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剑桥欧洲经济史

（第四卷）

16世纪、17世纪
不断扩张的欧洲经济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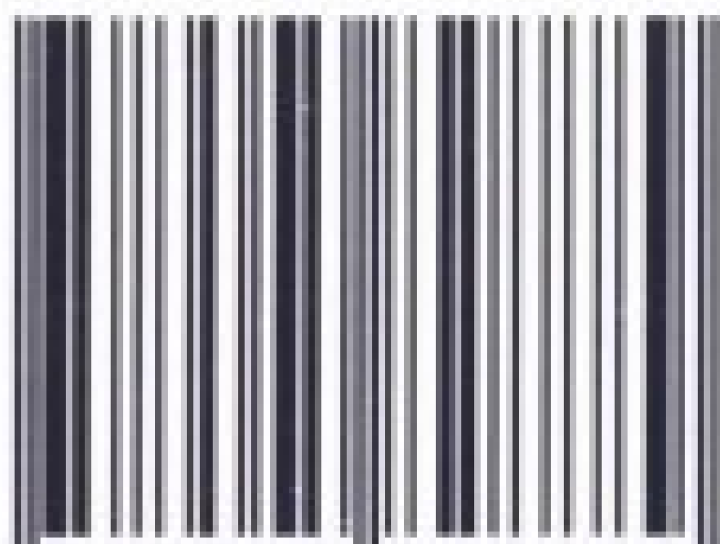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剑桥欧洲经济史

（第四卷）

16世纪、17世纪
不断扩张的欧洲经济



ISBN 7-5058-2888-6
F·2256 定价：86.00元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UME IV

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EDITED BY

E.E.RICH

Formerly Vere Harmsworth Professor of Imperial and Naval History in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and Master of St. Catharine's College

AND

C.H.WILSON

Professor of Modern History in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and Fellow of Jesus College

剑桥欧洲经济史

（第四卷）

16世纪、17世纪不断扩张的欧洲经济

E.E.里奇 C.H.威尔逊 主编

张锦冬 钟和 晏波 译

徐强 校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剑桥欧洲经济史. 第4卷，16世纪、17世纪不断扩张的欧洲经济/（英）波斯坦等主编；（英）里奇等分册主编；王春法等译.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10

书名原文：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SBN 7-5058-2888-6

Ⅰ. 剑…　Ⅱ. ①波…②里…③王…　Ⅲ. 经济史—欧洲—16～17世纪　Ⅳ. F1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072981号

剑桥欧洲经济史

（第四卷）

16世纪、17世纪不断扩张的欧洲经济

E. E. 里奇　C. H. 威尔逊　主编

张锦冬　钟和　晏波　译

徐强　校订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　邮编：100036

总编室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 esp. com. cn

电子邮件：esp@ esp. com. cn

北京天宇星印刷厂印刷

河北三佳装订厂装订

787×1092　16开　42.75印张　2插页　740000字

2003年10月第一版　2003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1500册

ISBN 7-5058-2888-6/ F・2256　定价：86.00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译　序

（一）

所谓经济史，无非就是有关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过程的历史，是历史演进的经济方面，是人类在一定历史时期经济活动的总称。但是，作为经济科学领域的一门边缘学科和基础学科，经济史又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发展演变的具体过程及其特殊规律的学科，它既为总结历史经验和预见未来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提供依据，也为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经济思想、学说、政策提供历史背景。没有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也就失去了依据和方向。

关于经济史在经济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似乎没有哪位经济学家会对此加以否认，而且许多国外著名经济学家也都精心撰写过经济史著作，如刘易斯关于经济增长与波动的研究、弗里德曼关于美国货币史的研究等等。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认为：要进行经济学研究，有三门专业知识必不可少，即经济史、经济理论与经济统计，其中经济史最为重要。"我愿立即指出，如果我重新开始研究经济学，而在这三门学科中只许任选一种，那么我就选择经济史"，这是因为，"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因此历史提供了

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①] 麦克洛斯基更在1976年对经济史与经济科学的关系做了精辟入里的论述。根据麦的观点，经济史学科本身的实际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即：它可以提供更多的经济事实，更好的经济事实，更好的经济理论，更好的经济政策，更好的经济学家；而经济学理论对经济史学科的贡献是：更多的事实，更好的事实，更好的假设，更好的数据解释，更好的历史学家。[②] 二战以后美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和繁荣，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即得益于战后初期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对经济周期史的研究以及对美国历史上国民收入账户的考察，美国经济史学家越来越多地使用经济模型和假设检验来研究经济史，从而使经济史的量化趋势日益明显。这一相得益彰的结合直到今天还为人们所津津乐道。[③]

遗憾的是，这样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在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中迄今还远未建立起来。在日常生活中，许多经济学家往往对经济史的功能和作用缺乏清楚的认识，甚至有这样那样的贬斥经济史的地位和作用的现象，而真正将经济理论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结合起来的中国学者，至今还不多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目前无论是国内的经济学理论研究，还是世界经济研究，之所以迟迟不能取得较大进展的一个突出原因就是经济史研究的严重滞后影响了理论研究的深入。

(二)

就其学科体系而言，经济史学科可谓枝广叶茂，体系庞大。

---

①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9页。
②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经济史”条。
③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经济史”条。

按其所涉及的地理范围，可以有国别经济史、区域经济史、国际经济史（研究国际经济的兴起、崩溃与复兴的历史过程及其内在规律）、世界经济史（以世界为整体来研究世界经济的形成和发展）等；按其涉及的经济部门，可以有农业经济史、工业经济史、银行金融史、贸易史等；按其所研究的历史年代，可以有古代经济史、近代经济史、现代经济史、当代经济史等；按其研究的经济行为主体，可以有企业史、企业家史、总统经济史等；按其研究的经济专题，又可以分为经济增长史、经济危机史、通货膨胀史、钱币史、经济政策史等等。事实上，我们所阅读的经济史著作，大体上都是按照这种学科分野来撰写的。

但是，如果从研究方法来分类，则所有的经济史著作大体上都可以分为两大类，即描述性经济史和分析性经济史。描述性的经济史著作主要对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客观描述，所回答的主要是"是什么"的问题，即在整个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经济方面是如何演进的？其轨迹如何？作用和意义如何？在这类经济史著作中，虽然我们也能够看出作者在立场、观点和方法乃至观察问题的角度上受到当时当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它们一般都没有系统的理论体系、概念体系以及特定的理论研究方法，而是通过对经济活动的详尽描述来尽可能全面地反映经济发展的客观进程。一般而言，由于描述性经济史著作是任何经济史研究的基础，也是任何严肃认真的经济分析的出发点，其学术价值也主要在于其对经济发展历史进程描述的客观性与全面性，因此，越是客观详尽的描述性经济史著作，就越能够为更为深入的经济史研究和经济分析提供一个研究平台和检验经济理论正确与否的实验场，其学术价值也就越高。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论从史出是这类著作的共同特征。

与此相反，分析性经济史主要依据某种具体的经济学理论对经济史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大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从而给出自己的解释，并以此证实或者证伪某种经济学理论。它们往往更强调特定经济学理论对于经济史研究的指导意义，强调将理论

与经济史研究结合起来，实际上是更加强调以论带史。在这里，明确的理论依据、内在逻辑严密的概念体系、清晰的理论分析框架以及严格的推理方法是这类著作的共同特点，其目的不仅仅是要了解经济史的一般演进过程，而且还要进一步解释某些经济事件在历史上发生的原因、内在的机理、具有的理论含义以及对于经济学理论演进的意义。在这方面，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福格尔和道格拉斯·诺思堪称先驱。麦迪森的《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1] 也主要是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的：收入增长与收入差距、影响增长实绩的原因以及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后所附的大量表格主要是对这些经济分析的数据支持。事实上，在经济史研究中强调用经济理论去研究历史已经成为目前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趋势。

当然，这种划分也不是绝对的，而且两者之间也不存在此高彼低之别。没有一套符合历史发展真实的描述性的经济史著作，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分析性经济史，更不要谈高水平的经济学理论研究。由于描述性经济史也存在着对某些具体经济现象的深入分析和探讨，分析性经济史也需要对经济发展过程给出基本的描述，因此，具体到一部经济史著作究竟是描述性的还是分析性的，只能依据其基本倾向性做出判断。据此推断，我们可以说《剑桥欧洲经济史》是一部描述性经济史著作，尽管其中的许多作者后来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思以及美籍俄国经济学家格申克隆等。

（三）

既然以应用经济理论研究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已是当前经济史研究的主流，而《剑桥欧洲经济史》又主要是一部传统的经济史著作，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选择这样一部著作介绍给国内学术界呢？这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

---

① 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 1997 年版。

其一，正由于目前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分析性经济史，因此，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版的世界经济史著作大都受过严重的“理论污染”，是试图从不同视角对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加以解释的著作，而纯粹的描述性经济史著作却比较少见。即使是奇波拉主编的《欧洲经济史》这样的综合性经济史著作，也具有明显的制度主义色彩，充满了作者个人对经济发展历史进程的新制度主义式理解和判断。从推动经济史研究深入的角度来看，这固然不错，但是，这样的分析性经济史著作越多，就越需要一些描述性的经济史著作，以帮助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经济发展的真实历史过程，以便从中抽象出经济演变的内在规律，并据此对现有经济理论的理论假定与观点进行证实或证伪的工作。这是因为，我们研究经济史，首先就要准确地知道经济发展的真实过程是怎样的，需要对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客观的描述。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够进一步解释它为什么是这样的，才能够对这样一个过程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以便从中发现规律性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首先需要的是一种比较纯粹的描述性的经济史著作，而不是以作者自己的眼光加以选取和解释的经济史著作。这样一种比较纯粹的经济史，事实上就是我们赖以进行研究的基础和标杆，也只有这种经济史著作，才能更好地发挥其经济理论实验场的功能，各种经济理论也才能够以不同的透镜来观察和解释这种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也才能够真正还经济发展的历史以本来面目。我国世界经济史的研究一直是经济史研究领域中的薄弱环节，因而极大地影响了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深入。比如说，建国以来，除了樊亢、宋则行等学者主编的四卷本《外国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和三卷本《世界经济史》（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著作以外，我们只有一些零散的国别经济史著作，如美国经济史、英国经济史、苏联经济史或者日本经济史等等，品种和数量都极为有限。近年来，国内学术界虽然也翻译了一些负有盛名的经济史著作，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布劳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

义》等，但是，从总体上看，这样一些经济史著作仍然属于分析性经济史之列，因而无法给我们提供一部比较纯粹的描述性经济史著作。

其二，《剑桥欧洲经济史》虽然名为欧洲经济史，但它所探讨和涉猎的范围绝不仅仅局限于欧洲，而是涵盖了世界各个主要地区的现代经济发展进程，包括美国、拉美、澳大利亚、东亚各国以及俄罗斯等国的现代经济发展进程，因而是一部事实上的世界经济史。我们知道，所谓世界经济史其含义基本有二：一是世界经济的历史，旨在探讨特定阶段世界经济的形成与发展，而这样一种作为人类历史新现象的世界经济孕育于地理大发现时期，形成于 19 世纪末期；二是世界的经济发展史，旨在探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内在规律，这样的世界经济史自有人类以来就已经出现了。就前者而言，宋则行、樊亢主编的《世界经济史》可为其代表；就后者而言，我们迄今还没有一部综合详尽的描述性世界经济史著作，而《剑桥欧洲经济史》恰好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陷。众所周知，现代经济增长是从欧洲、特别是从西欧起源的，欧洲经济的发展过程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整个世界的近代经济发展历程。因此，当我们以一种全球视角来考察和理解人类经济活动及其组织的演进时，欧洲作为人类先进经济活动的中心自然会首先进入我们的视野。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在关注欧洲之发达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同样关注其他地区之为何不发达以及如何才能走向发达，关注欧洲之发达是否是建立在其他国家之不发达的基础之上的，关注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或者说是否能够找到一种共同的繁荣之路。在这个意义上，《剑桥欧洲经济史》显然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它本身是研究欧洲的经济发展进程的，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欧洲国家，而是由此向外延伸至南北美洲、澳大利亚以及远东的日本、中国以及印度等，在欧洲国家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互动中研究和探索欧洲的经济发展规律，从而将整个世界纳入了欧洲经济史研究的范围，而将整个近代世界经济增长的过程视为欧洲起源并向全球扩散的过程，

这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不仅如此。由于欧洲联盟是目前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欧洲经济的一体化正在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因此，世界各国也都正在深入开展欧洲一体化历史与机制的研究，力求从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寻求欧洲统一的深刻内涵。对于正在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中的中国经济界来说，《剑桥欧洲经济史》这样一部具有全球视野的综合性经济史著作显然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借鉴。

其三，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现实与理论研究迫切需要这样一部描述性的经济史著作。我们知道，改革开放是最近二十余年来中国政治经济生活的主旋律，而目前中国也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体制改革与制度变迁进程。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以制度创新和制度演进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受到广泛的欢迎与青睐，而这种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诺思等学者对历史上欧洲制度变迁的研究。在其代表作《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诺思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和所有权理论等，对西方民族国家经济兴起的过程及原因给出了自己的独特解释，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经济史与经济理论的统一。但是，经济史是丰富多彩的，使用不同的视角去观察它必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和判断。那么，诺思从制度视角所给出的解释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他所得出的结论是否能够应用于中国的实际？推动这种历史变迁的内在机制又是怎样维持运转的？除了诺思的解释以外，我们从那一段历史中能否找到另外的解释或者说启迪？要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首先就需要我们对那一段历史、特别是制度创新与演进的历史做出尽可能客观详尽的描述，并在“知其然”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知其所以然”，进而由此确认诺思理论中的真理颗粒。惟其如此，学术界对以探讨历史上的经济制度变迁为主要内容的描述性经济史著作无疑有着巨大的社会需求，而《剑桥欧洲经济史》恰恰就是这样一部以欧洲从中世纪向现代经济转变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史著作。事实上，从《剑桥欧洲经济史》的总体结构中我们可以看出，它比较侧重于欧洲经济的崛起、特别是在此过程中的

制度变迁与政策调整问题，中世纪末期的欧洲经济及其向现代经济的转变在其总体结构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而这一部分恰恰是近年来西方学者非常重视而我国研究又极为薄弱的一部分。从编排体例上看，《剑桥欧洲经济史》不仅非常重视欧洲国家在中世纪的经济增长积累以及在这种转变过程中的制度变迁，而且将工业化及其随后的全球扩散置于一种自然延伸的历史进程中来考察，从而可以为我们理解和把握经济变革时期的制度演进过程与机理提供更加可靠与丰富的理论依据。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了解欧洲经济史、特别是从中世纪到现代转变过程中的经济史，也就不能完全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新制度经济学，在运用这些理论来解释和指导中国的经济发展现实方面也必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

(四)

《剑桥欧洲经济史》全书共八卷，是由著名经济史学家 **M. M.** 波斯坦等主编、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套权威经济史著作，在西方学术界久负盛名。这部著作的策划工作始于战火纷飞的 20 世纪 30 年代，约翰·克拉彭爵士和艾琳·鲍尔是丛书的主要发起人，第一卷出版于 1941 年，第八卷出版于 1989 年，从策划之始算起，历时近 60 年。数十年磨一书，这在世界出版史上可以说是比较少见的。

大体说来，《剑桥欧洲经济史》可以分为三部分：

其一，前三卷构成本书的第一部分，主要探讨欧洲经济从中世纪向现代的转变，即是什么因素决定了是欧洲经济而不是其他地区的经济率先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以及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不同经济活动领域所发生的变化。其中，第一卷《中世纪的农业生活》探讨了农业与农民生活的转变过程；第二卷《中世纪的贸易和工业》则探讨了欧洲内部不同国家之间经济联系的渠道与转变；第三卷《中世纪的经济组织和经济政策》则分析了随着经济活动领域与重点的变化，经济组织方式与政府政策的

相应转变与调整。事实上，近年来非常活跃的新制度经济学就是通过对这一时期欧洲经济转变的重新解释而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的。

其二，第四卷和第五卷构成了该书的第二部分，其重点是探讨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对外扩张以及欧洲的工业革命。其中，第四卷《16世纪、17世纪不断扩张的欧洲经济》主要分析经济增长与发展赖以进行的外部环境，即人口增长、科学思想与成就、价格、贸易模式与贸易线路、劳动力供应、大规模公司的组建以及重商主义理论与政策等；第五卷《近代早期的欧洲经济组织》则主要分析工业生产的核心机制、信贷机制、国际贸易机制以及国家作为生产者、消费者以及财政当局的功能等。作者的这一内容安排实际上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欧洲国家在现代经济中的突出地位早在工业化开始以前就已经确立了，仅仅从工业化自身并不足以回答为什么欧洲国家在长达三百余年的时间里一直支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

其三，本书的第三部分由第六卷、第七卷和第八卷组成，主要研究和分析工业革命以来包括美国与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其中，第六卷《工业革命及其以后的经济发展：收入、人口及技术变迁》重点分析工业革命展开的外部因素；第七卷《工业经济：资本、劳动力和企业》则主要分析现代工业经济增长的内部因素，如资本、劳动力以及企业家资源的供应等，并且主要是按国家展开分析的，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美国、日本和俄罗斯等；第八卷《工业经济：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发展》主要分析工业革命以来欧洲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及其演变。因此，大体上说，这一部分的三卷主要分析工业化的基础条件、增长因素以及政府政策变化。

应该指出的是，作为一部欧洲视角的经济史著作，《剑桥欧洲经济史》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那样的欧洲中心论倾向，对此我们应予以注意。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是最先在欧洲、特别是在西欧发源的。无论是从工业化的国际扩散来说，还是从世界经济形

成和发展的角度来看，欧洲在近现代世界经济发展中都居于中心地位。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我们接受或者说承认欧洲中心论的合理性。欧洲中心论是一种错误的历史观，我们必须加以批判，但这绝不是说我们应该拒绝接受欧洲经济发展进程所昭示的发展模式的普遍意义。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在强调各民族经济发展的独特性的同时，又往往忽略了近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致性，即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发端于欧洲的工业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欧洲人所确立的制度安排、规则选择等至今仍然起着主导作用。承认这一点，事实上也就是承认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至于欧洲国家的这种中心地位客观上是否合理，是否增进了整个人类的福利，那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需要专门加以探讨。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在哪一个时代，关注站在时代发展最前列的国家或地区，把它们作为自己模仿的榜样和赶超的对象，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理性的行为，也是一种自然的选择。从这个角度来看，把欧洲视为现代世界经济发育和成长的中心因而予以充分注意，是无可厚非的，这种做法本身也并不一定就是“欧洲中心论”的体现。当然，对于由于欧洲经济发展优于其他地区而形成的欧洲种族优越论，以及书本中可能隐含的种种欧洲殖民倾向以及作者出于自身立场、观点等对历史事实的不同理解甚至曲解，是应该予以注意和批判的。

（五）

本书的中文版翻译可谓历经坎坷，备尝艰辛。早在 1998 年，经济科学出版社就斥巨资向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购买了《剑桥欧洲经济史》（八卷本）的中文版权，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王春法博士组织翻译，经济科学出版社方面则由卢元孝编审负责编辑事宜。双方在多次协商的基础上制定了严格的进度计划和质量标准。在随后四年多的时间里，由于主译人员的调整及其工作岗位的变化，而且翻译及编辑加工的难度

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像，致使译稿完成的时间一再延迟，以致在原定的 2001 年 12 月这个最终出版日期之前，我们不得不致函剑桥大学出版社，请求推迟出版时间，并得到了理解与慷慨允诺。在这里，我们要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同行们，没有他们的理解与帮助，这样一项文化工程的命运是难以逆料的。同时，我们也要感谢经济科学出版社参与这项工作的各位编辑，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和无私奉献，这部著作是难以完成的；感谢各位主译人员，在市场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的情况下，他们能够甘于寂寞，勇于承担起书稿翻译的重任，从而为中国学术的繁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种精神又是何等的可贵！最后，我们还要特别感谢经济科学出版社的领导，没有他们的远见卓识和非凡气魄，这样一部宏大的经济史著作是不可能在中国面世的。目前，中国经济史学界正在经历一场声势浩大的“融入世界”运动，如果本书能够对此有所助益的话，则幸莫大焉。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我们一直未放松对译稿质量的要求，但是，翻译出版这样一部大型的经济史著作，还是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比如说，原书所引文献涉及大小语种数以十计，古今雅俚，纷繁复杂，其中部分虽经多方努力而无法翻译者，只好照录存疑。又比如，由于本书所涉及人名、地名繁多，时间跨度甚大，个别人名、地名因卷而异的情况也恐难以避免。另外，由于译者水平所限，译稿中其他错误也在所难免。所有这些都希望读者不吝指教，以期未来再版时加以改进。

王春法

2002 年 9 月于北京

前　言

自 1948 年规划本卷及下一卷要描述更为广阔世界（15、16 世纪的地理发现在一种全新的意义上将其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史以来，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兴趣显然已经变得更为广泛而积极了。这种兴趣的扩大在一定意义上是由于随着政治的发展而活跃起来的历史和经济研究，而后者又是新兴民族主义的知识工具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的研究兴趣集中于当地的社会与经济以及它们对欧洲商人、传教士、殖民者和行政官员们的反应。新的研究要求对以前已为人们广为接受的许多观点进行重新评价，并鼓励对欧洲史的许多方面进行新的探索，以至欧洲研究也获得新的推动力，欧洲扩张的动机、机构和成就也得到更为细致的讨论，并受到来自各方的更有说服力的批评。我们现在进行的这种讨论也必须是系统的，深入的，但它并不是为了反对一种认为国旗所到之处贸易随之而来的简单理论，而是以阐明二元社会、不发达地区、从属经济、初级生产者（国）、贸易条件、资本形成、受到保护的市场、大量购买和殖民地民族主义这些概念展开讨论。殖民地条约（*the pacte coloniale*）变得高度复杂了。

许多处理帝国主义问题的现代方法都是意识形态的，而且很大程度上都是依照法律和宪法的。然而，当国家的地位获得以后，重心就越来越转移到经济上了。当外部投资枯竭或被排挤出去，人们对新兴国家的同情心被收回，新兴国家不得不去平衡它们自己的经济，以它们能付得起的价格为其国内市场进行生产，以对消费者有吸引力的价格和数量为世界市场生产，并且还得允许必需的国外采购时，这种状况的出现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新兴

国家，不管是作为援助的接受者还是正在成长发育的独立经济的管理者，都是世界贸易体系的组成部分；就像它们从中诞生的殖民地一样。这种情况与老殖民地重商主义体系大不相同，后者有《航海条例》（Navigation Acts）和《糖税》（Sugar Duties），有殖民地条约和贸易、财政、海运业的独占政策（*exclusif* policy）。它与双重托管制（Dual Mandate System）也绝不相同，后者以相当简单的规定就可以使热带地区的资源为文明世界所利用，也使文明世界的资源为热带的人们所利用。因为在这种托管方式中必然隐含着欧洲优先的因素，至少在评价和控制局面方面是如此；但是，[XI] 这种优先权作为一种基本假定已经不存在了，只是作为一种经济上的必需而再现。

新兴的不发达地区必须在世界经济的大环境之中生存，这一现实没有它们必须自己决定怎么去做、必须去执行自己的决策这一事实更激动人心，但这并非没有意义。它们的独立地位和行动自由都是新生事物，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它们复杂的经济状况是一系列事件持续的结果，通过海上航线将欧洲人带到了它们国家的那些事件，也是由潜藏在那些事件背后的目的和思想所造成的。由于 15 世纪后半叶葡萄牙人的航海大发现，扩张运动随之拉开了序幕，它所带来的变化使西欧和世界其他大洲——非洲、美洲、亚洲，最后是澳洲——都被带进一种崭新的、更加紧密的、持续的经济联系之中。一种新的世界经济被创造出来，在这种经济中，里斯本（Lisbon）和贸易商行（the *Casa da Contratación*）控制了世界的香料贸易，指挥着它们的香料船队抵达它们的贸易中心果阿（Goa），然后停泊于塔霍河（Tagus）。事实证明葡萄牙的管理和财政技巧是不适于这种营利事业的，而荷兰人显示了他们作为干涉他人事务者（interloper，来自荷兰语的一个词）的能力，“作为西班牙国王臣民的安特卫普人拥有极为富足的资金，它们把香料全部控制在自己手中，通常提前拿钱买回它们，由此形成彻底的垄断”。这种抱怨来自于英国冒险商公司（Merchant Adventurers）的秘书，他更愿意他们自己获得这种垄断

地位；荷兰控制下的香料贸易对它们的波罗的海和西北欧贸易构成极为重要的补充，这是一个事实，而不是因人而异的看法。这种新兴的且在不断扩大的香料和东方产品贸易实际上被纳入到包括整个欧洲，实际上跨大西洋的贸易体系之中。

在葡萄牙人失去他们的控制之前，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包括东非主要港口在内的贸易模式，在这些港口，来自西非海岸的黑人奴隶在促进殖民地开拓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殖民地开拓从大西洋诸岛一直延伸到巴西和美洲大陆。糖类贸易使欧洲、非洲和美洲联系在一起，海运业是其重要的纽带。同样，在葡萄牙的支配地位被彻底打破之前，来自印加（Inca）王国和阿兹特克（Aztec）王国的掠夺物、此前从银矿获得的巨额收益都早已开始流入西班牙的国库中了，而哈布斯堡（Habsburg）国王们却发现：他们赖以获得帝国称号并得以维持这一称号的欧洲大银行家们都开始被卡斯蒂利亚（Castilian）对硬币的控制——正是这种硬币而不是西班牙王朝的世袭收入正在扰乱欧洲的币制——所深深吸引。【XII】

到了16世纪末，出产香料诸岛的农业经济、印度大部分地区的国内工业、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阿拉伯人的贸易经济、西非的本土社会、加勒比群岛（Caribbean islands）和西属美洲总督管辖两个省的广大地区的生活方式，无一不深受欧洲人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海上新航线被发现，与非洲、亚洲和美洲这些新世界接触变得更加容易和经常，欧洲自身也处在剧烈的重组之中。当然与非洲和亚洲的贸易通道早就开启了，尽管美洲此前不为人知，而且事实上在它被发现之后的许多年人们还一直难以承认这块独立的大陆。穿越亚洲的“丝绸之路”把中国的产品带到罗马，中世纪商人从事过殖民地（*kolonialwaren*）贸易，而为现有的营利交易［它是威尼斯（Venice）、热那亚（Genoa）和比萨（Pisa）财富的主要来源］寻找新的渠道与渴望建立新的贸易这两个动机共同推动了15世纪的海上探险。当然，这种改变的过程并不彻底，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依然处于与世界其他地区经济潮流的隔绝之中。但在人们对此持有绝对的保留意见时，事实依然是：世界

经济被地理大发现及其被利用的方式带入一种全新的、持久的统一之中。

编者们计划以两卷的篇幅来论述这种世界经济的产生及其特点，他们希望能对导致欧洲进行海外贸易和殖民定居的背景、在很大程度上由这种背景所衍生的动机、欧洲人通过对非欧洲商品、土地甚至人民的控制来解决满足自身需求这一问题的历史经验、公认的观念和制度进行客观的记述。

视角当然是欧洲人的。这来源于一种信念：这种世界经济从它所受的激励、它的组织和它所关注的主要事务都**是**欧洲的。当然，对非欧洲社会所造成的影响与欧洲社会一样值得注意，这种影响有时是直接的和强大的，比如，在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加勒比印第安人（Carib Indians）社会实质上被消灭了，或者，墨西哥和秘鲁王国（Mexican and Peruvian kingdoms）被西班牙征服者推翻。但非欧洲社会的反应通常更加深隐一些，因而对它的认[XIII]识要缓慢一些。法国人在 19 世纪晚期把这个过程描述为“蔓延（*tache d' huile*）”的过程，欧洲观念的逐渐渗透和影响让人联想到一滴油在一张吸墨水纸上蔓延的情形。对非欧洲社会而言，其结果无论如何都只是换一个角度，运用不同的技巧和证据来讲述的一个别样的故事（即使不是根本不同的），零碎、刺激或者仅仅是阴险的。首先，即使从非欧洲人的观点来看，也必须采用欧洲人的视角。因为很显然，欧洲人是新纽带的主动创造者。正是欧洲发现了新世界，而不是新世界发现了欧洲，欧洲人控制了由此形成的交换，根据他们的需要来进行贸易或殖民；而不是亚洲人、美洲印第安人或印度尼西亚人，他们把解救自己的良方寄托在与欧洲人的联系上。

然而，在以欧洲人的观点来看这些问题时，我们不应轻易地忽视这样的事实：正是处于骚动状态的、向现存的制度和观念挑战的欧洲把新世界带入它的轨道。通向新世界的全新的、定期的和相对可靠的航线也对导致发生于欧洲的变化产生了相当大的作用。要将对这个问题研究的两个方面截然分开是困难的，在一定

程度上说也是不适当的，而且编者们也无意做这种尝试。但是，他们尝试在集中探讨这一问题的本卷中论述欧洲对这一局面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包括人口、货币、劳动力缺乏、科学成就、农业发展和商业组织。在下一卷里，社会阶级和贸易技巧发展的结果，以及更为重要的经济方案所产生的作用将会得到探讨。这两卷之间没有编年史的先后顺序，也没有逻辑的区分。它们是一个整体，虽然做了一些不同方面的分述，但综合的评述还是把它们联系在一起。而且，之所以某些内容被编排在这一卷或那一卷，很大程度上仅仅是因为作者不是在指定的时间完成这些章节。

尽管在这两卷中没有编年史上的分工，但也有必要强调在这样的研究中年代顺序还是十分重要的。其风险并不在于搞乱了事实的先后次序——结构糟糕的叙述最终将会自我崩溃——而是事件和运动将不会在其他领域的当代发展背景中得到认识。例如，新世界在这样一个欧洲——在这里，民族国家的全权性是一个崭新却被普遍接受的思想——眼前被打开，我们很难夸大由这一事实所导致的结果。民族国家肯定不是15世纪的新生事物，无论它 【XIV】 的概念和主张、它的忠诚和仇恨、它的法律和经济信条，都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但由于它与改革了的国家教会联合，它拥有了一种新的权力和目标；为国民经济提供思想和行政机制的民族政治家们非常重视来自正在被展现的海外地区的潜在财富，他们把这些地区纳入他们的理论与实践之中。

其结果比那些产生于类似背景的结果还要惊人——对外部空间的探险方式与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相互冲突的时代相合，每一个意识形态都由一个巨大的全球霸主所主导。新世界的经济优势是很明显的（尽管不容易开发），而且海外领地很容易、很自然地落入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背景之中，而这种民族经济对15世纪事实上也包括以后世纪的欧洲政治家们似乎是举足轻重。

第一个挑战，欧洲的反应受到伊比利亚国家（Iberian states）统治地位的严重影响；不仅欧洲哈布斯堡王朝（Habsturg monar-

chy）的力量很大程度上由于它的海外领地而获得承认，而且那个王朝和它所代表的世界秩序的敌对者也由于直接源于新世界的恐惧、抱负和仇恨而感到痛苦。“深入思考一下这个菲利普（Phillippe）是怎样被屈尊的，我的意思是，首先从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开始的”，理查德·哈克卢特（Richard Hakluyt）这样写道，并且用一种其尖刻程度有所减弱的语调接着说，“如果你在西印度群岛触犯了他，碰一下他的心爱之物，带走他的财宝，那是战争的关键（*nervus belli*），他不能在西印度群岛拥有它，他的一伙老士兵很快就会土崩瓦解，他的意志被击垮了，他的力量消失了，他的骄傲无踪影了，他的专横被彻底制服了。”

英国与西班牙不断增强的敌意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海外的对抗，这种敌意从卡托·康布雷西斯条约（the Treaty of Cateau Cambrésis）中菲利普（Phillip）支持伊丽莎白（Elizabeth）而反对苏格兰玛丽女王（Mary Queen of Scots）的王权到为无敌舰队（Armada）和德雷克舰队（Drake' s）对加的斯（Cadiz）的袭击作准备等事件上逐步得到增强。因为德文郡（Devonshire）水兵在英吉利海峡的不断（*larrecins sans fin*）出现、德雷克舰队惊人的掠夺性环球航行，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追溯到西班牙在圣胡安德乌洛阿（San Juan d' Ulloa）对英国船只的攻击和霍金斯（Hawkins）试图为西班牙种植园主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西非奴隶——这种解释也许天真，但不一定不合适。

在这里，不可能有单一的因果关系，也没有对相关的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进行认真评估的任何可能性。【xv】但必须承认，欧洲人对待新发现的世界以及在那里组织生产和贸易的态度是十分重要的。这些欧洲人无论如何都是他们国家人口中的不稳定因素。有时受极度的贪婪所驱使，有时是由传教的热情，有时是由一些简单的个人原因所致，他们往往深受欧洲国家之间的敌对和在这些对抗中所蕴含的理论的影响；事实上，主要是理论而不是现实的影响，尤其在经济事务中。由于欧洲的日常生活的改变缓慢，而且它易受影响，但受到产品的流通、财富的创造和新世界所提

供的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的程度很小（通常居于第四或第五位甚至更远），不断增强其对人们生活的控制和对他们思想的统治的民族国家不懈地将他们的努力引导到金银上去，这是海外自治领地最闪光的产品。

"金条就是军费"这一任何时代都似乎是无可非议的信条在雇佣兵的时代更是如此，因此，黄灿灿的金条就更能驱使人。这一信条也导致将贸易平衡视为当务之急，使人们以这样一种方式去努力管理与殖民地一起发展起来的贸易，以便在母国的资金平衡表上保持国家的贸易平衡，并且把来自航运业、金融和海上保险的增加额作为净收入。

简言之，殖民地世界十分适合重商主义。以《航海条例》(Navigation Acts) 为代表的旧殖民体系（Old Colonial System）从克伦威尔（Cromwellian）时代的英国对荷兰及其昌盛的敌对关系中衍生出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18 世纪的海上和殖民地战争只是殖民和贸易对抗、各敌对殖民体系之间冲突的部分结果。其中有一些明显的纯粹个人敌对的因素——像东甘（Dongan）与德·拉·巴勒（de la Barre)、克莱夫（Clive）与迪普莱克斯（Dupleix)、华盛顿与蒙特卡姆（Montcalm）之间的敌对——更有哈得逊湾公司（Hudson' s Bay Company)、俄亥俄公司（Ohio Company）和北方公司（Compagnie du Nord）之间的贸易竞争，或者（英国的）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与（法国的）东印度公司(Compagnie des Indes Orientales) 之间的竞争，或者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与西印度公司（the Dutch East and West India Company）之间的竞争，还有波旁（Bourbon）太阳王与海上统治者斯图尔特(Stuart) 和威尔夫（Guelph）之间不断增加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一种为争夺其重要性稳步增加的海外殖民地和海外贸易而产生的对立。

欧洲在财富、战略力量和新世界的领地方面的竞争经历了许多阶段，但海外殖民地的宪法关系和经济发展两方面都完全被以下事实所决定：它们与一个民族经济及其平衡都是重大问题的时 【XVI】

代联系在一起。重心一直在变化，用以实现目标的策略也发生巨大变化，而能控制那些策略的社会阶级也是如此。但是，结果一直是一样的：把地球两端联系在一起，并且让这种状态永存下去，因为在其形成时代被控制的民族经济的模式也被强加给了东方和西方。

欧洲的利益在这种关系中应该居于支配地位——这种支配地位达到如此的程度，甚至当政治控制被解除以后，经济依附依然作为一个持久的传统而继续存在——这部分是由于形成这种联系的欧洲人的意志和能力，部分是由于欧洲国家的野心与组织。不过更多地是由经济环境所造成的。无论欧洲人带着什么样的动机去进行探险，他们发现最多的是广阔、肥沃却十分荒芜的空地，它们最明显的功用就是生产欧洲工业所急需的原材料。它们原先的用途即生产香料和金条很快就显得不合时宜，尽管并没有被完全放弃。当时烟草不得不在欧洲消费品市场中寻求恰当的位置，而且制毡的毛皮和生活用糖已经成为最迫切需要的原材料，而新世界却能为旧大陆的消费大量生产这些原材料。

这种结果是让人失望的，因为人们本来有很大的希望获得沥青、松香、焦油、大麻、直纹圆材和固定索具——所有这些海军装备的辅助材料迄今都是来自于与波罗的海国家（the Baltic）的极其脆弱的贸易。纽芬兰大浅滩（the Grand Banks of Newfoundland）让人难以置信的财富——游弋其中的鳎长一码，尤其是“出产大量的被野蛮人（Savages）叫作鳕（baccaloes）的那种鱼”，和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同时代的一位作者这样写道——的确导致了航运业的大发展，以至于横跨大西洋几乎成了一件平常事。有报告说，1578年后，每年有30~50艘英国船前往大浅滩；西班牙人派约100艘船去捕鳕，20或30艘船去捕鲸，从而使比斯开湾船舶的总吨位达到5 000或6 000吨；葡萄牙的捕鳕船队大约50艘，总吨位达到3 000吨；法国人通常派约150艘船，但每艘一般都不超过40吨，总吨位大约7 000吨。在大浅滩捕鱼显然是一个相当可观的事业，其自身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而且还

影响到制盐业、造船业的分布和成千上万的欧洲消费者的家庭习惯。它也是著名的水手摇篮，在当时的政治经济著作中占有独特的地位。但捕鱼业并不能满足欧洲国家对军火的实际需要；与海外世界的历次接触都不能满足这一要求，直到17世纪中叶印度大陆开始生产硝酸钾并能充足供应时为止；而印度大陆生产的这种产品是制成品而非原材料。 【XVII】

尽管有这样一些失望和延迟，新发现陆地所潜藏的巨大财富给这些欧洲强国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他们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以将它们纳入它们国民经济的控制之下。最终结果是他们为争夺最诱人地区的独自控制权——这意味着独占——而互相斗争（以和平或战争方式），然后把这些地区作为他们的卫星国来对待。在远离他们自己的祖国和他们力量的源泉，并且在几乎与世隔绝的状态下发号施令的欧洲人应该能够把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贸易强加给世界其他地区，这是产生这样一种结果的必要条件——即那时所产生的世界经济应该是欧洲模式的翻版，受基督教和西欧的观念和教义的统治。最终它会受西欧人的统治和管理，这一事实本身大大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西欧的世界观占据了统治地位。

欧洲利益最终占优势这是很容易想像的，对于欧洲的历史学家来说尤其如此；但它本身确实是世界历史上最令人惊讶和影响深远的现象之一。在带来这种结果的诸多因素中，欧洲人的世界观和目的也许是重要的，但主要应归因于历史上简单偶发事件。因为对海洋奥秘的探索是欧洲人视野扩大的一个组成部分。打开新世界的欧洲人改造了他们的船只，增进了他们关于航海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开始了一场技术革命，这使他们能够为他们发现的海外市场提供商品并能满足日益扩大的对原材料的需求。所有这些变化促成了一场共同加入欧洲大家庭和对海外领地财富进行瓜分的运动之中，这使海外扩张成为可能的、可取的甚至是必需的。

虽然贸易在正常情况下是买卖双方互惠的交易。但有时必然会对一方或另一方更有利一些；希望获得可资利用的有利地位以

便得到最大的利益在大多数的贸易中都永远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是任何一种贸易体系的共同之处，16 世纪欧洲的技术优势再加上他们喜欢冒险的性格，这些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他们获得了暂时的优势。但是殖民经济长期服务于欧洲市场并由此其得以维持，这不仅是经济条件所产生的结果，而且也是白种人在施加影响和巩固宗主权时期使用军事力量的结果。科尔特斯（Cortes）仅用了 600 人就征服了蒙提祖马二世（the great Montezuma）和墨西哥王国。他们只有 15 支滑膛枪和 7 门用石子作炮弹的小炮。印第安人援军和后来的增援在对墨西哥的最后征服中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科尔提斯只是用他自己的力量获得了首次迅速的胜利。此类事例不胜枚举：一小撮清教徒殖民者在潘农基（Pannunky）玉米地战斗中战胜了印第安游牧部落；一伙获胜的莫霍克人（Mohawks）被塞缪尔·德·尚普兰（Samuel de Champlain）和他惟一一个白人伙伴所驱散；或者一支阿拉伯舰队在霍尔木兹（Ormuz）海峡受到英国船只围攻并被击败，波斯王（Shah）曾强迫这些英国船只加入他的联盟。这种故事从对印度的征服到阿散蒂（Ashanti）和祖鲁（Zulu）战争，直到现代的乌姆杜尔曼（Omdurman）、毛利（Maori）和缅甸（Burma）战争一再被重演。正像故事的开始科尔提斯和塞缪尔·德·尚普兰所遇到的情况那样，在大多数情况下欧洲人都会得到来自当地土著同盟者的帮助；通常的结局都是欧洲军队支持一个能够满足胜利的欧洲人一切要求的当地政府。但这些只是同一个主题的各种变化——这一主题就是欧洲军队曾经是，并且确信永远是胜利者。这里没有考虑非欧洲人的英勇、忠诚、马术或战术。当然一部分是由于战术的原因，这是欧洲人在长期的作战过程中和他们的终身职业兵役制中获得的；另一方面是由于火药的使用所带来的恐怖和致命效果以及火药的使用者由他们的技术优势所产生的自信。[XVIII]

然而，单是火药一项还不足以养成 15 世纪和 16 世纪欧洲人超常的自信。这一时期文学和艺术所取得的辉煌成就，那时所建造的宫殿、教堂和大学的经久不衰、富丽堂皇，这些成就都是产

生于这样的一个欧洲之中的：当时农业无疑是其主要产业，农业是建立在无知而受压迫的农民之上的，而城市生活为垄断行会和政务会所统治，新的产业不得不躲避到农村地区。有权势的贵族能成为，也常常是巨额财富和高雅文化的主人；但事实上很少有贵族到海外冒险。引人瞩目的是，绝大多数的冒险家都是中产阶级职业出身的（有些是职业朝臣出身的），他们都是一些有积极进取精神和性格的人，他们却来自一个这样的社会和国内环境：让他们对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文化和教养保持一种敬畏之情。因为欧洲人不但精力充沛而且粗鲁；他们来自这样一个大陆，尽管其民族国家很有活力，但君主们在为他们不稳定的王位而互相争斗，与来犯之敌一争高下。【XIX】

要把欧洲置于与东方诸王国的财富与力量相匹配的位置，也许最好是查阅一下 1615 年托马斯·罗爵士（Sir Thomas Roe）拜见莫卧儿大帝（the Great Moghul）的记录，当时他是英国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的代表。作为一位有才干、有教养的人，一位在欧洲不可小看的君主的官方使节（尽管作为个人是大有非议的），罗为了得到贸易和联盟条约在莫卧儿朝廷逗留了几乎三年。他获得了他的前任威廉·爱德华兹（William Edwards）所没有得到的许多东西——爱德华兹只是发现大帝是一个乐于接受英国新奇事物的人；尽管罗想方设法要为英国的贸易公司获得一个可靠的条款，但最后还是失败了。他的失败部分是由于他确信贸易是莫卧儿大帝不甚重视的一件事务；但它也使罗认识到，在像莫卧儿大帝这样富裕而强大的君主与像英国这样一个贫穷的小王国的统治者之间签订条约似乎没有多大意义。问题很清楚，由于两位统治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否认的差别。

托马斯·罗，实际上所有欧洲人都是一样，常常以平等的身份对待东方伟大的国王们，在与他们打交道时通常都做出高傲的姿态，从不以恳求者的身份出现。国王的内侍提示他必须以这样的礼节来拜见苏尔坦·普维斯［Sultan Purveis，莫卧儿大帝的次子，巴拉普（Barampore）的统治者］：脱帽，以头触地。罗回答

说他“很荣幸去拜见王子，并被免去侍者的礼仪”。他要求获得与波斯王和土耳其大帝的使节同样的礼遇，而且当他前去拜见莫卧儿大帝本人时，他事先要求自己应该按照英国的礼节举止，“以便我能行为得体、正确”。

罗是一个让人钦佩的使节，他所获得的礼遇是此前任何一个欧洲人都没有享有过的。他的成就巨大，他的叙述是最能透露内情的。但像他这样的自信在当时并不罕见，英吉利人也并不是惟一一个感觉如此之好的民族。罗在日记中所描述的那种气氛在那个世纪和那个时期屡见不鲜，其中多半还是托马斯·罗重述前人的。正是军人的自信引起了战争；而火药不但在解释战争时起到【xx】一定作用，它更能解释为什么它会被极易对之忿恨不止的君主们所接受，他们的文化水平通常不逊于欧洲人展示给他们的任何东西。但是无论如何罗的出使并没有暗示如果达不到目的将会军事干预。对于印度的国王而言，任何这样的暗示都是十分可笑的。而事实上罗自己也坚信军事行动总是会榨干海外贸易的利益，葡萄牙人“自从他们占领并守卫东印度群岛以来，从未获得任何好处”，而用刀剑夺取殖民地的荷兰人发现“对他们的无情惩罚抵消了所有的获得”。他也宣称英国东印度公司仅靠在印度的贸易努力还不能把印度的财富掌握在英国人手中，因为根据当地严苛的税收制度、租金费和服务费，财富都集中在那些贵族和统治者手中，而不可能被那些众多的潜在消费者所掌握，事实确实如此。尽管这些东方的君主们对西方的奢侈品非常贪婪，但只有一样东西他们必须从欧洲获得——火器。因此，为了得到印度的财富，罗主张，东印度公司一定要通过出售给统治者武器来参与这个过程，从而分享统治者们的利益。罗所提出的这个办法肯定不是一个新的政策，但当它被完全采纳时，事实证明它对印度产生了最严重的后果，它是将印度与英国经济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基础，它比当时可能形成的任何一种纯粹的贸易关系要持久得多。

然而，这种发展在罗当使节时还没有成为事实。当然他的保证和印度人对他的保证的接受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私人性质。但

是他们也代表了一种具有更广泛意义的事物。17 世纪依然被人们的自信向前推进，依然为人们的探索精神所激励，这种精神曾使 15 世纪的人们告别已知的大片土地，勇敢地驶向未经探索的海域。17 世纪——“一个拥有巨大能量的时代”——据说“那个时代生命过多过旺以致不能浓缩为一个公式”。这种概括同样适用于欧洲与海外世界的关系模式得以确立的一切世纪；而且这种模式是以这种形式被确立的：欧洲人的需求、欧洲人的价值、欧洲人的人格占统治地位。

民族国家和军事实力说明了大部分问题。能为远程航行（*Voyages de longue course*）提供装备和资助的经济技术同样重要，因为这样可以避免航程中的危险，可以在许多参与者中间分散风险和利益。但是世界贸易的筹资不仅要求有为探险担保的能力，【xxi】而且还必须具有使用这些现有技巧的信心和勇气以及能使交易有利可图的有关世界市场和世界供应的知识。因此，它更深远的历史意义是欧洲商人在这一时期可以很轻易地接连不断地进入海外市场，在这个时期，他们作为个人而且通常作为拥立国王的人得到了承认，他们“商业的功绩”可以在一种全新的意义上进行理直气壮地辩护。

在 15 世纪的欧洲，重利法和正统教会对于价格的看法都没有被放弃，合股、保险和贷款的技巧还没有简单到使商人能彻底摆脱一切限制。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兴起之间的可能联系已经有大量的论著出现，无论是从逻辑或是从年代学的观点看都没有得出必然的结论。无论宗教改革前或改革后，对海外市场都有太多的贪婪之心，而且在 14 世纪许多大商人、商业公司都以与 16 世纪同样的技巧、按照同样的惯例进行经营。对 14 世纪商人的个案研究还不多见，但是他们一出现就具有让人信服的力量。诸如布里斯托尔的约翰·坎尼恩哥（John Cannynge of Bristol），他在资助爱德华四世（Edward IV）争夺英国王位的战役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他让他的私人舰队驶向海上；像金首饰商、伦敦市长爱德华·肖（Edward Shaw）爵士，他们也为资助爱德华四世做了不

少事，他个人曾献给理查德三世（Richard III）一个王冠，在亨利七世（Henry VII）时期他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理查德·惠廷顿（Richard Whittington），先后三次荣任伦敦市长大人，1405~1422年一直是威斯特敏斯特（Staple of Westminster）市长，他是一个意志坚强、富于经验并且富有的早期著名商人的典型，当广阔的新世界的地平线在他们面前打开时，他随时准备与国王和海军将军们共同冒险。有时是像琼·安哥（Jean Ango）和布列塔尼（Britanny）港的船主们（armateurs），或者是布里斯托（Bristol）的特许商业协会这样的人或机构带领和组织大家进行这种冒险。但不管是他们引导统治者或是他们被君主们所引导，欧洲的商人在一定意义上都是资本家，他们与新世界和东方的人们绝不相同，即使这些地区的人们早就从事商品生产了。

绝大部分从事探险和发现的欧洲人、初级商品的生产者都是来自于农业。在形成时期，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冒险家”（根据这个词圆满的历史意义）。他们满载着成船的欧洲商品冒险前进，从不知道他们要把这些商品卖到什么地方，卖给谁——在这一点[xxii]上与那些在出发之前就已知道他们的主顾和市场的商人大不相同。因此他们的贸易几乎必然是建立在物物交换基础上的；这种做法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最后形成贸易路线和习惯。在易货贸易中，欧洲人与非欧洲人对价值和资本的认识是显然不同的，建立在货币基础上的贸易更是如此。因为对欧洲商人而言，不管他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商人的职能就是贱买贵卖，他在交易中的存货就是他的资本，从中可以囤积居奇，获取高额利润，而不用考虑它的使用价值，而非欧洲人是用另外一套价值尺度进行交易的（直到他也采用欧洲人的做法为止）。

这种情形随着社会的不同而不同。极端的情况是，欧洲人遇到了北美的印第安人并用别的东西换他们的皮毛，而印第安人多年来一直认为这是一个简单的礼物交换过程，只是他们把不想要的多余东西转手而已，没有任何价值意识，对其数量也很少在意。对他们而言，任何一种铁器哪怕小到一根针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而他们通常一年内可以搞到无数张毛皮，可以说要多少有多少。与欧洲人进行贸易的这种基本方式同样可以在西非、南美和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地区发现。甚至在交易习惯已经形成以及一部分人已经通过与欧洲人的贸易从而在社会中具有了商人功能和地位的情况下，固有的普遍经济观念和习惯也使他们与他们的欧洲同行鲜明地区别开来。他们的动机也是极不相同的，而且令他们感到惊诧的是，欧洲人发现在市场被满足之前本地产品的供应已经枯竭了，而且价格的上升不但没有刺激生产反而削减了生产，因为非欧洲人那时还十分容易满足他们的眼前需要。他们也发现，那些被满足的需求只是人们浅层次的需求，他们对长远收益很少感兴趣，而这却是欧洲人所看重的。至于他们积累财富的欲望，也许仅仅是出于贪婪，也许是出于炫耀；这种动机也许会导致积聚物品，但很少会上升为一种资本去追求，而资本是一种再投资以得到更多收益的手段。在非欧洲人那里没有对无穷利益的追逐(*appetitus divitiarum infinitus*)，而这正被欧洲人作为永恒刺激而接受下来。

所以，迟至 18 世纪中叶，即使在毛皮商人认识到他们是在与一群职业印第安商人在打交道时，他们还是没有办法说服他们把所有的捕获物都带到市场上去。同样，印度尼西亚的荷兰人也苦于找不到经济动力以刺激为欧洲市场生产香料。他们不得不诉诸 **[XXIII]** 于战争，借助于少量的武器供应，充分利用“意外事故”，强迫他们帮助维持其统治的当地统治者供货。同样的事情在西非一再发生，欧洲人的支持成了当地首领们之间力量平衡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北美，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同样被迫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获得当地同盟者的效忠，不仅在他们相互之间的斗争中支持他们，而且帮助他们控制和尽可能地扩大毛皮交易。(欧洲人）所供应的物品确实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生活方式，使北美印第安人放弃了他们的弓与箭，依赖于整船的火器和火药。但是，尽管当地社会依赖于欧洲人的供应，但按照欧洲人的标准，当地社会依然是“毫无远见”。他们全年收入的相当大部分都用于眼前的消费和社

会炫耀，几乎不存钱，也几乎没有任何形式的资本积累。

这种贸易的典型特征是奢侈品、火器、华丽的服饰、酒很快成为欧洲出口的主要商品，而且持续几个世纪一直如此；当地人的要求在本地人缺乏利润动机或者（如果有利润动机出现的话）也没有资本积累动机的情况下很快廉价地得到满足。结果，欧洲人利用了各种形式的强迫手段，这反过来更增加了欧洲人需求的权威性。不过一般情况下某种形式的军事干预也是这个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其结果也许是欧洲人直接统治，或者是间接统治，由欧洲人支持一个当地的统治者（正像罗在印度所提倡的）视具体情况而定。有时其结果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这种关系利用当地人对酒或华丽服饰或武器的迫切渴望，为偿还由此而来的债务而刺激生产。

从这样的概括中一定不要得到这样的印象：有见识而又贪婪的欧洲商人总是剥削他所接触到的纯朴的、未被污染的土著居民，而且为对他们进行永久的盘剥建立了一整套制度。可以举出熟练企业家组织和维持一套联系紧密的生产制度（无论是平纹细布的或是硝酸钾的）的无数例子，在印度大陆尤其如此，他们知道金融信贷活动的所有细节，对“农村交易”而言，欧洲商人只是附属而已。巨大财富、众多的商业阶级和彻底渗透到印度生活中的经济就是以这种方式发展起来的；在其起源与控制方面都是本土化的，其背景也是欧洲人来临之前的。人们研究较少的西非本地贸易体系同样表明，欧洲商人只是为当地组织提供了一个出口。【XXIV】不是欧洲人而是非洲人或阿拉伯人捕获奴隶，采购金粉、象牙或红辣椒，并把它们运到海岸。

在强调从海上交往一开始欧洲人就在贸易上居于有利地位的同时，要承认这种优势并不总是由以下的事实所造成的，即他们是在与原始人打交道，这非常重要。当这些原始人在面对老练的商人们时，他们似乎拥有平等的权利；不过发展至今的世界经济是以欧洲和欧洲人的需求为中心的，为了保证他们的需求，惟一可靠的手段即政治上的统治通常也在追求之列。海外领地的经济

特性和必要性只是凭借它们自身的实力被缓慢而且不情愿地接受下来。在白人殖民者形成并保持着对都市利益的挑战期间（后来当地的人们继续了这种挑战），欧洲对奢侈品的需求一直优先于对当地生产者必需品的需求，这种状况持续了几个世纪。很难对最终出现的"发达"和"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对立做出平心静气的评价，在对这样一种制度的价值尚在众说纷纭时尤其如此。但至少应该承认，无论牵涉到这个体系中的道德或种族的思考会是什么，如果海外殖民地对欧洲人没有足够的经济吸引力的话，它们自身将会一钱不值，而且欧洲人的经济能力足以使其体系运行。无论如何其结果都是无可争辩的：欧洲的需求支配了当地社会的需求——日本是显著的例外，而中国只是方式不同而已。

思想习惯、对动机的分析，甚至相对的文化发展和对资源的掌握都不能完全解释这种突出的单方面发展现象。最初欧洲人希望发现通向这样一种地区的道路，这个地区勤劳富庶而众多的当地人能够为欧洲市场提供货物，而且这个愿望一直存留到18世纪，很大程度激起了人们开展各种南海项目的热情，这些项目激发和扭曲了那个世纪的扩张主义运动。但是像一个世纪以后向非洲扩张的法国人一样，欧洲人不断发现人口稀少的相对荒芜的土地——无人居住的土地（*terres sans peuple*）。因此他们的问题不仅是想方设法在他们发现的具有相当大潜力的社会中刺激生产，而且还要在不能供应但有潜力的本地社会或者在不能对之施加强制的当地社会中为他们自己组织生产，生产资料都被掌握在欧洲人手中——土地、矿产和劳动力。【xxv】

欧洲人对劳动力的控制通常包括动员一批外国劳动力并把他们运送到缺乏这种急需生产要素的土地上去，并且负责他们的生活。直到19世纪这个过程才开始颠倒过来，与以前一直是把劳动力运送到原材料产地不同，现在欧洲统治者开始把原材料运往他们的人口中心去。虽然有现代交通运输系统，但这种方法还是有它明显的局限性，甚至在19世纪，这种早期比较简单的解决办法还是得到了广泛的采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是一个中国苦力

出卖劳动的时期，是契约印度人在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接替黑人奴隶的时期，他们在锡兰（Ceylon）、马来亚（Malaya）、东非、中非和南非（East，Central and South Africa）既创造了新的财富又产生新的困难。

当欧洲人在对新的地区产生影响时，他们所面临的实际困难也是相当大的；这些困难由于欧洲内部的敌对而大大增强了，导致它们为土地划界都是在既不考虑自然特征也不考虑当地社会的情况下进行的。例如从德国的东非殖民地分割出去人口相对稠密的卢旺达（Ruanda）和乌隆迪（Urundi），留下坦噶尼喀（Tanganyika）这样一个劳动力严重缺少的地区，这纯粹是一个欧洲外交决策。同样，从英国殖民地冈比亚惟一一个良港分割出西非的广大地区归法国人统治也是欧洲的决策。事实上还有这种情况：欧洲的影响还会创造出一种以前并不存在的适当经济出来——就像在尼日利亚（Nigeria），或者印度、马来亚、南非和（一个时期的）中非那样。但这些例子与以下情况就恰成对照了，即欧洲的影响分裂或者摧毁了当地社会，而且破坏了该地区自然地理和经济统一性。要对这些行为的功过进行客观的评价，在找到为什么欧洲人在与其力量源泉距离如此之远的情况下能够获得并保持主动性的原因之前是不可能的。一个有效的当地社会和经济被摧毁（或被逐渐削弱）这种呼声越是被尖锐地提出来，就越是需要去理解这样的境况是怎样产生的。

强调欧洲人抓住了由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机会是十分重要的，但这并不等于接受了这样一个价值判断，即，因为欧洲人使他们的利益居于优势地位，因而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一切成功者都决不辩护；一切辩护都不是注定必然的。每一个事件都必然呈现它的功过，在社会与经济方面的，也许还包括民族或种族方面的。大多数假设都必然是一种判断的组成部分，因为任何一种判断都【xxvi】必须建立在一种假设的基础上，这种假设是关于如果事件按另外一种方式发生会产生什么结果。除了辩护或指责，为什么将权力安排在它发挥作用的地方以及为什么一些假设会被掌权者所接受，

对这些问题形成原因的理解都必然影响对整个问题的客观认识。

迄今为止，对欧洲人的动机与境况的尝试性描述想必已经解释了为什么权力总是与他们相伴，本卷及下一卷即服务于这一目的；如果说到此为止对历史环境的评述还没有说明当时的处境，那就应该考虑其他因素，不仅是历史因素，因为它们不是暂时的，而是永久性因素。似乎是一定的“自然规律”在起作用，使天平向有利于欧洲人的方面移动；至少，是某些“经济规律”在起作用。这些经济学规律——如果确实存在的话——远没有那么简单。如果有哪位历史学家试图去描述它们，或者从历史事实中提炼出这些规律，那么他一定是一位鲁莽的历史学家。但其中确实保留了一些基本的、可以接受的成分，像“买卖之间的差别达 10%”的格言所说的那样——其重要性显然不在真实的百分比。准则的有效性并不依赖于使比值发生变化的即期条件，而是依赖于这样一个基本的假设：买者会买，因为他预见到了它的一种用途或未来的利润，而卖者会卖，因为他的产品积压，而且他的商品对自己用途不大，因而需要交换其他一些商品。两者之间地位的对比要比上面这种反差更大，因为自由的买者从来都不是被强迫的；他可以掉头就走，或者去选择别人的商品，或者去另外一个供应渠道。主动权总在他那边。卖者自由行动的余地很小；他要出售商品，因而处于不利的地位。他很少有选择购买者的权力，或者为他的商品寻找另外一种用途。

迄今为止，欧洲人在进行贸易交往并为他们绝不想空手而归的航行而调拨资金和组成企业之前就已经历尽艰辛，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他们已经丧失了作为购买者的优势地位。当他们携带着欧洲商品进行物物交换时，常常发现对方并不接受这些商品[就像奥伦泽布（Aurungzeb）发现英国的毛织品一样]，他们将自己置于明显的不利的地位。但当他们与当地那些为了眼下的满足和社会影响而进行贸易的人们进行交易时，他们发现合理选择欧洲物品具有几乎是无与伦比的重要性。他们所带来的奢侈品会获得极高的社会地位价值，这些奢侈品在给予即期快乐的能力方面

[XXVII] 居于明显的优先位置——尤其是欧洲人所带来的蒸馏烈酒远远胜过本地所酿造的饮料。

因此，出于各种不完全符合逻辑或确实可说明的原因，欧洲物品在贸易中获得和保持了一种价值，这种价值足以弥补欧洲人只是远道而来寻找市场并且被迫进行易货贸易的商人这样一种不利地位。尽管他的商品常常没有多大使用价值，更没有什么内在的价值，而且通常在使用中极快、极易被消耗掉，一旦如果他撤出或中止这种贸易，也就预示着灾难。因为他与之交易的非欧洲社会一个一个地都接受了依附经济的地位。

在 18 世纪中叶，一系列的殖民战争加强了继续进入欧洲所控制市场的必要性，强化了海洋控制与殖民强权之间的密切关系，突显了任何一个交通不安全的殖民地社会的脆弱性，在这种情况下，依附的含义变得更加明显了。当时英国迫使荷兰东印度帝国（Dutch East Indian empire）退出欧洲市场，这使岛国的经济陷入拉富兹（Raffles）所称混乱状态。除了达恩德尔斯（Daendels）统治下的东印度群岛（East Indies）处于戒严状态这一事实外，许多其他的情况也促使荷兰陷入困境；但它们都强化了荷属殖民地社会作为一种依附经济的一般特性——依附达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对欧洲消费者的供应优先于维持它作为欧洲商品市场的地位。

荷属东印度帝国也许是一个例外，在这里，贸易与统治之间的密切关系必须考虑在内。但由此发展起来的体系的相互依赖，其中欧洲与欧洲人的利益居于绝对统治地位，这些都可以从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Napoleonic War）的大海军战略转变为保持殖民地与市场之间的交通问题［就像美国独立战争（the War of America Independence）的战略也曾经扭转的那样］的程度中得到判断。同期这一体系中的优良殖民地西印度群岛在经济上绝对是依附型的，这时却成了古怪的欧洲战场。当任何一种争端产生时，强国都到那里去——正像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历史学家布赖恩·爱德华兹（Bryan Edwards）所说的那样。

毫无疑问，殖民地生产商之所以对欧洲市场和供应商形成依

赖，部分是由于欧洲人在军事与政治事务中的优势以及他们在贸易中的专横。但这也部分地是由于殖民贸易自身的内在性质所致。【XXVIII】因为无论欧洲人是以个人身份移居并从事海外地区的资源开发，或是他们的贸易只是当地占统治地位的生产体系的补充，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得以发展的对欧洲的新贸易，与地理大发现所改变的中世纪奢侈品贸易大不相同，前者几乎完全是大宗剩余农产品或其他初级产品的乡村贸易。这种关系在理论上被设想为城镇与乡村之间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相互依赖、彼此支持和平等地位的体现。事实上，这种描述的明确简洁意义比它在此所隐含的意义更能为人所接受。由于人口过剩或者对人口过剩的担心，促使着欧洲人的扩张活动远离地价高而劳动力廉价的地区，而前往那些地价低（有充足的供应）而劳动力价高（紧缺）的地区。因此对土地和农产品的重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大规模移民背后的经济机制又进一步加强了这一点。通常对移民的支持一般来自拥有特许权的贵族，他们以承认得到殖民权为条件来提出他们君主对土地的要求，股东们渴望及早运出可出售商品——这只有从对具有明显潜力的农业区的掠夺中才能得到——的特许公司也支持移民。如果殖民者不再被作为“流放者”而是去接受他们每年接连不断的成船的货物供应的话，他们就必须满足“冒险者”对利润的合理期望，他们是用成船的钾碱、洋苏木、黄铜和香料，鱼和大麻，烟草和毛皮，最后还有糖等来满足他们的要求的。只有少数殖民者能满足他们的支持者的预期，许多殖民者都以优厚条件购得自己的领地［正像清教徒前辈移民（the Pilgrim Fathers）、加拿大的法国人（the French of Canada）和曼哈顿的荷兰人（the Dutch of Manhattan）所做的那样］。无论他们是否支付得起他们买地的费用，他们几乎都无例外地被拴到土地上了。当欧洲人作为管理者、指导者和剥削者而不是作为职业农艺师到来时，土著耕种者也同样被拴到了土地上。

对大宗出口商品的依赖——因为这是欧洲所要求的商品，使海外殖民地开始遭受经济规律的惩罚，其含义就像马尔萨斯

(Malthus) 或者里卡多 (Ricardo) 所说的那样让人沮丧。这就是贸易条件 (the Terms of Trade) 法则，它较少强制性，也没有多少理由，但它确实用经验事实表明作为一件历史事实和当代的实际经验，贸易条件只是对初级产品越来越不利。这意味着在一段时 [XXIX] 间内，为了换回同样数量的工业品或加工产品需要支付越来越多的初级产品，尤其农业产品。用来解释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当人们达到了一种拥有更大支付能力的更加先进的经济状态时，他们在奢侈品上的开支在他们收入中将占有更大的比例，而必需品的支出将占较小的比例。他们仍然需要满足其基本的需求，但这一部分支出在他们个人或国家收入中只占很小部分。结果，对奢侈品的需求较之对必需品的需求，成比例的增长，而且奢侈品的交换价值也在上涨；而贸易条件对初级产品非常不利。当初级产品生产者发现他们的处境恶化时，他们能够恢复自身购买力的惟一补救措施就是增加生产、将更多的商品投放到市场上。而这只能更进一步降低单位价格，造成供大于求，减弱卖方的竞争力，从而形成买方市场。这种做法也将生产者陷入收益递减的危险中去，因为农业生产的快速增长通常只有通过开发边际土地才能实现，而这又要以增加与市场的距离和更大的运输费用为代价。

正由于由一种农产品的生产转换为另一种农产品的生产是困难而缓慢的，常常也是不可能的——转产至少需要3~4年时间，在这期间市场趋势早已发生改变——所以主要生产者才会陷入这种困境。与此相反，制造商可以相当容易地从一种产品的生产转换为另一种产品的生产。至少资本在工业中的转移要比在农业中容易得多，即使在资金调配十分紧张的工厂也是如此，而且城市劳动力比农业劳动力更具移动性和多种技能。另外，当市场对制造商不利时，他不仅可以转产另一种产品，而且他还可以得到这样的好处：当市场对他有利时他可以减少单位成本，制造和销售更多的产品。

因此，西方世界的消费者与制造商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在贸易中拥有优势，并且以此使他们在15世纪和16世纪获得的最初的

优势得以保持下去；以至于“殖民经济”、“依附经济”和“不发达经济”这些术语几乎成了同义语，尽管每一个术语都有它确定和独特的含义。缺乏西方人在近现代史上如此明显而成功地对之掠夺的资本是这三种经济的共同特征，其结果是海外殖民地经济与社会生活的附属性达到如此重要的程度，以至于终结殖民主义的宪法地位现在也被广泛地认为只有有限的价值，除非这种从属于西方经济统治的局面也能得以终结。【xxx】

本卷和下一卷无意成为经济分析的著作，即解释和讨论由15世纪和16世纪发展起来的世界经济所塑造的独特格局的形成原因。毫无疑问，最终这部分析与解释的著作是必然要完成的。但首先要尽可能客观地对所发生事件进行真实叙述。因为至少对于拥有知识与理解自然背景的欧洲历史学家来说，一种适当的起点似乎就是对欧洲经济状况的叙述。人口、科学知识、无知和好奇、财政能力、国家实力和国家目标、作为国家偿还能力惟一可靠基础的贵金属的绝对影响，这些问题都应视为形成影响力的因素。对需要组织足够劳动力和为达此目的而采取措施的欧洲人接受程度也应考虑在内。在处理这个问题的诸多方面时，这一时期欧洲的境况应首先被视为后来发展的原因来考虑，还是由于反过来它受到非欧洲地区供应和机会的极大影响而延至以后再给予考虑，这始终是一个问题。总之，似乎有理由在开卷篇中论述一下欧洲经济变化中与世界观的诸多方面。农业问题对其形成似乎较少实质的影响；因为总的说来，农业是欧洲的主要产业，这是毫无疑问的，任何对欧洲经济和社会结构的研究都必须建立在农业状况的基础上，尽管在农业状况与寻求新的殖民地的冲动，或者与对利用新殖民地所提供机会的态度之间难以建立任何直接关系。同样，直到19世纪，随着在陆地和海上蒸汽交通系统的发展，欧洲的农业才受到海外生产的明显影响。欧洲与海外人口的饮食、劳动能力和生存率无疑很早就受到欧洲人在全世界传播种子的方式的影响。因而本卷也包含了一章来论述这一有趣主题的，而论述这一时期欧洲农业的那一章则被安排到下一卷中。

但章节的安排和考虑问题的优先顺序都不是完全符合逻辑或者是完全没有争议的。在这两卷的篇幅内来论述旧的殖民经济体系问题，其论述的顺序必然受到规划和编辑的内在困难的影响。【XXXI】如果这些章节被证明是有趣的和令人满意的，而且当这两卷都完成后，它们共同构成一个真实的历史基础，人们由此可以对世界经济的性质进行探讨，那么我们就基本上达到目的了。

【XXXII】

E. E. 里奇

图字：01-98-2993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67年第一版　1967年第一次印刷
　　　　　　　1975年第二次印刷
本书根据1967年第一版1975年第二次印刷本译出

策 划 人：卢元孝
责任编辑：贺聿坤　李一心
装帧设计：王　坦
版式设计：代小卫
责任校对：董蔚挺　杨晓莹
技术编辑：刘　军　袁　雷

目　录

图　目

第一章

从黑死病到重大革命前夕的欧洲人口[①]

1.1 引　言

历史学家们——与擅长做政治估计的行政官员和作家不同，他们两者都十分关心现在而不是过去——对人口统计资料的兴趣在缓慢增强。至迟在1764年，伏尔泰发现有必要劝告他的同行即历史学家们更多地注意人口问题。在他的纲领性文章《历史》（《哲学辞典》）中，他写道："人们向现代历史学家要求更多的细节，……时间的准确性，……再加上对人口的关注。"

近代历史学家可能很少会对伏尔泰的看法表示疑义；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会断言，至少在人口方面，他对"细节"和"时间准确性"的要求是难以满足的。实际上，追溯近代早期欧洲人口统计发展的历史学家不止一次地

① 这一章的打字稿完成于1955年秋季。

回想起塞（Sée）教授的断然否认，“我们不知道什么和我们不能知道什么”。

即使他并不十分同意这种主张，近代早期人口历史学家不可能没有认识到，他的任务确是难以完成的。无可否认，在所讨论的这一时期中，人们并不缺乏对统计的好奇。似乎对“炉灶（*focaticum*）”计数的最古老的记载是从 1092 年开始的；意大利的城市早在 12 世纪和 13 世纪就已经收集准人口统计情报，它们在这方面的发展并不亚于其他许多方面。在跨入近代门槛时，这种或那种方式的列表计数早已不成为公共管理的新奇特征了，尽管只是在 16 世纪意大利［在威尼斯（Venice）的西西里岛（Sicily）以及稍后在托斯卡纳（Tuscany）］收集类似统计数字的资料才成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意大利作家路易吉·圭恰迪尼（Luigi Guicciardini）在 1560 年写道，经常的人口统计显然是管理国家事务者应熟悉的事务，因此他对安特卫普（Antwerp）市政府和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的地方当局没有进行此类统计并且认为这“不是绝对急需”（*nisi urgente necessitate*）的事，感到惊讶。[1]

但是，对财政、军事、宗教以及——偶尔的——对人口统计的兴趣，使人们很早就有了有关家庭数量、收益清单、“接受圣餐者”名单等方面的资料，而且到这个时期结束时越来越多地出现类似实际人口统计那样的文献，这些资料一般并不能为人口历史学家提供像他们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时可以得到的那种定量信息。它们并不缺少数字；但在使用它们前几乎对所有的数字都要进行细致的核实和分析。那些数据的大部分都具有严格的地方意义，但都不因此而使它们可以适用于其他地区。它们中很少可以构成时间序列的。有一些数据甚至是有严重错误的，不得不彻底放弃。另一组相对古老的数据，受洗、结婚和死亡的教区记事录——如果进行系统的分析，确实可以提供更为可靠和详细的人口统计信息——它要比纳税登记及类似的东西要可靠、详细得多。不过，对它们的利用是一件让人精疲力竭的事情，况且，劳力费神之后，也不见得会有多大的裨益。

因此，“原始统计”时代的人口统计史要求：定量信息要有详细的证据和记录下来的当时人们的看法作为补充。但是对建立在判断和有代表性证据基础上，而不是实际统计基础上的当时人的估算的使用，哪怕是谨慎的使用，还是需要做一番证明。习惯于权衡、估量、计算等科学方法的近代社会发展研究者，对不是牢固建立在数量证据基础上的许多现象的看法有一种本

能的怀疑。这种怀疑不是没有根据的。[1] 人们不能评估庞大的总数，这一缺点在人们的感情或利益掺杂进去时显得更为突出，这一点一再得到证实；过去人们非常不善于估算巨大的数量。尽管如此，这种怀疑主义的态度也不应走得太远。人们以“多”或“少”、“大”或“小”、“增长”或“减少”评估数量的能力——与他推测绝对数量或变化率的能力不同——在 16 和 17 世纪时也许并不一定不如现在发达。似乎当时有能力的见证人在他们对短期 [2] 趋势进行评估时并不总是出错（对长期的趋势的预测常常受到先入之见的影响）。事实上，根据不可靠数据得出的似是而非的结果，或者对可靠数量的错误分析都会成为更严重错误的来源，这种错误要比见识广博的评述者对其处境的“印象式的”评价要严重得多。也许，普赖斯（Price）博士和其他人的失败给历史学家留下的印象是过于深刻了，以至于他们没有认识到 18 世纪后半叶英国的人口还在不断地增长。如果像这种其观点得以广泛传播的资深研究者都对人口趋势持有错误看法，那么我们还怎能相信不被数量证据所支持的更为偶然的观察呢？因此，应该强调，那些坚持 18 世纪英国人口正在下降的人们不是把他们的意见建立在有代表性的证据上面，而是建立在错误的计算上面。事实上，他们一定审慎地放弃他们所遇到的任何与他们相反的代表性证据，仅仅是因为它们的数据似乎是支持另一种结论。那么，我们认为，在缺少可靠的统计资料时，或者数据信息不完全或是有错误时，当时人们对人口趋势的意见记录就不应该简单地作为不可靠的资料而不予考虑。有时当代的评述者也许会被他们的感情冲昏了头脑，犯了夸大其词的毛病。但是他们对总体形势的判断并不会出太大的错误。他们不可能总是错把繁荣当做悲哀，把进步当做衰退，把人口的增长当做减少。

至于其他方面，早期人口史的研究者不应该期待能够应用太多成熟的统计技巧。自然，坚持人们能够“从粗率处理的粗略统计中比从精心处理的粗略统计中更容易发现真实”，这是一个在逻辑上不适当的观点。但是，正像已故的格林伍德（Greenwood）教授提醒我们的，相信“只要有足够精致的调查方法，真理自然会从任何资料中得到，尽管是不准确和片面的”是同样站不住脚的。确实，我们早期的大部分资料都是不准确和有偏见的，有

---

① 必须认识到：18 世纪以前，只有少数人可以接近官方统计所得到的结果，因为在大多数国家人口数据远没到可以公开出版的时候，这些数据被重商主义政府视为国家的机密。参看罗杰·摩尔斯（Roger Mols S. J.）：《欧洲城市人口统计史引论》（卢万，1954 年），第 1 卷，第 197 页以下。到了 1780 年瑞士的一位牧师和业余的人口统计学家瓦塞尔（J. H. Waser）轻率地发表了他对苏黎世整个城市和一个区人口的计算结果，他被处于重大的叛国罪并被处死（出处同上，第 124 页以下）。

时又是如此的粗略。

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说那些很容易判断出毫无价值（或接近如此）的数据。相信没有一个人口统计学家会过分计较剑桥郡（Cambridgeshire）所上交的 1569 年、1573 年、1577 年和 1588 年健壮男子的数目——每一年都正好是 1 000 个。他也不会更看重朗格多克（Languedoc）的灶税（*fouages*），在这里“炉灶”被视为具有纯粹财政意义的一个单位。但是，即使当一个[3]人合乎情理地确认数字不是常见的，并且是建立在实际计算基础之上的，也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它们的准确性或它们的意义。正像上面所显示的，进行家庭和其他类似的统计几乎总是出于获取财政或军事信息的目的，而这种目的从一开始就会损害结果的真实性。估价专员和新兵征募军官都不是最好的统计员，即使他们都是诚实和勤勤恳恳的。他们会遭到怀疑和地方的反对。当面临新税种或征募的前景时，人们就求助于个人或集体逃避。在一些偏僻的村庄或分布极为分散的农庄，隐藏自然非常容易。情况或许并不总是这样，但即使在要求穷人各自上报其收入的情况下，为确定准确的户数也要付出非常艰苦的努力，因此，这些统计对税收并没有什么贡献。社会中的流浪者、吉卜赛人、修补工人、玩手技杂耍的人、乞丐和其他游民几乎从来都不被计算在内。单独缴税，或减免常规税种的机构与团体——贵族和牧师、修道院的修士、修女、犹太社区、驻军、医院病人、劳动救济所的被救济者和监狱犯人——提出了一些统计中特殊的问题。因此，我们的资料并不总是显示出处理这些人的方式。

这些并不是不确定性的惟一来源。在将家庭统计用于统计人口之前，如果可能的话，有必要弄清楚每一计算单位的准确含义，像术语 *feux*、*foyers*、*fuochi*、*haardsteden* 等等指的是家庭、家族还是房屋？遗憾的是人们常常不能区分清楚。而且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构成解决另一问题或更为基本问题的先决条件，即相关系数或乘数问题，尽管它自身尚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无论如何，每一房屋（或家族）的人口平均数究竟是多少？而且，如果这个问题在极大的误差幅度之内只允许有一个答案，难道不可以更进一步考虑到下面这个问题，即在多大程度上完全可能从对家庭或住宅的统计出发得到适当的人口统计？

显然，在一个特定的城市或地区的住宅（或家庭）的数目与人口数之间存在着相当的一致性；但是这种相关性不一定十分密切，至少在短期内如此。一场流行病会严重减少人口数量，却不会带来家庭数目的即时变化，更不用说住宅的变化。另一方面，战争会对住宅造成破坏，但不一定对平民的

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另外，已婚妇女出生率的提高或婴幼儿死亡率的降低会导致人口的增长，但这只有到20年或30年后才会在家庭的庞大数目中得到反映。不能依靠对城市住宅或家庭的连续统计来显示暂时的人口变化，这种人口变化是由未婚工人为适应经济机会而移居所造成的：这些人还会在原来的住宅里居住。 [4]

尽管如此，重要的和长期的人口变化仍然可以从其居住选择趋向的变化中反映出来，即使从长远观点来看它不会立即反映出来。由此可见，尽管使用家庭统计和类似资料也只能使历史学家对绝对人口数量形成一个大致的估计，但通常它们使历史学家得以追溯过去社会长期的人口变化。从经济史的观点来看，原始资料的性质所给予我们的限制尽管是令人遗憾的却不是决定性的。实际上，人口统计的有些方面比如城市社区的规模和平均距离，或特定时间内的人口密度，如果准确的话，对经济史学家是有相当大的帮助的。但他所主要关注的是人口与经济**变化**的相互影响。为了认识这些因果关系，原始统计时代的人口史能够有一些用处，尽管其数据是零零碎碎的，而且大多是近似值。

1.2　黑死病及其后果

1347～1351年间黑死病在欧洲的出现——也许它是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瘟疫以后中世纪欧洲人口史上最大的事件——产生了如此长远的影响以至于在描述中世纪之后的欧洲人口时还不得不提到它。至于瘟疫，一旦被传入了欧洲，直到它第一次爆发之后的大约350年才消失。它以地方性流行病或时疫的形式对长期的平均死亡率或短期的死亡率的波动持续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在一些或许是大多数欧洲国家，中世纪以后的人口密度一直低于1300年或1340年，这一事实证实了14世纪人口灾难所产生的长远影响。

由传染病所导致的死亡人口数永远无法知道。甚至第一次传染病发作年代的大致死亡率也不能确定；只对死亡率的水平能够有把握地估计出来。乔赛亚·考克斯·拉塞尔（Josiah Cox Russell）教授对英国资料进行的认真统计分析所得到的结果，成为任何这样一种推测的最佳原点。他的计算显示，1348～1350年的流行病最初导致大约20%的人口死亡。当然最好不要从英国的经验中得出普遍性的结论。因为，14世纪的英国与法国，或意大利，或神圣罗马帝国（the Holy Roman Empire）的西部地区相比城市化水平很 [5]

低，总的说来人口密度也很小；人们可以设想欧洲中心地带人口稠密的村庄、城镇和城市得传染病的机会要高得多。

初步的证据似乎印证了这种推测。只要提供迥然不同的地区有关死亡率的 3 条信息就够了。1348 年的最后一天在维特波（Viterbo）写下遗嘱的那位作者估计教皇辖地（papal states）托斯卡纳区（Tuscan parts）的死亡率高达 2/3。一个南蒂罗尔（South-Tyrolian）编年史家指出，在他们地区只有 1/6 的人口在瘟疫侵袭后幸存下来。另一份当时的资料来源于科因博拉（Coimbra，位于葡萄牙）圣彼得（St Peter）大教堂的文件，该文件声称本市 3/10 的居民死于瘟疫。确实，对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万分恐慌的见证者的估计不应过分较真。不过，还有许多更有根据的信息也指出死亡率大大超过 20%。

人们不应忘记，即使我们（所拥有）的一些很有根据的信息也需要谨慎对待。例如，一些大陆修道院修士的大批死亡与英国的经历相似。但对这样的数据要抱以相当的怀疑态度，因为它的抽样并不具有代表性。从各个市议会得到的因瘟疫而死亡的数据大小不一，从雷维尔［Reval，即塔林（Tallinn）的德语拼写］的 27% 到不来梅（Bremen）和蒙彼利埃（Montpellier）的高达 60% 甚或 75%，但它们都受到同样的统计偏见的损害：市议员们——这个词本身也说明了事实——通常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无论何时用纳税登记表或地籍册作为计算的基础时，都会产生类似的偏差：家长也构成了一个上了年纪的群体。而且，资料显示在特定的社区纳税人或佃农的数量呈下降趋势，这一点很难得到解释。14 世纪中叶圣弗劳［Saint-Flour，上奥韦内（Haute-Auvergne）］、阿尔比（Albi）的城镇［朗格多克（Languedoc）］和庞高［Pongau，萨尔茨堡（Salzburg）］的税收记录也显示出类似的空白来，达到 40% 甚至更高，这实际上是由那些地方或地区的高死亡率所引起的；但是它们至少部分是由于瘟疫后所发生的移民造成的。

不过，确实也有一些当时的资料并不具有同样的特点。我们拥有勃艮第（Burgundy）的吉弗里（Givry）教区惟一的记事簿，可以对黑死病之前 15 年与 1348 年的年平均死亡人数进行比较。我们还拥有对不来梅市 1350 年瘟疫中死亡人口的异常详细的描述。这些资料都显示死亡人数不少于 40% 或 50%。从欧洲大陆其他一些城镇与城市［尤其是锡耶纳（Siena）、佛罗伦萨（Florence）、巴勒莫（Palermo）、汉堡（Hamburg）］所获得的数据，尽管不如吉弗里和不来梅的数据更有根据，但也显示出了相当高的死亡率，有时远远超过了总人口的一半。

[6]

迄今为止所提供的证据都是相当一致的，并且似乎证实了这种印象：欧洲大陆在瘟疫中的死亡率事实上确实大大高过了20%，这是拉塞尔（Russell）教授为英国所计算出的数据。但是以几条孤立的定量信息，显然不足以得出普遍的结论。首先，我们的大多数数据都是指城市或半城市的人口；农村的平均死亡率也许会相当低。不过，人们也不应过分执著于这一点。在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农村地区和萨尔茨堡（Salzburg）人口稀少的山区黑死病所造成的破坏似乎至少与相邻城市的居民所遭受的一样严重；而且来自朗格多克的一份奇特的资料用如此多的词句证实，瘟疫主要在农村人口中蔓延，“主要是在耕田者和庄稼人中间”（*potissime cultorum et agricolarum*）。而且它们有力地指出：巴斯德菌瘟疫（*Pasteurella pestis*）能以一种出人意外的游走方式发作。在同一地区瘟疫死亡率似乎因地方不同而极不相同。

在有些情况下这一差异是由于两种不同形式的瘟疫共存所造成的，即淋巴腺鼠疫和肺炎（第三种是败血病，比较少见）。前者的扩散要有昆虫带菌者即蚤；[1] 前者似乎比后者更容易得到传播，尽管后者的原发形式是具有高度传染性的，它只是通过咳嗽和打喷嚏在人们之间传播。另一方面，肺炎是更为致命的疾病；淋巴腺鼠疫病人还有康复的机会，而肺炎却几乎总是致人死亡。这种或那种变异体在不同地区的流行足以说明死亡率在地区变化的程度。

不过，这种假说几乎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地方和地区几乎或完全不受传染。当然，完全可以想像瘟疫放过了一些偏远的地区和聚居地，它们的隔绝状态保护它们免受流行病的传染。福勒兹（Forez）地区［里昂（Lyons）西部］的一个法国领地也是同样的情况，在总共300多块土地中，在第一次瘟疫侵袭后不到5年编制的地籍册中只有一块荒无人烟的土地列入。而且我们至少还有一份报告，其中谈到，中世纪意大利最重要的商业和工业中心之一米兰（Milan），还有其他一些更小的伦巴第区（Lombardy）的城镇［尤其是靠近皮亚森扎（Piacenza）的帕尔马（Parma）和瓦莱提东（Valletidone）］都奇迹般地躲过了1348年的瘟 [7]

① 人身上的蚤（*Pullex irritans*）与一些种类的鼠蚤（*Xenopsylla cheopis*）相比，似乎并不是今天瘟疫传播的重要媒介。参看法比安·赫斯特（L. Fabian Hirst）：《战胜瘟疫》（*The Conquest of Plague*），牛津大学出版社1953年，第236页以下。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欧洲它作为传染的媒介还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参看恩斯特·罗德恩瓦尔特（Ernst Rodenwalt）：《1575～1577年威尼斯的瘟疫：论西欧瘟疫的传染链问题》（Ein Beitrag zur Frage der Infektkette bei den Pestepidemien West-Europas），《海德堡科学院会议报告》，数学—自然科学部，1952年第2期论文，第218页以下。

疫，或者只受到轻微的影响。直到最近这种结论还得不到重视。横扫从葡萄牙到波兰、从西西里到瑞典大片地区的传染病，似乎不可能让任何重要地区幸免于难。然而，由汉斯·冯·韦尔费尔克（Hans van Werveke）教授和其他学者所提供的新证据却显示：事实的确如此。[1] 现在看来似乎相当一部分南部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包括人口稠密人们常来常往的城市路法因（Louvain）和根特（Ghent）——根特有 50 000 ~ 60 000 居民，是阿尔卑斯山北侧欧洲地区排在巴黎之后的最大城市——基本没有受到黑死病的侵袭。伊普雷斯（Ypres）城虽然没有完全躲过瘟疫的侵袭，但毕竟只是受到轻微的影响。冯·韦尔费尔克教授的论点得到以下事实的支持：一些比利时城市如果在 14 世纪中叶后没有经历人口增长的话，它们在不远的将来至少会出现人口增长的趋势。否则怎能解释以下的事实：路法因的自由民决定在 1357 年开始其新城墙的建造工程，待它完成时所围住的地区是以前的 3 倍？在同一年布鲁塞尔和那莫尔（Namur）都开始其城市防御工事的延长、扩建工程。布拉班特（Brabant）的泰勒蒙特（Tirlemont）城在几年后也开始其防御工事的扩建工程。

由于瘟疫传播惊人地不规则，再加上 16 世纪和 17 世纪流行病最严重时期欧洲城市所遭受巨大损失的数量差距，人们对欧洲在 1347 ~ 1351 年间人口死亡人数占总人口比例高达 25% 以上抱有疑虑，这个数据是由海克尔（J. F. C. Hecker）教授 100 多年前在他关于 14 世纪黑死病的开创性著作中提出的。[8]

但是，尽管这次瘟疫的最初影响好像比一度所想像的要和缓一些，但它对人口增长所造成的影响也许比一般所认为的要严重得多。当然，社会机体的恢复能力很快就发挥作用。正像吉弗里教区登记簿和其他资料所证实的，流行病一停歇就有许多对新人举行婚礼。鳏寡都在寻找新的配偶，而且对出生率产生了重要作用的是：年轻人比正常时期结婚得更早，当他们发现他们意外地拥有一笔遗产——这使他们组织一个家庭成为可能，也许对他们来讲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接管一个手工作坊或一块农田时，更是如此。自然

---

[1] 冯·韦尔费尔克（Van Werveke）的观点虽然受到罗埃（P. Rogghé）的批评，但只是部分的失效，参见罗埃的《荷兰南部的黑死病》（De Zwarte Dood in de Zuidelijke Nederlanden），《比利时语文学与历史杂志》（1952 年），第 30 卷，第 834、837 页。其他有关地方死亡率变化的例子还有，博德莱斯（Bordelais）的被罗伯特·鲍丘切（Robert Boutruche）在其《统一社会的危机：百年战争期间博德莱斯的封建主与农民》（巴黎，1947 年，第 199 页）中引用，萨尔茨堡的被赫伯特·克莱因（*Herbert Klein*）在其《1348 ~ 1349 年死亡的大多数人和他们对向阿尔卑斯山以东地区移民的影响》（《萨尔斯堡地方志学会报告》，1960 年，第 91 页以下）中引用。

对当时有关瘟疫后妇女生育率反常的有关资料不应全盘接受;① 但这种观察对历史学家来说并不是没有价值的:即使它们解释错了,历史学家也可以对一些人口快速恢复的明显证据进行反省。

在这一点上应该把注意力再一次放在公共事业上,如果不是人口的过度拥挤使之成为必需的话,那么它们至少受到预期人口进一步增长的推动。法属城市罗德兹[Rodez,阿基泰纳(Aquitaine)]就是这种情况,它的执政官在谈到其城墙扩建时明确指出:之所以选定这一工程,是"因为那些地区比较广阔,而且挤满了自治地区和市民"。这些句子写于1358年,传染病停歇后10年左右。自然,可以想像,罗德兹,像前面提到的那些佛兰芒人(Flemish)和布拉班廷(Brabantine)的城镇一样,都没有受到黑死病的侵袭。但是,巴黎和巴塞尔的情况如何呢?据说它们受到流行病的严重影响;在1359年和1361年,这两座城市都正忙于扩建它们的古代防御工程 他们的行为也许是出于军事而不是人口的考虑,有人会反对说。实际上我们知道在有些情况下城墙被延长不是为了给新住宅提供空间,而是为已有的城区提 [9] 供保护,或者是为了把空旷的土地包括在防御工事之中,这些土地在被围困期间可以种庄稼,饲养牲畜。但即使这是有关当局的首要目标,他们恰好在这个时候决定开始新城墙的工程这一事实显示出他们对人口状况的乐观态度。因为,尽管这种工程通常是以从容不迫的速度进行,因而在一定的时间内并不需要大量劳动力,城市的管理者至少对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能够以一种合理的工资雇佣到必需的劳力充满信心。许多德国城市在1348~1349年瘟疫后很快做出开始建造大教堂的决定,尽管这一决定可能是出于宗教而不是人口的动机,但它一定是得到同样预期的支持。从表面上看,劳动力匮乏和高工资只是暂时的混乱,它很快为移民和自然增长所克服。而实际上英国的证据显示,13世纪50年代,工资有轻微的停滞。总的说来,在黑死病过后的第一个10年呈现给人们的人口图上似乎有一些希望的迹象。

但是在大灾难之后的岁月里,无论什么样的短暂恢复都注定不会长久。因为尽管瘟疫在第一次侵袭中已经消耗了一些传染力,但它在1360~1361

---

① 或者可否说,这种观察本身就包含了真理的颗粒?如果哺乳期的平均长度在缺乏生育控制的情况下是与法国的人口学家所说的"生育间隔(*les intervalles intergé né siques*)"直接相关的话似乎确实如此,流行病(其他病症也一样)发作之后的不长时间内生育率会有一定的增长。由于奶妈中广泛传播的疾病和婴儿高死亡率会导致平均哺乳期的缩短,因而导致平均生育间隔的暂时缩短。而另一套生理因果链的作用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由于疾病通常会导致流产,而众所周知堕胎会增加过早怀孕的可能,所以流行病发作后会使生育间隔有一定程度的缩短。

年又卷土重来，而且来势更加凶猛，以后又多次发作。在以后的几次发作中疾病极其猛烈地袭击高龄群体，他们是以前瘟疫未及侵袭的人群，或者是以前得以幸免的或只是受到轻微影响的社会团体和地区。例如，1361 年的米兰（Milan）和 1400~1401 年的尼德兰（Netherlands）南部好像就是如此。瘟疫一旦在一个地方出现，它就会停留几十年，潜伏在一个地方却在另一个地方突然发作；不过，有些后来发作的瘟疫只是地方性或地区性的，总的说来没有第一次猛烈。由于饥荒常常加重了传染病，14 世纪后半叶和 15 世纪大部分时期死亡惨重。各种疾病——即使实际上不是由食物匮乏、营养不良和人们的抵抗力降低导致传染病的扩散——往往伴之以或继之以生存危机，由于劳动力缺乏，农业耕作被推迟或受到限制，传染病发作期间贸易和交通陷入混乱。在传染病间歇时，死亡率实际上降到通常的水平以下，由于许多【10】无论如何都要不久于人世的老弱病残者必定逃不过这场传染病，因而只留下对生活抱有较高期望的人们。但是有证据显示这种趋势至少部分地被其他因素所抵消。染上瘟疫并能生存下来的人们无疑会获得对这种疾病相当程度的免疫力，但他们也许会永远身体虚弱，易于染上其他疾病，因而会降低他们对生活的期望。

这一时期的生育率很明显不会高过导致死亡的潜在力量，因为 14 世纪最后 25 年的年龄分布对人口再生产不利。1347~1351 年的瘟疫似乎对过了中年的人特别致命——尤其是英国，而一些后发的传染病，尤其是 1360~1361 年的，则好像主要传染年轻人。一份来自英国的资料称第二次发作为“儿童的死亡（*mortalité des enfauntz*）”，据报告普罗旺斯（Provence）和波兰也是这一年龄段的人死亡率高。年轻人中年龄分类“空缺”的出现对以后几十年生育率一定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严重影响生育率的其他因素与生殖系统严重病症的生理效果直接相关。极有可能的是，在多发性传染病每一次发作期间怀孕的人数急剧下降，[①] 在许多情况下孕妇会由于热病而流产。

在这些情况下，人口的持续恢复是绝对不可能很快发生的。相反，所有的资料都显示第一次黑死病袭击时期的死亡人数远远不能为自然增长所弥补，在 1360 年和 1370 年以后欧洲大部分国家的人口都经历了进一步急剧的、长时间的下降。即使在那些人口恢复能力似乎更成功地发挥作用的地

---

① 除了生理因素，有一种观念认为，无节制的交合也会减弱男性的机体，使其更容易受到传染，这种看法也许是阻止交合的一个因素。

区，在整个 15 世纪其人口增长也常常受到极大的影响。

如果没有详细展示由卡尔·尤利乌斯·贝洛赫（Karl Julius Beloch）和其他学者所收集的所有定量信息，我们也许会说意大利像欧洲其他地区一样在中世纪晚期频繁发作的瘟疫中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它从黑死病中恢复过来是很缓慢的。然而，如果从 15 世纪伦巴第（Lombardy）和艾米利亚（Emilia）的一些郊区的许多新村庄的外观来判断，那些地区的人口似乎确实获得了增长。具有特殊有利条件的一些城市社区也是如此；例如，帕多瓦（Padua）在 1430 年和 1490 年之间它的人口增加了大约 1 倍。[11] 但是在其他一些地区，首先在大多数有人口统计数字的城市，如果它的人口实际没有减少的话，一般都保持稳定。例如，在锡耶纳（Siena）市，每年接受洗礼的平均人数在 15 世纪末与 14 世纪 80 年代大致相同。据报道，在 1395 年与 1421 年之间帕尔马（Parma）的人口损失了一半，但似乎在 15 世纪末以前又得到恢复。波伦亚（Bologna）市在 1371 年拥有 40 000 ~ 50 000 居民，到了 1496 年增加了几千人，但它的农民（*contado*）人口在 1396 ~ 1495 年之间似乎并没有增长。帕维亚（Pavia）甚至不能保持它的人口：在 1250 ~ 1480 年之间其人口从 20 000 人减少到 16 000 人，在 1485 年恶性流行病发作期间又损失了 5 000 人。1277 年和 1501 年分别对西西里家庭（Sicilian hearths）进行粗略统计所获数字显示，这个岛中世纪末期居住的密集程度从来没有超过 13 世纪。在那不勒斯（Naples）王国，"纳税家庭"（*fuochi tassati*）的总数在 1448 ~ 1475 年之间保持在稳定的水平上，但据报道，在其后 10 年却从 232 000 家减少到 215 000 家，这也许是 1477 ~ 1479 年之间恶性流行病致死大量人口的结果。

具体的证据与这些资料相当一致。在中世纪晚期，意大利城市中的国内奴隶制重新兴起——在佛罗伦萨异教奴隶的贩入在 1366 年被批准——预示着劳动力的长期匮乏，而这无疑是由黑死病及其所产生的后果引起的。

中世纪西班牙的人口史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未知领域（terra incognita）。有两个单独的数字值得一提，韦斯卡［Huesca，Aragon（阿拉贡）］市的家庭数从 1248 年的 1 347 家急剧下降到 1495 年的 616 家。来自加泰罗尼亚（Catalonia）的两份 14 世纪的资料显示了同样的（如果不是更急剧的话）下降趋势，它们显示出，巴塞罗那（Barcelona）市的家庭（*fochs*）数量无疑已经被黑死病吞没了不少，在 1359 ~ 1378 年间，家庭数目从 7 651 家减少到 7 295 家，而在同一时期全省的家庭数目从大约 81 000 家减少到大约

78 000 家。①

大约在 15 世纪中叶，人口似乎有了一定的恢复，至少在有些地方是这样的。比如说，阿拉贡的家庭数目在 1429 ~ 1495 年之间从 42 683 户增加到 [12] 50 391 户；巴伦西亚（Valencia）和纳瓦拉（Navarre）的物价波动也显示了那一时期人口的增长。不过，中世纪晚期西班牙的人口记录尽管粗略，但还是显示了差异。巴塞罗那的人口在 15 世纪后半叶似乎持续减少：在 1515 年，加泰罗尼亚市的家庭数目仅有 6 432 户。

关于中世纪晚期葡萄牙的人口，除了知道它在 1348 年的黑死病中遭受了巨大损失，在 1355 年的大地震和一连串的流行病中人口再次减少外，人们所知甚少。

至于英国，无疑，在 14 世纪 60 ~ 70 年代，其人口还在急剧减少；尽管在这一世纪最后 25 年其下降的速度似乎有大幅度的减慢，1400 年的人口减少到 1348 年的一半，或者，如果拉塞尔（Russell）教授的估计是可以接受的话，那就是减少到大约 210 万人。在世纪交替之后，这种长期的下降似乎才得以停止；事实上，如果耕地面积和工资方面的证据可以准确地反映人口发展趋势的话，15 世纪 20 ~ 30 年代一定是人口有所恢复的时期。但 15 世纪 30 年代末——瘟疫和生存危机遍及西、中欧的时期——存在着严重的食品短缺和流行病的再度发作；在其后的 20 年中，工业和农业经济部门的涨薪再一次显示了劳动力的严重匮乏。总之，在 1450 年甚至 1470 年以前的英国，没有什么迹象显示其人口有持续增长。

在法国，这个饱尝百年战争（the Hundred Years War）创伤的国家，扎克雷起义（Jacquerie）、勃艮第人（Burgundian）与阿马尼亚克人（Armagnac）之间自相残杀的斗争、公路的普遍被毁坏，凡此种种对人口的恢复都极其不利。当时的观察家对这一国家 15 世纪荒凉景象的逼真描述——它们的回声响彻在莎士比亚《亨利五世》一剧中勃艮第君主的台词中——不能仅被研究者作为修辞的夸张而弃置不顾。这些哀怨的描写和对地方不幸的许多具体陈述（包含在减轻赋税的吁请中）都为数量证据所证实，这些数量证据是现代历史学家从来源可靠的文献资料中选取出来的。例如，我们知道，图卢兹（Toulouse）的人口在 1335 年超过 30 000 人，1385 年大约是 26 000人，到了 1450 年减少到大约 20 000 人。其他资料证实，有大量的农

① 关于新卡斯蒂利亚（New Castile）在中世纪晚期的一些间接资料将在下面第 28 页（原书页码，即本书的边码。下同。——译者注）得到讨论。

田荒芜，封建领主的收入也相应减少。普雷斯的圣杰曼（Saint-Germain-des-Prés）大教堂发现它的租用者所能支付的租金呈下降趋势，这也许是一切现象中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尽管租金的支付随着多种变量的变化而波动，[13] 它们从 1360 ~ 1400 年间平均每阿庞（arpent）84 德尼厄尔（*deniers*）一直急剧下降到 1422 ~ 1461 年 56 德尼厄尔，乃至 1461 ~ 1483 年的 31 德尼厄尔，这似乎为人口的持续下降提供了初步的证据。[①] 它的外在表现——荒芜的耕地和葡萄园、摇摇欲坠的房屋和荒凉的村庄——自然是遭受了征服和再征服冲击的地区最触目惊心的景象。并不是每一个省都经受了像诺曼底（Normandy）那样惨重的冲击，那里在 13 世纪与 15 世纪末之间 221 个教区被发现损失了 40% 的教徒。但是，也有迹象表明，即使没有直接遭受破坏的城区，在 14 世纪后半叶和 15 世纪前半叶也经历了持续的人口减少。例如，格勒诺布尔（Grenoble）市南部的奥伊森斯（Oisans）高山地区就是这样的情况，那里家宅的数量在 1339 ~ 1428 年间第一次减少 46% 之后，在 1428 ~ 1446 年间再一次减少 24%，在 1446 ~ 1450 年间又减少了 22%。在这种急速的下降中究竟有多少是由于向人口稀少的地区的内部移民引起的还不得而知。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如此的移民（包括从西班牙、意大利和帝国的移民）的规模还相当大，有些早在 14 世纪后半叶已经开始了，但是百年战争结束后更加频繁。博德莱斯（Bordelais）在 16 世纪早期还在接受来自法国其他地区的移民。

"荒村（*Wüstungen*）"——就是村落的衰败，通常达到整个村庄消失的程度（*Ortswüstungen*），紧接着几乎总是耕地面积（*Flurwüstungen*）的急剧减少——也是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在中世纪晚期人口持续减少的最显著的征兆。几乎毫无例外的，即使在 14 世纪中叶以前这种减少现象已经在一些地区很突出了，它一直持续到黑死病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实际上，在不少地区［勃兰登堡（Brandenburg）、丹麦、挪威］在 1370 年之后好像才获得相当大的力量——有更多的证据证明，在 14 世纪后几十年和 15 世纪前半叶大多数国家的人口依然呈现下降的趋势。在东部德国的殖民地区，这种下降的过程在 1500 年前还没有停止。最晚到 1525 年属于埃姆兰德（Ermland）[14] 主教管区 332 个村庄的 24% 都被彻底遗弃。在那个时代的 10 944 胡符（*hufen*）中，有 5 163 胡符（或 47%）的土地都没有耕种。

---

① 如果这些租金用银的重量来计算，它们更会急剧下降了，因为在 1343 ~ 1500 年间在图尔铸造的里弗赫（*livre tournois*）的固有价值逐渐降到它原始标准的 50%。参见佩洛伊（E. Perroy）：《中世纪晚期法国的雇佣劳动》，载《经济史评论》第 2 辑第 8 卷，第 233 页。

不过农场和耕地不是随便可以放弃的。这一点在德国与在别处一样，[1] 只有贫瘠的土地才放弃开垦，通常为获得更多的耕种土地而开垦只是近代的事情。而且村落的衰败是对地块大小的选择过程。在中世纪晚期放弃小地块的比例似乎比放弃一般农场大小的地块的比例要高得多。

在一定程度上，农村人口稀少是由农村向城镇移民的结果。每次严重的流行病过后，城市社区都会对它们仅仅通过自然增长来补充人口的损失的能力丧失信心，因而会放宽它们的移民政策。加入手工业行会和获得公民权一度变得很容易。有几次，同业公会或者强制性的会员资格甚至被中央或市政府彻底取消。但是，即使是德国的城镇，在瘟疫过后的年月里，总是要接受相当规模的移民，它们中的绝大多数似乎都不能保持它们的正常人口。毫无疑问，有一些例外；我们似乎很难相信像奥格斯堡（Augsburg）或者纽伦堡（Nürnberg）这样繁荣的社区在 15 世纪竟然没有增加人口。但是几乎得到的所有数字［美因法兰克福（Frankfurt-am-Main）、乌尔姆（Ulm）、卢卑克（Lübeck）、布策巴赫（Butzbach）、米尔豪森（Mühlhausen）］都显示城市人口的停滞甚至倒退。据估计，德国的城市人口在黑死病和 14 世纪 60 年代流行病发作时急剧减少，在 1370 ~ 1470 年间又减少了 15% ~20%。

德国的西南和西北邻国瑞典和低地国家的中世纪晚期人口史资料比较齐全。而且许多资料都出版了并得到认真的分析。这些材料——洛桑（Lausanne）和日内瓦（Geneva）主教管区的礼拜报告、苏黎世（Zürich）和巴塞尔（Basle）及其附属地区的纳税记录、于希特兰德（Üchtland）的弗赖堡（Freiburg）和伊普勒斯（Ypres）的人口普查、布拉班特（Brabant）和海瑙尔特（Hainault）公国一系列长期而可靠的家庭统计数字，再加上各种补充材料——证实了前面几页所提出的观点。实际上瑞士和低地国家与欧洲其他大多数国家在这种资料方面情况相当一致：都没有为黑死病后 100 多年 [15] 人口的持续增长提供证据；相反在 15 世纪一段时期内其人口趋于下降（我们关于 14 世纪的知识太零碎，其证据太自我矛盾以至于无法进行概括）。

几乎在每一次下降比较明显的情况下，总是要提到产生这种结果的特殊历史背景。在瑞士西半部家庭数目的减少由洛桑（1416 年和 1453 年）和日内瓦（1411 年和 1481 年）主教管区的礼拜报告显示出来，它归因于萨伏依（Savoyard）公国的解体、勃艮第战争（the Burgundian Wars）和其他军事冲

---

① 英国的有关情况参看莫里斯·贝勒斯福德（Maurice Beresford）：《英国失去的村庄》（伦敦，1954 年），尤其是第 6 ~7 章。

突。苏黎世的城市人口在前90年中在大约5 000和6 500个居民之间波动，但在1400年后却下跌至不到4 000人，在16世纪第二个25年前再没有达到以前的水平。一般认为，所谓的“老苏黎世战争”（Old Zürichwar）导致了人口的下降。1440年也标志着巴塞尔人口史的转折点。这个城市在15世纪的前40年经济高度繁荣。到了1429年它的人口达到将近10 000人，1431年后只有当公会议（the Church Council）带来大量的临时居民时，它的人口才有了进一步的增加。但是，在1440年，巴塞尔城市国家又陷入战事之中，最终在1444年爆发灾难性的圣雅各布战争（St Jakob's War）；1449年公会议解散。在这些情况下，1454年人头税名单并没有让人吃惊：它们显示了人口的急剧下降，大约有8 000人；而且与苏黎世的情况一样，直到世纪之交后损失的人口才得以补充。像巴塞尔，于希特兰德（Üchtland）的弗赖堡（Freiburg）市在15世纪最初10年得益于良好的经济环境。它的人口在1379～1444年之间从3 000人增长到5 000多人。不过在这之后就没有更进一步的增长了。上面所提到的干扰对弗赖堡的影响似乎不亚于瑞士的其他城镇和地区。

从欧洲高山地区转向西北平原，中世纪晚期的人口学家并没有看到在人口领域的任何突出变化。自然低地国家总的来讲要比位于山区的瑞士的人口密度高得多。拥有大约10 000平方公里土地的布拉班特公国（the Duchy Brabant）在1374年居住了300 000～400 000人，而西部瑞士［位于日内瓦湖（Lake Geneva）与阿勒河（the Aare river）之间的农村］拥有大约8 500平方公里的土地，在15世纪初只有大约140 000～145 000个居民。那时布拉班特的平均人口密度大约是西部瑞士的两倍（每平方公里35人与17人）。但这两个国家的人口趋势几乎是一样的。【16】

低地国家中人口长期减少的最适当、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伊普勒斯（Ypres）。大约在1300年其居民有30 000～40 000人，它的市民自豪地将他们的社区与巴黎、罗马和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相比，这样一个城市的人口，在1412年的时候减少到只比10 700人多一点；整个15世纪其人口一直在下降，只不过速度慢了一些。但是，伊普勒斯也许是个特例。大家知道这个不幸的城市在1382年又遭受了长期的围困，其间它被迫把它的郊区付之一炬。而且伊普勒斯还经历了毛纺业的持续衰退。这种衰退无疑是其人口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也是佛兰德其他两个大城市没有出现的；因为另两个城市根特（Ghent）和布鲁日（Bruges）想方设法阻止了颇具竞争性的农村服装业的崛起，而伊普勒斯在这方面与其对手相比极不成功，它只能眼

看着它的主要产业退居农村。因此伊普勒斯所蒙受的人口损失会由佛兰德西南部农村的人口增长补充，或许还不仅仅是补充。

以孤立的城市所提供材料为基础来匆忙下判断，这究竟会造成多大的误解，我们只要看一下安特卫普（Antwerp）的情况就会明白，它在 15 世纪的崛起与伊普勒斯在同一时期的衰败形成尖锐的对比。伊普勒斯的人口从 1437 年的 9 400 人下降到 1491 年的 7 600 人，而从它居住人口判断，布拉班廷（Brabantine）市人口迅速增长：在 1437 年安特卫普的家庭数目是3 440 户，1496 年是 6 586 户。[1] 尽管如此，安特卫普在 15 世纪的人口增长还没有伊普勒斯具有代表性。从对布拉班廷家庭统计和类似资料的详尽研究中可以看出，低地国家的总体态势肯定不是增长的，而是长期的停顿或下降。当然，在 1374 ~ 1437 年之间，布拉班特一些地区也有一些人口增长的证据；但在 15 世纪其余时间内，人口趋势是下降的。海瑙尔特公国（the Duchy of Hainault）在 1468 ~ 1469 年间所统计的农村家庭总数比 1365 年汇报的数量要低一些；在下一个 10 年还在减少。同样，虽然极不完全和可靠，佛兰德诸公国（the Countries of Flanders）和荷兰（Holland）在 15 世纪后半叶所进行的统计也显示出：对社会机体来说，存在的只是一个相当脆弱的环【17】境。

表 1　　布拉班特（Brabant）公国

年　份	有人居住住宅数	与上一年相比的百分比变化	每一间隔期间年度百分比变化
1437 ~ 1438	92 738		
1464	91 957	-0.8	-0.03
1473*	85 527	-7.0	-0.78
1480	86 483	1.1	0.16
1496	75 343	-12.9	-0.81

* 居维叶的版本（1472 年）中所列出的年代是错误的。参见朱尔斯·旺内吕斯（Jules Vannérus）：《15 世纪（1472 ~ 1482 年）卢森堡的统计》，载《皇家历史学会学报》（比利时皇家科学院），第 151 卷，第 241 页，脚注 1。

资料来源：约瑟夫·居维叶（Joseph Cuvelier）：《布拉班特 14 ~ 16 世纪的户数统计》（布鲁塞尔，1912 年）。

[1] 这些数字都是指住有人的家宅，包括郊区的住宅；尽管资料中通常说的是对“家庭”的计数，在其后的实际工作中无论是布拉班特还是佛兰德（也许还有海瑙尔特和荷兰）统计的都是不同社区的住宅。

表 2　　**佛兰德郡（三个城堡）**

年　份	住宅数	与上一年相比百分比的变化	每一间隔期间年度百分比的变化
1469	9 447		
1477 年之前*	11 572	22.5	3.2
1485	8 321	-28.1	-3.1

*　建立在 1485 年提供的资料基础上。

资料来源：德·斯麦特（J. de Smet）：《1469 年佛兰德的户数统计》，载《皇家历史学会学报》（比利时皇家科学院），第 99 卷，第 105 页以下。

表 3　　**荷兰郡（农村社区）**

年　份	户　数	与上一年相比百分比的变化	每一间隔期间年度百分比的变化
1477	23 713		
1494	19 011	-19.8	-1.2

资料来源：引自卡洛·奇波拉（Carlo Cipolla）、让·多恩特（Jean Dhont）、波斯坦（Postan）和菲利普·沃尔夫（Philippe Wolff）共同编辑：《第九届国际历史科学学会》，第 1 卷报告集（巴黎，1950 年），第 62 页。

【18】

毫无疑问，这些住宅数据的急剧波动一定程度地被夸大了，人口数量变化的幅度也许大致如此。人们应该知道，农村和郊区的大多数住宅只是茅舍陋屋、结构脆弱，战争期间很容易夷为平地，和平到来时能极快地修复（由城墙所遮挡的住宅通常躲过敌军的毁坏，但其中许多住宅时常被意外的大火烧毁。不过，像这些地方性的灾难，尽管它们对个人的财产能够且确实造成损失，对总体来讲几乎没有什么意义。）这些数字所反映的是安全与社会经济繁荣方面的不断变化的情况。与住宅数在长时期内基本保持不变的普遍情况相反几年内至少造成住宅数两次急剧下降，这样的大灾难怎么能不严重影响人口的增长？无论人们多么怀疑居住记录这一有代表性的证据，中世纪晚期人口长期停滞的总体模式在低地国家再次出现这一结论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就像在法国和瑞士的情况一样，我们有可能列举出一些用于说明什么是 15 世纪低地国家人口减少时期的特殊历史事件——除非关于家庭的计数是完全错误的。例如，15 世纪 80 年代布拉班特公国人口明显的下降趋势无疑是 1482 年勃艮第的玛丽（Mary of Burgundy）的去世所引起的巨大混乱造成的。而佛兰德在 1477～1485 年之间家庭数目的急剧下降显然是来自于当

时一份有关奥地利的马克西米连（Maximilian of Austria）与法国的路易十一（Louis XI of France）之间战争的资料。

尽管人口历史学家也许在寻求地区人口下降或停滞的近因时是十分成功的，他不会满足于这些解释。观察到的模式在时空上的过分一致不能不使人们思考更一般的力量（它们与那些特殊的因素在同一方向上发挥作用），也许这种观察有助于检视中世纪晚期的人口增长。普遍而又长远的影响之一——而且这是最强有力的影响之一——对那个时期的人口趋势肯定具有消极影响的因素已经提到：地方性流行病、流行性瘟疫和其他疾病所造成的高死亡率。但是 16 世纪也不完全是个健康的时代（就此而言，也不是个十分和平的时代）；正像将要看到的，大多数欧洲国家想方设法使其人口都获得【19】了惊人速度的增长。只有通过将中世纪末期人口的减少与接下来一个时期强有力的增长进行对比，这一现象才能在它适当的视野中得到理解。为此，在试图对长期停滞的原因提出假说之前，先将下一阶段人口增长的证据详列如下。

1.3 人口的恢复和增长

关于人口，大卫·休谟（David Hume）提出了一种乐观看法，他认为社会无一例外地都会在一代或两代的时间内从即使最惨重的流行病对人口的破坏中恢复过来，他的这一观点为以后的许多人口学者所赞同，并且它与 18 世纪的情况一致，但中世纪后期欧洲的人口趋势并不支持这一观点。总的说来，正像已被证明的，持续的恢复——与短暂的和不确定的间断的增加不同——被长期地推迟了。不过当它到来时还是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许多情况下其迅猛的势头会将人口很快恢复到甚至超过 14 世纪前半叶所能达到的水平。

不过，这一重要时期关于人口的统计数字在极大程度上还是时间跨度太大且无规则；然而关于人口正在增长这一点，它们没有留下多少疑问，只是它们没能显示出这个过程在多长时间内发生。因而在缺少时间序列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有把握地确定特定地区的转向点。一般地讲，长期增长似乎是刚刚过了 1450 年之后开始的；尽管晚到 15 世纪最后 25 年，正像上面看到的，人口的恢复在有些地区受到阻碍，甚至因受特殊因素的影响曾一度下降。不过，在 1500 年以后，所有国家人口的持续增长都呈现出明显态势。

事实上，除了现代早期大城市的惊人发展之外——这个现象后面再讨论——无论那些关于“人”或“家庭（hearths）”的统计数字，或是以类似的数据为统计提供了基础的地区，都显示了地区人口有着不同寻常的高增长率。表4～表13列出了来自欧洲不同地区的数据。

这些数据——只是从大量数量信息中抽取的样本——具有不同的价值。可能事实上几乎可以肯定，至少这些急剧增长的数字与其说是反映了异乎寻常的增长率，不如说是反映了不断增长的财政压力或统计方法的巨大进步。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一个人口历史学家会接受像在那不勒斯的资料中所发现的那些数据的表面价值，它们显示出，在27年间（1518～1545年），“家庭（hearths）”数量年增长2.6%。这种大时间跨度的增长率具有早期殖民的 [20]

表4　　那不勒斯王国（不包括那不勒斯市）

年　份	收税的户数	与上一年相比百分比的变化	每一间隔期间年度百分比的变化
1487	215 127		
1501	254 380	18.2	1.3
1505	254 823	0.0	0.0
1507	267 324	4.9	2.5
1510	263 510	-1.4*	-0.48
1514	261 377	-0.82*	-0.20
1518	262 345	0.37	0.09
1532	315 990	20.4	1.5
1535	343 849	8.8	2.9
1541	335 395	-2.5*	-0.40
1545	422 080	19.9	5.0
1553	425 837	0.89	0.11
1559	470 589	10.5	1.8
1561	481 345	2.3	1.1
1562	482 301	0.19	0.19
1565	485 522	0.67	0.22
1573	487 378	0.38	0.05
1595	540 090	10.8	0.49

* 第二次下降和第五个10年初期的下降似乎归因于发生于1510年和大约1540年两次驱逐犹太人。

资料来源：朱塞帕·康尼吉奥（Giuseppe Coniglio）：《卡洛五世时期的那不勒斯王国》，第2卷，（那不勒斯，1951年），第152页。

表 5　西西里［不包括巴勒莫（Palermo）和墨西拿（Messina），而且牧师和贫穷的人们不算在内］

年份	户　数	居民数	与上一年相比百分比的变化（居民）	每一间隔期间年度百分比的变化（居民）
1501	123 662*	502 761*		
1548	152 989	671 560	36.3*	0.77
1570	196 089	788 362	14.8	0.67
1583	194 268	801 401	1.6	0.01
1607	203 400	831 944	3.7	0.01

*　1501 年的统计，不像以后的计算，包括马耳他岛，它在那时拥有大约10 000人。1501 年与1548 年之间增长的百分比是在假定西西里本身在 1501 年拥有492 761个居民的基础上计算的。

资料来源：卡尔·尤利乌斯·贝洛赫（Karl Julius Beloch）：《意大利人口史》，第 1 卷，第 117 【21】页。

表 6　撒丁岛（Sardinia）

年　份	户　数	与上一年相比百分比的变化	每一间隔期间年度百分比的变化
1485	26 263		
1603	66 669	153.9	1.3

资料来源：弗兰西斯科·科瑞多（Francesco Corridore）：《1479～1901 年撒丁岛人口的历史档案》，第 2 版（都灵，1902 年），第 87、91 页。

表 7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Castile）］

年　份	家庭的人口数（*vecinos*）	与上一年相比百分比的变化	每一间隔期间年度百分比的变化
1541	1 179 303*		
1594	1 340 320	13.7	0.27

*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其《菲利普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巴黎，1949 年，第 355 页）中引用的是一个较低的数据（889 440）。

资料来源：阿尔伯特·吉拉德（Albert Girard）：《现代西班牙人口》，载《现代史杂志》，第 3 卷（1928 年），第 426 页。

表 8　西班牙［纳瓦拉（Navarre）］

年　份	家庭人口数（*vecinos*）
1553	30 833（牧师没算在内）
1587	41 901（包括牧师）

资料来源：阿尔伯特·吉拉德上引书，第 433 页。

表 9　　西班牙［阿拉贡（Aragon）］

年　份	家庭的人口数（*vecinos*）	与上一年相比百分比的变化	每一间隔期间年度百分比的变化
1495	50 391		
1603	70 984	40.9	0.4

资料来源：阿尔伯特・吉拉德上引书，第 432 页。

【22】

表 10　　葡萄牙

年　份	户　数	与上一年相比百分比的变化
阿方索（Alphonso V）五世期间（统治期 1448～1481 年）	252 261	
1527～1532	278 468	10.4

资料来源：蒙塔包・马加多（J. T. Montalvão Machado）：《葡萄牙人口史》，载《医学杂志》，第 16 卷（1950 年），第 473～476 页。

表 11　　布拉班特公国

年　份	家庭数	与前一年相比变化的百分比	每一间隔期间年度百分比的变化
1496	75 343		
1526	97 013	28.8	0.96

资料来源：约瑟夫・居维叶（Joseph Cuvelier）：《布拉班特（14～16 世纪）的户数统计》。

表 12　　海瑙尔特（Hainault）公国（农村社区）

时　期	家庭数	与前一年相比变化的百分比	每一间隔期间年度百分比的变化
1468～1469	29 212		
1540～1541	34 286	17.4	0.24

资料来源：安诺德（M. -A. Arnould）：《14～16 世纪海瑙尔特的家庭统计》［De tellingen van de haardsteden in Henegouwen（14-16e eeuw）］，载《统计公报》，37/4（布鲁塞尔，1951 年），第 601 页。

特点，但在一个古老的国度里是难以达到的。即使在从我们的数据中所推断出的增长率不太大的情况下，其夸大的成分也是可想而知的。但即使个别数字是可疑的，从 16 世纪资料的概要中得出的总体图像，其轮廓还是很清晰的：一切的证据、统计和其他资料都显示出欧洲人口明显的上升势头。【23】

表 13　　苏黎世地区（不包括苏黎世市）*

年　份	估算的居民数	与上一年相比百分比的变化（平均）	每一间隔期间年度百分比的变化
1467	26 700 ~ 28 900		
1529	48 100 ~ 58 790	92.3	1.4
1585	69 975 ~ 85 525	45.5	0.81
1649 ~ 1650	90 000	15.8	0.24

* 自从 15 世纪前半叶以来苏黎世市一直对这个地区（*Landschaft*）行使主权，它只是比苏黎世现在的行政区稍微小一点儿。

资料来源：维尔纳·施尼德（Werner Schnyder）：《14 ~ 17 世纪苏黎世市与苏黎世区的人口》，载《施维策尔（Schweizer）史学研究》，第 1 卷，第 14 期，第 108 页。

欧洲各个国家的工资率和物价的长期变化趋势也支持这一观点。最近的研究[①]表明：在欧洲许多地区的 15 世纪最后 25 年和整个 16 世纪，城市生产者的真实工资和工业产品的每一实物单位所能交换的食物量在急剧地下降。从这个和其他相关的证据我们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不得不承认，在所研究的时期内，人口对土地资源的压力是巨大的。

例如，在 16 世纪的德国，人口增长所产生的问题似乎是如此的严重和众多以至于相当一部分当时的学者都感到难以对此进行评论。早在 1483 年，埃尔富特编年史（Erfurt chronicle）的作者就为人口增长的证据所迷惑，尝试以这样的事实来说明它："在这 20 年里没有发生任何真正的瘟疫；而且也很少有夫妇有八九或十个孩子。"几十年以后，巴伐利亚（Bavarian）的人文主义者和宫廷历史学家埃文提努斯（Aventinus）也对他的国家旺盛的生殖力表示惊讶：对他来说德国的人们好像是在树上长大的！类似的观察也可以在塞巴斯蒂安·弗兰克（Sebastian Franck）《德国史》［*Germaniae Chronicon*，奥格斯堡（Augsburg），1538 年］的序言中看到，只不过是以一 [24] 种更加阴郁的调子表达的。作者更多地具体谈到斯瓦比亚（Swabia）和巴伐利亚（Bavaria），他写道：

> 这些土地为世界其他地区孕育了足够的人口；（人口）如此庞

---

① 参看费尔普斯·布朗（E. H. Phelps Brown）和希拉·霍普金斯（Sheila V. Hopkins）：《工资率和物价：16 世纪人口压力的证据》，载《经济学》（*Economica*），新期刊，1957 年，第 24 期，第 290 ~ 306 页；英格里·哈马斯特姆（Ingrid Hammarström）：《16 世纪的"价格革命"：一些来自瑞典的证据》，载《斯堪的纳维亚经济史评论》（*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1957 年，第 5 期，第118 ~ 154 页，尤其是 136 页以下；费尔普斯·布朗和希拉·霍普金斯：《"建筑工人"的工资率、物价和人口：一些更进一步的证据》，载《经济学》新期刊，1959 年，第 26 期，第 18 ~ 38 页。

大以至于地产与房租急剧攀升，以致它们几乎不可能升得再高。我认为，除非上帝预定的战争和大量的死亡，否则我们必须再次由抽签或其他方式来决定谁由于年老而退席，或者是不得已而去寻求外面的土地，像吉卜赛人那样离家去漂泊……现在，据说成千上万的农民都在（1525 年）叛乱中死亡，但人口并不因此而匮乏；相反每个村子都是人满为患，不再需要添丁加口。孩子们遍布整个德国。

另一部 16 世纪的南德编年史，被称作《室内编年史》（*Zimmerische Chronik*），也以一种强调的语气来描述人口对土地不断增加的压力。“在我们的时代，”他写道，“斯瓦比亚和所有其他国家的人口急剧地、大规模地增加，而有史以来土地的开发（规模）远远超过了以往；除了位于最荒凉的森林和最高耸的山脉上的偏僻角落没有被开发和居住外，几乎全部土地都被开发了。”在一般性地提到开发举措以后，作者接着详细报告了最近时期齐默恩（Zimmern）县殖民的进展情况：成群的人们是如何正从拥挤的阿尔哥（Allgaü）潦倒下去的，在那里他们不能养活他们自己；他们是怎样要求并得到允许开始开垦的；这些殖民者是怎样得到被长期放弃的耕地并且恢复原来的灌木丛，在古老的森林中开辟道路。“而且难以让人相信的是，这些（新）村庄的居民和住宅在几年之中是怎样地大规模地增加，正像现在已经证实的那样。”

为免于让人们以为这是一个人口增长的孤例，我们有必要强调在 16 世纪德国的其他许多地方（尤其是在东部）都曾遇到类似情况：过去荒废的土地被有计划地再利用以及开垦活动重新兴起。关于德国西部人口恢复与增长的历史记载，最全的一个例子是来自于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k）公国。这一地区的人口据估算在 1500 ~ 1604 年间增长了 84%。与之毗邻的藻厄兰（Sauerland）据计算 1576 ~ 1618 年间每年的平均增长率大约是 4‰。近似甚至更高的增长率也在其他地方发现过，例如在黑森（Hesse）和第洛尔（Tyrol）。

开发利用与重新定居，尽管被强有力地实施着，但从长远来看，在一个正在迅速发展的农业社会中，它不足以保持以前的农场的比例。事实上，16 世纪德国人口长期增长的最强烈的迹象是许多小块土地不相称的增【25】加，它不仅出现在东埃尔比亚（East-Elbia），在这里，地主家族（*Gutsherrschaft*）的壮大伴随着旧式庄园租赁的逐渐消亡和许多小村舍的产生，而且这种现象还出现在农民所有制有一定发展的地区。在有些地区，地块分割（*morcellement*）推行到如此程度以至于这些小块土地的经济生存能力成了问

题，地区立法曾经试图中止这个过程，但并不总是很成功。[1] 同时一些君主以其他方式试图向农村输送过剩的人口。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一世（Saxon Elector August I，1553～1586 年）以有计划购置大块土地而闻名，他命令将它们分割成农用小块土地。类似的农业政策在德国中部也在实施着。[2]

不过，农场的小型化与土地的分割会使土地得到更充分的利用，缓解了一部分的人口压力，但对由人口的急剧膨胀而带来的问题而言，它既不是一个彻底的也不是一个永久的解决方法。农村的过剩人口必须寻找另外的出路。为他们提供的其他出路在哪里？城镇无疑要继续吸纳相当数量的农村人口，日益扩大的国内生产体系也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众所周知，在 15 世纪最后几年和 16 世纪前 10 年大量的移民都集中在萨克森（Saxony）、波希米亚（Bohemia）和第洛尔等地组成的这个正在迅速发展的矿区。但除了上面提到的开发活动以外，也许最大的发展是 1500 年以后，过去就发生过的德国向东运动的继续。[3] 加入到这些新移民运动中的人数［包括哈特派（Hutterites）、荷兰孟诺教派（Dutch Mennonites）和其他宗教教派群体因宗教原因的移民］也许并不比投身于 12 世纪和 13 世纪殖民事业的人数少多少。

德国并不是要调整其经济以适应人口快速增长的惟一国家。瑞士也许可以作为另一个例子，它在 15 世纪晚期和 16 世纪人口的增长，我们已经用部分的数字加以说明，它的人口增长为这一时期移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刺激。【26】瑞士的人口据估计大约在 1450 年有 600 000～650 000 人，到了 17 世纪的 30 年代增长至 800 000 或者 850 000 人。宗教战争似乎是那个时代制约人口增长的暂时性因素；但在 1513 年缔结和约时，人口的增长重新开始，到 1600 年已接近百万人。

只有通过坚定的努力才能维持这种长期的增长（尽管不是无限制的）。瑞士这时必须利用那时还没有集中利用（可能完全没有利用的）的土地资源。瑞士西部山区人口稀少的地方像侏罗（Jura）和沃州（Vaud）开始很快聚集起人口。但这种向耕作区边缘的移动显然不足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需求。在这个时候——大约是 15 世纪末——瑞士找到了一个巧妙的但在道

① 参看弗里德里希·吕特格（Friedrich Lütge）：《中德的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及其解体》（*Die mitteldeutsche Grundherrschaft und ihre Auflösung*），第 2 版，［斯图加特（Stuttgart），1957 年］，第 67 页以下。

② 同上，第 32 页以下。

③ 参看瓦尔特·库恩（Walter Kuhn）：《新时代德国东部移民区发展史》（*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Ostsiedlung in der Neuzeit*），第 1 卷［科罗格恩—格拉茨（Cologne-Graz），1955 年］。

德上则暧昧不清的减轻人口压力的方法，即有组织的军事移民。“当雇佣兵”（*Reislaufen*），即被外国军队招募，尽管这种做法被瑞士人而不是其他民族的人们更广泛地实施，但在现代早期的欧洲它并不为瑞士所独有；也不是什么新生事物。但过去曾经是，在其他地方一直是个人的事情在瑞士却发展成为公有事业，处于“投降”体制之下的州和联邦政府为外国势力提供雇佣兵。进入这一行当的人数不能确知；但肯定数目巨大。法国国王是瑞士主要的买主，据说在 1474 ~ 1792 年间为其提供了 700 000 人。据估计，有 50 000 ~ 60 000 瑞士士兵曾在 18 世纪前半叶的特定时间为外国国王服役。对生命损失的一个保守的估计——因为仅限于男性，所以更加严峻——瑞士由当雇佣兵所蒙受的巨大损失 15 世纪有 50 000 ~ 100 000 人，16 世纪和 17 世纪有 250 000 ~ 300 000 人，18 世纪有 300 000 ~ 350 000 人。

表 7 ~ 表 9（第 22 页）中列举的个别数据可以说明 16 世纪西班牙人口的增长趋势，但它们的有效性要打一定折扣，甚至不可与纳瓦拉（Navarre）的数据相比，但它们显示的趋势是没有错误的。而且，它也被 16 世纪 70 年代由遵从菲利普二世（Philip II）命令而进行的对农村状况所做的调查的结果所证实。尽管迄今为止，只有有关马德里（Madrid）和托莱多（Toledo）省的资料出版了，但得到的证据还是如此的确凿以至于所有西班牙中部地区的人口发展都能从中推断出来。【27】

如此不厌其详地进行描述的绝大多数城镇和乡村的人口从来没有如此稠密过；其中相当一些人具体报告了在他们记忆之中住宅或住户（*vecinos*）的增加数目。凡是给出数据的，都显示出增长率还是相当高的。在有些情况下家庭数量的增加比住宅数量的增加还要快得多——一个人口急剧增长的可靠信号。只有很少一些地方，几乎都是其中规模较小的地方承认人口的下降。同时，附近地区消失的村庄和教堂的遗迹并不少见，但它们都是通过所谓的传说语言表达出来，毫无疑问，这些荒村（*Wüstungen*）都是在遥远的过去形成的。

当研究者试图去寻求当地人口增长（或下降）的原因时，官员会警告说这种调查很少获得成功。毫不奇怪，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常常是相当模糊的：人们的健康状况（或反之，疾病的流行）作为被报告人口变化的原因的情况最多。当地的移民或高结婚率也被视为人口增长的原因之一。其中一个非常有趣的回答是把开垦行为作为当地人口增长的原因（*rompimiento de los campos e terminos de la villa*）。

前面刚刚呈现的 16 世纪新卡斯蒂利亚（New Castile）的人口记录似乎

并没有给由一些西班牙学者提供的这种观点多少支持；在 15 世纪和 16 世纪，西班牙的相对人口密度的地域高点从中部向边缘地区转移。这并没有低估像纳瓦拉（Navarre）、阿拉贡（Aragon）（参见表 8 和表 9，第 22 页）和加利西亚（Galicia）等省份所取得的进展。实际上加西利亚的早期人口史最近成为一个具体的研究课题，它显示出人口过于稠密地区的一些特点。1480 年或 1490 年之后一个世纪的似乎过高的增长率不久即为这个省试图通过大规模的移民来摆脱一部分过剩人口创造了条件，包括征募几千个健壮的男人去当外国雇佣兵。到了 16 世纪末期，它仍然经常性地采用这种季节性的劳动力移民手段。不过这种人口外流显然对减轻人口压力帮助不大。住户（vecinos）的数目远没有下降，1557～1594 年之间从 121 603 户增加到 125 718 户。甚至以一种奇特的周期连续袭击（1563 年，1573～1574 年，1583 年，1597 年，1618～1620 年，1628～1630 年）这个国家的罕见的大饥荒似乎也没有阻止人口增长的势头，尽管紧接着是长时间的流行病严重发作。全神贯注于经济越来越不景气（如果说不是原因的话）的政府无能为力。布施和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处理流浪者流放事宜也称不上减少人口压力的万全之策。【28】

在 15 世纪晚期和 16 世纪的欧洲几乎到处都遇到由人口的过度增长所带来或加重的困难以及克服它们的多少有些见识的尝试。适应人口状况的变化就不会轻易出现这样一种社会经济：它的土地资源是有限的，它的技术尽管不是停滞的，但进展缓慢，而且那个时代最为棘手的问题是准无产阶级的产生。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不为成群的“流浪者”、失业者和不能被雇佣的人所困扰，他们欺骗、纠缠或胁迫公路上的旅行者、田间或农场的农民和城镇的居民。自然偷盗、诈骗、行乞和流浪既不是什么新生事物，也不纯粹是人口现象之一：例如，早在 1383 年那时几乎不存在任何“人口过剩”的问题，英国议会认为有必要制定有关取消流浪者的法令，他们“比过去时代更多地游荡于全国”［理查二世（Richard II）7 年，见《本记》］。但毫无疑问，“强壮的乞丐”问题成为当时时代前所未有的紧急之事。文艺复兴时期一个最有思想的学者之一路易斯·维维斯（Luis Vives）曾经专门从事贫穷问题的研究，他的著作《贫困补助》（*De subventione pauperum*）于 1526 年在布鲁日（Bruges）出版，引起广泛的兴趣，现在已被翻译为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英语。16 世纪西班牙和法国的流浪汉小说与英国伊丽莎白时代（Elizabethan England）的诈骗故事的流行都说明同样的问题：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小说中，流氓都是很惹人注意的角色。

一般认为，英国城乡乞丐和流浪者的滋生是由圈地运动所造成的。但是

这种观点只是反映了当时对这一大变革持反对态度者的看法，不应该无保留地接受。15 世纪末和 16 世纪的农业革命事实上引起了严重的社会经济混乱。但是“饲养圈的削减”（和封建家臣的被解雇）只是由原先人口的急剧增长过程所产生痛苦的集中反映，这种人口的急剧增长似乎在 2～3 代之间使土地上的人口从 15 世纪前半叶的低水平恢复或接近于黑死病之前所达到的水平。如果国内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的产生（区别于那些陌生而固执的旅行者、碰巧大约在同一时期出现于英国的吉卜赛人）是英国公众和他们的统治者严重忧虑的源泉，那么当他们得知许多其他国家也【29】被同样的麻烦所困扰时会感到些微的安慰。1495 年亨利七世（Henry VII）主持颁布的《关于取缔流浪汉和乞丐的法案》和 1572 年伊丽莎白（Elizabeth）时期的《惩治流浪者法案》、《救济贫穷者和虚弱者法案》——这些只是都铎王朝（Tudor）诸多同类的法令和公告中的两个——在 16 世纪其他国王们所发布大量法令中，有两个与它们类似，即由勃艮第（Burgundy）君主们为布拉班特（Brabant）颁布的和由哈布斯堡（Habsburg）皇帝为奥地利地区颁布的法令。在社会的上层阶级中对土地的占有欲造成了 16 世纪英国和其他地方大量关于地产的诉讼。人口压力不仅形成了许多流浪者，而且也产生了大量的律师。

因而，毫不奇怪，在这些情况下，人们会在许多当时的著述中发现一种马尔萨斯式的焦虑。“人口在增长，所需要的耕地、谷物和所有其他食品却严重不足”，一个英国人在 1576 年写道：“如果他们知道哪里有块耕地，他们愿意劳动；如果农民知道哪里有块耕地，他会高兴地套上他的犁去耕作。”前面我们已经引用过塞巴斯蒂安·弗兰克（Sebastian Franck）对 16 世纪 30 年代德国人口状况所做的阴郁的评论。几年以前（1518 年）另一位德国人乌尔里希·冯·胡滕（Ulrich von Hutten）提倡发动对土耳其的战争，理由是它可以减轻国家人口过剩的负担。这位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声称：

> 在这个时代，供应不足，而德国人满为患（*populosissima*）。我们所有人都应盼望的一场对外战争——由此我们可以摆脱过多的人口——会神佑般地来到；它是出于天意，我是说反对土耳其的战争既有正当理由又是必需的……多少人在忍受着贫困，多少人在挨饿；城镇和农村到处都有懒散的士兵在随意地闲荡。[①]

---

① 《劝德国君主们一起承担对土耳其的战争》，载《乌尔里希·冯·胡滕……的呼吁》［爱德华·伯金（Edward Böcking）编辑］，第 5 卷，第 101 页。

在 16 世纪初期这是一个多么大胆而新奇的建议——把战争作为减轻人口压力的有效措施——100 年后，这种想法显然已作为管理国家的准则而被广为接受。“而且在这一点上”，一个英国作家在 1609 年向他的读者保证，“许多政治家首先考虑的是对大多数的国民有利，其次是对外战争，最后才[30]砍掉多余的树枝。”① 也许在这些观点之中最出色的代表是瓦尔特·罗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在他的《战争论》（Discourse of war）中他说：“当任何一个国家不堪承受依靠它生活的大众时，自然迫使它卸下重负，把负担放在其他国家之上，不管对不对……因此建立在普遍的、不可扭转的必然性基础上的战争可以称为普遍的、不可逆转的，或必然的战争。”

不过，那时另一个也许更有指望解决过剩人口的方法是开发大西洋彼岸，伊丽莎白（Elizabethan）王朝晚期和斯图加特（Stuart）时代的英国人开始越来越多地考虑把殖民作为减轻人口压力的一种方式。实际上，国家的人口密集状况被这一时期提倡殖民冒险的人当做最有力的论据之一。“确实如此，”其中一人写道，② “由于长期的和平和少生疾病，我们比以前的人口更加稠密，所以现在有那么多的艺术和科学，它们几乎不能共存共荣，不仅如此，它们总想彼此吞噬。”

以这种马尔萨斯口吻发表的意见或类似的言论的词证价值并不因为以下事实而受到削弱，即，许多害怕人口过多的作家——它们的人数并不比反对圈地运动的人少，后者强调人口稀少的危险——都在做出特殊的辩护。这些殖民计划和移民的拥护者总是倾向于从观察中得出夸大的结论，而这些观察本身十有八九都是正确的。

不过，在英国很难通过用定量的证据与他们对证，从而来证实或纠正当时关于人口趋势的论述；因为从 16 世纪和 17 世纪早期传下来的数字很少是可靠的。无论是 1545 年小教堂的调查、伊丽莎白时代花名册、16 年内超过 2 065 498 个受圣餐的人和不服国教的天主教徒，还是 1603 年由主教向枢密院做出证明的人数都不能产生多少自信。也许最好的资料还是里克曼（J. Rickman）对 1570 年和 1600 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的估算。尽管他的数据和计算方法远远不是无可指摘的，由 19 世纪的统计学家所做出的这些估算至少有这个优点，即它们都是建立在洗礼、葬礼和婚礼同一过程的平均数

① 罗伯特·格雷（Robert Gray）：《祝愿弗吉尼亚》（1609 年）中的《使徒书信题献》，由克劳斯·克诺尔（Klaus E. Knorr）在《英国殖民理论 1570～1850 年》中引用（多伦多，1944 年），第 43 页。

② 理查德·哈克卢特（Richard Hakluyt）：《关于西部发现的一次特别的讲演》，第 36 页以下。

上，因而彼此是可以进行比较的。以这种方式来使用——不是作为绝对的数量，而是作为一种反映变化趋势的粗略指标——里克曼的数字显示出，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在伊丽莎白时代如果不是以惊人的速度，也是以中档的速度在增长着（参见表14）。在16世纪早期和中期其增长速度也许更快。【31】

表14　　英格兰与威尔士

年　份	估算的居民数	与上一年相比百分比的变化	间隔期间年度百分比的变化
1570	4 123 708		
1600	4 811 718	16.7	0.56

资料来源：里克曼（J. Rickman）：《1570～1750年英格兰与威尔士的估算人口》，载《大不列颠：人口统计摘要（1843年）》，第22卷，第37页。

16世纪法国人口史的文献记载比英格兰都铎王朝（Tudor）的还要稀少，而且历史学家自身必须正视这一事实：他只能勾勒最粗略的轮廓。当百年战争在15世纪40年代已成强弩之末，而且最后在1453年彻底结束时，法国人民第一次得到机会重建他们濒临崩溃的经济。但是这个不幸的国家此时还没有享受到充分的和平；反对国内和外来敌人的斗争几乎从不间断地贯穿了路易十一王朝（Louis Ⅺ，1461～1483年），在驱逐了英国人之后的第一代人期间，向被劫掠地区的重新移居似乎有一定的进展，虽然比较缓慢。这丝毫不意味着人口恢复得很快；事实情况是，路易十一王朝的最后几年大闹饥荒，疾病流行，毁掉了法国人民在此前几十年在人口增长方面所能收获的哪怕是最小程度的收成。

在这之后不久，人口长期的显著增长就到来了。因为只有长期的人口增长才能使一个完全衰竭国家的人口密度恢复到如此的程度，以至于在1561年一个外国观察者都被人口饱和的状态惊呆了。威尼斯共和国（the Republic Venice）的大使向其政府报告，法国"已经人满为患了……；每一块土地都被居民们最大限度地充满了"。如果他愿意，这个威尼斯人可以用大量详细的事实来支持他的论述。在许多教区，教堂对于它们的信众来说变得如此狭小以至于不得不在这一时期扩建或重建。像巴黎和图尔（Tours）这样的城市开始住房紧张起来。里昂（Lyons）的人口据报告增长了50%。16世纪中叶或更早一些时期法兰西民族已从1350～1450年之间的巨大人口损失中恢复过来，这种印象为众所周知（并不太为人们所公认）的16世纪60年代所做的家庭普查结果所证实。将这些结果与1328年得到的结果做一个比较，尽管会受【32】

许多不确定因素的困扰，似乎显示出，法国在 16 世纪中叶以后的平均人口密度与 250 年前几乎是一样的——大约是每平方公里 35 ~ 40 人。

不过，我们不太确定的是，在 1562 年法国的宗教战争（the French Wars of Religion）爆发以后，其人口是否还维持这个水平。30 多年连续的国内斗争，紧接着是外国的干预只能使人口遭受巨大的损失。一个同时代人在 1581 年写道，估计到那时伤亡人员已超过 75 万人。但是这个数字根本不足以反映那个急剧动荡的年代里所有积极与预防联合行动的真实情况。维也纳（Vienne）的命运，也许不怎么典型，却是无与伦比的，有助于说明宗教战争的残酷性。它被占领和收复了不下 20 次，先后被胡格诺派教徒（Huguenots）、天主教徒（Catholics）和联盟（the League）的部队掠夺，1563 ~ 1564 年、1567 年和 1584 年又先后流行瘟疫，最后在 1595 年交付给亨利四世（Henry IV）时整个城市已经成了一堆废墟，满目疮痍。

表 4 ~ 表 6 所提供的数字（第 21 ~ 22 页）可以说明 16 世纪意大利人口增长的一般趋势。但那些数据所描绘出的轮廓图无疑是正确的，尽管人口增长的趋势并不与它们引导我们所做出的假设十分一致。只有通过查阅这个国家的政治史与军事史，我们才有希望对它的人口发展有足够的了解。

对意大利来说，15 世纪后半叶是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而且它的一些地区的人口增长，正像前面已经注意到的，似乎比欧洲其他地区来得要早一些。不过，随着 1494 年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Charles VIII of France）对这一半岛的入侵，意大利进入一个极度动荡时期。因为这个国家落入冷酷的军人手中达 30 多年。国内和外国的军队在意大利土地上相遇，各为其主进行搏杀，随之而来的是劫掠和疾病。尤其伦巴第区（Lombardy），是 16 世纪 20 年代所发生战争程度最激烈的地方，而且它在 1524 年和 1528 年还遭受恶性流行病的侵袭，死亡惨重。1529 年亨利八世国王（King Henry VIII）的两位公使在写给他的信中描绘了那种极其荒凉的景象。公使写道：

> 陛下，在基督教世界里看到这种景象，我们想这是最可怜的；[33] 有些地方人与牲畜都看不到，美丽的城池被毁于一旦，一片荒凉。维切利（Vercelli）……和帕维亚（Pavia）这 50 公里之间，可以看到的最适宜于种植谷物和葡萄藤的土地被荒芜了，一路上我们看不到男子或妇女在地里劳动，也看不到牲畜的影子，只是在较大的村子里看到 5 ~ 6 个悲惨的人；在这段路途中我们只在一个地方看到 3 个妇女从葡萄藤上采摘葡萄（此时正是 12 月），因为也没有别的葡萄藤可供订购和保存，一路上也没有看到谷物，也再没有看

> 到从生长着的葡萄藤上采摘葡萄的人们，而葡萄藤四处蔓延……路中间是一个小镇……已被夷为平地，一片荒凉。道路上也是如此，太可怜了！孩子们在大街上哭喊着要面包，他们快要饿死了。他们看到意大利农村和其他偏远地区的全体人民与其他地区的大多数人民一样，由于战争、饥饿和瘟疫死亡和逃走，正像教区牧师向我们指出的那样；因此，可以说，在许多年内，意大利都没有希望能恢复到满足人们需求的程度。①

所幸这种悲观的预测并没有成为现实。尽管这个国家的那些地区在承受着军事冲突的正面冲击，或者至少承受着16世纪20年代由战争带来的瘟疫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但早在16世纪中叶，那些地区的人口就已在恢复之中。尽管我们对农村的情况所知甚少，② 但意大利北部许多城市社区突出的恢复能力可以被认为是人口总体增长的初步证据。帕维亚市（Pavia）的人口在1529年减少到几乎不多于5 000人，13年后达到大约11 000人。维罗纳（Verona）的人口从1501年的47 000人减少到1529年的27 000人，到了1557年重新达到了以前的人数。曼图亚（Mantua）的人口在1529年以后也曾经经历了一个30年的快速增长时期。佛罗伦萨的人口在1527年的瘟疫和1530年的围困时损失惨重，恢复缓慢。它的人口从1510年估算的72 000人减少到1531年的大约60 000人，在以后的30年中一直保持这种低水平。不过在这之后很快就开始人口的恢复；因为1591～1600年这10年间在佛罗伦萨受洗的平均人数（3 016人）大大高于1491～1500年间的同类人数（2 523人）。布勒西亚市（Brescia）在1512年遭到洗劫，因而恢复得不这么好，但是摩德纳（Modena）的人口在1539～1581年间从15 500人增加到18 000人，而米兰的人口在1542年之后的50年间增长了40%。科摩（Como）的居民数从1553年的8 000人增加到1592年的12 000人，贝加莫【34】（Bergamo）的居民数从1548年的18 000人增加到1596年的24 000人。同一时期，帕维亚的人口似乎也翻了两倍多。

在这一世纪后半叶，上面最后提到名字的城市的人口增长程度更加突

---

① 《皇家委员会授权出版的国家档案》，第7卷，国王亨利八世（King Henry the Eighth），第五部分——连续出版物（1849年），第226页。

② 关于农村的人口增长，我们可以举出一些突出的例子，尤其是米兰公国和相邻的罗维戈公国（the duchy of Rovigo）的。在后一个地区，沼泽被排干后，紧接着在1548年～1603年之间，人口就增加了3倍。1535年之后人口快速恢复的其他例子（伴随着极高的出生率）被卡洛·奇波拉（Carlo M. Cipolla）在其《16世纪龙巴底人口史》中引用，《对吉诺·卢扎托的荣誉的研究》第2卷（米兰，1950年），第144～155页。

出，因为在 1575 ~ 1577 年间意大利北部曾经再次遭到罕见流行病的侵袭，它导致威尼斯的人口从大约 170 000 人减少到只有 120 000 多人，而帕多瓦市（Padua）损失了 1/3 的居民。帕维亚市似乎逃过了灾难，只有些微的损失，但与其相邻的米兰却遭受了 17 000 多人的损失。在这次灾难之前意大利北部的城市人口大幅度地超过了 16 世纪初期所达到的水平；1600 年的人口肯定不会太少，也许比 1500 年的人口还要多得多。

意大利的那些城市和地区只是短暂地或根本没有受到 16 世纪早期军事冲突的影响，不过它们不会一点儿不受战争的间接影响——疾病和经济混乱；然而，即使在 1494 年之后动荡的几十年里，它们似乎也拥有很高的增长率。那不勒斯王国（the Kingdom of Naples）和西西里王国（the Kingdom of Sicily）的人口记录（上面已列表显示，表 4 和表 5，第 21 页）提供了最具说服力的例子，尽管这并不是惟一的例子。16 世纪前半叶人口快速增长的其他例子是由威尼斯和锡耶纳（Siena）提供的。前者从 1509 年估算的 115 000 个居民增加到 1540 年的 130 000 个居民，再到 1555 年的 160 000 个居民。锡耶纳从 14 世纪 80 年代到 15 世纪末每 10 年间受洗的平均人数保持稳定，1500 年后开始急剧增长；而且这时的人口比以前的人口多出 1/3 以上，这个新水平一直维持到 50 年代中期为止，到那时，这个城市被围困和占领。

像刚才提到的灾难，或者还可以引用一个更为著名的例子，导致当地人口趋势间断的 1527 年罗马的被劫掠，它使这一时期意大利人口发展的主要特征显得模糊，但并不因此而难辨。总的图像显示出，在面对灾难时生命繁衍所取得的胜利。只有在 16 世纪后来的岁月里人口增长的长期趋势才在这个国家的一些地区开始稳定，而且有时甚至会走向反面——大概是人口压力对土地和早期经济停滞的一种反应（参见下面第 51 页）。

16 世纪低地国家的人口史与同一时期意大利北部地区的有一些相似之处：这两个地区的人口发展都受政治与军事事件进程的决定性影响。只是这【35】两个国家的安定与动乱的时间次序是不同的；对意大利而言，动乱的岁月发生在 16 世纪的第一个 1/3 时期的，对于荷兰而言，动乱发生在 16 世纪的最后 1/3 时期。

15 世纪 80 年代是一段极度艰苦的岁月，在这一时期可以看到南部低地国家（佛兰德、海瑙尔特，布拉班特）和荷兰郡（the county of Holland）的房屋数量急剧减少（参看表 1 ~ 表 3，第 18 页），在此之后，也就是在世纪之交前不久才开始恢复（参看表 11 和表 12，第 23 页）。大约是在 1520

年这次最近的损失得到补偿。但远远没有达到稳定的水平，人口增长似乎又持续了50年，安特卫普市的情况是最突出的例子。由于移民，它的人口到1568年大约增至100 000人（包括大约10 000名郊区的居民）。城墙内外的房屋数量那时大约是13 500套，与1496年统计的有人居住的住宅6 586套和1526年统计的有人居住的住宅8 479套形成对照。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都以像那样的速度增长是根本不可能的；不过，如果海瑙尔特公国的发展形势是很典型的话，那可以说，16世纪前70年所获得的人口增长一定是相当大的。

1567年潮流发生转折，它是随着阿尔瓦（Alva）将军的到来和尼德兰起义的爆发而到来的。如果用人口学的标准来衡量，把人口的损失直接归因于阿尔瓦的铁血委员会（Council of Blood）是没有意义的。在1568～1573年间，被西班牙人（Spaniards）处死的人数还不到18 000人（这个数字来自于惊恐万状的当时人的陈述），也许根本没有超过7 000人。在一个拥有大约300万居民的国家任何一次轻微的流行病就会夺去如此多或更多人的生命。至于人力损失，也许更严重的是成千上万的难民逃离低地国家。诚然，移民在很大程度上被大量外国雇佣兵的涌入所平衡；声名狼藉、撞运气的士兵是正要逃离这个国家的熟练工匠和富有商人的可怜替代物。有组织的卖淫——紧跟阿尔瓦的军队而来的是2 000名意大利妓女——并不是家庭生活的替代，即使完全站在数量人口学的立场上来判断这两种制度的相对优劣的话。

同时，随着西班牙皇家（the Crown of Spain）军队与奥兰治国王（the prince of Orange）及其继承者的军队所进行的混乱而野蛮的战争一年又一年地延续着，生命和财产的损失一直在加重。士兵和非战斗人员的死亡没有多大区别。当一个被围困的城市因饥饿而被迫投降或被攻占时，占领者会对守城部队和市民们发泄他们的愤怒。斑疹伤寒和其他多种疾病也会在士兵与市民中间不加区别地蔓延开来。简言之，我们可以说，除了斗争的第一个阶段之外，意大利南部比北部的省份遭受更为严重的打击。其北部省份中尤其是荷兰（Holland）和策兰（Zeeland）在坚固的防线后面挖掘壕沟防御，得以逃过1576年以后的蹂躏和屠杀。 [36]

很难得到用以说明这一时期南部低地国家人口发展的数字；但是当这些数字显露出来时（尽管是零零星星的），它们会充分地印证了解这个国家困境的人们所期望看到的东西。因此，我们发现从西南部开始，在海瑙尔特公国的第三大城市亚大（Ath），为税收目的而计算的烟囱数量在1553～1594年之间减少了59%。在阿维斯纳（Avesne），同一个省的一个小城，人口下

降同样剧烈。在与之相邻的佛兰德的一个农业区，奥登纳德（Audenarde）的夏特莱尼（châtellenie），其趋势也大致差不多：据报道 32 个教区中 27 个教区的家庭数目由 1557 年的 4 372 户下降到 1600 年的 2 520 户——其减少的数目超过了 42%。不过在这一具体例子中，它的大幅度减少不可能在 1576 年以前出现，因为据 26 个教区报告，在这一年，强壮的男子数量还大大高于 1558 年上报的数量。[1] 在布拉班特公国，人口减少最著名、最典型的例子是由安特卫普提供的。这个大都市在 1568～1589 年之间损失了超过一半的居民，而这主要又是由于 1585 年后，当宗教迫害和严重的经济混乱交织在一起使这里的生活不可忍受时的大规模移民造成的。

这些移民中的许多人都转向北方的省份，而这些省份的公民这时事实上从他们西班牙最高统治者那里获得了独立，他们能为共同信奉新教（Protestant）的人们提供保护。因此，当佛兰德和布拉班特市撤空时，荷兰的那些地区的人口却在迅速地扩张。莱登（Leiden）的人口从 1581 年的 12 144 人上升到 1622 年的 44 475 人。阿姆斯特丹在 1585 年～1611 年间的连续 3 次扩张之中，其地域翻了两倍，到 1662 年其居民据统计达到 105 000 人。一个英裔荷兰人（the Dutch）大约在 16 世纪末写道："上帝是如此地眷顾劳动者的后代以至于大部分地区的所有城镇像阿姆斯特丹、鹿特丹（Rotterdam）、恩库森（Enchusen）、布瑞尔（Briell）、中博洛维（Midleborowe），【37】实际上低地国家的大多数城镇再次成为过去每日所见的那种大城市（新城镇与过去一样大）。"

不过，成长并不仅限于市中心，16 世纪荷兰的人口增加主要不是由于移民而产生的：它的长期增加无疑主要是由自然增长带来的。它的数量级差可以通过把 1514 年所统计的家庭（hearths）总数目（45 857户）和 1622 年在荷兰和西弗里斯兰（West-Friesland）所做的人口普查的结果（671 675 人）进行对比从而得出判断。[2] 尽管这样的对比可能是粗略的，但它显示出：荷兰本身的人口至少在整个 16 世纪翻了两倍。

如果说关于欧洲中心地带人口发展的资料还是零碎的、不完全的，那么同一时期欧洲边缘地区的人口史就更难以详细地阐明了。我们知道挪威和丹麦在 16 世纪都经历了长期的增长。但就前者而言，这个国家在 14 世纪中叶后所蒙受的重大人口损失似乎不可能在 1600 年以前得到补偿（那时挪威的

---

① 当人们回忆在 1557～1558 年佛兰德曾经是激烈战斗的地区，而且又深受饥荒和瘟疫的打击，这种矛盾就迎刃而解了。

② 在总人口中荷兰本身（*zuiderkwartier*）拥有 505 185 人。

人口大约是 400 000 人，丹麦在战前的人口大约是 570 000 人）。一般认为，在古斯塔夫斯一世（Gustavus I，1523～1560 年）统治的繁荣时代，瑞典的人口增长迅速。不过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受国内斗争的影响和国外战争的拖累，其人口几乎没有获得多大的发展，因为像许多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或者甚至更糟，在 16 世纪 90 年代，人口繁衍遭受一系列庄稼严重歉收的打击。至于芬兰，那时是瑞典的属国，我们拥有两种家庭数目的统计结果（1557 年 33 046 户，1589 年 31 570 户），它们似乎或多或少显示人口的停滞状态。芬兰从 16 世纪最后几年开始向瑞典中部的森林地带移民，这是不是预示着人口的压力还难以确定。

波兰，也许因为它的一些南部地区似乎不太受黑死病的影响，好像比其他大多数西方国家更快地克服了中世纪晚期的人口危机。事实情况是：早在 15 世纪已经为开发林区而开始国内移民并且一直持续到 16 世纪（参看第 1 卷，第 396 页），这应被认为是东欧新一轮人口压力的征兆；而且我们拥有的数据也支持这种观点。诚然，我们的统计尚有许多可待改进之处。1578 年它的 3 个最重要省份的总人口，据阿道夫·波温斯基（Adolf Pawinski）统计是 2 118 000 人，而埃贡·菲尔罗斯（Egon Vielrose）统计是 3 200 000 [38] 人，这些都是由推测而分别得到的。而且，以前的资料都没有保存下来，无法与这些数据进行比较，除了同样是假设性的关于 1340 年的人口总数外，各自的推算结果是：米特科斯基（Mitkowski）的人口是 453 000 人，库拉（Kula）的人口是 658 000 人，雷登伯格（Ladenberger）的人口是 842 000 人，菲尔罗斯（Vierlrose）的人口是 1 240 000 人。然而，15 世纪和 16 世纪显著的长期增长几乎是不能怀疑的，尽管其实际增长率也许会比这些数据所显示的要略低一些。

16 世纪巴尔干半岛（the Balkan Peninsula）最大的一个地区一直被掌握在奥斯曼帝国（the Ottoman Power）手中，而且直到最近，这一地区人口资料所显示的前景对西方学者来说还是相当黯淡的。不过，土耳其人（Turks）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他们是很好的行政官员；在伟大的苏莱曼一世（Suleiman the Magnificent）统治早期进行了家庭普查，这次普查使伊斯坦布尔（Istanbul）大学的奥玛尔·卢特菲·巴肯教授（Ömer Lutfi Barkan）得以在 16 世纪 30 年代对巴尔干国家的人口进行统计。好像萨瓦河（Save）和多瑙河（Danube）以南地区（不包括君士坦丁堡）容纳了 100 多万个家庭，其中大约 80% 是基督徒，20% 是穆斯林，不到 1.5% 是犹太人。以 5 为系数，再加上君士坦丁堡的被统计人口 400 000 人，这样巴尔干教授所得到的

人口数目大约是 560 万。

不过，比推测的绝对人口数量概念更为重要的是 16 世纪土耳其欧洲省份的人口趋势。也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土耳其的资料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资料显示巴尔干的城市人口以相当快的速度增长。像索非亚（Sofia）和斯科普里（Skoplje）这样的城市在 16 世纪 30～80 年代之间家庭数目翻了两倍多。尼古波尔（Nikopol）、穆斯塔（Mostar）、阿德里亚诺普（Adrianople）和雅典（Athens）的增长都没有那么快，但同一时期萨拉热窝（Sarajevo）人口翻了 4 倍。1492 年犹太家庭被西班牙人驱逐之后萨洛尼卡（Salonica）接受了2 600 多家，到了 1529 年，据统计几乎有 5 000 多家，超过 1478 年所报告的数字 3 000家。从那以后，萨洛尼卡（Salonica）的人口似乎趋于稳定。

关于同一时期巴尔干的农村人口我们没有具体数字，但它也在增长着，这一点大概是没有问题的。土耳其当局急于在他们占领的省份加强他们的统治，长期以来一直鼓励移民，甚至不惜采取把安纳托利亚（Anatolia）的穆斯[39]林驱逐到巴尔干国家的手段；众所周知，那里也曾发生过一些强制驱逐基督徒的事件，这些移民对人口得失平衡的影响几乎毫无疑问是有利于西方的。

尽管 16 世纪初期巴尔干半岛最大的一个地区就落入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威尼斯人却设法在达尔马提亚（the Dalmatian）海岸、在爱奥尼亚群岛（the Ionian Islands）、在克里特岛（Crete），而且再直到 1540 年在摩里亚半岛（Morea）等地拥有了立足之地。共和国（the Republic）的档案馆为这些地区的人口史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总之，这些边远地区人们的命运是不幸的。威尼斯在 1537～1540 年间和 1570～1573 年间两次与土耳其（the Porte）发生战争，共和国的巴尔干属地的变迁也在它们的人口趋势中反映出来。首先举一个最为极端的例子：科孚岛（Corfu）的人口在 1499 年是 37 000 人，1537 年它目睹了有 15 000～18 000 名农村百姓在这里被土耳其人强迫做奴隶；到了 1576 年第二次土耳其战争之后，只有 17 500 人被留在了岛上；其中 7 500 人生活在首都。爱奥尼亚群岛中的两个，赛福罗尼亚岛（Cephalonia）和埃特卡岛（Ithaca）在 1569～1572 年之间损失了它们居民的 1/4。威尼斯人在达尔马提亚（Dalmatia）大陆和海上诸岛的领地也是损失惨重：它们的人口在 1559～1576 年之间减少了大约 1/3。当然从这些极易受袭击的边远地区（像巴尔干其他地区的状况）去得出结论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事实上，正如已经揭示的那样，东南欧洲的人口在 16 世纪是一直在增长着的。至于土耳其的统治，不管它的缺点是什么，至少必须承认它的一个成就：在相当长时期内，奥斯曼帝国在为它大多数的臣民消灭了战争的根源这一点上是成功的。

1.4　倒退的世纪

在1604年许多双焦虑的眼睛转向一个奇特的新星，它在不祥之光中闪耀着。它是个不祥之兆，预示着一个战争、饥荒和瘟疫时代的到来吗？在适当的时候人们会明白“恒星使者”（Sidereal Messenger）的警告这一次并不是在愚弄人：17世纪确实是一个暴力和动乱的时代。这种时代状况也反映在人口的记录之中。

为使人们对这一时代由欧洲公民与他们的统治者所带来的磨难有足够的认识，必须对它的混乱的政治和军事史作一番说明。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做【40】这项工作；只能涉及一些重大事件。除了不安定的波罗的海（Baltic）地区重新燃起战火外，俄罗斯在世纪之初没有什么凶兆。亨利四世（Henry IV）恢复了法国的宗教和平；在1604年英国与西班牙旷日持久的战争也宣告结束；神圣罗马帝国（the Empire）在1606年以后在与土耳其人的长期战争中享有一段喘息的机会，而它的两个主要的宗派集团，尽管犹豫不决，忧心忡忡，还是勉强参战；而且在1609年西班牙与联合行省（the United Provinces）签订了为期12年的停战协定。不过，如果战神（the God of War）在前20年迟迟不下手，那么它在17世纪余下的岁月里肯定会确立人类事务的方向，更具体说是在1620～1660年这一段时期内。

“三十年战争”（the Thirty War，1618～1648年），尽管事实上与当时欧洲的每一个重大冲突都联系在一起，首先是发生于神圣罗马帝国之内的自相残杀的战争。它对德国许多地区和波希米亚（Bohemia）中部地区的人口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从来都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只是在对京特·弗兰兹（Günther Franz）教授的无数地方性研究做出批评性提要的基础上，人们才开始得到灾难所造成全部后果的清晰图像。好像德国到战争结束时损失了的人口不到战前的40％。[①] 战争伤亡人数与野蛮的军队所残害的市民只占死亡人数的很小一部分。导致士兵和非战斗人员死亡的最强有力的杀手是饥饿与

---

① 公平地说，弗兰兹（Franz）教授的论文并不是没有引起争议。不过，德国的人口在“三十年战争”中损失惨重这一观点还不能轻易地放过。有新证据支持以下的说法：即17世纪中叶以后谷物价格趋于下降，还有，在德国中部、东部和南部发生了值得注意的谷物种植衰退、牧羊升温现象。参看弗里德里希·卡尔·里曼（Friedrich-Karl Riemann）：《工业化以前德国的农业和畜牧业》［*Ackerbau und Viehhaltung im vorindustriellen Deutschland*，柯尼斯堡市（Königsberg）阿尔伯图斯（Albertus）大学年鉴副刊，第3卷］，基青根和梅因（Kitzingen/Main），1953年。

疾病。在军事医院、营地、挤满逃离兵荒马乱的农村百姓的城镇等地方，由于人员过于密集、环境不洁、营养不良，从而滋生了流行病。传染病就从这些地方滋生，还有随着前进的部队而传播来的，这些传染病有痢疾、斑疹伤寒、瘟疫（主要发作于 1624～1630 年和 1634～1639 年），而且在战争要结束时，天花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另一个地方。随着主战场在帝国的广阔版图上来回地转移，疾病、劫掠和饥荒就会随之而来。

尽管中欧几乎没有一个地区遭受严重的人口损失（除了偶尔有些微损失外），但“三十年战争”结束时各地区之间人口状况却截然不同（参看图1），人口损失的程度主要视时间、期间、不同地区军队作战的范围而定。【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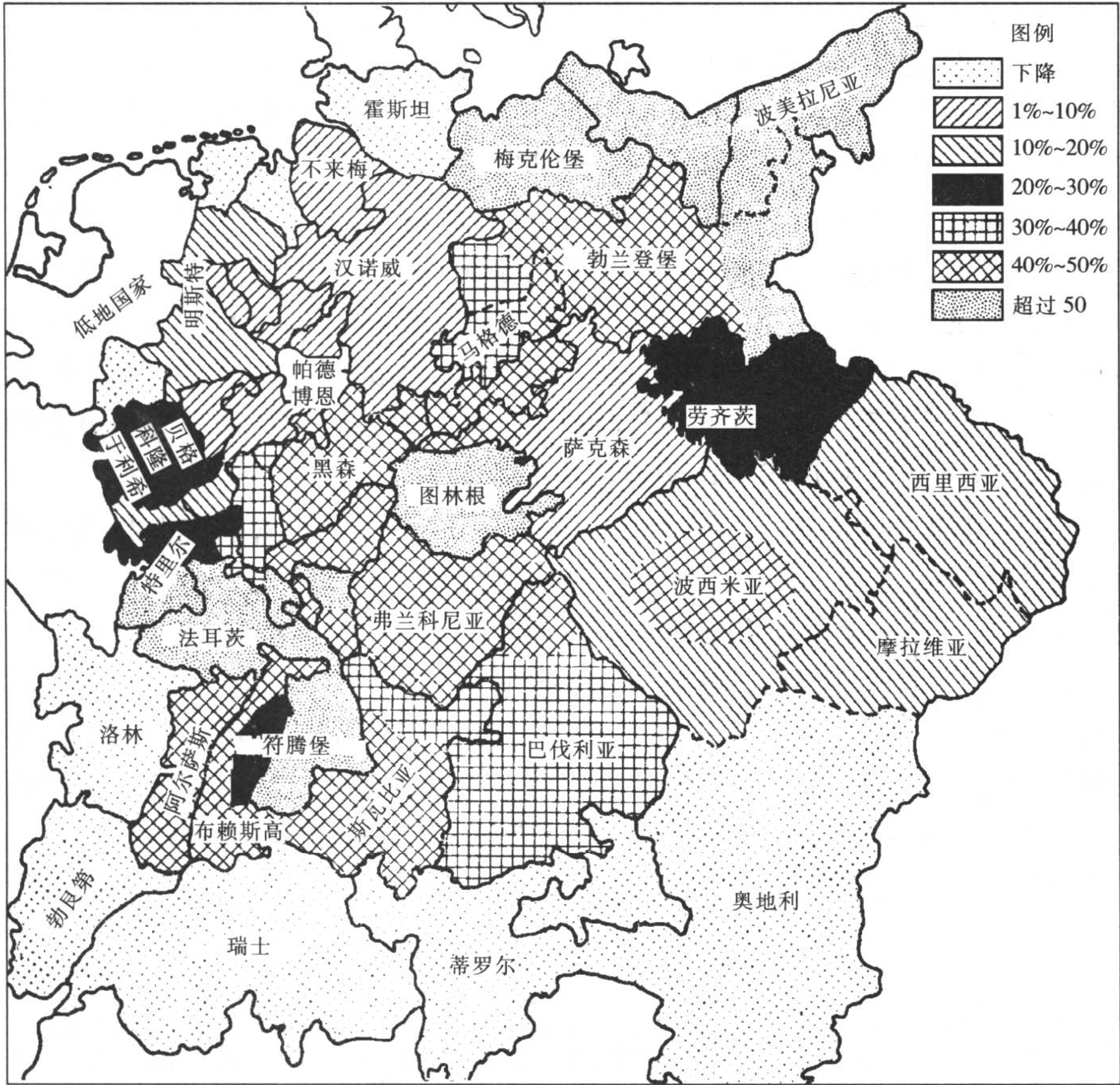


图 1　“三十年战争”期间神圣罗马帝国人口的下降（根据京特·弗兰兹）

因而，这里只举一些极端的例子，南部的法耳次（the Palatinate）和符腾堡地区（Württemberg）、德国中部的图林根州（Thuringia）、东北部的梅克伦堡（Mecklenburg）和波美拉尼亚地区（Pomerania），在1618～1648年之间损失的居民数目似乎都超过50%。而下萨克森州（Lower Saxony）到战争结束时则几乎完全从战争早期所遭受的毁坏中恢复过来。

【42】 地区的人口恢复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内移民的问题。即使在战争期间也有大量的人口移动：不仅是当时的背井离乡——农民逃进森林，或在邻近城市的城墙后面寻求一个安身之地——还有真正的移民，就像那些看着他们的家烧成灰烬，试图在战火波及不到的地区重建家园的逃亡者。其他的移民潮是由宗教迫害所造成的。因而，只举一个例子，在1625年以后的几十年中，无数个被奥地利驱逐的路德会教徒（Lutheran）都在法兰克（Franconia）和其他新教徒聚居区安置了新家。和平之后移民主要流向人口稀少地区。瑞士移民在诸如法耳次、阿尔萨斯（Alsace）和勃兰登堡（Brandenburg）地区的经济与人口恢复中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国内移民可以减轻由战争所造成的人口分布的地区差异，从而为自然增长创造有利的条件，自然增长毕竟是人口恢复的主要方式。有资料显示：战后人口出生率是比较高的。战争一结束就访问德国的一位意大利人观察到：许多能够携带武器的男子体质都很弱，但是那里到处都是孩子们。即使大约在1700年瘟疫已在中欧消失了，人口严重稀少的地区像符腾堡地区还是没有恢复到1730年以前的人口水平。在德国其他地区，尤其是东北部和西里西亚地区（Silesia），“三十年战争”所造成的严重的人口损失导致地主家族（*Gutsherrschaft*）的大量产生，贵族地主们乘机占有农民的大量空地，算作他们自己的地产，在那些半奴隶般小农的支持下他们就可以出租谋利。也许从社会观点来看是悲惨的，但这种发展并不一定影响人口的恢复。在普鲁士（Prussian）的一些省份像东普鲁士（East Prussia）、库玛（Kurmark）、诺伊玛（Neumark）或在波美拉尼亚地区（Pomerania）的农村中，大量无产阶级的存在并不影响它们的人口在下一个世纪翻两倍，甚至还要多。

在1618年以后几十年中，德国发生的人口灾难是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虽然说它们中的多数在17世纪前半叶也都经历了苦难时期。瑞士在1610～1611年之间遭受了恶性瘟疫的袭击。在拥有许多杰出的人士的巴塞尔市，它的12 000个居民有超过一半的人染上此疾，有将近1/3的人死于瘟疫，而温特图尔（Winterthur）小城几乎损失了一半人口。1615～1616年间，瘟

疫的发作，尽管相当轻微，众所周知，还是夺去了日内瓦大约 1/8 的人口：[43] 在 1629 ~ 1631 年间，这个国家再次遭受重大损失，一场可怕的瘟疫尾随曼图亚继位战争（the Mantuan War of Succession）而来，它蔓延到意大利以外的地区。在 16 世纪 40 年代后半期，当由战争带来的瘟疫从相邻的德国侵入瑞士时，它再次证明了疾病从来不受国界的限制。

在翻阅这个让人沮丧的流行病记录时，使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个国家在 17 世纪前半叶本应该能够保持它的人口数量规模的。而且事实确实如此，至少伯尔尼（Berne）和苏黎世的一些州（the Cantons）应该如此。前者，1653 年统计的家庭数目高于 1558 ~ 1559 年间的 60%。苏黎世地区（Zürich Landschaft）的人口据 1585 年统计是 70 000 ~ 85 000 人，到 1650 年好像增长到大约 90 000 人。尽管在这两种情况下的增长可能是在 1610 年以前的几十年中发生的，但以后流行病对农村人口的冲击不可能像城市统计数据让人们想像的那么严重。无论如何这个国家免遭战争的野蛮蹂躏。只有格劳宾登州（Graubünden）和相邻的瓦尔泰林州（Valtelline，17 世纪欧洲的战略区域之一）发生了大量的战斗和军队的移动，而且损失惨重。但瑞士联邦（the Swiss Confederacy）其余地区（一些边境地区除外）都没有受到多大的损害。

饱受战争蹂躏的德国与安宁的瑞士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个国家”，当时的一个德国人写道，“与德国其他地方相比较，对我来说是如此的陌生，好像我到了巴西和中国一样。在那里我看到平静地从事自己事业的人们；圈里关满了牲畜，场院里到处是鸡、鹅和鸭。谁也不用害怕敌人，谁也不用害怕抢劫，没人担心丢了财物、肢体或生命。”①

在瑞士人民的历史上，17 世纪后半叶是一段平静的岁月。大批的儿女们还是到国外去为外国的君主们打仗，国家成功地避免了卷入国际纠纷之中。至于流行病，在 1667 ~ 1668 年间不时有瘟疫发作；但都是地方性的，而且还是一系列可怕侵袭的最后一次。

在这些情况下，人口的增长除在 16 世纪前半叶曾一度被打断外又得以恢复。据统计到 1700 年这个国家的居民有 120 万，比 1600 年多出大约 [44] 200 000 人——尽管在 17 世纪瑞士大约有 300 000 人离开了他们的家园，他们中大多数是雇佣兵和殖民者，他们重新定居在德国人口稀少的地区。

---

① 汉斯·雅可布·克里斯托夫·冯·格里默斯豪森（Hans Jacob Christoph von Grimmelshausen）：《冒险单纯人》（*Der abenteuerliche Simplicissimus*）（1669 年），第 5 卷第 1 章。

在16世纪最后几十年开始形成低地国家人口模式的政治和军事因素在1600年以后还在发挥作用。《十二年的停战协定》（the Twelve Years Truce，参见前面第41页）对于人口恢复来讲是太短暂的喘息机会，以至于不可能有多大进展；而且在1621年，当停战结束时，西属尼德兰（the Spanish Netherlands）再次成为战场，而联合省（the United Provinces）像以前一样，坚决抵抗不让敌人进入。在这种情况下南部与北部的人口发展依然迥异。其不同可以用一位西班牙公使的话概括，"当我接近我现在生活的阿姆斯特丹时，"阿贝·斯卡格里亚（Abbé Scaglia）在1627年报道，"发现所有的城镇都是摩肩接踵，与西班牙占领城市的空空荡荡恰成对比。"

当写下这些句子时，战争何时结束还不得而知：要等到20多年以后尼德兰南部才能从事和平时期的事业。这时这个国家国势虚弱，而且甚至停战15年以后才开始重建。以下就是布拉班特的政治集团（the Estates of Brabant）所描绘的他们省在1663年的状态。

> 经历了长期的纷乱和战争，布拉班特公国——无论是有城墙的大小城镇、农村的特别行政区和村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们人口稀少，毁坏严重。许多地方的房屋都被烧毁、推倒和放弃；土地无人照管，在许多地方已经彻底荒芜——成了飞鸟的栖息地。

我们手头的数据与这些描述并不矛盾。1693年和1709年在布拉班特所做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这一公国（以当时它的边界为限）17世纪初的居民数目（373 000人）比1526年所推断的同一地区生活的居民数目（363 000人）并没有多出许多。如果我们没有忘记，在17世纪后半叶环境极其有利的条件下，人口的恢复肯定会有一些飞跃，那么由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八十年战争"期间（the Eighty War，1568～1648年）所遭受的人口损失完全抵消了1526～1568年间相对和平、繁荣时期的人口增长。

尽管我们没有关于佛兰德的全面资料，但关于奥登纳德（Audenarde）的夏特莱尼（*châtellenie*）的数据有力地证明了西属尼德兰这一地区的人口【45】发展与布拉班特的相当类似。在27个教区中，战前的家庭数目从1557年的4 372户减少到1600年的2 520户，到了1698年才又一次达到这个水平，据统计是4 385户。另一组用于说明沃尔内—安巴奇特（Veurne-Ambacht，西佛兰德）人口趋势的数据也显示出：在17世纪有强大的抑制力量在起作用。在公国君主兼任主教时期的列日（the Prince-Bishopric of Liège）的人口状况比邻近地区要好得多（这里的工业化在17世纪中叶以后飞速地进行）；

只是我们没有数据来证明这一点。[1]

通常，在战争期间，农村和小城镇而不是城市会遭受重大的人口损失。后者通常会得到很好的防御和供应，正因如此，对于农村公民来讲，在危难时期城市会成为他们很好的避难所。这种人口流动也许说明了这样的事实：根特（Ghent）的人口数量在 17 世纪纷乱的前半叶不但远远没有下降，反倒取得了相当大的增长。梅希林（Malines）和列日（Liège）的情况也是如此。安特卫普的人口在 15 世纪 70～80 年代陡降之后也重新开始稳定，如果不是贯穿整个 17 世纪大幅度地增长的话。

当时人对荷兰共和国（the Dutch Republic）人口稠密的热烈而常常带有妒忌的证实无疑说明了这一时期联合省（the United Provinces）人口的顺利发展，尽管遗憾的是没有任何综合的数据来说明这一点。在一个政治家和学者都极力鼓励人口增长的世纪里，荷兰被视为一个楷模，“勇敢的人民，富足，而且众多……；城市里挤满了人群就像蜂箱里充满了蜜蜂一样。”[2]

在荷兰最发达的 7 省（the Seven Provinces）中，早在 17 世纪初其城市化已经有很大的发展。到 1622 年至少 60% 的人口都是市民；而且其中绝大部分——准确地说是 3/4 生活在拥有超过 10 000 居民的 10 个城市中。其中至少有两个——莱顿（Leiden）和哈勒姆（Haarlem）分别拥有 45 000 个居民和 40 000 个居民——根据当时的标准应该被归入非常大的城市之列，而名副其实的大都市是阿姆斯特丹，它拥有 105 000 个居民。即使作为现代早期欧洲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意大利人也被荷兰的超前发展惊呆了。威尼[46]斯大使特里萨诺（Trevisano）在 1619 年写道，其他任何地方都没发现在如此狭窄的范围内会有如此众多发达的城市。他要是知道百年后所有这些荷兰的城市的人口将会更加稠密就好了！例如，哈勒姆和阿姆斯特丹的人口规模在 1610～1611 年间都有所扩大，在 1671～1672 年间和 1658 年它们又不得不扩大它们的城区。1700 年阿姆斯特丹的人口可能接近 200 000 人。鹿特丹的居民据 1662 年统计大约有 20 000 人，到下一个世纪中叶据估算是 56 000 人。[3] 莱顿的人口尽管由于恶性的流行病遭受 3 次大规模的死亡，在 1622～1685 年之间从45 000 人增加到大约 70 000 人，但在以后的几十年中由于城内本来兴旺的纺织业的衰退而急剧下降。

---

① 我们知道 1790 年列日（城区与郊区）被统计的居民有 83 224 人之多。
② 《英国的最大福祉》，作者不明（伦敦，1677 年）。
③ 当时的这个估算，尽管可能偏高，还是值得引用：它不可能太离谱。

尽管荷兰在17世纪的长期发展比其他邻国更为顺利，它的人口发展却不能幸免于暂时的倒退。荷兰人，尽管以他们的干净而闻名，对于瘟疫并不比其他地方的人们更有免疫力，据报告其发作时间集中于1623~1625年、1635~1637年、1654~1655年、1663~1664年。[1] 尤其是在1672年反对法国人的艰苦斗争中，当共和国的大部分土地都被敌人践踏时，防御者不得不采取炸开大坝这种孤注一掷的措施，这种斗争也带来了相当严重的后果。不过，从各方面的材料来看，恢复还是迅速的。“如果瘟疫发作的话，它们（即荷兰的城市）会马上得到补充……；它们通过邀请全世界的人到这里来，生活在他们中间来完成这一切。”[2] 的确，荷兰的城市在17世纪前半叶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难得的自由移民政策。如果说，大多数荷兰的城市都准备向荷兰同胞和国外的共同信仰者大开大门的话，那么其他的城市像阿姆斯特丹甚至会欢迎葡裔犹太人（Portuguese Jews）和马拉诺人（*Marranos*）。

当荷兰人因为他们不断增长的人口而成为欧洲羡慕的对象时，17世纪的西班牙则作为人口不断下降的国度而出名。它的敌人极其兴奋地注意到这一点，而它的国民却为国家的人口稀少而担心、抱怨。尽管早期的西班牙资料是可靠的，但还是难于确定下降有多严重，它具体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实上统计数据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它们也是如此的模棱两可，以至于一个头脑冷静的人口史学者像卡尔·尤利乌斯·贝洛赫（Karl Julius Beloch）就有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这一时期根本就没有下降。这种观点不会为很多历史学家赞同；众所周知，几乎所有卡斯蒂利亚（Castile）的工业城市在1594年与1694年两次人口普查期间都经历了灾难性的人口下降；例如，瓦拉多利德（Valladolid）、托莱多（Toledo）、塞戈维亚（Segovia）都损失了它们居民的一半多。不过应该承认，各省之间的人口趋势是各不相同的。如果要对列在表15~19中的数据进行解释的话，至少可以说，它们显示出17世纪前半叶卡斯蒂利亚（the kingdoms of Castile）、阿拉贡（Aragon）、巴伦西亚（Valencia）王国的人口急剧减少，而纳瓦拉王国（Navarre）的人口基本保持稳定，加泰罗尼亚（Catalonia，包括巴塞罗那市）的人口在整个17世纪明显增长。总而言之，西班牙在1600~1700年之间大约损失了1/4的居民。 [47]

---

① 据观察，这4次流行病中的3次都与伦敦的瘟疫大爆发同时或靠前一些时间发生。

② 《英国的最大福祉》，作者不明（伦敦，1677年）。

表 15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

年　份	家庭的人口数（*vecinos*）	与上一年相比百分比的变化	每一间隔期间年度百分比的变化
1591	1 340 320		
1646	807 903	-39.7	-0.72
1723	965 610	19.5	0.25

资料来源：阿尔伯特·吉拉德（Albert Girard）：《现代西班牙人口》，载《现代史杂志》，第 3 卷（1928 年），第 429 页。

表 16　　西班牙（阿拉贡［Aragon］）

年　份	家庭的人口数（*vecinos*）	与上一年相比百分比的变化	每一间隔期间年度百分比的变化
1603	70 984		
1650	22 688	-68.0	-1.4

[48] 资料来源：阿尔伯特·吉拉德上引书，第 432 页。

表 17　　西班牙（巴伦西亚）

年　份	房屋数	与上一年相比百分比的变化	每一间隔期间年度百分比的变化
1609	97 372		
1714	76 524	-21.4	-0.20

资料来源：阿尔伯特·吉拉德上引书，第 433 页。

表 18　　西班牙（纳瓦拉）

年　份	家庭的人口数（*vecinos*）	与上一年相比百分比的变化	每一间隔期间年度百分比的变化
1587	41 901		
1678	43 184	3.1	0.03

资料来源：阿尔伯特·吉拉德上引书，第 433 页以下。

表 19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年　份	家庭的人口数（*vecinos*）	与上一年相比百分比的变化	每一间隔期间年度百分比的变化
1553	65 394		
1717	124 032	89.7	0.55

资料来源：阿尔伯特·吉拉德上引书，第 433 页以下。

即使是对西班牙历史最粗略的研究也会揭示出这个国家难于维持（更不用说提高）这一时期人口水平的主要原因。众所周知，17 世纪是以一场流行病为开端的，它对人口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反映在以后 10 年货币工资和实际工资的大幅度上涨上。即使对夸大他们对**经济**影响的说法持怀疑态度，但还是可以说，1609 年被驱逐的 275 000 名摩里斯科人（*Moriscos*）进一步减少了这个国家的人口，而在整个 17 世纪到达西班牙的爱尔兰难民几乎足以弥补这些损失。向殖民地移民在数量上并没有多大意义，尽管当时人有时把它作为人口稀少的原因。无疑，更为严重的是由战争造成的劳动力的损失：与其说是由遥远地方发动的多次战斗（在西班牙国旗下所发动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外国雇佣军的帮助下进行的）所造成的，不如说是由【49】与葡萄牙所发生的长期流血冲突（1640 ~ 1668 年）所造成的。人们对通常被认为是西班牙人口稀少的主要原因的另一个因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没有同样把握。对人口下降经济状况的充分认识使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的疑问：17 世纪西班牙的经济衰退也许并不是它的人口下降的结果而是原因。当时的人们很明显也都这么认为。1624 年一位西班牙国会议员（the Spanish Council of State）认为，缺少资金和劳动力是这个国家经济波动的根源。

对葡萄牙人口变化的长期规律所知甚少，这显示出那里的人口发展与西班牙类似。早期的增长阶段（参看表 10）似乎在 16 世纪末以前就中断了。因为1578 ~ 1580年间残酷的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瘟疫和饥荒使其人口大减。以后几十年很显然也没有多大的恢复：1636 年上报的适合入伍年龄的人数只比 1580 年得到的同类数字稍微高一点儿。1640 年后为从西班牙统治下获得解放而进行的长期斗争进一步导致人口的损失。不过，在接近 17 世纪末长期的经济繁荣开始时，葡萄牙似乎进入了另一个人口持续增长的阶段，其强劲的势头使它的人口在 1732 年已接近 200 万人。

意大利 17 世纪人口的长期发展趋势深受这一国家历史上两次最严重瘟疫的影响：1630 ~ 1631 年和 1656 ~ 1657 年的瘟疫。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明以下的事实：1700 年大多数意大利的城市与地区都赶不上或远低于 100 年前的人口水平。这并不意味着要是没有这些灾难的话，意大利的人口会以大多数地区在上一世纪停滞时期所获得的速度不断地增长。意大利经济在这一时期的长期停滞无论如何会妨碍人口的增长。

事实上，有明显的迹象显示：早在 16 世纪最后 10 年和 17 世纪前几年就：各地的增长已经慢下来了，如西西里（参看表 5，第 21 页）、佛罗伦萨市和帕维亚市（Pavia），或者甚至出现负增长，像威尼斯（1586 年：

149 000个居民；1624 年：142 000 个居民），波伦亚（Bologna，包括城市与[50]主教管区）、费拉拉（Ferrara）和锡耶纳（Siena）。人们会注意到，我们关于早期人口停滞的证据并不只是来自城市（它也许可以用对农村的移民流向形成不利影响的当地经济贫困来解释），也是建立在地区数据的基础上的。

意大利的人口——无论怎样，可以说在一些地区——开始对其土地资源形成压力，这作为一种推测并不牵强。它为 1590～1591 年和1607～1608 年西西里的饥荒以及上面所提到波伦亚的城市与主教管区的人口下降所支持。免受 16 世纪 70 年代恶性瘟疫侵袭的后一地区却遭到 1590～1591 年波及意大利全境饥荒的沉重打击，这也许不是偶然的。人们也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有所发现：正是在那些遍地饥荒的年代里一位意大利学者乔瓦尼·博泰罗（Giovanni Botero）提出了一个理论来解释人口增长的自然限制：他的《国家的理性》（*Della ragione di Stato*）在 1589 年首次出版。不过，如果不是 1630 年和 1656 年的瘟疫导致了意大利大部分地区的人口死亡的话，就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能够告诉我们马尔萨斯式（Malthusian）的抑制何时和以何种形式才开始完全奏效。

可以有把握地说，第一次瘟疫夺去了超过 1/3 的城市人口，[①] 而皮埃蒙特（Piedmont）、伦巴第（Lombardy）、威尼西亚（Venetia）、艾米利亚（Emilia）农村和小城镇的居民[②]的死亡人数可能不少于 1/3。托斯卡纳（Tuscany）也受到影响，但似乎损失人数要少一些。26 年以后主要是那些以前避免了瘟疫光顾地区的情况在发生变化：意大利中部和南部、利古里亚区（Liguria）和撒丁岛（Sardinia）。城市人口的死亡再次使人震惊。那不勒斯、贝奈本托（Benevento）、萨勒诺（Salerno）、热那亚各自损失了他们人口的大约一半。罗马，也许得益于教皇特派健康专员（the Papal Commissioner of Health）所实施的严格的检疫，得以幸免，只损失其人口的 10%。瘟疫对那不勒斯王国各省份的影响有极大的不同。平均损失（包括那不勒斯市）可能大约是其居民的 1/8。意大利中部的教会辖地死亡总人数可能低于瘟疫前人口的 10%。西西里，如果它完全受到这次瘟疫影响的话，不可能损失太大。撒丁岛也免受它的侵袭，只有轻微的损失，只是它在 1680 年受到可怕饥荒的打击，岛上人口从 300 000 人（1678 年普查）降到 230 000

---

① 死亡人口波伦亚（Bologna）是 22%，而克雷莫纳（Cremona）和维罗纳（Verona）则高达 60%。曼图亚（Mantua）城区经过围攻和劫掠损失了大约 70% 的人口。

② 在维罗纳省死亡人口达到一半，埃斯特（Este）王朝诸国［摩德纳（Modena）和勒佐（Reggio）］死亡人数是瘟疫发生前人口的 20%～30%。

人（1688 年普查）。 [51]

如果一步一步再去追溯意大利各地区人口恢复的过程是令人乏味的。只要说这个国家的人口恢复足以抵消本世纪末以前两次恶性瘟疫所造成的恶果就够了。大多数大城市［那不勒斯、威尼斯、米兰、热那亚、帕勒默（Palaermo）和墨西拿（Messina）］和一些较小的城市（尤其是帕维亚［Pavia］）在 1700 年时的居民比 100 年前还少。17 世纪末这个国家的总人口似乎与 1600 年的人口差不多。即使像西西里这样的地方，尽管这个岛除了 1624 年有轻度的瘟疫发作外，几次主要的瘟疫都没有波及到这里，但在这一时期里它的人口只有很小的增长（1607 年：1 100 000 个居民；1713 年：1 121 000 个居民）。

瘟疫的幽灵频繁地出现在 17 世纪英国，与当时的意大利一样。不过即使是这一时期在英国发作的最严重的瘟疫也没有意大利的那两次厉害，但是它们发作的频率更高一些。伦敦在 1603 年、1625 年、1636～1637 年和 1665 年多次受到侵袭，更不用提 17 世纪 40 年代那个疾病流行的漫长季节了，由这次瘟疫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比此前 1636～1637 年的瘟疫要高得多。由于伦敦这些年的人口只能粗略地估算，因而不可能有把握地说有几成的居民死于这些瘟疫。不过似乎瘟疫和其他原因所造成的死亡人数不超过 1603 年和 1625 年的 25%、1665 年的 30%（1636～1637 年的发作比较轻微）。然而，1600～1665 年之间由瘟疫所造成的死亡总人数——多于 170 000 人——并不太低，与伊丽莎白女王末年的“死亡证书”上伦敦的总人口相比，可能还有点儿高呢。

表 20　　英国和威尔士

年　份	估算居民数	与上一年相比百分比的变化	每个间隔期间年度百分比的变化
1600	4 811 718		
1630	5 600 517	16.4	0.55
1670	5 773 646	3.1	0.08
1700	6 045 008	4.7	0.55

资料来源：里克曼（J. Rickman）：《1570～1750 年英国和威尔士的统计人口》，载《大不列颠：人口统计摘要》（1843 年），第 22 卷，第 36 页。 [52]

如果里克曼的数据被认为是准确地反映了趋势的话，但它们并不是 17

世纪英国和威尔士人口的实际数据，[1] 人们只能得出结论：从总体上讲，瘟疫对这个国家的影响比同一时期流行病对意大利的影响要微弱得多。从表面上讲，如此大的差异似乎是不可能的。毕竟英国的城市化水平比意大利低得多：除了“臃肿的大都市”（Great Wen）外，英国只有 4 个人口超过 10 000 的城市，即诺丁奇（Norwich）、布里斯托尔（Bristol）、约克（York）和埃克塞特（Exeter）。难道不可以设想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各种疾病不会太严重吧？不过，我们手边的资料却并没有证实这种乐观的设想。人们知道即使像较小的省城诸如切斯特（Chester）、什鲁斯伯里（Shrewsbury）、考切斯特（Colchester）、赫尔（Hull）、（泰恩河畔）纽卡斯尔（Newcastle upon Tyne），还有其他地方，都常常遭受与首都一样甚至更沉重的打击：例如在纽卡斯尔，从 1636 年 5 月 7 日到 12 月 31 日就有5 000 多人死于瘟疫，而考切斯特在 1665 ~ 1666 年间的一次流行病发作中几乎死去了同样多的居民。这些数据显示了相当高的死亡率。表 20 中还显示了人口有长期的适度增长，但是这些数据还需要做一些更正。英国和威尔士在 17 世纪末的人口要比这一世纪初增加了一些，这恐怕很少有人会否认。由里克曼的数据（25%）所显示的长期增长的幅度看起来还是很合理的。[2] 1630 ~ 1670 年间实际的停滞也与人们的预期一致；因为除了 50 年代中期和 70 年代后半期有较好的收成外，这一时期一直是长期的饥馑。也许让人怀疑的是：长期的增长主要（如果不是全部）是在 17 世纪前 30 年内取得的（正像里克曼的数据所显示的），或者主要是在这一世纪后 30 年，发生了人口的增长；[3] 1603 年和 1625 年的瘟疫和 17 世纪 20 年代的严重的经济衰退几乎不可能导致人口的增长。

[53] 事实上，1670 ~ 1740 年之间英国的生育率比 1560 ~ 1630 年这 70 年的生育率低一些。而且，这一世纪末“多灾多难的七年”（1692 ~ 1699 年）——

[1] 里克曼的数据无疑太高了。即使格列高利·金（Gregory King）在 1688 年估算英国和威尔士的人口（5 500 000）时还稍稍向下调整了一些。参看格拉斯（D. V. Glass）：《格列高利·金在 1695 年对英国和威尔士的人口估算》，载《人口研究》，第 3 卷（1949 ~ 1950 年），第 338 页以下，尤其是第 358 页。

[2] 由于里克曼的数据显示在 1570 ~ 1670 年间 4/10 的地区每年人口平均增长是 1%。这似乎正好是 1563 ~ 1665 年间伍斯特郡（Worcestershire）12 个教区所获得的增长率。参见埃弗斯利（D. E. C. Eversley）：《在教区记录基础上对 1660 ~ 1850 年伍斯特郡人口的调查》，载《人口研究》，第 10 卷（1956 ~ 1957 年），第 253 ~ 279 页。

[3] 尽管仅仅从莫尔登［R. Morden，《英国掠影》，1704 年，第 33 页，由钱伯斯（J. D. Chambers）在《1670 ~ 1800 年的特伦特（Trent）河谷》中引用，第 39 页］所提供的德比郡（Derbyshire）一个县的人口数据就得出结论是危险的，不过还是值得在此引用以支持我们的观点：“1676 年……68 000人，1704 年……127 000 人。”

个粮食价格奇高和地方性流行病“高发”的年代——好像至少在一些省城和农村教区造成了死亡率的明显（但愿是暂时的）上升。不过，从1670～1700年瘟疫从英国真正消失——1665～1666年的恶性流行病［紧接着于1667年在彼得博罗（Peterborough）延迟发作］是最后一次发作——应该带来死亡人数的大幅度减少。

人们并没有忽视这样的事实：即天花，这一在17世纪后半叶已经成为让人惊恐的疾病，正在成为王政复辟（Restoration）之后强有力的杀手，在1670～1689年之间的20年中伦敦的死亡证明（Bills of Mortality）上记录死于天花的人数为30 000个，占由各种原因致死总人数的7%。我们也没有忘记这一时期“恶性热病”（大多数情况下是斑疹伤寒）的流行、“肺痨和肺结核（tissick）”、“腹绞痛”（大多数情况下是腹泻的前兆）和其他种疾病使人们的生活费更加高昂，不堪重负，尤其是对于大都市的贫困阶层而言。但毕竟1666年之后瘟疫的彻底消失和英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带来一定程度的恢复。在17世纪最后1/3时期中，大约0.5%的年平均人口增长率——人们将会看到，这个增长率与1700～1750年间英国所获得的人口增长率相当一致——在可能的范围内已经很不错了。

从苏格兰流行病学的记录来判断，17世纪它的人口趋势与同时期英格兰的不可能有太大的差别。不过，苏格兰瘟疫发作期的高峰——1606年和1647～1648年——似乎与边界以南主要瘟疫的发作（时间）并不一致，而且苏格兰人比他们的英国邻居提早20年从这场古老的灾祸中解脱出来。而其余几次，苏格兰人民与英国人一样甚至更艰难地忍受17世纪90年代这一饥荒年代的各种“剧烈的泻肚和奇特的热病”，这一时期正是欧洲许多国家异常艰难和死亡率奇高的年代。

爱尔兰在经历了17世纪初激荡的年代之后，在1641年的起义之前那相对和平和繁荣的30年里，获得了一个恢复人口的机会。不过接下来是动荡的10年，在40年代末达到顶点，饥荒、时疫和天花祸不单行，使其国家人口损失惨重。威廉·佩第（William Petty）在1672年和1687年分别估算爱尔兰的人口有1 100 000人和1 300 000人，他的估算实在太低了。但是它们却显示出：一位当时内行的观察者在灾祸过后的30年依然还认为这个国家的人口十分稀少。事实上对威廉·佩第来说，国家处境如此艰难以至于很难保证有任何人口恢复的措施出台。他为提高爱尔兰的生育力而提出的方案中，甚至已经提倡一种激进的同时又但愿是暂时的性关系自由化，这可以从 【54】

他的备忘录《论婚姻》[1] 中略见一斑。此后 100 多年的和平和马铃薯丰收为解除人口的缺乏带来不大但有效的帮助。

如果完成了旨在对许多法国教区记事本进行系统分析的巨大研究项目的话，现代早期法国人口史的主线会比现在更清晰地显现出来。遗憾的是，这些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因而眼下任何关于 17 世纪法国的人口趋势的论述或多或少都被认为是一种推测。

如果，像已故的费尔南德·洛（Ferdinand Lot）所认为的，法国的宗教战争在其惨烈程度上不亚于或超过百年战争，在 16 世纪末年由亨利四世（Henry IV）所带来的移民定居是这个国家人口史的一个转折点。事实上还有一些零星的证据可以证明，17 世纪前 30 年尽管并不平静，却有一个长期的增长。既没有毁灭性的瘟疫，也没有出现较大的生存危机，法国的人口似乎在快速的增长。不过，在 1628 ~ 1638 年间许多地区饥荒和恶性瘟疫的多次发作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虽然并不是处处都这样，无论如何，这种瘟疫在米迪（Midi）、普瓦图（Poitou）和卢瓦尔（Loire）河谷比较严重。洛林（Lorraine）、阿尔萨斯（Alsace）和勃艮第（Burgundy）都被卷入 30 年战争的旋涡，因此在 1636 ~ 1637 年间就比其他地区遭受了更为惨重的损失，其时先是敌人军队的劫掠，接踵而至的是饥荒和瘟疫。

在 17 世纪中叶的投石党运动（the troubles of the Fronde）期间出现了另一次严重的人口危机。通常伴随人类动乱而出现的饥饿和疾病在这一次又由于遇到灾难的季节而加剧：我们知道 1646 ~ 1652 年间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欧洲的其他许多地区庄稼都歉收。查阅教区记录远远不能清晰地显示这次危机的严重程度：博韦西斯（Beauvaisis）有一个村庄超过 1/3 的人口损失了。

[55]

10 年之后，在 1660 ~ 1662 年间发生了另一次饥荒；法国的饥荒与匮乏还是遵从当时的一般模式，尽管可能比别的地方更突出一些，而英国、低地国家和德国谷物的销售达到或接近荒年间的价格。度过 1674 ~ 1675 年和 1679 年两次较小的生存危机，我们见到的也许是 17 世纪法国人口史上最为惨重的一幕：1693 ~ 1694 年间的大饥荒。这次灾荒，尤其是在农村贫苦人中间所产生的艰难和恐慌，常常被人描述，当时也留下了人口损失的记录。因而据报告早在 1694 年 1 月，兰斯（Rheims）市 25 000 个或 26 000 个居民

---

① 《配第文集》，兰斯唐侯爵（the Marquis of Lansdowne）编辑，第 2 卷（伦敦，1927 年），第 50 页。

中有 4 000 个在过去 6 个月中死亡——距下一次收获还有半年时间！在南方尤其是在阿马尼亚克（Armagnac），如果稍有区别的话，其情景就更加触目惊心。根据奥什（Auch）大主教的陈述，1694 年他的管区的人口只有 3 年前的 1/4；人口损失主要来自于疾病死亡和移民。蒙托邦（Montauban）的**省长**所提供的报告证实了这种荒凉的景象。"前些年的贫瘠"，他在 1695 年写道，"使（这些）教区损失了 1/2 或 2/3 的人口，以至于许多地方都没有足够的人手去开垦土地……阿马尼亚克尤为严重，也许有必要从邻省殖民来充实这个地区。"即使，正像后面几句话所清楚地表明的，共和国所有地区的状况并不都是这样糟糕，从以下几个地区收集的人口损失数目来看，这些地区包括诺曼底（Normandy）、博韦西斯（Beauvaisis）、布卢瓦斯（Blois）地区和莱昂内斯（Lonnais），毫无疑问，人口危机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鉴于最后这次灾难，再加上在 17 世纪最后几十年由于移民迁出导致这个国家损失了大约 175 000 个新教居民，人们几乎不敢肯定 1700 年法国的人口密度会比 50 或 70 年前更稠密。超过 19 000 000 个居民——17 世纪末由**省长们**上报的人口数目汇总——王国大概会比路易十三（Louis XIII）统治时人口要稠密一些，但它既不是由于自然增长，也不是由移民带来的净增长，只是由于威斯特伐利亚协约（Westphalia，1648 年）、比利牛斯协约（Pyrenees，1659 年）、亚琛协约（Aix-la-Chapelle，1668 年）和内伊梅根协约（Nijmegen，1678 年）所占领土地造成的。从人口学的观点来看，17 世纪不能被描述为法国历史上的**伟大时代**。

在 1560 ~ 1630 年间瑞典的人口增长很小，似乎在以后的 60 年内加快了增长，据估算增加了大约 25%。不过，人口数量适度的增长会导致生活水平一定程度的下降。[①] 1695 年之后增长完全停止而且到 1720 年之前再也没有恢复。芬兰人口从 17 世纪中叶到 90 年代早期曾有一次大幅度的增长，以后由于 1696 ~ 1697 年这个国家严重的灾荒其人口经历了一次急剧的下降。丹麦在 17 世纪 50 年代经受了类似的人口灾难。 【56】

17 世纪波兰的人口史，与它的西部邻国一样，经历了严重的衰退。其发展受到战争和 1648 年以后席卷整个国家的哥萨克起义的严重影响，它们对生命与财产造成灾难性后果。埃贡·维尔罗斯（Egon Vielrose）估算王国的人口在 1578 ~ 1662 年间从 3 200 000 人减少到 2 250 000 人。其他波兰学

① 参看伊莱·黑克舍（Eli F. Heckscher）：《瑞典经济史》（"哈佛经济研究"丛书，第 95），剑桥，马萨诸塞，1954 年。对瑞典食物预算最近的研究，尽管显示它们做了一些修改，但并没有对黑克舍的观点做出重大的修正。

者从各个地区所收集的样本也显示了 1650 ~ 1660 年间、1670 ~ 1680 年间、1710 ~ 1720 年间受洗人数在急剧下降。从这些统计中人们可以得出结论：1648 年后波兰农村和小城镇的人口稀少程度与 17 世纪前半叶 30 年战争期间由德国所造成的情况几乎一样严重。

关于巴尔干半岛各国的人口发展的数据尽管很少，但也足以支持这种看法：紧接着 16 世纪人口的增长而来的是停滞或下降。“在 17 ~ 18 世纪之间，”一位研究巴尔干经济的新锐学者告诉大家，“君士坦丁堡（Constantipole）、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萨拉热窝（Sarejevo）、斯科普里（Skoplje）、诺维帕扎（Novi Pazar）、贝尔格莱德（Belgrad）、班扎鲁卡（Banja Luka）的人口都有所下降……；在 17 世纪巴尔干半岛各国中大片大片的肥沃田野没有开垦，有不少低地的村庄消失了。”[1] 即使在欧洲大陆的偏远角落里，那种导致人口长期减少的强大力量也在这一时期产生作用，但是我们没有掌握足够的信息来证实这一点。人们能够确定的惟一一点是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不是其中一个原因：荒芜的田地和村庄的出现排除了马尔萨斯式的解释。

匈牙利的情况也是如此。1541 年土耳其对中南部低地的统治确立之后 [57] 就开始出现人口减少的情况，其幅度并没有被过高地估计。当 1683 年后哈布斯堡（Habsburgs）重新统治这个国家时，他们重新利用了一片荒地，有可能是肥沃的一块。因而到 1700 年一个“新国家”在欧洲重新出现，召唤那些想在新奇的天空下开创新生活的移民。他们再次来到：来自德国西南部和洛林（Lorraine）人口稠密村庄的青年农民，当他们乘坐的驳船在多瑙河（Danube）上向东驶向遥远的国度［他们朦胧地知道是指“希腊土地（Griechen-land）”］，他们唱起了忧郁的离别曲；塞尔维亚（Serbian）的不少家庭来了，其中大约有 30 000 名是在他们族长的带领下，赶在土耳其人越过多瑙河下游之前逃到这里来的；勤劳的斯洛伐克（Slovak）殖民者从西北部高地来到这片肥沃的平原；瓦拉几人（Wallachs）越过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山脉而来；世界各地的希腊人和犹太人都来到后广为人知的“匈牙利的迦南（Hungarian Canaan）”。不过中欧向最后的边远地区大规模运动的历史会在本章以后的章节中给予十分详细的描述：它构成了 18 世纪人口增长的一个方面，也是它的直接表现和次要原因。

---

① 特雷安·斯托亚安诺维奇（Traian Stoianoich）：《1600 ~ 1800 年间的土地使用与巴尔干经济的相关部门》，载《经济史杂志》第 13 期（1953 年），第 339、402 页。

1.5　重大革命前夕[①]

历史学家对过去情况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不像当时的观察者，他十分了解其后的发展。只有在回顾时才能认识到，当时被忽视或低估的处于萌芽状态的力量的真正意义。不过，事后的认识也有它的危险。阅读其后的历史我们很容易被误导，即对于那些似乎需要长时间孕育的现象，假设存在**具体**的“先例”和“早期阶段”；而且我们常常不相信我们手边的记录，如果它们不能证明我们的预料的话。

当试图评价 17 世纪末年和 18 世纪早期的总体特点时，最好是有意识地抵制这种诱惑。而这一时期的人口状况对即将到来的变化几乎没有什么预示。人们还受到一些因素的严重影响。正像我们所看到的，到了 17 世纪 90 年代几乎欧洲的所有国家都由于一系列的歉收、荒年造成了严重的生存危机。当灾荒和饥饿从卡斯蒂利亚（Castile）蔓延到芬兰，从苏格兰蔓延到奥地利时，人【58】口不是在增长而是到处都在下降。在 1698 年农作物严重歉收之后，瑞典一些地区的死亡率分别上升到 9% 和 16%。在芬兰的一个省塔瓦斯特兰（Tavastland），在 1696 ~ 1697 年间的灾荒中有不少于 1/3 的居民死亡。[②] 正像上面已经显示的，法国一些地区在 1693 ~ 1694 年间也遭受相当大的损失。在 1709 年布拉班特公国所作的统计显示：与 1693 年相比其人口没有任何增长。库马克（Kurmark）在 1728 年所作的统计表明居民还比 30 年前有所减少。米兰的人口在 1688 ~ 1710 年间从 125 000 人减少到 110 000 人。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多灾多难的七年”即使没有导致人口的减少，它至少也影响或阻止了人口的增长。这也不是此类疾病最后一次蔓延。紧接着 1708 ~ 1709 年漫长的严冬而来的大面积庄稼没有收成，再次在穷困阶级中造成严重的灾难和高死亡率，尤其是在法国，这个季节一直作为“严冬（*le Grand Hiver*）”而被铭记在心。在英国，庄稼歉收还没有达到饥馑的程度，因而它对人口的影响也不是很大。不过，1709 ~ 1710 年谷物的价格还是上涨得很厉害，伦敦的死亡记录记载了致命“热病”当时有着罕见的发生率。

---

① 这一部分是以“对重大革命的再思考”为题发表于《加拿大经济学和政治学杂志》（第 23 卷，第 1 ~ 9 页）上论文的缩写本。

② 参见艾诺·朱蒂卡拉（Eino Jutikkala）：《1696 ~ 1697 年间芬兰的大灾荒》，载《斯堪的纳维亚经济史评论》第 3 卷（1955 年），第 48 ~ 63 页。

同时欧洲再次进入一个普遍交战阶段。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the 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1701～1714 年）在西部进行，东北部一些国家正忙于一场更加漫长和残酷的冲突——北部战争（the Great Northern War，1699～1721 年）。

历史学家们有意缩小战争对人口的**直接**影响；总的说来这种对事物的观察是正确的。不过，北部战争是一次异常血腥的事件。这可以从芬兰 18 世纪中叶的人口资料中推断出来，它显示出：老年群体的性别分布十分异常。也就是说，在 1676～1695 年间出生的人中间女性要多于男性，高出 21% 到 68% 不等。结论是相当一部分处于服役期的男性都在战争中牺牲了。这些损失对一个国家生育力的影响不必再强调了。

[59] 战争伤亡人数如果能确定的话，无疑会大大超过战争期间的流行病所造成的国内人口的严重损失。西部的战场［尤其是在 1703～1704 年的巴伐利亚（Bavaria）］经历了斑疹伤寒的惯常发作，东北欧再次受到瘟疫的侵袭。尽管瘟疫在西部已基本消灭了，但在欧洲大陆东部一些地区还在流行。早在 1708 年，瘟疫就经过波兰传播到西里西亚（Silesia）；而且在以后的岁月里它的传播无疑与军队转移有关，但也为 1709～1710 年的食品短缺所引发，它波及勃兰登堡—普鲁士（Brandenburg-Prussia）、波罗的海各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在但泽（Danzig）市及其郊区，32 600人——是其人口的 1/3 到一半之间——据报告死于 1709 年间的瘟疫；哥本哈根在 1710～1711 年间据说损失了 21 000 人，大约是其人口的 1/3。其他东北欧的城市像哥尼斯堡（Königsberg，死亡 8 500 人，大约是其人口的 1/5）、里加（Riga）、斯德哥尔摩（Stockholm）、卡尔斯克洛纳（Karlskrona）、乌普萨拉（Upsala）、赫尔辛基（Helsinki）均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不只那些大型中心城市遭到侵袭。正像苏斯米尔克（Süssmilch）为（东）普鲁士（Prussia）和立陶宛（Lithuania）上报的数据所显示的，在 1709 年和 1710 年波罗的海沿岸地区（the Baltic littoral）死亡惨重。据统计，东普鲁士在瘟疫之后将近有 11 000 家农场空无一人。

瘟疫无情地向西部蔓延，在 1712 年到了德国西北部，1713 年传播到了奥地利、波希米亚（Bohemia）和巴伐利亚。到这时，瘟疫尽管在一些地方还很猖獗——布拉格在 1713 年据统计死亡了 37 000 人，如果我们的数据可靠的话——似乎已丧失原先的威力。在它侵袭意大利和西欧之前，瘟疫却突然消失了。

对西欧的人们来说，似乎他们的国家获得了对瘟疫的某种免疫力；以后岁月发生的事情尽管起初让人十分沮丧，但实际上更加坚定了他们的乐观态

度。在 1720 年 5 月，来自一个感染瘟疫的叙利亚（Syria）港口的船只把这致死之疾带到了马赛（Marseilles）。紧接着，这里恶性发作的瘟疫吞噬了这个城市 90 000 居民中的大约 4 000 人。它第一次发作后，在几周之内就蔓延到普罗旺斯（Provence）；在有些地方损失相对轻一些，而另一些地方尤其是人口稠密的城镇，死亡率是惊人的。据报告普罗旺斯的埃克斯（Aix-en-Provence）、马蒂盖（Martigues）、圣雷米（Saint-Remy）都损失了大约 1/3 的人口，土伦（Toulon）、奥里奥尔（Auriol）、贝勒（Berre）损失了一半人口，阿莱（Arles）、拉瓦勒特（La vallette）大约损失了其居民的 3/4。

这种灾难的消息在欧洲引起不安。各地的政府马上实施隔离并采取一些 [60] 预防措施——教皇下令堵塞了罗马城 16 扇城门中的 6 扇，以加强检查来往的货物和旅行者。在英国——这里是历史因果关系的复杂纠结——当人们不再购买法国的产品，而转向对英国产品的需求时，这种恐慌导致纺织品贸易空前大发展。不过这种恐慌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显然，瘟疫并没有越过普罗旺斯的边界和朗格多克（Languedoc）的一些相邻的地区；而且到了 1721 年 8 月，瘟疫已不见踪影。

在 17 世纪 90 年代，一连串的危机（常常是互相加深）影响了欧洲的许多国家，18 世纪早期以后一段岁月相比较而言似乎是非常繁荣的时期。总的来说，在 18 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许多地区都是收获充足甚至说丰收的时期。流行病不再发作，不再造成生命的损失，不过，天花、斑疹伤寒、痢疾或恶性的流行性感冒偶尔也会使死亡率上升，例如，在 1727 ~ 1730 年间的英国各地，它们曾经超过了出生率。然而，不再有时疫出现，除了在普罗旺斯有程度有限的发作。战争逐渐停止：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在 1714 年达成和约，奥地利与土耳其的战争在 1718 年结束。北部战争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并于 1721 年结束。人口恢复和增长的阶段已经到来。

此时，在人口历史学家进行叙述的过程中，他们第一次发现自己可以用在时间序列中还算可靠的资料来支持他的结论；尽管开始还只是在有限的地域内——芬兰和瘟典的 10 个分区——得到此类信息。这两个国家死亡率一直保持不变，北部战争结束后的大约 15 年内死亡率不高，在 1721 ~ 1735 年间瑞典平均每平方公里 21.2%，[1] 芬兰平均每平方公里是 20.8%。

[1] 这个数字是建立在当时人根据教堂记事簿所作的粗略的编辑基础上的，因而如果把由一个地区的调查所作的更正运用于整个王国，那应该提高到每平方公里 23.9%。参见伯蒂尔·波伊提乌（Bertil Boëthius）：《关于 18 世纪瑞典的新见解》，载《斯堪的纳维亚经济史评论》，第 2 卷（1953 年），第 151 页，脚注 2。

在 18 世纪其余的时间内，再也没有这样一个时期死亡率保持在如此低的水平上，尽管在后来的年月里死亡率还有很大的波动，但死亡率降到 1721 ~ 1735 年间的低水平是很少的，它再也没有降到低于以前的水平。直到 19 世纪 30 年代的瑞典和 19 世纪 70 年代的芬兰其死亡率才降到相当低的水平［基勒（H. Gille）］。

[61]

我们不可能仅仅把这种异常低的死亡率看做是生育率的作用从而得到解释。因为在 18 世纪，婴儿死亡构成总死亡率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低生育率意味着降低了死亡率。事实上，上面已经提到了年龄和性别分布非常不均衡，其结果是这一时期瑞典和芬兰的生育率相对较低。不过，由于死亡率一直比较低——尽管 1725 ~ 1727 年地方庄稼歉收——这两个国家的人口急剧增长。在 1722 ~ 1728 年间芬兰平均年增长率为 14.3‰，在 1729 ~ 1736 年为 16.7‰。在得到有关数据的瑞典 10 个分区，其自然增长，虽然说有些低，但也是十分突出的：在 1722 ~ 1728 年间平均年增长率为 9.7‰，在 1729 ~ 1736 年为 7.8‰。

尽管如此，欧洲社会能足以力挽颓势、使其出生率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地高于死亡率的时期尚未到来。例如在瑞典，其自然增长迟至 1809 ~ 1810 年才暂时转变其消极的态势。确实，所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 1720 年后其人口长期趋势都是在增长的。而这一时期生存危机和瘟疫比前面几个世纪都要猛烈得多，最严重的几次——如 1737 ~ 1743 年的、1771 ~ 1773 年的和 1788 ~ 1790 年的——它们都足以减低人口的增长，甚至暂时由增长转为下降。不过无论如何，由饥荒和疾病所带来的损失都不会造成严重损害。1745 ~ 1746 年的芬兰已完全克服了 1736 年以后多难岁月对人口造成的消极影响。1772 ~ 1773年间瑞典和挪威所遭受的净损失（分别为 71 000 人和 17 000 人）都没有超过它们总人口的 2.3% 和 3.5%，而且在以后的 3 ~ 4 年内也得到恢复。

18 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的人口发展在许多方面都是有代表性的，在那个时代，欧洲其他地区的情况都与此相仿。尽管人口增长率随国家的不同而不同，但大约从 1740 年起各国的人口都在增长，而且在这一世纪中叶之后，在许多情况下人口都是以加速度在增长。这种总体趋势由表 21 ~ 35 中所提供的数据做出了最好的说明——无论人们在接受这些统计或估计数字时会持什么保留态度。

[62]

表 21　　瑞　典

年　份	居民数	与上一年相比百分比的变化	每一间隔期间年度百分比的变化
1721	(1 462 000)		
1735	(1 703 000)	16.5	1.2
1750	1 781 000	4.6	0.30
1775	2 021 000	13.5	0.54
1800	2 347 000	16.2	0.65

资料来源：吉勒（H. Gille）：《18 世纪北欧国家人口史》，载《人口研究》，第 3 卷（1949～1950 年），第 19 页。表格中的数字都是估计数。根据最近的研究（参看第 61 页脚注 1）它们可能有所下降。

表 22　　芬　兰

年　份	居民数	与上一年相比百分比的变化	每一间隔期间年度百分比的变化
1721	(289 000)		
1735	(360 000)	24.6	1.8
1750	422 000	17.2	1.1
1775	610 000	44.6	1.8
1800	833 000	34.1	1.4

资料来源：吉勒（H. Gille）前引书，第 19 页。表格中的数字都是估计数。

表 23　　挪　威

年　份	居民数	与上一年相比百分比的变化	每一间隔期间年度百分比的变化
1735	(569 000)		
1750	(591 000)	3.87	0.26
1775	(718 000)	21.5	0.86
1800	883 000	23.0	0.92

资料来源：吉勒（H. Gille）前引书，第 19 页。表格中的数字都是估计数。　【63】

表 24　　丹　麦

年　份	居民数	与上一年相比百分比的变化	每一间隔期间年度百分比的变化
1735	(777 000)		
1750	(806 000)	3.75	0.25
1775	(843 000)	4.95	0.18
1800	926 000	9.85	0.39

资料来源：吉勒（H. Gille）前引书，第 19 页。表格中的数字都是估计数。

表 25 **西西里（包括巴勒莫和墨西拿）**

年　份	居民数	与上一年相比百分比的变化	每一间隔期间年度百分比的变化
1713	(1 143 000)		
1747	(1 319 000)	15.4	0.46
1798	1 660 000	25.9	0.50

资料来源：卡尔·尤利乌斯·贝洛赫（Karl Julius Beloch）：《意大利人口史》第 1 卷，第 152 页。表格中的数字都是估计数。

表 26 **教皇国**

年　份	居民数	与上一年相比百分比的变化	每一间隔期间年度百分比的变化
1701	1 969 000		
1736	2 064 000	4.8	0.14
1769	2 204 000	6.8	0.21
1782	2 400 000	8.9	0.68

资料来源：卡尔·尤利乌斯·贝洛赫前引书，第 2 卷，第 122 页。数字是总数，它们部分建立【64】在统计基础上，部分是对地区人口的估计。

表 27 **托斯卡纳**

年　份	居民数	与上一年相比百分比的变化	每一间隔期间年度百分比的变化
约 1700	(950 000)		
约 1750	1 079 000	13.5	0.27
约 1800	1 188 000	10.0	0.20

资料来源：卡尔·尤利乌斯·贝洛赫前引书，第 2 卷，第 237 页。数字是总数，它们部分建立在统计基础上，部分是对地区人口的估计。

表 28 **西班牙**

年　份	居民数	与上一年相比百分比的变化	每一间隔期间年度百分比的变化
1723	(6 100 000)		
1747	7 380 000	20.0	0.87
1756	8 000 000	8.40	0.93
1768	9 310 000	16.4	1.36
1787	10 410 000	11.8	0.62

资料来源：阿尔伯特·吉拉德（Albert Girard）：《现代西班牙人口》，载《现代史杂志》第 4 卷（1929 年），第 6 页。其中第一个数据只是建立在对家庭人口统计基础上的一个粗略估算。这些数据可能夸大了增长率。

表 29　　葡萄牙

年　份	居民数	与上一年相比百分比的变化	每一间隔期间年度百分比的变化
1732	(1 743 000)		
1801	2 932 000	68.2	0.99

资料来源：蒙塔包·马加多（J. T. Montalvao Machado）前引书，第 475 页以下。表格中的数据是当时人的估算，可能有点儿低，因而表中百分比的增长率有些夸大。【65】

表 30　　布拉班特公国

年　份	居民数	与上一年相比百分比的变化	每一间隔期间年度百分比的变化
1709	373 000		
1755	445 000	19.3	0.42
1784	618 000	38.9	1.34

资料来源：科塞曼斯（A. Cosemans）：《17～18 世纪布拉班特的人口》（布鲁塞尔，1939 年），第 187 页以下和第 224 页。数据是在统计基础上估算的。

表 31　　瑞　士

年　份	居民数	与上一年相比百分比的变化	每一间隔期间年度百分比的变化
1700	1 200 000		
1789	1 700 000	41.7	0.43

资料来源：比克尔（W. Bickel）：《中世纪末瑞士人口史》（苏黎世，1947 年），第 49 页以下。这两个数字都是估计数，但第二个是建立在（不完全）统计基础上的。

表 32　　德国（包括普鲁士的一些省份）

年　份	居民数	与上一年相比百分比的变化	每一间隔期间年度百分比的变化
1740	2 257 000		
1748	2 314 000	2.53	0.32
1752	2 497 000	7.91	1.98
1778	3 487 000	39.6	1.52
1790	3 911 000	12.2	1.01

资料来源：伊纳玛·施特奈格和亨普克（V. Inama-Sternegg and Häpke）：《人口变化：中世纪和新时代的人口》，载《简明社会科学小辞典》，第 4 版，第 2 卷（耶拿，1924 年），第 672 页。【66】

表 33 **英格兰和威尔士***

年　份	估算的居民数	与上一年相比百分比的变化	每一间隔期间年度百分比的变化
1700	5 200 000		
1750	6 500 000	25	0.50
1800	9 600 000	47.7	0.95

* 这三个数据都是估计数；1700 年的数据是建立在格列高利·金（Gregory King）对 1688 年的估算基础之上，它已为格拉斯（D. V. Glass）尝试修改过（参看第 53 页脚注 1），1800 年的数据是建立在 1801 年统计的数据基础上，也已为克劳斯（J. T. Krause）尝试修改过（参看下面第 62 页脚注 1）。

表 34 **爱尔兰**

年　份	估算的居民数	与上一年相比百分比的变化	每一间隔期间年度百分比的变化
1712	2 791 000		
1718	2 894 000	3.69	0.62
1725	3 042 000	5.11	0.73
1732	3 018 000	-0.80	-0.01
1754	3 191 000	5.73	0.26
1767	3 480 000	9.06	0.70
1772	3 584 000	2.99	0.60
1777	3 740 000	4.35	0.87
1781	4 048 000	8.24	2.06
1785	4 019 000	-0.72	-0.02
1788	4 389 000	9.21	3.06
1791	4 753 000	8.29	2.76

资料来源：康奈尔（K. H. Connell）：《1750～1845 年爱尔兰的人口》（牛津，1950 年），第 25 页。这里的数据是估计数，它们是建立在对房屋估算数目修正的基础上的。

表 35 **法　国***

年　份	居民数	与上一年相比百分比的变化	每一间隔期间年度百分比的变化
约 1700	21 000 000		
约 1715	18 000 000	-14.3	-0.95
约 1770	24 000 000	33.3	0.61
约 1789	26 000 000	8.3	0.44

* 这些数据都是由勒瓦瑟（E. Levasseur）在其《法国人口》（第 1 卷，巴黎，1889 年，第【67】206、213、216 页以下）中提供的。它们所指的法国不包括阿尔萨斯—洛林地区（Alsace-Lorraine）。

另外还要指出的是，研究者对于这些表中所提供的数据（斯堪的纳维亚的一些数据除外）都不必过分较真。[①] 不过，即使它们仅仅是为了用来证明18世纪人口增长的普遍性的目的，它们事实上也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因为只有通过认识到这种现象的普遍意义我们才能有希望理解它的因果关系。

1.6　引起长期波动的一些因素

人们曾一度怀疑，那种大约在14世纪中叶遭受黑死病打击的社会是否已经从经济和人口的长期增长时代进入停滞阶段。随着小块土地数量增长和人们开始向土壤贫瘠和气候险恶的地区移居，以前几百年的人口增长好像产生一种危险的局面。而且林木的砍伐导致养育动物的地区不断缩小，这些动物对中世纪的畜牧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其结果或者是牲畜过多，这必定导致牧草很快衰败和为动物流行病的滋生创造有利的条件；或者是牲畜出产量的蓄意减少，这等于减少土地的肥料和人们蛋白质的摄取量。这个阶段显然为重提马尔萨斯（Malthus）“积极控制”论做好了准备。1315～1317年欧洲的大饥荒也许是灾难的第一个预兆。

当14世纪后半叶黑死病和其他恶性瘟疫使欧洲的人口急剧减少时，耕地面积减少了，它已经十分危险地接近甚或超过收益递减线。随着谷类生产集中在肥沃的土地上，产量增加了，到了1370年谷物价格开始了长期的下降。本来粗鲁的马尔萨斯式**做法**就允许人口恢复增长，在此时就更是如此，因为新的人口状况使下层阶级的年轻人比以前更容易建立家庭。大量的空地能使那些无地的农民以较为合理的租金得到土地；劳动力的普遍缺乏，再加上谷物价格的下跌造成城乡实际工资的上涨。正像上面已经证明的，长期以来人口都没能对这些有利的条件做出反应。

中世纪后期瘟疫发生的频率和严重程度、政治与社会领域的极度动荡，无疑都会使死亡率上升、出生率下降。除了这些不利因素，下层阶级经济状况的极大改善会妨碍人口的快速恢复。人们可以**演绎地**做出这样的假设，而 【68】

① 这些资料的一些严重错误已为克劳斯（J. T. Krause）所指出，见其《1781～1850年英国的出生率与死亡率的变化》，载《经济史评论》，第2卷，第11期（1958年8月），第52～70页。这些错误如果说不是全部，至少说也是极大地影响了对18世纪英国人口增长的估算。

且有一些证据也持这种观点,[①] 那些改善导致生活水平的提高，包括消费的标准部分地从谷类转向肉类。这种消费偏好的变化反映在肉类和谷物相对价格的波动中，这更加强了上面所提到早期的村庄**荒芜化**（*Wüstung*）的过程，它是有利于畜牧业发展的欧洲部分“非谷物化”（decerealization）的一个方面。[②] 不过，在一定的农业技术水平上，出产相当于一卡路里热量肉类所需的土地相当于能出产同等热量蔬菜所需土地的 5 ~ 6 倍。最初的人口减少减轻了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但它必定为消费和生产模式的改变所部分抵消。这个假设有助于解释另外一个使人相当困惑的事实，即中世纪后期所遭受的饥荒并不比以前的世纪少,[③] 虽然说肥沃的土地人均**亩产**在这一时期要高得多。[④] 这些生存危机总是引起瘟疫的发作，因而它们是中世纪后期高死亡率的主要原因。

由前面段落所提出尝试性的观点而引出的一个必然推论应引起注意。中世纪后期社会中的中下层阶级所享有的相对的富足还远远没有达到早婚和婚【69】内高出生率的程度，也许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因为通常男子尽力避免其社会经济地位的显著变化——无论是个人升迁的结果或者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那些由劳工转化成的租借人或经常性佃户的儿子们，是不大可能会被允许通过一次草率的婚姻来对他的家庭新近获得的初步安定状态造成危害；而已经习惯吃肉的农场雇农与雇工也不会平静地面对重新回到吃麦片粥与黑面包的状态，那是一个大家庭要承担的拖累。自然，有关中世纪的数据（无论它们是什么）并不能让我们提出任何这方面确定性的证据。但至少有一个资料显然证实，在中世纪后期的城市成人人口中，相当大一部分事实上是不愿

---

① 参见威廉·阿贝尔（Wilhelm Abel）：《中世纪后期欧洲的荒村与价格下跌》，载《政治经济学与统计学年鉴》，第 165 卷（1953 年），第 380 ~ 427 页，尤其是第 398 页以下；也参见德拉蒙德（J. C. Drummond）和安·威尔布拉海姆（Anne Wilbraham）：《英国人的食物》（伦敦，1940 年），第 52 页。

② 在 16 世纪英国那种特殊的环境中，把耕地改为牧场一直持续到人口恢复开始之后。不过人们普遍认识到种植业的衰退，首先是“由于衰退和缺少劳动力，以至于丰收的谷物和其他主要作物卖不上价，他们不得不让他们的犁生锈，耕地荒芜”。《都铎王朝经济文献》[托尼（R. H. Tawney）和艾琳·波厄（Eileen Power）编辑]，第 1 卷，第 74 页。

③ 中世纪后期长期的恶劣气候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参看里希特（G. Richter）：《中世纪气候变化与村庄荒芜化过程》，载《彼得曼地理报告》，第 116 卷（1952 年），第 249 页。

④ 当时的一位观察家，佛罗伦萨的年代史编者马提奥·维蓝尼（Matteo Villani）对这种矛盾现象进行了评论：“人们认为，由于人口的减少会使土地的出产显得很富足；然而，相反……什么东西都异常匮乏且一直如此；不仅如此，在一些国家，……还有严重和罕见的饥荒”。尽管是用道德化的语言表达，作者所提供的解释实质上与上面人们的见解相当一致，即消费水平的急剧上升。“（人们）无节制地暴饮暴食，流连于酒席宴前，享受美味佳肴。”由科尔顿（G. G. Coulton）在其《黑死病》（伦敦，1929 年，第 67 页）中引用。

或不能结婚的。对 1467 年苏黎世纳税记录的分析显示：只有稍多于 50% 的纳税人有配偶；大约 44% 的人都是单身，而其余都是失去配偶的人。至于这种状况是否有代表性就不得而知了；[①] 但是，中世纪后期城镇生活中众所周知的有组织的卖淫却是这种状况的有力证明。[②] 也许与妓女之外的女人的婚前性行为也起到很大的作用；这里有充分的证据——尽管它只是来自于 16 世纪中叶的——表明在这种关系中人们经常采用**中断性交**的方式。[③] 这种方式不仅可以使非法生育率保持在较低水平，而且如果它延续到婚姻生活中的话，也将对婚内生育造成消极的影响。不过，对于后者我们所拥有的资料并没有说明。直到 17 世纪后半叶我们才对婚内生育控制有了某些积极的表示。

但是即使不借助于避孕的方式（教会激烈反对一切避孕方式），一个家庭也可以保持在较小的规模：一个与中年女性结婚的年轻男子不必害怕会生很多孩子。我们不能提供任何数据来显示如此审慎地选择配偶（德国一个古老的故事和广为传唱的民歌曾诙谐地描写过[④]）在中世纪后期会比其他时代更为常见。但在一个专业行会不断发展壮大的时代，与一个工匠能手的遗【70】孀结婚通常是一个野心勃勃的雇工获得经济独立的惟一途径。

还有控制家庭人口的另一种形式——溺婴——它一直为教会和国家所禁止。尽管这种凶残的行为在基督教社会中大为减少，但并未完全绝迹。来自 14 和 15 世纪英国的数据表明：无论在富裕的拥有土地的群体中或在做佣人的家庭中女婴都很缺少。这种异常的性别比例使人们怀疑有人在损害人类的生命。不用说，相当数量的女婴一出生即被杀害。人在出生后第一周和几个月期间是极为脆弱的，母亲和护士职责的疏忽——并不一定是有意且总是无意的疏忽——与有意的杀害一样同样会导致其死亡。

15 世纪中叶以后，一些欧洲国家人口长期增长以及 16 世纪较长时期的突出增长都难以得到解释。当时对出现这一现象原因的认识归结为没有战争

---

① 克劳斯（J. Krause）的统计（《中世纪的家庭：变大了还是变小了?》，载《经济史评论》第 2 卷，第 9 期，1957 年，第 431 页）表明在 1377 年纳税人口中大约 66% 的英国男性（尽管成年男子的总数只占 59%）是已婚的。不过这些比例也许高于中世纪的平均水平。

② 根据马丁·路德的看法（《论婚姻生活》，1522 年，《马丁·路德博士全集·评论集》，全 10 卷的第 2 卷，第 302 页），许多男子都不愿过婚姻生活，因为他不明白怎样去供养一个家庭。"这是婚姻生活的主要障碍，而且也是所有卖淫的根源。"

③ 参见《室内编年史》[*Zimmerische Chronik*，卡尔·奥古斯特·巴拉克（Karl August Barack）编辑]，第 2 次修订（弗莱堡和图宾根 1881 ~ 1882 年），第 2 卷，第 425 页；第 4 卷，第 10 页。

④ "我正当年轻时，却娶一个年长的妻子。"

和恶性流行病；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判断适宜于地方的情况，尤其是人口增长的初期阶段，这种判断是非常正确的。在法国入侵前 40 年间（1454 ~ 1494 年），意大利基本上处于和平时期。对其他国家来说，在 15 世纪后半叶至少从战争的灾难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休养生息。对于法国来说，百年战争于 1453 年结束；而且在这一年同样残酷却更为短暂的德国西南部的冲突也有了结果。在东北部，托恩和约（the Peace of Thorn，1466 年）宣告了波兰与条顿骑士团（Teutonic Knights）的 13 年激烈战争的结束。30 年之前温和的胡斯信徒们（Hussites）战胜了极端主义者，而且，他们与天主教徒（the Catholics）的暂时和解导致这些团体之间停止猛烈攻击，长期以来这些攻击一直对波希米亚（Bohemia）和相邻地区造成难以忍受的灾难。

但是，如果说在中世纪最后几十年一些地区得到暂时的喘息，免受屠杀和劫掠，则其他一些地区像勃艮第（the Burgundian）郡和与它相邻的地区在那个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内也都还处于暴力肆虐之中。在欧洲东南部，许多地区还处于动荡之中，动荡以匈牙利的马提亚·科维奴斯国王（King Matthias Corvinus 1477 ~ 1485 年）完成对奥地利的征服达到顶峰。在 1485 年以[71]前，英国还没有从它的王位争夺中解脱出来。

至于 16 世纪，几乎没必要对它的好战和残忍多加论述。欧洲几大巨头如哈布斯堡王室（the houses of Habsburg）与瓦罗亚王室（Valois）之间长期的争战席卷了偏远的那不勒斯王国与尼德兰王国。德国流血的农民起义（the Peasants' Rebellion，1524 ~ 1526 年）据可靠统计造成 100 000 人死亡。还有发生于瑞士（1529 ~ 1531 年）和法国（1562 ~ 1595 年）的宗教战争以及发生于德国（1547 ~ 1555 年）的类似的武装冲突。在荷兰有反对西班牙统治者的起义（1567 年以后）和“七年北欧战争”（the Seven Years Nodic War，1563 ~ 1570 年）。在帝国的东南边境有坚决抵抗奥斯曼帝国（the Ottoman Power）入侵的防御战争。

欧洲的人口在所有这些艰苦与磨难中增长；虽说在一些主要地区一度不是没有下降，但长期来看所有国家的人口实际都增长到足以超过 1450 年的人口水平。有没有迹象表明在这一时代饥荒和瘟疫减轻了对人类的控制？当然由于缺少有关生存危机和流行病的全面而可靠的历史记录，几乎不可能把一个时期所遭受的全部磨难与另一个时期的相比较。这样的灾难对人口的影响是随它们的频率、持续时间、范围和严重程度等因素而变化的；而所有这些，我们都了解得不多。

总的来看，在面对所有这些不确定性时，如果一个人只是很匆忙地对上

面所说的这些灾难做出暂时性的评估，事实上至少会稍微减弱积极抑制因素的作用——不仅是关于1453～1494年间的相对和平时期，而且也包括此后一个时期。我们上面已经就16世纪战争的时间与空间范围讲了很多，而这种说法的出现一定颇令人诧异。战争、瘟疫和饥荒常常会同时发生，前者招致和延长后两种灾难。难道疾病和饥荒会在几乎无处不在和没完没了的战争时代有所减弱吗？

粗略地查阅手边有关这一时期流行病学的记录，好像就能证实这些怀疑。新疾病在这一时期一出现（或者可能是旧疾病被发现有了病变），卫生标准似乎就会一再下降。我们听说了在英国（1485年、1508年、1517年、1529年和1551年）和欧洲大陆（1529年）一种神秘的“汗热病（Sweating Sickness）”的发作。在1529年后几年内人类的另一种新灾祸——梅毒由从意大利战场归来的战士和随军人员传播到欧洲广阔的地域内。斑疹伤寒虽然早就存在，但好像只是到了16世纪它才成为一种主要的流行病。一种虱生【72】传染病会在拥挤的兵营和帐篷中生活的污秽人群中找到它们最适宜的扩散环境。人们知道它在16世纪各个战场中一再发作，最严重的一次是在1566年。它也在被指派抵抗土耳其人的帝国军队中传播，当时的作家称这种传染病为“匈牙利病”。

虽是如此，这些灾难对人口的影响也不宜估计过高。事实上，除了斑疹伤寒这一可怕的疾病外（它的杀伤力一度曾与瘟疫一样厉害），这些“新”疾病对人类并没有太大的杀伤力。如果说“英国的汗热病”曾引起被吓坏了的观察家的高度注意，那是由于它是第一次发作，由于这种奇异的疾病向受害者侵袭的迅疾性，也许还由于这样的事实：它似乎有向富有阶级成员而不是穷人侵袭的倾向。不过，显然患上这种汗热病的人其死亡率并不很高。这些流行病只有一次发作而且仅限于英国；可不管怎么说，1551年后就再也没有听说这种疾病了。在1494年后急速传播开来的梅毒具有恶性传染病的所有特征。但在30年内它似乎改变它的特性，成为一种在不知不觉之间加剧的疾病，人们也是从那时起才知道它：一种可能缩短它的患者生命的疾病（而且降低他们的生殖功能），但在短期内并不致命。另一种注定要在17和18世纪产生毒害作用的疾病——天花——显然在这一时期的恶性流行病中并不是很突出。至于其他的疾病，有必要强调一下：关于鉴别诊断尚处于而且一直处于初步发展阶段。除了在有些情况下它们的产生被认为显然是由于腹股沟腺炎或痈的出现和患者的皮肤上出现黑点外，现代流行病学家仅从当时人对早期一些疾病的描述几乎是不可能做出有把握的诊断的。

即使这样，可以有把握地说在这一时期及其后一段时间内瘟疫是最凶恶的杀手。事实确实如此，如果发现它的力量在减小或者人们的抵抗力在增强的迹象那就更有意义了。如果能够发现瘟疫发作总的来说比以前的世纪更加温和、短暂或次数更少，这将给我们提供 1450 年以后人口增长潜在原因的重要线索。让我们再说一遍，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对于这些事情我们无法提供确定的答案。表面上流行病学记录并没有能显示任何瘟疫大幅度减弱的迹象。相反，我们听到这一时期瘟疫发作的几率比以前更高的说法；但中世纪以后时代的记录一般来说更加充足这一事实也许可以说明它。实际上，有证据显示瘟疫的死亡率有所下降，但也没有到惊人的程度，不过也许足以导致这一世纪 1450 年或者 1470 年后总死亡率长期下降的趋势。所发生的改变是：以前人们认为能迅速超越整个国家疆域的瘟疫眼下完全成了地方性的疾病。“瘟疫”，查理·克莱弗顿（Charles Creighton）博士，一位英国有名的流行病历史学家写道，“今后（即 15 世纪中叶以后）很少再是普遍流行的了；它越来越成为城镇的疾病了，当它在一个国家发作时，在很大程度上只限于一些有限的区域。”这种印象为一个当时称职观察家的论述所证实。“英国几乎每年都很少有瘟疫发作”，伦敦的威尼斯使节在 1554 年报告，“因为他们还不习惯预先采取公共卫生措施，**正像它通常也没有取得重大进步一样**。”一位 16 世纪早期的德国作家保罗·朗（Paul Lang），《瑙姆堡编年史》（the Naumburg Chronicle）的作者也对瘟疫分散发作及其地方性特征发表了评论。“它是奇怪和让人吃惊的”，他写道，“瘟疫永远不会完全消失，但是它每年都在某地发作，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此时减退了，几年之内又绕道回来。”① 在瑞典，1495～1565 年之间似乎没有瘟疫的全面发作。

[73]

瘟疫的传染力有所减弱（或者人们的免疫力有所增强）并不意味着它在 16 世纪地方性的发作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实际上，在 16 世纪后半叶它的发作更加猛烈。如果说伦敦市、它的特别行政区（Liberties）和它的教区以外地区（Out-parishes）仅在 1563 年这一年的瘟疫中损失超过 20 000 个居民，1593 年损失 15 000 居民是可能的话；如果说确实在一些小型城市像诺里奇（Norwich）在 1578 年 8 月 20 日～1579 年 2 月 19 日这个瘟疫发作的季节里据记载有超过 4 800 人死亡的话，那应承认，瘟疫的病菌还没有丧失其

① 保罗·朗（Paulus Langius）：《瑙姆堡教堂编年史》（*Chronica Numburgensis Ecclesiae*），收在约翰·布尔赫哈德·门肯（Johann Burchard Mencken）：《德国：主要是萨克森的作家们》，第 2 卷（莱比锡，1738 年），第 88 页。

巨大的杀伤力。而且在1560年之后，这一年在气候史上似乎是一个转折点，又有一些非地域性的恶性流行病发作。1563～1566年间一种名副其实的传染病流行开来，据记载先后在英国、瑞典、德国、瑞士、萨瓦（Savoy）、法国和西班牙发作。1575～1577年的瘟疫，尽管其波及的范围十分有限，却不仅仅是地方性的事件。它先在西西里、蒂罗尔南部（the South Tyrol）发作，然后迅速传播到北方的意大利，它在威尼斯、米兰和其他许多小城镇的居民中造成了大混乱。16世纪80年代在瑞士和法国发作的和1599～1600年在西班牙发作的瘟疫都与之相似，即它们都在一个国家领土内发作而不是在一个地方发作。 [74]

15世纪后半叶和16世纪的流行病记录似乎不能为任何关于死亡率变化的积极推断提供根据，也不能为有关死亡和饥荒的数据提供证据。这种历史考证领域比其他许多领域更需要做艰苦扎实的准备工作。经济史学家由于全然关注“长期”的问题，因而对他们认为是短暂的事件诸如生存危机等等问题不甚措意。而且，这可能是疏忽的另一个原因：所得到的关于更早一些世纪的资料——一些谷物价格和当时编年史以及政府档案中关于食物短缺的虽丰富但极为零乱的参考资料——太零乱和混杂以至于不能得出一个正式的统计结果。无论如何，想把前后相继各个时期的死亡与饥荒的影响进行比较的历史学家将会遇到棘手的问题：如何处理卷帙浩繁的资料所带来的偏见。

因此我们不能确保在这一时期生存危机的频率有明显的下降。由于战争和基本的混乱，地方的萧条还随处可见。在一些边远地区像半干旱的高原卡斯蒂利亚（Castile），可怜的收成和高昂的谷价每10年都要出现一次。但即使在那些气候温和的国家，食物严重短缺的现象也并不少见。欧洲的大片土地都受寒冷季节的影响，随之而来的庄稼歉收越发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地区性的短缺不可能通过进口邻国的食物有所缓解，尽管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不那么频繁。这里不是绘制这些主要灾祸详尽无遗年表的地方，尽管有一些应该列上。

1481～1482年英国、法国、低地国家、德国和波希米亚（Bohemia）庄稼歉收，造成英国小麦价格比长期的平均水平上涨了大约两倍。20年后，在1501～1502年间，英国和德国再次遭受饥荒，而法国小麦价格也远远高于正常水平。16世纪20年代晚期和30年代早期欧洲普遍庄稼歉收：1527年是英国极度匮乏时期，接下来是4年的小麦高价。大约在同时期（1529～1531年），德国也遭受庄稼歉收的打击。西班牙也处于艰难的困境中，1529～1531年新、老卡斯蒂利亚（Old and New Castile）和巴伦西亚小麦价格都很 [75]

高。16 世纪 20 年代后期意大利饱受战争蹂躏的惨状我们在前面已经描述过了。只有法国在这个普遍不景气的时期有点例外，它只在一年（1531 年）有着严重饥荒的记录。其困厄波及全欧的另一个时段是 1556～1557 年，有来自各个国家和地区饥荒和因饥荒而造成高价的报告：来自英国、荷兰、德国西北部、丹麦、法国的部分地区［勃艮第（Burgundy）和罗讷（Rhone）盆地］、意大利和西班牙。[①]

当 16 世纪接近尾声时食物短缺的次数和严重性似乎在增加，不仅在地中海地区（布罗代尔教授发现了**小麦奇缺**的突出征候），而且在欧洲其他地区也是如此［英国 1597 年和 1601 年的《济贫法》（Poor Laws）其意旨就在于对付由这个非常时期大饥荒所带来的困厄］。为了说明这种现象，几乎没有必要求助于气候的长期恶化的假设——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不容易得到证实；也许外部自然因素的长期影响不应该不加以考虑。[②] 有必要使人们记住的是，欧洲人口在 100 年或更长的时间内在明显增长。在 16 世纪后半叶，欧洲经济再一次接近暂时的人口饱和状态，与早在 14 世纪曾经达到的状态类似，那时它第一次为 1315～1317 年的大饥荒所减轻。

不过，没有哪一次 16 世纪的生存危机——如果我们冒险做比较，由于缺乏适当的衡量标准，只能是尝试性的——在严重性上能达到那次灾难的程度；而只有一次——1556～1557 年的灾荒——在影响范围上接近它。人类在免受饥饿方面，尽管做得还很不够，但在这一时期有所增强。到 16 世纪各市都普遍地实施了贮藏粮食政策，而以前只是富裕的和更有远见的市政府才这样做；一些地方的君主开始尝试紧急粮食贮备。[③] 不可否认，在严重匮【76】乏的时代，公共账户上大批的买卖会加重刚出现的恐慌，做面包的谷物大量地囤积在遍及全国的成百的国家和其他公共的粮仓中，在这样不景气的时期，这种囤积既可以作为物质上坚强的后盾，还可以作为心理的缓冲。

另一个因素，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个，即及时救济的可能性的不断增强既可以减轻生存危机在物质上的影响，也可以打击囤积居奇的投机分子。在这一时期受庄稼歉收打击的国家越来越依赖从遥远荷兰商人粮仓航运来的

---

① 参见阿斯特丽德·弗里斯（Astrid Friis）：《关于 16 世纪和 17 世纪经济与财政关系的研究 I：1557 年荷兰的两次危机》，载《斯堪的纳维亚经济史评论》，I/2（1953 年），尤其是第 199 页以下。

② 参见古斯塔夫·乌特斯施托姆（Gustaf Utterström）：《早期现代史中的气候变化与人口问题》，载《斯堪的纳维亚经济史评论》，第 3 卷（1955 年），第 3～47 页。

③ 在西西里，皇家粮库早在 13 世纪前半叶就已经建立了。但它们的功能有所不同。君主要求其贮藏量达到王国最大的出口基地的水平。参见阿道尔夫·绍伯（Adolf Schaube）：《地中海地区罗马人商业发展史》（慕尼黑和柏林，1906 年），第 505 页。

粮食——据说，阿姆斯特丹早在17世纪贮藏有“不少于700 000夸特(quarters)的谷物”——或者从如此遥远以至不受具体军事行动或地区性的天气变化影响的粮食过剩地区直接进口。然而，也只是一些经由通航水域很容易抵达的地方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外国的粮食供应——陆地运输大量低价物品依然很慢、不确定，而且还不赚钱——总的来说，在一个国家里情况还不一样，一些海岸城市紧急时至少可以从国外接受成船的物品。人们告诉我们，这就是1527年英国饥荒最严重时的情况，当时，“斯提尔亚德(the Steelyard)的商人们从但泽(Danzig)运来小麦和黑麦这些贮藏品，因此，这些东西在伦敦比在王国其他地方都要便宜得多”。1540年托斯卡纳区的危机史提供了又一个被救急的例子，它由黎凡特(Levant)一个谷物船队及时到达里窝那(Leghorn)港而得救。

自然，到16世纪各地区间粮食方面的海运贸易此前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了。例如，低地国家早在13世纪就进口来自南波罗的海的粮食；而英国和西班牙很早就在紧急时依靠这种供应渠道。应当说，现在由于一种更加发达的销售机制，首先是由于东爱尔比亚(East-Elbia)、波兰和爱沙尼亚(Estonia)可自由支配过剩产品的大幅度增加，永远或暂时谷物短缺的地区能从国外得到充足的供应而且比以前更为经常。到17世纪中叶，每年经由但泽港出口的粮食数量是1490~1492年年均装船量的6~10倍。17世纪接近尾声时，荷兰、德国和英国的商船都在卸下来自波罗的海甚至是来自地中海港口的谷物。① 西欧为提高平均亩产而取得的农业生产的进步、开垦和排【77】水工程的实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16世纪的生存危机。而且不只是谷类的供应在增加。2~3个重要的肉类食物供应新渠道也展现在这一时期欧洲人的面前：从科得角(Cape Cod)到拉布拉多(Labrador)丰富的鱼类资源在不断增加蛋白质的供应，而匈牙利和瓦拉几亚(Wallachian)平原及丹麦低地在过去一段时期里一度成为大量出口到奥地利、德国和荷兰的牛的出产地。

在试图评价所有这些进步在人口方面的意义时，历史学家会过分强调以前曾提到过的让人沮丧的生存危机记录。事实上，饿死的人数所占的比例不会很大，甚至还赶不上食物极度匮乏时期。相反，人们往往死于——如果他们死亡的话——“发烧”和“腹泻”，由于他们在饥馑时期被迫吃了不该吃或

① 这些粮食进口因为16世纪最后25年为地中海西部和近东生产可出口粮食的前主要粮食来源地的明显歉收而成为必要。

不洁的食物，或者由于他们衰弱的身体无法抵挡其他传染病所致。至于其余的死亡人数，可以设想，由于长期营养不良而缩短了寿命的人数比死于食品极度匮乏的人数还要多。由此，还是由上述提到的有利因素所带来的整体营养水平的提高，尽管不怎么显著，要比让人们产生怀疑的悲惨的饥荒记录显得更为重要。

15 世纪晚期和 16 世纪的人口增长是否只是因为死亡率的下降，或者是由于生育率的上升，对于这个问题，由于缺少相应的数据因而没有一个确定的回答。在当时的资料中偶尔也发现有人类生育能力旺盛的证据，尽管观察到儿童数量的增加可以使人产生这样的联想，但它并不一定意味着生育力的增长。保育室的大量存在可以证明婴儿的低死亡率与高生育率同时存在。但是，在新教国家有一个主要的制度变化，它在 16 世纪实际上提高了总的生育率：取消教区僧侣的独身生活，解散修道院。尽管这种父母存量的扩大对人口的影响不可能得到评估，但可以肯定它们是不可忽略的。这不仅是个生育率的问题：教区牧师家庭的儿女们出生在比较富有和开明的家庭中，他们会比一般的孩子有更多的几率能够度过他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并且还会成【78】为他们孩子的父母。17 世纪天主教国家竭力提倡和鼓励提高人口出生率的政策，它们不赞成牧师保持独身生活，限制修道院征募新成员，这不是偶然的。

根据马尔萨斯的理论，可望对生育率产生抑制作用的一个因素是实际工资水平的大幅度下降，它是随着 16 世纪的人口压力和长期的通货膨胀而产生的（我们假设，也许有些草率，就业率没有太大变化）。当食品的价格上涨，他们现金收入的购买力每 10 年下降一次时，社会的较低阶层是否会采取一种更为精明的策略呢？16 世纪以来流行的一句佛兰德谚语，不厌其详地告诫穷人：家庭是他们穷困的祸根。少财多子，让人穷死。

不过并没有迹象表明这种告诫被人听取了。实际上，16 世纪人口的恢复，与中世纪晚期人口的衰减恰成对比，这也许可以用这样的假想来解释：在工薪阶层中间（如果不是他们中家境更好的人中间）“谨慎约束力”有一定程度的减弱。古老行会体系的逐渐衰落和产业组织的兴起，它可以极大地利用半熟练工人，让这样的工人在安排他们私人生活方面享有相当大的自由，这样必然提高已婚者的比例，平均婚龄减小。[1] 尽管收入微薄，工作很

[1] 一部 1555 年的英国法令抱怨“城市的年轻人草率结婚和过快地建立家庭所带来的问题，他们从来没有显得这么稚拙和不老练”。托尼（R. H. Tawney）：《17 世纪的农业问题》（伦敦，1912 年），第 104 页脚注 3。

不稳定，年轻人还是决意要建立一个家庭，因为任何东西都不是等来的。无疑孩子会出生，但其中大多数都会夭折，家庭负担一度会难以承受。

重商主义的政府攫取“财富”的努力在从新世界进口的必不可少的银子急剧减少的时代会变得疯狂，这是毫不奇怪的。同一时期——17世纪——的政治家们应该对国家财富、权力和人口的其他来源感到同样的忧虑难道有什么可惊讶的么？当血腥的战争、饥荒、一系列瘟疫的发作在欧洲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造成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时，难道人口不也会随之下降吗？【79】

在其生存率大大低于上一世纪的时代，对人口减少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可以肯定统治家族成员的生存率是比较低的，他们通常是不暴露在战争的危险之中的社会群体，毫无疑问，比普通的人们享受到更好的衣食住行，而且更少受到传染病的影响。有资料显示，在17世纪统治家族出生的孩子100个中只有61.7%活过15岁，而16世纪是70.1%。[①] 在同一特权阶层每100位活过15岁的男性中1580～1679年间出生并活到50岁的男性只占41.6%，而1480～1579年间出生的男性所占比例是44.6%。这些数据与早期对丹麦的资料所做的观察是一致的，它显示男女两性成年贵族的死亡率在1630～1679年间远远高于1530～1579年间的，虽然后者正处在七年斯堪的纳维亚战争（the Seven Years Nordic War）时期，还带来一些消极影响。[②]

还有，另一组数据显示：在将17世纪出生的几百位上层阶级和英国的专业人员与16世纪出生的同一阶层人员相比时，他们的平均死亡年龄在降低，这进一步支持了这种观点：17世纪的死亡率比16世纪高。不过，由于平均死亡年龄的变化是否能用于推断死亡趋向还有疑问，[③] 对这些资料不宜过分推崇。

从某一方面来看现代早期欧洲在人口价值趋向方面的变化是与经济活动长期的节律相关的，这一点是可信的。商业的波动会影响短期的死亡率和出

---

① 1657～1676年间在法国北部农村人口中抽样所得到的相应的数据是58。参见皮埃尔·古贝尔（Pierre Goubert）：《博韦：17世纪的人口问题》，载《年鉴：经济、社会、文明》，第7卷（1952年），第454页。

② 参见哈拉尔德·威斯特加尔德（Harald Westergaard）：《死亡率和发病率教科书》，第2版（耶拿，1901年），第277页。在日内瓦出生的人们平均预期寿命的明显增长——从1561～1600年间的大约23岁增长到1601～1700年间大约27.5岁——为刘易斯·亨利（Louis Henry）观察到：《古代日内瓦家庭》，载《人口研究：16～20世纪》（巴黎，1956年），第157页，这也许正好是个例外，而且它也与17世纪瑞士相对有利的生活环境有关，这一点在上面已经注意到了（第44页）。

③ 参看勒内·巴雷尔（René Baehrel）：《古老制度下的死亡率》，载《年鉴：经济、社会、文明》第12卷（1957年），第85页以下。

[80] 生率：严重萧条导致人口中增加部分的许多人忍受饥饿和推迟他们的婚姻，他们的生活要依靠工作的工资（这对于因庄稼歉收而签约的产业就业者尤其如此，因为众所周知，庄稼歉收会在特定的面包缺乏时期造成对工业品有效需求的减低）。如果假定这种看法成立的话，在 16 世纪后几十年和 17 世纪较好的年代，在许多国家商业萧条的高频率和严重性与人口缓慢增长之间会让人看到不仅仅是偶然的一致性。[①] 不过，关于上面两方面的现象，人们都知之过少，以至于难以推出什么积极的结论。无论如何，战争与瘟疫似乎始终是影响这一时期人口波动的强有力的因素。

战争与不断增长的死亡率之间的因果关系在以前的章节中不止一次地强调过，因此在这里没有必要再特别强调了。不过，一个不太明显的因果链条将在这里给予考虑。为什么在这一世纪 1560 年以后的岁月里瘟疫发作的程度和频率来势会如此凶猛，是否有其他原因呢？各种疾病的**逐渐增强**（*crescedo*）——首先是瘟疫，还有痢疾，1600 年以后越来越厉害的天花——几乎是一致的，而且几乎肯定是与另一种现象相关的，即大城市快速的成长和增加。

在这一世纪，一种新型的城市正在出现；或者说，到那时还相当罕见的类型正在到处涌现。人们没有广泛认识到，除了君士坦丁堡这一古老世界的独特遗存外，欧洲城市不到 4～5 个——巴黎、那不勒斯、热那亚、威尼斯，也许还有米兰——在现代前夕达到这一标准，也许只有它们中的第一个城市其人口超过了 100 000 人。只有少数城市——佛罗伦萨、波伦亚（Bologna）、塞维利亚、科尔多瓦（Còrdoba）、格拉纳达（Granada）、里斯本和根特（Ghent）——为人所知，或者可以假设它们的城市人口达到了 50 000 人或者更多一些。中世纪后期十几个其他“大”城市趋于上升，其中有维罗纳（Verona）、巴勒莫（Palermo）、罗马、墨西拿（Messina）、伦敦、巴塞罗那、科隆（Cologne）、安特卫普、布鲁塞尔，可能还有维也纳和布拉格，它们的居民从 30 000 人到50 000 人不等。除意大利、西班牙和低地国家之外，[81] 一些相对重要的国际贸易和工业中心，像图卢兹（Toulouse）、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卢卑克（Lürnberg）、纽伦堡（Nürnberg）、奥格斯堡（Augs-

---

① 参看霍布斯鲍姆（E. J. Hobsbawm）：《17 世纪欧洲经济的总危机》，载《过去和现在》，第 5 期（1954 年 5 月），第 33～53 页；第 6 期（1954 年 11 月）第 44～65 页。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时期殖民世界也遭受了人口的减少和经济的不景气。参见伍德罗·博拉（Woodrow Borah）：《萧条的新西班牙世纪》（伊比利亚和美国史料出版物，第 35），伯克利和洛杉矶 1951 年，还有由皮埃尔·谢努（Pierre Chaunu）发表于《经济史杂志》（第 16 卷，1956 年，第 421 页以下）上的对这一研究的评论。

burg)、但泽（Danzig）和乌尔姆（Ulm），其城市人口仅仅达到，或者不会超过 20 000 人。

在此后的 100 或 150 年中，这幅画面极大地改变了，安特卫普正像已经看到的，早在 1568 年就已达到 100 000 人的指标；而在这个具体的个案中，紧接着上升而来的就是陡降，这个城市在 17 世纪一直保持在 50 000 ~ 65 000 人的水平上。阿姆斯特丹，在 1622 年以前的几年中曾突破 100 000 人，到 17 世纪末持续增长到大约 200 000 人。威尼斯在中世纪后期就已经是大城市了，到 1568 年达到顶点，大约是 170 000 人；尽管它的社区受到 1575 年和 1630 年两次灾难性瘟疫的打击，但它的人口从未低于 100 000 人，到 1700 年又回升到 140 000 人。米兰市在 16 世纪末和 17 世纪初时的人口也大大超过了 100 000 人。那不勒斯（包括郊区）作为另一个大都市，它在 17 世纪早期的人口接近 300 000 人；甚至在 1656 年的恶性瘟疫发作之后它的人口还超过了 150 000 人（1688 年的人口是 188 000 人）。罗马从人口上讲，在中世纪晚期只是一个二流的城市，但在 17 世纪末以前它的人口增长到 100 000 人；巴勒莫（Palermo）、塞维利亚（Seville）、墨西拿［Messina，加上它的建筑（*casali*）］和里斯本也都大约在 1600 年暂时地达到了这个规模。

巴黎比这些大城市都要大，那不勒斯可能是个例外。用一位威尼斯大使在 17 世纪后半叶写下的话，法国的首都是：

> "一个人口稠密、美丽富饶的大都市；在我看来，只有它才适合与威尼斯媲美，实际上它人口相当庞大，有许多的商店和行业……；事实上，巴黎是我不能尽述的，我最好是以欧洲没有一个城市像它那样巨大和美丽来结束我的话。"

那位大使还说，人们告诉他巴黎的人口是 700 000 人。他认为这个数目太大了；但他倾向于认为这个城市有 300 000 ~ 400 000 个居民。事实上，在那一时代这个数目也至少高估了 100 000 人；不过几乎可以肯定，巴黎（加上郊区）在 17 世纪某些时期曾达到或超过这个水平。

如果我们要估算 16 世纪和 17 世纪伦敦的人口，我们同样会不知所措，其不确定性部分是由于我们不能说明城区的人口，而它在地形上而不是行政上构成城市的一个组成部分。几乎可以肯定，大伦敦（Greater London）——包括伦敦市、特别行政区（Liberties）、外教区（Out-parishes）、威斯特敏斯特（Westminster）——大约在 16 世纪中叶超过 100 000 人的水平，在 17 世纪初几年内如果没有超过，至少也达到了 200 000 人。当詹姆 [82]

斯一世（James I）自豪地宣称："我们的伦敦市已经成为基督世界的最大或次最大的城市"［1615 年 6 月 16 日皇家公告（Royal Proclamation）］时他并没有搞错。在 1665 年的恶性瘟疫前夕伦敦人口（在可定义的意义上）不可能低于 500 000 人。

除了上面所列举的城市外，还有其他一些城市在这一时期接近 100 000 人的数量程度。里昂（Lyons）在 17 世纪末之前就接近了这个水平。马德里在 1561 年成为首都和主要的皇家官邸，它在迅速壮大，到 1700 年好像已经接近了 100 000 人。维也纳也从它作为帝国官邸的地位获益良多，到 17 世纪末，城市加上郊区接近 100 000 个居民，成为人口最稠密的日耳曼（German）城市。马赛——如果布罗代尔（Braudel）教授发现的数据是可以信任的话——早在 1583 年其人口已经突破 800 000 人；尽管几乎可以肯定在 1666 年它的人口并不那么稠密，但众所周知，这个城市（也许还包括郊区）到 17 世纪末的人口已经接近 800 000 人。巴伦西亚在 1609 年拥有 12 000 多所住宅，或大约 70 000 个居民；格拉纳达（Granada）正好与它差不多大。热那亚人口超过 70 000 人，汉堡和但泽在 17 世纪 40 年代拥有大约 60 000 个居民。

在 16 世纪，大型城市和超大型城市中心于 1550～1650 年间如蘑菇般迅速成长，这不仅是一个有意义的人口现象；它也是产生某种结果的因素。因为这些庞大聚居的人口繁殖会对这一时期的死亡率产生深远的影响，从而对这一时期人口史的总体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不用多少想像就可以认识到：这些大型的人类聚居区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食物、水和燃料供应、污水和垃圾处理、住房、道路等等——都是那种没有多少资本、技术，却充斥着大量麻木不仁的人们的社会难以解决的问题。过分拥挤、污秽遍地、水受到污染，有时还食品短缺，其结果只能是即使在"正常"的年份城市的死亡率也居高不下，如果是瘟疫经常发作的季节（有关资料前面的章节已经论述过了），其死亡率就是灾难性的；尽管出生率也很高，在我们掌握有资料的大多数大城市里，长期平均死亡率要远远高于出生率。只有永远存在的农村移民潮才使这些城市能够长期维持它们的人口，更不用说它的人口会有什么增长了。

不过，大型城市中心不仅是以这种方式充当国内人力资源的流动渠道；［83］它们也倾向于作为瘟疫发作的中心来消耗它们所容纳的人口。传播的过程通常是以在瘟疫开始发作时传播到富有的家庭所在的国家开始，但无论如何来自城市地区的各种疾病会迟早传播开来。尽管几乎不可能准确地追踪瘟疫传

播的方向和进程，但有许多资料显示，大城市不止一次地是瘟疫扩散的出发点。在 16 世纪后半叶和 17 世纪发生于伦敦的一次严重瘟疫还在 2 ~ 3 年之后被远在德国北部的人们感受到了。[1]

在同一时期，人口前所未有地集中在大城市里，这为瘟疫的发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西欧和中欧在 1700 年后不久就随着瘟疫的彻底绝迹而结束了其初期的发展，这真是耐人寻味。这种横行 300 年、导致人类大批死亡的惟一疾病为什么消失对人们来说还是一个谜。用瘟疫病菌逐渐减弱或人们免疫力的增强来解释是没有说服力的。最近的发作，尤其是 1656 ~ 1657 年意大利的和 1665 ~ 1666 年英国的瘟疫都与以前的一样致命。早在 18 世纪早期，地中海港口和有关机构检疫能力的增强、沿奥地利——土耳其边境**防疫线**（cordon sanitaire）效率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保护西欧不受瘟疫的侵袭，但在土耳其，其势力并没减弱。不过这些卫生预防措施的重要性也不宜过分夸大。隔离，如果能够富有成效的话，会保护一个城市或国家免受瘟疫携带者和它们的寄生物的侵袭，但在防护更为致命的传染病即寄生于跳蚤身上的鼠疫时就无能为力了。事实上，淋巴腺鼠疫是目前所知道的最为严重的一种侵蚀性的动物流行病；只有当跳蚤在吸食了病鼠之后再袭击人类时瘟疫才开始形成。[2]

对这种基本传染链（老鼠→跳蚤→人）的认识偶尔会给我们提供对导致欧洲瘟疫绝迹原因认识的线索。研究最后表明正是一种特殊种类的啮齿动物——小家鼠（*Mus rattus*），主要是它们造成了瘟疫的传播。它在人们家里【84】和船上长大，喜食人类的主要食物——谷类；但它首先是印鼠客蚤（*Xenopsylla cheopis*）的最好寄主，而我们所提到的瘟疫是**典型的**由跳蚤传播的瘟疫。不过随着砖墙越来越多地在原来是木墙的地方被建起来，当木瓦或瓷瓦屋顶逐渐取代茅屋顶，城市里粮仓成了过去的事情时，这种地方特有的老鼠会发现它的栖息地越来越不惬意。当木质结构和肮脏的住所在欧洲城市里逐渐消失时，就人身上的跳蚤在瘟疫传播中也起着一定作用来说，通过消灭适宜人蚤（*Pullex irritans*）滋长的环境，就一定会进一步减少瘟疫发作的可能性。也许比这些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在 1600 年以后一段时期，来自亚洲的

---

① 伦敦反过来好像在 17 世纪好几次都受到来自城市化的荷兰的传染。参见以上第 47 页，脚注 2。

② 但并不总是如此。如果像恩斯特·罗登瓦尔德教授（Ernst Rodenwalt，参见第 7 页脚注 1）所认为的，在温带人身上的跳蚤是瘟疫病菌有效的携带者，中世纪和现代早期欧洲的瘟疫并不总是以鼠群中的发作为先导；相反有时传染线是以**人蚤**（*Pullex irritans*）为媒介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新品种出现在欧洲，褐色或迷路的小家鼠（*Mus norvegicus*），它开始向老品种挑战，最后几乎彻底地取而代之。这种动物王国的革命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至于打破了鼠与人之间的致死关系。因为尽管褐色老鼠与黑鼠一样易受瘟疫的影响，但它的主要寄生菌不是印鼠客蚤（*Xenopsylla cheopis*），而是另一种具带病蚤（*Nosopsyllus fasciatus*），它是瘟疫杆菌不那么有效的传播媒介，而且还不嗜人血。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早几十年，在英国收集的经验表明：褐色鼠群中的瘟疫有一种自我绝迹的倾向。

欧洲瘟疫的绝迹意味着：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早期保持长期平均死亡率如此之高的其中一个原因已经不起作用。不过，从短期来看这种变化并不明显。正像上面已经显示的，大约在 1700 年前后的 20 年里，欧洲许多国家都产生了难以克服的人口危机。总的说来，直到欧洲各个地区的瘟疫消失之后 60 年，它们的人口才显示其出生率永远超过死亡率的确定信号。这并不是否认瘟疫的绝迹与重大的革命（the Vital Revolution）之间存在的因果联系。实际上，后者的一个方面作用在于：只是在缺少大倒退的情况下人口增长累积效应的表现。

17 世纪出生率的趋势非常难以确定。甚至连粗略的出生率这种估算生殖率不太理想的工具都不能准确地计算，除非在一些孤立的案例中。所有能够有把握论述的只是，那种年平均每千人 30～40 的人口生育率按照现在的[85]标准依然是很高的。应该想到，出生率的波动和地区性变化主要是由有关人口的婚姻状况短暂变化或地区性差异所造成的，也许还由过去特定时期的瘟疫所导致的年龄分布的改变而造成的。

不过有理由相信，这一时期婚内出生率不是完全不可控制的［通过溺婴、流产或者避孕试图避免婚前或婚外性行为造成的后果，这在一切时代似乎都很正常——不仅在“天主教国家”（Popish Countries）是如此，约翰·葛朗特（John Graunt）说，那里“非法的性行为导致怀孕但……实施流产或秘密杀害却使他们灰心丧气”。］[①]。否认广为人知的**不完全性交**的避孕效果是荒谬的；道德家认为有必要严重警告这些和类似的为挫败婚姻之爱的首

---

① 约翰·葛朗特（John Graunt）：《对死亡率议案所做的自然的和政治性的观察》，由瓦尔特·威尔考克斯（Walter F. Willcox）编辑（巴尔的摩，1939 年），第 60 页（1662 年第 1 版）。16 和 17 世纪德国的刑法典总是包含着有关杀害婴儿的条款。

要目的——生养孩子而设计的行为。[1] "结婚的全部行为"，圣弗朗西斯·德·塞勒斯（St Francis de Sales）早在17世纪就已写道："在这儿是不合适的，也是没有条理的，因为对于生孩子而言，它是有缺点和可恶的。"西班牙耶稣会会士（Jesuit）托马斯·桑切斯（Thomas Sanchez，1550～1610年）在为神学家们写的拉丁文著作中提供了更为特别的例子；他的思想在一位德国诡辩家出版于1645年的一篇论文中得到再现。在18世纪早期德国的布道辞和色情文学中也可以发现关于婚姻中生育控制的明确描述。[2]

并不缺乏减少怀孕次数的动机。早在1656年德·皮勒神父（the Abbé de Pure）就反对女子注定要患的他所称的"爱情水肿（*l' hydropisie amoureuse*）"；[3] 德·塞维尼侯爵夫人（Madame de Sévigné）写于1671年和1672年的信表达了同样的心情。在她得知她的女儿又怀一个孩子时，这位老夫人非常恼怒。"但是你的头脑都发胀了"，她大声说，"我根本不喜欢你过多怀 [86] 孕。"然后转向她的女婿，她显然把他当作元凶，"看来你真是不知道生孩子是怎么回事。但是听我说，我要告诉你一件事：生了这个男孩之后，你就没怎么让她闲着，我想你一点都不爱她……你以为我把她嫁给你是为了让你杀死她，损害她的健康、美丽和青春……？"这顿猛烈的抨击似乎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从而，德·塞维尼侯爵夫人现在在表达她的快乐和感谢方面毫不吝惜。"我非常高兴，亲爱的，"她告诉他女儿，"你没有怀孕，我真心真意地喜欢德·格利南（M. de Grignan，她的女婿）。"

如果说，在贵族家庭中对健康和美丽的考虑是反对太频繁怀孕的主要原因的话，那对中产阶级而言，社会和经济动机似乎开始影响在这些事情上的行为。在1709年上演的喜剧《资产者的法郎》中包含以下的台词：

需要不时地剥夺自己的快乐
只生能养活得起的孩子

人们自然不宜从一些孤立的片段中得出太多的结论；但我们还有另外的

---

① 参看安德烈·旺纳德（André Venard）和菲利普·阿里埃斯（Philippe Ariès）：《避孕实施史上的两个贡献》，载《人口》，第9卷（1954年），第683～692页。不过，正像上面已经显示（第170页）的那样，不完全性交（Onan）的过失最近没有再发现。瓦尔特·罗利（Walter Raleigh）有关"人工绝育"（在他的《世界史》第1卷，第5章第4节）的描述指的是**不完全性交**或生育控制（堕胎药？）的其他方法不得而知，只能存疑。

② 尤其是亚伯拉罕·桑科塔·克拉拉（Abraham a Sancta Clara）：《亚伯拉罕的"祝你顺利"》，载《著作集》，第11卷［帕骚（Passau），1837年］，第289、456页（第1版，1729年死后编辑）；还有约翰·戈特弗里德·施纳贝尔（Johann Gottfried Schnabel）：《喜欢招蜂惹蝶男子的迷宫》［保罗·恩斯特（Paul Ernst）编辑：慕尼黑，1907年］，第288、474页以下（1746年第1版）。

③ 参看菲利普·阿里埃斯（Philippe Ariès）：《18世纪以来的法国人口史和他们对生命的态度》（巴黎，1948年），第508页。

征象，早在 17 世纪中叶，甚至比这还早，如果不是在普通的情况下，至少也是在特别危难时期，谨慎的劝告到处得到采纳。人们——不仅是法国人——在苦难时期求助于一种形式或另一种形式的家庭限制，这一方面的证据在增多。一位法国的经济学家，以他作为一位地方官员的资格，他一定有相当多的机会观察到普通市民的**习俗**（*mores*），在一篇写于大约 1700 年的论谷物的论文中，论述这一点相当具体。德·布阿吉尔贝尔（de Boisguilbert）先生宣称：

> “一种极端的必然不仅会窒息了自然的一切趋势，而且在一些紧迫的情况下会违背自然……因为必然不认可任何规律，它会违反它在其中被发现的更大范围的最神圣的（规律）。还是让人们不要对出现的事情惊奇吧，即导致家庭缩小的极度的贫穷会被认为是一种赏赐，而且这种处境本身会带来完成（缩小）的方法。”[①]

【87】

这不仅是一种修辞游戏；统计资料表明，17 世纪法国的严重生存危机过后，紧接着就是与整个人口的下降明显不相称的怀孕的减少。例如，博韦斯（Beauvais）地区许多教区在可怕的 1649 ~ 1652 年期间都是如此，这一地区和本国其他地区在 1661 ~ 1662 年间和 1693 ~ 1694 年间还是如此。[②] 最近对从列日公国（the Principality of Liège）得到的数据所做的分析揭示了饥馑与受孕率之间同样突出的相互关系。[③]

这种现象是如此地广泛，以至于它是否能在生理基础上得到圆满的解释，或者是否可以借助危机年代结婚率的无可否认的下降来解释还是一个问题。也许可以假设这种“**受孕率的急剧下降**”［用默弗勒特（M. Meuvret）的术语］部分是由于深思熟虑的限制所致（杀害婴儿也在登记受洗人数的减少方面起到一定作用，但在危机过后人们是否会去求助于这种特别可憎的

---

① 皮埃尔·勒·佩桑特·布阿吉尔贝尔（Pierre le Pesant Boisguilbert）：《论谷物的品种、耕种、贸易和利润》，第 367 ~ 368 页；被黑兹尔·冯·戴克·罗伯茨（Hazel van Dyke Roberts）的《布瓦斯古贝特：路易十四王朝的经济学家》（纽约，1935 年）所引用，第 176 页。一位 18 世纪的人口学家托马斯·肖特（Thomas Short）也对生育危机的效果作了评论，但他只是争辩道：“穷困、疾病、饥饿或瘟疫时代是……感官享受最大的敌人。”被库津斯基（R. R. Kuczynski）在其《英国人口学家对 1660 ~ 1760 年出生率的看法》中引用，该文收入《政治算术：一次人口研究的专题论文集》，由兰斯劳特·贺格本（Lancelot Hogben）编辑（伦敦 1938 年），第 298 页，脚注 2。

② 参看皮埃尔·古贝尔（Pierre Goubert）：见前引书，第 461 页，和《庭院利用的丰富历史：教区登记簿》，载《年鉴：经济、社会、文明》，第 9 卷（1954 年），第 92 页。还参见康纳德（J. Canard）：《1612 ~ 1946 年于尔菲的圣罗曼的人口迁移》，载《黛安学报》第 24 卷（1945 年），第 121 页，和阿贝尔·什特兰（Abel Chatelain）：《关于一个村庄人口的笔记：贝尔蒙特（自 17 世纪至 20 世纪）》，载《里昂地理学杂志》，第 28 卷（1953 年），第 113 页以下。

③ 吕弗特（J. Ruwet）：《人口危机：经济问题或是道德危机?》，载《人口》，第 9 卷（1954 年），第 451 ~ 476 页。

家庭限制方式呢?)。

这些法国和比利时的情况并不是孤立的例子。好像威尼斯在1631年记录的受洗人数与前30年平均人数相比也下降了45%。下降的原因是那时正在猖獗的恶性瘟疫。尽管如此，下降的幅度还是惊人的。[①] 因为自从1630年8月瘟疫发作以后到1631年3月（本年度降生孩子们被怀上的最后期限），这个城市只失去了大约28 000条生命，或大约是其人口的20%。的确，在瘟疫发作期间受洗往往被推迟；但由于瘟疫在1631年底之前已经停息，这些被推迟的受洗者（包括1630年出生的一些婴儿）如果不是全部至少是多数都在这一年受洗和登记。而且，相当一部分婴儿在他们被抱到受洗的教堂之前就死于瘟疫或者由于在被疾病打击得七零八落的家庭中缺少照护而死亡。人们还得考虑由待产妇的疾病所导致的堕胎，[②] 并且还要考虑瘟疫发作期间人们倾向于减少怀孕（或生育）的生理和心理状况。在说过这些之后还剩下一个强有力的理由：受洗人数不均衡下降的原因之一还有生育控制。【88】

也许可以再引用一个例子。1703年爱尔兰在度过极其艰苦的年代之后进行过一次人口调查，它显示了一个奇特的人口年龄分布，与20世纪30年代在许多欧洲国家所发现的情况很相似：最年轻的年龄群体所占的比例大大低于年老的群体。部分是由于孩子太小不到调查年龄，部分是由于婴儿的高死亡率和危机期间结婚的被推迟；但可以想像杀害婴儿、人工流产、堕胎对这种异常的年龄分布也负有责任。

至于英国，由托马斯·肖特（Thomas Short）博士所收集的抽样显示：17世纪中叶以后受洗者与结婚者的比例在明显下降（1670～1740年间为3.44%，而1560～1630年间是4.06%）。这些数据是否可信，如果可信的话，是由婚姻状况的变化导致下降，或者是由一定数量的生育控制导致的，这些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逃避真实，因而他们也使苦难时代的人口状况恶化，不过，他们如果对此有所认识的话，就会增加17世纪政治家对人口减少的忧虑，而且也会激发实施这个时代鼓励提高人口出生率的政策。但他们对此

① 危机时期出生人数急剧下降的例子被广为人知的还有1591～1592年和1626～1627年的热那亚［参见朱塞佩·费洛尼（Giuseppe Felloni）：《16世纪和17世纪热那亚的人口史》，载《意大利历史档案》，第110卷，1952年，第263页以下］和其他地方。但是，几乎不可能让可获得数据适用于任何的细密分析。

② 约翰·葛朗特（John Graunt）在讨论了在1603年伦敦瘟疫初发阶段每周受洗人数不均衡的下降之后，得出结论：出生率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堕胎。参看库津斯基（R. R. Kuczynski）前引书，第289页。

有所认识吗？基督教社会有关性行为的禁忌并不鼓励人们公开讨论这些事情。只是到了 18 世纪以前像莫奥（Moheau）这样的人才开始自由地谈论"除了男子外所有生灵都不知晓的那些有害的秘密，其实早已传遍国家的各个角落"。[①]

在研究了欧洲各国过去 500 年的人口史以后，人们会朦胧地意识到一种粗略的同步性。而在一定时期内，各国似乎是不相关的，或者无论如何不是密切相关的，事件似乎构成灾难中一致的模式，人们发现它在广阔的区域引起人口下降的趋势，而在其他的情况下，形势似乎很有利，导致几乎各个地方人口的增长。至于短期的波动，表现出这种同步性也是不奇怪的。这可以通过以下的原因进行解释：瘟疫甚至战争都有扩散的趋势，气候干扰通常是很广泛的，它足以导致许多国家庄稼的歉收。不过，长期趋势的一致性就不易进行解释了。即使像 18 世纪欧洲人口的普遍增长这样一个相对晚近的现象还没有得到圆满的解释呢。

[89]

处于重大革命早期阶段的学者所提出的一些理论不是那么让人信服。这一时期死亡率的降低部分归因于在医疗知识与技术上的曲折进展，但这种进展对芬兰或葡萄牙，甚至西欧农村地区和城市贫民区的预期寿命几乎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可以有把握地说，绝大多数的人们根本没有接受医疗的关怀，那些不用清洗和抽血就能好起来的人才能得到医术高明的开业医生的治疗。雅克·卡萨诺瓦（Jacques Casanova）轻率的评论——"在医生手中被治死的人要比他们治好的人要多得多"[②] 也许并不太离谱。尽管医学理论有一些进展，18 世纪的疗法与早在 100 年前莫里哀（Molière）的《虚构的病人》（*malade imaginaire*）中所接受的治疗并无多大不同。18 世纪野蛮的治疗方法部分地说明了顺势疗法（盛行）的原因。这种治疗形式用药量十分小，就是顺其自然，无所作为。不过许多病人在正经开业医生手中病情越来越糟糕，但当他们采用顺势疗法进行治疗时，却很快就康复了——不是由于那种荒诞疗法的作用，而是因为他逃离了正统医学有害的护理。

人们并不总是能认识到：要治疗人体所遗传的任何一种大病，在防感染外科手术出现之前和六零六、胰岛素、抗菌素被发现之前，医生是起不到多

---

① 莫奥（Moheau）：《对法国人口的研究与思考》［勒内·贡纳德（René Connard）］编辑（巴黎，1912 年），第 258 页（1778 年，第 1 版）。

② 《卡萨诺瓦的回忆》，由玛德琳·博伊德（Madeleine Boyd）编辑，现代文库（纽约，1929 年），第 7 页。类似的观点在歌德的《浮士德》（第 1 卷，第 695～699 行）中也被表达过。

大作用的。医疗职业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这一点连18世纪著名的医生威廉·卡伦（William Cullen）也坦率地承认："我们对感染的特性一无所知"，他宣布，"它可以引导我们为消除和纠正它而采取任何措施。我们只知道它的效果。"① 因此，通常治疗并不能对染病的部位直接产生作用，而只能使症状有所缓和。一些有潜在效果的药材像汞、洋地黄制剂、吐根的根茎和根、金鸡纳皮在18世纪就已为人所知；但它们并不总是能得到正确的使用。【90】无论如何，在这些最近命名的治疗法中，许多都不被认为是可以救生的，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它们的使用对国家的人口死亡率不可能产生明显的效果。

至于预防医学，这一职业同样无助于事。老实说，接种这种预防天花的原始的方法早在18世纪就被引入到欧洲；但它的实施一直十分有限，而且它的价值让人怀疑。因为它的实施是有一些危险性的；如果他们是偶尔受到感染，那么接种会更容易帮助个人战胜疾病，被接种的人会承受真正天花的袭击，那么他就会直接地成为他的家庭以及他的护理者，乃至间接地成为整个社区的危险源泉。接种的反对者声称天花的发生率在18世纪末确实比这种治疗方法引进之前要高。② 种痘发现得更晚，以至于对18世纪的死亡率没有什么影响：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关于牛痘的那篇著名的论文到1798年才发表。

18世纪的医学对于保护人们免受产褥热或斑疹伤寒的感染也没有提出什么有效的方法。这一时期一些新产院和其他医院的建立在努力使死亡率下降的因素中是否能被列上似乎还成问题。在19世纪早期爱尔兰所听到的陈述：被热病袭击的穷人可能在树篱下康复，与在热病医院康复一样，这几乎不是一个谬论。如此的机构所带来的有益效果几乎肯定被各种病菌在居民中的扩散所抵消。18世纪的医院也是人满为患。2~3个病人共有一张床位并不稀奇。③ 在这些情况下医院是通向死亡的入口的称号也就显得名副其实的了。

在有助于18世纪欧洲死亡率下降的诸因素中另一个常被提到的进步是卫生的提高——它也需要重新考虑。在公共用水供应和污水处理方面的进步不应该否认。不过，其进步仅限于城市人口，而且要付出代价，至少在英国是这样，它是以新工业中心肮脏的贫民区的增加为代价。不过即使我们可以【91】

---

① 为莱斯特·金（Lester S. King）所引用，《18世纪的医学界》（芝加哥，1958年），第142页。

② 参看莱斯特·金（Lester S. King）的前引书，第320页以下。

③ 医院的床位数到处都不够。例如，布鲁塞尔，拥有70 000个居民的城市在1776年却只有一家医院、77张床位。安特卫普和根特大约在同一时期分别拥有96张和69张医院床位供50 000个居民使用。参看保罗·博南方特（Paul Bonenfant）：《比利时旧制度下的穷困问题》（比利时皇家学院，《知识阶层与科学、道德和政治学术论文集》，第2辑，第35卷，1934年）。

承认，总的说来卫生条件提高了，但它对总死亡率的影响不应该高估。洁净的用水和专门的下水道，在减少像伤寒和痢疾等疾病的发生方面它们是功不可没的，但它们不能防止像斑疹伤寒、天花、白喉或结核这些同样是强力杀手的扩散。这些疾病中有一些已经被更讲究的个人卫生、更好的住房条件和更充足的营养所制止住了。但是我们还有关于这种全方位的进步更多的证据吗？其他一些因素像东英吉利（East Anglia）沼泽逐渐被排干，它将有助于“疟疾”（ague）在英国消失，[①] 或者 1751 年以后英国人所消费的酒精大幅度的下降，这些实际上对地区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有全面的影响；但是这种地区性死亡率的降低自然不能说明 18 世纪欧洲人口的普遍增长。而正是这种宏观的现象需要做出解释。

人口史的许多学者似乎都同意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是人口增长的首要原因；而且尽管统计数据不能做出结论，我们看不出有什么决定性理由会对这种观点提出挑战。事实上，当死亡率较高时（在 18 世纪确实如此），死亡率的下降本身而不是出生率上升是引起人口增长的强有力的因素。[②] 我们也许会争辩，正是最高点而不是停滞时期被降低了。换言之，并不是“正常”年份的死亡率的下降引起死亡率长期下降的趋势，而是“严重危机”被彻底解除引起的。首先是瘟疫的绝迹，其次是生存危机明显的减轻，[③] 它们似乎是预期寿命提高的主要原因，它们二者都是由农业的进步与销售和运输技术的提高所带来的。

饥馑和瘟疫并没有成为过去的事情：例如，18 世纪 30 年代末和 40 年代初，人们深受流行性感冒和斑疹伤寒还有大面积庄稼歉收（1740～1741 年）之苦，那时是大多数欧洲国家极度困苦的时期；而且 18 世纪 70 年代初【92】也是如此。不过，虽然这一时期死亡率大幅度上升，有时还超过了出生率，但死亡率再也没有达到**灾难性**的程度。即使死亡率达到 69‰和 112‰，这分别是挪威和瑞典的维尔姆兰德（Värmland）省记录的数据，还远远赶不上 17 世纪苦难的上半个世纪里欧洲一些地区所经历的惨状。正如古贝尔（M. Goubert）所评论的，“1741 年后，有大量的人口死去：死亡率降低到不

---

① 可以假设早期英国记录中的“寒颤”（ague）是疟疾（malaria），一些流行病学家对这种鉴定还有争议。

② 参看托马斯·麦考恩（Thomas McKeown）和布朗（R. G. Brown）：《有关 18 世纪英国人口变化的医学证据》，载《人口研究》，第 9 卷（1955 年），第 119～141 页，尤其是第 127 页以下。

③ 这种现象并没有逃过当时人的注意。“对它人们几乎没有怀疑”，马尔萨斯（Malthus）在他的《论说文二集》（第 7 版，人人文库，第 2 卷，第 261 页）中写道：“综观整个欧洲，上一世纪由于匮乏而产生的饥饿和疾病比以前的那些时代要少。”

相称的程度。”（生存危机不像上几个世纪，不再有瘟疫的幽灵产生，人们自然会有许多办法对付这种减少的现象）。

众所周知，由于饥饿和瘟疫对于年龄小的尤其严酷，因而可以有把握地得出结论：危机总体的减轻一定会对婴儿的死亡率产生积极的影响；生存下来的、占有相对高比例、进入生育年龄的人口不会不对出生率产生有利的影响。另一个必然结果应该引起注意。正像上面已经显示的（第 87 页以下），严重的危机不仅总是导致死亡率的上升，而且会引起怀孕和活产数量的大幅度减少。整个 18 世纪危机明显减轻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长期平均出生率。

既然有这些有利的条件，人们会惊奇地发现——我们拥有的十分零碎的数据允许我们做出判断——在 18 世纪欧洲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生率长期上升的例子，爱尔兰可能除外。事实上，瑞典、芬兰和挪威的资料，还有法国的间接资料都显示出，18 世纪中叶以后出生率小幅下降，它也许不仅是由结婚率的下降，而且还有生育率的下降造成的。布尔茹瓦·皮什特（M. Bourgeois-Pichat）假设，法国总的生育率在 18 世纪前半叶保持在稳定的 2.50% 左右，到 1771 ~ 1775 年下降到 2.35%，1801 ~ 1805 年下降到 2.00%。前面提到的（第 86 页以下）避孕法的普及是导致这种下降的主要原因。不仅法国求助于生育控制，对斯堪的纳维亚的资料所进行的人口分析也表明：在北部国家家庭规模限制在这一时期也具有相当的重要性。[①] 18 世纪瑞士当地的学者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②] 德国的有关资料也具有同一指向，前面已经引用过了。至于英国，鲍斯维尔（Boswell）的《伦敦日记》和其他一些资料都显示：尽管它的目的似乎主要是预防性的，都市里“行为放荡之人”对这种避孕套还是很熟悉的。 【93】

不过，欧洲人对他的生殖器官能进行有效控制这个结论则完全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在这一点上，正像预防和治疗医学领域，他只是在漫长的道路上迈出了踉跄的几步，这条道路将引导人们从必然王国走向一个相对自由的王国。

---

① 参看吉莱（H. Gille）：《18 世纪北欧国家的人口史》，载《人口研究》，第 3 卷（1949 ~ 1950 年），第 39、53 页，和古斯塔夫·乌特斯特勒姆（Gustaf Utterström）：《工业革命前瑞典的一些人口问题》，载《斯堪的纳维亚经济史评论》，第 2 卷（1954 年），第 159 页。与法国一样，在斯堪的纳维亚，尤其是瑞典东部，庄稼与怀孕数量的相关性非常强烈，1771 ~ 1772 年庄稼歉收后出生数目下降了大约 50%。

② 参看埃利斯·登茨勒（Alice Denzler）：《16 世纪中叶到 18 世纪末温特图尔市人口的变动》[温特图尔（winterthur），1940 年]，第 18 页；刘易斯·亨利（Louis Henry）：《古代日内瓦家庭》，载《人口》，第 11 卷，第 2 期（1956 年），第 334 ~ 338 页。

1.7 结　　论

如果前面章节中的论述能够完全正确地呈现出人口的长期发展趋势的话，当前一些有关人口史的观点就应该修正了。一种依然流行的观点认为：在重大革命之前欧洲的人口尽管有短期的剧烈波动，但它在相当长时期内还是保持稳定的，或者还有些微的增长，这种观点已经站不住脚了。有充足的证据显示：这些起伏是被附加到已被清晰认识到的“长期波动”上面。[①] 中高年龄段的长期与决定性的增长被 14 世纪一系列的灾难所打断，紧接着是几百年的人口减少。这一时期反过来为下一时期创造了条件，在面临重大灾难时欧洲许多国家再次获得了长期性的较高增长率，在这之后则是另一个苦难与停滞的世纪。

关于那两个循环上升时期的准确增长率不能确定。但它们的增长幅度可以准确地估算，它可以与工业革命早期阶段所观察到的相比，这是没有疑问的。在这层意义上，18 世纪的人口发展并不独特。出人预料的是这个事实：它的长期增长是从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开始的，而且它能保持，甚至在一段时间内还增强其势头。不像以前的时代，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增长没有被灾难【94】中断和扭转。当增长最终慢下来时，这是由于几百万人的个人选择使然，而不是由于天灾（Acts of God）。

欧洲人声称是他们部分地战胜了死亡的力量促使社会走上工业革命的轨道，这完全是他们自己的功劳，这是一种自负的表现。严格地强调外部因素的合作并没有贬低人们在工农业生产、交通和销售领域的成就。没有这些进步，还有同样突出的卫生和治疗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成就，人口的增长将很快被马尔萨斯式无情的力量的作用所证实。不过当说过这一切之后，啮齿动物中的生态革命，我们相信，它极大地有助于瘟疫在欧洲的绝迹，也应给予应有的评价：不仅在它有助于消灭导致死亡率上升的最大杀手这层意义上，而且也是在这层意义上：也许只有一个没有了生存恐惧和突然死亡所带来的物质与精神后果的社会才能获得高度的知识与技术进步，没有这些，人口的增长不可能得到维持。历史学家只能题上阿尔伯特·加缪（Albert Camus）愁【95】闷的话：“那些处于灾难之中的人们绝没有那么多自由”。

---

① 因而为了防止可能的误解，应该强调这个术语不能运用于产生波动的机制本身。

第二章

科学方法与技术进步

2.1　从中世纪到现代

一种观点认为，从中世纪以来一直比较缺少科学和技术进步。对这个曾经流行的观点，应该予以批评，这一点人们并没有多大异议。相反，人们现在很清楚：12 世纪之后的那段时期是一个科学技术迅速、持续发展的时期之一，甚至超越了黑死病这个人口和经济的严重危机。大学的兴起从智力上武装了自然科学研究中心，后者大都（但不是没有例外）建立在古代希腊人著作的基础之上。从技术上讲，对水能和风能的利用、纺织机械的采用和更有效率的冶金术（第 2 卷，第 408 ~ 413 页，第 458 ~ 469 页），再加上更近的一些发明像机械钟、指南针、黑色火药的普及预示着一个生产、贸易和福利的新时代。有必要清除中世纪晚期许多科学与医学的学说以便让现代观念和方法拥有它们的地位，而且要对中世纪工匠的习惯做法进行一番改造以使他们支持现代社会，这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在任何一种情况下，15 世纪末所取得的成就都要高于查理曼（Charlemagne）时代所通行的标准，正像它反过来要低于 19 世纪的科学与技术一样。没有这种中间阶段，17 世纪

的科学革命和 18 世纪的工业革命都不可能发生。

对这一事实的认识决定了我们最初的视野。因为把科学和技术所有基本的变革都归结于现代心灵前所未有的独创性，就像仅仅在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中寻找它们的起源一样，都会造成误解。像在经济生活中一样，在科学和技术中没有剧烈的过渡时期；它们的情况往往是：变革都是随着新工艺或观念证实它们自身的价值而逐渐发生的；中世纪的一些趋势得到壮大，而另一些则走向衰落。

不过，通常我们这种论述都要对新发明现象给予考虑，这是由于它是现[96]代早期西欧科学和技术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尽管它很少在思想或经济生活中以这种方式产生巨大的变化。中世纪与现代世界的性质之间逐步演变的一个基本方面将成为这一章的主要内容。它主要关心的是思想家与工艺者，或者用现代的术语说，科学家与技术专家之间的现存关系。通常人们轻易地假设：在中世纪，他们各自功能之间的脱节要为科学的贫乏和技术的粗糙负主要责任。根据这种观点，在现代，对这些功能之间密切关系与共同利益的正确评价促进了共同的进步。科学不再只是纯理论的，正像技术越来越强调进行严肃的研究一样。因此对技术的精通需要“纯”科学助一臂之力，而且它也是高效生产的必然要求，这已经成为现在的自明之理。这种观点的危险在于人们会认为它具有以下的含义：技术只有在科学指导的前提下才总是前进，而科学只有在受到技术需要的激励时才会进步。

过去肯定不是如此。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研究自然与为了人类的目的而控制自然之间的关系只是在极其有限的例子中得到承认，像在治疗疾病时关于药草效能知识的实用性一样。这种关系不是因纯粹的愚钝而被忽视，而是环境剥夺了它的真正价值。那时所形成的科学研究形式与混乱的传统工艺之间没有多少共同点，以至于它们各自的代表者之间的密切协作不会有任何益处。只有极少数的例外，像 15 世纪的天文学说应用于航海中需要有一个实用的科学过程的视野，或者从另一方面看，这时实际需要的视野提示着自然哲学家所能够尝试予以解决的问题。尽管直到 17 世纪才开始对贸易程序的系统描述，我们关于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的许多知识实际上都来源于学问高深之人对当时工艺的说明。尽管这些作者兴趣在这些事情上，但他们只是对工匠的方法做一个明白易懂的说明，这显示了这时思考与行动之间的距离。

因此，在科学与技术二者的关系中，在一个能够对另一个真正反思之前，需要一系列漫长的独立变化和发展的全过程。科学家要了解严格检验事[97]实、实验方法和在形成一般理论中严谨的重要性。只有当力学、物理学和化

学中有一个牢固的、详细的和实验的基础时，这些科学才能进一步明确技术方法。同样，一定规模的经济和技术组织必须在运用科学的机会到来之前就已组成。大规模生产的形成；对动力的需求、更多精密机械和更复杂的化学过程；竞争的效果和对国家自给自足的探求，所有这些都必须运转起来以为科学分析和技术的指导创造需求。这一时期科学与技术各自独立地发展着，直到这一时期末时，实验科学家才最后能够在一些方面为工业发明充当先导。在 18 世纪末，科学与技术开始建立有效的联系，但直到现在，它们各自的内部问题和内部发展远远比它们之间偶然的相互作用更有意义。

在知识的与经济的传统——前者产生了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后者产生了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之间，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区别。中世纪文明的进步，尤其是在科学与技术方面，极大地得益于对外界知识的吸收，而不是欧洲本土的发明。西方科学复兴的先决条件是得到古代拉丁文著作。这些著作部分可以直接从希腊得到，而更常见的是阿拉伯文译本。古代穆斯林哲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著作几乎具有同样的权威性。而且中世纪欧洲的许多伟大技术革新——风车、指南针和舵、印刷术、黑色火药制造法、纸、丝绸、镀锡陶瓷——也都是从伊斯兰教国家或拜占庭（Byzantium）进口的。其中一些艺术品都有从遥远的中华和印度文明传播而来的悠久历史。几乎直到现代初期，欧洲一直是技术上落后的地区，它的主要优势在于它能够采用和提高从更先进社会学习来的东西。水能的利用——起初是用于碾玉米，其后用于纺织工业的一些部门——是一个明显相反的例子。高效的水能磨玉米机是罗马人的发明。落锤、捣矿锤、波纹管等等都通过挺杆搭在垂直水轮上的轴运转起来，这些似乎是在中世纪的欧洲发明的，尽管它们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广为人知。

到了 16 世纪，情况正好相反。外部的传播与欧洲内部的传播相比就微不足道了，这种内部传播从具有熟练技术、最优秀传统和最富于创造发明的地区向着那些不发达地区进行。某些地区像意大利，极大地得益于它们过去邻近外国产品和技术传入欧洲的通道，因而相对于其他地区形成了他们的优势，他们有更丰富的自然资源或对创造发明有着更强烈兴趣。到了 17 世纪早期，西欧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占据了科学与技术方面的优势；这种优势不仅可以用科学文献的质量和生产规模来衡量，而且可以用伊斯兰教帝国的逐渐退却、欧洲商人对远东贸易的介入、他们在人口众多、文明悠久的印度与中国进行殖民冒险的成功来衡量。与西方的这种优势相关的政治和经济因素不在这里讨论，但造船和航海方面的优势在陆地与海上战争中的重要性是十 【98】

分明显的。

现代欧洲的经济优势在 19 世纪达到顶峰，它是建立在技术进步、因而也是建立在由吸收阶段向发明阶段过渡的基础上的，这是在中世纪末发生的事情。例如，东方殖民主义的昌盛正是与商品替代条金作为欧洲的出口物相一致。为了（取得）这种进步，主要的信用贷款被分配给一长串经验主义的发明者和企业家，他们包括了从 15 世纪几乎不为人知的先驱者到工业革命时期尽人皆知的人物。欧洲的技术是如何发生这样的变革的？其社会与经济动力将在别处讨论：这里只强调与之相关的一个因素。在比较有利的经济条件下，增加私人利益和提高国家威力的愿望都能通过机械的使用、劳动力的减少、单位生产规模的扩大来实现。这在 17 世纪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与此同时，也有一种不断增强的趋势：认为这样的技术进步只有通过长期系统的研究和努力才能获得。科学家和企业家等等共同认为推动技术进步是一件有价值的工作。尽管 19 世纪前技术很少直接得益于科学，它们的目标与方法也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但科学家的发现精神会在不同阶层的人们中间作为发明的精神得以再现。工业前进的步伐会因为认真的研究和实验而加快，却[99]不会因为偶然的智慧火花而加快。

2.2 16 世 纪

工农业都处于一系列技术和组织变化的最后阶段，这极大地影响了 14 世纪以来欧洲的经济生活。从经济上讲，对像价格上涨（部分是由于 15 世纪造船和航海的进步所造成的长远结果）、总人口尤其是城市人口的增长、在一些地区行会和隶农制的减弱等等现有社会问题进行缓慢解决，比任何技术创新都要重要得多，只有一个例外后面还要提到。16 世纪在技术发明方面是丰富的，现在都第一次记录在册了。但是，通常发明家都走传统路线并很少取得成功。列奥纳多·达·芬奇是其中一个著名例子，他像其他人一样，很少从当时的科学中汲取帮助或灵感。

技术从欧洲文明的中心向边缘传播一直是 16 世纪突出的特征。在印刷和雕版、纺织、陶器制造、造船和金属制品贸易中，北部的生产与南部的生产持平甚至超过了南部。铸铁业在 16 世纪早期就被引进到了英国，后来在 16 世纪末也被引进到了瑞典，它在改变与北部力量的平衡方面是一个里程碑。到了伊丽莎白王朝末期，英国的制铁业与对出口贸易的政治限制展开了

斗争，并且在物质基础上极大地增强了国家的海上力量。同样典型的还有英国从德国引进了铜矿和锌矿的开采技术，以及铜和黄铜的熔炼和铸造努力，只是没有取得多大成功。在中美洲，西班牙殖民者通过采用欧洲的技术，极大地提高了稀有金属的产量，尤其是在波托西（Potosi，1545 年）开发之后，在那里人们发明了通过使碾碎的矿砂混入汞来提取白银的新方法。[1] 也许技术的传播对国家经济影响最显著的例子在联合省（the United Provinces）可以看到。当荷兰极大地依赖他们的渔业和航运业的时候［西印度群岛（Indies）采用了伊比利亚（Iberian）的航海技术］，他们的农业却越来越依赖排灌工程。他们的奢侈制品——书籍、镀锡陶瓷［代尔夫特（Delft）钙质精陶］、精致的金属制品——在海外都很有销路。因而，对显著技术进步的传播而不是当地的发明加强了欧洲北部沿海地区在政治上和地理上的优势。【100】

这种传播显然得到一种新出现的技术文献的帮助，尽管很难详细地评估它的影响。有许多书籍都是为工匠而写，其中一些拥有广泛的读者。关于耕作的那些书继承了中世纪的传统——农民的日历和类似的读物——人们对它们兴趣不大。关于纺织和造船的书籍出版得不多：它们的出版在 17 世纪才繁荣起来。人们最感兴趣的是关于化学与烟火制造术的大套系列丛书，以布伦什维格（Brunschwig）的《蒸馏法》（*Liber de Arte distillandi*，1500 年）为发端。蒸馏法已经是小工业的基础，其重要性随着各种语言出版物的出现而增强。在德国也出版了《采矿》（*Bergbuchlein*，1505 年）和《试金》（*Probierbuchlein*、大约在 1510 年），以及关于开矿和贵金属加工的实用手册。这些主题在三部经典著作中得到极大的发展——比林古西沃（*Biringuccio*）的《烟火制造术》（*Pirotechnia*，1540 年）、阿格里科拉（*Agricola*）的《金属学》（*de re metallica*，1556 年）和拉扎勒斯·艾克尔（*Lazarus Ercker*）的《论矿石和试金》（1576 年）。比林古西沃的书除此之外还提供了普通金属（尤其是青铜熔制术）熔炼和制作、玻璃、火炮和黑色火药制造的大量信息。阿格里科拉对在德国南部矿区使用的各种技术进行了十分全面的描绘。他详细描述和说明了用以扬起泥土和砂石、排水和为矿井通风并且以牲畜或水能为动力的大型机械；描述了准备无机酸和其他试剂的工作；描述了破碎机、洗涤器、熔炉、金属加工工业的熔化和精炼车间；还描述了许多生产的辅助过程。

---

① 银的汞齐化过程被比林古西沃（Biringuccio，1540 年）描述，但在欧洲直到两个世纪以后才被应用。

显然印刷所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这个过程，地方工业的既有方法和成功发明所带来的新技术一般都能变成印刷品，这样就不必去完成一个 16 世纪技术文献的详细索引了。自然，需要最高技巧的奢侈品行业——而且它无疑提供着最大的利润——是那些最常讨论的对象。比如说，帕利西（Palissy）在关于陶器的著作中，切利尼（Cellini）在有关金属制品的著作中和内里（Neri）在关于玻璃的著作（1612 年）中所论述的就是这种行业技术，而在描述精纺、编织或造船的一般方法中迄今很少论述这方面的内容。一些大型专门化产业像意大利的丝绸纺织，也许在一段时间内还要对他们的方法采取保密措施。不过，能与也许对业余爱好者比对手艺人更有吸引力的这些书相比的必定是那些关于大炮和设防方面的实用丛书和其他一些文献关于河流控[101] 制和人工排灌的书以及关于制图和航海方面的诸多材料（将在以后提到）。

在那些努力改进而不是编纂当时最好的技术实践的作者中，他们的机械化冲动是十分明显的。例如在列奥纳多那里，尽管他的发明也许根本没有什么影响，但人们不仅看到什么技术问题呈现在一位具有相当高的科学和机械见识、甚至可以说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才的面前，而且还能看到他试图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强烈主张利用自然能量，替代适合大规模生产的人力机器。最终机器会比人廉价这一原理在意大利得到了很好的领悟，而且在丝织业和威尼斯的兵工厂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列奥纳多的设计显示了通过机器部件——轮子、控制杆、凸轮、螺旋桨等等——的运转来替代人工操作的高度技巧，这种技巧在现代一直得到应用。它好像引人注目地再现于拉梅利（Ramelli）、贝森（Besson）和宗卡（Zonca）的《剧院机械》里。[①] 这样的图书无疑更多地阐明了一种希望而不是现实：纺织业、木材加工业、螺纹切削、抽水、研磨、碾碎、钻孔工作的动力化和机械化。一种更具空想性质的机械技能也在“自然魔术师”［其中吉姆白普提斯塔·代拉·波塔（Giambaptista della Porta）是最有名的一位］中间出现，他们发明自动机和其他令人惊奇的事物，部分是吸收了来自于亚历山大的英雄（Hero of Alexandria）的那种被恢复的传统。对于列奥纳多，所有这些新发明的影响微不足道，促成其发明的雄心也并不新鲜（军用“坦克”、轮船、自动旋转装置和其他许多发明早在 14 世纪就已被描述过了），但它们显示出（比过去要有把握的多）开发新经济机会的一种新途径。

---

① 拉梅利（A. Ramelli）：《各种人工机械》，1588 年；贝森（J. Besson）：《拥有精密和机械器具的剧院》，1579 年；宗卡（V. Zonca）：《拥有建筑和机械的新剧院》，1607 年。

即使对这些关于工业技术，特别是描述各种已成形的做法和用途不同的新发明的书籍进行粗略调查也会使人们感到惊奇：技术的总体进步尤其是对动力机械的利用进展得并不特别迅速。18 世纪工业革命的机械精神在 17 世纪已经初露端倪，只是它们当时由于许多技术和经济的原因遭到挫折。通常制造的“秘密”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染布、鞣革、给金属淬火或提高农作物产量的自吹自擂的秘方都只是建立在迷信和谬误之上的。因而传统的做法【102】还在继续，甚至（像在鞣革业）持续到近代。精密的机械常常难以操作，或者至少产生的经济效益较少——而且 16 世纪是一个实际工资下降的时代。顽固的偏见和利益挡在革新的道路中间。或早或晚工匠就会表达他们对技术性失业的恐惧，重商主义国家有时对他们的抱怨很敏感。这种恐惧促使威廉·李（William Lee）——针织机身（1589 年）的发明人，当他在家乡遭到拒绝时，在亨利四世（Henry IV）的资助之下在鲁昂（Rouen）建立（工厂）。在法国国王去世之后，新工业几乎崩溃，它在面对手工编织工人敌意的情况下才又慢慢有了一定基础。当发明者在不断扼腕叹息之时，拥有资本的人是不愿意投资到未经试验的新兴产业上去，这无疑是真实的。考虑到专利保护的不确定性、工人的不熟练和缺少区分空想的发明与实用性发明的标准，他们的犹豫是可以理解的。

关于生产的机械化，这里有两个技术因素在起作用。其一是能量，其二是物质。16 世纪和纽康门（Newcomen）时代之前的技术人员惟一可用的原动力是人、畜、风和水。供养人和畜费用高昂，而且单个人或畜的最大能量也十分有限。以风和水作动力的机器也是费用高昂，但运转费用低；因此当需要接连不断地工作时，像在抽水中它们是十分理想的选择。单位可获得能量大约是 5~20 马力也是比较高的。出于这些原因，有一种尽可能利用自然能量的趋势，但是这种趋势受到限制，因为在最需要它的城镇和港口，却难以获得它。在对能量的需求很小，或者只是间断需要的地方，机器运转的高成本被认为是不经济的。在要求付出公共的努力和大量资本费用的地方（像在土地浇灌中），在需求极大而且是持续不断的地方（城镇的用水供应），或者由于其他原因产业规模扩大的地方（像铸铁厂），机械的使用才是正当的。工业单位的规模既由经济条件决定，又由技术因素决定，只是在有些情况下，对自然能源的利用的限制才是技术性的。其中之一是矿井的排水，即使是一台 20 匹马力的水车配上两台低效的泵，很快就不堪重负，增强这个系统的困难可以想像。城镇用水供应同样如此，小规模上可以充分解决的问题，当城市人口成万成万地增加时，随着其重要性的不断增强，问题【103】

的解决就成为不可能的了。

因而通常有一个对技术人员不利的规模效应；他（所发明的）利用自然能量的机械因其相对不可改变，使它们不善于应对大问题，对小的生产者而言又太大了。另一种不同的规模效应应用于机械自身和任何一种建造工程，包括造船。这里的问题在于要实实在在地以一定成本建造有一定经济容量和能使用适当时期的、有足够力量的机器、桥梁或船只。它部分地取决于对材料进行加工的现有技术，甚至更依赖于材料本身的特性。石和砖太重难以运输，加工起来费力，抗张强度低。通常难以搞到足够尺寸的木材，而且这些木材抗腐蚀和抗磨损性能差，在一定的张力条件下会弯曲或折断。金属是更为理想的建筑材料，它们在坚韧性和不易磨损性方面有很大程度的变化，因此人们制造出金属部件以抗磨损。金属还有很高的抗张强度，一些加工方法像浇铸都非常经济。困难在于得到金属，尤其是价廉而充足的钢铁。对技术进步而言，存在着某种长期性的阻碍因素，它首先在 15 世纪鼓风炉的发明后减弱，其次为 18 世纪冶金术的革新而减弱。

结果是很容易得到评价的。道路和桥梁都很糟糕；宽敞、高大的厂房艰难地建立起来（在英国修道院解散之后把它们的建筑转作纺织业之用的可能性不能低估）。大船，它的船体是用相当坚固的木材建成，由于它们的容量与排水量的低比例，因而它们的建造很不经济。各种机器，甚至工业不太急需的——管子、大桶、矿车和铁路，还有锅炉——都是用木料做的，经常要更新，也极其粗陋。出于对强度的考虑，结构性的和移动的部件都是用大块木材做的，因为摩擦很快就产生磨损；用木材做的部件与用金属做的部件在精确度上相比就差多了。在 200 年后铁的世纪开始时，许多机械化的观念涌现出来，而使用木材的技术 16 世纪还认为它们是不切实际的。

早已有信号显示：木材王国作为人类表现独创性的首选材料的时代即将结束。用于家庭（和一些产业）的目的，它将会被玻璃、陶器和金属（青铜、白镴、铸铁）所取代。铸铁作为一种建筑材料并没有直接的价值，部分是由于它易碎，部分是由于特别巨大的铸铁人们不能制造。大部分来自高【104】炉的铸铁还要经过反复的锤打和加热，以使其成为使用量稳步上升的熟铁。木钉在建筑中让位于铁制的螺栓、螺丝钉和铁钉；木制轴承为铁制的代替。锁匠和时钟制造这两个铁制品加工的行业特别有趣，它们把工程技艺提升到更高的水平。二者都是来源于铁匠。工具和技艺向专业化发展产生了不同等级的精密度和灵巧度，生产了精密的座钟、手表和那个时代的柜锁。在对锤子、凿子、锉刀和钻孔器（它们后来被用于更为基本的目的）的熟练运用

方面，当时没有哪个产品能与这些产品相比。

煤作为燃料代替了木材，它在经济上具有最大的重要性，尽管这种改变仅限于英国和法国北部。煤的使用并不新鲜，它的被广泛使用只是因为木材太少。人口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加大了对燃料供应的压力，不仅是对家庭供暖和金属加工，而且对像煮盐、制砖、酿酒、染色和玻璃制造也是如此。随着农业向林地和荒地的类似扩展，压力在增加，在一些冶炼繁荣的特殊地区［威尔德（Weald）、迪恩森林（Forest of Dean）、康沃尔（Cornwall）］燃料的缺乏是很严重的。造船厂为了得到适宜密度的木材同样被迫向更远处延伸。它的价格要远远高于一般水平。诺森伯兰郡（Northumberland）的煤是廉价的替代燃料，尽管要海运到林恩（Lynn）和沼泽地带的河流、到泰晤士河（Thames）和伦敦、到英国南部和法国北部海岸。它能很轻易地应用到对大桶和锅炉的加热及其他方面，像烧砖和铁匠的工作，在它的有害成分中硫是主要的，但并不是太严重。煤在熔炉中的使用不是太容易，在那里原材料很容易受到燃烧物的污染；在玻璃制造中它的使用是通过把"金属"放在盖起来的锅中和对熔炉的重新设计来完成的。显然，人们一直非常渴望把煤运用于冶炼、尤其是铁的冶炼（对燃料的消耗比金属的产量要重好几倍），但是17世纪的发明家一直没有发现其中的奥秘，尽管有许多充满希望的发明，包括对燃料的加料（charking）。即使是在亚伯拉罕·达比（Abraham Darby，1709年）的成功之后，瑞典从纯铁砂中用炭冶炼的铁一直比英国矿煤冶炼的廉价的铁要优质一些。

这种燃料改变的结果被称作"早期英国的工业革命"。从经济学术语来看，这个称号并不是不正当的，因为否则英国工业几乎不能有发展。热处理【105】的降价还有许多衍生的结果，因为随着降价而来的许多措施（例如，焙烧、洗涤、溶解和结晶）都倾向于改进产品（如果必然达到节约的目的），紧跟而来的就是市场和生产规模的扩大。煤的使用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煤被采出的矿井。但同时应该记住：仅仅以一种燃料替代另一种燃料通常对技术方法只能产生很小的效果——实际上，只有在现有的技术能够轻易进行改进的地方煤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

到目前为止，工匠和企业家占据着画面的中心；尽管他们心灵手巧、有创造力和富有抱负，他们的努力却囿于传统并为缺乏指导的经验主义所支配。他们既不想认识他们的问题，也不想得到解决他们问题的理论见解。他们的书籍都是实用性的。不过科学的背景开始出现在他们的活动中。科学和技术的边缘正开始朝向一种更加有用的目的部分重合。

文艺复兴，回到古典主义，对训练自然哲学家在社会中去充当不那么热衷纯思索性的角色所产生的影响不大。16 世纪科学领域中的两项伟大成就，哥白尼（Copernicus）的新天文学和维萨里（Vesalius）给予完善的新解剖学，同样属于纯知识领域。它们不会有直接的用途，尽管它们在将来会产生有用的事物。在科学更加实用的学科中——机械学、物理学和化学——没有出现新原理来改变技术实践；相反，正像下一部分会显示的，其反面的影响会更重要。

医学史提供了一个科学知识不足以解决社会和经济发展中所产生的问题的突出例子。内科医生和外科医师要面对人们对他们的技能所提出的许多新要求，最初他们只是通过古人学说中的非常教条的自信来做出反应。城镇的成长使市民们更加亲密地挤在一起。不卫生的郊区出现了，河和井被弄脏了，卫生规则弃置不顾了。为瘟疫、斑疹伤寒、霍乱和天花的传播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市民的食物与农村人相比也可能更为缺乏，因为食物从遥远的地方运来，肯定不会多么卫生。社团管理的松懈使犯罪的倾向不受抑制地增强。

16 世纪和 17 世纪的战争也使当时医疗用品奇缺。主要战役的结局可能[106]为瘟疫的发作所决定，正像为战斗的运气所决定一样。在 1528 年那不勒斯对劳特累克（Lautrec）的围攻中就发生了这种情况。由于大部队都充实了兵力，战斗延长到了冬季，所以有瘟疫发作和军事组织崩溃的极大可能性。更具杀伤力的火炮被装备上了，军队都用手枪武装，大批的市民都陷入了战争的恐怖之中。直接死于炮火的人数比死于疾病的人数，或者由伤口没很好处置引起感染而死亡的人数要少得多。

水兵几乎并不比陆军士兵更幸运。一种新病症——坏血病与海上扩张史紧密相关。在葡萄牙人环球航行到非洲之前，在所有的航海史上都找不到任何关于它的蛛丝马迹，毫无疑问，是因为船上几乎从不缺少新鲜食物。中世纪的全部人口都患有轻微的维生素缺乏症，但这种恶性的、高死亡率的坏血病成为航海的常见的可怕病症还是比较新鲜的。它所产生的直接结果是航海者需要在公海中寻找平稳的风。如果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没有驶离大陆并驶入信风的话，他就永远不能到达印度。他在海上滞留了 4 个月，他的大多数船员都死了；哥伦布（Columbus）在经过 5 周的航行后，船员们都依然健康。当英国和荷兰的船只进行类似的航行时，他们都饱受同样的折磨。由于在这些漫长的航行中食物和水都很快变质，因此自然把坏血病的发生归因于饮食的恶劣，而不认为是因为缺乏水果和蔬菜造成的。对海

员和冒险家来说，像黄热病和霍乱这些热带病很少是致命的，因此陆地也不比海洋健康多少。

一种新疾病似乎不知从何处侵入。在15世纪末梅毒被首次描述；据说它是由查理八世（Charles VIII）的军队带入意大利的。成批的小册子在为这种新的医疗怪物喝彩，在30年中它传播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成为医疗实践中一种常见病症。这种疾病被普遍认为是由哥伦布的随从从西印度群岛带入的——尽管从未被证实，但这种意见依然受到支持。通常用愈疮木（*guaiacum*）来治疗，这大概是上天为新世界的灾祸提供的一种治疗药物。

医生治疗这种疾病的方法基本上还是传统的。关于它的症状、起因和治疗的知识来源于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和盖仑（Galen），治疗的药理学是来源于迪奥斯科里斯（Dioscorides）的《药物论》（*Materia medica*）。尽管有医院——也许并不比那些中世纪城市医院的管理更混乱和人员更缺乏——但没有研究新旧医疗问题的机构。这些内科或外科医生只得自己单独尽【107】力去解决。16世纪的医疗人员比他们的前辈处于更为有利的位置，他们可以采用好几种方式。他可以广泛地查阅有关书籍，由于印刷机的出现使古典文献、文艺复兴的新著让人们唾手可得。帕拉切尔苏斯（Paracelsus，大约1493～1541年）所代表的对传统学说进行攻击的学派发现用化学方法制作的药物；在这些药物中多数都没有什么价值，有一些甚至是有害的，像硫酸和砒霜，但其他一些相当成功，像用汞来治疗梅毒。琼·费奈尔（Jean Fernel，1497～1558年）和其他人所表现出来的更为理性的世界观使医疗教育也有了一些进步。在维萨里（Vesalius，1514～1564年）手中成为一门精密学科的解剖学启发了新一代的外科医生的工作。安布罗斯·帕雷（Ambroise Paré，1510～1590年）尽管背离了许多已经确立的实践，但他赢得了极大的尊敬，他的生涯说明了医生在专业知识和社会地位方面的缓慢提高，药剂师也是如此。而且即使内科医生为偏见所阻碍——正像他对静脉切开放血术和清洗的效力过分依赖一样——人们还是看到，在医生的传统中有慈善的因素。疾病是由腐败食物和污浊空气所引起的观念是不正确的，但想要提高卫生水平的改革者所采取的措施显然是有益的。

不过医疗专业是否能坚守住并与不断增大的绝大多数人们的生命危险的社会趋势相抗衡，这还是一个问题。当得病的机会大大增加时，个别患者在医疗护理下也许有更多的生存机会已变得无足轻重。有两个原因造成了社会医疗保障的薄弱，首先，自然是纯粹的无知。几乎没有理性的生理学，对产生疾病的生物体一无所知，药理学的知识和外科医生少得可怜。其次，公共

管理的软弱无能或冷漠助长了人们对反复宣传的基本原理的忽视——在许多情况下原理成了虽记在心却未被遵守的规则。为保持街道清洁和供应质量完好的食品所制定的条例没有得到贯彻；社会也没能为军队、船只和监狱组织及时的供应，或者提供完善的医疗服务。总之，当局对预防医学的警告几乎置若罔闻（在实际工作中），当然瘟疫发作期间除外，这些都对公共健康造成极大的损害。因为在这 3 个世纪中欧洲各地都有医疗改革者，像一些被忽视的技术发明者一样，他们要求加强对常识性卫生原理的宣传，这些原理即便只是拥有他们时代的残缺知识的人也可以领会。人们长期匍匐于坏血病的【108】淫威下——尽管多吃新鲜水果、蔬菜，这些具体的预防措施在 16 世纪已经为人们所注意——本身就是一个专业性的迟钝加上官方的冷淡会抑制医疗进步的突出例子。

政府与科学家在发展航运的共同兴趣的另一方面是航海（在这一个词更为准确的意义上说的）。这一方面在 16 世纪是非常成功的，因为这一世纪的数学要比当时的医学完备得多。有一个听众渴望学习关于数字的深奥艺术，这是初级手册中肯定要出现的内容，也出现在数学教师的高级班中，它自然要更多地涉及实用的主题。初级计算的书以各种主要的语言出版，其例题常常是关于贸易、交易和商业计算的；中世纪的商人更习惯于用机械器具像算盘。第一本这类英语著作是大主教顿斯塔尔（Archbishop Tunstall）的《计算术》（1552 年）；[1] 许多早期关于商业算术的书籍都是自列奥纳多·皮萨（Leonard of Pisa，约 1170 ~ 约 1250 年）以后写的，尤其是在意大利写的。它们为了共同的生活目的确定用“阿拉伯数字”代替了罗马数字。在 16 世纪后半叶出现一些涵盖范围更广的书开始探讨代数和几何。

对几何的理解是航海术、制图学和测量学的必备基础。葡萄牙人 15 世纪在向犹太和阿拉伯大师们（他们的知识间接来源于希腊数学家）学习之后，将天文学与制图学的技巧融为一体，它将使首次对非洲的海岸探险和其后对印度群岛的远航成为可能。这种新型的科学航行依赖于对星盘或前标尺、罗盘和测程索的运用，利用它们以经纬度确定方位。运用同样的坐标把地图扩展到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地区。航海是完全不同于领航、测深、测标和潮标的老技巧。想在没有出海经历的情况下饱享航海的妙处是徒劳的。

科学航海的观念和方法最初是由有实践经验的水手，像哥伦布和卡伯特

---

① 在无名氏的《用笔计算入门》（1537 年）和罗伯特·瑞科德（Robert Recorde）的著作之后。

(Cabot) 传播开来的；但是，一些有学问的人像数学家和天文学家马丁·贝海姆（Martin Behaim)、赫玛·弗里修斯（Gemma Frisius）和约翰·迪(John Dee) 也很快着手解决不可避免的困难。既有实践的也有理论上的困难。实践问题包括设计一个适用于海上的天文器具；测量航行距离的工具；使海图、表格和航向简单化的东西。数学家主要关心的理论问题更加不易解 [109] 决。16 世纪和 17 世纪航海中最成问题的地方是用测程器和罗盘来推算船位，还有标识的识别，它的位置被认为是准确地（但实际上常常是不正确的）标在海图上了。用时间测算或用太阳距离的方法确定经度的原理是广为人知的，但要把它们运用于实际当中就不成功了。磁罗盘给人带来的困惑也并不少。从正北方得出磁北的方法也是尽人皆知；罗盘制造者把磁针固定在标度板上，以使它在被制造的地方指向（事先确定的）正北方。因而，来源于德国和葡萄牙的罗盘并不能相互一致；也没有罗盘在遥远的水域指向正北方。那种错误的观念［在其他许多人中，塞巴斯蒂安·卡伯特（Sebastian Cabot）和琼·罗兹（Jean Rotz）也怀有这种信念］，即认为在世界各地罗盘上的磁北与正北方的偏差只是一种简单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船的位置可以确定，这种观念只是慢慢地才被放弃。许多地磁学的研究都是来源于拓荒者威廉·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的经典著作《磁性》（1600 年），在罗盘对海员的广泛用途被认识之前这本书是需要的。而且，航海者在从太阳和星星（一般总是前者）的高度得到它的纬度时，他需要准确的天文表格和简单的方法来检验他的观察（这里应该注意到：哥白尼的天文学理论革命在提高这样表格准确性的作用上是微不足道的）。自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 1546～1601 年）以来，测定星星的位置一直是天文学家工作的重要部分，巴黎观测站（1666 年）和格林威治（Greenwich）观测台的建立与这种测定密切相关。

仅仅确定一艘船的位置没有多大价值，除非能够在海图上准确地标出来，通过它可以画出适当的航线。至于宇宙志研究者——彼得·埃派因(Peter Apian, 1492～1552 年)、塞巴斯蒂安·明斯特尔（Sebastian Münster, 1489～1552 年)，尤其是亚伯拉罕·奥尔特琉斯（Abraham Ortelius, 1527～1598 年）——等人的地图是建立在对探险者报告批评性评价基础上的，这里寄托着沉重的责任。对海员来讲，制图信息的价值极大地取决于用于展示它的投影的类型，这里所取得的主要进展是墨卡托投影（Mercator's projec-

tion, 1569 年)。[1] 在 16 世纪航海这种新科学真正成为国际性的，它是数学家与航海家在欧洲各个地方合作的结果。相应地，有许多出版物专门探讨地【110】理学和制图学、航海和船舶驾驶术的关系，既有独创性的，也有模仿别人的。后一类书中最有影响的是马丁·科尔特斯（Martin Cortes）的《环球航海技术简编》（*Breve Compendio de la Sphera y de la Arte de Navegar*, 1551 年），其后许多作者都有所借鉴。里查德·艾登（Richard Eden）在 1561 年把它译成英语。

在早期科学探索史上——地形学与制图学是有区别的——由于科学问题与航海中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样的，许多类似的名称一再出现。用三角学来测量高度与距离的方法有无数的学者尝试过。因为三角学的方法对平面和垂直面的角度的准确测量是必不可少的，因而许多新工具的发明都得到鼓励和促进，其中有第一个经纬仪的雏形［瓦尔德泽缪勒（Waldseemüller），1512 年；迪格斯（Digges），1571 年］。研究工具，连同几何学中使用的其他器具都在第一批综合手册中得到详细的描述，像奥龙塞·凡埃（Oronce Finé）的《几何习题》（1556 年）、明斯特尔（Münster）的《数学基本原理》（1551 年）和盖洛西（Gallucci）的《使用不同工具的工厂》（*Della fabrica et uso de diverse stromenti*, 1597 年）。更为直接的研究方法是测链和平板仪的运用，这也是专业地产测量员常用的方法。科学研究和测平的实际用途是多种多样的，也是重要的。除了绘制第一批满足需要的地区地图外（1600 年尚在进行中的任务），测地员还得准备地产和城镇的地图、排水项目、港口工作和开挖运河项目的计划。他的技艺是为了充分地满足军事的需要，尤其与防御区在地理上的扩展相联系。有许多揭示数学对军事指挥者意义的书出版，它们又主要来源于先驱者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的著作《论战争艺术》（*Dell' Arte della Guerra*, 1521 年）和塔尔塔利亚（Tartaglia）的《新科学》（*La Nova scientia*, 1537 年）。

从所有这些可以判断：科学对技术，乃至对欧洲经济生活的影响迄今为止还不是很重要的。医疗专业的伟大学术成就对死亡率和瘟疫的发作影响甚微；物理学、机械学和化学方面的革新仅仅触及了基本生产部门——农业、纺织业、建筑业、矿业和金属加工业的工人们。精通数学却又热爱航海和军事科学这种更为引人注目的人才在欧洲商业和战争史上几乎没有看到。科学家实际上很少有机会把他的专业知识教授给实际工作者，从对工匠、水手和枪手愚钝无知的许多痛惜中可以看出，似乎实际工作者也不想去学。许多科

---

[1] 这种投影的数学理论由爱德华·怀特（Edward Wright）在 1599 年首次详述。

学活动的学究式的高傲，古代观念的固执的寂静，与浓厚的迷信和神秘主义因素的混合——炼金术和占星术保持甚至强调他们受到特别关注的权力——是对先驱者努力的严重阻碍，而正是这些先驱者们在数学、物理学或医学中竭力探索使实用技术进步的锁钥。当对它的实用性进行证明时，科学见解的 [111] 不确定性，相互矛盾学说的广泛存在和如此之多有把握的提议在实践中的失败都成了科学有限性的见证和实际工作者对它的价值怀疑的根据。不过，学术是物质文明得以提高的一个工具，这种论述是给予肯定的，在一定的情况下它还是完全不可缺少的。

2.3　培根、伽利略和笛卡儿的时代（1600～1640年）

“科学的真正和法定目标不外如此”，弗兰西斯·培根写道：“即用新发现和新能量来提高人类的生活。”[①] 尽管不应该认为这是培根对科学研究态度的概括，但这一句引人注目的话是17世纪对科学功能认识主要倾向的集中体现。虽然强调的程度各有不同，但培根的同时代人和后来者都表达了同样的意见。早在中世纪就有人极力主张为了它对社会的潜在效用而发展科学，其中罗杰·培根（Roger Bacon）的表达最为清楚。不过，即使是在现代早期，科学的实用性也很少得到体现，就像对耕种和制造这种普通过程的明智改进之类。人们希望，科学能够传给人类对那种想像中的自然神秘力量的支配能力，因而使科学成为自然和法定的魔术师——不仅是一位高级技师。因此科学是有用的这种陈述过去一直为、现在有时还在为被信以为真的假科学的实用性最清晰地阐明。17世纪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把这种陈述——变得越来越可疑——与下面这种信念区分开来：在自然科学与人类常见的技能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联系。科学家关于自然过程的有条理的理论和试验研究更应该被认为是与工匠对其中一些过程的零星探索是完全一致的。自然规律，如果它们能为科学所发现，一定会在实验室和作坊同样适用。当人们认识了它们时手工艺人的工作会因为对它们的认真遵守而大有提高。

关于科学与技术之间关系的观点还有另一面。如果应该由科学家获得对自然界（有机的和无机的）彻底的认识（它会极大地提高人类控制环境的 [112]

---

① 《新工具》，第2卷，第1章，第31页。

能力），那么人们会认识到，在科学知识还不完备的情况下工匠的实际经验在许多方面还提供着对自然更为基本的了解。工程师和金属加工工人每日都在证明哲学家不能解释的技术的价值，都会遇到他不能了解的新现象，并使他没有任何贡献的革新产生效用。因此培根以罗盘、黑色火药和印刷术的发明为例，似乎意在说明在过去几百年里学术对物质文明没有任何贡献可言；一切实用方面的进步都是由无学识的、缺乏指导的工匠取得的。正如伽利略在谈到威尼斯兵工厂熟练工人时所说：

> 和他们讨论常常会在对某些效果的探索方面帮助我，不仅包括那些显著的，而且包括其他一些隐秘的和几乎不可思议的。有时我也被引入思想的混乱状态，使我陷入解释某些事物的绝望境地，这些事物我不能说明，但我的感觉告诉我确实如此。[1]

遵从培根的传统，同样的言论在玻意耳（Boyle）的《实验自然哲学的实用性》（1663 年，1671 年）中得到了详细阐述。总的说来，他们的意思是：工艺技巧不仅限于对那些赖以为生的人有利益，它还是人类知识的一个重要分支。这就是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贸易史的编纂者的态度，他们也是《百科全书》的编纂者。

然而，在对科学的学术孤立的双重攻击效果进行评估时得分外小心，因为如果得出 17 世纪科学的突飞猛进完全归因于把抽象问题与实用问题分开，或者工业革命只是应用科学的产物的结论都是错误的。科学成为实验性的，但并不是通过努力去解决技术问题来实现的；实际上，对头脑简单的人来讲，哲学家通过对空气重量的研究和对虱的解剖来为他的实用性的声明辩护，这一景象适合作喜剧的主题。现代科学的方法在使其问题远离日常生活需要方面是它的第一个伟大胜利，这种胜利似乎会使那些人的断言落空：他们通过夸大它眼前的实用性来提高公众对“新兴实验哲学”的兴趣。

因为尽管在与亚里士多德的正统学说的斗争中，宣称一门关于现实事物【113】的科学（它是建立在坚实的实验和完美的数学推理基础上的）一定是实用知识丰富的源泉，这是有利的，它与学院空洞的学问恰成对照，但从理论到应用于实践这一步骤常常比想像的更为困难。即使像伽利略的著作《关于两种新科学的谈话与论证》（*Discorsi e dimostrazione intorno a due nuove scienze*，1638 年）在这方面也误入歧途。伽利略新科学的第一门研究材料的强

---

[1] 《关于两种新科学的对话》［由科鲁（H. Crew）和德·萨尔维奥（A. de Salvio）翻译，纽约 1914 年］，第 1 篇。这个演讲是通过萨戈雷多（Sagredo）之口发表的。

度，现在构成工程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伽利略的讨论是非常有趣的拓荒之作，但它是极其不完善的，有的地方甚至是错误的。对从事实际工作的建筑师来说价值不大，而且事实上其主题，尽管是一系列才华横溢的数学分析的结果，却几乎完全脱离直到19世纪的工程实际。其次，伽利略对第二门新科学——力学的贡献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他认为，从他首次确切阐明的原理到像计算大炮射程这样一个实际任务只是轻而易举的一步。从数学上讲，在承认一定的假设的条件下他是正确的；但是试图遵照伽利略的步骤的炮手就走上歧途了，因为其假设被实际情况破坏了。在许多其他情况下想从新发现的科学原理受益的尝试，不是被原理自身的不足挫败，就是被它不能解决偶然出现的问题而挫败。在解决这些问题时，18世纪实用发明家起着无法估量的作用，正像在天文钟的问题上一样。

而且，如果说至少自阿基米德时代起，在机械学中就存在着被认识到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与在17世纪前半叶就取得显著进步的其他学科截然不同。例如，在威廉·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的《磁力》中，他并不主要关心在航海时罗盘使用中所出现的问题，而16世纪它会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他意味深长地求助于实验方法；他为对有磁性物体（包括地球自身）的特性进行真实的阐明投入了很大的心力；而且他提出了第一个地磁学理论。但是很显然他是以一个自然哲学家的身份来从事这一任务的，因为对磁力的发现作为一个宏观的宇宙原理（吉尔伯特通过它来证明他对哥白尼理论的支持）代表了这一工作的最高成就。不过，他相信从一个磁偏针的偏斜度可以确定纬度，他希望这个发现能够被证实对海员有用。几乎同时代的、更值得庆祝的哈维（Harvey）和开普勒（Kepler）的发现都不为繁忙的世界所注意。血液循环理论是对盖仑（Galenic）生理学的第一次重要的冲击，但它并没有马上消除盖仑的著作在医学院的影响。哈维在医学实验和观察方法的进一步发展被长期地延迟了。开普勒的天文学，加上它的关于天体之间引力的新奇观念和它们运动的新数学公式都被如此严重地低估了，直到它被牛顿的万有引力体系所证实时为止，以至于当时它对与实际需要相关的天文学的那些领域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开普勒曾梦想过会产生如此的影响；相反，他的世界观是完全数学的、哲学的和神秘主义的。他的抱负是揭示天空中上帝设计的和谐完美，而不是为人类的目的而征服它们。【114】

因此即使当新一代的自然哲学家不再无所顾忌地用化学实验室的木炭和封泥来弄脏他们的手、磨他们自己的望远镜镜片、收集有关突出技术成就的

笔记时,[①] 他们认为开始搞一些公共事业的研究时，他们常常是搞错了。而且他们意识到他们的兴趣在于理论而不是真正实用性的；无论他们关于科学对人类的最终用途是怎么想的，他们之所以会更多地被引导去解决具体的问题只是因为实际问题会激起人们的好奇心，而不是因为它们的解决会带来一些物质上的利益。通常像天文学、解剖学、胚胎学和光学的问题都直接属于中世纪的传统，尽管现在以学院派的颇为不同的方式来解决。宗教现在被认为有助于增强人们对知识的好奇心，因此常常要求科学知识去激发人们给予自然创造者适当的尊崇，它也许会有些用处。正如玻意耳（Boyle）所说：

> 我们永远不能为了我们认为思考它们是有害和危险的那些工作而赞美和歌颂（上帝）……我们的赞美总是在这里产生，与我们的知识相称；因为我们越是沉思，我们就越能发现创造者圆满的更多信号；而且甚至我们最详细的观察，除了会使得我们对他的无所不知产生朦胧尊敬外，什么也不能给予我们。[②]

科学知识因而具有了宗教的品格。

17 世纪科学的经验主义趋势从来没有形成压倒之势；对哲学体系和一般理论的冲动依然强劲到可以影响科学运动。培根透露了对原子论哲学的偏[115]向，而后来响应伟大复兴（the Great Instauration）的英国经验主义者都赞成“机械论的［基本微粒论者的（corpuscularian）］”假设。伽利略攻击了阿基米德的数学方法，但他也是一个原子论者。笛卡儿特别自信他发现了基本原理，由此一个完善的哲学体系——道德的、伦理的和科学的——必定会继而得以展开。尽管他承认一个人“在哲学上的探索达到如此程度以至于会以它的方式获得对生活有用的关于技艺的知识”，对他来说更有意义的是，“没有哲学思考而活着实际上与没有尝试睁开双眼就把两眼闭上没有什么两样；而且观赏一切视野中的事物所带来的快乐是无法与哲学的发现所带来的圆满相比”。[③] 尽管有他对虚妄观念的怀疑（*Dubiae etiam pro falsis habenda*）和其他推理规则，尽管他对数学与光学有重大贡献，笛卡儿在哲理思考中的乐趣使他的内容最全面的书成为一卷有独创性的、精心编纂的、无法证实的沉思，正像后来惠更斯（Huygens）所称呼的：“物理学的精彩小说”。笛卡

---

① 例如，有 4 位当时的英国人就是这样：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日记》）、约翰·雷（John Ray，《观察地形的……》，1673 年）、约翰·洛克（John Locke，《在法国旅行……》，1953 年）和爱德华·布朗（Edward Browne、《旅行……》，1685 年）。

② 《哲学的用途》。

③ 《哲学原理》，载《著作集》［由亚当斯（Ch. Adams）和唐内里（P. Tannery）编辑］，第 9 卷（巴黎，1904 年），第 3 页。

儿在《哲学原理》（1664 年）中描述了宏大的宇宙系统及三种物质微粒的运动规律和天空中的旋涡，他认为在详尽阐述突出的细节以包容科学的所有不同学科之后已经够了。但由于他的想像非常开阔，笛卡儿为他的时代所树立的权威比他的任何一位同时代人都要圆满。与他最靠近的后继者都逃避与笛卡儿哲学的接触，而在法国（其他大陆国家要差一些），他被认为是直至 18 世纪中叶的现代科学成就之父。培根、笛卡儿也许还有牛顿，这许多伟大的科学改革者都天真地抱有希望：存在一些为数不多的开启未来宝库的万能钥匙，运用坚韧和勤劳，再借助于一些主要方法的发现，或思维技巧的运用，就足以发现关于自然界的全面知识和获得控制自然界的能力。这种对地平线之上普遍真理的想像（它自身就是即将到来的技术黄金时代图景中的一个要素）是一个应用科学沉闷的发展几乎不能提供的奢侈品，尽管它对纯粹的研究是一个刺激。

因此要记住，主要的科学成就被接受要经历漫长的时间（伽利略是 20 年，哈维是 30 年，开普勒是 40 年），而且从自然哲学和数学家的水平再普及到普通的实际应用人身上不可避免要拖延时间，17 世纪上半叶的新科学【116】并没有触及 16 世纪遗留下来的技术问题，这没有什么可惊奇的。一些发明家的活动，像科尼利厄斯·德雷贝尔（Cornelius Drebbel）潜水艇的设计，属于科学和技艺两个世界的中间，不完全属于任何一个，它只是提供相对于宏大主题之外的次要事物。实质上，科学需要许多物质上的支持，比如说，极其需要确实高效的科学组织、资助、富人的兴趣和更广大范围的实践积累。在以后的 17 世纪环境会更适宜一些，朝向应用科学的努力更有希望。

2.4　科学社团

现代科学几门学科分支的基础无疑是在 1650 年建立的，磁学和电学是由吉尔伯特建立的，天文学是由开普勒建立的，生理学是由哈维建立的，力学是由伽利略建立的。第一部真正的化学教科书的出现也在这一时期，以让·贝甘（Jean Beguin）的《化学初阶》（*Tyrocinium Chymicum*，1610 年）为发端，而且朝着对动植物品种进行系统的安排和描述迈出了第一步。一些最重要的科学仪器涌现出来——望远镜、显微镜、气压计、温度计。现代数学也在维埃特（Viète，1603 年去世）与笛卡儿（1650 年去世）之间的一段时期诞生。分散在 6 个国家和 100 篇论文中的如此多的个人创造瓦解了现存

的科学传统和支持了培根与笛卡儿对经院哲学残余的联合攻击。

不过对那些生活在这一世纪中叶的人来讲，新科学运动的支离破碎是显而易见的。盖仑的信徒和帕拉切尔斯的追随者（Paracelsians）之间的分裂，哈维的追随者与批评者之间的分裂导致内科医生们的分裂，而内科医生是最具有相似科学教育背景的同类群体，学者们对自然现象采取一种新的机械论的态度（它尤其在物理学中可望有重大发现），这种态度为在相信原子的盖森德的拥护者（Gassendists）与不相信原子的笛卡儿追随者（Cartesians）之间的争论所扰乱。两位伟大的先驱者——伽利略和开普勒在天文学各自独立的战线上工作，以至他们的思想很少混合。为获得胜利而进行的斗争在各地进行着——太多的斗争是发生于同一科学团体的成员之间——但是除了培根外，在反抗自然和权威的斗争中很少看到领导和协作。让新发现为人所知这一重要任务与寻找它们对公众的用途都是不能忽视的；它在 1831 年与在 1660 年一样显得必需，因为“哲学是在公众中涌现和展示自身”。

【117】 这时科学和医学的改革精神已经影响到许多人，尽管他们并不是重要研究者，但他们乐于以其他方式来发挥作用。他们中既有赞助人像佛罗伦萨的诸位公爵、哈伯特·德·蒙特默尔（Habert de Montmor）、柯尔贝尔（Colbert）和查理二世（Charles II）；还有科学的“报道者”像马丁·梅桑纳（Martin Mersenne）、塞缪尔·哈特利布（Samuel Hatlib）和亨利·奥登堡（Henry Oldenburg）。更为众多的是业余爱好者、艺术品鉴赏者、好奇的人，出于各种原因被吸引到新哲学这边来——这往往出于他们厌恶学院刻板的学习和语言学习，想要减轻人们生活的痛苦，或者对令人惊奇事物的爱好。17 世纪是第一个俱乐部和学会的时代。当时，人们首先喜欢对革新者——哥白尼、伽利略、笛卡儿——的优点进行争论，然后是实验，而自然史开始向贵族和职业人士扩展，在许多城市都开始经常举办辩论会和论证会。他们更多是与法院而不是与大学交往。第一个形成正式组织的是佛罗伦萨的西门托科学院（Accademia del Cimento，1657 年），其后是伦敦的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1662 年）和巴黎的皇家科学院（the 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1665 年）。每一个的存在都得益于统治家族的兴趣，他们对上面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提供了财政支持。

皇家学会的起源和早期历史（这三个中的一个曾经作为一个私人俱乐部非正式地存在过）显示了 17 世纪中叶科学与技术之间关系的性质。培根对工艺知识的完美经验主义和对科学对人类财产的增加所负有的责任的双重坚持在英国从没有人忘记。当内战爆发以后，威斯敏斯特政府被一些具有宗

教和虔诚气质的人所控制时，把注意力转移到为提倡新教基督教世界的统一而设计的方案上和为社会的目的而发展有用的知识上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在这些事件中主要的推动者是塞缪尔·哈特利布，一个德国新教流亡者，他与其他流亡者，像西奥多·哈克（Theodore Haak）和亨利·奥登堡（他是1662～1677年皇家学会的秘书）联合起来，而且还有相当多的具有宗教气质的英国年轻人，其中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和罗伯特·玻意耳（Robert Boyle）都成为知名人士。约翰·米尔顿（John Milton）也很赞赏这一团体的志向。哈特利布似乎从夸美纽斯（Comenius）而不是培根那里汲取了灵感，但是从他希望建立一个伟大的哲学学院，而且为了技术进步来看，他与培根传统的一些方面是一致的。他鼓励配第和其他人去调查和记录工艺过程，为了公共利益出版大量宣传机械和农业革新的小册子。哈特利布对理 [118] 论科学不感兴趣；而正是哈克促进了科学家在格雷欣学院（Gresham College）的聚会，它开始于1645年，15年后发展成为皇家学会。在格雷欣俱乐部和它由以产生的牛津哲学学会上，人们似乎很少讨论应用科学。随着皇家学会的成立，培根式概念再次引人注目。斯普拉特（Sprat）在他的《历史》（1667年）中争辩道：

> **手工艺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最确实的进步是在实验哲学的指导下获得的**……；除此之外，人们还有什么更伟大的殊荣（Privilege）值得吹嘘；难道一切其他被造物具有使用、指导、改变或提高的能力？这就是**上帝**赋予我们对他的手**所创造事物**进行**统治**的特权……；我们要支配好这种**能力**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采撷**渊博**之人的光芒，成为一个那些劳动者的**产业**和**工作**的永远的监工和指导者……；只有这样，**渊博**之人易于向上飞扬的思想才会被迫降临到**物质世界**来；而且更习惯于匍匐于地上的**商人们**冷静的想像力将会得到提升。[①]

为促进这些目标（的实现），自1660年以来，皇家学会宣布它的目的在于鼓励有创造性的和有知识的商人，还有哲学家和医生；它组织编纂商业史；它曾讨论革新具体工艺过程的最好方式；它开始收集国内各个地区农业实践的资料，目的在于移植那些似乎是最好的种子。在这些活动中表现突出的是3～4个哈特利布以前的信徒，但是，其他人并没有轻视功利主义者为

① 托马斯·斯普拉特（Thomas Sprat）：《皇家学会史》（伦敦，1722年），第393、395～396页。

科学所作的辩护。不过，在斯普拉特写作和印刷他的《历史》中的一些结果时，会员们已经厌烦这类培根式的项目了。没过多少年人们已经把它遗忘了。皇家学会真正的历史在它的会员的纯科学著作中得以发现，而且从长远来看，它对农业和工业的改善所做的贡献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原因已经谈过。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在预料之中的；更为重要的是态度的改变。例如，在 17 世纪末威廉·沃顿（William Wotton）的《对古代和现代知识的反思》中，人们是以纯理论的根据而不是以实用性这一附属的和推测的论据为新科学的世界观辩护的。科学不再因其社会意义而被尊重（乃至由此而被误解），而且社会悄悄地不再对技术施加什么限制，任其自由发展。

【119】一个科学学会的显著功能在于提供一个论坛和一种刺激，这是不需要强调的。它还直接导致第一份科学期刊的创立。毫不奇怪，为了科学的各分支学科和具体问题的联合研究，学会分成了委员会或组；也不奇怪他们所尝试的项目要依靠集体力量，像法国对卡宴（Cayenne，1672～1673 年）的探险。也可以说，学会正处在对时代最伟大的人物的重视之中，惠更斯（Huygens）、牛顿、卡西尼（Cassini）、雷（Ray）、雷莫（Roemer）和玻意耳（Boyle）。根据经验，人们会发现对共同兴趣广泛的鼓励是一个学会最有用的功能；而且培根的一些有点儿僵硬和制度化的想法即使在伦敦也被抛弃了。当学会充当国家有关科学的一个官方代表时，学会的刻板品格几乎毕露无遗，而且它在这方面的作为几乎都与应用科学和技术有关。正如人们所说，这并不是反对伟大先驱者的观点。自然许多个人都不愿意以任何方式脱离他自己的追求，但此时很少有人为必然要保持对自然研究的绝对无私这一抽象的理由作坚决的辩护。

在巴黎，路易十四（Louis XIV）和柯尔贝尔（Colbert）第一次预见了科学院可以成为一个科学和产业研究的部门。在一个管理完善的重商主义经济中不难想见这样一个政府机构的优点：其职能应该是（除了推进知识之外）促进实用的发明和揭露无用的幻想；调查国家的自然资源和探索利用他们的方式；而且一般来讲，通过帮助提高技术效率来增加出口和增强对外部供应的独立性。到 17 世纪末时国家支持的研究的一切可能的优点都为莱布尼茨（Leibniz）充分地阐明了，他正在为获得德国国家科学院的资助而努力，最终在柏林（1770 年）有了结果。不过，对科学效用更为系统研究的结果总是与其初衷不相称。巴黎和格林威治天文观测台在天文学上做了出色的工作，但他们并没有解决在海上确定经度的问题。巴黎的数学家对弹道学的不确定性和凡尔赛人造喷泉的设计所作指导没有任何成效。没有一项技

术上的重要革新是通过一个科学院的赞助而产生效果的。有太多的压力迫使皇家学会拒绝参与造船技术的研究，并且导致尚未恢复活力的科学院的暂时挫折。像在英国和法国一样，科学运动以国家学会为中心兴盛起来，个人爱好战胜了公共项目；在其他科学发达国家，像荷兰，从来没有对实用领域进行直接研究的任何明显的尝试。【120】

即使整理技术信息的努力也在英国和法国遇到挫折。皇家学会的一些商业史在斯普拉特的《历史》或《哲学会刊》上发表，尽管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而且皇家学会在批准新发明方面从未行使过它的权力，尽管有一个阶段它曾经想那么做。在奥登堡之后，没有（皇家学会的）秘书想推动哈特利布类型的项目。法国科学院每年对发明进行评价：1735 年发行一本《皇家科学院认可的机器和发明》（自 1666 年以来）。在对工业的描述上，它进展缓慢，但最终还是有了结果。在 18 世纪这个工作首先被列奥米尔（Réaumur），然后被杜亚美·杜·蒙科（Duhamel du Monceau）接过去，他们在 1761 年与 1788 年间出版了系列的《对皇家科学院院士们认可的工艺和技术的描述》。这对研究那个时代的产品来说是极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因为它是在技术产生急剧变化时期出版的，但这一著作是否用于实用的目的则不得而知。对技术的同样兴趣也在狄德罗（Diderot）和达兰贝尔（d' Alembert）的非常有名的《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中反映出来。早期的百科全书派学者像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在他的《技术辞典》[*Lexicon Technicum*，1704 年，其中，他第一次对塞维里（Savery）蒸汽泵做了描述]中，还有以法莲·钱伯斯（Ephraim Chambers）等也整理了技术事物方面的信息。同时还有一些个人，其中一些在科学上还有一定的声望［像克里斯托弗·马雷特（Christopher Merret）、内里（Neri）的《玻璃制造术》的英译者］，他们在对科学学会所规划的行业进行描述的工作上面做了不少弥补。在英国，约瑟夫·默克松（Joseph Moxon）对印刷、建筑、金属加工和其他行业作了描述；荷兰自然在对水车设计工艺的描述中技高一筹，如在《完美的磨坊书》（*Groot Volkomen Moolenboek*，1734 年）中；德国人雅各布·洛伊波德（Jacob Leupold）在 1724 ~ 1735 年之间出版了几本关于工艺和大型机械工程的书；造船在像苏特兰德（Sutherland）的《造船者的助手》（*Shipbuilders Assistant*，1711 年）一书中得到描述。尽管在这些不断增加的技术文献中并没有多少科学的洞见，但它是实际的，不掺杂异想天开的荒诞玩意儿。在 18 世纪中叶以前，要从书本上学习许多行业的“秘诀”还是可能的，尽管很少有人能再推测它们与当时的科学有多少关系。

同样，皇家学会的会员和法国的院士们中的私人研究者在重要性上大大超过了他们学会的集体努力，正是出于个人的利益，17 世纪科学可能的技【121】术含义才最清晰（地被揭示出来），而且也最有成效。要列举那个时代始终如一献身于相当重要的实用事物研究的数学家、天文学家或自然哲学家是困难的，但是故意对实用的发现或技术进行隐藏的蒙昧主义者同样很少。直到现代，科学发展史也只是偶然提供了这样的发现事例。除非日常事务中某种用途自身引起了科学家的注意，否则他不可能费力去研究它。因此，尽管牛顿对他的天体力学工作的任何技术性含义是毫不关心的（当然其他人对此曾有不同看法），他还是设计了一个新奇样式的航空仪器，而这正是因为它的奇特的光学原理［后来被用到哈德利（Hadley）象限仪上］吸引了他。伽利略则提出，钟摆的敲击可以调整到适应脉搏的跳动，这样会使医疗观察更加准确。格劳贝尔（Glauber）提出可以在烹调中用精盐代替柠檬汁，硝酸钠可以作农业肥；玻意耳对物质在低压下产生变化的研究提示他：食品可以保存在没有空气的容器里。在许多方面科学实验可以向人们提示一种一闪而过的思想，通常非常微小，几乎很少能发展到一种实用技术。只有化学家这一群体才能在头脑中不断应用他们的结果，这是因为大部分化学家一心想发现一种新的化学药品，正像很少人能像玻意耳那样主要关心从化学实验中获得对物质结构的认识。那些以实用的兴趣而著名的科学学会的成员们只是二流的人物或浅薄的业余爱好者。像对造林热爱有加的伊夫林（Evelyn），或把他的精力长期集中到证明新奇的双体船的优点上了的配第（Petty）在任何一种意义上都不是科学家，尽管他们试图“像哲人般地”工作。一些具有科学头脑的爱好者也为这类事物所迷惑，当然他们距严格的科学分析就更远了。

关于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这里有两个具体例子值得充分地讨论。人们熟悉的经度问题一直被认为是在科学的掌握之中的。在伽利略发现木星的 4 个卫星之后，他提出，经常出现的它们由行星遮蔽的现象，可以作为船只与一些固定地点之间进行时间比较的一种方式。如果能得到遮蔽的准确（时间）表，则从一些确定的子午线可以推断出时间，这个方法确实有用——如果一个训练有素的天文学家从甲板上一架摇摆的巨型望远镜中进行【122】观察的话。天文学中所有测定经度的方法都没有遇到这些困难。那时大约是在 1660 年，克里斯琴·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和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各自独立地致力于机械装置的完善工作之中，它们既适用于航海又用于准确的计时。胡克在发明了现在人们如此熟悉的时钟上的平衡

发条后转向其他事物；惠更斯为了设计第一个摆钟而对摆动物体的性质进行研究。[①] 惠更斯终其一生不时为达到他的目标而反复试验，也做出了几种设计不同的天文钟，但没有成功。在钟表制造术中，一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却被实用的时钟制造工匠所超越，这真是一个有趣的事实。正是工匠制造了摆钟这一相当精密的工具，发明了与惠更斯完全不同的机械装置，不过他是另外一个时钟制造工匠——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他在1761年制造了第一台有效的航海钟。不过摆的惟一性质即：摆动是有规律的却是由科学家调查和发现的，这却是事实。因而摆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科学发明。不过正是实用的工匠改进了这一发明使它成为有用的机械。

其他的发明显示了同样的模式。蒸汽机的发明故事就更加引人入胜。意大利数学家托里切利（Torricelli）在1644年发明了水银气压计，而且他第一个认识到大气会在所有的方向上对地球表面产生压力。“托里切利真空”，即管子中水银以上的真空引起了实验，它进一步为气泵的使用所推进。玻意耳的助手胡克使它成为实验室有用的仪器。经验显示，需要巨大的力量来超出大气的压力以抽出气泵的活塞。又是惠更斯用他日常生活中的机灵劲发现可以利用这种压力来做机械性的工作。他设计了一个内燃机的雏形：少量火药的爆炸将空气从气缸里排出来，当气体冷却时大气的压力就会推动活塞。丹尼斯·帕平（Denys Papin）让他的设计在英国家喻户晓，他提出通过用蒸气的膨胀来替代火药的爆炸从而改进了它。到现在为止，所有这些科学项目完全都是出于空想——与提到过蒸气动力“秘密”的作家的各种梦想一样地不切实际。在1698年，托马斯·塞维里（Thomas Savery），他可能与康沃尔郡（Cornish）的锡矿有联系，取得气泵的专利权，从此水就可以由蒸气的冷凝作用直接抽出来了，然后由于新蒸气的进入把蒸气从气泵室中排出【123】去。这个机器能够工作了，尽管效率不高。7年以后另一个工匠托马斯·纽科曼（Thomas Newcomen）恢复了蒸气汽缸与活塞分离的做法，由一个上面摇动的杠杆与气泵连接，蒸气动力的商业史开始了。这里的问题明显地没有受到蒸汽机早期发展中经济因素的影响——例如，煤和锡的相关价格——尽管经济因素是密切相关的。这里所需要的是有创造性和实际经验的人，像航海钟的情况一样，正是他们使一个科学概念成为在实际中应用的东西。除非他的兴趣被激起，除非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科学原理能够使他信服，否则发明是不可能产生的。科学知识提供线索，关于这点现在

① 这样的时钟早就被伽利略设计出来了——这一事实只有他身边圈子内的人知道。

与过去一样，但是，工艺方面的大发明必须让这种线索产生工业效用。技艺为了从科学中得到哪怕是偶然的益处就要多走超过一半的路程；而且工匠对科学著作的态度至少与科学家对技术进步的态度一样重要。

因此，将科学兴趣向那时被认为是社会实用的目标引导，这一有计划的努力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初似乎是失败了，无论这种努力是由科学机构或国家做出的都是一样。科学家自身是非常想遵从他们自己选择的路线；知识基础太薄弱了以至于不能将它应用于技术的细节问题，而且一般认为，适宜于科学着手的问题又太广阔和太不确定了。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进行长期研究所必需的机构、实验室和资源没有着落。纯科学机构的建立被证明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而且把得之不易的所学知识应用于酿酒业、烘焙业和烛台制造业的困难被证实相当复杂，比像弗兰西斯·培根这种鼓噪者所想像的要复杂得多，他们幻想在一到两代人之间就要改变整个知识和物质世界。不过，虽然有计划的运动从自然那里没有得到多少回报，各地个人的建议已经被证实是有益的了。也许终究自由放任政策是最好的选择：有科学与工艺经验所提供的帮助，有从他们的收益中所获得的激励，就让发明家和企业家去奋斗吧！不过，折中地说，当牛顿死时（1727 年），我们几乎不能说上一世纪的[124] 科学著作在公众中所唤起的热情与它所带来的物质进步的程度相称。

2.5 牛顿时代（1640～1740 年）的科学与技术发现

遗憾的是，前面关于科学与技术关系的讨论并没有告诉我们关于二者各自的很多东西，因为它们的关系是肤浅的。对历史的叙述会被想像严重地扭曲，人们会想当然地以为 17 世纪的天文学家除了航海的进步以外没有别的目标，或者纺织机械的发明家在缓慢地吸收伽利略和牛顿的机械学。科学的发展被它自身内在的一致性所控制。工厂主和为利益驱动的地主的发明创造才智加快了工艺的进步。实际上，他们二者都在一定程度受社会动态变量的制约。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富有进取心的国家在科学技术上同样干劲十足，这是毫不奇怪的；宗教信仰的改变不应视为影响科学和商业进步的一个因素。这是一个正在丢弃陈旧形式走向更自由形式的世界，置身其中的个人有望被他自己的成就激励着前进，这样一个世界同时同样地推动着理论和物质事业走向前进。但是，在考虑重要的具体问题时，这样的概括方式就失去了它们的敏锐。在认识 1600 年与 1700 年所看到的宇宙之间的差别时，它们是于事无

补的；或者对认识 1700 年与 1800 年之间人们在机器使用方面的进步也是无助的。

把科学看做一个观念的领域，把技术看做过程的领域，这种观点就能得到最好的说明。这时科学这一正在成熟的观念又可分成两个范畴：宇宙论的与微观宇宙论的——如果暂时把生物学放到一边的话。在每一个宇宙中机械原理都是居于统治地位的。这并不意味着物理学是唯物主义的，因为那些认为宇宙在部件的精密完美和它们因果逻辑的不变性方面可以与一块钟表相比的人，仍然会欢迎神圣的钟表制造者。机械学意味着所有的现象都可以用自然的普遍规律来解释，它是由作用于被认为是由粗细物质构成的微粒上的适度恒力所产生的。因此最后，物理学的宏观和微观水平都会在一种解释的一致性上统一起来。伽利略、笛卡儿和牛顿的物理学尽管各不相同，但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宇宙观念的基础存在于天文学这一描述性科学中。也许它最 [125] 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它是伽利略所开创的太阳系定性描述的扩展：在 18 世纪末以前天文学并没有超越这一界限。除了惠更斯和卡西尼（Cassini）对土星的研究，雷莫（Roemer）对木星的研究，赫留斯（Hevelius）对月面学的研究之外，在航空图上标出星星、细心观察月亮的位置这些更为传统的工作也在更为精确地继续着，这种精确性是由格林威治的弗拉姆斯特德（Flamsteed）迅速而出色地予以提高的。横向穿过地球运行轨道的光所需要的时间是由雷莫观察到的；此后布拉德利（Bradley）通过分辨光的最大速率对恒星明显的位置偏差进行了解释。[1] 对地球运动进行直接观测的努力失败了——星际视差太微小以至于无法观测。所有迹象都显示恒星间距离的无限性。因为没有根据推测一切星星都与太阳等距，或天空中的星星从地球上都能看到，或上帝的无所不能在他的创造中是受到限制的，认为宇宙的范围是无边无际的这种想法似乎是有道理的。“它与我的思想是不一致的（笛卡儿写道），或者就是一回事，它是一个矛盾，世界是无限的或无穷的，因为我不得不在世界的边界之外想像一个空间，无论边界在哪里我总要预先假定它们的存在。对我来说这个空间是一个真实的存在……”[2] 宇宙的无限是早期哥白尼学说信奉者（像开普勒）所反对的一个观念，但到了 17 世纪晚期即使最流行的说法也不惮于承认“从太阳到最远行星的距离也没有从太阳或从地球到恒星的距离远；它几乎超出了算术的范围。”不是为空间的无限而

---

① 布拉德利的推论（1727 年）使光行差成为观察地球围绕太阳公转这一革命的第一个见证。
② 笛卡儿：《作品集》，由亚当（Ch. Adam）和唐内里（P. Tannery）编辑，第 5 卷（1903 年），第 345 页。

战栗，而是为一种新的想像而自豪：

> 认为太棒了：当蔚蓝的天穹上布满了星辰，我想宇宙太局促和紧密了；我几乎都憋闷得要吸一口空气了：但现在它又豁然开阔敞亮了，成千成千的旋风被吸进来，我开始更加自由地呼吸，而且想到宇宙将比以前更加无与伦比的辉煌。[1]

芳特纳勒（Fontenelle）还以一种故作轻松愉快的态度坚持：在其他行星和这些其他天体上还存在着居民（尽管不是地球上这样的人）。

【126】 不过，在无垠的空间里，太阳系是惟一被科学研究的，研究的最伟大成就是表明天体运动服从于科学规律。自柏拉图以来，理论天文学永恒的问题就是发现这些运动的数学模型：在 1609～1619 年之间被开普勒成功解决的一个问题。17 世纪又增加了一个问题，即揭示这些运动得以产生的宇宙结构内部的物理关系。在牛顿的《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1687 年）中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他是通过把万有引力定律应用于动态分析的原理中来解决的，这一定律半个世纪前由伽利略创立，由笛卡儿、惠更斯和其他人发展，而现在被牛顿进一步地予以总结。这一定律的正确性被来源于它的数学理论与天文观测结果的完全一致来证实；第一次能够预测月球运动的复杂变化（尽管后来的数学家用这个定律取得了比牛顿自己更大的成功），不是通过来自以前观察的外推，而是通过太阳、地球和月球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物体引力来得到的。牛顿的《原理》不仅为物理学解释现象的能力提供了显著的证据，它还是机械论的胜利。尽管引力的性质和它与物质的关系还是一个奥秘，但它已经以最明确和最激动人心的方式显示出：我们对太阳系结构的认识足以说明它的现象——一切都可以用发现的物质和它们的运动规律来加以解释。物理学还需要上帝吗，是的，作为它的定律的创造者而保留？这是一个塞缪尔·克拉克（Samuel Clarke）与莱布尼茨争论的问题。对后者而言好像

> 根据（牛顿和他的信徒们的看法）上帝所创造的机械是如此不完美；以至于他还得不时把它们特别集中起来进行**清洗**，甚至**修理**，正如一个钟表匠修理他的钟表；其结果就是必须充当一个不熟练的工人，正像他常常被迫修理他的产品，使其正常工作一样。在**我**看来，**同样的**力量一直存在于世界上，只是从物质的一个部分传

---

① 德·芳特纳勒（B. le. de Fontenelle）：《与一位女士关于世界多样性的谈话》（1686 年，第 4 版，1719 年），第 122、124 页。

送至另一个部分，完全符合自然规律和前定的秩序。[1]

在牛顿的引力理论中，物理微观世界与宇宙宏观世界的关系是很关键的，因为促使行星公转的力量是物质微粒之间发生作用的力量合成。像伽利略、笛卡儿甚至他之前的培根一样，牛顿是一个信奉微粒说的人，而且他视“机械哲学”的原则为当然。“所有物体最小微粒”的性质，像坚固性、运动性、惯性必然从整个物体同一性质的存在中推断出来的，后者他认为是“一切哲学的基础”。[2] 因为机械哲学的目标是以运动、性质和微粒的结合来解释一切现象，这些正是物理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任何不采用这些术语而对自然现象所做出的解释因而都只能是不完全的。在《原理》中牛顿研究了引力——必须强调，对他来说这被认为是基本微粒的力——非常彻底地；他在别处以一种猜想的语言提出［附加在他的各种版本的《光学》（*Opticks*）中的“质疑”（*Quaeries*）部分］其他力是怎样被认为作用到光学、磁力、电学和化学反应的现象中的。[3] 牛顿对机械哲学的运用远比后来者复杂，但总体框架还是它们形成时的样子。【127】

随着对形式和性质以及被归入“深奥”的解释的怀疑，作为自然奥秘的最后隐藏处的物质微观宇宙成为物理学理论兴趣的核心。长期以来，人们满足于把热视为一种物质的“形式”，但是，两个与众不同的新哲学的倡导者培根和伽利略却认为：热，严格地说是物质微粒的运动在人体中产生的一种感觉（或者使其表面化）。在他们看来，微粒的性质是潜藏于受蒙蔽的感官下面的真实。笛卡儿尝试用三种不同种类物质的假设来解释整个宇宙，每一种都有它相应的机械功能。对所有的新哲学家来讲，光是颗粒能媒的一种震动，或者是微粒的一种实际散射；光学效果都是因为光与物质微粒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空气的实验研究也支持颗粒理论，它又进一步发展以解释空气燃烧和氧化的必然性。玻意耳是根据机械哲学进行化学实验的伟大解释者；在他看来，“微粒的”和“经验的”限制条件在实际上是等同的。无论自然哲学家拒绝同情与反感、魔法与神秘主义，无论他们选择机械论而不是万物有灵论，他们都是转而采用建立在物质的微观结构基础之上的解释。自然直接套用这种微观结构是不可能的，尽管用显微镜所做出的迷人发现似乎提【128】

---

① 《莱布尼茨与克拉克通信集》，由亚历山大（H. G. Alexander）编辑（曼彻斯特，1956 年），第 11 ~ 12 页。参看夸雷（A. Koyré）：《从封闭的世界到无限的宇宙》（巴尔的摩，1957 年），第 123、236 页。

② 《原理》第 3 卷，规则 3。

③ 在给科特斯（Cotes）的一封信中（1713 年 3 月 2 日），牛顿表示他原本要在《原理》第 3 卷的总诠释中“更多地谈一些物体微粒的引力”。

示：不一定总是如此，但它的特性可以很明显地从适宜的实验对象中推断出来。

在 17 世纪真正伟大的约一打的科学家中，没有谁对机械哲学抱有敌意，这使机械哲学继续成为 18 世纪科学理论无可争议的基础。没有人愿意把自己描绘成只是描述自然世界的人，或一个枯燥的数学工作者和成堆实验资料的整理者。尽管有培根式传统的一些方面存在，牛顿的时代并不怀疑理论，甚至也不怀疑恰当的思考：拒绝亚里士多德对宇宙的理性化之后，科学家们渴望建立自己的理论，把适当的注意力放在由实验和计算来证实假设上。

不过在强调科学革命的理论倾向以及从经院哲学的蜕变不只具有粗朴经验主义的性质这一事实时，还应加上，观察与实验也是新计划与众不同的突出特征。它们由此耗费了许多科学家相当大的精力，产生了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因其自身的价值与它们对新理论的贡献而受到重视。笛卡儿，17 世纪最富于思索的自然哲学家并且至少是重视实验的一个人，也做了一些解剖，并在这上面花了不少时间。牛顿的光学实验是经典的；他做了许多机械和化学的实验。即使对像玻意耳这样的一个伟大理论家来说也是这样，当然其他学者就更是如此了，化学完全是实验性的，如同天文学是观察性的一样。各个领域较次要的工作主要是由发现和记录事实组成，它们与对微观世界的认识或对整个宇宙的认识的关系眼下并不是很清楚。对当时气体力学、水力学、矿物学、冶金学和气象学的学者而言，许多似乎很重要的工作都属此类。在此类科学的应用中有关科学兴趣的个别例子，像机械学在工程学，天文学在航空中的运用已经提到了：科学家对研究工具的发明和改进所投入的注意力是始终如一的，这使他们与一些技术革新问题更紧密地接触。天文学家和显微镜学家必然会对玻璃的制造和加工感兴趣；在许多仪器中精确度【129】依赖于机械工切割螺丝或齿轮的技巧；其他一些仪器需要工具把金属线或圆形材料分割成精密的小零件；许多器械需要玻璃管、平面、耐热容器、强度大的硬焊料等等，这些通常都是商家不能提供的。在牛顿时代，科学工具在种类和精密度上都大有提高。只有最熟练的工匠才能制造它们，它们与科学工作者的合作是新颖而富于创造性的。科学发现至少取决于技艺的精致化。

正如玻意耳所指出的，这些发展促进了科学仪器制造这一专门行业的成长，这个行业分成两个主要领域，二者分别负责光学仪器和主要是用黄铜与铜加工制造品的工具。后一类工具的制造者与钟表制造者（他的技艺也更加精密和复杂）构成工艺的重要保密者。他们的工作是一个小型高级工程。这种工程的产品都是小规模的，不批量生产；它们是为实验室精心照管而不

是为作坊的粗陋使用而设计的；为这些工匠所使用的车床和其他工具只适合服务于奢侈品行业。在技巧和精密度上，工业革命的工程进步可以部分地由此预料。在18世纪早期，仪器或钟表制造车间也许是实用机械最好的学校。

这样的学校在30年后产生了结果。颇为当时人注目的（许多成就）都是工艺流程不断进步的结果。造船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行业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发展趋势：即船只的规模扩大，因此在这一代人中还很罕见的大船在下一代人中就成为普通船的了；通过嵌接、钉钉子把许多不算太大的木材连接在一起的船体建造原则还没有变。帆装要适应高寒和高速，但在设计问题上，科学家们这些外行的意见似乎并没有被实际工作者采纳，像作为他们朋友的安东尼·迪恩爵士（Sir Anthony Deane）就不采纳。一个新船"船体型线图"的描画和船体型线在造船厂实现的方法至少还是遵从几百年前的老传统。即使一艘新船的吃水深度和吨位也是从设计图中马马虎虎地估计的。享有"科学"创造美誉的工程证明是非常不实用的。正像造船者倾向于把船体规模和已经证明成功的帆船索具设计略作修改后全盘保留下来，而它本身也是逐渐革新的产物，因此在建造行业中经验和模式是最主要的考虑因素。在大型建筑中柱子的厚度、拱和梁取决于对稳固性或对现存结构的【130】考虑，或者参照失之于过分谨慎的传统规则。对材料强度的结构分析和试验基本上不为从事建筑工作的建筑师所知，尽管在拱的数学理论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即使像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这样有很高数学素养的建筑师的作品似乎也不比哥特式教堂更具有精确计算的基础。

其他许多建造工艺像那些水车设计安装、四轮运货车修造和四轮大马车修造或铸铁厂创建都与此相仿。许多人都知道工艺品从产生到消失变化很少：最明显的例外是奢侈品行业——手表与钟表、火器、餐具和家具。当调查到这例外的行业时还能稍稍看到一些工艺的变化。瓷器的制造比陶器需要更多的技巧和小心，但它本质上并无不同；能够制造转轮点火机手枪的工匠也能同样容易地制造燧火枪。产品精致程度的不同要比基本技巧的不同明显得多。工具当然得以改进而且这使得更为精致的作品成为可能，但机械工具像钟表制造匠为齿轮锉齿的工具就发明很晚且普及很慢。与比人手要精确的机械的发明相比，人们强调得多的还是手工的灵巧。纺织工业早期的一些发明家曾尝试模仿体力劳动者重复的动作，但是笨拙地失败了。奇怪的是，正是在人们认识很少的化学工业的工艺中取得了重大进步，而且它与科学的关系是最明显的。例如，英国的玻璃工业，由于采用了使用煤的熔化锅与熔炉和结晶铅的发明（1670年左右）而发展了一套与欧洲大陆不同的工业单位。

它的产品比有名的威尼斯玻璃要便宜，尽管没有它们获得的评价高。科学家们［梅雷特（Merret），1662 年；库恩凯尔（Kunckel），1679 年；霍尔巴赫（d' Holbach），1752 年］[1] 在玻璃中发现了不少化学的兴趣：在能够制造玻璃的材料中，在用矿物和金属盐为玻璃着色的工艺中。也许这种科学兴趣对玻璃制造帮助不大，但它对玻璃制作工艺的提高会有所贡献。一个革新像在肥皂制造中引进"盐析"工序就能使产量有真正的提高，而且为一个大家知道的地区带来超过其他地区的商业优势。因而"一种深红染料（Bow [131] dye）"的发明（与一种通过将白鑞溶化在硝酸里而制成的媒染剂一起使用的胭脂红），大约是在 1620 年由科尼利厄斯·德雷贝尔（Cornelius Drebbel）[2] 做出的，反映了伦敦染色业的暂时领先地位。大约在 1647 年，这种新的鲜红色在荷兰投入使用，哥白林家族（Maison des Gobelins）在 1660 年后不久就开始使用了。它被视为这一世纪杰出的技术发现之一。染色工艺中还有其他一些变化，这部分是由于采用了新的媒染剂以及人们追求更亮丽的罩面漆所致，部分是由于当与印度实行直接贸易时可以搞到大量的靛青，部分是由于采用了来自新世界的染料像洋苏木和巴西苏木，这些东西共同形成了这个工业，像对化学家有特别的意义的玻璃。

有意思的是，部分地由于炼金术的发展，金、银、汞、锑的冶炼发展成为冶金业。化学家还在钻研 16 世纪关于矿石和金属的杰出论文（第 101 页）。由技术发明为与铜、铁熔炼相关的工业领域所带来的改变甚微，这微小改变大部分体现在熔炉有所加大以及熔炼效率有所提高上面。这两种金属的产量稳步增长，特别是用于军事目的的。一些铁（如用于制造大炮的）从熔炉出来就直接铸造了；更多的被进一步加工成熟铁，可以用钢制造器具和武器。熟铁条的渗碳工艺被一名医生罗伯特·普洛特（Robert Plot）在 1686 年详细描述了；亨兹曼（Huntsman）在 1740 年第一次大规模地加工铸钢，不过，这一工艺早在 17 世纪就为人所知了。次要的金属受技术革新影响的程度更大。铅被卷成薄板卷，用它来覆盖船的底部。镀锡铁皮的制造长期以来一直在波希米亚的边境进行，后来也在法国和英国建厂。在哈尔茨山（Harz）中的戈斯拉尔（Goslar）从铅银矿砂中熔炼锌已经开始。在铜锡合金中铋、锑和砷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冶金学中有学究气的科学家总是满足于

---

[1] 标出的时间是指内里（Neri）的《玻璃制造术》（*L' Arte Vetraria*，1612 年）的一系列译本的时间，梅雷特和库恩凯尔为之加了不少注。

[2] 德莱贝尔（1573 ~ 1633 年）在伦敦度过他的大半生。除了他的军事发明外（包括潜艇），他发明了其他许多"科学"设备，如温控熔炉。与其他发明家一样，他对科学没有什么贡献。

学而不是教，尽管已有一些科学家（如牛顿）研究了合金的物理性质，而还是有许多人把结晶状结构和这些金属的其他性质与机械哲学的观念联系起来。列奥米尔（Réaumur，1683～1757年）是后一部分人中的佼佼者。他的第一部关于黑色金属的科学专著标题是：《锻铁和钢的冶炼法与铁的熔化精炼法》（*L' art de convertir le fer forgé en acier et l' art d' adoucir le fer fondu*，1722年），它是不解自明的。其中关于他的基本微粒的性质不很清楚，列奥米尔“清楚地认识到，为了说明物质的性质，有必要改变其外形和彼此间关系，而且不同物质能够随着温度的不同相互渗透、聚集或分散。”[1] 这是对抽象科学理论应用于实际技术问题的最好说明，尽管这种例证还很少；而且即使在这里，尽管有列奥米尔研究的极大优势，它的直接效益还是很少。组成公司来运用他的方法的尝试失败了，而且，尽管深受列奥米尔工作的恩赐，法国的金属工业还是远远落后于英国。【132】

一个在技艺而不是在理论上极大地受益于化学科学的工业是瓷器制造。在18世纪之前制陶工艺的最后一个阶段为锡釉陶器所统治，在意大利锡釉陶器制造业中很聪明地用鲜艳的搪瓷色彩（通过在釉料中加入金属氧化物来制造）来装饰；还有，在荷兰，在白釉蓝彩陶器（Delft）制造中则在奶白色质地上装饰以钴蓝，这是从英国学来的。[2] 竭力仿效中国瓷器早在蓝白瓷器的制造中就很明显，这种仿制激发了许多对更白、更硬、更细滑瓷体的组成成分的试验。其中最早的试验是在意大利和法国由富于实践经验的陶工做出的，它导致一种“软质”瓷的成功制造，尤其是在圣克劳德（St Cloud，1693年）和文森尼斯（Vincennes，1745年），后者在1753年又在塞夫勒（Sèvres）重建。对可能用于制陶的泥土和矿物以及用于装饰的釉料和颜料的检查成为法国化学家的主要工作。在1710年，弗里德里克·伯特格尔（Frederick Böttger），一个化学家，更是一个炼金学家，实质上是萨克森的奥古斯都二世（Augustus II of Saxony）的囚徒，发现“硬质”瓷可以用萨克森细白土制造，后来高岭土作为原料也为人所知。在迈森（Meissen）建立了一个工厂专门生产这种陶瓷。软、硬质陶瓷的区别由列奥米尔在1727年提出；他发现由沙、盐和其他矿物质造出的软质陶瓷是易熔的一种半玻璃化的物质，而东方的陶瓷是难以熔化的。位于塞夫勒的皇家工厂的厂

---

① 《列奥米尔关于铁和钢的研究报告》，由西斯科（A. G. Sisco）翻译，史密斯（C. S. Smith）作序和加注（芝加哥，1956年），第27页。

② 其他主要品种都是常见的锡釉陶器和德国产的锡釉粗陶器。大约在1680年，英国的一个重要发明是上盐釉，它被应用于许多陶器制造业。

长，法国化学家麦克凯（P. J. Macquer，1718～1784 年）在认识到萨克森陶瓷也是难以熔化的之后，着手在法国寻找类似适宜的原料。真正陶瓷的制作在他的指导之下在 1766 年开始了。许多人都在这一方面做过试验，其中有德国化学家波特（J. H. Pott，1692～1777 年），他在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133] the Great）的委托之下解开迈森之谜。还有英国伟大的陶工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1730～1795 年），他的永恒目标是把科学知识运用于他的产品效益中，提高欧洲陶瓷工业的美感和扩大其影响范围。

此刻，陶瓷业开始工业革命。陶工们的试验产生一种陶瓷，化学家们的试验产生另一种陶瓷，这两者之间的对比产生一个便利的转折点。18 世纪化学家对与陶土的烧制或与陶瓷工业所使用材料的性质相关的复杂化学变化所知甚少。他们为这个工业提出的科学建议是十分拙劣的：首先，对矿物质进行分类的能力和对两种性质进行比较；其次，进行实际试验和从结果中总结的系统方法。这些就足以使化学家投入一项新的过程之中了。因为对于它的发现而言，科学知识并不是必然的（中国人并没有靠科学知识也发现了它），但科学技能肯定能促进并发现它。其他一些发现也是以同一方式做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这种环境下，人们的发现会更多、更经常。一个新发明部分是科学的产物，是零星（也许甚至是虚假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运用的产物。不过，就工业革命的运行机制来说，它在很大程度上还一直处在纯粹经验主义发明的支配之下。

2.6 生理学、医学和健康

在工业增长和转变之后，人口规模扩大就成了 18 世纪经济史中最不可思议的因素。尝试对它进行解释的人通常都借助于医疗的发展，但在对这些进行讨论之前，要对生理科学，尤其是它们与医学的关系有所阐述。这里的情况与物理学和技术发生相互作用的普遍情况没有什么两样。18 世纪的医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经验主义的：它的主要“发明”，与工业中的那些一样，都是在缺少精密科学的深厚基础的情况下做出的——如预防注射和种痘。医疗经验，像工业的一样，显示了一些具有一般生理学重要问题的存在；而且在生理学中所做的一些工作也被反映在医学中，正像物理学中的工作被反映在技术中一样。但是医生，与制造者一样，只是一种边缘意义上的科学家，尽管他接受了科学训练。许多医疗问题，与技术问题一样，对于科

学分析和解决来说还太复杂。

对生物的兴趣基本上被分成两个不太相关的活动：自然史和医学，即人以外的生物学和人的生理学。只是，植物药理学所提供的交叉联系和许多博物学家职业都是医生（尽管一些最伟大的不是）这一事实有时还是会打乱这种概括。而且，直到大约 18 世纪中叶，自然史仍是被植物学家统治着，甚至到了 18 世纪的后半叶，杰出的博物学家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1707～1778 年）首先还是一个植物学家。从 16 世纪末到林奈的时代，植物学家主要关心的是分类法：在显微镜成为科学仪器之后（1660 年左右），一些博物学家像尼希米·格鲁（Nehemiah Grew，1641～1712 年）研究植物组织学，但是，一般的植物学家把对种的描述与分类作为他的目标。因此，尽管这时这一有限的领域里有不少成就，植物学对于人类更广泛的事务来讲没有多大重要性。有一些专门的发现，像植物有性繁殖，在科学上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但即使是这些发现，对开阔人们的思想见识也并没有多大作用，而且它们对加强农业实际工作者的努力也没有多大作用。由诸如查理·邦纳特（Charles Bonnet，1720～1793 年）、孔德·德·布丰（the Comte de Buffon，1707～1788 年）和伊拉兹马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1731～1802 年）等等这样的博物学家所提出的物种稳定性的传统观念受到了挑战，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具有更广泛意义的可能性，但是生物学发展史的黄金阶段属于 19 世纪而不是 18 世纪。 【134】

在动物学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倾向，这些新东西在很大程度上也属于医生的领域。动物解剖自古以来就对研究人体解剖大有帮助：17 世纪后半叶出现了许多比较解剖学的优秀著作并且动物分类学也取得了进展，这种进展主要归功于约翰·雷（John Ray，1627～1705 年）。更为激动人心的是显微镜被发明的奇迹。现在有可能解剖昆虫的“肢体”和追踪它们的生命史。一个完全未知的生命世界被揭示出来：醋中醋线虫、雨水和精子中的微生物。有机物的细胞结构与在血和奶中看到的细胞一样，这是为人们目睹的关于物质的微组织存在的证据，这是科学以前想像到的，但是以前无助的感官无法察觉。一些新观念也很快形成——最突出的理论成果是微动物学家们（他们认为精子是发育未全的胎儿）与卵源论者［the ovists，他们接受了德·格拉夫（de Graaf）关于哺乳动物的卵的有名发现，并认为那是胚胎的形式］之间关于显微镜的争论，它只有到了 19 世纪早期才能得到解决。[①] 这个生

① 真正的哺乳动物的卵细胞在 1827 年才第一次为冯·贝尔（von Baer）观察到。

殖机制问题既是生物学的兴趣也是人类的兴趣之所在；在它被解决之前关于【135】微生物奇异习性的许多资料都被收集起来；特赖布雷（Trembley）的一篇关于水螅的著名论文（1744 年）既是实验性的又是描述性的。显微镜被证明是动物学的重要工具，并且它极大地改变了动物学的发展，但是这一仪器在光学上的缺点，加上缺少利用它进行研究的化学方法，阻碍了对微生物结构和它们的生理功能的研究。

鉴于这些原因，人们对人类与动物各物种共有的各器官功能的认识会缓慢地走向成熟，而且正是在这里古代的概念和术语［“体液”、“情绪”、“消化（coction）”等等］被长久地使用。医学各分支学科（解剖学、生理学、药理学、病理学）几乎没有例外地为医生们所掌握，他们要时刻记住实践方面的要求，尽管化学家也贡献了许多新观念。在这些分支学科中，解剖学的基础是最牢固的，因为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医学意味着描述以血液供应和神经联系相关联的骨骼、肌肉和器官的位置，但到接近 18 世纪末时，从表面就可以描述肌肉、肝脏、心脏、脑等等的不同结构了。不过即使到那个时期，“生理学”主要地还是用肉眼描述的事物：对胃在消化中的功能或肾在分泌中的功能，人们只能给予一个粗略的、不确定的说明。也许最好的情况是不羞于承认自己的无知，而不是用想像性的解释来搪塞。现代生理学通常被认为是开始于哈维对血液循环的发现，它发表于 1628 年——事实上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这一发现长期无人能超越，也没有产生什么结果。因为哈维生理学理论最有价值的遗产是他的科学方法和推理方法，这为他的后继者所发展。他是医学从想像到事实转变中发挥重要影响的人物之一。

如果生理学家不能得出比那些当时正在流行的说法更为通俗易懂的解释，他们怎能前进呢？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人们赞成两种有密切关系的方法：机械的和化学的方法，这两种方法的联合至少为统一科学的形成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机械方法的代表人物有哈维（他证明了身体的血液供应是一个简单的水力学问题）和笛卡儿（他相信动物是有机的机械）以及机械哲学的权威。例如，可以通过一些肌肉影响到肺的运动来描述这种机制，而且显示呼吸的目的在于使空气与血液接触。斯蒂芬·黑尔斯（Stephen Hales，1679～1761 年）对动物血压进行了细致而重要的研究，对树液的同类运动【136】也进行了研究，他的研究工具是流体静压仪器。他还发现大量“不易挥发的空气”可以从有机物中产生——这是一个直接对生理学家而不是化学家有提示性作用的事实。阿尔布雷希特·冯·哈勒尔（Albrecht von Haller，

1708 ~ 1777 年）对机械生理学有一套更为复杂的看法，他认为人体的核心行为是一种过滤器，通过它适当的营养粒子或者被增添，或者必要时被血流滤去，而且有害的粒子同样被去除。不过，大多数人体都受到“头脑激情”的影响（它在人体中的位置迄无确定），人体自身是一个高度的机械—化学系统，执行的器官只是发挥它们被赋予的功能。上颌腺和皮脂腺会被疾病所扰乱，但是，无论任何东西都不会使它们分泌胆汁，它们所分泌出来的是唾液和汗，这与时钟会敲出和谐的声音一样。

化学方法同样是建立在类推的基础上。把试剂放在试管内后会产生一定的结果；同样的结果一定是在同样的体内环境内产生的。因此，酸是强有力的溶剂；胃液是酸性极强的；所以食物必须在胃里由熟悉的酸的化学反应来溶解。这是一个大有希望的进路，但它会因为化学知识的不足而受阻塞，例如，分析骨骼、肌肉和脂肪的或甚至植物材料的各种化学成分的努力产生非常不成熟的看法。实验室的类推也同样可能误入歧途。由化学所得到的经验表明：根据所提供热量不同，反应的进行是各不相同的，或者根本不发生反应；这会导致一种错误的观念：人体各部分温度的变化对那里发生的反应有决定性的影响。在对呼吸的研究中人们取得了最好的结果。哈维对循环血液的功能一直秘而不宣。在 1669 年，里查德·洛厄尔（Richard Lower）指出了静脉血和动脉血的区别——这两者都可以通过在空气中摇动制作出来。因为生命和燃烧都同样需要空气，正像气泵中的实验所证明的，空气中的一些东西由于呼吸被传给了血液，并被动脉中的血液携带着流动，这种推测似乎是有道理的。这种成分被认为是大气中所包含的微粒的一种，它也作用于易燃生物体的“含硫的”微粒以产生火。不过这些有趣的推测并没有为精确的连锁实验所证实，也没有被所有 18 世纪生理学家所肯定：呼吸化学需要拉瓦锡（Lavoisier）的燃烧氧化理论才能得到解释。

将生理学建立在机械（或物理的）和化学原理基础上的冲动毫无疑问【137】是正确的。由非常简单现象的知识来解释高度复杂现象的努力也是值得称赞的。遗憾的是，据我们所知，类似于这种非常简单的现象太少了。将现有的化学技术运用于生理学研究的方向似乎可以类比于用斧子在眼睛上做手术。尝试运用现有这些观念的生理学家也要忍受其缺点：机械水平的解释与化学水平的解释是非常不一致的——他也许发现把血液视为各种不同微粒的合成物有用一些，每一种都服务于特别的生理目的，但是当他在消化过程中追踪这些微粒的来源时，在化学水平上的这种解释被证明是不足的。因为，尽管有玻意耳，有用的化学论述并没有用微粒的术语表达过。而且最后，病理学

把有危害性的试管运用于机械生理学中了。如果生物体的过程是一个纯粹的机械或化学过程，在疾病中表现出来的失调的原因是什么？医生的问题是病人，而不是健康的身体，而且在延续到 18 世纪的医学传统中每个人都是有病的，除非他服药。身体好像并不是一台运转正常的机器；在正常生命条件下它还总是出问题，出现“退化”，而且要求正常的调整和恢复。因而生理学家被迫妥协：

> 肾管中的血液……由肾的弯曲管道所带来的，积存在乳头状突起的直管中，其中大部分是水，而且油还有盐与它混合在一起，它还包含着任何一种稀薄的液体。但是每一根输尿管起源处的最小直径和它坚定的抵抗力似乎都排斥粗油、乳糜和可凝结的浆。因此，血液不断增强的流动性如此容易地迫使红血球通过这些管子，而且通过病态的松懈，它们把真正的脂肪、乳糜、肉和饮料的盐给传送出去。但是当肾的力量被收敛剂恢复时，尿回复它的自然状态。[1]

因此，哈勒尔（Haller）对肾过滤功能的缺点和适宜治疗方法的反面效果做出了他的解释。但是，他被迫使用了一个含糊的“病态的松懈”作为失调的根源。从机械学上来解释这种病理状况非常困难，因为尽管由“酶”或其他事物所引起的健康有机体的感染概念在 18 世纪已经讨论过了，通常还是把病因归于正常功能的紊乱，而这无论从机械学上或化学上都不能得到【138】说明。

实际上，这一阶段的“科学”生理学对首先能够确诊病人的情况，然后想知道如何进行治疗的医疗工作者没有多大帮助。与过去一样，这些方面的进步取决于临床经验。在临床医师像托马斯·西登海姆（Thomas Sydenham，1624～1689 年）的著作中科学的方法是明显的，医生必然首先以一种经验主义的态度看待他的医术，这不可避免地会阻碍科学方法的发展。

也许医学的基本需要是对疾病进行准确描述，以便它们能被医生所诊断。在 17 世纪后半叶有一部这一类著作值得注意——其中各种病症都得到细致的研究，有一些是第一次得到研究，它们是皮肤病［鲁瓦洛（Roilau），1648 年；韦利斯（Willis），1670 年］、佝偻病［格利森（Glisson），1650 年］、中风［韦普弗（Wepfer），1658 年］、糖尿病［韦利斯（Willis），1670 年］、痛风［西登海姆（Sydenham），1683 年］和肺结核［摩尔顿

---

[1] 阿尔布雷希特·冯·哈勒尔（Albrecht von Haller）：《生理学初阶》（特洛伊，1803 年），第 383 页。

(Morton), 1689 年]。西登海姆 (Thomas Sydenham) 的书在这一方面特别有指导意义：他是一个伟大的教师和医生。莱顿 (Leyden) 与爱丁堡 (Edinburgh) 学院 (晚一些) 的医学训练由于它们教授的一些优秀著作而得以提高，其中，赫尔曼·博尔哈夫 (Herman Boerhaave, 1668 ~ 1738 年) 无可非议地享有最高的声望。同一时期的突出成就还有对化学药物和外来药物像金鸡纳皮 (奎宁) ——现代医学的第一个特效药——的聪明使用。但是缺少理论 (西登海姆宣称："所有写下的东西都是假设。") 或缺少建立理论的可靠事实的医术的进步都是注定进展缓慢的；而且即使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逐渐传播的东西也是逐步才有收获。当时，为欧洲大多数农民接生、治病和做殡葬的不是医生而是当地的聪明女人。

18 世纪出于两个原因使死亡的人数在减少。再没有大范围传播的瘟疫，像 17 世纪前半叶经常发作的那样。瘟疫在 1666 年以后的不列颠群岛 (the British Isles) 很少出现，而 1679 年以后则无人知晓。马赛 (Marseille, 1720 年) 和墨西拿 (Messina, 1743 年) 的瘟疫源于由近东幸免于难的中心区所带来的传染病，而且也仅限于这一范围内。其他次发作也没有超出奥地利边境。大约在 17 世纪其破坏性变得越来越强烈的天花最终得到控制，其原因起初是由于预防注射 (1717 年)，然后是由于种痘 (1789 年)。但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医学都没有得到多少称赞。也许对来自可疑地区的船只和物资进行检疫——这是医学界所支持的——在防止瘟疫传入到已不再是瘟疫流行地区的西欧地区还是有成效的 (尽管英国在 1720 年之前还没有检疫法)：瘟疫的消失似乎主要归功于褐鼠的优胜力量。预防注射是土耳其长期以来很熟悉 【139】 的以经验为根据的做法，它被玛丽·沃特莉·蒙塔古夫人 (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 引入欧洲。种痘是欧洲几个地方的人民所采用的另一种经验主义预防措施，爱德华·詹纳 (Edward Jenner, 1749 ~ 1823 年) 使它登上医学的殿堂。种痘被迅速地接受，这说明了医学专业愿意利用合理的经验观察，而不为其通过对疾病的研究来发现治疗方法的能力辩护。

人们普遍认为，导致 18 世纪健康得以提高的其他因素是卫生学而不是医学。在这种本质是社会的改革中，一些外行像约翰·霍华德 (John Howard) 起着主要作用，他们发现有必要批评医疗职业的懒散作风。于是，人们建立了新医院 (包括隔离医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以使老医院提高它们的卫生程度和敬业精神，这些也使这种监禁状态不至于过分可怕。接近 18 世纪末时，城市卫生状况大为改观，铺过的街道、源源不断的自来水设施和完善的排水系统得以形成。慈善团体也在为穷人们提供很好的医疗帮助。沼

泽地被排干减少了无处不在的疟疾。不过，只有英国在 1800 年之前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取得巨大的进步。

不过事物都有两面性。例如，接种是以其朋友们为代价来为患者带来一定程度的安全：人们有理由推想它**提高了**总死亡率，“接种通过把（天花）传播到本来可幸免于难的地方从而导致比它拯救的还多的人的死亡”。因而在巴黎 1763 年以前它是被禁止的。[1] 无论如何接种的人数总是很少。种痘由于流行的偏见长期以来也被限制。医院脏乱，空气不流通，有时死者与活人共用一张床。无钱很难进去。只是对于穷人来讲被医院接纳是一种真正的施舍——即使最破烂的居所也可能是一个更健康的地方。败血和热病是最容易在产科医院传播的。城镇的街道依然是污秽不堪、嘈杂混乱；如果自来水的源头受到了污染，它会把疾病传播得更远；如果河水未经处理而饮用的话，“卫生的”抽水马桶便成为下层土和河水污染的潜在途径。城市里生活着许多人，他们的寿命在缩短。[2] 到这一时期末，新工厂所在的城镇的生活状况更加糟糕。尽管采取了各种措施，恐慌还是让 19 世纪中叶的改革者们【140】心有余悸，诸如人们很难想像前工业时代的状况曾经那么糟糕。即使在那种情况下，总人口中相当大一部分人成为市民的结果是死亡率不可避免地提高了。

为了认识 18 世纪医药令人悲哀的无能为力——医药的作用丝毫不比以前的时代更大——我们要提到的是，这种无力感形象地表达在人们对让人尊敬的英国医生约翰·科克雷·莱特索姆（John Coakley Lettsom）的嘲笑中：

当患者向我求医，
我作为医治者为他们放血、让他们发汗；
如果这之后他们选择死，
那又怎能怨忠实的我，莱特索姆呢。

这并不是在否认医药为提高人的寿命所做的贡献。但不得病还是（总是）比希望得到治愈要安全得多，而且身体对传染的抵抗是最好的药物。

医疗进步会极其有效地降低死亡率，这种假说是试图解释 18 世纪英国人口增长的人口学家提出的，在出生存活率保持不变的前提下，他们将人口增长归结为死亡率的降低（尤其是婴儿）。在决意以此进行解释后，他们就从医学史中寻找证据以支持它，尽管医学史家在对同一证据进行评价时态度

---

① 引自康奈尔（K. H. Connell）：《1750 ~ 1845 年爱尔兰人口》（牛津，1950 年），第 214 页。

② 即使在瑞典，小城镇每千人的净生育率是零，斯德哥尔摩在 1802 ~ 1815 年的净生育率是 −6.6‰，农村是 7.3‰。据说城镇像经历了一场瘟疫。

谨慎。仅从医疗上考虑没有人会断定人口能有如此巨大的增长，正像英国和爱尔兰危难和战争期间，尤其是在大约1780年以后所发生的那样，也没有任何一个这样的断言会得到当时资料的支持。

爱尔兰所发生的事件得到了细致的研究，而且对这种医学假说的价值提供了最后的检验。[①] 爱尔兰把它的主要努力都放在科学与医学上了，而且农业人口缺少城市福利设施；农业人口从17世纪末的2 250 000人增加到1780年的4 000 000人和1841年的8 175 000人。如果医学与这种增长有任何联系的话，人们应该看到城镇的死亡率最小，而出生率最大——因为农民与城里人比起来在医疗条件上要差得多。事实正好相反：农民生养了更多的孩子，寿命更长。而且在爱尔兰生育率并不是保持不变的：它在增长。因为爱尔兰人结婚更早，生育的孩子更多，而且在这一时期孩子们并不被认为是他们家长的负担。正如亚瑟·杨（Arthur Young）所说，农民们“发现他们的幸福与舒适总的说来是与他们孩子的多少相关，而且没有什么能比无后更不幸的了”。[②] 可以预期马尔萨斯模式对人口的增长所施加的限制会得到应用的，正像它对付19世纪40年代及其以后的灾难性力量时所表现的；由于获得了马铃薯这一新的食物来源人口翻了好几倍，在这之前马尔萨斯模式对人口的增长的限制是不具有适用性的。大量的马铃薯和相当数量的牛奶构成农民通常的饮食，这已足够维持健康的身体了。母亲身体状况良好可以生养孩子，而且由于马铃薯比同样数量的谷物需要更少的土地，并且可以在贫瘠的土地上生长，因此它可以提供足够的营养以扩大家庭。爱尔兰的情况也被马尔萨斯提到：当食物的供应潜在地增加时，人口趋于增长以消耗它。 【141】

最近，这种把人口增长解释为对经济机会的反应的观点**在经过必要的修改后**也应用到了英国。[③] 几乎不能相信，英格兰的城市并不比爱尔兰的更有害，而且有充分的理由推断：坚持生育率不变的统计数据是虚假的。一般地讲，较高的净繁殖率是与出生人数众多相关，而不与较少的死亡人数相关。[④] 有利的经济环境鼓励人们早婚，因此提高了生育率，这种有利的经济环境在英格兰比在爱尔兰更为复杂一些：它开始出现于1730～1755年收成好、食物便宜时期，包括由工业化所带来的就业，发展农业以满足不断增长

① 参见康奈尔前引书。

② 参见康奈尔前引书第15页。

③ 哈巴库克（H. J. Habakkuk）：《18世纪英国的人口》，载《经济史评论》，第2辑，第6卷（1953年），第117～133页。

④ 见前引书，第123页。

的对食物的需要的能力，行会的衰落和对年轻人挣钱能力进行类似限制的减弱，教区救济体系。经济增长带来了经济机会：如果孩子们不能在新工厂就业的话，情况就不妙了，他们就不能生存下去。因此，经济史学家赞同亚当·斯密所建立的均衡——“劳动的报酬必定以这样的方式促进劳动者的婚姻和繁衍，就是使他们能够以不断增长的人口来供应不断增加的需求”[①] ——这种均衡在医学史中找不到理由提出质疑。因为如果医学能使更多的人们活下去，它却不能养活他们，让他们就业，正像在英格兰和爱尔兰所发生的一样。

【142】 尽管没有什么疑问，但只要资源条件允许，全欧洲的人口都在扩大。（人口的）增长事实上被饥饿而不是疾病抑制。在瑞典，黑克舍尔（Heckscher）教授写道，“食品供应是影响死亡率的决定因素，被认为比医疗因素重要得多。”从由传染病所导致的死亡与庄稼收成数量的关系来看，这是显而易见的。他相信，欧洲其他地方的情况大体如此：事实上，也许它们比瑞典的情况更糟，其出生率和死亡率更高。[②] 在 19 世纪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常常也是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这是意味深长的。现代的经验是：由于医疗的介入死亡率下降，但并不伴随以出生率的下降，人口的增长对其资源产生极大的压力，生活水平下降，因为医疗的效果是为了降低马尔萨斯开始人口控制的界限。但是，在 18 世纪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生活水平保持不变甚至更高，这意味着经济条件并不一定是限制人口数量的重要因素，倒可能是允许人口数量增长的因素。

由于这一时期英国农民生产粮食的能力无疑是有所提高的（也许比其他国家的农民更为突出，尽管其他地方的趋势是一致的），因而，我们就有理由对农业发展是不是一切都应归结于科学进行探讨。我们看到，没有多少证据支持这种看法。皇家学会曾设法在中上层人们中间鼓励这种探讨的兴趣，尽管没有回收到几份农事实践询问表的答复，对马铃薯和苹果汁的宣传也失败了。将近一个世纪以后，技艺学会颁奖以表彰当地引种像苜蓿这样的作物和农业工具的新型设计，但是这种努力的总体效果似乎并不很大。除了土地分配和荒地开垦（也许是提高总产量的最大因素）的变化之外，英国农业改革的主要动力，与其他地方一样，似乎是来自于竭力仿效荷兰式复杂

---

① 哈巴库克（H. J. Habakkuk）：《18 世纪英国的人口》，载《经济史评论》，第 2 辑，第 6 卷（1953 年），第 118 页。

② 黑克舍尔（E. F. Heckscher）：《工业革命之前瑞典人口》，载《经济史评论》，第 2 辑，第 2 卷（1950 年），第 266 ~ 277 页。

的轮作方式，它避免了休耕年岁庄稼的损失，还能够养活大量的牛群。至少可以肯定，无论是出于什么理由种植芜菁、人工种植的草、豆等等庄稼，它们在农业循环中的功能还没有被理解。有些人认为不同的作物从土壤中吸取不同的营养，但这种看法还只是一种经验的观察。化学分析还是太粗略，以【143】至于不能分离出植物的成分，而且还只能测量一下水、“油”、“盐”和一些“土”的构成。把泥灰、粪肥、石灰和其他肥料施放于不同种类的土壤中这种行为的有益性也不能得到解释。在18世纪农民们讨论最多的植物营养观念是由杰思罗·图尔（Jethro Tull，1674～1741年）提出的，他认为土壤中的微粒直接进入植物的组织中去了。如果用工具把土壤分离成足够小的颗粒，那么就没有必要施肥了。这只是一个简单“机械理论”的例子，它是不能用化学理论进行解释的。图尔的“新农业”是建立在一种设想而不是由科学证实过的理论基础上的，这一点应该得到强调——由于当时的科学知识倾向于解决问题的化学方法，不过科学不足以揭露图尔的谬误。植物生理学的开创者像尼希米·格鲁（Nehemiah Grew，1641～1712年）和斯蒂芬·黑尔斯（Stephen Hales，1679～1761年）的著作是重要的，但是，它们并没有对正在进行试验的农民们在实践中迫切要解决的问题给出答案。植物生命中碳—氧循环是在1774年首先由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观察到并得到描述的；对氮循环的认识要等到19世纪。关于植物组织形成中空气的作用在科学家有所认识之前，他们还在黑暗中摸索，而前进中的农民们则除了依靠经验之外得不到任何指导。

2.7　工业革命时期的科学与技术

并不是每一种在18世纪改变了它的品质的产品都是由重大的技术变化带来的。从逻辑上讲，一方面是经济结构和组织的变化，另一方面是工艺的改变，二者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区分，尽管历史地看是后者加速前者的变化。像酿造业就是一个在没有技术刺激的情况下发生经济变化的例子：事件发生的类型类似于各主要制造业，但啤酒酿造的方法只是在规模上有所改变。蒸气泵是一个酿酒新装置，但只是在酿酒产业化之后才引进的。也许更引人注目的是内陆水运的突然升值，其结果是产生一批运河开掘狂，英国尤为突出。必要的工程技术在路易十四王朝朗格多运河（Languedoc Canal of Louis XIV' reign）中得到完美的应用，除了缺少经济动力推迟了对它的使用外—【144】

切均好。相反，好像是缺乏技术动力导致了一些制造业像制钉、制靴、制鞋业还保持家庭作坊的水平。当 19 世纪末代替手工劳动的机器出现时，工厂的组织随之很快发生变化。在这一阶段，像这些新机器的发明者总是想要使工厂生产成为可能，而工业革命的最早发明者没有预见到他们努力的结果——工厂的出现。

在评述 18 世纪早期的整个工业活动时，技术发明所要解决的问题归为三类：那些通常由工匠手工完成的工序要改由机械联动装置操作；有关新型能量的利用；与冶金、化学过程有关的新工艺。第一类以凯（Kay）的飞梭为代表；第二类以瓦特改进了的蒸汽机为代表，第三类以合成纯碱为代表。如果技术进步和促其发生的愿望的实现是以不成功尝试的漫长历史为标志的话，那么到了 1700 年每一类技术发明都到了关键时刻。工业革命的每一项重大成功都是在以前一系列失败的基础上取得的；而且，自然可以推论成功是发明需求的集中体现，在探索中，探索者被激起了更坚定的毅力和冒险投资的更大决心。关于这一点还应该加上这一事实，技术上总体的、逐渐的进步反过来为在具体的问题上巨大的进步创造了条件：瓦特的发动机的优越性与镗孔技术的发展的关系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而且在第三类发明中有一些是由于科学的逐渐进步带来的。

第一类机械发明是最难以讨论的，因为从中难以辨别出一种逻辑模式；不过这样的发明是纺织业中工业革命的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如此多的发明似乎都依赖于发明者个人的经验和智慧，以至于在思考发明者取得成就的道路时考虑更多的是他的个人经历，而不是一般的技术问题。因此终于发生这样的事情：不同的人发明不同的机械要达到同样的目的——诸如为编织而制纱——一个可以在这里使用，另一个可以在别处使用，不用在它们中间进行选择。在有些情况下凭经验可以决定这架机器可以生产出最好的经纱，另一架机器可以生产出最好的纬纱，尽管这两架机器所生产的产品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人们可以指出所有的机器制造共有的特征乃至成功发明的共同特点，【145】诸如钢铁的巨大效力、机械的高度技巧、供人们使用的改进了的工具。许多机械都可采用铁齿轮，这样就不可能采用配上去稍大的木制轮牙。如果人们有理由推论：1800 年的纺织机械不能在更早一些时期被成功地建造，那么在它能够被建造出来的时候要对它的设计思想的出现进行说明也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自然，人们比以前更为经常地进行有关机械发明的尝试，也许机械知识也比以前传播范围更广。一些简单的零件（齿轮、棘轮、弹簧、凸轮、偏心轮、曲柄、滚轴、棘爪、导轨等等）装配在一起就成了一台机

器，这些有着不同的外观与用途的零件比两个世纪以前更让人熟悉。就像在刘易斯·保罗（Lewis Paul，1738 年）和里查德·阿克赖特（Richard Arkwright，1769 年）的纺纱机上用了一对压延辊（drafting-rollers）一样，一台重要的机器要追溯到它的前身，在上面这种情况下是采用重型钢滚轴来延长和减小金属的磨损。另一方面，人们怎样才能说明“指令”一台机器的穿孔片系统的发明［布雄（Bouchon），1725 年］呢？这似乎是完全新奇的观念。新机器中很少能有像保罗或布雄的发明中所表现出的这种独创性；大多数机器的独造性在于重新综合了熟悉的装置而且有一些（像刺果起绒机）还是相当简单的。一旦受到激励，同时生产规模证明一台机器的花费是值得的，许多工艺的操作像粉碎、混合、搅拌或压碎都很容易机械化，这并不比古代面粉机和漂洗机复杂。

至少人们可以说阿克赖特、哈格里夫斯（Hargreaves）、克朗普顿（Crompton）、沃康松（Vaucanson）、雅卡尔（Jacquard）等等对科学的贡献是巨大的。这时机械科学不再仅仅是机器设计了。风行的讲演者都在演示螺丝钉、滑轮、斜面等等，但所有这些装置作为实用机械都太为人所知了——如果不是从理论上，也是从经验上——以至于不需要进一步的推广。在上一世纪雷莫（Roemer）对轮齿最佳形状的早期研究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也没有后继者。再者，17 世纪科学家对热胀和计时都投人极大的注意力；但是要留待诸如哈里森（Harrison）、乔治·格雷厄姆（George Graham）和皮埃尔·勒罗伊（Pierre Leroy）这样的钟表制造者来对钟摆或弹簧秤上由温度变化所带来的影响进行校正。除了约翰·史密顿（John Smeaton，1724～1792 年）是个例外，在新生产机器的发明者中没有人与有组织的科学相关。

其余类型的发明，情况正好相反。牵引车的改进主要是具有科学抱负和对科学方法敏感的人的杰作，他们的态度比纯粹的机械发明者更为老道。对于水力工程来说，德·贝利多（B. F. de Belidor，1693～1761 年）、莱昂哈德·欧勒（Leonhard Euler，1707～1783 年）和其他人的科学著作无论如何不是无关紧要的，而且他们的一些结果被吸收到实践中。约翰·罗宾逊（John Robison，1739～1805 年）在一篇不太专门的文章中从理论角度显示：如果水流都被小的控制阀阻挡住的话，为水供应系统安装大管子就是浪费金钱；而且，如果水的供应量是一定的话，最好是设计一个水轮使水流减缓而 【146】

不是加快。[①] 他很清楚地认识到理论的总体缺陷，尤其是当它传播到工程师中间时，工程师们所受的教导只局限于对静止状态下机器的运转进行认识：

> 但是当平衡被其中一支优势力量打破时，机器也会运转；而且惟一一个让人感兴趣的问题是：**运转将会是什么样的？**直到这个问题被正确地回答了，我们还是没有学到任何重要的东西。即使在最简单的情况下也很少有工程师能回答这个问题；而且他们不能以一种确信的知识回答未经试验的机器的运转会是什么样子。

两位最著名的新技术工程师史密顿和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 1736～1819年）都被训练为科学仪器的制造者；他们都是皇家学会的会员，史密顿以他的《对能转动磨的风与水自然能量的实验研究》[②] 荣获了科普利奖（Copley Medal），瓦特以他对化学的兴趣而闻名；他们都与科学界的朋友自由地交谈。如果 18 世纪的条件允许的话，史密顿和瓦特几乎要成为科学技师，而实际上成了工业化学家，科学的方法而不是它的任何一种见解对他们有用。他们对实际的发动机的研究使他们与 19 世纪热力学中像**功**（*work*）和**能**（*energy*）这样的概念接近，尽管当时的科学关于这方面并没有提供充足理论结构。科学理论缺乏使得史密顿和瓦特在黑暗中跌倒；而在 20 世纪前半叶，科学理论在对实践工程师所关心的那些问题的有力攻击中得以形成。这些问题关系到原动机的效率。水轮每一次下落都会取来一定数量的水：一台蒸汽机一天中燃烧如此多的煤；问题在于找出如何比较不同发动机的工作效率的方法，而且确定可能是最好的设计。史密顿建造了不同类【147】型的水轮的模型，在他的试验中以在一分钟内它们所举起的重量来衡量它们输出功率之间的差距。结果，他制定出一些有用的设计原则。一台蒸汽机的“能率”的计算通常是每蒲式耳（相当于 84 磅）的煤燃烧所产生的能量能举起 100 英尺磅的水。不过，瓦特回到了史密顿对能量的定义，把 33 000 英尺磅称为“马力”。似乎在他们的试验和讨论背后隐藏着一个完美的发动机理想，它能把一切燃烧的能量或有落差的水能转化为机械能，而现有的发动机都只是接近这一理想；不过对这一理念进行准确的语言描述是很晚以后的事了。

---

① 罗宾逊在为《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 3 版（1788～1797 年）撰写工程学词条时这样写道；文章又被收入他（死后出版的）的《机械哲学体系》（爱丁堡，1822 年），参看第 2 卷，第 574 页、第 601～612 页、第 708 页。

② 《哲学学报》，1759 年。

至少他们的探索告诉他们自己：能够用于抽水或发动机器的很大一部分能量都被浪费掉了，部分是由于不可避免的摩擦和零件的惯性，更多的能量浪费是由于拙劣的设计，这一点在蒸汽机上表现最为突出。史密顿对纽卡门(Newcomen）发动机做了改进，其功率是前者的两倍。由于采用了独立的冷凝器和他对活塞上面的蒸气压的利用，瓦特更进一步将其功率提高了3~5倍；他用蒸汽机获得转动的方法极大地扩大了它的用途。纽卡门发明了一台抽水机，瓦特（蒸汽机）是工厂和交通的能量之源。

人们常常认为瓦特的发明——对工业革命第二阶段比第一阶段更为重要——极大得益于苏格兰化学家约瑟夫·布莱克（Joseph Black，1728~1799年）对热能的研究。[①] 瓦特本人在1814年曾得体地称赞布莱克对热力学所做的突出贡献，但否定了这一说法。[②] 尽管他承认从布莱克那里获得了潜热的概念，不过他声称他早就从实验中发现了蒸气的这一特性，而用于说明纽卡门发动机缺点的其他事实此前已经存在了，尽管布莱克的理论可以解释所有这些事实，但这种解释对他自己改进发动机根本就不重要。“这些改进是在早已成立的事实上进行的，蒸气是通过与冷物体接触从而冷凝的，而最晚认识的一个现象是，真空中的水加热不到100℃就沸腾了，其结果是：除非汽缸和其中的物质每次都冷凝到那个温度以下，否则是不可能得到真空的。”[③] 这是一个科学与工程平行发展的有趣的例子，一方面发展环境使布莱克在物理学上做出了重大发现，另一方面使瓦特成功发明了现代蒸汽机。【148】瓦特很清楚，为了从中得到有用的结果他是多么地需要以经验为基础的事实；布莱克虽然创立了说明这些事实的理论，却与有用的结果毫无关系。这似乎是用于说明科学与技术区别的一个非常恰当的例子。瓦特宣称他的主要发明与布莱克毫无干系，这是完全可信的，而且它表明了：与科学理论相比，经验对技术依然是十分重要的，仅从科学理论中得不到任何具体应用的推论。瓦特时代之后科学与工艺的背离依然在继续。蒸汽机这一工程依然被一些有实践经验的工程师像阿瑟·伍尔夫（Arthur Woolf，1776~1837年）和理查德·特里维西克（Richard Trevithick，1771~1833年）发展着，而热机理论的研究也在一些数学家手中（主要是在法国）进行着。很久以后热

---

① 这是罗宾逊（Robison）的意见，布莱克本人也很支持这一看法。

② 瓦特在1814年5月给大卫·布鲁斯特（David Brewster）的信中（此信收入前已引用的罗宾逊的著作，第2卷，第3~5章）写道：“我从来没有也不能认为我的改进工作是发源于（与布莱克）那些通信之中。”不过，他承认他从布莱克那里学到了不少关于科学推论和实验的东西，两人共同进行关于蒸汽中潜热的探索。

③ 前引书第8章。

力学才在实践中获得了一些意义。

热力学是从经验的根中生长出来的最后一个科学分枝。而化学制造业中的情况正好相反，正像所期望的那样，更为现代的关系最先在一些比较简单的过程中得以显现。直到大约 18 世纪中叶化学药品的配制和使用还是初步的，尽管在各种工业中化学过程还是很重要的。除了织物整理——漂白和染色——化学过程还包括制革和造纸，一些冶金工业和肥皂、玻璃、军火、糖、颜料、清漆、胶水、墨水和其他产品制造业。它们所需要的大部分原料或者是从有机物质中提取的有机物，或者是经简单加工过的物质。有机“化学药品”包括尿、酸奶、糠在其中发酵的水、血液、烟灰、角质物和骨、栎树皮和栎瘿、牲畜粪、醋和从旧酒桶上刮下的酒石等等。在所有这些药品中活性试剂与大量的腐烂物质混合在一起。从草木灰中得到苏打和钾碱，从马厩地面和鸽舍中得到硝酸钾。由古老的焙烧工艺先获得无机物，再从中得到有用的腐蚀剂明矾；其他重要的商品像硫、盐、矾、炭、石灰和白垩或者是直接从自然的储藏中得到，或者是经火烧获得。酸——其中硫酸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主要是通过药学的方法制造的。这些物质再加上矾及硝石算是仅有的纯粹的商用化学药品。

18 世纪晚期，化学技术的进步包括方法的改进、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用【149】几乎完全是人工制品代替混乱的有机物。加热硫以得到硫酸的生产使酸的价格大减，它首先被用在大型玻璃容器上，而后用于挂铅室［lead-lined chambers，罗布克（Roebuck），1746 年］。蒸馏罐中的木炭会使火药力量更大。在这些情况下产品并没有发生变化；更为精细的技术改进是使用硫酸和用漂白粉代替酸奶以及其他酸液，用从盐中提取的苏打来代替植物碱。这时所供应的有机物是昂贵而低效的。用酸奶来漂白和在太阳光下晾晒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和广阔的地面；在北部仅限于夏季几个月。草木灰中碱的含量比较低，而且（直到苏格兰短命的海草灰产业成长起来时）在英国和法国，碱严重地依赖于从西班牙进口。因而，这两国人发现新物质和新方法的动机十分强烈。氯的漂白作用[①]被法国化学家贝特洛（C. L. Berthollet，1748～1822 年）在 1785 年发现；同时，当气体化学还处在初级阶段时，这种发现并没有多大实际用途。法国制造液态氯进行漂白的尝试失败了。不过在 1789 年，查理·坦南特（Charles Tennant，1769～1838 年）通过在石灰中吸入氯气成功地实现了，而且后来在格拉斯哥的一家工厂里由氯化石灰大量生产干燥漂白

---

① 首次由瑞典化学家舍勒（C. W. Scheele，1742～1786 年）在 1774 年描述。

剂，要是没有这一发现，这种产品的急剧增加会使漂白工人手足无措。人造苏打有悠久的历史，但它的制造问题却很难解决。长期以来，化学家一直在研究碱的性质；约瑟夫·布莱克在此前不久所做的研究（1756年）是出色的。布莱克后来与瓦特和伯明翰的实业家约翰·罗布克（John Roebuck，1718~1794年）尝试共同合成苏打，后者已经制造出了硫酸。英国在1770年后取得几项从普通盐中进行这种合成的专利：问题是如何将硫酸钠（格劳贝尔盐）转化为碳酸钠（苏打），因为从氯化物（盐）提取出前者的方法是众所周知的。[1] 类似的研究也在法国进行着，而且在1777年后设计出了几个工艺；不过合成苏打是作为副产品在出售，因为天然的材料还很便宜。这些工艺并没有包含什么新东西，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789年，这时尼古拉·勒布兰克（Nicholas Leblanc，1742~1806年）发现：它们却构成19世纪重化学工业的基础。[2] 应该指出，勒布兰克只是通过以经验为基础的实验发现他的工艺，因为它不可能被他那个时代的化学预言；不过，他的实验只【150】能通过人们的科学技巧来实现。勒布兰克自己的工厂失败了，而且他的工艺的成功只是在他死后才得到证实；同时，大约在1796年，英国开始在泰恩河（Tyne）制造苏打（这一技术反过来要感谢法国化学家），而且很快传播到其他地区。因此在勒布兰克方法被英国广为采用许多年以前，1823年盐税被取消以后，合成材料出现在英格兰市场上了。

化学工业中还有其他许多实验的例子。陶瓷的制造前面已经提到了。韦奇伍德（Wedgwood）是化学工业最大的实业家，他一直在新方法和新材料的研究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他也得到过他的科学界的朋友们尤其是普里斯特利（Priestley）的帮助。从煤中提炼焦油最先是由邓唐纳德勋爵（Lord Dundonald，1749~1831年）在1781年发现的；[3] 同样的工艺也可以生产煤气，1805年被用于照明；磷光火柴也被发明了；用于造纸的破布可以用化学方法漂白，这样，彩色的和白色的破布都能得到利用；纺织品的染色一直得到化学家的注意，尽管他们不能揭开这一工艺的奥秘，却能增添一种新的颜色：普鲁士蓝。

许多伟大的化学思想家，像普里斯特利和布莱克，都充当他们制造业朋友的顾问，用新的工艺来测试产品，提出新的反馈，甚至计算成本；因为有

---

① 所有的专利权获得者都为盐这种沉重的负担所阻碍。

② 硫酸盐是用石灰石和焦炭加热的。

③ 他还从焦油溶液中提取清漆和氯化铵。邓唐纳德是那个时代最积极的实业家，在合成苏打行业中很突出，但好像他的努力并没有获得商业上的成功。

些人，像马克凯［Macquer，塞夫勒（Sèvres）高级瓷器厂厂长和法国印染业的检察员］和贝特洛（后一个岗位马克凯的继任者）都由政府部门提供生活费用。其他人，像舍勒（Scheele）和博梅（Baumé）都是药商；[①] 另外一些人，像伯格曼（Bergman，他创立了瑞典的“苏打水”工业）、博美（法国第一个制造氯化铵的人，而且还建立生产性的企业）、查普塔尔（Chaptal，他建立了制造酸、明矾、铅白等等产品的工厂）和居通·德·莫沃（Guyton de Morveau，合成苏打行业的一个冒险者）都为了自己的利益进入化工业。18 世纪最伟大的化学家安托万·拉瓦锡（Antoine Lavoisier，1743～1794 年）从来没有远离过实际问题，尽管这些问题与他的主要研究并无多大关系；他检验了水供应的纯净程度，关注农业改革，还是政府火药税务处（Régie des Poudres）的处长，而且还不断为事关国家利益的一切化【151】学问题提供咨询。因而，毫不奇怪，在这一方面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是特别紧密的。不过，应当记住，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人的素质是最重要的。当理论上科学进展不大时，一位科学家无论是作为一位工业顾问或一位企业家都具有重要价值。这对化学而言尤为正确；一位优秀的化学家在实验的帮助之下或许能够顺利解决某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如果仅仅靠他自己的知识或通过查阅与这个问题有关的最好的书籍他也不能解决。

在化学工业中，那些想尝试新工艺的人，要么他们自己就是有名的化学试验者，要么至少具备一些化学方面的训练，这几乎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此，学术界与从事制造的化学家之间的交流是非常自然的。政府雇用科学家是不需要做多少解释的，像在法国，有不少由政府控制的产业，或者像水文学、测量及陆军和海军军官训练中都需要特殊技巧（主要是数学方面的）。这些岗位几乎不需要什么研究能力，但是它们提供了锻炼机会。18 世纪的政府已经认识到国家科学院还是有一些用途的，它以它的声望为像在 1761 年和 1769 年观测金星凌日这样重要的科学项目的安排提供支持。政府请求科学支持最突出的例子发生于革命战争（the Revolutionary war）时期的法国，大批著名的科学家被召集来重建炸药工业，还要发明其他战争用品。这时，政府还重组科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建立综合工科学校（École Polytechnique）以培养大量的工程师派往军队服役。科学要影响私人产业是非常困难的。大学提供了一些物理学、化学和数学的教学岗位；但当

① 在这一时期，一些有抱负的药商像博美都转向化学制品的生产，基本是那些药用的化学制品。

这些学术课程得以讲授时——或许更常见的是在实践中却被忽视了——在为学生将来从事工业职业所做的准备却不多。工业结构没有为科学家提供什么职位，除非他为自己建立一个新公司。在欧洲各个国家中的那些促进农业发展而且为技术问题的解决提供奖金的社团，只是为科学家知识的应用提供了极为有限的机会。科学与制造业之间个人层次上的交流要比正式机构更为有效。有意思的是：在英格兰，这样的交流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二者有两个最著名的交流场所，其中之一是私人俱乐部，由韦奇伍德（Wedgwood）、布尔顿（Boulton）、瓦特、塞缪尔·高尔顿（Samuel Galton，实业家和科学爱好者）、伊拉兹马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詹姆斯·基尔（James Keir，化学家）、普里斯特利（Priestley，团体中惟一著名的科学家而且并不是最初的成员）、威廉·维瑟林（William Withering，植物学家）和其他一些人共同组成伯明翰月球学会（the Lunar Society of Birmingham）。不过，这个俱乐部主要是靠其成员的个人关系维持，它似乎不想发展社团功能。因【152】此，即使是月球学会几乎也不具有"技术研究组织"的资格，主要是因为任何一条信息都是在其成员之间私下传播，就好像俱乐部并不存在一样。也许除了像在塞夫勒（Sèvres）这样的国家制造业内，有组织的技术研究在18世纪似乎并不存在。这时的经济是一个小规模私人企业的世界，而且甚至是处心积虑地隐藏真理的世界，无论是在科学、技术上还是在商业上都是如此。新的发现传播非常缓慢；新工艺都是在紧锁的门后悄悄地测试，而且如果为了整个产业的利益将其传播开来，那肯定是出于恶意，而不是由于第一发明者的本意。像韦奇伍德、布尔顿、瓦特这些人会因为他们的科学创造得到应用而自豪，但与他们有知识的对手一样，他们会对他们的秘密严加防守。在这样一种气氛中合作根本是不可能的，甚至科学对工业的许多用途都是在理论上宣布，任何一种具体的应用都尽可能秘而不宣。

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企业家这三者的身份都变得比以前更难以解释。因为，这时每一种的功能都迫切需要制造业的进步，尽管没有哪一个占主导地位。科学最终还是有所贡献——尽管重要的还是方法与经验，它们要压倒理论上的见解。技艺上还需要有一些新发明或新工艺以便扩大到产业规模上，不管它的来源是什么。商业企业需要资本的增加、工

厂的选择和市场的开拓。[1] 有时一个人的实验和工艺天才是与另一个人商业上的聪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像布尔顿与瓦特；有时一个科学发明家依赖于非常古老的资助方式，像勒布兰克与奥尔良公爵（Duc d' Orléans）之间的关系那样；很少有人像查普塔尔这位科学家那样直接投身于工业中；但也许最常见的事情是具有科学精神的企业家像韦奇伍德、罗布克或邓唐纳德，他们自己在听从他能得到的建议的情况下能最好地解决技术问题，而且逐步建立起他自己的"实验工厂"。实验的发展常常依靠一些老式企业，到了一定时候，它会不失时机地吞并掉它的主人（如果它成功的话）。撇开为人熟知的纺织机械发明家的名字不谈，那些为制造业改进做出了贡献的大部分人都与当时的科学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这一点给人留下很深印象。[153] 这样的人通常认为他们自己把科学精神引入工业之中，而且利用了科学的发现。因而，在工业革命持续稳定地进行之前，这一事业的拥护者正在提醒人们注意科学曾经创造出来的奇迹和应用科学会在未来产生更大的作用。

无疑这种宣称来源于一种混乱的思考。科学与技术常常被一些漫不经心或乐观主义的作者们混为一谈，而且，可以说来源于一个发明的科学通常是不符合惯例的。一个半世纪以后工业革命的历史似乎显示了科学宣称改造世界的虚弱，它并不具备当时人们夸张的力量——尽管它们的境况比以前确实要好一些。对一块铸铁或船体的应变或者甚至一个简单的化学反应所做圆满而科学的分析，与现在所看到的这些分析相比，以前关于这些题目的知识是多么浅陋啊！视野有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是由科学发展本身所带来的。对当时的人而言对技术问题进行理性、系统地研究是极其新奇而有益的；现代历史学家倾向于把成功归因于长期艰苦地把它们转变为经济的制造方法，而不是归结到这种有缺陷的少量研究结果上面去。即使如此，人们还是易于把影子当做实体、把科学语言当做现实。在科学的逻辑中没有"偶然的"、不可预言的发现的位置（尽管这些在现实中常常发生），不过，工业革命中最具"科学性"的发明具有这种偶然性——它们能被做出，但不能被理解。无论是那些工程师或工业化学家的问题都只能根据他们的长处来解决，而不是由科学理论的点滴知识来解决，尽管它们也能为他们提供答案。科学的用途存在于它的经验性，而不是它的理论性——从这方面来说，化学会比机械

---

① 我以前的同事尼尔·麦肯德里克（Neil McKendrik）先生发现，即使像韦奇伍德这样一个高级的技术专家，他成功的程度也取决于他游说的本领有多大。

学更有价值。而实验研究的方法（尽管只有一般概念最粗略的基础）也会像找到解决制造业问题的症结一样，做出科学的发现。至少从哲学层次上，经验主义、经验、直觉——所有这些能够使一个人甚至在不知道怎样去做的情况下回答一个问题——构成科学领域中应受尊重的一个方面，同时它们也是在社会中最有用的一个方面。在工业革命奠基者的心目中，经验主义而不是理论认识，是科学基础之中最坚固的一个构成方面，而且受到他们的高度重视。【154】

第三章

运输与贸易线路

3.1 地中海贸易

16世纪初，地中海在很大程度上还自成一个世界。它与苏伊士（Suez）和直布罗陀（Gibraltar）以外的广阔海洋世界相比并不渺小，所以还称得上一个大世界。一艘船——普通的商船，赶上适宜的天气——需用两个月时间从卡塔赫纳（Cartagena）或阿利坎特（Alicante）到达亚历山大（Alexandria）；从墨西拿（Messina）到巴巴里的的黎波里（Tripoli of Barbary）也许需要2~3周时间；从里窝那（Leghorn）到突尼斯（Tunis）需要10~12天；这里有宽裕的空间和活动余地；而且，总的说来，这个地区几乎可以自给自足。大约6亿人口居住在内海周围的国家中，它们出产大部分的食物、原材料和几乎所有他们消费的工业品。他们建造自己的船只来完成他们的贸易。这一地区最丰富、最有活力、最具多样性的经济活动集中在意大利北部较小的区域内，由米兰、佛罗伦萨、热那亚、威尼斯和与它们相邻的小城市及卫星城组成。佛罗伦萨和米兰是重要的制造业中心——佛罗伦萨在发展自己的贸易船队方面很少成功，而米兰也从未拥有自己的贸易船

队——但是威尼斯和热那亚这两个庞大的工业中心同时也是主要的海上列强和伟大的商业船队的活动基地。在意大利以外的拉古萨（Ragusa），则专门建造运输庞大货物、粮食、盐和羊毛的大商船。法国越来越统一和繁荣，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地中海贸易经由马赛（Marseilles）进入罗讷峡谷（Rhone Valley），有三角帆的轻型小船船队繁忙出入。亚得里亚海（the Adriatic Sea）、第勒尼安海（the Tyrrhenian Sea）和里昂海湾（the Gulf of Lyons）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干线。这些海岸的航运承担了地中海地区内部贸易的大部分。海港是欧洲其他地区——经由海、河或山上通道——获得地中海产品供应和接收来自东方非常珍贵的奢侈品的中心。

地中海国家中大部分本来就没有足够的土地。少量的降雨再加上被一代代农民与他们的羊群剥夺净光的土地，使得土地出产很少，还很不固定。每一个城市都想从其近邻那里得到尽可能多的粮食。许多城市的地方扩张主义、对扩大他们管辖权的持久关心也主要是来自于他们急欲控制相邻地区的【155】食物供应。用运货马车或驮畜运输大量食品毕竟缓慢而且成本高，粮食能被经济地运送到中央市场的范围太小。[①] 因此，当地资源的供应即使在收成好的年月还是远远不够的，在不可预料的经常发生旱灾的地区就更靠不住了。即使在普通的岁月里，大多数大城市都还是要通过海或河从遥远的地方进口一部分必需品，而在当地歉收的时候则常常被迫加大进口的数量，而且一接到通知马上就要实施。因此在地中海地区存在着一个专门的、复杂的，也必然是灵活的粮食海运贸易，把每年过剩的也许大约 50 000 现代吨的粮食从比较丰收的地方转运到缺乏的地方，无论是永远或是暂时的。商船——威尼斯的、热那亚的和拉古萨的——都很大，被设计用于运载粮食，而且通常不运输其他物品。小麦、大麦和小米是运输最多的粮食，这些东西用于制作面包和饼干。黑麦和燕麦在地中海地区还很少见，直到 16 世纪晚期北方的商人到来时才有。

海运粮食最经常的进口者是地中海地区西部与中部的城市。东部的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按照欧洲标准是一个大城市——是吞食它所遇到的所有粮食的一个巨大的胃；但君士坦丁堡能够而且确实实现了对黑海（the Black Sea）沿岸富饶地区的粮食出口垄断。只是在歉收的年月奥斯曼

---

① 布罗代尔（F. Braudel）：《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巴黎，1949 年），第 347 页。至于佛罗伦萨最远的界限是大约 12 里。参看帕朗蒂（G. Parenti）：《对佛罗伦萨物价波动的初步研究》（1939 年），第 82 页。

(Ottoman) 政府才被迫从其首都贮备里调出大量地中海地区粮食。开罗，另一个大都市，是一个更好的地方。尼罗河谷 (the Nile valley) 一直滋养着开罗和亚历山大 (Alexandria)，并且，还有大量结余。同样，叙利亚的繁华商业城市都有它们自己的粮食供应渠道。在西部，人多粮少，处境非常困难，尽管那里也有一些城市比别的地方更幸运。米兰从它周围富裕的农村受益不少，而且甚至将成包的粮食用火车运送到格瑞森斯 (Grisons)。马赛得到普罗旺斯 (Provence) 和罗讷河谷 (the Rhone valley) 的支援——支援粮食是从驻防在意大利的查理八世 (Charles VIII) 和路易十二 (Llouis XII) 的军队从海路运送来的。正像马赛 16 世纪在规模与富裕程度上都有所增加一样，沿着罗讷河谷到达地中海水域的粮食越来越少。这些 (粮食) 最后主要运抵出产酒或油、羊毛的国家，佛罗伦萨、热那亚、威尼斯、拉古萨、那不勒【156】斯、西班牙东海岸的城市它们都是从海路进口粮食者，通常由当地所有的或由市政府所有或特许的船只运输。

在所有或几乎所有的城市中，保证供应的稳定是政府的首要职能，而且成了政府采购与贮备机构的永恒责任。他们偶尔都干那种海上掠夺谷物的勾当，在缺乏粮食时派出他们的大型武装划艇拦截运粮船，将它们带入自己的港口。尤其是马耳他 (Malta) 的骑士无耻地以这种方式为他们的岛上城堡贮备粮食，在西西里航道 (Sicilian channel) 或奥特朗托海峡 (the Straits of Otranto) 巡航以寻找驶向威尼斯或西班牙的运粮船。这种行径是有收获的，但抢夺者也要付出代价。

在西方，出口粮食的主要基地是阿普利亚 (Apulia) 和西西里，它们在政治上都为西班牙统治者控制。阿普利亚是那不勒斯王国的一部分，而且它的大部分粮食都供应了那不勒斯市。如果从陆上运输粮食通过半岛从经济上是可能的 (就像西班牙政府在 16 世纪 60 年代曾经建议过的那样)，那不勒斯就会垄断这个供应渠道；但其成本是十分高昂的。阿普利亚的粮食通过海上运输，而那不勒斯不得不与来自威尼斯和拉古萨的其他购买者竞争。不过，西西里是地中海西部主要的产粮区，出口粮食量各年之间有很大差异，但在 1532～1578 年之间年平均大约在 10 000 吨，[①] 大部分粮食向西班牙和西班牙的同盟国热那亚出口，但它们也向欧洲的地中海地区和北非所有饥馑的

① 120 000 沙马 (*salme*，相当于 275 升)。这一时期收成最好的年份是 1532 年，大约有 260 000沙马，最差的年份是 1557 年，大约是 20 000 沙马。比安基尼 (L. Bianchini)：《西西里的经济社会史》(那不勒斯，1841 年)，第 1 卷，第 240 页。12 沙马的粮食约等于现代的 1 吨重。当然，这只是很近似的说法，接近程度取决于粮食的种类。

城市出口数量不等的粮食。粮食主要生长于岛的南部，而且从墨西拿沿岸有限的一些官方特许码头（*caricatori*）装船。墨西拿是一个专业的粮食港口，它出口西西里的产品，而且也转运来自东方的粮食。不过，出口贸易中的商业公司——主要是热那亚的和佛罗伦萨的——在巴勒莫都有他们的总公司，那里生活着许多大土地所有者，而代表着总督府的官员们负责发放珍贵的出口粮食凭证（*tratas*）或许可证。这些许可证并不是无偿发放的。一个出口许可证所需费用是粮食本身价值的1/4到一半，它还会随着价格的波动而上涨。粮食与许可证的成本都必然加到运费上，如果西西里的粮食价格是每凡加（*fanega*）10西班牙雷阿尔（*reales*）——这一世纪中叶的正常价格——出口许可证值5雷阿尔，那么，从供应者那里到码头的运费是3雷阿尔，从港口出发到达西班牙港口的运费是3.5雷阿尔，保险金是9%，不到1雷阿尔；运到阿利坎特（Alicante）的费用是22.5雷阿尔。[1] 不过即使需要这么高昂的费用，许可证的发放与拒绝也是给予恩惠或施加政治压力的一种方式；因此对粮食的需求是一贯的，而这又是一个多么好的赚钱机会。 【157】

在地中海西部，粮食方面几乎是不能自足的，即使有西西里这个粮仓，但进口的城市也一直对黎凡特（the Levant）便宜又充足的粮食有需求。与土耳其人有密切贸易关系的威尼斯尤其依赖于东方的粮食。它的殖民地——科孚岛（Corfu）和一些克里特岛（Crete）的城镇——都从帕特莫斯（Patmos）和相邻的爱琴海（Aegean）诸岛得到一些供应，而有时再从他们购得的粮食中出口一些。共和国（the Republic）经常从埃及、亚历山大、沃洛（Volo）、萨洛尼卡（Salonika）、发罗拉（Valona）、普瑞维萨（Prevesa）进口粮食，所有这些城市都向西方出口粮食。自然，这样开放的贸易需要土耳其政府的批准，而且，自然地，购买粮食的请求常常被驳回，这种驳回或者是由于经济原因，因为君士坦丁堡粮食紧缺，或者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或突然的变化；但除了官方出口外，在希腊群岛的轻快的土耳其三桅帆船（*caramusalis*）上一直在进行着猖獗的违法贸易。没有这种贸易，威尼斯将会生活得十分糟糕。1570～1573年间的土耳其—威尼斯战争（the Turco-Venetian War）造成了威尼斯食物供应大危机；共和国被迫向西班牙求购——向它的所有地区——粮食，而且不顾后果地抢夺从阿普利亚驶向那不勒斯的运粮船。

即使在和平时期，粮食贸易中也充满着惊险和混乱，由于地方庄稼歉收

---

① 参看布罗代尔：《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第451页。

或出乎预料的丰收。西班牙在 16 世纪通常被认为是一个进口国；但在 1555 年的时候，安达卢西亚（Andalusian）的小麦被出口到了罗马，在 1564 年出口到了热那亚。在 1587 年时，撒丁岛（Sardinia）的粮食出乎意料地过剩，大量出口到热那亚。即使是阿尔及尔（Algiers）和奥兰（Oran），也偶尔会发生意外丰收并有粮食用于出口。

在 16 世纪后半叶，地中海西部的粮食状况总是不稳定，越来越糟糕。饥荒不仅越来越经常——它们一直经常发生——而且越来越严重。那不勒斯在 1560 ~ 1600 年间遭受了 6 次大饥荒——1560 年、1565 年、1570 年、1584 年、1585 年和 1591 年。其中最严重的是，西西里的粮食出口停止了。在 1575 ~ 1577 年间那里发生了一次饥荒——连续 3 年庄稼歉收——而且不得不从阿普利亚以饥荒时的高价为墨西拿购买玉米；在 1591 年又有一次更严重的饥荒。从 1592 年起，西西里几乎完全停止了粮食出口而且成了一个进口者。人口，尤其是城市人口的总体增长似乎是这种严重缺粮的主要原因。【158】关于生产力的下降却没有什么证据，尽管它由于多年的过度放牧和侵蚀也可能会有所下降。16 世纪 70 年代土耳其与西班牙（Turco-Spanish）的大规模对抗和威尼斯与西班牙的联合，也打乱了正常的粮食贸易，同时增加了对海军、陆军和驻军的粮食供应。即使对抗停止了，土耳其政府既不愿也不能重新向西方出口粮食。黎凡特国家的人口也在增长。在 1589 年、1597 年和 1600 年等年份，饥荒多次降临君士坦丁堡。整个地中海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而且这种饥荒的加重是北欧通过航运对地中海进行侵犯的潜在因素之一，因为急需大量粮食运送过来的荷兰与英国船只一直在分享这有利可图的贸易。

尽管粮食是最最必需的，但无论如何在地中海地区它不是惟一一种通过海运大量输入的日用品。盐和腌制食品都是重要的贸易品。地中海的人们确实不是嗜肉者，而正像松巴特所正确地指出的，在地中海地区腌鱼和肉类贸易却从来没有达到北方水域人们的那种数量与重要程度。[1] 不过盐和鱼干是重要的食品。金枪鱼是最重要的地方鱼类；西西里水域［尤其是墨西拿海峡（the Straits of Messina）］和普罗旺斯海岸水域是鱼类资源最丰富的地方。不过地中海咸鱼的供应从来没有充分满足过需求，而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城市也进口从大西洋水域捕捞和腌制的鱼类。整个世纪葡萄牙人都从他们自己的

① 松巴特（W. Sombart）：《现代资本主义》，第 1 卷，第 315 页。

水域和纽芬兰浅滩（the Newfoundland Banks）捕捞金枪鱼和鳕；而大约从1585年起，来自北海的桶装鲱鱼开始大量出现在荷兰人的船上；这是北方贸易侵略的又一个例子。

地中海地区的气候特点以及潮汐相对较少的状况促使人们用最廉价、最简单的方式——蒸发海水制盐，无论哪里的海岸，只要适宜人们就会这样做。至于粮食，长期存在的长途贸易弥补了当地供应的不足。威尼斯人是盐的主要运输者；伊斯的利亚（Istria）和西西里［特拉帕尼（Trapani）］是主要的出口来源，当然，在威尼斯控制了塞浦路斯（Cyprus）盐田期间得除外。

另一种由海路大量运来的重要食品是油、酒和乳酪。乳酪是通过复杂的、混乱的路线进来的，有许多不同的品种——来源于奥韦格内（Auvergne）、帕尔马（Parma）、米兰和上述所有撒丁岛上的地方，从这里整船整船地运往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南部是油的主要产地；二【159】者（尤其是意大利）都是出口油以换取粮食，这种贸易甚至远至埃及。地中海的长途贸易在16世纪衰落了，部分是因为安达卢西亚的油转向西印度群岛，在那里可以获得好价格；但整个世纪大量的油和用油制造的肥皂都可以经常性地从巴里（Bari）经由亚得里亚海船运到威尼斯和拉古萨。地中海的酒贸易——由于葡萄栽培在这一地区普及开来——不能和驶离纪龙德河（the Gironde）与瓜达尔基维尔河（the Guadalquivir）前往大西洋沿岸目的地的船队相竞争；但那不勒斯的酒产品会经由海路供应罗马和更北部城市的需求。那不勒斯的酒供日常饮用。更为人欣赏、也更贵重的奢侈品是产自塞浦路斯和克里特岛——驰名的马姆齐（Malvoisie）葡萄产地——的烈性甜酒，这种酒在从地中海、君士坦丁堡到热那亚，甚至会越过直布罗陀到英国的广阔范围内高价、少量销售。用这些珍贵的酒与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商船通过同样的航路运来的希腊的葡萄干——普通葡萄干和“无核葡萄干”做交易。即使在16世纪的地中海，糖依然是奢侈品。地中海东部克里特岛、塞浦路斯是主要的供应地；西班牙西部、东南部的糖是从马拉加（Malaga）、阿利坎特、卡塔赫纳到热那亚、里窝那和西西里船运去的，它们和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一起，满足威尼斯的大部分需求。

一个繁忙——根据当时的标准也是——而人口稠密的城市中心，像意大利北部，不仅进口食物还进口许多工业尤其是纺织业的原材料。意大利的服装业不再严重依赖英国的毛料，而实际上也没有那么多的毛料了。大部分毛料来自西班牙，而且在西班牙毛料交易会上，意大利购买者要与另一个大工

业区——西属尼德兰（the Spanish Netherlands）的购买者竞争。在 16 世纪中叶超过一半的西班牙出口毛料经过毕尔巴鄂（Bilbao）和其他大西洋港口船运到佛兰德斯。[①] 将近 16 世纪末时更多的毛料运到佛兰德，运送到意大利的越来越少，而到 17 世纪的时候，佛兰德几乎吸纳了所有的出口毛料，可能出口总量上有所减少。佛罗伦萨和米兰那时从能获得的诸多地方购得毛料，亦即从北非、巴尔干和黎凡特所有次一级的毛料产地进口；而他们的服装业无论在质与量上都衰落了。不过综观 16 世纪，几乎一半的西班牙优质毛料出口都仍然是经由马拉加、阿利坎特、卡塔赫纳，很少是经由巴伦西亚【160】和巴塞罗那海运至热那亚、里窝那和威尼斯的。拉古萨、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大船在这一行业中居于优势地位。

意大利北部的丝织商在原材料的供应方面要比服装制造商幸运，而且将这种优势地位一直保持到 17 世纪。地中海地区的许多国家都生产生丝，而且，与粮食和毛料一样，西部的部分供应来自于东方。地中海西部主要的集散中心是墨西拿，那里供出售的生丝来自远至巴伦西亚和叙利亚的黎波里。生产丝绸的那不勒斯也是来自卡拉布里亚（Calabria）的过剩生丝的集散中心。从墨西拿到那不勒斯，大包大包的生丝被装上运往意大利北部热那亚或托斯卡纳（Tuscan）的船上。

在地中海的欧洲部分，人们将大量的皮革用于各种用途：马具、挽具、防毒衣、鞋和靴、手套、家具、书皮等等。与毛料、丝绸和粮食一样，皮革贸易打破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划分。意大利北部是主要的进口地区；人口较少却放牧大批牛羊的北非是皮革的主要产地。皮革从阿尔及尔、塞里（Sallee）、戈列塔（Goletta）船运到墨西拿、安科纳（Ancona）、拉古萨、威尼斯和其他许多基督教徒的港口。西班牙中部是一个巨大的畜牧地区，自然每年出产成百上千张皮革；但许多西班牙城市都是皮革加工中心，它们不仅生产皮革制品为当地使用，还生产许多种适宜出口的优质专门制品，尤其是皮雕工艺品（*guadameciles*），像墙面涂料一样，在 16 世纪，这种工艺品作为涂成金色的精致悬挂物而广泛使用。萨拉戈萨（Saragossa）、托莱多（Toledo）和格拉纳达（Granada）都以它们的皮雕工艺品而闻名，这些工艺品经由马拉加、巴塞罗那出口到地中海和北欧地区。因此，西班牙是一个皮革的进口国和皮革制品的出口国。总的说来，在 17 世纪后半叶地中

---

① 参看卡兰德（Carande）：《卡洛五世（Carlos V）与银行家们》（马德里，1943 年），第 64 页。

海西部不再是皮革自足的地区，从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进口量逐年增加，甚至还从远至波兰、俄罗斯和——最重要的——新世界进口一些；而地中海地区主要必需品对大西洋地区的依赖程度也在不断增加。

与畜产品和蔬菜贸易的数量和急需程度相比，16 世纪地中海地区的矿产贸易相对较小，但其重要性在增强。其中最重要的是作为服装业必不可少的清洁剂成分之一的明矾，它在这一世纪初主要是热那亚商船从小亚细亚（Asia Minor）运来的。16 世纪初从靠近西维塔韦契亚（Civitavecchia）的托尔发（Tolfa）的丰富贮藏中进行开发——明矾从那里沿着海岸运到里窝那和热那亚——还运到西班牙东部。结果东西部之间的明矾贸易就此衰落。在 【161】 16 世纪后半叶，从意大利到英国和低地国家的出口贸易得到蓬勃发展，最初是通过热那亚的商船，后来逐渐落入荷兰和英国的手中。

在整个 16 世纪，其他主要矿产品的贸易流向都是由西向东的。在东部一些地区被认作宝石的珊瑚的贸易是一项赢利的贸易，这项贸易主要为热那亚所垄断。热那亚渔民把天然珊瑚送来，在热那亚被加工成饰品，这种饰品在埃及有销路，因而从这里运到那些国家，同时香料从那里反方向运到这里来。非贵重金属的贸易也朝着同一方向运往东方。铁矿的贮藏是如此的广泛，以至于地中海大多数制铁中心都利用在他们门边发现的矿石；而铜、锡和铅一直是长途贸易的贵重物品。地中海地区对这三种金属需求的增加主要是军火需求量增加的结果；旧式包铁、用铁浇铸的枪管都被铸铜的部件所代替，因而，对前两种金属的需求增加。铜主要经由陆路来自德国南部，再用威尼斯的商船出口到地中海东部。英国是——已经持续几个世纪了——铅和锡的主要产地，在 16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铅与锡都是通过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运到地中海地区，到 16 世纪末荷兰和英国的商船也加入进来从而这种贸易更加繁荣。

意大利北部、法国南部和西班牙东部城市的产品发现了广阔的市场，尤其是佛罗伦萨的优质轻纺毛织品畅销到地中海地区，而且，它们还经由阿勒颇（Aleppo）的集市远销到亚洲内陆。米兰在整个 16 世纪始终是地中海地区武器装备的主要制造中心。威尼斯依靠它的船只，由里昂经马赛为地中海地区提供源源不断的书籍，以供其发行，而热那亚则为地中海世界提供纸张。从威尼斯传送过来固定数量的各式玻璃制品，不仅有精致的玻璃餐具、镜子之类的东西，还有像沙漏这种日常用品，它是在船上用以显示时间流逝的惟一方式。一切西方世界在海洋上远航的船只都要使用——而且需要不断地替换——这些种类的易碎的威尼斯玻璃。陶器不是意大利完全垄断的产

品；塔拉维拉·德·拉·莱纳（Talavera de la Reina）的蓝色陶器、位于塞维利亚（Seville）附近蔡纳（Triana）的白色和黄色釉陶都在英国、西印度群岛和北非的港口销售；但费拉拉（Ferrara）和萨沃纳（Savona）的花饰陶器也有足够的需求并足以支付长途运输的费用。这些城镇，尤其是意大利北部的 4 大城市确实不再享有百年前那种轻易的控制与牢固的优势地位。[162] 整个世纪，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米兰的织工不得不与来自德国南部的廉价粗斜纹布竞争；米兰的武器制造者和军械工人面临来自德国南部城镇的竞争，他们越来越专门从事阅兵盔甲和比武武器的制造，并制造那些他们虽占优势，但没有十分广阔的市场的产品。不过，即使在他们的产业优势受到挑战时，意大利北部还长期占据他们商业上的统治地位。德国南部的制造业——比如军火——能与意大利竞争；但他们向南要越过勃伦纳山口（Brenner），而且要装在威尼斯的船上到达黎凡特；陆地运输尽管与海洋和河道运输比起来昂贵一些，由于装载的是制造品，还是很便宜的，足以将德国南部与地中海地区连接起来。

在 16 世纪，地中海地区是一个各种商业活动十分活跃和丰富的地方。但最富裕和最诱人的贸易是来自于地中海地区之外的商品：香料，尤其是胡椒。除了多香果（Malaguette）和西非的粗劣的假胡椒外，欧洲交易的香料都是来自于东方。中世纪后期一条长长的商业交换链把印度、锡兰（Ceylon）、印度尼西亚的香料种植者与威尼斯的商会理事们联系起来。在它的东端，贸易是由中国人操纵，他们的平底帆船收购东印度群岛的肉豆蔻和三叶草，然后把它们运到马六甲（Malacca）的马来港（the great Malayan）。从马六甲穿过孟加拉海湾（the Bay of Bengal）到印度，这种贸易始终掌握在穆斯林商人手中，无论是印度的、马来的或是阿拉伯的。印度远东的货物，加上锡兰的樟属植物和印度自产的胡椒在马拉巴尔海岸（Malabar coast）的香料港口进行出售——像科钦（Cochin）、卡利卡特（Calicut）、卡纳瑙（Cananore）、果阿（Goa）等港口——和古吉拉特（Gujerat）港口以及更北方的港口，尤其是第乌（Diu）进行出售。这些港口与印度洋沿岸其他地区的贸易基本都掌握在阿拉伯人手中；从马拉巴尔海岸他们用柚木建造的在海洋中航行的阿拉伯货运帆船（*baghlas*）为其贵重物品结关后驶向波斯、阿拉伯和东非的港口，其掌帆规律是根据东北和西南季风的定常性交替变化。在 15 世纪末，从印度洋到地中海有两条航线和两个转船运输港口：霍尔木兹（Hormuz）和亚丁（Aden）。从亚丁到红海（the Red Sea），红海是一个

暗礁密布的加热的漏斗，船只行驶缓慢而且危险，而大船（*baghlas*）很少敢于越过曼德海峡（Bab-el-Mandeb）。红海贸易都是通过大量的沿岸航行的小商船，一种是斜首尖尾四边形拉丁帆船（*zaruqs*），另一种是阿拉伯帆船 [163] （*sambuqs*），还有其他许多三角帆船进行的，在一个与另一个小港口之间往返，最后到达苏伊士，再通往开罗和尼罗河谷的红海港口。在波斯湾（the Persian Gulf），这一地区特有的大型双头船（*boums*）运载着东、西非的货物离开霍尔木兹驶向阿拉伯河（the Shatt-al-Arab），再从那里，商队运送整船的香料由内陆，或者通过小亚细亚（Asia Minor）到达君士坦丁堡，或者经由巴格达通过美索不达米亚到达阿勒颇——叙利亚的香料大集市。威尼斯的商船由亚历山大驶向威尼斯，亚历山大是地中海驶向开罗或的黎波里的港口，后者是通往阿勒颇的口岸；而香料从威尼斯得以分销，经由河道或驮畜队，到达意大利北部，越过阿尔卑斯关口（the Alpine passes）到达德国南部（这一地区与许多其他地区一样构成威尼斯物资供应的地区之一），或通过海洋到达马赛，再沿着罗讷河到达法国中部，或经过海洋到达巴塞罗那、阿利坎特、马拉加，经由英格兰海峡到达低地国家和北欧。除了香料从那里大旅行之外，威尼斯还推销在欧洲拥有高价、通过同一商路到达那里的其他东方产品：要比意大利或法国好得多的中国和波斯丝绸；印度的棉布；在中国生长并被认为是药物的大黄；还有宝石——来自印度的绿宝石、缅甸出产的红宝石、锡兰出产的蓝宝石。这些都是让全欧洲眼羡的“赚钱贸易”，而且它们使得威尼斯成为世界上的大海港之一。

16世纪初，地中海的香料贸易经历了几次严重的危机，其结果是，人们通过好望角（the Cape of Good Hope）建立了葡萄牙与印度之间的直接贸易。葡萄牙人很快取代威尼斯人成为大西洋沿岸国家香料的主要供应商。葡萄牙人的货物在1501年到达安特卫普，而安特卫普则成为西北欧主要的集散中心。在1504年，第一批葡萄牙商船抵达英国。德国和法国的西部很快通过安特卫普来满足进口供应。西班牙——很奇怪——用了更长的时间改变其商业习惯，但到了16世纪20年代，麦迪纳·戴尔·卡姆波（Medina del Campo）集市上所出售的胡椒基本上都是葡萄牙人从印度运来的。葡萄牙人甚至一度插手地中海的香料贸易。热那亚人在16世纪早期就开始从他们那儿购买胡椒。甚至威尼斯人，在1515年为了完成他们自己老客户的订单也被迫在里斯本购买胡椒。从威尼斯人的观点来看，麻烦并不在于葡萄牙人通过压低胡椒的价格进行竞争；问题在于葡萄牙人通过武力和武力威胁，通过抢夺船只和炮轰马拉巴尔海岸（Malabar coast）的港口，通过在果阿、霍尔

木兹、索科特拉岛（Socotra）和马六甲建立自己的港口，而且竭力以各种手段禁止除他们自己之外的一切海上香料贸易，由此一时成功地阻止了正常【164】的阿拉伯航行，而此航线正是供应波斯湾和红海的港口的要道。在 16 世纪最初几年里，只有很少的运香料船到达黎凡特市场，威尼斯人通常是在这里获得他们的供应的。

不过，葡萄牙人垄断的持续时间并不长。尽管他们在海上仍然是威风凛凛的，葡萄牙人并不能指望依靠在相当分散的基地之间游弋的一些军舰就能永远抑制十分繁荣的商业，它要供应埃及和土耳其帝国以及欧洲的客户。他们没能占领香料贸易的关键点之一的亚丁。他们在索科特拉岛（Socotra）建立的为时不长的基地不足以有效地封锁红海。他们不能充分利用霍尔木兹的立足点，因为他们需要波斯人的支持以共同对抗土耳其人，而要达此目的就必须允许货物通过波斯湾。他们想成为这两个地方通行费的征收者，妨碍而不是制止阿拉伯的贸易。印度洋的香料贸易——或者其相当大一部分——很快重新进入它的老渠道；随之地中海贸易在威尼斯商船上重新活跃起来。在价格和质量的连续竞争中优势无论如何不在葡萄牙人的海洋贸易一边。葡萄牙人种种行为的代价和绕过好望角航线（the Cape route）的风险都是巨大的，而且还有增大的趋势；而葡萄牙人提供不出什么商品以能够形成有利可图的对外货运。他们用条金购买香料，而运回费用还应包括在外路途的费用。另一方面，阿拉伯的商人们运载在印度有销路的商品：美索不达米亚的马匹、阿拉伯半岛（Arabia）和地中海的铜、武器、轻纺毛料、珊瑚饰品。形成完好、正常的中介链条的最后一环的威尼斯人也拥有类似的优势。他们拥有可以在开罗和阿勒颇集市上出售的商品；而且拥有在复杂而高利润商业中运作的经验和信誉。来自黎凡特的胡椒价格与由好望角航线运来的胡椒的价格，如果说有一点区别的话，一旦运到地中海西部区别就很小了。也许在质量上还是有一点差别的。阿拉伯人和威尼斯人与葡萄牙人比起来也许是更有辨别力的购买者。而且人们普遍认为，香料在长途航行当中会腐烂从而失掉它们的香味。这无疑是由威尼斯人传播的故事，但也许它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因为葡萄牙人的货物都是用口袋装在有裂缝的船上，经由气候恶劣的地区。浸泡在海水中对任何货物都没有好处。

此外，政治事件朝着有利于红海航线（the Red route）的方向转变，这使威尼斯人至少恢复了他们在地中海和德国南部的垄断。16 世纪中叶是穆斯林力量和伊斯兰世界中土耳其力量在各个方面急剧强大的时期。1526 年，【165】巴卑尔（Babur）在帕尼帕特（Panipat）奠定了印度莫卧儿（Mughal）帝国

的基础。一支土耳其舰队得到了葡萄牙人没有得到的东西，占领亚丁，从而使红海成为土耳其海峡（a Turkish Strait）；埃及在 1517 年已经被侵占。1538 年和 1546 年葡萄牙人在他们第乌（Diu）的堡垒中受到重创。他们自己的贸易虽在继续，却在减少。阿拉伯的贸易在不受阻碍地发展，而黎凡特的港口很是繁荣。在 1550～1570 年间大量的胡椒涌入地中海地区；据统计，仅红海一个航线每年就有大约 1 500～2 000 吨的胡椒运来。[①] 见多识广的当时人毫不怀疑贸易额像以前一样巨大，而且至少与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时一样巨大。在 1560～1563 年土耳其—葡萄牙战争（the Turco-Portuguese war）期间，土耳其的军舰截击印度洋上葡萄牙运香料的商船，而且迫使它们改道红海。在霍尔木兹以外，葡萄牙军队确实更为成功，而且当战争持续时，波斯湾的贸易遭受葡萄牙人的严重劫掠。不过，威尼斯人却总是拥有在两个敌对的供应者之间进行选择的优势。如果阿勒颇不能供应的话，开罗能够；反之亦然。葡萄牙人有理由为他们脆弱的海洋贸易而焦虑。在 1563 年与土耳其人议和期间，他们曾经尝试——不成功地——达成一个协议：他们自己能够将香料从印度船运至红海；黎凡特贸易线路似乎是如此的长久、如此的赢利。

大约在 1570 年，一系列事件发展的形势又对葡萄牙人和好望角航线有利。1578 年阿拉伯人反抗奥斯曼统治的起义风起云涌，从而中断了红海的贸易。这次反抗直到 1573 年才被镇压下去；而同时，威尼斯与西班牙一起卷入了地中海地区 1570～1573 年间反抗土耳其的战争之中。热那亚与威尼斯这一对过去政治和海上的对手，淹没在地中海东部的土耳其帝国与地中海西部的西班牙帝国这两大强悍的对手的敌对之中。这种形势的纠结造成黎凡特贸易的急剧衰落。在 1577 年威尼斯人再次收缩到在里斯本购买胡椒，这样做的目的是提高进口税，自从 1519 年以来，他们都是在征收着来自西方香料的进口税。

到 16 世纪 80 年代早期，黎凡特的商业更加衰落，也许是由于土耳其与波斯之间断断续续敌对的结果。时机有利于新近拥有葡萄牙的菲利普二世（Philip II），他在 1585 年向威尼斯议员提出奇特的建议：提议葡萄牙进口胡椒的相当大一部分以十分低廉的价格卖给威尼斯人，另外还许诺护航舰护送【166】威尼斯商船访问里斯本，而且让这些商船在西西里粮食贸易中占有一定份额。如果接受的话，契约会使威尼斯与西班牙的政策牢固地绑在一起；并将

① 布罗代尔：《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 429 页。

会保证葡萄牙香料通过欧洲内部航线的集散，而这种方式比它们当时越来越受荷兰和英国私掠船、海盗船影响的大西洋航线安全和保险得多；而且将给予黎凡特的贸易以致命的一击。如果我们考虑到那时黎凡特的香料稀少并且价格较高的话，这种提议对威尼斯人必定有相当的吸引力；但它被拒绝了，而且事实证明了拒绝的智慧。黎凡特的贸易复兴了。其中一部分确实大大增强：经由阿勒颇和亚历山大勒塔（Alexandretta）的波斯丝绸贸易（后者在1593 年取代的黎波里成为位于叙利亚的威尼斯人的仓库）。16 世纪 90 年代是印度洋和平几乎没被打断的时期，黎凡特的繁荣贸易也是如此；而在大西洋葡萄牙人的船只则受到连续的封锁，而且遭受在亚速尔群岛（the Azores）和佛得角（Cape Verde Islands）以外活动的海盗船的不断袭击。

整个 16 世纪地中海的香料贸易一直繁荣。威尼斯远远没有因为葡萄牙人发现海洋航线从而被逐出这一行当，它成为葡萄牙人欧洲大部分地区香料供应的有力竞争者；而且基本上一直从旧航线得到他们的香料。不是葡萄牙而是荷兰人，次之是英国人彻底摧毁了威尼斯在这一行当所拥有的优势地位。

3.2 北欧贸易

16 世纪初，北欧的贸易模式与地中海的模式有明显的不同，原因在于，在那里，也许除了波罗的海毛皮（显示尊贵和财富的服装）贸易外，没有“更赚钱的贸易”。一小部分香料和其他东方产品由缓慢的河流从里海（Caspian）岸流向诺夫哥罗德（Novgorod）的大集市，在那里它们被装在汉萨同盟（Hanseatic）的商船上并运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但大多数奢侈品都是用地中海的商船从地中海运到北欧，或者经由陆路，或是更多地用其他方式经由里斯本和安特卫普从东方运到北欧。北欧贸易经营的主要是大量的日用品。这种事实本身使得长途贸易基本上只走水路；而且根据地中海的标准，北欧在陆路运输设施方面无论如何都是欠缺的。罗马道路建设的遗留是很可怜的，它的高降雨量、湿润的陆地和茂密的森林，导致车辆交通，甚至驮畜队在许多地方一年中的大部分日子都是没有用的。北欧的海运装备还是很精良的；但北欧的造船业——按照地中海标准——还是相当原始的，这个[167]行业缺少资金流动的简易方式和市场研究报告的快速传送。船只还不专业化，甚至货运和打鱼还在混用，或者和平和战争时的用途还没有分工。

在这二者之间，除了这些鲜明的对比之外还有明显的类似。与地中海地区一样，北欧拥有兴旺发达的工业区——主要是服装加工——位于尼德兰南部，它进口大部分的原材料和食物，出口大部分成品。也与地中海地区一样，北欧还拥有生产可靠的出口食物和原材料的地区。在这方面北欧确实是很有潜力的一个地区；它的气候和它的大片肥沃的土地——绝大多数还没有开发——将会及时地生产出要比在地中海盆地侵蚀的土地上辛劳所得多得多的产品，而且它的渔产品也是世界上最丰富的。最后，北欧的潜在“交通资产”在两个方面要比地中海地区更为有利：轻易搞到的大批木料和可通航的河流。在16世纪和17世纪商业赢利的机会、丰富的资源和海运技巧的增强在技术革命中结合起来共同使北欧成为世界贸易的主要中心。

在16世纪初，北欧还没有（它自己的）威尼斯和热那亚，但它拥有两个不同的地区——或者港口城镇群——它们的商人擅长海运贸易。这些城镇包括德国北部汉萨同盟（the North German Hanse）的城镇和尼德兰的港口。15世纪末这两个地区的商船船队的载货量几乎是一样的。[①] 在14世纪和15世纪的大部分岁月，汉萨同盟的（Hanseatic）商人们控制着北海（the North Sea）、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和冰岛（Iceland）的贸易，而且他们对波罗的海地区的关系就相当于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相对于地中海地区的关系。在地中海地区感受到它的挑战整整一个世纪以前，来自荷兰的竞争已经向波罗的海地区提出了挑战。在中世纪后期，贸易线路和贸易关系的变化趋势是：德国付出代价，而对荷兰有利。通过松得海峡（the Sound）进入波罗的海的航线最先由荷兰人开辟，与从汉堡（Hamburg）到吕贝克（Lübeck）的旧陆上路线相比，人们选择前者。而吕贝克作为过去汉萨人员和政策的总部，其贸易和重要性都有所损失。布鲁格斯（Bruges）作为汉萨 【168】 贸易和势力的主要对外中心也衰落了，主要因为它的港口的淤塞，而安特卫普成为北欧主要的商业港口。在那里，汉萨同盟（the Hansards）也不享有特权。安特卫普在16世纪的大部分岁月都十分繁荣；但它不是主要的造船中心，而战争和对国外船只的依赖最后证明是祸根。1576年“西班牙的复仇”（Spanish fury）给安特卫普以毁灭性打击。1585年对帕尔马（Parma）的围困和占领导致许多商业公司的迁移、破产和流放——主要是到阿姆斯特丹——成千的新教手艺人流放。荷兰商人抛弃了港口，而帕尔马试图通过汉

① 福格尔（W. Vogel）：《论15世纪、16世纪和17世纪欧洲商船船队的主力》，载《中世纪和近代历史研究和尝试》（耶拿，1915年），第277页以下。

萨同盟的航运恢复其贸易的努力也因荷兰人对斯凯尔特河（the Scheldt）的封锁而失败。荷兰人在 20 年的休战（the Twelve Years Truce）和其后的战争期间一直非正式地但却有效地继续这种封锁，而最后在明斯特协定（the Treaty of Münster）中，他们争取了一个条款：终止斯凯尔特河的商业活动。在整个 17 世纪，安特卫普的码头只能由内河航运使用，而且只由一些荷兰运粮船使用。安特卫普经营的海上贸易都转到了阿姆斯特丹。直到 16 世纪末，汉萨同盟还是一支需要认真对付的力量；他们还在英国和伊比利亚半岛（Iberian）的贸易中发挥过作用；但是，他们在反对荷兰人侵犯的斗争中打了败仗，荷兰人机动灵活，再加上他们拥有廉价的运费和商业企业，以及越来越强大的海上力量。当“三十年战争（the Thirty Years War）”使德国的经济生活陷入瘫痪时，荷兰人却乘机成为北欧国际贸易的主要垄断者。

汉萨同盟与荷兰人竞争的领域是大批的食品贸易，尤其是粮食、盐和咸鱼；毛料衣服；皮革、铁和木材。在北欧，和在地中海一样，那里既有永久和经常的粮食贸易，还有暂时和常变的粮食贸易。英国通常或多或少是一个粮食自足的国家，但偶尔遇上潮湿的夏季，大部分的收成也会受到损坏，这样就会在这一年进口粮食，下一年出口粮食；或者会在这个国家一个地区进口，而同时在另一个地区出口。16 世纪末和 17 世纪初伦敦的人口急剧膨胀使谷物进口成为必然，主要是从波罗的海地区，最初是使用汉萨同盟的船只，后来是用荷兰的船只；但是大约在 1660 年后，从外国的进口就几乎停止了，因为这时伦敦能够依靠不断扩大的国内供应。至于输出港，他们只是在大饥荒时从国外进口谷物。那时英国暂时是惟一的一个进口国，而到这一时期末时，它就再也不是进口国了。同样，法国在收成好的年份出口，而只是进口收成差的粮食。经常的进口国有西班牙和葡萄牙，它们从法国和波罗【169】的海地区进口粮食，而且严重依赖德国和荷兰的船运，甚至在与联合省（the United Provinces）交战时期也是这样。1595 年和 1598 年在伊比利亚港口获得荷兰人的船只每次都有 400 ~ 500 艘。在其他更远的地方如欧洲的最北方，荒芜而森林茂密的挪威是波罗的海粮食的大主顾。卑尔根（Bergen）是具有一定重要性的港口，汉萨同盟的船只常来常往，进口粮食和出口“淡鳕鱼干”和森林产品。不过，最大的粮食进口者是尼德兰的工业地区；这些人口稠密地区为了他们自己的生存需要进口粮食，而且也是为了庞大的、正在成长的酿造业，它要出口啤酒到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尼德兰中南部的一些小麦和大麦供应都是从法国北部通过索姆河（Somme）或斯凯尔特河运来的。更多的小麦和对广大的人群更为重要的大量黑麦都是由海路从波

兰和德国东部运来的，而又是在波罗的海南岸广阔的平原上出产的。粮食都是用小船和驳船通过这一地区缓慢流动的河流运到港口，这些港口都位于河口；最具有特别重要性的是沿着维斯瓦河（the Vistula）到但泽（Danzig）的港口。因为但泽的商人和其他汉萨同盟的东部港口都面临着出口大量商品的问题——粮食和木材——大批量的，荷兰船只的帮助形成了一个极大的优势。自然，文德的（the Wendish）城镇是极其不欢迎荷兰船只的；这是导致汉萨同盟分裂的问题之一，因为吕贝克和它的邻居们要想将荷兰人从波罗的海地区驱逐出去的做法永远不可能得到但泽的配合。

松得海峡通行费（the Sound Tolls）的不断上涨和征收费用的丹麦（the Danish）政府变本加厉的盘剥，从来没有能够威胁到全程海上路线的低廉费用。16 世纪通过松得海峡的船只总量是惊人的。从这一世纪初每年平均大约 1 300 艘到世纪末超过 5 000 艘。[1] 众所周知，一艘船在一年当中要几次进出，而且大多数船只都很小。吨位只是一个粗略的分类，并没有准确记录；但是一些船只肯定在 60 吨以下；绝大多数的船只都登记为 60 ~ 200 吨，很少超过 200 吨的。在 17 世纪船只数量降到世纪中的年平均大约 3 000 艘，但船都很大。在 1620 年登记超过 200 吨的船只数量第一次超过更小吨位的船只。这种突然的增加让人难以置信，它主要是由于 1618 年引入了更为严格的估算方法，但这种严格的估算方法无疑是在鼓励人们使用更大的船。吨位的区分在 1645 年停止，但是商船的规模在逐渐扩大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无论怎么计算，在两个世纪中所运载货物的重量和数量都是巨大的而且是在【170】增加着的。15 世纪 90 年代最早几年的松得海峡收费登记册（the Sound Toll Register）显示：经过松得海峡的大多数商船都是荷兰的。在 17 世纪其比例稳步增长。整个 17 世纪阿姆斯特丹是供应整个欧洲的主要粮食市场。当反过来，荷兰受到使用同一条航线的英国人的挑战时，他们已准备用政治和外交武器来防御：与丹麦商订承包松得海峡通行费的赎买协议（the Redemption Treaties）。在 1670 年他们的航运受到战争的严重影响之前，荷兰人通常投入大约 735 艘船经营波罗的海和北海的贸易（不包括捕鱼和沿海岸的小船），平均大约 280 吨；总吨位大约 207 000 吨。这是荷兰船队总吨位的 1/3 ~ 1/2 之间，[2] 是同一时期英国商船总运载量的两倍多。荷兰在波罗的海

---

[1] 尼娜·艾林格·班格（Nina Ellinger Bang）：《1497 ~ 1660 年经由松得海峡的船只和商品列表》（*Tabeller over skibsfart og varetransport gennen oresund*，1497 ~ 1660 年），（哥本哈根，1930 年），第 1 页。

[2] 根据福格尔前引书第 319 页，是 568 000 吨或 284 000 拉斯特（*last*）。

粮食贸易中的统治地位直到 18 世纪才受到有力的挑战。

16 世纪初，波罗的海地区是北欧另一种必不可少的食物在北方的主要产地：咸鱼，尤其是咸鲱鱼。瑞典南端的斯堪尼亚（Skania），还有吕根岛（Rügen）以外水域是主要的渔场。捕鱼是当地渔民远离海岸的营生，而盐渍和包装是在海岸上进行的。主要用波罗的海渔业中的盐或者是来自吕内堡（Lüneburg）的矿物盐，经由汉堡或吕贝克沿着河道运来的，或者是海盐，来自法国的比斯开（the Biscay）海岸。汉萨同盟的船不仅带来了盐，还为渔场供应必需品和盛装捕获物的木桶；而且汉萨同盟的商人们还会向北欧地区和沿大西洋海岸的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分销最终产品。对鲱鱼的处理因而还包括长途运输和使用大型远洋海轮，而且这些也是汉萨同盟贸易很重要的一部分。

在 16 世纪，荷兰的渔民发现了新的捕鱼水域和新的捕鱼方法；波罗的海的渔业和汉萨同盟在渔业贸易中的份额都彻底地衰落了。其衰落是逐步的；迟至 1537 年，斯堪尼亚还生产了 50 000 拉斯特（*last*）的桶装鲱鱼；但 1537 年是一个好年份，而且那时北海多格滩（the Dogger Bank）和其他地方以及苏格兰海岸以外的竞争地都正在有规律地捕鱼，而荷兰则是为全欧供应鱼类的强有力竞争者。与汉萨同盟不同，荷兰人不仅捕鱼和包装，而且贩卖捕获物。为了开拓远离海岸的捕鱼场，他们发明了一种结实的渔船，一种相当专门但建造便宜的飘网渔船，通常所认为的双桅捕鲭渔船（*buizen*），它足够大可以在甲板上取出鱼的内脏、腌制和装桶。一艘渔船出一次海可以捕回 40 ~ 50 拉斯特的鱼；在好年份一艘渔船能够在 6 月中旬到 12 月之间出 3 次海，这是法定的“开放季节”；而从事这一生意的渔船数量在生意最红火时一般估计大约有 1 000 艘。

[171]

荷兰人在海上成功的一个秘密是他们愿意建造便宜的渔船并充分利用它们；而且大约在 16 世纪中叶，他们开始发展一种运送鱼至市场的系统，这样能使渔船在整个季节里都连续在海上作业，而不是在他们的货舱满时返回到港口。众所周知的快船（*ventjagers*，salehunters）从港口出航迎接归来的渔船，在甲板上接过他们的捕获物，然后运回港口，让渔船继续捕鱼。这种快船早在 1556 年立法中就已提到；尽管那个时候它们还不敢太远离河口。不过，一部 1604 年的法律描述了在捕鱼场成熟了的猎售（sale-hunting）行为，用设计好的快船将这一年的第一批鲱鱼以尽可能短的时间运到市场。第一批捕获物总能卖得一个好价钱；当第一批快船到达阿姆斯特丹或符拉尔丁根（Vlaardingeng）时，荷兰人——通常没有那么多骑手——想方设法以最

快的跑步速度在海牙（Hague）或阿姆斯特丹出售第一桶“鲜鲱鱼”。商人为此日的装备有轻快的马车和快马——既体面又赚钱的活儿。咸鲱鱼分销到欧洲其他地区是17世纪荷兰海上优势的主要基础。对这种状况的不停抱怨使得英国政府反抗荷兰，他们在英国港口销售在英国水域捕捞的鱼；虽然取代或至少学习他们的计划一再提出，但没有什么结果，因为英国在我们这个时期内不能在建造用于这种贸易的简陋船上与荷兰竞争。

北海的鲱鱼业——“大渔业”（Grand Fishery）——不是荷兰惟一的渔业，尽管它是最重要的。在北海，鲱鱼帆船可以在鲱鱼季节以外延绳钓鳕鱼；而且一些较小的无龙骨的船，像舍芬宁根（Scheeveningen）的“尖尾渔船”和建有活鱼舱的小船，可以在船上保存活鱼，并在尼德兰港口多格滩捕捞鳕鱼以及做“鲜鱼生意”。冰岛鳕鱼业需要较大的船只，而且不能与鲱鱼捕捞联合，因为季节是一样的。冰岛的鳕鱼不是卖鲜鱼，而是腌制，或 [172] 在岸上风干，主要销往西班牙和西属尼德兰（the Spanish Netherlands）。鲱鱼和鳕鱼贸易都大受影响——因为运鱼船都得通过英吉利海峡（the Channel）才能到达他们最理想的市场——它们备受敦刻尔克人（the Dunkirkers）的关注，他们与渔业关系就像狗鲨与鲱鱼的关系一样。帆船都带有武器，而且自1589年以来通常都带有护航舰。尽管有劫掠和护航舰的花费，这一贸易一直稳步发展直到17世纪中叶；但1652年后，荷兰与英、法的战争严重影响了这种贸易。从那时起，轮流护航和禁令就可以对荷兰的渔业史进行总结。英国的军舰和法国的私掠船导致北欧干鱼贸易的逐渐衰落，而南欧越来越依赖于来自新英格兰（New England）和纽芬兰（Newfoundland）这些更远地区的供应。

荷兰渔业的第三部门即斯匹次卑尔根群岛（the Spitzbergen）的鲸鱼业创造了巨大的出口贸易。斯梅伦堡湾的鱼油加工（*Traankokery*）开始于大约1612年，而荷兰的北极公司（the Dutch Arctic Company）两年以后特许经营。因为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渔业十分兴旺，而且停泊在海湾里的捕鲸船队还吸引了更远的船队，它们带着给养来到海岸上的割取油脂站，然后满载鲸油而归。一艘船在一个季节里可以在斯梅伦堡（Smeerenburg）与阿姆斯特丹之间进行两次航程，每次可以装运1 000夸脱（quarters）鲸油。到1641年，过度捕鲸使斯梅伦堡割油站亏损，而公司倒闭。英国和法国的战争、征用训练有素的人和船只消耗了荷兰的捕鲸船队。许多荷兰船主为避免征用把他们的船只卖给英国人；从而捕鲸业从北欧海岸水域转移，以跟随鲸鱼向大西洋公海和北极的大片的松散的浮冰区不可预测地

移动。

在 16 世纪早期，北欧贸易中最重要的制成品是毛料服装。一种或另一种服装在许多地方制造，但主要的产地是意大利北部、法国北部、佛兰德、布拉班特、荷兰和英国东部。其中佛兰德是最重要的。其他加工区之所以繁荣是因为它们的产品是对佛兰德产品的补充，而且也同样是在那里销售。实际上，服装加工区共同构成一个延伸的地区——尽管不断有内部的摩擦——从地理和经济的相互依赖上，从海洋与河流运输的便捷和廉价上。

[173] 在 16 世纪的前 75 年中，作为佛兰德服装业中心的安特卫普港是国际纺织业贸易中心，因而也是北欧一大片地区重要的商业与金融都市之一。从经济上讲，伦敦是安特卫普的一个卫星城，随着安特卫普逐渐繁荣起来；而且汉萨同盟的许多城镇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尤其是西部那些城镇。

在佛兰德织机上纺织的羊毛部分是来自于低地国家自身，但主要是来自于西班牙和英国。英国是北欧高质量羊毛的产地，享有的声誉如此之高以至 16 世纪早期的意大利商人都要到伦敦购买相当数量的羊毛，并通过莱茵河船运到意大利。不过外国的购买者，无论是意大利人或者是佛兰芒人（Flemings），都为在英国采购时被区别对待的出口税所困扰。只要有可能，出口贸易都掌握在英国人手中。大陆的主要市场（the Staple）一直位于加来（Calais），只要这个城镇还为英国人拥有，情况就会是这样的。佛兰德的商人们在加来购买他们的羊毛，然后用自己的船运回安特卫普。1558 年失掉加来之后，主要市场迁到米德堡（Middleburg），再往后是迁到布鲁日（Bruges），在这里一直持续到 17 世纪早期。1617 年英国羊毛出口被最后禁止，而外国的主要市场被取缔。那时安特卫普港陷入一片死气沉沉的破败状态；英国工业正在并购所有国内的羊毛生产，而且从西班牙进口羊毛。不过整个 16 世纪，尤其是安特卫普兴旺的那一阶段，英国连续地——正像几百年前它所做的一样——生产和出口大量超出国内加工需要的羊毛。

羊毛贸易的组织和把生羊毛运过北海都是相当简单的事情。织物贸易更为复杂一些。不同的加工中心生产出不同类型和质量的织物，而且常常交换他们的产品。织物和羊毛都是便于携带的；它们都可以制成合适尺寸的捆与包，以合理的价格让驮畜运进运出当地的加工中心。正是这种易携带性使国内体系的发展成为可能，通过它西欧的许多织物得以生产。在佛兰德与布拉

班特，织物和制造它的原材料通过内河网状系统（天然的或人工的）很轻易地得到搬运。织物可以从安特卫普所有的方向运出去，通过海洋到达英国、冰岛、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地区，换回粮食、鱼、木材和生羊毛；通过海洋它们也可以到达西班牙和葡萄牙。通过内河（莱茵河是其中最重要的）它们还可以到达德国的中部和南部。莱茵河负载着大批由马牵引的【174】驳船，将荷兰的鱼和佛兰德的织物运到远至法兰克福（梅恩河畔，Frankfurt-am-Main），而且满载着德国中、南部用亚麻纺成的"粗斜纹布"、莱茵河酒、钢铁、金属器具和武器，还有来自地中海和东方的香料与丝绸归来。驳船都很大，船上都有永久的生活舱。许多驳船上的船员都是荷兰人，而且海轮上的船员也都是荷兰人，尤其是驶向欧洲北部地区和进入波罗的海的海轮。安特卫普出口织物严重地依赖于，而且越来越依赖于荷兰的船运。到16世纪末，随着佛兰德的被破坏和安特卫普的衰落以及莱顿（Leyden）和阿姆斯特丹自身作为纺织制造中心重要性的加强，荷兰对织物运输业的控制自然还会加强。

不过，在16世纪的北欧，低地国家并不是惟一的织物大规模出口商。英国出口织物已经几个世纪了，而且在16世纪，英国的出口——尽管有巨大的波动——翻了两倍多。它们主要朝着两个方向：安特卫普和德国北部、斯堪的纳维亚、波罗的海地区。意大利、拉古萨和法国的商人们在伦敦的采购都是很小的。大宗出口主要是未染色和未漂白的织物，这是英国工业为佛兰德的精整工供应的，并且都主要为英国的出口商所掌握，长期以来他们都以特许商业公司（the Merchant Adventurers）这一法人团体名义活动，以此来保护他们特殊的垄断。这个管理公司总部设在安特卫普，特许商业公司在那里是一个有影响和受人尊敬的团体。另一方面，在16世纪前半叶，从英国运往北欧的厚实耐用的毛织物几乎都是由德国汉萨同盟（the German Hanse）的商人们运出的，他们反过来由于他们的运输服务在伦敦享有特殊的权利——在出口税上享受相当高的优惠，还有，他们在商业区（Steelyard）享有实际的治外法权。德国人长期以来利用他们的海上力量阻止英国人向波罗的海渗透。此外，在16世纪初他们开始在佛兰德贸易上与英国商人争雄；因为吸引伦敦人前往安特卫普的向心力也为汉萨同盟的商人们感受到了。相应地，英国的经济民族主义由于16世纪50年代初的萧条变得更加激烈，汉萨同盟在伦敦的特权首先被要求削弱并得以实现，最终被取消。不过，同时发生的西班牙与英国恶化的关系中断了佛兰德贸易。安特卫普在【175】60年代初拒绝英国商品，70年代初再次拒绝，而随后降临这个城市的灾难

却阻止贸易的完全恢复。特许商业公司被迫到别的地方寻求“大宗商品”，在一个或另一个汉萨同盟的城市（the Hanse towns）——自然暴露出他们反击伦敦政策的企图——或者在尼德兰联合王国（the United Netherlands），或者在这两个地方。经历许多变化之后，而且作为艰难谈判的结果，1611 年特许商业公司将他们的德国总部放在汉堡，这里被证明是最近开发的高质量织物成品的极好市场。他们在那里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汉堡当局对他们的欢迎是汉萨同盟在统一性和商业进取心方面衰落的征兆。不过，不论荷兰人强加什么样的苛捐杂税到他们头上，对英国的特许商业公司来说，还是不能丧失它们的未完成织物的尼德兰市场。他们永不归还西属尼德兰（the Spanish Netherlands），他们的贸易中心在米德堡、鹿特丹（Dordrecht）、代尔夫特（Delft）、多尔德莱希特（Dordrecht）之间迁移，而 1655 年在多尔德莱希特永久固定下来。那时他们的特权越来越受到英国闯入者和外国人的公开挑战，这些人把英国织物船运到阿姆斯特丹暂时保存和用荷兰商船再次出口。

汉萨同盟的衰落和德国在伦敦特权的被取消促使英国在波罗的海的商人们寻求特权。东陆公司（the Eastland Company）在 1579 年组成，它向松得海峡以外的国家出口染色和装饰布料，向英国进口亚麻布、亚麻、粮食和海上补给品。它在外国的贸易中心先是设在埃尔宾（Elbing），此后设在但泽。它的成员与特许商业公司的有部分重叠，但它的贸易额比他们的要小一些，而与同一地区的荷兰公司相比就更小了。它比特许商业公司的成员更糟糕的是，它在 17 世纪前 75 年的经历是与荷兰竞争失败的历史。整个 16 世纪，它的成员都是用荷兰买来或特许的商船运送他们的大部分商品。所有这些变化和发展的结果是：在 17 世纪低地国家的织物出口几乎完全由荷兰人运送，无论是通过海洋或是内河。英国的织物出口，以前部分掌握在德国人手中，现在也为英国人与荷兰人共享，荷兰虽然没有获得垄断的利益，也不拥有特许公司，却得到了更大的份额。在 1601 年总共有 714 艘船只进入伦敦港，其中 207 艘是英国的，40 艘是德国的，360 艘是荷兰的。① 自然大多数荷兰[176]船只都是小型的，并且只从事北海贸易；但它们的规模足以运送英国织物到荷兰和德国，而许多船只行程更远。据报告在 1620 年荷兰在英国港口与松得海峡以外的国家之间运营的船只有 200 艘。② 他们抓住英国国内战争（the

① 米勒（L. R. Miller）：《1601～1602 年有关伦敦航运和进口的新资料》，载《经济学杂志季刊》，第 41 期第 740 页。

② 国家档案，国内部分，1619～1623 年，第 157、211 页。

English Civil War）的机会进一步发展他们自己的毛纺业并扩大他们在德国和波罗的海的市场。乔赛亚·蔡尔德爵士（Sir Josiah Child）在1688年宣称，英国对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不及荷兰的1/10。[①] 荷兰的航运不仅运送北欧地区的绝大部分织物出口，还有几乎所有的制成品和工业原材料：低地国家的陶器、德国的武器和金属器具、瑞典的铁与铜、俄罗斯与波兰的亚麻和大麻、波罗的海的木材、沥青和钾碱。

煤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例外。在法国北部和尼德兰南部各地都开有煤矿，但泰恩河（Tyne）煤田是主要的出口地区，而英国的运煤船不仅承担泰恩河与泰晤士河（Thames）之间的沿岸贸易，而且还承担低地国家的大部分出口贸易。在17世纪前半叶，煤还是主要的家用燃料。在后半叶则成为重要的工业原材料，而且对它的使用还在急剧增加，而对它的运送是那一时期英国商船运输快速增长的一个潜在因素。

总之，在大件货物和多种货物运输方面荷兰是没有对手的。他们为英国、法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等国提供服务。英国《贸易法案》（the Acts of Trade）和1664年与1667年法国的关税在从荷兰人里夺得欧洲贸易方面同样没有发挥多大作用。《航海条例》（the Navigation Act）的用意被特许免税打破；它也被《布莱达协议》（the Treaty of Breda）的有关条款打破，它们包括荷兰内地贸易区莱茵河全部地区；而且尽管从荷兰夺取和购买不少，英国航运力量还是不足。在《宁韦根协议》（the Treaty of Nymwegen）中，法国被迫让渡相当大的关税回扣给荷兰。在17世纪末整个法国与北欧之间的货运业，以及与之相关的大部分英国贸易都还掌握在荷兰人手中。直到18世纪英国的托运人——他们在那时很大程度上不像受管控公司那样面临约束，而且已经成为向世界许多地区出口各种类型与质量的织物成品出口商——才向北欧贸易中荷兰的统治地位发起严重的挑战。

运输史必然与木材贸易史密切相关。直到19世纪中叶，木材还是建造运输工具的主要原材料。由于它的庞大和坚硬，从经济上讲是最难以运输的商品之一。然而在16世纪甚至17世纪，木材被证明比技术和资金更容易移动；那些其人民几乎完全从事货运业的欧洲国家，由于缺乏木材，因此不得不进口。荷兰人从未供应值得一提的天然木材。西班牙和英国北部的天然木材质量上乘，却被造船和炼铁消耗，在16世纪中叶已开始缺乏。法国天然 【177】

① 《贸易新论》，第4版第113页。

木材供应良好，但到 17 世纪也已感到缺乏。对于一切国家，尤其是对荷兰而言，不被中断的木材供应对维持海上力量是必需的，从而对木材贸易的控制是一项重要的事情。

北欧 3 个地区生产大量供出口的木材。这 3 个地区拥有的森林可供几百年采伐，并且它们基本上得到了保护。德国西部生产质量不错的栎木，这种木材经由易北河（Elbe）漂流到汉堡和经由威悉河（Weser）漂流到不来梅（Bremen）。许多木材，包括瑞士山毛榉也沿着莱茵河漂流下来。挪威是松树和枞木，主要是山毛榉的产地。造船所用的枞木和栎木主要来自于波罗的海南岸的林地。

这些地区共同的优势不只是有好木材，还有它们的易进入性。在国际木材贸易中，运木的花费是很小的——通常大约是送达价格的 5%。运费是决定性因素。只有它的绝大部分路程是水路，从经济上讲木材才可以搬运。在最为有利的条件下，从经济的角度讲，20 公里的陆路通常被认为是最长的路程。因此易运输的木材是生长在距海洋 20 公里以内或者是距河流相当的里程以内。在这方面波罗的海的森林尤其位置适当，它拥有许多可通航的河流，而且在河口还有装备良好的港口。维斯瓦河（Vistula）与德威纳河（Dwina）都是运输木材的主要河流，但泽与里加（Riga）都是主要的港口。严酷的冬季气候使冬季砍伐的原木用成群的牛拖拉或用雪橇运送成为可能，即通过封冻的冰雪运到河岸。有关运送木材的合同通常要等到适宜的冬季气候才签订，因为在暖冬道路泥泞或突然解冻的气候条件下，原木无法搬运。让原木沿着河流漂流到海里是很简单的，尽管比较慢。在较小的溪流中，原木都是单个地漂流。在挪威他们通常都是这样安排整个行程：让原木沿着急流下行；但在波罗的海地区的河流和莱茵河，他们在合流处将原木集中起来，制成木筏。这些木筏通常由 1 000 根或更多的原木制成，载着伐木者一家和他们的木屋、家畜、家禽以及牛车顺流而下。他们顺水漂流几周和几【178】月，由船尾的大桨掌舵，而且常常由桨或帆加快速度。

到了海边，木筏就拆散了。筏子上的人步行或乘坐他们带着的牛车回家。原木流入由河中的水栅构成的“木材库”（mast ponds），根据大小、质量分类和“围住”或作记号。最好的枞木用三桅帆船出口作桅杆。其他木料也许在装船港锯开，而且作为“木板”或“松木板”装船；或者其他的作为大木装船，只是刨平和修整以便少占船舱中的空间。“护壁板”一词最初是起源于栎木的一种形状，这种木料在从但泽运送至里加时原木的两边都被砍平。荷兰人通常都以这种方式运送木料，这些木料在赞

德姆（Zaandam）和其他港口的锯木厂锯成木材；但英国的木料通常是在波罗的海港口加工，那里的风车完成这种操作，这样会比在英国加工更便宜一些。

随着商船在17世纪的扩大，木料运输船也越来越大。它们的规模主要受沙洲的限制，这些沙洲阻碍了许多波罗的海港口的扩大。根据17世纪的推算，普通型的船只有200～400吨。据估计木料的“立方码”是50立方米。1立方码的木料约相当于1吨的货物，假设是栎木和更轻一些但更庞大的枞木混装，那么大多数船只都能装运200～400立方码。一艘“大船”的建造——航运船只——在17世纪后期至少需要1 000立方码，还不算桅杆和圆材。考虑到17世纪海上军事力量的不断扩大、商船运输的增强（商船用木材尽可能少的木材，但所建造的船尽可能的大），还有海岸建筑物对木材需求的不断扩大，所有这些情况都会让人们对17世纪北欧木材运输贸易的规模和运输木材船只的数量有所认识。在17世纪后期每年大约有250艘运木材船从里加启航，而从但泽启航的船只是它的两倍。偶然的危机产生急剧而突然的需求；例如，伦敦大火（the Fire of London）就让挪威人喜出望外。

木材贸易特别消耗船运量。木料只有在夏季可以安全地航运，部分是因为足够大可以赚钱的货物只能放在舱面上或各舱之间，因而使得运船上部累赘增加；部分是因为有些形状的木料——大木和桅杆——会使船只行驶艰难以至于在逆浪中特别危险。还有，承运者有一种强烈的倾向：要在贸易中采用破旧的船只，这必然提高了保险率。一个更属于经济上的困难在于难以获【179】得进入波罗的海的货物。一船分门别类的工业品和“殖民物品”——烟草、雪茄之类的东西——可以在但泽买回60～70船的普通木材。大多数运木料船都只装着砂石等压舱物进入波罗的海。毫不奇怪，运费，再加上相关的税费和保险金至少占到在目的地进口木料价格的2/3。因此这种运输的方式影响到木料的质量和持续时间。在水中浸泡数月之后，木料才在夏季装入闷热的船舱中，在里边蒸上几周；再由于从但泽到赞德姆或伦敦的航程需用至少一个月时间，而且战争期间还要等待护航，需要的时间更长。这样的环境会滋生真菌，尤其是可怕的“干朽”。这是根据——惟一真实的根据——英国人坚持拒绝外国木材的根据，也是他们选择适当干燥可用的国产栎木的理由（当其竭力广告的商品能够被拥有时）。用进口木材建造的船只常常寿命不长——至多20年；而也正因如此，对木材的旺盛需求才始终得以维持。

与粮食贸易一样，在 16 世纪波罗的海的木材贸易部分是由荷兰人运送的，部分是由汉萨同盟的船只运送，而到了 17 世纪就几乎完全是荷兰船只运送。英国东陆公司在这一贸易中所占份额是相当小的。在这一贸易中，波罗的海以外的供应也维持着大致相同的分配比例。早在 1550 年，挪威就不再是汉萨同盟的独占地区。对英国托运人而言，挪威拥有离出海口距离最短的优势；从卑尔根（Bergen）到赫尔（Hull）只需一周。即使这样，到 1600 年荷兰人也控制了挪威的大部分木材贸易，而且 1670 年在挪威的贸易中他们拥有 40 000 吨左右的航运量。1553～1556 年理查德·钱瑟勒（Chancellor）对白海（the White Sea）的探险为英国打开了来自阿尔汉格尔斯克（Archangel）内陆的新供应渠道：但其供应被忽略了，因为英国人认为其运费过高，直到大约在 1610 年荷兰开始使用它时这种状况才有改变。美洲的供应在 17 世纪从未认真地考虑过，因为其运费太高。在这一世纪，波罗的海一直是主要的木材供应地，但泽是主要的木材港口；尽管但泽在这一世纪每发一船的木材就发两船的粮食，不像里加只发木材。

汉萨同盟的贸易、荷兰人和英国人从波罗的海到北海的贸易都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所有的商人都依赖于国家力量保卫松得海峡（Sound）的良好愿望——在 17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是丹麦，最后则是瑞典。通过松得海峡对木材贸易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木材是重要的战争军需物，而经由吕贝克进[180]行陆路运输会显得过于拥挤。没有商人在经常性免交松得海峡通行费（Sound Tolls）上获得成功（尽管荷兰人为了他们自己的航运在这一世纪的几十年中承包了松得海峡）。波罗的海的木材也是不可缺少的。因此英国人和荷兰人一直对棘手的战争与“北冕星座”（Northern Crowns）复杂的外交十分关注。英国在与荷兰人竞争中的一个优势是：在 17 世纪大多数时间里它都倾向于支持最后的胜利者——瑞典——而荷兰依靠与丹麦的友好关系，它却是最后的失败者；但这种优势直到这一世纪末才变得明朗。在整个 17 世纪持续不断的战争中，主要海军大国的运木材船队需要——而且得到了——装备有重武器的军舰护航，而通过松得海峡则一直需要战舰威吓性的出动。英国与荷兰都冒险出动舰队以保证建造未来船舰材料的供应。最后——但不到 18 世纪——英国凭借其军事实力获得了商业的优势，这是以前在运输费用的竞争中没能获得的。

3.3　大西洋海岸贸易

地中海与波罗的海这两个内海的重要性，再加上它们的特点与必不可少的贸易，显示了16世纪这两个端点之间海上商业的图景。这样的图景也许是错误的。16世纪欧洲的贸易不能整齐地划分为北与南。在从塞维利亚（Seville）到鹿特丹（Rotterdam）这一漫长的大西洋海岸线上，还分布着许多海岸和河岸上的港口。它们在运送港口到港口货物方面，无论在种类与数量方面至少都可与北欧或地中海地区相比。伊比利亚半岛的航海传统和规模不应被低估。在16世纪后半叶，西班牙是欧洲拥有船只第二多的国家；西班牙与葡萄牙商船的总和至少与尼德兰的一样多，而且比英国、法国或德国的要多得多。伊比利亚船队分成地中海的和大西洋的两支；但16世纪西班牙人指挥的加泰罗尼亚（Cataluña）船运业却在衰落。在1562～1563年间，菲利普二世（Philip II）的政府曾经试图通过从毕尔巴鄂（Bilbao）调动造船工重整旗鼓，但失败了。毕尔巴鄂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西班牙港口，其货运量超过塞维利亚，尽管它拥有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它的货运量还大大超过巴塞罗那、阿利坎特或马拉加港的运量。[1] 在16世纪它是较大的造船中心，它的内陆山地生产优质的栎木和供应相当数量——尽管从未十分充足——松【181】木桅杆和沥青。在西印度群岛贸易中使用的大多数船只都是在比斯开延（the Biscayan）港口建造的，包括大多数最大的船只，这些船只超过了安达卢西亚（Andalusian）船坞的承载量。不过对海运业不利的是，由于缺少可航行的河流，这使大量有用的木材无法运出来；而且由于这个地区也生产铁，炼铁业与造船业争用现有的木材。正是由于对森林的消耗，还有设计的保守和建造中越来越多的以次充好，导致17世纪比斯开湾（the Biscay）造船厂的衰落。在船桨用材告罄之前，桅杆用材早就消耗光了，而且早在16世纪的最后25年就已经通过荷兰、佛兰德与汉萨同盟的船只大量从波罗的海地区进口了；但用于做龙骨、艏柱和船尾柱的粗大的栎木越来越难以购取，而且运费高昂。制帆篷的布和船上的索具都是进口的；比斯开延人（the Biscayans）从未发展出自己的工业，而是从法国或葡萄牙购得他们的

---

[1] 厄舍尔（A. P. Usher）：《16世纪和17世纪西班牙的船只与航运》，载《经济史的事实与要素》（剑桥，马萨诸塞，1932年），第212页。

帆布，从意大利或经由尼德兰从波罗的海购得他们的用大麻制作的索具。

总的来讲毕尔巴鄂和比斯开湾海运，与尼德兰的一样，不是靠“赚钱的”贸易而活，而是靠普通商品的大量运输。主要出口物是羊毛，卡斯蒂利亚（Castile）北部，尤其是塞戈维亚（Segovia）和索利亚（Soria）省高地出产的高质羊毛。伯戈斯（Burgos）古城是这种高价产品的主要收购中心，而且它还是卡斯蒂利亚地区拥有商业行会（Guild Merchant）的为数不多的城镇之一。成袋的羊毛从伯戈斯用驮畜运到毕尔巴鄂，在那里被装上比斯开延或佛兰德的商船。自然，大部分羊毛被运到西属尼德兰，但也有相当大一部分被运到汉堡，有一些被运到法国北部，还有一些——在 17 世纪其数量不断增加——被运到英国。由于 16 世纪后期政治状况，当它与尼德兰的贸易趋向衰落时，与英国和与布列塔尼（Brittany）的贸易却稳步上升，这使其巨大的损失得到补偿。毕尔巴鄂还向同样的目的地出口优质铁，尽管数量很小，还有不少廉价的劣质酒。除了海上补给品以外，它主要的进口品是佛兰德和英国的织物。

另一个在大西洋贸易中比较突出的西班牙港口是塞维利亚（Serville）。塞维利亚——后来为加的斯（Cadiz）所取代——主要是作为西印度群岛官方贸易的终点而闻名，它还是欧洲其他地区所需的新世界（New-World）的食品、染料和药品——糖、可可豆、胭脂红、靛蓝、洋苏木、烟草和奎宁等等——的来源。安达卢西亚（Andalusia），与比斯开湾一样，拥有广阔的森林，而且在瓜达尔基维尔河（the Guadalquivir）和里奥丁托河（the Rio Tin-[182] to）的河岸建造船只。所建造的船只没有比斯开湾的多，也没有那么好，但这个地区拥有捕鱼和海上航行的传统，而且塞维利亚长期以来一直是主要的港口，它与英国和低地国家有着密切的贸易联系。英格兰西南地区所产大量织物都从布里斯托尔（Bristol）海运到塞维利亚；而且整个安达卢西亚是北欧主要出口商品——鱼——的理想市场，不管是来自北海的咸鲱鱼还是来自冰岛和纽芬兰线滩（the Banks）的咸鳕鱼。在 17 世纪塞维利亚还进口各种大量的法国工业品，它们再通过执政官政府（the *Consulado*）的垄断者出口至西印度群岛。除了美洲的产品，塞维利亚还出口安达卢西亚出产的生羊毛——粗劣和廉价那种——和其他几种服装工业的原材料：卡斯蒂利亚的肥皂、橄榄油和海草灰苏打——一种来源于海边藜科植物灌木灰、肥皂制造中常用的碱。它还供应北欧大量的冬季水果——柑橘、葡萄干尤其是无花果和扁桃，以前曾是少有的奢侈品，但在 16 世纪成为相当普遍和大宗贸易的对象。

不过，西班牙南部出口的最有名的产品是酒。酒是庞大、沉重但有价值的商品，而且是陆路非常难于运输的商品。惟一可行的陆运方法是皮囊运输——这是可航运河流较少的国家像西班牙常用的方法——但装在恶臭的羊皮囊中在骡背上颠簸不仅费钱，而且还败坏酒味。另一方面，装在木桶中的酒，尽管几乎不可在陆地上移动，但在水路上运输却方便、容易；装满酒的船不需要其他压舱物；而且酒装在木桶中还更加有味。因而欧洲的酒河——莱茵河和罗讷河、加龙河（Garonne）和瓜达尔基维尔河都具有双重的重要性。不过，由加龙河、瓜达尔基维尔河和它们的支流所打开的市场在范围上是有限的。大部分加斯科涅（Gascony）和安达卢西亚的酒并不是在国内，而是在由海紧密相连的国家寻找它们最好的消费者。英国和低地国家，尤其是英格兰是依赖欧洲市场最严重的国家，因为他们自己不出产酒，但由于与这些国家建立了紧密政治联系，养成了固定的口味。

到16世纪，波尔多（Bordeaux）红葡萄酒贸易，尽管它有古老的历史，却由于政治原因失去了它在中世纪后期还曾享有的繁荣，并走向衰落；尽管波尔多在这一世纪初还供应英国酒消费的3/4，而且直到威廉二世（William II）从市场征收酒税时红葡萄酒还一直是英国贸易的重要项目。波尔多几乎没有自己的海运，它的酒是由英国、佛兰德和荷兰的船运输，或者由布列塔尼（Breton）的商船运输到法国北部。波尔多对北欧贸易相对衰落是塞维利亚和加的斯（Cadiz）的收获；因为在16世纪，英国人对西班牙西南部和加那利群岛（the Canary Islands）出产的烈性酒越来越喜欢而且持续至今。进口布、出口白葡萄酒构成16世纪布里斯托尔（Bristol）的贸易。安特卫普也在16世纪进口大量布匹，这些布匹用西班牙或佛兰德的商船运输。荷兰人，尽管他们愿意运送任何种类的酒，但通过河流运来的大部分进口莱茵白葡萄酒都是自己饮用的：而且在“三十年战争（the Thirty Years War）”期间莱茵河流域的（the Rhenish）葡萄园遭到普遍的毁坏，荷兰人不再喝白葡萄酒而改喝地方酿造的啤酒。 【183】

甜酒贸易与红、白葡萄酒相比要小得多，尽管在北欧甜酒卖得好价钱。在16世纪它们主要来自地中海，而且用罐子而不是木桶从长期掠夺了他们木材的岛屿海运。不过在17世纪土耳其人占领克里特岛（Crete）时，马姆齐甜酒（Malmsey）的供应被切断。酿制马姆齐甜酒（the Malvoisie）的葡萄已经在马德拉（Madeira）移植，但马德拉白葡萄酒的妙处不能为北欧的人们完全品味，直到18世纪早期才有所改变；17和18世纪热那亚人在英国和低地国家出售意大利甜酒的尝试没有获得多大成功，因为这些甜酒的味道不能在长

途运输中得以保存。在 17 世纪后期英国人对甜酒的需求促使这种港口贸易的增长，用英国或荷兰的商船航行 3 ~4 周从波尔图（Oporto）运到伦敦。

大西洋沿岸贸易的第三大货物是盐，北欧的腌肉业和腌鱼业都要使用它。盐在欧洲有许多来源：吕内堡（Lüneburg）的矿物盐，它大量供应斯堪尼亚（the Skania）的渔业；用达林克（*darinck*）灰制造的泥炭盐（moor-salt），在荷兰港湾盐浸渍的泥炭；在卢瓦尔河（the Loire）口与纪龙德河（the Gironde）口之间的许多地方由蒸发提取的海盐，但主要是在布鲁热（Brouage）湾与布尔热纳弗湾（Bourgneuf Bay）；葡萄牙南部尤其是锡土巴尔（Setú bal）也生产类似的海盐。荷兰人——那些运输大宗货物的足智多谋的专业人员都是国际盐业贸易高手和盐的主要使用者。在 16 世纪早期根据统治大渔业（the Grand Fishery）的帝国规定：坚持使用泥炭盐，但当达林克的供应用光时，鲱鱼的加工处理者被迫进口海盐，它比泥炭盐更粗糙、更脏，而且在用于加工处理鱼之前通常还得溶解和蒸发提纯。16 世纪中叶以后他们被命令只准使用西班牙或葡萄牙的盐，而且锡土巴尔成为供应的主要来源。尼德兰的反抗、1580 年西班牙与葡萄牙王国政府（the Spanish and [184] Portuguese Crowns）的统一，还有 1585 年、1595 年和 1598 年里斯本和锡土巴尔对荷兰航运的封港令，导致这一贸易的中断和困难。荷兰人可以从布尔热纳弗湾得到盐，但并不够。他们需要如此多的盐，而且使他们自己像运输者一样成为必不可少的，以至于他们几乎在整个战争期间采用各种借口继续与里斯本、与锡土巴尔，而且也与西班牙港口做生意。西班牙默许它，因为他们还要依靠荷兰船只为他们运输进口的粮食与木材。即使在封港的年月，当海运的缺乏和加重促使西班牙政府在西班牙港口夺取敌人的船只时，大多数荷兰人想法贿赂他们，让他们的船出海。贸易的状况变得如此地不确定，而且西班牙的默许的代价又是如此高昂，以至于在 16 世纪最后 10 年和 17 世纪最初 10 年不得不在佛得角（the Cape Verde Islands），而且最后在西印度群岛这些更遥远地区抢夺盐田。这样荷兰与他们之前的西班牙、葡萄牙一样逐步地从大西洋沿岸转向大西洋的彼岸开展贸易活动。

在 16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意大利北部和佛兰德是欧洲两个主要的工业与商业活动地区，而且它们之间的联系是两个地区繁荣的必要条件。意大利沿海城市通过海路从黎凡特进口东方商品，而且与他们自己制造的商品一起出口到佛兰德，进而分销至整个北欧地区。它们除了接受金钱以外，还从佛兰德和德国得到工业品，从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地区得到原材

料。这种多样而重要的贸易既经由陆路又经由海洋。有好几条陆路，它们要取决于河流的交汇和山上的关口。阿迪杰河（the Adige）上游岸边和附近一些繁华小城——维罗纳（Verona）、特兰托（Trento）、鲍尔扎诺（Bolzano）、麦拉诺（Merano）——它们的繁荣归功于从威尼斯越过勃伦纳（the Brenner）通达德国南部制造业与商业中心的贸易——这些商业中心包括奥格斯堡（Augsburg）、纽伦堡（Nürnberg）和其他地方。这些德国城市又通过乌尔姆（Ulm）和斯图加特（Stüttgart），或者维尔茨堡（Würzburg）和法兰克福与西北大动脉莱茵河相连。勃伦纳对于威尼斯，圣哥大山脉（the Saint Gotthard）对于热那亚和米兰，都是一条至少可以通行骡子的大干线，通过这条干线可以到达作为欧洲中心的瑞士，从而再——尽管不是一条十分易走的路——到达莱茵河上游。

除了非常庞大的物品，这些陆路拥有不少优点。它们比海路安全，尤其是从 16 世纪 30 年代起，当北非城镇的统治者稳固和增强了他们的海上力量乃至不断发动反对基督教商业的挑衅性战争时。在 16 世纪中叶直布罗陀海峡（the Strait of Gibraltar）是一段非常危险的航程。在德国，河岸土地所有者不时强索通行费确实接近海盗行为；但另一方面，陆路交通的发展正在提高它的效率，因而交通不再局限于河运。在德国，这一世纪中两轮和四轮运货马车的数量与效率都在稳步提高。在地中海国家，16 世纪是骡子的全盛期，从商业上讲，正是恭顺而倔强的驮畜为西班牙征服了新世界。很奇怪，它的价值在欧洲还不太被认识。查理五世（Charles V）时西班牙作家们加入到抱怨西班牙和意大利骡子饲养过多的行列中，他们说这样减少了可用于作战的驯马的存栏量。然而骡子茁壮成长并在降低运输费用中起到一定作用；而且在地中海世界的许多地区，有证据表明，在 16 世纪下半叶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选择陆路而不是水路交通。

[185]

意大利北部与德国南部之间的跨越阿尔卑斯山的贸易的繁荣并没有持续到 16 世纪。它被没有预见的和不可控制的自然变化所中断，或至少是被严重地削弱了。中世纪晚期是气候越来越严酷的时期，到 16 世纪末和 17 世纪前半叶在北欧和阿尔卑斯山脉地区这种严酷达到顶点。那时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的村庄会被快速推进的冰河淹没——冰河到那时还如此小、离最高点还如此远以至于没有人会想到它们会成为一种威胁。高山上的关口远古以来一直是夏季的贸易线路，这时也被冰雪阻挡。德国南部与地中海的贸易，还有通过地中海与外部世界的贸易被迫转向相反的方向，沿着莱茵河朝尼德兰和大西洋沿岸发展。意大利与尼德兰之间的陆路贸易几乎停止了。

海上线路还保留着。16 世纪初，地中海与大西洋北部沿岸之间的海上

贸易几乎没有例外都是用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商船运输的。在这一世纪前半叶，意大利的这种优势还保持着，但其困难在不断增加，这是因为木材供应的消耗和随之而来的造船与修理费用的上涨。威尼斯以前完全依靠内地供应木材；伊斯的利亚半岛（Istria）供应栎木，雷蒂亚山脉（the Rhaetian Alps）和卡尼克山脉（Carnic Alps）供应枞木桅杆和落叶松木横梁。相当大一部分【186】桅杆用材是从阿迪杰河（the Adige）上游得到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16 世纪，但是在 15 世纪末，栎树森林的消耗使人们忧心忡忡。在 1520 年兵工厂获得了额外的权力能够保留栎木材作为航海之用。它利用这种权力保护了大片的森林，不仅从烧炭人那里和山羊口下，还从商业造船工人那里。私人造船厂被迫从威尼斯控制地区之外进口栎木，从达尔马提亚（the Dalmatian）海岸和阿彭奈因斯（the Appenines）的东坡进口；但是这些地区缺少可以运输原木的通航河流，因而获得的供应是有限的。缺少木材在 16 世纪后半叶的地中海西部成为很普遍的现象。

威尼斯的造船不仅为材料缺少所阻碍，而且也为建造和设计中的保守主义所阻碍，在对商业如此敏锐的人民中为何出现保守主义？这是难于解释的。到 16 世纪 30 年代时，威尼斯人在佛兰德贸易中启用了大帆船。大帆船由于它们的速度和不受风的影响，因此在地中海地区很有价值。在大西洋中，它们只能在夏天使用；而且它们必然是不经济的。它们装载货物不多。划桨能手（无论是自由民或是奴隶）都很难找到而且供养他们花销很大。最后连桨在威尼斯几乎都很难找到，因为制作桨的山毛榉木都为兵工厂留作他们自己之用了。在 1532 年，佛兰德的大帆船中断了它们的航行。保留在贸易中的意大利船只基本上都是宽身帆船。威尼斯造船厂长期以来专门建造大型商船。他们对缺少木材的反应是建造较少的小型、中型船，但继续保留着每年建造 4 ~5 艘大船的老习惯。[1] 许多超大型商船都是 16 世纪中叶而不是更早时候在威尼斯建造的，其中许多超过 600 吨，甚至超过 1 000 吨——比为大西洋贸易建造的大多数船只大多了。船身都很坚固、牢靠，设计和帆装都是老式的，建造和航行都花费很大。16 世纪后半叶，在与北方更为廉价的中型船只竞争时，这种船只获得成功的机会越来越少；16 世纪末，商业造船厂几乎停止建造它了。到 17 世纪只有海军兵工厂还坚持威尼斯的造船传统。威尼斯商人被迫从北欧、西班牙和从爱琴海（the Aegean）诸岛买

---

① 莱恩（F. C. Lane）：《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的商船和造船工人》（巴尔的摩，1934 年），第 106 页以下。

船以维持他们的海上贸易。

大西洋海运向地中海地区的入侵是英国人的、法国人的、汉萨同盟的，当然还是不可避免的——但有点儿姗姗来迟的——荷兰人的作为。长久以来在对塞维利亚贸易中表现积极的英国人，大约是在 1511 年，第一个越过海峡并与之建立正常贸易关系；一些船只离开布里斯托尔和南安普顿（Southampton）驶向里窝那、西西里、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最后推进到远至贝鲁特（Beyrout）和叙利亚的的黎波里的地方，他们带来了毛织品——“克尔赛手织粗呢”（kerseys）——和锡，这是枪炮铸造业急需的材料；他们还购买丝绸、胡椒、甜酒、水果、油和地毯。他们是如此的弱小以至于无法与威尼斯人展开真正的竞争，而且常常把货物委托给威尼斯的商船。他们的访问在 16 世纪 50 年代早期突然停止了，其原因只能猜测，由于其他国家的海运，包括意大利的、法国的和佛兰德的都还在海峡间穿梭。其原因可能与土耳其的入侵有关；而更有可能与英国人有关。16 世纪 50 年代早期英国正处于商业危机和信用收缩期：也是理查德·钱瑟勒（Richard Chancellor）的企业注意力转向东北部寻找“中国”（Cathay），从而打开与阿尔汉格尔斯克的贸易的时期。英国大约在 1573 年回到地中海；在 1578 年，他们与土耳其协商；而在 1581 年，黎凡特公司得到他们的特许，从而开始在黎凡特开展赢利的贸易，并与威尼斯竞争。这仅仅是个小小的开端。在 16 世纪末，英国人以海盗行为而闻名，这表明他们还想掠夺大贸易的一部分，而不是开展他们自己的贸易。大西洋强国对地中海贸易的首次真正的征服不是由英国人，而是由荷兰人取得的，尽管英国人下手更早。【187】

英国人进入地中海出售织物和锡。荷兰人先是以出售鱼和粮食开始。他们与里斯本和塞维利亚的贸易从未完全停止过，尽管深受战争的影响。在这些南部港口中，它们不能不知道整个地中海西部地区粮食越来越缺少的情况，特别是自 1586～1590 年意大利庄稼连年歉收所造成的饥荒。事实上不只是他们急忙奔向意大利以灾荒时的价格出售粮食；他们的老竞争对手，汉萨同盟在这一方面反应也很迅速。德国商人有来自波罗的海的粮食可供出售。他们还拥有战争中保持中立这种政治上的优势和急于排斥荷兰人的西班牙政府的积极态度。在 1590 年，托斯卡纳大公（the Grand Duke of Tuscany）由于不能从西西里实现粮食需求的满足，便转而寻求来自但泽、吕贝克、荷兰、法国和英格兰的供应（也是按照这个顺序）。而汉萨同盟求助于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市场是有紧急原因的，因为荷兰的竞争使他们在北欧很艰难，而在 1579 年他们在英国失掉了特权。他们急于到意大利，用西班牙的安全通

行证保驾护航。1593 年，总共有 219 艘船到达里窝那，其中 73 艘装运的是来自地中海以外地区的粮食。其中 34 艘是属于汉萨同盟各个城镇的、12 艘是荷兰的、7 艘英国的、4 艘佛兰德的、2 艘挪威的、1 艘里加的；13 艘其身份未查明。不过有意思的是，在 73 艘船中实际上只有 29 艘在汉萨同盟的港口装货，主要在汉堡和但泽；[1] 7 艘英国商船都在英国港口装货；而里加的船在里加装货；至于其他的船只，所有荷兰的和佛兰德的、2 艘挪威的、5 艘德国的和 5 艘"可疑的"商船都是在阿姆斯特丹装船，这都进一步显示了这个城市作为国际粮食贸易中心的重要性。所有这些航程都在一年的头 5 个月中完成，而且从阿姆斯特丹出发的航程 5～12 周不等；这也是从过去冬季航行的恐惧中解放出来的标志。

汉萨同盟参与地中海贸易的竞争并不长。随着 1604 年英国与西班牙条约和 1609 年荷兰与西班牙停战协定的签署，德国失去了它作为中立国的优势。由于在最接近的内陆地区他们没有重要的工业中心，他们与荷兰相比就没有什么东西可提供给地中海的买者。在船只设计和商业组织这些技术问题上，他们也落在了荷兰的后面；而且在 17 世纪第二个 25 年中，德国受到前所未有的战争破坏的影响。由于所有这些原因，17 世纪早期，地中海与北欧之间的贸易主要落到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手中，这里与其他地方一样，荷兰人占了相当大的份额。一旦打进粮食贸易之中，荷兰人就会坚决获得这一"赚钱"贸易的绝大部分，紧接其商业活动之后的暴力行为与他们的残酷一样有效。他们证实了为地中海地区所建造的船只即使在地中海地区也没有竞争力，尽管这些船只采用了大西洋航海的优良设计和更为便宜的建造方法。他们在 1597 年到达叙利亚；在 1598 年亨利二世授权以法国的名义与土耳其人做生意。在 1612 年他们获得土耳其的投降条约时，他们的贸易被宣布完全合法。

在荷兰在地中海贸易趋向扩大以及他们更为招摇地闯入印度洋的同时，霍特曼（Houtman）在 1595 年启航，而东印度公司（the East India Company）在 1602 年组成。以后的 20～30 年间荷兰控制了印度尼西亚生产香料的主要群岛，而且将香料贸易的相当大一部分转向好望角航线。结果是将东方贸易分为两个部分。荷兰和英国商人到远东寻求香料、白布和平纹细布。他们到黎凡特购买丝绸、甜酒、无核小葡萄干和地毯。这两种贸易都很赚钱；在 17 世纪早期，英国黎凡特公司的贸易被许多人认为比（英国）东印度公

[1] 参见布罗代尔《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中的表格，第 499 页。

司的贸易要有利得多，因为土耳其是织物、锡和武器的市场，而远东的物品不得不用现金购买。另一方面，威尼斯人发现了远东物品的供应若经由阿勒 【189】 颇会导致其数量减少或是价格大为提高；而且他们在近东商品的贸易面临着越来越剧烈的竞争。长期以来，威尼斯的海运一直在亚得里亚海、爱琴海和黎凡特之间承担着相当大的贸易量；但积累的财富和威尼斯的海上力量最终被西班牙与土耳其之间长久的战争逐渐削弱，而且它的贸易地位被 1669 年对土耳其克里特岛之战的失败严重地削弱。逐步地、难以觉察地，亚得里亚海成了一片没有生气的死水。

第勒尼安海（the Tyrrhenian Sea）的港口由于贸易方向的变化和北欧商船的涌入而赚钱。尤其是进入里窝那商船数量在 17 世纪早期急剧增加。[①] 热那亚尽管在造船和商船拥有量上都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其作为一个港口和商业中心的重要性，它有一个繁荣和工业发达的内陆。在与法国南部港口沿岸贸易方面稳步增长，这些贸易主要是通过马赛所拥有和建造的商船进行的。马赛作为一个小型商船的港口越来越繁荣——实际上柯尔贝尔（Colbert）使它成为责备的对象——尤其是在 1681 年以后，当朗格多克（Languedoc）运河开凿成功通航时。这条运河是 17 世纪完成的许多内陆水路中最为伟大的，它为法国人提供了大西洋与地中海之间的一条通道，但只是相对小型的船只可以通过。

按照北欧的标准 17 世纪通过海峡进入地中海的远洋货轮都很大，尽管要比大型的意大利商船小。福格尔（Vogel）[②] 估计 1670 年荷兰在贸易中使用的船只大约有 200 艘，平均规模大约在 180 拉斯特或 360 吨。形成这种高吨位的原因是出于防御的需要。海盗行为和频繁的战争使地中海对于没有武装的商船来说成为一片危险水域，而且所运载的货物都是价值高昂的，与它们的价值大小成比例，为了保护它们得支付给水手足够的钱。荷兰人很擅长使用没有武装的轻型大容积商船，常常放弃一些在北方贸易地区所使用的优秀的和经济型的商船。英国人习惯于建造更为沉重的木造船，这更为浪费人力，但它在地中海比在波罗的海更有竞争力。17 世纪他们在地中海的贸易比荷兰人的要小得多，但它在稳步地增长，尤其是在 17 世纪末，而且越来 【190】 越得到海上力量、与巴巴里（the Barbary）统治者的协议以及其后基地建立

① 布罗代尔（F. Braudel）和罗马诺（R. Romano）：《1547～1611 年里窝那港口商船的进出》（巴黎，1951 年）。

② 《论 15 世纪、16 世纪和 17 世纪欧洲商船船队的主力》，载《中世纪和近代历史研究和尝试》，第 319 页。

的支持。正是这种合力最后在 18 世纪产生了让人不愉快的矛盾存在物——英裔地中海人（an English Mediterranean）。

3.4 远洋贸易

在欧洲与欧洲之外的世界建立起正常的远洋贸易是 16 世纪的主要成就。在 15 世纪最后几年之前，横渡远洋航线的惟一经常使用者是在冰岛水域活动的捕鱼船队，还有一些在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它们各自所拥有的大西洋岛屿之间来往的商人们。到 16 世纪末远洋航线，如果不是平常的话——这样说是因为它们总是很危险——是很频繁的。欧洲的商船经常运载着货物横跨大西洋和印度洋，即使很少横越太平洋；而且它们往返的许多个遥远港口都在欧洲人的控制之中。

从里斯本到印度和从塞维利亚到西印度群岛这两种主要的远洋贸易有许多共同点。它们两个的航程和航行日期都为独具特色和可以预报的风向系统所决定。两种贸易在法律上都具有垄断性——一个是公共的，一个是私营，这种垄断性在实际上都不彻底。在 17 世纪这两种垄断一再成为其他沿海地区人民进行攻击的目标，这种攻击十分成功，由此他们能够发展更为强大的海上力量、更灵活的贸易方法和更廉价、更有效的运输方式。

在 16 世纪前 20 年，葡萄牙人通过使用海上力量获得筑垒的基地和在东方商业中的地位；而且他们的海上力量，尤其是欧洲舰载大炮的威力使他们能够保护他们的贸易免受东方竞争者的打击。果阿，他们的亚洲重镇，是一个有相当力量的海军基地。不过说葡萄牙人“统治”了东方贸易线路则是一种夸大。他们控制了从欧洲到印度的海上交通线，因为 100 年来他们没有竞争者；但在亚洲水域他们很快接受了他们只是许多商人团体中的一个的地位。在战争期间，他们抢夺穆斯林的船只，而在和平时期，他们在霍尔木兹（Hormuz）和马六甲（Malacca）——他们的战略基地向过往船只征税；正像我们看到的，阿拉伯的独桅三角帆船继续穿过印度洋，中国和马来[191]（Malay）船只在中国海和爪哇海（Java Sea）之间往返。葡萄牙商人有时把货物装在中国的平底帆船上，而且反过来也是如此。葡萄牙人商业上的成功不完全归功于海军的实力——尽管他们的船只按照东方的标准是巨大的——更多是因为他们活动的多样性和地理范围。从“杂货商之王”（grocer king）的立场看，葡萄牙在东方的组织具有不只一个主要功能：不仅把东方的香

料，主要是胡椒，而且还把锡兰（Ceylon）的樟属植物、西里伯斯岛（Celebes）的肉豆蔻、婆罗洲（Borneo）的樟脑——此物是其中最有价值的——从摩鹿加群岛（the Moluccas Islands）和班达群岛（the Banda Islands）穿过，最后运到里斯本。不过，为了买这些货物，他们也不得不发展附属贸易的整个网络，因为葡萄牙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可供交换的，也没有多少商业资本。

这种地方商业的基础是从古吉拉特港（Gujerrat）到科罗曼德尔港（Coromandel）之间棉织品的出口贸易。这些棉织品在印度尼西亚有很好的销路，在那里他们用香料来交换，而在东非他们用黄金和象牙来做易货交易。所有这些地区的人口在那些日子为印度布匹提供了赚钱的市场，就像在更近的现代，他们为曼彻斯特和大阪纺织品提供赚钱的市场。日本对中国工业品的急需同样能使葡萄牙人赚钱。这两个帝国之间的直接贸易大约在1480年为明朝皇帝永远禁止，这是由于日本倭寇（*Wako*）海盗在中国海岸的劫掠。走私无疑还在进行；但是，在官方贸易中葡萄牙人作为中间商拥有重要的优势。尽管澳门的宽身帆船比它们同时代更有名的马尼拉的西班牙大帆船历史更短——60年与200年之比——它们也没少赚钱。其中许多艘都是在印度用马拉巴尔（Malabar）柚木建造。它们一定是航行十分得力，因为在这60年中只有一次船只失事的记录，而且是在一次台风中。从果阿启航通过马六甲，它们运载各种欧洲商品到葡萄牙在澳门的租界，在那里它们装上丝绸织品、生丝和从广州（Canton）购买的瓷器。这些货物都在长崎（Nagasaki）出售，通常都是用块银偿还。由于银的价值在中国比在日本高，在返回澳门时通过用银兑换金还可以赚钱。在1618年每年启航一艘巨型船驶向日本的行动取消了，而这又是由于存在着遭受荷兰攻击的危险，但许多小而快的船还一直从事这一贸易并一直持续到1639年。丝绸也从澳门海运到望加锡（Macassar）——香料的产地——还运到马尼拉，在那里它们按墨西哥银元的价格被出售。还有其他许多地方的交易：如在中国海岸与小巽他群岛（the Lesser Sunda Islands）之间展开的檀香木交易；奴隶贸易，无论是非洲黑人或是中国和日本苦力（*muitsai*）；从美索不达米亚进口到印度的马匹和来自阿拉伯半岛的铜；从印度出口到中国和日本的鹰、孔雀，甚至偶尔还有笼中的老虎。葡萄牙人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商人。葡萄牙语作为亚洲海上贸易通用语（*lingua franca*）达200多年。洋泾浜英语（Pidgin English）来源于混杂的葡萄牙语（Pidgin Portuguese）。【192】

“集市贸易”要比皇家船队的贸易更加广泛而且可能更能赢利，后者对

财政很有助益。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些连接果阿与里斯本的船队竟构成帝国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他们的薄弱——如此可怜地在灾难记事《海上悲剧史》（*História trágico-marí tima*）中透露出来——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航线内在的困难；船只的缺陷；还有人员配备和指挥系统的薄弱。

葡萄牙的第一批殖民者由于缺少详细的地理知识，他们在他们到达的第一个海岸，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the Malabar Coast of India）建立了他们主要的东方基地，它是一个缺乏保护的港口。他们的其他许多基地都是处在古代阿拉伯贸易线路上，位于印度洋的北岸。除了为了绕过好望角或者为了访问帝汶岛（Timor）或摩鹿加群岛（Moluccas）之外，他们的后继者很少进入南半球。在驶向中国海和香料群岛（the Spice Islands）时，他们走的是长期以来马来（Malay）船只所使用的北部航线，经由马六甲海峡那些受到保护的水域。果阿既是他们组织的经济中心，也是行政中心，还是他们船队的目的地。与其他马拉巴尔港口一样，果阿的海上运输受不断替换的西南与东北季风的支配。每年有 3 个月没有一艘冬季的船能够毫无困难地到达果阿港，另有 3 个月没有一艘夏季的船能够离开果阿港。马六甲和霍尔木兹是两个最重要的补给基地，每年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与果阿中断了联系；这一期间由此转船运往果阿的香料受到限制；而且西印度群岛皇家船队的航行日期被限定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他们在 3 月离开里斯本，估计 9 月到达果阿；从果阿 1 月或 2 月启航，直抵好望角，或者 12 月启航，通过莫桑比克（Mozambique）海峡走更漫长、更安全的路线，在 8 月或 9 月到达里斯本。不能准时启航意味着要推迟许多月，而且可能意味着航程中的灾难。在什么时候航线都有危险：在好望角以外经常出现的阴沉的天气，还有圣赫勒拿岛（St Helena）、佛得角群岛（the Cape Verde Islands）和亚速尔群岛（the Azores）以外的海盗船，尤其是与西班牙联合以后，当葡萄牙的船只成为西班牙的敌人有懈可击的对象之时。食品供给站——由巴西、罗安达（Luanda）、莫桑比克向外航行，由圣赫勒拿岛或罗安达或亚速尔群岛向本国航行——都相隔好多周的航程，因此除了在海上的风险和敌人的劫掠之外，还得加上坏血病和伤寒所带来的危险。[193]

开展这些危险航行的船队都很小，很少超过 5 ~ 6 艘船的，有时只有 1 ~ 2 艘；但是组成船队的船只都很多。1592 年巴勒斯（Burroughs）所搭乘的"德欧斯夫人号"（*Madre de Deos*）被哈克卢特（Hakluyt）定等级为 1 600吨，而且它无论如何不是贸易中惟一的巨型船。还有地中海类型的宽身帆船，它是为装运最多的货物而建造，而不是为战斗或经得起海上的风浪

而设计的。葡萄牙与印度的葡萄牙造船厂能够而且也确实建造了可靠的中型船只，它被使用于其他贸易中，而且被许多有经验的船长，像著名的若昂·佩雷拉·科特雷亚尔（João Pereira Corte-Real）推荐给西印度群岛；但宽身帆船一直在使用，而且在1550～1650年间它们的规模还在稳步扩大。拥有巨型船的小船队建造起来比同样吨位的小船要便宜一些——这是葡萄牙的主要考虑，在他们那里木材缺乏而且建造费用高昂。在理论上，组成一支这样的船队，在正常固定的航程和可以预见的货物的前提下，无论是人员配备还是航行都更为经济。实际上，印度洋航线上的船只（*naós da Carreira da India*）虽为了安全而发展得很大，但在建造与设计方面并没有相应的改进。

为了商业利益，安全以几种方式被牺牲掉。官员和商人担心的是装满货物的船队的航程，维护工作却草率进行，装载也快速而粗心。疲惫与破旧不堪的船只还回到海里，而且船只还习惯性地超载，部分是由于对于官员和水手来讲，在操作上允许他们在不多给付工资的前提下私下进行这种冒险。这自然不仅限于葡萄牙的船只。荷兰人和英国人都是运营他们的船只一直到最后，而且出于同样的原因船只超载。不过在印度洋航线上（*Carreira da India*），船只都是在不安全的状况下准备出海，因为那些负责做出主要决定的人本身就缺少专业知识。在16世纪和17世纪葡萄牙人从来不改变他们中世纪的社会结构以适应海上航行指挥的需要。葡萄牙的航海者和领航员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是如此的机敏以至于像理查德·霍金斯爵士这样的法官都只有赞美他们；[①] 但他们常常是一些低出身的人，而且在印度皇家船队中他们都在为贵族服务，他们所受的训练是军事的而不是航海的。许多舰长和队长获得了相当丰富的指挥海上航行的经验，但他们并不是专业水手。在《海上悲剧史》（*História trágico-marí tima*）中几乎每次报道都显示了官员们之间意见的对立、航运公司中专业技能（*esprit-de-corps*）的缺乏和危机时刻纪律的严重缺少。

船只失事的发生率随着船只规模的扩大而稳步上升。船只受虏获的发生率取决于政治状况，它也在上升并且更不稳定。所有的原因加在一起所造成【194】的最惨重的损失发生于1620～1623年之间这4年之中，当34艘船只从里斯本或果阿启航时，有8艘失事了，2艘被劫掠了，还有9艘被迫返回港口。准确的数据不得而知；但1550～1650年之间所损失的总数不少于100艘，

① 理查德·霍金斯（Richard Hawkins）：《观察》，由威廉姆逊（J. A. Williamson）编辑（伦敦，1933年），第57～58页。

也许超过 125 艘。16 世纪前半叶，在海难中损失的船只非常接近 1/8，在 1550～1650 年之间的接近 1/5。[1] 16 世纪这一贸易的最细心观察者葡萄牙的编年史家科托（Couto）和荷兰的爱管他人事务者林朔滕（Linschoten）都指出了损失加剧意味着什么。

正像人们所料到的，葡萄牙人在为西印度群岛船队配备水手方面存在困难，他们从能找到水手的地方招募水手——东印度水手（Lascars）、斯堪的纳维亚水手、英国水手和荷兰水手。荷兰不仅有像林朔滕的著作《旅行图》（*Itinerario*），而且它的水手还拥有个人经验，因此通过这些它非常了解葡萄牙在东方的海运线路，荷兰人不仅是香料的销售者，还是欧洲造船资本的提供者。荷兰冒险家群体在 1595 年开始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向东方航行，而且 1602 年以荷兰东印度公司（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为纽带联合起来，通过把印度撇到一边和与印度尼西亚的香料产地建立直接联系，审慎而彻底地背离了葡萄牙的做法。只要有可能就对中间人进行研究是荷兰商业政策的固定原则；而且最初就深谋远虑地指出：宣布其目的是和平贸易的船队应该远离果阿和马六甲。因此，荷兰从很早起就从另外一个入口巽他海峡（the Sunda Strait）进入爪哇海（the Java Sea），它位于季风纬度的南部和东南贸易风带上，由西部或西北部接近的帆船很难进去，但由南部驶来的船在一年中的什么时候都很容易进入。在从好望角驶向巽他海峡时，他们很快会发现在印度洋南部航行的基本原则——在南纬 30 度和 40 度的地方在西风起来以前，或在朝北赶上朝向爪哇或印度的贸易风之前要“向东航行”；这一原则要坚持到航行的最后一些日子。这样的航程有它的危险；它需要适于航海的船。而且在航行表还没被发明，而在通过航位推算和猜测计算出经度之前，船也许已向东航行得太远了。澳大利亚西海岸尽管位于低度数地带，却成为荷兰与印度做生意的商船（Dutch Indiamen）的葬身之地，就像纳塔尔（Natal）是【195】葡萄牙人的葬身之地一样。

向南的航程也提出贸易问题。直接从好望角驶向东印度群岛的船只没有得到当地贸易体系的支持，除非他们出口大量的条金，他们必须提供一些在印度尼西亚市场接受的欧洲商品。荷兰人在自己的欧洲后门有工业城镇，通过运来德国工业品解决了这个问题——钢盔、盔甲、火器、亚麻布、天鹅绒、玻璃，还有一整套被简称为纳龙白格尼亚（*norembergerie*）的精巧

---

[1] 参见奎里诺·达·冯塞卡（H. Quirino da Fonseca）：《缺少海洋的葡萄牙人》（里斯本，1926 年），第 724～732 页，还参见德·法里亚·索萨（M. de Faria e Sousa）：《亚洲的葡萄牙人》，[波尔图（Oporto），1945 年]，第 3 卷，第 525～560 页。

玩具。

在 1598 ~ 1602 年这 5 年时间内，有 51 艘船离开尼德兰驶向东方。除了一支有 9 艘船的船队（它尝试一条经由麦哲伦海峡向西方的航线，然而一系列的不幸使其几乎完全成了一种失败）外，所有这些探险作为航海试验都是成功的，而且大多数作为商业冒险都有一定程度的赢利（这是一个非常赚钱的行当）。1598 ~ 1599 年由雅各·冯·奈克（Jacob van Neck）指挥的船队到达了摩鹿加群岛，装载着香料，而且用 14 个月返回了船籍港——这是一次出色的周转。联合公司（the United Company）在它成立的最初 4 年里共派出大约 50 艘船，都安装有作战的武器，然而有几艘船被敌人损坏或严重损坏，只有两艘是以其他方式损失的。荷兰人与葡萄牙人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越来越漫不经心；但是，他们使用的船只却越来越适合他们的任务，而且比葡萄牙的宽身帆船更有效率、运营起来更经济。荷兰人把他们起用大量中型船只的策略扩大到东方，这一策略曾使他们在欧洲受益不小；随着 17 世纪的进步，荷兰人建造更大的与印度人做生意的帆船（Indiamen），但其规模的扩大很好地保持在高效运营的范围内。根据福格尔（Vogel）的看法，[①] 在 1670 年，大约有 100 艘船只经常性地从事尼德兰与西印度群岛之间的运输，绝大多数都有大约 600 吨——是荷兰人所拥有的商船中最大的，但还比 50 年前缓慢行驶在印度洋航线上（*Carreira da India*）的巨轮（Leviathans）要小得多。

从它成立时起，荷兰公司（the Dutch Company）就比葡萄牙王国政府（the Portuguese Crown）和英吉利公司（the English Company）所掌握的金融资本和船只要多得多；而且在 1619 年，一位有远见的水手简·彼得斯宗·西恩（Jan Pieterszoon Coen）在巴达维亚（Batavia）建立一个军事基地，占据果阿和马六甲的有利位置，这给予荷兰船队一个永远的战略主动权。他和他的后继者都很审慎地利用他们的优势来取消买者的竞争和尽快地形成垄断。他们首先通过用暴力占领葡萄牙工厂的方式寻求从后者那里夺得“集市贸易”，而且通过封锁和占领来中断葡萄牙与印度之间的长途贸易；然后从群岛的最有利可图的贸易中排除其他的商人，无论是欧洲的还是亚洲的；【196】而且最后使香料主产区的较小支配者处于附属地位，为了荷兰人的利益而控制生产和价格。而荷兰舍弃什么，英国就争夺什么。1623 年，在一支英国舰队的帮助下伊朗国王阿拔斯（Shah Abbas）夺取荷兰的主要堡垒之一霍尔

① 前引书，第 319 页。

木兹。它所控制的贸易也停止了，而且那个地方很快成了一个纯粹的村庄。马六甲在遭受许多攻击、反击和 11 年的封锁之后，在 1641 年被荷兰人夺去，而且也同样走向衰败。它所拥有的贸易转向巴达维亚。葡萄牙在锡兰和印度南部的港口被荷兰人夺去并被当做停靠港口。果阿从未被夺去，但是，一支荷兰舰队从 1637～1645 年连续 8 个冬季封锁它，而夏季它又受到季风的自然封锁。果阿的出口贸易在荷兰和英国的控制之下相当大一部分被转到其他港口而且从未恢复。印度尼西亚主要的国内贸易中心亚齐（Atjeh）、望加锡（Macassar）和其他一些地方都遭受了类似的厄运，这些地方的统治者在失败之后同意在宗主国公司的允许之下限制其海上臣民从事米及其他必需品的贸易。欧洲最强有力的竞争者英国商人在 17 世纪 20 年代从他们在爱琴海（the Archipelago）的许多停泊地被驱逐；而且大多数主要的香料生产岛屿——安波那岛[1]（Amboyna）、德那第岛（Ternate）和班达岛（Banda Islands）——都通过彻底占领或取消交易债务抵押品赎回权的方式使它们接受荷兰的直接控制。

在谈到荷兰时，与谈到葡萄牙时一样，不必对“垄断”一词给予过多的解释。荷兰东印度公司通过对生产地区的控制基本垄断了对欧洲的香料，以后是咖啡的贸易，咖啡是在这一世纪末从阿拉伯半岛传入爪哇的。反过来，它还垄断欧洲商品在印度尼西亚的销售。不过，这种长途贸易只是其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印度洋的其他地方和整个东方它都在与中国人、马来人和阿拉伯人——他们都是熟练的海上贸易者——展开贸易竞争，而且也与其他欧洲人竞争。即使在爪哇海，只要这些国内船舶尊重宗主国公司对一些商品的垄断，荷兰还是容忍，甚至鼓励大量国内船舶的存在。在其他地方，与其贸易对手比起来荷兰的商业敏感和海运效率获得了广泛的，尽管不能说是普遍的成功。荷兰商人在波斯南部对葡萄牙人和阿拉伯人是一种补充，他们提供了织物和火器，为欧洲先转运相当多的丝绸和地毯到巴达维亚（Batavia）。通过控制锡兰的港口，他们获得了日康提王国（Kandy Kingdom）对外贸易中的更大份额。他们接管了葡萄牙对中国台湾的贸易，而且在 1639 年以后获得了日本小部分对欧洲人的特许贸易。另一方面，他们对【197】中国海岸的贸易没有多少进展。澳门的葡萄牙人继续与印度、与欧洲和马尼拉做生意，但中国当局不允许珠江（the Canton River）的其他欧洲人做生意。在印度，荷兰不仅与葡萄牙在果阿的贸易残存者共享这一地区的贸易，

---

① 即安汶岛（Ambon）。——译者注

而且还与英国以及后来的法国共享。荷兰从科罗曼德尔海岸（the Coromandel Coast）的普利开特（Pulicat）和其他地方出口布匹到印度尼西亚，但从未达到接近垄断出口的程度。

葡萄牙在印度的真正继承者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正像葡萄牙人在中国所做的那样，英国人发现对付荷兰竞争的最好办法是保护一个强大的王子。他们通过让莫卧儿（the Mughal）皇帝认识到他们在航海中的用途从而获得了苏拉特（Surat）的贸易特权。1643 年，通过与戈尔康达（Golconda）国王达成协议，他们得到了第一块土地马德拉斯（Madras），并在那里设防。孟买（Bombay）是与布拉甘扎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Braganza）的嫁妆一起送来的，而加尔各答（Calcutta）是 1690 年在恒河三角洲（the Ganges delta）的泥浆里建立的。公司从这些港口装上棉布、平纹细布、靛蓝和硝石运到英国，付款——由于在 17 世纪还很少“集市贸易”——主要用现金。到这一世纪末公司开始尝试向中国发展。起初它在班特姆（Bantam）或马来港口购买中国商人的茶叶。它第一批直接从中国装船的货物是 1689 年在厦门（Amoy）；不过，英国公司要在荷兰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并通过从印度出口来为与中国的贸易提供资金之前，还是用了许多年。

带着这些特点，17 世纪早期荷兰的海上入侵和商业企业在印度洋和其相邻水域的贸易体系内进行了一场较大的变革。印度洋北部的绝大多数贸易被舍弃，被转到了南部。红海和波斯湾成为商业上的死水。对这里的，以及东非的港口而言，远东的有价值的产品的供应被中断了，它们基本靠当地的奴隶和海枣贸易维持着。马斯喀特（Muscat）苏丹的劫掠加速了他们的衰落，在葡萄牙人从霍尔木兹和马斯喀特撤离之后，这个国家成了这一海岸主要的海上强国。免遭他们掠夺的惟一一个港口是位于阿巴斯港（Bandar Abbas）的荷兰贸易站。同样马六甲海峡在很大程度上也失去了它以前的重要性，而且一度几乎被欧洲海运业所遗弃。亚洲东南部与欧洲之间的贸易是从巴达维亚到达赤道以南的好望角。1652 年荷兰在好望角建立殖民地就是为了方便这种贸易。即使与印度的贸易走的也是南部航线。到 17 世纪中叶印度洋贸易的航线才固定下来，它们是航行了 200 多年的路线。横帆战胜了三角帆，贸易风战胜了季风。【198】

在 16 世纪，发生在西班牙与通用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国家（Spanish America）之间的横穿大西洋的贸易比由葡萄牙到印度的贸易要使用更多的船只和运送更多的物品——矛盾的是，前一种贸易至多满足几百上千西班牙

殖民者的需要，满足那些梅斯蒂索混血儿（*mestizos*）和讲西班牙语的印第安人的需要，而后一种贸易直接连接西欧与东方的广大人口。但准确地说，由于是一个殖民社会，通用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国家不仅仅是一个高度发展的东方社会，而且它们对欧洲经济也是一种补充。这些殖民者为在美洲的环境里维持他们的西班牙生活方式要从西班牙进口许多物品。为向这些物品付款，他们发展了大牧场、种植和矿业经济，并生产销往欧洲的物品。他们的种植园需要大量的奴隶，因而产生了与西非全新的贸易市场。最后，在 16 世纪中叶，他们偶然发现世界上最富的银矿，这使他们能为还在进口的许多物品付款，并通过提供购买东方产品所需的硬币而繁荣与东方的贸易。

与通用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国家的贸易，按照法律是一种严重的垄断，虽然仅限于——有一些有限的例外——塞维利亚港口，而且参与其中的也仅限于那个城市的商人，并且是自 1543 年被组织进城市贸易法庭（*consulado*）或商业行会中的商人。早期向西印度群岛的航行开始于安达卢西亚港，而安达卢西亚的资金也早被吸引到这一贸易中。安达卢西亚的主要城市塞维利亚是卡斯蒂利亚最发达的港口；实际上也是卡斯蒂利亚惟一重要的港口。塞维利亚已经与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建立繁荣的贸易关系，其中发生在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则是这种贸易的一种自然延伸。横渡大西洋的航海者在最后从加那利群岛（Canaries）启航时，不仅可以装满燃料，而且可以在这里加满足以到达西班牙西部的水；他能够在东北贸易带上航行，能充分利用对他有利的风向。这个重要的，也许还是漫不经心的发现是哥伦布第一次航行的主要成就之一。而且，塞维利亚是最方便装货的港口，这是新世界的殖民者最需要的。16 世纪前半叶，美洲的贸易主要是工具、瓷器这些日常用品，首先是食品、酒、油和小麦粉的大宗贸易，这些是在美洲生活但拥有欧洲口味的人依然需要的。而它们基本上都是安达卢西亚地方出产的。大部分船只也都是地方特有的轻快多桅小帆船，适宜于在沿海地区航行，而且非常小，很少有超过 200 吨的，通常要小得多。按照 1522 年皇家标准在西印度群岛【199】的船只载货容量最小是 80 吨。不过，这种规模的船在适宜的经度和季节能够相当安全地横渡，而在早期，当西印度群岛的货船要到许多小定居点不定期地送货时，这种小规模的货船的优势就表现出来了。在那个时代，塞维利亚形成垄断地位并不困难。其他西班牙港口并没有表现出参与的愿望。到 16 世纪中叶垄断还很稳固而且变化了的环境没能打破它。

16 世纪 40 年代，银的大发现在横穿大西洋的贸易中促发了巨大的变革。西印度群岛的欧洲人口急剧上升，它的购买力更为快速地增强。对安达卢西

亚酒和油的需求还一如既往，但外部货物包括越来越多的更有价值的工业品——衣服、武器、家庭用具、玻璃、纸张、书籍——都不是安达卢西亚的产品，也不一定是西班牙的产品。回程载运的货物除了皮革和糖以外，包括大量而且其数量还在不断增加的条银，另外还有美洲出产的各式各样的奢侈品像胭脂红和烟草，它们都在西班牙传播开来。每年平均从塞维利亚运出的货物从16世纪40年代的不到10 000吨增长到16世纪80年代的超过20 000吨，也许是西班牙海运总量的1/10。最高的年份是1608年，有45 000吨；但这是一个例外。从塞维利亚结关后离开的船只数量每年都有很大变化，但在1550～1610年间每10年的平均值相当稳定地保持在大约60～65艘。不过，这一贸易中船只的规模也在稳步扩大，而正是自我防卫的需要和出口商人的利益在支配着这种扩大。在这方面，西班牙从来没有达到葡萄牙的那种扩大程度，因为塞维利亚河既是一个地理上也是一个法律上的瓶颈，而且圣卢卡（San Lúcar）沙洲对船只进出吃水也是一个限制。人们做出各种各样的立法努力来使船只的吨位降下来，部分就是出于这一原因。官方所允许的最高吨位从来不高于550吨。直到1609年，法定最小吨位并没有提高到200吨，尽管以后也有阶段性的提高。实际上驶往西印度群岛的船只平均吨位在16世纪50年代大约是240吨，在16世纪80年代大约是265吨，世纪之交大约是400吨。[1] 这一贸易所保留的许多小船包括来自加那利群岛的，都被允许驶向西印度群岛，而且可以载运不太赚钱的农产品运送到较小的殖民点。另一方面，16 【200】世纪晚期的船队中所包括的超过600吨的船只数目不断增加，而且在17世纪，超过1 000吨的船只不时地横渡大西洋。

海上巨轮的建造不是大西洋的传统。西班牙大西洋港口的造船木工与那些葡萄牙的一样，尤其擅长轻快多桅帆船的设计——这种船是惟一真正适于航海的伊比利亚（Iberian）类型。面对大型船只的需求他们借助于地中海的模型。既不是商业用船（*naos*），也不是西印度群岛船队中作战的沿海双桅渔船（*galeones*），无论是在哪里建造的——是在安达卢西亚（Andalusia）、是在比斯开（Biscay），或者是在西印度群岛本地——无论是在船体型线图方面，还是从在16世纪前半叶由威尼斯的布勒森（Bressan）家族所开发的相应类型操作的经济性能方面来看，都没有显示出多少进步。它们赶上好天气足以在地中海顺利航行，这些巨大的、不易操纵的、超载的船在大西洋尤其是西印

---

① 厄舍尔（Usher）：《16世纪和17世纪西班牙的船只和航运》，载《经济史的事实与要素》，第206～209页。谢努（H. and P. Chaunu）：《大西洋上的塞维利亚》（巴黎，1655～1666年），第1卷，第146页，第6卷，表13和第149页。参看第218页下面关于船只吨位的注。

度群岛船队所使用的开放港口中航行是很危险的。其中最严重的灾难发生于1563 年——7 艘船在诺姆布勒·德·狄奥斯（Nombre de Dios）搁浅了，15 艘在加的斯（Cadiz）港口失事，5 艘在坎佩切湾（the Gulf of Campeche）失踪；1587 年——6 艘船在圣卢卡沙洲搁浅并破碎了；1590 年——15 艘船在维拉克鲁斯（Vera Cruz）港被"强北风（'norther'）"吹上了浅滩；1591 年——16 艘船在特尔赛拉岛（Terceira）失事；1601 年——14 艘船在维拉克鲁斯港再次被"强北风"吹上了浅滩；1614 年——7 艘船在加图切角（Cape Catoche）失事；在熟悉的港口搁浅的频率对船只的可操纵性质提供了有意义的注脚。确实，并不是所有失踪的船只都很大，也不是所有失踪的船只都是西班牙的；这是由于当西印度群岛贸易中的船主能够规避法律时，他们经常使用外国建造的船只，包括有佛兰德的、荷兰的或葡萄牙的。只不过在西班牙，像在葡萄牙造船业一样规模胜过设计，这一迹象是极为明显的。

当攻击者携带有大炮时，商船规模扩大并不足以解决海上掠夺和掠捕商船的行为。西班牙在 1542 年与法国发生战争期间第一次组织了护航。从 16 世纪 60 年代起，驶往西印度群岛的绝大多数船只都有护航舰。驶往新西班牙的一支船队被认为每年 5 月离开圣卢卡，而通常通过摩那航道（the Mona Passage）进入加勒比水域。一旦进入加勒比海，驶往洪都拉斯（Honduras）和大安的列斯群岛（THE greater Antilles）的船只就分离了；主要船只经过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和古巴的南部，经由尤卡坦（Yucatán）海峡，横穿海湾到达维拉克鲁斯。巴拿马地峡（the Isthmus）船队在 8 月离开圣卢卡，而且展开稍微偏南的航程，经过向风群岛（the Windward Islands）。一些船只进入梅恩河（the Main）的小港口，但大多数船只在诺姆布勒·德·狄奥斯［后来的贝洛港（Puerto Bello）］外海面下锚停泊，在那里它卸下运往秘鲁的货物，装上银子。然后退入设有堡垒和被保护的卡塔赫纳（Cartagena）港。两支船队通常在西印度群岛过冬。巴拿马地峡船队在 1 月【201】开始返航，沿着西北方向前进——通常借着右舷的风轻松自在地顺风行驶——直到它能绕过圣安东尼奥角（Cape San Antonio）而且进入哈瓦那（Havana）。同时墨西哥船队（*flota*）在 2 月要顶着来自维拉克鲁斯的贸易风展开冗长乏味的 3 ~ 4 周的航行，3 月在哈瓦那会合（*rendez-vous*）。哈瓦那是远航船只从墨西哥湾撤出的惟一通道。船队在那里整修和供应储备食物，而且为了在飓风季节到来之前避开热带水域，船队总是在初夏尽可能结队驶向西班牙。不过，推迟和没能会合也是常有的事。船队逆风航行通过佛罗里达（Florida）海峡——冗长而危险的一片水域——而后坚守在北部直到

他们能找到能够横渡大西洋的西风。

每一支船队都由武装的西班牙大帆船护航，根据国际环境和当时的船只情况有 2 ~8 艘不等。这些军舰也运载贸易货物，通常记在总督及其手下的账上；有一次旗舰被报告超载以至于它较低的炮眼都在水里。不过，总的来说，护航制度还是能为其目的服务的。比较有规律的航行保持了一个半世纪，那正是西班牙与海上强国频繁地发生战争的时期。从护航队落下的船只常常受到劫掠，但在那期间只有三次整个船队被拦截从而被击败，一次是被英国人，两次是被荷兰人。对这种制度的主要反对意见集中在它的花费上。护航的费用要通过对运载物品收取额外沉重的税来偿付。护航队造成不可避免的拖延不可能经济地使用船只。海军军官和财政官员的掠夺行为加深了一个近代法国作家所恰当称乎的"欺骗的精神变态"，而且更加大了这种费用。高昂的运输费用、严格的限制、船只的长期缺乏和 16 世纪后期西班牙工业扩张的彻底失败，这些因素共同使西班牙不可能满足通用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国家对商品的不断增长的需求。

因过多限制所导致的通用葡萄牙语的拉丁美洲国家（Portuguese America）的贸易损失不多。在 16 世纪前半叶，在巴西海湾的小殖民点在贸易中只能为印度船队供水和用木薯面包供应奴隶；而后来在许多小港口之间展开的贸易，散布在 2 000 公里的海岸上，贸易者公然反抗这种限制。欧洲急需的糖是这种贸易的物品。在 16 世纪晚期和 17 世纪前半叶，巴西供应欧洲消费糖的大部分，它还进口相当多的工业品，不仅供 50 000 左右的葡萄牙种植园主和殖民者之用，而且也为非法再输出到通用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国家的人所用。物品从巴西的南部港口运到拉普拉塔河（the Río de la Plata）地区，而且被骡子驮着越过图库曼（Tucumán）山地到达波托西（Potosí），甚至到达库斯科（Cuzco）和利马（Lima），那里不必给付西班牙关税或护航费，它们与经由巴拿马地峡（the Isthmus）而来的合法进口货竞争。这些货物主要是织物和金属器具——由于葡萄牙几乎没有工业——来自北欧；另外还有奴隶。 【202】

早在王国（the Crowns）统一之前，奴隶贸易构成西班牙与葡萄牙帝国之间的商业联系。葡萄牙是 16 世纪惟一一个在西非拥有集中管理奴隶的场所和与奴隶买卖统治者保持经常接触的欧洲国家。葡萄牙运送的奴隶不仅供应巴西的种植园；在 1580 年之前是非官方的，在此之后是公开的，它们还是加勒比地区西班牙裔蔗糖种植园主的奴隶、运往新西班牙矿区的奴隶，和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到达波托西矿区的奴隶的供应源。由

于奴隶，还有他们携带易腐烂的货物不能指望等待护航，他们被特许可以直接从里斯本驶向通用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国家；而且他们中许多人更进一步走捷径，在不被许可的情况下直接从几内亚（Guinea）启航。想通过走私其他更密集的物品来逃税是很明显的。因此对申报所运载奴隶的数目的规定是很严格的：差不多每吨货物可以运一个奴隶。这个数字不是出于健康或人道原因的奴隶最大数，而是保证船只装满奴隶，不能再装其他货物的最小数。西班牙王国所做出的限制或协议（*asientos*）无论在检查走私或——由于缺少船只——在保证奴隶的充足供应方面都是不成功的。机会被还在对马德拉群岛（Madeira）和加那利群岛（the Canaries）合法贸易中活跃的外国商人抓住。英国是第一个把他们的大西洋航线延伸到几内亚的海岸国家，他们做奴隶贸易，他们把奴隶，连同织物和其他工业品走私到加勒比的殖民地，返程带回糖、皮革和银子。种植园主欢迎这种贸易，而且地方官员纵容它。在 16 世纪 60 年代所进行的 4 次航行中，约翰·豪金斯爵士（Sir John Hawkins）的那次在其中最早发生，也最为著名。

荷兰介入美洲贸易比英国晚，但其规模要大得多。大约在 1587 年，荷兰商人开始出现在巴西，用织物换糖，而且他们在贸易中所占份额在稳步上升。大约 1595 年，他们开始访问大安的列斯（the Greater Antilles）港。1608 年他们与古巴和伊斯帕尼奥拉群岛（Hispaniola）所做的皮革生意据说需用 20 艘 200 吨的船。西印度群岛所记载的第一个荷兰奴隶是在 1606 年出现于特立尼达岛（Trinidad）。不过，首先大规模地吸引荷兰航运业来到加勒比地区的是盐。大约从 1598 年起，荷兰的盐商由于不能在葡萄牙获得这种基本的防腐剂，开始在委内瑞拉（Venezuela）的库马纳（Cumaná）附近的 [203] 阿拉亚（Araya）环咸水湖一带开发大量的盐田。相当多的船只很快集中在那块荒凉的地方，尽管这时它们还不时遭受西班牙军舰的打击所带来的损失。根据西班牙地方长官的说法，1600～1606 年间每年大约有 120 艘外国船只访问他们省，大多数都是平均载重量大约 300 吨的荷兰运盐船。[1] 这是每年的总吨位，它可以与从塞维利亚到墨西哥和贝洛港（Puerto Bello）的官方联合船队相比。除了运盐的船，还有一些荷兰的和英国的大商人，带着织物和金属器具来到库马纳，带走委内瑞拉的烟草和玛格丽塔（Margarita）珍珠。这些船中大多数都有捕押船只的许可证，而且如果商品所有者拒绝做交易，一旦有

① 斯鲁特（E. Sluiter）：《1594～1609 年荷兰与西班牙在加勒比地区的对抗》，载《拉丁美洲历史评论》，第 28 卷（1948 年），第 179 页。

可能他们就随时准备用武力抢走商品。盐不属于任何人，而且也从来没有人为它付出过什么；尽管横穿大西洋运输如此数量巨大的商品费用一定十分高昂。在1609年，随着停战协定的签署，过去发生在锡土巴尔的贸易恢复了，而由于特殊的原因阿拉亚（Araya）的航运停止了。荷兰的走私者与商人继续在巴西和加勒比地区活动，而且当敌对行动再次出现时，荷兰议会（the States General）准备在美洲水域用强大的海军支持他们的贸易，一如在印度洋上所做的那样。

荷兰的西印度公司（the Dutch West Company）成立于1621年。在此后的27年间它展开了掠夺、征服和竞争贸易的历程。其结果是从塞维利亚到西印度群岛之间的官方航运到1640年萎缩到每年不足10 000吨，而且在17世纪其余的岁月里继续下滑。荷兰商人借助更有效率的船只开始介入，就像新世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船只一样，也像他们在旧世界中那样，而且阿姆斯特丹成为洋苏木、胭脂红、可可豆的市场，成为秘鲁银子和巴西黄金的市场，就像它是东方丝绸和胡椒的市场一样。为了更便于与美洲大陆加勒比沿岸（the Spanish Main）开展他们的贸易，荷兰人1634年占领了库拉索岛（Curazao）以用作他们的基地，它也拥有高品位的盐田。他们至少暂时地征服过巴西最北部海岸的狭长地带，从那里他们出口糖和巴西红，进口从西非工厂和从葡萄牙人那里俘虏的奴隶。

荷兰人在加勒比地区的胜利有着深远的间接结果。荷兰人提供了一层海军屏护，在这个屏护后面，其他北欧人、英国人、法国人和苏格兰人都沿着从纽芬兰到巴巴多斯岛（Barbados）这大西洋海岸狭长地带建立他们的殖民地。这些新殖民地通过进口工业品和生产供出口的主要商品呼唤着新的贸易出现。荷兰人自己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它成了一个海狸毛皮这种奢侈品贸易的中心。【204】毛皮是由易洛魁（Iroquois）的中介从湖区沿着哈得孙河（the Hudson）用独木舟运来的，然后航运到欧洲，主要用于制帽业。新阿姆斯特丹也在北美其他殖民地与加勒比地区之间发展了一种繁荣的转口贸易。毛皮的其他重要来源是法国在圣劳伦斯河（St Lawrence）的殖民地，和在17世纪末由位于哈得孙湾南岸的哈得孙海湾公司（the Hudson' s Bay Company）所建立的英国贸易站。再向南，弗吉尼亚（Virginia）在17世纪20年代成为英国烟草的主要来源地。在小安第列斯群岛（the Lesser Antilles）的英国和法国殖民地，也尝试进行过烟草贸易，但没有取得多大成功。不过大约在17世纪中叶，他们开始生产糖用于出口。荷兰的商人认识到每一个成功的新殖民地都意味着对航运的新需求，他们首先从巴西引进了甘蔗并且教给种

植园主将它栽培和利用。他们提供滚轧机、铜容器和其他用于加工的设备，可以用未来的收成赊欠；不久以后他们就从西非运来奴隶用于田中劳作。几十年内，这个岛上的定居者就从由小农场主构成的挣扎的社团转变为雇用奴隶劳动、出口蔗糖的发达种植园主群体。苏里南（Surinam）、埃塞奎波（Essequibo）和德麦拉拉（Demarara）等殖民地都是荷兰人在巴西受到驱逐之后得到的，这些地区在很大程度上是按同一种方式发展的。新英格兰殖民地基本上从事小规模的混合农作，因此没有多少出产出口欧洲。他们的木材运费太高，他们的鱼不能与荷兰的捕获物竞争［尽管有一些新英格兰鱼销到葡萄牙和马德拉群岛（Madeira），换回一些酒］。不过，随着蔗糖殖民地财富的增加，新英格兰人学会用他们的小船把粮食、牛肉、马匹、桶板和咸鱼运到西印度群岛交易，买回糖酒或用于制作糖酒的糖蜜，还有糖，其中大部分都再被出口到欧洲，他们以这种方式来支付从欧洲进口的工业品。荷兰的圣埃乌斯塔提乌斯（St Eustatius）岛成为这一贸易的极有用货物集散地。

在横跨大西洋和美洲内部的贸易稳步扩大的过程中，荷兰起初是主要的运载者。不过他们的优势并不是没有受到挑战。海上和商业力量突然崛起，使得葡萄牙人不仅成功地重新获得了他们在巴西的领地，而且还赢得了这一贸易的绝大部分，还得到了位于安哥拉（Angola）的必不可少的奴隶贩运站；这是对他们在东方损失的足够补偿。自 1663 年起，英国的船主也重申他们在这一贸易中的权威。确实，皇家非洲公司（the Royal African Company）一直处于财政困难；但这些不是由于荷兰的竞争，而是由这个公司在它的市场内【205】被英国的好事者削价抢生意和欺骗造成的，就像所有大垄断者都被他们的代理商通过削价而抢走生意。奴隶贸易需要一大帮人，以至于在奴隶贸易中，荷兰人在经济人员配备方面的天赋与其他许多贸易相比不太具有优势。在 1660 ~ 1730 年间，英国商船的总数量有很大的增加，与其间及其后有些年份的相对停滞期恰成对比。粗略的估算为：1663 年是 90 000 吨，1688 年是 178 000 吨，1701 年是 261 222 吨。[①] 这种快速的增长部分是由于外国船只的采购带来的；在 17 世纪 80 年代 1/4 ~ 1/3 的英国商船都承认是荷兰建造的。[②] 不过这种增长中也有相当大一部分船舶都是由英国建造的。这种增长主要集中在海岸贸易与对美洲殖民地的贸易上。在 1660 ~ 1690 年间英国在垄断与他们

① 厄舍尔（A. P. Usher）：《1572 ~ 1922 年英国海运业的增长》，载《经济学杂志季刊》，第 13 期（1927 ~ 1928 年），第 467 页。

② 巴波尔（V. Barbour）：《17 世纪荷兰和英国的商船》，载《经济史评论》，第 2 卷（1930 年），第 2 页。

自己的殖民地贸易上获得了十分巨大的成功。剩下的一些船只用在向通用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国家的走私上了。

《贸易法案》（the Acts of Trade）在美洲比在欧洲更为有效。《航海法案》（the Navigation Acts）的有些条款甚至更为殖民地中强大的既得利益者所欢迎，这是由于它们给予殖民地海运和造船的保护。在殖民地港口海军可以自由地夺取荷兰的船只；而且一系列特意计划的侵犯行为都是为法案所支持的。英国人对牙买加的占领为自己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基地，在那里，他们可以在与通用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国家的走私贸易活动中与荷兰展开竞争。反之，在1664年新阿姆斯特丹被并吞，则使荷兰丧失了进行非法贸易的基地。根据1667年的《布莱达协议》（the Treaty of Breda），荷兰接受英国对海岸城堡角（Cape Coast Castle）的占领而且放弃他们长期以来靠武力维持的对奴隶海岸（the Slave Coast）贸易的垄断。

1690年，英国商船的总吨位大约是178 000吨，其中大约有28 000吨从事对美洲的贸易；[①] 不到1/6。而荷兰在对美洲贸易中使用了他们商船的更小部分：根据福格尔[②]的说法大约是总吨位568 000吨中的40 000吨或者1/4强。英国的船只，包括殖民地建造的单桅小帆船，要比荷兰多，但其中大部分都更小一些。它们的平均载重量大约是120吨，而荷兰的平均数是250～400吨；但这种差异随着英国购买荷兰的船只和英国较大型商船建造技术的进步而逐渐消失。不过欧洲对美洲的全部贸易在17世纪末急剧地扩大，以至于在荷兰没有相应减少的前提下英国和法国的海运都有相当的增长。荷兰的绝对优势，尽管在这一贸易中没有在其他大多数海运商业分支部分强，还是持续到18世纪。 【206】

在16世纪和17世纪，大西洋船只无论出于何种正常的商业目的都没能进入太平洋。麦哲伦海峡（Magellan' s Strait）的通道非常缓慢和危险；在逆着盛行的西风的情况下，从船头到船尾没有配备帆的船要从合恩角（Cape Horn）折回是不可能的。秘鲁的发现者从巴拿马（Panama）沿海岸向南航行，而贸易也沿着同样的线路。来自欧洲的商品在诺姆布勒德迪奥斯（Nombre de Dios）或贝洛港从西班牙大帆船上卸下，然后卖给秘鲁商人。它们被驳运

① 厄舍尔，前引书，第467页。比尔（G. L. Beer）：《旧殖民体系》，第1编，第1卷，第43页。

② 《论15世纪、16世纪和17世纪欧洲商船船队的主力》，载《中世纪和近代历史研究和尝试》，第319页。

(the Chagres) 到河源；再从那里被运货骡队驮到巴拿马；再装上由太平洋海岸建造和拥有的船只；然后在卡亚俄（Callao）、秘鲁和智利的其他港口靠岸；这时如果它们是由内陆城镇像库斯科或波托西预定的，重又被驮着越过高而险的山口。正如我们看到的，还有另一条线路，经过布宜诺斯艾利斯，越过拉普拉塔河进入南美洲腹地，然后由运货骡队驮着越过图库曼到达波托西。这种后门贸易只需很少的转船运输，而且是非法的，不付关税；但它从来没有成为供应的主要渠道，这是有充足理由的。官方对拉普拉塔河贸易的禁止是次要原因；更重要的是紧靠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内地贸易区的贫困；其中最重要的是距离的差别。在那些小船和航行缓慢的岁月里，偏航的距离非同小可，陆上运输和转船则没那么要紧，除非是非常大宗的贸易。经由开罗或阿勒颇的东方商品贸易之所以能维持下去，是由于 100 年或更长时间以来，完全由水路直达印度的航线被发现。同样，经由巴拿马的贸易（运来的是工业品，运回的是银子）没有被来自在秘鲁发财后回到西班牙的人（*peruleiros*）的竞争所击垮；而且那些精明的侵入者荷兰人发现在贝洛港走私商品很值。

巴拿马地峡（the Isthmus）贸易得以存在的另一个原因是：它能吸引在两个总督的辖区之间从事海岸贸易的海运服务。墨西哥和秘鲁都出产银子；这是它们在西班牙眼中的主要价值所在。但是秘鲁出产的银子比墨西哥多，【207】而且它在以前的 16 世纪除了仅够它生存需要的并没有生产多少。内战、印第安人的反抗和不利的地形共同阻止了印第安和欧洲生活方式的渗透以及印第安手艺人获得欧洲的工艺。西班牙人在秘鲁的收获（*conquistadores*）是保留了一个西班牙社区，还有许多供他们支配的硬币和对消费品的旺盛需求。另一方面，在墨西哥，西班牙人和印第安社区很快开始混合并融合。墨西哥人是勤劳和丰饶的，但它缺少硬币，而这又是由于当地收集钱币（*quinto*）的效率不高以及有大量的私人汇款寄往西班牙。从 16 世纪 30 年代起，从墨西哥向秘鲁进口西班牙出产的商品以补充越过巴拿马地峡的昂贵供应。相当多的墨西哥产品都是随着这些船只转运出去的：骡子、蔗糖、罐头水果；欧洲风格的物品都是在新西班牙由西班牙或印第安工匠制作的；而且是一种有趣的印第安人的物品分类——磨光的黑曜岩镜子、上漆的葫芦、羽毛编织的花毯，还有类似的东西。返回的物品几乎全是银子，除了在 16 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一时期有来自环卡维利依卡（Huancavelica）矿的成船水银运往墨西哥。这种贸易中的船只，或至少它们的龙骨都是在尼加拉瓜（Nicaragua）太平洋海岸的华图科（Huatulco）和其他小港口建造的，这个地区不仅出产

木材，而且还出产龙舌兰（Cabuya）纤维，它们可以用来制造绳索甚至帆。遗弃的帆和为船队（*flotas*）装配的帆，还有所有必需的铁装置都是从维拉克鲁斯进口的。在16世纪下半叶的瓜亚基尔（Guayaquil）造船业也得以发展起来。它所建造的一些船只大到200吨或250吨，而且多到在一年内可以完成从墨西哥到秘鲁的航行。[①] 尽管是在中美洲建造的，大多数船只都为秘鲁所拥有，那里有资金来建造它们。当西班牙大帆船停泊在贝洛港时，他们就从卡亚俄（Callao）不定期地派遣货船前往巴拿马，在其他时间是前往墨西哥，或者是前往能够搞到赚钱货物的任何地方。

不过，沿海贸易者所获得的最大利润与跨太平洋贸易有关。当葡萄牙的香料贸易陷入困境时，当通向远东的新航线比平常呈现出更大吸引力时，人们策划了1564年对菲律宾的探险。通过菲律宾和墨西哥开拓一个香料贸易的企图在面对东方的葡萄牙即时的戒备反应时就迅速地破产了，但勒盖斯皮（Legazpi）提出另一种丝绸贸易，通过它丝绸可以从常来岛上的中国平底帆船上随时买到。在以后30多年中，葡萄牙人的嫉妒情绪转变为自愿的海上和商业合作行为。西班牙在马尼拉的殖民地成为澳门商人的主要市场，他们 [208] 无视禁令，出售中国丝绸以换取美洲的银子，而且很快就控制了菲律宾商业的相当大一部分。17世纪，当葡萄牙失掉了接近日本的机会时，而且当荷兰关闭了反对他们的马六甲海峡时，发生于马尼拉的贸易有助于把澳门从商业崩溃中解救出来。

跨太平洋贸易在急需块银的社会与块银充足且便宜的社会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由此西班牙人能够在马尼拉买到丝绸，以一种经过一次在两个非常燥热而不卫生的地方之间进行极其漫长而危险的航行后所得到的合理价格购买的。墨西哥最南端的阿卡普尔科（Acapulco）是太平洋沿岸最好的港口；但是，与维拉克鲁斯和贝洛港一样，只有当西班牙大帆船停泊时它才忙碌起来；在一年的其他的日子中，它的人口都迁移到更高和更有益于健康的地方。从阿卡普尔科到马尼拉船舶借助信风大约需要8~10周的航程。像在大西洋中一样，归来的航程是比较危险的。船只离开马尼拉之后，需要大约两个月时间艰难地向东北方向航行，这片水域平常盛行柔和而多变的轻风，但也经常受台风的袭击。这是船只经常失事的最糟糕的一片水域。在北纬30度或40度地带，相当于日本所在的纬度，那里常刮西风，这种风吹动船只

① 博拉（W. W. Borah）：《墨西哥与秘鲁之间的早期殖民贸易与航海》（《伊比利亚的美洲史料》，第38卷，贝克莱，1954年），第67页、第116页以下。

到达加利福尼亚海岸，然后向东南航行至阿卡普尔科。归来的整个航程需要4~7个月，而在更加漫长的航行中饥渴和坏血病会使一艘船成为漂泊的墓地。这种贸易中所采用的船只大多数是在菲律宾用当地的柚木建造的，欧洲人的设计，东方的工匠。它们拥有极高的声誉：是世界上最坚固、最耐用的船。根据1593年的法规，它们的规模被限制在300吨，而块银的数量被限制在一年中能支持进行两次航行，做出这种特别的努力在于把块银的出口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其数量实际上很少超过，而且常常达不到；但是船只经常大大超过300吨。它们的规模由建造时代贸易的需求所决定。

这种贸易最兴旺的年头是16世纪最后10年和17世纪最初10年。在这些年头中，卸在阿卡普尔科港的丝绸被驮运过墨西哥，然后再从维拉克鲁斯出口到西班牙；欧洲对丝绸的需求是如此的旺盛，而来自各个产地的供应又是如此的不足。还有相当数量是由阿卡普尔科用船转运到秘鲁，这是因为太平洋的风系阻止了从菲律宾直接航行到秘鲁。在最旺盛的年头1597年，从阿卡普尔科运送到马尼拉块银的总量——其中大部分来自秘鲁——达到12 000 000 【209】比索（Pesos）；这个数字接近跨大西洋的官方贸易的总价值。[①] 不过这是非常罕见的。在16世纪最后10年，每年出口的块银通常都在3 000 000~5 000 000比索，其中可能有2/3来自秘鲁。这种贸易很快从这些高水平上滑落下去。通过如此漫长和复杂的航线到达欧洲的丝绸，无论是波斯的或是中国的，都不能与由荷兰进口到欧洲的丝绸在数量上竞争，它们进口的数量在不断增长。1640年之后整船从墨西哥运往西班牙的丝绸完全停止了。至于对秘鲁的丝绸贸易，它一直不被西班牙的官员们所喜欢，这既因为它把秘鲁的块银转移到新西班牙，然后再运到渴求硬币的东方，而且也因为中国的商品涌进秘鲁，冲击了西班牙纺织品市场。自1631年起，为了隔离墨西哥，为了控制块银的漏损和至少为西班牙人保留秘鲁市场，总督管辖区之间的贸易被禁止。无疑走私还在进行；但是，经由巴拿马地峡的贸易始终是秘鲁进口的主要渠道。秘鲁的块银生产在17世纪中叶急剧地衰落，而且仅此一项就足以减少对丝绸的购买。跨太平洋的贸易收缩到墨西哥自己就能吸收的程度。

到18世纪末，马尼拉的西班牙大帆船继续它们虽危险却总是有利可图的航行。菲律宾的西班牙人与西班牙的往来完全依赖这条脆弱的交通线，在整个17世纪他们也都坚持与无论是欧洲的还是亚洲的敌人进行斗争。在此期间，

---

① 博拉，前引书，第123页。哈林（C. H. Haring）：《西班牙与西印度群岛之间的贸易和航海》（*剑桥，马萨诸塞，1918年*），第169页。

马尼拉始终是哥伦布和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后继者进行环球航行的中途会聚之地；这种航行是在可能发生恶果的情况下而坚持进行海上航行的胜利。

3.5　运输工具

在16世纪和17世纪期间，欧洲船只的总数量在稳步增长。两个内海沿岸国家的增长率慢一些——地中海的船只也许根本没有增长——大西洋沿岸地区增长更快一些，北海沿岸的国家，尤其是尼德兰联合王国（the United Netherlands），特别在17世纪增长是最快的。荷兰的船只数量在200年内几乎增长了10倍。在1670年荷兰拥有的船只吨位——大约568 000吨——大大超过了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国、苏格兰和德国所有这些国家拥有船只吨位的总和；荷兰在造船方面的优势就更加明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210】17世纪晚期，英国船只的数量已经在增长之中；但即使在17世纪末，英国所拥有的船只数量还只是荷兰所拥有的船只数量的1/3～1/2，而且可能英国所拥有船只中有超过1/4的部分还是由荷兰建造的。

许多环境性因素都可成为这种绝对优势的原因之一，但荷兰船只有两个突出的特点尤其需要在这里提示一下：建造便宜和专业设计。所有当时的观察家都注意到了荷兰造船木工的技巧、他们用材的经济，只要有不太耐用的材料可以采用时，他们还是乐意用比如毛皮代替更为昂贵的栎木。在造船厂省力装置的采用同样是重要的：像绞车、对付圆材的起重机、以风做动力的锯床等等。这些在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中都是很经济的。此外还得加上大规模采购材料、用荷兰船只运输这些材料的低廉运费等优势。在17世纪中叶，在荷兰造船厂建造的成本要比在英国的造船厂少花费40%～50%。[①]

荷兰的船只不只是建造更便宜，而且能更好地服务于船只的特殊目的。在16世纪晚期和整个17世纪，荷兰人都是欧洲商船设计的领先者。其历史是一种稳定的发展而不是革命性的创新。与15世纪将横帆与三角帆完美的结合相比，在船的帆装方面没有产生大的变化，15世纪还生产了伊比利亚式横帆帆船。小船的帆装方面有一些大的革新，荷兰人在适用于远航的船只的帆装革新方面相对保守一些。三桅船，船体前部装上横帆，而后桅主要采用三角

① 巴波尔：《17世纪荷兰和英国的商船》，载《经济史评论》，第2卷（1930年），第249页。

帆，这或许是那个时期的标准样式；到 1640 年，波拿文彻式（bonaventure）后桅已完全绝迹了，而且两桅船也很少见了，至少在北欧是这样的。这是由于大多数商船简单的 5 个或 6 个帆的设计已经能满足需要了。设计有桅栓和桅帽的中桅大约在 1570 年开始引人注目地出现于荷兰人的船上；但在这一时期许多商船都没有前桅中帆。船首三角帆和支索帆——是最能节省人力的装置，采取一些措施它能够利用逆风所带来的一些动力——直到 17 世纪末还没有开始取代陈旧、笨拙的斜杠帆。

在这一时期，最突出的革新是在船体的设计上。荷兰造船厂有组织地致力于解决提高船的运载力、减少它的运营成本的问题——这主要是指它的船[211]员，同时与它的大小也是相关的，在它的航行质量没有过多损失的前提下，他们开发了一种与其他国家常用的船只相比更长但不深的船（与它的横梁成比例）；这种船有着非常完美的断面和几乎平坦的船底；其龙骨的长度与全长比例很大——也就是说，它极大地缩短了船头到船尾的长度；它还有垂直而平阔的船头和非常浑圆的船尾突出部取代了其他地方常有的巨大的艉肋钣。这就是弗卢于特（*fluyt*）船，它开始在 16 世纪最后几十年出现，当 12 年协议（the Twelve Years Truce）给予荷兰人从敦刻尔克人（the Dunkirkers）的打击下得以喘息机会时，这种船便大量地下水了，并由此在 17 世纪的大部分年头里统治了北欧的贸易。它们的长度是其横梁的 4～6 倍。[①] 为了弥补船体过长的不足，从船头到船尾的上层结构缩小到勉强够居住舱室的程度。这种弗卢于特船实际上比漂泊的货舱稍强一些。它们的桅杆被分开竖立于桅座上，以便为主舱留下宽敞的空间。它们的帆缆都很简单，为了节省劳力都是尽可能远地通过绞车或滑车而工作。最为重要的是，为了减少船员和运营成本，它们携带很少或不带枪炮。有了这种类型的船只，在和平时期，荷兰人能够提供比他们的英国竞争者低廉 30%～50% 的运价。没有证据证实工资会比在英国船上低（尽管利息率和保险金通常要低一些）。这种差别主要归因于更为低廉和经济的船只、精明的商业意识与在货物处理、贮藏和运送当中的经验和谨慎。

弗卢于特船代表了商船设计方面的重大进步。不过它确实没在尼德兰之外的地区得到广泛的效仿，因为英国的、法国的、斯堪的纳维亚的、甚至西班牙的商人都发现无论是从荷兰船主那里或从敦刻尔克的捕获品市场购置这

① 哈格多恩（B. Hagedorn）：《19 世纪主要船型的改进》（柏林，1914 年），第 102 页以下。可以与厄舍尔书中的表格作对比：《1571～1922 年英国海运业的成长》，载《经济学杂志季刊》，第 13 卷（1927～1928 年），第 467 页。

种荷兰弗卢于特，都比被授权在他们自己的船厂仿造更廉价、更让人满意。它在船只类型和经济上所显现出来的巨大成功必然影响整个欧洲商船设计的观念。直到引进钢铁船体之前，弗卢于特船的总体比例成了货运船的标准。它显示出：在大多数贸易中 200 ~ 500 吨之间的中型商船要远胜过易损坏的西班牙大帆船和南欧流行的宽身帆船。军舰在规模与动力上都在稳步增长；但大型商船很快就失宠了。从 17 世纪中叶到 19 世纪中叶超过 700 吨的木制商船成了稀罕的事物。【212】

弗卢于特船的采用标志着军舰与那些商船功能的第一次明显的划分。这种功能的专门化并不是在一切贸易中都能实施。例如，在地中海危险的条件下，弗卢于特船就与泰晤士河的驳船一样不合时宜，而且在那里，就如同在印度洋中一样，荷兰人采用大型木制武装船只，就像小军舰一样，当时人称之为平纳塞（pinasse）船载艇——这有点儿让人误解，这是由于这些牢固的船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小货船（pataches）毫无共同之处。[1] 荷兰的平纳塞比一艘弗卢于特船吃水更深，但其横梁与船身的长度之比基本是一样的。正像我们所看到的，正是在更危险但也更有利可图的长途贸易中，诸如英国这样的采用同样船只的对手才向荷兰人提出了最为激烈的竞争。英国人比荷兰人更加保守，他们对武装商船的喜爱维持更长一段时间；但在 17 世纪后半叶，武装商船至少在北欧和大西洋沿岸地区逐渐成为在经济上与时代不合拍的事物。荷兰人清楚地觉察到了差别并且勇敢地接受了它和它的必然结果：在战争期间提供护航舰。

专门化比仅仅在货运与战斗之间做出区分走得更远。弗卢于特船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类型；它的比例随着它被采用的行业的变化而变化。卑尔根木材贸易中的**涡瓦德**（oostvaerder）船比越过波罗的海沙洲去装载粮食的涡瓦德吃水要深 2 ~ 3 英尺。运载木材的船只需要进行特别的改变。17 世纪早期的长圆材通过舵杆装入舱内；但后来成了一种习惯，由于水的密闭性，可以将舵的上端向上直到艉突出部，以使舵柄能完全进入船内。舵杆的形状到那时成了小而垂直的，而不是宽而水平的，而且运木材船船尾的专门装卸杆必须伐掉。捕鲸船也需要做一些特别的改进，尤其是粗短桅杆上的转帆索，它要负荷沉重的滑车，通过这种滑车才可以对鲸的躯体进行处理。在蔗糖贸易中，船只需要有比较高的甲板顶，可以为双层的大桶提供空间，或者可以临时增加甲板以运送奴隶。不过，所有这些专门类型的共同点是简洁、浮力大

---

① 哈格多恩前引书，第 115 页。

而且避免浪费空间；它们商业上的成功主要是由于这些特点。

与船只设计一样，在航海中，16 世纪和 17 世纪也是一个稳步发展而不是革命性创新的时期。必需的仪器、罗盘早在 16 世纪早期就已经吊在常平架上了。【213】而关于磁性变化的知识，16 世纪的探索者已经在逐渐丰富。在 16 世纪测量速度的方法也被发现——以前是靠经验或猜测——通过拖板计程仪、打结的绳子和计时沙漏的方法，因而大大提高了航位推测法的准确性。一艘船在海上的位置通过航位推测法和所观察到的纬度共同确定。由北极星（Pole-Star）的高度或由太阳的高度用磁偏表计算高度的基本方法在 15 世纪已经发现，并在没有变化的情况下继续使用，除了在 16 世纪发明了测量高度的先进仪器：十字标尺之外，还有为了太阳观测而改进的背面标尺。16 世纪晚期数学和天文学知识的巨大进步对实用航海的影响十分缓慢，而且要发现一种观测到真正位置（包括经度）的方法不得不等到精密计时器和 18 世纪六分仪的发明。另一方面，海图的制作在这一时期不断提高。17 世纪后半叶，用于航海目的的老式沿海航行指南已经被投影法制作的海图所取代，它适用于标绘推测和观察的位置，而且用直线显示出纬线和子午线。墨卡托（Mercator）在 1568 年出版了他的平面球体图，是体现"墨卡托投影"的第一张图。1590 年爱德华·怀特（Edward Wright）出于工作目的对投影法做了很大的改进，而且直到大约 1630 年的航海家们还在广泛地使用着他的投影法。正如在 16 世纪里斯本取代了威尼斯一样，在 17 世纪，阿姆斯特丹取代了里斯本成为地图、图表集、航海手册的主要出版中心。不过，17 世纪的船长一般并不是书上航海家。一般说来，航海安全的稳步提高和航海家自信更多来源于对海洋的丰富经验和个人知识而较少来源于科学革新。

在海洋航行与内河航行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区分。许多航线，尤其是在沿海贸易中包括二者，而且甚至远洋船只（尤其是在荷兰），也会从分布在长着庄稼的田野中的河道或运河中驶过从而完成整个航程。关于河运的重大意义前面已经提到了。在荷兰，土地是几百年来由桩、以坝围海所辟的低地、堤坝等建成的，人工河道至少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从某种程度上讲，在佛兰德和意大利北部的一些地区都是如此。船闸——成功建设运河的关键——在 15 世纪末之前就在这些地区广为人知。其他地方连用于灌溉的运河都很少，除了一些明沟，像英国的佛斯渠（the Foss Dyke）自罗马时代以来就或多或少一【214】直在使用着。不过，17 世纪在西欧尤其是法国确实形成了一种挖掘运河的狂潮。连接布里阿雷的卢瓦尔河（the Loire at Briare）与蒙特吉斯的洛英（the Loing at Montargis）的德布里阿雷运河（the Canal de Briare）被苏利（Sully）

在1605年开始挖掘并且在1640年完成——实际上不是被国家，而是被国家许可的一个公司开掘的。从圣欧麦尔（St Omer）到加来（Calais）的运河，是根据柯尔贝尔（Colbert）的命令开凿的，是作为他国内重建项目的一部分。还有很著名的朗格多克运河（Languedoc Canal），前面已经提到了。这个伟大工程是西欧大规模运河开凿的先驱。在148公里内有119个水闸，高于海平面620英尺，而且有6.5英尺深。不过在后来的17世纪被证实要对这运河进行维护就很困难。它的航行总是仅限于较小的船只，而且常常被淤泥阻挡。在普鲁士（Prussia），弗里德里克·威廉运河（the Frederick William Canal）是根据伟大的选帝侯（the Great Elector）的名字命名的，它在1669年开通。在英国，东英吉利（the East Anglian）沼泽的排干要求有一个沟渠系统，它能为驳船所利用，还能使王室的林恩（King's Lynn）港口获得来自8个郡的羊毛和小麦。

内河能为各式各样的地方船只所利用。维特森（Witsen）[①] 为荷兰一国所罗列的就有39种河道或运河的小船。正是由于发明了能在狭窄的运河中调动、能承受近海的重击的小船使荷兰造船厂获得了经验，他们成功地把这种经验运用于深水船只中。弗卢于特船的圆形船尾和平底背离了它的驳船的原型。什么地方都没有在他们驳船和其他小型船只的帆装上更能展示荷兰人的多才多艺和独创性。撑杆主帆在河道驳船中使用至今；平衡四角帆为飘网渔船和捕鱼船的船主普遍赞赏；船首三角帆和桅上主斜杆都在18世纪极为有效地吸收到远洋船只中——这些都是16世纪或17世纪荷兰的发明，首先运用于内河和沿岸的船只上。所有这些都为了同样的目标——在狭窄的水道中获得操纵的灵敏性、在风中有出色表现、尽可能减少船员。

小船的设计技巧实际上并不仅限于荷兰。在地中海贸易被大西洋船只获得之后的很长时间，许多地中海港口都形成了它们的特色而且常常留住一些非常高效的地方船只。这就是马赛的单桅三角帆船（*tartanes*）——它是三角帆船传统与从船头到船尾革新的完美的折衷——还有小船（*navicelli*），它则是阿诺（Arno）的具有优美船体线的河道小船，是迪尤默（Dummer）主张在英国的河道中使用的。[②] 英国人也有他们自己的类型。泰晤士河驳船是 【215】 仿制荷兰的；但塞汶河（Severn）小渔船过去是，而且现在仍是“纯粹英国的”。如此牢固、耐用、非常独特的地方船只在整个欧洲运送大宗货物，而

① 维特森（N. Witsen）：《古代和现在的造船与管理》（阿姆斯特丹，1671年），第165、169~171页。

② 《迪尤默进入地中海的航线》，1685年，王室手稿，第40卷、第142~143页。

且弥补了大型远洋和沿岸船只的工作。

内河有一个严重的不足：住在河边的地主可以随意地阻碍交通，无论是用鱼梁和其他物体障碍，或者是通过强征费用。17 世纪政府努力扫除或减少这些贸易障碍，尤其是鱼梁，但很少获得长久的功效。要开辟一条特殊的水路是如此的昂贵以至于运输——除了是非常沉重或大宗的货物，它们只有通过水路运输才经济——宁愿采用与之平行的陆路作为一种更为低廉的选择。陆路运输更为灵活。除了在城镇，而且是在一些干线上，自罗马时代以来这些干线就或多或少一直维持在适于使用的条件下。如果公路运输发现被糟糕的路况或过分沉重的收费所阻挡，那将会有一条绕过障碍的路被发现，这正是河道或运河交通所不能做到的。因此，陆路与水路交通在这一时期欧洲许多地方都在相互竞争，而且两者都在稳步扩大。运输就是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就像一年中的变换一样，气候状况和费用征收影响到成本。

在这一时期，马具变化不大。马牵引重物的三个最基本的装置——钉掌的蹄铁、坚硬的肩膀上的轭、给马上挽具依次套上四轮马车的方式——都可上溯到 10 世纪或 11 世纪，而且在 16 世纪之前的西欧得到过广泛的使用。另一方面，在二轮与四轮运货马车的设计方面，正像小船与驳船的设计一样，16 世纪和 17 世纪的欧洲人展现出了伟大的创造性。16 世纪末德国第一次做出了三个重要的改进："第五个轮"或前部转向马车；用皮带来悬置车身，弹簧装置的基本形式；还有通过缩短铁轮箍与轮辋的距离来保护车轮。这些装置第一次安装在载客马车上，在 16 世纪晚期开始制造，并为达官贵人所用。亨利四世（Henry IV）被行刺的马车还没有安装这些装置；路易十四（Louis XIV）的豪华马车上安装了这三项先进的装置。17 世纪前半叶，载客马车的数量急剧增加，无论是私人马车——路易十三（Louis XIII）和路易十四都竭力阻止它的使用，但没有获得成功——和公共马车。德许耶斯

[216] (Dechuyes)[1] 在 1647 年列举了法国 43 个城镇的马车状况，其中有马车离开巴黎的正常间隔，一天到一周一次不等。公共马车起源更早。在这一时期使用中的马车的数量在稳步上升，而且在 17 世纪晚期随着铁轮辋和"第五只车轮"从四轮马车扩大两轮马车，它们的效率也得到提高。

这种重量不断增加的包铁车轮的切削和撞击造成现有公路的严重损坏，

---

① 《巴黎指南：名称的含义、上述城市街道和郊区及其周边地带全部地址》出自德许耶斯(Dechuyes)，列昂内斯（Lionnais）（巴黎，1647 年）。

事实确实如此，而这引起了政府的注意，政府觉得有必要建立一个修筑和养护公路的组织，而不是任由交通走出自己的道路或者继续使用坑坑洼洼、破烂不堪的罗马残道。无论如何，只有在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南部的一些地方，这些道路是没有覆盖物并且是适于行车的。在北欧大部分道路长期以来都因为冰冻、杂草丛生或被掩埋而报废。例如，沿着莱茵河左岸的罗马大道匍匐于超过10英尺的美茵茨（Mainz）的河边的烂泥下。中世纪的道路修筑者从来没有遵从罗马的方法：铺设厚实、坚固的水泥粘合石路，它是为行军的人使用而设计，不是为沉重的马车使用而设计的。罗马大道浪费材料和人力，而且特别经不起冰冻。中世纪晚期的道路可塑性更强、更适于轮式车辆行驶。它是通过在沙面路基上铺设铺路砖，或者把大鹅卵石夯进沙子或沃土中而建成。这两种路面尽管都比罗马大道便宜，但修筑和养护还是比较昂贵，而且城外的道路较少这样铺设。在欧洲，第一次建立养护道路国家组织的郑重尝试是由法国路政官（Grand Voyeur de France）苏利（Sully）做出的。这一机构在1626年就被取消了，因此没有做多少事情；但是这一工作由精力旺盛的柯尔贝尔接了过去，他通过艰苦繁重（*corvée*）的劳动成功地给法国大部分主干道铺上了碎石路面——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道路使用年限不长，因为大部分道路没有固有的路基和经得起日晒雨淋的路面。柯尔贝尔免职以后他的道路就没有人管理了，石头时间一长被交通的重压挤压进了泥里。直到18世纪晚期，由碎石筑平，然后用沙子浇注缝隙中，再用水泥填塞而成的较薄而有弹性的路面被一位英国（或者说更是苏格兰的）工程师发现；而且重型压路机能使筑路者获得必需的坚实程度。在整个16世纪和17世纪，正是其类型不断改进的小船和驳船不得不在没有好好受到照管的、以鱼梁设障的、有收费阻碍的航路上定期往返的时候，驮畜和车辆的类型虽不断改进却为未经改善的道路所阻碍，或者被遗漏和常常被不适当修筑的道路所阻碍。欧洲大部分地区道路的糟糕和航路的受阻反映了商业时代政府的软弱无力。它们是这一时期内陆交通的发展落在急剧增长的海路交通后面的主要原因。【217】

关于船只吨位的注解

在16世纪的大多数欧洲国家，如果船舶装载着在这一地区经常运载的标准货物的话，用于计算运费和入港费的单位被认为相当于船只的载重量。最常被认为标准货物的是酒、油、粮食或盐。装

送杂货或干货的船还没有达到它的载重量，它的货舱已经满了；相反，如果是一批铁的话，即使装到它的最大载重量，但它的货舱还是半空的。这样的货物通常是按照随意决定的重量或体积单位收费，并且假设这些货物表示粮食、酒、油或盐这些货物标准单位所占据的空间。在一些港口——比如塞维利亚——当局保存有与最常运输各类货物等价的物品名录。货物按大包、体积或重量计算，这似乎是最方便的。塞维利亚的标准货物是酒，而标准单位两大桶的登记是吨（*tonelada*）。两大桶可以容纳 35～40 立方英尺的液体；它们在货舱中所占据的平均空间——还要加上桶的腹部和船尾所浪费的空间——大约 60 立方英尺；而且加上这些桶，它们重达 2 300 磅左右。在波尔多酒贸易中桶（*tonneau*）是重量单位（或者货舱中的体积），相当于 4 个波尔多大桶（*barriques*）的量，比西班牙两大桶略少一些。海湾的盐业贸易有它自己的单位，大桶（*brouage*），大约相当于 1 吨的 1/6。在波罗的海粮食贸易中常用的重量单位是拉斯特（*last*），理论上是一架大型四轮马车的最大装载量；港口与港口之间是不一样的，但拉斯特通常是在 4 000 磅～4 500磅。不同种粮食的具体重量是相当不同的，而且一艘船船舱中假设等量体积的物品也是不一样的，根据各地认为的标准粮食种类，从大约 120 立方英尺到将近 200 立方英尺。黑麦是最为广泛接受的标准粮食，不仅因为它是北欧最普通的粮食，而且因为它的特殊重量是：一艘船的黑麦载重量被发现通常可以占据货舱的整个空间。粮食的各种拉斯特不可与荷兰的鲱鱼拉斯特混为一谈，它也是各港口各不相同，但最通用的是 12 桶或者 14 桶，大约相当于黑麦平均拉斯特的 5/6。

船只的等级从经验上讲，有时是由装载特殊类型货物的直接经验决定，有时是由几个主要量度的粗略估算决定。定出某种等级的需要并不取决于船主信誓旦旦的宣称，那样的话，早在 16 世纪晚期与 17 世纪早期就会导致形成计算货舱容量的总原则。对最初被认为是对载重量进行直接呈报的单位会由此成为只是大致相当的容量单位。这样一个规则的早期例子发生于 1628 年的英国，皇家船只和皇家所租用的船只都是按龙骨的长度计算，排除虚假的标杆，船板的最宽幅、从船幅到龙骨最上端的高度，两者相乘，然后再用

[218]

100 去除。[1] 其他更细致、更准确的规则都在 17 世纪中被提出来，而且人们试图发现一种计算载重船吨位的方法，因为这种船只的吃水度没法确定。所采用的约数有时是 100，有时是 94 或 98；而且激烈的争论集中在最准确的约数这一问题上。采用计算规则总的效果是减少了船只未必真实的吨位——这是像政府、主要租船者自然需要的——而且，至少在英国船只中，使其装载吨越来越接近 100 立方英尺，它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上普遍接受的价值。类似的变化发生于对西班牙登记吨（*tonelada*）和荷兰拉斯特的计算中。

在这样多各不相同的计算单位和计算方式中，精确的等量很显然是不可能的。一系列建立粗略的比较基础的尝试都已进行。谢努（Chaunu，《大西洋的塞维利亚》第 1 卷，第 125～146 页）证实了西班牙登记吨（*tonelada*）价值在 16 世纪晚期和 17 世纪早期的急剧上涨，而且暗示可以采用现代装载吨来为西印度群岛贸易船只划分等级。范·德里尔（Van Driel，《吨位测量》）描述了北欧测量的复杂性。一次时间上更近的一般性讨论出现于莱恩（Lane）的《吨位：中世纪和现代》中。在前面一章中吨位的表示尽可能采用 100 立方英尺的装载吨。其数据必然只是粗略的。其中大部分历史都还是模糊不清的。总之，关于不同国家、不同时期船只的相对容量的一切陈述都要谨慎地接受，除非知道它真正的量度。【219】

① 多姆（S. P. Dom）第 32 卷，第 119～121 页。

第四章

欧洲经济制度与新世界：特许公司

直到中世纪末期，世界仍分为几个几乎自我封闭的地区，彼此间仅通过十分有限的贸易渠道相联系。的确，正如弗雷泽·罗依格（Fritz Rröig）在一篇出色论文中所论证的那样，可以这样认为：中世纪时世界性经济已经具有初步形态，因为香料贸易和丝绸贸易，北欧海盗的航海和阿拉伯人的探险都已发生，甚至偶尔才出现的四处漫游的旅行者和传教士，都进行了具有不同重要性的对外接触。然而，如果只从重大而明显的方面看，则西欧、近东、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远东，都仍各自遵从着自己特殊的生活方式。

此后，自15世纪末以来，地区间联系趋向增加并变得更为活跃，这缓慢地促进了全世界的单一市场的产生。面临新任务的大西洋沿岸的欧洲人发展和应用了新的经济技术。他们改变了经济组织的构架，创立了新的合作行为方式和新的国家部门，最为重要的是创立了新式商业公司。他们改进了技术，并通过新的资产组织形式和重新采用奴隶制而改变了运用资本的方式。国家更加直接地干预经济事务并且缓慢地创建了近代殖民地。一般认为，他们的方式最初属于**重商主义**，并最终发展成为近代资本主义。

最初的殖民地开拓是以地理大发现的年代为明确标志。但是，历史地看，这种开拓并非绝对创新，西欧公司的那些远赴海外的活动在方法和习惯上受到了更早时候流传下来的启示。尽管它们没有完全采取那些技术，但是，仍无法按年代截然地把新方法与旧方法区分开来。中世纪时意大利在东方的殖民地开拓——即那时的海外世界——以及14世纪、15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尝试，还有15世纪葡萄牙人的尝试，为在美洲和亚洲建立新定居点的人们树立了榜样。【220】

意大利殖民地全部是沿东地中海海岸而建的。自从1098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甚至在攻陷耶路撒冷之前，热那亚人就对安条克（Antioch）1/4地区拥有特权。此后不同城市的商人们组建公司以管理和开发其殖民地。14世纪时，热那亚人为了希俄斯岛（Chios）的管理和贸易而组建了一个合股公司，其股票很快就有了稳定的价格；此后，他们又建立了以塞浦路斯（Cyprus）为对象的合股公司。直到大规模的葡萄牙殖民运动开始时，这两个公司仍然存在。意大利城市共和国把封建习俗移植到其遥远领地的定居点上。这些殖民地从城市——包括庄园、领地、封地以及建立在集体或个人特权之上的整个组织——向外扩展。自16世纪以来，许多不同国家的殖民地往往是按照同样的原则建立的。

农业的发展因为有奴隶制而得到保证，这种奴隶制一直以环地中海沿岸的国内地区作为基础而存在，并扩展到了中东的拉丁王国；像在黎凡特（Levant）那样，作为多年以来某些新地区的支柱产业，制糖业在海外领土上也获得了发展。母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海上交通，特别是西班牙大帆船队，即运宝船队，是按照13世纪威尼斯航海船队的模式组建的。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殖民地通常都或多或少地直接受其宗主国统治；例如，热那亚就建立了卡加里（Gazarie）办事处和罗马尼亚办事处［还有科西嘉（Corsice）办事处］，前者统治它在里海的殖民地，后者则统治它在拜占庭帝国的殖民地。意大利人直接把这些机构和习惯带入了从事殖民地开拓的国家。

因为意大利人在殖民地扩张的过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他们分散于西欧各国，促进了观念变化和货物交换。他们积极参与了15世纪沿非洲海岸的航海，当地理大发现结束以后，意大利人仍然在伊比利亚国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在英国的意大利人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在法国的意大利人维里萨诺（Verrezano），还有他们的许多同胞，都向那里的统治者们提出了航海设想，这些由意大利人所控制的航海被证明是有决定意义

的。此后，在 1555 年，塞巴斯蒂安·卡伯特（Sebastian Cabot）成为英国国土上倡导向莫斯科公国（Muscovy）远航的主要鼓动者之一。就这样，意大利人的方案在世界各地被提交给统治者、投机者和西方世界的冒险家们。【221】

尽管如此，在这场改变了世界面貌及欧洲在世界中的角色的伟大运动中，意大利人仅仅起到了次要作用。由于不断受到威胁，威尼斯仍总在设法保住在东地中海的殖民地。然而，直到 16 世纪，它却仍为这一问题所困扰。在地理大发现时期之前，热那亚就已经失去了它的殖民地，而它的市民却令人瞩目地参与了前往新世界的航海。当然，在 15 世纪和 16 世纪，意大利人仍然是经济上最强大的，它的商人集团分布范围最广。相对于新航线来说，意大利港口的位置并不好。此外，意大利城市共和国虽然城防坚固，却因各自传统不同而四分五裂，因此没有庞大到足以能够建立永久性海外机构的程度。意大利人在欧洲扩张运动中是无能的，这直接说明，由地理大发现及其后果造成了一个平稳演进过程突然中断。当意大利不再被视为主要市场并沦为欧洲的战场时，它的衰落注定要成为欧洲经济均衡局面发生变化的一个证明。

不同的国家是在并不平等的机会下开始其所从事的新事业的。葡萄牙人在此前 3/4 个世纪时，就已经沿非洲海岸进行了多种多样的贸易航海。西班牙人虽是效仿葡萄牙人，但也发展了自己的新机构。这两个国家和其他所有寻求额外的海外领土的国家一样，都既求助于那些未经尝试的方法，也求助于经过长期试验所获得的各种经验。

英国具有组建特许权集团的传统，这种特许权集团是未来公司的雏形。中心市场的商人们已经在一种共同的规章制度下紧密相连，他们都使用由他们的国王在欧洲大陆所建立的国家市场——从 1359 ~ 1558 年通常设在加来（Calais）。冒险商们从 15 世纪中期就已经组建了一个公司，其总部设在尼德兰——位于安特卫普（Antwerp）（但往往有很多例外）。直到 1564 年，冒险商们才获得特许权，那时他们的鼎盛时期已经逝去，然而他们自己却一直存在到 19 世纪。在 16 世纪的进程中，数目众多的公司得以创立。从事殖民地开拓和贸易的英国公司，是按照过去已有的方式，并做出某些调整而形成的。

在稍早于地理大发现的时期，是法国发展了最接近于从事海外贸易的大型公司的模式。【222】作为国王，路易十一做了很多改革，并且始终以他的前任国王们未曾有过的方式致力于经济，正是他开创了这种海外贸易公司。在他统治的期间，他试图建立一个与地中海进行贸易的国营公司，在当时，地中海地区通常是长途贸易地区。他试图给予这个公司特许权以使其具有垄断地位。

在建立了一个法兰西—热那亚公司之后，他接着建立了两家完全属于法国人的同类公司。他亲自为它们提供船只和资金，并保证它们在地中海的港口中拥有一个立足点。但是，法国的商人们却起来反对建立这种垄断权，并挫败了建立这种垄断权的势力。从这一时间起，法国人的活动鲜明地以国家干预和国家授权的垄断作为标志（同时也是以各有关方面的反对作为标志）。

在这些活动中，并没有创造出任何确实符合新世界需要的新东西。但是，就后来那些大企业的商人们和西欧的殖民者们所会采用和发展的方法而言，早期的经验就有所预示。

4.1　扩张的背景

白种人对海外的扩张已经有5个世纪了，但是，这一扩张运动应被分为两个部分。其分界线与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相一致。而工业革命自身却又与大规模的殖民地开拓运动密切相关；它至少部分地是由海外殖民地所提供的产品和市场所引发。另一方面，工业革命和欧洲文化运动同时发生，并与发生在欧洲、同时也向其殖民地（特别是美洲）扩散的政治动荡在时间上是一致的，这种动荡为欧洲人在其所管辖的国家中的原有地位的崩溃铺平了道路。在以近代资本主义的性质作为基础的新生产方式得以采用的同时，殖民地的政治形势也发生了变化。各地区的殖民地都更大程度地成为其宗主国的海外基地，而且经济的发展更加直接地受制于政治上的考虑。

这里我们关注的是扩张运动的第一阶段，即从15世纪末到18世纪初这一阶段，在这一期间有5个国家从事重要的殖民地事业——葡萄牙和西班牙，【223】还有它们之后的英国、荷兰和法国。[①] 前两个国家采用的方式和制度与其他3国不同。特许公司是后3个国家的殖民地开拓所具有的典型而关键的内容。特许公司的组建在制度演变过程中是一个必要的环节，正是由它产生了后来的近代资本主义及其国际关系网；特许公司的垄断为一些国家吞并殖民地并将其并入帝国版图铺平了道路。

在构成第一个阶段的3个世纪中，16世纪有其自身的特色。欧洲的扩张在总体上仍十分缓慢，部分原因在于，对波罗的海地区和莫斯科公国的贸易

① 丹麦、瑞典、库尔兰德、勃兰登堡（Brandenburg）和汉萨（Hanseatic）城镇，甚至皇帝都被期望所蛊惑，开始从事有时令人颇感兴趣但毫无重大成果的行动。

增长起着减缓海外发展的作用。一些其他因素削弱了进取精神，这种精神本来有可能引导商人和冒险家前往新世界；有些国家由于它们在地理大发现初期所取得的成就而提出主权要求；远航印度伴随着风险，这种风险使其只对最敢于冒险的人和最具进取精神的资本家才具有吸引力。

地理大发现的视野规模巨大，这使第一批发现者即伊比利亚诸国[①]感到意外，它们还没有为完成这样一个巨大的任务而装备起来。它们的海外远航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提出的，而且政府很快就确信自己将是最大的受益者。在葡萄牙，发展被置于国家干预下，而这又是以这个国家已形成传统的一整套措施为标志的——它们包括航海船队的组织，领地授予及其管辖权的制度，还有印度事务署。在西班牙，贸易署标志着同样的发展。

其他国家只是在 16 世纪才得以做初次的尝试。早在 1496 年，亨利八世派遣约翰·卡波特从英国前往美洲，这一举动标示着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航海引起人们注意的程度已颇高。在此后的 3/4 个世纪，英国没有再进行其他受官方资助的、去往美洲或亚洲的远航。在法国方面，维里萨诺在 1524 年得到过航海资助，此后直到 1535 年，雅克·卡蒂尔（Jacques Cartier）去往加拿大的航海才再次得到王室资助。从这段时间以后，政府的政策更加具有目的性，这一进步性的变化毫无疑问地反映了公众的看法。假如说，雅克奎斯·卡尔蒂尔和他周围的人曾计划建立永久性海外殖民地，那么，佛朗西斯【224】一世（Francois）出于对西班牙和葡萄牙所赖以制定宏伟政策的财富的嫉妒，早就专心打起香料和贵金属的主意了。对亨利四世（Henry IV）来说，香料和贵金属也是其政策的首要内容。但对于亨利二世、卡特琳·德美第奇（Catherine de Medici）来说，则梦想着向海外殖民。法国人的所作所为，其动机掺杂着政治和经济两种因素。

在伊丽莎白的统治下，英国重要的海上事业得以继续进行。与这种事业相关连的是对以海盗方式掠夺财富的渴求，这种方式在当时已成习惯；与之相关的还有对探险的迫切需要。在那个时代，这两种事情比我们所想像到的更加显得自然和必需。但是，如果说英国政府早就打算建立真正的海外殖民地，其航海设想却多半是出自于民间的市民和商人。

在英国和法国，以及在所有海上国家，海上及海外活动是与劫掠西班牙船队相联系的。是否具有战争或政治斗争的借口都会如此，而且这是许多商业公司的许多次航海的起因和目的。

① 指在葡萄牙—西班牙半岛上的各国。——译者注

当地理大发现已告完成时，所有正在组建管理机构并集中管理权的国家都希望从新世界所拥有的财富中获得利益，并希望获得其中的某些财富，这种财富对它们完成其大规模的民事和军事任务具有前所未有的必要性。欧洲的海外扩张与民族国家的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不过，随着民族国家的发展，许多旧的机构仍得以保存，它们与在海外新创的机构一道发挥作用。

在国家权力崛起之时，地方和城市的权力必然地衰落了；不过，各个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并不相同，所面临的任务也不同。以葡萄牙为例，它自13世纪以来即有统一的法律制度，自14世纪以来即有统一的税收制度，它的经济管理先进而多样。而西班牙却在哥伦布第一次航海那年才攻占格林纳达（Granada）并由此完成统一，然而仍尚未建立公共机构。英国和法国在宪法制度方面优于其他国家。当尼德兰联省在比其他国家晚一个世纪才加入殖民地开拓行列（却立即处于领先地位）时，它自己才刚刚获得独立，而且权力机构仍掌握在城镇和行省手中。至于三级议会则只不过是一个代表们的集会罢了。没有其所代表的权力机关的授权，他们什么也不能决定。联省【225】成为殖民政权，这是根据荷兰州长与三级议会之间的奥尔登巴内费尔特（Oldenbarneveldt）条约确定下来的。联省建立了联合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 Indie Compagnie，或 V. O. I. C），它是由此前所成立的若干公司（the compagniën van verre）合并而成的。当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被联省对欧洲的野心拖入殖民地竞争时，这些国家便着手加强其政府的机构和组织。事实上，对欧洲各国而言，海外扩张都伴随有对其内部机构及政府进行加强和重组的运动发生。

城市经济的影响到此时已衰落多年，它见证了西班牙港口对国王给予塞维利亚（Seville）特权的抗议。“外港（outport）”［即约克（York），赫尔（Hull）、纽卡斯尔（Newcastale）、埃克塞特（Exeter）、南安普顿（Southampton）和普利斯托（Briston）］对伦敦习惯性地产生着反对情绪，东印度公司多年都使用特别的伦敦标志，以及与东印度公司竞争的普利茅斯（Plymouth）公司和纽芬兰（Newfoundland）公司的成立，这些都显示出地方势力在英国仍长期起作用。同样，在法国，海峡沿岸和大西洋沿岸的港口经常反对国王所授出的特权，并时有成功，特别是反对内陆城市［如里昂（Lyons）］在公司里拥有独立议事会的重大特权。作为对这种城市影响力的直接继承，荷兰东印度公司内部的独立议事会仍保持着它们的地方传统。

尽管王室和中央政府的权力在增长，封建主义却仍然主宰着人们的心灵和习惯。自从英王亨利七世授予约翰·卡波特特许权，再到路易十四对其统

治期间建立的若干公司授予特许权，在这段时间内，所有国家都面对着通常的领主及其部属之间的关系。16 世纪，自 1533 年以来，葡萄牙国王授予了巴西总督世袭总督权——像他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就已对马德拉（Madeira）和亚速（Azores）所做的那样。在巴西，有两个地区繁荣起来，即伯南布哥（Pernambuco）和圣维森特（São Vicente）。

特许公司承认政府所拥有的宗主权；它们尽自己作为部属的义务，甚至到了 18 世纪，它们仍然按照传统方式分封采邑。法国在加拿大的领地很大程度上是按照刚刚时兴起来的封建庄园的体制来进行组织的。甚至在 18 世纪，路易丝安那公司仍根据国王的批准建立公爵领地、侯爵领地、伯爵领地和男爵领地。英国人在其若干美洲殖民地同样这样做。瓦尔特·罗利赫（Walter Raleigh）在弗吉尼亚（Virginia）建立采邑，南、北卡来罗纳州（Carolinas）也是封建地区。荷兰公司是最为典型地展示这种趋势的范例。新教徒居民在 17 世纪起来反抗西班牙国王，然后在其美洲殖民地建立了一个封建政权。由公司树立的大庄园主必须宣誓效忠，但被允许免受司法审判。英国人和荷兰人有时在这种封建制度中增加一种其自身具有牢固传统的大学组织和市政制度。

【226】

在这个诸侯们仍然能够有效地代表其国家的时候，到处都可以看到各小国决心从新世界的财富中捞到好处。葡萄牙的马诺尔（Manoel）和简三世（Jean III）需要做的只是对 15 世纪的活动加以发展和扩大；简三世曾自己宣称他是真正的印度香料商人。卡斯蒂里亚（Castile）的伊莎贝拉（Isabel-la）为哥伦布的头两次航海拿出了自己 7/8 的资金，她把国家岁入按同样份额据为己有。英法两个王朝则紧紧控制着其整个殖民帝国的经济发展。英国的亨利七世早在 1496 年就对约翰·卡伯特的远征加以赞助，伊丽莎白不仅用自己的款项资助了德雷克（Drake）的海盗式远征，而且也资助了非洲公司的组建（在 1588 年），该公司赢利的 1/3 归她所有。詹姆斯一世（James I）和查理一世（Charles I）分别在 1624 年和 1628 年曾徒劳地试图从东印度公司的赢利中分一杯羹。查理一世曾期望他所建立的与东印度公司相竞争的公司对自己的资助支付报酬。在法国，弗朗西斯一世（Francois I）对来自他所资助的美洲航海的香料和贵金属所产生的利益寄予厚望。但是，在亨利二世时期，科利尼和卡特琳更多考虑的是获取新的领土。亨利四世自己与某些荷兰人一起筹划组建了一个东印度公司，他还给一些公司授予了采矿特许权。而谈到黎塞留（Richelieu）公爵，我们可以说，在旧制度时期，他是惟一一个似乎理解殖民地重要意义的法国政治家。他组织并资助的一些公司

的问世，这具有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意义——如莫尔比昂公司及其后以加拿大为对象的森特·阿索斯公司，以安得列斯群岛（Antilles）为对象的美洲群岛公司，还有东方公司。在黎塞留之后，柯尔贝尔（Colbert）是大约10个特许公司的真正的创立者，而路易十四在很多情况下用其权威予以支持。特别是柯尔贝尔，1664年建立了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此后又建立了塞内加尔公司、阿卡迪公司、佛得角公司和中国公司，其中大部分在他当政期间或稍晚时经历了重大改变。【227】

但是，在3个最主要的殖民国家中，以及在18世纪任何效仿它们的国家中，没有人曾经梦想建立一个殖民帝国。扩张运动的所有领导者，无论政府还是私人，从根本上说，其首要的需求，是通过贵金属和贸易获取财富。荷兰作为最后加入到主要国家和殖民地开拓国行列中的国家，是第一个效仿伊比利亚诸政权的。荷兰人通过间接手段，利用与当地王公的协定和结盟，而获得了一席之地；只是到了1610年之后，在其第二任总督让·皮特森·科恩（Jan Pieterszoon Coen）执政时，他们才宣称拥有海外领地。法国人16世纪在加拿大、巴西、佛罗里达和圭亚那经历了错误的尝试，只有到了1610年以后才再次开始建立永久性定居点；地点是加拿大、圭亚那，1630年后在安得列斯，其后在马达加斯加，最后在印度。英国人在16世纪末在北美洲的尝试无利可言，只是到17世纪初，他们才在那里站稳脚跟，而在印度立足则是1640年以后的事。

因此，在16世纪末，仍然只有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是占有重要海外领土的国家。葡萄牙人在中部非洲步步深入，而且进入了巴西，在巴伊亚（Bahia）设立总督；他们沿着全世界的海岸分散地建起基地，从摩洛哥到澳门，特别是出现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他们位于印度洋的所有殖民地都由一个遥远的、设在果阿（Goa）的总督统治。西班牙人统治着除巴西（巴西是葡萄牙人的广阔领地）之外的几乎全部南美洲，他们还在墨西哥和利马（Lima）设立了两个总督；同时他们还掌管着菲律宾。英国人和法国人则几乎没作任何建立殖民地的尝试；自16世纪开始以来，一些英国人占据了弗吉尼亚大陆的一些地方，伊丽莎白在1597年授予他们一个特许权。法国人经过几次毫无结果的努力之后，没能保住他们在巴西的基地和在南美洲北岸及佛罗里达的基地，但是在加拿大，他们则坚持不懈地努力着。

此外，在创设制度以规定宗主国与海外领土的关系方面，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也是独一无二的。主要殖民国家所采用的不同方式，可以从它们的活动所处的时代背景，并从不同国家的政治史及与之同步的经济组织的发展方【228】

面得到解释。伊比利亚诸国创立了具有国家特征的机构，它直接从属于国家；其他国家采用半国家性的公司组织，从而使私人市民得到更多的主动权。

4.2 国家制度

自 15 世纪中期以来，葡萄牙王室已经开始对非洲海岸的贸易授予垄断权，即对某些地区和某些商品，以各种名义授予私人的垄断权。此后，在财政署（Vedores da Fazenda）的管理下，首先是休达商行（Casa de Ceuta），接着是几内亚商行（Casa de Guinea），然后是米那商行（Casa de Mina），都在里斯本（Lisbun）依次建立起来。维多斯·达·法森达作为官员而控制着葡萄牙的全部经济生活，同时也控制着一般的国民生活。后两个商行不久便合并为一个机构，控制着非洲海岸的全部贸易。当与印度的契约达成以后，国王便创立了一个印度商行，或称 da India。而印度，在 1517 年建立了一个财政部，并很快紧随其后建成一套国家体制，用以管理工厂和官方仓库。

在地理大发现之后的数年间，任何商人只要按照利润支付关税，就都可以自由地运送商品去西印度或从那里带回货物。但是，自 1450 年以后，流通规定做出调整，在 1506 年，国家保持着对贵金属和香料的垄断，特别是胡椒、丁香、豆蔻和麝香。货船必须由舰队保护，舰队由王室船只或由商人的船只组成，国家强制商人们接受这一制度，而且所有远航无论往返都由商行进行控制。进口须按不同税率缴纳关税；但是，五一税，即在早期由航海家亨利所征收的一种 20% 的税，成为了统一的税率。这一税率后来在各个国家成为标准。

不久，由一个单一的管理者（the *feitor*）在一个机构内控制两个不同的商行，一个是印度商行，另一个是米纳和几内亚商行；他下面设有 3 个财政官员，其中之一负责控制香料，另一个负责出卖香料之后采购货物，第三个负责米纳和几内亚商行。还设有 5 个秘书——*escrivães*——3 个负责印度商行，2 个负责米纳和几内亚商行。

商行本身设在王宫附近，从而使葡萄牙国王和政府始终能够看到那些为【229】其提供岁入的帆船，并可以轻易了解其规模。造船厂设立在商行旁边。此处有数百名工匠从事其工作，总监（the *Provedor*）要在那里组织商行所派遣船队的装备，检查舵手、副舵手、船长，还有大副和船员，这些人是他根据管理者的提名而推举的，并在此为舵手提供其赖以航海的航线图。

这些人员的数量和划分不久受到调整。总监被置于管理者之上；财务人员减少到两个，而秘书增加到了6个，秘书与一个称重员和一个账簿管理员共同掌管一个有60个雇员的小部门，其中包括一名随船教士。事实上，商行愈来愈成为一个控制全部葡萄牙殖民地贸易的组织。然而官方的规定一直允许船上的官员和船员，以及殖民地官员和长官为其私人利益而在王室船只上搭载商品，其价值有时相当于正常运货量的价值。

在西班牙占领葡萄牙期间的1591年，菲利普二世（Philip II）建立了一个财政委员会，其权力的范围涵盖整个葡萄牙王国及其海外殖民地；在1604年，他又设立了一个特殊的机构即印度委员会，以处理殖民地事务。它分为两个部分，其一负责巴西和非洲，另一部分负责印度洋。印度委员会与财政委员会分享整个大西洋地区的岁入和对殖民地贸易的控制，这导致了许多争端和弊病。但是，受到政府对海外殖民地控制最严重的干涉的，是设在马德里（Madrid）的葡萄牙事务院，它所遭受的干涉显得持久而又始终十分沉重。

1640年后葡萄牙重获独立，其真正的机构并未发生改变。印度委员会变成皇家委员会，它管理整个海外殖民地（在摩洛哥、马德拉和亚速的港口除外）。但是船队的组织和对印度的王室垄断权被授予了财政委员会。对巴西的垄断权则被授予给一个特别成立的机构，或是授予给享有特权的公司。然而这些机构通常都缺少权威，而殖民地的长官和地方官员几乎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控制贸易和经济的。葡萄牙人的国家似乎越来越没有能力维持其垄断。1640年以后，葡萄牙国王受到荷兰东印度公司（它在当时激发着人们的想像力）成功的诱惑，在17世纪与18世纪的时间里，建立了隶属于前文所提到的两个商行的一些公司。这些公司只取得了无足轻重的成功，到【230】18世纪末，葡萄牙和它的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几乎是自由的。

西班牙未能从15世纪葡萄牙的经验中获得益处，但却在模仿着它的邻国的方法。地理大发现把它带入新的使命，同时，这种使命也伴随着新的权利和责任。西班牙卷入到国际外交中并在欧洲赢得优势，这使得它愈加需要控制自己的行为。西班牙政府对贸易活动的控制显得迟疑不决。外国人一直被禁止在西班牙进行贸易，而只被允许通过西班牙人作中介来从事贸易。有一段时间，卡斯蒂里亚人自由地向美洲移民。但政府在私人贸易商的船只上为自己保留了1/10的吨位，并在"印度地区"设立了阿德安那（Aduana）商行；自1501年以后，西班牙政府开始约束贸易。它为自己保留了有可能在西印度发现的贵金属的1/5，它还把贸易特许权给予塞维利亚，这是卡斯蒂里亚最大的城市，而且恰好位于它的中心。

为了组织贸易，西班牙政府创立了皇家法庭及贸易署（the Real Audienciay Casa de Contratacíón）。它的管理者包括一个财政员、一个控制员兼秘书和一个“经销人（factor）”，该经销人的特殊职责就是控制货物的运输（第一个担任此职的是一个热那亚人，是他规划了贸易署的蓝图）。这一机构被打算用来同时作为法院、贸易管理机关和当时所必需的水文研究院。贸易商行记载着出口的商品和自殖民地运回的商品，以及许许多多对西班牙海外殖民地贸易具有影响的细节问题。该商行很快就开始组建护航队，而且自 1526 年后，组建护航队成为强制性措施。公司为每条船选择船长和船员，安排船队的构成，规定航行的时间和线路。一个同样的机构在伊斯帕尼奥拉（Hispaniola）岛建立；一个由王室经销商组成的小组对所有贸易拥有完全控制权。他们为了与塞维利亚保持正常联系而控制了全部西班牙殖民地，并且通过国王的赠与垄断了贸易；事实上，这些经办人的机关不过是海关机构罢了。在 1510 年，通过对这些机关的监察，通过对货物的登记，以及对商业行为和组织之间的协调，该商行在此后两个世纪中的特征得以确定。1524 年创立的一个委员会通过给予它受理上诉权而使该组织得以完善。

[231] 王室垄断在 1512 年变得更加灵活，但却仍然保存下来，它的规定在 1534 年、1536 年和 1543 年分别受到修订。稍后，该商行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变为组建护航舰队（the *flotas*），而且，这种任务愈来愈转变为组织对海盗和敌人的防御。塞维利亚很快发现自己的垄断地位受到加的斯（Cadiz）的挑战，加的斯位置更适于贸易但更易遭受海上攻击。塞维利亚被迫与之分享对商业的控制，不过在加的斯建立的机构一直隶属于在塞维利亚的商行。卡斯蒂里亚港口的垄断地位同样受到其他港口的挑战，这些港口有其传统的制海权和约束其商人的贸易活动的权力；但是，它们却从未能分享到一点点对殖民地贸易的好处。

为把所有海外殖民地统一到一个组织中，该商行付出很大努力，其目的包括财政方面，而且也是为了获得贵金属、防御及组织护航。自 1542 年以来，该商行直接从属于最高皇家印度诸地委员会（Consejo Real y Supremo de las Indias），这是 1542 年就建立的实际上负责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委员会，而且它实际上还肩负着海外殖民地政府的职能。印度诸地委员会（The Consejo de las Indias）自身成了一个完全的部，它作为西班牙经济的一个核心因素而开始在西班牙政府机构中占有重要位置。

商行的重要作用迫使它改变其功能和特征。自 17 世纪下半叶以来，它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官僚机构，它的职位开始被一些不熟悉经济事务的显赫人

物所占据，在17世纪上半叶，即奥利瓦雷斯（Olivares）当政期间，该商行的贵族特征愈加明显。当其管理已经衰落之际，它的人事安排、它的国家控制和寡头政治的趋势，促使其内部形成了消极和无所事事的风气，这正是西班牙帝国衰落的标志。

自从13世纪末，几个西班牙港口和一些内地城市如布尔戈斯（Burgos），成立了一个会所（称作 a Consulatus maris or Consolat do mar，以区别于市政府），它既是法庭，也是商业公司。从1525年以来，塞维利亚与西印度进行贸易的商人要求为他们而成立一个会所。1543年，印度货物贸易会所（the Universidad de los Cargadores a las Indias）［区别于用来组织城镇货主的商务会所（the Universidad de marcantes）］得以成立。印度货物贸易会所（the Universidad de los Cargadores a las Indias）的裁决机关，即其会所法庭，把它的名称应用于整个机构。类似的会所，和通常类似的会所组织（*universidades*），16世纪末在墨西哥建立起来。17世纪初在利马，18世纪在五六个主要港口（甚至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也建立了这类委员会。这些会所的作用有时相当重要，特别是在墨西哥。塞维利亚的会所同时还在司法方面帮助该市的商行。它的组成包括一个行政长官，两个由其前任挑选的领事，一个贸易法官，还有30个通过抽签选出的商人。它在1556年正式开始发挥作用。会所是商人和政府之间的中介，它对于商行理清全部实际事务的细节（在一个商行官员的指导下）是一种经常性的帮助。它的位置就设在商行旁边。【232】

从一种严格的经济观点看，这种会所属于管理公司（Regulated Company）的范围；它用一部分国家税收作为投资，与特许公司有某些共同性，但是它的完全从属性质使其在旧制度的政治和经济组织中占有独特的位置。它的独特性突出了伊比利亚国家处理殖民地事务的机构所共同具有的一个方面内容。

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政权管辖是最早建立起来的，在整个16世纪期间它们是仅有的殖民地政权管辖。它们始终独具特色，并与其他国家后来所建立的政制相区别。商行是国家部门和行政机关的组成部分，行政机关把它们完全彻底地结合在一些日益协调一致的组织机构中；它们直接控制着从本国对殖民地的贸易，它们没有把任何部分的权力授予他人。此外，国家为自己保留了部分贸易；在本国和在殖民地，国家都认真地保留了贵金属的贸易，在葡萄牙还保留了标准的商业垄断。贸易事务对国家的严格隶属关系，这使这些政治管理具有一种很强的重商主义特征。而商行对贸易活动的参与丝毫没

有显示出生机勃勃的演进或进步。从为海外发展提供资本这一点上看，这两个商行所使用的资金仅仅是国家通过征税或是通过并非自愿的认捐而获得的。不过它并不进行永久性的投资，并且不要求必须获利。因此，商行对殖民地的形成或生产者集团的形成影响甚微。另一方面，它们卓越的组织才能，也许并不完美，却使得第一次进行全球范围扩张的努力成为可能。

就我们上面所涉及的时候而言，从其总体的发展情况上看，商行的行为表现出一些矛盾的特征。它们把海外生产的赢利直接交给国家支配。但是，【233】它们过多的规定和控制，无力阻止很多权力滥用，而且对母国的发展造成阻碍，对殖民地发展的延缓性影响则更甚。它们在面对其巨大任务时那几乎不可避免的无能为力对其作用妨碍甚深。16 世纪的海盗活动自然而然地导致了广泛的走私贸易，从而削弱了人们所渴望的有规则贸易，而且那些或多或少已得到公开承认的税收逃避，使政府试图强加于母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封闭的贸易体制产生了很大裂痕。

17 世纪开始，标志着欧洲扩张发生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法国人仍然处于派遣探险队的阶段和军事占领的阶段，只是偶尔才试图建立定居点和进行殖民活动。而英国人当时已建立了几个有贸易特权的公司，但却没有扩大其对新世界的要求。但是，几年之后，新的效仿西班牙和葡萄牙国家机制的机构便建立起来。特许公司通常是私人建立的，但偶尔也是国家授意建立的，它们开始从事贸易项目和殖民地开拓，这些活动直接地来自早些时候的公司，只不过发展了一些新的形式。

英国在 1600 年建立了第一个特许公司即东印度公司，它是由一些要求王室授予他们贸易垄断权的商人们创立的。联合东印度公司（the V. O. I. C.）1602 年在荷兰建立，它是由大约 10 个在它之前成立的公司合并而成的。它的起源完全归功于商业企业。但是，它的活动区域位于西班牙—葡萄牙帝国的心脏地带，而成立之时联省正在与菲力普二世进行战争。因此，出于同等程度的政治原因和经济原因，当局强加给荷兰公司一种牢固的制度，然后相应地授予其特许权。1621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因荷兰西印度公司的成立而得到加强，后者对在巴西进行的战争起着重要作用，并与政府保持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几乎从一开始，荷兰东印度公司便引起人们的嫉妒和羡慕；它的财富，以及它不久即赢得的权势，使它在整个 17 世纪的过程中具有一种不可匹敌的声望。

荷兰人和英国人的榜样重新唤醒了法国人的野心。历经 17 世纪的后3/4的时期，法国民间有许多创举，它也拥有许多分散的投机商业。然而在法

国，对组建大规模公司的迫切需要明显地是政府性的。东印度公司的组建，是亨利四世个人所为，他还参与成立了其他几个公司，同时，他还授出在加拿大开拓殖民地的特权。亨利四世总体上没有取得成功，而且他或许仍然专 【234】注于寻找香料和贵金属；或许，在英国人和荷兰人做出榜样之后，他也致力于寻求一般的商业利益；很显然，他被同等程度的政治和经济动机所驱使。此后，黎塞留和柯尔贝尔把他们的殖民地事业合并到一个不仅仅以征服领土为目的的政治计划中。

对所有这些国家而言，一种相似的运动正在不断地改变着其海外定居点的特征。经济动机对殖民地活动的开始进行有着巨大的重要性，而且，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殖民地的产品被要求与宗主国的产品相适应并作为其补充，同时国家把垄断权的经营结合到独占贸易（l' exclusif）的国家体制中。从政治的观点看，欧洲国家所经历的变迁对其海外领土造成了影响，即使其作用降低为本国人的侨居地。但是，同样，这一过程是不能一概而论的。例如，路易十四统治期间的战争，就波及到了殖民地。不过，在西班牙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战争期间，3 个作为竞争对手的东印度公司则设法在争夺者之间保持了某种中立。

在 17 世纪末，欧洲国家向其他大陆的扩张开始产生出更为重要和结合得更为紧密的组织。如果说葡萄牙在亚洲的领地略有缩减，如失去霍尔姆兹（Ormuz）和马六甲（Malacca），那么它在美洲大陆的领土却得到扩张；在非洲，它则巩固和扩大了对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控制。在安得列斯、西班牙仅仅控制住了几个大的岛屿，不过它保住了美洲的辽阔领地和对菲律宾的拥有权。英国扩展了它在北美洲大西洋沿岸的殖民地，在哈德逊湾（Hudson）站住了脚，还占据了安得列斯群岛的几个岛。17 世纪结束期间，是一个投机思想和带有资本主义特征的企业颇为活跃的时期，英国的殖民地已经被认为是英国财富的一个“主要部分”。荷兰人在好望角定居下来，并且在从波斯湾到新加坡的地区获得了一连串的保护领地。他们或多或少地统治着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地区。法国人在加拿大牢牢地定居下来，沿密西西比河推进到远至路易斯安那，此外，他们还占有了安得列斯的部分岛屿。法国人在非洲，将其权威扩展到塞内加尔（Senegal）及其周边国家，在亚洲，他们则已经开始尝试一种进行干预和与印度国王结盟的政策，而且他们已经开始建立一个注定很快就会夭折的帝国。几个其他北欧国家在非洲、美洲和亚洲开 【235】始了一种缺少计划的殖民地拓展活动。①

---

① 参见第 6 页注释 1。

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不论是行政管理的方式还是经济发展的方式都没有发生改变。这些方式本质上是实用性的和从经验出发的，对葡萄牙人来说尤其如此。对这些方法无法加以归类，它们从一个殖民地到另一个殖民地各不相同，从一届政权和长官到另一届政权和长官也各不相同。但是，从17 世纪开始，在里斯本，海外领地（the terrae ultra marinas）像阿尔加维（Algarve）一样，被认为是同一王国的成员，并拥有像阿连特茹省（Alentejo）、安特多尔省（Antre Douro）和米尼奥省（Minho）一样的地位。但是，在几乎所有其他欧洲国家的殖民地，政治机构（就当时其存在而言），尤其是经济发展，都控制在特许公司的手中，尽管这些公司的组织仍然处于试验阶段。在 1688 年的革命以后，由于公司的发展在各种经济活动中都蓬勃兴旺，英国从事贸易和殖民地开拓活动的公司数量大大增加。其增加的数量与1719～1720年南海泡沫（the South Sea Bubble）时期不相上下。1717 年到1720 年，在法国，一个与此类似但较为和缓的运动发展起来了，它与劳（Law）及其所推行的“制度”有联系。欧洲国家的战争更多地延伸到殖民地，不过，无论是战争初期还是末期，在欧洲和其他大陆发生的战争在时间上并不一致。在此期间，英国大规模地扩展了它在美洲和亚洲的版图，而法国人则失去了加拿大和印度。一般意义上，在一种更为严格的“独占贸易”政策下，宗主国对其殖民地的约束更加严密。早在 1719 年，一个英国作家这样写道：“我把这个王国及其全部殖民地看作是一个巨大的躯体。”殖民地成为帝国的附属部分，其范围被推进到过于遥远的地方，从 17 世纪中期以后，就受到攻击。这些特许公司被过于巨大而重要的任务所压倒，它们自身越来越依赖于宗主国。

欧洲国家当时的人口结构与 19 世纪有很大不同。在葡萄牙，人口数量很少（1517 年是 140 万），这对它所面临的艰巨任务来说，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条件。[236] 在西班牙，16 世纪中叶规模可观的向外移民明显地降低了该国的生产能力。荷兰由于人口很少，因而没有采取任何可能鼓励向外移民的措施。在法国，向外移民主要来自诺曼底（Normandy）、布列塔尼（Brittany）、波尔图（Poitou）和圣通日（Saintonge），甚至柯尔贝尔促进向外移民的努力也收效甚微。按照人口比例计算，英国移民数量最多，移民的去向是北美。没有任何地方因为人口过多而必须移民。在各个地方，甚至在几乎无人居住的岛屿，欧洲人定居点的范围都是非常有限的。

因此，由于推动移民的力量十分微弱，移民对当时的总体发展只起着相对来说很小的作用。欧洲在根本上仍然是一个农业地区，从某种观点看，那

些开辟新航海线路的人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只是一种边缘性的活动，而并非欧洲经济的核心因素。在各个不同的国家，对殖民地经济具有任何强烈兴趣的人数量很少，也许葡萄牙人除外，殖民地的生产被视为是隶属于宗主国的。整个西欧的兴趣被寻找贵金属所激发，而且外来的产品如糖和棉花使这种兴趣得以维系。新世界的经济发展加速了我们的工业文明的形成，促进了我们的经济的改变，使它从第一个阶段发展到第二个阶段；但是，直到18世纪末，这一运动的发展仍十分缓慢。

这种缓慢主要归因于交通工具方面。航海仍然是一种非常困难的技艺；先是1660～1662年，接着在1698～1702年，发生了两次从法国到中国的航海，每次几乎都用了两年时间。类似的是在18世纪初期，从里斯本到伦敦要用5个星期，从伦敦到巴伊亚也需5个星期，某个传教士从巴伊亚到里斯本，他在1708年用了80天，在1721年用了138天，甚至直到1756年，从普茨茅斯到查尔斯顿（Charleston）的航海竟用了7个星期。各种危险，包括海盗（在各处都很普遍）、对航线的无知、可能出现的延误和躲避，都可以对航海的神秘性做出解释。尤其在16世纪，甚至进入到17世纪，这种神秘性都令人不可思议地被保持着，它限制了关于贸易和发展的知识，并因此限制了对这些知识的利用。

具有同等重要性的是，大多数特许公司都面对辽阔的疆域；在多年时间里，它们所能做的只是对辽阔的领土进行尝试性的探索。各个东印度公司，在不同的国家都被给予从好望角到麦哲伦海峡的贸易特许权；西印度公司则【237】得到了在大西洋沿岸地区，甚至是整个美洲大陆东海岸的垄断权。一个1642年在法国成立的东方公司（A Compagnie d' Orient），在20多年里一直试图开发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但终因失败而放弃；1664年由柯尔贝尔创立了庞大的印度公司（Compagnie des Indes），其建立目的是为了开发同一个岛屿，然而却在1669～1671年从马达加斯加转向到印度大陆立足，五六年之后，作为其全部努力的结果，该公司除了在从苏拉特（Surit）到钱德拉戈纳（Chandernagore）分散建成了七八个基地之外毫无成就；但是由这些基地而滋生了在锡兰（Ceylon）、苏门答腊（Sumatra）、爪哇（Java）和曼谷（Bangkok）立足的野心。

仔细审视这些令人生疑的冒险，便能更好地理解，从1613～1633年法国的“du Noyer”[①] 项目失败（尽管有来自最高当局的鼓励）之后，以及在

① 具体意义不明，可能是指“泛海”的意思。——译者注

官方资助的莫尔比昂（Morbihan）公司和圣—皮埃尔—弗勒德利塞船运公司（the Compagnie de la Nacelle de Saint-Pierr-fleurdelysée）成立之后，殖民地公司的计划是多么容易被卷入整个法国经济的发展计划，其范围从巴黎的缝纫师到塞纳河（the Seine）的开挖，还有比利牛斯（Pyrenees）的森林和采石场。这类事情在法国历史的不同时期都可见到——首先是在黎塞留政府的初期，此后更晚是在主政者劳的影响下，计划通过一个单一的殖民地开拓公司来控制法国与非欧洲地区的全部贸易。此外，17 世纪初在瑞典，尤塞林克斯（Usselincx）所倡议的公司试图把它的力量扩展到世界最遥远的地区。在法国和英国，直到 17 世纪下半叶，国家才多次宣称，在亚洲、非洲或在美洲的公司所管辖的领土过于辽阔，并要建立起更好地适合于更为有限的任务的商业机构。这些公司要前去完成其任务的地域如此辽阔，说明了它们要求政府提供保障是绝对必需的。

这些国家试图在民族的基础上做出内部统一行动，这种不懈努力对殖民地扩张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宗教产生了各种影响。有些国家由于宗教原因而特别青睐移民，另一些国家的移民则是由迫害所激起。传播福音的想法在哥伦布（Columbus）和其他早期发现者的动机中占有一定位置；在法国，传教士通常与公司的成立相联系，而且王室经常为公司安排传教性质的任务。[238] 尽管，一般情况下新教徒都被排斥在法国殖民地之外，但是，有很多法国人愿意在殖民地为胡格诺（Huguenots）教徒建立避难所。大量非英国国教徒出于良心从英国迁往美洲，他们带往新世界（通常是以有组织团体的方式）一种精神，它至今仍影响着美利坚合众国的制度和社会。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委员会正式地对荷兰海外领地的宗教事务做出了考虑，但荷兰公司对这类事情却兴趣不大。

民族国家在促进海外扩张中所起的作用，为它们在近代努力维持对国民生活各个方面的控制定下了模式。重商主义是这种愿望的经济表达，它在各地都占主导地位。作为 15 ~ 18 世纪占统治地位的经济论调，重商主义是信仰、理论和实践的混合物，其目的是增加国家财富。这一目的通过国家行为来实现并为国家利益服务。最初通过积累贵金属，其后（18 世纪初）通过积累各种货币手段；而且重商主义在母国与殖民地关系的构成上起着直接作用，特别是对贵金属的生产和流通、初级商品的进口和制成品的出口以及工业在新地区的作用来说更是如此。

这些特征在欧洲国家是普遍的，但是，当我们面向范围更广泛的国家时，还有待努力将它们表现出来。非洲和美洲，一般而言实际上无人定居，

然而非洲仍对白人定居点关闭，而美洲直到它获得解放并居于领先之前，都一直是欧洲的附属部分。另一方面，亚洲居住的人口相对密集，而且具有其自身的传统，其组织足够稳定，这些使他们能够保持自身特点，并且以一种消极的方式抑制欧洲人的进入。

在这些不同的条件所形成的框架之下，欧洲人完成了他们的发展与创新的任务。他们没有有意识地区分开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他们迁入空旷的大陆，从而能够在扮演政治角色的同时扮演经济角色，并且在长时间内他们这样做并未激起任何激烈的反对。但是，在亚洲，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经济功能是他们所扮演的惟一角色，而这一功能在扩张之初是非常关键的，只是到了 18 世纪，当扩张被征服所代替时，古老的特许公司才让位于未来的帝国。【239】政治和经济这两种趋势被两种不平等的力量所代表，这两种力量为了新地区的发展而携手合作。商人和投机者在那里急于马上获得利益，而国家则同样急于获得权力。

4.3　公司的成员和财政

开发新世界的公司和机构的成员可以划分为两类。活跃的成员自然是商人，但是，怀有各种兴趣的资产者（他们因享有大量各种特权而身份显赫）、官员以及城市居民也在各种不同而范围广泛的安排之下加入到商人的行列。

一般来说，是商人们急于促成公司的形成。伦敦的商人在 1579 ~ 1600 年期间为东印度公司的组建铺平了道路；荷兰公司的建立者早在 1594 ~ 1602 年，就已着手建立许多航运公司（Voor-Compagniën）。此外，在法国，正是商人，而且首先是来自海港的商人，在 1663 年要求建立一个以殖民地开拓为目的的大公司。在各个地方，商人为海外航海提供了大部分资金，而且正是他们把公司带到了新地区。

留在宗主国并从那里指导贸易活动的商人们很少具备管理大片地区的经验，并且不得不采用很多不同的权宜之计来对他们的企业修修补补。那些在 16 世纪和 17 世纪远赴海外的人，是真正为一种冒险的欲望所驱使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事实上几乎仍然是游牧民。直到 18 世纪，所有地区都有一种共同的风俗，即一个年轻的商人都要跟随一个有资历的商人完成其服务期，通常是在外国。16 世纪中叶，巴黎的大商人宣称，商业的特征包括有：“在持

续地面临着沉船、受劫以及其他偶发事件时，在面对各种危险和急难时全身心地投入工作”（en travail de corps et d' esprit, et au danger et péril continuel de naufrages, détroussements et autres cas fortuits）。英国的“纯粹的商人”与法国的“优异的商人”（bons marchands）都急于把他们自己与工匠和零售商区别开来，他们获得这一称号是根据相同的标准，即在海外定居一定时期。甚至在 17 世纪，与外国地区进行的进口贸易通常会造成商人们旷日不归，而且海外基地的建立者们在横渡大洋寻求贸易时几乎不需要采用任何新奇手段。他们已经习惯了武装旅行，习惯了海盗的攻击，习惯了保护自己，【240】习惯了在工厂进行战争，这些工厂是他们在遥远的土地上建造的，其中并无多少变化。当商人在指挥运送其货物的船只时，当他们挑战船上海军船长的权威时（像黎塞留和柯尔贝尔时期在法国发生的那样），也并无任何新奇可言；当商人们要求某一殖民地的管理权时（不管属于什么级别），正如他们 1713 年在圣多明哥（Saint Domingue）所做的那样，或者当他们在 18 世纪或多或少地在各地要求军队指挥权时，所有这些，也都并非是什么新鲜事。海外定居点的官员所具有的头衔突出了商人的重要性，并说明了权力的性质和那里的竞争。这些头衔在所有开拓殖民地的国家是普遍的——上层商人、商人、合伙人、助手。至于其他方面，如果说，有一些商人确实开始专门从事他们的贸易，大多数商人则继续买卖各类商品，而且当他们冒险远航去寻求各种殖民地物产时，几乎不改变他们这种买卖活动的常规。

也许是出于必需，也许是出于单纯的自利，也许是因为给予他们特许权的当局的暗示或要求，商人们在基本的商业问题之外，还对科学发现具有兴趣。正如费纳奥·戈麦斯（Fernão Gomez）以每年考察 100 里格（Leagues）的海岸为条件获得圭亚那的贸易包租区那样，1550 年，弗纳奥·德·劳伦赫（Fernão de Loronha）获得了对巴西的贸易许可，条件是 3 年之内要考察 300 里格海岸。16 世纪末，在阿姆斯特丹，未来的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与地理学家普朗修斯（Plancius）保持着固定联系。巴伦茨（Barentz），勒梅尔（Lemaire），哈德森（Hudson）为商业公司工作；甚至在 18 世纪，打动库克（Cook）船长的不仅是商业计划，而且有对纯粹的科学发现的追求。

这些共同的特色导致了类似的但并非一样的趋势（从有关的国家来看）。15 世纪的惯例使葡萄牙人习惯于官方控制、王室垄断和贸易出租制度，这种制度有时以地区为基础，有时以商品为基础。西班牙人面对新的任务，马上通过贸易署（the Casa de Contratación）这样的机构得到训练。为追求贸易而开始和海洋打交道的英国人，已经形成了有数百年历史的地方行

会，而且传统上是在特许权和集体特权的庇护下维持生计，培根宣称“通过公司进行贸易最适合英国人的天性”[1]，他们的集团组织（group-organization）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某种宗教联系而得到加强；东印度公司的工厂领导受命把他们的“家庭”——在他们指挥下的人——召集到一起进行晨祷和晚祷，这种精神（它最终产生了一些纯粹的宗教定居地，正如那些清教徒前辈移民的定居点）多年来给英国企业以某种“虔敬与利益相结合”的特征。在荷兰，随着在独立斗争中捍卫地方自治和民事自由的活动成为习惯，商人们被允许按自己的意愿自己组织起来，几乎不受国家控制，尽管在对外事务中他们仍代表着国家。荷兰的殖民地公司1663年在法国引发了这样的评论：“值得注意的是，商人们正在独自地安排并完成着一切”。而在英国和荷兰，商人们在公司的组建上起着最主要的作用，法国人可以按海洋利益和领土野心区分开。人们可以料想，在1644年，在建立东印度公司所需的人员中，有3/4是商人。在那些参与海外企业的人中，始终有一个活跃的因素，即来自王国内陆地区的代表，而巴黎、里昂和其他城市的人往往参与其中。在法国，个人主义的民族精神自始至终都在抵制着国家的主宰，然而，结论地说，与由商人发起的运动相比，国家所发起的运动更为重要。在那些殖民地开拓只具有次要的重要性的国家中，商人的作用始终从属于国家当局。【241】

始终有一定数量的企业完全私有，它们逃避特许公司和国家规定的限制，有时以合法的方式出现，有时以非法的方式出现。其数量在各个时期并不相同，这些企业在国家当局对私人给予特权的事务中处于中间人的地位。16世纪早期发现者的那些中断了的故事由于荷兰航运公司而得以继续，而且很多商人继续从事独立的远征，或者以个人的方式，或者以私人伙伴加入到一起的方式。有时他们甚至设法阻止建立大型国家公司。商人们这些与国家活动同时开展的活动是不能被压制的，而且它们为商人们在参与扩张中的持久重要性提供了证明。

商人们的作用因其他合作者的行为而得到加强，这些合作者直接或间接地资助着公司。据估计，1664年法国商人的比例是独具特色的，东印度公司的成员中可能有1/4是商人。

皇室成员们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青睐于扩张。这里我们仅指出西班牙和葡萄牙皇室成员从其各自的商行中所得到的利益。英国的国王希望以其私【242】

---

① 参见E. 利普森著：《英国经济史》第2卷，第193页和注释6。

人身份从大型公司的岁入中获得利益。我们已经看到，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是如何设法从东印度公司获取某些利益的。早在 1660 年王政复辟时，查理二世就设法建立一个竞争性的从事东印度贸易的公司，而且没有遇到任何阻碍。的确，在有些时候，国家采取的是相反的态度。1621 年，联省的三级议会认购了荷兰西印度公司的一半资本，路易十四为他所创立的许多企业提供了所需的大部分资金。

像皇室成员一样，而且经常是步皇室成员的后尘，各种级别的高官显贵们也在从事海外开发的大型公司中占有股份。除了从商行中获得有利可图的挂名差事的伊达戈（the hidalgos，即西班牙下级贵族）之外，在英国和法国，许多皇室成员和朝臣参与到公司之中。更有甚者，最高级别的贵族经常成为公司的领导。例如，在法国，在路易十三未成年时期，即他作为达姆维尔（Damville）和蒙莫朗西（Montmorency）公爵期间，以及在路易十四即位前作为布列塔尼（Brittany）陆军中将（the maréchalde la Meilleraye）期间，都亲自领导着富于进取的大型公司并在其名义下资助这些公司。17 世纪下半叶，英国鲁珀特（Rupert）亲王是哈德逊湾公司的主管人员。缩小贵族的范围，大量血统纯粹的贵族是在英国和法国组建的公司的合股人。英国皇家非洲公司在 17 世纪初就包含有一大批贵族，在 38 个成员中只有 5 个是真正的商人。而且，它为了允许合股人的子女成为公司成员而制定了特殊条件。管理着两个荷兰大型印度公司的荷兰商人阶层的确并非真正的贵族，但是它却成为一个严密的寡头集团。在这些显贵集团的背后必然排列着国会成员、大批从事法律职业的法庭人员，这些人都是由政府邀请（在法国某种程度上是任命）而在大型商业公司中持有股份的。

其他更加直接地与金融业和制造业有关的人也参与到公司中。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法国最大的金融巨头（担任王国的 Fermiers-généraux）经常被那些想成立公司的大臣们摊派捐赠。在法国及其他国家，人们能够把自亨利四世统治时期以来的一批人区分出来，并可以用近代术语“殖民者”来称呼他们。这些“殖民者”聚集在亨利四世、黎塞留、柯尔贝尔周围，而[243]且一直到 18 世纪，他们同样地卷入了非洲、美洲或东印度群岛（the Indies）。可以随便举出几例，比如在政治与行政的分界线圈内的一些高级官员或职员，像贝林赞尼（Bellinzani）和贝里耶（Berryer），来自巴黎的商人像普克林（Poquelin），来自大海港的商人如鲁昂（Rouen）的弗曼内尔（Fermanel），银行家像弗蒙特（Formont），或工业家如卡迪乌（Cadeau）。很难把这些人与他们那个时代的其他资本家区分开来，而且他们的活动与那

个时期的一般活动相互混同，这些活动的特征是，它们大多数缺少专业化，还有，在殖民项目中活动中，活动性质具有模糊性。

一旦在交易所买卖股票的活动得以创立，在这些经济和社会集团之上，在殖民运动的边缘，一种对贸易和殖民地事务的兴趣就得以在一般公众中蔓延开来，以至于它成为一种不可小视的社会现象。在17世纪期间，两个印度公司的股票交易是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的主要业务。值得注意的是，在法国和英国，在同一时间，南海泡沫和“劳制度（The Systerm of Law）”震动了社会各阶层——它们是在金融上没有重大前途的狂热运动，然而它们并非毫无结果，而是为公众舆论对殖民地事务产生兴趣做了准备工作。

在公司的支持者中，有一个阶层必须从另外的角度予以思考；除了英国，而且（出于不同原因）除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外国侨民在大多数国家中都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必要强调麦哲伦（Magellan）为西班牙服务的例子，或是强调意大利人在欧洲扩张之初在所有海外探险中所起的作用（前面已经提到）。荷兰人在17世纪遍布各处；人们可以看到，他们在亨利四世时期和黎塞留时期的法国，积极地推动了公司的形成。同样，他们也出现在丹麦、瑞典和某些汉萨城镇。荷兰人为船只提供船长，而且如果荷兰政府不予禁止，他们还可提供部分船只；有时他们甚至为其他国家的殖民地提供部分高级管理人员。清教徒卡隆（Caron）（布鲁塞尔本地人），还有弗朗西斯·马丁（Francois Martin）（巴黎人）是通过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工作而开始其职业的，后来他们转到其竞争对手法国人那里。资本家在各个国家投入资金，黎塞留时期法国的一些公司甚至从英国获得财政援助。而在柯尔贝尔时期，它们则从德国获得资助。尽管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章程所正式禁止，外国人仍然被招聘为雇员。这些在外国从为一个公司服务到为另一个公司服务的变换，说明了纯粹的国家性的动机远不像今天那样强烈；宽容使自【244】中世纪延续而来的迁移自由成为可能，并进而减缓了把人们的活动局限在国家范围内的经济趋势，这种趋势是日渐强大的民族国家所发起的。

与伊比利亚国家的商行相比较，特许公司保持了其自身的真正自治。长期以来，国家在发展自身权力的同时，把一部分权力授予那些它们给予商业特权的公司，同时这些国家经常转让出部分宗主权。在18世纪，在那些仍然没有海外领土的国家中，国家和个人在政府授予的特许权的保障之下，通过某种程度的严格合作关系联合起来。这种国家与个人之间多年以来的合作关系着重表明了它们的经济目标。

英国由于其根深蒂固的传统而首先采用这种特许公司的方式，在那里，

自中世纪以来这种方式就已为人知晓。在 16 世纪期间，英国已经建立了特许公司，这些公司或从事伊斯特兰（Eastland）贸易（1408～1579 年在波罗的海），或从事莫斯科公国贸易（1555～1666 年），或从事黎凡特贸易（1581 年），或从事非洲贸易（1588 年，再次是 1618 年）。商人们发起了这些公司，而且是伦敦的商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正是他们建立了第一个大型殖民地公司——东印度公司，伊丽莎白女王在 1600 年对其授予了特许权。其他公司是由一些出入政界的人所发起的，像瓦尔特·罗利，或由一些贵族所发起，特别是对于 17 世纪初以在北美洲建立殖民地为目标的公司来说更是这样；在贵族们所创立的公司中，最重要的是哈得逊湾公司（1670 年）和南海公司（1710 年），它们所辖之范围从马六甲一直延伸至麦哲伦海峡，并因此而包括整个印度尼西亚。

在荷兰，自独立战争以来，荷兰和锡兰（Zealand）的商人们计划到达远东，或者经由西北航路，或者经由东北航路。当 1594 年以后，他们终于绕过好望角时，几家从事"远距离航海"的公司（Compagniën van Verre）随之出现。他们的航海面临着严重的危险——例如在 1598 年，在属于 5 家公司的 22 条船（前往东印度群岛）之中，只有 14 只返回了欧洲——而且在东印度群岛，他们彼此之间进行了相互损害的贸易竞争，当他们返回欧洲后也是如此。联合东印度公司在 1602 年从总议会获得了特许权（由这些公司联合起来），从而享有好望角与马六甲海峡之间的垄断权。大约 20 年后，[245] 在 1621 年，由于威廉·尤塞林克斯（William Usselincx）的努力，一家西印度公司得以创立，它得到了大西洋沿岸、美洲大陆和南北美洲的全部贸易权（从北回归线到好望角）。

这是荷兰的两家最大的特许公司，然而其他公司（显然较为次要）与它们同时存在。公司无论大小都在国家管辖之下生存，国家始终坚持主权原则，即使是以传统的封建形式。然而，从这些公司的结构特点来看，从难以区别其职员与政府官员的角色来看，这两个大型公司，特别是东印度公司，多年来是真正的国中之国，而且为了各种实际目的，在欧洲和在东印度都保持着独立。对第一个成立的公司即东印度公司而言尤其如此。

与荷兰和英国的公司相比，在法国，特许公司通常带有更为深刻和明显的国家印记。在亨利四世时期、在路易十三与黎塞留时期，和在路易十四与柯尔贝尔时期，政府不仅习以为常地参与组建乃至创建公司，而且由政府招募人员、任命主管人员、积累所需资本（至少是募集其中的大部分）；法国政府习惯上为特许公司提供船只，而且，正如几乎在各处所发生的那样，通

过免除关税和给予其他特权来予以帮助。17 世纪期间，法国公司在政府组织之下的合并说明了它们的这种特殊之处。国家同时也使这些公司具有相当程度的多样性，直接属于国王的殖民地则由海军部管理，而那些属于特许公司的殖民地则由财政部控制。

在北方国家可以发现类似的安排，而且是独具特色的。那里的公司完全是由国家所建立的——例如在 1612 年、1634 年、1686 年及 1728 年的丹麦东印度公司，17 世纪末丹麦的西印度公司，1626 年和 1731 年的南海公司，威廉·尤塞林克斯和路易斯·德·吉尔（Louis de Geer）的瑞典西印度公司。在 18 世纪末，还有一个普鲁士非洲公司和一个库尔兰德（Courland）公司。尽管这些公司的建立带有随意性，其中的一部分却管理得十分出色，有些在印度，有些在非洲，特别是在几内亚海岸（Guinea coast），只不过它们寿命短促。

它们的特许权使这些不同的公司能够在大约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保持其自主性。这些特许公司秉承中世纪的传统，保持了旧制度法律体系的特点。这【246】些特许公司是自由的保证，而且保护了那些为我们今天的经济铺平了道路的创新，特别是它们保护了各种合伙关系，而这种合伙关系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怀疑在为谁制造垄断和独占市场。多年以来，它们的特许权一直是确保贸易公司的内部团结和运作秩序的手段；对那些出海远航的公司来说，特许权是对敌人的敌对行为和对手的竞争行为的防卫手段。

有时是通过某个命令作为补充，有时是通过专利证书或是正式宣告作为补充，特许权使公司享有明确的法律地位，即它是由政府当局授予特殊权力的半官方机构。然而公司内的成员个体是为其自身的利益而工作的，也许是在共同的规则下工作，也许是为了一种相同的利益而工作。这种机构至今仍可在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国家中找到，而在那些深受法国大革命影响的国家则被中断，然而今天却几乎在各个地方都生机勃勃地重新出现。它们的法律地位使公司的存在神圣化，并使之成为一个政治实体（body politic）。尽管如此，我们可以发现，1724 年一个英国法院驳回了荷兰西印度公司的诉讼权，因为这个公司虽已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但它的名字并没有被明确写入允许其成立的特许状中——这种僭越说明了正式手续的重要性，也说明了商业竞争的激烈程度。

特许权规定了被授予者活动的范围。对所有大型公司而言，这是一个地理学的区域；对其他公司而言，这也许是某种特殊项目或贸易的开发——毛皮、渔业、烟草、奴隶等。分配给大型公司的辽阔地域证明了那种直到 18

世纪初仍一直左右人们思想的商业理念。我们已经看到辽阔无边的土地被授予各个东印度公司。荷兰人把整个世界划分给它的两个大型公司。确实，那些公司和殖民地的创立者的地理知识十分有限。商人和资本家的确是为了自我实现，然而他们首先需要进行探险。劳的西方公司（Compagnie d' Occident）的目标是控制法国在世界各个地区的扩张，它是那个时期最后一个所提出的要求明显超过其自身能力的公司（作为一个公司，甚至作为一个半官方公司而言）。

由特许状而获得的特权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完全经济性质的；另一类是政治性的，经常是统治权的委托。

【247】国家一直是把某种贸易垄断权的授予——正如在 15 世纪的葡萄牙那样——限于一段固定的时期。这段时期通常至少是十几年，而在法国对西印度公司和东印度公司来说，分别是 40 年和 50 年。垄断权的重新授予使国家有了一个牟利和重申其权威的机会。早在 15 世纪后期，英国在给约翰·卡波特的专利书中就已经授予了垄断权。这种垄断权不像西班牙和葡萄牙所施加的限制那样明显，但它为“殖民地契约（*Pacte colonial*）”这种限制开辟了道路。这种垄断权一直遭到那些被排斥在外的人的抗议，那些无执照经营者的走私活动所造成的漏洞，是导致对垄断权做出修正并在 18 世纪下半叶最终将它废除的主要原因。大多数特许权也给予金钱方面的优势，特别是免除关税，或者至少是降低税率。在某些国家——事实上是法国——这些特许公司接受财政补贴，有时是直接的，有时是按照贸易增长的比例。有时国家给予它们实物上的资助，特别是用来进行贸易的船只。通常国家把这些公司所要开发的土地所有权授予它们，这种所有权与国家打算在遥远领土上行使其宗主权这一问题相联系。

事实上，国家习惯上把或大或小的一部分宗主权委托给特许公司。在异教徒的土地上，政权在第一块被占领的土地上就已建立。土著人被认为是没有权利的，由于这种原因，信基督教的国王们可以确定大量的判例；葡萄牙人可以根据 1455 年教皇的一个训令而要求宗主权，西班牙人则根据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国王的要求，通过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在他们自己与其葡萄牙邻居之间的仲裁而要求宗主权，并在稍后，由 1494 年签署的托德西利西斯（Tordesillas）条约予以批准。其他国家的国王可以和那些已经确保其地位的国王一样要求同样的权利。余下的就是是否拥有与宗主权相称的实力的问题了。

国家把宗主权的标志委托给半官方公司的条件取决于各种不同的情况和

当下的需要。对荷兰人来说，最关键的需要是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外领地中得到一个立足点，不管是实际拥有还是宣称拥有。亨利七世要求卡波特在任何他可能占据的土地和地区升起他的旗帜和标志，以行使全部领土主权和司法权。为了自我实现和规范贸易，这些公司被指示与既定的统治者［那些掌握“财产、官职和司法权（dominium，titulum et jurisdictionem）”的人］达成协定。特许公司不得不防御它们的欧洲敌人，防御那些由于自己闯入别人已经从事的生意而招致的敌人；它们不得不利用堡垒来保卫它们的基地，【248】并做好防御准备，它们武装自己，签订条约，训练士兵，装备战船，拉拢同盟，并且卷入各种复杂的国家关系中。为了管理授予给它们的地区，他们必须首先在其本国国民范围之内行使司法权，但却逐渐扩展到把土著人也包括在内。公司据点的头领（主要任务是经济方面的）发展成为拥有广泛权力的行政长官，但仍然是公司所任命的人员，军队官员也是如此，即使其官职是政府所正式授予的，他们也仍是公司的人员。

特许权使公司具有一种非常真实的自主权。从这种观点出发，最具特色的是荷兰公司，当西印度公司在 1621 年创立时，它所更为紧密依靠的是三级议会，而更早成立的东印度公司，自 16 世纪中期以来就不再要求三级议会批准在亚洲的总督人选。在那一时期公司主管人给荷兰议会这样写道：“东印度群岛的殖民地不是由国家所取得的，而是由私人贸易商获得的，如果他们愿意，就可以把它们卖给西班牙国王或任何其他联省的敌人。”

一般情况下，为了换取它们的特权，这些公司只需缴纳与其所属国家的其他公司同样的关税和税收，然而颇经常发生的是，它们在重新延续其特许权时要为它所拥有的宗主权和统治权缴纳封建式的酬谢。这些公司享有特殊的优势，并因此而具有一种特别的、特权性的地位，由于这点，国家也期待它们能使国家财富得以增加。

在法国或是英国，由于不同的原因，这样一种情况绝非罕见，即一项特许权的授出，应当通过把另一项特许权授给与之竞争的公司而加以相互折衷。在亨利四世、路易十四、查理一世和威廉三世时期，这种现象可以在从事东印度贸易的公司那里发现；而且，从一种法律的和技术的观点看，18 世纪庞大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其说是最初的 17 世纪（自己名称所指的）公司的后继者，不如说是它的一个对手公司的后继者，这家公司成立于 1698 年，而后在 1708 年与东印度公司合并。

在旧制度时期，各个国家中政府权力的不断扩张导致了国家对公司的运转直接干预，甚至当它们获得特许权后也是如此。在英国，自 17 世纪初期

以来，把国家权力（“国家事务的安排”）委托给商业公司的原则受到了挑战，而且有一部分人在那么早的时候就坚持认为建立殖民地是国王的事情。[249] 这种感觉与在思想领域的运动相一致，在洛克的言论中和在作为 17 世纪一个持久特征的立宪主义中都可以发现这种思想。的确，当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的要求被认为有损于东印度公司时，国王遇到了麻烦。但是在 1660 年，查理二世没有遇到多少麻烦就获得了公司的部分利润。伦敦逐渐增长的优势有助于统一商业行为并突出英国在海外领土扩张中的国家特点；“到东印度进行贸易的伦敦市长和商人”在 1698 年变成了“到东印度进行贸易的英国公司人员”。国会对殖民地事务的控制日益增加，在 18 世纪上半叶，英国公司愈来愈被吸收到政府机构之中。

在法国，皇家政府（间接由亨利四世控制）变为直接由黎塞留和柯尔贝尔控制，而他们是那个时期大多数公司的创立者。路易十四保证柯尔贝尔被选为东印度公司的领导者之一［并在凡尔赛宫（the château of Versailles）里为公司提供了一个办公室］。他还解散了一些公司。他自己亲自任命几内亚公司的成员。他在 1684 年命令几家公司支付股息，以提高公司的信誉。柯尔贝尔确实有意在加拿大和安得列斯建立直接管理，并且建议采用法国国内采用的形式，特别是在立法和司法方面。在 18 世纪，效仿 1717 年的西印度公司，在此之后的东印度公司的领导者的选举，愈来愈被置于政治掌控之下。在 1723 年公司直接由印度事务院所管理，这个事务院有 20 个成员由国王直接任命，10 个成员由持股人选出。事务院的主席是内阁首席大臣杜布瓦，而它的领导者是总督察（controleur-general）杜顿（Dodun），同时这个事务院自身是政府的一个高级事务院。稍后“rien ne se décidait au Conseil des Directeurs qui n' eût son écho au Conseil des Ministres”，在 7 年战争期间公司的管理部分变成了“印度事务院中的战争办公室”（bureau de la guerre au départment de l' Inde）。一般由公司任命的行政长官和军事领导，事实上一点一点的改由政府任命。贸易和生产的组织都成了国家事务。

在荷兰，国家的行为是最不具效果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将其岁入的1/33上缴给联省省长威廉三世。在 1747 年，屈服于反对其滥用特权的运动，公司把一个总经理的职位授予了年轻的联省省长威廉四世。[250] 但这个人在 1751 年去世，使他没能利用这一职位为公众谋福利。

18 世纪上半叶，在各个地方的“殖民地契约（pacte colonial）”更为紧张化。不同国家之间的竞争——在资本的征集和使用方面，在公司人员的挑

选方面，在选择甚至是最高级别的官员方面——尚未达到将在下一个世纪才出现的严酷程度，不过，那种各方都让企业带有鲜明的国家特征的趋势，不管是在欧洲还是在海外，都是明显存在并且日益受到强化。

有些特许公司成为了旧制度时期最为重要的商业机构。三个东印度公司（荷兰、英国和法国）的繁荣使其成为政治力量，它们的盛衰兴亡在世界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们的辉煌历史使其在群体的演进中占有醒目位置，这种演进预示着作为现代资本主义核心成分的有限公司的形成。

当欧洲扩张开始时，商人们的合作是按照两种方式来组织的：一种是私人合伙制，它是中世纪以来遍布整个西欧的传统做法（在德国，直到16世纪初，这种方式仍受到怀疑，即使是以一种严格的家族组织为基础也是如此，因为它具有垄断的倾向）；另一种是特权机构，作为特许公司的直接先辈，它在英国特别活跃。垄断和其他特权（其起源是政治性的）以许多微妙的方式弥合了这两种方式之间的差别。随着公司的演进，那种预示着现代组织形式的特征，最早出现在英国。然而即使是在英国，这种形式也仅仅是缓慢地发展着，众多各种各样的措施以一种经验主义的方式加以尝试，其结果是造成了相当的困惑。在那些已经获得特权的合营公司当中，有些是作为它所从事的经济任务的报酬而得到这种特权的；另外一些公司则享有在今天是属于国家的权利，即司法权、外交权和军事权力。这些公司的自主权的程度彼此间差别很大。在这些半官方的或私人的组织之外，葡萄牙的商行和西班牙的商行是从事控制和管理的机构，其起源是政治性的。葡萄牙的商行还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贸易；但是，这两个国家把土地开发的任务留给了私人。此外，正如我们所看见的那样，在塞维利亚，印度货物贸易会所（the Unrversidad de los cargadores a las Indias）必须被认为是非常类似于半官方的公司，特别是类似于管理公司。【251】

但是，特许公司在其他方面所具有的司法和财政地位，使我们仍能够把特许公司分成两类。传统上把它们分成管理公司和合股公司，而且事实上这种区分说明了真正的区别。管理公司本质上是人的团体，而在合股公司里，最终是永久性资本成为统一的联合行动的基础。管理公司来自于一种传统的形式，与现代卡特尔相比两者有某些共同特点，但同时在某些方面又有所不同；它们为贸易制定了共同条件，但并不是为了共同的贸易。合股公司开创了导向今日的有限公司的运动，三个大型东印度公司即属此类。只有“纯粹的商人”，“好商人”才被招入管理公司，有时是在其学徒期满后，有时

是凭借继承权，或是通过缴纳“hance”，或至少是由公司现有成员缴纳一定的保证金。所有成员都要受道德训诫的约束，而且都必须接受贸易上的同样的惯例，例如“定额”规定了公司成员买卖商品的数量。然而，在这些限制之下，每个成员保持着自己的主动性，并承担着自己贸易的风险。而管理公司一般只招纳有资格的“纯粹的商人”，那些以公共资本为基础的公司欢迎那些投资者；各个等级的资本家，不管是商人还是贵族，都可以参与公司的贸易，或至少可以分享各种利润。

在我们看来，这种对照表明了不同种类的公司之间的明显区别，但是旧制度的一个特别的特征在于，那时的人们并不这样明确地在结构上区分从事贸易的公司和从事殖民地开拓的公司。此外，人们似乎并不对那个时期经济机构的普遍庞大感到惊奇。大约两个多世纪，即 16 世纪中叶到 18 世纪末，所有公司都不断地尝试着设法发现一种适宜的机构形式：群体借以可能共同行动——为了购买或出卖商品，为了建立工厂，或为了占据某个殖民地据点，但没有必要在法律方面过多考虑其共同行动的方式。区别的产生以及传统形式的公司的消亡都是逐渐发生的，这些公司的继任者奠定了殖民地的基础，使之为 19 世纪的帝国做好准备。

这种演变及其显著特点，可以从英国的情况中发现和找出。只有在经过并非总是坚持到底的试验之后，这种显著的特点才得以出现，记住这一点是重要的。英国人的经验主义使得英国商人比其他国家的商人更加不看重法定的和政府的模式。甚至晚至大约 1640 年，东印度公司的成员在很多场合都特地被问及，他们希望自己的公司采取什么形式。它应该是一个管理公司，还是一个为每一次航海而专门组建的合股公司？或是一个为所有航海而成立的，可以持续控股的公司，或是一个类似于我们现代公司的有限公司？某些特征显示出（也许不太明显），荷兰、法国和北欧的其他国家是向同样的方向发展，而且同样缺乏经济模式的界定。

【252】

这种发展对我们来说似乎十分复杂，因为我们今天的主要标准很不适合于过去的时代。这些公司的根本原则在任何经济规划中都没有共同的基础。从长期来看，把人们组织起来成为管理公司或合股公司的做法来自于不同时期。管理公司继承了中世纪的习惯和传统，其特性也基本上来自中世纪的规章制度；合股公司着眼于将来，其特性来自于其使用资本的形式和方法。特许公司应归入管理公司，原因很简单，即它们都具有使其得以存在的章程；然而所有这些公司开始运转时，或者是具有永久性资本，或者是被迫获得一种永久性资本。所以这两种类型的公司能够同时并存，并一直持续到资本主

义最终取得胜利。[1] 此外，同一个公司可能从一种类型转变为另一种类型——这的确正如那些在大规模殖民运动之前的公司那样。黎凡特公司作为一个合股公司成立于1581年，在1605年变成了管理公司，我们可以注意到东印度公司成员对于公司应该采取哪种组织形式表现得犹豫不决；几内亚公司作为一个合股公司成立于1618年，在经历了一系列变化之后，1750年后期，其后继者皇家非洲公司成了一个管理公司，并且明确禁止为了公共利益而进行贸易。

更为明显的事实是，这些公司往往对自己的属性自加混淆，从而其特征显得模糊不清。

在各种情况下，这些公司根据政府法令建立起来，其构成几乎一成不变。下面这一事实毫无特别之处，即一个管理公司（介于公司和卡特尔之间），应当对任何想加入它的人开放；而且只缴纳加入费即可，可以是由亲属推荐，也可以不是。[2] 多年以来，甚至在合股公司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管理公司成员的数目并不固定。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其名册上登记着218个成员；在荷兰，所有航运公司（Voor-Compagniën）的成员都可以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成员，而且从一开始就确定了所有联省的公民都可以成为公司成员；在法国，由亨利四世及后来由柯尔贝尔所建立的公司一般都向所有人开放，只要他愿意在第一艘派往美洲或非洲的船只返回之后认捐1年或18个月甚至3年的资本。在1664年东印度公司成立之前，300多人出席了一个预备会议，其中的很多人认购了公司的资本。此外，直到17世纪，加入英国公司仍然需要缴纳加入费，尽管它们是股份公司。这一做法同样也应用于合股公司；公司的成员被称为“兄弟”，他们的妻子被称为“姊妹”，他们的头衔是“公司的自由人”或干脆称为“自由人”；成员的儿子缴纳的加入费比其他候选人少；在大型东印度公司中，年轻的雇员被称为学徒，而且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一个工厂的全体人员构成了其领导者的“家庭”。

【253】

然而在公司内部，成员之间并不平等。令人不解的是，正是那些具有固定的合伙资本的公司，才最为正式地规定了成员的不同地位。毫无疑问，在

① 直到1733年，伦敦、布里斯托尔和利物浦的商人们要求取消东印度公司，并要求以一个每个商人都可以在其中使用自己的私人资本进行贸易的公司替代它。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没有参加殖民地开拓的工作，管理公司却一直持续到19世纪前25年。冒险商公司（其历史可至少追溯到15世纪）一直持续到1806年，而非洲公司一直持续到1825年。

② 冒险商公司在17世纪中叶有7 200名成员。

英国，及稍后在法国，公司成员的权利通常是按照其贡献的资金来分配的；但是，在英国和荷兰（而且根据早已广泛传播的惯例，在德国也同样如此），一个公司的成员可以被分为两类。部分成员被给予充分的参与权，其姓名在公司的登记簿单独注册；其他通过中间人购买股份的成员，只能以其中间人的名义登记，而且本人不能行使任何支配行为。

甚至公司的团结也并非像我们所倾向于相信的那样得到明确的保证。有时成员们自己组织起来，并且在公司内部，权力会被授给某种俨然具有自主性的组织。事实上，不仅成员的数量很少受到限制，而且成员对公司可以采【254】取任何行为而不必受到限制。组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中有很多已经是黎凡特公司的成员，而且继续保持其成员资格；在约 1640 年，有些东印度公司的成员是冒险商公司的成员，尽管冒险商公司一般不在欧洲以外进行贸易；在荷兰，荷兰西印度公司欢迎较早的公司即东印度公司的成员加入；在法国，特别是在柯尔贝尔时期，任何人只要愿意即可加入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的成员建立了其他公司，像 1660 ~ 1698 年间的中国公司，还有其他几个从事非洲贸易的公司。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一做法在所有殖民国家都是普遍的。

甚至在公司内部，一些团体（多少具有同源性）享有某种形式的自主权，有时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实，有时是正式的和规章制度的安排。在英国，不同港口的商人相互反对已成传统，伦敦人坚持要求一种与外港相比更具特权的地位。这种现象甚至可以在东印度公司内部发现。然而地区的划分在荷兰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内部保持得最为明显。它是当时最为现代的公司，而且是多年来最受羡慕和最常得到别人模仿的公司。这个公司实际上由 6 个商会组成，一个是阿姆斯特丹商会，其他分别是起源于航运公司（Voor-Compagnien）的米德尔堡、鹿特丹、代尔夫特、霍伦和恩克赫伊曾商会。这些商会的权力和规模并不相等。阿姆斯特丹负责公司一半的债券，米德尔堡商会负责1/4，其他 4 个商会按不相同的比例负责余下的 1/4。每个商会都享有自主权；它们准备自己的船只，挑选在船上和在印度的人员，并分别予以指导；它们挑选运往印度的货物，并各自分别出售所带回的商品，把某些只能由公司代理人（代表整个公司）进行交易的货物单独放在一旁。每个商会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募集资金，而且一个商会的财政状况可能非常不同于另外一个商会。这些商会只是缓慢地在彼此之间发展联络，公司的团结和维系一般是由其中最活跃的商会进行干预而得到保证的。

在 1626 年瑞典东印度公司建立时，这样一种松散的组织所造成的不确

定性和延误，并没有阻止它效仿荷兰人的榜样和在国内各主要港口建立商会。此外，几乎2/3个世纪以后，荷兰公司的声望使它在法国又有了一个效【255】仿者；当东印度公司由柯尔贝尔建立之时，除去在巴黎的主要办公室以外，它或许还包括里昂、鲁昂、勒哈维尔（Le Havre）、南特和波尔图等商会，它们以一些来自各自城镇的成员的认捐为基础。公司的机构是统一的，不过几乎完全是效仿荷兰的榜样。某个大型公司的成员可能会具有许多明显不同的身份。尽管如此，从最初的时期开始，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在永久性资本之下运转，它是在国家新开辟的一块土地上建立的，而且，在那里，没有管理公司会对可能的创新形成阻碍。

这些公司的特性很长时间没有得到确定，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它们的公司身份很不明晰。同一个人可能是不止一个公司的活跃的成员：英国东印度公司和黎凡特公司的董事长多年来是同一个人，而且两个公司使用同一本登记簿和记事册。在法国，用来称呼它们的共同名称缺乏精确的界定；在亨利四世时期，从事贸易和殖民地开拓的公司有时候被称为公司，有时候被称为商会（society），但是雅克·萨瓦雷（柯尔贝尔的合作者和《完美商人》一书的作者）把公司这一名称用于最大型的公司。

公司的这种踟躇不前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即使这有些令人困惑）来自于资本在公司的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不仅是资本的使用方式，而且恰恰是资本的概念造成了很多的模糊不清。

合股公司这一名称描述的是一种新的合伙形式。当公司所支配的资金的功能发生变化时，这一术语的含义也得到发展，而且它最终被用来描述某种非常不同于它第一次成为一个被普遍使用的术语时的意思。那些真正自主的团体，或具有法人特征的公司内部的小团体，长期以来通过由其各成员联合认捐的金融资源来运作。然而，在近代时期开始时，这种以共同资本为基础的团体，扩大了它的活动范围，获得了特许权并得到了最具重要性的权力；在那时，它们的新奇之处不在于它通过一种共同的资本而运作，而在于这种资本的永久性。合股这个词（甚至在英语里）表示的是一种双重的性质。此外，如我们今天把这一术语翻译为法语的 *compagnie par actions*（正如我们通常所做的那样），我们就犯了一个弄错年代的错误，我们的 *compagnie par actions* 是在16世纪和18世纪形成的合股公司的最新发展。而那时资本的形【256】成，尤其是资本的使用，是按照那个时代的特殊方法来指导的。

大型公司的资本是在各种条件之下和按照各种原则积聚起来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600年拥有30 000英镑；荷兰公司在1602年拥有6 459 588弗

洛林（florin）；在 1604 年，拟议中的法国公司的私人认捐最少需要 3 000 里弗尔（Livre），然而总额似乎从来没有限制。1664 年为柯尔贝尔所建公司的认捐，经过一系列增加后，从 6 000 000 里弗尔达到了 15 000 000 里弗尔。显而易见，这笔资金的用途是相当多种多样的。

事实上，资本的概念，尤其是关于在一个集体企业中资本如何使用的观念，仍然是模糊不清的，在习惯上每次单独的购买和出售行为，还有每次长距离航海，应被分开来考虑。某个参与这种生意的公司的成员们将其资金作为共同的资本来使用，每次远航返回之后所带回的货物将被出售，利润被分割开，每个参与者拿着自己的钱走开了。这种经营方法经常被特许公司的成员们所使用。从 1600 ~ 1612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确实一直都在以这种方式工作。每次航海时它都要筹措必要的资本，而且每次行动之后关于该次行动的专门的条例也随之结束。有时一系列航海可能导致它们彼此之间的竞争，然而，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参加者是同一批商人，这种竞争得到了控制（但并非总是完全得到控制）。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孤立地对待每次航海与把盈余资金转入下次航海这两种做法之间变来变去。因此，同一个公司既使用临时资本，也使用固定资本。

在荷兰，有一项正式的条例，即荷兰东印度公司章程的第十条，允许其成员自由撤走其资本，以及撤走在其资本为公司支配期间他应得的利润份额。在这种情况下，公司的登记簿上注明“获利”的结束，并注明那些拥有获得权利的人员的姓名。然而在同一时期，在 1612 年，英国公司和荷兰公司都拒绝偿还那些投资于建筑、船只和土地的资本，而且不允许变卖为现款。从那时起，荷兰公司允许持股人自由地出卖其股份，特别是在交易所。【257】1621 年新的荷兰西印度公司的章程，以及 1623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章程（更新之后）禁止实际撤回资本，尽管股份是可以买卖的。直到 1658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才宣布其资本固定化，而且这仅仅是一个原则上的声明，因为其成员在此后的一段时间仍然可以撤回至少一部分投资。

在那时，法国人始终对英国和荷兰的例子进行审慎考虑，那些对贸易和殖民地开拓怀有兴趣的社会团体接受了相同的关于大型公司的性质的观点。在 1660 年，中国公司建立时其资本为区区 220 000 里弗尔，显然这只是为一次航海做打算。这个公司具有商业和宗教两种目标，它的最重要的倡导者是鲁昂的一个身份高贵的商人，一个“Fermanel”，而且它只派出了一艘船。这家公司在其章程中预见到，当其第一次航海的船只返回时，问题就变成了以何种方式为第二次航海筹集资金。

在所有国家，在资本的固定化这一问题上，某些共同的做法是由实际情况支配的。然而在这个时期，公司领导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获得流动资金。有理由确认的事实是，最令人瞩目的大型殖民公司，即荷兰东印度公司，其资本数额从 1602 ~ 1788 年间并未发生改变。当需要现金时，它习惯上发行短期公债，这种做法在 1676 年以后被使用得最多，而且也是 1638 年以后荷兰公司的各个商会所使用的做法。此外，尽管荷兰公司每年都要起草一份关于它在荷兰的货物和资产的综合报告，但至少是在 1638 年以后，部分地由于交通方面的困难，它从未拿出一份全面的资产负债表。它的报告从未成为一幅关于它在全世界所处地位的完整图画。

就严格的规定来说，公司成员在资本中的股份是从属性的，微不足道的。在开始时，公司的资本是由一些数目不太确定，价值大小不一的股份（shares）组成的；成员的数目是固定的。此后，这些股份又被分为更小的股份，其价值也是固定的，它被称为是股本（stocks）（或者是 actions）。英国东印度公司成员的摊派额并不相等，最初被分为 50 英镑一股，到 1676 年上涨为 100 英镑一股。荷兰公司最初没有规定认捐的股份价值。1604 年在法国，筹划中的东印度公司的股份最小额是 3 000 里弗尔。在 1664 年，这家公司的资本被分为 1 000 里弗尔一股和 500 里弗尔半股。【258】

持股人的权利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才固定下来，我们已经注意到，特别是在英国和荷兰，一部分公司成员只是通过完全正式的成员的隐蔽干预才能参与公司事物。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每个成员的表决权与其投资多少相一致，自 1623 年以来，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大的投资者根据章程享有主导地位；小的持股人被剥夺了全部实质的权力。这种区别往往在各个地方都或多或少明显地暴露出来。同样地，在英国，哈得孙湾公司规定 300 英镑一股具有一个投票权。在法国，在劳之后，印度公司的资本是 112 000 000 里弗尔，被分成了 2 000 里弗尔一股的 48 000 股和每份 200 里弗尔的 80 000 份 1/10 股。

从资本开始被划分为股份那一刻起，买卖股份就变为易事了。在 17 世纪，正如我们注意到的，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业务主要由两个荷兰印度公司的股票交易组成。

殖民公司从事的航海带来的利润差别很大。英国东印度公司把初次航海的利润投入第二次冒险；而第二次航海的利润是 195%；第三次航海的利润相当可观，并被用于第五次航海；第四次航海因两艘船只的沉没而亏本。

1609～1613 年间的另外 8 次航海，其利润率分别是 334%、221 $\frac{2}{3}$%、318%、311%、260%、248%、320%、233 $\frac{11}{12}$%。在 1651～1690 年间，公司的股息在 12 $\frac{1}{2}$%～60%之间变动，而利润最可观的时期是 1687～1736 年间。

在一个时期里，大多数公司的利润都是丰厚的，而利润的分配仍是一件不确定的事。英国和荷兰应用的是同一种被认为是含混的规则：一旦出卖了一定比例的带回货物，而其款项已进入金库时，就必须支付股息。关于利润分配，劳做了一项创新，即建议支付 7 $\frac{1}{2}$% 的固定利息，外加一种可变化的股息；一般意义上利润的分配取决于公司领导者的决定。

在整个旧制度期间，所有国家在资本的使用上，都在一系列的尝试中表现出犹豫不决。甚至在 18 世纪，在资本使用上，仍没有显示出某种规范一致的方法。

在这些国家里，行政机构的发展同样是缓慢和尝试性的，甚至对那些更[259]大的公司来说，尽管它们的重要地位促使其进行革新，情况也是如此。因为这些公司的先驱者所采用的原则并不具备榜样的价值；冒险商公司的总部，尽管在伦敦商人占有优势的情况下，仍然分裂为伦敦商人和外港商人两部分，而且其正式机构甚至不在英国，而是在欧洲大陆的某个港口。

英国东印度公司是第一个获得海外贸易特许权的公司，它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一种近代组织形式。公司的最高当局是一个“业主委员会”，还有一个由 24 个“助手”组成的“委员会”，其成员由“业主委员会”任命，它在一个行政长官和一个副行政长官的权威之下指导公司的事务。公司成员划分为几个各自负责专职的委员会。

荷兰公司以一种更为经验主义的方式来组织。就航运公司（Voor-compagnien）来说，由 72 个董事负责联合公司的领导。稍后董事的数量减少到 60 人，这些董事成员的数目（bewind-hebbers）是按照各个商会所投入的资本来分配的：阿姆斯特丹 20 人，米德尔堡 12 人，代尔夫特和鹿特丹各 14 人，霍恩和恩克赫伊曾共 14 人。他们推选一个成员为 17 人（de Heern XVII，亦即 Zeventien）的“长老会（college）”来管理公司。持股人从一开始即分为两类，这种分类在 1623 年开始明确化，在 1647 年则正式化；只有

最大的投资者才享有真正的权力。对各个商会的控制实际上是市政或行省当局的一种职能。

我们对商会的自治达到何种程度已有所了解。他们之间的相互来往一直缓慢而艰难，而它们与 17 人长老会的关系没有共同的形式。17 人长老会在觉得必要时就聚会，一年很少超过 3 次。尽管如此，大约自 1640 年起，在这些难以调和的机构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联系。公司拥有自己的事务官（solicitor）；1652 ~ 1706 年是皮特·冯·戴姆，他自 1693 ~ 1701 年写的 Beschrijving，是公司历史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在海牙，他周围，有一个秘书处，不久以 “de Haagsche Besogne” 的名称而知名，它专门负责特别是与殖民地的联络，负责支付红利和其他有关共同利益的事务，特别是那些要提交给 17 人长老会的账目和报告。此外，阿姆斯特丹商会每 8 年中有 6 年行使主席资格，它还习惯性地对与公司的整体利益有关的任何事务进行干预，这不仅对公司的发展具有一种持久的影响，而且使公司的发展具有连续性。

事实上，17 人长老会，还有富有的商人阶层［公司董事会成员（the bewindhebbers）正是从其中产生的］在两个世纪以来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管【260】理公司的，管理不仅是稳定的，而且也几乎是秘密的。

荷兰西印度公司建立于 1621 年，它具有类似的机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领导者是 19 人，而且其中有一个是三级议会的正式代表。

由柯尔贝尔建立的法国公司仿效的是大型荷兰公司，由于出现稍晚，它们的管理能够组织得稍好一些。我们知道，柯尔贝尔时期法国的东印度公司的机构曾被人们设想为什么样，也知道它实际上是什么样；在行省建立起的 5 个地方商会应该每 6 个月把有关其活动的报告交送总管理公会（the Chambre de la Direction générale），持股人全体会议应该每年举行一次；要想在公司里获得一个投票权需持有 6 股，而要想有资格被选入某个商会，在巴黎需持有 20 股，在其他行省需持有 10 股。巴黎的 12 个董事由持股人任命，他们由 9 个来自行省的董事来辅助；董事的任期是 7 年，轮流卸任。每个商会有一个出纳，一个秘书，一个账簿保管员（均由持股人选出），每年都要向董事们提交一份账目综合报告，并且所有认捐者都能得到这份报告。由董事管理的部门或协会承担着日常事务。账目被细分为 9 个专门的账簿。在 1668 ~ 1669 年间，柯尔贝尔亲自关注公司的秩序，以便规定每个董事的任务，并详细规定他们必须每周为公司工作 4 天，每天的工作时间是下午 4 点到 7 点。

在 18 世纪的公司里，职员的数量往往过于庞大，而其职责也得到更为详细地划分。西方公司（the Compagie d' Occident）只有 6 个董事，由国王

任命。而在 1719 年，印度公司则有 30 个董事，在 1724 年降到了 24 个，也全部由国王任命。

这些董事管理着各个专门的部门。董事们则由皇家事务院的特派员管理。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1723 年，当它在劳体制之后被重组时，它被直接置于印度事务院的管理之下。

通过所有这些重新调整，董事越来越成为纯粹的官员，或成为持股人的代表，他们或多或少是由国王直接任命的。在北欧国家，公司是由政府直接【261】建立的，其管理一律是由政府机构来进行。

宗主国的行政当局将其权力扩展到海外殖民地，其措施不仅明显表现出试验性，而且显得很是多种多样。

显而易见，对那些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殖民地的机构和行动的人必须予以分别考虑，他们直接地代表着国家。纯粹的经济任务仅仅是笼统地区别于政府的职能，而且在各个地方都（实际上并非总是合法地）受来自上面的、总督所控制的管理部门的直接约束，并且根据总督的命令，由官员和职员群体所控制。在法国，直到路易十四时期，职员、总督、行政长官或副长官和监督人的人员框架，才被用来代替由公司任命的人员。特别是在加拿大和安的列斯更是如此，而且，最初它所采用的只是一种断断续续的方式。

一般来说，大型公司自己组织它们的服务。第一个将其各个部门统一为一个单一机构的公司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甚至这家公司多年来也表现出相当多部门化。在其早期岁月，它只在印度洋拥有几个孤立的据点。1609 年，根据与三级议会的协议，该公司设立了一个总督，而且很快就习以为常地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来任命它。荷兰东印度公司在美洲的机构显示出相当程度的多样性。

在法国，重要的公司都仿效荷兰东印度公司；事实上，他们同样任命自己的总督，不过他们需要国王的同意。在一般的公司中，地域和据点的分散导致了局部地区长官的设立，这种长官或多或少地在总督的控制之下。这些领导者中有许多人由委员会或协会来辅佐，它们之中有些是“独立的”，有些仅仅具有地方性的有限权力。所有这类上层官员都被授予了一种权力，而特许权力则被让与给他们的公司。

在大多数公司中，在这些头领和机构之下，在各个方面行使权力（甚至在军事和司法事务方面，司法通常附属于军事）的人是“上等商人”、“商人”和“低级商人”。他们的称号（显然与其任务相适合）在不同的国家所表现出的类似程度惊人。他们由下属的补充人员来辅助，其头衔多种多

样——账簿管理员、特派员、助手等等。这些公司很少或从未建立严格的等级制度；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雇员们拥有各种各样的头衔，并非所有的头衔都总是可以在每一个据点发现。这些代理人与其公司之间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薄弱的；他们之间往往相隔甚远，而且在各个地方公司的各个级别的代表都被授予了为自己的利益从事贸易的权力，还经常被允许为最危险的对手公司的利益而从事贸易。【262】

就特许公司来说，不仅仅是其内部组织模糊不清，它们的总体特征也无法确切地予以界定。在国家机构和被授予特许权的大型企业，与那些为其私人利益而承担长距离航海风险的私人组织之间，还存在着一批具有内容多样的权利商业机构，它们达到了不同的发展程度。它们中一部分也是特许公司，只不过其重要性是次要的，有时甚至是直接隶属于大型公司，有时限于某一狭隘的地区性活动，或限于某种特殊商品的生产或贸易。它们中的其他部分，或是从国家，或是从自己的公司获得执照或有限的许可。然而它们可能拥有相当程度的权利和合理有效的组织；从 1595 年开始，一个由鲁昂和迪耶普（Dieppe）商人组成的私营公司为对几内亚、安哥拉和巴西开展贸易而建立起来，它设法在巴西沿海与葡萄牙人开战。

甚至是属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那些由国家建立的机构，也采用了授予特许权的方法，并建立起由其所控制的公司。在 1623 年，由于受到成立不久但已成就辉煌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启发，西班牙大臣奥利瓦雷斯（Olivares）用同样的名称成立了一个对葡属东印度进行贸易的公司。这个公司在位于里斯本的印度事务院的控制下工作，直到 1633 年，它仍然存在。在葡萄牙恢复独立之后，国王的一个名为 P. 维埃拉（Vieyra）的重要顾问，制定了一个创立两个公司的计划，一个是对印度的，一个是对巴西的，然而他只组建起了一个公司，即巴西商贸总公司（the Compania Gēral do Comércio do Brasil），它在 1649 ~ 1720 年间负责宗主国与巴西之间的船运垄断。另一个公司是佩德罗二世（Pedro II，1667 ~ 1683年）时期建立起来的，处理对非洲的贸易，其他公司此后陆续建立，其形式和目的形形色色。庞巴尔（Pombal）大臣（任期为 1750 ~ 1777 年）建立了对帕拉（Para）和马腊尼昂（Maranhão，1755 年）贸易和其后的对伯南布哥（Pernambuco）和帕拉希巴（Parahiba，1759 年）贸易的新公司。在西班牙，政府对公司和对私人都授予了许多垄断权，特别是在向美洲殖民地运送黑奴方面的垄断权，其中，作为所授权力对象的这种私人既包括本国人，也包括外国人。

而即使是在两个伊比利亚王国，私人企业也找到了公司运营的方法，在【263】

所有其他国家情况也都是如此。在法国，几家中国公司从更为庞大的东印度公司分裂出来，其中的第一家（成立于 1660 年）像其母公司一样消逝了。第二家（成立于 1698 年）是根据专门限制那些现有公司权利的皇家法令而创立的。连续成立的塞内加尔公司和南海公司（也许是相互派生的，也许不是），像贩奴公司（Asiento Company）一样，是从事奴隶贸易的，它们之间有着紧密的结盟。而且由于各种原因，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即这些特许权对已曾授予的特许权造成了侵犯。

至少是在 17 世纪初期，在所有国家，私人市民能够从特许公司获得授权而从事某些方面的贸易。在 1682 年的法国，东印度公司对一个“商会”（société）授予了使用自己的船只进行贸易的权利，不过需要收取的费用占其所运货物价值的 10%。在 1701 年，在资金已经具备的条件下，国王在几内亚公司内部建立了一个金融家小组，负责批准任何想参与奴隶贸易的商人。所有国家的公司都采取了类似的特许权制度。

从这些多样性可以再次明显看出，贸易机构是试验性的。同样明显的是，这些似乎被明确的规则（例如特许状及其所授予的权利）所约束着的方式，却为不确定性留下了大量空间。

这种普遍的不确定性说明了特许公司是不稳定的和数量众多的，也说明了其权力和活动的多样性。仅对法国而言，在 1600 ~ 1789 年之间，已知的 75 家公司显然是不完全的数字；对东印度的有 7 家，对中国的有 3 家，对加拿大和阿卡迪亚（Acadia）的有 6 家。有些公司的规划和手段是有限的，或者是严格地隶属于政府当局，在伊比利亚国家尤其如此；有些公司成了“国中之国”。这些公司是多种多样的，但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它们是白种人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扩张时所找的第一种手段。它们在开发新世界财富的方式方面，同样表现出了多样性与一致性的反差。

4.4 新世界的经济发展

在海外领土上，经济发展的方式依土地是直接由国家控制，还是被国家【264】授予给公司的情况的不同而不同。它们同样依土地是否有足够的居住人口而不同，而且，依照海外领地的产品是否与宗主国的产品形成互补而不同。

在相当一个时期，所有海外企业都在同一个指导原则的管理之下，它们首要的目标是获得财富；这些公司通过贸易来实现这一目标。甚至在 18 世

纪，克莱夫（Clive）和杜布雷（Dupleix）所遭遇到的来自各自公司的困难也是由于没有接受董事和持股人的这一基本观念。在18世纪中叶，东印度公司的一个行政长官写信给董事委员会说，他把自己的货物置于优先地位。拉·布尔冬奈斯（La Bourdonnais）把杜布雷称为“这个商人”。总控制官希尔霍特（Silhouette）在伦敦宣称“对公司来说，使它成为在印度的军事力量是不恰当的，而是应把它限制于商业目标”。在1756年，在凡尔赛的政府宣布“在最终的意义上，安的列斯仅仅是一个贸易机构”。

的确，自地理大发现之后，美洲的广袤的土地向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敞开了。在此后的16世纪，对其他殖民国家来说，它是一个建立广阔定居地的诱惑和机会（在17世纪）。但是，同样正确的是，在伊比利亚国家之后，没有国家试图在亚洲攫取疆土，或在亚洲建立一个帝国及其保护地。161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送达其代理人的指示明确地命令他们培养与当地国王的友谊，以便获得贸易上的便利。在17世纪“荷兰人全力以赴地避免在大陆建立机构”。而且在150多年的时间里，这个大型公司仅仅拥有分散的据点。甚至当它达到其力量的顶峰时，它也只不过是局限在巴达维亚（Batavia）及其周围，在锡兰的寥寥几个据点，以及在好望角行使直接的管理。荷兰公司具有典型性，只是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期间，在形形色色的条约和结盟的形式之下，荷兰、英国和法国等帝国才开始形成。在这些帝国的旁边，排列着其他欧洲国家的殖民地，有些得到扩展，有些没有，有些持久，有些短命。只是在这一时期，人们才可以区别两种类型的公司，即纯粹从事贸易的公司和殖民公司。

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之下，欧洲人建立了横跨海洋的殖民地。西班牙人向美洲移民的数目相当巨大，在弗朗西斯一世和亨利二世时期，在柯尔贝尔的主持下，法国人系统地仿效西班牙人的政策，希望在其殖民地建立人口稠密的定居地。最初建立定居点的英国人是罗利，此后英国人持续建立同样的居住地，特别是在美洲。荷兰人则坚决反对任何向印度的大量移民。【265】

同样，与当地人的关系也是多种多样的：在与当地人之间的通婚上，西班牙人颇有魄力；而法国人所尝试的政策，我们今天应称之为“同化”；英国人和荷兰人则使自己与当地居民隔离开。在有些国家，这种关系受到宗教观点的影响。

就定居在新领土的人口来说，在地理大发现之后所出现的一个新生事物就是从非洲向美洲运送黑奴。自中世纪以来，这种奴隶制就从未完全消失。对美洲的辽阔地域而言，奴隶制提供了数量众多的劳动力群体，正如在古代

时期一样。大多数横跨大西洋从事贸易的公司被要求提供这类劳动力，自 17 世纪末以来，在很多国家，政府还特地为这一目的而颁发特许权。

土地的占有是按照普遍接受的原则来进行的。对无人居住土地的初次占有意味着强有力的权利要求，因为非基督徒被认为是没有土地权的。国家对特许权的享有者专门给予在土地方面的正当权利。例如，在英国，在 1496 年，亨利七世授予约翰·卡伯特这样的权利。詹姆斯一世也在 1606 年授给弗吉尼亚公司的成员们其可能发现的全部土地的所有权。在法国，1628 年，路易十三把加拿大完全（en tout proprié té）授给了百来个股东（Cent Associés），1633 年他把在美洲的若干地区授予了“康城（Caen）的威廉”的公司，同样是完全授予。在 1664 年，路易十四以同样的方式把马达加斯加给予了东印度公司。这些公司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这些土地的所有者；大约 1651 年，法国的“美洲公司”把 1635 年授给它的安的列斯群岛一点一点地出卖了，1670 年，荷兰西印度公司把苏里南岛卖给了阿姆斯特丹市。

就其自身而言，授予土地的活动来自于传统的做法。第一批探险者（其中有些人是与其追随者一同到达的）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封为国家确立的封建体制下的领主。葡萄牙的种植园主（Fazen deiros）和西班牙的种植园主（Haciendados）既是其土地的主人，也是其雇员的主人。通过把土地按照监护征赋制（encomiendos）来划分，以及通过把强征来的印第安人纳入强制性劳动（即分派劳役制 repartimientos），耕作土地的中世纪方式得以持久地存在。在加拿大，个人占有的土地是按照封建庄园制来分配的，其特征[266]一直在变动之中。在伦敦的弗吉尼亚公司里，大多身为大地主的持股人，拥有一种按其投资比例而接受土地分配的权利。有时公司为自己保留了它们已经部分转让出去的土地的所有权。因此，普利茅斯的弗吉尼亚公司在领土方面是伦敦公司的竞争对手。在 17 世纪末，这种习惯逐渐地扩展开来，很多对新定居者的土地授予是按照一种统一方式来决定的。

移民者通常是由公司以一种有计划的方式招募的，特别是在法国，很多公司在其特许权的约束下，把某一具体数目的殖民者带往其土地。这种做法可以追溯到“契约劳动力”制度；这种劳动力是殖民公司从母国带来的，他们必须为公司服务一段规定的时间，通常是一年半到三年。

特许公司，像国家建立的机构一样，在重商主义的总体框架内组织其地区的出产，并按照重商主义的支配性原则来调整其做法。所有特许公司都是为了找到传说中的黄金国（Eldorado）而建立的。这一传说主宰着人们的想

像，然而在新大陆显现出来的财富，把这一幻想转变成为一种非常不同的现实。

紧随第一次地理大发现之后的行动，最初是为了寻求香料和贵金属。在价值大小方面，胡椒不久就被豆蔻超过，然后又被丁香超过；此后，香料又缓慢地失去了它们相对的重要性，尽管对荷兰东印度公司来说（它仍然是香料的主要流通者），香料仍然是关键的。在 17 世纪黄金和白银的地位下降到了第二位，不过，去往米纳斯吉拉斯（Minas Geraes）的热潮又使生产金银的活动重获新生；在 18 世纪初，尽管是在颇有技巧的金融家克罗泽（Crozat）的管理下，法国的路易斯安那公司（Compagniede la Louisiane）仍要求开发矿藏和矿石。这些都是各公司的计划书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也是劳时代的普遍情况，同时也是一种源于观念的刺激和反映，它突出地表现了贵金属所一直唤起的希望。

有必要强调的是，大型公司经常寻求的另一种财富来源。相比于我们今天看来，海盗行为远没有那时的人们看来更应受谴责。袭击西班牙船队是海盗行为的一种，它经常或多或少是公开地与正常贸易结合在一起。安的列斯的海盗，在 17 世纪的前 2/3 的时期里都在继续着这种行动，而且这种海盗行为早已经蔓延到了欧洲海岸。

[267] 矿产财富的寻求和开发缓慢地被人们对殖民地资源的更为广泛和更有计划性的开发活动替代。最先得到开发的是具有特别价值的商品。荷兰东印度公司，利用当地政权作为其中介，以一种更有条不紊的方式组织香料的生产，并涉及数目众多的规定；它经常下令毁掉那些超过市场需要的庄稼，即使这些庄稼是它自己下令种植的。在安的列斯的法国公司，像其外国竞争对手一样，大规模地扩大了甘蔗的种植；1698 年殖民者被命令放弃甘蔗而种植烟草、可可、靛青。很多情况下，公司像其政府一样，为自己的利益把大片地区用于种植同一种作物，而欧洲市场的状况并非总能为这些作物产品提供令人满意的销路。从一个大陆到另一个大陆的移植扩展了作物和商品的产地，而它们此前则被限制在多少有些孤立的地区。甚至北美洲海岸的渔业，还有加拿大的皮毛业，日益成为欧洲出口贸易的正常补充，而且重商主义者试图保持这类贸易的平衡并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

工业活动同样破坏了传统的生产秩序，与之相伴的是一段对观念的检验时期，而这些观念也是处在变化之中。在一般意义上，这种由贵金属的流入而产生的巨大而多样的变化对特许公司的影响，要小于这种变化所引发的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商行的影响。

然而制造业却提出了多种问题。一般而言，这个行业的公司与母国的经济界紧密地联系着，它们没费多少力气就把旧工业移入殖民地；荷兰人有意地避免这样做，而英国法令则设法阻止殖民地工业的增长。然而 17 世纪法国开始授出特许权，特别是对加拿大的特许权，组织手工业者移民，并许诺给予移民者“匠师”（master）的特权，即在殖民地居住一定年限之后，有权在法国以“工头师傅”（maîtres de chef-d' oeuvre）的身份开业，这一具体年限在 1628 年是 6 年，在 1642 年是 10 年。也因此，在很多地方，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不久就陷入争吵。当柯尔贝尔时期，加拿大试图在行政长官塔隆（Talon）的统治下独立存在下去时，宗主国当局并未反对；但当在特许公司统治下的殖民者个人，试图发展蔗糖和朗姆酒工业时，国内的生产者对法国政府进行鼓动，并于 1684 年促使形成了对安的列斯制糖业的禁令。对棉花的禁止，其后对瓷器的禁止，对来自远东的古董和家具的禁止（所有【268】这些都是东印度公司的重要贸易种类）所激起的争吵和争论，不仅持续了半个多世纪，而且蔓延到了好几个欧洲国家。在英国，1733 年的一个法案禁止进口产自美洲殖民地的帽子，并且把美洲帽子生产者的雇工数限制为 2 人。当英国与其殖民地之间的斗争已经临近，而且殖民地态度坚决时，主要是出于对作为特许权发出方的自豪，查塔姆（Chatham）爵士高喊到：“如果美洲决定制造一只马靴或一个钉子，我将发动英国的全部力量来反对它”。

那种对不平等的和分散的经济进行协调的企图，在所有贸易事务中都得以极其严格而坚决地推进。国家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并因此对特许公司的活动造成了侵犯，人们一直分不清这些公司的活动是国家自身的活动还是个人的私人活动。这些公司的建立最初是为了进行贸易，而且，英国总督“把货物置于优先地位”的做法是具有典型性的。然而它们的自主性（根本上是经济性的）不得不让位于国家政权，国家打算恢复行使那些已经转让给公司的权利，并把公司的运作受置于适用于所有其他事务的同一法律之下。

当葡萄牙国王把皇家船队的垄断强加于母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所有航运时，他是第一个把贸易置于严格管制之下的人；1640 年后，一个特许公司成为这种官方事物的补充。西班牙始终禁止外国船只进入其殖民地，但存在着例外情况（很多情况下都是如此），也存在着许可证和执照，其中贩奴合同（the asientos）就是最长久和利润最丰厚的例子。使用受到控制和保护的、有护航的船队的做法，是符合那个时代的逻辑的；自 1526 年往后战争和海盗行为就支配着西班牙的政策，航运被迫只有在共同的护航下才有可能；每年有两个舰队和另一个舰队的 1/3 被派出。特许公司同样为其绝大部

分的长距离航海派遣数艘护航船只。

这种管制很容易得到推行，因为长时间以来船只一直是其船长的财产，他们迫切地需要确保航海的安全。从17世纪中期以来，法国公司一直设法在荷兰建造它们的船只，或是购买荷兰船只，这是因为荷兰造船厂的技术更胜一筹。像绝大部分商人一样，公司并非总是其船只的所有者。甚至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直到17世纪下半叶仍没有努力去拥有船只。

然而，所有公司都尽其最大努力去维持其贸易上的垄断，这种垄断是由其特许权所允诺，它在所管辖的地区享有的。在旧制度时期，在殖民地所有[269]问题组成的历史中，最为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公司垄断和国家垄断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是经济性的也是政治性的，并依赖于那时被称为独占贸易（l'exclusif）的和后来经常被称为“殖民契约”的制度。对柯尔贝尔来说，从荷兰人手中夺取安的列斯贸易，是其政策的一个重要成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垄断在范围上是不相同的，有些垄断是世界范围的，另外一些是地区性的，垄断的范围显示出公司的权力是不相同的。

从17世纪末以后，公司的地位变得更加复杂了。在法国，在1698年和1727年的法令之后，“殖民契约”得到更为严格地执行。在英国和荷兰，公司或许更愿意向个人或私人公司颁发执照和许可，不过，在这两个国家对待外国人的政策中，除此之外，却没有更多的自由。

特许公司的运营要依靠各种司法和经济条件，并与重商主义体制结合在一起，这使得划分不同贸易区，和使公司具有其专门的管理模式的做法，似乎具有了合理性。一方面是欧洲和卡纳里斯之间的贸易，另一方面与马德拉之间的贸易，它们二者一直都享有某种特殊的地位；在公司和国家规定方面，奴隶贸易引起了纷杂混乱和相互抵触；安的列斯和美洲大陆之间的关系受支配于各种不同的规定。美洲与远东之间的航海一直受制于特别严密的规定。在南亚，欧洲人碰到了一种或多或少是有组织的贸易关系体系；阿拉伯人、印度人（袄教徒）和中国人在印度尼西亚和南部印度的港口彼此相遇；他们四处走动，对所有公司来说，“从印度到印度”的贸易是他们活动的一个富有成果的方面。

公司多方面的活动一直与国家的外交和立法相交叉；而且，从17世纪中叶以来，尽管重商主义占据统治地位，这两方面并非总能相和谐。此外，由公司和国家取得的成果，总是被无照经营者的走私贸易（经常由外国竞争对手所组织并经常由其政府所维持）所破坏，而且，同样也会毫无例外地因公司授予其代理人的许可证而陷入麻烦，这种许可证允许他们自行其是

地从事贸易。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对整个经济以及对所有公司都会产生影响：用金银【270】付款的问题。它与贸易平衡这一更大的问题相联系。硬币主义在各个地方都被接受，由此各地禁止金银的出口。在所有国家，殖民地贸易都招致了强烈批评，在这些批评中，批评者们以最强烈的方式大声疾呼，反对把金银从母国带出。查理五世早就谴责过葡萄牙人把基督教的财富运往异教徒的国家。贯穿 17 世纪，在整个西欧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都十分激烈；在很多情况下，众议院对输出金银的公司进行谴责，在 18 世纪，笛福和伏尔泰在这一问题上也持有这种反对观点。而公司的支持者徒劳地反驳说，从长远来看，它们的贸易会为国家带来净收入。这一争论直到 18 世纪下半叶仍未结束。

4.5 公司的终结

18 世纪，控制欧洲国家与其殖民地关系的机构不断地遭到破坏，而与此同时，殖民地自身的经济状况也经历了变化。早期体制的崩溃是从自由主义运动开始的，它发生在大陆国家，其结束则是由法国大革命及其后继运动促成的。

对公司授予的垄断权一直遭到强烈反对。在英国，各个港口有着互相嫉妒的传统。从 1604 年起，下院对以伦敦为中心的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提出抗议。在法国，三级议会（Etats-Generaux）对所有贸易垄断的建议都予以反对；地方商人甘冒风险和危险进行世界各个大陆的探险，也一个接一个坚持不懈地抗议特许公司的创立。在荷兰情况则有所不同：荷兰东印度公司是处于强烈竞争的各团体之间妥协的结果，而且其董事对他们的共同利益有一种非常明确的意识；他们属于同一个阶层，这种阶层的同一性使其国家的政治方针和经济活动得以统一——不过它不久就陷入寡头政治的错误之中。

在 17 世纪末和 18 世纪初，在各处都可看到抗议。1688 年，在英国，因为有一个私人公司提出要经营与北美洲的贸易，一个已经建立的、资本为 100 000 英镑的公司没能获得特许权。不久，欧洲国家海外殖民地的发展也【271】对习惯的做法形成挑战，并阻止了传统规定变得更紧。殖民地赢得了某些贸易自由，它们创立了自己的工业。而思想领域的运动［有法国的重农主义者和古尔纳（Gournay），以及英国的亚当·斯密］坚定不移地倾向于自由。

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各个欧洲机构（包括特许公司在内），由于经济自

身的发展而过时，在海外机构和在母国都是如此。特许公司不再有能力使自己适应形势，更谈不上控制形势。所有公司都迷失于其官僚机构自身的复杂性之中，偏袒的做法使各个层次的滥用职权成倍地增加。在其所面对的巨大任务面前，其装备及管理方面的不适合，注定了它们要分散地，并且是缺少成效地使用其力量：尽管并不稳定的股息分配有时是丰厚的，而公司的存在却变得靠不住了。它们的核心的商业目标过分局限于使殖民地能够有效地生产。国家最终注定要接管殖民地的政治机构，而私人市民则在国家的指挥之下开发殖民地的资源。

国家与那些被授予权力和特权的团体之间的冲突缓慢地发展着，并且，在英国殖民地事务中，它们首先达到某种至为激烈的状态。从 1619 年、1625 年和 1633 年，弗吉尼亚公司仍然保持着它的权力，它把方向转向北美洲，除了是一个商业公司之外，它实际上还成了一个独立的地方政府。政治权力变得越来越重要；国会一直不断地忙于殖民地事务。18 世纪中叶，国会对在印度发生的滥用职权进行了调查，并在 1773 年通过了管制法案，1784 年通过了印度法案，对东印度公司进行了重组，使其隶属于国王。

在法国，可能是 1670 ~ 1672 年，柯尔贝尔政府走向对西班牙的模仿，即建立一种综合管理体制。或至少也是建立一种对在此之前相对独立的殖民地活动的监督体制。如果说一方面他保留东印度公司，那么另一方面他支持解散西印度公司，并将其土地分割开；他把加拿大置于国王管制之下，把其余土地分割给更小的公司。在建立圣多米尼哥公司（the Compagnie de Saint-Domingue）的同时，他任命了一个马提尼克主管委员会（Conseil Superieur for Martinique），而且在安的列斯的各个地方，这个公司的雇员直接为政府服务。在 18 世纪，印度公司经过劳的重组，在几经兴衰之后，几乎成了一个政府机构。它在战争期间遭逢不幸，它在与英国公司的竞争中生不逢时，还有，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也对它进行攻击，所有这些使它在 1769 年被废除。在 1785 年，一个新的公司建立起来，使用同样的名称，并由政府直接控制；但它也在 1793 年 10 月被废除。【272】

在荷兰，荷兰公司时常在认可国家权威的同时，又设法保持住了很大程度的自主。但是，从 1726 年开始，它在贸易上持续亏损并变得日益弱小；在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时，这家公司连一艘船都不再拥有，并在 1784 年向其英国对手出让了在其领土上的贸易权，而且一点一点地放弃了它的土地和权力。在 1790 年，一个新的公司组建起来，却没能取得成功，在 1796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仅仅保住了爪哇和特尔纳特（Ternate）的所有权。此后，在

1798 年，巴达维亚共和国废除了这个公司并吞并了这个建于 1602 年的曾经辉煌的公司的可怜的一点剩余。

在大型公司中，英国东印度公司一直持续到 1858 年印度起义时才被废除。英国中心市场公司和布里斯托尔与约克郡的冒险商公司多少还存在着；而哈得孙湾公司则仍在积极地从事贸易活动。

当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国家被拿破仑的军队占领时，它们的国家机构也就消失了。

4.6 结　论

白种人的扩张改变了这个世界，而且对世界经济的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方法上的不同，乃至这一时期所发生的从已经取得的成就上的倒退，见证了旧制度时期欧洲各个部分的区别和不一致。甚至像特许公司这样最为活跃的企业，其管理上的缺陷也表明，其所采用的方法，是一直持续到近代以前的古老的经验主义，而且还表明，使这种方法发生改变的发展进程是缓慢的。

在最早经历地理大发现的两个国家中，国家既控制着新世界的政治机构，也控制着经济发展，如果说这一点是正确的，那么同样正确的是，那些在国际政治上成为主要势力的各国，都是通过国家授予特许权重新恢复国家与私人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且，这些国家后来的发展使得它们在各个地方恢复它们已经授出的权力，并且在近代殖民体制之下把处理新地区问题的方法统一起来。【273】

相应地，经济的发展缓慢地导致欧洲与其海外殖民地之间形成更合理的联系组织，而同时所有大型公司的内部结构都进行了重组。欧洲利益的主导地位得到了愈来愈多的强调，欧洲国家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被置于越来越紧密的管理之下。殖民地经济尽管多年来一直处于从属地位，但仍然形成了自己的特征；同时，它们的需要和要求也同样不能被忽视。

反差变得不太重要了。日益方便的交通在经济增长和思想联系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白人移民构成的人口最先要求自由，首先是在经济的基础上，然后是在政治上。多边贸易使过去隔离的经济之间有了联系，而且非常缓慢地趋向于一种世界经济的建立——即使在今天它也仍是很不完善的！组织方式越来越依照同一种模式。昔日的公司，连同它的一切不平等，缓慢地让位于在各个地区形成的结构都相似的机构。到工业革命开始时，人们几乎无法把一个工业或商业机构与其竞争对手区别开来。【274】

第五章

农作物和牲畜

人们不应该认为，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在引进新的农作物方面，欧洲农业是停滞不前的。亚历山大的征服，阿拉伯人的入侵，十字军东征，依次使欧洲人熟悉了许多外国产品。自从基督教时代开始，欧洲引进的农作物包括：水稻、高粱、甘蔗、棉花和几种柑橘类植物；在动物方面，水牛和蚕在南欧已经有了经济地位。这些引进中有一部分是近代才完成的。水稻和棉花只是在15世纪才从西班牙到达意大利，荞麦在法国的传播也是在这同一时间；蛇麻草在北欧缓慢地传播，直到16世纪早期才在英国种植，就在当时，英国人的酒类消费，第一次在浓啤酒（ale）之外又加上了一般啤酒（beer）。

15世纪的欧洲人对农作物引进的潜在价值有充分的认识。有一类农作物其本身的生产非常不足，这就是香料。它在北欧特别为人所需要，在那里，干制和腌制的食物是人们冬季膳食的必不可少的部分。为了满足这一需要，亚洲的香料经由陆路进口，但花费巨大。当我们发现，在1563年加西亚达奥塔（Garcia da Orta）的记录中，100磅的锡兰肉桂的价值是10磅黄金时，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早期的探险者把黄金和香料的寻找联系在一起。植物类药物是其追求的一种附属目标；像大黄这样一种备受重视的药物

不得不从亚洲进口，而且在 1542 年的法国，其报价是肉桂的 10 倍。佩雷斯（Peres）是第一个被选派到中国的葡萄牙大使，他于 1517 年到达。他是一个药剂师，期望从中国带回有用的植物。

只是，在这一事件中，很少有重要的植物被从亚洲或非洲引进到欧洲。正是未经预料的美洲的发现，才改变了世界农业的地图。当哥伦布及其后继者熟悉了美洲的农业时，他们发现旧世界与新世界共有的作物只是棉花、椰子和一些葫芦属植物。那里为美洲之外所不知晓的作物包括：玉米、木薯、马铃薯、甘薯（至今或许还没有传至一些太平洋岛屿）、花生、法国豆、烟草、可可、菠萝和西红柿。狗是两个半球惟一共有的家畜；此外，美洲居民只是部分地驯养了美洲驼、几内亚猪和火鸡。【275】

因此，已知世界的潜在的植物资源一下子增加了 1 倍。随之而来的农作物与牲畜的传播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影响之一，而且可能是地理大发现的所有影响中最为深远的一种。没有美洲的作物，欧洲不可能有能力像后来那样养活那么庞大的人口，而且旧世界的热带地区不会如此之快地得到开发。没有欧洲的牲畜，特别是用于运输和耕作的马和骡，美洲大陆不可能以它已经发生过的那种速度被开发。然而这些进程不是突然的，而且也不是全部都发生于我们正在探讨的这一历史阶段。有些最重要的引进，例如引入亚洲的橡胶和金鸡纳树，以及引入西非的可可，是直到 19 世纪才发生的，而其他物种的引入一直延续到现在。

5.1 欧洲农业中的作物引进

把欧洲农业的引进作为开始是合乎道理的，因为其对当时的欧洲人的影响是最直接和最明显的。葡萄牙人沿非洲海岸的早期探索，只产生了一种具有直接利益的作物，即伊甸园谷物（Amomum melegueta）。它们在欧洲已经被当作胡椒的替代物和用来制作一种被称为 hippocras（一种姜汁式的补身葡萄酒——译者）的料酒。而现在它们可以比经横穿撒哈拉的陆路运输更为廉价地得到，这种贸易使其得名为“谷物海岸”；然而这种谷物不能适应欧洲的气候。葡萄牙人在东方的进一步探索，同样发现了丰富的植物物产，但并没有导致任何重要生物的引进。

美洲农作物的情况是非常不同的；但即使这些作物的引进也是缓慢的。有些作物，像玉米和木薯，是哥伦布初次航海至此时就发现的，它们得到了

广泛的传播；其他植物，如可可，直到人们进入中美洲才被发现；还有一些南美洲内陆土生的植物，如马铃薯和西红柿，则是直到秘鲁被征服时才发现。

玉米是哥伦布在初次美洲之航时带回故土的，并在1494年意大利出版的一个小册子里得到过描述；不过第一份受到广泛阅读的关于玉米的描述材料，是1511年彼得·马蒂尔所写的。最初它在欧洲被当做是花园里的新奇物种，不久就被给予了农作物的身份，并迅速地传播开；在1532年，一个【276】当地种植的样品被植入意大利的标本馆。由于这一时期有从西班牙前往穆斯林国家的大批摩尔人难民，玉米和其他美洲作物向北美洲和土耳其帝国的迅速传播得到了促进。另一株标本室里的玉米样品，1574年在尤夫里特（Euphrates）被收藏。在西班牙国内，玉米的初次种植是在瓜达尔基维尔河谷。然而它在西班牙南部和葡萄牙南部的经济重要性，因为这样一个事实而受到限制，即由于它必须在夏季种植，它所需要的灌溉用水如被用于其他作物，则收益更大。而在17世纪期间，玉米传播到了西班牙西北部和葡萄牙北部的更为湿润的山区，彻底改变了那里的农业和膳食，取代了裸麦和粟（Panicum miliaceum）。在意大利，它的产量同样被认为超过了当地谷物，并在18世纪的上半叶成为主要作物。同样，在18世纪，它成为移植到摩里亚的作物，直到大约1700年，在包括目前的罗马尼亚在内的地区（这个国家后来成了欧洲主要的玉米产地），还没有有效地引种玉米，而此后开始引进。玉米据说是由意大利和土耳其商人引入的，所以看起来，这一作物是同时从东方和西方到达欧洲的。玉米被引种之后，迅速地被农民作为一种主要的膳食品种。然而，在南斯拉夫（今天的另一个重要的玉米产地），19世纪之前，玉米一直没能从园艺植物提升为田野作物。在食物上对玉米的过分依赖，悲剧性地伴随着糙皮病，这种疾病的发生原因是缺乏维生素。1703年在西班牙的阿斯图里亚斯，它第一次得到记录，稍后在意大利北部被记录。

哥伦布在引入玉米的同时，也把甘薯（ipomoea batatas）引入了西班牙。也许是借助于它的春药作物的名声，不久，它就成为流行的园艺植物和次要的农作物。它无法在更北的地方生长，不过，在16世纪和17世纪，英国以昂贵的价格从西班牙进口了一少部分西红柿。

烟草植物也是经由西班牙和葡萄牙第一次引入欧洲的。在1561年，让·尼考特作为驻里斯本的法国大使，把从佛罗里达进口的烟草种带回法国。在巴黎，它的叶子作为治疗多种疾病的秘方很是流行。它被用于鼻烟，或糖浆以及其他煎药。吸烟的习惯是由英国人第一次引入的。烟叶被带入英

国至少是 1587 年，由五花八门的描述，它的引入归在霍金斯、德雷克和莱恩的名下。然而，通过以自己作为示范而使吸烟成为时尚的是沃特尔·拉雷[277] 赫爵士。这种习惯传播得如此迅速，以至于保罗·汉斯奈尔 1598 年访问英国时写道，“英国人在不断地吸烟”。荷兰人和德国人不久从英国人那里学会了用烟斗吸烟的习惯。另一方面，西班牙人直接从印第安人那里接受了雪茄的使用。大约直到 1796 年，在汉堡，抽雪茄的风尚导致了在北欧建立了雪茄工厂。古巴生产的哈瓦那式的外卷烟叶成为一种珍贵的商品。在此之后，经过较长时间，荷兰对雪茄烟叶的需求导致了在苏门答腊形成了类似形式的生产。

法国人还是把某些植物引入欧洲的先行者。卡蒂尔在 1535 年发现了在加拿大种植的大豆（phaseolus Vulgaris），并很可能把种子带回了法国；无论如何，英国人最早是从法国人那里得到它们的，并从此称之为“法国豆”。菊芋是 17 世纪早期坎普林和莱思卡波特从加拿大带回来的。那时欧洲缺少一种美味的根茎作物，仅仅由于这一原因，它在法国成为一种流行的作物。在 18 世纪期间，这些东西在法国很可能比马铃薯的种植更为广泛。

到 1573 年，马铃薯（solanum tuberosum）在西班牙得到培育，那时塞维利亚的桑格（de la Sangre）医院在购买粮食时将马铃薯算在范围之内。1588 年在意大利它被记录为一种移植的园艺植物。然而，它在北欧的种植很快就超过了南欧。植物学家克劳修斯在 1588 年得到了由教廷使节的随员带入比利时的马铃薯的块茎。不列颠群岛独立地从美洲引进了马铃薯，这似乎是没有疑问的。然而传统上认为是拉雷赫把马铃薯带入了爱尔兰，这在今天却不能在历史学上得到证实。1596 年杰拉德必定在其伦敦花园内种植过马铃薯。然而这种新作物在爱尔兰的传播要比在英国快。在其引种之后的 50 年之内，它成为爱尔兰绝大多数人的主要食物品种——这是所有美洲植物中在欧洲被接受得最快的一种。其他地方对马铃薯的接纳多少有些缓慢，这部分地可以从这一事实得到解释，即就那时的品种来说，马铃薯块茎既疙疙瘩瘩又有深孔，与现代的经过改良的圆而光滑的品种相比，去皮时更为费力。

在美洲的水果中，菠萝在 16 世纪和 17 世纪在欧洲被展出，但是，直到 17 世纪末它才作为水果而种植。在 18 世纪期间，这种水果成为法国、英国和荷兰的富人在其温室里种植的非常时髦的品种。西红柿是 16 世纪引入欧[278] 洲的，并在南欧得到固定培植。在北欧国家，这些水果令人奇怪地几乎没有引起兴趣，在 18 世纪末的英国也很少得到种植。惟一一种易于在欧洲培育

的调味植物是美洲辣椒（红辣椒或干辣椒）。根据福柯斯（Fuchs）的记录，1542 年人们在德国种植它的样品；在 16 世纪下半叶的西班牙，它的种植变得非常普遍；在英国，1597 年以前由杰拉德种植。这种辣椒对南部欧洲食谱形成了重要补充。

在相当早的时期，某些美洲树种在英国得到成功种植：金钟柏（*Thuya occidentalis*）的种植是在 16 世纪；泽柏（the swamp cypress）和雪松（pencil cedar）的种植是在 17 世纪。但是，那些目前在商业林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树种向欧洲的引进，大部分是迟至 19 世纪的。

火鸡是惟一一种在欧洲找到了经济地位的家畜。它的英语名称（turkey），正如几内亚猪一样，显示出我们的先辈在关于它们是从何处被引进的问题上，其观念是多么模糊。火鸡是西班牙人第一次引入欧洲的，它的传播非常迅速，到 16 世纪 30 年代来到了英国。图瑟尔曾提到，早在 1573 年火鸡就已是流行的圣诞食品。

有些重要的家畜引进，同样是从旧世界向新世界的引入。英国纯种马的基础是由 1689 年的“突厥的比尔利（Byerley Turk）”，1702 年的“阿拉伯的达利（Darley Arabian）”和约 1784 年的“戈多尔芬的巴布（Godolphin Barb）”的引入而奠定的。当欧洲人到达中国时，他们发现，在这一最先把猪驯养的地区，发展了一些有用的品种。由于英国人在 18 世纪对家畜改良的兴趣，中国的猪在约 1770 年被引进，而在 1800 年被记录为“在英国十分普遍”。它们在某些英国现代品种的身上留下印记，特别是“中部白猪”和“伯克郡猪”。这两种猪又被运往世界的其他地区。

5.2 欧洲农作物和家畜向海外的引种

欧洲农作物和家畜向海外的初次引种是向安的列斯群岛。在 15 世纪期间，西班牙人很可能把自己国家的甘蔗带到了加那利。葡萄牙人则是把它从西西里取回后再在马德拉种植的。在这两个地方，兴旺的制糖业很快就发展了。哥伦布在 1493 年正是从加那利把甘蔗秧带到了伊斯帕尼奥拉岛。现在我们无法确定它是否成活下来，不过下一批甘蔗秧又被送出，而且在 1506 年制出了第一批糖。【279】

葡萄牙人同时把几内亚湾的圣多美变为殖民地，在那里，到 1522 年有 60 个制糖厂，加上马德拉的糖产量，使得葡萄牙成为那时主要的产糖国。

1526 年巴西糖在里斯本支付关税，然而直到 1532 年，仍有关于从马德拉向巴西引进甘蔗的记载。

不幸的是，所有引入美洲的都是那时欧洲种植的低糖甘蔗品种，与印度的“普里（Puri）”和现代西班牙的“阿尔加罗比那（Algarobena）”属于同一类型。引进者意识到了需要的是最好的原种，因为哥伦布在 1494 年写信给其国王说，“请陛下指示唐胡安·德·丰塞卡只把最好的甘蔗送到这里”，然而可供他们选择的品种并不多。只是到了 18 世纪，这种后来被称为“克里奥尔”的甘蔗，才被产量高出许多的高糖甘蔗或更“贵重的”甘蔗所取代。每公顷低糖甘蔗的产糖量很是低下，这使得必须占用更多的土地，这也是欧洲国家贪婪地竭力寻找适宜土地的原因之一。

哥伦布在携带甘蔗的同时，还带着更为普通的西班牙农作物的种子，但这些作物在当时并没有成为重要的作物。为了在美洲建立酿酒业，葡萄在多次探险中被重复引进，这提示人们，那些引进者不仅有成功，也有失望。温带谷物在美洲的移植不属于目前我们所讲述的事物，因为它们在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世纪里，还没有进入美洲之外的贸易或影响到欧洲经济。

欧洲家畜向美洲的转移，具有更多的重要性，因为就这一农业分支来说，美洲大陆几乎是完全缺乏的，而作为引进的结果，一种更为直接的贸易也发展起来了。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把欧洲家畜引入马德拉、卡纳里斯和亚速尔这件事上已经有了经验，尽管这在生态方面是一个苦涩的教训。兔子被引进马德拉群岛的波多一桑多岛，对当地的植物的破坏如此巨大，以至于到了大约 1420 年人们抱怨，在那里不可能再进行耕作。

葡萄牙人同样特别积极地把猪和羊带到岸上，并在无人居住的岛屿上任其繁衍，在那里，它们可能对船只的粮食补给和失事船只上的水手有用。仅以圣·赫勒拿岛为例，卡文迪许在 1588 年来到此岛时报告说，那里有数千只山羊和“大量的猪”，还有从美洲引进的火鸡。在其他情况下，引进并不【280】是有意的，而是动物从沉船上逃走的结果。贝雷努达岛上的猪，据推测其来源就是这样的。1591 年失事的“五月”号和 1609 年失事的“盖茨”号上的船员就是靠这些猪而生存下来的，而且自 1598 年开始，新斯科舍那边的塞布尔岛上的那些得到记录的野牛和野羊也是来源于此。

哥伦布在第二次去美洲的航海时，带去了牛、绵羊、山羊、猪和家禽，在卡纳里斯（the Canaries）所属的戈梅拉（Gomera）运上岸。牛在伊斯帕尼奥拉迅速地繁衍开来，在 1520 年其数目估计达到 4 000 只。从希斯帕尼奥拉、波多黎各和古巴向西班牙的皮革和羊只的出口很早就发展起来，并且

为殖民者提供了一种重要而稳定的收入，而这些殖民者此时正在建立定居点以作为进一步征服的跳板。在 1587 年，圣多明戈（伊斯帕尼奥拉）出口了 35 444 张皮革，墨西哥出口了 64 350 张皮革，直到 19 世纪以前，南美洲和中美洲的牛群几乎一直是单一地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引进的牛种大部分是安达卢西亚黑牛和其他西班牙长角牛，它们具有较远的非洲血缘。这些牛群在赤道地区的繁衍相对来说是成功的，这部分地归功于其非洲血缘。而牛在非洲的繁育成功，又使得在美洲产生了后来著名的巴西弗兰奎尔牛（Franqueiro）和得克萨斯长角牛。阿吉雷于 1543 年第一次把牛从智利和秘鲁带入阿根廷，从而奠定了这个国家的养牛业基础。西印度地区后来引进了英国、法国和荷兰牛，并最终产生了一种被称为“克里奥尔”牛的混种牛。

在北美定居点，荷兰人把牛带入了新阿姆斯特丹，瑞典人把牛带入了其昙花一现的特拉华殖民地，这些牛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使得邻近的英国定居者对这种牛趋之若鹜；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新开辟的定居点条件恶劣，而这些那时尚待改良的英国牛却颇为适应。所有这些牛的引进都是在 18 世纪牛种改良的伟大时代开始之前进行的。

在新世界，猪的繁衍理所当然地比牛更为迅速，对征服者的探险来说，成活着的猪群和羊群是一种重要的补给。尽管如此，当冈扎罗·皮泽罗在 1541 年从秘鲁出发向东进行一次探险时，竟能携带 4 000 ~ 5 000 头猪，仍是令人惊奇的事，因为那时西班牙人进入该国仅仅 11 年。而科罗纳多在 1540 年从墨西哥向北所进行的一次探险也以类似的方式携带了 5 000 只羊。【281】

马是被引进的另一种非常重要的动物，首先是作为征服墨西哥和秘鲁的工具，它被用来恐吓印第安人，因为他们以前从未见过这种动物。在稍后的时期，当印第安人因此而养育马匹时，形势多少发生了逆转。许多西班牙人的马匹蔓延开来并在美洲的牧场上自由地繁育，而且有些印第安部落在见到任何白种人之前就已经成为出色的骑手。除了将马和骡用于运输和耕作以外，对于高卓人（gaucho）和牛仔来说，马匹是在了无遮拦的大牧场上放牧时不可缺少的东西。

在非洲和东方，则没有这种从欧洲引进农作物和家畜的需要，因为同样种类的动植物早已经存在于那些它们可以茁壮生长的地方。而且直到 1652 年，在荷兰人在南非从事农业以前，没有欧洲人作为农民在那里定居下来。荷兰人同时还带来了欧洲的谷物；对牛而言，他们使用霍屯督人（Hottento）的牛来满足需要。在这些牛里面，他们有选择地饲养了南非牛这一品种，它完全能够满足他们在拉车和牛肉方面的需要。只有在一些岛屿上是缺少家畜

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毛里求斯，法国定居者把牛引进那里，并产生了现在的“克里奥尔”牛，它比很多同一类型的牛在热带地区繁育得更好。

5.3 热带地区间农作物和家畜的流动

当欧洲殖民国家开发热带地区时，它们自然迫切地希望把输出的农作物的种植扩展到新的适宜的地区。葡萄牙人在南美洲、非洲和亚洲都拥有殖民地，这一事实使得大陆之间的引进变得更加容易。而西班牙人在其美洲殖民地之外，还拥有菲律宾这一亚洲立足点。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西班牙政府的一艘船只每年一次往返于墨西哥太平洋海岸的阿卡普尔科和马尼拉之间，这使得植物的引进成为易事。

移植的继续进行，到了一定时候，移植就导致了植物园的建立，而后者建立的目的又是为了促进植物的引进和繁衍。其中第一个植物园是荷兰人1694 年在开普敦建立的，用作为把亚洲的植物经长途远航运往欧洲的中转站。法国人 1735 年在毛里求斯的潘普利莫塞斯建立了一个植物园；英国人【282】1764 年在西印度的圣文森特建立了一个植物园，他们还于 1774 年在牙买加、1786 年在加尔各答和大约 1796 年在潘南（Penang）各建了一个植物园。北美洲的第一个植物园是由巴特拉姆（Bartram）于 1730 年在费城建立的；1781 年西班牙的查理三世派遣了一个去墨西哥的探险队，其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个植物园。作为热带作物的交流所，欧洲的植物园也起着非常明显的作用：阿姆斯特丹和巴黎早在 1706 ~ 1723 年建立了种植咖啡的植物园，1760 年，自从它成立的那天起，基尤（Kew）也建立了植物园。有一种作物，即烟草，由于吸烟被引入旧世界而立即流行起来，它的传播没有得到政府的鼓励，不过事实情况有时是与政府的意愿相违背的。穆斯林很快就把烟草从欧洲引入土耳其和波斯。到 1622 年，波斯人已经发明了吸水烟的技术。据记录，印度在 1609 年有了烟草，爪哇是 1601 年有了烟草，不久中国人从葡萄牙人那里得到了它。在非洲，据记载，在 1607 年，在塞拉利昂，烟草被广泛地种植和使用。欧洲人在作物引进上似乎经常特别忽视品种差别的重要性，不过，他们不久就认识到不同的烟草在质量上的差别。由弗吉尼亚的英国定居者最先种植的当地品种并不好，这些品种很快就被“奥里诺科”和“特立尼达”品种所取代。这后两种烟草很可能是拉雷赫 1594 ~ 1595 年在其南美探险时得到的，并通过间接的繁育传到了英国和爱尔兰，这两个国

家从此开始种植烟草。

调味料的情况则十分不同，对美洲热带地区的开发表明，那里只出产3种调味料植物：辣椒、香子兰和甜辣椒。欧洲人对这些调味料是不熟悉的，直到人们的一种口味形成了之后，它们才传播开来 。根据已有的记载，最早发生此类情形的是辣椒。甜辣椒只是大约到1601年才被引进到欧洲；香子兰直到19世纪才在亚洲种植。亚洲的调味料则备受欧洲人推崇，因为他们对其早已熟悉。不过经过考察发现，除了姜在亚洲广泛分布之外，每种调味料只是生长于某一局部地区。因此，姜是最早被带入美洲的；但是对其他调味料而言，葡萄牙人和后来的荷兰人认为，继续把它们的种植限制在他们几乎拥有其垄断贸易的地区是符合其利益的。直到1767年法国旅行家拉·玻义维尔成功地把辣椒和肉桂移植到毛里求斯的潘普里默塞斯植物园时，这种对植物的垄断才被打破。后来由他（作为毛里求斯的地方行政长官）在1770年和1772年派出的探险队，在摩鹿加人迹罕至的海岸登陆，并带回了丰富的丁香和肉豆蔻植物及其种子，其分布范围从毛里求斯到塞舌尔的留尼汪岛，以及南美洲的法国殖民地卡宴。毛里求斯的丁香工业一直保持着重要【283】地位，直到19世纪被桑给巴尔代替为止。1796年，不列颠东印度公司从摩鹿加得到肉桂和丁香并运往潘南（Penang），那里成了种植这些植物的另一个中心。

在制糖业方面，向美洲热带地区引进高糖高产的“名贵”甘蔗是一件头等重要的事。直到18世纪，欧洲的航海者开始频繁光顾太平洋岛屿，这种甘蔗才受到当地更具价值的甘蔗的冲击。据认为，在1766～1768年布干维尔进行环球航海时，已经把塔希提甘蔗带到了毛里求斯。然后这种作物又从那里传到了留尼汪岛（波旁），1792年这种甘蔗再被带到法属西印度的马提尼克。几乎在同时，1793年，布来赫船长以波旁或奥塔海特（塔希提）的名义从塔希提直接把4个品种的甘蔗带到了牙买加，它们很快就代替了现有的克里奥尔品种，并把糖产量提高到了此前不可能达到的水平。

重要的热带饮料作物——咖啡、可可和茶——的引进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因为直到很长时间以后，在欧洲才对它们有广泛需求。咖啡（最开始用于贸易的那种）是埃塞俄比亚土生土长的，不过在欧洲人的探险时代之前就已经在阿拉伯种植了。不知何时它又从阿拉伯传入印度，并由荷兰人于1658年带到锡兰，1696年它被传入爪哇。1706年一株爪哇咖啡秧苗到达阿姆斯特丹植物园，从其后代繁衍出美洲（作为最大的咖啡种植大陆）巨大的咖啡种群，直到其最近的后裔。这部分地是通过1714年从阿姆斯特丹直

接向苏里南引进而发生的，部分地是通过1716年和1723年从巴黎的皇家风景园（后来的植物园）向马提尼克的引进而发生的。其结果是，在植物学上，同一种群的变种虽缺少，却可以产生改良的多样性。据记载，可可是1560年被引入西里伯斯的，然而直到进入19世纪的很长时间，可可在其土生的美洲大陆的有效种植都是有限的。同样，茶叶到了18世纪末，也只是中国的出口产品。对于出自金鸡纳树皮的奎宁来说，也有着类似的局限性。这种药物由于在1639年治愈了秘鲁的总督夫人秦肯伯爵夫人（这种植物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而成为欧洲人流行的退热药。不过，在此后的200年里，南美丛林的野生金鸡纳树就足以满足由此而引起的需要。

对欧洲人而言，本地粮食作物的传播并没有像出口农作物那样引起那么多的兴趣。大量传播的发生似乎多少是偶然的，而且很可能是通过非洲与美洲之间运送奴隶的船只而发生的。[284] 可以理解，装到这种船上的给养应该包括玉米、甘薯、花生和法国豆（在美洲海岸时），还有高粱、薯蓣和豇豆（在非洲海岸时）。到达之后，船上的东西将被清扫，不留做下次航海之用的粮食将被出卖或扔掉；其中有些可能被当地人试着种植。无论如何，上面提到的每种农作物肯定不久就在大西洋彼岸出现了。薯蓣是美洲黑人特别普遍的粮食作物，他们中很多人来自几内亚海岸的东部，在那里薯蓣是主要食物。要想说明木薯引进非洲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这种作物的种植不是用根而是用一截茎，而且它里面总是充满粉末。这种作物据认为是引进到巴西的，因为在16世纪葡萄牙人与刚果王国有着持续的接触。葡萄牙居民可能是为了自己的需要而引进它的，因为梅洛拉在1682年描写一次刚果之行时说："葡萄牙人比黑人更多地使用薯蓣"。农作物的引进也发生在从葡萄牙到非洲东海岸的航路上，例如有记载指出，在1634年葡萄牙殖民者曾在桑儿巴尔种植玉米。

把这些新的粮食作物和烟草引入非洲的影响是深远的。到那时为止，热带非洲在世界所有农耕地区中拥有的土生粮食作物的种类是最少的。谷类仅限于高粱，几种小粒的粟，还有在非洲西部若干地区土生的"红"稻（Orgza glaberrima）。根类作物只包括薯蓣和低产量的"卡菲尔马铃薯（Coleus）"。豇豆，还有在西非的班巴拉花生，是仅有的重要的豆科植物。在引进的品种中，玉米在高降雨量地区比土生谷物产量更高。两种新的根类作物，木薯和甘薯肯定特别受欢迎，因为它们增加了种类很少的可以逃避蝗灾的作物品种数量，木薯可在地下长时间保存，对湿润的热带来说是饥荒时期最好的储备食物。这些新的作物在历史时间的进程中，肯定使成千人在饥荒

时免于死亡。它们以一种历史学家未加记载的速度在非洲大陆上传播。[①] 到了19世纪，欧洲人第一次进入到非洲内陆，他们发现这些新的作物已经完全融入到了非洲农业中。回过头去看，非洲在食物上的这一革命是欧洲经济扩张的一个更引人注目的结果。

【285】

据认为，在亚洲、非洲和美洲之间的农作物移植方面，葡萄牙人再次起了大部分作用。以某种缺乏证据的说法，椰子和亚洲水稻被引入西非，芋(Colocasia)被引入美洲，都被归功于葡萄牙人。还有，事实情况是，在引进美洲的植物当中，菠萝是在1583年，番木瓜是在1600年，甘薯是在1616年分别见于历史记载的，而它们的引进也都归功于葡萄牙人。然而在亚洲，其本土的食品要远比非洲范围更广，在接纳美洲作物方面较为缓慢，而且没有达到与非洲相同的程度。木薯（在欧洲被称为珍珠粉）只是在1736年才被引进毛里求斯的潘普里莫西斯，1786年又从那里到达了锡兰，并在1794年到了加尔各答的植物园。马铃薯（Solanum tuberosum）可能是从英国引进的，似乎是在华伦·哈斯丁（Warren Hasttings）任总督时（1772~1785年）开始在印度种植的。

在此期间，只有一种粮食作物的移植作为一种政府行为而得到明确记载。1769年陪同库克船长前往塔希提探险的科学家们显然被面包树的优点所打动，他们认为它可能成为西印度奴隶的有用的食用植物。相应地，1787年布莱赫船长（库克船长的同事）在付给奖金的情况下被派往塔希提采集植物。这次航海以哗变和灾难而告终；而布莱赫在和妻子勉强幸免身亡之后，被再次派往塔希提。他在1793年成功地从那里把面包树的树苗带到了圣文森特的植物园，同时把塔希提甘蔗引到了牙买加。不幸的是，面包树没能像期望的那样成为西印度流行的食物。

热带大陆之间的家畜转移在这一时期几乎没有发生，一些动物遗传学家推测巴西的穆哈（Mocha）牛具有非洲血缘，巴哈马的绵羊和山羊也有非洲血缘。然而即使这种活动发生过，也是非常罕见的。

概括起来说，哥伦布之后，农作物的传播直接地影响着全部热带大陆地区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经济事务，不过它们不是由这些大陆的本地居民进行的，而几乎全部是由从事自己的经济事务的欧洲人完成的。

---

① 一些被认为是关于玉米在非洲的早期记载是不正确的，因为葡萄牙语的“milho”一词那时不仅是指玉米，而且也是指其他谷物。

5.4 农作物传播的经济影响

最先对新植物发生密切兴趣的是医生和药剂师，他们试图发现每种植物有哪些具有可用于医药的“优点”。他们断定甘薯是一种春药；菠萝可以开【286】胃；豆角肯定有益于补肾。马铃薯长期不被信任，因为它与有致命毒性的茄属植物有关。加西亚·德·奥尔塔的《印度药物样本集》是第一本欧洲人写的但在东方印刷的书籍，它于 1563 年在果阿出版。如此之多的外国植物到达欧洲，在时间上稍早于对草本植物学家而言的伟大黄金时代，而且或许部分地激发了后者的出现。在 16 世纪期间，德国人福克斯、法国人克劳修斯和英国人杰拉德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关于美洲植物的最早描述和绘图。在 17 世纪，更多的科学工作是在热地地区本地进行的。赫尔南德斯在其 1651 年的《Rerum medicarum Novae Hispanae Thesaurus》一书中，第一次记述了香子兰。汉斯·斯罗兰爵士（后来的皇家学会的秘书和会长），1687～1688 年间在牙买加采集植物，并在 1696 年出版了一本关于这些植物的拉丁文目录。鲁姆修斯（1626～1693 年）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工作，他的《Herbarium Amboinense》一书是最早关于亚洲植物的优秀著作。

然而对外国植物的科学兴趣很快就被经济方面的兴趣所超越。在大规模的常销商品的贸易走入正轨之前，有一些错误的尝试。一些在 16 世纪到几内亚东海岸进行贸易的早期的欧洲贸易商，船上装载的货物是棉布和棕榈油。然而很快就发现其他地方的棉制品在数量和质量上更胜一筹；棕榈油贸易也随之衰落了，直到工业革命开始后的 1772 年才重新开始小批量地、经常性地向利物浦方向运送。巴巴多斯开始从事殖民地事业时是一个出口烟草、棉花、靛青、姜和黄颜木的地区。然而制糖业在 1642 年兴起后就取代了所有这些贸易。

几乎在任何一种特殊商品的大规模贸易发展起来的同时，热带农业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特别的问题，即相对市场而言的生产过剩。这大部分是因为这样的事实：绝大部分热带产品，在当时或现在都是奢侈消费品，其需要量是有限的，早在 1496 年，来自马德拉和加那利的额外的蔗糖导致该种产品价格下降，1498 年，葡萄牙国王马诺尔对马德拉的糖出口做了限额。早期的烟草生产陷入了同样的麻烦。1639 年由于价格暴跌而促使圣基特的英、法定居者约定停止烟草种植一年。同一年，弗吉尼亚种植者与其行政长官达成协议把当年的烟草产量限制为 1 500 000 磅，把此后两年的年产量限制在

1 200 000 磅。在调味料贸易方面，由于生产过剩，一大批肉豆蔻和豆蔻香料 1760 年在阿姆斯特丹被烧掉，以便维持其价格。在荷兰，肉桂储备在价格低落时期也被烧掉。过量生产也同样可以使温带地区产品遭受挫折，那里【287】的产品充分地供应着欧洲，而且没有哪个殖民国家愿意鼓励向那里移民。1644 年在康涅狄格，小麦的生产过剩使其价格下跌至 2 先令 1 蒲式耳。补救的办法是，指定两个垄断购买商以 4 先令 1 蒲式耳购买后再将小麦出口到海外。这些购买商并没能成功地找到市场，这一点可从那些后来发生的要求他们偿还债务的诉讼中看出。

我们已经考察了由新的农产品贸易而进一步引发的经济发展，接下来我们最好是对每一种类的农产品贸易都分别作更为详细的考察。

5.5　调味品贸易

为了理解调味品贸易的历史发展，有必要说明其中每一种调味品的产地。胡椒原产于印度南部，不过在欧洲人来到那里之前已经传到了马来西亚地区。它是调味品贸易中最重要的大宗品种，也是早期欧洲与印度之间的贸易主要品种。1599 年荷兰人囤积胡椒，使伦敦的价格由 3～6 先令 1 磅涨至 8 先令 1 磅，这是 1600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的直接原因。肉桂和小豆蔻都是印度南部和锡兰的土产；不过锡兰肉桂皮比印度的出产更受珍视，这使得锡兰先是成为葡萄牙人后是变为荷兰人最具诱惑力的目标。肉豆蔻树（它也可制出豆蔻香料）的分布局限于摩鹿加，在那里，丁香的分布只是局限于群岛中的几个小岛。因此，摩鹿加成了欧洲列强争夺的最有价值的地方。这里也是欧洲人从东西两个方面深入全球的交汇点和冲撞点。葡萄牙人从西方到达，通过 1511 年马拉加的占领而在马来西亚地区得到了第一个基地，然后开始进行摩鹿加地区的贸易。麦哲伦的西班牙人探险队的幸存者们在 1521 年向东方环球航海时在那里碰到了葡萄牙人。在 1526 年和 1528 年，更多的西班牙人从东方来到这里，与葡萄牙人在摩鹿加进行了一场断断续续的战争，直到 1529 年萨拉哥萨条约签订时，这些岛屿才最终割让给葡萄牙人。荷兰人在 1609 年巩固了从葡萄牙人那里争夺过来的摩鹿加，绝不愿容忍闯入者。在 1623 年他们在这里对英国贸易商实施了“安波那大屠杀”（Massacre of Amboyna），这使得这两国之间的关系长时间地恶化。

各个欧洲列强轮流控制着最有利可图的调味品贸易的来源，竭力使这种【288】

贸易被自己的国家所垄断。在葡萄牙，整个调味品贸易几乎从东方航海开始时就成为皇家的垄断。在西班牙，征服摩鹿加的短暂期间，1524 年时，他们成立了一个调味品委员会来负责这项商业，它在科鲁那（Corunna）设有一个仓库，计划向佛兰德、德国和英国等利润丰厚的市场供货。荷兰人在 1602 年把东方贸易的权利并入联合印度支那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宣布对调味品实行政府垄断，并把垄断权委托给这个公司，这个公司实际上成了国家部门。

在荷兰人统治印度尼西亚期间，通过采取地方性措施，他们对调味料生产进一步实施控制。这个公司决定把肉豆蔻的生产限制在狭小的班达群岛上，而把肉桂生产限制在安波那。地方当局每年都派遣远征队前往摩鹿加的其他岛屿，以毁掉那里的肉桂树，尽管这种措施从未完全成功地达到目的，但却持续到 1824 年才最终停止。据说，这种措施的第一个结果就是这两种调味品的产量降低到原来的 1/4，当后来欧洲的调味品需求增加时，却不可能通过自发的方式恢复生产。1656 年安波那人被要求种植 120 000 多棵丁香树。在 1656 年实际种植了 60 000 棵；然而在 1667 年却禁止再种植新的丁香树；1692 年和 1697 年丁香树被砍伐。从 1720 年开始，进一步规定每个安波那种植者只允许保持 125 棵丁香树。

对丁香和树桂之外的其他调味料来说，也不可能试图紧随市场调整生产，因为它们并非仅仅生长于某一地区。18 世纪在爪哇的那些胡椒产地，胡椒也处于荷兰人的最严密的控制之下，其制度是强迫某一特定地区供货，然后负责管理的公司按照自己制定的价格收购。在万丹，从 1763 年开始，监视者被派到各处检查胡椒的种植是否达到要求。在荷兰人统治下，一种类似的制度被应用于锡兰的肉桂种植。英国人从其 1796 年占领锡兰。直到 1832 年，一直延续着政府对肉桂的垄断。这种制度确实把调味料的世界价格维持在一个人为的高水平上，这一情况通过废除垄断之后的肉桂出口增加和价格下跌而显示出来。

5.6 蔗糖贸易

在 15 世纪的时候，甘蔗生产扩展到马德拉和卡纳里斯，这导致的第一[289]个后果是它与现有的欧洲生产者发生了严重竞争。这种情况由于美洲殖民地加入生产而变得更为严重。到了 1580 年，尽管有某些财政援助，西西里的

制糖业仍然变得奄奄一息。1684 ~ 1732 年，政府试图通过增加保护性关税来使其复活，这确实使该岛一度在蔗糖方面自给自足，然而，到了 18 世纪末，蔗糖生产还是停止了。在西班牙，制糖业曾是摩尔人的工业，但在格林那达被占领之后就衰落了，1609 年摩尔人被驱逐之后进一步受挫。尽管蔗糖生产从未完全停止，到 1800 年却减少至 4 个制糖厂和 1 255 公顷甘蔗。在中世纪，在意大利南部、马尔他、摩里亚、罗德岛、克里特和塞浦路斯等地的小型制糖业全部经历了类似的衰落并最终都消失了。

在马德拉和卡纳里斯，蔗糖生产都使用了非洲奴隶劳工，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其本国都已经习惯小规模地这样做了。1552 年，在马德拉有2 700 个奴隶。使用奴隶或许有助于这些岛屿上的生产者的售价低于其他欧洲蔗糖生产者；然而马德拉和加那利各自依次被巴西和西印度的竞争所打败。在 16 世纪下半叶期间，这两个群岛的蔗糖生产都已过巅峰，而且逐渐地被葡萄种植和酿酒业所取代。尽管如此，这些岛屿和阿佐尔在制糖业或其他方面，使欧洲人度过了开发更宽广的边远土地的学徒期。

在美洲热带地区，蔗糖和奴隶制的历史有着更加紧密的联系。这一时期，在所有热带出口作物中，甘蔗需要的人力劳动最多，特别是在收获方面，制糖厂需要在离甘蔗地最近的地方，运输则必须在收割之后的几小时之内，这样就第一次需要建立种植园制度。对这种有秩序的工作来说，土著印第安人在数量上不足，在天性上也不适合；西班牙的“监护征赋”制度，即把土地连同居住在那里的劳动力一同转让的制度，被证明并不合适。毫无疑问，甘蔗是热带地区农业奴隶制的首要原因。1518 年第一个贩奴执照被授予劳伦斯·德·古米诺特，他在 1518 ~ 1528 年之间进口 4 000 个非洲奴隶到西班牙殖民地。这些奴隶又被转包给葡萄牙商人。西班牙人被托德西利亚斯条约（1494 年）排除在外，无法从事自己的贩奴远征，并因此不得不把奴隶进口委托给外国人。从 1552 年以后，这种合同被给予葡萄牙人，荷兰人在 17 世纪分到一部分合同。1701 ~ 1713 年间法国人得到了这一令人垂涎的垄断权，后来由于乌得勒支条约它又落到了英国人手里，皇家非洲公司【290】是英国的这一垄断的执行者，它已经拥有向英国西印度供应奴隶的垄断权。最后一个贩奴合同是从 1786 ~ 1789 年由贝克尔和道森的公司获得的，他们是哈瓦那的英国商人，负责向古巴输入奴隶。从 1789 年开始，古巴的奴隶贸易不再受到限制；而在 1778 年西班牙从葡萄牙人那里获得安诺邦岛和费尔南德·玻岛，作为它自己的在非洲水域的奴隶贮藏所。这些奴隶贸易方面的发展都依次对制糖业有影响作用，由于这些发展，古巴第一次成为一个主

要的蔗糖生产者，由此使得 1801 年的糖价违人心愿地暴跌。

蔗糖与奴隶制的紧密联系在英国的巴巴多斯殖民史中得以更清楚地表现出来。从 1627 年的定居点一直到 1639 年，这里的主要作物是烟草，由签订合同的白人劳动力在小块土地上种植。1639 年的烟草价格暴跌（由于影响到其他殖民地，我们已在前面提到过），使一部分种植者转向蔗糖。这种转变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它使该岛经济发生革命性变化。种植园的规模增加了，土地价值大幅度提高。白人人口由于向其他殖民地移民而锐减；1640 年岛上仅有几名奴隶，而到了 1651 年则有 20 000 名。

17 世纪和 18 世纪制糖业的命运沉浮与西印度土地的原始肥力的枯竭和甘蔗种植向新地区的扩展有着密切的联系。1714 年，在巴巴多斯，有人抱怨说，土壤现在每年都需要施肥才能种植甘蔗作物，而大约在同一时期，这里所需的奴隶劳动力比肥力不太枯竭的法属岛屿多 4 倍。1667～1670 年间，当法属的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正式开始蔗糖生产时，粗糖的价格几乎降低了一半。在 1713～1733 年期间，由于圣多明戈（法国人 1697 年从西班牙那里夺来，现称海地，该岛西半部过去称为伊斯帕尼奥拉）糖产量增加，使得英国蔗糖的市场大大缩小了。这直接导致英国国会在势力强大的西印度院外游说者的影响下，于 1733 年通过了《糖浆条约》，对进入英国境内的外国蔗糖课以重税。到法国大革命时，圣多明戈出口的蔗糖比所有英国殖民地出口量之和还要多。不过一个相反的进程现在开始发生作用。1791 年圣多明戈发生叛乱，其后，在发生战争期间，其他法属岛屿与欧洲的联系被切断，这造成了糖价上涨，在 1793～1798 年间几乎上涨到 3 倍。[291]

更狭小的、英国人的西印度群岛，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农业专业化的国家，到目前它把绝大部分土地用来种植出口作物，并发现进口食品比种植食品更加有利。所以在 17 世纪晚期和 18 世纪，西印度从英伦诸岛进口了大量食品。这些食品大部分来自爱尔兰，其中包括牛肉和猪肉，鲱鱼、黄油和马铃薯。马铃薯还从兰开夏郡出口到牙买加。这种贸易进行的过程，苏格兰在 1707 年与英国合并之前没有参与其中。《航海条例》把苏格兰与英国殖民地的贸易限制在英国船只和英国海港的范围内；直到与英国合并很久以后，格拉斯哥才成为向殖民地出口的重要港口和制糖及烟草生产的中心。西印度殖民地还从英国北美殖民地的温带地区进口大量食品，这种贸易对双方都很合适。那里供应的是牛肉和猪肉，面粉、面包，还有少量稻米、玉米和腌鱼以及其他品种。

同时，在荷兰人统治的东印度，发展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蔗糖生产制度。

甘蔗种植和加工掌握在中国移民手中，而且无法用与管理当地农民的作物生产的相同方式来管理他们，对供给的控制主要是通过改变价格，并迫使中国人把糖卖给东印度公司。从 1622 年开始，这里的糖开始运往欧洲。17 世纪和 18 世纪期间，这种贸易量从未达到很大数量；1770 年荷兰从其所有殖民地进口的蔗糖数量仅有 12 500 吨。不过，在亚洲还有可供选择的市场，这其中包括有朝向日本规模稳定的低质蔗糖出口。

制糖业与最初向热带地区出口的专门农用机械相关联。1650 年铁框滚轴首次取代了当时有 3 个纵轴的粉碎机上面的木制滚轴，这种滚轴最早是乔治・西特韦尔在他的德比郡附近的铸造厂里制作的。过了一段时间，这种滚轴被水平轴所取代，其中，最早的近代型是科林格于 1794 年在伦敦制作的。1773 年，一种可以把甘蔗引导至第二次碾轧的机械装置，由弗莱明在英格兰获得专利，而且，一种类似的机械还由维拉特・弗雷雷制成，并在 18 世纪应用于圣多明戈。在这个世纪里，1768 年在牙买加和 1797 年在古巴，蒸汽机第一次用于榨糖，不过直到 19 世纪，蒸汽机的使用才成为实质性的。

欧洲经济的一个更重要的项目是炼糖业；尽管个体单位或“熬糖间”通常规模都很小。炼糖业活动曾在 15 世纪的威尼斯和博洛尼亚进行，粗糖 【292】进口来自遥远的塞浦路斯。当威尼斯衰落以后，安特卫普成为这项工业的主要中心。安特卫普的商人们还投资于甘蔗生产，他们中的一些个体商人在 1560 年在加那利和巴西拥有种植园。1556 年在安特卫普有 19 个炼糖厂；然而 1576 年西班牙人对该市的掠夺终结了那里的炼糖业。下一个炼糖业中心是阿姆斯特丹，1661 年那里有 60 个炼糖厂。荷兰加工了英格兰和法国殖民地大部分的蔗糖，直到 1660 年，英格兰的航海条例和法国柯尔贝尔政府的类似限制才扼制了这种贸易。下一个成为重要中心的是汉堡，1690 年在那里有8 000 人受雇从事炼糖业，1750 年那里有 350 个炼糖厂。1683 年法国有 29 个炼糖厂，鲁昂则是最繁忙的中心，也许是作为鼓励炼糖业的一种方式，柯尔贝尔本人是鲁昂一家炼糖厂的合伙人。据说，1700 年蔗糖是法国最重要的出口品。1788 年法国进口的粗糖达 81 000 吨，与此相比，1785 年英格兰进口了 103 800 吨粗糖。丹麦在 17 世纪晚期建立了炼糖业；用来处理来自其西印度公司的粗糖。在英格兰，只是在 1660 年以后炼糖才变得重要。1753 年伦敦有 80 个炼糖厂，布里斯托有 20 个，其他各处还有一些。在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之前，格拉斯哥只有 2 个炼糖厂；而在格里诺克这个后来的炼糖业中心，直到 1765 年才建立了一个炼糖厂。

5.7 烟草贸易

在欧洲，烟草最初作为一种珍贵药物而受到欢迎。然而当吸烟的习惯传播开时，它开始被谴责为一种有害的和堕落的行为。在英格兰，詹姆斯一世自己在 1603 年写了一篇“反对烟草书”。1635 年法国的一个短暂的法令禁止购买烟草，除非凭医生处方在药剂师那里购买。在 17 世纪的不同时期，瑞士、土耳其、波斯和俄国都把吸烟作为一种应受惩罚的犯罪行为。在俄国，对烟草的禁止持续到了 17 世纪末，而惩罚包括割鼻。

尽管如此，对烟草种植的需求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这种作物成了某些欧洲国家最早的海外定居地的生存基础，像弗吉尼亚、马里兰和法属西印度。由于烟草在欧洲和海外都可以种植，因此每个欧洲国家种植和进口烟草的历【293】史多少都是变化无常的。每个国家自然而然地希望或是从自己种植的烟草或是从其殖民地种植的烟草得到供应。1620 年，埃德温·桑迪斯爵士在国会抱怨说，国家没有必要每年花费 120 000 英镑从西班牙进口烟草。

也是在 1620 年，詹姆斯一世考虑到弗吉尼亚公司答应提高烟草进口关税，并把全部烟草作物交由英格兰港口运输，从而禁止在英格兰种植烟草。这一禁令后来扩展到爱尔兰，并由国会在 1660 年再次用法律加以重申。尽管如此，它最初并没有被严格执行，据说有段时间在英格兰西部的郡有 6 000 名种植烟草者。当 17 世纪 60 年代开始强制执行这一禁令时，有些地区不得不动用军队来摧毁烟草作物，并于 1666 年在温什科姆和切尔滕纳姆爆发了骚乱。直到 1690 年烟草种植才暂时被消除。不过事情并非就此结束。1660 年的法案并没有应用于苏格兰，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烟草短缺使苏格兰开始种植烟草，直到被乔治三世的法令所禁止。在同一时期，一种非法的烟草种植在约克郡的山谷里兴起，后来种植者被课以总共 30 000 英镑罚款，而烟草被公开焚毁并从此绝迹。

英格兰殖民地的烟草生产遭受了和蔗糖相似的周期性生产过剩与价格波动。为此，弗吉尼亚人不得不经常限制种植面积或销毁低等烟叶。1758 年，烟草在弗吉尼亚达到了 18 世纪的最高产量，出口量为 70 000 000 磅。马里兰的烟叶具有某种与众不同的品质，并在低地国家找到了主要市场。在英格兰国内，烟草贸易受到严格控制。詹姆斯一世将其作为王室的垄断业务，烟草交易商必须获得国王的专利特许证，国王由此获得了相当一笔收入。随时

间流逝，欧洲的烟草需求量增加，英格兰的烟草再出口变得更加重要。据说，在1770年，进入英格兰的烟草和进入苏格兰的数量相当，而进入苏格兰的烟草的4/5都被重新出口。贯穿这一时期的高额烟草税，以及再出口退税，导致了蓄意的金融欺诈，并发展成为大范围的滥用特权。沃波尔试图在其1733年的消费税法案中引入一种经过革新的制度，却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使政府发生动摇，因而被迫放弃。

在法国，烟草种植开始后，类似的问题摆到了政府面前。1674年烟草的种植和销售被国家垄断，并像其他垄断权一样被包出。然而在1719年时，政府为了烟草业的利益而采取了一项新政策，希望在路易斯安那发展大规模的烟草种植。在法国国内烟草种植被全部禁止，除了在弗朗什—孔泰、弗兰德斯和阿尔萨斯这些不适用该法律的地方。禁令是通过罚金、苦役甚至处死等刑罚才得以实施的。这一禁令一直持续到1791年，直到革命代表大会解除对烟草种植和加工的禁令，使其只缴纳无足轻重的税收。【294】

葡萄牙和西班牙拥有广袤的热带殖民地，但在这一时期，这两国却从未认为应该鼓励本国的烟草生产。葡萄牙在18世纪禁止烟草种植。西班牙直到失去其美洲殖民地之后，本地的烟草生产才得以发展。当地消费所需的烟草是18世纪期间在土耳其的欧洲领土如色萨利平原上种植的。然而直到后来西方人形成了对“土耳其”烟草的口味，才导致出口贸易的增长。

5.8　饮料贸易

欧洲人开始与之接触的第一种非酒精饮料是可可，科特斯发现墨西哥人在使用它。阿兹台克特地人把它做成一种苦味的粥。此后的一段时间，西班牙人学会加入糖和牛奶使之更加可口。17世纪早期，巧克力成为西班牙人所珍视的饮料，最先是在非洲，后来在西班牙。早期的巧克力工厂都在西班牙，西班牙长期以来不仅寻求垄断该项贸易，而且对制作巧克力的方法保密。饮用巧克力的习惯从西班牙最先传到了意大利。1640年，这种东西被列入一个德国药剂师的价目单。1657年一家巧克力房的广告出现在伦敦的毕晓普斯盖特街；1660年，人们在阿姆斯特丹饮用巧克力。在法国，路易十四的西班牙新娘玛丽·特拉萨使饮用巧克力成为时尚，关于她，据说，“国王与巧克力组构成玛丽·特拉萨的两项基本感情”。巧克力制造的垄断权在1659年被授给了凯伦·大卫，1692年又转给了一个丹麦人。尽管1700

年伦敦有很多巧克力房。那时的巧克力过于昂贵，只是贵族的奢侈品。直到18 世纪中期巧克力价格大幅降低时，它才成为一种更为普通的饮料。

最初只有墨西哥出口巧克力，其后委内瑞拉开始种植可可；在那里，正如在其他美洲国家一样，尽管有野生可可树，却仍要引进可可种子，而且树 [295] 种得自何处始终无法查考。委内瑞拉在 1634 年开始出口可可。而且尽管此项贸易在法律上被限定只能是对西班牙，荷兰人仍然很快就获得了一席之地，他们当时在加勒比海是无所不在的运输者，把这种“加拉拉斯可可”直接运到阿姆斯特丹。17 世纪期间，在特立尼达发展起了可可种植园，在这里，可可的真正引种是在 1525 年；在马提尼克，可可是 1664 年由犹太人本杰明·达·考斯塔从委内瑞拉引进的，而第一次出口是 1679 年，是运往法国的。英格兰人在伊斯帕尼奥拉和牙买加（当英格兰人在 1655 年夺取该岛时）都发现了已经确立的可可生产。然而，在 1727 年，所有西印度群岛的可可种植园都遭到毁坏，显然这是由飓风造成的。多年之后，可可种植才得以重建，而牙买加直到 19 世纪才做到这一点。苏里南的可可出口开始于1725 年。与此相对照，在 18 世纪，巴西只有很少量的可可种植。

这一时期饮用的巧克力不同于近代的“可可”，后者已经去掉了过多的脂肪，脱脂过程 1763 年在法国有明确的记载，然而直到接下来的一个世纪才被广泛使用。咖啡豆的粉碎最初是由人力进行。弗莱父子工厂用水力代替了人力，该工厂是布里斯托的约瑟·弗莱博士于 1728 年建立的。1795 年这家工厂在可可制作中首次采用了蒸汽机。据说，到 1800 年，德国的所有主要城市都有巧克力加工厂。然而，巧克力贸易仍然是小规模的。18 世纪最后几年，大不列颠进口的可可每年不超过 100 吨。可可种植从美洲向其他大陆的扩展仍然缺少刺激因素。

和可可一样，咖啡并非一种古老的饮料，它作为饮料最早是阿拉伯人发明的，在 16 世纪早期只在中东国家之间传播，在接下来的世纪里，饮用穆哈豆的旅行者把这种习惯传进了各个欧洲国家。关于欧洲最早的一些咖啡制作间的建立日期，可以作如下断定：1650 年在牛津、1652 年在伦敦、1671 年在马赛和 1684 年在莱比锡。从此以后，这种贸易迅速增长。然而供货的来源与今天非常不同，今天，最大宗的咖啡来自南美洲。所有咖啡树都是“阿拉伯品种”，直到 20 世纪，“罗伯斯特种”才被种植。从墨卡出口的也门咖啡通过亚历山大和士麦那的市场到达欧洲。在法国，咖啡进口仅局限于马赛，1723 年咖啡销售的垄断权被授予印度公司。荷兰人在锡兰和爪哇的 [296] 早期引进活动我们已经提及。1713 年从爪哇出口了第一吨咖啡。此后数十

年间为了适应需求而调整供给的疯狂举动导致了爪哇农民在一个时间被强迫种植咖啡，而在另一个时间又必须拔掉它们而种植胡椒。荷兰的“咖啡巡视官”四处奔走实施这些规定。在锡兰的低洼地区，咖啡无法种植，其生产转到了内陆地区的康提王国，而出口仍由荷兰公司垄断。

1718 年，法国人从墨卡把咖啡引种到波旁（留尼汪），由此而得名的“波旁品种”，后来在全世界传播得非常广泛。在美洲，咖啡最先移植到苏里南，大约在 1726 年树种又提供给了巴西，1774 年，在里约热内卢附近建立了第一个种植园。哥斯达黎加是直到 1779 年才有了咖啡种植，哥伦比亚则晚至大约 1784 年。而在牙买加，大约 1730 年就从马提尼克引进了咖啡，那里的“蓝山咖啡”成为英格兰市场的主要供货来源。据估计，1750 年，欧洲进口的咖啡总量为 6 000 万磅。到了 1789 年，仅是法国殖民地的供货量就超过了这一数字，其中主要来自圣多明戈。牙买加 1784 年出口了 200 万磅咖啡，而到了 18 世纪末其产量激增。这部分地是由于皮特在 1783 年把英格兰的进口税从每磅 1 先令 6 便士降至每磅 6 个半便士，部分地是由于圣多明戈的种植园被革命所破坏。在 18 世纪晚期，北美洲和欧洲一样成了咖啡的重要市场。1793 ~ 1799 年间，美国的咖啡进口在每年 34 万 ~ 6 100万磅之间波动；在此后几年里，美国咖啡进口量是茶叶的 6 倍。

茶叶贸易不同于咖啡和可可贸易，有一个欧洲国家即英格兰的茶叶消费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要多。茶叶是 1610 年由荷兰人最早进口到欧洲的。这批货来自日本；然而，随着贸易的发展，茶叶几乎全部来自中国。茶叶贸易在一段时间里仍旧由荷兰人垄断，大约在 1635 年被再出口到法国，约 1645 年再出口到英国，约 1650 年再出口到德国和斯堪地纳维亚。同时俄国在 1618 年经陆路得到了第一批从中国来的茶叶。直到 1689 年签订尼布楚条约时，经这条线路的茶叶供应才开始稳定。从中国去往莫斯科的路程需要 18 个月，实际上比经海路去往西欧还要费时，英格兰东印度公司在广东和阿莫哥（Amog）取得据点之后，在 1669 年向英格兰运送了第一批茶叶。很符合常规地，茶叶在英格兰也经过了这样的阶段：首先在药房一盎司一盎司的出卖，然后，有时被奉为治病良方，有时又被贬为奢侈之物。1650 年，【297】英格兰的茶叶价格根据质量不同为每磅 6 ~ 10 英镑。到 1703 年的时候，平均价格降到了每磅 16 先令。在 17 世纪最后几年，英格兰每年进口 20 000 磅茶叶；1703 年达到了 100 000 磅。尽管韦斯利在 1748 年还猛烈抨击茶叶的饮用，到了 18 世纪末，茶叶消费达到了全国人口平均每人每年 2 磅这一庞大数字。

贯穿整个 18 世纪，合法的茶叶贸易仍然由东印度公司垄断，几乎全部是由广州海运而来。所征收的高额关税，以及强烈的需求，使茶叶成为一种对走私者来说特别有利可图的商品，而且，据估计，18 世纪英格兰消费的全部茶叶有一半是走私的。向北美洲殖民地的茶叶走私也是大规模的。

茶最初是在咖啡屋饮用，和咖啡的价格一样都是 2 便士一碟。这种地方是专供男人去的。然而在 1717 年托马斯·特文宁在伦敦的德维尔罗克斯街开了第一家茶馆，贵族太太们蜂拥而至。进一步发展而来的是“茶园”，1732 年的沃克斯霍尔是这类茶园的第一家。1742 年建立的拉内拉赫成为同样著名的茶园。在这些茶园中，有些把饮茶与其他表演和体育活动结合起来：玛丽勒本茶园提供欢宴和烟花；博蒙特赛茶园备有画展；库柏茶园提供音乐会；“白色通道”茶园则提供板球。在 18 世纪高峰时期，伦敦有 30 多家茶园。这种狂热同样扩展到了殖民地。纽约拥有自己的茶园，其中最著名的是“茶水泵”茶园，那里的天然泉水据说特别适合制作茶水，并作为“冲茶用水”在全市销售。茶就像其他饮料一样，它的一个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使上流社会的举止变得温和，而且当茶变得更为廉价时，它为大众提供了狂饮杜松子酒之外的另一种选择。

茶叶被卷入美国革命的政治之中，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误解造成的。到目前为止，东印度公司所有茶叶都运到英格兰，在英格兰，关税是按照英格兰和美国的商人最终销往美国的茶叶比例来缴纳的。大量茶叶走私者是这种局势中的第三方。1773 年的《茶叶法案》具有多种目的，其中之一就是帮助东印度公司处理其大约 1 700 万磅积压的茶叶。所采用的方法是给予东印度公司直接向美国输入茶叶的权利，并允许其使用自己的船只和通过自己的代理人在那里销售。由于免去了英格兰的关税，美国消费者购买茶叶的费用可【298】以减少一半。然而这一法案激起了船主、美国进口代理商，还有走私者的怨恨。这个法案被人们作为政治资源加以利用，而事实上其本身并不具备如此多的这种价值。不过“波士顿茶党案”在经济上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使得美利坚民族永久性地更多地成为咖啡的饮用者，而非茶叶的饮用者。

5.9 欧洲的马铃薯

我们已经记述了马铃薯经由西班牙和不列颠群岛的双重引进。这种作物具有重要意义的第一个所在国是爱尔兰。这个国家在 17 世纪被叛乱和对叛

乱的镇压所折磨，而许多爱尔兰农民在英格兰的地主制度的迫使下只能靠一小块土地生活。在这种情况下，马铃薯的特定优点就显得十分明显。它每公顷的产量远远高出在当时谷物所能达到的产量，而且它的菌类敌人“晚疫病”，在1842年以前的欧洲各地都尚未出现。田里的马铃薯与谷类作物相比更不易被军队毁坏。被最早确切提到的马铃薯种植是1606年在唐郡，但是此后迅速传播开来。到17世纪末，马铃薯成为爱尔兰所有较为贫困阶层的主要食物。尽管马铃薯是一种美洲大陆本地的作物，但第一次引进到北美殖民地却是来自于爱尔兰。似乎是在1718年，爱尔兰移民开始在新英格兰种植马铃薯。爱尔兰人还在1728年把马铃薯引进到圣海伦那，在那里它成为一种最重要的物产，在为船只提供补给方面尤其重要。

英格兰和苏格兰的马铃薯种植则要缓慢得多。17世纪在此二者的大多数地区马铃薯仍不过是无足轻重的园艺植物。18世纪，马铃薯在苏格兰具有了和在爱尔兰同样的地位，它是居住于苏格兰高地和岛屿的不幸而贫困的佃农赖以生存之物。马铃薯的引进还导致了猪的饲养的增加；它当然也取代谷物成为人们的食物，同时也使得酿酒者更难于买到它。在英格兰，马铃薯的田野种植开始于兰开夏郡，或许是由于那里与爱尔兰联系密切，或许是由于那里的爱尔兰移民对马铃薯的需求。1700年以前开始的田野种植对教会当局来说是一个难题，因为它急于要对这种新作物征收什一税。到1750年从利物浦出口到爱尔兰的马铃薯达到相当数量。在18世纪的英格兰，马铃薯处于与萝卜的竞争之中，萝卜是该世纪早期新引进并做田野种植的另一种块根作物，萝卜的种植以某种方式有助于马铃薯的传播，因为它使得农民熟【299】悉了块根作物的田间护理，并使他们意识到它在流通中的巨大价值。不过萝卜仍然可以与马铃薯相竞争，是因为它为赤贫者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廉价食品。在东部和南部英格兰，马铃薯传播缓慢，而且直到19世纪才有真正广阔的种植面积。在泽西（Jersey），它在大约1780年取代了防风根而成为田间作物，防风根在此之前一直是人和猪都食用的主要块根作物。19世纪前10年，在泽西最早种植的马铃薯中已经有一部分输出到了伦敦。

在欧洲大陆，德国是第一个马铃薯生产大国，并且此后一直如此。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克·威廉一世（1713～1740年在位）和其子弗里德里克大帝实行强制性的马铃薯种植。不过正是7年战争所造成的饥荒才第一次真正确立了马铃薯的种植。1770年，发生于一连串谷物歉收之后的又一次饥荒使马铃薯种植进一步扩大。1778～1779年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爆发了一场被称为“马铃薯战争（Kartoffelkrieg）”的交战。它之所以如此得名是因为两

国调动军队保证己方食物补给而使敌方得不到食物，而且只是在波西米亚的所有马铃薯全被吃光之后才停止了敌对行动。1853 年，巴登州的奥芬堡竖立了一座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的塑像，因为他被错误地当成了把马铃薯引入欧洲的人，塑像上刻着这样的话，“上帝所赐，弥足珍贵，匮乏之救，穷人之助”。

在法国，马铃薯的风行历时颇为缓慢，直到 18 世纪晚期它仍无足轻重。在 1772 年，A. A. 帕门蒂尔（曾作为普鲁士的战俘）获得了一项由贝桑松科学院颁发的、奖给在缓解饥荒的新食物上有贡献者的奖金，而这是因为他写了一篇关于马铃薯栽培的论文。路易十六给了他 50 摩肯（morgen）土地用于种植马铃薯；此后又进行了一次宣传活动，国王把马铃薯花插在扣眼上，玛丽·安东妮则戴在头上，这些都对马铃薯的进一步种植起了一定作用。在法国大革命的战争期间，马铃薯的种植扩展得更加广泛。

在匈牙利，马铃薯是在 1654 年由自德国返回的学生引进的。然而在欧洲的边远地区，马铃薯的引种时间较晚。在瑞典，马铃薯的引进大约是在 1725 年，在挪威，关于马铃薯栽培的最早记录是开始于 1758 年。俄国和波兰很可能是在 18 世纪晚期从德国获得马铃薯的。

马铃薯在经济上的巨大贡献，是使欧洲能够在更长的时间里，利用自身【300】的资源养活其处在增长之中的人口，如果没有马铃薯，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此外，马铃薯还在使用少量土地的情况下为城市人口提供了一种廉价的食物，从而对工业革命的经济基础形成有帮助。

在 18 世纪结束之前，这种农作物和家畜传播的漫长过程由一个更具重要性的事件画上了句号。1788 年，在澳大利亚，第一个欧洲人定居点建立了，那里是欧洲人到达的最后一个有人居住的大陆。在那里土著人没有种植任何庄稼。谷类作物的种子是由从英格兰和好望角出发的探险队带去的，值得提到的是，在 1793 年玉米的种植面积是小麦的 5 倍。然而 1796 年小麦丰收，产量达 40 000 蒲式耳，可供殖民地 12 个月之需，从而足以自给。然而，当 1799 年由于澳大利亚干旱，殖民者经历了第一次农作物方面的挫折时，其自足感降低了。

到这时，殖民地开拓的技术已经多少超越了业余水平的阶段，至少在具有远见的人之间是这样的。新南威尔士公司的约翰·麦克阿瑟船长就是其中之一，他有预见性地写到：“居住在如此远离文明世界的其他部分的一小群人，不可能有最后取得成功的希望，除非生产一些用于出口的原料，这种原

料需要很少劳动力就能生产，具有相当的需求量，而且能够负担长途海运的开支。”他断定，能够最好满足这些条件的产品就是细羊毛。

从好望角到澳大利亚的第一次航海就把绵羊带到了那里，不过这种羊是粗毛型而非细毛型。而1797年从好望角进口了美利奴绵羊（Merino sheep），麦克阿瑟从这些羊中得到了2只公羊和4只母羊。他就是利用这些羊的后代为澳大利亚的羊毛出口奠定了基础。这些事件并不具备直接的经济上的重要性，但作为未来的预示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欧洲人对世界的探索最初很大程度上是以寻求香料为动因的。然而从长期来看，欧洲最重要的进口并不是热带地区的农业奢侈品，它们在数量和重要性方面都被大量的温带农业的主要产品所超过，如小麦、羊毛，肉类和奶制品，而这些产品来自由欧洲企业所开辟的新地区。【301】

第六章

殖民定居点及其劳动力问题

在15世纪和16世纪，欧洲人参与海外活动有很多动机，其中为欧洲过剩的人口提供出路这一点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他们的真正动机也许是希望对异教徒予以打击，或是希望增强祖国的实力，或是希望弄清地球的形状和本质，或是希望得到大量财富，要不就是逃离单调无聊的生活，也可能是这些事情的混合，他们心中几乎还没有获得贸易品的愿望，如来自先进的东方的香料，丝绸和棉花，他们既不愿意定居海外，在异国他乡谋生，也没有为其同胞提供这种机会的想法。他们不是殖民者，而往往是贸易商或假充的贸易商。开拓殖民地，定居或组织生产的欲望是后来才产生的，而且并不是出于自愿。

当欧洲开始进入近代时，对其人口的估计，以及对各个日益成为实际的单一整体国家的人口估计，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推测，其中家庭的数目，领圣餐者的数目，船主的数目，合适的士兵的数目，甚至死亡者的数目等这类数字是很容易受到出生和迁移的影响的。通过这种方法得到的数字可能与现代的推测方式有密切联系，然而这些数字仍然略带猜测性质，而且从发生着海外扩张的情况来看，它们可能很大程度上还是不恰当的。不过，借

助于这些数字，总体的图景却已经开始比较清晰地显现出来，并且，对研究者颇显得具有重要性。这一景象开始于14世纪一次广泛而灾难性的人口减少，这种减少又延续到15世纪最后25年，由于地方性瘟疫和连年战火延缓了任何持续性的人口复苏。此后，“在1500年之后，人口的增长在所有国家都变得势不可挡”①。这一人口增长时期的标志是，对失业的贫困者社会真诚而广泛的关心——这种关心在历史著作里留下的痕迹比在今天的社会中留下的痕迹更多，这一点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正是这种关心使得像维维斯(Vives)、冯·胡滕（Von Hutten)、罗伯特·格雷（Robert Gray）和瓦尔特·罗利（Walter Raleigh)，以及许多其他形形色色，才华出众的人写出了优秀作品。然而除绝对的人口增长之外，失业还是许多其他因素的产物：战争，技术进步，宗教和社会的、在观念和习俗方面的变化，还有城市化程度的增加。人口的流动性无疑比过去所能想像的还要大，漂泊不定的流浪者是【302】负责处理这一问题的政治家的主要忧虑对象。不过，尽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农村人口的迁移相当自由，却很少有证据能证明存在着一种可被称为农村殖民的运动。所谓运动的意思是要进入西欧的边远荒凉的地区。它始终是近在手边的解决办法，在逻辑上和在事实上（根据中世纪晚期的先例）都是农业人口过剩的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

农业方面的证据甚至可能显示出，在15世纪和16世纪之交时，农村人口减少了，它伴随着一种明显的趋势，即采用劳动节省型的生产方法和为提高生活水平而重视农业副业的就业，而不是把重点放在作为农村人口严重过剩的长期解决办法的农村荒地占用上。

很可能出现的情况（因为这种可能性大得不能再大了）是，日益增加的人口加入战争或涌向城市。他们的需要和他们在犯罪方面的能力，使政治家感到为难和困窘。不过很显然，到了地理大发现时期，西欧尚未达到任何类似于人口饱和的程度，不管是按照现代的标准还是当时的标准都是如此。麻烦是社会和经济方面的，而非人口方面的。这些麻烦来自于生产方式和生产习惯的改变，以及消费方面的变化，而不是来自于绝对的人口过剩（城镇和农村都算在内）。这一时期的政府还远未感到有很大必要为过剩人口提供一个出路，而当时的学说是趋向于相反的方面，它强调，在连绵不断的战争中，出于军事需要应保存人力。民族国家正致力于制定其原则，而且这种原则制定在王朝统治方面、法律方面、礼拜仪式方面和国防方面比在经济方

① 参见本卷第20页。

面迅速得多。不过这些国家认识到了健康而众多的人口在国防和经济方面的基本价值。当地理大发现揭示出从海外获得财富和取得经济力量的可能性时，政治家的目标是在不削弱国内所具有的人力条件下得到这些好处。

从殖民活动一开始就为葡萄牙人殖民地开拓定了调。葡萄牙的小规模和贫乏的人口与其所取得的宏大成就之间的反差是这一时期最明显和最令人感兴趣的特征。葡萄牙人的野心曾经被归纳为渴望在东方贸易方面取代威尼斯。这种看法忽略了许多宗教上的和人员上的因素，正是这些因素使得布雷根茨（Braganza）的王室扶植和组织了探险者，另外它也忽略了探险者纯粹【303】的从事开发的冲动。然而，当东方被发现的情况及其潜在价值开始被人们认识时，葡萄牙开拓殖民地的目标不是对印度本身领土的占有，而是拥有对印度的贸易。葡萄牙人的开拓方式是以“领海的概念（a mare clausum）”为基础的，领海在教皇的权威下得到保护，以使它免遭其他基督教国家的侵犯，而且这种开拓是以一种堡垒和要塞的体系为基础的，它使开拓者免遭当地人的反抗。甚至在国防方面，男人的数量都是不足的。堡垒位于有战略意义的位置，而且海上力量很快就作为一种纽带被接受下来，它使据点具有了凝聚性和力量，而没有它，这些据点就会是弱小的、分散的和脆弱的。

这种方式的结果是葡萄牙人的据点几乎根本算不上殖民地。他们控制着东方航线的战略要点。然而，甚至要塞里的人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从当地招募的。葡萄牙人的据点几乎没有政府机构，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很小，而且葡萄牙人的力量很少能够到达远至距离其船只一天路程的地方。葡萄牙缺少进行大规模移民所需的人口，然而其进行东方扩张的环境具有一种奇特的适宜性，对它的规模不够的人口来说，可以说是恰好具有适合性。因为在印度大陆，穆斯林政权因战争而晕头转向，葡萄牙人从未遇到来自这个次大陆上任何一个正在交战的大部族的敌对行动，因此，葡萄牙人在印度保护自己并不需要太多的人力，而继续向东以及在岛屿上，举足轻重的则是海上力量。对贸易来说，葡萄牙人同样发现不需要大规模的人力。他们遇到的是一种高度发展的经济，这种经济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能够为欧洲市场提供奢侈品，而且葡萄牙人没有从事生产和制造方面工作的愿望，而只是把建立在具有竞争力的当地经济基础之上的贸易转移到自己的航路上。他们的目的是使葡萄牙国王成为惟一一个在欧洲与印度之间进行贸易的商人，而不对这种贸易的国内环境造成冲击。在印度大陆有可供他们利用的穆斯林的贸易体系，这一体系包括资本主义的各种必要形式，其最高级的表现形式是能够为葡萄牙船只供货的大出口商。因此，关于贸易以及这种贸易的保护，葡萄牙人都能够在不

进行大规模移民的情况下设法应付。

然而，他们的非常成功的体系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某些变化，而且也对新世界与旧世界之间的联系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当具有相同的海上力量的欧洲竞争对手对葡萄牙的权利发起挑战时，对已经赢得的贸易进行防御需要严密的组织，而建有要塞的据点需要军队以抵御欧洲人的进攻，并需要在缺乏海上支援时仍能坚守。葡萄牙人的办法是由他们的总督阿方索·阿尔布克尔克以论文的形式提出的，他提出的计划包括建立一系列独立的要塞，并开辟从【304】位于马拉巴尔海岸的果阿货物集散地进行的贸易，而到欧洲则只经过里斯本港，他把防御体系集中在波斯湾和亚丁湾等脆弱地区，并提倡通过繁衍出一种混血人口来解决人力资源的问题。

在与所接触的土著人的关系上，缺少移民的葡萄牙人表现出一种处事态度上的宽容与宗教上的固执的奇特混合。那些顽固不化坚持异教的土著人，往往被葡萄牙人残忍无情、背信弃义地对待。不过这并不是种族歧视，而且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种族隔离。从发生接触的早期，他们就把土著人带回葡萄牙，并平等地对待他们，而且经常与之缔结婚姻。据记载，在16世纪初期曾有过一位来自刚果的黑人主教，尽管在刚果传教活动的影响强度特别大，这仍然不失为一个葡萄牙人试图忽略种族和文化水平方面差异的标志。纳妾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血气方刚的男人长期驻守在外，远离妻子，与穿着很少的土著妇女接触密切，而这些妇女又对家庭内部的奴役和一夫多妻制习以为常，并且不把这种私通看作是特别罪恶的行为，与此同时，在教堂内有大量的跨种族的婚姻举行；阿尔布克尔克发展了一种关于葡萄牙帝国的理论，它以一种混合血统的社会作为基础，而不考虑土著人是阿拉伯人、黑人、印度人还是印尼人。这种情况远非仅仅是对人的生理弱点的妥协，这是一种清晰的，首尾一贯的帝国理论，其基础在于，葡萄牙人无法靠自己提供足够的男人，更无法提供足够的女人来住到帝国各处。

即使如此，阿尔克尔克的理论是为一个在东印度进行贸易，或是从非洲对印度进行贸易的帝国而设计的，它所针对的贸易体系的特征是当地的贸易商把货物运到海边准备出售和装船，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任何这种体系都是不可能运转的，因为欧洲人不得不自己组织供货，甚至不得不忙于生产技术方面的工作。葡萄牙人在大西洋岛屿、在阿佐尔、在马德拉、佛得角和圣多美角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此外，他们在美洲大陆的巴西遇到的也是这种情况。在那里，农业定居点是维持任何殖民地所必需的准备工作，而任何以出口或消费为目的的生产将不得不成为欧洲人的工作，对移民的需要也

[305] 比在东方更为严重，并且，那种拥有要塞和行政长官的混合型社会并不适合于繁重的生产工作。

对这个人口需要问题，葡萄牙人有 3 种解决办法：其一，是规定在土地已被开垦的情况下才可以被转让的法律制度（即 Donatarios 的制度）；其二，是可以把罪犯流放到殖民地的刑法制度；其三，是奴隶制的采纳。在这 3 种制度中，流放制度产生的作用最小，尽管葡萄牙的移民后来被新教国家认为是其帝国衰落的一个原因，但其缺陷属于欧洲社会维持的社会与道德习俗方面的缺陷，而不是由于某些实际的罪恶倾向。不管怎样，相对而言，流放的罪犯人数是很少的，其大多数前往东印度驻防和服役，而非前往定居点所在的殖民地从事生产和劳动。半封建性的土地转让，与使用奴隶制相结合，确实能够使欧洲人所拥有或管理的生产性种植园在大西洋岛屿和在巴西都发展起来。

尽管关于殖民运动的不同阶段，许多不同的界定都可以适用，但几乎是大多数人都普遍运用的一个界定是从土地和劳动力的方面来开展的。相对充裕或匮乏的资本，还有管理的能力，都不能不予考虑。土地和劳动力既然是生产制度的基本要素，相应地，殖民运动也就是从土地缺少而劳动力充裕（甚至达到过剩的程度）的地区向土地充足（甚至是没有价值的土地）而劳动力不足的地方迁移的运动。当劳动力寻求更好的市场时，移民便自然而然地发生了。而一旦殖民不再是指向更好的劳动力市场的自发运动，也就是成为国家事务或资本发展的问题时，那些渴望殖民地的政府就面临着一项组织必要的劳动力供应的任务。在被称为“开发性殖民地”的地方，极少量的欧洲管理者和贸易者通过使土著居民适应欧洲人贸易的需要和习惯而完成“殖民”。另一种极端是“移民性的殖民地”，欧洲移民自己充当必要的劳动力。在这两种极端之间，还可能发生的是，移民在数量上不足以完成全部生产性工作，也没有使得当地居民能够或愿意完成这些任务。移民作为殖民者而非管理者，已经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或者把当地居民变成自己的劳动力；或者自己向殖民地引入外国劳动力。

面对这一左右为难的境地，各个殖民国家根据其背景和制度的不同所采[306] 取的方法也不同。殖民地是建立在利用海外地区的生产能力谋求利益的欲望的基础之上的（这一欲望的程度是最强烈的，然而并非必然受到指责），以至于各殖民国家所面临的问题都是相同的，而其解决办法也没有根本上的不同。葡萄牙不得不作为一个先行者面临这一问题，因为没有先例可循。它最初的解决办法是设法把当地居民组织成为适合的劳动力，然后把补充性劳动力的进口作为第二种来源。在这方面，它使用黑奴。事实上这种近代殖民方

式一直持续到19世纪奴隶制发生急剧改变时，而当时的信念自由和持续积累的殖民经验为殖民地带来了独立的渴望和独立的可能。

到1552年的时候，在大种植园（葡萄牙的法律制度使之成为可能）的基础上，圣多美正为出口而生产蔗糖，马德拉则在销售糖和酒，而此时阿佐尔的奶酪出口数额颇大，并能够作为葡萄牙船队的补给站。安哥拉和巴西是葡萄牙的制度赖以存在的两个主要地区，其中，巴西作为原料供应地更为重要，没有它安哥拉将无足轻重。葡萄牙人发现在巴西土地和人都处于天然的状态。印第安人在劳作技巧上远未达到像东方那样生产精致物品和调味料的程度，他们尚未驯养用于劳作的任何家畜，他们的农业最多不过是随意种植少量的花生。到达巴西的葡萄牙人绝大部分不是农耕者，因为由于东方贸易大量涌入葡萄牙，它已经变成了商业化国家，而其早期移民都是投机者，而非农民。然而在巴西，他们不可避免地转向农业，而且不得不亲自安排农业。葡萄牙人被这个国家巨大的河流所诱惑，并借助于更小和水流更缓的河流，他们在其法律制度下很容易在农业上建立起一种分布广泛的种植园经济。这种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分散性，其定居地缺乏密度和纵深，它倾向于所谓的“自我殖民”（这一特征不同于美国历史上所称的“边疆”）和在必需的劳役方面对强制性劳动力的依赖。土地辽阔得让人感到危险，而劳动力却几乎没有。

葡萄牙人的分布显得分散和流动，但由于政治上的成熟和前后一贯，以及人们对教会与国家之间缺乏观念上的区分，还有，耶稣会教士及其所资助的教育使团的统一等这些方面的影响而使这种不利得以弥补。其结果是，作【307】为一种地理特征的分散性，并没有伴随着发生政治或经济特征上的四分五裂或严重分歧。这是葡萄牙人所具有的特殊优点，不管是在其东方还是西方的殖民地都是如此。同样特别而重要的一个事实是“他们向前挺进而不考虑殖民者的种族的同一或种族的纯洁”。[1] 在巴西和在东方一样，惟一的障碍是宗教正统性方面的。外国血统和有病的血统都可以自由进入殖民地，然而宗教和法律上的统一性自始至终都被保持着。

在巴西，殖民地和农业的真正开始，可以追溯到1532年在现在的桑托斯港附近的圣文森特殖民地区的确立，到那时，葡萄牙人在东方取得的经验使他们进一步确定了作为商业国家而非农业国家的特点，他们在巴西农业发展的可能性问题上所采取的方法不是农民的那种办法，即喜欢肥沃的土壤并

① 吉尔伯特·弗瑞尔著：《主人和奴隶》（纽约，1946年），第40页。

将其用于生产，而是商人的办法，即致力于通过组织其他人进行劳动而获得最大收益并将产品出卖。甚至那些在葡萄牙或大西洋岛屿受过农业训练的人也已经习惯于那种经常使用奴隶劳动来完成繁重工作的制度。

6.1 来自西非的奴隶

事实上，葡萄牙在成为殖民国家之前就是一个拥有奴隶的国家。在巴西的殖民地刚刚开始的时候，人文主义者克兰纳德斯写到，在葡萄牙“所有工作都是由黑人或摩尔人战俘来做。在葡萄牙，这一种族的人正在泛滥成灾。一个人几乎可以相信，在里斯本，男女奴隶的数量要超过作为自由人的葡萄牙人”[1]。穆斯林政权的扩张使人们得以知道非洲是提供黑奴的来源，而且从公元 1000 年开始，穆斯林的侵略和战争使稳定的奴隶供应每年都得到保障，他们为欧洲人提供战士、劳动力和仆人。十字军骑士及其后继者，那些从事黎凡特和非洲贸易的基督教商人，在进行奴隶贸易时像穆斯林一样丝毫不受良心谴责，然而他们通常是通过贸易而非掠夺来获得奴隶的。

在地理大发现时期，正如在调味料和奢侈品贸易方面一样，奴隶贸易方面的目标和成就在于把在穆斯林手中早已兴旺起来的生意转移到西方的和基督教的航线上。[308] 这种贸易本身被认为是必需的和可以接受的——它达到如此程度，以至于据估计 1500 年左右仅在威尼斯一地就有大约3 000个黑奴——而且葡萄牙人自从与西非海岸发生最早接触的时候起，就在一年之内带回了 700 或 800 个奴隶，在从摩尔人那里得到的种植园里劳动，或做那些不适合使用国内劳动力的工作。

贩运奴隶及随后的奴隶劳动不涉及良心问题，因为西北非的全部居民都被认为是摩尔人，基督徒有责任对其发动战争，而且当其被俘后将其变为奴隶是合法的。很显然的是，探险家们使葡萄牙人所接触的那些种族并没有卷入到基督教与穆斯林教之间的斗争，那么，1454 年尼古拉五世的教皇敕令就可以使良心问题得到解决。他在敕令中鼓励葡萄牙人在反对摩尔人时坚决前进（直到 1492 年摩尔人才被彻底赶出欧洲），并允许“对包括全部几内亚海岸；博哈多尔角和南恩（Non）以南的萨拉森人，异教徒和其他基督的敌人发动进攻，统治他们，并永远地奴役他们”。必须把奴隶转变为基督徒。这种方

---

① 转引自吉尔伯特·弗瑞尔著：《主人和奴隶》（纽约，1946 年），第 245 页。

式，加之没有种族偏见是葡萄牙人的显著特征，造成了某些奇特的反常。奴隶们在上船时集体受洗，然而他们仍然身为奴隶。与此相反的是刚果的土著国王们，他们在名义上接受基督教，这并不妨碍其继续保持多妻或供奉其偶像，然而却又使其由此有资格被当作合法政权。葡萄牙人能够（并确实也曾）与他们签订条约，并以此条约作为保持贸易基地和奴隶贸易的必要条件。

黄金海岸的发现似乎使得葡萄牙人在15世纪的最后25年里接近了他们的主要目标，即打开非洲海岸。然而黄金的获得（在16世纪早期约占全世界每年新产黄金的1/10）导致了人们对这种发现产生了兴趣，也最终对葡萄牙人环绕好望角的航海乃至他们进入东部海域开展的丰富贸易重新燃起了兴趣，因此，对黄金海岸的了解转移了而非增加了对非洲的关注。此外，1446年葡萄牙人已经越过了塞内加尔河和佛得角，一些黑人首先是作为新入教者被带回欧洲。他们吸引了商人们从事非洲贸易，因为黑奴在葡萄牙已被知晓和接受。随之而来的是经常性的奴隶货船，而且到了1460年航海家亨利死时，一种经常性的奴隶贸易已经建立起来了。【309】

这些奴隶很快就被证明是一种有助于葡萄牙人与黄金海岸进行贸易的商品。尽管他们在那儿建筑了阿尔米纳（Sao Jorge da Mina）石头城堡，并在阿克西姆和沙玛建立了较小的城堡，他们却无法主宰黄金海岸的生活，而只是按照当地人制定的条件进行贸易。葡萄牙人被当地人勉强接纳下来，他们用来建立据点的地盘是当地人根据协议租给他们的，尽管他们的贸易使得靠近其据点的沿海地区出现了相当多的土著人定居点，他们对其落脚之处的当地人的部落生活却很少或没有影响。最重要的是，这些葡萄牙人不被允许直接与内陆地区进行贸易，而那里是黄金和金沙的最初来源。这种方式变得流行起来，在世界各地都被重复采用，因为欧洲之外的人们在与欧洲人的接触中迅速地发展了一种有关经济策略的强烈意识，还有对与使用价值相对应的贸易价值也形成了日益觉醒的认识。沿海地区的非洲人，与后来北美的易落魁人和中国的洋行（Hong merchants）一样，宣称并维护了一种作为欧洲贸易商和内地生产者之间惟一的中间人的权利。因此，葡萄牙人被迫带来沿海地区非洲人所需要的商品，而奴隶则是黄金海岸地区居民准备用来进行贸易的货物之一。

从塞内加尔河以南的上几内亚可以稳定地获得稀少的奴隶，不过这绝大部分是来自佛得角岛屿，它们位于上几内亚海岸的不远处，那里的居民控制着塞拉利昂和塞内加尔之间沿海的贸易。这种贸易几乎是自我封闭的，而葡萄牙人（除了那些被派往佛得角岛屿的人）的奴隶的重要来源是位于沃尔特和尼日尔三角洲之间的“奴隶海岸”，这一地区后来被称为“石油河”。

当葡萄牙人在 1483 年第一次到达贝宁时，贝宁的国王们正在这里进行着一系列内部战争，通过这些战争他们巩固了对尼日尔三角洲各部落的统治；而且通过战争他们掠取了葡萄牙人愿意对之进行收购的奴隶供应，之后葡萄牙人又把这些奴隶卖与黄金海岸的种族。葡萄牙人还把奴隶带往欧洲，带往大西洋岛屿上的种植园，此后带往巴西。

葡萄牙人把来自欧洲经济的习惯和态度带到其海外殖民地，奴隶制度的运作，欧洲经济早就轻车熟路，这种熟练由于在非洲海岸贸易的早期经验而得到加强。黄金海岸、象牙海岸、谷物海岸［其实际出产为“伊甸园谷物”或马拉瓜塔（mala gueta）胡椒］依次向欧洲人展示了巨大的吸引力。然而正是“奴隶海岸”在奴隶制向美洲和西印度的扩展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310】伴随着葡萄牙对奴隶劳动的依赖日益增长——这种增长既依赖摩尔人工匠，也依赖黑奴，公共生活中的排场讲究也就产生了，伴以相生的还有冷漠和懒散，以及众多家庭的生活贫困和经济活动的明显减少。葡萄牙人在哪里安顿下来，就把他们的这些态度以及对奴隶制的采用带到哪里，同时，我们也很难低估这样一个事实的重要性，即葡萄牙人打开了非洲海岸及其奴隶供应，其时正值他们探索通往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财富的道路，而且他们最终发现并开发了这些财富。对葡萄牙人建立永久性据点来说，尼日尔三角洲的气候被证实太不利于健康，而且，实际上在 16 世纪早期，他们撤离了在果托（Gwato）的据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放弃了奴隶贸易，因为葡萄牙人在圣多美岛和费尔南多玻岛定居下来，并发现这些岛屿上的气候对发展甘蔗种植十分理想。从这些岛屿到大陆的不间断的贸易被坚持下来。这种贸易大部分是通过非洲人来代理，而且是半世袭的（对他们来说，这里的气候比对欧洲人危害要小），这种贸易为岛上的种植园主提供奴隶，用于甘蔗种植，为商人提供运往葡萄牙本土及其新领土的奴隶。这些岛屿，特别是圣多美岛，甚至在那里的甘蔗种植失去吸引力之后，它仍继续作为获得奴隶的基地，当时正接近 16 世纪末期，那里的一些种植园主开始仿效那些来自马德拉的种植园主，横渡大西洋前往巴西。

6.2 奴隶与蔗糖

由于通往内陆的困难，葡萄牙人在巴西的定居地倾向于限制在沿海地区。大的河流并非通往内陆深处的凭借，而且葡萄牙人没有任何理由转过身

来背向海岸并大胆地离开海洋并放弃航海过来的船只的支援，在沿海的条形地带总是可以找到可资利用的土地的。

迈向殖民化的第一步是建立起10个船长辖区，每一个都沿海岸线延伸约5里格。然而10个辖区之中只有3个被证明是成功的——在北方的伯南布哥辖区、巴伊亚辖区，南部的圣文森特（包括圣保罗市）辖区。尽管圣文森特与邻近的印第安人因为一个葡萄牙人与其首领的女儿缔结婚姻而建立了友谊，但在伯南布哥和巴伊亚都发现，必须与印第安人打仗才能占有其土地，不过，圣保罗探险队（the Paulistas）（来自圣保罗）在寻找奴隶的远征中一直深入到了马托·格罗索（Matto Grosso）。【311】

总体而言，印第安人在沿海地区被要求清扫地面，守卫大型房屋，并做房屋里的家务工作。印第安人的生活是自然主义的。他们强壮而健康，乐于砍伐树木并搬运上船，然而他们并不耕种土地，例外的情况可能是由妇女们种上一点花生或一小片木薯，他们也不饲养家畜。为了对殖民者具有价值，他们的生活不得不一下子从漂泊不定转为定居一地。他们不得不使自己习惯于连续不断的活动和食物上的改变，同时他们必须在殖民者带来的疾病中——鼻粘膜炎、天花、梅毒、痢疾——幸存下来并保持其活力。对印第安人的要求太多了，尤其是为了使这个国家开始生产，这些要求必须在第一次接触时完成。印第安人失去了其活力。他们自己变得退缩了，“成为封闭在内心痛苦中的人”，而殖民者们则迅速地寻觅着一种更令人满意也更勤劳的劳动力资源，如果这块土地上潜在的财富需要开发，如果对移民而言，巴西仍要保持家园般的吸引力，那么就需要这样一种劳动力。

黑人作为社会和经济体制的一部分在葡萄牙和大西洋岛屿早已颇为闻名，因此是这一问题的显而易见的答案。有些葡萄牙殖民者从岛屿来到巴西时确实可能带着他们的奴隶。他们肯定带来了甘蔗的培植，而黑人似乎是甘蔗种植几乎不可避免的对应物。巴西的很多土地都特别适宜甘蔗种植，特别是那3个度过了殖民地初期困难的大辖区：即伯南布哥的邻近地区，巴伊亚附近的雷肯卡沃地区，还有圣文森特辖区——这里是种植第一批甘蔗和饲养第一批引进家畜的地方。欧洲的糖价很高。那里有一种无法满足的对糖的需要，含糖量低的克里奥甘蔗（殖民地制糖业的第一阶段即以这种甘蔗为基础）从中东向外扩展到伊比利亚半岛并从那里扩展到大西洋岛屿和巴西。

当“最初对富饶矿藏的无法实现的希望”破灭之后，以及关于巨额奢侈品贸易的计划失败之后，在巴西，糖成了所有殖民者梦寐以求的东西。糖

算是一种有现成市场等在那里的商品作物。对国王及其官员来说，在巴西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早期的重点在于希望从矿产和调味料获得财富。然而，当农业被认为可以作为财富的来源时，官方为国王所提出的目标是“在不增加本国负担的情况下使美洲旷野有人居住，清理出丛林地带的土地，并防御海盗和野蛮人进攻这些地方，而且要把它们变为出产物产的地区，所有这些【312】事情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只是那些敢于践踏地球上这一片如此荒凉的土地的人的勇敢”①。法律制度对授予大量适于做种植园的土地提供方便，国王或多或少地承担着扶植种植的责任，责成那些被授予土地的封建地主从事农业方面的工作。他们被允许独占榨糖机并用来推动它们的水轮。这种做法和当地土壤的天然优势，再加上糖是最具现实性的财富和与适意源泉这一事实，足以使他们把农业方面的兴趣转向对糖的执著。在定居地经历的第一个世纪结束之前，这样一种看法被接受下来，即“出于上帝的旨意，由于在巴西得自蔗糖和棉花，木材和鹦鹉的金钱，陛下的财富中将增加许多纯金”②。

用于甘蔗的种植园的数量从 1576 年的 30 个增加到 1584 年的 76 个，而到了 16 世纪前 1/4 结束时，则增加到了 180 个。出产的甘蔗数量超过了榨糖厂所能处理的数量。据估计，即使甘蔗的农业生产完全停止，仍有足够的甘蔗可供榨糖厂正常工作 3～4 年，而且葡萄牙人的船运尽管一年达到了 30～40 船，仍无法从伯南布哥运走所有蔗糖。这些或许是市场饱和的特征，然而在整个这一时期糖价却仍旧居高不下，而存货量的积累与其说是由于该商品的过度供应，不如说是加工和市场推销方面的无能导致的结果。

粮食作物的种植某种程度上为蔗糖所牺牲。然而蔗糖贸易中所显示出的缺少平衡是能力不足的结果，而非来自这种贸易本身任何固有的弱点。因为，葡萄牙人在此项贸易中地位显著而且非常幸运，不仅要处理过去的经验以及获取关于机械和所需技术知识，而且还要处理所需劳动力的来源问题。

尽管 1525 年运向巴西的第一船黑奴比运往西班牙殖民地的黑奴晚了若干年，却仍是处于巴西殖民地形成的早期和形成期，黑奴贸易的开始是缓慢的，因为对殖民者来说，黑奴是一种资本的投入，而并非所有殖民都能够负担起这种投资，特别是早期的移民都倾向于这种奴隶的地位状况是由他们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失败而引起。在南方，圣保罗探险队继续寄希望于印第安奴

① 转引自吉尔伯特·弗瑞尔著：《主人和奴隶》（纽约，1946 年），第 252 页。
② 转引自吉尔伯特·弗瑞尔著：《主人和奴隶》（纽约，1946 年），第 252 页，引自 Joas Lucio de Azevedo, *Épocas de Portugal Ecôonomico.*

隶，并继续深入内地寻找他们，直到 1570 年的王室法令宣布所有印第安人获得自由（除去那些根据国王或总督的命令参加战争者或那些具有攻击性的食人生番）时才停止。在伯南布哥和巴伊亚，黑人更容易地和更早地成为一种主要的角色。到 1585 年，当巴西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成为一直保持到 17 世纪结束时的那种模式时，据估计殖民地的居民数量为 57 000 人，其中 25 000 人是白人，18 500 人是“开化了的印第安人”，还有 14 000 人是非洲奴隶。在总体数字之内，地区间的差别相当大。据推测伯南布哥有大约 10 000个黑奴，而巴伊亚约有 3 000 个黑奴。另据估计大约在这一时间，伯南布哥首府奥林达有 700 个居民，其四周有 50 个制糖厂，每个制糖厂有 20～30 个居民，而雇用的黑人总数达到 4 000 人。在其他地方，甘蔗种植没有这么多，而且黑人并非作为一种投资，他们的数量也就没有这么多。【313】

在 16 世纪，大西洋岛屿降低为次要的地位，而巴西成为葡萄牙的巨大的殖民定居地，葡萄牙人在那里从事基本农业生产。而且像过去在大西洋岛屿一样，葡萄牙人发现了现成可用的黑奴，能干，精力充沛，而且往往习惯于农业生活，可以用来做田间的重体力劳动。

然而，奇怪的是，贩卖黑奴的贸易甚至在黑奴成为葡萄牙殖民地自身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之前就已经是葡萄牙人的一种重要的利润来源了。16 世纪中期以后，巴西农业的发展推动稳定而繁荣的交通得以开辟，这种交通为那里的殖民者的甘蔗种植提供了黑奴，早在 16 世纪第一个 10 年以来，葡萄牙商人就开始向在新世界的西班牙殖民地运送黑奴。这是因为在奴隶拥有上，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葡萄牙能够为了海外地区的开发而从它所控制的地方运来奴隶，这点是非同寻常的。而同时西班牙却总是被迫到自己的帝国之外去获得所需要的奴隶，这点同样是非同寻常的。西班牙在非洲海岸没有殖民地。

6.3　西班牙帝国的印第安人和黑奴

葡萄牙人是在君主制的领导下迁移到他们的殖民地的，然而，面对新的需要时，他们在如何调整其制度这一问题上没有清晰的观点。相反，西班牙人却贯穿了一种显著的和条文主义的帝国理论，这导致了对管理的经常性的而且有时是成功的探究，而这种理论包括一种明确规定了的照顾到土著居民的政策。这种盘算周到的帝国主义理论包括政治、宗教和经济的监护责任，【314】

然而这些责任要由实际的、准备移民的人来实施，而这些移民的兴趣首先在于使新地区成为有利可图的地区。尽管有君主制政权，有由贸易商行对所有与新世界接触的严格控制，还有对移民的严密筛选，很多不加掩盖的投机者仍很快就想办法来到西班牙殖民地，而且，据传说，起初他们都是“灰心而绝望的人”。这绝不是说所有人都是罪犯。然而，即使那些征服者们(Conquistador)（指那些在 16 世纪征服秘鲁、墨西哥等地的西班牙人——译者）有hidalgo（西班牙下级贵族——译者）的背景，以及纯粹而坚决的扩张目标（正是这一目标到 1550 年时把西班牙人从新斯科舍带到合恩角，从俄勒冈带到了麦哲伦海峡），他们却更多的是个人主义者，相对于推行西班牙国王政策的要求而言，这些人意志更加果敢但却没有多少仁慈。

在殖民地开拓方面和在地理大发现方面一样，哥伦布都是伟大的革新者。他很早就意识到他所发现的土地需要通过殖民来使之用于生产（他并没有到达过经济已经得到过充分发展的远东），他建议伊斯帕尼奥拉的殖民应当在一个集体农场的基础上进行，并对淘金者进行限制，对大约 3 个或 4 个城镇授予市政权利，控制由加的斯（Cadiz）通往欧洲的全部贸易，并对移民的数量进行限制（他建议限制在 2 000 人），发展重点要放在农业和基础牢固的社会发展上。此外，如果需要组织生产，而且不具备一种已经存在的贸易制度，那么必须要为新制度的基础付出开支。哥伦布建议牛群和其他家畜应当用出卖奴隶的钱来购买。这一建议不仅为西班牙的劳动力状况投下意义重大的亮光（奴隶在西班牙像在葡萄牙一样颇为闻名），而且同样显示了哥伦布自己在第一次接触中，对加勒比印第安人的看法。根据 1492 年的外侨权利法他被任命为世袭总督、州长、海军统帅和西班牙殖民地的舰队司令，然而他的意见与西班牙的既定政策相违背，而且与女王的意愿相违背。在 1494 年，一个法官小组宣布印第安人是自由的（尽管他们不适合自我管理），而伊莎贝拉也把哥伦布送到西班牙的一船加勒比奴隶又送回加勒比岛屿。哥伦布手下的那类殖民者表示不愿意为集体农场工作，进而，1498 年，在印第安人造反时，哥伦布的困难达到了顶点。解决办法提供出来了，至少是提供了暂时的解决办法，因为法律学家炮制出了“正义战争”的理论，按照这种理论，拒绝接受加给他们的规则的印第安人将被剥夺其自然权利并被合法地变为奴隶。这种办法是在哥伦布的事业即将结束时到来的，那时他[315] 被免去官职并于 1500 年身带枷锁被解送回国。伊斯帕尼奥拉在他最后的几年获得了执照，那时把印第安人作为奴隶这样一种可能性已被接受。而 1498 年的海外远航搭载着新的移民，其中很多人是罪犯，他们是被一年的

免费粮食供应吸引而来的。

作为总督的哥伦布也曾寻找过解决其困境的办法，他全盘放弃了集体农场的形式，并且把移民编入“分派劳役制（*repartimientos*）”，即对土地或劳役进行分配，或对两者都进行分配。一般是在准军事的基础上对土地及其附属的劳役进行某种半封建式的授予，一个步兵的份额是差不多100公顷组成的一个“*peonia*”，一个骑兵的份额是大约500公顷组成的一个“*caballeria*”。这一革新导致了非常强烈的抗议。哥伦布（和从他那时起的很多总督一样）所受到的攻击既来自他试图压制的殖民者，也同样来自为了加勒比人的参与此事的人道主义者。教会对哥伦布大声反对，大部分消息来自奥万多和拉斯·卡萨斯，这些消息似乎使得西班牙政府被认为是为了移民的短期利益而对土地和劳动力进行自私自利地开发。然而，当奥万多在1502年为执行一次特殊使命（他拥有凌驾于全体官员之上的全部权力并负责纠正滥权和维护公正）而到达伊斯尼奥拉时，他发现那里仅有300个殖民者。他们掌管着相当数量的赖以谋生的种植园，而且为了使它们投入生产而征派繁重的劳役，村庄和当地的社会因此被破坏，甚至连西班牙人的统治似乎也受到威胁。奥万多奉命让加勒比人重新返回其村庄，并给他们分配居留地，而且为他们提供保护和建立学校。

然而，为了进行生产，加勒比人仍然不得不充当劳动力，因为殖民者的数量太少，而且对体力劳动过于冷漠，无法亲自从事沉重的农业劳动。这种困境在皇室的命令中也得到反映。尽管印第安人可能被强迫进行建筑、采矿和农业方面的劳动，他们却是作为自由人为工资而劳动。奥万多开创了要求加勒比酋长提供固定份额的劳动力并将这些劳动力按照“监护征赋制”给予殖民者的制度，而上面提到的这种饱受争议的解决办法就是在这时确立的。在“监护征赋制”中存在着毫无疑问的“信托”因素，西班牙人的“监护征赋制”把分配给殖民者的印第安人的监护权也给予他。这种制度所隐含的信念是把印第安劳工结合到白人和基督徒的群体中，这本身就是一个使勤劳的习惯和基督教价值观代替其异教的习惯和价值观的教育过程。同时也很确定的是，这种制度作为向移民提供其所需劳动力的工具可谓显得恰到好处，而没有它，他们的生存就会面临困难。殖民者比西班牙政府，有时甚【316】至比传教的牧师们，更加方便地利用这一制度服务于自己的目的。

“监护征赋制”注定要在南美大陆扮演其角色，因为西班牙殖民地巨大的矿产财富导致了对矿场劳动力的稳定需求。在那里，这种制度经过调整和发展，以“米达（mita）”制度而知名，它造成那些被指定从事矿场劳动的

印第安人几乎永久性地背井离乡，因为矿场遥远并需长途跋涉、长期不归，由此还造成家庭生活的破坏。就这种制度的方式而言，它并非缺少慷慨大度，因为印第安雇工可以选择新的主人，以赎买自由，而且可以和妻子和家庭生活在一起。然而它是迫不得已的，并且成了事实上的奴隶制。更有甚者，从卷入此事的人的类型来看，这种制度几乎不可避免地遭到持续不断地滥用。并且它受到教会和国王及其下属同样地持续不断地关注。“米达(mita)”制度以及对它的全部滥用在中美洲一直持续到进入 18 世纪后的很长时间，它使得那里的印第安人成为经济生活一个重要而活跃的因素，它也把印第安人的文化和西班牙人的文化融合起来，从而生产了作为经济基础的贵金属，发展了一系列优美的城市和良好的教育机构，并形成了一个宽容的、无种族歧视的拉丁美洲社会。

西班牙人的方法的优点部分地在于个人的冷漠和宽容，部分地在于政府的原则。在教会强烈而可能时断时续的促使下，西班牙国王通过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法令（并非全部都得到贯彻）介入此事，以阻止对“监护征赋制”和“米达（mita）”的滥用，并试图创立一个印第安人在其中占有合适位置的社会，即他们既作为大部分土地的所有者而有权利，也承担作为劳动力来源的义务。1512 年的“布尔戈斯法”改革了许多滥权，特别是规定了任何妇女和儿童都不得被强迫进行沉重的野外劳动。在这些法律形成之后的几年内，随之而来的是在枢机主教西门斯（Cardinal Ximtnes）领导下成立了一个调查滥权委员会，还有就是对“监护征赋制”进行重新分配，以及按照两个人的寿命期限进行授权（因为以一个人的寿命作为占有期，会使得占有者尽其所能地利用其特权，并毫不怜悯地剥削其所占有的印第安人）。此外，西门斯为印第安人建立了保留地，这一时期的情况清晰地显示出，教会与政府作为一方，殖民者作为另一方，二者之间发生了利益冲突。当快到 16 世纪中期，在中美洲的矿藏开始引起更多注意时，分歧也达到了顶点。1538 年的一个教皇训令禁止（形式上的）对印第安人的奴役，而 1542 年的【317】修订法案（the Recoplilación of the Laws）对整个制度进行了修正。

修订法案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多米尼加人拉斯·卡萨斯（Las Casas）即“印第安人使徒（Apostle of the Indians）”的影响，它谴责奴役印第安人的想法。他寄希望于自己作为僧侣已经取得成功的试验，他确保在危地马拉省没有印第安人“被委托给他人”，而且他通过传教上的努力确保了那里的印第安人作为自由人而顺从。西班牙国王确信印第安人在服从并与西班牙人的合作中应得到其适当的利益，因此修订法案规定不得再授予新的“监护征赋

制”，而现存的则全部在其拥有者去世后停止。任何印第安人都不得被作为奴隶，甚至在“正义战争”时也是如此。同时，由于“监护征赋制”消失，任何政府或教会官员都不再拥有印第安人，印第安人则被送回他们的村庄，在其土著酋长统治下生活。“监护征赋制”的终止者将获得赔偿，特别是对拥有者的遗孀和子女，赔偿来自国王的岁入。然而，殖民者深知，没有劳动力他们的土地将一钱不值，他们的征服也将毫无意义。有些官员拒绝公布新的法律，在秘鲁爆发了武装叛乱，墨西哥受到反叛的威胁，教士和官员同样受到蔑视，而且有充分可能发生的是，一次普遍的叛乱将在新世界发生，并将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国家，以及使西班牙失去滚滚财源，正是这种财源才使它刚刚开始显示出具有国际重要性。查理五世被欧洲的五花八门的麻烦所困扰，于 1545 年撤销了新的法律，从此以后，西班牙国王承认“监护征赋制”为一种必要的制度，并致力于减轻它的缺陷。

当 1565 年菲律宾被西班牙征服时，“监护征赋制”也扩展到那里，然而，接受并延续这种制度的需要（或与此类似的需要），与为了印第安人的利益而抑制它的需要两者的结合，导致了一种隔离制度的发展，其中每个殖民地政府下属的印第安人事务官负责保护印第安人的利益，而印第安人则被与欧洲人隔离开——除了与他们的官方指导者和保护者才能接触之外。他们在自己的村庄里共同居住，而他们的监护者（encomiendero）和他的工头和监工同样都被禁止与他们住在一起。当印第安人被要求服劳役时，他们才出现，其他情况下则在（保护性的）屏障后过自己的生活。他们不用作为家庭奴仆，不被供给酒类，他们的主人负责使他们有基督教牧师。任何单个的“监护征赋制”都不得超过 300 人。对这种制度的这种修补使它一直延续到 17 世纪末并进入到 18 世纪。这些修补并没有始终得到不折不扣的遵守，然而尽管它们所容许的滥权造成了严重的人口减少。却保证了西班牙—美洲印【318】第安人在大陆幸存下来，并为西班牙殖民者提供了适于采矿和适于更普通的农业以及适合于其他各方面发展的劳动力。这种制度使大批印第安人留在了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并成为自由的村庄。它还使得许多“被委托”的印第安人在“监护征赋制”因授权到期而结束时，与他们成长于其中的种植园结下了经济的和社会的联系，这些人尽管在法律上是自由公民，却表现为西属美洲的偿债式工人。

“监护征赋制”与西班牙人在美洲大陆所征服的边界一起向前发展，而且事实上正是“监护征赋制”使得“征服者”能够在他们所取得的土地上进行投入和生产。同时，在加勒比岛屿，几乎在西班牙人开始进入大陆之前

"监护征赋制"就已经破产。这种经历上的反差，部分地由于单纯的时间年代原因，部分地在于社会制度的原因。在这种制度下，这些岛屿最早经历了把印第安人作为劳动力的不加限制的试验，而且经历了由西班牙人对一个原始的和不对等社会的劳动力需求所造成的影响，而在中美洲，西班牙人遇到的是强大而具有能力的部落和王国，后者具有充分的统一性，而且在作为其基础的经济中，农业、建筑和采矿的沉重工作被视为生活的组成部分。中美洲的居民对在同一环境下持续劳动的想法并不反感。而发展程度较低的加勒比人（其经济是以渔猎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却发现西班牙所需求的那种劳动是不可容忍的，这正如巴西的印第安人在面对葡萄牙人要求时的情况一样。加勒比印第安人从白人那里"走开"，不再去满足其要求。他们不仅没有提供满意的服务，而且他们死了，伴随着对生活的厌恶，在一代人之内，人口的绝对缺乏使得他们非常不适于殖民者的要求。关于这种变动的数字，我们不可能精确地获得。然而结果却是清楚的，而且估计出的数字可以作为这一过程的一个指示物。据推测，在 1492 年西班牙人进入时，伊斯帕尼奥拉的加勒比人口总数约为 300 000 人。到 1508 年减少至约 60 000 人，到 1514 年重大的殖民开始时，一次巨大的减少使人口到了约 14 000 人，到 1548 年则达到了一个几乎预示着灭绝的数字：约 500 人。[1]

欧洲人的疾病在加勒比人口的大批死亡中起到了一定作用，然而，毫无疑问主要的原因是对白人占领所带来的变化的一种消极厌恶。加勒比人长期以来习惯于西印度的自然条件所允许的无需费力的生活，他们不具备对欧洲【319】殖民者进行抵抗或合作所需要的恢复能力。由于家庭生活和社会稳定被"监护征赋制"的要求所破坏，加勒比人退缩并死亡。他们的位置被黑人奴隶所代替，这些黑人身体强壮，能够胜任热带条件下的沉重劳动，而且在面对逆境时具有令人惊叹的恢复力。

最早为人所知的向西班牙岛屿运送黑奴的现象是在 1505 年。然而，在此之前，实际上从西班牙殖民地最开始时，就很可能有黑奴被运来，因为黑奴在西班牙颇为闻名并为人们所接受，而且奥万多在 1501 年接到的指示强调，尽管犹太人和摩尔人奴隶要被排斥在殖民地之外，却应鼓励黑奴的进口。更有甚者，早在 1503 年，奥万多就抱怨，逃难的黑人在印第安人中间传播了坏习惯。伊莎贝尔女王似乎非常认真地关注这个问题，甚至于命令只有白人奴隶才能够被带到岛上！然而这发生在她统治的最后一年，而且我们

① E. G. 伯恩著：《西班牙在美洲（1450～1580 年）》（纽约，1904 年），第 211～214 页。

可以清楚地找到当时黑奴进口许可证明的证据，当她去世时，费迪南德毫不犹豫地鼓励和发展这种贸易，按确切的数字，在 1505 年运送了 17 个黑奴，同时还有采矿用的设备，与这种变化同时的是，奥万多请求运送更多的黑奴。

这种发展情势部分地来自于一个早期发生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的进行采矿的权益，因为伊莎贝拉给费迪南德留下了王室在西印度的一半份额。然而，伊斯帕尼奥拉并非是仅有的与此有关的地区。在早期，这个岛屿是去往西班牙的船运所要经过的正常货物集散地，随着西班牙殖民地的扩张奴隶从这里被运往其他岛屿。这样，波多黎各在 1509 年被殖民，而奴隶不久就被带往那里；牙买加在 1509 年民被殖民，1517 年那里肯定有了奴隶，而且很可能是在更早几年；古巴同样在 1511 年被殖民；达里恩（Darien）是大陆上最早的殖民地，它建于 1511 年，而早在 1513 年那里就有了黑奴。

西班牙殖民地的这种黑奴引进，是一种没有组织的引进。然而，它显示了黑奴所能从事工作的价值，还显示了黑奴弥补加勒比印第安人缺陷的方式。在 1510 年贸易商行接到组织供应黑人劳工的命令，而且，因为印第安人不适合，官员们接到的命令是要把黑人送到矿上劳动。根据命令，100 个黑人，然后是 200 个黑人将由财政部运走，并在到岸时卖给殖民者，这是一种新特征的开始，即一种投机的奴隶贸易的发展。它非常不同于截至此前所发生的为已知主人的个人利益而运送极少量黑人的偶然性行为，黑奴因此而成为【320】一种商品，黑奴贸易的本质特征因此而得以确立，即它是一种有组织的贸易。

到这时，西班牙殖民地的黑奴是来自伊比利亚半岛。当运输路线能够从非洲海岸直接到达加勒比海岸时，黑奴贸易有了进一步发展。然而，最值得提到的事实是，西班牙与葡萄牙相反，不得不向其殖民地之外寻找这种至关重要的供应。进口这种“商品”需要收入许可证或“贩奴合同（asiento），”“贩奴合同”的制度即由此而来。而由于葡萄牙人拥有贩奴经验并在非洲海岸拥有殖民地，不可避免地成为黑奴供应的主要来源，而且不可避免地为了逃税而卷入走私贸易。贩运黑奴的执照具有相当大的好处，既是因为它使人能够进入一个活跃的市场，而且也是因为它提供免税。从 1516 年查理五世统治开始时，这类执照被作为年轻君主个人喜好的标志而自由发放，它们中的绝大部分到了他所宠爱的佛兰德人手里，而这引起了西班牙朝臣的反对，特别是摄政的卡迪纳尔·西门斯的反对。然而，究竟西门斯是更关注岁入可能来源的损失，还是更关注人道主义的问题，或更关注佛兰德人的优先权，或更关注人口稀少的殖民地是否会由于引入过多奴隶而发生奴隶暴动的危险，仍然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肯定的是，奴隶的数量已变得相当的多，

而且这种关系到岁入和国家利益的贸易肯定已经呈现出重要性。

因为看到葡萄牙殖民地的情形，对奴隶暴动的恐惧部分地消除了。在那里，据说甚至毫无防卫的寡妇也能和平地生活在多达 800 个黑人中间，有关的当事人说，只要处理果断，就不会有危险。宗教命令及其对印第安人的关心也影响了对黑奴的政策。伊斯帕尼奥拉的多米尼加人宣称，如果印第安人被限制在“分派劳役制”中，那么，黑人对减轻对印第安人需求是至关重要的，并能在印第安人获得自由时代替他们。这种使用黑人来减少印第安人需求量的想法，后来由拉斯·卡萨斯有效地予以实施。这种想法是大多数官员的共识和多数殖民者的需要。大陆上的殖民地和岛屿上的殖民地一样，三番五次地要求准许进口黑奴，这部分地是因为印第安人不适合殖民者的目的；部分地是因为印第安人诉诸于一种法律和公正的意识。由此，黑奴被解说为是使印第安人获得保护的惟一方式。黑人没有同样诉诸正义的意识，这【321】是一种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这种特征成了 3 个世纪或更长的世界历史的标志，并使欧洲人的海外扩张的方式得以创立。

对拉斯·卡萨斯来说，基本的需要是使到来的白人殖民者的数量令人满意。然而，当西门斯死后，大主教修士把他的请求直接带到国王那里时，他的想法被表达为，每个新的殖民者必须被允许携带 12 个黑人，从而不必再需要印第安人的劳动。这种原则一度认可，可以奴役黑人，以便使印第安人解脱出来，问题的是需要多少黑人才能使殖民地稳定下来。贸易商行提出安的列斯需要 4 000 个黑人。在 1520 年，美洲大陆采用了同样的方法，最初的安排是每个殖民者配有 3 个奴隶（后来增加到 7 个），此后需求大增，达到了五六百个。早期的提议和实践是让西班牙商人把货物从塞维利亚带到几内亚海岸，用来在那里换得奴隶，并在其许可证的期限内把他们运往西班牙殖民地。然而这需要葡萄牙君主的允许，而且意味着有些西班牙商人从事这种贸易时没有许可证乃至有无视葡萄牙当局的意思。在此基础上，从事有限数量的贸易是可能的，也是有利可图的。然而对某项较大的协议，像 1518 年授给布雷萨（Bresa）总督的购买 4 000 个奴隶的重要许可证，需要区别看待。来自西班牙当局的特权性的垄断不可能与蔑视葡萄牙当局的走私贸易混为一谈。

授予布雷萨总督的许可证所采取的形式是国王下达给贸易商行的命令，它允许把 4 000 个奴隶不被干涉地运往西班牙的西印度，而且受益人同样被授权到非洲海岸寻找奴隶，并直接送往西印度，而不必返回塞维利亚。最后这一点是一项例外的特权，不同于大约同在此时发放的其他较小的许可证，这些较小的许可证的受益人被要求把奴隶带回西班牙。不过这种较小的许可

证与发给布雷萨总督的许可证相比是无足轻重的，后者显然打算垄断奴隶贸易，而且被允许将其许可证转包出去。奴隶贸易的垄断是更为重要和更具危险性的，既是因为它没有终止日期，也是因为它把对西班牙种植者来说至关重要的劳动力供应交到了作为宠臣的获益者手中。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垄断者把这一非常关键的供货服务转包给非本国人，甚至是包给西班牙的敌人。这对西班牙人是一个弱点，这个弱点是西班牙整个帝国时期的显著特征。【322】

6.4　奴隶贸易与国家间的对抗

全部劳动力问题只是欧洲走向新世界的经济演化过程的一个方面，而总体上的经济方法是在 15 世纪和 16 世纪武断的民族主义的环境下推动形成的。那个时期出现的民族国家的大部分特征来自其君主，开发新世纪的经济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君主的能力和弱点的限制。哥伦布的航海（正如人们熟知的那样）是由伊莎贝尔女王卖掉自己的珠宝来资助的，而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成了卡斯蒂利亚国王的属地的一部分；葡萄牙人的探险是阿维兹王室（the House of Aviz）的个人冒险事业，西印度的商业也为这一王室所拥有；伊丽莎白女王则在从她所统治的从英格兰出发的航海业务之中拥有股份，并（徒劳地）希望获得一部分利润。在对欧洲外交局势的新的估计中，哈布斯堡王朝是支持旧制度的中坚；新出现的民族国家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对哈布斯堡王朝的要求和野心予以蔑视。在对不同的国家进行衡量的时候，经济因素并非第一次像外交和军事对比那样被考虑在内，因为，在中世纪晚期，不做这种考虑是普遍的做法。然而，在地理大发现时期，国家财富所被赋予的超乎寻常的重要性是没有先例的。对雇佣兵的依赖日益增加，君主对货币收入的依赖日益增加（当这种收入无法获得时就会产生相应的缺点），由过去时期王朝间的争吵加上宗教和民族的自我意识而导致的国家之间的紧张和不宽容日益增加，这些事情对解释这种新的经济侧重点大有帮助。然而，如果不考虑 15 世纪和 16 世纪的政治家（不论世俗的还是教会的）比以往更多地思考经济因素这一事实，任何解释都是不令人满意的。尽管这似乎是试图仅仅通过对问题的说明来解释它，这种态度上的变化仍是极为重要的。其结果是，地理大发现以一种新的方式被带入外交对比。哈克卢特勉励他自己反对哈布斯堡政权的同伴，“你们要在西印度打击它，就像打在它们眼珠上一样”，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的劳动力的缺乏，就成为为其对手所利用，而为[323]西班牙政府所防护的事情。正如他们不能被期望在不考虑当时的军事战略准则的情况下去筹划其欧洲外交一样，人们也不再希望哈布斯堡君主及其顾问在不考虑当时已被接受的政治经济学准则的情况下去管理西班牙海外属地。的确，由于美洲的矿产流入西班牙，它不再像欧洲其他国家那样由于保存用作军费的贵金属而面临窘境。作为结果，对贸易平衡的关注，和对防止金银外流的关注，不再成为西班牙政策的显著或一贯的特征。然而，这只是全部游戏中的一张牌，而且并非必然由西班牙来打这张牌。西班牙政府充分认识到经济因素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影响到外交和军事事务，在设法安排其经济生活以便产生外交和军事结果时，它像 16 世纪欧洲其他国家一样是“重商主义者”（如果这一概念可以正确地用于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例如，西班牙希望利用禁止英格兰货物输入到荷兰而在英格兰激起骚乱和反叛，从而推翻伊丽莎白政府，或至少迫使它在英格兰恢复罗马天主教。

贩奴贸易恰好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到来，它的来到时机之所以恰如其分是因为其关键之处是一种以一定条件为基础的垄断。这种特许权和特权与对它们的滥用一道成为后来的“重商主义”体制的醒目特征。然而，让它在新世界生存的要素之一——这种处理方式受到很大争议，而且也是西班牙当局严重不安的一贯原因。因为在颁发许可证问题上的偏袒徇私和能力低下，对“奴隶贸易”的无知和利用许可证转包，导致了许多滥用权利，供货不足和高价，为走私和腐败造成了方便。第一次重要的特许是在 1518 年，应在 1527 年到期，然而实际上许多次船运都是在这一日期之后以这个许可证的名义进行的。真正的贩奴合同——作为缴纳款项的报酬的特许证（绝大部分给了非西班牙人）——时期开始于 1528 年授予两个德国人特许证，它是为了酬谢他们支付给皇家财政部的 20 000 个银币（ducats）而允许他们在 4 年之内进口 4 000 个奴隶。这是一种垄断，它使殖民者处在垄断者的摆布之下，而垄断者作为外国人，其利益在于弥补他们付给财政部的钱，并尽可能多地在限定的时间内从其特许中获利。伊斯帕尼奥拉是最良好的供应奴隶市场，然而甚至在那里（在 1531 年一个新的金矿刚开工）奴隶都特别稀少、昂贵而糟糕，以至于抗议声从未停止，它来自教会、同样也来自国家。这无妨于这样的事实，即德国人把他们的“贩奴合同”转包给葡萄牙人，葡萄牙人借此在里斯本和西班牙殖民地之间，或是在加勒比岛屿和葡萄牙西非据[324]点之间建立了一种直接贸易。

“贩奴合同”制度的缺陷是如此明显。以至于除了已成过去的特许权留下

的残余影响以外，自德国人的特许权到期开始，这种制度被放弃了，这种放弃一直持续到1580年西班牙占领葡萄牙及其海外殖民地时。这两个时间中间的这些年，对奴隶的需求是增长了，而非下降了，这种需要是通过颁发一系列临时的、短期的许可证来满足的，奴隶的数量通常限制在大约300人。这些特许权与大型的、垄断的“贩奴合同”区别显著，它们为国王带来了一定数量的税收，并给殖民者提供了奴隶。然而它们在消除西班牙帝国经济的巨大缺陷方面毫无作为；它们并没有提供一种稳定的、受到控制的、必需的劳动力供应。奴隶的数量，以及他们相对白人殖民者所具有的人数上的优势，在这一时期确实增加了，而且之所以没能做出一种持久的和令人满意的“贩奴合同”的安排，是因为没有西班牙人能够承担它，尽管西班牙政府看起来在有靠得住的投标者的情况下乐于尝试一种长期的贩奴合同。此外，国王的需要使得那些已经付款的特许权无法确定究竟能否在其年限内得到兑现与尊重，因此，国王最多只能出卖一种短期的特许权，通常是卖给勤勉的商人而非宠臣。

对奴隶劳动的依赖有一个几乎不可避免的特征，即这种需要从来没有充分而廉价地得到满足。因为劳动力是奴隶占有制里最容易消耗的因素。到查理五世统治结束时，在西班牙与其殖民地官方信件中，有许多提到奴隶对殖民地经济的必要性，以及对奴隶短缺的抱怨。然而，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限制都未能把这种非常重要的贸易控制在西班牙本国人的手里。确实有一些西班牙商人得到了相当数量的特许证，然而，外国人的数量还是超过了他们，而且有理由认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只不过是外国人的中间人罢了，这些外国人设法逃避那些规定所有与西班牙殖民地之间的贸易都只能由西班牙公民进行的法律。然而有一种规定却得到维护，即殖民者不得亲自从事这种贸易，不得前往里斯本或非洲取得他们需要的奴隶。

在这种情况下，走私和私下纵容的运输应该是富有吸引力并大量进行的，这点并不奇怪。这类运输的进行伴随着某种道德上的确信，即他们并未做错什么，而且的确是在为殖民者提供被政府法令所剥夺的必需劳动力。一般而言，这类运输前往非洲海岸获取奴隶时，将会严重侵犯葡萄牙的不动产，而这些奴隶被带到西班牙殖民地出卖时，不过是逃避了某种形式上的禁令，葡萄牙比西班牙对自由贸易的禁止更为严重。到目前为止，奴隶贸易的这种方式使16世纪的商人们感到满意，以至于一批强有力的英国商人注意到了建立一种盎格鲁—西班牙合作关系的可能性，以这种方式从事这种贸易，以便满足殖民者对奴隶的需求，西班牙政府想要的是经济上的力量和控制，英国商人则想获得由此产生的利润。这似乎直接打破了这一时期占支配【325】

地位的政治—军事联盟，不过必须记住，在伊丽莎白统治早期，英国与西班牙并没有处于明显的敌对关系中，而且这种敌对的确大部分是由英国海盗船在内罗海（Narrowsea）的劫掠引起的，这一系列的劫掠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奴隶贸易中的事件。与勃艮第之间的某种旧有联盟仍然在缓和着英国与西班牙之间的关系，法国仍然是这两国的头号敌人，而且在卡托—康布雷齐条约中，菲力普（他认为他与伊丽莎白之间的婚姻既无可能也不诱人）坚持认为，与法国所支持的苏格兰玛丽女王的宣称相反，伊丽莎白才是英国合法的女王。

然而，我们仍需付出努力才能认识到，约翰·霍金斯之所以开始进行向西印度运送奴隶的贸易，是因为他希望他或许能在英国和西班牙之间建立一种固定的商业合作。两国之间已经存在着牢固的贸易关系，在西班牙港口有英国商人居住，并构成势力强大的侨民，也有从这些基地进行的贸易，霍金斯和他的父亲威廉早就在这些传统线路上从事贸易，并已经发了大财，获得了长足发展，而且正是在前往卡纳里斯和马德拉的航海中，他们开始意识到因西班牙缺少奴隶而为他们提供的商业机会。几内亚海岸的黄金贸易似乎有时同样具有吸引力，然而葡萄牙船只在那里守卫，甚至在王室的某些支持下英国商人仍未能闯入。在 1562 年约翰·霍金斯与他的同伙在一次这类试图闯入几内亚海岸的黄金贸易的企图失败之后，开始在奴隶贸易中提出要求。霍金斯在田纳里菲（Teneriffe）带上一个西班牙舵手，不顾葡萄牙当局的反对，在塞拉利昂获得了 300 个奴隶，然后前往伊斯帕尼奥拉。他的想法是这样的，就西班牙而言，他把奴隶卖给缺少劳动力的殖民者是正当的，这种正当性来自于“公海的自由和西班牙与英国人对对方港口所享有的彼此互惠的贸易权利，并依靠于英国和勃艮第家族之间悠久的商业协定”[1]。尽管对葡萄牙而言他的行为是值得争议的，霍金斯对西班牙的接受充满信心，他在完成一次非常出色的贸易之后，派出两艘装载奴隶的船只前往西班牙卸货。然而，西班牙政府没能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这一事件，他的船只被送往西班牙，他留下的一些用来在佛罗里达的殖民地支付可能的西班牙税收的奴隶都被没收。霍金斯感到不满，却确信这是一种为双方带来利益的重大机遇，于是他于 1566 年开始了第二次航海，他发现他在几内亚海岸同样面对葡萄牙人的反对，在西班牙本土（这次他前往大陆而非岛屿）面临直截了当的禁运。

【326】

尽管他的奴隶是殖民者非常需要的，霍金斯这一次却没人光顾，直到他抗议说他需要的只是诚实的贸易。他在博布拉塔（Burborough Water）卸下

① J. S. 柯尔伯特著：《德雷克和都铎王朝海军》（1）（伦敦，1917 年），第 81 页。

了 100 个奴隶，此外他还不得不展示武力，以便从设在里约得拉哈卡的西印度财政部获得对自己账单的付款，殖民者的疑惑被霍金斯的炫耀武力所平息，他做了一笔好生意，设法从这次冒险投资中获得了 60% 的利润，并且在离开时从博布得拉哈卡总督和西印度财政官那里都得到了关于他良好行为的证明。

通过诚实的贸易，被默许的走私，或直截了当的武装入侵，霍金斯表明他和其他类似者能够轻而易举地蔑视西班牙对其殖民地的经济和军事的控制。他通过这些做法使自己不再拥有任何作为一个英国人的特殊想法，即不与西班牙为敌的想法。因为西班牙人感到，如果有机会，他们和其他类似的人将不可避免地转而攻击每年横渡大西洋运输来自那新世界矿产的金银的运宝船队。这种危险使得在伦敦的西班牙大使及其背后的西班牙政府关注这一问题。霍金斯著名的第三次航海是前往圣胡安德岛洛阿，他击败了西班牙官方的报复并因此开始了无可挽回的德雷克（他当时在船上）和英国海盗与西班牙人之间的仇恨。这转过来又在很大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他们与西班牙无敌舰队之间的斗争，并导致了欧洲外交与军事力量在其平衡和目的上的改变，其中，西班牙的无敌舰队立即成为一个原因和一个特征。奴隶贸易在使英国和西班牙进入无休止的敌对中起了作用，并激发英国采取一项对西班牙关于新世界的单独占有要求进行挑战的政策。到目前为止，即到 16 世纪末，英国政治家和商人同样都全神贯注于在北爱尔兰垦地殖民的实际可能性，并专心考虑他们长期以来与近代欧洲和与黎凡特的贸易关系，而且专注【327】于从渔业向种植园的转变，这些种植园位于纽芬兰和北美洲的部分海岸线。只有拉雷赫和极少数具有同样想法的投机者开始想到英国在美洲大陆和岛屿上的殖民地，然而他们的冒险却是命运不济的，他们的事业遇到了斯图亚特王朝的政治家的强烈反对，这些政治家仍然梦想着恢复盎格鲁—哈布斯堡联盟，然而这种联盟已经遭受了霍金斯及其后继者的令人难忘而又不可原谅的打击。

从霍金斯事件及其后果中产生的一件可以肯定的事是，英国人作为一个民族，无法希望通过安排一种无视葡萄牙而与西班牙结盟的奴隶贸易来介入并弥补与西班牙帝国经济之间的裂痕。的确，在无敌舰队达到顶峰之前，西班牙试图通过征服葡萄牙而寻找解决办法。在这方面，借助于有效的开发和新国民的友好，使菲力普得到了他的王国所需要的全部劳动力。然而联合主权并没有给两国带来统一，除了把荷兰和西班牙带入一个经济统一体之外，无疑并没有一项统一的经济政策。通过王室法令，葡萄牙人明确地被拒绝给

予西班牙国民的特权，特别是与西班牙殖民地进行贸易的特权。既然葡萄牙人拥有可以获得奴隶的整个海岸，而且他们自己积极从事于为其在巴西的殖民者提供奴隶的运输活动，这驱使他们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持久化而纵容走私和蔑视政府。这种利益在若干年里变得非常有组织以至于为国王提供了来自特许和关税的稳定收入。他们还建立了一个重要的特许权受益者和商人的机构，这些人的财富和影响使得他们在政治上举足轻重。

这批葡萄牙商人在非洲西海岸影响也很大。他们在那里的兴趣是在贸易而非殖民地，而且通常情况下殖民地不过是海边的一些小据点或者是（为了更好的防御而）设在邻近海岸岛屿上的小据点。在塞内加尔北面的上几内亚，葡萄牙人遇到来自穆斯林商人的反对，而且他们位于阿尔金的惟一的永久性殖民地很快就陷入衰落，因为贸易转移到了从塞内加尔河到塞拉利昂的更平缓的上几内亚南部地区。在这里，他们没有遇到较大的穆斯林势力，而且在这一地区的佛得角岛上的殖民地和日益兴旺的甘蔗种植园，使贸易具备了条件从海岸地带扩展到冈比亚和塞内加尔河的内陆地区。这是一种兴旺【328】的贸易，其中金砂、胡椒和阿拉伯树胶对奴隶贸易是一种补充，然而它落入了一个声誉不好的世袭社会的手中，这一社会没有特别的优点，也没有特别的国家特征。从塞拉利昂到黄金海岸，天然良港缺少，这对贸易是一种阻碍，然而从黄金海岸到葡萄牙有一种繁荣的金沙贸易，在阿尔米纳、阿克西姆和沙玛的葡萄牙据点建造牢固而易于防守。然而，甚至在这里，葡萄牙人对土著人事务的影响也仅局限于据点附近的狭小地区，沿海居民有效地阻止了葡萄牙人试图与内地居民直接接触的企图。他们还憎恨葡萄牙人关于垄断或试图垄断与欧洲人贸易的要求，而且如果有机会，他们总会准备与其他国家的船只进行贸易。然而，葡萄牙的影响还是强大的，而且贸易的吸引力非常巨大，以至于葡萄牙人的据点导致了相当数量的黑人迁移，移民的发展使部落解体后产生了对欧洲人据点的依赖。

葡萄牙人对黄金海岸的土著社会的影响是重大的，而对贝宁湾的影响则更大，因为在那里他们与崛起中的贝宁国王发生接触，并且从这个国王为巩固政权对其邻国发动的战争中可以得到大量的供给于大西洋岛屿和新世界的奴隶。尽管贝宁湾和比夫拉湾的条件非常不利于健康，以至于从 1520 年开始人们不再有试图在尼日尔三角洲建立永久性基地的打算。而贸易却在继续，因为从圣多美岛和佛南德玻岛操纵这种贸易被证明是容易的。而且在这些岛上发展了广阔的甘蔗种植园，这种种植园一直兴旺到 16 世纪下半叶，直到那时奴隶暴动的危险和单一种植所造成的土壤肥力枯竭迫使许多殖民者

渡过大西洋来到巴西，而把这些岛屿留作为大西洋贸易收集奴隶的补给站。

结果是这样的，尽管葡萄牙人排斥所有其他欧洲人的要求在非洲海岸不被接受，而且尽管像霍金斯这样坚决的竞争者始终能够把奴隶运往美洲，葡萄牙人实际上主宰着整个16世纪的奴隶贸易并同样地向自己的和西班牙的殖民地供应所需劳动力。这种供应从未足以平息殖民者的抱怨，而且很可能始终真的是供应数量不足。事实上奴隶的数量似乎达到平均每年13 000人。这一数字在人口统计学上的重要性，在没有任何关于社会单位的数字的确切估计的情况下是无法确定的，而奴隶正是从这些社会单位中被带走的——它们是深入到非洲心脏地带的部落——然而，无疑，奴隶的数量能够使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新世界的定居点依赖于奴隶而得以形成，并因此导致了在下【329】一个世纪里，对奴隶产生持续而迫切的需要。

然而，西班牙经济的弱点仍旧存在，因为奴隶贸易主要掌握在控制着非洲海岸的葡萄牙商人手里，而且菲力普的葡萄牙和西班牙臣民之间的差别使其政权的弱点无法消除。试图把这种奴隶运输组织起来，或置于西班牙的贸易商行制度的控制之下，或置于葡萄牙的“贸易法庭（Consulado）”制度的控制之下的企图均告失败。实际上，在塞维利亚和里斯本之间，存在着利益斗争，它集中体现了两个国家的不同利益。葡萄牙人及其分销代理人，实际控制着这种贸易，并使得他们自己成了殖民者所能依靠的惟一可靠的筹办者。

葡萄牙人在这一时期主宰着特许权，这因1595年总的贩奴合同制度的复活而被进一步加强，这一制度是全面而独占性的，被授予给佩德罗·古梅斯·雷纳尔，他是卡斯蒂里亚人，是在与安托尼奥·努内斯·卡尔德拉的竞争中赢得这一合同的，后者是佛得角和安哥拉贸易的*fermier*，一个经验丰富而可靠的商人。复活贩奴合同制度的目标是利用葡萄牙殖民地的设施而不许葡萄牙人分享西班牙在西印度的财富，然而，明显的是（伴随着把这一贸易置于“贸易法庭”的控制之下的打算），这个卡斯蒂里亚人不得不依赖积极从事奴隶贸易的商人的工作，而他们的主要作用就是把特许权体系包租出去，然而他被允许自己从事贸易，而且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贸易为他而保留。从西班牙人的观点来看，存在着一种使奴隶供应不间断的需要，并需要把船只引向某些特定的地方，尽管商人们不受那些迫使他们只能使用某些欧洲港口的更加令人气恼的限制的束缚，却仍然在其贸易中受到严重妨碍，而且存在着走私和亡命者进行贸易的空间。特别是，贩奴者一般被禁止向大陆运送奴隶，他们不被允许雇用外国代理人，而且他们只被允许带回用来交换其奴隶的除贵金属之外的殖民地物产。这些规定很容易被逃避，而且当贩奴

者雇用一个早就为个人利益而从事这项贸易的殖民者作为代理人时，这些规定就尤其难以执行。尽管如此，这种规定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了西班牙以什么方式处理这种贸易，甚至在征服葡萄牙以后，西班牙仍试图通过这种限制来[330]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独立性。对国家实力和收入的渴望，再加上事实上对非洲的实际贸易的特许权是分别授出的，而且贩奴合同只允许对西印度和美洲进行贸易，使得这种特权的价值受到如此之大的贬低，以至于这种大型的贩奴合同在 1601 年就被自愿交回，而它应当 1604 年才到期。

失败和困难并没有阻挡住这种制度，这类制度中的一部分似乎非常必要和有吸引力，以至于关于一项新贩奴合同的谈判没有遇到什么拖延和困难。然而，把这项贩奴合同交到葡萄牙人手里（无论如何在这种贸易中他们控制了最初阶段）所具有的优点，导致了把它授给葡萄牙的安哥拉总督、非洲税收的总承包人胡安·康第落。这对现实而言是一次胜利，是对西班牙人不拥有对奴隶海岸的控制这一简单事实的接受。对这一事实的承认，以及对由此而来的推论即葡萄牙人不会轻易容许外国人干涉在其领土上的这种贸易的承认，导致了这样的结论：即对排外主义政策中的缺陷必须予以接受，然而这一缺陷是很不体面地作为缺点而被接受的，而且贩奴者被禁止把特许权授给外国人；只有葡萄牙人和卡斯蒂里亚人被允许从事这一贸易。到 1603 年考提诺死时，贩奴合同陷入了一个复杂而困难的处境，以至于被完全废除，一个新的合同被制定，用来完成直到 1690 年的规定的期限。这个合同和在它之后的合同，为走私贸易（不仅仅是走私奴隶）留下了许多漏洞，并使得殖民者们非常缺少劳动力，使殖民地被外国人扰乱，以至于这些合同的缺点被人们普遍认识到，而且葡萄牙人曾一度被迫把奴隶送到塞维利亚，那里一直作为所有前往西印度的船只必须经过的货物集散地。

与西班牙当局试图在贩奴合同制度的范围内寻求解决的努力无效，还有，更重要的是，这一制度吸引外国商人，使他们像霍金斯那样在西班牙殖民者和西班牙殖民地官员的默许下，无视这一制度，这两者都依赖于一种比贩奴合同更多和更稳定的奴隶供应，而在这方面，西班牙人有了主要竞争者，法国人、英格兰人和荷兰人，其中只有荷兰人到目前为止最有效率和最危险。安特卫普和其后的阿姆斯特丹的商业重要性，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荷兰人对与波罗的海和莱茵兰地区的贸易的控制基础上的，以及建立在，荷兰人向北欧提供，葡萄牙人带到伊比利亚港口的，来自东方的调味料和奢侈品的贸易基础上的。荷兰人从西班牙人那里争取到的贸易比英格兰人要少，而[331]对葡萄牙人来说，荷兰人提供了通向欧洲市场的销路。

"首先，对波亭戈来说，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单纯的好人，他每年都要充满渴望地（上帝知道）航海到地球上的三个地方，几乎完全是为了香料，而且当他带着香料返回家乡时，作为西班牙国王的臣民的安特卫普人，用其极其丰富的财力把这些香料全部留在自己手里，况且经常是提前就已付钱了，由此而造成了一种十足的垄断。"①

这就是英格兰冒险商业公司的书记（Secretary）所写，他对荷兰人的成功具有详细的个人了解。然而直到17世纪早期，荷兰人被自己的自治主义者的组织所阻止，并被其与西班牙殖民地的正常贸易方式所阻止，而不能积极地参与打破伊比利亚国家垄断地位的活动。直到那时，法国人是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主要领导者。

法国海盗在新世界对西班牙船运进行劫掠，此后，霍金斯引起了西班牙人对英格兰人的恐惧，他们认为英格兰人都只是在等待机会做同样的事。对西班牙的大陆殖民地的最早威胁是来自法国人，尽管霍金斯在其第二次航运时曾对西班牙人在佛罗里达的殖民地予以救援，但这一殖民地仍很早就被摧毁。这个殖民地脆弱而装备低劣，而且其所处位置令人生非分之想，使西班牙运宝船经佛罗里达海峡并从加勒比地区前往欧洲时易于受到劫掠。法国人与西班牙殖民者的贸易是被强迫进行的，所采取的形式与霍金斯的航海非常相似，而且法国的船长们自然而然、轻而易举地转向了海盗和劫掠行为。然而，直到1652年（英格兰在这一地区的第一个殖民地在同一年建立），法国才在加勒比地区建立起殖民地，法国通过国家的努力建立的殖民地是在圣劳伦斯港。

法国这样做的原因部分地来自于一种合乎情理的、不愿在宗教战争的迫切需要之外再与西班牙发生海外争端的想法；也部分地由于法国完全缺少一个强大而目的明确的政府。然而，当法国走出其内战并在亨利四世统治下具有统一的政策时，并且是具有与由苏利制定相前后一贯的经济政策时，这种政策却没有为海外殖民地留下多少位置。的确，这是一种灌注着自给自足的国家经济的观念的政策，正是"美丽的法国"所具有的辽阔幅员、多样性和财富，支配着法国人的思想。这个主题依次经过了，苏利、拉泽利、巴塞雷米的解释，但并无多大不同。"Ce grand royaume，compose de pays differens de solage et de ciel，mais tous bien correspondans entre eux-mesmes，est non 【332】

① 约翰·维尔勒著：《论商业》，G. B. 霍特克斯主编，摹写本协会（纽约，1931年）出版，第36页。

seulement fourni de tout ce quil faut pour l' estre, mais encore pour le bien estre." (其大意是称赞法国王国幅员辽阔、资源多样、出产丰富以及财富众多——译者)[①] 这类话可以在略有变化的情况下被多次重复。它们增强为一种齐声谐律的信念，对法国而言，对外贸易除了在仔细控制的情况下，都会导致其本国产品的外流，而殖民地对法国来说，是不必要的和有潜在危险的。至于那些它自己无法提供的商品，如铅，则可以通过规范良好的贸易来获得，而没有必要使自己为了得到它们而陷入殖民地风险中去。这一主要观点被苏利的论文所强调，他认为在北纬 40°的殖民地土地（这一纬度以南的任何土地都将造成与西班牙的竞争）上得不到什么利润，他还谈了许多法国私人企业前往加拿大和纽芬兰的冒险活动获得支持而一无所获的事例。不过，"西班牙令人难以容忍的支配地位" 连同对冒险和轻易得手的劫掠的渴望，确实对法国的一些个人起了刺激作用，而且正是通过利己主义者的努力（有时是有国王的特许状）法国人才做出了他们的探索。的确，雅克·卡蒂尔在 1534 年的航海中被以国王的名义派去试图发现"某些岛屿和国家，据说人们能在那里找到大量黄金"，然而，他却不怎么顾及王室的利益，他的活动是由私人赞助者资助的，他的后继者也是如此。

对英格兰人而言，同样必须承认，直到斯图亚特王朝时期，才在殖民地扩张上形成了认真的国家努力。厄尔斯特和纽芬兰合在一起，耗费了伊丽莎白时代的人被迫从防御及海盗活动中节省出来的精力，而且在弗吉尼亚和圭亚那，殖民的企图遭逢不幸。它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类冒险事业缺少国家的支持，甚至缺少协调一致的私人支持，"对伊丽莎白时代冒险家的辉煌成就的骄傲（以及今天所产生的关于新伊丽莎白时代的浮夸言辞）不应该使我们看不到这样的事实，即不是英格兰而是荷兰在 17 世纪上半叶期间打破了伊比利亚海上霸权的背景"[②]。在与葡萄牙的贸易已经得到牢固的维持的情况下，荷兰人继而在十分重要的奴隶贸易的 3 个阶段占有支配地位：首先是对巴西的贸易；其次是对几内亚的贸易；第三是对西班牙殖民地的贸易。按道理这个顺序并非特别符合年代顺序，因为这 3 个阶段在时间点上有重合之处。

尽管荷兰人最初的影响是以贸易的方式，而且对伊比利亚港口和对新世界来说同样都是这样的，然而，当 16 世纪末他们考虑在新世界建立自己的、【333】作为其欧洲经济对等物的农业殖民地时，他们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里程点。在

---

① A. 德·蒙特克雷蒂安著：《政治经济学讲义》，冯克一布伦塔诺（Th. Funck-Brentano）主编（巴黎，无出版日期），第 131、240 页。

② C. R. 博克瑟尔著：《葡萄牙人在巴西》（牛津，1957 年），第 1 卷。

这一问题上，理论家是威廉·尤塞林克斯，而榜样是向葡萄牙提供糖、棉和染料木的巴西，成果则是1621年荷兰西印度公司的成立。这是在经过相当长的拖延之后完成的，其间，在1609年西班牙与荷兰签署停战协定，使荷兰人能够更加自由地进行对巴西的贸易，并使他们不顾葡萄牙人及其构筑的要塞据点，而在对几内亚海岸的贸易（更多的是为了黄金和象牙而非奴隶）中占据明显优势。此外，在1621年获得特许权的荷兰西印度公司在起初就以对西班牙的鲜明敌意作为标志，它的目标不仅是和平的拓殖，而且是战争和征服，而且它受到1617年勒梅尔航海进入太平洋和统一东、西印度公司以联合进攻哈布斯堡王朝的观念的启发。然而西印度公司开始得很缓慢，而且，尽管到1623年它已拥有15艘海上船只，却都是用作贸易航海的，而那时它的领导者（the Heeren XIX）仍在慢吞吞地打着进攻巴西的主意。

在这时，巨大的葡萄牙殖民地有60 000～70 000个欧洲或混血的殖民者居住着，其中的大部分是在伯南布哥辖区，在那里，甘蔗在产品生产中占主要地位。种植园主需要每年引进8 000个奴隶到这里，而奴隶贸易几乎全部控制在葡萄牙承包人和犹太商人手里，他们在贩奴合同或特许权之下工作，从葡萄牙在安哥拉的殖民地运走奴隶；他们还控制着大部分同样有利可图的蔗糖贸易。然而，许多葡萄牙商人的称呼只不过是胆大妄为的荷兰人的装饰幌子，这些荷兰人以这种方式逃避西班牙的禁运。在"十一年停战协定"期间（1606～1621年），他们的地位大大提高，以至于到这个时期结束时，他们承担着巴西与欧洲之间全部贸易量的1/3～1/2。到1622年，仅在阿姆斯特丹就有25家制糖厂。使这样一种重要贸易不受破坏的感情往往非常强烈，然而要求对西班牙给予打击的呼声同样强有力。在1623年底，一支强大的荷兰远征队起航前往巴伊亚，并于第二年5月很容易地占领该城。这是一种重要的战略移动，而且，如果巴伊亚被控制，巴西的其他部分肯定会陷落。然而这个重要城市的守军在糟糕的指挥下陷入不幸，因1623年一次远征安格拉、1624年一次远征安达（在皮埃特·海恩指挥下）以及1625年一次灾难性的夺取葡萄牙在黄金海岸的阿米纳要塞的企图，其海军力量被消耗。

结果，在1625年4月末，一支由50多艘船组成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联合舰队毫不费力地夺回了巴伊亚。由皮埃特·海恩领导和鼓动的成功的商业袭【334】击，使西印度公司维持了其偿付能力和坚决果断，而且尽管夺取葡萄牙据点的努力失败了，他们从几内亚海岸进行的黄金和象牙贸易仍然活跃而兴旺。西印度公司意欲夺取一块殖民地以及与之连在一起的奴隶贸易，这一主要目的暂时没能实现。然而，当1628年皮埃特·海恩截获西班牙运宝船时，他

的事业达到了巅峰，船上共有价值 800 万荷兰盾的白银，除此以外还有黄金、珍珠和丝绸——这在西班牙殖民地漫长历史中就此类行动来说，这是惟一成功的一次。流入公司金库的还有其他战利品。依赖这些战利品，公司兴盛起来，并用这些战利品作为资金，开始了新的旨在完全夺取一块殖民地及其贸易的努力。

这次，荷兰人转向了北方产糖的伯南布哥辖区，然而，尽管他们夺取了奥林达和累西腓两座主要城市，却被游击队包围，并于 1631 年被迫放弃奥林达，而专心防守累西腓。借助于能够把兵力从海路一处转移到另一处这一巨大优势（而葡萄牙人则不得不在内陆行军），并借助于其手中所具有的摧毁种植园的能力，到 1637 年，荷兰人似乎赢得了优势。然而抵抗并未结束。的确，巴西的凸出部分被称为新尼德兰，然而并不能由此宣称已经建起了一块殖民地。这场战争耗资超过了公司的战利品所得，而且使荷兰负上沉重债务，拿骚一锡根伯爵约翰·毛雷特被任命为总督，这带来了团结和效率，还有某种使荷兰东印度公司获得显著成功的目的感。在早期的军事成功之后，开明的行政管理出现了，然而，随着贸易的恢复，使得个人打破西印度公司的垄断成为可能（除了奴隶、染料木和军火贸易）。这时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一事实上，即如果巴西的自然资源要得到开发，就需要不断的奴隶供应。尤塞林克斯最初持有的观点是，他所渴望的荷兰热带殖民地应当由北欧人来居住和工作，但这些地方却没有形成多少吸引力，而在荷兰人终于得到的巴西北部，实际情况是与奴隶贸易难解难分地结合在一起。

在荷兰西印度公司活动的第一个时期，几内亚海岸三次成为重要而毫无结果的远征目标，那里吸引荷兰人的不是奴隶贸易而是黄金和象牙贸易。加尔文教徒的良心对奴隶制感到不安，有这样的先例，1596 年一船奴隶被运到米德尔堡，在到达时就被释放了，而且直到约翰·毛雷特成功占领伯南布哥时，摆在他们面前直接的问题才是，荷兰人到底还是大规模地进入了这种【335】贸易。在加尔文派神学家的包庇之下——这些神学家论证说，在奴隶接受新教教义，而且他们没有被卖给可能使他们成为罗马天主教徒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情况下，奴隶贸易就是合法的——公司的董事们开始觊觎来自非洲的大规模的、稳定的奴隶运输，并于 1637 年攻取了重要的葡萄牙要塞阿米纳，其目的在于使荷兰人对位于黄金海岸的供货基地予以控制。然而来自黄金海岸的奴隶不如来自刚果和安哥拉的奴隶受到重视，而来自卢安达的奴隶是西班牙在墨西哥和秘鲁的矿场的主要劳动力来源。甚至 1640 年底，约翰四世的加入，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联合政权的崩溃，都没能阻止荷兰人仍然

把葡萄牙人视作敌人，也没能阻止葡萄牙人继续不懈地努力收回失地。当总议会与葡萄牙之间的停战谈判正在进行时（在欧洲已经结束而海外尚未生效），约翰·毛雷特派遣了一次远征，使得荷兰人在1641～1642年拥有了卢安达、本古拉、圣多美、安诺邦甚至阿克西姆（葡萄牙人在几内亚海岸的最后一个要塞）。而这些新获得的地盘并没有被交给在巴西的机构来管理（这些地盘是巴西经济上的附属物，而且对它们的占领正是由巴西引起的），而是交给了位于欧洲的公司所直接领导的一个专门总督。

尽管在征服工作结束之后，约翰·毛雷特在和平开发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和发展，西印度公司却丝毫没能使得葡萄牙人在巴西的抵抗结束。14个辖区中的7个仍在坚守，包括巴伊亚和里约热内卢，而且用于完成征服的费用逐渐超过了公司从在圭亚那、库拉索岛、阿鲁巴岛、西非和北美哈得孙河口的殖民地所得到的利润。甚至来自奴隶贸易的利润都最终被战争经费所吞噬，这种情况相当严重。尽管有抱怨说，公司对输入奴隶的数量进行控制以便维持高价，但据估计，在1636～1645年期间，有超过23 000个奴隶被运到累西腓。然而种植者手里并没有多少现金用于购买奴隶。而有命令说，奴隶只能在付现金时才能出卖，这造成的主要后果就是奴隶都流入了犹太投机者手里，并且，对种植者来说，造成了奴隶价格提高和西印度公司利润下降。

在巴西蔗糖生产中，荷兰人实际上并没占多少份额，在种植和加工两方面都是如此。他们首先是商人和经销人，而葡萄牙人保持着对生产的控制。【336】甚至，约翰·毛雷特上任后，在一段对生产业务来说相对乐观的时期内，即使很多荷兰人拥有种植园或榨糖厂，葡萄牙人仍广为占据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职位。其结果是在乡下葡萄牙人占主导地位——这种趋势非常有利于葡萄牙人，因为抵抗荷兰人的游击队从未被完全征服——而荷兰人则聚集在城镇。尽管荷兰和德国的农民受到鼓励从事移民，却收效甚微，而巴西经济的基础仍然是葡萄牙种植者和他们的黑奴。西印度公司曾致力于袭击西班牙在智利和布宜诺斯艾里斯的殖民地，不过来自巴西的蔗糖出口仍是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而且把重点放在这种单一作物上，使得巴西经济的失衡一直延续，所谓失衡是指在粮食、肉类、面粉和酒方面像奴隶一样都需要进口。总之，结果造成了生活费用昂贵，这是某种灾难，因为在经济上它使西印度公司逐步变得得过且过，并破坏了荷兰人本来拥有的在巴西建立持久性殖民地的可能机会。随着1644年约翰·毛雷特被召回，以及三级议会所占领的土地被拒绝归还，如火如荼而有组织的反对荷兰人统治叛乱就此打开了大门。荷兰人尽管保持着海上优势，在陆上却被逼得处于防守，例如，累西腓的守

军设法坚持到一支缓慢组织起来的救援舰队的到来，并于 1646 年夏季使得包围解除了。最终葡萄牙国王约翰四世决定直接介入对荷兰人的反叛，这部分是因为荷兰船只对葡萄牙运糖船的袭击，而没有来自巴西的蔗糖收入，葡萄牙将无法负担防守与西班牙的边界的费用，“失去巴西将造成葡萄牙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消失”①。

因而，当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内部争斗和西印度公司的猜忌荷兰人在行动上表现出无休止的拖延时，葡萄牙的主力舰队被派出增援巴伊亚。这并没有改变在巴西的力量对比，然而它牵制住了荷兰人所拥有的在巴西海岸以外的船只，同时使葡萄牙人能够派遣一支 15 艘船的舰队去夺回卢安达。然而，这种机会利用只不过使葡萄牙人免于完全丧失对安哥拉的控制，因为他们在那里已经遭受惨重失败，而且来自锡兰的私掠船给巴西贸易造成极大破坏。同时，荷兰人于 1648 年底和 1649 年初在陆地上仍然强大，并足以有效地破坏富庶的勒肯卡沃地区的甘蔗种植园。面对荷兰人的海上优势，以及为使巴【337】西殖民地得救并满足向其提供贸易和运输的需要，葡萄牙人于 1649 年成立了自己的“巴西公司”，外国人和异教徒被允许认购资本，而里斯本商会被给予特殊地位，而且，里斯本从一开始就被指定为护航队出海的惟一欧洲港口，这种护航队的提供和组织是巴西公司的主要公共职责，公司所使用的很多船只都是从英国雇用的（英格兰急于给荷兰一次打击），在葡萄牙的外国商人被说服认购公司资本。公司的资本很大部分来自犹太人，而且它得到了为巴西供应食品而非奴隶的垄断权，还得到了对糖、棉、烟草和其他产品征收出口税的权利。这些特权并没有使巴西公司成为一个赢利的公司。然而，荷兰人在巴西的力量越来越弱，因为各省之间的争端使西印度公司不能奉行一项明确而有力的政策，还因为贫困使士兵和水手遭受饥饿和忽视，使贸易自由被转让给外人——甚至在 1648 年，奴隶贸易的自由也被让出。尽管如此，局势并没有发生有利于葡萄牙人的决定性变化，因为巴西公司组织的强大护航队没能打败累西腓的荷兰守军，而且当布莱克指挥的克伦威尔舰队控制了海洋时，塔吉斯河受到了封锁，舰队还把英格兰船只从巴西护航队中撤出，又袭击运糖船并给葡萄牙人造成了沉重损失。另一方面，自 1652 年以后，英格兰舰队与荷兰人处于战斗之中。当英荷战争爆发时，而且当巴西公司于 1653 年底派遣了一支 77 艘船的舰队时，累西腓的荷兰守军终于被击败，而荷兰人在巴西的所有殖民地也都投降了。

---

① 博克瑟尔著：《荷兰人在巴西》，第 186 页。

6.5　西印度的蔗糖与奴隶

在约翰·毛雷特领导下的、似乎很可能获得成功的、并且是耗资巨大的巴西冒险事业结束了，这标志着荷兰人在南美大陆建立一块殖民地的努力归于失败。然而，从来自劳动力供应方面的影响来看，这又标志着殖民地开拓历史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在17世纪上半叶，世界不仅见证了荷兰人无视西班牙的霸权，在一片——和通过罗马天主教的托德西利亚斯条约建立的新世界属地具有对应关系的——新教领地上建立了东、西印度公司，而且见证了他们在北美的曼哈顿、奥兰治和新阿姆斯特丹建立了新拓居的殖民地。此外，从欧洲向清教徒的新英格兰殖民地的第一次大规模移民，也发生在这一时期。

新英格兰殖民地的开拓有着自己的推动力，然而它们是建立在皇家特许权和许可状，以及特许公司的框架之内的。同样的结构也存在于英格兰加勒比地区殖民地的开始阶段。1620年，在巴巴多斯，殖民地的运作初见端倪，而在巴哈马，偶尔有一些水手和海盗在岛上过冬。然而，英格兰人第一次认真在加勒比建立殖民地的企图发生在1624年沃纳占领圣克里斯托弗岛时，非伊比利亚国家对西印度的普遍兴趣可以由这样一个事实来判断，即在一度是英格兰海盗的沃纳在圣克里斯托弗停留的同时，曾为法国海盗的艾斯奎莫林也落脚此处。对法国人和英格兰人来说，西印度殖民地的基础都是烟草作物。种植这种作物被证明是小规模的家庭农民所能胜任的，烟草导致了一次可能持续了1/4个世纪的令人吃惊的移民时期，并使小的土地所有者迅速地涌入该岛，这与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拥有奴隶的种植园体制形成了鲜明对比。 【338】

烟草在1612年引进弗吉尼亚，已经被证明挽救了殖民地，而且加之早期的为了团体的和公司的利益而集体耕作的制度被放弃了，这些事情共同而有效地刺激了显然已是奄奄一息的殖民地经济生活。在英属和法属西印度，烟草的作用非常相同。在17世纪和在20世纪一样，“西印度”只不过是欧洲术语学的一个共同的习惯用语，适用于相隔数千海里的许多不同的经济。然而，这些岛屿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首先由小土地所有者定居，这些人把烟草作为所依赖的商品作物加以种植。在此之后，殖民者在这一时期的专有权框架内生存并拥有其土地，而且“受让人和所有者”像农民一样，关心劳动力供应的组织问题。就这一问题而采取的方法是两方面的制度——从一

方面来看，是土地的让与要以受让人带来一部分劳动力作为条件（这种制度后来在英格兰的卡罗来纳殖民地和法属加拿大被采用，结果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然而缺少效率）；另一方面则是根据契约帮助移民的制度。契约的核心是劳工由将来的雇主提供移民费用，作为交换，他则要在一定时期内按照已说明的条件和协商好的报酬为雇主服务。一个人可以带来一定数目的劳动力，作为回报他可获得土地转让，通常是按照契约制度来得到这些劳动力。这两种因素就是以这种方式相互结合的。它们与刑法交织在一起，重罪犯或政治犯如果作为签订契约者前往殖民地，就能够获得自由。

【339】 在这些制度之中，招募劳工的方式，以及移民费用的支付，在提供欧洲劳动力方面起了作用，并使得在北美的英、法、荷殖民地成为名副其实的移民拓居地。这样的结果部分归因于气候，部分归因于宗教上的不宽容，而且直到 18 世纪中期才趋于完成。更值得注意的是，特别是在 17 世纪中期的若干年里，由烟草消耗，小业主和契约制劳工共同组构成在亚热带西印度群岛的白人劳动力人口。

移民并非仅局限于西印度。到 1640 年，新英格兰的人口已经增至超过 40 000人，而弗吉尼亚的人口约达 7 500 人。来自英格兰的移民的迁移原因多种多样：有“三十年战争”的经济后果，即由于荷兰人新崛起的经济优势，使英格兰呢绒在欧洲的市场被瓦解；有劳德和亚美尼亚人所采取的基督教会的政策；还有纯粹的漂泊流浪者和供应充足的廉价运输。根本的事实是，在斯图亚特时期的英格兰，生活是不稳定的，受到特权和一种过时的社会和法制制度的限制，而新世界则提供了更好的生活资料和更自由的身份。由于这些动机，海外移民运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而且以清晰的社会和宗教特征为标志。然而，宗教上持异议者在移民中间属少数（甚至在“五月花”号上也如此），而社会和经济上的混乱造成了大量可提供的契约制劳动力，这具有首要的重要性。

作为结果而产生的依赖奴隶劳动的殖民地，与从事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的殖民地之间相区分而存在，这使今天的北美洲社会多样化。在西印度，这种区分同样重要，这是由于，区分源自于一种年代顺序而不是由于纬度不同才发生的区别。小业主的社会在奴隶到来时退出了；烟草和咖啡则让位于蔗糖。转折点出现于 17 世纪中期。荷兰西印度公司从先前的位置撤出并在巴西建立了自己的热带殖民地，而且它转向从事于其他西欧国家西印度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其基础是船运、贸易、奴隶供应以及从巴西带来的甘蔗种植技术，这些行动具有重要性。

结果是两方面的：贸易增加和西印度的繁荣，还有这些岛屿的重要性（主要是战略上的）获得重大增进。在17世纪，还有一些冒险事业由此产生，像里克爵士的普罗维登斯公司，以及开发托图加要塞的无休止的努力，这样做除了获得战略基地外别无其他动机。不过，这一时期新的和具有重要性的特征（帝国主义的概念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围绕着它而建立，直到所谓的“旧殖民体系”崩溃为止）是西印度贸易的数量和价值。它们成为“不列颠帝国的中心，对英格兰的伟大和繁荣具有极大的重要性”。[1] 到17世纪末，它们提供给英格兰的进口比所有大陆殖民地还要多（分别为9%和8%），而且在出口方面也占更大比例。据估计，英格兰从西印度得到的收入比与世界全部其他地方进行贸易的收入所占的比例更高，甚至对“旧殖民体系”大声谴责的亚当·斯密也承认这一制度背后的种植园体系所具有的极大利益。而亚瑟·杨计算说，对英格兰经济而言，在西印度雇用的一个英格兰人的价值是在北部的“面包殖民地”所雇用的一个人的18倍，而亚当·斯密则采用更为一般的说法，“我们在西印度的任何一个殖民地的一座甘蔗种植园的利润往往比已知的欧洲和美洲的任何其他种植场所的更大。” 【340】

当然，对西印度的这种强调，很大程度上应该说是后代人建立在已完成制度基础上的一种判断。不过当时的人们同样强调这点。以牙买加为例，克伦威尔把它置于自己政策的中心，称赞它是西印度的关键，“处于所有商业的腹部”，而且柯克在1625年，以及再次在1637年制定了一份备忘录，呼吁组建一个英格兰西印度公司与荷兰人竞争，在他看来，这个问题对英格兰公司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他建议联合，借助荷兰人的技术、经验和资本来打击西班牙。

荷兰人的方法和组织被加以详细的调查，关于竞争对手的细致分析被送到英格兰政治家面前。荷兰公司控制着16个奴隶基地，它对这种贸易如此重视，以至于几内亚贸易被作为一项专门的资本项目，而公司不同的地方商会负责非洲殖民地的不同地区。对英格兰人有利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在1654年他们与葡萄牙人讲和，从而获得自由进入葡萄牙海外殖民地的通路。

然而，到此时为止，荷兰人仍高高在上。我们（指英国人——译者）把西印度政策的各部分分割开，而荷兰人却把它们结合起来并因而获益。我们把百慕大殖民地划给百慕大公司并于1623年给出圣克里斯托弗的特许权，1624年给出巴巴多斯的特许权，1625年给出圣克鲁斯的特许权，1628年是内维斯，1629年是普罗维登斯，1632年是蒙塞拉特和安提瓜。不过，我们 【341】

---

[1] E. 威廉姆斯著：《资本主义和奴隶制》（查珀尔希尔，北卡罗来纳，1944年），第52页。

英格兰在 1618 年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几内亚公司，而且当其垮掉后于 1631 年又建立了一个。这种做法与荷兰人不同，其合理性在于这些殖民地的确不是计划用来获得黑奴的，而是以英格兰契约制雇工为基础的。关于运送契约制雇工，以可得到的数字而论，绝大部分来自 17 世纪最后 1/4 和其后的时期，很显然，在大约 1689 年以后（尽管蒙茅斯起义失败和流血审判之后有大量来自西部郡县的政治犯签订契约），移民数量有相当大的下跌。然而，除去移民新英格兰殖民地的清教徒之外，大约一半到 2/3 的全部白人殖民地移民是罪犯，契约制工人或赎身劳动力（redemptioner）——赎身劳动力是相对自由的雇工，他与船长签订合同，在到达殖民地时开始契约劳动，时间是直到种植园主能够偿还船主的船费，而契约制工人则早在上船之前就已经进入劳动契约，而他的雇主则负担其全部费用。到 1660 年，这种制度从马里兰的 12 000 人的人口中带走了大约 1 078 个雇工，而据估算 1633 ~ 1680 年期间有超过 21 000 个雇工被运到殖民地。在弗吉尼亚 1624 ~ 1625 年的人口调查中，总人口仅为 1 227 人，其中 487 人是雇工，而黑人只有 23 人。据推测，到 1665 年，这个殖民地的雇工数量达到了 10 000 人，而总人口到 1671 年已达 40 000 人，其中 2 000 人是黑奴，而每年有大约 1 500 个雇工被送到殖民地。没有来自卡罗来纳的令人满意的数字，然而很明显，在南部的大陆殖民地，白人劳动力在 17 世纪中叶的若干年里比黑人数量更多也更为重要。

在岛屿地区，变化来得更快。当“成群的英格兰和法国殖民者像苍蝇一样涌向西班牙帝国在加勒比地区的正在腐烂的尸体”时，白人人口的数字达到高峰，到这个世纪中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①] 对西印度岛屿进行一概而论始终是困难的，然而，有显著的事例表明这种重要趋势非常强大。以巴巴多斯为例，它在一项英格兰特许权中与圣克里斯托弗联在一起，【342】并与 1625 年授给德埃纳姆贝克的法国特许权相联系，然后，在 1628 年它作为一项英格兰特许状中的内容，（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一道）授给了科提恩，从这些专有特许权的纠缠中解脱出来以后，它被卡莱尔伯爵詹姆斯·海获得，并于 1630 年被一家伦敦的辛迪加获得。尽管这些显示出纠缠与困难，到 1631 年，通过土地所有者的努力，大约 3 000 ~ 4 000 个英格兰殖民者被运到巴巴多斯；到 1636 年竟有超过 6 000 个英格兰殖民者；而到 1642 年已经增加到 37 000 多人。这意味着，每平方英里有 224 个白人。此后开始减

① 参见 H. I. 普里斯利著：《旧制度时期法国在海外》（纽约，1939 年），第 8 章；A. 皮姆爵士著：《殖民地的农业生产》（牛津，1946 年），第 87 ~ 89 页。

少，到1655年白人降至23 000人。到此时，圣克里斯托弗和内维斯的白人人口在20 000～30 000人之间，没有黑人。然而，尽管白人人口如此迅速地达到如此高峰，这些岛屿却没有繁荣起来。的确，殖民地的类型曾激发出一种观点并使它兴起，即这些岛屿在这个时期的历史显示出，没有生理上的原因说明白人为什么不能从事热带的沉重农业劳动，因为与这种变化随之而来的，不是白人人口的衰弱，而是他们在经济上的失败。[①] 小种植园主和他们的白人雇工耕种着5～6公顷的小块土地并维持着某种程度的生活标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639年烟草市场崩溃。这些岛上出产的烟草被认为比弗吉尼亚的烟草质量差，一方面是因为热病和坏血病，王室特许权和烟草税；另一方面是因为英格兰君主的敌意，甚至对格洛斯特郡和英格兰其他郡烟草种植的禁止也没能挽救这里的烟草业。1639年的市场饱和造成了彻底的萧条，并导致了此后的农业体制的改变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

甚至在烟草时期，英格兰的西印度岛屿已经与荷兰公司发生了密切联系。挂荷兰国旗的大量小船负责清理得自西班牙人的战利品，并跟在庞大而有组织的舰队后面做生意，它们显示出了荷兰人提供货物（或在需要时提供奴隶）的能力和把殖民地所依赖的大宗出口运回欧洲的能力。那么，举一个极端的例子，1632年，英格兰在普罗维登斯岛的微小的殖民地把全年的庄稼全部卖给了荷兰公司，1638年普罗维登公司无视禁运，寻求并得到了与荷兰人进行贸易的许可，而1639年荷兰人提出完全购买该岛。从某种程度上看，普罗维登斯岛是个例外，得自西班牙人的战利品在其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很少有白人雇工来此，殖民者能够利用从荷兰人那里买来的奴隶种植农作物。在各处，与荷兰人的联系都同样重要。比如说，法国和英格兰在圣克里斯托弗的殖民地在1629年遭西班牙袭击后，都是在荷兰人的帮助下生存。此后那里开始了一种奴隶劳动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制度。圣克里斯【343】托弗殖民地之所以能开展独自斗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能够把烟草卖给荷兰人。他们对荷兰人过于依赖，以至于1659年英格兰人送出的一份诉状说该岛贸易已经彻底被荷兰人收购了并导致英格兰人受到阻碍。尽管巴巴多斯人口增长了，其烟草生产却非常不景气，以至于土地所有者从殖民者那里得不到什么，而且直到1640年情况才发生改变。此后，在菲利普·贝尔船长的管理下（他是一个"非常诚实、非常富有的人"），良好的法律得到了制定，而"荷兰人也来传授制糖技术，自由贸易得以开展，并且发生了大

① 参见A. 格林费尔·普莱斯著：《热带地区的白人殖民者》（美国地理学会，1939年）。

量的产品供给”，这些使该岛迅速繁荣起来。到 1643 年，岛上有超过 6 000 个黑人奴隶，而且土地升值很快。1660 年黑人人口增至 50 000 人，土地价值涨到 1640 年时的 7 倍。与上代烟草种植者的粗陋住宅不同，岛上有建筑精美的房屋，里面摆满了丰富的器皿和家用物品，通常总有 60～70 艘船等待装货，到巴巴多斯的贸易总共占用了 400 艘船和 10 000 名水手，每年带来大约 10 000 吨欧洲货物，并带回糖、棉、靛青和烟草等物产。糖占主要地位，在该岛 12 930 英镑的关税岁入中，来自红糖的超过 10 000 英镑，其中白糖占 1 400 英镑。

在巴巴多斯的重大变化中，很容易区分出荷兰人所起的那部分作用，因为他们“来到这里并传授（制糖）技术”，此后又提供所需的奴隶。当克伦威尔的军队在 1651 年占领该岛时，他们发现在港口里有 16 艘荷兰船只，总督也报告说那里的贸易大部分是与荷兰人进行的。他们激励、资助乃至促成了那里朝向种植园制度转变——那些既无力负担土壤保持，也难以试种其他作物的小土地所有者的疾病与贫困实际上早已为这种转变铺平了道路。荷兰人带来机械设备和奴隶，并把种植者带到巴西和向其演示正确的耕作方法。①

牙买加显示了同样的特色，即使可能有重要的差别。在从西班牙人那里将其夺取之后，英联邦政府试图在该岛安置被遣散的军人，并为他们提供小块土地的所有权（不适合种植甘蔗）。在内战期间，安置契约劳工的企图只不过是使这座岛屿充满了恶棍和流浪者，而且社会因为缺少妇女而变得危险和不稳定。这引发了一件有趣的由大法院审理的案件，一个名叫欧文·埃文斯的胆大妄为的威尔士人被指控凭借虚假的权力在威斯特考文垂周围骑马转悠，劫持女孩并把她们卖给殖民者做老婆。教堂看门人抱怨说，姑娘们不应因害怕被埃文斯抓到而躲到教堂来时，这件丑闻被曝光，此后这人的权力被证明是伪造而来的。然而人口市场仍在，而且它是殖民地社会不平衡的标志。到 1655 年，牙买加有超过 7 000 人“在山里”，而且直到总督摩第福德（他偶尔为荷兰公司做代理人）在 1664 年引进甘蔗栽培时才获得稳定。此后白人居住人口达到约 7 500 人的水平，而黑人数量从 1673 年的 7 500 人猛增至 1728 年的 74 000 人，牙买加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然而这却以黑人和白人增长的日益失衡为标志，还以强迫种植园主保持一定比例的白人雇工的“短缺法（deficiency laws）”为标志，另外也因殖民者对奴隶暴动存有恐惧而以对民团和军队的依赖为标志。

[344]

① 《编年国家文件，殖民地：1661～1668 年》，第 541 页。

6.6　英国和法国的奴隶贸易

如果说，正如当时的证据所显示的那样，是荷兰人教会了在西印度的英国和法国种植者如何种植甘蔗，并把蔗糖从他们那里买走，并且直到歧视法律被通过为止（有时在此之后还有这种贸易），那么，正是英国人从事了因此而被刺激起来的奴隶贸易。尽管有霍金斯和他的航海，以及1588年塞内加尔冒险商公司获得特许权，英国对非洲海岸的贸易仍是默默无闻、无足轻重的，这种情况直到1618年出现了一家具有奴隶贸易特许权的、从事对几内亚和贝宁贸易的冒险商公司才有所改变。然而，尽管这家公司在非洲海岸的科尔曼丁建立了第一个英国据点，并开启了英国人经常性地介入奴隶贸易，它却仍还不是荷兰人的重要竞争者。毫无疑问，英国经纪人在黄金海岸足以站住脚根，在海岸角城堡建造了一些建筑物，并使公司一直维持（在1631年重组并于1651年更新其垄断权）到王政复辟时。然而，看起来，当西印度对奴隶的需求在17世纪中期上升的时候，由英国几内亚公司进行的贸易绝不是其中的一个主导成分，而且很少具有重要性。无照营业者和从公司获得许可的私人商人保持着活跃的兴趣和沸腾的贪欲。不过，稳定而有组织的贸易却掌握在另外一些人的手里，而英国公司所关注的似乎是寻找黄金，而非一种固定的奴隶贸易。

当皇家冒险商公司在1660年获得进入非洲的特许权时，对黄金的执著【345】追求仍然继续，而直到1663年，公司获得一项新特许权并重新组织时，奴隶贸易才被作为一个首要目标予以考虑。此后，奴隶贸易以及西印度劳动力需求的新模式才被加以认真对待。在1663年有超过3 000个黑人被交付给巴巴多斯，而且英国公司负责为西班牙殖民地的贩奴者提供了3 500个奴隶。这个合同是无法完成的，因为公司的奴隶销售遇到困难（在西印度资金短缺），这个合同受到英国竞争对手的严厉谴责，并受到荷兰人的积极反对。在这两个新教国家之间，在表面上和平仍是主要的一面。然而1661年罗伯特·霍姆斯向黄金海岸进行了一次强大的海上远征，并占领了冈比亚河口的一个库兰德尔据点，而且巩固了公司在黄金海岸和邻近的塞拉利昂的据点。此后，荷兰人截获了6艘英国船只，霍姆斯则占领了荷兰人在佛得角的据点，在海岸角的要塞，还有在黄金海岸的其他据点。而在1665年，德·鲁伊特把英国人从除了海岸角城堡以外的全部黄金海岸的据点赶走。当

1665 年与荷兰人公开交战时，这个城堡仍在英国公司的手里。而这场战争主要是为了争夺海外世界的地盘和贸易。然而英国公司已经深受连累，无法在它宣称拥有垄断权的贸易上满足需要。私人贸易商被免费授给在海岸角进行贸易的许可证，同时冈比亚冒险商公司成立了用来经营对冈比亚和塞拉利昂进行贸易的下属公司，并把西北非的贸易也租借给它。冈比亚公司所经营的地区主要出产对英国出口的物品，而且尽管一些奴隶得自黄金海岸，而英国人像葡萄牙人和荷兰人一样，发现贝宁湾出产的奴隶最好，也最多。

皇家冒险商公司因其“特许权获得者”的地位带来了困难并由此走向衰落，它拥有特许权，却通过一项许可证制度把它承包给从事实际贸易的商人。作为一个以赢利为目的的公司，它在 1670 年彻底失败了。然而它作为英国人公司，却经历了英国在奴隶贸易上与荷兰人正式竞争的开始阶段。而且它的推动作用，以及政府把这种贸易置于可靠而有组织的基础之上的渴望，足以把它引向组建一个新的而更加强大的公司，此即 1671 ~ 1672 年皇家非洲公司。黑奴被作为新组建公司的首要目标，公司的组建经过了帝国有目的的筹划，并具有与荷兰人相竞争的基础，它把在非洲和西印度地区的殖民地编织在一起，正如大城市的供应系统一样——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沙夫茨伯里的[346] 想法，即把各组成部分结合到这样一个贸易帝国里面，从而使它们彼此之间互相提供最多的服务，并作为整体服务于王国，而王国也服务于它们。

1672 年，皇家非洲公司被授予特许权，并因此在不列颠帝国的经济中扮演一个明确的角色。它还希望从皇家冒险商公司那里得到西班牙殖民地奴隶市场的份额，因为它的这一份额现状仍不令人满意。它所要满足的要求是重大的，而它的成立则处于一个幸运的时刻。因为第二次英荷战争主要是殖民地贸易冲突所引起，并对皇家冒险商公司的垮掉起到了重要作用，而第三次英荷战争（开始于 1672 年）主要是欧洲王朝统治的阴谋，法国深深地与之牵连。皇家非洲公司因此而能够着手开始其生意，而荷兰人的注意力却被别的事情所占据。奴隶的数量每年波动很大，而波动的原因根本上来自于非洲而不是欧洲。种植园主对奴隶的需求稳定存在，但并非总是大到了能够使船长们去寻找奴隶供应的第二个来源；而且在黄金海岸，由当地战争、欧洲人的反对或一些不重要的人员上的麻烦对奴隶输入造成了困难条件，这往往意味着船长们不是前往贝宁湾，而是把不适合的奴隶运往美洲和西印度。

即使如此，据估算，在 1672 ~ 1711 年之间，这家公司在西印度通过拍卖出售了 90 000 个奴隶——在巴巴多斯占了几乎一半，在牙买加超过 1/3。考虑到那些在拍卖之外直接卖给种植园主的和在航海途中死去的，在这些年

里这家公司肯定往这些岛屿运送了大约 100 000 个奴隶，而很可能从非洲运出了约 120 000 ~ 125 000 个奴隶。

到此时为止，在这个时期里，最大的贸易是发生在 1674 ~ 1689 年，这些年间所运输的奴隶占庞大的总数的近 2/3。其中巴巴多斯是某种例外，在那里，依赖于蔗糖的、拥有黑奴的种植园经济正发生转变，其决定性步骤，是在皇家非洲公司到来之前由荷兰人主持完成的。因此，在巴巴多斯，在与荷兰人竞争期间，皇家非洲公司成功地和有目的地从事奴隶贸易，使奴隶人口的数量达到种植者需求的数量（而且在数目上超过了“短缺法”所坚持的黑人与白人的比例）。然而，在其他岛屿，特别是在牙买加，经济发展没有达到巴巴多斯的程度。在皇家非洲公司的经办下，牙买加的奴隶人口增长了 4 倍，到 1700 年达到 40 000 人，到 1722 年翻倍到 80 000 人，1754 年达到 130 000 人。在小一些的岛屿上，比如说内维斯，与巴巴多斯相类似，到公司开始行使垄断权时奴隶输入正在接近于饱和。而圣克里斯托弗、安提瓜【347】和蒙塞拉特对奴隶的需要不是为了维持其经济，而是为了扩展和转变。考虑到贸易的中断，皇家非洲公司似乎满足了这些岛屿合理的需要，也为其垄断的合理性做了辩护，并在发展和维持蔗糖经济方面起了作用，直到 1689 年爆发的战争使其事务陷入混乱为止——这一次战争的盟友是荷兰，而敌人是法国。此后，奴隶的匮乏和高价引起了这些岛屿的一致抱怨，特别是来自巴巴多斯的抱怨，尽管公司很可能对它的服务要好于任何其他岛屿。

针对产糖岛屿的特殊条件，皇家非洲公司对至关重要的劳动力进行垄断性控制，其结果是，奴隶很可能比在自由贸易体制下更便宜，因为公司从非洲海岸以控制价格购买。然而奴隶的流通却转向了巴巴多斯丰富而喧闹的市场，而牙买加和其他小岛屿则毫无疑问地缺少劳动力，而且这种缺少达到了使社会和经济的稳定受到影响的程度。麻烦部分在于，奴隶可以说是种植主为使岛屿发展有利可图的种植而支出的最大的一笔资金，因此与缺少劳动力相比，英属岛屿在这一时期里遇到的麻烦，更多的是缺少用来购买这种特殊劳动力的资金。特别是在殖民地开发方面来说，这种劳动力的最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它需要支出大笔的启动资金，而普通的劳动力却需要很少的启动资金和相当多的维持资金。牙买加作为较晚获得的殖民地，受此影响颇巨，而且有很多呼吁迫使这家公司以赊账方式供应奴隶。尽管如此，很显然，牙买加还是受到公司对巴巴多斯优惠政策的伤害，而且奴隶的缺乏阻止了该岛经济的发展。内维斯在广义上说反映巴巴多斯的状况，而其他较小岛屿则与牙买加处境相同。

英国国会因此而收到大量反对皇家非洲公司的诉状——甚至连巴巴多斯

和内维斯也远非满意——而这家公司自身却处于一种岌岌可危的境地，无法组织起对其特权的有效保卫。然而，如果贸易将要继续，或者，如果在这项重大贸易上英国殖民地不想依赖外国人，那么，在非洲海岸组建一些管理机构和采取某些保护形式就是紧要的。所以，当 1698 年国会终于接手这家公司时，法案出发点的基础是，在非洲建立要塞和堡垒是必要的，而所有参与【348】这项贸易的人必须出资用来维持它们。这将通过公司向所有对非洲的出口和所有来自西非北部的出口征收 10% 的税收来实现。除此之外，对非洲的贸易成为自由贸易并向国内所有臣民开放。法案使公司面对来自那些早先无视其特许权并维持其贸易的私人贸易商的竞争，这要求公司采取更加果敢有力的贸易手段，而它所产生的结果是，在法案通过之后的若干年里，殖民地得到比过去好得多的劳动力供应。几年之内，法案的成效使公司精疲力竭，而私人贸易商则繁荣起来，甚至向非洲运送公司的经纪人用来购买奴隶的货物。到 1705 年，公司把它的案例提交给国会，并寻求对 1698 年的法案进行修正，因为独立的贸易商承担了这项贸易的大部分。在 1698 ~ 1708 年期间，私人贸易商向牙买加运送的奴隶大约是公司的 5 倍，而且比公司发展得更快。

正如他们给垄断的公司造成很多伤害一样，私人贸易商在殖民地的工作同样有很多有待改进之处。奴隶的数量在私人贸易期间仍然不足，而且因为在竞争条件下到非洲购买奴隶更贵，奴隶的售价也就更高。然而，对于种植者来说，独立贸易商至少带来了更多的奴隶，而与垄断体制所造成的供给不足相比，成本的增加是不太严重的缺点。公司在岛屿的经济转型中起到了作用，然而它发挥作用的特殊方式造成的情况是，这种占有奴隶和种植甘蔗的经济与本可能达到的程度相比利润要少，更不稳定。战争、西非本地国家的状况以及英国政治生活的形势，都是造成这种结果的因素。公司不应单独承担责任，然而如果它把全部努力都用于这些岛屿的话，公司运营所遇到的确凿无疑的困难对英属西印度的影响本会小一些。但它没有这样做，部分是因为其他地方似乎也有赢利的良机；部分是因为夺取荷兰人和葡萄牙人对西班牙殖民地的奴隶供应纯粹是一项国家政策。

在葡萄牙的反叛成功之后，作为西班牙帝国体制的基本弱点，缺少直接进入非洲的通路的情况再次显示出来。在没有西班牙人供应奴隶的情况下，政府在 1662 年以前一直没有对奴隶贸易做出正式安排。中间的这些年（指 1662 年至葡萄牙反叛成功——译者）是一个西班牙殖民者与荷兰走私者自由贸易的时期，因为这种贸易总是归于最有效率的商人，而且这一时期【349】毫无疑问是荷兰人占统治地位，所以只能有一种结果。禁止葡萄牙人运输

的第一个后果就是劳动力的缺少如此地显著，以至于矿场和农场都停产了。荷兰人尽管伪装成意大利人试图获得贩奴合同，他们的策略仍被拒绝了，英国商人的要求同样被拒绝了，尽管英国驻马德里大使抓住查理二世复辟登上王位之机，寻求为英国公司得到一年运送两船奴隶的合同。西班牙政策中的排外因素非常强大，以至于所有供应奴隶的提议都被拒绝了。没有西班牙人的供应来源，殖民者或许不得不在没有奴隶的情况下生存。然而，在第一次抗议之后，殖民者却异常友好。因为一旦人们承认不可能通过谈判得到自由贸易，很快就会通过走私贸易来满足全部需要——这种情况达到如此程度，以至于据估计与此前任何时候相比，殖民者能够以更低的价格买到更多的奴隶。殖民者的迫切需要得到了满足，然而并非以一种执行帝国法令的方式，因为没有由此产生出税收和船运能力，也没有产生一种由自己控制的劳动力来源。

导致 1662 年贩奴合同制度复活的不是供应劳动力的需要，而是对获得大西洋地区船运的希望，而贩奴者是热那亚商人格里奥和洛梅林。荷兰西印度公司和英国皇家冒险公司都着手从贩奴者那里得到转包合同（贩奴者被完全允许这样做），而且英国公司承担了一项每年提供 3 500 个奴隶的合同。这超过了他们所能完成的限度，而他们的失败只不过做了荷兰人在此项贸易中优势的注脚。在“格里奥和洛梅林的贩奴合同”（到 1671 年）期间和稍后的时间里，西班牙人所需的奴隶供给都完全依赖荷兰商人。然而，从 1672 年以后，英国皇家非洲公司继承了对西班牙贸易进行分享的野心，而且谈判始终在进行，尽管这家公司无法使自己向西班牙人稳定地提供任何较大数量的奴隶。而西班牙人似乎在进行奴隶贸易，开始是在巴巴多斯，后来在牙买加，而且数量相当大。西班牙人或他们的代理人，愿意比英国种植者出更高的价钱。尽管西班牙人的贸易是零零星星的，并于 1685 ~ 1686 年之后衰落了，但却为英国公司带来可观的利润，并激起了批评，因为，据称该公司为了从西班牙那里赚钱而使英国殖民者缺少奴隶，甚至英国政府也在某种程度上垂青于西班牙人，因为他们的贸易以现金为基础并为英国的收支平衡带来了急需的金银。

因此，英国和西班牙政府都愿意促成这种贸易，其意图却是出于对自己的贸易理论的遵照，而在两国政府的背后，种植者的需要、他们用现金或实物付账的能力以及商人们提供船只和货物的能力，都作为影响因素，确实是共同推动了这种贸易的方式的形成。这种方式使英国公司持续不断地受到去达成某种协定的诱惑，这种协定的目的在于胜过独立贸易商。最终，在 1684 年，一项协议达成了，英国公司向西班牙在牙买加的代理人输送2 000 【350】

个黑奴。这或许违反了“航海条例”，然而，英国政府对此视而不见。政府的帮助无法使公司在战争期间完成合同，事实上，在这项协议下，公司没能在向西班牙殖民者供应奴隶方面起任何重要作用，但是，毫无疑问，个体英国商人在这种贸易中发挥了作用。

尽管如此，英国公司培养并延续了分享西班牙贸易的企图，当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所造就的机会使得贩奴合同被交到法国人手里时，英国公司的野心成了国家竞争的问题。因为法国人在经历了与英国人非常类似的学徒期后也进入了这项贸易，与之相伴的是早期半海盗式的航海及随后在西印度的拓居，还有主要由荷兰人主办的甘蔗种植。在那种由“业余者”进行的高度个人主义的大西洋海岸架航海活动发生之后，这项贸易的利润，以及将其统一到某种国家的和帝国的经济政策中去的需要，使得这种贸易以公司的方式进行组织，进而，法国的奴隶贸易被依次在 1673 年分配给塞内加尔公司，在 1685 年分配给几内亚公司，在 1703 年分配给借约公司（Asiento Company）。与英国公司所激起的同样抱怨——高价、奴隶短缺和缺少利息——不间断地对法国公司提出，抱怨来自种植者，也来自私人贸易商，还来自持股人。公司尽管依次支撑场面，而实际情况却是一个问题是另一个的继续和扩充，而且正是几内亚公司在 1702 年从西班牙政府得到了授予的贩奴合同。这一贩奴合同将持续 10 年或 12 年，它对“借约公司”（作为几内亚公司的后继者）的约束是，如果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持续下去，那么在这段时间里运送 38 000 个奴隶，而如果实现和平，则运送 48 000 个奴隶。

然而，和平使“借约公司”的垄断结束了，在乌得勒支，谈判者把贩奴合同从它手中拿走，并把为西班牙人提供奴隶的权利交给了英国人（即交给了南海公司）。这是一个高层外交的问题，而非实际的商业事务，因为[351]“借约公司”已经把它的权利转授给了法国商人个体（大部分来自南特港），而且，当 1716 年几内亚公司的特权被撤销后，实际的贸易活动并没有多少变化。对法国殖民地的贸易仍在继续，限制在拉罗谢尔、波尔多、南特和圣梅洛等港口，另外，尽管 1721 年垄断权又被授给印度公司，该公司不过将其地位利用成为从实际从事贸易的商人那里获得税收的工具。因此，在整个 18 世纪，兴旺的法国奴隶贸易以南特和法国在几内亚海岸的殖民地作为基础，为法国殖民地提供所需的劳动力，并为把法属西印度群岛带入到革命战争爆发时它所享有的繁荣高峰发挥了作用——在这种繁荣的鼎盛时期，瓜达卢佩被认为与加拿大同等重要，而圣多明戈被视作“安的列斯群岛的明珠”。

然而，尽管成就显著而引人注意，在这种情况下，仍有许多不令人满意

之处，这种贸易并不以参与者的共同感受为基础。对商人而言，支付现金而非实物、受控制的供货以及对外国竞争的排斥才是主要特色。而且他们始终都在准备迎接挑战，以在贩奴合同中获得对西班牙殖民地贸易的一席之地，如果必要，则牺牲为法国种植者提供的正常供应。而对种植者来说，以低廉价格获得固定而充足的奴隶供应，可以用实物付账或长期赊欠，是其农业经济的必要特色；而且，如果他们可以从无照外国人那里得到更优惠的价格或质量更好的奴隶，他们总会急于这样做。此外，18 世纪是一个地区性殖民地战争的时期，而作为海上商业的奴隶贸易和作为繁荣的前哨基地的西印度群岛，都一直是脆弱的，并且不断受到袭击。

在法属岛屿内和英属岛屿内一样，发展的状况规定着对奴隶的需求。到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和法国在印度公司名义下的奴隶贸易机构开始时，瓜达卢佩的奴隶已经几乎达到饱和状态，而圣多明戈则刚刚开始生产并不断地把新的土地用于耕作。法国贩奴商人的主要市场是在圣多明戈和马提尼克，而后者稳定地吸纳更多的奴隶。在宗主国法国，贸易的主干部分落到南特商人手里，并由于人事或船运状况等原因遭受无休止的轻微波动。不过，在整个 18 世纪，法国的奴隶贸易看起来经历了 3 次比年复一年的轻微波动更严重的重大衰退——1725～1726 年期间，印度公司及其下属机构，对特许权的直接利用达到了最低水平；1747～1748 年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352] 完全搅乱了这项贸易；1758～1763 年间与英国的殖民地战争则使衰退（在巴黎条约里）达到了顶点。而高峰时期则在 1750～1755 年之间，那时从南特每年平均运来超过 9 000 个在非洲购买的奴隶。

在总体图景之内的多样性让人备感趣味。从 1715 年到 1728 年，南特商人每年平均提供 2 570 个奴隶（买入 35 968 个，航海中损失 6 497 个，633 个被盗，28 856 个此期间在岛上售出），然而这些数字来自船长的公务统计，不具有绝对的真实性。在此期间，这项贸易处于扩张之中，个体船主向印度公司的垄断进行挑战并将贸易活动延伸到新的地区，利润的获得使越来越多的船主加入到这项贸易中。当苏瓦松议会和塞维利亚条约给予法国商人进入西班牙市场的更多自由时（始终把贩奴合同本身留给英国人），他们的贸易量缓慢地增加了，不过，直到大约 1733 年，扩展才开始；自 1729 年起，的确出现了衰退。在 1734～1737 年期间，扩张趋于稳定，然而 1738～1745 年间是增长巨大的时期，年平均运输量增长到大约 7 000 人，而在 1743 年竟高达 9 000 多人。在这一时期，对圣多明戈的贸易发展速度超过其他法属岛屿很多；原因之一是，那里幸免于摧毁了其他岛屿的飓风，然而，只要获得劳动力就能持

续繁荣并具有开辟新种植园的可能，才是一种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如此繁荣的贸易也无法避开法国与英国之间的冲突，这种贸易对私掠船是一种诱惑，私掠船在两国都受到强大势力的怂恿，而且在两国都被认为是他们所实行的殖民制度的真正基础。从 1737 年以后，法国船只在非洲海岸遭到反对和干扰。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正式敌对行为只不过是长期以来已经明显了的敌意的公开继续，然而，公开的战争使英国的全部海军力量能够被部署到反抗脆弱而地位重要的法国贸易的行动中去，而私掠船和袭击商船者封锁了法国港口，使非洲基地被隔离，并以牙买加为基地在加勒比地区随意巡航，其目标是封锁圣多明戈。从战略上说，法国的贸易及其 3 个关键地区容易受到侵犯，而到 1748 年它已经处于完全停止状态。这完全是由于英【353】国海军的优势，因为经济形势并未发生变化，法国商人清楚知道利润之所在，殖民者则提供了迫切而恒定不变的市场。当代表们聚会制定亚琛协约时，要求重建贸易的请愿已经组织起来了，而和平刚一达成，法国船只就再次涌入奴隶贸易，并在 1749 ~ 1756 年间使其达到最高峰，在 1749 ~ 1755 年间的 6 年里，每年平均从南特运来 8 000 个购自非洲海岸的奴隶，几乎7 000 人是在岛屿上售出的。

战争时期环境会产生压力，还有，作为一种繁荣贸易，它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进入衰退趋势，它们导致了在此期间经营此项贸易的商家数量下降以及商家之间的合并，还导致贸易者们使用数量较少而容量却更大的船只，并且它们完全集中于马提尼克和圣多明戈两个较大的市场，另外，还使这项贸易从黄金海岸扩展到了安哥拉王国。在这里，法国安哥拉公司的组建，标志着这项贸易在战争时期之后，开始了恢复的趋势，也标志着当事者们有着组织新的资本来经营这种贸易的企图。安哥拉公司是一家得到良好资助的合股企业，由经验丰富的商人来规划，然而来自安哥拉的奴隶质量不好，而领头的贸易商的阴谋诡计又为公司的稳定投下阴影，因此，它只进行过一次成功的航海。法国贸易的显著特色仍然是个人框架而非合股公司，尽管法国印度公司保持着其特权地位并由此获得向船主发放许可证的权利。

尽管安哥拉公司倒闭了，法国贸易在整体上是繁荣的，而且是整个法国帝国的福利的关键部分，在法国与英国之间为争夺帝国霸权而发动的战争中，法国的贸易像印度或加拿大或西印度群岛本身一样也卷入其中，而且它所受到的影响的程度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那些因争夺战略要点的斗争而影响到的地区所受影响程度一样。与加拿大——美国边界的要塞建筑以及与在印度的杜布里和克里芙的战斗相对应，贩奴商人不得不起来自卫，然

而，贸易是繁荣的，法属岛屿也是繁荣的，直到7年战争爆发以前，其蔗糖赢利都在稳定增长，并达到了一种英国岛屿无法赶上的繁荣高峰。然而，这种繁荣依赖于奴隶贸易，而奴隶贸易则依赖于和平或海上力量，而且，当令人担心的和平让位于公开的战争时，法国的贸易几乎在一夜之间停止了。7年战争期间，宗主国法国和它的西印度殖民地之间的商业往来也中断了7年。然而，奴隶贸易与得自殖民地的财富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从这样一个事实来判断，即英国控制着海洋，并在加勒比地区取得了全部胜利（1759年夺取瓜达卢佩，1762年夺取马提尼克、格林纳达、圣卢西埃和圣文森特），但却从未试图夺取圣多明戈，而它毫无疑问是法属岛屿中最富庶的一个。英国军队在西印度的首要任务不是夺取法国领土，而是打断法国的贸易并保护英国的贸易。因为，英国军队使法国从地中海解放出很大力量，并且，这些力量得以投入到劫掠加勒比地区贸易中去，所以梅诺卡的丢失被认为（很可能是正确的）是很大的灾难。然而，到战争结束时，特别是在与西班牙宣战之后，英国在加勒比地区取得了完全的胜利。【354】

尽管如此，当进入和平条约的谈判时，不仅瓜达卢佩被还给法国（然而加拿大由英国保留），而且，关于这些岛屿，争论还带来了“蔗糖 + 奴隶”经济的这种逆耳之言。西印度岛屿，以及大陆南部的种植园殖民地对奴隶的依赖和对通过进口而不断加强的对奴隶群体的依赖，使得种植者依赖于欧洲的资本家和船主，并使这种关键的供应处于宗主国政府的控制之下。这种占有奴隶的经济完完全全是一种依赖型经济，而这些岛屿赢得高度评价只不过表明依赖可能是相互的。然而，奴隶贸易使种植者对商人在经济上的依赖非常不同于对其祖国的政治和军事上的依赖；因为带来奴隶的商人还经常以固定的价格带走蔗糖、棉花、咖啡和染料木等该地的物产。如果说，政治家认为法国是一个依赖性的帝国，那些产糖岛屿（对奴隶有恒定不断的需求）则扮演使这种依赖达到完全的角色。不过，在有关是否应该把瓜达卢佩归还法国的辩论中，谢尔本（皮特称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尽管产糖岛屿造成母国的削弱和人口减少，然而“无论在哪，种植甘蔗就意味着人口减少”。伴随着日益增加的人道主义的和反对奴隶制的呼声，出现了一种强有力的观点，即认为依赖性的产糖岛屿始终是一个负担，因为它们从未维持过足够的用于防御和管理的白人人口。自北部兴起的，以个体的自耕自给为基础的拓居者殖民地可能既无需政府操心又对帝国有最大益处。帝国的全部争论并非纯粹由殖民地以何种类型的劳动力作为基础这一问题所支配，这可以从这样一个事实判断出来，正是大陆南部蓄有

[355] 奴隶的殖民地最为热切地寻找新的土地，并领导了从密西西比峡谷向西部新地区的跋涉，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逃避英国法律，并在表达和领导反对英国统治的运动中，及时地起到了积极的和促成的作用。

当在 18 世纪最后 1/4 的时间里，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制度进入其试验期，英国贸易的缺点在引起产糖岛屿的反感方面起了充分作用。英国政府通过乌得勒支条约从西班牙那里赢得了贩奴合同的特权，并把它与每年向西班牙殖民地派遣一艘船的权利一道，都授给了南海公司。就西班牙政府在把全部外国人排除在对其殖民地贸易之外的规定的基础来说，这种每年一艘船的保证是惟一允许的例外，在条约中，作为一种对法国人的歧视，这种排外主义的存在一直得到了坚持。英国人对西班牙帝国贸易的这种侵入并没有规定的期限，不过贩奴合同的期限是 30 年。

英国人中的贩奴合同标志着种植者和商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并标志着殖民地的经济利益有着从属于英国商人的利益的某种关系，这种从属关系导致了“旧殖民体制”被谴责为重商主义。的确，向西班牙殖民地供应奴隶可以被辩解为一种输入西班牙的金银以保持英国贸易平衡的手段，然而对西班牙人的奴隶贸易，还有对所夺取的法属岛屿的贸易，只能是造成对英国种植者的竞争——造成在奴隶运输和蔗糖及殖民地物品销售两方面都发生竞争，并由此成为商人们获得利益的代价。因此，对玛拉基·波斯特瓦斯瓦依特以及对更多的人来说，乌得勒支条约的贩奴合同条款是不公正的；是“一个罕见的，其制定对国家而言利益极少的条约”。南海公司对它每年向西班牙殖民地派遣船只的权利大加利用，以至于引起无休止的抱怨，并最终导致了“詹金斯之耳战争”，英国种植者抱怨说，这项权利只不过是提高了在该岛出售奴隶的价格，违禁的贸易商既对垄断加以抱怨，又对它加以蔑视，其情绪程度激起了国家的强烈反对。南海公司是这样一个时期的产物，它是英国一种渴望状态的缩影，这就是试图在一个经特许的和独占的公司的框架内进行一种有秩序的帝国贸易的渴望。就其本身而言，它并没有从事贩奴贸易的经验，在皇家非洲公司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南海公司与之签订了供应奴隶的合同，并在贩奴者所指示的时间和地点发货。

然而皇家非洲公司仅仅是勉强维持生存，1698 年的《“百分之十”条[356] 例》规定个体贸易商必须向公司缴税，以作为对全部所依赖要塞的维持维护费用的分担。这一条例于 1712 年到期，它导致了私人贸易的兴旺，而当其停止时，导致了公司把此项费用列为经常性开支，而不落到私人贸易商头上。在这样的基础上，皇家非洲公司无力竞争，而且，尽管在 1730 年一项

关于要塞的政府补助获得通过，然而，这种帮助甚至也没能使公司经营的贸易赢利。私人贸易商具有太多的有利条件，而且，到1730年，它们数量极多，经营良好。对皇家非洲公司而言，从他们那里赢得大部分贸易的希望微乎其微。事实上，南海公司自身已经把它的贩奴合同包给了私人贸易商，而且，几乎在该公司享有其特权的开始时，关于这种贸易的一种新体制也开始了，在这种体制中，布里斯托和利物浦等重要奴隶贸易港口（尽管始料未及，兰开斯特也经营着数量繁多的贸易）占据主导地位。

随着外港和独立贸易商兴起并在此项贸易中占支配地位，对所谓的国家利益（而不是贸易平衡）的控制和保护退居幕后了，而贸易商和种植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变得更为公开。这不应被视作种植者一方获得权利的征兆，相反，毫无疑问，他们处于脆弱地位，在贸易的两端都易于受到剥削——当贸易商作为整体赚得财富并在繁荣中消亡时，种植者花掉了全部所得，或负债而死，或在一种其实距破产仅一步之遥的虚假富足中死去。此外，种植者可能偶尔对奴隶产生正常的人类情感，而对贸易商而言，奴隶除了是“一件”商品以外，什么也不是。种植者在总体上是缺少吸引力的人物；贸易商对“航海中途”的恐怖负有责任，这一用词是18世纪和19世纪初反对奴隶制的演说者（他们不缺少辩才）的口头禅。然而，种植者本身却受到广泛批评，这既是因为其平常的生活方式，也因为他们对机会把握和特权维持的忽视，还因为他们在经营自己的保守农业之中所形成的依赖于奴隶的方式。然而，如果一种国家经济是具有任何意义的（没有它，产糖殖民地或奴隶贸易就失去了合理的辩护基础），种植者就有权抱怨贸易商把奴隶提供给外国的与之竞争的种植者，而这些奴隶本是他们自己急于购买的。

从英国种植者的观点看来，贸易体制的缺点或许还是情有可原的，然而，当战争的机会使竞争对手的领土被置于英国控制之下时，这种缺点便变得更普遍和更严重。例如，在7年战争期间，英国占有古巴大约9个月，在此短暂的时间里，据估计，有超过10 000个奴隶被运进此地，这比此前的西班牙殖民地开创以来的250年里的奴隶总数的1/6还要多。与此类似，在英国人占领瓜达卢佩的3年里，他们共运入40 000个黑人奴隶。当在17世纪最后1/4时间里，也就是在旧殖民体系达到成熟期时，英国商人所运送的奴隶的2/3被卖给了外国人，利物浦的商人们经手了全部欧洲列强奴隶贸易的几乎一半，而且在这一世纪期间，英国贸易商为法国和西班牙甘蔗种植者提供了50万黑人奴隶。 【357】

从根本上说，这种贸易体制的顶点是私人企业的产物，而不是一种有组

织的贸易的产物。“旧殖民体系”在其过程中将其形式抛弃，以此作为实现其目标的一个必要步骤。殖民地的确依赖欧洲，在对其生活方式至关重要的奴隶供应上完全依赖欧洲。然而，正是英国和法国商人在为新世界提供奴隶，并且对需要者的国籍不加区别，而且在这两个国家的政府机构之内，是私人商人承担着贸易，而不是由为维护国家目标而成立的大型特许公司来进行。然而，国家控制并非完全没有价值。例如，当“贩奴合同”在 1750 年被交回给西班牙时，西班牙政府同意支付 100 000 英镑这样相当大一笔款项作为对公司的赔偿。而产糖岛屿和佛罗里达南部殖民地也是国家间竞争的重要部分，这种竞争在七年战争中达到顶点。

6.7 北美洲殖民地

奴隶贸易（其结果是：单一种植，依赖性，欧洲对非洲贸易与西部扩张之间发生相互关系），被结合进南部殖民地经济，与此同时，需要注意另外两个开展海外贸易和殖民的主要地区。在北面，加拿大实际上仍被限制在圣劳伦斯河口。在法国人的统治结束之前，探险者、皮毛贸易商和传教士确实已经进入到落基山脉脚下，而且从哈得逊湾出发的英国人也到达了那里。然而，除了法国人在河流下游地区的殖民地以外，那里没有工业，没有农业，也没有劳动力问题。法国人或英国人经手的兽皮贸易主宰着西北部的广大地区，而在这种兽皮贸易中，印第安人也是参与者，不过，在任何意义上，他们都不能被称为白人雇用的工人。在运往欧洲的兽皮背后，有一系列完整的贸易 [358] 关系，而欧洲人缓慢地认识到，兽皮不是由实际捕获猎物的猎手带来进行贸易的，而是由从事贸易的中介部落，他们或许对利润的获得有所贡献，然而其主要职能（他们对这种职能越来越看重）是把欧洲的货物带到内陆地区，并把兽皮带到商站，不管这些商站是在海边还是位于内陆，或是在河流的上游，甚至是（在这个时期结束时）在草原地带。印第安人尽管越来越确切无疑地依赖于来自欧洲的进口，却仅让这种依赖性对其生活方式的次要方面发生影响。他们仍然是漂泊者、猎人和——以巨大的不安定为代价——独立的人。对兽皮贸易来说，他们是重要的，但他们却不受白人支配，甚至对那些接受白人贸易商有偿雇用的个人来说，雇用也只是短期的，并且是以一种保持独立的方式。对兽皮贸易而言，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人工雇用（maine de' oeuvre）”。

在加拿大有居民的地区，没有任何受佣者可被承认为劳动力。法国在圣

劳伦斯河下游的殖民地在早期主要是男性和军事性的，由于殖民者试图为换取各个加拿大公司所被授给的土地和特权而建立一种契约殖民制度，从而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军事化结果。经常有受到宗教命令保护的孤儿和“诚实的姑娘”被运往殖民地，以使社会获得平衡和稳定。然而，在法国人的理论中，有一种建立一个包含土著人血统的混合社会的观点，以及通过相互通婚造就大批新的法国臣民的观点；法国人的方法是，不论是通过贸易，还是通过传统的尝试，或是通过探险的努力，都可以与印第安人保持不断的社会和经济接触，以至于这成了在加拿大的生活中的一种正常特色。因此跨种族通婚和一种公认的混血成分（the métis canadien）成了加拿大社会和法属加拿大经济的一方面内容。由于捕鱼、进入森林寻找有兽皮的印第安人（常常并不是亲自用陷阱捕猎兽皮）是固定地附属于繁重农业劳动但又富有吸引力的活动，还有，由于农业劳动在一年的很长时间里几乎是不可能的，从而，法属加拿大的经济经常处于过分延伸的危险之中。工业仍然是小规模和地区性的，仅仅被用来满足从事农业和兽皮贸易的人口的最低需要，位于河边地带的农场始终面临被忽视的危险，因为人们都奔向了海洋或森林。然而，平衡并没有因为往加拿大征派大量辅助性劳工而得到校正，这些劳工也许会使土地所有者在其他基础上而不是通过自己的操劳来发展农业。庄园和种植园被建立起【359】来，人们也通过了禁止到森林地区从事贸易，或者甚至禁止长时间外出的法律。然而，情况仍然是，土地所有者最多也不过是生产基本的生存必需品——或许有时会在当地市场上出售一些——而且，作为农业发展的主要劳动力的，仍然是土地所有者自己及其家庭，还有相对很少的欧洲血统的仆人。

位于半北极条件下的加拿大与开发中的亚热带南部殖民地及加勒比地区之间的地带，即北美洲的温带地区，对 16 世纪那些有关殖民地开拓的理论家们来说，是最有吸引力的地区，政治家们希望那里出产欧洲经济所需要的所有用来补充自身资源的商品。英国和荷兰的北美殖民地对自由移居者和对政治家具有同样吸引力，这很早就证明了，如果一个殖民地能够在经济上自立（特别是在重要的劳动力问题上），就必须给予它最周到的政治关注。

在 1623 年，荷兰西印度公司把第一船殖民者带到了曼哈顿。西印度公司从新尼德兰公司接管了其在拿骚的脆弱的要塞，还有它与易洛魁亚部落联盟的条约（荷兰人通过该条约同意提供火器来换取兽皮），而且，荷兰人不顾来自其弗吉尼亚英国殖民地的邻居的反对而在曼哈顿岛上保持了一小批驻军。荷兰殖民者占据了长岛，还有现代的费城所在的地区——事实上他们建立了广袤的新尼德兰殖民地——牛群和羊群在第二年也到来了。然而，尽管

曼哈顿岛上的印第安人把他们的土地卖给了荷兰人，无论他们还是任何他们的邻近部落都没有屈服于受雇于殖民者的诱惑，也没有变成为在该岛和在大陆出现的农场或种植园（bouweries）中的劳动力。新尼德兰仅仅被认为是一个可供选择的农业地区，在农民自己承担沉重劳动的条件下，它对荷兰没有什么优势可言，殖民因此也是缓慢的。

一种解决办法是对任何带来 50 个移民的人授予“大庄园主（patroon）”的称号，并授予位置适宜的庄园，这一办法可能会产生某种组织方式，它的风格介于葡萄牙的分派劳役制制度、西班牙的“监护征赋制”与英国和法国的契约佣工之间。然而，即使在 1629 年授给想成为“大庄园主”的人的、有“特权和免税权”的特许状在有效存续，人们也在面对着这样一个时期，即荷兰殖民地在一个无论怎样都要经历的过渡期内，尽管可以向殖民【360】者自由地供应奴隶，但也是仅能生存而已。而且，事实上，对荷兰的务农者来说，成为大庄园主的佃农并不具有什么诱惑力。然而，有一些兴旺的种植园得以建立起来，特别是烟草种植在曼哈顿占据了支配地位（这种作物需要较少的固定劳动）。尽管如此，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殖民地并没有被移植到生活在新阿姆斯特丹及其周围地区的贸易商和船主头上。而大庄园主关于把罪犯和贫民依照契约佣工制运来殖民地的要求也被拒绝。相反，在 1638 年，西印度公司规定毛皮贸易和占用土地的权利应向所有殖民者开放，并对移民做出了具有诱惑力的授予土地和提供股份的许诺，而殖民地则向前发展了一大步。来自英国本土（也有一些来自英国殖民地）的英国人与德国人和胡格诺派教徒、皮德蒙特土人、韦尔多派教徒、苏格兰人、再浸礼教徒以及犹太人一道来到殖民地。由于一场灾难性的印第安人战争，这种尝试受到损害，不过，到 1653 年，新阿姆斯特丹拥有 2 000 人的讲多种语言的人口，而到 1664 年则几乎达 10 000 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来这块土地定居的农民。

对荷兰西印度公司或三级议会来说，无论是要表现出与这项政策相伴随的宗教宽容，还是要面对日益增长的对城市自治的要求，都不是一件容易接受的事。然而，新尼德兰足以充当荷兰的民族主义者，对在特拉华河的竞争的瑞典殖民地进行压制，并且，它还卷入了作为共和与复辟时期标志的英国与荷兰之间的战争。结果是荷兰殖民地被其英国邻居夺取而且兼并了，这个地区的实际的所有权被授给了约克郡公爵詹姆斯。然而，尽管殖民地与母国的关系密切到了卷入其冲突的程度，而且，如果总督德·斯图伊文森特能够抵抗，他将会这样做，然而，新尼德兰仅有10 000 人的人口，而且市民对荷兰的认同感的程度不足以使他们产生坚持抵抗数量众多的敌人的想法，也

不足以使他们克服自己受到西印度公司和三级议会忽视的感觉。

当居民们也对总督表示反对并坚持投降时，荷兰在美洲的统治走到了尽头。这件事本身或许不令人感到惊奇，因为抵抗是注定要失败的。然而导致这种缺少抵抗行动的态度是值得评论的。由于同样的原因，地方民族性强过了对欧洲的忠诚，而且，为了吸引从事劳动的务农者而采取的招募政策支配着局势，【361】正是这种经济手段决定了殖民地的模式，决定了殖民地在政治上的冷漠。

英国人进入新阿姆斯丹后，提出该殖民地应向所有可能来自荷兰的殖民者开放，而现有的殖民者具有离开的自由，荷兰船只也可以自由进入殖民地。这种贸易自由的提出对殖民者接受投降起了不少作用，而且当投降已经完成后，荷兰人甚至被允许违反航海条例，以便让他们到殖民地进行贸易（特别是用于毛皮贸易的货物）。他们是一个经济实体，除了进行毛皮贸易所需的欧洲货物之外，他们是自给自足的。对他们而言，荷兰不足以作为奴隶劳动力的提供者，或者作为种植园农业可能出产的重要出口商品的市场——至于毛皮贸易，在英国统治下是能够顺利地进行的。因此，新阿姆斯特丹没有遇到太多困难就变得很像纽约。

英国夺取荷兰殖民地的远征在某种程度上隐藏了其目的，因为它作为一个计划同时用来使英国殖民地恢复秩序。波士顿是1664年离开英国的由4艘船组成的小舰队的公开目的地，与之同行的还有4位特派员，这次远征的部分目的在于把王室政权和英国国教的主教制度强加于马萨诸塞和南部联邦。这次远征同样也有经济背景，如使混合型基本农业和为国内生产必需品的当地制造业成为可能并且能令人满意。新英格兰殖民地的经济自主性当然受到了英国殖民者的，在社会和宗教上的独立性的强烈挑动。在这个阶段，不可能把经济和宗教因素的作用与新英格兰殖民者独立精神的产生拆散开。在17世纪的人看来，这种独立性并非充满了吸引力，因为它感觉迟钝而缺少宽容，然而它却深深地编织进了殖民地生活的模式中，而其中最坚实的一根丝线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欧洲劳动力是社会的基础，也是开发那些正在被利用的土地的基础。这里没有对输入的奴隶劳动力的依赖，也没有对土著劳动力的依赖；气候、土壤，以及社会模式都同样促进了混合型的基本农业，而且尽管烟草使经济多样化，庞大而富有的种植园并不罕见。新英格兰社会的经济基础，在多少依赖于契约佣工的情况下，仍然支配着那里的社会模式；而且与荷兰人的情况一样，这些经济基础是依赖于白人家庭——或雇用【362】的——劳动力的欧洲社群，他们在温暖的北方气候条件下开发用于小麦种植和放牧的土地。这与宗教观点的压力一道解释了为什么新英格兰殖民地的全

部历史是一部对母国的经济和法制上的监护发动叛乱或接近于发动叛乱的历史。在查理二世整个统治期间，马萨诸塞州与他处于持续的激烈争吵之中，他则以没收该殖民地的特许权结束了这种争吵。

新英格兰殖民地以对它自己的佣工形成依赖而自身却走向独立的前景作为鲜明的标志，与此同时，向南方发展的殖民地却显示出了明显不同的特征。在整个 17 世纪，契约佣工的"贸易"都在延续并得到发展。"清教徒社群在农业上人数不足，趣味单一，对新来者怀有敌意，很少接受他们。相反，在更南部的地区，新来者受到那些需要廉价劳动力的种植者和农夫的热烈赞扬，也受到那些需要使其土地授权合法化的投机者的热烈欢呼，还受到希望扩大人口的殖民地地主的热烈欢呼"[1]。这个时期，在所有来到南方殖民地的人中，有超过一半的人是佣工。这一时期的国家文件充满了这样的主题，即劳动力是使殖民地作为生产区进入帝国经济的首要必需物。而且在 18 世纪之前，在南方大陆殖民地，白人契约佣工的数量没有被黑人奴隶所超过。迟至 1755 年，马里兰州总督仍然能够这样写道："种植者的财富存在于他们的佣工（是花高价买来的）的数量，其程度恰如英国农民的财产依赖于其牛群的数量"。而这不过是对一个半世纪以前弗吉尼亚的格言的重复，即"我们的主要财富在于佣工"。

到 1755 年，只有在南卡罗来纳，黑奴的数量超过了白人。那时在马里兰，白人为 107 000 人，黑人为 42 000 人；在弗吉尼亚，白人为 173 000 人，黑人为 120 000 人。在南卡罗来纳，大约有 50 000 黑人，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 25 000 人的白人人口，而在佐治亚，白人佣工同样远不如黑奴重要。

作为一种农作物的烟草，作为当务之急的军事防御，以及 18 世纪英国的社会动荡和经济混乱，这些就足以解释白人契约佣工的重要性。然而，南方殖民地首先是种植园殖民地，出产供出口的热带和亚热带物品，其标准体制是大规模的庄园（通常是种植园）。奴隶或半奴隶劳动是一种必需。随着 [363] 18 世纪的消逝，当南海公司和皇家非洲公司，以及利物浦、伦敦、布里斯托和兰开斯特的商人们使奴隶贸易对英国种植者而言变得更加容易和可行时，这种贸易也变得非常重要。然而，这些发展并没有对南方经济的性质，或对它对宗主国的密切依赖产生重大的影响。尽管在 18 世纪结束之前，南方殖民地的扩张性的、缺少远见的农业，开始把美洲殖民地的边界扩展到密西西比和俄亥俄等远离海岸的内陆地区，而南方的经济却仍然在市场销路和

---

① 转引自 A. E. 史密斯的著作，第 4 页；还可参见第 27、332 页。

运输及供应两方面与宗主国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对劳动力供给（不管是黑人或白人劳动力）的需要方面。

6.8　香料群岛的劳动力及其管理方式

横渡大西洋的欧洲殖民者们，以其不同的方式坚定而有力地发展了一种社会和经济结构，并在其中组织生产。他们的努力是多样化的；或是试图把土著居民组织起来；或是把仆役或家庭成员组织起来；或是组织白人契约佣工；或是组织起黑人奴隶，并以之作为原料生产（不管是在矿山还是在田野）的基本劳动力。在东方，情况从一开始就截然不同，因为欧洲人在东方总是碰到充分发展了的完整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这些制度构架自身足以能够将欧洲人所要寻找货物的生产和销售活动组织起来。由此，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英国人、法国人和荷兰人，是作为商人，而非作为（最终变为劳动力提供者）原料生产者来到这里。当然，在这种东西方的一般差异之外，存在着很多地方性的例外情况。一个主要的例子就是，欧洲人的影响不仅超越了运输当地经济的剩余产品，而是发展到为提供这些产品而组织劳动力。

荷兰人为其东印度贸易带来了知识和现实性，这些东西已经使他们成为在欧洲贩卖东印度产品的大师。他们还带来了如何通过有效利用东方的运输航线和贸易关系而获得利润的知识。因为在 1595 ~ 1601 年之间，荷兰人有大约 15 次远征，它们无视葡萄牙人的禁令而直接与东方进行贸易，此外有 4 家荷兰公司为开展这种贸易而存在。合并而成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于 1602 【364】年成立，它给财政带来了额外的稳定性，也带来了更加稳固的指导性与垄断性的控制。另外，它还带来了议和或战争的能力、获得土地和建筑要塞的能力，以及一种显著的国家主义方法。

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为防范葡萄牙人而有必要保卫荷兰人的贸易和殖民地，而与其对手相比，荷兰人在行动中表现得特别英勇，其海军策略则非常机敏。在 1605 年葡萄牙人被从柔佛（Johore）和安波那赶走，而且除了在澳门港这个欧洲人被允许由此进入中国的地方之外，葡萄牙人的地位被彻底削弱了。在那里，葡萄牙人与中国当局的友谊很牢固，并在 1623 年击退了一次荷兰人的进攻。

在荷兰人汹汹而至以前，葡萄牙人已经陷入了严重困难。他们发现调味料贸易的大型集散地是在马六甲，而在马六甲的后面，有一个商人和贸易者

的网络，他们在把调味料运至马六甲的每一站的过程中都抬高价格。葡萄牙人在 1511 年占领了马六甲，并在那里建立了多重政府形式，分别管理印度人、摩尔人和爪哇人；然后，他们决心越过在马六甲的市场而直接与调味料产地接触。于是他们从马六甲迁移到摩鹿加（或称香料群岛），并于 1522 年在特尔纳特通过与该岛国王结盟而建了一个要塞，并因此获得了丁香贸易的垄断，当时丁香只出产于特尔纳特、蒂多雷、安波那和一些小岛。然而，这次迁移使葡萄牙人与蒂多雷相冲突，并与此前通过往马六甲运调味料而获利的爪哇贸易商发生冲突，还与相邻的岛屿发生冲突，由于各地的人们开始认识到欧洲市场的可能性，对丁香的狂热也传播到了这些岛屿。此外，葡萄牙人从未在实行民主政治的班达岛取得支配地位，而那里集中了肉豆蔻的贸易。在肉豆蔻方面，他们只好依赖爪哇贸易商把该种调味料带到市场，并依赖他们在安波那的地位。自 1511 年起，他们已在安波那岛立足，安波那岛具有巨大优势，它既出产丁香也出产肉豆蔻，而且，它的统治者并不憎恨传教的努力，而葡萄牙人总是因为这种努力而使自己与当地居民的关系变得复杂。

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当较早的佛教徒和婆罗门教徒的信仰被伊斯兰教取代时，宗教的复杂性更加重要了。较早的文化是来自印度的印度教徒商业殖民的结果。自 9 世纪以后，当穆斯林把东方贸易带入世界经济巨大变化的范围内（穆斯林的扩张是这种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特色）时，这种文化受[365]到了挑战。到 1250 年左右，穆斯林在北苏门答腊立住脚，并由此向南扩展。他们在 1440 年到达特拉纳特岛，到 1450 年时则成了马六甲的主人。然而在爪哇，土著的麻喏巴歇王朝（其权力建立在婆罗门教信仰的社会种姓制度之上）此时正处于其政权的鼎盛时期，它控制着该岛北部沿海出产稻米的平原地区，还操纵着进行调味料、矿产和制成品贸易的广泛而复杂的贸易系统，它把帝汶岛和巨港岛等遥远岛屿上的物产也包括其中。

葡萄牙人夺取了马六甲，并因此对穆斯林势力造成了一次强烈打击。然而，穆斯林势力在特拉纳特岛占支配地位，葡萄牙人在该岛建立一个基地（以便能够摸清马六甲货物集散地情况）的努力不断在宗教和人员方面受到对手的袭扰。穆斯林的敌对还使葡萄牙人无法接近万丹岛的胡椒贸易，并阻止他们接近爪哇内陆的希瓦依提克头领们。葡萄牙人的地位在 16 世纪头1/4 结束时摇摇欲坠。的确，他们还控制着马六甲，然而，在南面的柔佛岛，苏丹自己对葡萄牙人怀上了难以消解的敌意。在苏门答腊的亚齐（Atjeh），穆斯林王朝蔑视葡萄牙人并拒绝与之进行胡椒贸易，婆罗洲的文莱港是马六甲贸易的一个兴盛的穆斯林对手。甚至在特拉纳特，葡萄牙人的地位也由于宗

教争端而遭损害，而且，来自爪哇穆斯林的敌意使马六甲海峡的航路变得危险。不管怎样，葡萄牙人对控制和利用战略性海上航线未做努力，而且，当其在特拉纳特岛的要塞被围困5年并在1574年陷落之际，其间没有来自马六甲或果阿的任何援救。

因此，在出现任何来自欧洲的重大的挑战之前，葡萄牙人在东印度的势力和贸易就似乎已经处于衰落态势。当爪哇内陆的国家接受伊斯兰教信仰，以及强大的马塔兰王国（尽管因不断的王朝之间的战争而分裂）将其统治扩展到该岛东部和中部时，在柔佛、文莱、苏门答腊和特拉纳特的穆斯林对手变得更具威胁。欧洲人进行干预的场景已经成熟，仇恨和竞争足以使挑战葡萄牙地位的欧洲人获得强有力的当地支持。位于爪哇的农业占主导地位的马塔兰和苏门答腊的商业政权之间的竞争十分显著。马塔兰的肥沃土壤使其有能力向各岛屿供应稻米，它还注视着北面的巽他海峡，该海峡把它与苏门答腊分开，并且它还提供了一条与经由马六甲海峡相比并不逊色的东西方之间的航线——况且马六甲在葡萄牙人控制之下。苏门答腊在农业上不太富饶，却因控制着其【366】南部海岸的巽他海峡和北部海岸的马六甲海峡而拥有巨大优势。这种地理位置使它不可避免地依赖由此获得的商业机会来寻求财富和力量，并同样不可避免地陷入与马塔兰的持久斗争，因为每个国家都试图通过占领对方的海岸来控制巽他海峡。然而，马塔兰没有赢得对整个爪哇的控制。许多拒绝接受伊斯兰教的印度人移民到相邻的巴厘岛，然而伊斯兰教的实际统治地位并未给爪哇带来统一。分裂是沿着商业和农业利益的分野进行的，在内陆的马塔兰代表着水稻产区的农业优势，而万丹位于巽他海峡，代表并领导着商业利益。

在爪哇，正是这种农业和商业部分之间的竞争，使荷兰的无照经营者有机会推翻葡萄牙人的势力并取代它的位置。从一开始，荷兰人就从他们所发现的战争局势中获得利益，并从土著国家的态度中获利。马塔兰的统治者欢迎他们，因为这些统治者依赖于农业而不必担心荷兰人成为贸易上的对手，而万丹的居民同样也是友好的，因为他们希望从荷兰人的贸易中获利。1596年在由科尔内里斯·德·霍特曼领导的第一次东印度航海过程中，荷兰人与万丹岛的苏丹缔结了盟约，尽管后者的行为总是傲慢自大，使葡萄牙人感到没必要对这种对手感到恐惧，但葡萄牙人却注定要卷入荷兰和西班牙的敌对之中，他们发现不仅有必要为商业竞争做准备，而且有必要为其据点的武装进攻做准备。然而，葡萄牙人企图通过恐吓万丹岛苏丹以使其拒绝所有类似的欧洲对手，这种做法的失败应对葡萄牙人尊严与能力的显著衰落负有责任。万丹战胜了葡萄牙人的舰队，并希望后来的荷兰航海者帮助它驱逐共同

的敌人。然而，尽管荷兰人的进取心和热情在紧随霍特曼航海之后的若干年期间把许多船只带到了万丹，而他们在这个个人冒险时期的目的却首先是商业性的。因此，他们在特拉纳特和安波那建立商站，与这些岛屿友好通商，却拒绝加入印度尼西亚人反对葡萄牙人的斗争。

荷兰的供应、荷兰的船运、还有荷兰的贸易方式，都比葡萄牙人所能提供的任何东西先进，以至于到 16 世纪末，他们牢牢地控制了贸易。在 1600 年他们与安波那建立了正式盟约，从那时起他们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些岛上[367]的土著战争，并加入到以葡萄牙人为对象的普遍敌意者之外。一支仅有 5 艘船的荷兰小舰队，在 1601 年 12 月拦截并驱逐了一支有 28 艘船的、赶来巩固葡萄牙对万丹的控制的舰队，这决定性地标志着新的转折点。荷兰人确实没有能阻止葡萄牙人征服安波那，不过葡萄牙人在特拉纳特的同样企图也遭到失败，并且，在柔佛岛，也由于荷兰人占得先机而被驱赶走。

荷兰东印度公司于 1602 年 3 月成立，它把荷兰人分散的利益统一起来，形势因此而变得有利。然而，贸易已经和战争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更严重的是，调味料贸易明显地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限制，即除火器之外，香料群岛对欧洲产品几乎没有需要。岛上居民的主要需要是稻米，因为岛上人口稠密，而大部分地区种植的粮食作物只有西谷米一种。而且，在岛上，只有来自加里曼丹海岸而非来自欧洲的布匹才能找到市场。在这里，荷兰人碰到的问题和荷兰毛皮商在北美碰到的问题相同。岛上居民的直接需要一旦满足，对贸易就漠不关心了。结果是，调味料价格的提高使利润减少而非增加了，这正如欧洲经济中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岛民只需要一定数量的货物，当其有限需要得到满足后，贸易就失去了动力，而且在达到某种程度之后就无法肯定贸易是否还能继续，而不管出什么的价钱。只是，他们在自己内部所实行的垄断，再加上他们对葡萄牙人的优势以及他们与印尼人的良好关系，使荷兰人在其船只躲过失事和海盗之后能够获利丰厚，甚至在 1599 年，荷兰人实际上掌握了欧洲胡椒市场的垄断，但尽管如此，很快他们就被迫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在东印度“不存在没有战争的贸易，也不存在没有贸易的战争”。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卷入了群岛上的战争，并在意义上发现，武器供应与提供某种无限广阔的市场靠得很近，而且也是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并非是葡萄牙人的权利要求和西班牙政权（自 1580 年起成功夺取了葡萄牙王位）的权利要求的惟一挑战者。1600 年以后，一家英国东印度公司也进入这一地区，这部分是由关于德雷克穿过这些岛屿的传说和他在特拉纳特的呼吁所引起，部分是由詹姆斯・兰开斯特爵士及后来的冒险商所赚利润所激起，并且，还

部分是由荷兰人的令人瞩目的利润和对胡椒的控制所激起。一支法国远征队在1601年也到达万丹，而一家法国东印度公司也于1604年组织起来。

然而，荷兰公司还是轻而易举地对其对手取得了优势，并且相对他们占有相当大的主动性。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庞大的战争和征服工具”，而且【368】它所派遣的强大船队——在头3年有38艘船——不再首先以商业为目的。他们是为了进攻葡萄牙人，而且轻松地把他们从柔佛和安波那赶走。荷兰人的胜利理所当然地使它能够在随后的1605年与安波那达成一个协议，然而，这一协议不仅给予荷兰人贸易上的垄断权，而且还承认了荷兰人对该岛的宗主权。如果荷兰人能设法把葡萄牙人从其控制的马六甲赶走，那么，随后他们还会在柔佛获得宗主权。然而，他们失败了，此外，他们在特拉纳特的据点被来自菲律宾的一支西班牙远征队攻陷。结果特拉纳特苏丹与荷兰人更加靠近并完全把他们当作盟友，而且曾许诺，一旦他们能够联合击败西班牙人，那以后他将把荷兰公司视作保护者。然而在这种联盟结出果实之前，或者说在荷兰人在特拉纳特和安波那的地位得到巩固之前，荷兰人必须在战争中打赢。

很显然，没有精心策划的行动，就无法战胜敌对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而这需要一个要塞，以使荷兰人的统治能够由此向外辐射。于是荷兰公司从对贸易的渴望和对进行贸易的地点的渴望转向了对军事统治的渴望。总督皮特·博特在1609年接到命令，要他寻找一个适宜建立要塞的地方，以作为在东印度的所有荷兰船队的集结地。位于巽他海峡的万丹岛所具有的战略和商业重要性使它成为一个理所当然的选择，然而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据点同样设在那里，而且互相对立的穆斯林统治者为了寻找盟友而设法使欧洲国家互相反对。荷兰人转向了雅加达附近的城市，只是若干年之后，他们才从当地统治者那里得到满意的条件，同时英国人也随后来到雅加达，正如他们总是在群岛各处尾随更具冒险精神的荷兰人一样。当法国人似乎也可能在雅加达建立立足点时，强有力的荷兰总督让·皮特森·科恩开始建造要塞，尽管他尚未结束与当地统治者的谈判，而当英国人开始修建堡垒时，他又将英国人的这些堡垒摧毁。而且，尽管荷兰与英国这两个国家在欧洲相安无事，他随后还是把英国人从万丹、安波那和摩鹿加赶走。在1618～1619年他击退了英国人的一次猛烈进攻，而且由于爪哇统治者倾向于英国人，他便把整个爪哇强行置于荷兰人统治之下，而把雅加达作为要塞和统治中心。

科恩总督扩大其统治并把雅加达城变为作为荷兰商业中心的巴达维亚，而此时欧洲的外交官们在这两个新教国家之间达成和约。英国人也和荷兰人一样进入爪哇。然而，他们无法保持足以与其竞争对手分庭抗礼的军事力【369】

量，也无法阻止或参与去往万丹岛的讨伐性远征，在那里，科恩于 1621 年通过屠杀全部与英国人站在一边的人而使其平定，此外，1623 年被逐出安波那后，英国人也无法在这些岛上维持某种据点。在法国人不构成什么严重挑战的情况下，荷兰人是这些群岛的主人并着手把控制权变为领土权。的确，直到 1663 年，西班牙人才撤出摩鹿加，而直到 1641 年马六甲才被荷兰人占领；而且荷兰人发现其权力扩张的问题在于使他们卷入了无休止而又危险的战争。海盗总是紧随着繁荣和土著政权的同时衰落而到来。不过，尽管荷兰人被迫在很多战略要点上维持其堡垒，在爪哇，他们仅仅试图将其控制扩展到要塞之外，或最远扩展到城镇及最近的四周之外。甚至可以说，在爪哇，他们最重要的目的也只是贸易特权，而且是在出于控制贸易的目的之下才不很情愿地对港口进行统治，然后又统治了一段狭长的海岸，再后统治了该岛的腹地，而这是直到 18 世纪中期才完成的。

然而，荷兰人逃避统治责任的做法并不意味着他们让土著国家独立自主——荷兰人只是在不再涉及商业利益的时候才停止干预。绝大部分土地由土著人拥有，但是，一旦条件合适，他们就会像在美洲一样，采用“正义战争”和没收反叛者土地这类做法。例如在万丹，在 1621 年的“安抚”之后，那些支持英国人的人的土地被分割成“园圃”，并被分配给予荷兰公司的雇员，条件是后者要为公司供应出产的调味料。当爪哇中部被置于统治之下以后，他们采用了同样的措施，公司任命的人被称为“代理人”，其地位很像封建地主，对土地和居民都拥有权利。大部分“代理人”都是土著人，像过去隶属于其国王那样成为公司的家臣，而他们政治上的隶属程度——从几乎独立自主到被与公司的盟约所约束，再到在巴达维亚四周完全受公司统治，从而有所——不同。

“代理人”之所以能不受干涉地管理除欧洲人之外的所有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依据了不同的法律制度和土地使用制度。他们可以依赖公司对他们半封建式的统治的支持，而且，在进入 18 世纪相当长时间以前，他们一直不受什么干预——除了商业事务之外。在商业方面，他们处于强有力的控制之下，必须服从公司代表的命令（这些代表被称为“公使”），并必须交付规定数量的指定产品，包括木材、棉花、靛青和咖啡。这是一种处于演变中的灵活制度，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是公司始终远离位于巴达维亚的统治中心。实质上，它意味着荷兰公司的地位相当于当地国王的太上皇，支持他们的统治并通过一个“公使”控制他们的土地的出产，而且该公使还对公司的雇员和所有其他欧洲人行使统治权。

【370】

由于这种制度的根源在于控制生产和垄断贸易的需要，因此很自然地，行政管理和贸易管理之间的界限就是不固定的，并且行政管理不断向进一步干预贸易事业的方向发展。事情的确是这样的，尽管这并没有使荷兰人的制度失去其双重特征，即一方面让印尼人受似乎适合他们的法律和总督的统治；而另一方面又在另外的法律，另外的法庭和最终在另外的教育和社会制度中给予欧洲人某种特权地位，这些制度是专门为欧洲人的利益而管理的。关于这种双重制度的社会，有许多可供评论和批评之处，然而，不管这种制度在让土著人获得法制和文化发展方面有多少功绩，它在荷兰人手中却并没有能让当地人的基本农业生活遵循自然而然的发展方式。不仅“代理人”在他们所必须提供的产品的数量上受到指导和控制，而且在实际作物种植方面，他们的土地也受到严格控制。通过组织所谓“巡查”来摧毁——超出所估计的受到控制的欧洲市场所需的——额外产出，并使荷兰人的垄断得以保持。对这种销毁的抵制则导致了报复（正如1647年在安波那那样），还导致了对其丁香贸易的完全吞并和控制。大约自1680年以后，负责边远地区的“巡查官”被赋予监督应交给公司的粮食的生产，此外，一种监工制度或“咖啡巡视员”的制度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咖啡巡视员”与“代理人”的某方面的行为密切相关，并发展成为政治和行政事务的附属管理者。然而，他们的主要的和优先的职责是确保被需要的耕作在农业周期里自始至终都被加以规划和关注。

正是由于在欧洲市场上，“巡查”和“咖啡巡视官”对调味料和其他产品的有限数量的流通进行控制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势，才使得土著经济的组织性在日益增加。在18世纪结束时，不仅有更多的“咖啡巡查官”被任命，而且这些岛屿经常被指定只能出产一种商品。例如，在1656年，丁香种植【371】只局限于安波那和尤里阿塞斯，并且，在那里，人们被命令种植愈来愈多的丁香，直到市场饱和，才得到不再种植的指令，进而还因此销毁了一些丁香树。在爪哇的咖啡种植和后来的胡椒种植也经历了类似的组织化。在所有这些作物中，正如在一般性的调味料贸易中，以及在对种植的最后规定背后，存在着一种对正常经济过程的持续干涉。荷兰人有时直接从种植者那里得到作物，或直接从当地代理者那里得到，这些代理者以每年交纳调味料为条件而占有土地。在按价格购买的情况下，交货往往是被迫的，而价格则遵照若干年的长期规定，并且是有利于荷兰人的。

在所有这些之外，荷兰人还从当地种植者那里索取义务劳动。有时是由公司直接索取，更经常的是通过代理人的代理。荷兰人挖空心思想把当地农业经济隶属于自己的目的，任何一种情况都是这一目的的最后和最明显的标

志。他们自己从不从事任何大量的实际农业事务，并把大片土地交由土著人所有，他们炮制了一种制度，让土生土长的农民为其目的做固定劳动。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他们允许当地的社会和制度以自己的方式自然而自发地发展。荷兰人的经济势力进入到岛上居民的全部生活，它造成的结果是当地贸易的衰落，还有大多数岛屿所种作物发生重大改变，并使印尼社会有更多的政府权威，以及印尼人的生活水平更不稳定，最后这一方面的情况是由于对代理人的支持和坚持种植主要商品作物而造成的。此外，在一些地方，如万丹（这里最受青睐的作物是肉豆蔻），奴隶劳动是自由农民所构成的农业的补充，而且一种地区性的奴隶贸易也发展形成了，奴隶是通过对邻近岛屿的袭击来获得的。

然而这种情况是一种例外。一般而言，荷兰人在东印度的制度的显著特色是它不同于依赖白人劳动力的北美自耕农业，同样也不同于西印度群岛和南方大陆的种植园农业。荷兰人通过使用当地农民的方法获得劳动力，作为这种方法的结果是形成一种多元社会，它就像占有奴隶的美洲社会一样，是欧洲海外扩张的一个显著结果。重要的不同之处在于，尽管事实上荷兰人缓【372】慢地被迫接受越来越多的管理责任，甚至当其把统治的实际操作交给代理者，但同时，荷兰人并没有在同于经营蓄奴种植园的意义上营建印尼殖民地。他们作为商人、管理者或士兵而生活，而非亲自从事初级生产。而且，尽管让·皮特森·科恩曾经计划建立一个荷兰血统的“Vryburgers”的社会，然而“Vryburegers”在印尼从未获得过任何社会和经济重要性。锡兰和好望角的情况则不同。然而，在印尼，在那些有可能在印尼社会和荷兰宗主权之间建立一种二元社会，并且利用这种体制使土著政权负责必要劳动力的组织的地方，那种基本的二元经济条件就会影响到了整个社会。

一种不同种类的二元社会在蓄奴的西印度和美洲大陆种植园兴起——这种二元性建立在奴隶缺乏地位的基础上。在这些直接区分主人和劳动者、欧洲人和“土著人”的二元社会与人们在法律与司法上具有同一性的北美拓居者殖民地之间，还存在着拉丁美洲殖民地。在那里，在社会和法律制度的框架内（这一框架以传教士的强烈影响为标志），劳动力一部分来自美洲印第安人，一部分来自输入的奴隶。

于是，作为欧洲海外投机事业一个明显的、至关重要的共同问题——对劳动力的需要，是按照殖民者的欧洲背景、按照动机的不同，以及按照土著居民的习俗和数量的不同而得到解决的。正是在这些方面条件的限制下，这【373】种获得劳动力的需要才能够影响和塑造欧洲殖民地的经济、社会和司法构架，并使它们表现出各种特征。

第七章

1450～1750 年欧洲的价格[①]

15 世纪中叶至 18 世纪中叶欧洲的价格史的确是一个博大的问题，要在单独的一章里阐述这个问题，不怀有惶恐是不可能的。勾勒这段历史的框架很容易，但就当前的知识状况，要揭示所有的事实，甚或对其做出有把握的解释，都没有多少可能。本章所做探究的主要任务是重新确立价格史的可信性及其基本特征。

考察这段价格史，首先遇到的困难是，我们所面对的经济已成为**过去**，现在它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取代，其结构和节奏同 19 世纪工业化的欧洲经济大相径庭，更不用说 20 世纪的经济了。因此，探究这种经济规律的读者和历史学家需要调整自己的基本概念，以便和这种经济相适应。

然而，价格史研究至今仍未获得成功的分析工具。无论结果如何，它必须依赖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提供的工具。这意味着，历史学家得经常努力阐释术语，这种方法论上的精益求精，结果又带来了不确定性，并导致观点的

① 弗兰克·史布勒（Frank Spooner）担负了本章的计算工作。我只在文章中加以引用并添加了说明。这使我应该承担全部的责任，也使我可作要求的任何荣誉应受严格限制。雅克·贝尔坦（Jacques Bertin）和他的同事 F. B. 绘制了本章的图表。

反复变化。似乎每一位学者都相信，只有一种方法——他自已的方法——才是有说服力的方法，这种信念怂恿他“以科学的名义”甚至摆脱拒绝前人的观点。

的确，对价格史研究来说，这些困难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它们是历史学家自找的，而且，这些困难极多。对价格史的先驱者，如基奥格·维贝（Georg Wiebe）、弗朗索瓦·西米昂（Francois Simiand）、弗朗西斯克·布亚克（Franciszek Bujak）、贝弗里奇勋爵（Lord Beveridge）、威廉·阿贝尔（Wilhelm Abel）、伊尔·J·汉密尔顿（Earl J. Hamilton）、厄内斯特·拉布鲁斯（Ernest Labrousse）等人的大名，历史学家们不去理会，或者说，是由于研究者的油嘴滑舌和消极的批评而被忽略。人们必须记住，如果没有他们，价格史将难以存在。自他们开拓性的工作之后，在问题的主要方面，价格史几乎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而在问题的反面，却是另一番景象。价格史【374】学家满足于核实其整体意义早已确立或隐含的细节问题。价格史有面临着堕落为毫无结果的逻辑演练（exercise）的危险。

在我们看来，我们用不着停下来一一列举有关的各种争论，这些争论存在着掩盖问题实质的趋势。价格史不是也不会是对历史的惟一解释，它只是试图从一个角度简化过去人类活动的复杂关系。它是对历史真实的局部判断，但它胜过对客观的和复杂的统计证据的使用。在习惯这种特殊语言或者是在接受它的分析工具（无论多么简单）方面，历史学家无疑会遇到困难。因此，在存在观点严重分歧的地方，保持审慎和小心是合适的，但只有当我们为了包容和解释整个历史而超越这样的争论的时候，审慎和小心才有意义（价格史自身也就有了意义）。

这就是厄内斯特·拉布鲁斯研究的准则：对历史的整体研究最重要。一个价格系列当然有其自身的真实性，但它不是**为其自身**而创立的，作为一种对历史真实的重新审视，它的重要性仅仅在于对知识领域的贡献。因此，价格史必须穿插于通史中，它归根到底只是通史的辅助。

在重现“普遍的”真实的过程中，仅存在**一个**正确的价格系列、**一种**可接受的方法吗？如果真是这样，则足以令人惊叹。本章的作者分别征询两位对经济学感兴趣的数学家的意见——一位在英国[①]，一位在法国[②]，希望他们能够就最好方法的争论给出某种解决。他们用几乎相同的话，立即回答

① 牛津大学的 C. B. 温斯顿（C. B. Winsten）。
② 巴黎大学的 G. Th. 吉尔博德（G. Th. Guibaud）。

说："没有单一的方法"。他们的意思是，任何提供一个好的或比较好的答案的图表都将服务于分析的目的，对它们，不妨都试一试，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因此，我们受到鼓励，对一个特殊事例进行了研究。本章的一位作者与吕杰罗·罗马诺（Ruggiero Romano）和乌戈·图奇（Ugo Tucci）[①] 合作考察了一个关于乌迪内（Udine）的谷物和葡萄酒价格的长系列。这个系列适合做各种计算，因为它提供了同一市场上连续 212 年间各种谷物的每周价格。他们尝试了所有的方法，每种方法都突出了历史真实的某个特定方面。

因此，为借助开放的思维，并从已知的价格长系列出发，通过比较各种方法，以抓住欧洲实际的总体价格运动，我们决定采用最适合待处理工作的方法。由于承担了如此广阔领域的研究，我们要做的事立刻复杂起来，而且，由于不是一个，而是有几个同时存在着的、往往很不相同的欧洲[②]的出现，从而事情变得更加复杂。〔375〕

经济史学家早就指出，欧洲大陆由劳动分工所组织，也就是说，共同生活的范围限定了欧洲大陆的许多活动领域。1400 年，欧洲肯定可以按照冯·屠能（Von Thünen）模式分割成许多区域。不过，在此之前，巨大的"工业区"和市场的某种一般组织在 11、12、13 和 14 世纪的欧洲已经出现。

威尼斯官方贸易网络的扩展（见图 3，该图显示了商船的活动），意大利工商业城市的卓尔不群，最后是西北欧（尼德兰、英格兰和法国北部）纺织工业经历的波动，都为此提供了证据。这种集中和产业专业化是由业已确立的优势所产生的，这无疑意味着欧洲和它的劳动力获得了程度很大的一体性。这正如 J. A. 旺·胡特（J. A. Van Houtte）[③] 所提出的重大问题（尽管不是首次）：当 16 世纪安特卫普（Antweep）肯定是一个国际港口城市的时候，布鲁日（Bruges）在 15 世纪是不是呢？总之，经过几个世纪，在欧洲的生活中，某种一体性已经确立，并且它注定要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因此，人们最初合乎逻辑地认为，价格似乎处于一位乐队指挥的控制之下，从伦敦到伊斯坦布尔，从莫斯科到里斯本，这一指挥迫使价格遵照他的指令行事。但随后我们将看到，他并不总在指挥台上，有时他还心血来潮随

---

① 吕杰罗·罗马诺、弗兰克·史布勒、乌戈·图奇：《1450～1797 年间乌迪内的价格和局势》，其中的一部分以标题"威尼斯人统治时期乌迪内及弗智利地区的经济状况"出版，载《吟游诗人轶事回忆》，第 17 卷，1960～1961 年。

② 这里作者的意思可能是说欧洲各地的情况差异很大，从而看上去像几个不同的欧洲。——译者注。

③ J. A. 旺·胡特：《14～16 世纪的布鲁日和安特卫普究竟是"地区港市"还是"国际港市"?》，载《北方评论》，第 34 期（1952 年）。

意指挥，而且乐手们也不守纪律。总之，无论在何处，这种音乐都充满了个人的创造。用经济学的语言，可以说，1450～1750 年的欧洲处在非完美控制的时代。

除从事穿越阿尔卑斯山的大宗贸易外，15 世纪的威尼斯还影响着繁忙的、具有或多或少灵活性的海洋经济，而这时的布鲁日则是海洋经济的另一个中心。这种光彩夺目的国际经济已显示出现代特征，但也有某种局限，它没有影响所有的海洋和大陆。因此，我们必须小心，不要把我们的注意力局限在涉及奢侈品的诸多先进领域：[376] 12 世纪中叶以后出口到地中海地区的北方呢绒，威尼斯商船远涉重洋运到艾格—莫特（Aigues-Mortes）、英格兰、布鲁日的香料，还有小麦等等的国际贸易。因为还有另一种尽管模糊但影响并不亚于此的情况，即由于封闭或货币经济的不完全而出现的经济的停滞和倒退。但是，当国际经济真正撞入时，它随时能够使这种经济分崩离析（波兰就是这种情况，伴随着大规模的谷物出口，物价飞涨，货币急剧贬值）。易货贸易（也就是以实物偿付的交易）甚至在 17 世纪仍很盛行——巴黎附近的博韦（Beauvais）就是这种情况。在那儿，只有富人才拥有金币银币，穷人注定只得使用“黑币”（指含铜量多于含银量的小额钱币——译者），且其拥有的“黑币”为数很少。这是无数小城镇经济生活的真实写照，那里几乎见不到足值的金币银币。欧洲的所有地区都属于这种情形。

正因为如此（还有其他原因），我们绘制了一些图表，以便充分说明问题。这些图表有助于强调和突出价格水平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当时开创，阻碍了，也可能是促进了生活的一体化。从一体化这个词的真正意义上说，难道不正是由某些地方辛勤劳动的低价值造成了劳动价值的地区差别从而使这种意义得以培育出来吗？因为，但泽（Danzig）或巴尔干半岛（the Balkans）出口的谷物、中欧和后来新大陆出口的白银、产自巴西冲积层的黄金（大约 1670～1680 年以后），归根结底是来自于最穷和最受压迫的那部分人的劳动——投到国际市场上的廉价劳动。

我们必须面对的所有这些困难、矛盾和问题并不能都得到解决。借用恩斯特·瓦杰曼（Ernst Wagemann）[1] 的精彩比喻，价格（许多数字中的一组数字）像一个好“侦探”。我们经常托他打探消息，但只有在侦探小说里，每件事情才能得到完美解决。实际上，我们将试图从四个不同的方面更好地说明常常是非常模糊的问题：

---

1 恩斯特·瓦杰曼：《充当侦探的数字》（慕尼黑，1952 年）。

（1）为谨慎起见，我们首先必须考虑货币——通货和贵金属。

（2）我们要证实存在长期趋势。这使我们的讨论转向“长时段”[1]的历史。“长时段”的历史关注反复出现的现象胜过偶然现象、关注结构胜过特殊波动。

（3）我们必须关注界线分明、具有间发性的短期运动，它们五花八门的名称往往使人误以为它们与传统的历史学十分接近。【377】

（4）我们必须对各种解释进行总结，也就是对以前的数据、问题、理论、图表和计算进行评价，这时，我们应告诫自己，在目前的情况下，得出最终结论是不可能的。

7.1 货币、贵金属和货币市场

价格的确只有在货币系统内才能被理解，货币系统为价格充当框架和表达的方式，没有货币，就没有价格！但马莱斯特罗瓦先生（the Sieur de Malestroit）早在1567年就说过，货币是“没有几个人能理解的谜”[2]。即使在今天，人们也不能就讨论货币问题的重要性达成共识。

冒着过分简化的危险，我们必须重申讨论过多次的核算货币（the moneys of account）问题。这并非因为问题本身复杂，而是因为讨论它需要付出一定的智力努力。各种核算货币（在区别于日常流通货币的意义上）今天都以核算体系（accounting systems）的形式而存在，但这种形式复杂而且专业，通常只有专家才能弄明白（例如，作为核算货币用于共同市场国家之间相互清偿的美元）。另一方面，在我们所涉及的时期，“想像的”通货却是欧洲各地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不熟悉这一点，要理解核算货币的必要性是困难的。

所有的价格、所有的核算体系（即使是最不成熟的）和所有的契约——至少是绝大多数——的制定，都是通过“不必由金属货币代表”，而是充当流通中铸币的价值尺度的核算货币来完成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货币及其辅币：在法国，1图尔里佛（the livre tournois）价值20苏（Sol或

---

1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载《经济、社会、文明年鉴》（1958年）。

2 马莱斯特罗瓦先生：《马莱斯特罗瓦账房师爷1567年5月16日的日记》，载鲁伊治·艾诺迪（Luigi Einaudi）编辑出版的《奇闻轶事》（都灵，1973年）。

Sou），1 苏等于 12 德尼埃（denier）；在英国，1 英镑分成 20 先令，1 先令分成 12 便士；在德国，1 马克或 1 芬特（Pfund）分成 20 先令，1 先令等于 12 芬尼（Pfennig）……。用这种方式，所有的价格都以核算货币制定，然后再折合成通货偿付。举例来说，在 1574 年，65 图尔里佛（法国的核算货币）的债务用退斯通（teston）银币（当时通行的铸币，每个官方价值 13 苏）来偿付，则需 100 退斯通。

【378】 但是，为什么要用这些看起来很复杂的中介呢？它们的存在完全是因为它们是不可或缺的，它们使货币系统完善且具有连贯性。一枚"声音听起来是真的足量"金属货币代表着若干克作为商品的金锭或银锭，像任何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这些金、银锭的价格是变化的。毫无疑问，各国政府一直力图拥有一种相当于核算货币的真实货币（核算货币原本也是一种真实货币）。但是，由于贵金属价格的波动，必须不断调整这种货币自身的重量，以使通行的货币和核算货币保持一致。借助新币（新币比旧币轻些）的频繁发行，小额硬币的调整近乎成了家常便饭（后面将再谈此事），大额硬币的调整也屡见不鲜，如此，不一而足……结果，很早就出现了在重量、成色、印记、磨损、破损或非法的刮擦（这常常要求称重）方面差异很大的货币同时流通的现象。此外，到处都充斥大量秘密流入的外币（往往成色不够且极其多样）。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行日常交易的核算呢？

以威尼斯共和国 1551 年 9 月 24 日公布的法令为例：法令列举了可在威尼斯流通的外国金币的名单，并提供了其中 21 种的模本，以易于鉴别，同时提供了它们以核算货币威尼斯里拉（lire）表示的价值。每当有必要时，由威尼斯铸币厂——the Zecca——发行的"有效货币（'effective' coins）"的兑换率也确定下来。因此，一切都井井有条：如果一名威尼斯人要偿付 10 万里拉的债务，他可参照最近的兑换率，使用任何一种法令中列举的威尼斯或外国货币。简言之，他所做的，就像要我们用金币偿付 10 万法国法郎时所做的一样。我们必须用 10 万除以巴黎证券交易所拿破仑金币的最新报价，然后精确计算出所要支付的金币数。顺便提一句，在这种场合，我们现代的纸币或多或少扮演着旧有的核算货币的角色，尽管纸币是由国家银行担保的一张纸，是合法货币并能积存（以固定的比率）的事实使它具有真实货币的所有特征。

因此，核算货币是一个量具，一个尺度，它使价格分类成为可能并创立了一种连续核算程序。作为金币、银币、比龙（billon）（即含铜量多于含银量的小额硬币）和铜币的计量单位，它使这些货币相互间形成合逻辑的联

系，而且自身也成为这种联系的一部分。这样，在日常生活中，比龙（被称为“黑币”）总是通过核算货币及其辅币来衡量。例如，在米兰，[1] 泰令 【379】（terline）总是值其核算货币帝国里拉（lira imperiale）的1/40，塞西尼（sesini）总是值1/80。然而，泰令和塞西尼的发行数量毫无节制。它们很小，含银量极低，而且随着不断的贬值，其成色和重量也每况愈下。

由于小额硬币因成色下降而价值降低，导致帝国里拉潜在的贬值，而里拉的贬值，势必通过“内部兑换”，使纯金、纯银币的面值不断上涨。德国也是同样的情况，在那儿，1芬尼（铜币）始终等于核算货币马克的1/240。在土耳其，阿斯普尔（asper）（一种几乎不含银的小铜币）充当核算货币，它的贬值（1584～1586年后更是司空见惯）必然危及其余货币的流通和价值，这影响了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广阔领土的社会安定（这些地区在破坏性日盛的通货膨胀影响下，社会会陷入混乱状态），同样也会影响了土耳其人政权的稳定性。

同样的情形在莫斯科公国也可见到。卢布（rouble）曾是一种真实货币，在15世纪，随着其银质辅币戈比（kopeck）和半戈比（half-kopeck）的出现，它仅成为核算货币。1656～1663年，莫斯科公国铜币充斥，铜质戈比取代了银质戈比，卢布随之迅速贬值。1701年，彼得大帝发行银币半卢布，接着1704年又发行银质卢布。于是，核算货币重新成为真实货币，然而并不总是如此，因为新货币在1762年才最终稳定下来。[2]

各国政府在处理这些棘手的货币问题时，究竟想要得到什么？他们当然想固定所有货币的价值（无论是大额货币还是小额货币），并且想维持一个稳定的核算体系，这个核算体系直接涉及他们的税收和岁入。各国政府认为他们的控制（往往缺乏真诚）取得了成功，至少他们自欺欺人地这么认为。

下面以一个绝妙的例子来结束上述讨论。在法国1577年的一条“典型的”法令中，国王诏令所有臣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用图尔里佛进行核算，而要改用“金埃居（gold écus）”。金埃居，通常称为足赤金埃居（écus d' or au soleil），是**真实的**货币。每个埃居此后价值3图尔里佛，换句话说，价值60苏。

在理论上，图尔里佛与埃居（从而与黄金）的挂钩正式延续到1602年，然而，宗教战争一爆发，平衡立即被打破。在开放的市场上，埃居的价 【380】

① 卡洛·奇波拉（Carlo Cipolla）：《1580～1700年间米兰的货币运动》（巴黎，1952年）。

② 威·勒克西斯（W. Lexis）：《贵金属统计论纲》，载《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1879年），第368页；有关素材由列宁格勒隐士博物馆俄罗斯货币部主任G. 斯帕斯基（G. Spassky）提供。

格大大超过 60 苏，与此同时，物价飞涨。和平恢复后，1602 年国王颁布了新敕令，重新确立用图尔里佛表示的核算体系，同时规定每金埃居的价值升到 65 苏（这自然在后来又被突破）。虽然如此，但历史的痕迹依然保存下来，也就是在用埃居核算外币时，它的价值仍固定在 3 里佛（即 60 苏）。这是一个真实货币（它继续流通）如何成为核算货币的饶有兴趣的例子（因此再一次显示所有的核算货币是如何起源的）。在 15 世纪，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到威尼斯杜加（ducat）的头上。几乎可以说，自从 1472 年 3 月杜加固定为 6 里拉 4 苏迪（soldi）后，它就成为威尼斯的主要核算货币，相反，直到那时还和它具有相同功能的货币色庚（sequin），则继续用作流通的货币。在 16 世纪，西班牙杜加［固定为 375 马拉维迪（maravedi）］的命运是这方面的另一个例子。

阅读了上述内容并抓住了要点的读者可能早已认识到，核算货币的贬值——常常被表述成“真实货币面值的上涨”——是本章所涵盖的时期中每一个货币和价格问题的症结所在。严重的骚乱几乎总是伴随着核算货币的贬值，但后者是前者的原因还是结果？

图 4 显示了 1440 ~ 1760 年主要核算货币逐年贬值的情形，实际表现为用白银表示的这些货币的等价物同时发生量上的逐渐减少。我们一样可以用金，甚至或用铜来表示这种等价物或“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我们之所以选择白银，首先是因为有关白银的基础数据比较完整；其次是因为，与黄金相比，白银揭示了经济活动中更大范围和更真实的关系。在所考察的几个世纪里，白银是一个不错的指示器（这话一出口就有些后悔）。老实说，不存在像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1818 年）所选的小麦、约翰奈斯·法尔克（Johannes Falke）（1869 年）所选的黑麦、埃尔曼·格罗特（Hermann Grote）（1864 年）所选的最低工资（我们甚至还可以加上金和银）这样的单一尺度。图表和指示器越多，结论就越可靠。

如果我们想一个一个地弄清楚每一种流通货币是如何转变的，我们就得在图 4 所提供的曲线前停留很长时间。但很显然的是，就目前而言，我们仅仅关心总的特征。总的特征是什么？1440 年前就已开始的贬值持续到 1750 年以后并延续至今。任何偏离总趋势的核算货币，注定迟早要屈服于这种基本趋势。所有流通货币的内在价值几乎无例外地下跌，有时突如其来，有时缓缓下降。1642 年前的马拉维迪是一个例外（至少有人这么说），1601 年后的英镑同样如此（尽管几经波折，例如在 16 世纪 40 年代，但英镑仍是这些货币中含银量最高和最稳定的），还有那不勒斯（Neapolitan）的卡利诺

【381】

(carlino)（如果所获资料是正确的话，但对此我们常常并无把握）[1]。任何流通货币最终都逃脱不了总体贬值的命运。在本章所考察的3个世纪里，英镑对白银的比价仅损失43.42%（这是一个突出的表现），图尔里佛损失82.68%，热那亚里佛（lira）损失72.98%，波兰格罗兹损失（grosz）90.10%，荷兰荷兰盾（guilder）损失68.74%。追溯起来，在1750年的整个欧洲，货币贬值在波兰、土耳其和法国这三大政治实体中显得特别严重。在法国，1726年改革后，图尔里佛勉强稳定，但处于很低的水平，这是约翰·罗（John Law）改革立竿见影的结果。

利用多种方法从这些曲线图中引申出货币类型学是可能的，甚至是有益的。在已提到的图（图4）上，可以看到，每种流通货币都由实际含银量来体现，但是差异极大。如果按照各自的含银量来进行分类，不同类的流通货币，具有共同的命运吗？或者更精确地说，"重币"（英镑是惟一的例子）、"中币"，最后还有"轻币"有共同的命运吗？[2]

在这个问题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另外两个问题：什么是币值变化迟缓、缓慢下降和急剧下跌的决定因素？而且，在经济活动中，特别是在价格运动中，它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真实货币升值"（也就是同纯金、纯银相比因核算货币的贬值而引起的铸币面值的上涨）吸引外国流通货币的涌入。无论是图尔里佛、马克，还是其他想像的核算货币的贬值，必定影响流通货币的运动。货币的流通立即加速了。

事实上，核算货币的贬值必定既影响短期又影响长期的价格水平。在这种影响传播的过程中，我们无疑常常能够观察到明显的时滞。如果外币兑换【382】率的变化先于或伴随每一次贬值（如我们所料），仍可指望贬值不会立即对国内价格产生明显影响。F. J. 费雪[3]（F. J. Fisher）的一篇重要文章讨论了1522～1526年至1555年英国的危机，更确切地说，是一系列危机（在16世纪40年代更为显著）。英镑的急剧贬值立即影响了安特卫普的汇兑市场。英国呢绒在这个主要集散地因此而降价，接着出口飙升（在创记录的1553年达13.3万匹）。英国国内的物价却在上涨，但速度相对缓慢，落在流通货

① 朱塞帕·康尼吉奥（Giuseppe Coniglio）：《西班牙统治期间那不勒斯的食品与价格》，载《那不勒斯历史档案》（1940年）。

② 这些术语指的是不同计算单位的纯银等价物，而不是指它们所体现的流通货币体系的相对稳定性。

③ F. J. 费雪：《16世纪的贸易趋势与政治》，载《经济史评论》（1940年）。

币币值下降的后面。百姓对物价上涨的抗议和亨利八世及随后的爱德华六世所目睹的因王室外债的膨胀所导致的政府财政困难，终于使英国在 1560 年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进行了流通货币改革。

因此，对核算货币的干预（干预其下降）对价格施加了影响，但这种影响在短期常常是不完全的，而且因不同金属价值变化的不同而采取了不同的干预方式。实际上，有时是金币的面值上涨，有时是银币，有时是二者同时上涨。有关乌迪内的长价格系列看来就符合这个结论。在只有金币面值上涨的情况下，物价轮番上涨的趋势似乎受到扼制。如果威尼斯（乌迪内系其属地）提高金价，就意味着当局想吸引黄金和金币流入国内。相反，作为补偿，它必定将出让一些银币。流出的白银在**短期**似乎减缓了名义价格的上升，这再次说明白银在经济活动中起着动力作用。白银充裕，物价就趋于上涨；白银稀缺，物价则趋于下降。但应注意，这仅仅在短期是正确的。在长期运动中，核算货币的任何变化都在价格运动中反映出来，而且被价格运动所淹没。

随着时间的流逝，价格对流通货币币值变化的反应越来越准确。为了建立价格和流通货币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需要具备相当数量的流通货币并够得上能进入流通状态的最低限水平。[1] 流通货币的数量一定要比人们预想的【383】多，因为只有当水先蓄在那儿才能开闸放水。简言之，提高币值始终意味着对金银的**需求**。然而，正如我们所知，没有供给，需求就没有力量。供给必须对需求做出响应并满足需求。在西方，直到 16 世纪初，供给似乎相对缺乏弹性，至少对需求响应迟缓。

所有这些，使得价格史显得十分复杂，研究者很难解释价格的实际状况和价格运动的来龙去脉。如果以 1450 ~ 1474 年为基期（=100），就能计算出欧洲不同国家价格系列的平均指数，从而显示出以贵金属表示的通货的内在价值在欧洲的平均下降。当然，为了准确，本应考虑必要的补偿因素，并按照相关各国经济的规模进行调整，但限于我们现有的知识水平，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所给出的图表仅具有参考价值，但即使如此，它仍值得我们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们同时计算了货币的含银量和含金量（以克为单位）。把它们倒过来，我们就可以得到欧洲白银和黄金名义价格的平均上涨指数。

黄金、白银这两条价格曲线值得我们注意。从长期看，金银的价格以相

---

① 吕杰罗·罗马诺：《殖民地经济：18 世纪的智利》，载《经济、社会、文明年鉴》（1960 年）。

当稳定的速率上涨，时时出现减速的阶梯，但除开两次例外，根本没有出现真正的下落（见图11）。在整个历史时期，金银价格不断攀升，这似乎是货币系统自身特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卡塞尔（Cassel）到沃依廷斯基（Woytinski）、基钦（Kitchin）、瓦伦（Warren）、皮尔逊（Pearson）、韦尔科兴（Wilcoxen）、里斯特（Rist）和马若林（Marjolin），这些经济学家显露出极大的热忱，试图解决这个无从解决的难题。在历史上，社会对金银的需求从未间断。根据对19世纪中叶所做的一项估算，**仅仅**为使物价**维持不变**，贵金属存量在19世纪下半叶至少要以3%的系数持续增长。否则，通货紧缩将由此产生。因此，即使在通货紧缩期间，仍存在着对贵金属的稳定需求和消费，而反之，此时若能在操作上将通货膨胀的方向引导，则只是使这种需求更加清晰和明确。

我们也注意到（对此已众所周知），金银这两种贵金属并不沿着同样的道路运动，在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通常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实际上，我们必须始终[①]对流通中这两种通货的数量做出区分。大致说来，直到1550年前后，黄金**相对**充裕；到16世纪中叶后，白银数量急剧增加，黄金就变得相对稀少。这种差距越来越大，而且，直到17世纪中叶，银对金的比价逐渐下降。从此以后，这两种金属数量差不多并驾齐驱。【384】

除了金银的平均价格外，我们还绘出了著名的两种贵金属比价的曲线图，换句话说，就是根据白银估算的黄金价值的变化（见图5）。曾经有一段时间，经济理论家想把金银比价固定在1∶12的“自然比率”。在17世纪早期，黄金的增值显而易见（我们愿意称其为“黄金的转折点”），黄金终于超过了与银1∶12的比率。一眼就可看出，金价上涨的原因是由于美洲白银的大规模生产和更现代的——几乎是“工业化的”开采方法，而黄金生产当时仍停留在手工生产方法阶段。

这种解释大体上是合理的。但这两种贵金属的流通速度也应起一定作用。金币的流通速度是否比银币多少快一些？考虑到贮藏的因素，人们宁愿说，黄金的流通倾向于更慢一些。流通速度的这种差异一定有其影响。总之，正如弗兰克·史布勒所指出的，16世纪中叶之后，欧洲转向金本位制，黄金的供应不如白银充裕，并且，这一趋势将保持下去。

如果这些一般性论述有价值，那么我们所绘的图表（有待完善）或许能提供某些帮助。在各地，历史学家在研究过程中收集了一些关于金银比价

① 弗兰克·史布勒：《世界经济与1493～1680年间法国的货币铸造》（巴黎，1956年）。

的数据，这些数据显示出金银比价偏离总体趋势很小，但总处在偏离状态之中。如果我们把这些零星的数字集中起来，并把它们同**平均**运动相比较，根据其是否高于或低于平均水平，而赋予其意义，人们马上就会明白不同运动的差异，这种差异常常使欧洲的货币流通富有生气。因此，1555 年，接受查理五世政府咨询的西班牙"货币专家"指出了黄金和白银的双向运动：白银不断地从西班牙流向法国，黄金则反其道而行之。或者，正如菲利普·吕兹·马丁（Felipe Ruiz Martin）所揭示的，在尼德兰存在一个巨大的借助汇票用黄金进行偿付的网络，这种偿付最显而易见的表现是支付在西班牙服务的军队的军饷。这种先期的运动依次引发其他的运动。

同样地，人们也可能注意让·德吕莫（Jean Decumeau）收集的关于 16【385】世纪罗马[1]或瓦尔特·安德森（Walter Anderssen）收集的关于 16 世纪拉古萨[2]（Ragusa）的统计资料，这些资料实际上涉及的是特殊情况：当时的罗马在币值方面并不完全与西方的其他部分同步，而拉古萨不断地在西方（日益受丰富的白银供应的影响）和受非洲黄金控制的土耳其帝国［借道埃及，由开罗铸币所把非洲黄金铸成金币"苏塔南（sultanin）"］之间左右摇摆。

至此，我们有意把信用和法定货币——"纸币"（这是不准确但很便利的称谓）放在一边。然而这种虚构的货币以千万种形式流通着并逐渐侵入欧洲的经济生活。它在 15 世纪时是那么的偷偷摸摸，16 世纪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小心翼翼，但到 17 世纪时，它的出现已咄咄逼人，成为金银不可缺少的伴随物（可以这么说，金银这两个伟大的演员在充分施展演技上已受到阻抑），这是 18 世纪凯歌高奏的前夕。

无论纸币的性质如何，它都以核算货币为基础。最早的银行券无非是核算货币的实物形式，充当担保物的金银的支持有助于把整个系统和贵金属的相对稳定连在一起。后来，其他形式的票证出现了，例如政府债券——西班牙的公债券（juros）、意大利城邦的公债券（giuri 或 monti）、法国巴黎市政厅年金、安特卫普城市债券、英国的国库券等等……，更不用说以"借据"[3] 形式投入流通的债券（debtor's promissory notes）或最一般意义上的

---

① 让·德吕莫：《16 世纪下半叶罗马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第 2 卷，巴黎，1957 ~ 1959 年），第 667 ~ 668 页。

② 奥特·安德森：《关于拉古萨货币总量和货币系统的材料》，载《社会经济史季刊》（1935 年）。

③ 皮·古贝尔（P. Goubert）：《1660 ~ 1730 年间的博韦及博韦地区：17 世纪法国社会史引论》（巴黎，1960 年）。

私人债券。它们提供了部分独立于实际硬通货的交易手段，但决不能免除自身的危机，特别是不能免除核算货币所遭受的混乱。

例如，只要想一想中产阶级在签订契约时是多么谨慎小心,[1] 就会明白这一点；抑或可以从银行提供给储户的单据中看出来，即便是热那亚(Genoa)的圣乔治银行(the re-established bank of san Giorgio),[2] 也给储户提供两份存折(cartucari)，一份按黄金记账，一份按白银记账。从 1625 年起，甚至还有按西班牙本洋(the reales de a ocho)[币值 8 里亚尔(real)]记账的第三份存折(西班牙本洋在 16~18 世纪曾是欧洲的标准货币之一，【386】也是一种世界货币，从美洲到中国，它都流通)。

所有这些票证都是通货的潜在形式吗？如果需要证明的话，除了西班牙法院记载[3]的契约(证据极其充分)外，人们只要看一看热那亚银行家用国王委托给他们作为他借款"抵押"的担保年金(the juros de resguardo)所从事的获利颇丰的交易就可以了。像其他年金一样，他们用这些担保年金作为偿付的辅助手段。当时的人很快理解了这种幻象货币(ghost money)的意义。后来，对好奇的葡萄牙人伊萨克·德·品托(Isaac de Pinto)[4] 而言，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1764 年，当时欧洲正值战争，各国纷纷举债，债务不断增长，品托写道：

> 列强凭借信用筹措的借款是额外增加的一笔通货，一笔至今仍不存在的通货，它由信用和公众观念的力量创造出来，具有真实的和人为的价值(在本质和传统两方面)，只要信用得以维持，它们就能流通，并且部分地履行与真实通货同样的职能，无论实际上这是多么难以捉摸和不可能。

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去研究这些复杂的流通过程。但是，我们应该注意汇票这个特殊的例子。汇票说明了许多重要的联系，在思考全部的和结为一体的欧洲历史方面具有突出的意义。

然而，应该指出的是，这里并不是要再次详细地揭示汇兑运作的机制，也不是要道出它的奥秘：套汇的利润常常可能掩盖有息的借贷(我们知道，

---

① 伯纳德·施纳佩尔(Bernard Schnapper)：《16 世纪的租金》(巴黎，1957 年)。

② 弗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力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巴黎，1949 年)，第 407 页。

③ 年轻的西班牙历史学家阿尔瓦诺·卡斯蒂罗(Alvaro Castillo)正从事票证的研究，并已在《1557~1600 年的流动债务和固定债务》中发表了他的某些观点，载《经济、社会、文明年鉴》(1963 年)。

④ 伊萨克·德·品托：《奢侈论》(1764 年版)。

在当时有息借贷被指责为不道德)。然而，利用机遇不同于创造机遇。套汇活动的基本特征在于核算货币之间的比价差异，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这种差异通过外汇表现了不同经济和货币状况之间的对抗。

1609～1750 年间，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货币市场这个简单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所有这些情况。阿姆斯特丹的货币市场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不同汇率之间的一般关系。图 7 的一系列图示对几个重要金融市场[①]在阿姆斯特丹的选择性 10 年期平均汇率作了展示。依惯例，把荷兰盾——荷兰的核算货币——1609 年［里斯本（Lisbon）和巴黎是 1619 年］的价格作为【387】基期，其指数值为 100，这是我们以下计算的立足点。随后的 3 幅地图分别显示 1640～1649 年、1700～1709 年和 1740～1749 年这 3 个 10 年期的平均数，它们简洁地说明了各种外币同荷兰盾的关系。[②] 外国货币在阿姆斯特丹的比价当然取决于这种货币的内在价值，否则岂不使人奇怪？由于荷兰盾固定为基期指数 100，外币的汇率曲线实际上非常接近它们的内在价值曲线。内在价值一下降，交易所就立即记录在案。甚至可以这么认为，既然汇率随市场价值而动，而不是由政府确定的，那么，每当这两条曲线出现偏差的时候，汇率曲线就应该更可靠一些。因此，在必要时汇率曲线能够提供一个检验和修正通货贬值曲线的合理手段。

然而，图 8 的第二张曲线图给出了更加精确的说明。该图仅涉及但泽在阿姆斯特丹货币市场的汇率报价，它是以荷兰盾对但泽的格罗兹进行价值调整而得到的指数序列。格罗兹是但泽和波兰的其他地区共同拥有的核算货币（直到 1663 年）。在这张曲线图上，荷兰盾在三个方面充当比较单位，因而底线 100 实际上代表着三条线：第一，以核算货币出现的荷兰盾；第二，折合成白银的荷兰盾；第三，折合成黄金的荷兰盾。至于格罗兹，它也由三条曲线代表，在每一个适当的场合，这些曲线显示了格罗兹与荷兰盾的**相对**价值：（1）以核算货币计算的相对价值；（2）折合成白银计算的相对价值；（3）折合成黄金计算的相对价值。这样，相关的结果立即就清楚了。在 17 世纪 20 年代早期剧烈的贬值之后，格罗兹在阿姆斯特丹的汇兑值出现明显的暴跌，随后局势恢复了正常。这期间曲线以小幅度下降为特征。同时，仍可注意到一个重要方面，也就是汇率一般保持在由金银价值设置的界限以内，即位于金银价值曲线之间，但明显显示出跟随白银价值运动的趋势。

---

① 这里市场的意思是指它的货币。——译者注

② 应该指出的是，在阿姆斯特丹，银行货币的贴水（agio）已考虑在内。

我们可以就另外的通货和汇兑再次进行验证。我们不妨留在阿姆斯特丹的货币市场，在此可以看到，巴黎和伦敦的曲线（后者偏向于随黄金曲线运动）提供了类似的答案。在威尼斯，汇率的运动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借助于对把银行货币（该市的全部汇兑活动都通过此进行）转换成流通货币收取高额的手续费（agio）——大约 20%，威尼斯人试图把当地货币里拉的国际汇率保持在其在当地的实际与变动水平（折合成金银计算）之上。[1] 【388】

我们已经提到过 16 世纪 90 年代法国发生的罕见危机。这是一场同时影响到价格和货币的双重危机。关于价格，我们掌握的几条曲线表明，当时物价飞涨。但通货如何呢？似乎在 1577～1602 年两份法令的颁布期间，埃居（当时它已取代图尔里佛，充当了核算货币）的价值始终固定在 60 苏。核算货币——不论是埃居，还是图尔里佛——在理论上保住了自己的内在价值。然而，只要看一看 1587 年后价格上涨时的名义价格曲线，就可以相当肯定地说，实际上事情并不是如此。从 1587 年起，金埃居与作为核算货币的埃居脱钩，在自由市场上实际可兑换 65 苏或更多，在胡格诺战争（the League）期间的艾克斯昂普罗旺斯（Aix-en-Provence），甚至有兑换 100 苏的记录。但这种不正常的紧张状态很快得以缓解。埃居回落到较低的水平，但在 1602 年正式确定“贬值”范围的法令颁布之前，曾有一项调查显示，埃居的兑换率是 65 苏、64 苏和 63 苏。

然而，在此期间，汇率怎样呢？它们理所当然地受到这种商业贬值的影响。在里昂（Lyons），一个接受一张用埃居（当时的计算单位）表示的可在法国兑付的汇票的商人，完全明白他在接受用真实的埃居现钞偿付时，依据的是市价而不是官价。因此，他所接受的汇率必须与市场汇率相符合，他必须慎重考虑埃居兑换值的下跌。但下跌的幅度有多大？根据弗兰克·史布勒从里昂交易会获得的对威尼斯、热那亚、塞维利亚（Seville）和安特卫普的汇兑数据，可知大约是 14%。[2] 这个数字当然比巴黎围城期间（during the siege）所记录的官方汇率下跌的幅度小（当时这个跌幅在短期曾达到过 30% 甚至 40%）。汇兑记录的数字反映全国的经济状况，而全国的情形显然不同于一个被围困的城市。但是，不论是 14% 还是 40%，银价的上涨都影响食物的价格（以“名义价格”计算达 500%）。因此，为精确起见，如果根据汇率变动所提供的信息去调整用白银表示的价格的涨幅，剧烈的通胀或

---

① 弗兰克·史布勒将撰文继续讨论这些问题的含义。
② 弗兰克·史布勒，见前书，第 308 页。

许要降低40%之多。但对亲身经历这种通胀而又入不敷出的人来说，这仍
[389] 可能是严酷的，可是，从世界范围来看，它并不比同期其他几个国家经历的通胀高得多。

在结束以上的分析时，我们得再次称赞核算货币。核算货币的确是虚构的，但它有真实的价值（和实际的、有效的金银通货相联系）。它和纯粹的"障眼物（screen）"①或过时的、好笑的装置②有云泥之别。至于它是原因还是结果，并不重要。而我们对核算货币的研究既包括对价格和贵金属的研究，又包括对把欧洲分成不同部分的国家或地区，然后对各自经济水平的研究。

因此，最后再问一句，货币是独立的还是不独立的变量？对于这个貌似简单的问题，需要做出几个在许多方面互相矛盾的回答……。切莫忘记，所有的事物，如核算货币、铸币价格、经济状况、社会结构、历史时期等都是彼此依赖的。因此，不是仅仅一个主要因素，一项单一的研究，一次不言而喻的活动，而是上百次的评估和小心探索方能回答。

例如，核算货币的贬值并不像它初次显现的那样简单。当金币或银币面值上升的时候，核算货币的内在价值下降，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贬值的含义显然不同。

每一种经济，甚至每一种政治制度和货币系统，无疑都有其独特的贬值方式、习俗、薄弱环节和必要性。在威尼斯，我们看到什么？我们发现金币价值持续缓慢地上涨，由此产生了吸引黄金的效果。威尼斯堪称是铸造金币的工厂，它把泽契尼（zecchini）或色庚（sequins）改铸得很完美，然后重新投入流通。对于黄金持续的升值，必须把它作为长期问题（我们已勾勒过并将在后面再谈）或短期问题进行研究。

就短期问题而论，不妨看一看乌迪内长长的月份价格数据。我们可以假定这些数据对来自威尼斯的专横影响敏感（但不是极其敏感）。必须记住，提升金币的价格就是吸引外国的金币，但在另一个意义上也是驱逐银币。这也意味着用黄金衡量的核算货币的贬值。事情确实如此。这里所考查的价格
[390] 系列的确显示出对许多影响的反应，其大体朝着相同的方向：金币的升值总

① 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用语。

② 比较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sir James Steuart）所下的定义："就其自身的价值而言，核算货币的作用与测角的度、分、秒等以及地图的比例尺相同。"见《詹·斯图亚特著作集》（共6卷），（伦敦，1805年），第2卷，第271页。

是趋向于抑制物价的涨势，有时甚至戏剧般地打断物价的轮番上涨；相反，金币的贬值和银币的补偿性升值（不论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则趋向于加速物价的上涨。这已成为一条十分普遍的规律，这条规律在其他地方比在威尼斯更容易得到验证，因为相对而言，威尼斯很少从事白银交易。如果有人就此问题深入研究，肯定会受到欢迎。但与其着手确定货币贬值对价格运动的长期影响（这不再需要论证），不如根据贬值主要是影响黄金还是白银，尝试着找出物价运动行为方式的差异（必须重复一遍，是在短期的差异）。

7.2 长期趋势

“长期趋势（the secular trend）”这个术语用来表示本研究中最长时间段内的价格运动。它包含其他所有的价格运动，并带着它们一起运动，借用弗朗索瓦·西米昂多次被人引用的形象说法，犹如潮汐运动包含海浪运动。正如潮汐有涨潮、退潮和息潮一样，人们同样可以说，长期趋势有上升、下降甚至停滞三种状态。为了弄清楚这些事情，我们必须求助于可获得的最长时段的价格曲线。

例如，位于亚德里亚海（the Adriatic）和威尼斯泻湖（the lagoon of Venice）接壤处的小城镇基奥贾（Chioggia），其公共账簿记录了直到 1797 年镇属粮仓（the Fomdaco）每天售出的小麦数量和价格。如果每天仅取一个价格（平均价或中间价），我们就能消除当天价格的小小波动；如果我们仅取周六的报价，或 6 个工作日的平均价格，一周内的价格差异同样被消除；依此类推，我们可以获得 1 个月或 1 年或 5 年、10 年、20 年、50 年的价格。有 10 种乃至 20 种不同的但又类似的方法可使我们随意地消除暂时的、短期的、较长时期或很长时段的价格波动，而仅仅使长期趋势凸现出来。这正是 5 年或 10 年平均法、不定期移动平均法、最小平方法、移动中位数法等方法的目的，除非人们满足于沿着数据散点图拉伸一条棉线并根据对走势的判断（*avista d' occhio*）来对其进行调整，以大致确定可能的回归斜率！对此，数学家可能会微笑着说，这个结果和由最小平方法所完成的回归并没有太大的差异，而就数学而言，最小平方法是消除短期波动的方法中较精致的方法之一。【391】

所使用的方法就说到这里。但用这些方法处理怎样的数据？是同时采用所有的价格，计算出总指数（尽管用总指数来表明整个欧洲的状况远非易

事)？还是先就几种重要价格单独进行仔细研究，然后再对不那么重要的价格进行分类研究？我们选择的是后者，首先考察的是小麦的价格，我们对其十分依赖，因为有关小麦的价格数据比其他任何商品都要丰富得多，而且还因为谷物是欧洲每一个国家的主要开销。如果我们考察日本和中国，我们就会以大米的价格作为首要的历史见证物。

我们所绘图表中的不同价格系列充分利用了名义价格（即用核算货币表示的价格）和白银价格（即折合成白银数量的名义价格）的 10 年平均数。这样做有几个理由，有的充分，有的却难以令人信服乃至满意。贯穿整个欧洲历史进程，我们的研究要具有一体性，这种要求使这种做法似乎很明智：一方面，把价格简化为白银克数，因为白银是一种国际偿付工具，并且通过它可对不同的经济状况进行粗略的比较；另一方面，这种做法将移动平均数或中位数的计算考虑排除掉了，而正是由于所有长时期的价格系列都有数据间断使得这两种平均指标不易计算。当然，我们自始至终都依靠名义价格数据。不论面对何种困难，我们起初总是宁愿回到原始的、未经调整的价格数据（它们的不准确性最低）。

考虑到我们的主要目的，下面这两个要求是不言自明的：①根据对不同的经济状况所掌握资料的相对准确性，确定由一系列特殊案例所揭示的价格长期运动的变动年表；②超出特殊案例的范围，弄清欧洲经济的整体运动。

7.2.1 小麦

首先，小麦是欧洲前工业化经济最重要的产出，也是经济状况的衡量器。甚至 18 世纪中叶，英国仍是以乡村为主。几乎到处种植、到处都有记载的小麦提供了作为计算开展基础的长串价格数据。作为一种商品，小麦无疑有不足之处。由于小麦需求缺乏弹性，其价格对收成的好坏极其敏感。正因为如此，它并不直接跟随价格的一般趋势。在长期，小麦价格短期波动的影响趋向于消失，但是，小麦供应的主要困难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存在。在长期的通胀中，谷物价格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倾向于比其他任何商品更快上涨。无可否认，小麦并不孤单，其他谷类——黑麦、大麦、燕麦等等充当了大部[392] 分的面包原料。在法国，经常提到“les bledz”；在西班牙，“los panes”同样经常被提到（les bledz、los panes 都是麦的复数名词形式——译者）。实际上，小麦往往与其他谷物相混杂，这些杂麦在不同的市场上以不同的名称出售。在欧洲不同地区，人们食用的面包有黑白之分。某地消费的面包的

品质可以说明当地的许多问题。食用黑面包的地方几乎肯定是穷地方。1579年，一位对食物很挑剔的威尼斯人在加利西亚（Galicia）的一家小旅馆里费了些力才找到了黑麦面包，然而这恐怕难以称其为面包。波兰经由维斯图拉（Vistula）、但泽、埃尔宾（Elbing）出口小麦，但作为生产者的农民自己却吃黑麦面包和喝啤酒（可谓饮大麦）。甚至在贵族的餐桌上也不总是有白面包。根据18世纪的一项调查，在富裕的城镇但泽，黑麦的消费量是小麦的4倍多。大约在同期的马赛（Marseilles），为满足城市消费，面包商采购普罗旺斯（Provence）平原和丘陵地区生产的上等小麦，而农民却在出售其生产的小麦的同时，食用品质十分低下的"海麦（sea wheat）"。这些"海麦"是由帆船从地中海东部地区（the Levant）或巴巴利（Barbary）运到马赛的（尽管这么做需要付出往返的运输费用）。不仅如此，甚至黑麦也在国家之间交易。北方国家在出口小麦的同时，也出口大量的黑麦。

尽管如此，**小麦**——我们所关心的是小麦**价格**——在整个谷物价格里起主导作用。在食物匮乏时期，小麦价格的变化不比其低等的谷物的价格变化显著。对于法国的情况，让·默弗雷（Jean Meuvret）最近写道："在谷物市场上，主导因素是小麦"。这一点可由巴黎1520～1698年的**食品市场价目表**（the mercuriale）（或市场现行价格）的数据证实。在图12中，我们给出了其后期数据中的部分数据。关于这一点，皮埃尔·古贝尔（Pierre Goubert）甚至说得更为明确："作为17世纪人们的主食，谷物的价格在价格的统计研究中足以给出用以说明主要经济波动的最好和最可靠的数据。"布阿吉尔贝尔（Boisguillebert）在1695年就已说着同样的事情："……小麦的计价……确定了其他所有商品的价格。"正如厄内斯特·拉布鲁斯所认为的那样，18世纪法国穷人在面包上的花费等于其家庭总开支的一半。难道绝大多数人不也是这样吗？

小麦是一个影响全局的问题，是经济结构的体现，也是日常食物的主要特色。因此，人们不会觉得奇怪，笨重而难以运输的小麦，居然听命于西方繁荣且人口过剩的地区，或根据总希望给予优先供应的军队军需官的命令，周游欧洲各地。为了使笨重的小麦起运，市民和市镇当局往往不得不早早采取措施。他们必须求助于巨商大贾（有时是国际商人）［例如，在1591年意大利和地中海地区严重的危机期间，向里斯本从事国际贸易的巨商希门尼斯（Ximenes）求助］，而且货款必须用金银支付。威尼斯从13世纪起不是用金条从阿普利亚（Apulia）收购小麦吗？在16世纪和17世纪，布列塔尼（Breton）的海员用小船把北方小麦运至里斯本和塞维利亚，反过来，在地 【393】

方当局的默许下，他们带回金银块或“来自米纳（Mina）的红金沙”。

人们可以事先猜测到，这些情况对小麦价格波动幅度的影响多么富有戏剧性，常常就像不折不扣的地震，正如伊尔·J·汉密尔顿就西班牙小麦价格所收集的长长数据记录的那样。仅仅通过抹平波峰和波谷，透过剧烈的价格运动，我们就能够看清我们的方向。虽然价格波动极其剧烈是国际小麦市场的大体特征，但是，当我们试图分析长期趋势的时候，却不能考虑这些。

1. 小麦价格

鉴于文献资料常常有间断的特点，我们遵循格奥尔格·维贝（Georg Wiebe）和威廉·阿贝尔（Wilhelm Abel）的思路，利用每 10 年的平均数。这常常使我们有可能利用一些其原始数据尚未公布的现有计算结果。这些平均数似乎相当令人满意地消除了 10 年内的价格变动（10 年内的价格变动是原始记录中的主要困难之一）。至于价格系列的选择，我们显然必须优先考虑长系列。虽然这些长系列不太多，但它们相当好地涵盖了欧洲大陆的情形。我们以百升小麦作为供参考的共同单位，并计算出了用核算货币和白银克数表示的每百升小麦的价格。

首先是用白银表示的价格。这些价格数据汇集在图 19 里。图中的曲线描绘了欧洲 59 个小麦价格中心的情形，其中一些刻画得很细致。这些曲线既有重合又有相当大程度的分离。用一条连续曲线把价格的最高点连接起来，同样地再把最低点连接起来。这两条连线（**最高价格**和**最低价格**）形成一个“面”，参照这个“面”，每条曲线就获得了其特殊的意义。这个“面”就像一条宽阔的河流，其两岸起初相距甚远，而在 18 世纪时则明显地相互靠近。我们甚至能够把部分曲线还原为混合运动曲线，这样做有时能改进我们的理论并增加其价值。例如，由费尔南·布罗代尔绘制的威尼斯 1575～1609 年间的公认价格曲线，其位置处在所给曲线图的上限。尽管我们已经预料到了这一危机年代的这种状况，但这种状况的验证还是让我们又一次感到很有趣。同样，根据 P. 芒特利埃（P. Manteuier）前些年所收集的有关奥尔良（Orleans）的数据所绘制的曲线（尚存争议），亦可在该曲线图中找到其位置。【394】

这种“验证”对于图中所给的相当可靠的长曲线特别有价值。无论是与上限线或下限线相对照，还是真正与由整组数据计算出的绘制在上、下限线之间的平均线相对照，每一条曲线都以自己的方式上下起伏。再一次提请

读者注意，我们并没有赋予平均线多于作为一个有助于更容易地理解曲线图的向导的价值。但是，我们同时可以有把握地指出，利沃夫（Lwow）的曲线始终与整个价格运动的下限线相随，至少直到17世纪中叶，在很长时间甚至低于波兰其他城市的曲线。而且，埃克塞特（Exeter）的曲线在1689～1690年后朝着上限线上升，在此之前，它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长期追随平均趋势。这一点很有价值，熟知1688年"光荣革命"下一年英国实际情况的历史学家对此不会感到惊奇。至于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曲线，直到17世纪中叶，始终远远高于其他曲线。对所有这些，在后面我们将借助于有关的图表进行简短的说明。

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分析工具，这个工具肯定有待于改进，但即使如此，它仍给我们提供了大量信息，其中有一些是出人意料的。例如，当我们把以波士顿（Boston）为特殊例子的"美洲"小麦价格放到我们的简图上时，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至少直到1764年大饥荒过后不久为止，这些价格决不像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具有竞争力。难道应该根据"比较成本"和"运输成本"对18世纪美洲小麦运抵欧洲的条件重新仔细审查？或者再次检查相关的通货和价格系列？

我们的曲线图还揭示了另一个问题。自18世纪初以后，上限线、下限线的明显靠拢表明，欧洲各地的价格已开始趋向一致。如果小麦价格证据具有普遍意义，那么，随着价格的拉平，只有在存在价格水平差异的环境中才能运作的商业资本主义不是会逐渐瓦解吗？这些价格水平的差异产生于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差异，而这又是由于历史的差异。商业资本主义在极力利用这些价格差异的同时，又有助于把它们填平补齐，它还引发一系列流通渠道的建立，并相应地导致人们的兴趣被转移到别处，以寻找更为有利的条件。这样说或许牵强，但在1440～1449年间，价格的差异是从6克（在利沃夫）到43克［在巴伦西亚（Valencia）］，而在1750年，这两地的价格差距数据则分别在38克和75克。这里所发生的变化相当清楚。

最后说一句，价格的趋同无疑意味着商品流通和铸币流通的改善。且不说18世纪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也应归功于流通的改善，难道我们不可以认为，在欧洲某些得天独厚的地区，流通的改善有助于结束可怕的饥荒惨剧？在1750年（这一年份数字非常粗略）之后，欧洲仅剩下尚可忍受的"受抑制的饥荒（suppressed famines）"。【395】

2. 绘制价格地图的尝试

价格不同寻常的趋同仅涉及本章所研究的历史时期的末端。在 15 ~ 18 世纪期间，欧洲的价格呈现出另一番景象：各种各样，千差万别。[1] 当时欧洲的情况远不是——像我们所知或自以为我们所知的法国大革命前夕的欧洲那样——拥挤、躁动的，人流也不是容易往来而且频繁往来。实际上，用地图揭示这些差异、地区隔离，是我们考虑的重要方面，而小麦价格地图正可担当此任。

为了显示清楚，在我们的地图系列里，我们不得不削减作为证据的城市数目。除此之外，我们只得有限制地选择 7 幅相邻时间间隔均为 50 年的地图（见图 20）。如果时间间隔短一些，地图系列占的篇幅会太大，而且使我们过多地偏离我们的主题——长期趋势。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被忽视。长期趋势绝不是千篇一律的，它势必要考虑到欧洲各地价格水平的差异。

像比较传统的气象图一样，我们的地图区分高压区和低压区，即高价格区和低价格区。然而，气旋和反气旋分别处于一条固定线的两侧，而高、低价格区之间的界限却是移动的（因为平均价格线终归随总体趋势而动）。而且，我们的地图试图显示的是穿越样本 10 年平均数的长期趋势。为了使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比较成为可能，这些 10 年平均数均以白银计量。

第一幅地图（1440 ~ 1449 年，数据稍显单薄）显示出了价格水平的显著差异。利沃夫和巴伦西亚的小麦价格比大约是 1∶7。巴伦西亚的价格最高，北欧和大西洋欧洲（Atlantic Europe）是中间价格区，东欧［波兰及其【396】邻国奥地利（其拥有维也纳的价格曲线）］是低价格区。应该注意的是，布鲁日和乌得勒支（Utrecht）的价格在某种程度上被高估，而施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价格明显高估——根据先前的数据和随后的趋势，该价格显然应减少 1/3，甚至一半。然而，关于这一点，我们还缺乏进一步的考证。

对于第二幅地图（1490 ~ 1499 年）来说，证据丰富多了。它表明价格普遍下降，但以前的价格差异没有改变。我们发现，地中海地区（乌迪内和那不勒斯）的价格水平最高，该地区往北也许能够延伸到格勒诺布尔

---

[1] 可以说是“互不相关”。参见瓦尔特·阿基里斯（Walter Achilles）的优秀论文：《16 ~ 17 世纪欧洲的谷物价格与谷物贸易》，载《农业历史学和农业社会学杂志》（1959 年）。

(Grenoble)。大西洋欧洲的价格没有这么高（乌得勒支，以及可能还有布鲁日得除外），同地中海地区相比，价格差异大约是35%。英格兰（以埃克塞特为代表）的情况比较突出，而施特拉斯堡和维也纳的情况则更加显著，这两个地区代表着欧洲第二类价格区的最低点。至于作为欧洲第三类价格区的东欧，其低价格仍为人瞩目［克拉科夫（krakow）为5.47克，利沃夫为4.77克（这比巴塞罗那约低7.5倍，因巴塞罗那的价格为35.26克）］。简而言之，如果我们把欧洲第一类价格区（地中海地区）的价格指数定为100，则北欧和大西洋沿岸地区（第二类地区）为77，作为东欧（第三类地区）代表的波兰为16。自然，这些都是粗略估计。

第三幅地图（1540～1549年）所显示的时期正值美洲白银大量涌入的前夕。在地中海及其邻近地区，价格依然居高不下，只有老卡斯蒂利亚(Old Castile）是个例外。但是，老卡斯蒂利亚盛产小麦，位于典型的地中海地区范围之外。同前两幅图相比，地中海地区的价格涨幅相当大。涨价的浪潮席卷意大利［那不勒斯、锡耶纳（siena）、佛罗伦萨、乌迪内］、法国南部，深入内陆，直到格勒诺布尔。这股反气旋的“顶点”在巴伦西亚和新卡斯蒂利亚（New Castile)。实际上，对于这两个城市以及加泰罗尼亚(Catalonia)，高物价的潮流显得无法抗拒，而这几乎妨碍了它们在地中海地区经济中起积极作用。

中等价格地区（乌得勒支、布鲁日和巴黎除外）也颇具特色。该地区始于维也纳和奥地利，横穿德国和法国，终于英格兰。要不是维也纳的价格(13.98克）差不多低23.5%[①]，英格兰的价格水平（18.17克）就是本地区最低的。

至于第三类价格地区（欧洲的内陆），如果我们对那些往往根据不完整的数据计算出的数字予以接受，那么价格肯定正在上涨。正如斯塔尼斯拉夫·哈斯佐夫斯基（Stanislaw Hoszowski）所指出的，由于响应西部地区对谷类产品需求的增长［这使维斯图拉河（the Vistula）上的运输更加繁忙］，这些价格无疑上涨了。这种解释是可能的。在华沙（Warsaw)，价格水平很低（9.08克），然而，我们难道不应该把克拉科夫反常的高价格（18.12克）归因于小波兰（Iittle Poland）人口相对稠密的地方条件吗？ 【397】

50年后，16世纪最后10年的地图受到当时所知的最大程度的白银扩散的影响。与塞维利亚的商业活动同步，白银的进口自1600年（根据伊尔·

① 如果13.98克、18.17克无误，则应为23.06%。——译者注

J·汉密尔顿的数据）或自 1610 年［按照胡盖特（Huguette）和皮埃尔·谢努（Pierre Chaunu）的看法］回落。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其时正处在“黄金危机”的前夕。自“黄金危机”以后，整个欧洲的货币系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战争、饥荒、社会动荡和经济混乱都变得更加频繁。

高价格的反气旋继续以地中海地区为中心，地中海地区自古是欧洲最富庶，也是价格水平最高的地区。价格的最高点已移向安达卢西亚（Andalusia）（这是不言而喻的，因塞维利亚已成为昂贵小麦和面包的中心）。尽管如此，通货膨胀仍得以维持。在意大利、法国南方和整个西班牙半岛，（Spanish peninsula）通货膨胀特别明显（就广义的通胀而言）。但新卡斯蒂利亚物价上涨的速度稍缓一些，而老卡斯蒂利亚的相对缓慢则明显得多。然而，高物价的汹涌浪涛已淹没了整个法国，只有利摩日（Limoges）、普瓦蒂埃（Poitiers）和比莱巴罗尼（Buis-les-Baronnies）“幸免于难”，算是例外。高物价控制了巴黎周围地区，而巴黎自己，在 1590～1591 年的围城期间，价格水平大约是 143 克。但是，我们已经指出，当地生活费用被过分高估，还有其他的原因。这样，面包昂贵的欧洲地区变成了另一番景象。我们即使不把该地区同中等价格的大西洋地区和低价格的东部地区相比，而是把它同价格相对较低、幅员辽阔的另一地区相比，也能显出差异［该地区从克拉科夫（27 克）、维也纳（40 克），一直延伸到英格兰的埃克塞特（67 克）］。在这个地域里，惟有乌得勒支和阿纳姆（Arnhem）的价格高，但那是战争使一切陷入混乱的结果。如果把欧洲南部的价格总指数定为 100，那么，北部仅约为 76，波兰为 25。

16 世纪末，欧洲最重要的特征显然是，波兰小麦价格（作为成本价）已被吸收进欧洲总体价格之中这一事实。①

一眼就可看出，这种情形的原因肯定要归结到维斯图拉河和波罗的海（the Baltic）的谷物贸易。整个 16 世纪和 17 世纪初期，但泽港的谷物出口【398】稳步增长。它越来越多地从波兰南部地区征调农产品，同时又使这些地区的价格越来越与西欧的价格接近。部分由于这些出口，北欧小麦和其他谷物的价格仍相对便宜。然而，1591 年后，波罗的海的小麦也开始运往地中海地区，而且这种贸易延续了很长时间。

第五幅地图（1650～1659 年）向我们展示了“三十年战争（the Thirty Years War）”的后果。乍看起来，情形似乎颇为混乱：一方面，价格总体水

---

① 更确切地说是波兰北方的小麦。瓦尔特·阿基里斯对此有所保留，见前引文。

平明显下降；另一方面，又在地理位置上出现了广泛的变化。

由于缺乏足够的真实数据，我们只能做出某些尝试性的结论。南部地区的价格最高点似乎是在那不勒斯，而要说最低点在乌迪内，则会引起一些麻烦，尤其是与意大利的其他地区相比的时候。

然而，欧洲决定性的变化并不是发生在价格居高不下的地中海地区，而是发生在以前价格相对较低的北方。北方如今已被分割为两个不同的价格区。首先是在维也纳和布列塔尼之间存在一条低价格链——当然，只是相对而言，它往南限制地中海地区的高价格向北扩展，往北阻挡从乌得勒支到英格兰的高价格向南传播（后者的情形很新奇）。因此，从地图上很快可以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欧洲被一条低价格带（主要在欧洲大陆）拦腰斩为两个大致相似的高价格沿海地区。简言之，包含欧洲**老财富中心**的南部的价格明显下降，而包含欧洲**新富裕地区**的北部的价格相对上涨。究其原因，是因为北部的经济地位从此变得优越了吗？或者是由于波罗的海的谷物贸易这台复杂的机器出了毛病，不能再源源不断地生产和分配廉价的小麦？

德国的异常也很显眼。尽管有一条低价格带从东向西贯穿中欧，但仍可注意到，德国的价格非常低。德国极其低下的价格水平，恰好出现于“三十年战争”期间，这进一步说明为什么当欧洲价格随后下降（确切地说是保持稳定）时，德国的价格却偏偏显出上涨趋势。

如果我们并不过分关注热那亚的特例，那么，西地中海地区在第六幅地图（1690～1699 年）中就已失去了其优势地位。法国在巴黎的带领下，从此价格处于较高水平。尼德兰（the Low Countries）的情形也是如此。至于英格兰，在 1688 年革命后，已成为麦价昂贵的地区。在中欧和东欧，尽管自 1675 年后价格显出上涨趋势，小麦依然便宜［利沃夫 44.31 克，卢布林（Lublin）40.13 克］。在华沙，小麦售价好像是每百升 25.24 克（该数字尚存争议）。【399】

在这幅地图中，我们仍然可以辨认出北、中、南三个主要地区。南部地区（锡耶纳、新卡斯蒂利亚、乌迪内）的高价格由于持续的经济萧条而逐渐下降。在从利沃夫到布列塔尼的欧洲大陆，价格稳定，只有德国落在后面，而法国则独自遥遥领先。在北部地区，17 世纪的暴发户（the nouveaux riches）都食用高价面包。

在最后一幅地图（1740～1749 年）中，新的平衡已经建立。这幅地图证明了我们前面所确认的趋势：从维也纳到波罗的海和布列塔尼是一条价格相对较低的大陆主要轴线；北部地区是高价格区之一；在地中海地区，价格

维持在中等水平。然而，到了 18 世纪中叶，所有这些差异逐渐缩小，平衡似乎是大势所趋。因此，更确切地说，南、中、东、西各地区的价格水平大体上程度不同地趋向于相互融合，略低于平均水平，而西北地区的价格稍高于平均水平。

3. 价格长期运动中的波动

上述的解释使我们熟悉了小麦的价格及其具有多样性的原因。然而，遍及欧洲的长期趋势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尤其是，以某种确定的标准把它分离出来的困难是什么？

这个问题并不简单。它必须始终在与我们业已强调的欧洲经济多样性的关系中予以考虑，而事实情况又是价格史学家倾向于仅仅研究特例。当各种各样的证据碎片汇集在一起时，人们立即发现，各种不同的解释都不可能推广作为整个欧洲的一般规则，我们有必要对此做出精细的区分。

因此，我们仅能总体上接受为历史学家所认可的特殊价格运动的年表，其中包括四个长时段：15 世纪价格下降（确切地说是停滞）；16 ~ 17 世纪初价格节节攀升；随后又逐渐回落，直到 1720 ~ 1750 年间为止；最后是 18 世纪通胀卷土重来。但是，任何把这些时段的日期确定得更加精确的企图立即会使人踌躇。首先，这些不同升降运动的日期，在许多情况下，根据人们采用的是名义价格（即用核算货币表示的价格）曲线还是用白银表示的价格曲线，而互不相同。这两条曲线应该选择哪一条？为什么这两条曲线显示的日期有差异？对于这些问题的任何回答，只能是近似的，不确定的，这尤【400】其是因为我们必须从总体上接受的曲线本身存在争议。然而，由于可以交替利用以名义价格表示的数据，和以名义价格折合为白银克数表示的数据，提出下面几个复杂问题似乎是有用的。

（1）16 世纪的“价格革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首要的问题一定是：过去现在均被称为 16 世纪“价格革命”的运动在哪个特定的时刻开始？“价格革命”这个词通常指的是价格水平总体的上涨，它结束了危机四伏、停滞不前的 15 世纪。但是，1500 年并不是有决定意义的一年。如果我们把“价格上涨”和“16 世纪”相提并论，那么，有许多因地而异的 16 世纪来临日期。

由名义价格判断，16 世纪的价格革命看来有一个酝酿时期（正如在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发生前，都曾有过酝酿时期一样）。这个酝酿时期的特征

是，价格缓慢上涨（在1450～1500年间，大约上涨50%，每年大致上涨1%），并为时常使价格走向发生转换的明显的周期运动所打断，但在长期价格上，上涨的趋势无可否认。由于地点和经济状况的不同，也由于不完整的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数据，这个酝酿时期的来临略有差别：巴黎，1460年（?）；埃克塞特，1462年；慕尼黑（Munich）和奥格斯堡（Augsburg），1463～1464年；乌得勒支，1464年；**罗马，1485年**；施特拉斯堡，1464年；根特（Ghent）和布鲁日，1464年；**法国**［根据G. 达韦内尔（G. d'Avenel）］的数据，**1465年**；法兰克福（Frankfurt），1470年；利摩日，1468年；**拉古萨，1482年（?）**；利沃夫（就燕麦而言），1485年；西班牙（巴伦西亚），约1500年。[1] 我们用黑体字标出了非常粗略的数据及其地点，对于其他数据，也应有必要的保留，因为就15世纪而言，我们所掌握的样本数据很不完善。即使如此，我们终归可以肯定，作为现实的日常生活的一个要素，酝酿时期几乎同时开始覆盖整个欧洲，只有西班牙，可能还有葡萄牙是例外。对于西班牙这个例外，我们可能有把握，但遗憾的是，我们缺乏有关葡萄牙的可靠数据。

尽管存在易受其影响的周期运动，西班牙的名义价格——不论是在纳瓦拉（Navarre）还是在巴伦西亚——趋向于保持平稳。只是在1500年后，巴伦西亚的价格才开始上涨，这个日期对塞维利亚可能也适用。根据安德烈·赛普斯（André Saypus）的考证，16世纪西班牙价格革命始于1506～1510年左右，然而，他没有提供实际的数字依据。因此，尽管由于伊尔·J·汉密尔顿无与伦比的著作，我们都倾向于按照他的想法来描绘欧洲总体的价格运动，但伊比利亚半岛（the Iberian Peninsula）是与欧洲经济不同的区域。【401】

如果我们用以白银表示的价格数据代替前面引证的以名义价格表示的数据，那么，立即可以看出，革命酝酿时期被限制在某个范围内。以白银表示的价格实际上仅在德国的法兰克福、维尔茨堡（Würzburg）和慕尼黑这几个城市随名义价格的上涨而上涨。在利沃夫，前者落后后者约10年；在埃克塞特和乌迪内，大约是30年；在布鲁日和根特，可能长达36年。在西班牙（巴伦西亚），直到大约1500年，以白银表示的价格和名义价格才开始一起上涨。

根据迄今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西班牙是处在价格革命酝酿时期之外的主

[1] 伊尔·J·汉密尔顿：《1351～1500年巴伦西亚、阿瑞根（Aragon）和纳瓦拉的货币、价格和工资》（马萨诸塞州剑桥，1936年）和《1501～1650年美洲财富和西班牙价格革命》（马萨诸塞州剑桥，1934年）。

要国家。然而，我们注意到，在西班牙以白银表示的核算货币的价值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我们还注意到，西班牙——确切地说，是整个伊比利亚半岛——是当时非洲黄金的集散中心：黄金从该地区流走，又通过有利的汇率吸引白银。早期的一张曲线图显示了两种贵金属比价在西班牙和德国之间的差异。维多利诺·马加拉埃斯·戈蒂诺（Vittorino Magalhães Godinho）在他关于葡萄牙帝国经济结构的转折点的那本影响日益扩大的著作中，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在作为地理大发现伊始的 15 世纪里，伊比利亚世界继续指望伊斯兰和非洲，指望其金币、奴隶和贸易（均包含在“撒哈拉地中海”的贸易内）。难道非洲的影响不再达至比利牛斯山脉（the Pyrenees）？难道不正是黄金再一次对伊比利亚半岛的价格运动起到了减缓作用，才使其与欧洲其他地区不同步？所有这些问题都还没有确切的答案。然而，仅仅考虑所有这些相关因素，对西班牙的异常——其名义价格运动和以白银表示的价格运动直到 1500 年均处于停滞状态——做出解释仍是可能的。

在别的地方，每当价格上涨率高于核算货币贬值率时（如在施特拉斯堡，是 28% 的价格上涨率对核算货币 9% 的微弱贬值率；在乌迪内，是 40% 对 18%），名义价格和以贵金属表示的价格总是有力地同时上扬。

以上论述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地方的核算货币贬值程度会比另一个地方严重？人们可能很容易说，核算货币的贬值程度与白银的充足程度成反比（德国的实例支持这个论点）。乍看起来，蒂罗尔（Tyrol）和中[402]欧的银矿（早已被奥格斯堡的商业金融家开采）的白银产量的急剧增加，或许解释了德国核算货币较小幅度的贬值和两条价格曲线的齐头并进。然而，每年 10 吨的产银量似乎不足以造成这样的结果。德国由此又呈现出另一个异常：价格在德国的上涨比在其他地方要显著得多，与随后 16 世纪的价格飞涨不相上下。对德国来说，价格革命似乎没有什么酝酿时期，但我们是否也必须考虑到 1350 ~ 1450 年间德国危机的深重程度？在这场危机中，**Wüstungen**（被遗弃的乡村）随处可见。即使在经历了百年战争的长期混乱之后，德国当时所遭受的苦难似乎比法国或英格兰更深重一些。既然德国的价格比别的国家下跌得多，其上涨就很有潜力，所以，上涨起来就快得多。以上解释仅仅是尝试性的假说，这些假说必须**认真检验**，并且如果有必要，就得舍弃。

另一个重要现象也有待解释，这就是在尼德兰（事实上还有英格兰）以白银表示的价格的相对稳定。正如威尼斯和乌迪内可靠的价格信息所反映的，这种稳定也适用于意大利。总的来说，欧洲经济的两个最具活力的中

心——佛兰德（Flanders）和意大利，可能存在对白银的超额需求，其核算货币的贬值就是证明（威尼斯的核算货币贬值，以及佛兰德甚至更严重的反复贬值）。当地白银需求很旺，价值被高估，然而，又持续流向其他经济中心（例如，一名威尼斯商人 1467 年在一封信中谈到，白银流向西班牙；在后来的文件中更加明确显示出威尼斯有大量白银于 1505 年被运往西班牙或巴巴利兑换黄金，获利颇丰）。简言之，问题是，佛兰德和意大利北部地区核算货币的贬值，如果折合成白银计算，是否足以抵消价格的上涨？实际上，要证实价格上涨还需要有更加充分的实证数据。

然而，毫无疑问，一种综合的价格运动（由名义价格所记录）——或许不充分，但仍极其清晰——表明，早在美洲的第一批财富运到之前，欧洲就已全面觉醒。英格里·哈马斯特（Ingrid Hammarström）曾指出了瑞典的觉醒，这一见解必定引发人们的深思。

对于我们研究的问题来说，我们所掌握的材料显然是不够的。有关整个意大利的文献竟然是一片空白（乌迪内和基奥贾除外）。但是，正如伊尔·J·汉密尔顿所正确指出，在佛罗伦萨（Florence）有大量的文献资料可供使用但仍未被利用。传统史学家专注于美男子洛伦佐（Lorenzo the Magnificent）统治下的佛罗伦萨，这固然是正确的，但是，他们把视点放在这个享【403】有特权的城市，根本没有揭示隐藏在其无与伦比的壮丽景象背后的重要经济现实。而经济史学家仅熟悉 16 世纪凄惨的佛罗伦萨［科西莫（Cosimo）的佛罗伦萨］。这很可惜，因为它使我们失去了考察欧洲总体命运的珍贵证据。

（2）“漫长的”16 世纪什么时候结束？16 世纪的结束如同它的开始一样难以确定。价格的回落姗姗来迟，而且，来临的日期同样因地而异。

我们必须再一次区分两组价格数据——以白银表示的价格和名义价格。这两组价格数据给出的结果并不相同。

从银价来看，“漫长的”16 世纪变得短了许多。实际上，就在 16 世纪 80 年代西班牙的政治变革之后，衰退的先兆出现在西班牙。西班牙首先要为征服葡萄牙付出代价（1580 年），紧接其后又要为无敌舰队偿付“账单”（1588 年）。到 1589～1592 年间，西班牙经受了一场短暂而严重的财政危机，但其原因难以解释。[1] 不久以后，整个法国［巴黎、格勒诺布尔、利摩日、瓦朗斯（Valence）、罗芒（Romans）］似乎也跟着衰退。实际上，由于

① 皮埃尔·谢努：《塞维利亚与大西洋（1540～1650 年）》第 8 卷，第 781 页。

某种原因，法国不得不为胡格诺战争付出代价，这场战争导致急剧的通胀，拖累了整个王国。在 16 世纪的最后 10 年里，意大利的前景亦很黯淡，这在锡耶纳、佛罗伦萨或乌迪内有所表现。

因此，以白银表示的价格曲线的最高点显然依次落在安达卢西亚、乌迪内、锡耶纳、艾克斯（Aix）、巴黎、格勒诺布尔等地，时间是 1590～1599 年。热那亚的衰落看来似乎是在 17 世纪 20 年代的 10 年间，但其证据值得怀疑。这样，一场协调一致、影响广泛的价格运动把西班牙和意大利拖入了未曾预料的早期衰退之中。西班牙和意大利长期是欧洲得天独厚的地区，从美洲输入的贵金属减少，对它们是意料之外且难以忍受的打击，因为当地富裕的（几乎是奢侈的）生活方式要求从新大陆取得更多的贵金属。法国也遭受了（至少是部分地遭受了）贵金属输入的减少。继 16 世纪末短暂、剧烈的价格波动和随后的急剧下跌之后，以白银表示的价格在各地似乎稍有回升，这种回升持续到 17 世纪初，从而延缓了一场真正的衰退。然而，16 世纪末明显的转折看来仍然是值得重视的。

欧洲北部国家（德国、尼德兰和英格兰）的情形，与欧洲南部国家的上述情形形成鲜明对照。在欧洲北部，价格转折的出现（仍以白银表示）[404] 竟在几十年之后。在德国，起决定作用的时期似乎是在 17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就在著名的剪削钱币边缘时代（Kipper-und Wipperzeit）之后；在维也纳以及整个奥地利，变化时间似乎大体上和德国的时期相近；在英格兰和尼德兰，直到 17 世纪 40 年代，衰退才明显。对于波兰，尤其是对于但泽（直到 1661～1663 年，其仍受制于王国的货币控制），即使是 17 世纪 20 年代大骚乱之后，在价格能够反映通胀压力的情形下，我们也不可能做出明确的判断。

由此可见，欧洲南北两侧的对照极其鲜明。根据以白银表示的价格，长期趋势运动方向的逆转在欧洲南部处于 1590～1600 年间，在欧洲北部处在 1620～1630 年间，或许甚至直到 1650 年。依据白银的分布状况，在白银数量史的框架内，可以对这种南北对照进行部分解释，而这种解释也是我们要做出最终结论时所将要采用的解释。

现在，我们把名义价格同首先以银价做出的判断进行比较，结果是令人吃惊的。这时，长期趋势的逆转似乎发生于三次连续的价格运动之中。第一次运动发生于德国，17 世纪 20 年代其价格开始下滑［莱比锡（Leipzig）、维尔茨堡、慕尼黑、奥格斯堡为 1621 年；维也纳为 1622 年；法兰克福和施特拉斯堡似乎仅在 1636～1637 年间下滑］。第二次运动及第二组总的价格数

据大约发生于 17 世纪中叶：锡耶纳为 1649 年；埃克塞特为 1647～1648 年；拉古萨为 1648 年；那不勒斯（Naples）和乌迪内为 1649 年；艾克斯为 1655 年；阿姆斯特丹、阿纳姆、乌得勒支为 1651～1652 年；但泽或许为 1660～1664 年（就黑麦而言）；博韦为 1661～1662 年；巴黎为 1662 年。第三次也是最后的一次运动 1678 年发生于卡斯蒂利亚（就名义价格而言），其情形十分特殊，我们呆会儿再谈。

名义价格亦步亦趋地随银价而变，这种情况出现在英格兰，荷兰情况亦非常接近。应该说明的是，这种巧合表达了一个简单的算术真理，因为以白银来衡量英镑的内在价值是固定的（或者或多或少是固定的）。在德国，两种运动相隔的时间较长，约 10 年或 20 年。在意大利，这种间隔被大大扩展（有半个世纪之久）；在法国则更长（但尚存质疑），而在卡斯蒂利亚又比在法国还长——超过 3/4 个世纪。因此，在这些国家，持续的通货膨胀促使名义价格不断上涨。在西班牙，由于铜币的过量发行，通货膨胀呈现出人们所熟知的形式。而且，整个欧洲大陆（或差不多整个欧洲大陆）都曾遭受过类似的货币灾难。各大商埠（尤其是在地中海沿岸地区）像躲避瘟疫一样，力图摆脱此种灾难。在卡斯蒂利亚，由于查理二世政府的改革，这种铜币泛滥的状况终于在 1679 年结束了，而名义价格的上涨随后就轻易被制伏。【405】

然而，我们无须对铜币充斥的典型后果再费笔墨，因为当时的人们对此都有亲身经历，并且史书都有记载。我们关注的只是确定长期趋势的逆转。在欧洲经济的氛围里，这种逆转同样不是一气呵成的。在 17 世纪，由于各种困难和灾难，经济发展十分缓慢，混杂纷呈的欧洲各国经济经过一系列的反复之后才适应新的环境。吕杰罗·罗马诺声称，一切都取决于 1619～1620 年急剧而又特殊的危机。这种说法即使人惊奇，又让人觉得有趣，但不能使人信服。我们能够相信这种发生突然、有着决定性影响的进程中断是这样地影响深远而又简单明白吗？

（3）18 世纪的复兴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从 17 世纪的价格停滞到 18 世纪的陡然上涨之间，还有最后一个转折点尚待确定。这里，又一次和人们预想的相反，充满活力的 18 世纪的特征不是直线发展，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像 16 世纪一样，常常是犹疑不定的。

白银价格显示出，欧洲的价格上涨是分两批进行的。第一批是德意志地区，价格上涨顺序如下：维尔茨堡和维也纳为 17 世纪 50 年代（此时似乎至少跨出了第一步）；梅恩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on-Main）、莱比锡和柏林（Berlin）为 17 世纪 80 年代。简言之，17 世纪的萧条在这里仅持续了几十

年，其部分原因只是由于“三十年战争”（1618～1648 年）带来的破坏和苦难。

第二批起步较晚，大约在 1720～1750 年，包括尽可能免受“三十年战争”影响的许多欧洲国家。在这一大批国家里，我们注意到意大利（锡耶纳、那不勒斯、乌迪内为 18 世纪 20 年代）、卡斯蒂利亚（为 18 世纪 20 年代）、法国（艾克斯、格勒诺布尔、施特拉斯堡、巴黎、博韦也为 18 世纪 20 年代）起步早一些。在随后的 10 年里（18 世纪 30 年代），但泽、阿纳姆、阿姆斯特丹和布鲁日开始起步。在最后的 10 年里（18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英格兰［埃克塞特、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和伦敦］方才行动。

名义价格显示出有三种价格运动。德国和奥地利的价格运动属于第一种，包括法兰克福、施派尔（Spires）、莱比锡（1657 年），维也纳（1659 年），慕尼黑、奥格斯堡、维尔茨堡（1671 年）；韦尔斯（Wels）（1672 年）；魏尔（Weyer）（1674 年）；施特拉斯堡（1655 年）。属于中间一种的是法国（至少部分如此），包括：艾克斯（1673 年）；格勒诺布尔（1689 年）；比莱巴罗尼（1690 年）；米兰（Milan）（1684～1688 年）；阿姆斯特丹（1688 年）；莱顿（Leiden）（1690 年）；乌迪内（1689 年）；热那亚（1690 年）。属于最后一种价格运动的有锡耶纳（1721～1727 年）；卡斯蒂利亚（或许是 1721 年）；但泽（1735～1739 年）和英格兰（埃克塞特为 1731 年，伦敦为 1734 年）。

总之，仅有一个反常——德国，然而它极其重要。威廉·阿贝尔曾注意【406】到这个反常，但没有过分强调。确实，关于这一点，至今还缺乏详细的研究。“三十年战争”（1618～1648 年）能完全说明德国的迅速复兴吗？或者说我们不是已再一次亲眼目睹处于其经济活动谷底的德国的复苏了吗？是否可以说，由于经济凋敝、价格低下和人口大幅度下降，相比欧洲其他地区，德国处在阻碍较少、更加有利的位置？

初步的结论只能仅仅涉及问题的表面现象或其框架，而不能作为问题的解决方案。值得庆幸的是，历史学家对长期趋势的基本方面的认识趋于一致。然而，对于长期趋势上升和下降的转折点的确切日期仍然举棋不定。在每一种有某种意义的场合，影响整个欧洲的转折点总是涉及相当长的时段，大致是 1460～1510 年间、1590～1650 年间和 1650～1750 年间。欧洲从不在一年内，在某个单独的协同运动中来个大转弯。这是由于欧洲的结构、它在基本方面的差异和不同地区之间缺乏协调所综合导致的结果。

尤其是，我们所反复说明的数据局限使以名义价格做出的判断和以白银表示的价格做出的判断之间存在矛盾。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矛盾不能单凭比较这两种判断的优劣来解决。换句话说，正如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所知，不能仅仅依据货币数量论甚或质量论来考虑价格。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其中一些几乎是不言而喻的。

7.2.2　小麦以外的其他商品价格

随处可见的小麦，已经指明了长期趋势的主要问题。现在我们必须弄清楚，其他价格在哪些方面加强或削弱了这些初步结论。必须仔细审查这些价格证据，并且尽可能把它们和小麦价格联系起来考察。

因此，我们应该给予某些价格以特别的关注，这些价格与小麦价格一致或不一致。当这些或大或小的价格差距维持在一个长时间段时，就成为欧洲经济的特征或结构之一。同时，也成为对欧洲经济的主要说明之一。如果对价格进行相互比较，那么，它们常常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1. 两种重要的食物价格——葡萄酒和肉

(1) 葡萄酒。葡萄酒和小麦一样起着重要作用。种种迹象表明，在15世纪和18世纪期间，葡萄酒和烧酒的消费均有增长。[①] 在16世纪，酒的消费的首次增长仅涉及城镇（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城镇于16世纪初，法国的城镇于16世纪末）。很清楚的是，城镇居民饮酒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但他们不太注重酒的质量。接着在18世纪，酒的消费出现第二次增长，这次影响到了乡村。在法国，农民习惯上不嗜饮酒，凑合着饮用“葡萄渣汁(piquette)”，但在约翰·罗币制改革后，转向饮用越来越多的葡萄酒。 【407】

在16世纪和18世纪这两个经济扩张的重要时期，酒精饮料的消费数量，从葡萄酒到苹果酒、啤酒和烈性酒（白兰地和粮食烧酒），都增加了。随着酒馆和其他卖酒场所数目的增加（关于它们的轶闻趣事众所周知），各种葡萄酒的价格如箭在弦。正因为如此，我们从未发现葡萄酒价格远远落在总体价格波动的后面，相反有时还走在前面。

---

① 大家一定记得，白兰地（由葡萄蒸馏而成）和烧酒（由谷物蒸馏而成），实际上是在16世纪期间才开始作为商品出现的。

然而，如果就葡萄酒的消费而论，欧洲是一个整体，但葡萄的种植却可分为许多地区。从这点来看，欧洲至少可划分为三个地区（图 2）。

位于欧洲南部的地中海地区一千多年前就是一片葡萄种植区。地中海气候以北地区（也就是说，大致超过了橄榄树生长的北方界线）在罗马帝国时期就已种植葡萄。随后，葡萄种植一点一点地向大陆纵深推进，并且逐渐适应了较不利的气候条件。通过对各种类型的葡萄酒的选择，终于在波尔多地区（Bordeaux rigion）、勃艮第（Burgundy）、香巴尼（Champagne）、皮埃蒙特（Piedmont）以及莱茵河流域（the banks of the Rhine）成功地酿造出了欧洲闻名的质量最佳的葡萄酒。然而，这种成就的获得并非易事。在毗邻葡萄商业种植的北方界线的地区，也就是在拉昂（Laon）山区或兰斯（Rheims）山区的坡地上，种植葡萄的困难最多。1579 年，就在兰斯，葡萄成熟过晚，收获期间"赶上一场严重的霜冻，挂在葡萄架上的果实被冻得如此厉害，以至许多人用口袋装载摘下的葡萄"①。人们为什么要很麻烦地用传统的背篓来装载这些冻得像石头一样硬的葡萄呢?

葡萄种植的这条北方界线，大致始于法国卢瓦尔河（the Loire）的入海口，穿越大陆，在美因茨（Mainz）附近与莱茵河汇合，接着沿多瑙河（the Danube）向北直到其最东端的克里米亚（the Crimea）。俄罗斯人于 18 世纪就在克里米亚地区开辟了葡萄园。早在中世纪以前，尽管寒冷的北风肆虐，【408】葡萄树在该地区却曾生长茂盛。

欧洲的第三个地区是位于这条界线以北的广袤土地，那里不生产葡萄。然而，人们对葡萄酒的嗜好并不稍减。在尼德兰、英格兰和德国，有时因长年饮酒，人们对上等佳酿情有独钟。越往东走，人们对口味的要求越来越低。波兰的情形还算过得去，至少在 1700 年以后，对法国葡萄酒的需求在当地形成了稳定的价格行情。但在 18 世纪的圣彼得堡（Saint Petersburg），外国酒尚未上市，甚至刚刚运抵港口还未卸货，假冒伪劣产品便已充斥市场。

因此，葡萄种植在欧洲可分为三个地区。在地中海沿岸地区，葡萄藤遍布各地，无处不在。譬如，在 1540 年 8 月的直布罗陀（Gibratar），葡萄藤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在葡萄收获时节，居民倾城而出，晚间就在葡萄园中过夜，而在这时，深知城市习俗的阿尔及尔海盗（the Algerian Pirates）试图对城市进行偷袭。此事只是一个缩影，但它简单明了地显示出葡萄种植的重要

① 让·普索（Jean Pussot）：《临时工》，1857 年版，第 12 页。

性，并透露出这些地区必须做出的两难选择。大体上说，这是一个要小麦还是葡萄藤，要面包还是要葡萄酒的问题。例如，在威尼斯的科孚岛(Corfu)，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在15世纪，科孚选择了葡萄干和浓烈的甜葡萄酒，从那时起，它就经常处于饥饿的边缘，心急如焚地等待着运粮船的到来。皮埃尔·维拉尔（Pierre Vilar）的一系列论著清楚地表明，在加泰罗尼亚，（Catalonia）麦价和葡萄酒价之间存在着无尽的此消彼长关系，这种情况不可能与谷物的种植无关。同样的情况在普罗旺斯也普遍存在。

在欧洲的第二个地区（同样生长着葡萄藤），对葡萄藤或小麦，以及葡萄藤和工业之间的选择也存在。柯尔培尔（Colbert）曾对他手下寻求发展工业的人说："……若有两个城镇，其位置均适于发展我们需要发展的工业，但一个城镇拥有葡萄园而另一个没有，你们必须无例外地选择后者，因为葡萄酒对（工业）活动有很大的妨碍……"。

对于不生长葡萄藤的欧洲北部，我们必须进一步区分为两类地区：一类地区是南方葡萄酒的老主顾，而在另一类地区，葡萄酒仍然是奢侈品，是财富的炫耀和某种比较新鲜的东西。我们不禁想起一位波兰贵族，他执意要喝葡萄酒，以便不与狂饮啤酒的农民相混淆。虽然葡萄酒是一种奢侈品，但它创造需求，并且如维尔纳·松巴特（Werner Sombart）所说，它是资本主义扩张的促进剂。满载来自波尔多或来自拉罗歇尔（La Rochelle）邻近地区桶装葡萄酒的船队，很早就驶向北方，之后不久，这些船队从远至伊比利亚各港口、马德拉斯群岛（Madeira)、亚速尔群岛（the Azores）和意大利各海港的地方运送葡萄酒。波尔图（port)、雪利（sherry)、马德拉（madeira)、马拉加（malaga）和马尔萨拉（marsala）等这些葡萄酒的历史显示出英格兰曾是个开放的市场。从16世纪起，各种浓烈的红白甜葡萄酒开始由塞浦路斯（Cyprus）向英格兰出口。【409】

载运勃艮第葡萄酒的内河驳船队也活跃在荣纳河（the Yonne）和塞纳河（the Seine）上。巴黎地区生产的葡萄酒亦经河流运往鲁昂（Rouen）及更远的地方。陆路运输在必要时也派上了用场。每当葡萄收获的尾声，就有被意大利人称做**桶车**（carretoni）的德国大车车队翻越阿尔卑斯山（the Alps)，来到南方，装运维罗纳（Verona)、布雷西亚（Brescia）和伊斯特里亚（Istria）等地所产那依然"浑浊的（unsettled)"新酒，威尼斯听任本地的这类葡萄酒外销北方，而对罗马格拉（Romagna）和阿普利亚（Apulia）生产的口感醇厚的葡萄酒情有独钟。

在不生长葡萄藤的北方地区，每年新酒上市之日（不论新酒来自何

地)，就是人们欢庆之时，且总是毫无节制地海喝。或者可以说，南方人的特征就是酗酒中毒，而北方人则是烂醉如泥。记得蒙田（Montaigne）曾嘲笑德国人，说他们一口气把满杯的酒喝干。在克拉科夫，来自摩拉维亚（Moravia）或匈牙利的新葡萄酒在每年近 9 月的时候运达，如果不标明原产地，就不许出售。这就是执政官命令供应摩拉维亚葡萄酒的酒馆以嫩枝点缀门脸，而出售匈牙利葡萄酒的酒馆则以一把麦秸装饰门脸的原因。

我们前面说过，麦的种类很多，那么，葡萄酒的情形如何呢？葡萄酒的种类也很多，而且，通常来说，无论在什么地方被消费，葡萄酒的品质好坏是不会被遗忘的。在 15 世纪的温切斯特（Winchester），教堂里使用的葡萄酒已有一级（用于弥撒）和二级之分。在 16 世纪末的伊顿（Eton），不再混淆干白和干红葡萄酒。在曾长期是优质葡萄产地中心的奥尔良（18 世纪衰落了），从 16 世纪起，就有两种品质的葡萄酒，这两种葡萄酒的差价很大，好酒价格是次酒价格的 2 倍甚或 3 倍。在商业重镇亚眠（Amiens），1565～1567 年的价目表上记有 5～8 种葡萄酒的价格。在阿姆斯特丹，我们拥有 1669 年 11 种法国和西班牙产葡萄酒的价格资料。

阿尔萨斯（Alsace）的价格系列同样显示出，购买者区分葡萄酒的原产地。毫无疑问，历史学家要确定价目表所提供的各种品质的葡萄酒的原产地并非总是易事。例如，在乌迪内，di Sopra 葡萄酒和 di sotto 葡萄酒总是同时并存，它们无疑代表不同的产地，而且后者的售价总比前者贵些。

另一方面，在那不勒斯，希腊葡萄酒和拉丁葡萄酒之间的区分很清楚，而且这种区分由来已久（这两种葡萄酒均向罗马大量出口）。然而，在克拉[410] 科夫，我们再一次被一系列葡萄酒弄得晕头转向，找不到前面谈到的匈牙利葡萄酒或摩拉维亚葡萄酒。在它们的位置，有浓烈的甜葡萄酒，新奇的粮食蒸馏烧酒，此外，总还伴有醋——葡萄酒的穷亲戚，也是啤酒的穷亲戚，因为还有麦芽醋。在讨论葡萄酒多样性的本节里，我们从多种可能中选出三个最新的实例：首先，是但泽，其资料是如此清楚，以至我们复制了相关的价格曲线（见图 22 和图 23）；其次，是利沃夫，在这儿，浓烈的甜葡萄酒、普通葡萄酒和粮食烧酒之间的竞争似乎很激烈——尽管其结果一点也不清楚；再次，是品种更多的华沙，这儿有匈牙利葡萄酒、浓烈的甜葡萄酒、法国酒（自 1700 年起开始标价）、粮食烧酒，甚至还有桂皮白兰地。

但是，对葡萄酒品质的一贯关注似乎是北部地区——欧洲第三类地区——的特点。在地中海地区，例如在新老卡斯蒂利亚或在巴伦西亚，极常见的情形是，葡萄酒就是葡萄酒，是当地生产的 vino de la tierra。在这儿，

一条价格曲线就足以记录葡萄酒的价格运动。

而且，北部地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大量饮用烈性酒——白兰地和更多的粮食蒸馏烧酒。16世纪欧洲重新采用（确切地说是推广）了蒸馏技术，在17世纪时欧洲饮用烈性酒变得十分普遍。到了18世纪，烈性酒的生产和消费均急剧增长。从那时起，谁能想像没有烈性酒的战争和士兵或水手的生活？北方领导了烈性酒的消费。阿姆斯特丹曾是烈性酒的主要生产基地，是粮食烧酒和白兰地（由葡萄酒蒸馏而成）的主要市场，正是荷兰人使西方各地的葡萄农明白了蒸馏葡萄酒的好处。

北部地区另一个更具个性的特点是饮用啤酒。随着啤酒花的普遍使用，啤酒这一古老的饮料在各地迟早会用现代方法酿制。如果硬说葡萄藤种植的北方极限与饮用啤酒的南方极限一致，自然是言过其实。事实上，啤酒也已深入到遥远的南部地区的某些地方。巴黎很早就有了啤酒厂，而且这还不是惟一的例子。

显然有多种啤酒。奥格斯堡的价目表上有“浅色”和“深色”啤酒之分；维也纳，虽享有白葡萄酒之都的美名，却拥有6种不同品质的啤酒，而且价格有时不相上下；华沙有5种啤酒价格；利沃夫有2种；克拉科夫有6种。在慕尼黑，啤酒被分为“三月啤”和“冬季啤”，据说前者质量更好而且售价较高（尽管有例外，但这个规律还是可以得到证实）。 [411]

那么，在葡萄酒和啤酒的这些价格数据里，重要价值的是什么？首先，这些数据证实了先前由小麦价格得出的大致的价格运动。特别是在16世纪，所有的葡萄酒价格，无论葡萄酒在生活中重要还是不那么重要，也无论其产地远近，全都上涨。葡萄酒价格随16世纪的价格革命而上升，其后又受17世纪衰退的影响而下降。啤酒对这些价格波动同样敏感。这已被挑选出的阿尔萨斯、加泰罗尼亚和但泽的价格曲线证实（图22），除此之外，还有温切斯特、利沃夫和阿姆斯特丹的几项数据（图23）。

但首要的问题是，这些价格与小麦价格相比上升更快还是更慢？一般说来，对全欧洲三个不同地区来说，答案是三重的。为了更便于阅读，我们把答案绘制在曲线图里。我们设想，在我们挑选出的城镇里，我们能够把百升小麦和百升啤酒进行比较，这二者的价格均以白银的克数计量。

第一个检测来自西班牙巴伦西亚和新卡斯蒂利亚的两条价格曲线（图23）。这两地代表欧洲种植葡萄的第一个地区，属于地中海气候。在巴伦西亚，葡萄酒价格起初大约是同等数量小麦价格的2/3。于是它从其低起点开始以大致相同的速度跟随麦价上涨，但总不能消除两者的差距。在新卡斯蒂

利亚，麦价同样在开始的时候就高于葡萄酒价，而且在 16 世纪，它比后者上升更快，所以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遗憾的是，16 世纪以后，我们不能继续对两者进行比较，因为葡萄酒的计量单位带来了难以克服的困难。我们当然不能仅从对这两个案例的研究中去得出规律，但是，通过它们而对盛产葡萄地区的价格如何变化有所了解仍是可能的。

如果对格勒诺布尔做同样检测，意义就要小一些。从价目表来看，格勒诺布尔饮用的葡萄酒来自当地的葡萄园。小麦比葡萄酒贵一些，但相差不大。在 16 世纪的最后 10 年，葡萄酒价格比小麦价格上涨更快一些，并因此超过了麦价。但麦价不久又赶了上来，此后仅一次落在葡萄酒价格之后。总之，这两条价格曲线差不多并驾齐驱，麦价稍为领先。

但往北走，情形就倒转了。在英国的温切斯特学院，每百升“教堂用葡萄酒（chapel wine）”的价格最初是每百升小麦的 6 倍，而且直到 16 世纪 40 年代货币贬值之前，葡萄酒价格比小麦价格涨得更快。在这以后，小麦价格似乎与葡萄酒价格同速飞涨。到 1655 ~ 1659 年间，仍称为“教堂用葡萄酒”的葡萄酒（然而它同以前的葡萄酒一样吗?）的价格是麦价的 10 倍，[412] 并且，其继续上涨得如此迅速，以至于到 1710 年，达到了麦价的 12 倍，在 1750 年达到了麦价的 20 倍。在富裕的市场阿姆斯特丹，几乎存在同样的情形。1630 年左右，在阿姆斯特丹被视为奢侈品的波尔多葡萄酒的价格是小麦价格的 7 倍；在 17 世纪下半叶，葡萄酒价与麦价的比例从 1 增至 10，并且它在荷兰与法国为西班牙的王位继承权而发生的漫长战争期间，还在进一步扩大。

这些数字无须多做解释，然而必须特别指出，这些数字表明，在北部地区，葡萄酒的消费量明显低下。在北方作为奢侈品的葡萄酒与在南方任何农民都能拿着杯子到自家的酒桶里舀着喝或任何城里人都能从离家很近的酒馆买到的葡萄酒完全不是一回事。为了用数字生动说明这种差别，我们以作为北方普通饮料的利沃夫为代表而绘制了啤酒的价格曲线。百升啤酒与百升小麦的价格起初差不多相等，这一平衡随后由于麦价的上涨而打破，以后两者的差距不断拉大，因为从 17 世纪早期起，啤酒的价格就已保持稳定。到了 18 世纪中叶，啤酒的价格仅为小麦的 1/4。不管怎么说，这意味着北方和南方一样，饮料——也就是日常饮料，无论是葡萄酒还是啤酒——都不如食物重要，这是符合实际的、也是适当的。一个顺便的例子或多或少证实了这一点：在 17 世纪，博韦的四周都种有葡萄，价格曲线显示葡萄酒的价格随麦价而动。

然而，从长期来看，这是事实。在短期，事情就没有这么简单。价格易受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这使价格曲线失真。如果我们同时考察小麦和葡萄酒，博韦的数字就恰好说明了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小麦和葡萄酒常常矛盾，当小麦的价格低时葡萄酒的价格就高，反之亦然，这是因为小麦丰收同时葡萄歉收，或者相反。当两种产品都歉收时，它们的价格曲线就一致。

（2）**肉价**。19 世纪科学种田才缓慢地得以推广，在此以前，从 1400～1750 年，欧洲人以素食为主，面包消费量很大。因为，只有这种“落后的”饮食才能使欧洲得以支撑人口不断增长的压力。尽管 1650～1750 年间欧洲人口确实遭受了几次减少或停滞，但它还是从 1400 年左右的约 5 000 万人或 6 000 万人增加到 1750 年左右的 14 000 万人或 15 000 万人，增加了 1 倍，甚至很可能增加了 2 倍。

直到 19 世纪中叶为止，面包的消费使肉食的消费越来越不为人所注意。从那以后（仅仅是从那以后），对面包和肉食的需求倒转了，肉价上涨，因为肉食渐渐变得越来越流行。1750 年前，欧洲人指望白面包，现今他们指望肉食。尤其是在 19 世纪期间，当各种豆子、马铃薯和各种各样的绿色蔬菜（一些品种是全新的，另一些是通过选种和先进的耕作而进行的改良）越来越成为日常的食物时，面包不再在食物中占首要地位。 【413】

人们通常不太知道的是，1750 年餐桌上面包多肉食少的状况（这种状况大体上又延续了一个世纪直到 1850 年左右为止），这是生活状况恶化的结果，如果我们把时间追溯到中世纪，这种状况并不存在。在中世纪，餐桌上——不仅仅是王公贵族的餐桌——堆满了各种肉食，时间越往前推越是这样。威廉·阿贝尔 1937 年明确指出，这种状况的出现是从 15～18 世纪漫长的演变的结果。这一论断证实了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1871 年发表的早期论文中的观点，看来这一论断是不可反驳的。根据阿贝尔的研究，德国城镇年人均肉食消费量由 15 世纪的 100 多千克（某种生物学意义上的最大值）下降到 19 世纪的不足 14 千克。德国的这种现实或迟或早也成为了欧洲其他地区的现实。由此可见，为了摆脱人口日益增多的压力，欧洲由耕地有限，有大片敞地可供放牧的制度逐渐发展成为不断蚕食牧场的耕作农业制度。在西方，勉强维持农人生存并给农人带来欢乐的畜牧地区变得越来越少。正如 17 世纪一位名叫鲁瓦泽尔（Loisel）的法学家和经济学家所写的关于布赖（Bray）地区的情形：“事实上，只有住在牧场和公地附近的村民才有寻欢作乐和无所事事的倾向，他们依赖一两头牲口将就生活。”

众多的证据证实了畜牧业的衰落，也为我们显露了易于辨认的有关细节。例如，西欧对皮革的异常需求（这说明了从埃及或从巴尔干地区，以及更多地从新大陆进口那么多皮革的原因），或从 15 世纪起对匈牙利、巴尔干地区和波兰的畜群的依赖［这导致欧洲的这些边缘地区产生了真正的农民牧场（Viehwirtschaft）和领主牧场］。

但是，我们必须从统计数据和价格出发来考察它们如何（有例外则证明有规律）会引发古斯塔夫·施穆勒提出的重大问题。一般说来，正如我们从安达卢西亚的牛肉价格曲线、从维尔茨堡和桑威奇（Sandwich）的在重要性方面并不逊色的牛肉价格曲线（图 24），或从巴黎未出版发行的绵羊价格曲线（依据慈善机构的档案）（图 26）所看到的那样，肉价跟随麦价和【414】其他谷物价格运动。由于对肉的需求少于对小麦的需求，肉价或迟或早跟随麦价运动，但总保持相当的距离。在 16 世纪巴黎的价格曲线中，绵羊的价格始终处于其他所有价格的中间位置，其上涨既不快也不慢。小麦价格的涨速高于羊肉价格，这种情形从维尔茨堡和英格兰的价格曲线亦可以看出。如果我们把麦价和肉价折合白银计量，并对二者做一比较，结果就十分清楚：农业和粮食谷物总是处于主导地位。

有关的例子很多。在施特拉斯堡，黑麦的平均价格从 15 世纪的 100 上涨到 17 世纪的 350，而肉价在同期仅上涨到 250。在杜伊斯堡（Duisberg），从 1485 ~ 1520 年到 1590 ~ 1628 年，黑麦价格上涨了 200%，而牛肉的价格仅上涨 112% ~ 142%。在萨克森（Saxony），从 15 ~ 16 世纪下半叶，黑麦和牛肉的价格分别上涨了 250% 和 150%。毫无疑问，整个演变过程不可能是没有曲折地沿直线发展的。博韦的肉价在 17 世纪头 30 年一路领先，轻微上涨，直到 1630 年左右。此后，它与麦价波动的平均数一致。在德国，由于在严酷的“三十年战争”期间人口下降，曾一度出现了逆转的局面：麦价落在畜产品价格之后。拿维尔茨堡、奥格斯堡和慕尼黑来说，如果我们把 1619 ~ 1624 年（1622 年特殊，不计在内）和 1669 ~ 1673 年这两个五年期做一比较，以前一个五年期的价格（以核算货币表示）为 100，则后一个五年期黑麦价格跌至 25，而肉价停留在 85（慕尼黑和奥格斯堡）和 60（维尔茨堡）。这种情形纯属例外，但延续了很长的时间，这使屠宰场和牲畜交易会又兴旺起来。据法兰克福 1658 年的一份文件记载，“目前市场供应十分充足，顾客挑选自己最喜好的商品是可能的……”。

事实上，欧洲的肉类和畜产品的历史大有文章可做，尽管它极其多样，但仍被逐渐纳入一个共同的发展模式。为此，需要研究食物的历史。直到现

在，食物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只是从未被认真分类、计量或比较的有趣细节的罗列，刚刚开始超越轶闻趣事阶段。一日三餐由什么食物构成？它们的卡路里含量有多少？它们的花费又如何？这些问题，几乎没有人考虑。维托德·库拉（Witold Kula）正在进行一项研究，他的结论是，对18世纪的波兰农民来说，最便宜的卡路里仍然是从粮食烧酒中获取的。我们或许赞同这种饮【415】酒的正当理由，但其仅仅是一个浅薄的玩笑。价格史无疑只能从侧面展现这种“现实主义的”食物史（还刚开头），但它却能触及问题的要害，或者更确切地说，价格史为食物史提供必要的参考材料。我们始终把食物史社会学和生物学方面的材料和这些材料联系起来考察。食物的价格和可供选择的范围是尤其一直困扰人类的日常问题。

2. 除食物之外的商品的价格

至于非食物价格，由于各种原因，我们不得不放弃继续从事系统调查的奢望。首先，除个别例外之外，我们收集到的数据不太精确。石灰按“车”卖，但一车有多少？当精确讨论木料时，可以运用不同的度量衡。至于纺织品，其混乱使任何解释都是枉然。从长期看，纺织品的品种多不胜数，其价格主要受染料和工艺流程的影响。整匹面料的长宽各不相同，即便是众所周知的固定品种也是如此［例如，在波兰出售的粗呢，每匹的长度为32～37埃尔（ells）不等］，甚至当可能根据有确定特征的商标（在莱顿，诸如“单狮牌”、“双狮牌”等等）来识别由这些商标所确指的某些呢绒或丝绸品种时，在全欧洲也从未发现可用于比较研究的面料。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在时尚和公众需求的影响下，纺织技术发生了变化并得到发展。

至于钢、铸铁、铁、铜和其他金属，因为重工业当时尚未建立，所能收集到的价格曲线极其有限。

总之，我们尝试着考察这些不同的经济部门，仅仅是为了满足任何有关价格通史的章节的要求。在每种情况下，我们将努力说明有关资料意味着什么，并着重分析价格的长系列。如果某些产品的数据相对可靠一些，我们就尽可能追溯它们的价格变迁。

（1）一般意义上的建筑。住所牵涉到一系列价格。建造房屋乃至居住其中所要进行的家具购置、取暖和照明——所有这些必然需要使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对于这一大批物品而言，已公布的价格曲线很多，但它们通常缺乏连续性，并且很少能涵盖本文考察的整个时期。许多物品，例如木板条、屋

顶板、石灰、厚木板、托梁，我们对它们确切的重量、尺寸、构成材料乃至产地都充满疑虑。我们正在考察的商品是当地生产的，还是加上了运费的外来物品？所有这些导致了难以解释的价格矛盾。以 1550～1750 年间的波兰为例，“椽子（rafters）”的价格在华沙上涨了 10 倍，但在克拉科夫仅上涨了 5 倍；然而，“木板条（laths）”的表现相反，其价格在华沙从 1 涨到 20，在克拉科夫则从 1 涨到 30。尽管我们由此得不出肯定的结论，但可以说，“木板条”和“椽子”这两个词的含义需要进一步明确。[416]

（2）砖。对于砖，我们能够多列举一些例子。砖（经由木柴烧制）是惟一由我们绘制了曲线图的物品，对其正确性我们并不能肯定，也不指望说服他人相信。在欧洲不同的地方，砖具有可比性，常按千块或百块出售。虽然欧洲以石砌建筑居多，但砖的使用也相当普遍。无论在伦敦、阿姆斯特丹、但泽或巴黎（孚日广场），还是在锡耶纳，几乎到处都有砖房，在路易十三世统治地区（以及亨利四世统治地区），还有在尼德兰，砖石混合建筑十分流行，砖的使用更为普遍。然而，砖太沉重，运输因素对其价格的影响不容忽视。即使是在今天，住在砖窑附近的人买砖也便宜一些。这个因素或许足以解释我们所考察的最可靠曲线中的某些差异（这些曲线已折合白银计量）（见图 27）。

这里总共有 5 条曲线，分别是利沃夫、克拉科夫、维尔茨堡、英格兰和巴伦西亚的曲线。我们还附上了折合白银计量的小麦平均价格曲线，正如前面所言，这条曲线仅供参照之用。

大家可能注意到，除几个例子之外，100 升小麦的价格大致等于 1 000 多块砖的价格（我们可以提供大量的参考数据来支持这个结论）。大家还会看到，砖价大体上随着价格总的上涨而上涨，但比小麦上涨慢。从 16 世纪中叶到 17 世纪中叶，砖价上涨，而在此之前和之后，砖价停滞不前。

我们本可以给出与每一条砖价曲线相应的当地小麦价格曲线或已有的总价格指数曲线，以提供多种参照和比较，但我们满足于指出，从 1450～1750 年，英格兰的总价格指数从 100 上涨到 600，而砖价仅增长到 350。在波兰，价格的涨速与英格兰相同，其间的两次价格下降与 1661～1663 年的货币贬值不期而遇。然而，只有通过利沃夫和克拉科夫之间的详细比较研究，才能说明这两个城市的价格水平差异。

我们随即还应发现，波兰的砖价起初大体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1440～1444 年间，每千块砖在利沃夫的价格是 25.7 克白银，而在英格兰是 77.8 克，在巴伦西亚是 87.81 克。西部地区（巴伦西亚、维尔茨堡、英格兰）

的三条曲线停留在高得多的水平上。如果我们对克拉科夫的价格暴跌不予考虑，那么，只是在 18 世纪，所有曲线才趋于互相靠拢。显然，我们不能对 [417] 这些曲线图提出过多的要求。砖的价格包含一种常见的自然原料价格，也包含劳动力、燃料（通常是木柴，但在尼德兰和英格兰也有煤）价格和运输费用。燃料的费用下降能说明英国以及荷兰砖价的相对下降吗？或者能说明为什么这两个国家用砖铺设街道吗？

(3) 木料。有关木料的数据同样说明不了太多的问题，尽管木料对室内取暖、建房和造船极其重要，尤其是提供了冶金所需的木炭。木料远远超出了家庭需要及其价格的范围，不能把它局限于此处的讨论。

几乎可以断言，直到 18 世纪，甚至直到 19 世纪，存在一个木材时代，木柴是供人类任意使用的主要能源。从 16 世纪开始，是英格兰木材资源的日益匮乏导致其首先转向使用煤炭吗？对此的信念构成了约翰·U·内夫（John U. Nef）关于英国工业化那篇著名论文的基础。

木材也意味着对耕地农业的限制，结果往往是地进林退。“空旷的郊野”和树林之争已历时几百年之久，并且仍继续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发生。面对如此重大的问题，我们注定只能提出尝试性的回答。

我们已绘制了利沃夫、新卡斯蒂利亚、维尔茨堡和伊顿以白银计量的木材价格曲线图，并分别按各自的价格水平高低排列（见图 28）。由于我们一直与“车”打交道，自然就不能精确比较车与车之间的数量了。维尔茨堡和利沃夫的曲线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尽管前者这条属于德国的曲线显示的是 17 世纪大降价的早期征兆（在 1620～1624 年前，而利沃夫直到 17 世纪 50 年代才开始）。然而，波兰的价格有追随德国价格运动模式的倾向。新卡斯蒂利亚的价格曲线不完整，但它显示了西欧长期下降趋势中的下跌特征。最后，伊顿的木材价格自 1600 年开始上涨，到 1650 年后保持在一个高价位。直到 17 世纪中叶为止，英格兰的木炭价格（图 29）比木材价格上涨得更快（我们已讨论过，在英格兰，价格运动基本趋势的逆转要晚一些）。博韦的价格曲线表明，在 17 世纪初期，当地的木材价格连续 30 年急剧上涨（涨速比麦价更显著），此后又随欧洲经济的普遍萧条而回落。但博韦 17 世纪最有趣的事实无疑是在某些地方的重新植树活动。米切尔·德凡兹（Michel Devèze）所做的关于 16 世纪期间巴黎盆地森林状况的广泛研究同样表明，当时森林界线的确定与现在十分相似。汉斯·赫尔穆特·韦希特尔 [418] （Hans Helmut Wächter）则进一步关注东普鲁士（East Prussia）1620～1625 年发生的转折：曾越来越多地使用土地的谷物种植遭受了挫折，远离村庄的

土地被撂荒，作物渐渐局限在优良的土地上种植。小麦的产量同时开始增长并且继续增长，而林地不再受到蚕食。但是，根据我们现有的资料，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单凭掌握的价格曲线来确定耕地和林地的边界这个重大问题的精确界线。

（4）纺织品。纺织品带领我们进入到一个广阔的、复杂的领域，（如果我们不能说是不可能，也是）很难对这个领域进行深入的考察。更加令人遗憾的是，纺织业当时是**主导**产业，无疑会引起那个时期经济的“片面”扩张。它终究会无可争辩地在工业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正如事实所证明的那样，命中注定它的发展要远远超越它所肇始的环境条件。

早在 15 世纪以前，欧洲的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纺织工业。根据不同情况，这些纺织业或者主要满足本地需求，或者主要供外销（有时外销到离产地很远的地方）。接着，纺织业出现生产的集中，从欧洲地图上可看出这种集中的传播过程。16～18 世纪，纺织业的集中继续加强，但其间确实还夹杂着某些并不总是容易说明的调整和变动。在这几个世纪里，再没有别的产业比纺织业更富流动性了，因为纺织业对城乡工人的依赖甚至比对厂房或原料的依赖更强一些。虽然，产业中心的设立地点和不同地区的相对重要性是个大问题，但我们并不特别关注，或者更确切地说，假如价格史能对这个问题提供新的解释，那我们不妨对它做一番考察，但就目前的条件而言，我们无论如何做不到这一点。我们的任务是要通过思考以下三个方面，以试图为一团乱麻般的材料理出一点头绪：首先，是原料；其次，是某些比较知名的成品；最后，是可能的分布范围（对此必须尽可能进行详细的调查）。

纺织品主要的原料有羊毛、棉花、亚麻和大麻。在我们的曲线图上（图 30）给出了以白银计量的每千克原料价格，并根据各自的价格进行了编排：在图的上方，是各种羊毛的价格；往下许多是棉花和亚麻的价格（在 17 世纪末期亚麻的价格水平才和棉花一致）；在图的底部，是大麻以及在阿[419]姆斯特丹被称作“鱼绳麻（paternoster flax）”的特定品种亚麻。当然，由于我们的曲线图所包含的各种国际贸易商品中没有蚕丝，并且没有考虑农民生产的用于家庭和当地消费的产品，它的有效性受到进一步的限制。农民生产的用于家庭和当地消费的产品多半处在货币经济之外，因而不为我们的资料所记载。

我们所挑选的几条用来研究的曲线与长期趋势大体相符。阿姆斯特丹市场上的里加大麻（Riga hemp）的价格运动值得我们注意。很容易看出，除里加大麻的价格回升早些（在 1682 年以前）之外，它的走势和欧洲大陆的

特征曲线一致。而法兰克福的亚麻价格曲线很好地反映出了16世纪的价格上涨。尽管在1750年以后，奥格斯堡的亚麻价格运动出现反常（至少从表面上是如此），但它反映了16世纪和17世纪的趋势（奥格斯堡的亚麻价格更加昂贵，这令人颇为诧异）。就作为欧洲西部特征的18世纪价格上涨而论，里加大麻、阿姆斯特丹的“鱼绳麻”、士麦那（Smyrna）的棉花和塞哥维亚（Segovia）（一种优质羊毛）都跟随着普遍的价格回升运动而变动，不过这确实以里加大麻的遥遥领先开始。

至于各种原料的相对价格差异，应该指出，毫无疑义，西班牙羊毛价格居于首位，且惟有但泽的优质羊毛价格尾随其后，而但泽的普通羊毛价格要低得多。按照约翰·霍顿（John Houghton）的说法，英格兰的羊毛价格更低，但我们注意到，这些羊毛是当地产品（或基本上是），不用负担巨额运输费用。由于同样的原因，亚眠的羊毛价格如果放在曲线图上，会显得很不起眼。

我们绘制的纺织制成品的价格曲线共有5条（图31），分成两组，但不值得我们过分信赖。如果织物的长度以米计量，价格以白银克数计量，我们就可以清楚地显示存在于作为优质产品的英格兰呢绒与生产成本较低的产品——比如粗斜纹布（常常以亚麻纱为经线，以棉纱为纬线）——之间的差别。在法兰克福出售的英格兰红呢绒的价格，在15世纪有所下跌，在16世纪又有所上涨（然而，涨幅中等，在1515～1519年至1600～1604年间，上涨55%），但遗憾的是，我们找不到18世纪初的价格数据。然而，在利沃夫出售的“lunski呢”（也就是“伦敦呢”）是否存在同样的价格运动呢？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但不管怎样，这两条曲线的走势是极其相似的。在17世纪，它们多少显得有些跟随着克尔赛手织粗呢（kersey）的价格运动（该价格曲线令人满意），其形态为从1605～1609年的顶点快速下跌至始于1719年的稳定时期。

在法兰克福，粗斜纹布的价格在1519年后显示出上涨的趋势，接着快速上涨直到16世纪末，其后又继续以非常慢的速度上涨。然而，我们能相信这些吗？倒是英格兰的克尔赛手织粗呢，其价格在18世纪很稳定。我们必须承认，在我们收集的这些资料里还没有非常可靠的东西。我们能否由此假定，纺织品价格比麦价上涨慢而下跌快？如果能得出这个结论，却也十分难得。【420】

我们所描绘的这幅图画缺少关心主要纺织品价格运动的清晰展示，也缺少某些令人信服的材料。但清晰与可信的研究成果尚未问世，目前也不能作

什么指望。相反，我们知道，食物和纺织品的价格运动在短期常常是矛盾的，这种矛盾标志着危机和混乱的发生。总之，关于短期变动，导致了这种矛盾结果的看法是各不相同的，而长期的图景则深藏不露。此外，由于其他商品的价格波动，纺织品的价格运动仅仅只有一种行为模式是值得怀疑的。在这里，我们掌握的材料再一次不允许我们得到明确的结论，但是不管怎样，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其行为模式不是多重的而是单一的。古纳尔·米克维奇（Gunnar Mickwitz）早就注意到，在 16 世纪的里加存在两个市场；一个是价格高的外国纺织品市场；一个是价格低廉的当地乡村生产的纺织品市场。菲利普·吕兹·马丁在其尚未公开发表的最新研究成果中，正确地强调了 16 世纪塞哥维亚（Segovia）和位于拉曼查平原（La Mancha）的昆卡（Cuenca）之间的不同，前者是为通过塞维利亚向新大陆出口而生产高品质呢绒，而后者是为供应当地的市场而生产。这不等于说，普通或中档产品不会销往外地，拿阿拉贡（Aragon）地区农民生产的著名的条纹呢（cordelates）来说，它们就销售到很远的地方。但它们的市场和我们非常熟悉的奢侈品或半奢侈纺织品市场差异很大。实际上，正是便宜的大众产品，我们不容易弄清楚，比如说，阿勒颇（Aleppo）及其邻近村庄生产的粗蓝棉布，据 1687 年的一份文件[①]说，这些粗布通过马赛港进入法国后被做成衣服卖给法国南部的穷人。我们应该把这些衣服想像成现在已过时的家庭妇女围的蓝围裙或今天法国工人的蓝工装吗？在充斥廉价面料的世界，羊毛织物仍然是一种奢侈品。莎士比亚（Shakespeare）不是借法尔斯塔夫（Falstaff）之口，说出对身穿粗棉布或硬麻布的人的鄙视吗？在 18 世纪，莫渥（Moheau）十【421】分欣喜地指出，以往很少使用的粗呢料开始在法国乡村普及。纺织业在 18 世纪、尤其是在 19 世纪取得的决定性、革命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源自大众对其产品连同棉花消费的增长。

大众织物的价格并不像其他织物的价格那样波动。在米兰，可以绘制 1625～1660 年间高级和低级面料各自的价格曲线——后者相当稳定，前者则显著下降。在生活艰难的岁月，譬如在商品短缺或商业危机期间，市场需求倾向于必需品，偏好价格便宜的商品。对于给定的收入，存在沿着无差异曲线的替换。面料越好，收入弹性也越高。因此，在米兰，低等面料的价格保持不变，而优质面料的价格趋于下降。不过，这考虑的还是短期的情形。

---

① 巴黎国家档案馆的《涉外事务》（序列 B），第 3 卷，第 235 页。

但是，这种因素在长期亦有影响。维托德·库拉在他的一篇优秀论文[①]中说，在讨论厄内斯特·拉布鲁斯的某些观点时，他被深深打动，并对上述论断确信不疑。确实，在波兰（无疑在其他国家也是这样），以前的奢侈品逐渐变得越来越接近大众，价格相对来说越来越便宜。那些价格相对而言越来越贵，确切地说，没能变得越来越便宜的反而是生活必需品——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品。在涉及18世纪的欧洲时，必须记住这一点，因为当时奢侈品开始流传，并为中产阶级广为接受。

总之，在现有的纺织品价格曲线中，有助于说明长期趋势的可靠数据寥寥无几。但在各地却有汗牛充栋的文献资料未经整理、研究。或许我们的数据还能够完善和精练；或许除价格问题以外，还能够考察产量问题（对此我们知之甚少）。这些问题，我们以后再谈。最后，我们可能也值得在欧洲范围内跟踪几种已知物品的价格，那各地的观察者一定会注意到距离和运费的影响。这或许意味着需要更多地进行连续考察贸易流和精确辨认各种关于纺织品的研究。这样，才可以说得上是为解决1750年前欧洲最重要的产业部门的价格问题做出了重大贡献。

7.2.3 重工业崛起前的欧洲

如果说，在1750年前欧洲确实存在一个纺织业，也是由于对纺织品的需求量很大的缘故。衣和住是同等重要的必需品，几乎和食一样重要。但在15～18世纪之间，欧洲仍然只能拥有有限的重工业生产能力。只是到了后来，随着煤、焦炭炼铁的兴起和钢铁的大规模使用，发展重工业才有可能，而在对蒸汽机、铁轨、钢铁汽船、机器及其无数零件的需求出现之前，大规模使用钢铁几乎是不可能的。【422】

1750年，这些条件还不具备。我们切莫因矿山、锻造厂或铸造厂的存在而产生太多的错觉。早在乔治·阿格里科拉（Georg Agricola）时代之前，这些行业就从某些了不起的技术成就中获益（诸如矿山坑道中的抽水泵、升降机，粉碎矿石的杵锤，或水车驱动的机器等）。但木料仍是制造这些机器的主要材料，而且，在能量的传送中使用绳索与使用链条同样普遍，例如，在克拉科夫附近的维利奇卡（Wieliczka）盐矿，就使用由椴木纤维编

① 维托德·库拉：《历史与经济：长时段》，载《经济、社会、文明年鉴》（1960年），第306页。

成的绳索（能耐盐的腐蚀）。

然而，矿山和铸造厂的确导致巨大的资本投入、大量的投资和劳动力的集中。在由环境和政府的偏袒所形成的高度垄断的保护之下，这些企业当时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雅各布·富格尔（Jacob Fugger）在蒂罗尔和匈牙利创办铜矿中所表现的过人胆识和辉煌业绩已为世人熟知。1563 年由伊丽莎白（Elizabeth）女王特许在英格兰成立的铜业公司亦如此。而关于这一点，我们就不必再提曼斯菲尔德（Mansfeld）生产的铜行销世界的历史，更不用再提 17 世纪瑞典铜业的成就。约翰·U·内夫在其经典名著中已对"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格兰、尼德兰和瑞典这些在早期具备得天独厚条件的国家发源的经过做了详细的阐述，我们只需对其概述就够了。

但是，这些成就受到欧洲经济活动大环境的限制，某些成就，例如，中欧的矿山，犹如昙花一现。除个别例外之外，锻造厂、铸造厂和矿山的成功往往局限于小企业。从 16 世纪起，法国的锻造厂就属于这种情况。有人试图对其进行全面调查，然而还没有成功。在大炮的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因为铜和锡可铸成各种形状，它们比铁对冶金工业的促进作用更大一些。但在许多情况下，像教堂的钟一样，炮筒的铸造仍以手工方式进行。至少直到 16 世纪早期，才从实心青铜管中开凿出无缝炮筒。在 18 世纪，开凿技术有了进一步的改进。

我们提供的数据多少和上面的概述相符。它们反映了欧洲各地的价格差【423】异及这些重工业产品的价格运动。经济形势无疑对重工业品的价格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不如对食品价格的影响那么明显。

1. 铁（图 6）

这里我们仅有三条铁的价格曲线。亚眠的曲线极好，可惜这第四条曲线太短。[①] 大致说来，所有这些曲线（利沃夫的除外）都随长期趋势大起大落：在维尔茨堡，铁价于 1613～1619 年间达到顶点，但 1680 年又进一步上涨（这是随后的长期趋势的一个早期征兆）；在亚眠，铁价与西欧的总体价格趋势相符；在阿姆斯特丹（瑞典铁的曲线直到 1609 年才开始），铁价在 1750 年以后呈显著的匀速上升（尽管晚了些）；在利沃夫，铁价先是非常缓

① P. 古贝尔，见前引书。我们应该注意到在亚眠出售的小麦和铁的价格在短期的负相关。然而，农民首先是犁铧的主顾。

慢地上涨，随后是短期下跌，再水平延伸到 1661 年，最后于 1718 年开始显著上涨，这种上涨似乎要使其价格接近国际市场水平。

2. 锡（图 6）

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错的案例。尽管我们的数据并非无懈可击，但它已成为一个经典例子。直到 17 世纪末，英格兰锡［主要产自康沃尔郡（Cornwall）和德文郡（Devon）］似乎独占全欧和整个地中海市场，并经由繁荣的东地中海贸易，转销欧洲以外地区。1695 年以后，荷兰人以与暹罗（Siam）的条约确立了对暹罗的生产锡的垄断权。随后，产自亚洲的锡（质量优于英格兰锡）充斥欧洲市场。自 1722 年起，其价格在阿姆斯特丹定期公布。如果锡价均以每百千克锡折合白银数计量，那么，由此得出的曲线使我们可能对各种锡价进行排队（见图 6）：但泽的锡价在 18 世纪早期时最高，但在 18 世纪中叶被阿姆斯特丹的亚洲锡价所超越；在阿姆斯特丹的市场上，英格兰锡最便宜。由于竞争和市场有限（在 17 世纪最后几年以前，市场根本难以扩大），这些曲线明显聚拢在一起，几乎没有大的波动趋势。在 1480~1740 年间，英格兰锡价仅翻了一番。

我们拥有英格兰锡的产量和生产成本数据。虽然在欧洲市场上锡价上涨缓慢，但相反，其所有的生产成本——铁、绳索，尤其是劳动力的食物——的上涨要显得迅捷得多。结果锡的产量受到限制。大约自 1450 年起，英格兰锡的产量开始上升，其后保持稳定大约至 1520 年，接着又显出下降的趋势，只是在 1667 年后才再次增长，并且继续迅速增长，直到 1690 年为止，在这之后增速放慢。我们已经说过，大约在 1480~1740 年间，锡价可能翻了一番，而就锡的产量而言，则在大致相同的时间里翻了两番半。【424】

3. 铜

在日常生活中，铜是铁的竞争对手，又在货币金属中位居第三，我们对铜的价格自然更感兴趣。我们在绘图（图 6）时对这些曲线做了特殊处理，把 1 单位的白银同其等价物进行比较：①以金为等价物（即金银比价）；②以铜为等价物（是以铜计量的银价的倒数）。此外，我们也给出了以白银计量的铜价。我们必须记住，在这种情况下，铜、银比价曲线上升意味着铜的贬值。如此看来，1460 年以后，在维尔茨堡铜急剧贬值。这种早期的通货膨胀是不

是德国所独有的呢？它与15世纪后50年的价格上涨有关吗？这些问题还有待讨论。随着16世纪的来临，铜价急剧上涨（我们仍参考维尔茨堡的数据），如果英格兰和阿姆斯特丹的曲线没有误导我们，那么，就可以看出，此后铜价趋于平稳，市场趋于稳定。因此，铜正在承担起货币金属的作用。

7.2.4 价格指数和工资

从史实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比以前讨论的问题的证据要充分一些，却难以解释得多。实际上，工资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价格。人们用工资回报一个人的努力、工作，此时人们通常很吝啬。在我们考察的这个时期，工资变化相当迟钝，无论是上升还是下降，都运动缓慢。通过把货币工资转换成实际工资，或通过把1单位谷物的价格作为缩减指数（这是威廉·阿贝尔偏爱的方法，但并非他一人使用这种方法），或通过采用生活费用指数［E. H. 费尔普斯·布朗（E. H. Phelps Brown）和歇拉·霍普金斯（Sheila Hopkins）已计算出了一种消费品综合指数］，我们就能够从货币工资和生活费用之间的差距中看出工资运动的特点。

但是，没有一种方法是完美无缺的，即使把一种方法和另一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也并不能消除各自的缺点。假设1510年在巴黎地区的一位工人因他在1 arpent（约2.5英亩）葡萄园的劳作而挣得10图尔里佛，但在价格上涨不断累积的情况面前，这笔钱值多少？他能用来购买哪些物品？查理·维尔兰登（Charles Verlinden）[1] 诙谐但有些草率地说，他设法用这笔钱活命，必要时，他购买便宜货，以应付生活费用的上涨。维尔兰登接着说，如果不是这样，挣工资的人肯定都已离开尘世。但这确实是事实，并且事情的发生具有人们不能忽视的规律性：经济危机和人口危机从来就离得不太远，【425】常常是“死亡来清账（death settled the score）”。假如某人的确活了下来，他如何“设法活命”？他如何通过控制其欲望、购买、节省和奢侈程度来使其工资满足现实需要且与时升时降的实际生活水平相符？即使在今天，生活费用也难以衡量；在同时代的人都颇费踌躇的场合，即使拥有全部统计工具的历史学家，在不完全信息面前又能有何作为呢？

我们知道，工资运动的原始资料不如价格的原始资料那样易于分析和有

---

① C. 维尔兰登、J. 克瑞贝克斯（J. Craeybeckx）、E. 史科里尔斯（E. Schouiers）：《16世纪比利时的价格运动和工资》，载《经济、社会、文明年鉴》（1955年）。

助益。工资的数据并不总是让人相信。更有甚者，我们很难把货币工资和工资分得一清二楚，在以物易物的经济里，工资多半以物结算，很少有工资完全以货币支付。在这方面，我们始终只能找到几个有用的例子，而且一般是在建筑业中寻找。由于在漫长的冬季，活儿不多，又有经常发生的殃及建筑业的危机，如果泥瓦匠及其帮工一年到头都有活干，那么，他们的确够幸运的。因此，很多事情还是让人疑窦丛生。

如同对基奥贾做的广泛调查那样，针对各种服务的费用做出调查也是可能做到的，例如调查碾磨一定数量小麦的费用，或在可比条件下运送确定数量的谷物至市属谷仓（the Fondaco）的费用。然而，要了解这些服务，却难上加难，而且在每一种情况下又都有情有可原的情形。因此，所获资料与我们研究的关联程度取决于资料所属的特定地区、时期以及资料的建档方式。尽管我们知道工资率，但不知道工作的天数——知道了工作的天数，也就知道了失业水平。正是因为人们当时对按照钟点有规律地工作的观念并不了解，或者几乎一无所知，在从前工业经济下的生活常规向机器时代所要求的规律性的转型中，人们感到很难适应。除歇工和公共假日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因经济状况或工人自己一时冲动的失业，或者用更确切的术语说，就是向后弯曲的劳动供给曲线。因此，在某个时候，当实际工资率下降时，人们做的工作比实际工资率上升时所做的工作要多，这或许意味着实际人均收入相对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简化的计算不再具有其最初的价值。而某些种类的账目令人极不满意。奥码尔·卢特菲·巴肯（Ömer Lutfi Barkan）刚刚指导了对建造伊斯坦布尔（Constantinople）苏莱曼清真寺（the Suleiman mosque）的账目的仔细研究。建筑工地上工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流动性极大。只有不断招聘新人才可能填补缺额，并且试图增加人手以满足最繁忙时的需要。在休息日星期五过后，星期六是发工资的日子，这天工人人数最多，但下周一开始，工人人数又降了下来，又不得不雇用新手。然而，诸如此类的循环往复使我们难以估算每个工人的平均收入，并且，我们决不清楚，这种工人出工时断时续的制度是不是普遍存在的。【426】

而且，就我们目前的知识水平而言，不可能测算某个国家在过去某个确定时期的典型预算和衣食住的平均开支。显然，只有联系工资必须满足或应该满足的需求，才能对工资率进行研究。E. H. 费尔普斯·布朗和歇拉·霍普金斯以一种武断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已建立了过去7个世纪英格兰的个人消费模型，在这个模型里，各种开销的比例是固定的（食品80%、取暖和照明7.5%、纺织品12.5%）。既然人的需求，即使简化为平均数，

也确实随时间和地点而变，因此，这个模型显然是一种简化。然而，简化是必要的，于是我们假定这个对消费模式的综合估计是有充分根据的，并且假定我们能把它分割成等额的日常开支（然而，这个假定比前一个假定更难接受）。在我们做出这些让步之后，他们所采用的“消费品篮子（the basket of consumables）”就相当清晰地显露出来：消费者每天往这个篮子里放入“淀粉类”食物（包括各种谷物、面包和各种豆子）、肉和鱼、奶制品和饮料、照明用的油、燃料、衣料等等，以满足他的需要。事实上，这个篮子不过是通过计算总指数来跟踪生活费用变化的一种方法，它的确切内容如脚注中所给出。[①] 作为计算总指数的一种方法，和任何其他方法相比，这种方法既有优点又有缺点。

因此，利用这种方法，E. H. 费尔普斯・布朗和歇拉・霍普金斯已能够【427】完成整个一连串的计算。他们首先为这个“篮子”中的各种物品分别绘制价格曲线，又通过给每一种物品分别分派权数，计算出一整篮子消费品的综合价格曲线。接着，他们利用这条生活费用曲线来衡量工资。这样，如果把1451～1475 年定为基期，其生活费用综合指数为 100，那么 1571 年英格兰实际工资就由指数 63 来表示，或者说，几乎是最初那个篮子的 2/3。就这样，他们借助一个固定的消费单元（a fixed unit of consumption）缩减了我们的工资曲线。在图 32 中，以上的说明变得清晰起来，通过这张图读者可以领会它们的全部含义。

我们利用 E. H. 费尔普斯・布朗和歇拉・霍普金斯的估测，就可以得到巴伦西亚、维也纳、奥格斯堡、阿尔萨斯和英格兰这几个样本的曲线。这些用同一种方法统一起来的曲线无可争辩地表明，当联系消费单元考虑时，挣工资者的实际工资率下降了。虽然名义工资每次至少能跟上工业品价格运动的步伐，但无论在哪儿，用我们的方法来衡量，实际工资都下降 50% 以上。随着 17 世纪后半叶的来临，情况开始慢慢好转。但这种好转是否在更大程

① 本计算中所采用的家庭开支的分配情况如下：

	%
淀粉类食品	20
肉和鱼	25
黄油和奶酪	12.5
饮料（麦芽威士忌、啤酒花、糖、茶）	22.5
小计（食品）	80
取暖和照明	7.5
纺织品	12.5
总计	100

E. H. 费尔普斯・布朗和歇拉・霍普金斯：《7 个世纪里消费品价格与建筑工人工资率的比较》，载《经济学家》（1956 年）。

度上是表面上的？这是另一个问题。

这种实际工资率的暴跌恰好与16世纪的物价暴涨相对应，它们共同导致了工作时间更长、生活更艰难、贫困化更严重和大多数人情绪低落。当时的人常常能感觉到生活正在恶化。在诺曼底（Normandy），古贝尔维尔先生（the sieur de Gouberville）1560年在日记中写道："先父在世时，家中每天都有肉吃，食物十分丰盛，喝葡萄酒就像喝水一样。但到了今天，一切都变了，百物昂贵……最富裕农民的食物也远不如过去的仆人。"

我们且再来看看费尔普斯·布朗提供的曲线。在英格兰，生活状况的恶化一直延续到1610～1614年，其后出现过缓慢的、小幅度但不间断的改善，直到18世纪中叶为止。在维也纳，16世纪后半叶生活水平突然下降，接着又有所回升。在17世纪早期以前，其生活水平的下降和英格兰大体相同。此后，生活水平第一次出现极其缓慢的改善，但好景并未超过17世纪80年代。后来再一次出现了急剧的下降，接着又开始回升。

以上的内容或许有待说明和补充。由于结论是无可争辩的，这种补充说明工作就十分容易。我们可以中肯地指出，这些结论和威尔汉姆·阿贝尔得出的结论十分吻合。威尔汉姆·阿贝尔的结论与哥廷根（Göttingen）有关。哥廷根因其大学闻名遐迩，其实不过是个小城镇。威廉·阿贝尔绘制的曲线显示了整4个世纪期间哥廷根一名砍柴工砍一捆（或"Klafter"）木柴的收入情况。尽管他把砍柴收入简化成相等数量的黑麦的做法我们不能没有保留地全盘接受，但其结论却几乎与用复杂得多的指数法得出的结论相同。总之，根据对哥廷根砍柴工劳动收入和黑麦价格的估计，可以看出，在1475年到1580～1590年间，实际工资迅速下降，随后又有所回升，但相当缓慢和无常。 [428]

我们的最后一次检验，尽管有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但仍十分精彩，它涉及17世纪的博韦及其邻近地区。皮埃尔·古贝尔最近的研究[①]涉及从1630～1730年长达100年的"B时期"（这是借用弗朗索瓦·西米昂的说法，至少法国的经济史家对此很熟悉）。这意味着长达100年的衰退。前一个100年不断上涨的价格在1630～1637年间、最迟在1650年陆续地停顿下来，但直到1662年后，价格的全面下降才十分明显。在这个价格逐渐下降罕见的100年期间，价格运动方向的逆转是一个缓慢的、不间断的过程，这并不使我们感到惊奇。由于货币工资相对稳定，实际工资持续的、但非常缓慢的上涨就变得势不可挡。这在刚开始时对大多数挣工资者有利。赶上好年

① P. 古贝尔，见前引书。

景，由于物价下跌，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趋于上升。但毕竟还有灾年，百物腾贵，死亡率极高。简单地说，结果是短期运动常常足以使长期运动中正在改善的状况彻底逆转。这也是皮埃尔·古贝尔在思考博韦地区的情况时所得出的结论。但勒内·巴雷尔（René Baehrel）在谈及普罗旺斯时并没有如此悲观。然而要结束对此问题的争论，并无可能，我们也不能存什么幻想。从15 世纪晚期直到 18 世纪初期，欧洲的生活水平逐渐下降。如果有可能，对在此之前的 14 世纪和 15 世纪的情况进行认真的分析或许是很有趣的。大体上说，这两个世纪的情况要好一些。是否真如许多优秀的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在我们已提到但未说明其来龙去脉的反复发生的暴乱之前，正值劳动者的黄金时代？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随后的 16 世纪及 17 世纪早期的确就是一个贫困的时代。

我们现在来结束对长期趋势的探讨。关于长期趋势，我们已花了很长的篇幅，但是，我们还只是刚刚开始勾勒其宏大运动的轮廓。我们仅仅详细考察了小麦这个最重要证据以及可铸硬币的金银。这限制了我们的调查范围，【429】使我们的结论一开始就局限在传统解释的框架之内。勒内·巴雷尔认为，以各种形态出现的货币不过是披在真实的经济运动身上的一件面纱。对此，我们不敢苟同，但我们赞同他的另一个观点，即通货不是一切，只有名义价格才有权被称为真实价格。

把名义价格折合成金、银改变了名义价格，更确切地说是使其符合了某种特定类型的解释。虽然在长时段（或短时段）中理解金、银、小麦、工资等这些我们已考察过的项目存在或大或小的困难，但是，只有当我们再一次把它们和其他价格相比较时，它们才有价值。我们在衡量它们时，必须联系商品和稳定的收支流量等经济现实。勒内·巴雷尔关于 16 ~ 18 世纪下普罗旺斯（Lower Provence）的那篇有重大突破的论文正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一种尝试。到目前为止，我们仍不能确定这篇论文的结论的有效性，但其目标无疑是正确的。

7.3 短期波动：周期及周期性运动

除长期趋势之外，人们还能清楚地看出一系列的短期波动。这些短期波动各有自己的名称、表象和内涵。最长的一种波动，持续时间大约 50 年，称

做康德拉捷夫周期（the Kondratieff cycle）［不久前，加斯东·安贝尔（Gaston lmbert）曾就此问题撰写了一部好书］。接着，根据持续时间由长到短的顺序，依次有：约20年的超周期（the hypercycle）；15年的厄内斯特·拉布鲁斯**间周期**（intercycle）；常常以克莱芒特·朱格拉（clement Juglar）的名字命名的朱格拉周期，持续8～10年，有时年限不足，但很少超过；最后是基钦周期（the Kitchin cycle），历时最短（约40个月）。除基钦周期以外，还有季节运动，历时不到1年，人们只是一笔带过，几乎从不专门进行研究。

由于**周期**一词可用于分析季节运动，我们不应因此而误入歧途；该词无非指一升一降的双重运动，而在两种运动之间有一个顶点，从该词最严格的意义上说，称为**危机**。虽然“危机”一词在每一种语言中都有宽泛地使用的倾向，但我们在此处仍试图限制其含义：危机是破裂、间断、瞬间。

显然，这些周期的命名是暂时的，以后将逐步被修正。确实，在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中，每一种周期都各有其拥护者和反对者。但这种看法上的不 [430] 同与其说是因为学者们好争论，不如说是因为观察到的现实是根本不同的。从美国经济到欧洲经济，或者从现代经济到前工业化经济和历史悠久受人推崇的农业经济，周期的概念怎能以同样的面目出现呢？根据观察的时期不同，总有一种周期凸现出来，占据主导地位，并且这些周期常常相互重叠……。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不完整的周期系列。根据长期趋势是处于上升阶段还是下降阶段，这些周期的先后顺序不同。此外，根据各周期在长期趋势或康德拉捷夫长周期的运动方向上是否势均力敌，它们的先后顺序也不同。总之，由于所处环境不同，每种周期或者逐渐淡化，或者变得突出。经济形势并不自动以这样的方式来整理周期：2个或3个基钦周期构成1个朱格拉周期；2个朱格拉周期构成1个超周期；2个超周期构成1个康德拉捷夫周期……。在实际生活中，任何这样的周期合成都是不存在的。

在长期趋势内，各种周期之间的相互影响决定了一系列的作用和反作用，这些作用和反作用会完全打乱单个的周期运动，往往改变的是其持续的时间。在法国，1778～1791年的厄内斯特·拉布鲁斯间周期表明，两个振幅不同的周期能够以一个周期的一半运动和另一个周期的全部运动合并在一起的方式实现局部融合。

但是，无论它们多么不规则，这些周期混合在一起，也形成了一种**大体上具有周期性的节奏**，就像是经济活动的呼吸。经济学家趋于在这个基本点上达成共识：与经济学和经济计划的本意一致，应给予历史的数学或准数学公式更多关注。

鉴于这种考虑，我们和布尔机器公司（the Compagnie des Machines Bull）的计算中心合作，对乌迪内从 1586 ~ 1796 年每月的谷物价格进行了一系列的计算，作为前面提到的研究的一部分。借助计算机来完成大量的复杂运算，以便在连续的相关关系中凸现出周期性。最后，我们得到了相关系【431】数，连同最低限度的说明，我们在图 18 中给出。[①]不管怎样，大致的结论是

① 在乌迪内（1586 ~ 1797 年），小麦和玉米月度价格系列相关关系的统计显著性迅速降低，但后者的下降速度（每两年降低 0.5）不如前者（每年降低 0.5）快。然而，在小麦的情形下周期运动更加显著。对此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小麦是上等商品，具有较好的收入弹性，在国际贸易中的销路也更广。而玉米在我们所研究的时期逐渐成为一种主食。在经过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相当于一个 21 年的周期）后，两个系列的相关关系的显著性再次降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不考虑这种显著性变动与超周期或长建筑周期（the long building-cycle）有近似相合的特点。尽管如此，由于这些相关系数是如此之低，因而不允许我们给出一个清晰的解释。小麦和玉米每隔 1 年的有关数据如下：

按月计算的时间周期	相关系数		月份	相关系数	
	小麦	玉米		小麦	玉米
1	0.96	0.97	361	0.12	0.20
13	0.53	0.70	373	0.13	0.20
25	0.33	0.48	385	0.11	0.14
37	0.32	0.38	397	0.17	0.10
49	0.33	0.35	409	0.13	0.11
61	0.32	0.36	421	0.08	0.11
73	0.33	0.39	433	0.06	0.07
85	0.36	0.40	445	0.05	0.07
97	0.39	0.32	457	0.04	0.03
109	0.29	0.19	469	-0.01	-0.03
121	0.30	0.18	481	-0.08	-0.06
133	0.30	0.21	493	0.05	-0.03
145	0.27	0.20	505	0.13	-0.01
157	0.24	0.21	517	0.10	-0.03
169	0.34	0.26	529	0.13	-0.03
181	0.33	0.29	541	0.12	-0.05
193	0.28	0.27	553	0.08	-0.04
205	0.25	0.24	565	0.04	-0.01
217	0.30	0.24	577	0.01	0.05
229	0.34	0.29	589	0.06	0.07
241	0.33	0.31	601	0.05	-0.01
253	0.34	0.33	613	-0.05	-0.06
265	0.29	0.31	625	-0.06	-0.06
277	0.26	0.27	637	-0.01	-0.04
289	0.26	0.20	649	0.02	-0.04
301	0.24	0.15	661	0.04	-0.04
313	0.20	0.13	673	0.03	-0.03
325	0.18	0.16	685	-0.03	-0.03
337	0.12	0.17	697	-0.002	-0.06
349	0.13	0.18	709	-0.01	-0.09
			721	-0.06	-0.12

清楚的：在长达200年的历史长河中，贯穿着一连串的周期及其重复。而J.海尔费里希（J. Helferich）在其1843年的开拓性著作中也已经提出了这一点。

在贝弗里奇勋爵有关价格的早期研究中，这些快慢不一的节奏和反复曾引起了他的兴趣。通过计算，他发现一些极其相似的现象每隔15年重复出现。可见贝弗里奇勋爵很早就注意到了周期性波动。不久前，皮埃尔·古贝尔开始研究这些重复，使我们能重温历史上的好时光以及坏日子。他发现，在博韦，每隔30年便会出现一次粮食歉收（1597年、1630年、1661年、1691～1693年、1725年……）。因此，他问道："这意味着存在太阳周期吗？"在这里，他指的是斯坦里·杰冯（Stanley Jovons）一个世纪前提出的，但直到不久前才被学术界认同的太阳黑子周期论。为什么我们不能认为太阳周期对农业生活（农业生活本来就比工业活动更易于波动）可能有影响呢？【432】无论怎样，为什么我们不愿意考虑这个想法呢？

7.3.1　季节运动

让我们从最短的周期运动开始。由于季节运动是可以预报的，统计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习惯于把它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无论你在什么地方观察，季节运动几乎都是确定的。在1843年，经济学家威廉·罗雪尔（Wilhelm Roscher）写道："谷物价格（不论年景如何）总是在10月、11月和12月最低，开春后价格逐渐上涨，在4月、5月、6月和7月价格最高。"只是到了19世纪，才有来自阿根廷、智利和澳大利亚的第二次收成在欧洲上市，这是由于南半球的季节恰好与北半球相反的缘故。根据对季节运动的定义，现有的对季节运动的调查不超过18世纪中叶，而我们在操作上还可能忽略由单纯的季节运动所引起的谷物和其他农产品的价格变化，而设想季节运动总是包含在历时更久的周期运动之中。

尽管如此，季节运动还是存在。在乌迪内，从小麦到黑麦、玉米和其他谷物以及各种豆子的每次收获都意味着价格的突然变化。无论这种价格变化是否很快被平息，对那些生活遵从短期时间间隔长度上的社会模式与社会常规的人们来说，它们就显得既重要又急迫。如果掌握了每天、每周或每月的市场行情，人们就能发现，季节运动还会扮演重要的角色。当我们仅考虑季节运动时（见图13），1676～1683年间的乌迪内就有这方面的例子，它表明季节节奏时常出现。我们可以想像，在物质匮乏的异常年代，对每天只能

量入为出并且承受了价格波动的全部压力的绝大多数穷人来说，在 17 世纪中叶，小麦价格在大约几个月的时间内从 14.30 里拉变为 32 里拉的后果是什么。

我们知道，只有当我们掌握了同期谷物的储备情况，才能完全清楚地揭示谷物价格的季节运动。正如我们在基奥贾所看到的，富人从冬季开始，就随时打探对来年收成的预期，并做出相应的谷物储备；政府也要储备谷物，以阻止投机性的超量购买，并防备饥荒的出现。

有人会说，我们选择的例子是季节运动特别明显的情况，这无疑是正确的。更多的时候季节运动不那么明显。情况到底如何，都取决于当时主要的【433】价格周期，正是它促使季节运动的内在节奏得以形成。

7.3.2 有无基钦周期？

基钦周期或许仅仅只是影响现代经济的一种周期，尤其是美国经济具有的特色。它似乎在不久前（20 世纪）才从新大陆抵达欧洲，甚至比马铃薯叶蚺传入欧洲还晚一些。有时，有人还说，历时 40 个月的基钦周期是现在人们越来越相信的太阳周期（历时 10 年）的 1/3，它尤其反映了商品的运动。

只是，重提这些对基钦周期的限制条件是具有合理意义的。我们考察了我们所掌握的月度价格曲线，以观看是否能从其中辨认出某种基钦周期类型的短期节奏。然而，这不是第一次尝试，因为皮埃尔·谢努毫不含糊地指出，他在 16 世纪塞维利亚跨大西洋的贸易曲线中发现了基钦周期。当乌迪内的价格曲线用于研究系列的相关关系时也显示出周期性的重复；直接观察这条曲线，我们很容易**在某些时期**区分出一系列历时 3～4 年的短周期。[①]这些短周期似乎总是偶然的、分散的，一旦有其他运动加在它们之上，它们立即就烟消云散。根据我们的观察，我们至多可以推断出，短基钦周期主要在相对平稳的时期中得以显示出来。一旦较长期波动变得可观一些（它们能变得极其剧烈），短期变化就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例如，在迪克斯迈德（Diksmuide 或 Dixmude）（也可能还有基奥贾）15 世纪的价格曲线上，短期波动表现相当明显。乌迪内 1628 年以后的曲线也是同样情形，我们可以看

① 在乌迪内的曲线上，尽管存在干扰，但通过平均时间间隔，可以合理地推断出存在一个长度略低于 39 个月的周期。

到一系列的小波动。

在混杂不清的运动中辨认出令人难以捉摸的短周期肯定是经济学家感兴趣的事。对历史学家来说，基钦周期显然是时隐时现的，其影响也不如长建筑周期，即朱格拉周期那么重要，而朱格拉周期几乎吸引了历史学家全部的注意力。

7.3.3 朱格拉周期、拉布鲁斯间周期、巴雷尔四倍周期、康德拉捷夫周期

在10年内周期（intradecennial cycle）的影响下，价格曲线呈现显著的、“结构性的”重复，特别是在我们掌握有逐月的价格数据（这些数据并不是必不可少的，但非常令人称心如意）的时候。这些10年内周期相当于2～3个基钦周期，并且其长度似乎都不超过10年。【434】

在考察1500～1650年间塞维利亚的贸易周期时，皮埃尔·谢努曾提及长达11年的朱格拉周期，但应该指出的是，他谈论的是航海贸易问题，而非价格周期问题。如果把巴黎、博韦、下普罗旺斯、乌迪内和锡耶纳的贸易曲线放在一起，计算这些周期的长度的算术平均数，那么，计算出的平均数大约是7.5年（见表36）。

表36　　贸易周期长度的算术平均数

地　　点	自（年）	至（年）	周期数（个）	平均长度（年）
艾克斯（R. 巴雷尔）	1588	1733	18	8.06
博韦（P. 古贝尔）	1588～1589	1727～1728	20	6.95
巴黎(H. 霍舍和J. 默弗雷)	1588	1728	17	8.24
锡耶纳（G. 帕朗蒂）	1588	1727	19	7.31
乌迪内（R. 罗马诺、F. C. 史布勒、U. 图西）	1588	1728	19	7.36
总平均数（年）				7.58

给出这张表不是为了确定一个尺度（存在一个单一的尺度吗?），而宁可说是为了指出一个数量级以供参考。

但是，如何最好地计量这些周期？应选用什么单位？像皮埃尔·古贝

尔那样，比较审慎的历史学家坚持以朱格拉周期为计算单位，而且仅以其为单位，只是偶尔建议采用更长的计算单位，或者把几个周期合并计算（这其实是换汤不换药）。另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波是一个接一个地往前传播的，有些运动方向一致，有些运动方向相反，它们的运动是相互叠加的。想像继一个起伏不甚显著的周期（但它还是有一个长的上升期和一个短的下降期，下降幅度并未增大）之后，出现了一个处在长长的显著上升期的周期，这时人们肯定有冲动把第一个周期的整个部分叠加到第二个周期的上升期上，并且会一直叠加到后者的危机点——整个周期运动的顶点为止。

然而，实例总是比一般性解释更有说服力。下面我们就来考察巴黎的小麦价格曲线（见图 12），它提供了一个拉布鲁斯间周期的经典例子。这条曲线显示，小麦价格从周期的最高点指数 420（以 1610～1616 年为基数 100）回落到 1593～1594 年的最低点 173。我们把随后的周期连接到这个周期上，而随后的周期在 1596～1597 年达到约 201 的最高水平，然后，在 1601～1602 年以最低点 79 结束。这样就呈现出一个历时 11 年的间周期，这个间周期以价格下降为特征，其下降趋势只是在 1595～1597 年前后受到小小的阻碍。从重要的方面来看，这 11 年无疑具有某种一体性。像 1778～1791 年的间周期（厄内斯特·拉布鲁斯的经典名著以此为基础）那样，以 11 年为单位或时段具有对多次重复的协调效应敏感的优点。不仅如此，它还扩展了周期分析的范围，使其能够表现上升或者下降的交替活动。这与其说是统计分析的花招，还不如说是观察在更有力的长波作用下周期出现畸变的一个方法。【435】

然而，把上述的方法进一步扩展显然是可行的。在我们上面的做法中，我们本可以把 1588～1593 年的周期上升部分连接到 1590～1602 年的“拉布鲁斯”周期上，从而实现两个周期的组合：一个周期快速上升（1588～1593 年），而另一个周期因后劲不足而显得有气无力（1593～1602 年）。不用说，这种组合实际上很牵强。这个历时 14 年的长周期（双周期）并不真是一个整体，对试图发现一个惟一的单位或时段的历史学家来说，它几乎引不起兴趣，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就应该提到。在我们看来，只有当两个前后相继的周期连接起来，中间不存在太长的间断，并且合成或是几乎合成为一个单一的运动的时候，才存在一个起作用的超周期（之所以如此称呼，是为了把**长周期**同康德拉捷夫周期区分开）。总之，这两个周期必须结合成一个紧密的整体，从而以一个长节奏取代通常的节奏。即使如此，把两个前后

相继的周期成双结对，也没有多少好处。如果我们把加斯东·安贝尔关于17世纪法国的曲线同皮埃尔·古贝尔关于博韦的曲线进行比较，我们很容易发现，尽管前者采用了超周期，但它并没有为提供一张试图对其做出解释的历史学家提供出令人感兴趣的年表。

然而，对于双超周期（the double hypercycle），即勒内·巴雷尔的4倍周期，却不能这么说。为了使问题简化，勒内·巴雷尔有意从名义价格出发；由于擅长严格的统计分析，他计算出了代表长期趋势的线性回归方程。勒内·巴雷尔的方法，自有其道理。他每次都把几个周期连接起来，如何连接取决于这几个周期是否具有上升、停滞或下降的趋势。这样，若干30年的时段就摆在我们面前，这些时段照例都聚集着4个普通周期。我们应认真留意的是，这4个普通周期都是合逻辑地聚集在一起的，由于有相同的趋势，它们的波动起伏是一致的。这些时段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包含更大范围经济活动的时间单位。因此，对下普罗旺斯来说，1594～1625年的时段（下降阶段）聚集着4个周期：1594～1602年的周期、1602～1610年的周期、1610～1617年的周期、1617～1625年的周期。随后出现的1625～1655年（上升阶段）、1655～1689年（下降阶段）和1689～1725年（上升阶段）这几个时段同样如此。

这种规律性并不是利用某些统计技巧的结果，而是来自简单的相加。确实存在处在同样方向的周期组，这正是勒内·巴雷尔的解释与厄内斯特·拉布鲁斯的解释不谋而合的原因。但为了寻找真实的解释，我们必须超越周期 [436] 的局限。弗朗索瓦·西米昂采用划分“A阶段”和“B阶段”的方法，就是在此方面的努力。勒内·巴雷尔在认真思考之后，不但接受了西米昂的方法，而且还使康德拉捷夫周期的概念重新流行起来。勒内·巴雷尔的价格曲线30年上升，接着30年下降，它不会有什么错误，也与康德拉捷夫运动的模式相一致。康德拉捷夫通过19世纪的价格运动观察到了这些双重运动。勒内·巴雷尔从对价格数据的直接观察出发，发现这些双重运动在16世纪初就已存在，而且无疑它们存在的时间要更早一些。加斯东·安贝尔就1339～1389年间或1420～1470年间法国的情形绘制的曲线图难道不是显示出他也同样观察到了类似运动吗？

7.3.4　周期的和超出周期的解释

因此，便有了许多周期系列，它们构成如此多可行单元（compart-

ment），或者说，如此多可以进行解释的框架。然而，如何解释长期趋势已是一个可能引起争议的话题，如果再加上长短不一的周期，争论便没完没了，更不用提是短周期决定长周期，还是长周期决定短周期这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了。周期不论长短，人们都能轻松地装扮它们，使它们能与相关的"事件"相符，这样，不论是作为原因还是作为结果，它们都悄无声息地走进了政治、社会或经济的历史。

如果不依靠具有长、短周期的价格运动，那么，不论是从政治、社会还是从人口统计的角度从事经济研究，都将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为了用一种运动去说明另一种运动，也不必非把这两种运动弄到一块不可。无论如何，只有在核实了局部运动和整个欧洲的形势之间的明显差异之后，才可能接受任何由某些**局部**现象对周期性运动的解释。例如，就法国而言，谈论"胡格诺运动的周期"或"投石党运动（the Fronde）的周期"，就等于认定在此期间的价格波动完全由当时法国的政治形势决定。然而，在投石党运动时期，在法国以外的欧洲其他地方价格也在上涨，而且意大利和波兰的价格上涨比法国还要剧烈得多。

难道我们总是很便利地从中推论，战争就是永远起作用的"原因"吗？加斯东·安贝尔认为，战争应该为经常发生的通货膨胀负责，例如在阿赞库尔（Agincourt）或罗克鲁瓦（Rocroy）战争期间的通货膨胀。在每次破坏严重的战争之后，人们都可能重建家园，因而出现"建设繁荣（building booms)"。这样看来，战争似乎成了领路人，正如人们常言，"制造一切（bellum omnium pater)"。不过，这种看法忽略了战争能够像成为周期的原因那样容易地成为周期结果的可能性。有时战争甚至可能完全置身于周期运动之外。[437] 勒内·巴雷尔在对17世纪和18世纪普罗旺斯的战争和价格做了详尽的研究之后，赞同这后一种最终的论断。

最后，如果一个价格周期总是不足以由局部的因素来说明，那么，当它在时间上被隔离开的时候，就更不能被解释清楚。一个价格周期只有和其前后的周期联系起来，才能得到说明。

我们所需要的，不仅是对整个欧洲的价格周期进行比较研究，而且是进一步分析不同周期的类型。我们必须继续从事弗朗索瓦·西米昂探索新知识领域的工作，以促进由厄内斯特·拉布鲁斯或勒内·巴雷尔所开创的事业的发展。

7.3.5　投石党运动和奥利弗·克伦威尔统治期间的整个欧洲

尽管在经济结构和长期演变的方式方面，欧洲具有多样性，但是就经济的国际化而论，欧洲具有相当大程度的一体性。看来我们似乎必须接受厄内斯特·拉布鲁斯、皮埃尔·谢努和勒内·巴雷尔权威而又正确的观点，他们以其经济节奏［或如恩斯特·瓦杰曼所说的“经济发展趋势（*Konjunktur*）”］对照于经济结构以说明经济过程。从欧洲的一端到另一端，所有事情的协调一致，与其说是由于受到一根指挥棒的指挥，还不如说是由于这种经济节奏中每每都存在一次持续的冲击——当时主要来自农业生产。这种冲击迅速在整个欧洲引起反响，尽管欧洲不同地区因其独特的历史和结构而对这种冲击回应的方式不同。因此，虽然可以勾勒出长期趋势的轮廓，但要描述欧洲的经济活动却需要更加精确的实证材料。像厄内斯特·拉布鲁斯那样，利用每月的价格数据，甚至最好是采用每周的或每日的价格数据，重新考察那些引起争议的问题，也是可能做到这种描述的。在历史科学中，认识的进步往往（如果不是总是）取决于计量精确度的改进。在法国的情形下，周期波动是由精确计量的数据得出的。

我们能够就 17 世纪中叶［当时法国处在投石党运动时期，英国处在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统治时期］波及整个欧洲的周期运动对此种描述进行简捷的论证。我们没有任何先入为主的理由，一定要选用这个极好的例子，正如所显示的那样，还有其他的例子，但这个例子就已能够使我们做出精确的比较分析。我们不妨把具有价格差异的欧洲想像成有波浪和潜流的大海。在 17 世纪中叶，通过确定和比较某些波浪和潜流的规模和强度，我们就能够精确地对它们进行计量。下面的日程表更详细地显示了这一点：　【438】

表 37　　显示欧洲周期性价格运动的日程表

周　期				1						2						3					
	一期波谷			一期波峰			二期波谷			二期波峰			三期波谷			三期波峰			四期波谷		
	年	季	百分比	年	季	百分比	年	季	百分比	年	季	百分比	年	季	百分比	年	季	百分比	年	季	百分比
博韦	1640	1	100	1643	2	190.13	1646	2	83.20	1650	1	296.80	1650	4	185.87	1652	2	274.13	1657	1	100
巴黎	1639	4	100	1643	2	298.80	1646	2	88.10	1649	4	285.10	1650	4	191.75	1652	3	305.34	1657	1	107.40
罗宰昂布里	1640	1	100	1643	4	236.11	1646	3	94.44	1649	4	347.22	1650	4	236.11	1651	4	361.11	1657	1	114.58
锡耶纳	1640	2	100	1644	2	207.86	1645	1	181.78	1649	2	436.61	1651	4	183.71	1653	2	331.09	1660	1	118.95
乌迪内	1640	3	100	1643	4	233.77	1646	3	148.77	1650	2	507.50	1654	3	153.82	1656	4	265.37	1659	3	136.51
利沃夫(燕麦)	*1641*	*1*	*100*	1642	3	191.67	1643	1	122.22	1651	3	1 061.11	1655	*1*	333.33	1657	3	916.67	1659	*1*	263.89

【439】

我们绘制的地图和坐标图的混合图（图 17）突出显现了 1640～1660 年间席卷整个欧洲的前后相继的三个价格周期；实际上，这些周期现象不能用局部的因素来解释。我们从图中还可以看到，这些周期波动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差异，如果按时间顺序排列，相对来说并不大。精确计量这些差异——有时落在平均差异之后，其他时候则走在平均差异之前——是极其有意义的事。我们知道，价格周期运动的节奏对人类的物质生活和非物质生活十分重要，只有在对其有更多的认识之后，才可能确定价格周期运动的方向问题（如果这样的方向存在的话）。无论如何，历史发展的脉络显然能够证明存在着一个总的经济节奏。欧洲当然是这样，或许世界情况也是如此。

7.3.6 周期前后相随但互不相同

由于在总体趋势的方向上，周期是聚集在一起的，所以勒内·巴雷尔采用严格的线性运动形式向我们指出了一种可行解决方法。对于那些沿相同的方向上升的周期，我们可以通过一条上升的直线把它们串在一起；而对另一些下降的周期，则应由一条下降的直线来连接。我们已经指出，这些由聚集在一起的周期所形成的时段是同康德拉捷夫对晚些时候情形的分析相一致的。康德拉捷夫的分析并不只是估计，也不是突发奇想的产物。实际上，康德拉捷夫周期是经济节奏和长期趋势之间、经济活动和经济结构之间的联结纽带。由于勒内·巴雷尔试图论证由局部运动叠加而成的整体运动，他就必然要利用这种用于分析总经济活动的长时段计量工具。

但这并不是按时间顺序对经常发生的周期运动予以研究的惟一方法。遗憾的是，历史学家极大地忽视了由经济学家珍妮·格瑞诺蒂—克瑞茨门（Jenny Grizioti-Kretschmann）和玛丽·克吕埃尔（Marie Kerhuel）各自撰写的开拓性著作（均出版于 1935 年）以及由经济学家爱德华·R·杜威（Edward R. Dewey）和艾德温·达肯（Edwin Dakin）共同撰写的综述性著作。根据以上几位作者的观点，存在各种不同的周期类型，有的温和，有的剧烈，且某个周期属于哪种类型，取决于该周期是处于长期趋势的上升阶段还是下降阶段。因此，在西班牙，贯穿整个 16 世纪的价格上涨趋势伴随着几个相对温和的周期，但 17 世纪的价格下降趋势则相反，它带来了一系列剧烈的周期。为了对“10 年内周期”可能具有的剧烈程度有所认识，我们不妨回顾一下 17 世纪的乌迪内，在某些伴随有物质匮乏的经济形势发生严峻变动的时期，价格涨幅曾高达 500%。当时的这种短期的价格上涨可与几

【440】

乎整个 16 世纪的价格上涨率相比。

皮埃尔·古贝尔也注意到了这些温和周期和剧烈周期之间的交替时期。他对此没有做出解释，而且，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指望得到肯定的解释。看来，我们必须对由至少是季度价格数据，最好是月度价格数据构成的长系列数据进行更多的研究，并进而对其做出多方面的相互比较。正如我们在 1640～1660 年的周期坐标图（见图 17）上所看到的，周期运动随时间和地点不同变化很大。然而，由于没有肯定的解释，我们也就不怕提出一些临时性的解释。由此看来，广泛的周期运动并不仅仅是长期趋势上升或下降的推演。例如，在博韦，温和阶段和剧烈阶段的分期远非长期趋势的运动所能决定，也似乎与 30 年的时段没有任何明显的联系。甚至玛丽·克吕埃尔的观点也不再是显然的了，她认为周期运动是长期趋势回落阶段（我们称之为"链合阶段"）天生的伴随物，尽管这种解释常常与观察到的现象相符。还可以提出另一个既与已知的事实一致同时又兼顾研究工作的可能进展的假说吗？可以，该假说就是：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在某些时间、地点流通中金、银和货币的供应是不足的。在金银币足值、信誉好且不缺少"黑币"的地方，物价往往偏高，而剧烈波动的可能性则要小一些（当然，其他条件应相同）。贵金属的相对匮乏似乎是价格剧烈波动的罪魁祸首。

但这一论断的正确与否，还需等待进一步研究的判定。在相关问题的争论中，从来就不存在最终的定论。但是，从以上的分析和论证中，我们可以得出两点启示：（1）为了评估经济结构，全面拓展对经济节奏和波动的调查范围是十分重要的；（2）还需要对有关数据进行更新，并展开更精确和内容更广泛的计算。

英格兰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英格兰拥有极好的价格曲线，并且在此领域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成绩，但有关的材料和解释或者陈旧，或者还没有全部出版。为了牢牢把握英格兰过去的总体经济形势和所有随经济形势而定的永久或半永久的价格运动，就必须尽可能用小于年度单位的价格数据重新审查这些材料和解释。实际上，我们的曲线图所给出的英格兰经济发展脉络仅仅是粗略的。这就是我们对贝弗里奇勋爵表示敬意的一个更充足的理由，他【441】至死都在不断地努力完善其早年的工作。

7.4 结论及对前面解释的概述

现在该是做结论的时候了，但我们必须在很大程度上把争论搁置起来。因价格史而产生的各种理论和解释只是试图理解捉摸不定的现实。在这里，我们并不打算提出一个新理论，而只是对前面的各种解释进行概括，并指出哪些方面还需进一步调查研究。

7.4.1 货币数量论

前面的解释直接把我们导向货币数量论。在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的交换方程中得到清晰表达的货币数量论坚持认为，在均衡的条件下，价格水平是货币供给量的函数。人们还可以认为，伊尔·J·汉密尔顿在其关于安达卢西亚价格水平的最初几篇文章中，也能够理直气壮地宣称已对该理论的正确性进行了检验。

如果暂且认为货币数量论起作用，那么，它与实际情况相符合的程度有多大？首先，基本的素材是：（1）大致从 15 世纪末叶到 17 世纪初期西欧价格的总体运动（为简化争论，我们可以把其局限于 16 世纪的长趋势）；（2）贵金属的涌入，这或者根据由伊尔·J·汉密尔顿收集整理的数据系列来衡量，或者通过胡盖特和皮埃尔·谢努的贸易统计来衡量，也可以通过来自秘鲁的波托西银矿的白银产量来衡量。从玛雷伊拉·帕斯·索尔旦（Moreira Pazy Soldan）公布的数据中可看出，在采用混合炼银法（一种熊彼特式的“创新”）之后，波托西银矿的白银产量直线上升。如果我们对图 33 和图 34 进行比较，可以发现（1）和（2）中的两组运动大体上相互伴随。

[442] 但这种关系并不必然令人信服。鲁伊治·埃诺迪[①]、卡洛·奇波拉和弗

① 在给出了对法国马莱斯特罗（Malestroit）与博丁（Bodin）之间争论的看法后，鲁伊治·埃诺迪表示不赞同任何一方。通过利用由伊尔·J·汉密尔顿和保尔·勒沃公布的 1471～1472 年至 1590～1598 年间的价格数据，他得出了以下的结论：在这一百多年期间，价格指数（以核算货币估计）由 100 上涨到 627.5。此次价格上涨，35.47% 是由于图尔里佛的贬值（即占价格上涨的 222.6%），64.53%（即占价格上涨的 404.9%）是由于其他原因，包括来自美洲的贵金属的影响。当然，不必认为埃诺迪的计算是准确无误的，但其方法是审慎的（因为，他说：“如果我们认为只有图尔里佛的贬值起作用，那么，接着就会认为只有来自美洲的大量贵金属起作用……”）。埃诺迪依次分析了每一种因素的作用效果。

朗索瓦·西米昂否认这种关系是确定的，并且否认它是向一体性的靠近。其他因素也在起作用：比如说，在此处所考察的整个时期都在起作用的核算货币的贬值；由于卡托—康布雷齐（Cateau Cambrésis）和平条约的签订（1559 年 4 月 1～3 日），历时多年的战争终告结束，因而导致意大利重建所需的投资，以及重要的人口因素等。

此外，我们还必须证明，各种各样的货币贬值和遍及各地的人口增长是不是像它们是价格上涨的原因那样，同时也是价格上涨的结果，还有，金、银产量的增加是否是 16 世纪前开始的经济活动水平扩张和加速发展的结果——这一点我们确实愿意相信。在一般性结论中，每种解释都必然由两个方面组成：原因是如何成为结果的和结果是如何成为原因的。

在卡洛·奇波拉简短但并非具有决定性的介入发生之后，还有，在我们拥有了鲁伊治·埃诺迪收集的数据之后，现在的我们，对调查研究的步骤做出颠倒就显得合适。换句话说，尽管事实并不必然这样，但我们还是假定贵金属的突然增加是价格上涨的惟一原因。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行下面的两项工作：（1）审查欧洲小麦的平均价格曲线，这条曲线首先被折合成黄金计量，再被折合成白银计量。我们暂且假定这些折算和曲线图（见图 11）**是审慎的**并忠实地记录了价格总体运动。同时我们也假定，在此“模型”的框架内，黄金供给量的增加等于相应地增加了白银的供给量，即贵金属供给量的增加以白银来计算。最后我们注意到，以黄金计量的麦价的上涨在 1600 年前后停止下来，而以白银计量的麦价的上涨在 1640 年前后才停止下来。对以黄金和白银计量的麦价变化的这些“转折点”，自然可持保留态度并允许讨论，但它们确实指出了不存在多少疑问的基本变化。（2）在不要求讨论古斯塔夫·卡塞尔（Gustav Cassel）或其后继者的深奥解释的情况下，在 16 世纪价格上涨的框架内，我们既可以调查由于从美洲进口贵金属而导致的贵金属增量，又可以调查 1500 年前的贵金属存量。至少从理论上讲，在暂且不理会失业水平变化的情况下，只有在货币供给量平稳增长时，价格水平才可能保持稳定。货币供给量的增长当然随经济活动水平而定（就大约 19 世纪中叶的欧洲经济而言，3% 的增长率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但我们没有多【443】少把握可以认为这一理论适用于 16 世纪的情形。就算它是适用的，我们仍需知道利率、起初的货币存量规模和使货币的实际总量增长的平均流通速度。

我们相信数量级始终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参照点，而且即使对统计数据还存有争议，但基于此的争论却是一种论证方法，一种有吸引力的步骤。有两三种计算总货币供给量的方法可供我们使用。

1. 第一种方法

由 W. 雅科布（W. Jacob）所进行的早期研究《贵金属生产与消费的历史调查》（1830 年），在统计学界声名狼藉是很自然的，但他所建议的方法却有一些优点。据雅科布估计，1809 年欧洲流通中的金银量，以银计量是 47 426 吨。如果从此总量中扣除 1809 年的产量，就可得到 1808 年的金银存量，以此类推，可以得到更早年份的金银存量。雅科布提醒我们，这需要一个条件，即应考虑欧洲金属的外流以及工业消费和磨损。当然，这些都是极其合理的，但真要使连续的计算无懈可击，起点的基数必须精确计量。然而没有证据表明雅科布做到了这一点，相反，却有证据表明他在相当程度上没有做到这一点。最后，他计算得出 1500 年前后的金银存量（均以白银计量）仅仅是 4 230 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雅科布用于连续扣除的历年产量远远低于泽特贝尔（Soetbeer）的估计（1895 年），而泽特贝尔的估计又大大低于 W. 勒克西斯（W. Lexis）的估计（1897 年），勒克西斯的估计又低于克拉伦斯·哈林（Clarence Haring）（1915 年），尤其是低于伊尔·J·汉密尔顿的估计（1928 ~ 1934 年）。如果我们承认 1809 年的基数是可靠的，在此基础上，根据我们今天掌握的历年贵金属产量，在做出必要的扣除之后，我们得出的结果竟是 16 世纪初金银存量水平低于零，如果把每年的金银输出及其非货币使用考虑进来，这个差距会更大。

2. 第二种方法

像 W. 勒克西斯在计算 18 世纪俄国的货币供给量时所做的那样，我们是否有根据相信某个时候流通中的金银总量大致相当于在此前 30 年间铸币的总和？在法国，1631 ~ 1660 年大规模货币重铸期间铸造的货币总量达到 267 734 871 图尔里佛，或取整数是 2 259 吨**白银**（包括以白银计量的金币量）。由于法国当时约有 1 600 万居民，这样人均货币供给量就等于 16.73 图尔里佛或 141.22 克白银。假定欧洲人口是法国的 10 倍，且人均货币供给量与法国相同，那么，欧洲 1660 年的贵金属存量将达到 22 590 吨白银。这是一个偏高的估计。尽管如此，如果我们从这个总量中扣除已知的或估测的 1500 ~ 1660 年的贵金属产量（在 1500 ~ 1650 年间，抵达塞维利亚的黄金和白银分别至少为 181 吨和 16 886 吨），1500 年的金银存量再一次处于很低的

[444]

水平，尤其是当我们把金银的输出、磨损及非货币使用考虑进来的时候（这种考虑遵循 W. 雅科布的方法）。因此，我们的计算再次得出令人失望的结论。

3. 第三种方法

这种方法可能是对前两种方法的改进，至少比它们更成功一些。我们拥有欧洲黄金、白银这两种贵金属的总量数据。这两种贵金属总量由一种价格，即我们熟悉的金银比价联系着，并通过它实现其实际价值的**相互平衡**。我们知道，金银比价在不断变化，1500 年欧洲的平均比价约为 10.5∶1，而 1660 年则为 14.5∶1。在既不考虑欧洲的金银生产和来自亚洲、非洲的金银输入，又不考虑通过波罗的海和东地中海地区的金银输出以及由于使用和储藏带来的损失的情况下，我们假定这两种贵金属的总量仅仅由于美洲金银的不断涌入而增加。之所以这么假定，是因为来自美洲的金银无疑在这两种贵金属的增加中占优势（根据伊尔·J·汉密尔顿的统计，在 1500～1650 年间，来自美洲的黄金大约有 181 吨，白银大约有 16 000 吨）。如果我以 x 代表 1500 年的黄金存量（单位：吨），以 y 代表同期的白银存量（单位：吨），那么，我们可能得到下面的两个方程：

1500 年　　$10.5x = y$

1660 年　　$14.5(x + 181.3) = y + 16\ 886.8$

解这两个简单方程，可得 x 为 3 564.5 吨，y 为 37 427.3 吨。

显然，上面计算的前提存有争议，而且问题还相当大。毕竟这两个方程预先假定黄金和白银的实际存量是基本相等的，同时又拒绝接受金银生产的劳动需要量是不同的这个第三方面考虑。而且，这两个方程还意味着对金银的供求完全由金银总量决定。总之，我们是如此习惯于认为从美洲涌入的金银淹没了整个欧洲，以至于一见到这两个异常的大数字就感到困惑。但应该记住的是：这两个大数字一方面包含了约一个半世纪的金银产量；另一方面又包含了从货币系统诞生前开始的大约 2000 年间的积累。亨利希·奎林（Heinrich Quiring）的《黄金史》一书，并不总是正确的，实际上，该书的描述多于定量分析。但我们仍然可以注意到，他认为罗马帝国时期的黄金总产量为 1 700 吨，中世纪为 500 吨。这两个数字加在一起呢？其和开始接近于我们对 1500 年欧洲黄金存量的估计值 3 000 吨。但这仅仅是一种概算，而不是一个证明。然而，无论我们的估计多么不完善，它还是同历史学家的 [445]

估算一致。和他们的前辈相比，历史学家倾向于高估贵金属存量。这似乎有足够的理由，但既然如此，货币数量论又起什么作用呢?

更简单地说，我们所做的这些调查研究都是在浪费时间吗? 可能是这样，但我们自有辩解的理由。一条理由就是，直到 1930 年，甚至更晚一些，我们的前辈过低估计了美洲贵金属抵达欧洲前，欧洲贵金属的产量和存量。他们认为，美洲的贵金属如潮水般涌入原本贵金属奇缺的欧洲，从而给欧洲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事实似乎相反，自古以来，旧大陆积累起来充当货币的金银量相当可观，但货币的损失也很大。这些估计对美洲金银产量的剧增的论断决不会有什么损害，只是，它们有助于人们对新旧贵金属的数量关系得出一个全新认识。

总之，如果根据最乐观的推测，由新大陆涌入的贵金属甚至不及欧洲原有货币存量的一半，那么，货币数量论以及欧文·费雪的交换方程一定会丧失某些说服力，而且只有在 16 世纪的货币流通速度大大提高的条件下，它们才能对 16 世纪的价格猛涨做出有效解释。

但是，所有的迹象都恰好表明情况就是如此，而且确实应该如此。在 1660 年前后的法国，人均货币供给量**大约**是 16 ~ 17 图尔里佛，而人均总收入至少有 100 里佛。要使这两者之间的差额得以补足，货币就必须流通，即如葡萄牙人品托所说的“转手（ cascade)”，以履行其众多的使命。在我们所考察的时期，无论在法国还是别的国家，货币流通速度无疑都加快了，这种情形早在 16 世纪就已出现，而在 18 世纪则更加突出。

但问题依然存在：货币流通速度这个协同因素是否增加得足以使欧文·费雪的方程仍然能够有效地充作 16 世纪价格革命的一般解释? 我们说“足以”二字，是因为很少有人怀疑当时流通速度的增加，但增加的比例是多少? 横扫欧洲的货币快速流通无疑涉及所有的资本、财产和积蓄，几乎没有例外。无疑存在地理学者所称的“集水盆地（catchments)”——处于闲置状态的货币存量汇聚，亦即资本储备的集中。例如，在 15 世纪初的巴塞尔 (Basle)，该城 7 000 名居民的收入分配相当合理，即使存在殷实富户，但贫穷却几乎绝迹，历史学家鲁道夫·苏姆（Rudolf sohm）对此颇感惊讶，但这种景象在 100 年之后肯定不存在了。在 16 世纪时贫富差距开始出现，且越来越大：富者愈来愈富，穷者愈来愈穷。这种情况至少部分地归因于铸币的迅速“转手”和传播。分析和解释这种传播仍然是必要的。我们必须弄清楚货币流通速度的增加是否像它随人群的不同而不同那样也随欧洲地区的不同而不同。如果能掌握必要的数据和数据系列，这真是一个用模型进行

[446]

定量研究的好题目。

实际上，货币流通速度随地区的不同而不同，并且有数以千计的妨碍货币流通的因素。总之，在塞维利亚这个极其重要的货币集散中心，从美洲输入的金银是属于从事国际贸易的大商人和天主教教皇西班牙国王的财产。因此，这些“财富”不是被投入大宗国际贸易（大宗国际贸易得到发展，并由此加快了金银在欧洲的流通），就是被用于西班牙的外交冒险活动［里查德·埃伦贝格（Richard Shrenberg）早就指出，第一次是由查理五世1552年在麦茨（Metz）可悲的围城战期间实施的］。接着，菲力浦二世在1580～1590年间又一次采用了同样的步骤，对此，菲利普·吕兹·马丁做了描述。这一次，西班牙打开了所有的闸门，并建立起大规模的白银流通网。通常，西班牙尽可能阻止白银流通，以免白银流到境外，而在这个时候，如同白银太多一样，它迅速流动，并且从这时起，西班牙白银对整个欧洲的货币供给量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从此以后，新大陆白银的每一次运抵，对整个欧洲的金融和商业生活施加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强有力的影响。胡塞·让迪·达希尔瓦（José Tose Gentil da Silva）为了说明其节奏，专门绘制了相关的地图。每当来自美洲的运银船队一抵达，欧洲的货币市场就相继获得大笔“赏金”，变得宽松起来，亦即铸币充足，“现成的”现金充裕，汇票盛行（这三者通常相互伴随）。因此，来自塞维利亚的货币从一个货币市场流通到另一个货币市 【447】 场，清偿的商业和金融交易价值常常是自身价值的10倍乃至100倍，接着，为了再次借贷现金和清偿贸易，又继续流通到下一个货币市场。无论是以铸币的形式还是以汇票的形式，货币就这样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从一个货币市场转到另一个货币市场。在16世纪的罗马，每年的铸币流通量与塞维利亚不相上下。在1575～1602年间，威尼斯铸造了62吨金色庚，这比同期塞维利亚得到的52吨美洲黄金还多。在1493～1660年间，法国的铸币量达到4 133吨白银（金银铸币均转换成相应的白银计量），也就是同期抵达西班牙的“美洲财富”的1/5强、1/4弱。对于这些引人注目的数字，我们不应过于惊讶。在那时的欧洲，金银币就像由奥芬巴赫（Offenbach）作曲的歌剧中的火枪手，或者像太阳系仪中的行星，它们几乎总是同样的人或行星，只是打扮不同而已。

然而，金银的流通并不具有对称性和规律性，它并不总能回到起点。黄金白银不断地经由波罗的海、地中海东部地区和好望角外流到近东和远东地区。而且，因政治和商业原因，西班牙的白银有自己特定的流通路线。正如

我们的某个地图（图 10）所表明的，这些路线给北欧带来极大的利益。它们也给意大利带来利益（比图 10 显示的还多），因为白银经由热那亚、佛罗伦萨和威尼斯流通，用以清偿源源不断的汇票和黄金支付，其后，这些白银流到了尼德兰。在安特卫普这个被战争腐化的金融中心［像不久前在印度支那战争期间从事皮阿斯特（piastre）交易的西贡］（皮阿斯特是中东几国的货币——译者），聚积了大量的货币，这些货币从这儿向北方各个国家传播，首先传到尼德兰。对与国际贸易有关的商业通道来说，西班牙白银外流的这些政治通道是一个补充。而商业通道的目的地之一仍是北方，因为西班牙要靠北方提供小麦、铜、锡、木柴、木板、船梁、大麻和亚麻织物以及高级衣料。每年都有一二百万埃居的货物几乎秘密地从北方运往塞维利亚。对北部国家的贸易入超使西班牙和葡萄牙把剩下的一部分黄金和白银用得一干二净。意大利从对西班牙的贸易中也获利不少，但意大利对东地中海地区支付的款项为数巨大。在 1595 年（创记录的一年），仅威尼斯就向叙利亚送去 551 667 杜加，折合白银 14 700 千克。[①]

就北部国家来说，只需解释其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少量白银损失。因此，【448】就像一切迹象表面上所显示的那样，如果 16 世纪末长期趋势的逆转发源于塞维利亚，那么，它以下面的方式发展。在 1604 年（英国和西班牙的和平年）以及 1609 年（西班牙和联省 12 年的休战）的时候，北部国家在同西班牙发生战争的过程中崭露头角，从而积累起大量的货币，这既是因为在普通商品的贸易中连续出超，又是由于战争的结果。北部国家从放贷这些货币储备中获取利润的做法一直持续到 17 世纪中叶。而且，它们还取代地中海沿岸国家向印度和中国输出金银。

以上的解释不可能是对长期趋势畸变的惟一合理解释。某些地区，例如传统的地中海地区，由于继承了古代的经济结构，尤其是由于它们比其他地区，是拥有更广泛使用货币的习俗的先进经济，其贵金属的供应比其他地区更加充裕。因此，勒内·巴雷尔所考察的普罗旺斯在 17 世纪的货币供给就比皮埃尔·古贝尔考察的博韦要充足一些。弗兰克·史布勒勾勒了法国 16 世纪时的货币供给差异。但我们能认为北方经济长期在很大程度上不如南方经济那样置于货币流通网络之中吗（有若干个别情况确实符合这一说法）？使用金银较少的经济可能意味着它进行着更原始和更多的物物交换。北方的

---

① 威尼斯博物馆玫瑰厅赠品第 42 卷，第 23 页背面。1593 年、1594 年、1595 年和 1596 年 4 年总计 1 045 447 杜加，平均每年 261 361.75 杜加。

城镇经济，更倾向于纵向的结合，依赖落后的或半发达的乡村而生存。在这种情况下，北方对货币和贵金属的消费（广义上的）必然少于南方。由于北方的经济结构更简单，经济基础更牢固，因而不像南方那样对贵金属挥霍无度，这种状况至少存在于 17 世纪初和 18 世纪的全面扩张之前。在 18 世纪的全面扩张期间，经济的发展转向有利于曾经是穷人的那些人，亦即使他们变成了新富人。

因此，如果把货币数量论同货币流通速度结合起来，并考虑到欧洲经济的差异，那么，货币数量论就是有意义的。而且，根据维尔纳·松巴特和巴西历史学家的研究，在 1680 年至 1720 ~ 1730 年期间，由米纳斯古拉斯（Minas Gerais）、马托格罗索（Matto Grosso）和巴伊亚"荒漠"（the 'Sertão' of Bahia）生产的黄金有 5 亿 ~ 6 亿皮阿斯特被投放到欧洲市场。这些投入欧洲，投入到国际经济中的黄金直接进入流通了吗？或者，是否和弗兰克·史布勒关于早些时候情形的结论一致，变得相对充裕的黄金再一次刺激了白银的开采？其结果是，新西班牙的银矿经历了远比第一次繁荣辉煌为甚的第二次繁荣。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数量问题还没有遇到能予以解决的学者，即还没有发现属于它们的伊尔·J·汉密尔顿。但是，我们能确信两件事：欧洲货币存量在 18 世纪获得相当大的增加，并且货币流通速度进一步提高。在法国，我们对 1660 年货币存量的估计是 2.67 亿图尔里佛，而古典经济学家对 1789 年货币流通总量的估计达到 20 亿图尔里佛。即使考虑到核算货币的贬值和这些总量数字的不可靠性，这也是一个相当大的进步。【449】

7.4.2　价格、工资与资本主义

我们必须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价格史对于我们认识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孕育有无启发？实际上，资本主义可以被视作一种既是社会的又是经济的**结构**，一种历时长久的现象。正因为如此，通过短期或相对短时期的情形勉强对资本主义做出解释存在着很大风险。当然，这些情形无疑对这种结构的扩展和萎缩具有影响，但用这些转瞬即逝的、内生的因素来说明资本主义的全部命运，似乎并不总是合理的或充分的。

伊尔·J·汉密尔顿在他早年的一篇文章中正确地强调了自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远航（1497 ~ 1499 年）以来，美洲的发现，尤其是欧洲和印度及远东之间直接海上贸易通道的开辟，对资本主义发展

的重要性。他还正确地指出，在通货膨胀期间，工资落后于物价的上涨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家，从而为资本的集中创造了较大的利润空间。总之，我们要抛弃伊尔·J·汉密尔顿的理论，并不那么容易，但重要的是继续完善这些理论。任何经济波动，即使是决定性的、剧烈的或有影响的经济波动，在长期的、"结构的"历史（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中仍然是偶然事件，就其本质而言，这种历史超越了偶然事件，无论是就伊尔·汉密尔顿所强调的偶然事件，还是在考察 18 世纪欧洲小麦价格逐渐走向一致的过程中我们所提到的偶然事件来说，都是这样。换句话说，无论是在短期还是在长期，资本主义的作用都是多重的。

一个例子就足以显示资本在短期的多重特征。以 16 世纪末的威尼斯为例，当时威尼斯金融家和商人越来越难以接受海上冒险活动中风险的不断增加。在 16 世纪末和 17 世纪初，公海上的航运受到海盗的威胁。而在 15 世纪，这种威胁实际上并不存在，但在 16 世纪则受到来自宗教战争（伊斯兰教徒对基督教徒、新教徒对天主教徒）的威胁，而在 17 世纪，海上掠夺已司空见惯。既然如此，当时在威尼斯投资的利润从何而来？由 1606 年商界贤人团（the Clinque Savii alla Mercanzia）的一份文件可知，当时佛罗伦萨商人控制着威尼斯，对某个居住在威尼斯的佛罗伦萨人来说，为了保住自己的财富，可以从事房屋的投机买卖。然而，同样也住在威尼斯的一位热那亚商人，则冒险进口银条并从事外汇投机。对于一位具有贵族血统并且还拥有与他的贵族出身相称的财产的威尼斯人而言，如果他没有因为运气不佳而沦落为贫穷的绅士阶层［他们因为居住在威尼斯的圣巴尔纳巴区而被称作"巴尔纳巴人（Barnaboti）"］，为了保住自己的钱财不受损失，正如我们在几份公证文书中所看到的那样，他会在贝桑松（Besancon）市场冒险（从事有息贷款，即使利率很低）。最重要的是，他也会购买土地，并改良土壤。威尼斯共和国小麦产量的大幅度增长应归功于像他这样的人，同时这也能确保他们获得利润，因为农业是欧洲的最大产业（这一点，我们必须牢记）。这些威尼斯人也投资于呢绒行业，只是投资额小些。在 17 世纪初，呢绒行业的较高工资无疑限制了企业家的利润，再加上北方呢绒的竞争，这些威尼斯人纷纷离开这个行业。总之，怎么能用单一规则去适用到如此众多的投资机会组成的类谱呢？就指出投资机会的无限多样性来说，我们甚至还没能完成这个开头呢。

【450】

无论我们给资本主义下什么样的定义，它都是一种缓慢萌发的现象。伊尔·J·汉密尔顿和凯恩斯勋爵（Lord Keynes）对资本主义的经典描述只抓

住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个特定方面，即价格和费用相对水平的变化这种情形。价格和费用相对水平的变化很可能有利于利润的增加，但它不可能独自起决定性作用，伊尔·汉密尔顿首先认识到这一点。但认识到这一点，仅仅只是进一步研究的起点。价格史能为我们开启一扇窗，但不能打开所有的窗户。

7.4.3 价格史与“系列史”

价格史仅仅是构成“系列史”[①] 的一个章节，尽管它无疑是最早着手的章节之一。系列史就是通过对各种长系列实证数据的比较研究来认识历史演变的数量方面。但在“系列史”还未拥有更广泛的研究领域或更精确的手段、目的和结果之前，价格史就将只是构成系列史的一小部分。【451】

目前，在我们已经拥有的系列、即将出现的系列、甚或可能的系列中，哪些系列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充分的证据？

1. 同一系列与相关系列

我们首先要做的显然是完善和增加价格系列：对某些仍缺乏统计数据的广大地区，例如巴尔干半岛或莫斯科公国，进行全面调查研究；在与欧洲发展有关的非欧国家中抽取样本并对其进行分析；然后，如有可能，完成那些已有的不完整系列，例如，在纺织品领域，现今数据的匮乏使我们不能对这个惟一可供我们利用的重要工业部门进行检验；最后，收集并整理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对于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威廉·阿贝尔试图弄清其长期的变化趋势，而H. J. 哈巴库克（H. J. Habakkuk）已系统地促进了其有前途的研究，阿尔杜·德·马达列纳（Aldo de Maddalena）最近则就此主题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

“相关系列”所指的是与借贷利率有关的系列。在这方面，伊尔·J·汉密尔顿计划对15～18世纪的整个欧洲展开大规模的调查（不论其能否实现）。相关系列这个术语亦指与商业利润率有关的系列。在这方面，还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调查。但是，比如说，只要我们对里斯本从与亚洲的贸易活动中获得的多得惊人的红利能够有些了解，我们就可能找

① 该术语系皮埃尔·谢努的发明，见1960年6月6日《工业报》：《中期动力与系列史》。

到一个对 16 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所得到极大促进的程度进行衡量的好指标。德国商人卢卡斯·雷姆（Lucas Rem）积累的财富清楚明白地揭示了这一点。在 16 世纪，在几乎每一个商业中心，人们都谴责热那亚商业金融家通过在外汇市场和商品市场的投机而肆无忌惮地牟取暴利。如果行得通的话，对热那亚商业金融家赚取的利润进行研究将是富有成果的。但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得到他们的文书和账册呢？

其他可供进行“系列”研究的资料必然包括国家预算方面的数据和有关一般生活水平的数据。不久前，H. 格罗特（H. Grote）对一般生活水平的演变进行了研究，他以“最低工资”作为衡量一般生活水平高低的基本指标，在皮埃尔·古贝尔考察的博韦地区，其生活水平的高低可用一个 6 口之家每年大约消费的 500 升小麦来衡量，而勒内·巴雷尔发现同期普罗旺斯地区的数字是这个数字的 2 倍多。可见，这个数字作为一个参照点仅仅具有相对价值，对此，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样本数据。尽管有专家嗤之以鼻，但是在衡量生活水平的高低时，我们还是应当把每日所需的热量估算在内，即便这些估算会使我们暂时或永久地养成同前面在评论货币数量论时一样的不严谨作风。

2. 独立的或平行的系列

【452】 在这个标题下，一组人口曲线自然展示在我们面前。皮埃尔·古贝尔在其著作中充分利用了这些人口曲线（人们经常把这本著作连同涉及经济波动的曲线一起引用）。虽然我们已经知道，人口危机与生存危机恰好吻合，价格上涨与死亡率提高不期而遇，但相关的论证进一步澄清了这些问题。在过去有关出生和死亡的报告中，人们发现不存在人口变动的长期趋势，甚至也不存在长期趋势的征兆，但人们今后一定会考虑人口变动存在长期趋势这个假设。

然而，根据人口来解释有关价格运动的任何问题都与此大不相同。首先，我们必须小心地把在职工人人数的变化（增加或减少）同总人口的变化区分开。例如，在普罗旺斯，1600 ~ 1690 年间就业的工人人数增加了。其次，我们必须在需求价格理论的意义内澄清我们关于**最佳**人口的概念。价格总是既与货币量有关又与产量有关。如果其他因素保持不变并且货币供给量不增加，那么人口的增加自然会导致价格的下跌。伊尔·J·汉密尔顿利用 19 世纪的历史证实了这个结论。他发现，在 19 世纪，人口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增加得快，而在该世纪，在除战争时期以外的大部分时间里，价格不断下跌。在发现加利弗尼亚（California）和澳大利亚（Australia）的金矿后，价格开始上涨，在1873年后，价格又开始下跌并且直到19世纪末没有再上涨，而在发现南非（South Africa）和阿拉斯加（Alaska）的金矿后，价格又开始上涨。这里，再一次提出了流通中的货币量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然而，所有这些都还需要验证。

相比之下，社会因素又怎样呢？社会因素太不明确，不能进行精确计量，更确切地说是不适合精确计量。厄内斯特·拉布鲁斯主持的1955年罗马代表大会建议开展的对社会结构的大调查，与贝弗里奇勋爵于1933年领导的价格运动大调查异曲同工，但前者主要涉及18和19世纪。可我们能够在什么模式，什么“模型”的基础上用数量来表示社会因素呢？我们又能从这些数量中分离出什么系数以便能够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等级提供一幅富有科学意义的真实图像？我们认为这么做是可行的，因为每一次长期的经济衰退都趋于使社会停滞不前，等级分化，并阻碍社会内部的流动，但要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历史学家就必须借鉴社会学的理论和实践，并且照例审慎地、有选择地把它们的成果运用到自己的研究工作中来，然而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

3. 贸易和生产

我们更容易把价格系列同有关贸易和生产的数据系列进行核对，这时也【453】有许多因素需要考虑，但只有当我们掌握了记录贸易和生产的长系列数据，才可能进行相关问题的讨论。尼娜·班格（Nina Bang）和克努特·科斯特（Knud Korst）就1497～1783年间厄勒海峡（the Sound）征收的关税撰写了一部具有开拓性的著作。其他人的研究证实了该书中的有关数据，并使我们认识到了该书的重要性。最近，另有一些人对尼娜·班格和克努特·科斯特的艰巨工作感兴趣。但胡盖特和皮埃尔·谢努的工作在艰巨性方面并不亚于此，而且从历史的角度看，还要更重要一些。他们已考证了1502～1650年间塞维利亚和美洲的贸易额，并且正在研究加的斯（Cadiz）1784年前的贸易额。通过这两项极其重要的工作，他们将计算出世界上一条主要海上贸易渠道从其肇始直到几近现代的贸易额。

那么，价格和贸易如何波动？无论是从穿越厄勒海峡的贸易来看，还是从伊比利亚半岛的跨大西洋贸易来看，答案都很简单，这一点让人感到高

兴。贸易和价格的运动大体一致，没有明显的差距。价格上涨伴随（说“引起”可能不太合适）贸易增长，价格和贸易同步运动。这一认识拓展了人们通常讨论价格的范围。

然而，我们能认为船舶总吨位的变化（港口装卸量的变化显示了这一点）令人满意地表现了总产量水平的变化吗？皮埃尔·谢努坚持认为这种表现是存在的，但是是间接的。从已知的情况来看，船舶总吨位和总产量水平可能互为函数关系。但我们对生产知之甚少。因此，就 16 世纪而言，我们只能得到三条主要曲线，而且这些曲线并不太合我们的意：1378 ~ 1676 年间翁斯科特（Hondschoote）的丝毛哔叽（sayettes）产量曲线、威尼斯历时两个世纪的优质呢绒产量曲线和莱顿的呢绒产量曲线。如果需要，我们也能引证波托西银矿的白银产量和康沃尔郡、德文郡的锡产量。但若涉及波托西则意味着对我们所研究的欧洲范围的超出，它把我们带回到欧洲不遗余力地对外殖民地化的时期。欧洲的这种对外扩张也成为最早的国际经济的框架或模型的一部分。

在这种情况下，图表是最有说服力的。与价格运动（仍然是小麦的价格）相比，这三条抛物线形状的曲线上升和下降都很猛烈（见图 33）。在这里，我们遇到了辩证经济学的经典案例：一方面是不可逆的价格运动；另一方面是可逆的产量运动。如果问题的症结就包含在这样一个简单的系统内，那么，我们就可以相对轻松地得出结论：价格运动引起产量运动（有一定的时滞），并且是产量运动的发动者。但是相反，价格的缓慢下降却允许增长的纺织品或矿产品产量以比价格下降更快的速度又下降回来。不过，这一点尚未得到证实，为此我们还需要一些新的产量曲线，来看一看在产量先上【454】涨后下降的变化过程中，在欧洲不同地区的长期价格运动中，是否存在类似的上涨和下降。例如，莱顿的情形究竟如何？对于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明确的回答。

同样，我们还可以自问，东普鲁士小麦播种面积的增减和尼德兰治理的土地的增加（这两者都表现了农业产出的变化），是否随长期价格运动而变化（见图 15 和图 16）。这个问题还不能得到完全解决。

我们将会清楚地看到，这些总结性的讨论正在把我们领向何处。在我们看来，价格史的缺陷不仅在于资料不足而且在于资料的使用不够充分。人们从未把这些资料真正地运用到关于经济增长的大讨论上面（勒内·巴雷尔的著作的真正价值就在于，该书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着手普罗旺斯的价格研

究），也没有运用到关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讨论。人们习惯把两个问题混在一起，似乎经济增长始终意味着社会进步，反之亦然。M. 马诺林在谈到欧洲共同市场时写道："从长期来看，任何经济扩张都对人有利，但这一结果只有在经过很长时间之后才能获得。在此期间，加速的经济活动预示着打破传统的结构，改变劳动力的地理和职业分布，转移经济活动的**中心**，从而对某些人有利而对另一些人有害。"他随后又指出，经济扩张可能意味着社会危机，甚至极其严重的社会危机。

这些适于我们当前困境的思考，也适用于自中世纪以来的整个欧洲历史。我们十分乐于认为，经济增长应该从长期的角度加以研究，因此，表现长期趋势的价格曲线恰好可被视为经济增长无可怀疑的证据。但价格并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证据，它是影响工资（工资是对一个人工作的报酬）增减的一个因素。当价格不是被视为经济扩张的尺度，而是被视为生活水平的尺度时，价格曲线又意味着什么？即使我们拥有最好的资料和最可靠的价格曲线，我们也不可能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必须以另一种方式重申这个问题，但没有什么方式要比把勒内·巴雷尔对普罗旺斯的研究同皮埃尔·古贝尔对同期（漫长的17世纪）博韦地区的研究进行比较更好的了。他们都把这期间的120年分成4个时段，这4个时段的日期几乎是相同的（但仅就日期而言）。当博韦处于繁荣时期时，普罗旺斯正值经济衰退。而当普罗旺斯蒸蒸日上时，博韦则陷入灾难之中。实际上，勒内·巴 [455] 雷尔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并且遵循弗朗索瓦·西米昂的思想路线，把这120年划分为"A阶段"和"B阶段"。而皮埃尔·古贝尔从社会危机的角度，根据周期性上涨的剧烈程度，确定了繁荣时期和萧条时期。因此，读者需要花一定的时间来领会这种相互转换。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不妨补充说，它们的起点都是价格运动，虽然价格大体上以同样的方式运动，但还是有差异，而这种差异只能由这两位作者萦绕于心的信念不同来解释。在普罗旺斯，周期性危机的力度较弱，而在博韦，增长阶段则较平缓。对于各自的曲线，两位作者提出的问题不同，因而得到的回答也就不同。

我们最后的结论是，迄今所研究的价格史还没有对基本问题提供一个满意的回答。但价格史以自己的方式确实提供了有关工业化以前的欧洲的证据，作为《剑桥经济史》的一章，本文旨在回顾这些证据。价格史表明（而且的确非常清楚地表明），欧洲既是众多实体各自为政，从而可以说是有着呈现出极大的多样性的一面；同时又有互相联系，呈现出一体性的一

面；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价格史进一步表明欧洲存在因共同的经济命运而融合在一起的趋势。最后，价格史提出了无以计数的问题和调查研究课题，而一项研究的真正目的不就是要拓展我们的视野吗？历史从来不是一劳【456】永逸地写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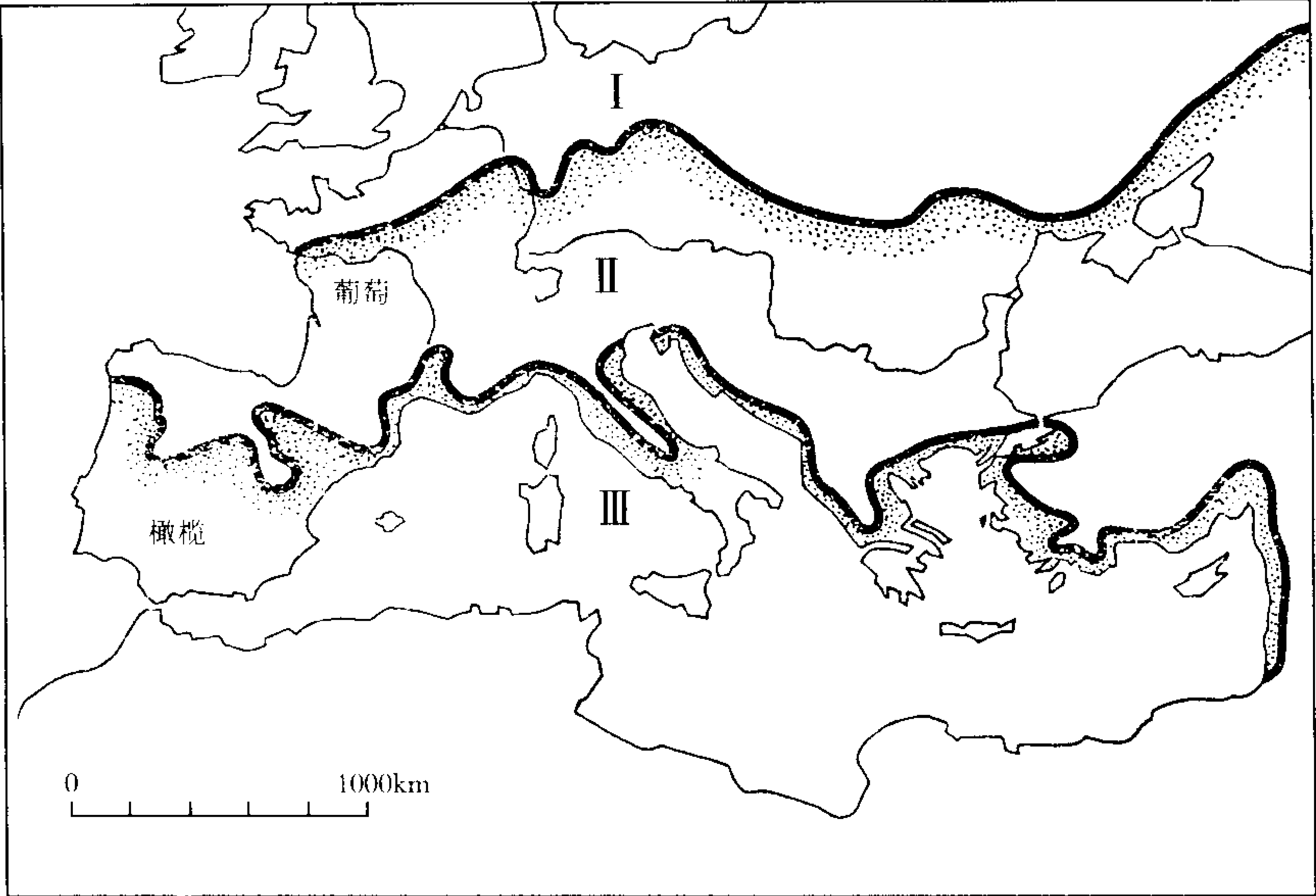


图 2　根据现今葡萄和橄榄树的种植范围确定的欧洲三大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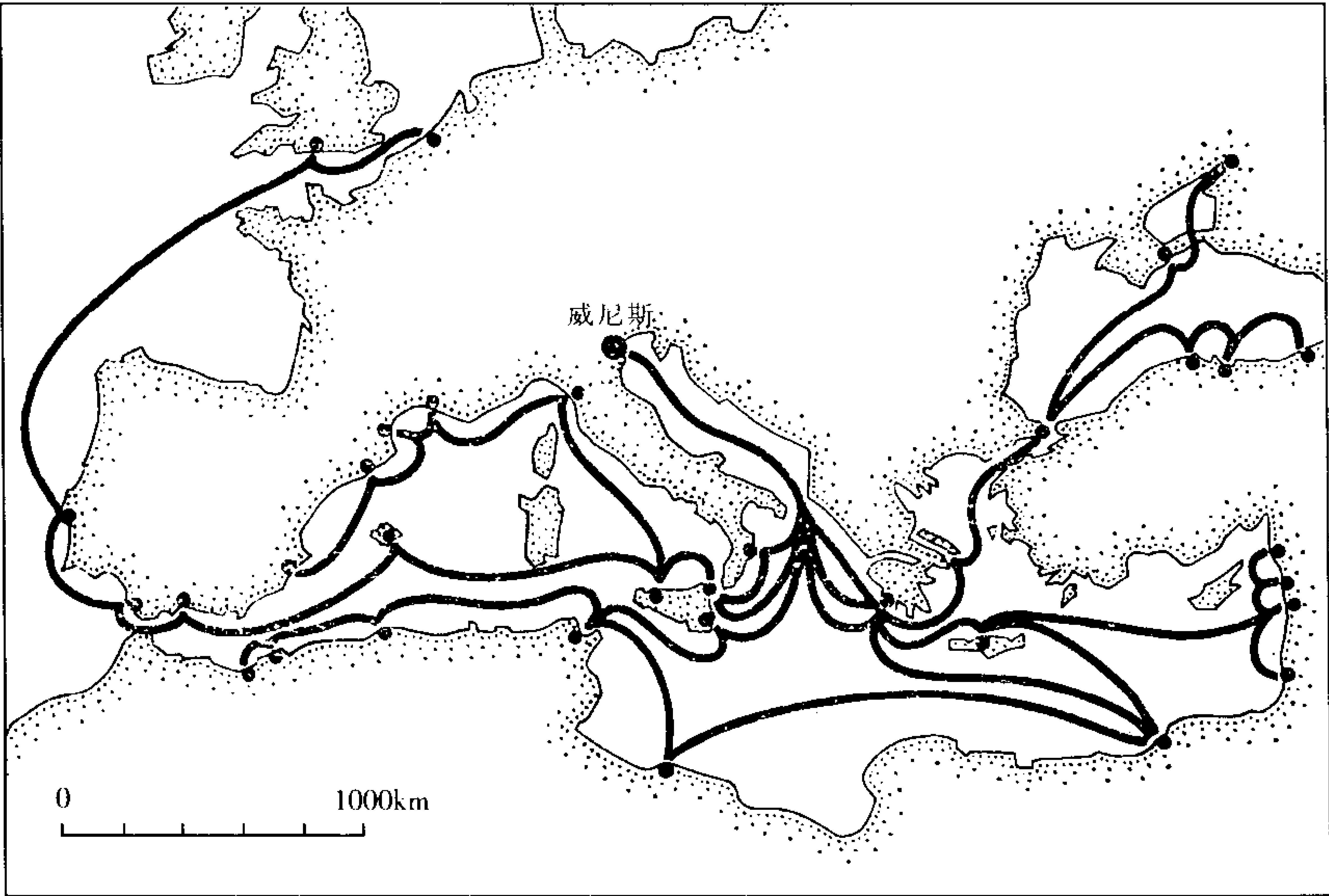


图 3　1442 年威尼斯航海状况：帆桨商船的航线

资料来源：C. 维旺蒂（C. Vivanti）和 A. 特南蒂（A. Tenent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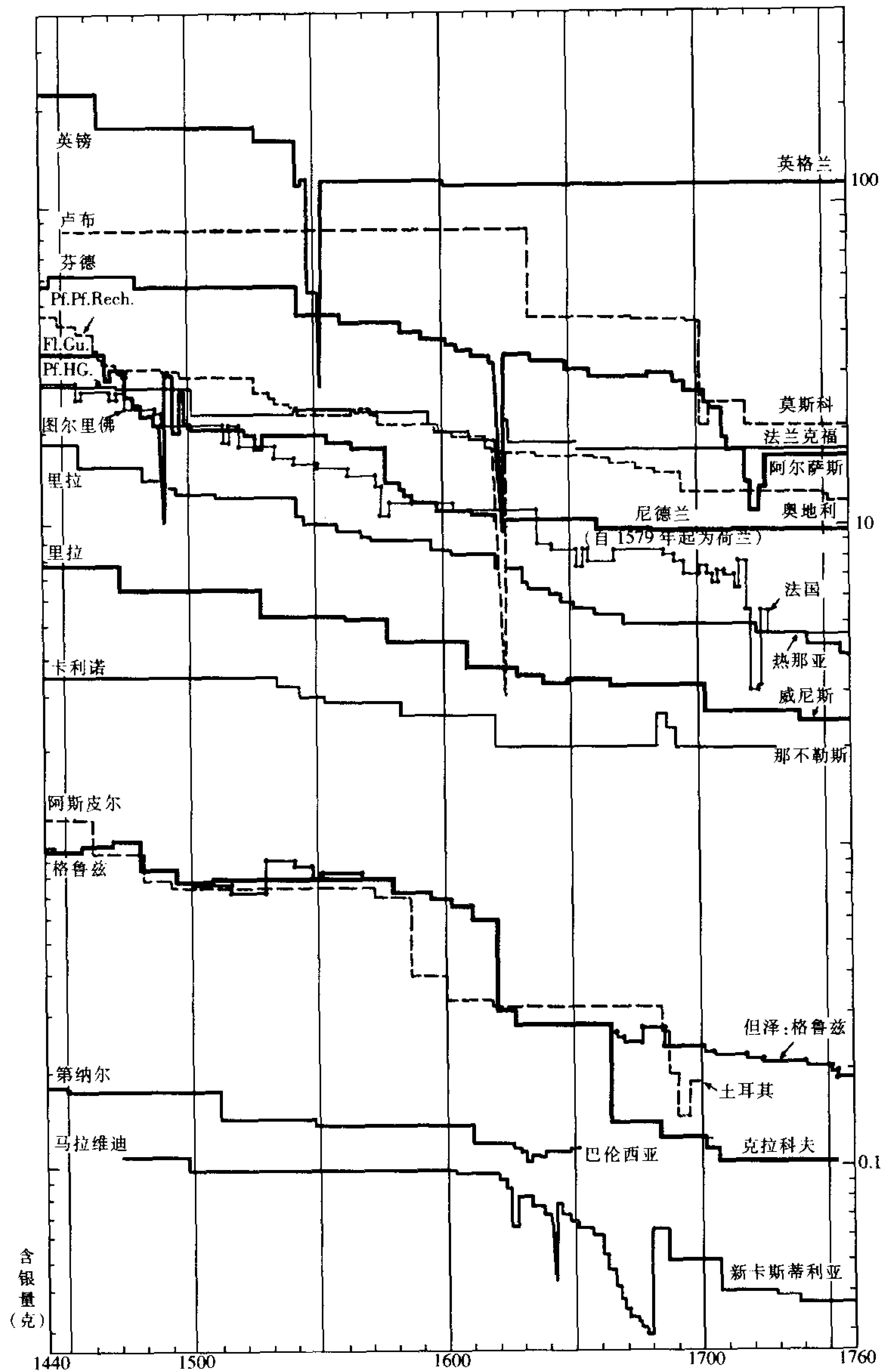


图 4 根据其含银量多少排列的欧洲核算货币

[Pf. Pf. Rech.：芬德、芬尼、(核算) 古尔登；
Fl. Gu.：弗罗林，1579 年后为荷兰盾；Pf. H. G.：芬德、赫勒、荷兰盾。所给出的卢布和阿斯皮尔的价值是大约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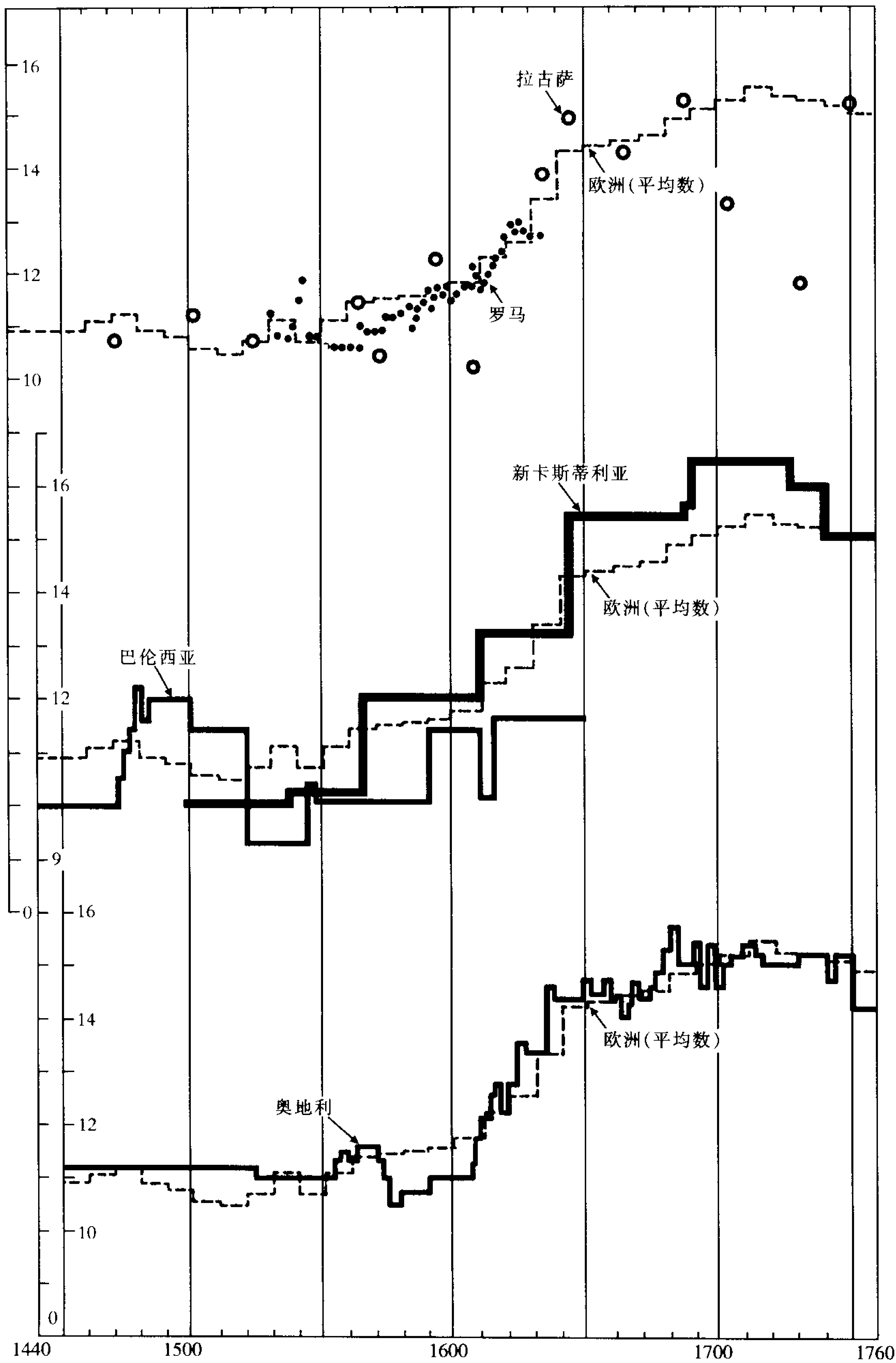


图 5　欧洲复本位制下的金银比价（算术比率，黄金单位为 1）　【4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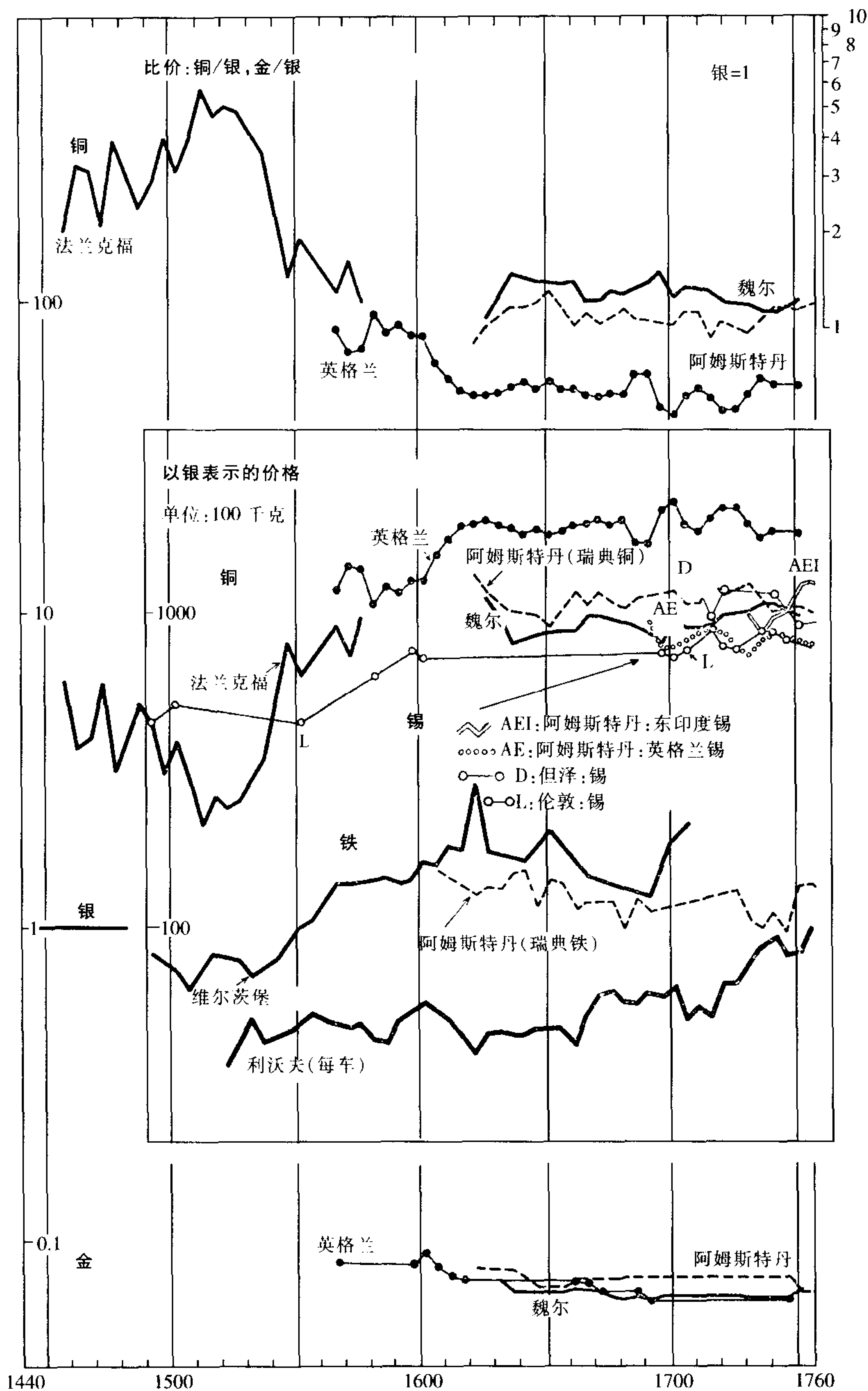


图 6　金属的价格：5 年的平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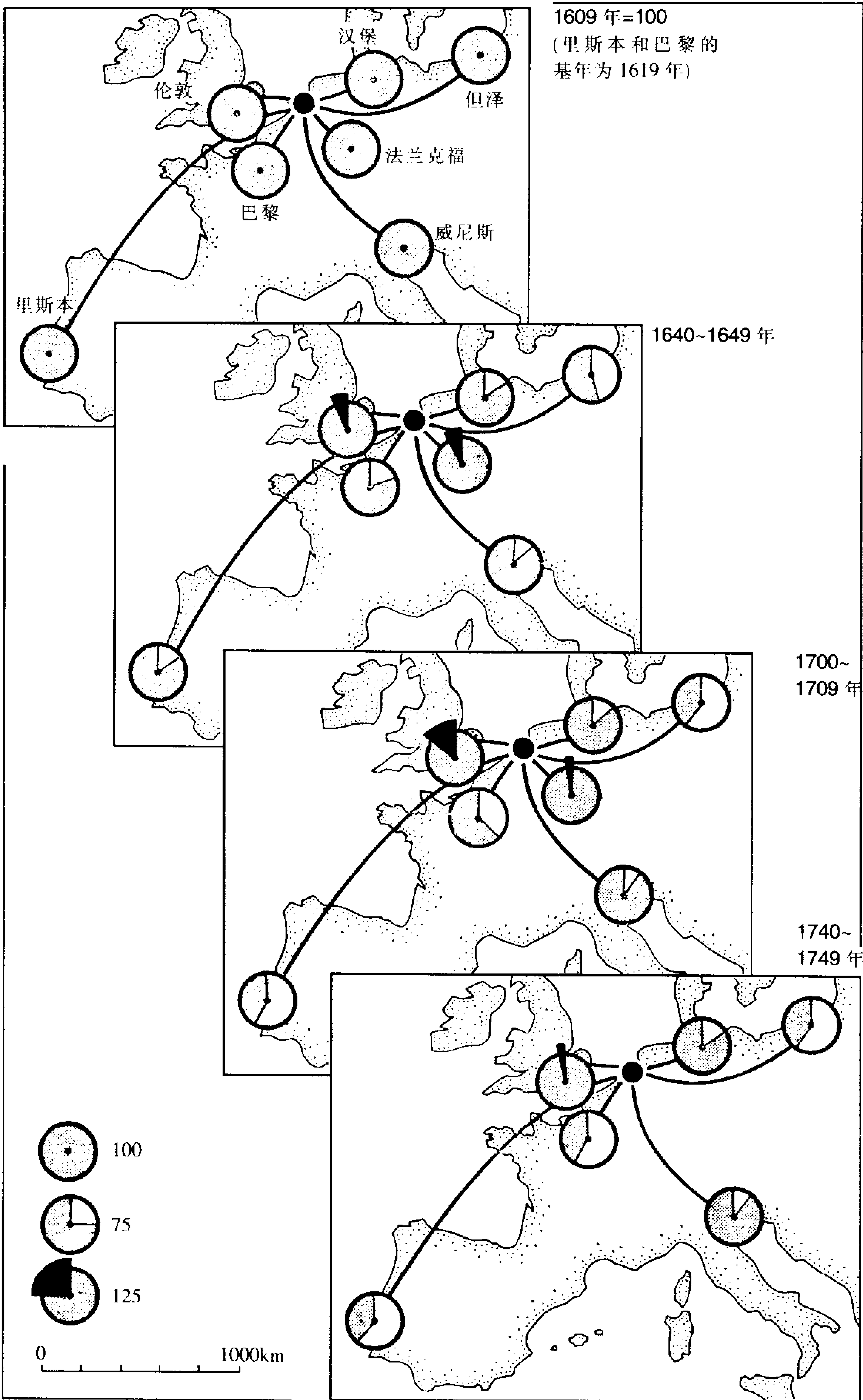


图7 阿姆斯特丹的汇率

【461】

资料来源：N. W. 波斯托缪斯（N. W. Posthum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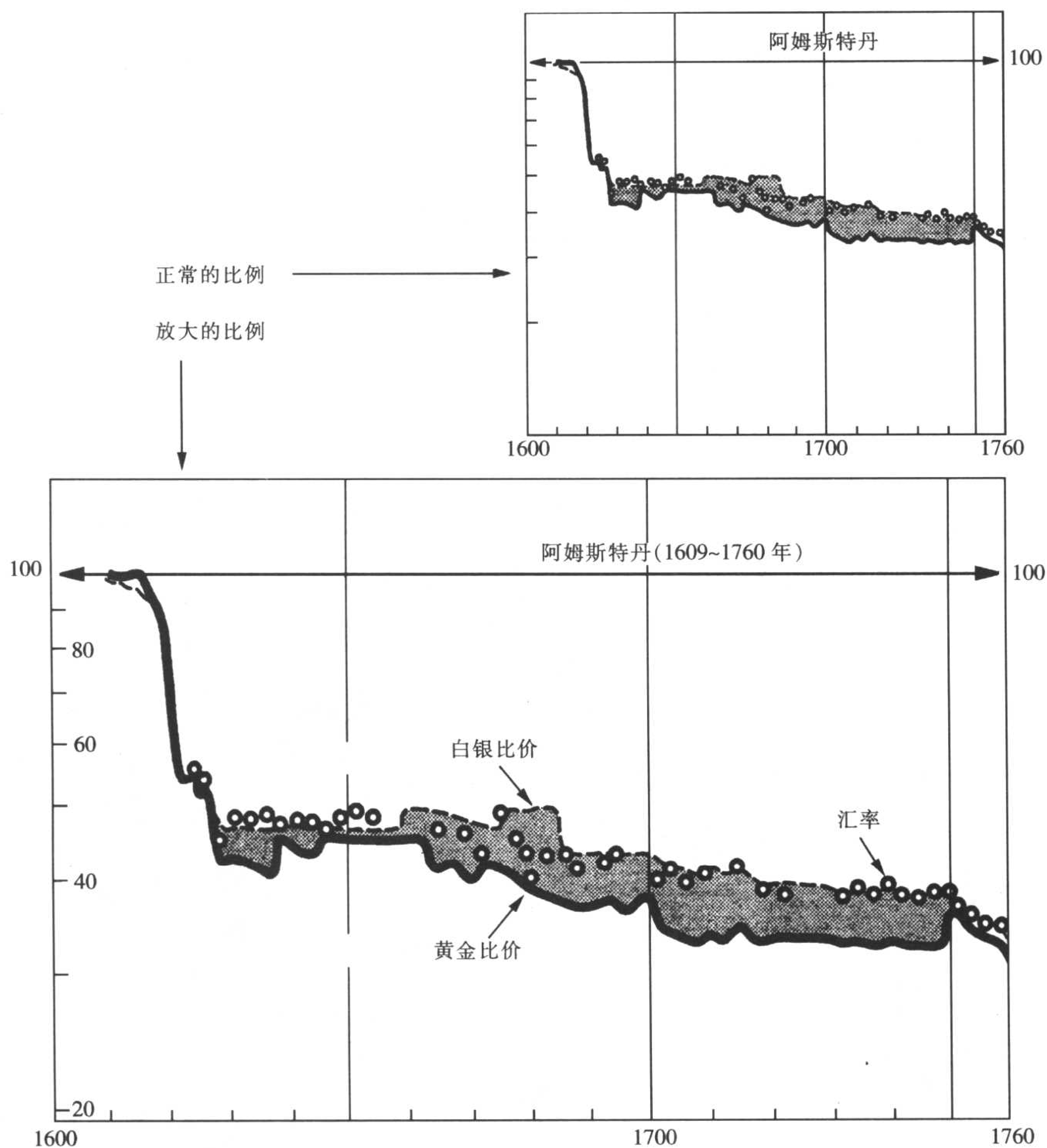


图 8　但泽对阿姆斯特丹的汇率［阿姆斯特丹 1609～1760 年的指数（由核算货币、纯金、纯银所确定的荷兰盾价值的综合指数）值为 100］

【4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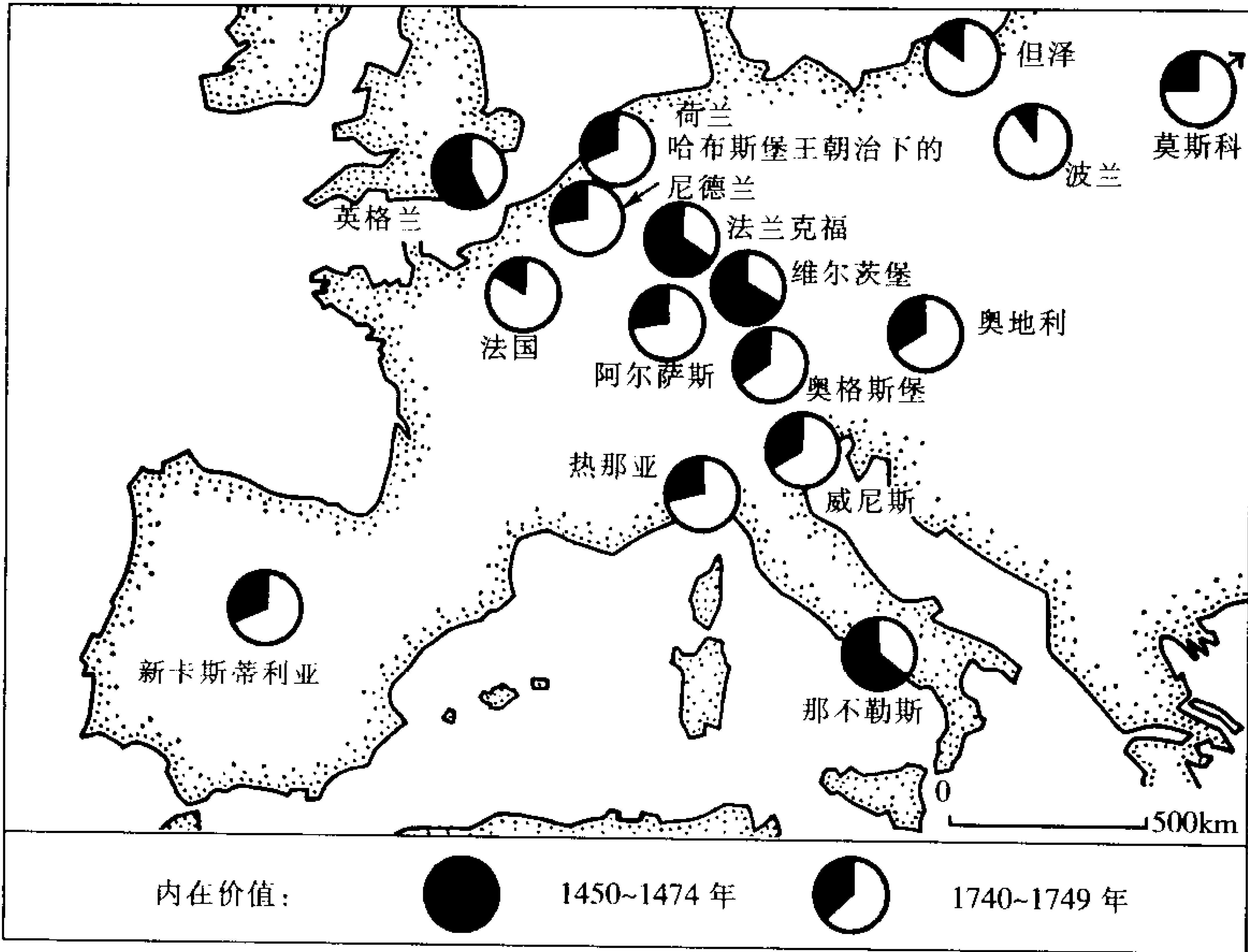


图 9　1450～1750 年间以白银衡量的核算货币贬值程度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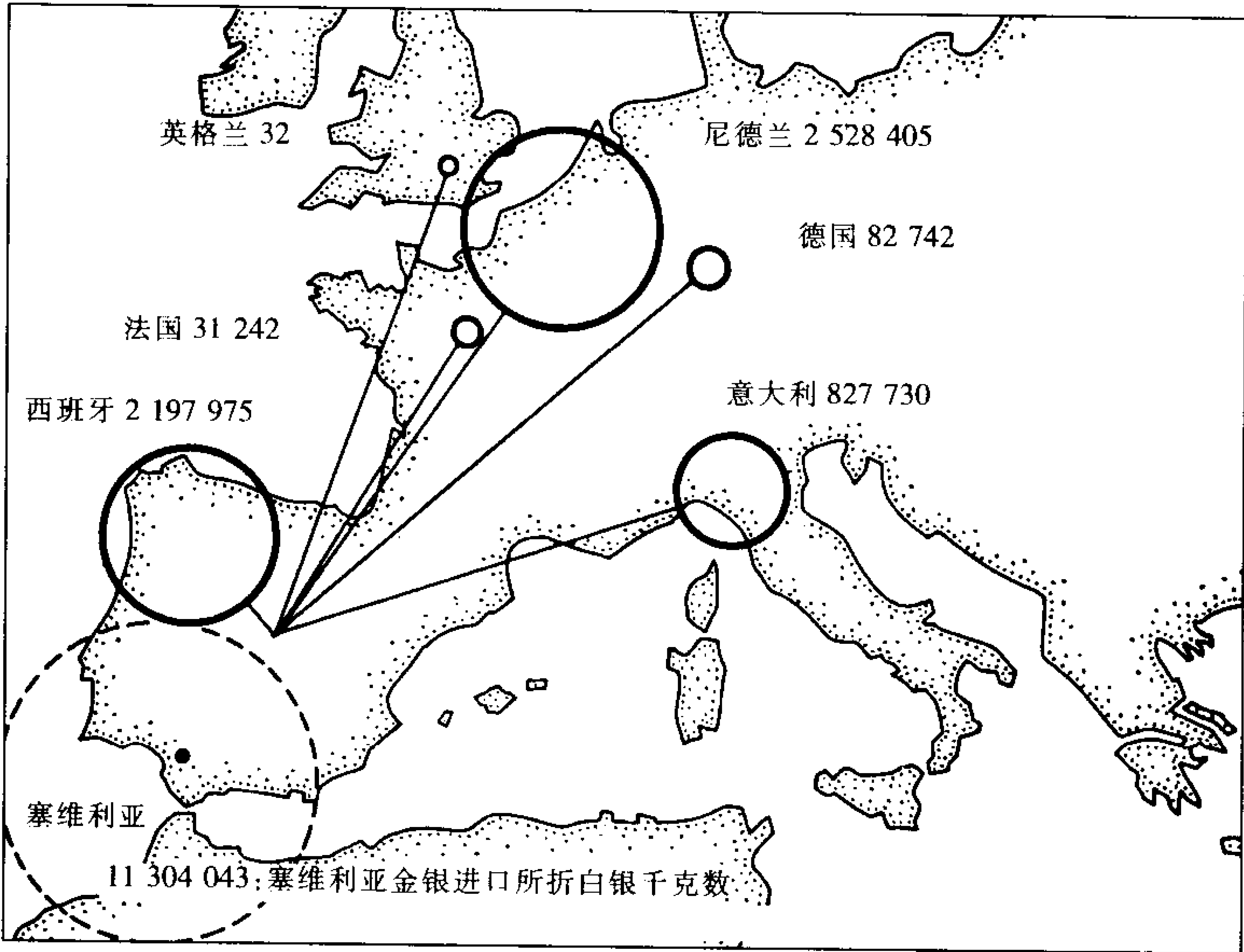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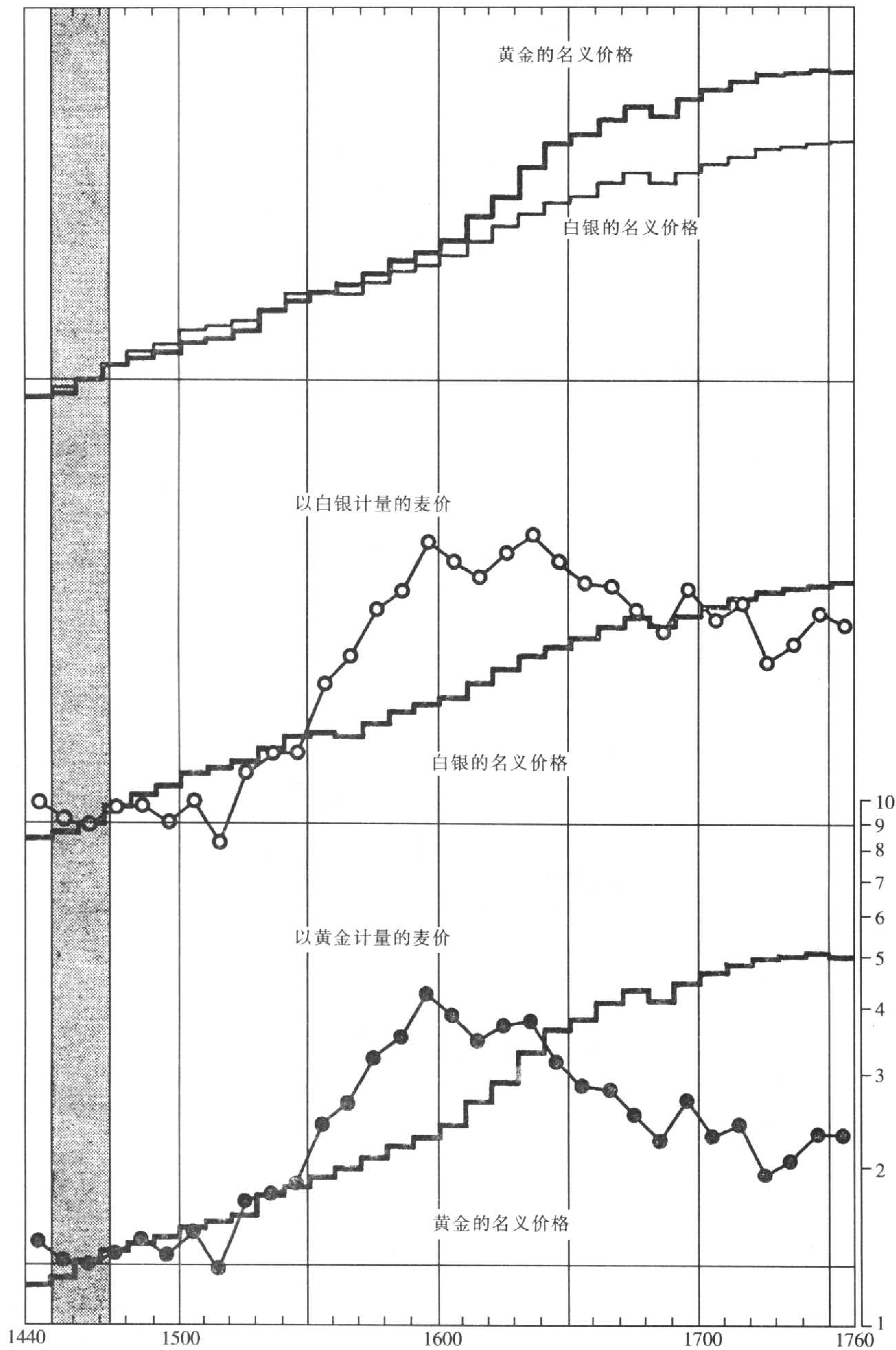


图 10　1580～1626 年间以千克白银衡量的西班牙人的契约支付额　【463】

资料来源：A. 卡斯蒂罗（A. castillo）



【464】

图 11　欧洲小麦价格指数：10 年平均数（1450～1474 年为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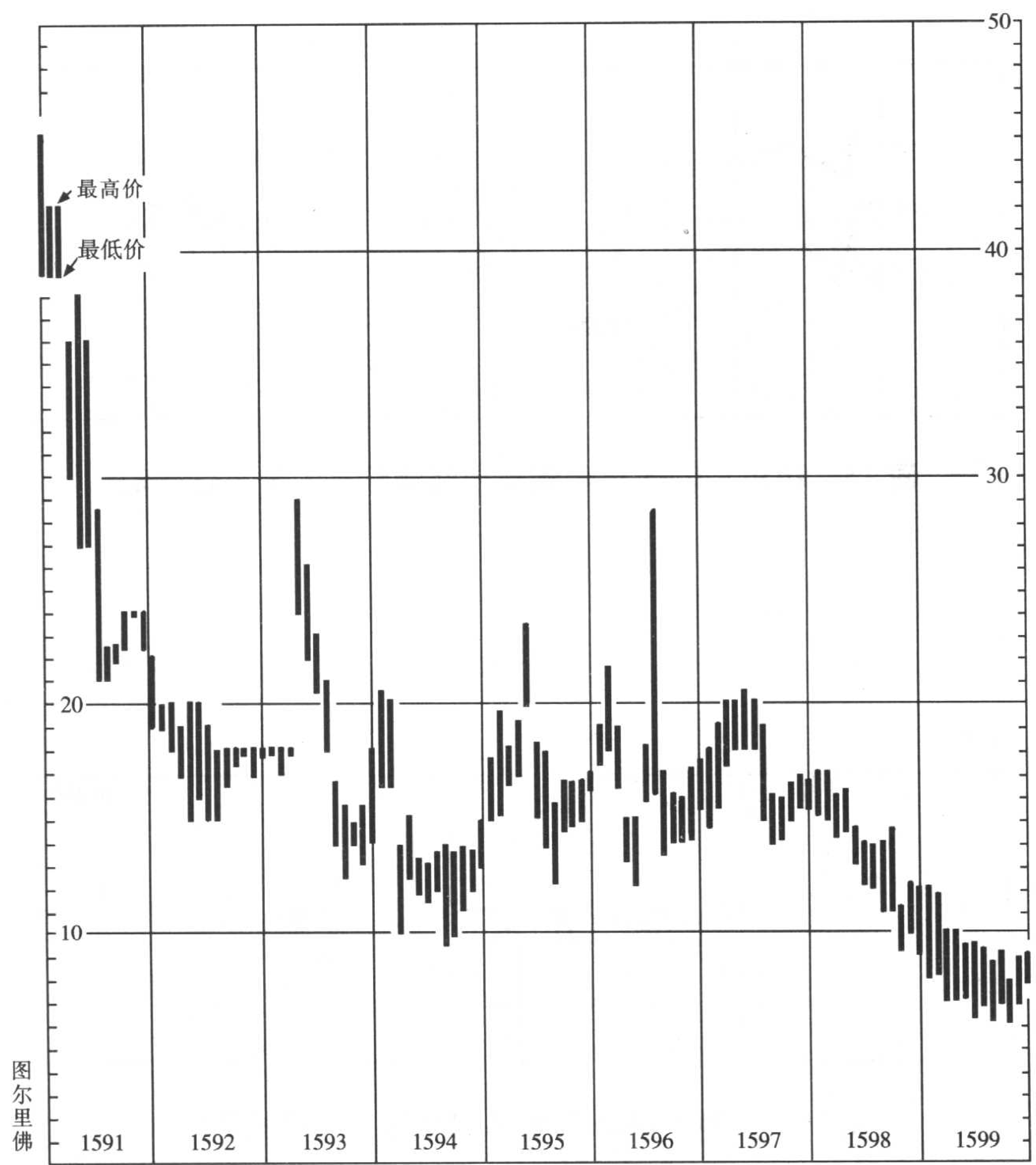


图12　1591～1599年间巴黎食品市场价格表的部分内容，它显示了在巴黎中央菜市场每个月月初以图尔里佛表示的小麦最高价格和最低价格之间的差距

资料来源：M. 鲍兰特和J. 默弗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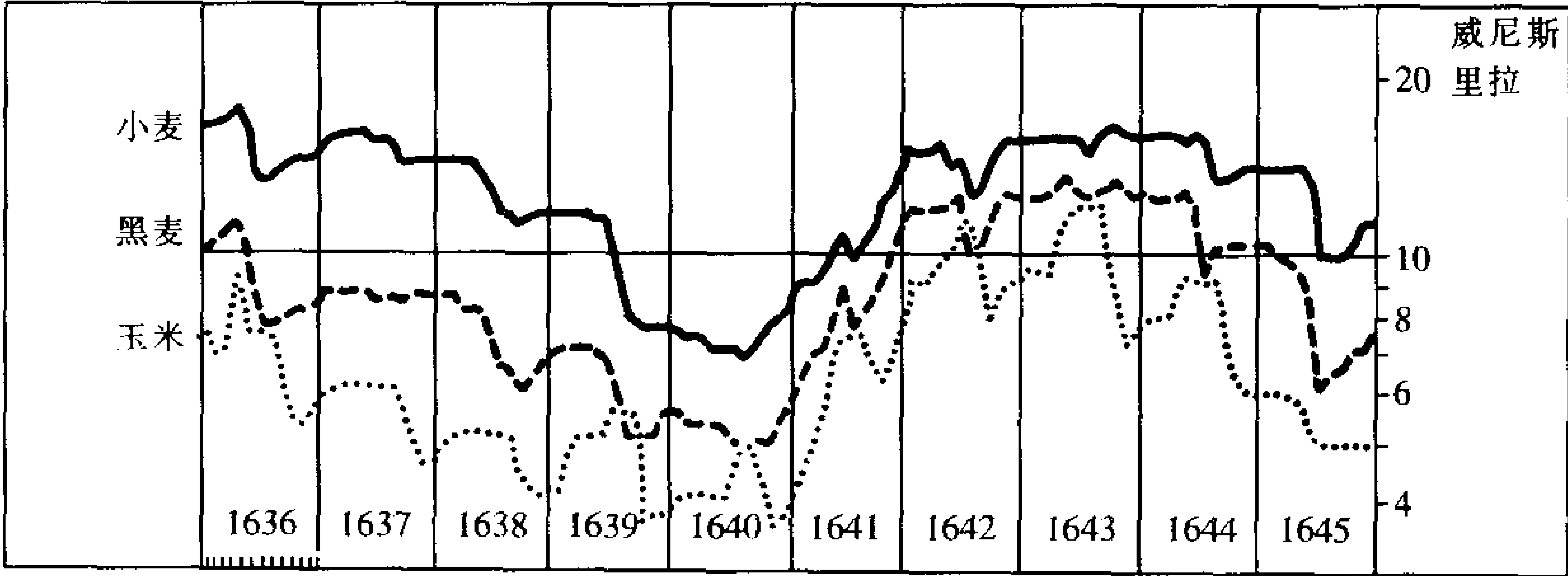


图 13 1636～1645 年间乌迪内谷物价格的季节性变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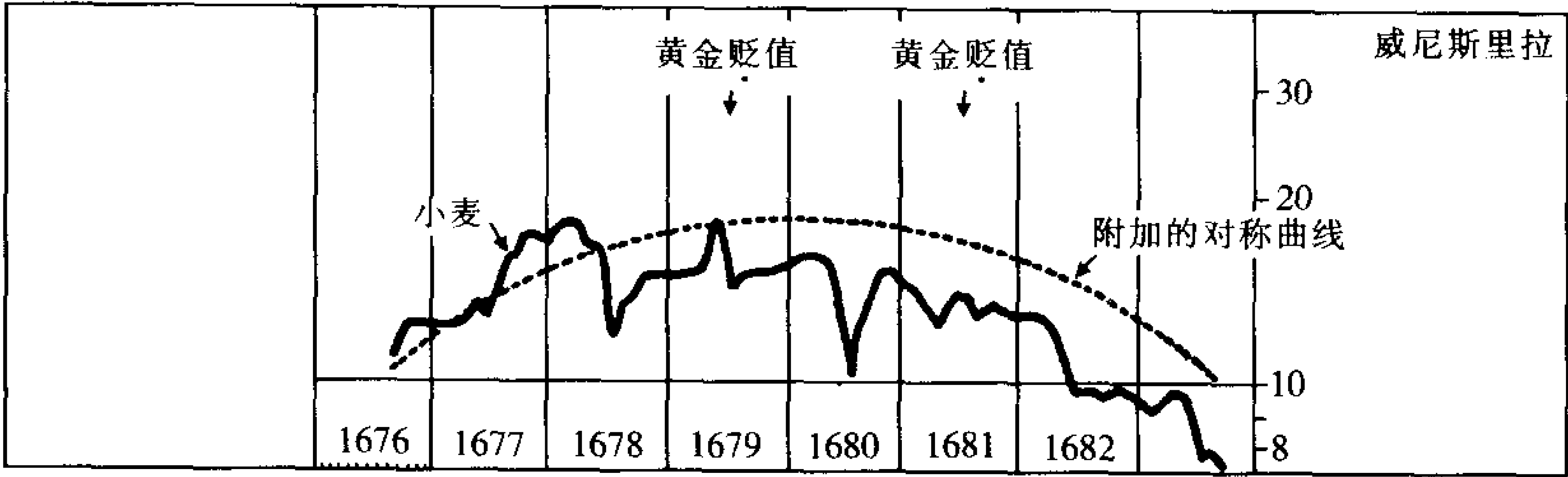


图 14 1676～1683 年间乌迪内的小麦价格周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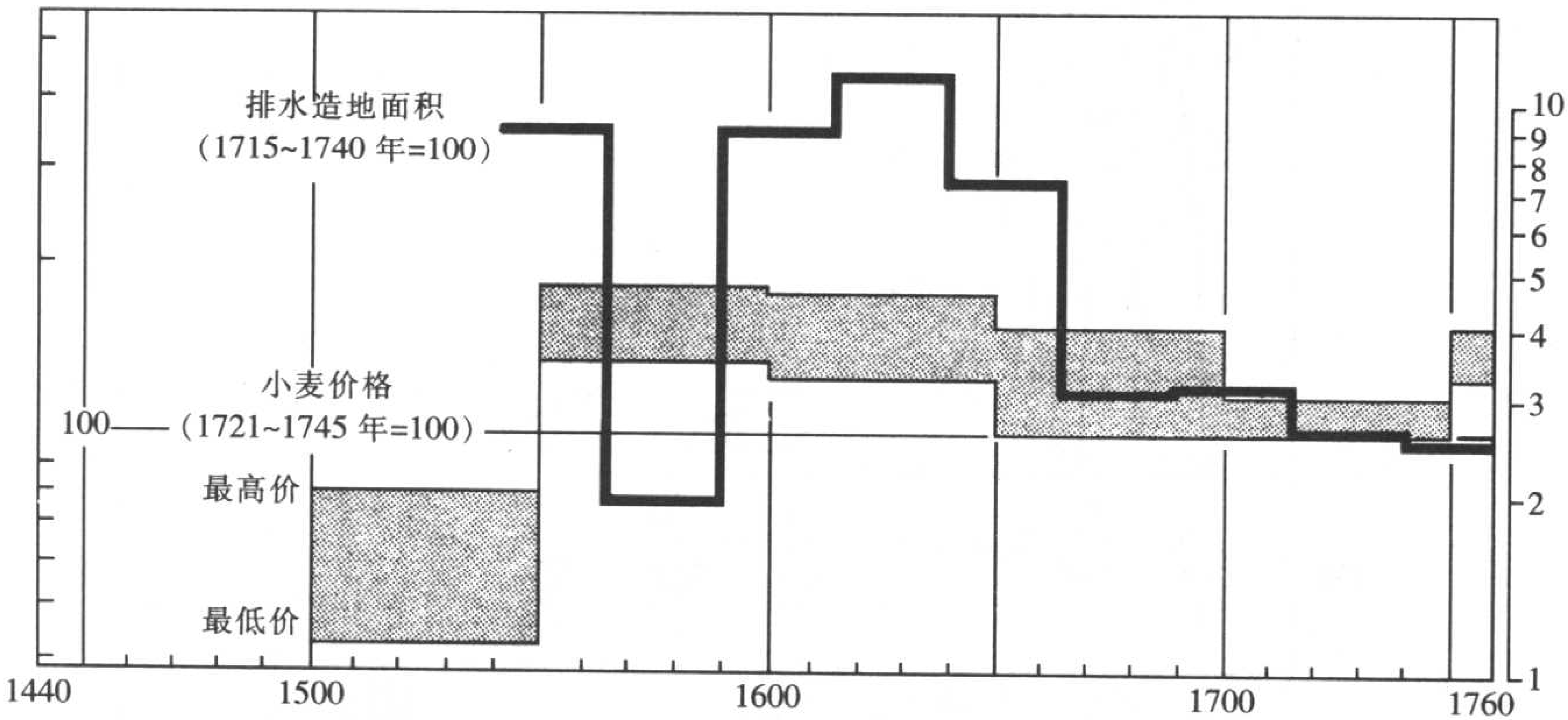


图 15　尼德兰排水造地面积与小麦价格（阴影部分显示小麦的价差）

资料来源：B. H. 斯利克·冯·巴特（B. H. Slicher van Ba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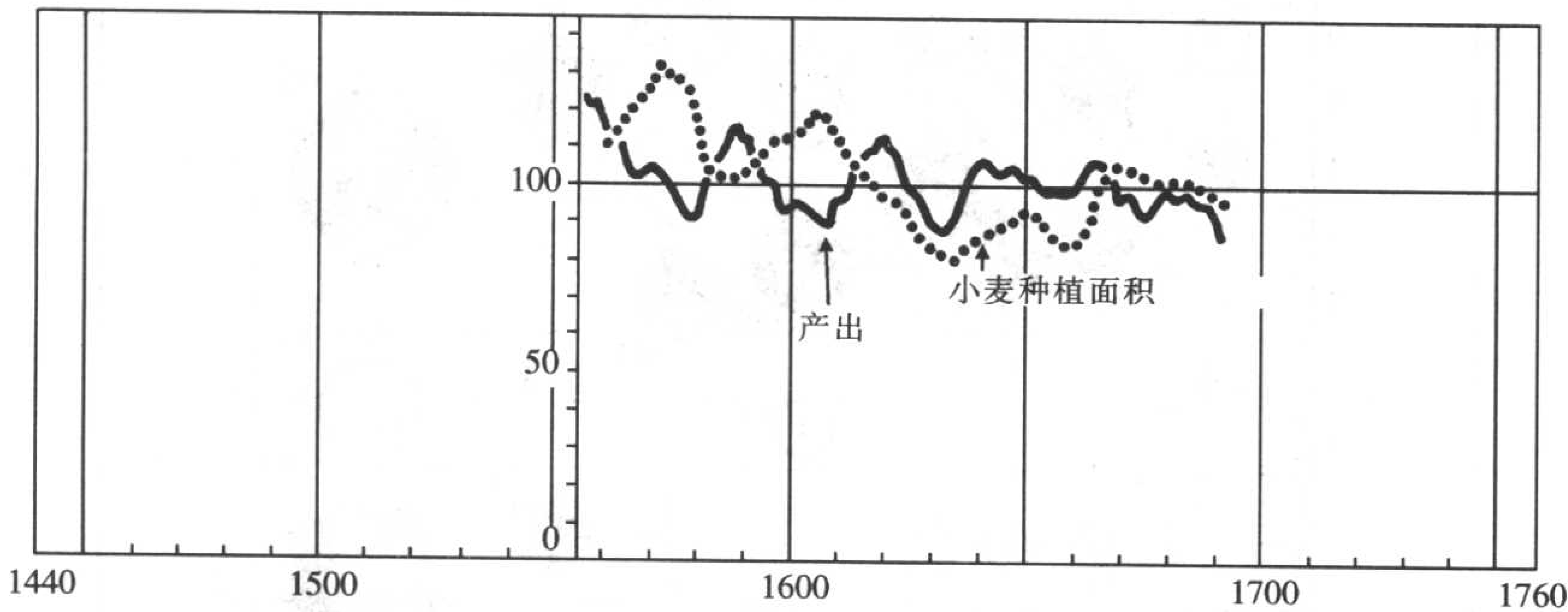


图 16　东普鲁士谷物生产的趋势：11 年移动平均数（1550～1696 年为 100）

资料来源：H. H. 韦希特尔（H. H. Wächt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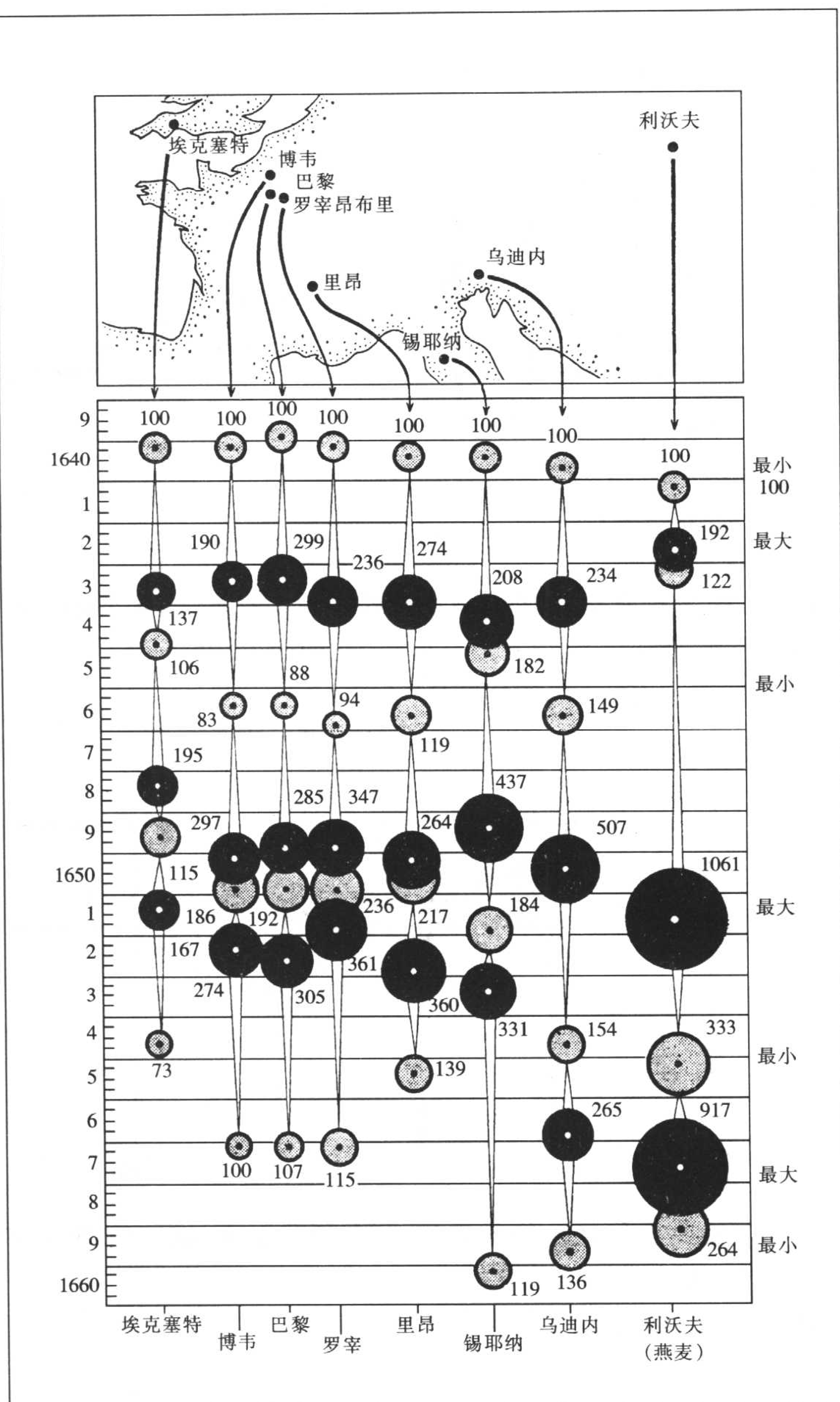


图 17　1639～1660 年间欧洲的一场小麦危机（1639 年第四季度至 1641 年第一季度的基数为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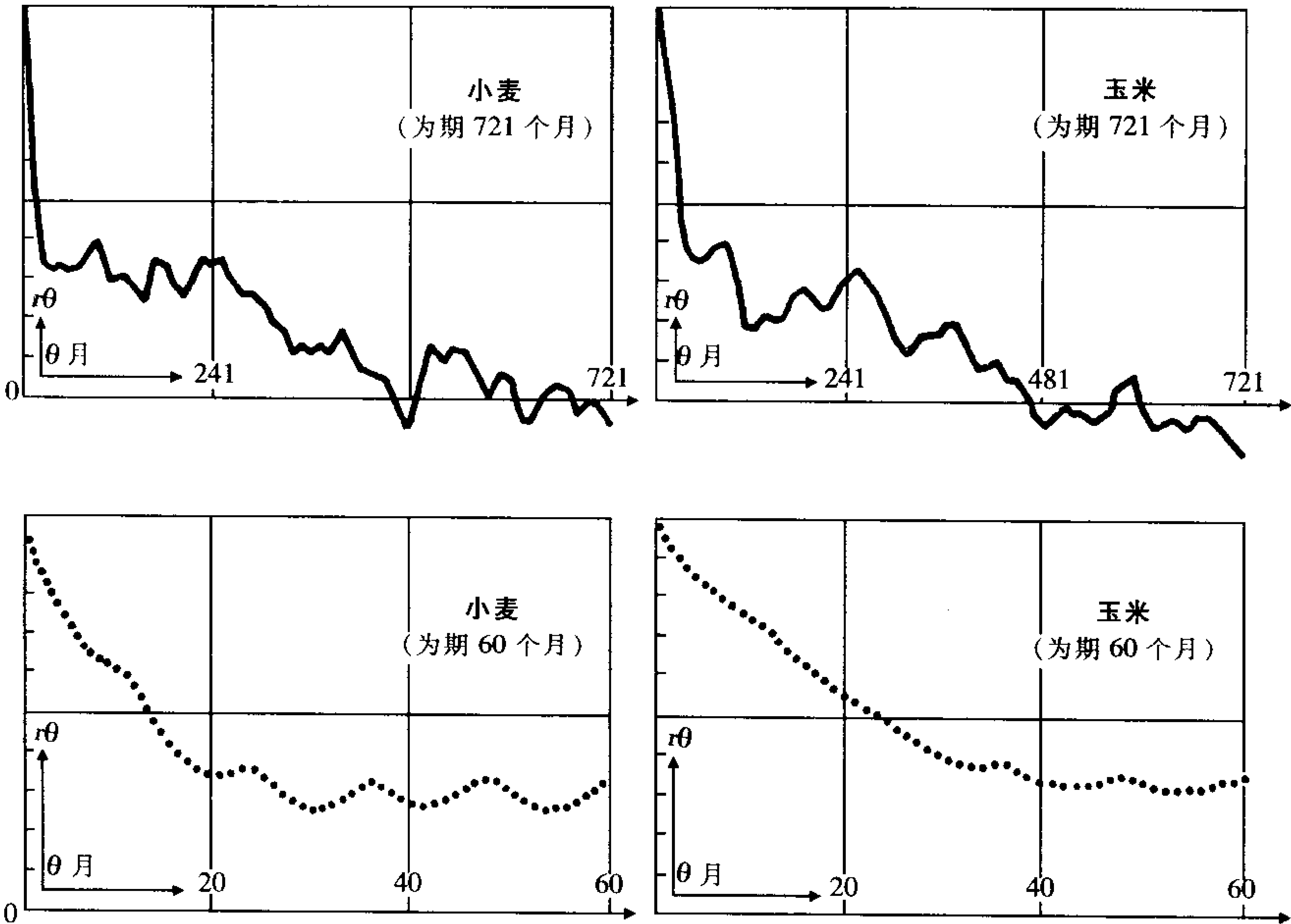


图18 1586～1796年间乌迪内谷物价格相关图 【4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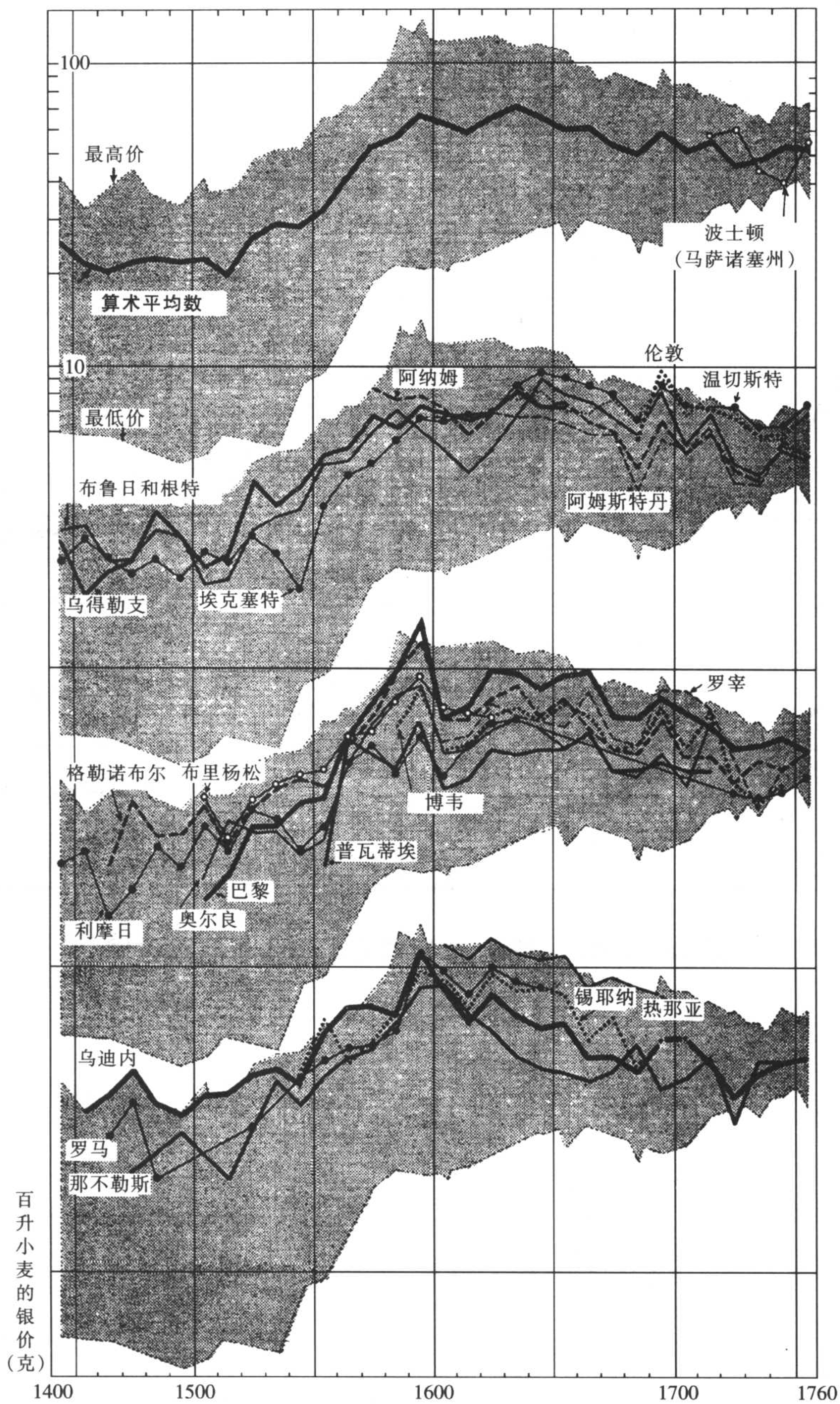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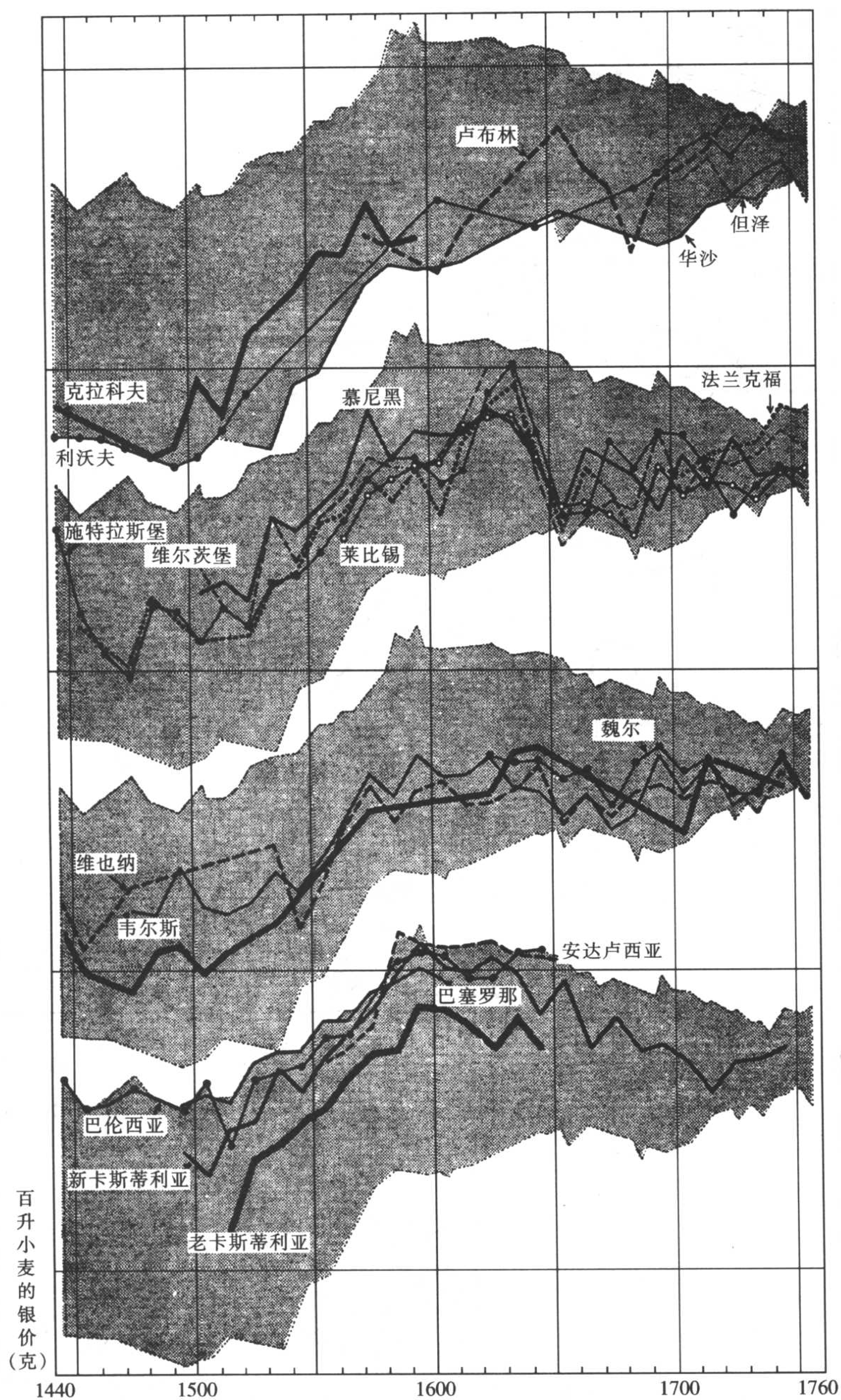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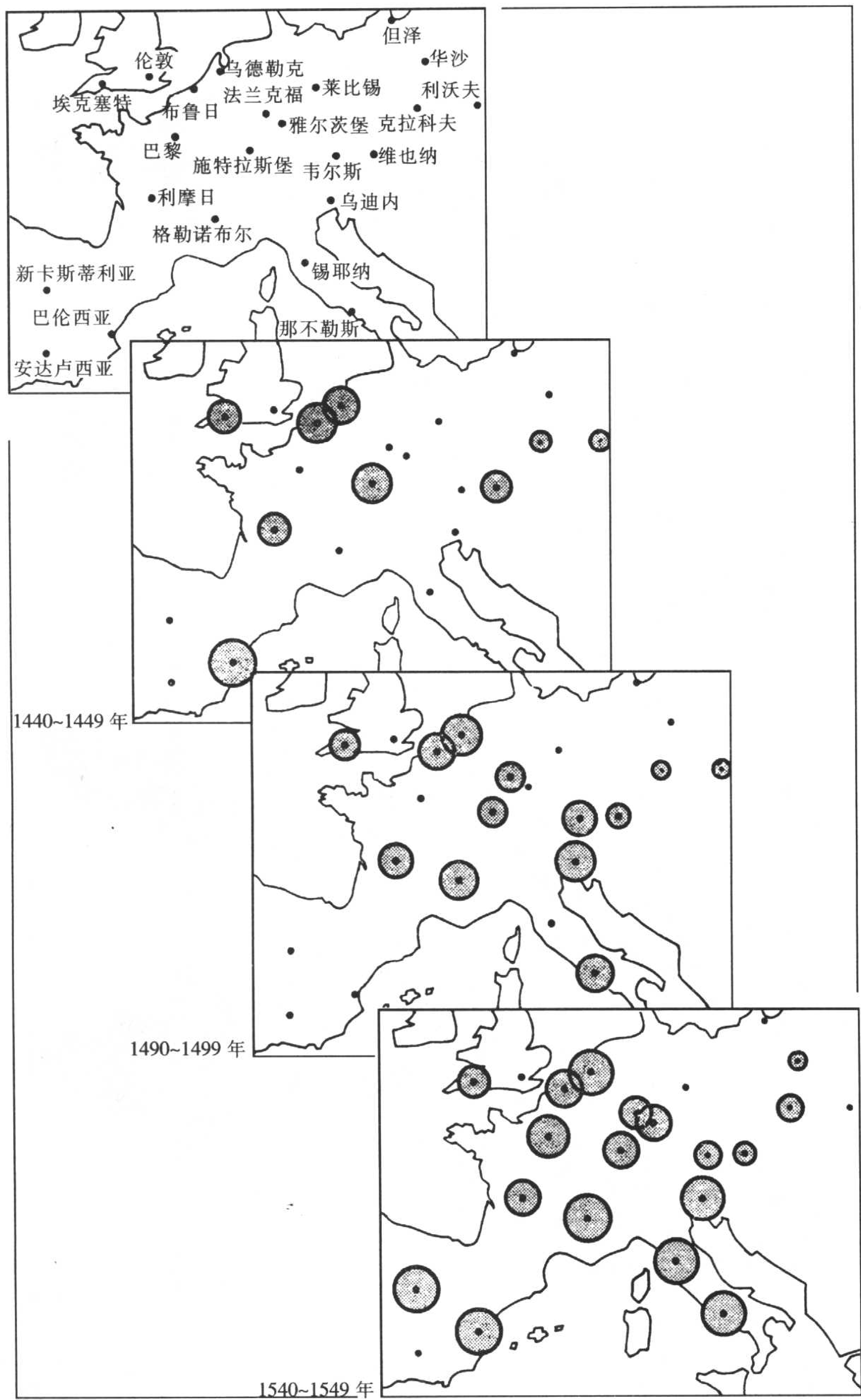


图 19 百升小麦的银价（克）：10 年平均数（阴影部分显示了最高价和最低价之间的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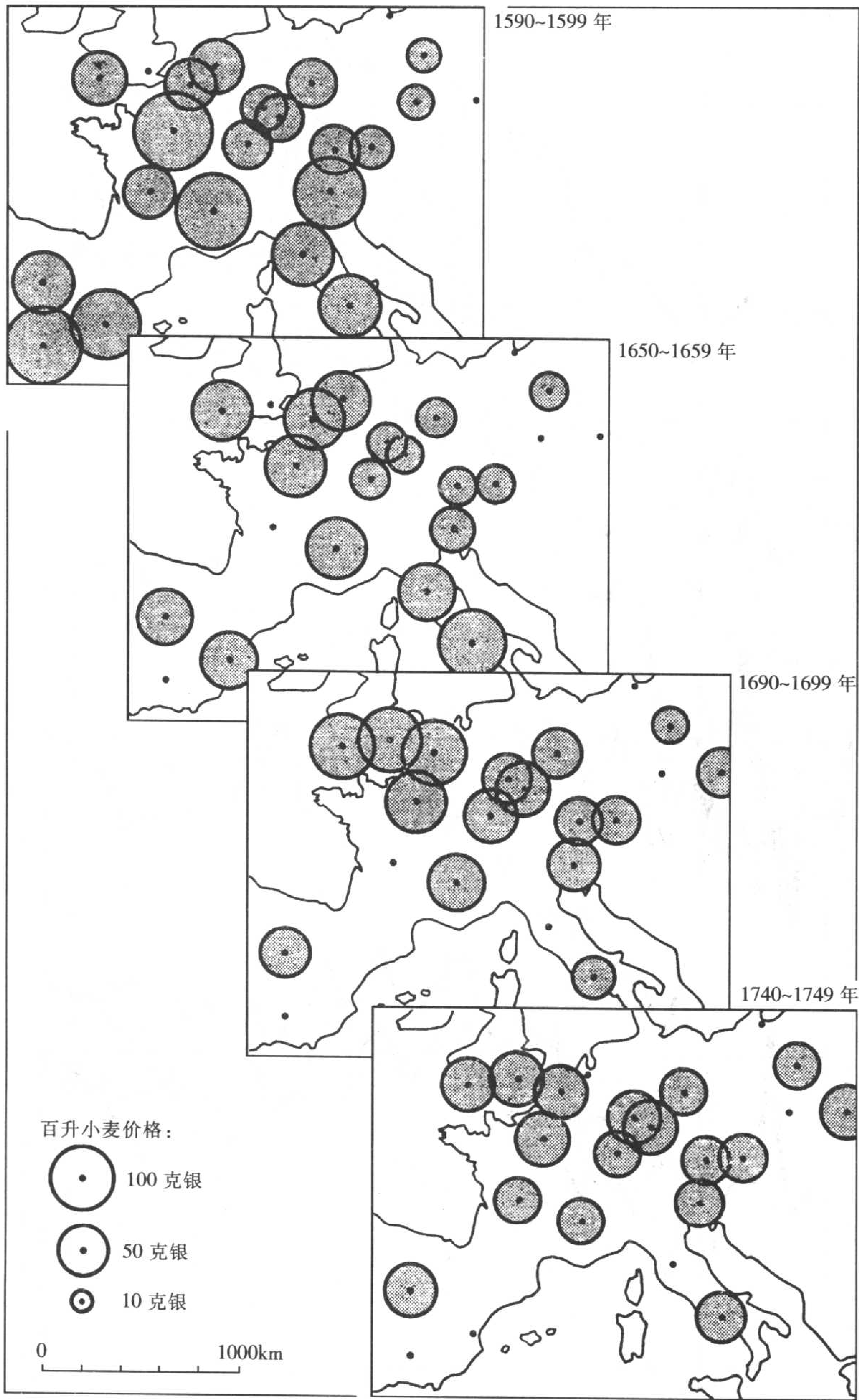
【470】


卢布林
但泽
华沙
克拉科夫
利沃夫
慕尼黑
法兰克福
施特拉斯堡
维尔茨堡
莱比锡
魏尔
维也纳
韦尔斯
安达卢西亚
巴塞罗那
巴伦西亚
新卡斯蒂利亚
老卡斯蒂利亚
百升小麦的银价(克)
1440
1500
1600
1700
1760

【471】



【472】 **图 20　以白银（克）计量的每百升小麦价格的地理分布：10 年平均数**


1590~1599 年
1650~1659 年
1690~1699 年
1740~1749 年
百升小麦价格：
100 克银
50 克银
10 克银
0
1000k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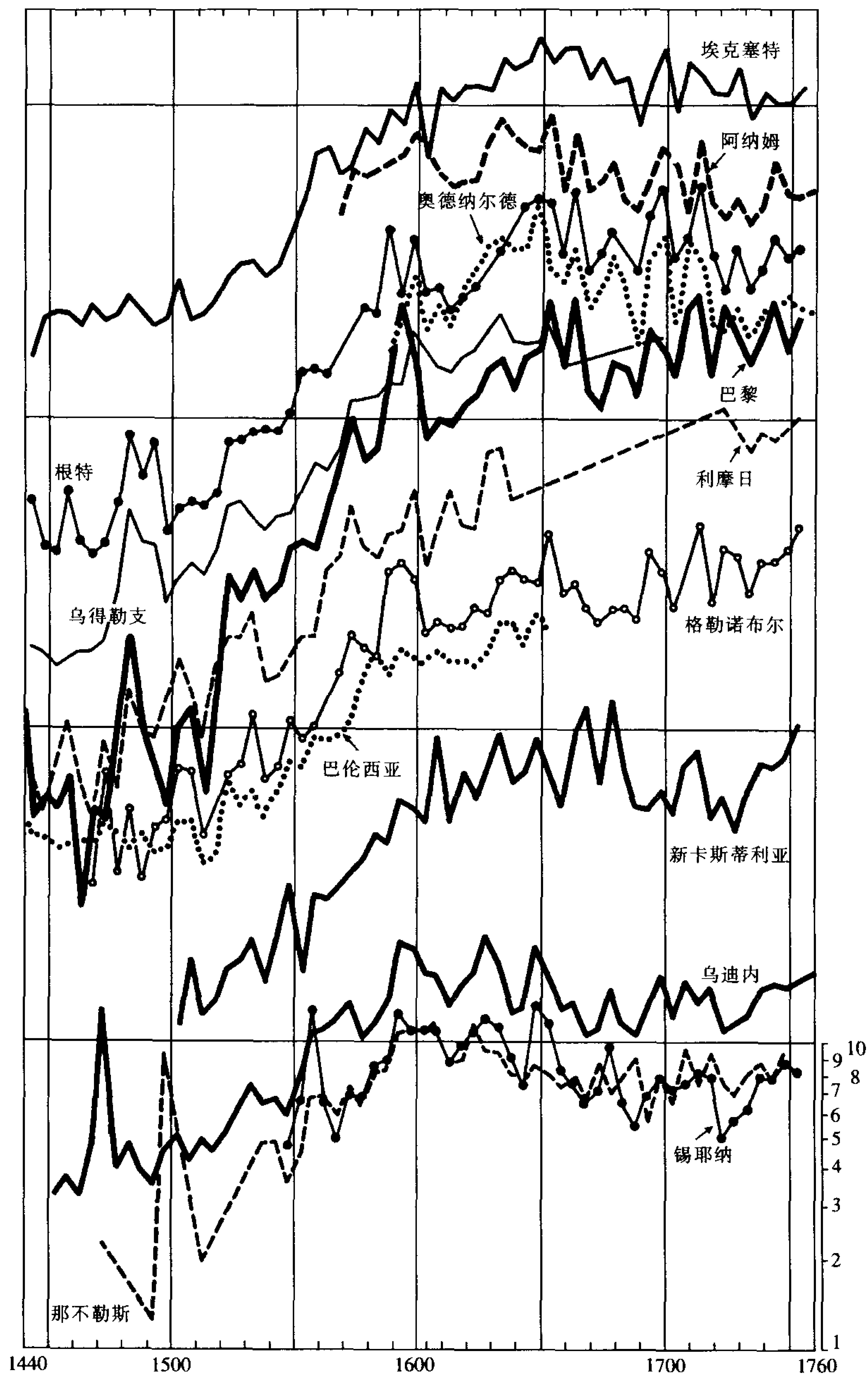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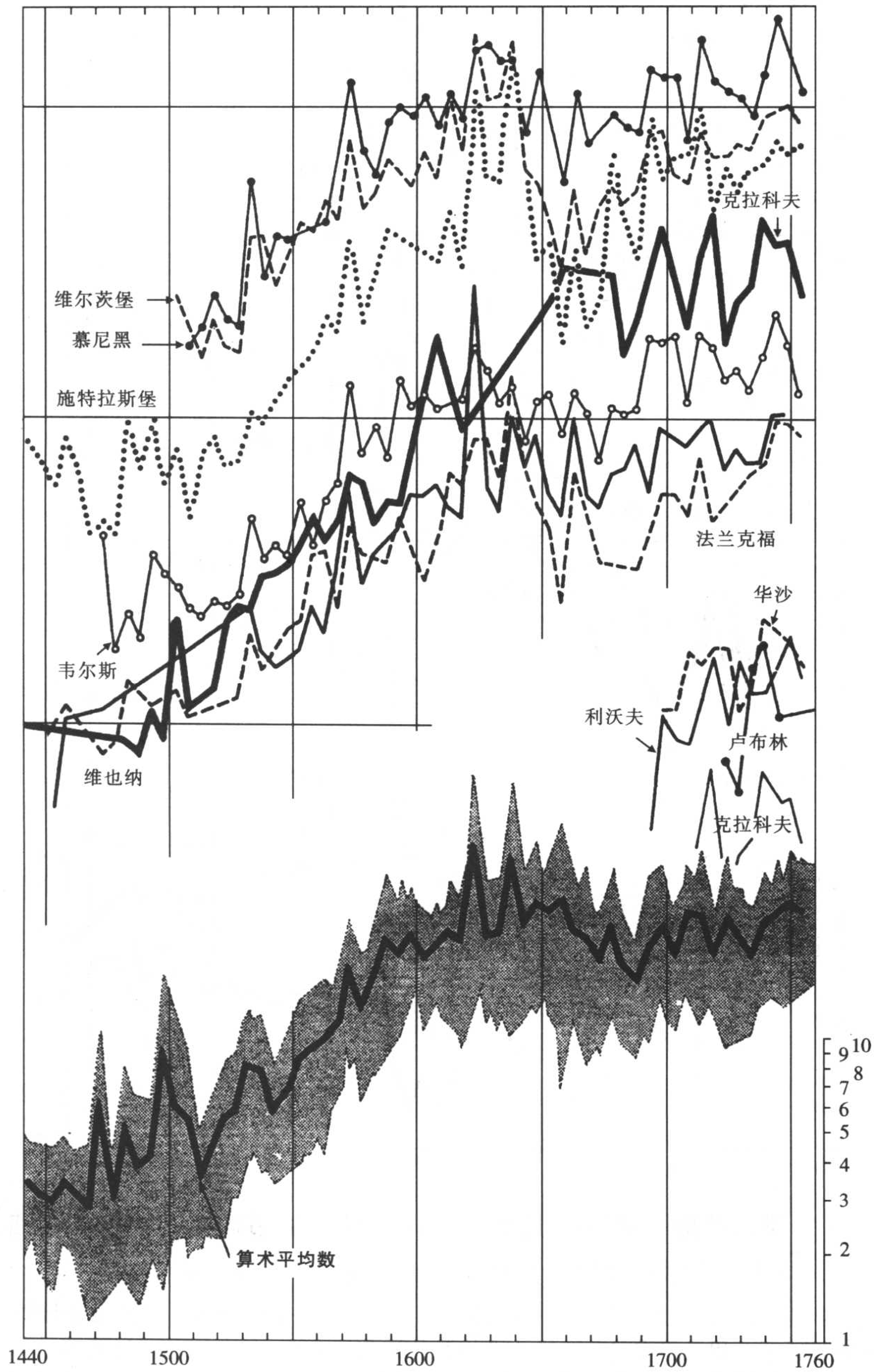


图 21　以核算货币计量的小麦价格：5 年平均数（阴影区域的边界由欧洲 59 个小麦价格系列的图表得出，其中 20 个系列单列）

[474]


维尔茨堡
慕尼黑
施特拉斯堡
韦尔斯
维也纳
克拉科夫
法兰克福
华沙
利沃夫
卢布林
克拉科夫
算术平均数
1440
1500
1600
1700
1760
1
2
3
4
5
6
7
8
9
10

【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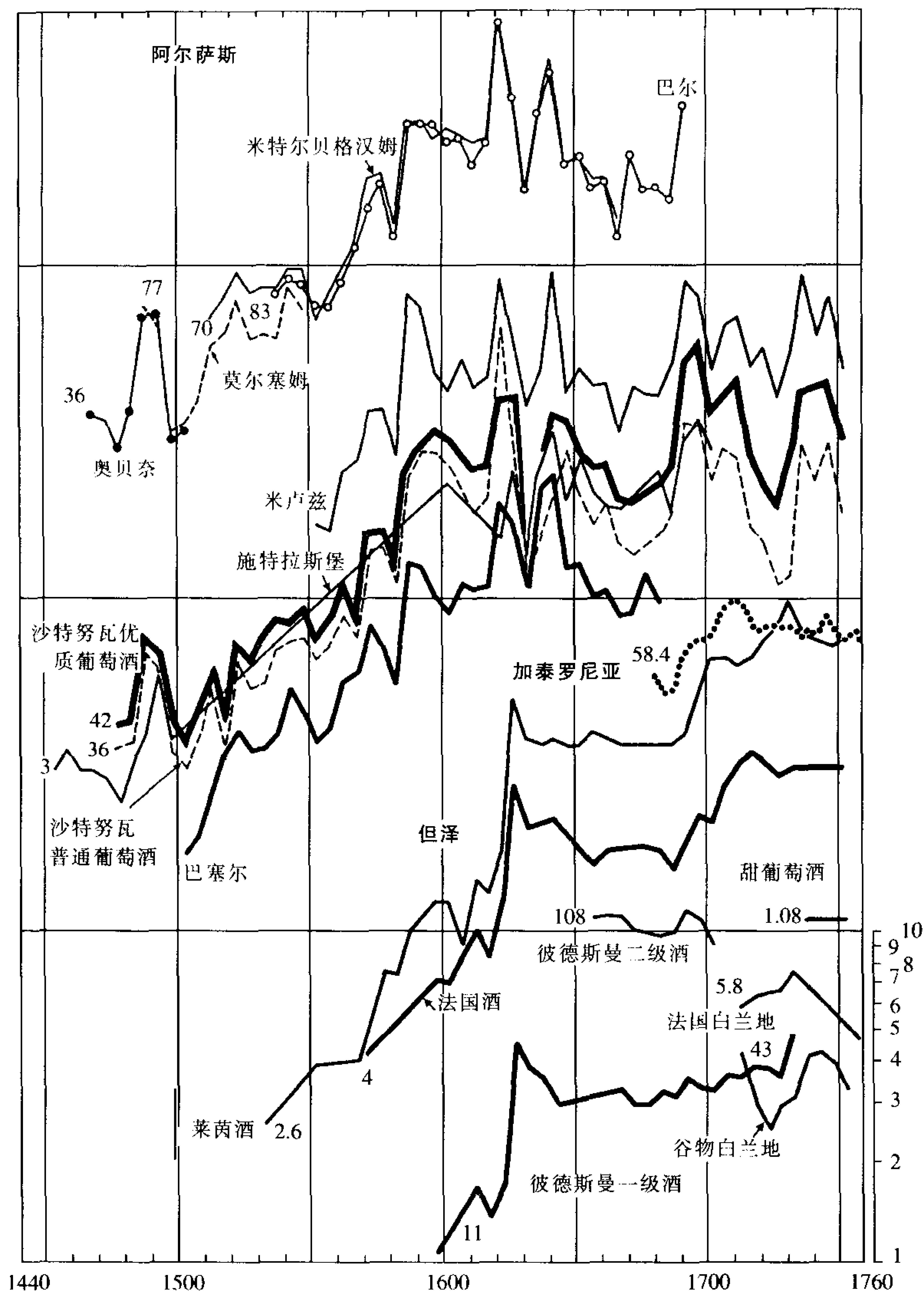


图 22　阿尔萨斯、加泰罗尼亚和但泽以核算货币计量的葡萄酒价格：5 年平均数（图中数字显示了每一价格系列的第一个价格）

阿尔萨斯：以每标准量多少芬尼计算（巴塞尔除外，以每 saum 多少先令计算）。

加泰罗尼亚：巴塞罗那 13 年移动平均数，以每 carrega 多少加泰罗尼亚苏计算。

但泽：以兹罗提计算，甜葡萄酒以 sztof 为计量单位，谷物白兰地以 om 为计量单位，法国白兰地以 wiertel 为计量单位；以格罗兹计算，法国葡萄酒、莱茵地区葡萄酒和彼德斯曼一级酒以 sztof 为计量单位，彼德斯曼二级酒以 om 为计量单位。

【4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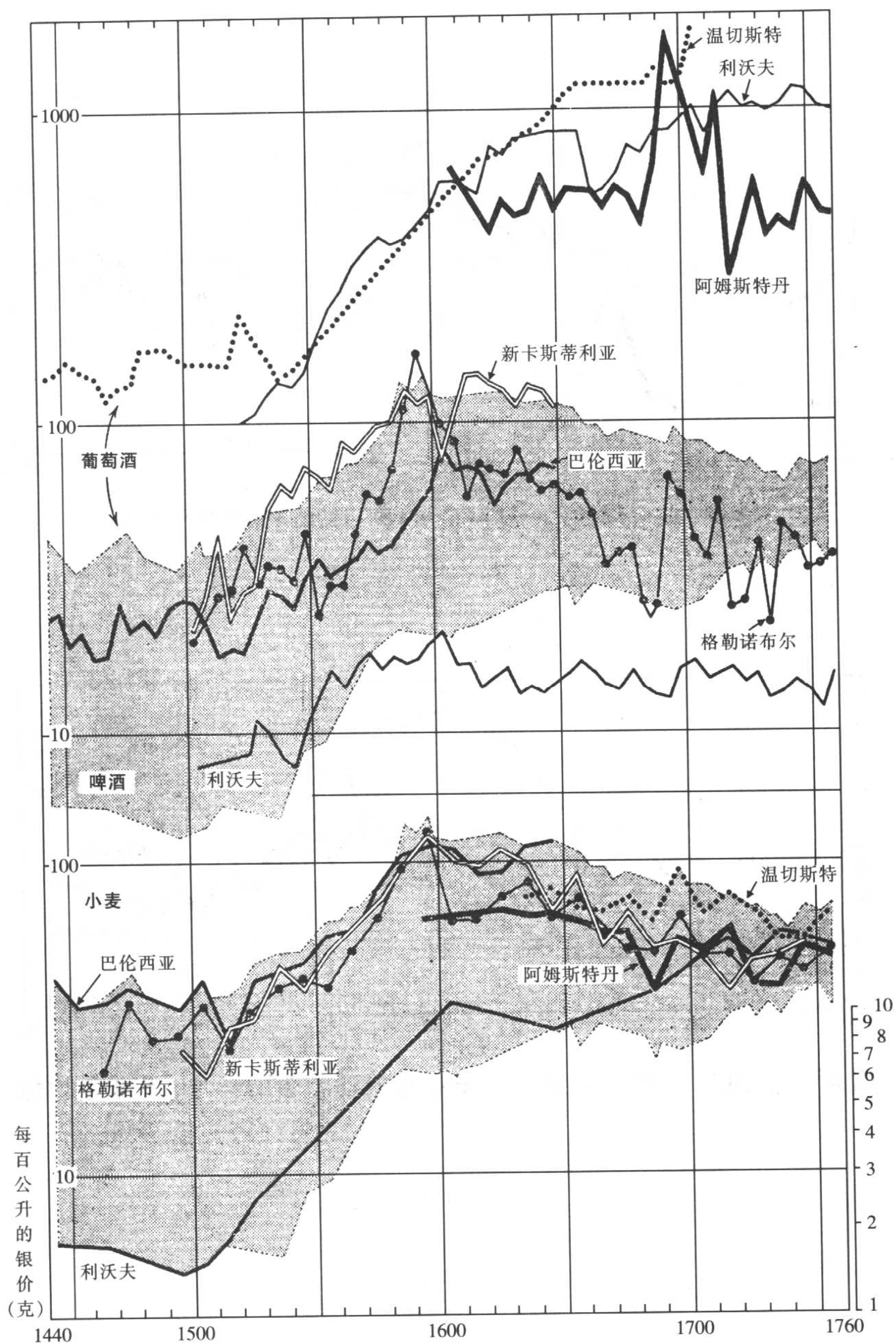


图 23　以白银（克）计量的每百升葡萄酒、啤酒和小麦的价格：5 年平均数（阴影区域显示了麦价的差距）

【4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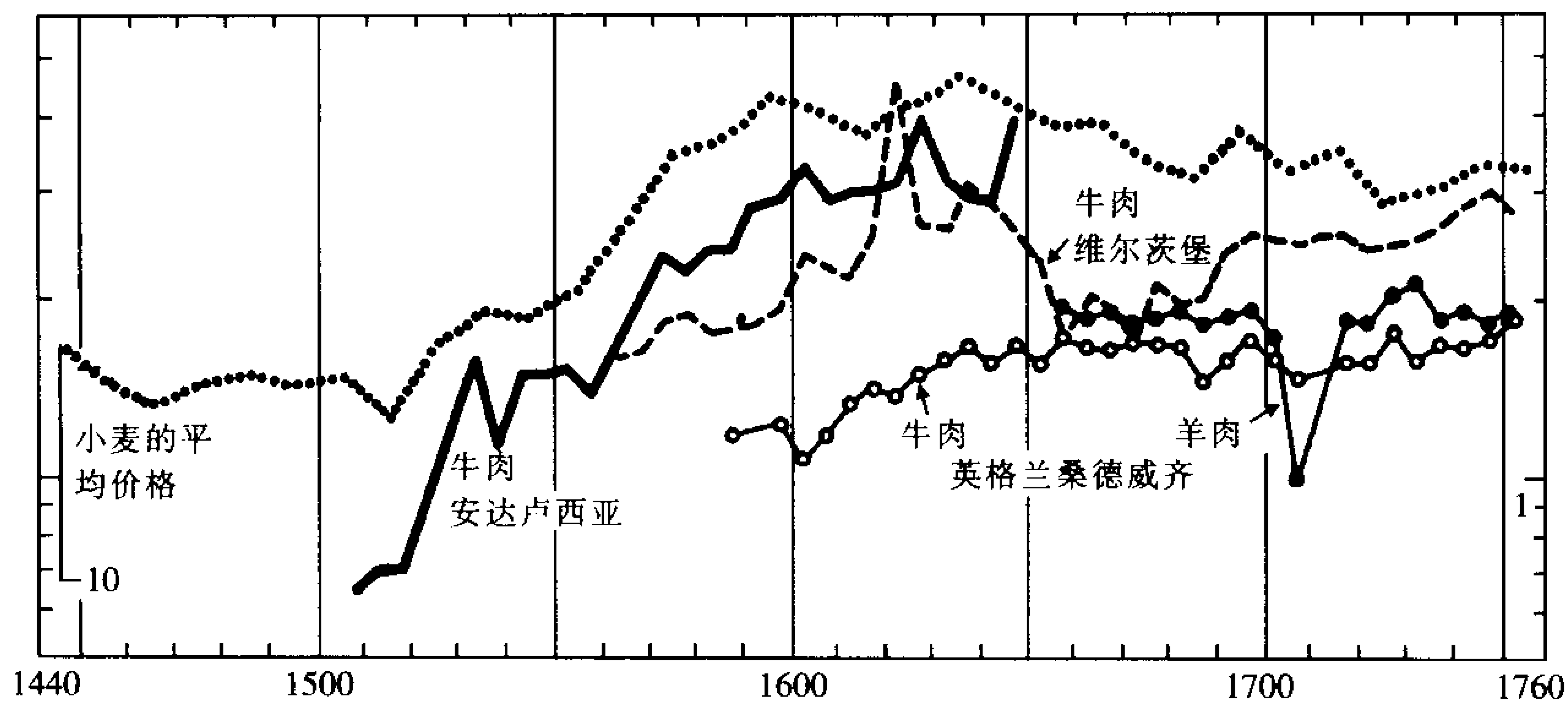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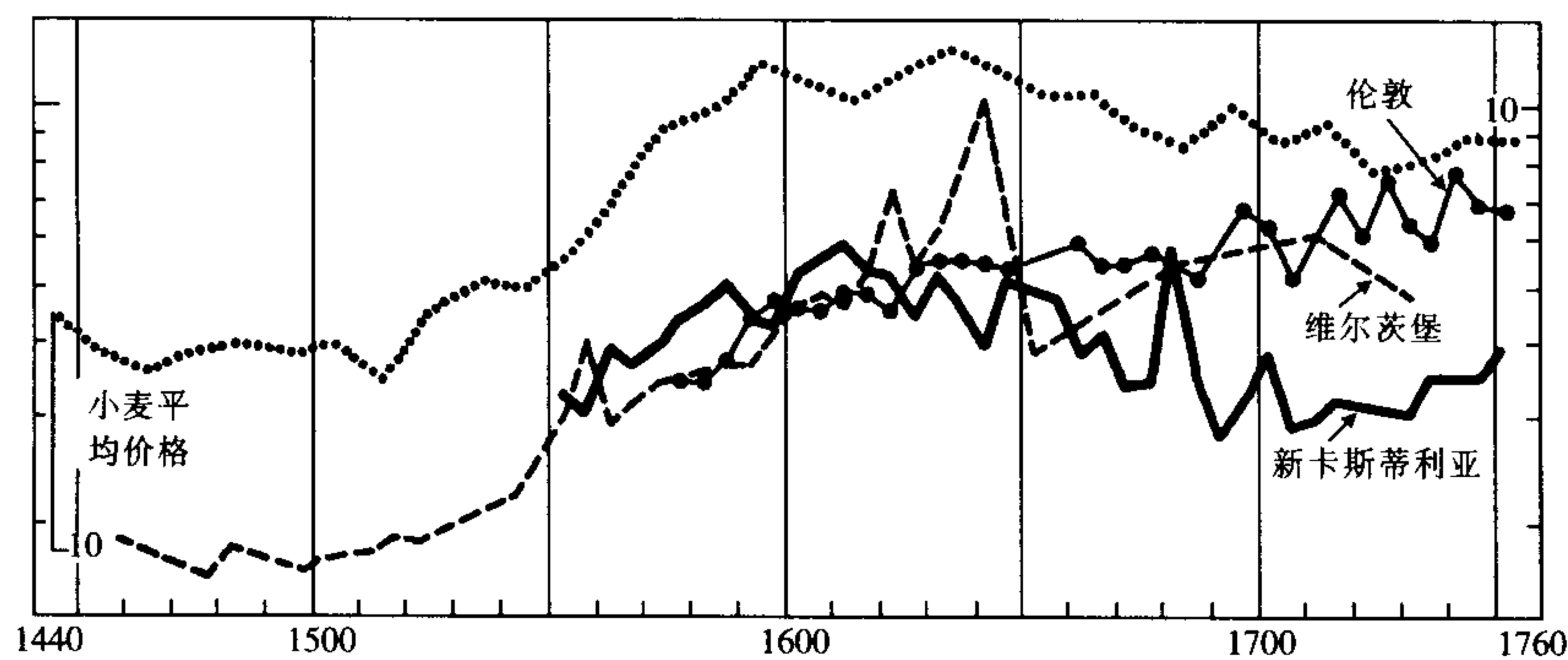


图 24　以白银（克）计量的每千克肉的价格：5 年平均数



[478]

图 25　以白银（克）计量的每千克制蜡动物脂的价格：5 年平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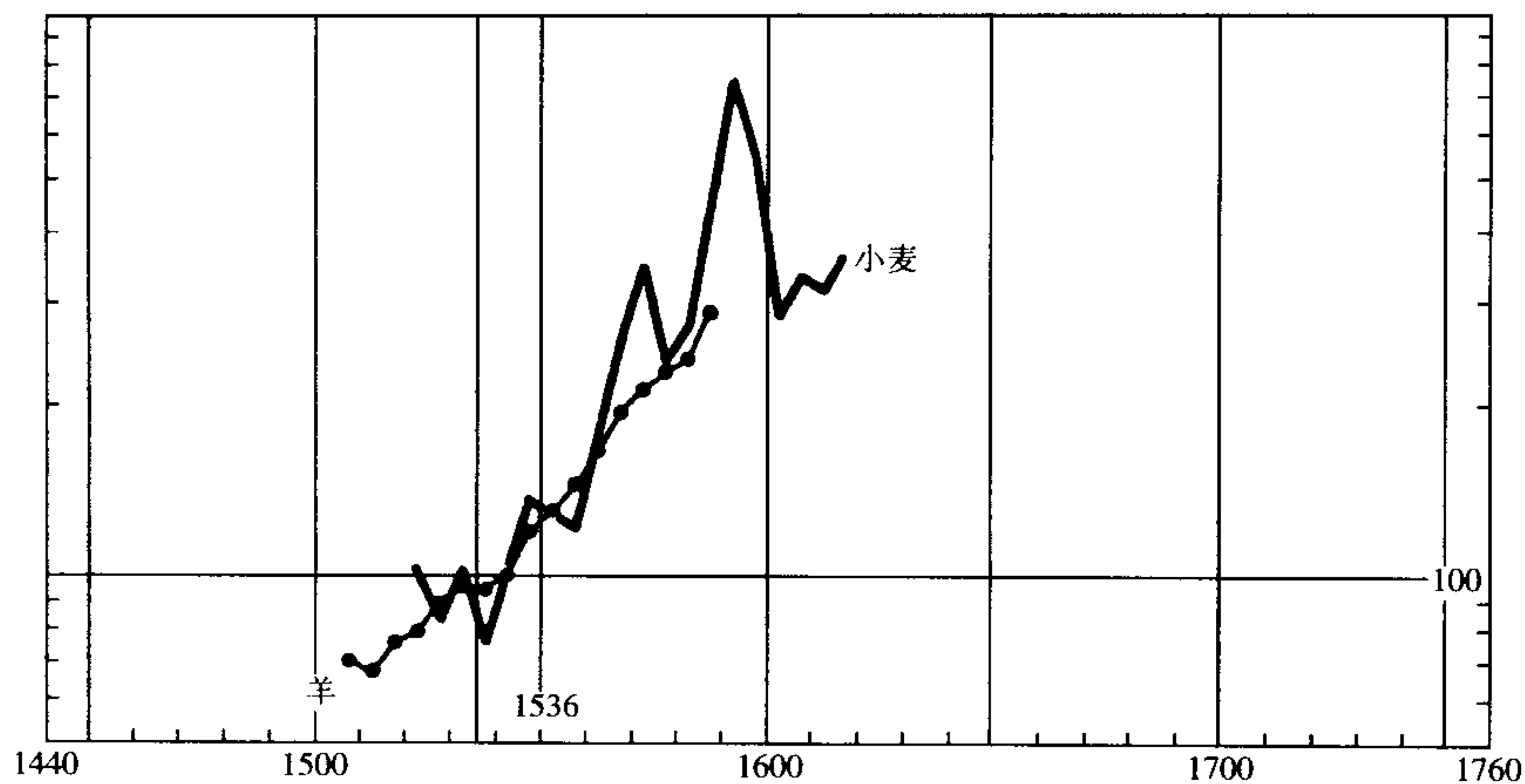


图26　羊和小麦：巴黎名义价格指数：5年平均数
(1536年=100)

资料来源：M. 鲍兰特（M. Baula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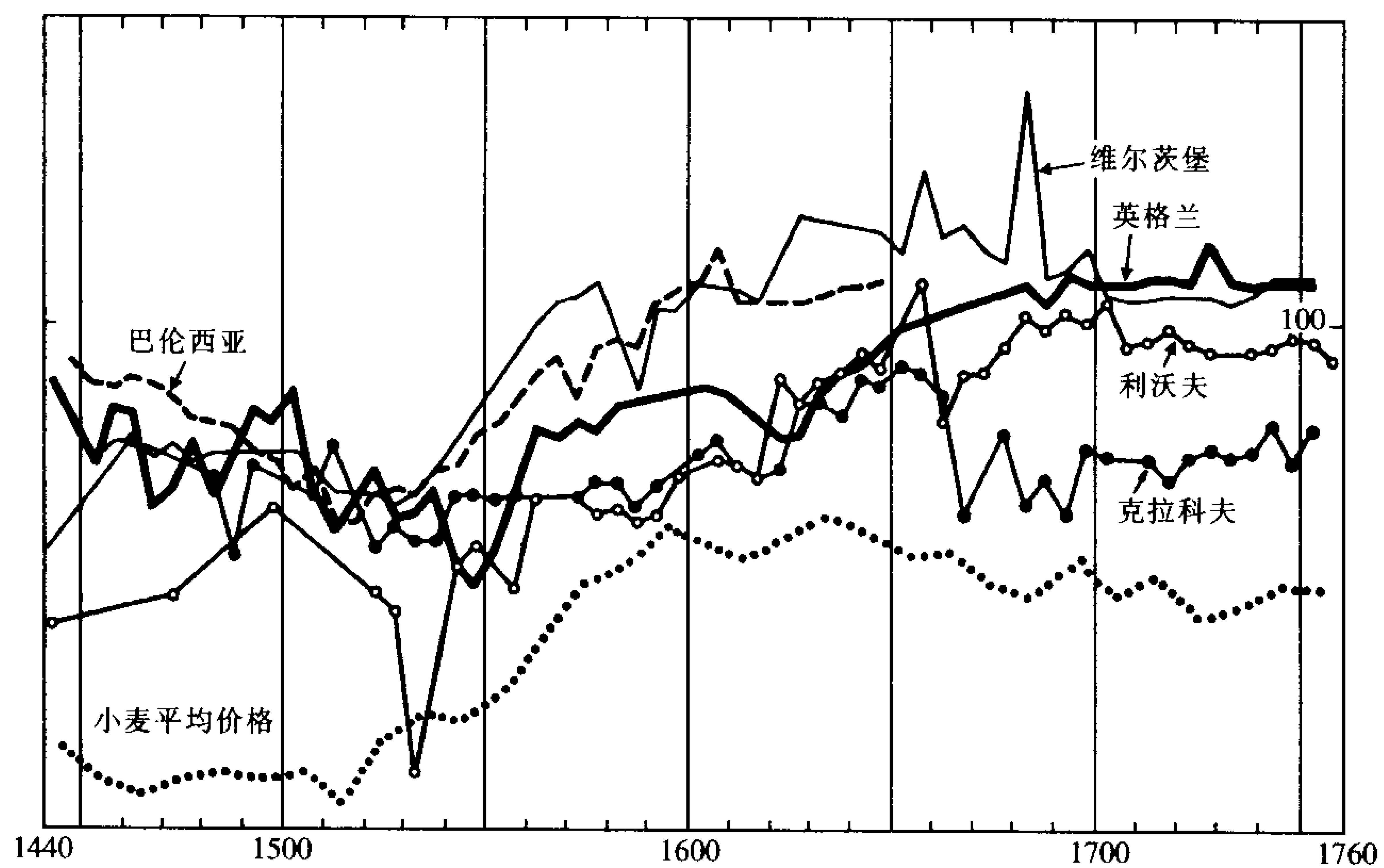


图27　以白银（克）计量的每千块砖的价格：5年平均数

【4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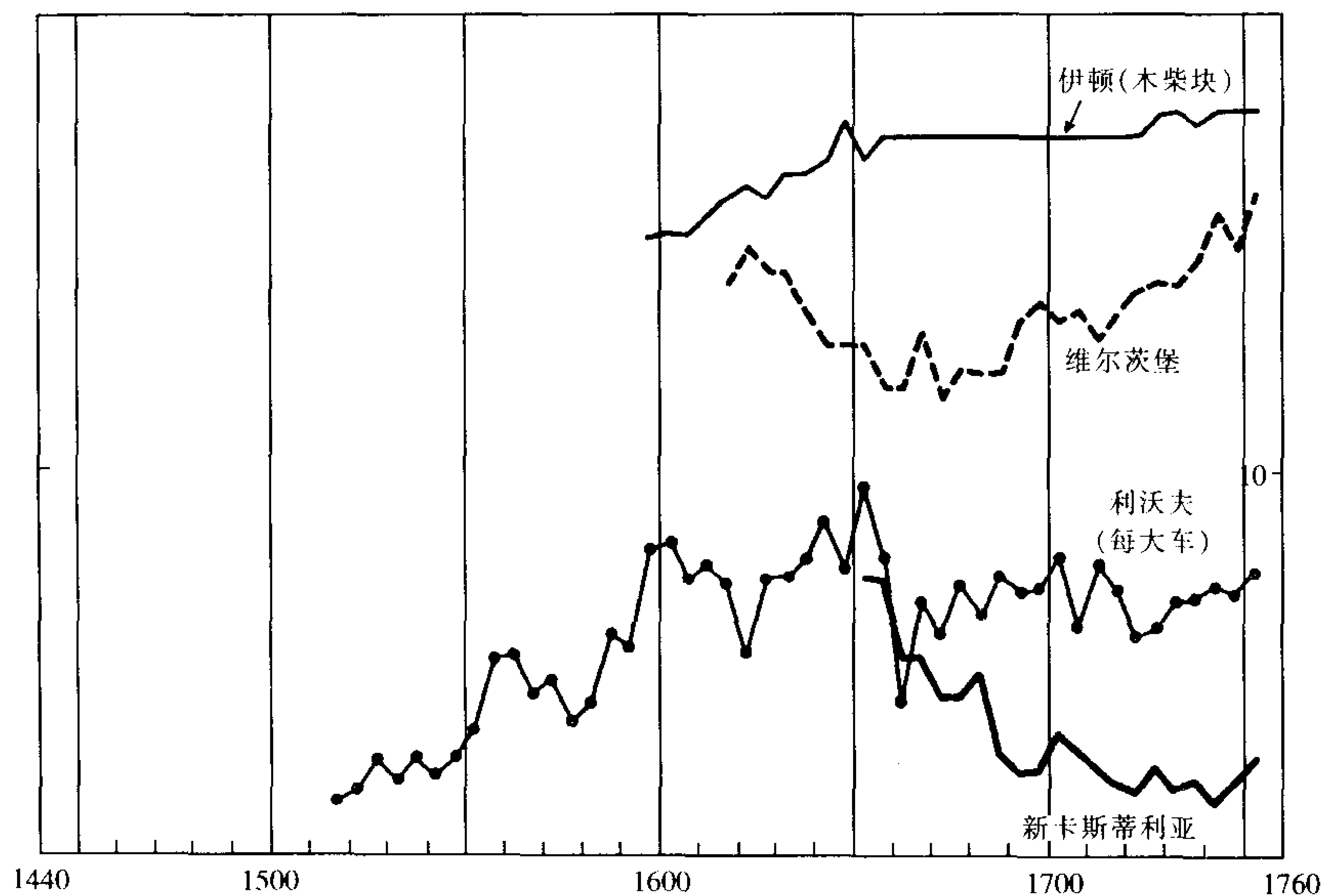


图 28　以白银（克）计量的每车木柴的价格：5 年平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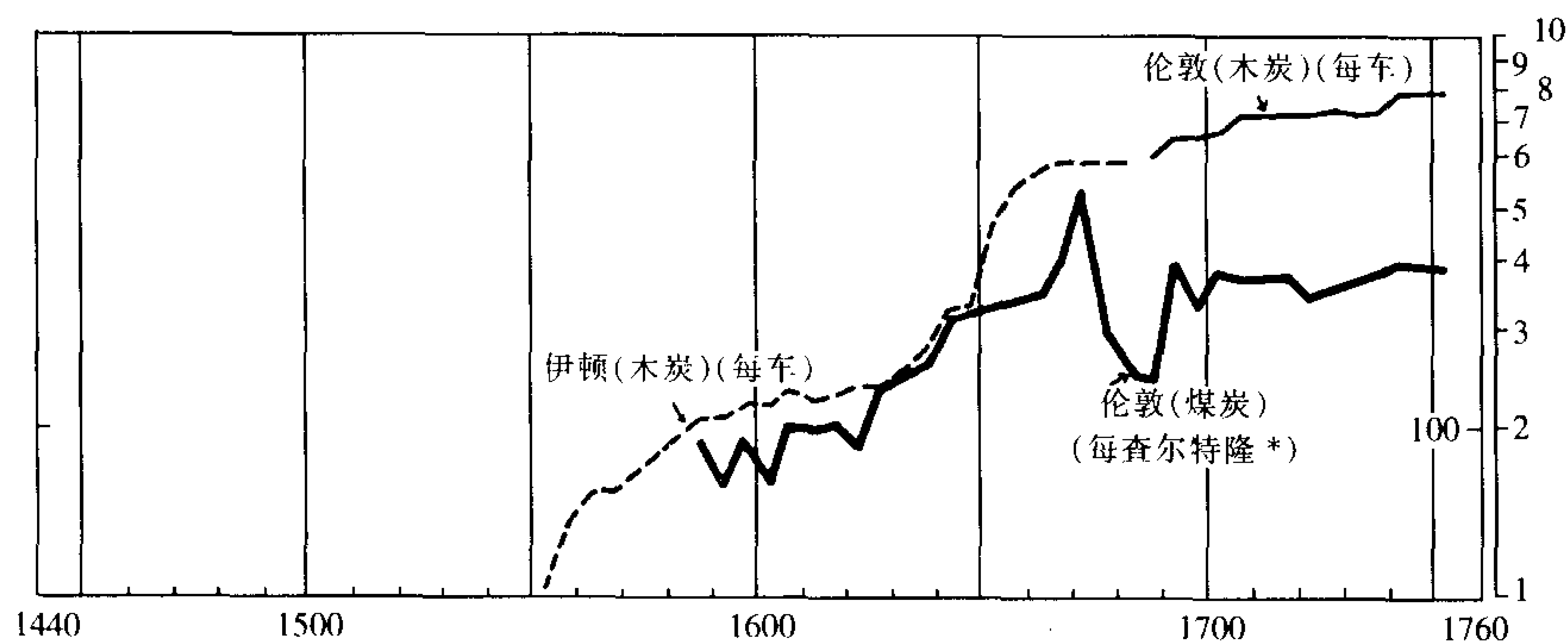


图 29　英格兰以白银（克）计量的煤炭和木炭的价格：5 年平均数

【480】

* 查尔特隆（chaldron）：英国常用容量单位，等于 36 蒲式耳或 288 加仑。——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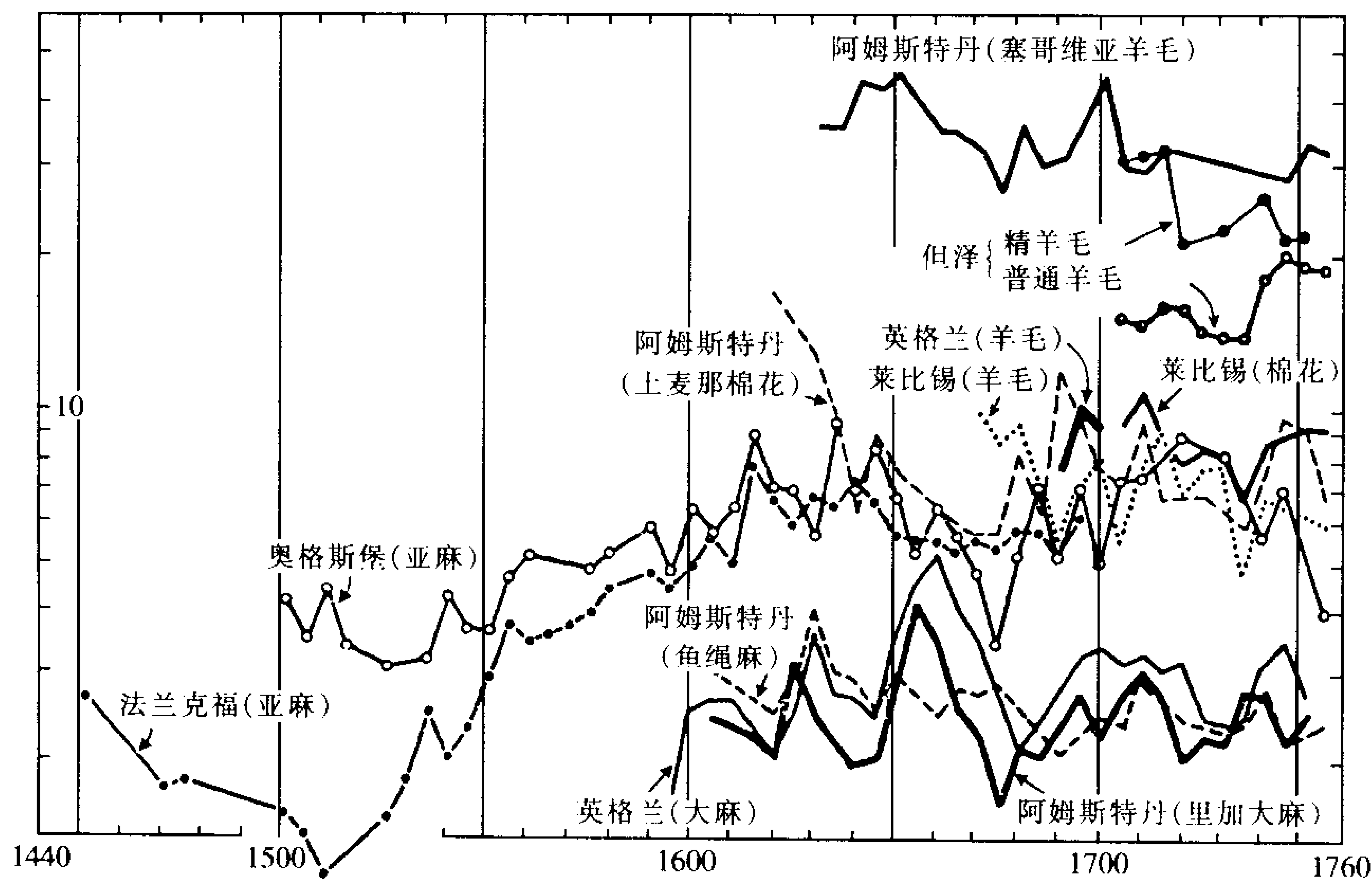


图 30　以白银（克）计量的每千克纺织纤维的价格：5 年平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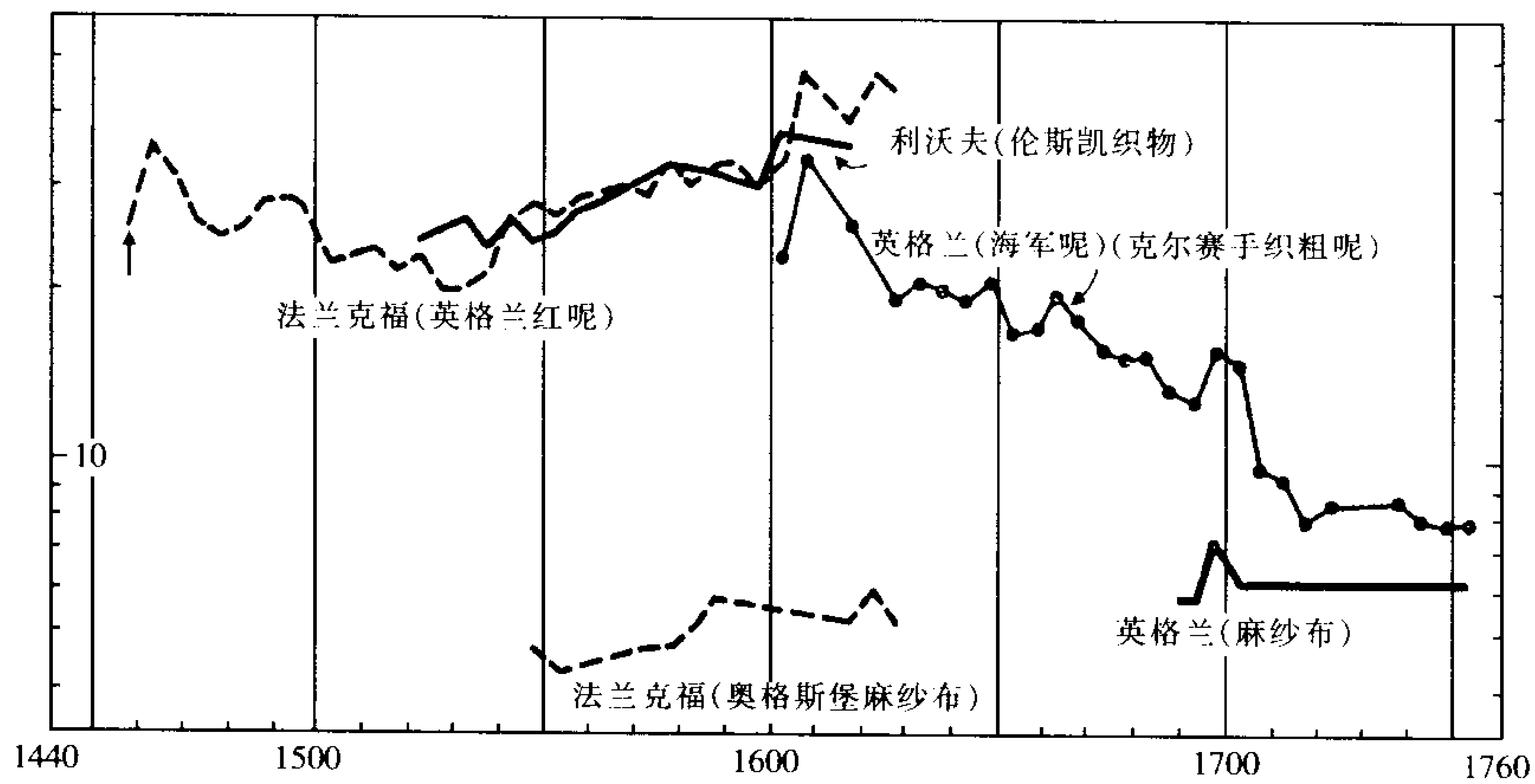


图 31　以白银（克）计量的每米织物的价格：5 年平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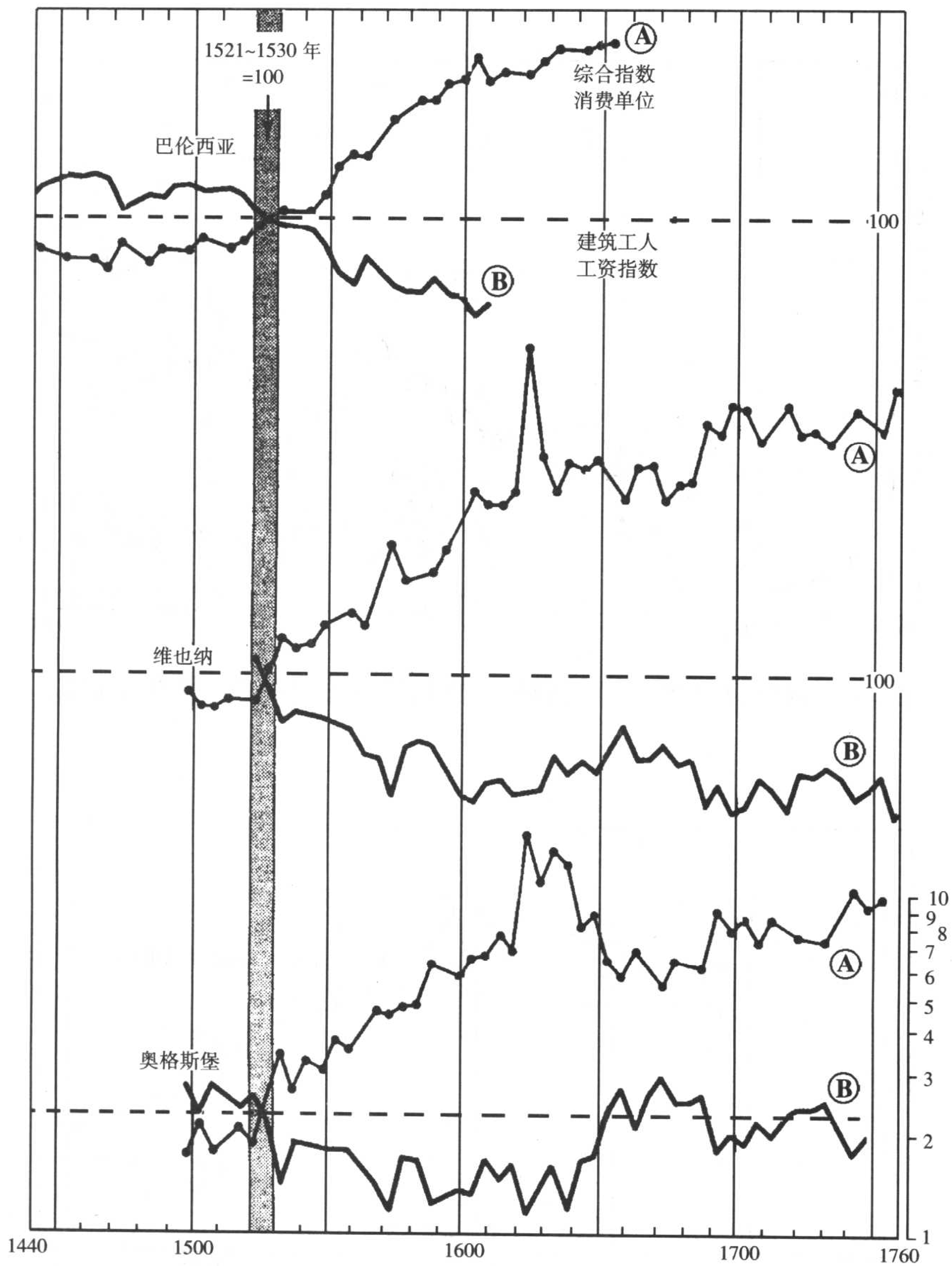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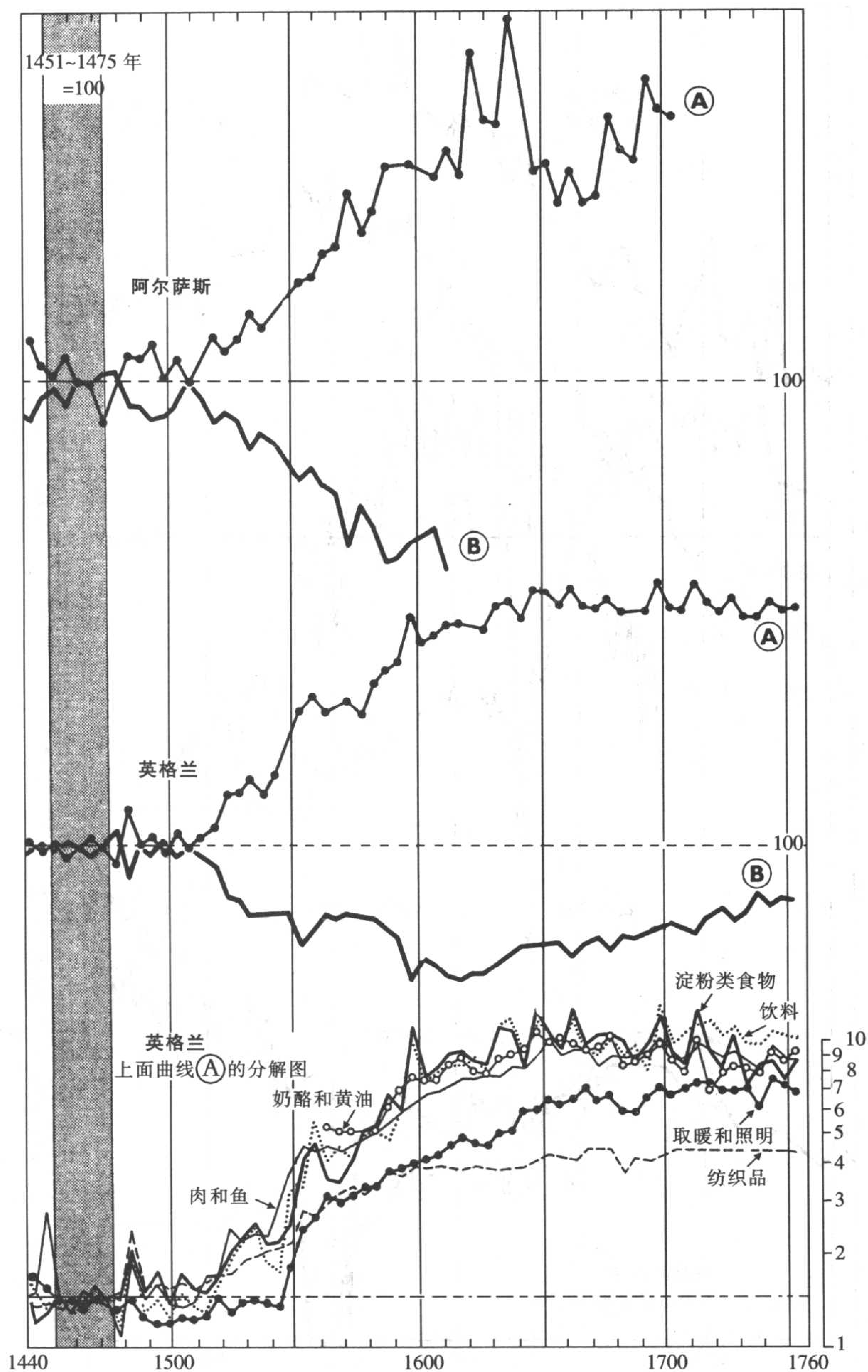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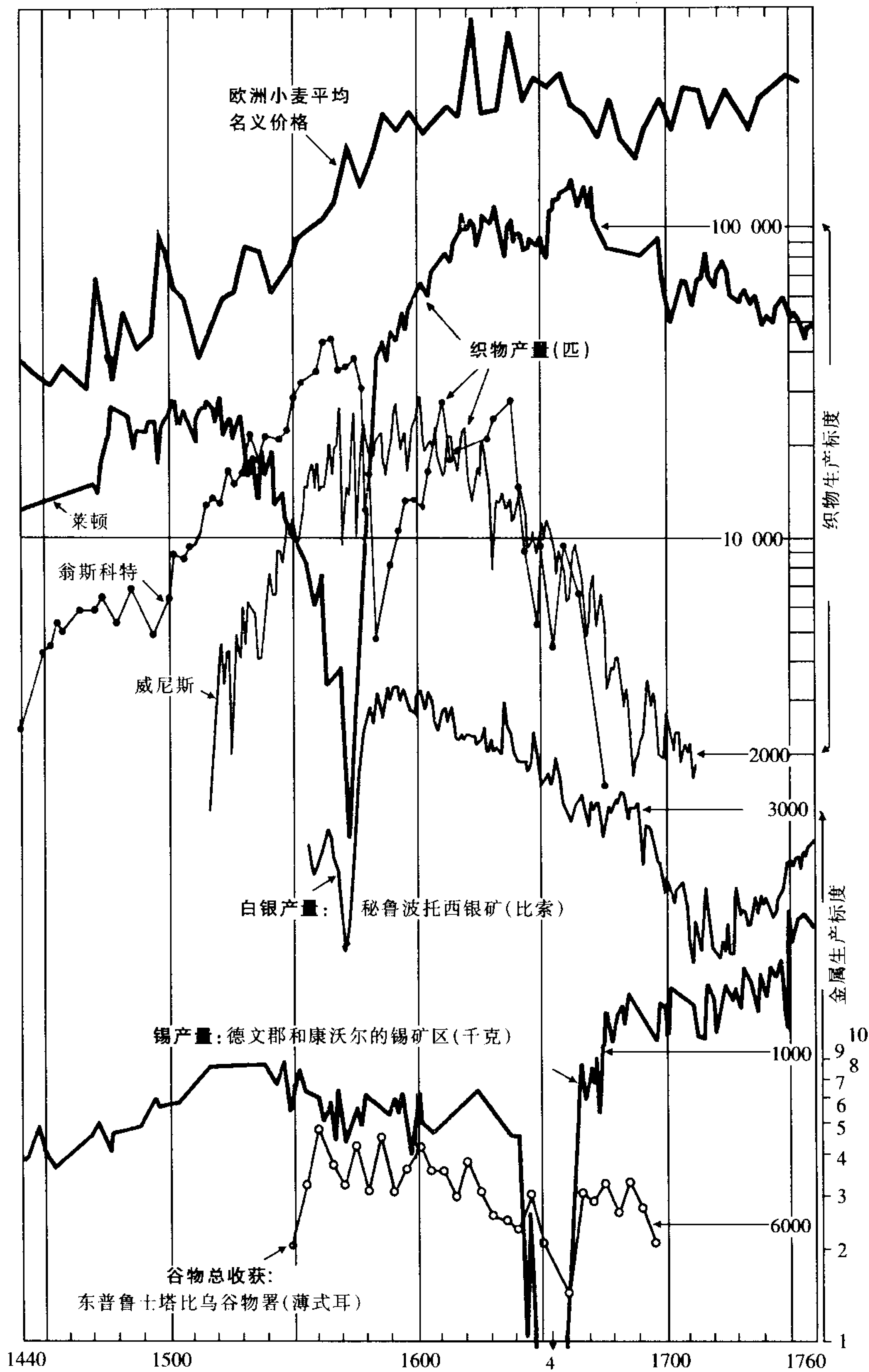


图 32 建筑工人工资和生活费用：5 年平均数

【482】 资料来源：E. H. 费尔普斯·布朗和歇拉·霍普金斯


1451~1475 年
=100
阿尔萨斯
Ⓐ
Ⓑ
100
英格兰
Ⓐ
Ⓑ
100
英格兰
上面曲线Ⓐ的分解图
奶酪和黄油
肉和鱼
淀粉类食物
饮料
取暖和照明
纺织品
10
9
8
7
6
5
4
3
2
1
1440
1500
1600
1700
1760



【484】

图 33　价格和工业产量的变化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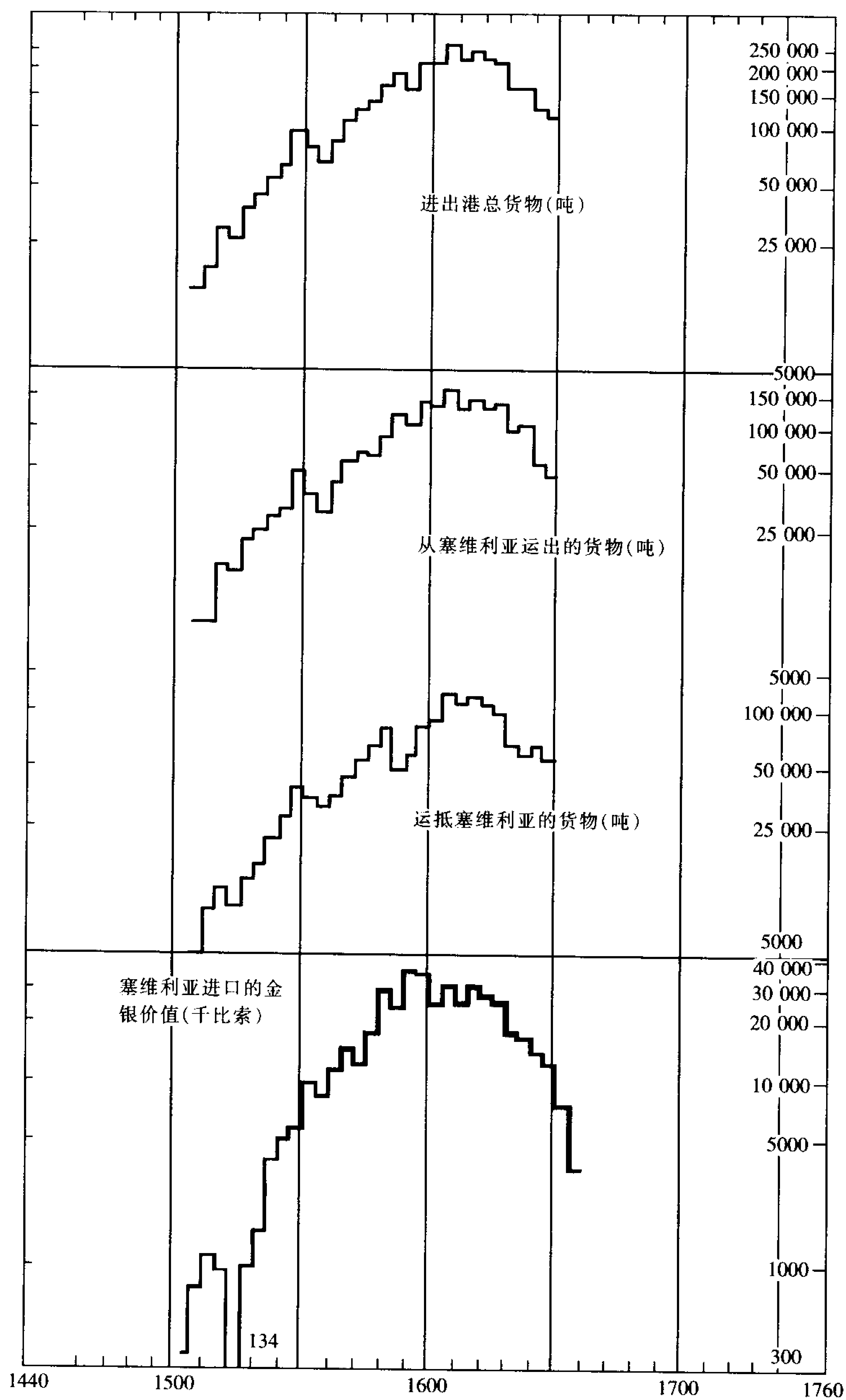


图 34　塞维利亚的港口装卸活动：与美洲的贸易

资料来源：前者，胡盖特和 P. 谢努；后者，E. J. 汉密尔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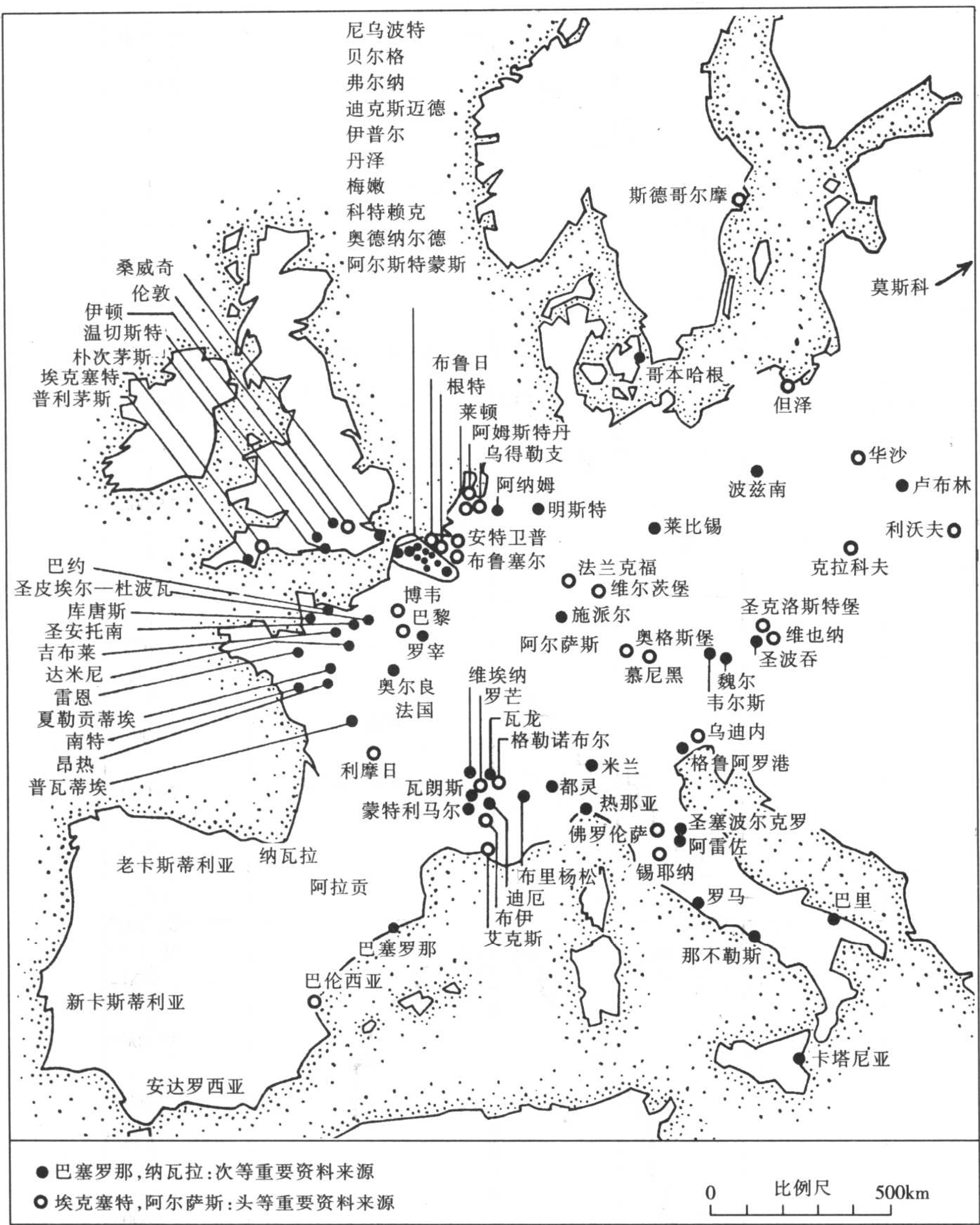


图 35　1450~1750 年间欧洲价格史资料来源分布图

(注意：许多价格系列的估计十分粗略)

【486】

第八章

贸易、社会和国家

“重商主义”时代这一说法并非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说法。在沿欧洲西海岸和沿从马拉加到威尼斯的地中海海岸的各个地方，在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若干世纪的时间里，商人都是社会中生气勃勃的因素。随着贸易量的增长，随着国际船运的扩张，此前孤立的地区和贸易被联系了起来，商人和生产者的活动逐步地发生作用并改变了西欧社会的面貌，这部分地是通过采用新的或扩展现有的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社会变化来实现的；部分地是通过他们直接或间接地施加于政府政策的影响来实现的。在任何统计的基础上，在各地，大部分人仍然以某种方式和土地连在一起；然而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贸易和商人在各个地方都削弱着那包围中世纪经济共同体的、处于崩溃中的习惯之墙。

历史学家往往能够在资本主义这一名称下描绘这种新生经济的主要特征，并把资本主义和宗教改革拉扯到一处，乃至公开宣称，不管怎样，后者部分地解释了前者。据这些历史学家所称，在16世纪，特别是在北欧，诞生了一种新类型的经济社会，它以之作为基础的活力和野心，其本身与人类同样古老，不过此时不论好坏，正以某种方式在社会上蔓延开来：而且新教——特别是加尔文教义——是这一进程的主要推动者。据称，这种教义对兴起中的资产阶级具有最大的吸引力，或许甚至说它是直接而有意识地针对

这一阶级的，并把“上帝的召唤”的光荣和魅力加在他们与生俱来的占有精神上。过去曾经在社会上不那么令人尊敬的事情，现在成了一个人可以引以为荣的职业。据说，在这时，谈论经济美德第一次成为一种可能的事情。

这种认为15世纪和16世纪时在加尔文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联系（不管如何界定）的观点的正确性，最近受到更多的怀疑。这些疑问主要有两点理由。第一，已经有人指出，加尔文及其追随者对利息和高利贷[487]等类事物的态度是被夸张了。在加尔文自己的著作中，他对这类事物的注意是勉强的和微小的。的确，他用简单的道德法则代替神学判断作为经济行为的基础，然而，没有理由认为他的教规使资本主义实践更容易，更没有理由认为他有使它变得更加容易的意图。新教国家的国家政策继续以传统的方式受这种观念的指导，即任何东西都有一个合理的价钱；利息的最高利率是被固定的，价格——特别是食物的价格——是受控制的。中间人受到反对，当铺是由政府负责经营的。加尔文教派的社会保守性通过发生在荷兰（其经济在当时是最先进的）的关于高利贷的争论可以得到最好的说明，这场争论发生在加尔文派资格最老的神学家，作为一个严格、朴素而不妥协的新教徒的富蒂乌斯与萨尔马修斯之间。它的缘由是这样的：富蒂乌斯把一个敬畏上帝的妇女从他的集会中赶走，因为她的丈夫是开当铺的，从而可以说她也因此而受到高利贷的玷污。对所谓“加尔文派”国家的社会状况的审视愈是详细——不管是荷兰共和国、英国东部的清教地区、伦敦和英国中部、苏格兰、法国的胡格诺派地区（波尔多东部和马赛北部），还是后来的新英格兰——这种认为在加尔文派与商人阶层的兴起之间有明显关联的主张就愈是值得怀疑。相反，在上述各地区能够看到，由于加尔文派的理论和社会观点所具有的保守性和严格性引起了商人群体与清教当局之间关系紧张。在荷兰共和国，这种社会紧张成了政党结盟中的一个限制因素。具有自由和宽容见解的商人阶层、代理人和贵族被由奥兰治王室支持者和忠实追随者（为加尔文派教士与教徒群众，其中大部分来自社会低层）所构成的反对者谴责为“放荡者”。在这里，加尔文派对“资本主义者”的反感直接表现为政治冲突。同样确实的是，在新英格兰，那些以安定和身份作为理念传统基础而建立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的清教绅士，与那些像伦敦东区佬一样足智多谋的城市商人移民之间也陷入了冲突。“做一个虔诚清教徒的同时又做一个成功的商人意味着生活在似乎无法承受的压力之下。”[1]

---

① B. 拜里恩著：《17 世纪新英格兰的商人》（剑桥，马萨诸塞，1955 年）。

如果根据阶层和职业来认定加尔文的追随者，有两个团体比商人更有资格，至少说，在早期是这样的：他们是绅士阶层和工匠。在法国和尼德兰，【488】正如后来在英国和新英格兰，加尔文派的领导职位是在虽有社会影响却贫穷而心怀不满的少数绅士组成的阶层中招募的，这个阶层的人是克伦威尔型的"有土地绅士"（正如 G. M. 特里维廉写到的），他们不像骑士那样与土地有深刻的联系，而是把土地仅仅看做金融市场上的财富，他们在这里没有精神的栖所或心灵的家园，只要仍是地球上的寄身者，就像他们所说，生活"在梅赛克（Mesheck），这象征着永久；以及生活在克达尔（Kedar），这象征着黑暗"①。这样一些人组成了精英，然而他们的数量不足以构成忠诚的加尔文派团体的民众。这些民众是从西欧城镇成长中的工匠群体中招募的。南部尼德兰（那里出产布匹的古老城镇，如根特和伊普尔，处于衰落之中）具有不稳定而且容易爆发的城市人口，他们遭受到了职业不稳定和物价广泛波动所造成的所有不幸。当迫害使好几千人背井离乡时，他们向北逃往尼德兰北部的港口和工业区，逃往法国和英国。城市（像莱顿、哈勒姆和阿姆斯特丹）人口的增长可以从"新到市民登记簿"中得到详细的追溯。这些各行各业的工匠虔诚、勤劳而且通常有文化，他们组成了加尔文派的信众并涌入其他教派（如门诺宗），或涌入各种集结在再洗礼名下的奇怪教派。在诺里奇和科尔切斯特，他们同样加入到与他们信仰相同的信徒中间：一个孩子从科尔切斯写信给他在伊尔普的祖母，他的情况是加尔文派家庭的一个典型。"……我们的生活非常宁静而平和，并听到很多布道。半年以来，我学做图书装订，但是挣钱很少，现在我在学别的手艺。我的大姐为伊普莱斯的皮特·贝克工作，他在诺里奇这儿有一家酿酒厂。我的兄弟维里金正在学制作刀具的手艺；爸爸在一个捻绳厂干活；我的妹妹纺线。"② 像这样勤劳的工匠家庭是早期加尔文派社团的主要成分。不难看出，为什么他们中的一部分在中世纪社会里崛起并获得财富和地位，那可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大部分事情只能墨守成规的社会，是一个假日与宗教节日就是一回事，人的脚步像牛一样缓慢的时期。加尔文的教义很可能鼓舞那些勤俭节约地从事其工作的人把物质上的成就看做是上帝的恩宠：而且既然没有人能够在内心察知不可察知的上帝的意志，所以一切都是尝试。在这种相当易变的社会里，平凡的美德获得了它的报酬，因此，在后来的 17 世纪和 18 世纪，商业团体与新教【489】

① C. M. 特里维廉著：《斯图亚特时期的英国》（伦敦，1904 年），第 225 ~ 226 页。
② W. T. C. 莫恩斯主编：《胡格诺学会会刊》（1887 ~ 1888 年）。

派别之间的一致性的程度日益增加了。然而，早期卑微的加尔文派信徒的物质成就以及他们在人数上的增加具有一种其创建者并不欢迎的结果。加尔文教派经历了一种被较晚形式的新教经常重复的过程，即把自己内部产生的宗派开除——例如：阿米尼乌斯派、公理会、浸礼会、门诺宗、贵格会、惟一神派。随着宽容观点在新教信徒中的增长，早期在清教徒与牟利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松弛下来。由于虔诚愈来愈成为一种福音，商业群体的良心也变得更容易适应。然而这种现象属于一种较为适应社会状况的派别。早期的宗教改革者则会发现，如果按照他们的教义，他们很难对这种情形予以认可，甚至是不可能对之予以接受。

如果我们可以说，新教和新教伦理并没有像它们在过去某个时期那样，似乎解释了那么多经济现象，那么，看起来，在经济改革时代，似乎也没有那么多东西像它们看上去那样需要解释。在 16 世纪，人们目睹了重要的经济变化。欧洲的扩张为欧洲带来了白银和调味料供应的来源。贸易量增加了，人口增长了，新的航路和货物中转站建立起来，相应地，旧的衰落了。这些事情随后带来了重要的社会变化，如物价上涨，一部分人的收入适应了新的物价水平，另一部分人的收入则不仅仅是适应了它，而还有些人的收入没有变化。然而，从法国入侵意大利到“三十年战争”结束期间，欧洲经济的发展所包含的模仿和重新调整要多于创新。经济事务中的领导地位逐步地从地中海转移到了北方，而且随着意大利城市的衰落，尼德兰城市崛起了。然而，就北欧国家经济中所使用的商业方法或工业技术来说，15 世纪的威尼斯商人或佛罗伦萨布匹商没有什么是不熟悉的。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了解绝大部分复杂的金融、信贷和国际兑换技术。雅各布·福格二世正是前往威尼斯的提得斯奇家族学习贸易技术，并通过在后来应用这些技术而使福格家族扩大为 15 世纪最大的商业企业之一。布鲁日的贸易和金融业由热那亚、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和卢卡商人的“部落”（侨民团体）所控制。对我们而言，爱克（Eyck）所画的卢卡商人阿诺费尼和他的妻子的肖像是晚期中世纪商人的典型写照，这并非偶然。在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主要的银行家仍然是意大利人或西班牙人——卡维坎第、吉拉第、帕拉维奇尼——而詹姆斯一世甚至仍然雇用勃拉马奇做他的私人财政代理人。在荷兰共和国，在北方新兴的商业经济与来自意大利的古老传统之间的有形联系，仍然在像佛那第家族那样有适应能力的意大利人那里保持着，这一家族在荷兰和英国都是活跃的银行家。经济本身的运行方式也没有根本变化。关于货物集散地的理论和实践在荷兰的重要性和过去在威尼斯一样，而荷兰人所赚财富

【490】

的最大部分来自于他们作为中间人为世界其他地区提供的服务。同样并非偶然的是，17 世纪早期，借鉴意大利人的储蓄金融方式的荷兰商人也可以雇用德·凯瑟尔为他们设计一个纯粹意大利式的证券交易所；因为在意大利与北方之间的交流中，很多重要的内容有助于北方新兴商业城市进行建筑和规划方面的概念——这类概念，可以在当时荷兰出版的书籍、地图和塞里奥、帕拉迪奥、维格诺拉和斯卡莫齐的图画作品中找到——塑造。“意大利式”的戏剧角色使北方的清教徒忧虑重重。当时，荷兰和德国的两个最有创造性的音乐家斯韦林克和舒茨都是威尼斯圣马克广场的风琴手加布雷斯的学生。因此，北方新兴的商业经济借鉴了意大利的经济观念和技术，而且尽可能地复制了意大利经济兴旺于其中的社会和美学环境。荷兰联省长官在 1526 年这样写道：阿姆斯特丹在贸易技巧方面是年轻的威尼斯，并且日益变得成熟。“由于它的河流，它的位置，人口和在每条街道流过的运河”，圭恰尔迪尼在 30 年后写道，“它很像威尼斯”。

由于北欧的商业社会包含一种工业因素，这一点也与在意大利的情况类似。意大利古老城市的衰落——佛罗伦萨、米兰、帕尔马、科莫、卢卡、热纳亚等，最后，还有威尼斯自身的布匹和丝绸工业——与尼德兰南部古老城市的衰落相类似，而且两种情况具有同样的原因：城市对工业生产的烦琐规定。重要的区别仅仅在于：在尼德兰和英国东部织布工业成功地——而意大利的工业则普遍失败了——使自己从行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因此训练自己采取更加灵活的组织，以迎合异想天开的时尚和需要。尽管在肥皂、玻璃和金属工业方面的创新很重要，却没能改变 16 世纪和 17 世纪的社会性质。在整个欧洲，包括英国在内，“工业”仍然意味着纺织业，其范围从荷兰和英国的最精致复杂的精纺绒线和丝绸到德国或波兰的粗劣的毛线或亚麻线。【491】这些工业在各个地方都与农业和乡村密切地联系着。重复一遍：工业机构与商业机构相比要原始得多，而商业技术的最大来源是意大利，特别是在会计方面，它是所有其他商业形式发展的基础。在各个方面，在高度发展的中世纪晚期，意大利经济与近代早期北欧经济之间，在特征上的相似性比其差异性更为醒目。两者的商人和银行家的情况也是如此。一个美第奇或达提尼或福格家族的商人会发现他的思想和行为的模式，在 17 世纪阿姆斯特丹一个特里普商人或佩尔商人或杜茨商人的公司里，会得到非常透彻的理解。如果说，高利贷行为对商人内心的烦扰随时间流逝逐渐减少，那么，这并不是因为加尔文派达到了它最初的目标，而恰恰是因为这种教义没能实现其初衷。

在 1500 年，代表着最富有和最先进的贸易、工业和财富中心的两个地

区是由意大利城市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热那亚组成的四边形地区；还有尼德兰从伊普尔向东北经过根特和从布鲁日直到安特卫普的狭长地带。在这些地区，商人非常成功地从封建干扰中解放出来，并阻遏了由新政权政治上加强集中控制的要求而产生的新威胁。在政治风暴与战争之间稍纵即逝的间歇期，如果商人们能得到和平，而不是被那些视其为军费来源的战略家们青睐有加的话，他们就有看到物质进步的可能。恰恰是因为这里的商人所处的政治和社会关系相对来说很简单，这些经济社会没有为后来留下什么纯理论性的文献。意大利城市和低地国家的早熟的经济发展，是由那些商人获得了政治权力的城市的独立性所孕育的。商人行使政治权力的方式在各城市并不相同。在威尼斯，“国家”似乎使富裕的贵族达到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而在热那亚则不然。威尼斯共和国建造帆船，固定运费，把帆船拍卖给私人投标者，扶持工厂并为威尼斯船只安排航线和护航。然而不管是在意大利还是在尼德兰，政治和社会状况都没有激发商人或政治家去思考经济活动与其他活动之间的关系。这种产生于这些城市经济的“经济学”著作包括两种：【492】或是按中世纪传统，以经济生活所提出的道德意蕴和问题作为对象而进行的沉思；或是试图研究商业经济中的纯粹技术性问题——大部分是兑换、信贷和货币问题。16 世纪，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半经济学著作的最丰富的素材源泉是看起来无休止的对利息的合法性问题的争论。教士辩论者，奥古斯丁派和多米尼克派教士、天主教修士、神学家、律师、大主教和枢密院主教孜孜不倦却毫无结果地继续着这场争论，储蓄银行业和贷方（被称为 monti）公会的增加则加剧了这种争论。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同样热烈而毫无结果的关于得自汇票的利润的争论。关于 15 世纪到 16 世纪期间遍布意大利和荷兰的公办当铺应收取利息以作为管理开支的提议，激起了另一场言辞之争，双方是赞成者方济各会与批评者奥古斯丁派和多米尼克派。乞讨应当禁止——正如西班牙和尼德兰政府所主张的那样——还是应当允许？在意大利和西班牙方济各会和多米尼克派再次就此互不相让，而荷兰布鲁日大学校长（见艾吉丢斯·维特修斯著《De Continendis etaliendis domi pauperibus》）的干预，使这一中世纪的争论与新的贫困问题和为身体健全的贫困者提供习艺所的问题联系起来。一种更小型的技术手册，如达文塞提的《Lazione delle Moneta》（1588 年）和斯卡鲁菲的《Alitinonfo》，使这种争论从道德上转移到实际操作阶段，但是并没有使它变得更能引起兴趣。先进的城市经济似乎没能有益于关于经济问题本身的探索性追问或根本的思考。这些追问或思考不是来自于舒适，而是来自于压力，不是来自于满足，而是来自于不

满。第一篇关于如何在国家内部增加贸易量的论文不是来自北方的商业城市，而是来自那不勒斯的教皇监狱，这就是安托尼奥·塞拉的《关于使没有矿藏的王国金银充足的可能方法的简论》，这是一部比它的题目所意味的要严肃得多的作品。为什么那不勒斯省如此贫穷而威尼斯和热那亚为何又如此之富？像16世纪和17世纪绝大部分作者一样，塞拉相信——而且无法肯定他就是错误的——那不勒斯王国的贫穷完全不应当归咎于金属货币的缺乏。他完全反对同时代人（如德·桑克提斯）的观点，即这是由于汇兑率过高（而对金银外流加以限制即可控制汇兑率），而是从那不勒斯与邻国的贸易条件寻找原因。如果一个国家所负债务超过了它所具有的信用，任何管【493】制都无法阻止货币外流。因此，塞拉转而研究可以使一个国家在其邻国之间成为债权国的经济条件：这些条件是土地的出产，以及制成品的出口量；而这反过来又依赖于人口的特征，依赖于凭借新工业进入对外贸易的计划和使它能够作为中间人闯入世界贸易的成功。为了帮助实现这些目标——为了发展新兴产业，刺激出口和影响汇率——政府被授权干预经济事务。所有这些，对熟悉此后几年发生在英国的托马斯·曼与其对手之间辩论的读者来说都是似曾相识的。比曼稍早的塞拉有资格被列于这样一批人中间，他们最早对当时贫困原因在货币上的分析所存在的肤浅性有所察觉，并在贸易和工业条件上探寻深层的原因。几乎不必赘言，他的观点对同代人或对那不勒斯王国当局毫无影响；事实上塞拉的《简论》连同其辛辣而详尽的对国家政策的批评一道，被埋没了一个半世纪。但不应认为，这种埋没意味着对一个地方反叛者的特别偏见。西班牙的政府体制一视同仁地压迫其臣民：统治者的爪牙、官僚和税吏统统降临到这个凋敝而残破的王国，而来自西印度的财富只不过使它变得贫困。这并不是因为缺少批评。来自于政客阶层（几乎全部自修道院以外的教士中招募而来）的持久而猛烈的对国家政策的批评贯穿了16世纪和17世纪。马雷纳、马奎兹、冈萨雷斯·德·阿亚拉、卡兰萨、法亚多以及很多其他人呼吁一种可靠的货币，对实施格雷汉姆的法律提出警告，对试图禁止金银外流同时招致巨额外债的愚蠢行为进行抨击。蒙卡达和纳瓦雷特抨击政府试图用来管制物价和谷物流通的法律，批评对摩里斯科人的驱逐，并把西班牙的可怕的肃清运动视为进行性和延续性的贸易和工业衰落的根本原因。然而这一切都只是徒劳。税赋增加，垄断愈演愈烈，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竟不得不以货币贬值而告终，而每个卡斯提尔市民的雄心都变成了使其家庭获得“hidalgo（西班牙下级贵族）”的身份并努力取得免缴赋税的权利。在所有这一切中，既无政策也无理论，而只有一种与一切理

智相冲突并无视一切建议的财政上的绝望。有一种观点在长时间内都有其正确性，它类似于柯尔律治在其《桌边谈话》中对西西里的看法："通过纵穿【494】西西里的短暂旅途这种简单办法，你即可学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完全推翻你心中的每一条法律、习俗和惯例"。

在西班牙及其领地，国家政策与理智日甚一日地分道扬镳，与此同时，在英国和法国这些正在崛起的新兴国家中，却明显有一种持久的（即使并非完全成功的）企图，即把思想与政策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这并不是说政治家和管理者总是明智地制定法律，更不是说他们总能实现其（明智或不明智的）目标。然而，我们也无法不注意到，在许多作家和思想家的言论与政府的立法行为之间，有一种广泛的和睦关系：这种和睦关系明显地与西班牙政治家和热衷政治者之间的争吵形成反差。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曾多次试图说明这些经济国家主义政策的性质和目的。有些作者认为它们来自于政治家的野心，其主要目标是增强国力。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这种政策只不过代表了商人们地方主义的野心，是少数人为其私利而炮制的一种阴谋。"我们的商人和制造者们"，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重商主义体系"一章中写道"迄今为止是主要的设计师"。在这些术语之下进行的辩论倾向于把"商业体制"的创立者的目的归结为二者选一：或是"强大"；或是"富足"。这种争论是否富有成效，此点似乎令人生疑。因为一旦我们没法界定重商主义者所谓"强大"的含义时，很明显，他们所考虑的是一种以经济为基础，并具有某种经济目的的政治体制。同样地，对"富足"的思考也是与政治和战略相联系的。"财富"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它具有某种符合并增强国家实力及防御能力——甚或是战胜和蹂躏其弱小邻国的能力——的特征。也就是说"强大"和"富足"并非互相排斥的概念，而是互补性概念。根据时间、地点和人物的不同，侧重点有时在此，有时在彼，不过这两个概念从未完全分离。的确，在 16 世纪和 17 世纪欧洲，在几乎从未间断的战争的条件下，由于中世纪战争的不人道的特点被邪恶者所继承，加上新科学所带来的技术，还能有什么其他选择吗？到此时为止，人类的思想领域仍没有对作为奢侈品的、由经济科学严格界定的"经济"概念留出空间。如果说"国家"需要商人的财源，那么，商人离开"国家"的力量也无法施展。无论如何，在欧洲西海岸的国家正是这种情况，那里的王朝认识到了与贸易联姻的好处并在神智较为清醒时与之达成条件适宜的联合。这个新的【495】伙伴经常受到野蛮的宗教狂，或奢侈而又无能的国家的剥削和压迫，然而，在卡斯提尔的混乱与在大部分其他国家所发现的国家经济目标及其实现手段

方面的正统性之间仍有显著区别。亚当·斯密所谈的历史或许并非无懈可击，但是，他认为"重商主义体系"——政府为了促进某种贸易理念而进行干预时所采用的一套规定——是"由商人们向国会和王室议政会，向贵族和国内绅士……所陈述"之论辩的结果，这种观点还是颇为中肯的。从"无用的关注"到为其国家获得并保持尽可能多的贵金属，重商主义者转向了另一问题：贸易平衡。为了达到一个良好的贸易平衡，亚当·斯密说，他们设计了"两架巨型机械"：一架是为鼓励出口（或更严格地说是制成品的出口）而设计的法律措施；另一架是为阻止进口（或更严格地说制成品的进口）而设计的法律措施。相反，工业所需的原料应为国内工业而保留或在需要进口时尽可能自由而廉价地进口。亚当·斯密对这种体制的批判在其他地方再作讨论。然而无论是否有坚实的历史学基础，被称为"重商主义"的法律体系的性质是不存在疑问的。这"两架巨型机械"也是真实的。然而，它们的起源是大可争论的。

很多经济控制机构后来都与近代国家的经济或政治野心有联系，而且它们事实上是起源于中世纪，是地方性或局部性需求的产物，或纯粹排外情绪的产物。没有什么比思想家、执政者和立法者对把英国羊毛保留给英国制布业一事的关注更能体现"重商主义体系"的特征了。有关学者在《论英国的公共福利》[1581 年，Ed. 拉蒙德（Ed. Lamond），第 86～87 页] 中论证说，羊毛出口"不足以带来财富"，而通过把羊毛留在国内提供给"织布者、制革者、贩马者，还有绒线制造者——通过他们的手艺和才能，就能带来财富"，而此时他这样说不过是在重复 15 世纪中期以来的政府政策罢了。贸易和工业利益与建立工业保护体制——禁止进口羊毛制品——的财政需要结合在一起，与禁止出口羊毛结合在一起。这种政策背后的那种工业压力偶尔会显露出来，例如，发生在亨利八世时期的关于约克郡仍保留的出口约克郡产羊毛的权利的争论就是如此。1529 年英国的织布商抱怨说，这种出口 【496】 剥夺了他们的羊毛供应。这一年通过的一项法案取消了约克郡的特权。全部斯图亚特时期的航海政策可以在中世纪针对意大利商人的措施中找到根源，这些措施一部分是为了取缔挥霍浪费，另一部分是关于其他方面。

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大船，
满载着充足的货物。
有各种香料和杂货，
有甜酒和各种骗人的东西，
无尾猿，可笑的玩意儿和拖着尾巴的猴子，

都是些没用的零碎儿。

还有一些让人眼花缭乱的东西，

和我们买了却不耐用的东西。

然而这篇《英国政策的抨击》的作者像其他一些人一样，认为这些来自外国人的侵犯是双重的：他们带来华而不实的东西并运走“最璀璨的明珠”——英国的羊毛。中世纪晚期贵金属的缺乏导致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对出口进行干预。当爱德华四世把出口金银定为重罪时，该法案也含蓄地指出这样做有两个理由：使国家免于货币枯竭和避免政府在紧急情况下因无钱应付而产生政治危险。由没有多少关联的地方性或团体性利益作为作用因素而产生的初期重商主义的类似情况也可以在其他欧洲国家发现。意大利、汉萨和佛兰德等地的城市都发展了其各自形式的“航海条例”，限制其商人使用外国船只。在德国，城市经常对周围乡村进行战斗以控制食品和工业原料。在某些情况下一种 Bannmeile 得以建立，在其范围内生产的任何食物和原料都必须运往城市。任何可能与该城市的手工业相竞争的工业都不被允许。于是城市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利益得到促进，其方式在英国或法国可以找到并非完全相同的对应，并在相当程度上预示了后来的国家性经济排外主义。在法国则相反，对经济政策中的国家主义性质的意识是较早而普遍的。如果说里昂的丝绸业值得支持，这并不是因为它有利于里昂，而是因为有利于法国。路易十一在 1466 年 12 月 15 日诏书中宣称：

【497】

我们已经意识到：当我们必须到王国之外去寻找并引进金线和丝绸锦缎，并支出大约 450 万埃居（ecus），这对我们本身是件非常不利的事情……因此，为了防止每年从国内大量输出金银去换取金线和丝绸锦缎……在经过理事会的深思熟虑之后，我们决定在里昂建立金线和丝绸行业，并把在此行业中有丰富经验的男女业者招聘到那里工作。

在国王诏书和奏章中，散布着数百处类似的初始的经济国家主义的表述。出口硬币和金银的人是众矢之的。据说雅克·科尔因为把货币送到国外而在 1453 年受到谴责。教皇不断受到攻击，人们指责他使法国货币枯竭。1484 年三级议会的一份奏章中说“货币在政治的肌体中就像血液在人的肌体中一样：因此有必要检查法国遭受了什么样的失血和流泻，”并补充说，教皇最近刚从法国掠夺了 200 万金币。因此，硬币主义被用来支持高卢主义（Gallicanism），反过来也是如此。15 世纪中期《英法传令官的辩论》（Le Debat des Herauts d' Armes de France et D' Angleterre）的作者也和议员们一道

对法国所拥有的来自自然资源的财富心满意足地同唱赞歌，这种财富使法国几乎无求于他国。此外，在诏书和小册子中反复出现对奢侈的攻击——男人和女人在衣饰上的奢华，使用香水和进口无用的零碎儿。在对金银线和镀金家具予以禁止上，硬币主义与古老的取缔奢靡的传统结合到一起了。

近代欧洲的新兴国家所采用，并被称为“重商主义”的经济国家主义政策，在过去封建的与城市的政权的（上面提到的）这些分散的行为和思想中就有其根源。然而，它们却在智识性与逻辑性上又都没有什么内在一致性。对奢侈的道德上的反对，对外来者的感情上的不信任，对金银的特殊优点迷信般地崇敬，垄断者对其垄断地位的担忧以及其他人对垄断的忧虑——所有这些东西纠缠混杂在一起，或多或少地既反映出人类的愚蠢，也反映出人类的精明。不过，从 16 世纪中期以后，有关迹象日益明显地显示出，思想家、执政者、西欧新兴国家的政府，开始把他们关于经济政策的思想综合成有系统的东西。王朝统治的代价迅速增长。王室变得更大和更奢华。战争持续得更长。国王所占有的土地的出产和不常有的战争税的补充，不足以支持新国家主义的开支，甚至再加上出卖官职、垄断权和其他类似事物的所得也是如此。没有哪个政府仍然能够对自己的偿付能力与其臣民的福利之间所【498】存在的关系完全视若无睹。“……国民的财富”，有学者在《论公共福利》中写道，“就是国王的财富”。这种意识的结果在各个国家并不相同，而且历史学家们对随之而来的，作为所有“重商主义”信仰的自然结果和核心特色的政府干预的效果或动机无法取得一致看法。这并不令人奇怪，因为当时的人们自己在这一问题上也颇有分歧。主要的事实是，各方面都日益倾向于认为，按照某些规则管理其臣民的经济生活是政府的任务。所采取的政策根据有关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而有某种程度的不同。在有些国家，政府政策是自上而下强加下来；在其他国家，则是通过与个人或集团的利益的协商和合作而产生。在任何地方，古老的、道德上的对奢侈的限制和憎恶都没有完全消失。在所有地区，这种运动的特征都是实验性的，而非科学合理的。而那些农业国家的方式会与海上贸易和城市工业作为重要部分的国家有所不同。时间期限在各地也不一致，总体上说，特有的原则和政策在大西洋沿岸的海洋国家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而在易北河以东的欧洲，以及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南部和东部地中海的外围国家，则是其出现和消亡都很缓慢。所采取的措施并非总是与当地的情况有直接和合理的联系。因为观念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传播是相当迅速而令人吃惊的。不管恰当与否，随着 17 世纪的继续，思想家和决策者之间在一般原则上似乎日益达成共识。无论公开与

否，贸易平衡成了核心原则，它的第一个得到明确说明的形式出现在英国。

大约在 16 世纪中期的若干年里，古典形式的贸易平衡成为一些作家的主要议题。写于 1549 年的《论公共福利》一书的作者是这样写的："……我们必须始终注意，我们从外国人那里购买的不要多于我们卖给他们的（因为那样做会使我们自己贫穷而使他们富裕）"。而且他和格雷欣都提到了爱德华三世时期的关税统计，从中（据说）可以看出出口超过了进口。在《论公共福利》的初稿写出之后两年，威廉·莱恩向塞西尔建议，应该使用关税数字来发现是出口大于进口还是相反。两年之后，威廉·科利梅利（一个伦敦杂货商）在一份呼吁书中进一步得出结论，出口的数量不足以支[499]付进口的费用并因此使财富流向海外。这种观点并非完全是崭新的。历届政府在法律条文中都含蓄包括了一种被称为"交易平衡"的理论，试图用来约束英国商人和外国商人之间的私人合同，从而使之为英国增加可支配的金银或硬币数量。在欧洲大陆上的官方的中心贸易集镇上出售商品的英国商人被迫将其收入的一部分以现金形式带回英国。在英国出售货物的外国人被迫按《就业法令》在英国花费其部分利润。负责收关税的海关人员，以及负责将海关人员征收的外国货币兑换成英国货币的皇家兑换人员负责对这些规定进行监督。对当时的贸易平衡概念有着促进的事情很可能是复式簿记传入英国，并与当时日益增长的对民族国家共同特征的意识相结合。复式簿记至少早在 14 世纪就已经在意大利被采用了——今天的专家们正努力弄清更确切的日期——然而当《论公共福利》最早出现时，距佩西奥里的系统性的论文只有一个世纪的历史。而最早的复式账簿（属于一个叫托马斯·霍维尔的西班牙商人）则距之只有1/4个世纪的历史。格雷沙姆像很多其他人一样，根据新原理自己记账。休·奥德卡斯特对佩西奥里的解释——是第一份以英语进行的研究——则距之不到 10 年。詹姆斯·皮勒的《样式与格式》(The Maner and Fourme) 是第一部纯粹来自英国的簿记研究著作，是《论公共福利》出现之后 4 年，即 1553 年问世的。毫无疑问，从账簿那里借用的"平衡"（差额）观念对经济学作者发展出一种国家收支平衡的理论有强烈的影响，这种理论的附加含义是，任何收入不平衡都必须通过现金偿付加以纠正。"贸易平衡"这一术语似乎是米塞尔顿在《商业循环》（1618 年）中第一次使用的，然而其思想在肯特郡的文物收藏家威廉·兰巴德对海拉斯关于外贸的言论所做的解释性笔记中就已包含："如果我们输出的商品比进口的商品在价格上要多，超出部分以货币形式流入，然而如果我们进口多于出口，那么，超出部分必须以货币支付，这就是使国家财富增加或减少的方

式，除非国内没有多少货币。”一种主导于此后两个世纪的经济思想和政策的主要原理就这样被清晰地阐明了。

在地理大发现开始时，这些衡量国家优势的基本原则就已经很好地确立起来了。对地理大发现的迫切要求本身就部分地反映了探险者及资助他们的统治者对物质财富的期望。同样地，新时代的潜在可能性在当时人们的眼中是一种满足经济和战略安全需要的国家政策手段。1492 年 4 月哥伦布与费【500】迪南德和伊莎贝拉之间所达成的“协定”雄辩地证明了双方所具有的经济上的期望。哥伦布出发时不仅带有 1 份给“大汗”的详细介绍，以及 2 份给其他可能遇到的统治者的未写称呼的介绍，而且还被许诺可以得到那些地区出产的或在那些地区通过贸易得到的黄金、宝石、调味料或货物的10%，并可免除税收，还可享有对任何前往那里的船只投资1/8的权利，以及把这些权利给予其后嗣和继承人的永久留置权。期望中的财富所施加的诱惑力在很长一段时期都保持着作用。关于特许，殖民地公司对采矿权特别关注；例如，在 1663 年 1 月对皇家非洲公司的授权就是证明，在该授权书中，授予了对“全部金银矿藏及进行贸易的独占性特权”。

在其他统治者看来，西班牙获得巨大白银资源的好运，对西班牙政府而言，这是一种直接而纯粹的意外之财；它的弊端（如果有弊端的话）对他们来说并非显而易见。兴起中的波旁王朝和衰落中的哈布斯堡王朝对财富的顶礼膜拜并无多大分别，继之而起的英国统治者继续希望北美洲东海岸会成为一个新的秘鲁。伊丽莎白统治下的新的大型公司都带有这种相同的标记。最早的“俄国公司”是寻找印度和中国的财富以及戈尔廉达的传说中的宝藏的一个补给站。在其沿西北航线进行第一次航海的时候，弗罗毕舍追求的是同样的目标。在其第二次和第三次航海时，他是被对纽芬兰金矿的幻想所诱惑。皇家采矿公司希望在英国的土地上找到金银，而在政府的纵容下，私掠船组成的合股公司在该时期内长期劫掠其他人的海上贸易。①

对现代观察者来说，很难把这些事件集中在一点来考察。半个世纪以前，历史学家们还在争论着，这些事件究竟是国家政策和威望的杰作，还是一种私人性的而且往往是可悲的寻宝活动。更多的了解使得人们很难将它们完全归到威廉·坎宁汉姆（他持前一种观点）或乔治·安汶（他持后一种观点）的简单结论上。例如，最近的研究“俄国公司”的历史学家注意到，1553 年的最初的企业有 240 个伦敦人参与，包括高级官吏、商人及航海家。

---

① 见乔治·安汶著：《经济史研究》第 5 章各处，特别是第 175 页。

他认为无法用单一的动机来解释这一企业的起因：国家政策、国家声誉、金银的诱惑、地理学的好奇心——所有这些因素都存在。[1] 伊丽莎白在为公司【501】与沙皇的讨价还价中态度坚决而讲求实效，在贸易特许权问题上毫不动摇，而对方则以东方人的方式谈及各种政治和王朝事务。

如果说，事情并不像以前历史学家把暴力时代的贸易战争与正当贸易区分开那样简单，那么，把贸易的历史划分为明确界定的阶段也并非易事。某个学派提出，开拓殖民地的动力开始时是单纯的寻求宝藏，而后来发展成一种更为复杂的关于殖民地所具有的一般经济价值的观念；特别是殖民地可以使母国从在重要资源方面对外国的依赖中解脱出来，并因此获得基本的贵金属储备和更大程度的战略保障。[2] 这种看法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占有相当地位：它在哈克卢特那里得到清晰的表述：

> 我们刚刚获得的美洲……国家……在气候方面相当于柏柏里、埃及、叙利亚、波斯、土耳其和希腊，黎凡特海的所有岛屿，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国、佛兰德、上亚美尼亚（High Almayne）、丹麦、伊斯特兰地区（Eastland）、波兰和莫斯科，而且可以马上或在很短的距离内为我们提供全部或大部分上述国家以非常昂贵的价格并伴随种种危险提供给我们的商品，而且花费极小，更为安全。

这段话表明，在英国殖民地事业的最早阶段，人们是如何形成那种最终在共和与复辟时期的航海条例中被付诸实施的观念的。然而，令人怀疑的是，是否存在着从“硬币主义”到“重商主义”观念，以及从“国家”企业到私人企业的清晰演进。与伊丽莎白时期一样，斯图亚特晚期的公司董事会——像非洲公司或渔业公司——是令人奇怪的朝臣、随从、政府官员和商人的大杂烩。金银仍然备受重视，而且很可能是出于足够的理由。发生较大变化的是观念、政策和法律，它们的目的在于保持和增加金银的供应。随着时间流逝，一部分这类殖民地和海外贸易的一个令人困窘但极具启发性的特征逐渐变得更加清晰了：有些贸易（特别是对东方的而且可能还有对北方的贸易）要求大量提供贵金属，它首先是被欧洲商人们用作采购手段。只有当这种贸易所带来的商品被转卖后所得金银或硬币的数量大于最初在国外【502】采购的花费时，才可能为母国净增金银或硬币的数量。这一主要事实在任何

---

[1] T. S. 维兰著：《“俄国公司”的早期历史》（曼彻斯特，1956 年），第 1 ~ 2 页。
[2] 例如可参见 R. L. 舒勒尔著：《旧殖民体系的崩溃》（牛津，1945 年），第 11 ~ 13 页。

一套为了证明殖民地贸易的益处而设计的理论中都不得不占有一席之地。

在《论公共福利》问世 3/4 个世纪之后，重商主义政策的核心特征由托马斯·曼在《英国通过外贸所获财富》一书中被加以归纳和重述。曼的著作成了晚期重商主义者的圣经——亚当·斯密认为它是大陆重商主义赖以建立的榜样——然而，当它被认为值得发表时，其福音已经过时了。像大多数重商主义著作一样，它也是危机的产物——就它而言，是 17 世纪 20 年代早期萧条的产物——然而，一直拖到在 1665 年的战争之前的冷战策略环境之中，它的强烈敌视荷兰的情绪显得颇合时宜时，它才获得发表。它所谈的东西与《论公共福利》不相上下。"增加我们的财富和金银的一般手段是对外贸易，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始终审视其原则；每年出售给外国人的东西在价值上要多于我们所消费的他们的东西。"曼是这样说明其原理的：如果（他说）我们出口价值 2 200 000 英镑的货物而进口 2 000 000 英镑的货物，我们必然赚得相当于其差额的金银。然而，如果我们的情况正相反，就会损失金银。这一原理几乎对任何人的情况而言都易于理解和应用，并随 17 世纪的继续进行而得到详尽说明和修正；然而，它作为重商主义体系的核心原理，其受到坚持的长期性可以通过马太·德克的《外贸衰退原因论稿》看出。该书于 1749 年出第二版，其时已在《论公共福利》问世的两个世纪之后，大概在曼之后的一个世纪又 25 年。德克在某些方面离开国家控制而倾向于自由贸易，尽管是老生常谈却能够这样写道：

> 如果英国的出口超过了进口，外国人必须以金银支付其差额而我国财富得以增加。然而，如果英国的进口超过出口，我们必然要付给外国人这一差额的金银而国家则变得贫穷。

难怪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贸易先驱们如麦考洛，被那些信奉这种纯粹谬论的人们的顽固坚持所改变。他们所设想的这种贸易平衡的谬论在萌诺斯和休谟等明哲之士摧垮其基础之后仍作为"镀金的泥像"而被盲目崇拜。在我们审视这些基础之前，值得我们一提的是，从 16 世纪中期延续到 18 世纪中期，这种原理的明显的连续性隐藏了这样一个重要的发展：与国家福利相联系的外汇问题被放在贸易流量以及制约这种流量的条件之后而居次要位置，这一变化以 16 世纪 20 年代盖拉德·麦里恩与其批评者之间的一场著名论战作为象征。【503】麦里恩坚持 16 世纪的传统。正如亨利八世时代的托马斯·格雷沙姆爵士一样，麦里恩坚信货币管制和限制的作用。格雷沙姆（其职务是为国王募集资金，而他却更看重向国王解释他自己在这件事上的成功）认为英国的最佳政策是使其货币在市场上保持尽可能高的价值，因为（他

论证说），这将带来硬币并使英国能够更便宜地购买外国商品。他忽视了这种政策对出口市场的反作用。半个多世纪以后，爱德华·米塞尔顿（冒险商公司的副主管，在某些方面强烈倾向于曼的观点即贸易决定汇率）已经能够主张“低汇率”的好处。高汇率不适合作为出口商的冒险商公司，使它难于找到市场，并在把佛兰德货币兑换成英国货币时损失了利润。

经济学专家们的争论往往与产生这种争论的实际问题离得很远。如果16 世纪 20 年代的争论仅仅是针对抽象原理的话，就不值得记录下来。然而情况并非如此。争论的结果事实上是曼的胜利。《英国通过外贸所获财富》连篇累牍地反复论证的理论是，任何货币控制——禁止出口金银，提高或降低币值，对出口利润的强制性管制（这种利润是“银行家最了不起的成绩”）——都不能影响国家的福利：“我们的财富的法则”是“我们的外贸的平衡”。这种信念指导着立法，或者不管怎样，它也是与曼时代以后数量渐增的立法相一致，这些立法的目的都在于扩大出口并按照某些原则减少进口数量。皇家兑换署在这种情况下没能复兴，它在 1628 年之后的取消，见证了认为货币政策是经济中的控制因素，而且可以不根据实际的贸易活动来规定这一信仰的衰落。在王政复辟之后，即使是在政府对外币和金银出口的禁止放松了的情形下，情况基本还是这样。本地硬币的输出仍是非法的。

货币控制的这种松动，以及对商品进出口的严加控制（这方面的最好的表述是在所谓的“航海条例”中），促使亚当·斯密评论说重商主义者在【504】这里只不过是从一种徒劳无益的监督转到另一种“更复杂、更令人困惑而同样徒劳无益”的监督。国内贸易（这位政治经济学之父说道）被重商主义者所忽视了。的确，所有事情都被他们忽略了。

> 没有任何诡辩（麦考洛写道）比这样获得的成功更彻底了……农业、商业和制造厂不再是公众关心的对象。“贸易差额”被认为是获得和增加国家财富的惟一来源和手段，这架复杂机械的一方是奖金和银行家，另一方是限制和禁止，人们为了贸易顺差而将它的整个运作体系启动。①

由于这些被证实是有缺陷的，麦考洛继续说，外交、军事和海上力量都被布置用来加速这一过程，只是出于“一种徒劳无益的企图，以实现想像中的优势和达到某种仅是虚幻的目标”。重商主义者的很多计划都未能见效，它的那种（私人的或国家的）经济企图毫无疑问起到了刺激战争的作

① J. M. 麦考洛主编：《早期英国商业论著》（1856 年，剑桥大学 1954 年重印），第 6 ~ 7 章。

用。然而，在此之外，很多反对重商主义的古典论争都是浮夸而不确切的。重商主义者远远不是根据其政策的实际结果来判断，而几乎无例外地把“贸易差额”的论点与国家农业和工业生产的增加密切相连。关于商业，经常是采用限制的原则，然而它却总是被认为从长期来看会增加贸易量。正如一个法国历史学家所论述的：“对货币获取量予以特别关注是重商主义者的起点，而工业生产活动则是实现他们那对外贸易繁荣这一最终目标的手段”[1]。此外，在研究者对为达到重商主义者目的而设计的立法规划的实际效果未作事先思考的情况下，也不能认为构成关于这些立法规划的争论的背景的文献，证明了（凯恩斯所说的）经济学家向重商主义提出的“理智上的困惑”这一指控是合理的。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把财富和货币看做是“在一般意义上具有各方面的相同性”[2]?《论公共福利》在这一问题上是非常明确的。贵金属相对其价值而言易于携带；可以长期保存；在各地都能通用，非常易于分割成许多微小部分；由于这些原因，它们被全世界一致选择，被认为是“所有文明都用作衡量物品所值的交换手段，非常适于长途携带或贮藏，或被接受为出卖多余物品的所得，和用来在最需要的时间和地点购买我们所缺少的物品”。除了这种清楚明白的常识之外，作者又对需要的和不太需要的职业进行了评论，说明尽管关于商业和货币控制的辩论还要持续3/4个世纪，而作者本人却早已意识到生产因素在国民经济中的基本重要性。他认为一共有“三类职业”：把钱带出国家的人；既没有把钱带出也没有带入，而是“把所赚得的钱又在国内消费的人”；还有把钱带入国家的人。第一种职业——广义上讲即进口行业——包括“绸缎商、杂货商、酒商、服饰用品商和 mileyners（该词意义不详——译者）”；被认为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对一个国家来说并非必不可少，而是可以从所有行业中省掉”。在没有其他补偿性赢利的情况下，它们会是一种昂贵的奢侈。第二类职业包括补锅匠、裁缝、烛台匠一类的手艺人，从国家的观点看他们既无利也无害。第三类行业——“织布商、制革匠、制帽匠和绒线制造商”——被认为是把财富从国外带入国内。这些职业使英国减少了对进口的依赖，节省了“目前花在进口上的无数财富”，并提供了可带来实际货币收入的出口。国家实力的观念早已出现：国家将充满“有能力保卫国家的人和同时能够为国家赚取很多财富的人”。这方面的榜样并不难找，佛兰德和德国就

【505】

① T. 莫里尼·廉比著。
② 《国富论》，第4篇，第1章。

是这样的国家，它们通过这类职业而拥有许多富有的城市，在这样小的弹丸之地做到这点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对《论公共福利》进行审慎、公正和分析性的解读，使得人们很难坚持通常的观点：即从硬币主义的黑暗，经过贸易差额理论的微明，再到自由放任主义的黎明，以及正统的经济科学，重商主义存在着一种理智上的进步。硬币主义并没有头脑简单到把财富和货币混为一谈的程度，如果说它的强调重点是在金银上面，那是出于植根于当时条件的实际理由。国王们需要“大量金银……以防备各种事件”，正如该作者认为的那样：

> 如果我们遇到战争和饥荒，正如过去发生的那样，而且需要大炮（军火）或其他来自外国的帮助，我们现有的货币并不能为我们提供这些。同样的，如果我们在国内缺少谷物，并被迫从国外来获取，我们自己的货币也不能去购买它。

这位作者提前两个世纪回答了亚当·斯密认为必要的进口始终只能通过商品出口来支付的观点；这些进口甚至在丰年也只能“带来勉强够用的必需品”。【506】因此“如果战争和饥荒同时而至，正如以前曾发生的那样，我们又如何是好呢？我们肯定会处境艰难并面临外国的威胁”。如果这些是写于1548 年或 1549 年，作者不必等待多久就会看到这种担心变成现实，1556 年西欧歉收，对波罗的海地区谷物的依赖耗尽了本地区的财源并使白银枯竭，而且它还很大程度上是那年的范围广泛的财政危机的重要原因。[①] 其他与对金银流失的恐惧有关的行为是：1566 年旨在鼓励本土制盐业的法案在其开头提示道，来自国外的食盐供应“的确花费了大量金钱，并由于浪费和使本国金银及硬币流向国外而导致本国的贫困……”，然而，还是曼的《英国通过外贸所获财富》更为系统地说明了，认为重商主义体系是建筑在对有关财富和货币的本质的无知和困惑之上的论断是多么轻率而危险。曼的核心理论，正如已经表明的那样，是贸易差额。正是这一点，而非“兑换”（正如麦里恩所主张的那样），才是“令人惊叹的功绩”的制造者。然而，贸易顺差在产生金银净收入方面的职能并不是通过一种抽象而迷信的方式被认识的，曼充分意识到贸易“可以”在不使用货币的情况下进行（他说），“在世界货币流通量很少的情况下，有大量的贸易是通过抵偿或实物交换来进行的”，曼自己作为托斯卡纳的一个商人意识到，当时最先进的贸易地区即意

---

① A. 弗依斯著：《16 世纪和 17 世纪经济与财政关系探究》，载《斯堪的纳维亚经济史评论》（1950 年）。

大利城市已经采用“债券”补充和代替贵金属货币的使用，而且“官方和私人银行每天仅仅通过签字就轻松满意地把巨额信贷从一家转移到另一家……”。他清楚地看到了把硬币主义的逻辑推向极端的结果：“所有人都会同意，一个国家如果货币充足就会使本国商品变得昂贵……”，而且尽管可能有利于“一部分个人的收入”，却“直接有害于国家”，至于物价高涨则会阻碍消费并因此减弱市场、贸易和就业。曼的著作的这部分内容的全部喻意是，货币的首要的实际职能是应用于贸易，而绝不是应用于国际贸易（他可能会主张）。在他的这一观点与他所坚持的、一个明智而强有力的国王应该每年“贮备金银”以防突然性的饥荒和战争的观点之间并无冲突之处。这种金银贮备的一部分似乎应以合同的形式“持续分发给”臣民用来【507】建造战船，购买和储藏谷物，兴办银行，维持武装力量及其装备。

重商主义者并不习惯于把他们的逻辑推演得太广。对曼而言，国家财富的问题就是私人财富的问题——“财富交付给国库和作为私人财产是一样的”。“今日只怀今日忧”或许是他们的主题，他们还可能震惊于休谟式的学术上的不负责任，这类人可以以一种源于对供求规律的坚定信仰的沉着冷静，来面对英国在一夜之间损失其金银储备的4/5（为什么只是4/5?）。亚当·斯密认为，把金银不必要地限制在国内如同保留多余的厨房用具。对曼来说，这种看法似乎还没有愚蠢到不可容忍的程度。《国富论》中在金银问题上的矛盾也是如此。因为如果说（曼很可能会诘问）在他写作《英国通过外贸所获财富》之前的一个世纪中，最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之一就是纸币和信贷获得了日益扩大的使用，如果说这一点大量节省了贵金属的使用并有效地增加了以金银作为基础的货币流通，如果说这些是确实无疑的，那么，这本身难道不是默然首肯了较早时期的社会对金银的依赖吗？这种依赖不是直到最近才被摆脱吗？曼心中所藏的部分实际的思考是众所周知的——例如东印度公司（他本人的公司）需要通过输出金银来购买作为返航及再出口货物的东方商品。这并非像人们有时所设想的那样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尽管它是极端的事例。对曼来说，“有许多国家只是为了我们的货币而给我们带来利润可观的贸易，否则就根本不对我们进行贸易，因为他们不需要我们的货物……”。他首先想到的是东印度，不过他同样提到了意大利和土耳其，并把这些国家与“东方国家”划为同一类地区，商人在那里可以使用硬通货购买小麦，带回仓库后再找恰当时机重新出口到西班牙和意大利以牟取厚利。对曼的逻辑进行争论，认为他所倡导的政策可能会陷入麻烦，这是没有益处的。有一点似乎很清楚，即他关于金银的思考的基石是对国内和国

际贸易技术的敏锐观察以及全面的（即使有时是目光短浅的）了解。后来的作者们经常犯的错误是以为存在着某种复杂的信贷的偿付手段，而曼则推想以硬币支付给外国人可能往往是必需的，否则就会完全失去某次生意的机会。的确，他可能并不理解（金银）双本位制的货币流通的本质（这种流通是政府出于政治目的对货币进行操纵的结果），而且他对贸易活动和兑换问题之间相互作用的看法也并不恰当。然而，曼及其同代人关于贵金属在外贸活动中具有某种特别的重要性的信念似乎是有牢固基础的。【508】

在曼进行写作的时期，问题最大的贸易是对东方和对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在这两个地区，困难首先来自于当地居民无力购买或不愿购买——以使相互贸易成为可能的——足够的货物；其次来自于缺少任何稳定的多边偿付体制（而不是用谷物或金银）来补救贸易的不平衡。1663 年政府决定废除对出口外国硬币和金银的惩罚，部分地是由于注意到荷兰共和国允许硬币自由流通，当然，同时，荷兰仍然不仅设法保持其货币而且设法巩固其作为金银币市场的地位。与此相关联（而且几乎被后来的评论者所忽视）的是可以被称做“硬通货”地区的问题。“有鉴于”（对法律做出变更的“鼓励贸易法案”的条文开头就是这样说的）一些重要而有利的贸易在没有硬币或金银币的情况下就无法进行，“必须允许自由出口”。随着时间推移，对北方贸易的重视发生了改变。由于耕地面积的扩大和技术的改进，英国对进口食品的依赖得以减轻，对白银大量外流的关注的必要性也相应地降低了。另一方面，对波罗的海地区的海军补给品的依赖不是减轻了，而是加大了。此后试图把新英格兰发展为木材和焦油的另一个产地的企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样的信念——通过减少对波罗的海地区所垄断的战略性商品的依赖，既可以在财政上，也可以在战略上（这两者难道不是一回事吗?）获得很多好处。这种看法在这一世纪结束时仍然很强烈：当“贸易和种植园督察官”在 1701 ~ 1702 年 2 月向其君主报告国家经济状况时，他们评论道：

> ……我们在与瑞典和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上每年逆差大约 200 000 英镑，在对丹麦的贸易上我们每年逆差约 150 000 英镑，而……我们近几年对西印度输出的金银超过了 400 000 英镑，此外在最近的战争之前的若干年里我们对法国的贸易每年逆差已达大约 1 000 000 英镑。

然而，某位现代批评家可能会问，这些赤字难道不能通过英国的国际贸易关系范围内的信贷而抵消吗？随着总体上日益增加的贸易顺差，通过货币兑换上的对销机制能解决个别的贸易逆差问题吗？答案似乎是不能。【509】

重商主义者构建其理论的时代，是一个贸易已经突破传统的欧洲界限（商人们在此范围内彼此相识并通过固定的渠道来进行贸易）并已经扩展到外部的亚洲、非洲和美洲地区，伴随着这种扩展产生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它们部分地是由于（正如我们说过的）购买力的缺少以及对热带地区消费者的陌生的品味难以把握，但最主要的是由于缺乏任何可以通过多边贸易体系来解决支付问题的手段。这些困难中的一部分，当贸易和支付网络被——特别是荷兰人——传播到北方和东方时逐渐得到了解决。然而很多困难仍然存在。“东印度公司”，在造币厂的牛顿的继任者写道，“总是需要大量的白银……所有产自法国和佛兰德的酒、白兰地、锦缎、玩具、花边织物和麻纱以及产自丹麦和瑞典的铁，海军补给品和木材都是用金银支付的……”此外，使这些麻烦更为严重的是，没有人对收支平衡的统计感到满意，这种统计是以声名不佳而且有缺陷的海关数据为基础的，并完全忽略了无形的进出口，因此毫不可信。

金银在弥补国际收支体系的鸿沟方面所起的持续作用的最鲜明的证据，来自于亨利·奥克森福德所著《论我国全部贸易差额的发现（1698～1719年）》这一类著作。奥克森福德是海关总监察长助理，他并非是一个雄辩家；他的调查是枯燥的、事实性的和翻来覆去的。然而他的著作毫无疑问地证实了当时的国际收支体系的结构缺陷，这一体系迫使商人和政府重新回到对贵金属的依赖。这类问题并不是英国和法国这些通常被认为是追求可界定的“重商主义”理论的国家所特有的麻烦。或许关于对波罗的海和对东方贸易的实质情况的最有说服性的证据来自于荷兰和丹麦的资料，它显示出，和英国人一样，荷兰人也都依赖于金银和硬币的自由流动以维持和提高其对外贸易的水平。“……荷兰的居民”，那位紧随曼之后的17世纪最有影响的经济学作者写道：

> 如果不携带货物就无法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他们在那些国家出售货物，把它们变为货币，并用来购买他们在那里找到的货物，或者在找不到可买之物时把钱通过兑换带回荷兰。然而，如果这些外国不需要或极少需要我们的货物，却出产（我们所需的）商品，除非我们把金银制成的硬币或货币带到那里，否则无法与他们进行任何贸易，这难道不是很明显吗？由此所有人都知道挪威、东方国家、士麦那、波斯、印度、中国等国家所提供给我们的商品远远多

【510】

于它们购自我们的商品，我们只有使用金银与他们进行贸易。[1]

这些话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当时人们对金银的态度之中所包含的某种道理。稍后关于荷兰贸易结构，法国人有一种分析与此是一致的。[2] 荷兰人如果不是随身带着金银的话——带到但泽、挪威、哥尼斯堡以及俄国，那么，他们是无法以其在北方的那种规模进行贸易的。正如最近的关于波罗的海贸易的详尽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几乎毫无疑问，丹麦湾是来自西班牙属美洲的"白银船队"的大部分船只的最终目的地。正如关于荷兰和英国公司的统计数字所表明的那样，另一种主流贸易是指向印度的贸易。此外，其他地方还有更为地方性的需要。热那亚在从西西里购买丝绸和粮食时发现西西里人坚持要他们以银币支付。总的来说，似乎没有什么理由怀疑，就长期而言，欧洲出口的白银至少和它所获得的白银一样多。

那些对需要以金银来促进的海外贸易怀有直接兴趣的人——如曼和查尔德——的观点，以及那些相信这种贸易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而对公共福利有重要意义的人——如唐宁和考文垂——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为以增加国家可利用的财富资源为目的的政策提供了某种合理的根据。有一种与它们一道，但在某种很小的程度上，在贸易和货币政策方面与之意见相左的观点，是一种把首要关注点放在货币上的观点。这很可能是重商主义者对一国范围内贵金属储备怀有焦虑的最基本原因。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重商主义者并没有将其逻辑推向极端。当可被称为货币数量学说的理论付诸实施的时候，曼仍然在世。《贸易增长》（1641 年）的作者亨利·罗宾逊对于垄断论者以牺牲他国为代价而为本国争取财富的愚蠢不抱任何赞同："……在那些我们前往出售商品的国家，如果货币也是充足的，这符合我们的利益……以免到头来我们像亚历山大大帝一样，在几乎征服整个世界以后，因为不再有征服的对象而哭泣"。重商主义作者对聚敛金银的后果的明显漠视（这使后来的【511】作者感到困惑），[3] 部分地可以用某种金科玉律般的格言（无疑是得自于商业经验）和法则来解释，即赚钱总比赔本好，他们认为这一真理对国家和对个人都是有利的。他们并非逻辑学家，因此，他们似乎没有必要在这一问题上追根溯源。由于存在着疑虑，使他们不太可能长时间不去关注那个时代另一个主要的可怕之物——对"货币短缺"的恐惧。在整个这一时期，特

① 《荷兰的政治准则》，1662 年出版，作者被认为是让·德·维特，而实际上是莱顿的布匹商皮特·德·拉·考尔特。

② P. D. 胡特著：《论荷兰的贸易》（伦敦，1717～1719 年）。

③ 例如，可参见海克斯舍尔著：《重商主义》，第 2 部分第 4 章。

别是16世纪20年代、1649年、16世纪60年代和16世纪90年代的贸易衰退期间，都可以听到这样的哀叹，即商品因卖不出去而积压，人们则没活儿可干，而原因则是“货币短缺”。然而，在那些本国不具备贵金属资源的国家里，也许总会出现某些关于外贸对货币本身产生影响的焦虑，这是可以理解的，是毫不奇怪的。贸易活动、汇兑率与由金银双本位制的调节和贬值所造成的货币流通现象之间的关系完全没有得到正确的理解。没有任何人能够具有这样的观点，即除易货贸易之外的贸易水平和就业水平以及人们的实际生活所依赖的货币，应当是不受干预的。这类意见不能被当成迷信而遭到抛弃（那些较为明智的观点得以避免这种迷信）。那些认为货币状况——与输出白银的公司或商人的繁荣兴旺相比较而——具有更高优先地位的人们之间的冲突并非局限于英国。白银价格在整个17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荷兰飞速上涨，政府根据货币管理部门的指示对白银出口加以完全禁止，而这激起了阿姆斯特丹市长的强烈抗议。

> 作为全面禁止白银出口的后果，这个国家不仅是与东方、莫斯科、威斯特伐利亚等地的贸易，而且还有与东印度的贸易，都将注定变得停滞或至少受到很大影响。因为没有现成的货币，贸易是不可能的，特别是阿姆斯特丹——作为一个在欧洲范围之内所有可支付汇票实际上都可以提款、汇寄、贴现或转让的地方——如果那里的货币兑换商和商人在提取和贴现汇票的地方不能自由地从这个国家送出白银或硬币以避免损失的话，将遭受很大损失，甚至冒着失去汇票交易的危险。

阿姆斯特丹市长对该国金银和硬币匮乏的恐惧，以及因为匮乏可能更加严重而感到的焦虑，不知为何与若干年之前困扰着其邻国英国的那些焦虑相类似，英国财政部因这种焦虑而寻求对海关统计数字进行分析的可能性，以便使英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保持平衡，并为此任命了一个海关总督察员去做进一步的研究。【512】

就荷兰经济的结构和特点而言，贸易差额的概念对它很少或几乎没有意义（参见后面），但是没有理由认为，荷兰商人与新上任而且生机勃勃的英国财政大臣威廉·洛恩德相比具有本质区别。关于英国的形势，他在1695年写道：“英国白银匮乏以及由于汇款而造成的外汇损失的根本原因……”是“贸易差额”。英国人从差额这一角度使经济形势明确化这一习惯做法，毫无疑问与这样一个事实密切相关，即英国的出口贸易仍然主要建立在本土的初级原料和土特产的基础之上。来自像曼和恰尔德这样的与转口贸易

（这种贸易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造成了英国对外贸易的革命性变化）相关联的商人和公司的，对一种更自由、更合理以及不太迷信的贵金属政策的呼吁，并非出于偶然。概言之，由于英国的贸易结构呈现出某些早些时候作为荷兰人标志的那种货栈特征，人们对货币政策的观念也经历了调整以适应这种变化——然而有人也许会补充说，这种调整并没有大到可以说服他们允许出口英国硬币，而是这种出口仍然是被严格禁止。

此外，当时的经济学思想的一个核心特征仍然是赋予贵金属高度的价值。这种思维方式并非仅限于那些被认为是正宗的重商主义者所持有，它同样被那些讲求实际的、先进的和大城市的荷兰共和国的商人们所分享。它产生于当时的一些条件因素。欧洲仅仅是刚从易货方式的国际贸易中解脱出来，尚未完全采取后来的贸易者所设想的那些支付和信贷手段。易货贸易的传统仍然存在于波罗的海港口，在 18 世纪，格拉斯哥与非洲和西印度的贸易仍然是在易货的基础上进行。在某种更为灵活的支付机制得以发明之前。合乎逻辑的进展是从易货贸易发展到现金支付。在人们接受劝导对纸币给予信任之前，以及在稍后的几代人接受各式各样的信贷形式之前，仍有某些障碍需要克服。其中之一就是重商主义欧洲的贸易模式的僵化，这是由地区之间的贸易牢不可破这一特征所造成的。亚当·斯密提出，沉迷于金银的重商主义者忽视了履行其职责的另一种可能性，即以商品出口来支付，此时他犯了弄错年代的错误，但他直接指出了 16 世纪和 17 世纪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一【513】个主要难题：他的评论即古代时期的粗糙的物产显然不适合这类交换，而“更为精致和先进的制品”由于其体积小而十分美妙地适合于这类交换，显示出他对于重商主义时代的基本问题是多么的不了解。在支付方式上重视金银，这一问题的产生是由于西欧所需要的波罗的海物产超过了它所能支付的对方愿意接受的货物的数量。荷兰人在这类易货贸易上做得比英国人好，因为他们所经手的通过做中介贸易而得到的货物种类更为丰富，特别是硬币的数量更多。同样真实的是，他们在东方相当成功地建立起一个货栈体系，这个体系涵盖于中东、印度大陆、爱琴海、中国和日本之间，因此，使对从欧洲输出的硬币的依赖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英国人则不太成功，并且继续输出巨额白银——18 世纪 20 年代几乎达到了 900 万英镑，或者说等于 1701 年英国银币铸币量的 2/3，以解决圣大卫城堡的英国代理商在 1693 年所描述的那种问题，不过这种问题绝不是仅见于在印度的贸易。“土著人”，他们写道，“不愿用胡椒来交换货物，因为，如果他们出卖胡椒而得不到现钱，他们就不愿意卖掉它”。在银币的重要性衰减的背后——首先是与黄金挂

钩，然后是独立的——是这样的事实，即白银作为一种国际交换中的商品，其价值高于仅作为一种国内货币的价值。人们越是到更远的东方进行贸易，白银相对于黄金和货物的价值就越高。

最后，除去这些特性——即一种仍然原始的，仍然与初级商品如棉花、木材、鱼类、盐、酒和羊毛的交换密切相关的欧洲经济特性——之外，还存在着由战争、暴力、政治动乱所造成的问题。那些在人们心中徘徊不去，而且在哲人和经济学家看来似乎非常愚蠢而不合理的偏见和迷信，却在一定程度上是时代的反映。"战争"，乔治·克拉克爵士在17世纪时写道，"可以说，它像和平一样是欧洲的一种正常状态……"[①] 一场战争可能会切断整个地区的贸易，海盗和私掠船对海上货运来说是一种持久的威胁，甚至在和平时期，差劲儿的交通也会妨碍承兑，而自给自足的政策也会使一个国家与除去宗主国之外的所有地区隔离开，无法自由交往。在这样一个动荡年代，暴力以及暴力的威胁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们对金银寄予的信任要超过对借据的信任。正是某些这一类的考虑使得政治家和商人把贸易顺差视为（凯恩斯所说的）"务实政治的优先目标"，而非在后来的经济家眼中的"纯粹的执迷"[②]。【514】

如果说，在当时的经济中，可以找到某种有关重商主义者对金银的专注的原理，那么，亚当·斯密、麦科洛以及其他人的另外一些指责，即在重商主义体制下，"国内贸易被忽视了"。即农业、商业和工业由于对"差额"的偏爱而受到忽视又做何解释呢？贸易差额问题所争论的对象既不是纯粹经济学的，也不是与国家的战略实力有关的纯粹政治学上的。不可否认的是，"重商主义体系"在英国建立的这个世纪里——从1620年到1720年——很多思考这一问题的人所未曾做出说明的（如果不是最终的）目标就是为国家经济创造财富。与17世纪20年代的托马斯·曼一样，弗朗西斯·布鲁斯特在1702年的著作中也明确地认为，"这个国家之内的所有劳动力都得到雇用是使金银流入王国的最可靠的方式和手段"。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一观点在半个世纪之后仍被德克尔和其他著作者所采纳。然而这并不是说"差额"问题使他们心无旁骛；相反，对他们来说，这一观点是作为某种动力的。如果出口得以增加而对进口的依赖却减少了——不管全部的目的是否在于增加金银，使国家更加强大，百姓（或其中的某些集团）更加富裕，

① G. N. 克拉克：《17世纪》（牛津，1947年），第98页。
② T. M.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原理》（1936年），第333页

英国更能够自给自足，或税收得以增加——都必然会出现对经济过程的干预，生产的数量和质量也必然会得到提高。这个过程并非是一帆风顺的。立法是时断时续的，不过在大约一个多世纪的时期内，立法显示出，鼓励出口和减少进口这一理念正在得到稳步发展。中世纪的法律汇编中散见着许多条例和条例片断，它们的目的似乎相同——促进羊毛生产或织布业或造船业或是防止金银流失——然而经济立法在新的阶段获得了某种理论上的一惯性和某种行政上的持续性，而这些是过去所缺乏的。这些条例对价格问题、质量问题和生产方法的问题不太重视，而是专注于较大的问题，即通常在贸易差额这一概念中得到具体说明的那些问题。对金银的辩论中的思辨性和抽象性被人们放弃：在新阶段，所持观点的正确或错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观点最易于被理解以及可以最有效地得到贯彻实施。

此外，研究者对证据的任何处理，都尚不足以证明 17 世纪英国人所乐于接受或被迫忍受的不同政府在对待国家经济中的问题的态度有什么显著差【515】别。最错误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以为共和党政府就其性质而言比保皇派政府更加能够回应私人贸易的需要。前面已经提到，新英格兰殖民地的商人与清教徒绅士之间的关系是紧张的，后者从最开始就为前者规定了方向，并在必要时以纯粹中世纪的方式来反对违背道德的商业行为。这类良心上的责备对詹姆斯一世（他对那些对他资助金钱的人的建议还是予以倾听的）或查理二世（他在位早期对经济事务有一种道德上的兴趣，定期与“最活跃的商人们”进行磋商，向他们提出愿意尽自己所能促进贸易并在非洲贸易公司、皇家渔业公司和哈得逊湾公司等前景良好的项目中找得了王室及其赞助者的合适的代理人）来说并不存在。大型出口公司的利益在两个“航海条例”中都得到反映——其中一个是在其他时期通过的；另一个是在王政复辟时期通过的。经济政策由于要服从于斯图亚特王朝或克伦威尔新教联盟的更重要问题，从而可能受到调整或限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一个 17 世纪的政府与重商主义经济学的一般目标有任何冲突之处。不过，任何政府都会尽力避免与贸易竞争对手之间发生轻率的诉诸武力行动，比如克伦威尔在 1654 ~ 1658 年之间，以及查理二世在 1664 年所做的那样。

思想和政策的新阶段的特征是政府利益和私人利益的结合，国家和商人的结合，而他们所追求的理念不仅是国家实力，而且是国家实力与私人及社会利益的结合，而这阶段的开始应该追溯到 1622 年，乃至追溯到那一年据报告说是作为反经济萧条的措施而成立的委员会，而这种措施又是紧随重商主义那一个不幸失败的所谓科肯方案而发生的。重商主义的伟大而富有创造

性的阶段的结束是以1721年国王的著名演说作为标志的，沃波尔在演说中宣布，他打算使现存的大量重商主义立法在关税和税收方面的内容中所残留的混乱得到整理，从而扩大国家的商业，而“这个国家里的富有者和贵族是首先依赖于”这种商业的。对实现这种最终目标来说，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他继续讲到，“要比尽可能地促使我们自己的制造品的出口，促使为这些产品的制造而进行的产品进口活动变得更可行和容易更为有益的了；通过这种方式在贸易差额中我们将保持顺差，我们的航海得以增加，我国的穷人当中也会有更多人得到雇用。”应当予以强调的是，这样的说法并没有宣布经济干涉主义观念的终结。它标志着这样的事实，即重商主义的传统机构是完备的。此后的重点在于对重商主义进行调整，特别是为了工业的增长而采【516】取了越来越多的保护。

1622年的委员会是在经历了漫长而可叹的经济混乱之后才出现的，而“科肯方案”只是这种混乱的一部分。科肯及其支持者的目的，名义上是促进英国的呢绒制造，使其从生产半成品发展到生产成品。因此很多人以为这将可以增加呢绒业的就业，特别是增加整修和染色工人的就业，并可能使英国在与荷兰争夺市场时获得更大份额的利润，而且在总体上将会使已经成形的关于贸易顺差的观念得到促进。英国的国内政治状况并不可靠，它反而衬托出了科肯的雄心的真实性质：打破冒险商公司对呢绒出口的把持。我们不必关心该方案的细节，这一方案的失败是灾难性的，并在其后留下了长长的破碎的痕迹，知道这一点就足够了。在清理废墟的过程中（其中包括大规模的失业，贫困以及与荷兰的一次重大争吵），有一点变得清晰起来，即关于危机的原因以及应采取的对策，大部分公众的观点已经发生了改变。正如以往一样，那些饱受困扰的，肩负着对付危机的任务的官员们首先采取的办法仍是提出如下建议，即加强货币管制，继续执行现存的对金银出口、销毁硬币以及制造金银用具的禁令。甚至在1621年的辩论中，最受赞同的关于危机的看法仍是老调重弹的“硬币短缺”。然而，在莱昂内尔·格兰菲尔德领导的皇家顾问小组内部仍产生了较为明智的忠告。这些建议是通过减轻银币的重量来解决这些问题，然而1620年成立的一个专门处理货币问题的委员会回避、敷衍并最终扼杀了这些建议。其后，1622年的委员会提出的方案更为明智，就本身而言，它们所围绕的原则并非创新，但是对贸易差额的阐述却前所未有的明晰准确。托马斯·曼成为委员会成员，这是意料之中的事；而且他的参加为当时的政策做了最为重要的宣传。委员会成员提出了今后的国家经济政策所应以之为基础的6个主要原则。这些原则是：（1）通

过禁止（特别是对荷兰）出口羊毛，漂白土和白粘土等措施为英国呢绒业保留原材料。(2) 通过阻止英国船只和商人向荷兰竞争对手供应西班牙或土耳其羊毛等措施对其造成打击。(3) 通过发展制造业而减少对进口的依【517】赖和金银的外流；亚麻布将在国内制造，本土种植大麻和亚麻，以使英国不再依赖波罗的海地区。(4) 目前由荷兰人开发的渔业将由英国公司开发，荷兰人将被赶走。(5) 通过向英国进口货物而赚钱的外国商人和船主将必须把所得利润用于在英国购买英国产品。(6) 进口货物只能由英国船只或货物出产国的船只来运送。这些原则（除去第 5 条）全部成为后来的具体政策所由以产生的根源。这些原则结合在一起，代表着一种对荷兰人的进攻战略，荷兰人在欧洲经济中通过作为中间人、掮客、精加工和成品加工者而获得的有利可图的位置是脆弱的。在这里，人们不难看到与《英国通过外贸所获财富》一书中的原则如出一辙的观点。

> 如果我们充分考虑到英国的广袤、美丽、富饶、海上和陆上的力量，或说是勇敢好战的人民、马匹、船只和武器的众多，有利于防御和贸易的地理位置，海港和港口的数量（这些港口敌人难以进入，而本国居民则便于出海），由优质木材、铁、铅、锡、番红花、谷物、食物、皮毛、蜡和其他自然资源所构成的财富，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王国有能力成为不受制于人的国家。因为任何强国，不论它拥有什么样的繁荣和优势都无法像这样得天独厚地拥有充足的食物、财货，以及在战争与和平时期都需要的东西，它们不仅足以自给，而且可以满足其他国家的需要，以此衡量，英国可以每年获得大量货币，从而使其福祉趋于完美。

不幸的是，稍加审视就会发现，并非所有这些自然资源都是英国最多。另一方面，荷兰人的国土狭小，资源贫乏，其幅员“不及英国两上郡之和”，然而它却显示出技能的作用，即“在商业领域里的不断进取”所产生的作用。凭借这一点，荷兰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而且并没有损害英国人的利益。因为荷兰人是以船运作为其贸易的基础的。而其船运又是以在英国沿海的鲱鱼捕捞业为基础的。在那里，英国人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可以看到荷兰渔船——“数以千计的家庭、家族、手工业、贸易和职业都因此而运转，维持并兴旺，特别是航行和航海方面”，同时国家的国库收入也由此获得。

嫉妒、野心和常识遂成为后来被称为重商主义的政策的主要源泉。对用【518】于呢绒制造的原料的出口禁令被年复一年地重申和加强，并存在了一个世

纪，它是亚当·斯密所抨击的一个主要目标。这种措施对斯图亚特王室，国会议员和受到限制的君主而言都是一种共同信念。实行这些措施所遇到的困难以及存在着为竞争对手提供原料的其他渠道这一事实，使得封锁其他羊毛来源的想法得以产生。1651 年的一项计划试图通过一家私人公司与西班牙国王达成协议，提前购买塞维亚和卡斯蒂里的全部羊毛，从而使荷兰人的羊毛供应减少 4/5。这种想法在 1662 年被再次提出。这种计划是否被付诸实施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在危机时刻（正如 1622 年、1657 年的危机，而 1622 年的危机完全是呢绒业的危机），它总是易于被人们想到的一种办法。

关于新工业（比如亚麻纺织）以及种植能提供工业原料的作物（如大麻和亚麻）的计划都与减少进口并促进出口的观念有密切联系。像英国这样富饶的国家（曼说道），应该“通过利用（无限多的）荒地……来自给自足，并免于进口大麻、亚麻、绳索和烟草以及其他各种我们现在取自外国并使我们陷入巨大贫困的东西”。由于我们“在知识上的不足”，使得我们在“财富方面陷入贫困”，这样的主题在整个这一世纪里被不断地重复。然而，直到这个世纪结束时，经过持续努力，英国的呢绒业才能够在各种工艺的技术程度上在雷顿与荷兰相竞争，并能出口真正的制成品，而英国的亚麻业也才能与哈勒姆（Haarlem）的亚麻业相媲美。至于“开垦荒地”的方案则较为迅速地成熟起来。早在 1589 年，一个早期的规划者就设想出了把沃什湾（the Wash）周围的费恩地区（the Fens）排干积水并变为一块沃土，变成“整个王国的粮仓，并足以供应其他国家”。这样，那里可以使 200 000 人生活富足，船运将因粮食贸易而兴旺，铁匠生意，还有造船业、水手、船帆制造等行业也是如此。100 万公顷的土地可以饲养 300 000 头牛和 25 000 匹战马。从而，那里将成为“国王的领地，一个新的共和国和一个完整的国家”。16 世纪 20 年代，哈特菲尔德沟（Hatfield Chase）即在汉伯尔（Humber）、特兰特（Trent）和奥斯（Ouse）之间的 70 000 公顷无法通行的沼泽地带被排干，使得那里的地价从每公顷 6 便士上涨到 10 先令。然后，杰出的荷兰工程师沃姆伊登又从那里转到费恩地区——“作为 13 个县的排水之地”，是“零星散布着几丛芦苇”的一片泽国……到 16 世纪 50 年代中期，萨缪尔·哈特里布把这片被开垦的土地描绘为“出产英国最好的大麻、亚麻、燕麦、小麦、油菜籽和木材”。规划者们总共开垦了几乎 50 万公顷的土地。

渔业也被 1622 年的委员会所涉及，其状况长期以来令人哀叹。从 6 月到 12 月，荷兰捕鲱鱼船队沿设得兰的浅滩一直到达泰晤士河港湾。英国的 【519】

批评者认为这是对国家尊严的伤害，他们所估计的荷兰人在此捕鱼所得到的价值数额巨大，但显然是有所夸张的。然而他们的估计并没有超过荷兰人自己对此项价值的估计，事实上，正如强调农业对英国的重要性一样，强调捕鱼业作为荷兰经济基础的重要性是不应被视为夸张的。它是英国与荷兰之间关系产生摩擦的一个持久根源，而且它是关于海上主权的法律基础的主要争论的根源。当荷兰人宣称其拥有捕鱼自由时，他们在格劳秀斯的《论海上自由》中寻找经典表述，而英国人则以约翰·塞尔登的《领海范围》作为依据。此外，一系列组建英国渔业公司的尝试都归于失败。正如英国人似乎缺少加工和染色呢绒的熟练工艺一样，他们同样缺乏捕捞、腌制和装运鲱鱼所需的并不神秘的技术。渔业问题因此而持续地刺激着那些更为狂热的人，这些人认为英国获得财富和力量的最佳途径就是与荷兰开战。他们的理论在 1652 年和 1665 年受到检验，并被证明是有缺陷的。

众多私人的和国家的动机，混合起来并存在于 17 世纪人们的心中。它们所产生的一系列思想和政策被称为重商主义，其著名的体现便是《航海条例》。为了理解《航海条例》的目的，我们必须记住，新殖民地地区的重要性不断增长。关于殖民地开发，最早的经济动机往往是寻找贵金属。而这种动机又及时地让位于一种普遍的期望，即把殖民地作为可供选择的，更廉价和更安全的货物来源，在过去，英国只能从其他国家购买这些货物。然而，这种期望反复受到荷兰人的阻挠，他们所凭借的办法是介入到殖民地生产者与英国购买者之间。

英国的人们因此认为支付运费和船费使英国货币枯竭，并因此认为英国组建一支船队和水手队伍的机会被剥夺了，而它们不仅是有利于经济，而且还有利于国防。1651 年的《航海条例》设计得巧妙而适当，其目的在于截断荷兰商人和船主对英国的全部进口。在其效果得到令人满意的证明之前，它被 1660 年、1662 年和 1663 年的《航海条例》所取代，它们的范围比 1651 年的条例扩大了，其目的则更有限，而其实施则更有效率，最近的历史学家研究了其实施的细节，并对其效果给予了高度评价。① 在乔治·唐宁【520】爵士的领导下（他或许应被称为重商主义体系的设计者），英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自此而由英国船只所独占、保护和运输。那种直接禁止金银出口的老办法现在大都已被放弃，而重点转移到了增加出口的数量和价值，减少由外国船只进行的进口的数量和价值，并尽可能通过使用英国船只来获得收

① L. A. 哈普尔著：《英国的航海条例》。

人。因此，在历经将近40年的间隔期之后，曼及其同事的建议被完全地付诸实施了。

然而，所有这些并非仅仅限于“贸易差额”的神话。“贸易差额”的概念及其与金银的关系变得松弛起来，这一概念成为当时最主要的经济学教条，它意味着，并也可以被人们认为意味着，（对许多不同的人和利益团体而言）它是许多不同的事物——而任何这些主张都不能被予以否认。尽管如此，如果把贸易差额看做是思想和政策中的自相矛盾的，破坏性的因素，那将是错误的。一般来说，无论它的具体结果是怎样的——这点根本无从知晓——重商主义者把“贸易差额”理论视作一种动力理论，其生命力到达经济体系的每一环节。关于呢绒贸易所采取的措施——保留原料、招募技师并保护市场——不仅仅被认为是有助于贸易顺差。贸易顺差本身就是国家福利的一个衡量标准，反映出（正如重商主义者相信的那样）穷人就业的增加，雇主财富的增多，整个国家的利益和力量的增长。《航海条例》作为经济体系的另一个重要基础，其目的是双重的，即通过对船运和殖民地的垄断而增加战略实力和经济财富。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批被列举出来的来自殖民地的商品之中，就包括用于呢绒业的热带染料。在这方面，立法者们不过是把已有几个世纪历史的原则扩展到殖民地开发的新阶段罢了，这种原则就是为国家的工业保留所需原材料从而对抗法国和荷兰的乡村工业的竞争。这种官房主义（fiscalism，又译财政主义——译者）是经济政策的一个因素，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然而，英国重商主义的财政理论似乎经常与强有力的私人和政府势力相一致，并且不像西班牙或德意志诸侯的那种与这类势力相对立的财政理论那样有害于经济发展。假定说，经济决策者们最精心设计的计划会在时间流逝中变得陈旧僵化并因徇私舞弊而被削弱，而任何政府机构最终都将变得迟钝而腐败，英国最后经检验也未能幸免于此。那么，流行于这一富有创造性的世纪里的英国重商主义思想在接受毫无成见的审视时，就似乎是意义非凡而效果显著的。【521】

在近代初期，法国所发展起来的有关国家政策的思想与英国具有很多基本的相似性，不过，这些思想受到经济环境的强烈影响——特别是受到经济资源的性质的影响——也受到政治制度的影响（法国的政治制度在这一时期与英国有显著差别），还受到那些法国经济中留有痕迹的个人思想和事件的影响。经济政策和思想的绝大部分发展都受到法国国土面积和财富的影响：法国在1600年人口就已达到1 600万，是西班牙或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的2倍多，是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的3倍，是荷兰共和国人口的

8 倍多。经济上的中央集权在当时的荷兰不存在，在 17 世纪的英国也开始衰落，而在法国柯尔贝尔时期却处于鼎盛时期。处于这种中央控制之下的资源包括农业产品——酒类及谷物——它们产自欧洲最富饶的地区，以及波尔图和马赛等港口的运输和贸易，这些港口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崛起并辉煌。这一地区的经济统一某种意义上是人为的结果，因为交通往往很糟或根本无交通可言，而且贸易所受到的阻碍——过路费及地方特性——一直持续到大革命时期。然而政治上的统一是实在的，这意味着自中世纪末期发展起来，并在柯尔贝尔法典中最终得到具体化的经济理论，在这块当时最大的政治统一体中无论如何被贯彻实施了。法国国王、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行为与思想一直是与他们所处的物质环境以及他们的征服开拓的雄心与意愿相互作用的，而这些行为和思想部分又是起因于他们意识到了法国所固有的、尽管也只是潜在的成为欧洲霸主的能力。

颇具特色的是，从 15 世纪中期到 17 世纪早期，从《英法传令官的辩论》到黎塞留的《政治盟约》，法国的政治——经济思想都持续思考着法国所蕴含的财富和力量以及与之相反的它实际上的弱小：这使托马斯·曼的英国读者联想起他关于“自然”及“人为”财富的论题。法国的先驱们陶醉于法国所拥有的可估算和不可估算的优势—它的优良港口、木材、铁、盐、葡萄园、矿产、渔业资源，它的众多勤劳的人口，更不用说还有它从一流的捕猎活动所获得的乐趣，它的女士的美丽，以及由众多神圣古迹而产生的精神上的慰藉。法国的经济学如果不能富于人性意味，那么就会一无是处。然而，正如在黎塞留的著作中那样，法国在经济—战略方面的弱小是得到承认的——它缺乏一支强大的商船队，而这样的船队能够使[522]法国最大限度地增加其财富并可以作为海军的基础，从而在必要时用强力手段获得无法通过贸易来得到的东西。在黎塞留的思想中，国力与财富之间具有一种孪生关系并应共同作为法国国家政策的不可分割的目的，这两者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他所提倡的用来实现其目标的手段——通过大型贸易公司，通过殖民地开发，通过那些可以带来金银贮备的净增长的贸易，而且始终以海军力量作为基础——并非是独创性的。他的全部思想都可以追溯到“奏章”及 16 世纪的经济学家及政府官员的著作中所孕育并且也已零星出现的这类观点。一种实际上（尽管不像同时代的英国思想那样明晰）以贸易差额并往往以国家的金银净增长作为衡量标准的国家优势的观念自始至终都在发展之中。例如，在 1484 年的一份总议会的“奏章”中就这样写道：“对于政治机体而言，金钱正如人体中的血液一样，

有必要检查一下法国已经流失的血液……”从那时以后，一批批定期发布的王室文告禁止向罗马出口货币：高卢主义的根源之一就是硬币主义者。旨在禁止皇室成员之外的其他人使用和进口奢侈品的《节约法令》是同一思维模式的另一产物。

到16世纪下半叶，这些源自中世纪的简单思想已经发展为完备的立法（这些法律所得到的最好的礼遇可能就是对它们的违反），其目的在于国家的自给自足和培养本国产业。1576年的一份奏章的主题是，如果人们最大限度地从事法国本国所产的丰富原料的加工生产，将会带来财富。这种对经济学上的陈词滥调的虔诚表述经历了很长时间才得以变为具体而有效的行政措施，然而这并不必然地使其失去重要性。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形成在管理上具有规模经济性科学很缓慢地发展着，仅此而已。在这方面的实例已经举过了。莫提奥（一个威尼斯人）在1557年领到了一个为期10年的生产玻璃器皿的执照。安托尼·卡拉斯被免去税收，以便他能为丝绸业种植桑树。德·罗伯维尔在官方资助下探寻并开发矿藏，从而使得金银匮乏程度降低。这种思想被经常重复提出，而其功绩的很大一方面在于使有劳动能力的穷人得以就业——这对黎塞留和柯尔贝尔而言，是颇有吸引力的工业活动所具有的一项好处，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是如此。“国民们”，黎塞留说道，“变得拥有财富且不服管制。”柯尔贝尔的工作时间的相当一部分是用来对他的下属州长们轮流教诲，宣讲工业的好处在于既可以作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又可以增加国家的福利。工业仍然被视作一种社会稳定因素，而不是一种社会的刺激因素。因此，1572年的一份诏书的主旨是禁止外国纺织品的进口，从而 [523] 使法国的臣民“能够更好地制造和生产羊毛、亚麻、大麻和纤维制品……并获得现在由外国人来赚取的利润”。这种理论暗示出国家干涉主义，而经济专制是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的3位最值得注意的经济学作者的主要论调——他们是博丹、德·拉费马斯和克雷蒂安。让·博丹作为政治理论家而最为人所知，他绝对是世袭君主制的拥护者，还是以美洲金银的流入来轻率地对当时的物价飞涨进行解释的人中的最有影响者［见H. 奥塞尔（H. Hauser）主编的《16世纪的饮食生活：让·鲍汀对M. 德·马拉斯特伊克特的回答》La Vie Chere au XVIe siecle: la reponse de Jean Bodin a M. De Malestroict. 1568年（1932年）］。然而，在国家政策形成的历史中，他的作用并非是无足轻重的，他进一步推动了把在中世纪习以为常的思想——节约法令、硬币主义、沙文主义——熔铸为某种条理一贯的理论和实践的过程。他反复强调古老的论题：“盐、酒和小麦是法国无尽的矿藏。”通过对西班牙出口这

些和其他货物，法国可以获得金银。法国的进口，博丹说道，是很少的——主要是油、香料和丝绸——然而，即使这些，也是可以不必进口的，如果法国人足够勤劳和聪明的话。他的结论是，法国应该对进口制成品征税，并对出口原料征税。这正是他 1576 年在国会面前为之辩护的经济计划——以合理的保护计划代替 1540 年单纯的财政关税。法国因此而同样存在着亚当·斯密所说的政策“两架巨型机器”，它们在托马斯·曼关于重商主义的经典之前的 3/4 个世纪里一直在孕育形成着。这种体系在亨利·卡特勒当政时得到扩大和发展，当时所特别感到的实际需要是对由宗教战争时期的疏忽和混乱所引发的问题进行系统的抨击。的确，在巴塞雷米·德·拉费马斯（他是亨利的随从，后升至商业总管和法国商会会长）的著作中，很少有什么创见而颇多幼稚。法国的丰富资源与它的对资源的可怜的管理形成反差。金银——“王国和君主的神经和支柱”——通过懒惰和管理不善的贸易而流失。从意大利而来的运货的骡子带来那并非必需的进口货，驮走的却是钱币；意大利马戏团就是这样靠提供一些无聊而不必要的消遣而带走法国的金银，同时，朗格多克的羊毛却被勤恳能干的米兰人买走并以赢利，如此等等。所需要的是某种通过行会来组织进行的对工业的王室支持和国家管制。【524】德·拉费马斯在很多方面是柯尔贝尔的先行者，特别是他对工业管制的狂热信奉。他并没有停留于理论推演。据说，在他的领导下，商业委员会在 1601 ~ 1604 年间的两年多时间里竟开了 150 次会。丝绸制造、马匹繁育、亚麻和粗纹布的制造、模仿西班牙的镀金皮具、玻璃、瓷砖、挂毯、华丽的南方纺织品、河流和运河工程，造船业和一般的发明，这些只是他们调查研究的一部分内容。在德·拉费马斯和他的同代人《政治经济学论集》的作者安东尼·德·蒙克雷蒂安身上都充满了那个具有两面性的世纪里的经济学家和诗人及科学家所共同具有的空想特征，这种特征是中世纪和近代思想因素相混合后的奇特产物。尽管蒙克雷蒂安的思想有种种粗糙和古怪，他仍然反映了当时事物的一个新奇方面。他比他的先辈们更强调殖民地贸易的价值——特别是美洲殖民地——把它视为原料、木材、香料等物的来源，而过去法国是要用金银从国外购买这些东西的。蒙克雷蒂安在这一点上预示了黎塞留及后来的柯尔贝尔时的大型公司，即新法兰西公司和美洲群岛公司，它们以开发与加拿大和西印度群岛的贸易为目的。蒙克雷蒂安认识到了殖民地商品的重要性，他承认金银的重要性事实上是象征性的，在这些见解上他超越了他的前辈，此外，在 1614 年的国会讨论中，特别是在 1626 年的名人大会上，以及在黎塞留的政策中，都可以找到拉费马斯和蒙克雷蒂安的影响。

这个世纪的演进并不利于贸易和工业的和平增长，而由加尔默罗会修士圣·让（又叫让·艾恩）在投石党运动前夕所写的叫做《体面的商业》的令人称奇的书，说明了商人是如何进入封建社会的。如果没有商人们为了贸易上的诉讼而付给其成员的费用，哪里会有穿袍贵族呢？更进一步，贵族阶层的成员往往是凭借妻子带给他们的财富才获得职位的，而她们又是那些通过从事贸易来赚钱的市民的女儿。法国社会的演变颇不同于英国，这一点在当时并不像在后来那样明显。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柯尔贝尔所追求的不合人性的勤勉，他通过一个接一个的改革，把工业置于为国王和国家服务的位置。

不仅仅是历史学家同意把柯尔贝尔作为国家干涉主义的象征和代表。当时的人们就是这样认为的。对莫里哀来说，柯尔贝尔是“伟大的柯尔贝尔”，他的“学识和辛劳”构成了法国在欧洲优势地位的重要基础。在布瓦洛看来，柯尔贝尔使法国奠定了法国的工业，并因此使法国从受邻国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拉辛（Racine）在《贝蕾妮丝》（Berenice）的序言中说：“整个法国都在赞赏他能洞悉一切，对繁重的事务驾轻就熟，而且处变不惊，不知疲倦。”他所强调的不是智力，而是能力和坚忍不拔。在拉辛看来，柯尔贝尔的思想从未达到过一般理论的水平，这种看法是颇为正确的。柯尔贝尔是典型的政府官员，他所关心的是体制如何运转，而非它所具有的功能。后者并没有成为理性分析的对象，这是从上几代思想家和政治家那里继承下来的社会思想遗产。柯尔贝尔的任务并不是检审现在的成堆的理论和制度，而是汇集各种思想并使制度变得稳定和统一。因此，他毫不犹豫和动摇地继承了传统的关于海外贸易的观点。世界贸易本质上是一种固定不变的事物：金银、船运和贸易的数量是固定的。法国的任务是与欧洲其他各国打一场“货币战争”。商业（他写道），“是各个国家之间一场持久进行而方式和平的战争，它靠的是智慧和能力”，而且到了1670年他便可以庆贺自己在这场经济战中已经征服了除荷兰之外的所有国家，因为，荷兰与波罗的海地区、远东地区和大西洋地区的贸易资源使它得以维持。然而，路易十四在位期间创立或革新的大型贸易公司“像军队一样”在各个地区进攻荷兰人，并很快使其衰弱。有一种观点认为柯尔贝尔就像跟随着一个好战主人的爱好和平的随从，这可是大错特错了。柯尔贝尔所继承的带有偏见的逻辑就是冲突。对许多稍早一些的法国作家来说，法国的主要的经济上的敌人是意大利人，他们在蚕食着法国的生命；在此之上，柯尔贝尔又加上了荷兰人。因为荷兰人才是法国的“死对

[525]

头”。他因此而理所当然地赞同 1672 年对荷兰共和国的进攻并梦想把它的财产并入法国。

在柯尔贝尔的贸易观点背后是他对金银的看法。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对中美洲白银资源的控制使它所具有的力量对柯尔贝尔造成了触动，这种触动使他下决心获得白银并将其流通限制在法国以内。只有贸易才能够获取金银并使其在国内流通而以免流失。此外，人们发现，他的前辈的传统观念在他那里有了更明晰的形式。他与同时代的英国人和荷兰人一样，把与西班牙的【526】贸易视为最具潜力的赚取金银的生意：而把与东方的贸易视为最主要的潜在危险。马塞对黎凡特和东方出口白银，这是他一直忧心忡忡的事情之一。博丹的保护主义原则至此已有一个世纪的历史，现在为了工业利益而被更强有力的付诸实施了，因为柯尔贝尔比其同时代的英国人更为公开地认为制造业不仅是财富的来源，而且是社会满意的源泉。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在这一问题上仍是在追随着早期的思想模式，而且是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去付诸实施。在各级政府机构的探究之下，所有工业生活中的秘密都被揭示，这些金字塔式机构的顶端是柯尔贝尔的决策机构，即商业委员会，下面则是对把规章制度贯彻到生产程序的全部细节中去的执行官员，他们要确保第戎（Dijon）的纺织品做到每匹布有1 408支线，查特伦（Chatillon）的布则是1 216支线。这种把所有工匠都置于行会之下的做法曾被以前的穷困的政府尝试过。现在则再度被尝试。因此，当英国在重商主义时期国内贸易的管制（与对外贸易的管制的不同）被逐渐废除时，在法国重商主义却普遍地首先被视为要对工业的每一微小环节施以管制。表面上看，这种干预的目的是两方面的：保证质量和树立社会纪律——正如柯尔贝尔在 1669 年的训令中赤裸裸地宣称道要“把恐惧注入工人的心中”。在萨瓦雷的帮助之下制定的商业法典对工业的每一方面都予以规定，而迄今它仍作为法国商业法律的基础。某种程度上，柯尔贝尔的措施与稍早的英国理论家和立法者促进工业及技术进步的企图是一致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对外国企业家和技师的引进在英国和法国 16 世纪中期及 17 世纪中期的历史上具有过先例。同样，他在某次对肥皂垄断的特许令人联想起查理一世 1631 年的灾难性试验。在“组织规程”中对纺织品染色工艺的每一细节的关注，又使人想起科肯方案中的这种做法以及其后的企图学习并推广基本上仍由荷兰人在北欧所垄断的某项技术的尝试。在一个仍然基本上是农业性的、仍然蒙昧的、而且仍然对有组织的精确的工作持一种旧有的、中世纪式的无所谓态度的社会里，柯尔贝尔政策中的所有这些方面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这种体制并非在任何理

论的意义上不适合于时代，而且，几乎毫无疑问，它显示了某些成功，特别是在军事和海军装备的供应方面，以及在豪华的纺织品、玻璃、瓷器和类似物品的市场方面。法国挂毯、家具、镶边织物、丝带、镜子、瓷器的制造者是意大利同行业先驱的竞争对手和死对头。甚至在更普通的平纹布和亚麻布的制造方面，法国也是领先的；而且，在柯尔贝尔死后 10 年的时候对法国纺织工业进行的一次调查也显示出它的范围辽阔和蒸蒸日上。这些工业对法国的出口都有所贡献；对减少进口也都有贡献。探究在法国政府干预和工业进步之间关系的所有细节是不可能的。法国人的海关数字与英国海关数字的不可靠性是相似的，但更为糟糕，而且，法国人对“贸易差额”的兴趣没有浓厚或有效到可以产生出那种能够与 1756 年的英国海关数据表相比较的数据的程度。我们只能对各种可能性做大致的对比，而大致的情况是柯尔贝尔体制的缺陷与日俱增。“组织条例”，行会规章和经济控制与刺激的其他手段，同样都具有财政方面的目的，这一点并不一定是至关重要的。柯尔贝尔继承、强化和实施的体制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它并不像西班牙或那不勒斯的财政主义那样胡作非为。尽管如此，随时间推移，对财政收入的需要因战争而变得迫切——类似于 1672 ~ 1678 年法一荷战争的战争很大程度上是重商主义理论的产物——“体制”的目的变得更多是财政上的，而较少经济上的。越来越多的官职为利益而被出售。柯尔贝尔主义成了一位法国学者所说的“一场混乱的暴政”。所有官僚机构，不管在开始时是多么廉洁而睿智，都会趋于僵化，都会随条件变迁而日益远离其职责，而最坏的结果是沦为一种幽灵和腐败。当柯尔贝尔执掌大权之时，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改革税收和为王室敛财。这个目标从未实现，而且直到法国大革命时变得更加遥远。那些本应当作为改革后机构中的一部分的职位本身也成为出售对象。这种体制产生出了像德·罗斯曼夫人一样的社会寄生虫，她通过召集成群结队的替王室服务的老鸨和女投机者而在工业特许权方面发展了有利可图的贸易。她在接受审讯时讲道，如果所有从事她这类生意的人都被惩处的话，至少能装满好几个巴士底监狱。巴黎警察总监证实了她的说法。王宫中的名字几乎无一遗漏地记录在她的名单上。由柯尔贝尔及其继任者所建立的巨大的管制机构产生于一种官僚对贸易和工业的轻视——因为商人们“几乎总是仅了解他们自己那点生意经，而对维持商业运转的巨大力量却一无所知”。在这种评论中有某些确实之处，但是，如果将它用作为王朝统治时期为经济管制进行辩护而提出的理由，那评论者所表现出的这种精明就是一种可怕的肤浅了。18 世纪对各种形式的干预的强烈反对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样一个

【527】

简单事实，即重商主义时代的完美规划变得陈旧过时，格格不入而且腐败[528]了。这种归谬式的论证本身刺激了人们对更为自由的经济的任何可喜征兆进行寻找，即使它的基础是目光短浅者的权宜之计，但也能够被逻辑或证据所证明。

的确，直到18世纪，法国一直都在工业产量，对外和对内贸易量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资源丰富，人口众多且富于才智，以及就劳动力和市场而言拥有有利的地理位置。然而，如果把王室利益（由柯尔贝尔作为其代表）对生产的刺激的可能性排除在外，以及把王室集团通过为那些在贸易中致富的人敞开贵族身份之门而为商业事业提供刺激做法的可能性（这种做法是路易十三时代开始的）排除在外，那么将是错误的。使应该富有的人获得社会成功的奖励，或满足像M. 约尔丹那样的（最好是通过地方酿酒业）成为妈妈姆齐[①]的愿望，这本身并没有什么害处。据说，在18世纪的法国没有什么行业不具有发财致富的可能。危险来自于柯尔贝尔集权体制的衰落所造成的官僚暴政与腐败，这种暴政与腐败对创业精神产生了打击。18世纪的法国充满了发明创新，尽管发明创新转为工业应用的速度远远落后于英国，而且，可以验证的是，许多法国的发明都是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开发和应用的，因为其发明者因法国的官方阻挠和迫害而却步。[②] 在后柯尔贝尔时期，法国资产阶级中最富有和最具影响的部分不是工业家或一般商人。贵族式资产者（bourgeois vivant noblement）包括收税官、财政官和律师，这些人享受着官僚化社会的丰厚的额外收入。人才、企业和资本不断地被从生产业和贸易中转移开，而投入到令人生疑的公共财力支持的事务活动中，而这种事务活动在实际特点上又是很私人化的。因此，尽管英国的重商主义时代被戏称为“国会的柯尔贝尔主义”[③]，但是，在英国和法国的重商主义体系之间仍有根本的区别，尽管所采取的许多措施在方法和原则上似乎都是相似的，但在起源上并不相同，而在目的上至少是其侧重点不同。甚至亚当·斯密也不得不承认，英国重商主义体制的目的是经济上的，即使这种目的并不适当，这一目的就是“生产”，而所培养的势力是生产者。他认为，在重商主义体制的设计者当中，“迄今为止，我们的商人和生

---

① *mamamouchi*，法国作家莫里哀在其作品《贵人迷》一剧中虚构的土耳其爵位。——译者注
② 见S. T. 麦克罗依著：《18世纪的法国发明》。
③ W. 坎宁汉姆著：《英国工业及商业的增长》，第2卷（1903年版）第3部分，第403页。

产商们才是最主要的设计师"[①]。这些看法对法国重商主义都无从谈起。在【529】法国，管制是自上而下的，是"王室的柯尔贝尔主义"。柯尔贝尔或许会向商人咨询，而且在他死后商务院又增加了更多新东西。然而，没有证据表明商人在柯尔贝尔时代或其后操纵了政府的政策。因而，在法国并不存在与英国相似的情况，在英国，大型贸易公司、船主、羊毛商人、制铁商、制帽商、甘蔗种植者，以及其他许多行业都进行游说、演说和贿赂，以便能够各行其是或做与此类似的事。而且在法国也没有类似于英国那样的针对两个世纪（显然是从17世纪初期到法国革命）以来重商主义所执行政策而进行的大规模书面辩论。在法国也没有曼、蔡尔德、布鲁斯特或其他数十几位重商主义作者来研究思想和政策。雅可·萨瓦雷及其子辈的著作构成了对法国商业和经济实践的令人着迷的评论：然而他们并没有像同时代的英国人所经常做的那样对政策进行研究。《理想的商人》一书的书名恰当地表明了它的内容和特色。由一个过去的商人来向其主管者评论政策是不适宜的。和英国相比，甚至法国的贸易组织都可以说是政府的事情。在法国，公司一般是在政府资助下由商人组建的。印度公司是由国王和柯尔贝尔与商人合作创立的。侧重点上的差别是很重要的。政策本身的目的似乎往往对商人造成遏制而给工人带来折磨，而不是有利于他们，受益者是在王室办公室里被人格化了的国家（难道不是路易本人使之如此的吗?）这样的前提一旦被接受，那么，从柯尔贝尔主义降至最纯粹的财政主义的道路就的确是一马平川了。

1664年，在第二年的英荷战争爆发之前的言论之战期间，柯尔贝尔自己在给路易的一份备忘录中讲道，荷兰人试图夺取世界贸易从而增强其战争实力。

> （他写道）他们把政府的主要原则建立在这点之上，他们充分认识到，如果他们掌握了贸易，他们的实力将不断地在陆上和海上强大起来，并会使得他们强大到足以成为欧洲的战争与和平的决定【530】者，并随心所欲地限制正义和限制各国君主的计划。[②]

---

① 应该补充的是，实际上商人们所要求的东西很少能全部得到满足。在作为大臣与说客之间缓冲者的这一官方职业出现之前的很长时间里，国王和大臣的顾问们的主要任务就是首先挑选商人势力。因此最早和最晚的《航海条例》都不代表贸易公司或海务局所要求的；然而分别由奥利弗·圣·约翰和乔治·唐宁设想的可以被认为是与普遍利益相一致。1696年最终建立的"贸易署"并非是商人们向政府施压要求建立的"商业署"，而更大意义上应说是"专家"委员会，它是作为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约翰·洛克所提倡的。

② 转引自G.T. 雷尼尔著：《荷兰人的国家》（1944年），第133页。

同时代的英国人也做出了类似的断言。在并非是出于感情用事的情况下，对荷兰的政策（毫无例外像其对手一样狡猾、自私自利并同样残忍）的这种指责只能被认为是一种误解。当时欧洲的任何政治体的主权意识和“权力”欲望都并不逊色于荷兰。反抗西班牙的起义最初主要是起因于荷兰人对菲力二世别出心裁的集权计划怀有一种保守的憎恨和不信任，因为菲力二世试图把分散的公国、郡县和主教辖区融合为一个以布鲁塞尔为首都的统一国家。一位荷兰作者曾恰当地把暴动的早期称为“中世纪式的叛乱”[①]，而且，在此意义上的中世纪在荷兰共和国出现之后仍然继续存在着，城镇商人的寡头政治对当地的州郡已然影响颇深，他们实行的实际上是专制统治，尽管在新国家中是一种仁慈宽容的专制。他们反对任何可能与商业利益相冲突的主权要求，不管这种要求是来自哈布斯堡家族还是来自奥兰治家族，这个商人共和国都予以坚决反对。对他们而言，近代国家、新君主政权、罗马法、神授君权，统统指向一个方向——只为自己而不为他人的王朝统治的胜利。商人共和国的利益和与君主政体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政策上的反复无常并不协调一致，在君主政体下贸易附属于政治、外交、财政主义、战争。从传统政治制度发展而来的“国家”，以及得到继承和发展的经济结构，都过于微小和脆弱，无法承担起类似于柯尔贝尔所替它描述的计划。为利益吗？是的；为实力吗？不过，实力这东西也仅当为保护私人贸易所必需，并在充满战争的世界里作为生存的基本保障时才作为目的。而且对实力的追求总是勉强的，因为甚至组建护航队也是意味着税收。这个商人共和国的统治者同样不喜欢加尔文派的不宽容和危险的宗教狂热，因为加尔文教派对民主的兴趣似乎不可避免地要威胁到新教改革运动，而且它对奥兰治家族的忠诚使它支持联省省长而无视共和国的真正利益。这个商人共和国的联邦制度摇摇欲坠，而且在水平方向因宗教和阶层差异而被划分，垂直方向则因地区差异而被分割，因此它对和平不构成威胁。常存的疑问是，它是否能为【531】市民的财产提供适当的保护？因为他们技术方面的能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繁荣使他们总是成为那些技能不济、缺少勤勉然而却黩武成性的强邻的目标。

与经济上颇为成熟的意大利城市国家一样，尼德兰的城市商人们也是商业技艺的实践者，而非阐释者。被称为阿姆斯特丹、德尔夫特、鹿特丹和其他城市的地区，是一个繁忙的，由办公室、仓库和秤房组成的地区集团，相对而言，从这里并没有产生出多少经济学文献。加尔文派神职人员如沃依修

---

① 雷尼尔著：《荷兰人的国家》（1944 年），引自第 1 部，第 2 章。

斯（Voetius）与其反对者之间的争论，正如意大利各贸易城市之间的争论一样，转向了令人奇怪的中世纪论题，仍然主要集中高利贷和利息的合法性。至于谈到较宽泛意义上的“政策”，如果说法国缺乏关于政策的辩论是因为商人的政治地位低，那么在荷兰缺乏这样的辩论则恰是因为商人的势力强大。在这样一个政治上很微小的社会里，政治上的考虑总是服从于私人的贸易利益。国家的政策降低成了某种副产品，而非积极的策略。这个商业共和国或许会不情愿地同意征税，动员或以某种方式组织军事或经济上的战争，然而，它只是在情况紧急或别无选择时才这样做。这并非民族特性的问题。从开展军事战斗的水平来看，荷兰人不逊色于任何人，而且在热带地区，荷兰贸易公司之所以得以摆脱其在欧洲的政治家的谨慎限制，而往往是因为以充满残暴的方式行事。乔治·唐宁爵士在天性和习惯两方面都做不来荷兰人的朋友，对其政策亦无法赞同，然而在他对荷兰人的嘲弄中也不无些许道理，即他们在欧洲大讲海上自由，而到了其他地方却处处奉行领海范围。根本上说，这种解释来自于荷兰贸易体制及其国家自身的特性。荷兰人所超越的那些较大的国家，其经济基本上是农业性的，其兴起中的工业也可以说是依赖于本地所产的诸如羊毛、亚麻、铁、木材、谷物等资源，而荷兰人的发展主要是作为中间人、兑换商、船主，或最重要的是作为操纵者，作为其他地区的人所生产的产品的成品加工者或精加工者。

可以说，荷兰商人所抓住的根本机会在于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欧洲各地的人口增长，这为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商提供了赢利的市场。阿姆斯特丹，以及其他城市（在较低的程度上），都首先是作为贸易货栈。因此贸易顺差的原则，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为出口和赢利性生产保留当地原料，保护本地制造业，奖励工业技术等等这类观念，就其性质而言是与荷兰人不相干的，并且无法得到他们的响应。从技术方面来看，他们在所从事的工业【532】上已经领先于其邻国了，而在贸易流通方面，他们基本上不把货物流通的性质归结到数量方面。他们的生意所依赖的是他们在购买和重新出售方面的技巧——特别是对时间和地点的判断。无论怎样，试图搜集有关荷兰的贸易差额的任何有用而可靠的资料的尝试都将是一项无法完成的工作，因为其前提是荷兰不存在某种集权式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对采取何种措施有一致意见，制定“政策”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像雷顿的羊毛纺织业那样重要的地方工业的利益没有被忽略，他们最终也只能充当副手，因为普遍的利益是：货物集散地的往来贸易不应受到妨碍。即使是雷顿的工业也是受商业利益支配的。

关于荷兰政策的根本出发点的经典论述，包含在1662年问世的名叫《荷兰的利益》（Het Interest van Holland）的作品中，该书稍后被译成了法文和英文。该书的作者被普遍认为是荷兰政治家约翰·德·维特，实际上大部分是雷顿商人皮特·德·拉·考特的作品。对大多数欧洲读者来说，以《原理》之名而为人熟知的这部作品保存了荷兰经济以及作为其指导的政治和经济的既定方针的标准记录。在它之后半个多世纪，作者们仍以一种对时间推移不加考虑的态度从中征引荷兰贸易数量和贸易额的统计数字。[1] 德·拉·考特最关注的是荷兰省的福利与繁荣的状况，事实上，他认为这与整个联省的福利是一致的。如果说他的作品有某种主题的话，那肯定是自由——免于迫害的自由；免于王朝统治的自由；更主要的是免于战争的自由。他认为免于战争的自由是健全的经济和繁荣的条件。难道不正是独立战争早期的宽容才使得欧洲其他地区（特别是从尼德兰南部行省）的技术和资本流向了荷兰吗？而且难道这不也正是荷兰成功的基础吗？而加尔文派的不宽容背叛了良知的自由。同时，他认为，税收是必须的，因为贸易需要护航队的保护，然而税收应该是由所有其他人承担，而不应由企业家来承担，正是企业家的工作才构成了所有其他人财富的基础。应该让公职人员、外国人、承租【533】人、艺术家承担税收，而让贸易商和制造商自由地去创造财富。那些靠公司特权作荫庇的人，或其他垄断集团的利益必须被剥夺，并让他们回到自由竞争这一尺度的评判之下。贵金属的流通之所以必须摆脱限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一些国家——挪威、波罗的海地区、中东和远东——“确实出产比我们对它们所购买要多得多的商品，我们只有用金银才能与它们进行贸易”。

德·拉·考特的逻辑在其自身的范围内是无懈可击的。如果承认商业共同体是经济中的动力因素，那么他怀疑中央集权是对国家福利的主要威胁就是正确的。王朝统治就是洪水猛兽——早期是哈布斯堡王朝，现在（不管怎样存在着可能性）是奥兰治王朝。君主制下没有自由，多米恩（Domine）概括了共和派商人阶层在王朝野心的时代感到的来自政府的危险。这直接导致了他的主要的恐惧：战争。“在所有事情中，战争，主要是海上战争对荷兰是有害的，而和平则是有利的”。除非是在极其被迫的情况下，荷兰商人在战争面前是要冒极大风险的：只有在受到“一个人的意志所无法忍受的奴役”的情况下，才使荷兰人感到有理由进行战争，就像反对菲力二世的战争一样。在其他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以外交，或是以经济的武器——器具

---

[1] 例如，可参见马修·德克尔著：《论外贸的衰落》（1739年）。

和进口——而不是以公开的战争来对付侵略的威胁。在荷兰的邻国中，只有英国是真正值得惧怕的，然而，即使是英国在与荷兰进行海战方面，也有某些劣势——它的海岸线长而防守脆弱，而且风向有利于荷兰。荷兰没有理由与英国结盟，但也不必与之打仗。解决之道是“在所有分歧上善言以待，并赢得时间以期其专制国王追求享乐、穷奢极欲并横征暴敛，从而耗尽财富并负债累累，身败名裂，或陷入内外战争”。他的所有这些见解显示出了对荷兰邻国的政治状况的相当明智的把握，正如1667年和1678年的情况所显示的那样。《原理》一书事实上是先见之明与老生常谈的混合体。对君主权利的不信任与勃艮第王国的松散随意的封建主义本身一样古老。显然我们在这里听到的是“中世纪精神”和保守主义的不绝于耳的回响，反对西班牙的暴动很大程度上就是发源于此的。然而，《原理》对自由是国家福利之根本的观点的坚持使之经常被视为具有一种预言性。后来的那些承认从它那里汲取营养的作者们（如德克尔），经常被认为是对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理论产生过相当强烈的影响。[1] 事实上《原理》首先是十分实际的、实用的和【534】时代性的。对其作者（或作者们）而言，其实际意义在于荷兰大致处于查理二世复辟和路易十四继位时期所面临的局势。自由放任主义尚处于萌芽之中，而可以称之为经济理论的，实际上就是那种如果荷兰想要避免被其强大的邻国毁灭，那看来就非要遵守的道道罢了。然而，因为荷兰的经济是成熟的（尽管也是脆弱的），所以《原理》的很多经验主义观点所具有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当时的状况。后来的经济在其技术和财富获得发展并放弃了征服的方式以后，会充满兴趣地在《原理》中发现它所包含的普遍性的智慧。[2] 到了这一时期，正像历史中比比皆是的嘲弄对象一样，荷兰共和国也成了沉重税收的牺牲品。它避免了内部的王朝统治的危险，却没能避免波旁王朝加在它头上的灾难。它在1730年以后的海外贸易走向停滞，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所遇到了来自法国和英国的重商主义竞争。然而其工业的整体崩溃似乎来自于内部的税收负担，特别是消费税，这种税收导致了工资和成本的上涨，消耗了其工业阶层的竞争力和主动性。而税收又是由荷兰这样一个资源贫乏、国土小、人口少的小国所承担的巨大的国防开支所造成的。

这些都是后来的事了。因为至少在德·拉·考特的著作出现之后一个世纪，欧洲国家才开始进行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经济动机的战争。1652年第一

---

① 见《英国名人词典》，德克尔，马修爵士。
② 更详细的记录可参见C. 威尔森：《利益与实力》（1957年），特别是第2章。

次英荷战争的起因是一系列问题，但经济上的竞争即使不是主要的原因，也是重要的事端之一。1665 年第二次英荷战争是典型的商业战争。其根源是英国的城市、王室和海军都有打一场成功而有利的战争野心，并且也都参与策划。在这些方面的势力看来，这场战争在 1654 年被克伦威尔不明智地中断了。与此同时，柯尔贝尔在 1664 年和 1667 年所征的关税被证明是 1672 年战争的前奏，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这场战争中，对荷兰共和国财富的妒忌起了主要的作用。在这些战争的所有口头外交和宣传上的序曲中，显而易见的是，英国和法国认为荷兰人的职能与经济权力的概念不相一致，这种经济统治权的概念尽管界定模糊，却有充分的根据被认为是与“重商【535】主义”相一致。把荷兰人从贸易中间人的位置上赶走，取代他们作为进出口运输者的位置；不再让他们获得原材料，因为这可以由本地的工人加工并成为更有价值的出口的基础；阻止他们供应奢侈品和无聊玩意儿而带走贵金属和更有价值的商品——所有这些动机在英国和法国的评论中都是到处可见的。在这些动机的背后都存在着差额的概念，但并不总是得到公开表达。并非偶然的是，作为这种观点的经典陈述，曼的《英国通过外贸所获财富》在写出之后将近半个世纪，才于 1664 年首次出版，这是作为对荷兰人的心理战的一部分。人们并非总是注意到，曼的著作有一半内容是对贸易差额理论的严肃的并显然是一般性的阐释，而后一半内容则是对荷兰人及其所有作品的攻诘。“联省”，他写道，“就像一只用很多借来的羽毛作装饰的美丽的鸟。如果每只鸟都收回自己的羽毛，那么，这只鸟就变得几乎完全赤裸了”。按照一般的说法，这种观点就像蒙克（Monck）在 1663 年所说的：“这种或那种理由有什么用处？我们想要的是现在由荷兰人所占有的大部分贸易”。或者像佩皮斯（Pepys）在 1664 年 2 月在咖啡馆所听到的，由海军承包商表达出来的打一场“与荷兰人的战争并战而胜之”所具有的好处，世界上的贸易对我们两个国家来说显得太少了，因此其中一个必须退下来。[1] 这就是战争所产生的思想源泉，它们是由更为专业和更为复杂的重商主义理论所派生而来的。有关国际冲突的观点是贸易差额理论所内在包含的，经济上的战争不知不觉就会导向真正的军事战争。因为当和平的进展对那些急不可待的人（这是始终如此的）来说过于缓慢的时候，采取一种军事的和快捷的办法就强烈起来。尤其是当对方像荷兰那样在战略上很脆弱的时候，显然更是如此。

---

① 威尔森：《利益和权力》第 7 ~ 9 章。

当然，上面所描述的进程是有间断的。伦敦市的企图就可能是被克伦威尔阻止了。第一次英荷战争由于政治和宗教原因而结束。摄政时期和平得以维持，尽管并不可靠，因为克伦威尔心中所装的计划比发泄假定存在的在经济上对荷兰人的不满更为重大。最终，英一荷竞争因为法国在欧洲称霸的威胁而消减了，法国的意图是政治和宗教上的，而非经济上的。然而，对英国来说，18 世纪在经济上与法国的竞争一直是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因。到 18 世纪 40 年代，法国执著于贸易的复苏和进步。1745 年的一个手册作者主张：[536] ……通过一场强有力而精心筹划的战争，我们的商业在总体上将比与这两个国家（法国和西班牙）和平交往更为兴旺。第二次英荷战争期间欧洲的冲突扩大到了西非和西印度，其目的是争夺奴隶和热带产品。贩奴合同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的可怜的战利品。表面上看，1739 年的宣战理由是西班牙对英国走私者进行干预。在 1744 年的战争中，英国有了破坏法国产糖殖民地的机会。殖民地贸易的成果——北美洲的鱼、皮毛和木材以及西印度的市场和产品——在七年战争期间是皮特及其城市支持者的首要目标，而且皮特的"体制"与上个世纪的任何体制一样，清晰地体现着重商主义的双重特征，在维内尔（Viner）教授看来，这种双重特征是所有重商主义者的共性。[①]"我们的贸易依赖于我们对海上力量的正确运用。贸易和海上力量是互相依赖的……富人作为国家的真正财源有赖于商业。"[②] 然而早在战争结束之前，就有迹象表明商人对战争作为政策工具的优点已不再满怀信心，而且皮特自己，以及其他政治家——沃波尔、佩勒姆、纽卡斯尔、贝德福德——对战争感到不安并且不愿将事情诉诸战争。1763 年的和平把曾为之争战的很多地盘归还给了法国，这短暂地反映出了对国家政策应走向何处的困惑。英国尚没有准备采取一种完全成熟的、和平的自由放任主义。但是，1763 年的做法显示出好战的重商主义的时代正走向尽头。英国开始在战争中失去过多而所得甚少。从这一点出发，英国的状况开始更加类似于 17 世纪的荷兰。英国的资源和粮食都不能完全自给自足，它的资本充满风险地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船只和货物之中，因此它开始表现出一个其野心受到责任感的制衡的国家所具有的特征。

有一种曾经颇为流行的看法是，在比利牛斯和约（1659 年）之后的世纪里，经济学是停滞不前的。最近的研究表明这种看法说得有些过于夸张

① 见雅各·维内尔：《权力与富足》，载《世界政治》，第 1 卷，第 1 期（1948 年）。
② 引自尊敬的赫伯特·瑞奇门德：《政治家与海上力量》（福特讲座，1943 年），第 133 页。

了。尽管没有任何重要的概念得以确立，但在这个时期里，在西欧地区，对某些过去被接受的观点的信奉开始减弱了。在英国和法国，海外（特别是殖民地）贸易的扩张——其本身无法像在其他时期那样，能用简单的公式【537】来解释——连同信贷机构、银行业和公共金融业的增长，使得一些作者对此前往往被认为是自明的和简单的真理的理论和有效性提出修正，有些人甚至对其提出了挑战。如果贸易差额理论或对贵金属的崇拜要在经济结构和制度（比如贸易渠道，商品和市场类型的增加）的变迁之中得以继续存在，那么也只能通过对现实世界中不断增加的复杂性来对它进行更为精致复杂的理论解释。在那些于 17 世纪、18 世纪之交进行写作的英国经济学作者之中，有些人获得了后来的古典学派经济学家所给予的赞美，认为他们对经济自由的好处做出了第一次明白而富于启发性的阐释。达德利·诺斯是英格兰的斯图亚特王朝晚期的著名活动家和商业家，他于 1691 年出版了《论贸易》。当 1856 年政治经济学俱乐部重印此书时，主编麦考洛几乎无法找到恰当词语对这部“毫不妥协地倡导商业自由”的著作进行赞美。它是“没有脚踵的阿喀琉斯，它毫无弱点，毫无局限，毫无限制”。尤其使这位维多利亚早期的评论者感动的是，诺斯明智地把国家利益与私人利益相提并论，并对各项规定中所体现的对金银的迷信不屑一顾，认为那无异于想用篱笆圈住飞鸟。诺斯写道，没有人“能够靠政策获得财富，能够带来贸易和财富的只能是和平、工业和自由，而绝非其他”。更多的溢美之词留给了名为《对东印度贸易的思考》（1711 年）的小册子，它所抨击的是要求以禁止进口东方纺织品的形式来保护纺织业，它对使用机械以及分配劳动力原理进行颂扬，它的阐述“熟练而巧妙，即使亚当·斯密也难以与之匹敌，而只能效仿之”。麦考雷先生同样颇为赞赏地说：“谈论东印度贸易的小册子很出色，是一流的。我尚未发现与之同时代的作品有能与之相比的……”最近时期的经济思想史专业的学生把比对这两部作品更高的推崇留给了伯纳德·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1714～1728 年），它把诺斯所勾画出来的，稍后在蒲柏的两行诗句：

> 理性和热情响应着一个伟大的目标；
> 爱自己与爱社会协调一致。

之中得到尊崇的观念，合乎逻辑地（即使有些火药味儿）推向其结论。曼德维尔的长篇论文（它的另一标题《私人之恶，公共之福》使人更易于理【538】解其内容）被人们恰当地称之为最重要的自由放任主义的文献资料。

几乎没有疑问的是，新的经济制度——银行，借据、汇票和其他信贷与

支付手段——给当时的经济体制带来了更大的灵活性，从长期来看，这降低了以前人们普遍存在的对贵金属储备的焦虑，并因此而使贸易差额所受到的关注得以减轻到使人们注意到两者关系的程度。变化并非一蹴而就。弗朗西斯·布鲁斯特在1702年所写的《贸易新论》仍然诉诸于古老的焦虑，第五篇论文的题目是“所有人的就业是使金银流入国内的最可靠的方法和手段”。而且，我们已经看到，在此之后近半个世纪时，德克尔仍然以差不多同样的方式重复着曼所开创的模式。不过，从总体上说，对经济政策的态度发生了某种不可否认的变化。凯恩斯曾经宣称，重商主义首先是一种就业政策。如果把这种观点应用于重商主义早期，则是令人怀疑的，当时对金银的思考暗示着对其在当时条件下的用途的一种直接的而且或许是理性的思考。而从复辟时期以后，却可以发现一种日益增长的对贫穷劳动力就业问题的关注。

就其本身而言，这种对就业的关注并不显得新鲜。伊丽莎白时期的作者们曾经从整体上思考不同类型劳动力的价值，而且他们的观点得到了伊丽莎白时期立法的回应（或许是比较微弱的回应），例如1556年的《关于呢绒业工人的法案》（其目的在于促进出口），还有1562年的《避免进口若干海外工匠生产的外国商品的法案》，后者的题目就说明了一切。然而在总体上，伊丽莎白时期的劳动力立法的目的是中世纪的。其目的不在于促进经济增长或社会变化，而是阻遏这种变化。塞西尔1559年的所谓的工业计划是谨慎而保守的，它为大多数这一时期的社会立法定下了基调。普通的道德考虑仍然被作为一种出发点，即“使青年习惯并从事劳动和工作，以免他们成为游手好闲的无赖……”然而，道德考虑往往具有社会目的：维护秩序。伊丽莎白时代的人并非把“秩序”仅视为消极意义上的无麻烦。对立法者来说，正如对斯宾塞、莎士比亚、埃利奥特、胡克、罗利和许多其他人一样，社会秩序反映着宇宙自身的秩序，在那里：

> 苍穹、星体和地球这个中心，
> 服从着等级、地位和位置。
> 恪守着划分四季的运行轨迹、
> 职能和习惯，全部秩序井然。

【539】

而对自然秩序进行干预或破坏，其结果是令人不敢想像的。

> 把等级取消，把和谐破坏，
> 然后听！一切变得多么嘈杂。

诗人和哲学家的主题也是立法者的主题。他们的目的在于阻止社会演变，防

止一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的侵蚀，警惕技术创新所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一句话，在于稳定和保护现在的社会秩序。这些想法颇具生命力，然而逐渐地，几乎是不知不觉地，在17世纪的进程中，它们适应并容忍了这样的观点，即一个人应当使自己活得更好些。更进一步，通过改善自己的生活，他可能改善他人的生活。对威廉·配第来说，应该使人们有工作并保持其技能，而不是让数以千计的人因失业而丧失劳动技能。[①] 赢利不大的出口似乎也是更可取的。其他许多作者拾起了优西亚·蔡尔德的论调："供济和雇用穷人是人们对上帝和自然的职责"。因此，经过修正的重商主义对经济的看法有了更多的"社会性"。我们正在进入慈善学校运动，手工工场、纺织学校、孤儿院和医院的时代。尽管以当时的标准衡量，这些地方也往往是条件极差的，以后来的标准衡量则更可怕，但这些机构代表了人们减轻良心上的负疚的企图，并把这一减轻过程与对社会的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这些计划中的很大一部分，其起源——还有其合理性——都在于它们对国家的贸易差额有促进作用。在很多人看来，大量失业或未充分就业的贫困人口似乎是国家最大的资源浪费，同时也是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的持续威胁。"我无法再进一步强调了"，布鲁斯特写道，"对穷人的忽视是我们的政府的最大错误"。因此，像蔡尔德这样的经济学作者采用了一种新的"衡量"国家福利的进步方法。关于贸易差额的数据实在是不可信赖，真正有意义的是通过贸易和运输总量以及通过劳动人口的数量来衡量的国民生产。与某些同时代的人不同的是，蔡尔德并不相信低工资对维持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是至关重要的。高工资是"国家富强的确定无疑的证据"，而低工资是"该国贫穷的证明"。蔡尔德观点的高度模糊性说明了对问题的复杂性有了一种真正【540】的认识；困难已经被察觉到了，然而到此时，研究者仍然无法通过正确的分析来探究这些难题。他含蓄地暗示，贸易逆差有可能掩盖着某种国家利益。在诺斯、蒙德维尔、蔡尔德和洛克的著作中，尽管其风格和目的各不相同，我们却都可以看到一种新的社会福利概念，其中的一方面在迪恩·塔克的《商业要素》中被概括如下：在一个有更多的人得到雇用的世界里，存在着一种平衡，我认为这种平衡值得人们予以重视，这就是工业平衡，因为没有工业，货币就是有害的，而非一种福祉。把这一点与休谟对贸易差额理论的批判放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看到亚当·斯密对重商主义思想的整体结构的归谬法证明。然而不管经济学家对经济的自我调节性质多么的信心十足，要说

---

① 威廉·配第：《手稿》第1部分，第60页。

服管理者甚至是商人相信管制是多余的，是需要颇费时日的。甚至当19世纪20年代在曼彻斯特自由贸易理论的重要试验已经相当明显时，在其他地方对取消禁止纺织机械出口禁令的泛泛而论的空谈才刚开始。而且到19世纪60年代，在重商主义的最后遗迹消退之时，要求政府资助以对抗德国和美国的竞争（这本身也是一种新的重商主义产物）的呼吁仍未远去。

在法国，与在英国十分相似，对重商主义制度及其正统性的攻击有两个来源：一个是那些因管制体制或因被排除在他人所获得的特许权之外而受到损害的商人；另一个是哲学家的不满，他们从关注经济行为的伦理学最终转向了关心经济行为的动机，并感到难以使自己的结论与国家干预所依赖的前提相调和。1700年之后，被邀请作为代表参加商务院的、来自主要地方性城市的商人们，几乎没有人对柯尔贝尔的基本教条提出质疑；但是，越来越多的人鼓起勇气对他们无从参与的垄断或使其地区利益受到损害的关税进行攻击，然而，即使这可以被称为一种尸位素餐的经济学，它却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结果。例如，鲁昂和南特的代表就对几内亚公司的垄断提出了批判，因为它没能向法属西印度提供足够的奴隶，而这被认为是法国港口所进口的西印度产品价格昂贵的原因。[①] 应该注意的是，这与1697年在英国发生的对皇家非洲公司的垄断的抨击十分相似，后者是由消费者（牙买加种植者和英国贸易商）与供应者（伦敦和西部地区的布匹商）联合提出的，他们都认为为了自己的利益，应该有一种范围更扩大和方式更公开的贸易。[②] 同样地，在商业批评方面，来自里昂的代表在1701年的演讲中，对国际贸易的和平性质几乎表现出一种科布登式（Cobdenite）的信仰。这导致了一种对在关税方面应当采取互惠政策的建议，这一观点与优西亚·蔡尔德在其《贸易新论》中的一种表述非常相似：“如果我们想让其国家与我们进行贸易，我们就必须接受他们的产品和商品，就像我们卖给他们的一样”。【541】

此后不久，从一个令人奇怪的来源产生了这样一种迹象，即某些法国人发出的声音与同时代的英国作品一样，认为政策应该更持续地指向社会目的。沃邦（Vauban）倾其一生及其全部才智效力于国王，退休之后开始研究法国的经济状况。他的《法国什一税》于1707年问世，其时他已经临终。该书主要是呼吁税制改革，它涉及为贫穷劳动力提供更好条件的需要。如果他们收入更好一点儿，衣食更足一些，并缴税少一些，他们将会“更

---

① C. W. 科尔：《法国的重商主义》（1683～1700年），第255～258页。
② 戴维斯：《皇家非洲公司》（1957年），第133页。

加尽心尽力地工作"；而他们的劳动正是法国的财富与力量的源泉。"（沃邦总结道）没有什么比反复提醒君主注意这一真理更能有益于他们"。路易对沃邦的忠告并不欣赏，这位元帅是在国王的愠恼下郁郁而终的。其他人却颇为欣赏沃邦的观点，而且稍后在那些 18 世纪奉行重商主义的国家（如西班牙）中的作者们广泛地引用他的观点。显然有一种类似于对早期重商主义的沙文主义和黩武主义进行反攻的观点流行开来，尽管我们不应该过于严肃地看待它。甚至那些商人中产阶级代言人，像英国的蒙德维尔和笛福，法国南特，鲁昂和里昂等地的代表们，一方面在时机有利的时候似乎期待着维多利亚时期自由派的声音；另一方面又随时准备在不太有利的时候迅速重弹经济国家主义的老调，并不由自主地抛弃其发展国内工业的计划。

南特代表的呼声是："自由是商业的灵魂"，这听起来——尽管有些虚假——像是哲学家的口气。布阿吉尔贝尔（他是律师和地主）攻击说，柯尔贝尔的整个体制就是法国的不幸的代名词，更公允地说，这种权威的、根【542】本的批评才有资格被认为是哲人之见。布阿吉尔贝尔的观点包含着英国人所表达的大部分新看法，特别是在金银问题上。"黄金和白银并不是而且从来不是财富本身，而且只有在与生活必需品有关并在能获得它们时才具有价值。就此而言，金银只是一种尺度和估价。"货币，本应作为贸易的仆人，却成了贸易的主人，而且不是在流通中去追求其真正目的，不是去花费，而是被贮藏起来，因为对贸易的阻碍使物价低迷。这里再次出现了对未来观念的预示。据认为，不管是处于孕育之中，还是更进一步，布阿吉尔贝尔已经阐述了在一个世纪之后为经济学家所发出的反对硬币主义地位的每一个论点。[1] 布阿吉尔贝尔像他的英国同时代者一样，提出了自利与社会福利一致性的理论。"……如果对自然之理不予干涉，一切都会运转良好……"对柯尔贝尔主义两方面的攻击逐渐地合为一处。当柯尔贝尔询问里昂的商人如何才能促进他们的贸易并服务其商业时，他们回答说——传说如此——"给我们自由"。玛奎斯·德阿尔詹森（他是第一个经济学俱乐部"阁楼"的成员）把这一术语从市场意义转为一种经济学原则。当德阿尔詹森把"我们"这个词删掉时，古尔纳（Gournay）（与他同时代，是卡尔皮佩尔和蔡尔德的法文译者，在贸易和政治经济学的几乎各个方面都著述甚丰）却增加了"请让通过（'laissez-passer'）"这个经典词汇。于是商人们的不满与那些坚信"天赋权利"的人的怀疑主义结合在一起，那些人的信念促使他们对任

① C. W. 科尔：《法国的重商主义》（1683～1700 年），第 244 页。

何宣称“具有完备而普遍的、指导一切商业的能力”的人提出挑战。这种能力是不可能的。Non datur scientia。

因此，我们远不能说西欧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不同程度上是由贸易商自己制定出来的。在意大利和低地国家，贸易量的增加是自发的，在英国，自发性较少，在法国则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明确指示（甚至是命令）而达到的。与贸易量的增加以及由之所激发的社会福利和政治野心一道，产生了称为重商主义的理论——实际上就是对贸易能比农业更迅速地使国家富裕这一点的确信。然而，甚至在法国这个经济部门受到上层控制的国家里，在“柯尔贝尔主义”出现之前很长时间，就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贸易，而且商人群体也已经人数众多，但是，他们仍没有团结一致到足以影响政策以及对国王和贵族的野心进行影响的程度，这些国王和贵族贸易的兴趣主要是政【543】治、战略和财政意义上的。毫无疑问，西欧沿海经济的这种自发性因素来自于海洋本身。18 世纪和 19 世纪，在交通方面的革命发生之前，只有通过水路才可能运输相当数量的大宗商品。运河工程可以使只有邻近海洋的地区才可获的利益得以扩大其范围——因此，柯尔贝尔才与黎奎特（Riquet）合作建设连接加伦特（Garonnt）和地中海的两海运河——然而，即使可通航的河流所带来的利润也是有限的，因为当时缺乏可以使船舶战胜激流的动力。马匹所能驮运的货物数量有限，这使其用途主要限制在运输奢侈品上。那种认为航海仅被限制在靠近海岸的地区的看法是不真实的，然而大部分情况确是这样。尽管如此，使西欧经济繁荣的重要贸易是波罗的海、欧洲西海岸和地中海之间的大宗商品的贸易，即粮食、木材、盐、酒的贸易，而且在这些贸易之外，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又出现了新的即对东方的贸易和跨大西洋的贸易，而这些新贸易是有组织地从较早时期的贸易——比如由黎凡特人所从事的东印度贸易——之中发源产生，它们还把新的大宗商品如糖、烟草和棉花带到欧洲市场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得益于这些贸易的地区并没有成功地实现或试图实现我们称之为民族国家的那种政治形式。那些做到了这一点的国家——英国和法国——则发展、采取并完善了我们认为是重商主义的政策形式，到 18 世纪下半叶，这类国家即使没有在制度上，也在理论上准备把重商主义作为因贸易和工业的发展而过时了的工具而予以抛弃。然而在其他地方，情况却完全不同。在比利牛斯山以南，易北河（the Elbe）以东，以及在中世纪即属落后地区的南意大利，经济和社会条件远远地落后于西欧。18 世纪启蒙运动有一个并非无足轻重的阶段，即上述地区的思想家和统治者把西欧在上一个世纪已被证明是适当和似乎有效的思想和制度加以

借鉴：在经济方面就是由仁慈的专制君主在理论和（无规律地）实践上采用重商主义。这可作为一种距离遥远的观念与制度进行移植的例证，在 20 世纪俄国和东方进行西方化之前，这种移植可谓是无与伦比的。而在脆弱性和人为性方面移植者与被移植者也是相同的。

在欧洲最贫困而混乱的地方要数西班牙了。“将西班牙同法国相提并论是大错特错的。”1759 年驻马德里的法国大使这样写道：【544】

> 第一君主国人烟稀少；既无工业，也无诚信，几乎没有警察，少有公正；人们懒惰不勤勉；国内没有铁路，没有舟楫，没有运河，少有车辆。总之，可以说这个国家至少比其他国家落后两个世纪。①

这一次不必担心这种说法有诙谐的夸张。多年以后改革家和金融家贝鲁斯（Cabarrus）惊呼道：“我们中间有多少穷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国家几乎都是穷人；与计算等于几乎全部人口的一无所有者相比，找出那些极罕见的拥有一切的富人是更容易的事。”在此状况面前，西班牙人并非完全无所作为，但困难太多而办法太少。1724 年首次出版了格罗尼莫·德·乌斯塔雷兹的《海上贸易的理论与实践》（*Teorica Y Practica de Comercio Y de Marina*），该书是对西班牙经济症结的一种纯粹的重商主义分析和诊断。西班牙政府以其所特有的，只有在面临变革的威胁时才具有的速度和热情查禁并销毁了该书的全部册数，然而到 1742 年该书再次出现。9 年之后，它被译成了英语，题目是《贸易和海洋事务的理论和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a of commce and Maritime Affairs*）。书中讨论的是贸易差额问题。西班牙所遭受的是从外国人那里购买的“货物和产品比我们卖给他们的更多，因此每年我们的贸易逆差都达数百万金币”。由此就自然产生了正统的重商主义观点。西班牙的绝大部分出口都是由应该自己利用的原材料构成的——羊毛、生丝、洋红、靛青、香精和铁矿石是“毁灭我们的新武器”。另一方面，财政体系积极鼓励着某些制成品的进口，正是这些进口使得我们本国的工业无法建立。这一切是多么愚蠢啊！我们所进口的外国货超过我们的出口越多，“那么我们最终的痛苦和毁灭也就越大……”，这难道不是“一个无可辩驳的道理”吗？其他国家——特别是法国和英国——已经建立了一套规定来鼓励本国的制造业并通过政策来限制进口。乌斯塔雷斯说，这就是

---

① 引自 J. 萨瑞赫（J. Sarrailh）：《18 世纪下半叶西班牙的启蒙运动》（巴黎，1954 年），第 7 页。

1664 年和 1667 年柯尔贝尔制定的关税之目的所在；这就是英国禁止羊毛出口的目的所在；这就是为什么荷兰在所有进口限制中惟独解除了进口西班牙羊毛的限制。这难道不是因为呢绒制成品的价值是所有原料价值的 5 倍吗？而所附加的价值是由技术所产生的吗？西班牙没能遵循这些基本智慧的法则，因此而以每年2 000 万金币的平均数量失去自己的金银而流向那些向其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国家。 [545]

在西班牙自 1492 年得自美洲的数十亿金币银币中，只有 1 亿保留下来。道理很简单：西班牙需要更多的制成品。关于在塞维利亚复兴丝绸和羊毛业的结果，乌斯塔雷斯进行了思考。6 万名纺织工人将得到雇用，而他们则需要“店主、裁缝、制鞋匠、制假发者、制帽者、屠夫、面包匠、木匠、砖瓦匠、铁匠、医生、银行家等等诸如此类的人”的服务。塞维利亚将不仅可以自给自足，而且还将因其“资源”和“一条得天独厚的、很长一段都可通航的大河”而能够卖给外国人比外国从他们那里所购买的要多得多的货物，并享受“富裕和繁荣，摆脱目前所遭受的货币短缺和其他苦难”。类似的幸福在其他城市亦可随之而来——塞哥维亚、托莱多（Toledo）、科尔多瓦（Cordova）、格林纳达（Granada）、莫西亚（Mercia）、瓦伦西亚（Valencia）、萨拉戈萨（Zaragoza）、瓦拉多利德（Valladolid）、美的那多坎普（Medina del Campo）等等。然而，这些城中有哪个能如此这般？前提是首先要取消对制成品出口所征的 15% 的税以及“*alcavala*”，即 15% ~20% 的销售税。所有这些都是 17 世纪早期所产生的纯然重商主义。然而，带着某种出自“社会”关心的提示，正是这种关心正在成为其他地方重商主义作品的特征，乌斯塔雷斯引用沃班的《法国的税收》来说明这个道理，即正是“普通人”的“劳动、贸易和贡物”才使国王和王国变得富裕。正是他们提供了劳动者，庄稼人和保卫国家的士兵与水手。然而他的结论却是十足的重商主义信念：贸易需要海军力量的支持，而海军需要以贸易作基础。必须“为战争和运输这两者”而建造好的船只，因为这两者（贸易和海军）是不可分割的，是互相依存的，而且我们应该以同样的热情和警惕去建设和维护它们。

所有这些观点都是雄辩的、推想式的、理想主义的、中世纪式的和模仿性的。乌斯塔雷斯还举出了例子：

> 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和英国的做法应当被作为明智和有价值的模仿对象，因为正是由于这些做法他们才得以扩张并维持其现在所享有的贸易财富、富足和荣耀，并使其因遍布世界的领土和军队而

受到人们尊敬。与此相反，由于我们的疏忽和管理不善，西班牙始终受到压迫，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因其软弱而受到轻蔑。

乌斯塔雷斯从未加以探究的恰恰是新工业如何建立，或由谁来建立它们。【546】博纳德·德·乌勒尔（Bernardo de Ulloa）也未能做到这一点。他在1740年出版的书中以更为详细的方式提出了自己对复苏经济的建议——（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是对乌斯塔雷斯的“一种补充”。由于不具备任何可以付诸实施的途径，乌斯塔雷斯和乌勒尔的著作成为西班牙死气沉沉的冷漠与迟钝气氛的牺牲品，在沉寂中度过了20年。葡萄牙的情形则非常不同，在那里，漫长的大西洋海岸线与里斯本和奥波托（Oporto）的良港早已孕育出了贸易和海洋事务的知识。到18世纪50年代，庞巴尔（Pombal）改变葡萄牙性质的改革已颇有进展，其中部分措施反映了乌斯塔雷斯和乌勒尔所提出的建议。而西班牙改革者却更多地受到日渐兴起的理性主义和重农论思想家的影响，而较少地受到曾吸引其先辈的英国和荷兰模式的影响。在那些聚集在查理三世周围满怀希望的改革者的著作中——法国人卡贝鲁斯，爱尔兰人博纳德·沃德，还有最重要的改革者若维兰诺斯（Tovellanos）——弥漫着很强的法国哲学的影响。他们谈的更多的是理性，而非贸易差额，并且认为在走任何更庞大的通向社会繁荣的捷径之前，都必须先发展教育。特别是对沃德而言，重农派的理念使其思想指向了被遗忘而未经开垦的土地，它是西班牙最大的，真正的财富。这类计划只有一种方式才能具体化——通过国王个人。因此改革者们对查理三世进行了大量忠实而夸张的颂扬。只有他能够通过制度来散播经济学家在其著作中所显现出来的光明。

在查理三世的开明专制之下的变革尝试是均等地来自于较老的重商主义和较新的重农主义的思想复合体。对改革者来说，两者都在西班牙富有施展余地。坎波曼尼斯（Campomanes）作为很可能是最清楚地认识到西班牙衰落原因的政治家，把重点放在了工业、贸易和技术培训的改革上，并发表了“培养民间工业”和“工匠培训”这类内容的演讲。若维兰诺斯更多地是受到来自法国的新思想的影响。他总是以自由的抱负开始，然而却倾向于以某种保守主义的评论结束。他的《关于自由的报告》（1785年）是以对 gremios（行业行会）的抨击开始的，然而结束时却主张使所有匠师、工匠和学徒都成为一个普遍行会的成员。《关于农业改革的报告》是在10年之后，对荒废土地、公地、封地、教会永久产业以及 Mesta 的特权都予以猛烈抨击，并提倡圈地、灌溉和水路交通。然而，即使这一次，他仍是在最后时刻改弦更

张，对谷物的自由贸易予以反对。与此同时，作为卢梭信徒的卡贝鲁斯，把矛头指向了贫困问题，对现存的收容所、孤儿院和医院的管理进行谴责，指责其腐败，不人道而且不恰当，而沃德在其《*obra pia*》中吁请对国外的管理方式进行调查研究。于是，不管是否持续，也不管是重商派还是重农派，在改革者们的促动下，国王比其前任们做了更多的事。经过一个短暂时期——事实上直到独立战争——他们设法制造了一种经济复兴的幻象。开始于 1746 年的“农村之友协会”成倍地增加，至 18 世纪末已达 72 个。讲授科技知识的中心得以建立；在农业方法和纺织品制造方面进行了实验。政府在马德里建立模范工厂来生产玻璃器皿、家具和挂毯，在其他地区的模范工厂则生产织物、帽子、棉布、瓷器、铜器和其他物品。大臣和外交官们把经济谈判作为其重要职责，并与土耳其和新诞生的美国签订了协议。1776 年的一项法令试图解决贸易和工业的社会地位问题，它宣布，一个人不会因为从事某项“诚实而体面”的贸易或手艺而失去市民甚至贵族的特权。妇女获得了在工厂工作的权利。对纺织品制定了新的标准。其他工业被免予征税。外国商人和技师被鼓励带着资本和技术来加入到新工业中。【547】

这些原因是否导致了人口再次开始增长？繁荣是不是似乎来到了加泰罗尼亚（Cata lonia）、巴斯克地区（The Basque Provinces）、阿斯特里亚（Asturias）、瓦伦西亚、塞哥维亚等城镇？这是十分值得怀疑的。从整体上看，西班牙仍然贫穷而迟钝。几乎或根本没有迹象表明农村地区的极度贫困得到减轻。奴隶制度——奴隶主要是摩尔人和黑人——仍然是合法的。在瓜达尔卡那尔（Guadalcanal）或阿拉贡（Arogon）采矿所需技术是由外国人提供的——英国人或德国人。西班牙殖民地所需商品的绝大部分来自于外国。来自于西班牙本国的仅是零头——大概是总数的 8%。事实上，西班牙的经济没有得到转变或改革。如果卡贝鲁斯的说法是可信的，那么，它就确实仍然是如此“恶劣”以至于难以恢复。正如 M. 萨雷赫所说的，西班牙经历了一系列源于一种自由和正义精神的勇敢尝试，并企图发展个人福利和实现国家繁荣。然而，这些仅仅是面对令人绝望的困难的尝试而已，而后来的几代改革者仍需重新进行“对顽固势力和总是死灰复燃的陋习（contre des forces inexpugnables et des abus toujours renaissants）”的战斗。

在 1713 年之前，对作为西班牙殖民地的南意大利地区而言，西班牙的真实情况也同样适用。在那里，沿海的一小片狭长地带是富饶的，有橘树林、葡萄园和橄榄树，比如那不勒斯（Naples）周围或卡拉布里亚（Calabria）

[548] 的特里纳海（Tyrrhenian Sea）沿岸，这些地区与在它们背后的山地地区的普遍的贫穷和贫瘠相对照地形成反差。一群愤怒而不安的民众或许会像1647 年马萨尼埃洛统治时那样揭竿而起。然而，这种暴力性的爆发是剧烈的，也是短暂的。对待贫困和压迫的一般态度是宿命式的顺从，这部分是由于气候原因，而且无疑又因几个世纪以来经由入侵和劫掠所形成的阿拉伯混血而得到强化。表面上看来，这种情形不利于智力上的探索活动。然而在这里——在较小程度上类似于苏格兰——贫困似乎起到了促进智力探究的作用，而且，如果不是因为其智力活动方面的杰出贡献，那不勒斯是不会名声显赫的，18 世纪下半叶，在那里产生了一系列出类拔萃的经济思想家。这种现象并非新事，塞拉（Serra）（将被我们重新提到）就是卡拉布里亚人。而此时新兴的一代把塞拉的研究继续向前推进，费迪南多·加利尼（Ferdinando Galiani）建立了一种与早期那不勒斯经济学家的联系。正如他的许多先辈一样，他也是教士，而且后来也成了执政者，是那不勒斯最高贸易委员会的成员，此后则是那不勒斯驻海外的外交官。加利尼著作颇多，以其重商主义观点攻击重农派（他决意这样做）。然而在其经验论之中，有一种连贯性。加利尼认为，每个民族和每个时代需要不同的法律，根据抽象而绝对的原则来立法是愚蠢的，因为人们的需要并非在一切时间和地点都相同。在其1750 年首次匿名出版的最著名作品《论货币》（*Della Moneta*）中，他提出了一种颇有价值的理论，这种理论与其说更像当时的英国和法国的思想，不如说更接近于 19 世纪的边际效用理论。[①] 在其对贸易政策的总体看法下，加利尼是一个重商主义者：他的兴趣在于以其《论货币》重新唤起被遗忘了一个多世纪的安东尼奥·塞拉的《简论》。帕奥洛·多里亚（Paolo Doria）也是如此，这位热那亚数学家是维科（Vico）的朋友，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似乎是在那不勒斯度过的。加利尼的同时代人安托尼奥·布洛吉亚（Antonio Broggia）也是那不勒斯人，他似乎比加利尼更倾向于重农学派。他的《论税收》（*Trattato dei Tributi*）和《论货币》（*Trattato delle Monete*）使其确立了作为税收和货币方面的权威的国际性声誉。而他的《*Trattato della Sanita*》毫无疑问被本国的很多同时代人认为也同样地具有重要性。第四个，同时无可争议地，也是早期那不勒斯思想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安东尼·格诺维西（Antonio Genovesi），他重新振兴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巴托洛梅奥·因

① 研究早期意大利和德国经济思想家的读者可参看 L. 科萨（L. Cossa）：《政治经济学研究指南》［杰文斯（Jevons）英译，伦敦，1880 年］和该作者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导论》［L. 戴尔（L. Dyer）英译、伦敦，1893 年］。

提里（Bartolomeo Intieri）在力学和贸易的名称下为他设立了欧洲第一个经济学讲席。与加利尼一样，格诺维维西也是一个经验论者。他的《Lezioni》[549] 无疑是学识渊博的，但与他同时代或在他之后的主张重农学派者却批评它支离破碎，不成体系，格诺维西是重商主义者，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他开明而温和，但其同道者是蔡尔德、配第、乌斯塔雷斯，而非奎斯内（Quesney）。只有重商主义者才认为有必要把托马斯·曼的作品译成意大利语（他正是这样做的）。对他而言，经济学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是“La Scienziache abbracia le regole per Kendere La Sattoposta nazione popolata, potente, soggia, poleta（信奉之能使贫弱之国变得人口众多、强大、智慧且有文化的一种法则科学）”。只有那布勒斯人才深知南意大利是多么需要这样一门学科。在 50 年的时间里，格诺维西以雄辩和教士般向热情的那不勒斯公众进行演说，传播国家进步和国内变革的热情，并为其中的许多经济学家如费兰吉利（Filangieri）、帕尔梅利（Palmieri）、布里甘提（Briganti）和加兰蒂（Galanti）提供了素材。如果说有某一个人在 18 世纪最后几十年里使那不勒斯产生了对社会问题的一种普遍的兴趣，那么这个人就是格诺维西。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任何意义上，格诺维西都不是一个独创性的思想家，他的理论是正统重商主义的一种变形。对他而言，存在着“有益的贸易”（出口制成品和进口原料）和“有害的贸易”（出口原料而进口制成品）。另外，干预只对于后一种情况才适用。“有益的贸易”应该被给予自由，而且在自由的条件下才会最兴旺。在折中主义者之中——法国的弗波内斯（Forbonnais）、英国的斯图亚特和德国的财政主义者（下面将谈到）——格诺维西很可能是最有影响的，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了德语和西班牙语并受到广泛的阅读。[1]

意大利的确因这些年里在社会问题上的智力探究的活跃而著名。关于经济问题的刊物在佛罗伦萨、威尼斯和都灵等地得到建立。威尼斯政府成立了一个关于土地（terra firma）的农业科学院。第二个经济学讲席是奥地利政府于 1768 年在米兰为贝卡利亚（Beccaria）设立的，他主持此席直到 1770 年。贝卡利亚预见了《国富论》中的许多原理，并比本塞姆（Bentham）早 12 年推广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La massima felicita divisa nel maggior numero）”这一说法。在摩德纳（Modena）有帕拉迪西（Pardisi），在帕勒

[1] 关于格诺维西的最新的评论，见《对安东尼·格诺维西的成就的研究》（*studi in Onore di Antonio Genovesi*）（那不勒斯，1956 年）。

莫（Palermo）有塞尔吉奥，而威尼斯的修士奥提斯（Ortes），可能是意大利经济学家中最有独创性的思想家了，他所沉思的是他所认为的（并非毫无根据）意大利经济中不能解决的问题。并没有多少证据表明在意大利各【550】地，重商主义的理想与实际的政府行为之间有任何直接联系。像贝卡利亚在伦巴第（Lombardy）、多尔芬（Dolfin）在威尼斯一样，一些人对经济生活中挥之不去的行会的影响提出了反对，但没有得到什么反响。帕斯考利（Pascoli）在 1733 年根据重商主义立场提出的重振与教皇辖地之间的贸易的建议，付诸实施并没取得什么可见的效果。最显著的，或许是惟一的不同于重商主义计划所遭受的普遍的冷漠而毫无生气对待的，是图斯加尼（Tusang）、班迪尼（Bandini）1737 年在那里写作了关于开垦锡耶纳沼泽（Sisnese marshes）的著名论文，这篇名为《论经济》（Discorso Economico）的论文呼吁大公佛兰西斯（Francis）通过开垦这片沼泽来验证一个真理——很大程度上是班迪迪从沃班那里得来的——即如果税收、官吏、规章制度被减少或最好是取消，那么，繁荣的农业将确保会出现一种粮食充足的结果。这种请求发展成为一种更普遍的，对更合理和更自由的经济呼吁，尽管经过长时间的拖延，终于结出了果实。这部分地区是锡耶纳省的低洼地带，包括整个图斯加尼的 2/5。佛兰西斯作为呼吁所指的对象，并未受到触动，然而其继任者佩特·利奥波特（Peter Leopold）却遵从了班迪迪的建议。这只是一个例外情况。在总体上，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重商主义者的抱负是无法被具体衡量的，这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在于这些地区往往是贫瘠的，气候是不利的，而其居民在物质生活方面习惯于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而且，在这些情况之上，还有几个世纪以来的治理不善所造成的成堆问题。只有新技术的冲击——特别是交通方面——才能够造成突破性的进展，而这不是这个时期的事。第二个原因来自于第一个。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重商主义完全是从英国、法国和荷兰的模式中派生出来的。然而它所模仿的只是理论，而很大程度上却忽略了理论所由以产生并对之依赖的社会制度基础。在英国、荷兰，甚至在法国，有娴熟于传统技艺的商人团体。殖民地贸易的开通是由它们主动进行的，而这种开通又扩大了它们的繁荣。公司机构和贸易差额的理论及政策只不过是其欲望的理性化表现。英国重商主义文献的绝大部分是实际的商人或与商业有关的人——曼、米塞尔顿（Misselden）、维奥里特（Violet）、蔡尔德、诺斯、吉（Gee）、笛福——的作品，甚至在法国，商人阶层的活动也是由萨瓦雷和佛伯内斯这样的作者加以记录和传播的。而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一般来说并非如此。经济学著作绝大部分来自于神职人员或律

师。格诺维西起初是担任圣职的。加利尼是一位 *monsignore*（天主教高级神职人员——译者），班迪迪、奥蒂斯、帕斯考利也都是神职人员。卡兰蒂 【551】（Galanti）是一个律师。其他人如贝卡利和维利是贵族。18 世纪，在大部分意大利经济学作者之中，只有两个人作为商人为人所知。贝洛尼（Belloni）是罗马的银行家，布洛吉亚是那不勒斯商人，后来转而从政。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后期的西班牙重商主义者。乌斯塔雷斯是公务员；乌勒阿是马德里的地方法官。这种情况使得他们的作品和建议有某种不现实之处。贸易差额不是作为现存商人群体的努力的衡量，而是被认为是一种“解围之神”，可以自己创造出贸易来，这种贸易的数量和性质为向国王提供收入所需，另外，还为百姓创造出就业，为国家创造出财富和力量。至于说企业对技术及其应用的需求（如果它们确实存在的话），则被认为是次要的。西班牙立法者大胆地承认贸易活动并非一定是不体面的，但他们却没能采取积极措施来训练商人并给予他们实际地位。尽管这并非是制定政策所必需的大的抽象概念，却是事情的真正症结之所在。

如果对经济方面的文献只是粗加浏览，会使读者得出结论，在中欧、北欧和东欧，情况与西班牙和南意大利类似。统治这些经济落后地区的国王们，或是从个人利益出发，或是为国家利益而采取正统的重商主义原理，以作为经济政策的基础。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在德国，正如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一样，有一种迟到的重商主义。国王们的确采纳了较早的英国和法国的作者和管理者所倡导，并由 17 世纪晚期和 18 世纪的德国重商主义者所效仿的方法。没有什么比弗里德里克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的名言更符合传统的重商主义了：

> 为使一个国家繁荣，首先需要的是贸易顺差；如果它为进口所支付的多于其出口所得，它将会一年年地贫困下去。如果一个人钱袋里有 100 达克特（ducat），每 24 小时花出 1 块钱而无任何进项，那么 100 天后他将一无所有。一个国家避免这种灾难的办法是，把本国所有原材料都用于国内的制造业，建立其他技术性工业以加工进口的原材料，并且使生产成本低廉从而占领国外市场，这种类比是可以理解的。弗里德里克为建立新工业和新企业所做的很多工作，到耶拿（Fena）时期已经消失了。据认为，这又是一次温室 【552】栽培式的成长。当重商主义这株植物暴露在室外并不再有王室的照顾时，它似乎就枯萎了。所有这些说明了一些真理。就 18 世纪日耳曼国家的重商主义而言，它在某种程度上与各地的重商主义一

样，都有一种人为性。然而，在某些重要方面，既包括观念也包括观念的实施，它与其他地方的重商主义还是有不同之处的。而且有一定理由认为，它对德国政策影响的深度及其作用的持久性比某些时候人们所想像的要更深和更持久。①

与欧洲西部相比较，德国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德国东部的邻国在经济上是落后的。在更靠东部的地区主要是农业区，其封建主义沦为一种残酷的奴隶制。德国的贵族统治使大批斯拉夫农民陷入一种和欧洲其他各地一样都存在着的恶劣状况，而“三十年战争”使情况更为恶劣。甚至在 1694 年，波美拉尼亚（Pomeranian）的一条法律竟然允许地主在任何逃跑农民的背上烙印。德国东部的农民被描述为“忧伤的，不满的，奴隶般的……与可悲的受到驱使的牲畜之间没什么区别”。弗里德里克的“开明”包括计划减轻其自己土地（约占王国的 1/3）上的农民的负担，对他而言，德国农民“与法国人相比像植物一样呆板”。不管怎样，即使是弗里德里克也是无所作为的。德国，特别是东部地区，仍然处于难以改变的落后之中，缺少道路，何况是文明。绅士们的“大旅行（Grand Tours）”不会光顾远至东部的地区，少数［如布尔尼（Burney）1772 年为其《欧洲音乐调查》寻找素材的旅行］去过那里的人遇到过很多困难，遭遇了很多不方便、不文明、冒犯以及身体上的痛苦，以至于希望别人不再步自己的后尘。然而，并非所有地方都是野蛮的。再靠近德国西部的地方，农村的情况与其他西欧国家的经济有更多的相似之处，而且尽管往往是粗糙的，在各地却都有工业的迹象。

大部分地区制作亚麻，而从巴伐利亚（Bavaria）到东普鲁士，从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到西里西亚（Silesia），几乎每个村庄都有织机。莱茵河（the Rhine）地区有纺织工业。在山区，特别是在德国中部和东部这些木材燃料和水力资源丰富的地区，拥有采矿业和冶金业。在德国北部的沿海地区，有大型港口，那里的商业技术的传统仍然很强，在很多城镇，都有技艺娴熟的工匠和细腻的技术，后来的企业家正是从他们之中崛起的。通过这些广泛然而分散的德国工业化的事例，我们既可以论述很多，也可能无可论述。18 世纪 30 年代，公允的旁观者的作品对德国工业从整体上作出的评【553】论是，其规模仍然很小。他们描述了一种这样的经济，交通落后，州与州之间还存在着关税，而农村保守的农民和城镇保守的行会使经济受到阻碍。在

① 选自《费里德里克著作集》，第 9 卷，第 206 页。引文出自《论政府形式》，很可能其所涉时间是自 1777 年开始的。

整个这一时期，水路收费关卡是德国经济的梦魇。“三十年战争”以后，莱茵河上游的航运消失了。据称由于关卡，酒和小麦在曼海姆和荷兰边境之间的价格上扬了3倍。在莱茵河下游，关卡的限制使得贸易仅限于一小段河道。在易北河地区，混乱至少是严重的。在18世纪早期，由德累斯顿（Dresden）到汉堡（Hamberg）的船一般要走上4个星期，其中3个星期是花在通关过卡上的。顺流而下的木材要以实物交费。到1685年，有一批数目为60根的从萨克森（Saxony）到汉堡的寄售木材，其中54根是作为贡物献给包括勃兰登堡（Brandenburg）和纽伦堡（Luneburg）在内的有关诸侯国的。而只有6根能到达目的地。易北河上的航运总共包括48个互不相关的关卡障碍。30个是边界上的，10个是属于城市的，还有7个属于封建地主所有。在德意志全境以及它的各州内部情况都是如此。这种关卡体制一直持续到法国大革命以后，因为诸侯们对这种收入来源依赖颇重，以至于无法予以废除。然而，等到关卡被废除之后，却并未出现普遍的经济进步，不过，沿海地区是个例外。在那里，波罗的海南部海岸以及古老的汉萨港口仍是重要的。其中汉堡首当其冲，它的银行（建于1619年）仅次于阿姆斯特丹银行，亚麻（在当地漂白）贸易颇为兴旺，而且，那里有范围广泛的精加工和成品加工工业。这个地区是一个例外。

而从整体上看，德国各地的情况是经济潜能受到政治状况的阻碍，但这种潜能毫无疑问仍然是存在的。当时，在德意志的纺织工、染色工、木匠、制锁匠、制钉匠和矿工中间，有些人正是后来德国巨头的祖先。在北方——特别是在霍斯坦（HoLtein）——农民们自己投身于贸易，出售或购买粮食及木材，甚至凭借合伙购置的船只赴海外与挪威和荷兰进行贸易。在波西米亚和西里西亚，农民兴办贸易，大概是凭借他们作为马车夫和运输者所建立的渠道而得以进行的。18世纪波西米亚的玻璃工业正是由农民出身的贸易商所创立的。在奥地利境内，而特别又是在波西米亚，那里的这种经济发展很大部分是归因于贵族企业——约瑟夫·冯·波尔加伯爵（Josef von Bolza）、费迪南·哈拉克伯爵（Ferdinand Harrach）、拜仁·奈夫泽（Baron Nefzer）和其他数十人——这些人的庄园为工业企业提供了场所。例如约瑟夫·马克希米利安·金斯基伯爵（1705～1780年）在其庄园里拥有11个不同的工业企业。在东欧，类似这样的情况随处可见。在明斯克（Minsk）南【554】部的乌尔泽克兹（Urzecze），以及在波兰境内，女王拉德泽维尔（Radziwill）1737年在其庄园内建立了一个玻璃和镜子制造厂。它运转了一个多世纪。这种开发并非新生事物。早在200年前，尤利乌斯·冯·布劳施魏克

（Tulius Von Braunschweig）就已经有过先例，他曾大规模地开办采矿企业和盐井。还有丹尼尔·兰特奥（Daniel Rantzau）的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不过，到这时，这类事情变得更加普遍，比如说，像图林根（Thuringian）的瓷器制造是由贵族企业和资本所兴办的。尽管如此，由于企业运营的资本短缺所造成的限制还是很明显。就贵族企业来说，最重要的影响是它为那些有可能成为高层官员的人提供了经验，这种试点的训练和试验甚至在这一重商主义国家的更大型的企业中也结出果实。因为德国思想和政策的特征是它从一开始就试图通过国家资助来解决私人资本和企业的不足之处。在德国不存在一个可以从中招募贸易商、销售商、经理人员、职员和其他类似人员的中产阶级，因此，这些职位只好由政府官员来担任，而他们往往是来自贵族之家。在普鲁士，比如在西里西亚，就有制铁业的创建者雷顿公爵（Reden，1752～1814年），还有德国最早的蒸汽机制造者之一弗里德里克·布克林（Friedrich Buchling）。在奥地利，和很多人一样，奥托·路德维希·冯·洛斯卡尼（Otto Ludwig von Loscani，1702～1757 年）和弗雷赫尔·冯·索根托尔（Freiherr von Soygenthal，1735～1805 年）这两人是作为政府官员而从事建设性工作以建设奥地利及其属地的经济生活。萨克森伯爵冯·恩西德尔（von Einsiedel，1737～1810 年）在引进的工人和技术信息的帮助下建立了一个铸铁厂——是下萨克森（Lower Saxon）的一批以这种方式建立的工厂中的一个。显然，17 世纪和 18 世纪德国的似乎是自发产生出来的很多贸易和工业方面的发展，是由作为私人企业家或政府官员的贵族们创办的。然而，我们不能仓促下结论，认为这些贵族或其国王单纯地是被财政上的需要所驱使。正如研究这一时期的德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学家所指出的，为国家牟取利润的需要并不能排除存在其他动机的可能性，政治性或经济性动机可能与财政动机共存[①]。（我们可以说）西班牙和普鲁士政府的经济政策都具有财政目的这一事实，与另外一个事实相比就显得重要性不够，这一事实即是西班牙是通过混乱而自取灭亡式的各式税收来追求其目标，而普鲁士是以弗里德里克大帝所阐发的原理作指导的。

【555】 然而，再次出现的是，当对 17 世纪和 18 世纪德国和奥地利经济学作者的具体的研究和建议加以分析时，就会发现，尽管他们（像与其同时的西班牙和意大利作者一样）从英国人和法国人那里吸取了材料和样板，但他

① 弗里泽·雷德利希（Fritz Redlich）：《德国工业化初期的企业家》（剑桥，马萨诸塞，1954 年），企业家研究中心论文。

们还是展示了某些为他们所独有的特色，而且是与德国的状况有明显关联的特色。具体而言，尽管他们总体上与其他各地一样，奉行一般的重商主义原则，然而，他们在手段和目的方面却更加明确，而且更多地关注于经济管理而非理论。他们并未无视德国与被它作为实际效仿对象的国家之间在社会和经济结构上的差异，而且他们注意到了在贸易和工业的实际运作方面对读者给予指导。德国作者的这些特点有时使他们的思想之价值受到贬低。相反的是，它们生动地说明了它们所由以派生的经济的性质，而那里的政治和战争在阻碍经济进步的自然因素之上又加上了人为因素，那里缺乏私人经济代理人，只能用政府官员来担任。德国重商主义者的传记显示出理论和实践往往有着密切的联系。马克思（Marx）在《资本论》中可以断言说，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是从英国和法国引进的现代货色，然后由“仅仅是学者”的德国教授们加以讨论。至于在亚当·斯密以后的时期，有些东西是令人嘲笑的。而对于重商主义时期，这种指责是没有根据的。德国的“官房主义者”是一类独特而重要的思想家。“*kameralwissenschaft*”① 这一术语来自于“密室（camera）”一词，即管理国王的岁入和支出的地方，而且严格地说，“学科”一词所指的是支出对岁入所由以而来的财富资源的影响。在狭义上，官房主义具有成为一系列税收协议的倾向。在较广的意义上，它包括有关国家经济利益的理论，而从本质上说，行政管理要求将这些学说加以实施，正如贸易以及工农业生产的技术方面一样。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条约签订之后，随着国王对领土主权的拥有日渐盛行，官房主义发展成为一套独立于它早些时期所隶属的法律体系的学说。它的直接目标是——其理由已经提到过——训练合格的官员来募集和管理国家岁入，并培育被数十年战争和人口及资源的破坏所摧毁的国家利益。这是德国人的信念［为了避免经济上更富裕的国家（似乎具有的）那种逻辑上的谬误］的根源，这种信念即为了建设强大而繁荣的经济，需要政府和企业家之间的合作。荒芜的土地应【556】重新得到开垦并有人口居住，战争债务需要偿付，工业应由新的和引进的技术来加以振兴。这种官房主义的各方面变成了农业理论、人口理论、税收理论。官房主义（*Kameralgeleghrton*）学派分裂成了与国家的宗教二元性相一致的两个“教派”。聚集在哈布斯堡周围的天主教派，与霍亨索伦（Hohenzollerns）王朝日益崛起的地位愈加紧密相连的新教派。

就奥地利学派来说，创始人毫无疑问是约翰·约西姆·贝克尔（Johann

① 德语中的陈旧术语，意指“财政学”、“国民经济学”。——译者注

Toachim Becher，1625～1685 年）。贝克尔曾是一位医生，他于 1666 年移居维也纳，在那里新建立的商业学院授课。两年之后，他出版了著名的《从启蒙发生到帝国、城市与共和国的兴衰演变的政治过程》。贝克尔的著作其精神是重商主义的。像其英国先辈和意大利后继者一样，他宣扬一种褊狭的观点，谴责那些从外国进口本国能够生产的货物的商人，称其为“Propolists（即从事 *Propolium*——为牟取高利而囤积——的人）”。对外国的恐惧的实际根源在于法国奢侈品流入奥地利，数年以来，官方政策对此一直试图加以禁止。相反，那些愿意投资于本国工业的人是有功劳的社会栋梁。地区管理的最终目标应该是“人口稠密与收入丰厚的乡镇”，以及一种支持这种人口的繁荣的农业。在这种程度上——他避免了任何政策上的硬币主义概念——贝克尔与其英国同时代者以及法国和意大利的后继者（如沃班、格诺维西和班迪尼）有很多共同之处。就是说，在他的思想中有一种强烈的“社会”因素。在他的全部思想中，都有些许假充内行的成分。贝克尔是一位充满活力而讲究实际的思想家，他的著作保持着与现实的密切联系。他属于那种在 17 世纪被称为“规划人”的集怪人、江湖骗子和准天才于一身的奇特之人，这类人的社会作用及功绩仍有待于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有一位作者曾在学识的广度及多才多艺方面把贝克尔与莱布尼茨（Leibniz）相提并论。[1] 不过，总的来说，贝克尔还是一位不太成功但却有魄力的企业家，他建立了位于维也纳的著名的家庭用品制造公司（Manufacturenhaus auf dem Tabor），在那里他根据合同生产各种纺织品、厨房用具、染料、制糖、熔炼金属并分割金银。他在慕尼黑和沃玻斯多夫（Walpersdorf）建立丝绸制造厂——后者是位于封建企业家辛森多夫（Sinzendorf）伯爵的庄园里，此前，这位伯爵已经建立了其他类似项目。

[557] 贝克尔的思想（以及他的规划）由他的女婿菲利普·威廉·冯·霍内克（Hornich 或 Honingk）和威廉·弗赖海尔·冯·施罗德（Wilhelm Freiherr von Schroeder）所继承。凡·霍内克是为国王兼教士帕索（Passau）效力的管理者，他主要关心的是说明哈布斯堡家族如何通过一种合理的经济政策增加其财富。在总体特征上，他的思想是重商主义的，在其《厄斯特赖希对各种问题的论述以及他在不同时候的愿望》（*Oesterreich über alles, wann es nur will*）（1684 年）中得到阐述的。他与其岳父一样，特别急于使法国自食其果。他的著名言论是：“为一件商品花两个银币，只要它们能留

---

[1] 雷德利希：《德国工业初期的企业家》，第 14 页。

在国内，那么就好于仅花一个银币而它却流到国外”。接下来顺理成章地是，所有外国制品都应被禁止——不必等到国内相关工业的崛起。不管怎样，国内工业总会迅速兴起的。霍内克是受到欢迎和有影响力的，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甚至约瑟夫二世也觉得在他的理论中有很多有说服力的东西。早期官房主义三人组中的第三个是凡·施罗德，他继承了贝克尔在维也纳的企业，他是哥特（Gotha）的恩斯特（Ernest）大公大臣的儿子，而且似乎早年曾为这位大公效力。作为一个狂热的炼金术士，他移居到荷兰和英国，在英国，他效力于查理二世，并在1670年献给他一个自己制作的红玻璃饮料瓶。此后，他来到维也纳继承贝克尔，其“工厂”在土耳其围城时被烧毁，之后，他来到匈牙利担任某个管理职务。他在1686年完成了著名的《Fürstliche Schafz-und Rent-Kammer》，利用了曼和德·拉·考特的著作。他从他们那里获得的，不是（他自己有时以为的）某种支付差额类型正统的重商主义，而是一种考虑到政策的“社会”要求的合理性。就是说，“导致一个国家富有或贫困的，不是货币的输入和流出，而是不同贸易的平衡”。在3个“生产”阶层中——农民、工匠和商人——商人是这个国家的“手与足”，因为负责“对外”活动。然而，因为他们更易于 *cives orbis quam urbis*，因此，更适合于经营他们自己的事务，而不是作为顾问和决策者。政策的制定应当参考像哥特大公所使用的那种本国制造业的详细账目。必须制定进口和出口的一览表，并应当以之作为“国家的立场”；因为到那时，通过采用一种合适的税收体制就可以对“整个贸易和制造业的运转加以或快或慢的调节”。

与此同时，在新教国家也产生了类似的观点。维特·路德维希·冯·泽肯多夫（Veit Ludwig von Seckendorff）——以“伟大的塞肯多夫”而闻名——继凡·施罗德的父亲之后担任了哥特大公的大臣，并且终其一生为所有萨克森的在位国王出谋划策。与奥地利的官房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一样，他的观点在人口理论方面进行了修正。一个国家的真正财富在于“臣民的数量”。然而在其税收理论中，他认识到了企业的重要性。那些为百姓提供就业的人应享受税收政策方面的有关特权。这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混合式的德国重商主义，其重点在于实力，但也明智地照顾到了经济繁荣。既非（像西班牙式的重商主义那样）纯粹的模仿，也非（像意大利那样）学院式的，也非（像法国那样）危险的自我创新。由此出发，德国思想的性质变得更加明晰了，一个又一个的官房主义者专注于据认为是专门性的同时又与德国复兴有关的事物。冯·劳尔（von Rohr）在其《Compendiöse Haushaltungs- 【558】

bibliothek》中开创了农村经济理论。林业经济学是由冯·卡罗维茨（von Carlowitz）在其《Silvicuctura oeconomica》中所论及的。苏斯米尔克（Sussmilch）把圣经中的训诫“要富庶而人口众多”作为自己的论题，这或许可被视为表达了他的主人即弗里德里克大帝的心声，正是这位主人的关照，使他从最初的随军教士升迁进了普鲁士科学院。这种对人口无限制扩大的痴迷是除普芬多夫（Pufendof）之外所有官房主义者的十足特征。苏斯米尔克著作的强烈的统计学特色是时代的特征：其他人——康英（Conring）、斯克梅泽（Schmeizel）、阿亨瓦尔（Achenwall）和斯克奥泽尔（Scheozer）——也都在耶拿、哈莱（Halle）和哥廷根（Gottingen）发展了统计学的研究，并注意到它与政府行政管理之间的关系。甚至莱布尼茨——像牛顿一样——也与政府管理的实际方面保持有密切联系。然而，没有哪个官房主义者比雅可布·马派格（Jacob Marperger，1656～1730 年）更独具特色地研究德国企业的“引产”问题。马派格是最早提议开展一种系统的商业教育的德国经济学家。他的较早的建议是现有的大学应加设商业教授。到 1723 年他发表《Trifolium mercantile aureum》时，这一建议已经变成了另外一种建议：即建议在萨克森设立一所商业学校，不仅讲授狭义的商业学科，而且有经济学、技术、几何学、历史、力学和语言。最后他提交了建立一所干部学院的计划，经济学、法学、地理、历史和实用技术方面的教授将在那里为商业人士和政府官员进行授课。马派格的冗长而费解的著作长达数千页，并在著名的 1762 年《官房主义文献》中占了不小篇幅。然而他的作品既不荒谬，也并非是失败的。这些建议出了果实，即 1767 年在汉堡建立的商业学校。它是由约翰·乔治·布斯克（Johann Georg Busch）——他是一个教育家和业余经济家——和一个当地的商人共同创办的。这所被称为“汉堡商学院（Hamburgische Handlungs-Akademie）”的学校有大约 50 名学生，大部分在 [559] 15～18 岁之间，它的课程设置有些类似于一所英国非国教学院的课程。布斯克倾向于重商主义，他的信念通过阅读詹姆斯·斯图亚特的《探索》而得到加强，斯图亚特是一个拥护詹姆士二世的人（Tacobite），他于 1746 年逃往德国并在巴登（Baden）和符腾堡（Württemburg）工作了一段时间。甚至有人认为，正是这类影响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商人们总体说来仍继续其重商主义思维，而对使政治家和哲学家颇感兴趣的自由放任主义却持抵制态度。在其他地方也成立了商业学校。符腾堡大公建立了霍厄·卡尔施舒勒（Hohe Karlsschule），而且，当哥廷根拒绝设置商业课程时，乌尔兹堡（Wurzburg）大学却更为爽快地接受了这类课程。布斯克本人应玛丽亚·德莱萨（Maria

Theriesa）之邀提交了一份以其自己的原则为根据而设立一所商业学校的计划。这所学校于1770年得以建立。1791年在柏林建立的一种商业高级中学，几经起伏，并在1806年关闭。这类学校给将来带来了问题。到此时为止它仅仅以培养有能力的商人为目的。这样的问题已开始出现，即这样一个目标如何与对更广泛教育的更大规模的需要相适应。[1]

晚期的官房主义者，冯·朱斯蒂（von Tusti）和冯·松南费尔（von Sonnenfels），整理并概括了其前辈的思想：朱斯蒂倾向于重农学派，冯·松南费尔与其前辈们分歧颇大。然而在一个重要方面，朱斯蒂继承了传统，他的最著名的断言是一个国家是不可能人口过多的。对松南费尔来说，就业机会对人口构成了某种限制。因此，他对早已存在于晚期英国重商主义著作中的一种区别进行了分类。他说，存在着两种衡量贸易差额的方法——通过货币方面的结果和通过就业方面的结果。而且这两者是以相反的方式起作用的。如果，奥地利和葡萄牙进行贸易，奥地利出售225万镑的尼龙，换回200万镑的钻石，那么，从货币上说这笔交易不利于奥地利，因为它以较大价值的商品交换了价值较小的商品，但是，差额的优势是在奥地利一方，因为这笔贸易为其人口带来了就业。

德国重商主义的特殊性在于，既非独出心裁也非无所不包。大多数作者的思想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得自于较早的英国和法国经济国家主义的著作者和实践者，然而，他们认真谨慎地把它加以调整，以适应德国的需要，使它朝向变成为实用的、行政的、地方性的东西，而不是朝向变成为具有普适性的更广泛的经济法则。他们主要关心的是生产和贸易方面，并没有忽视在德国【560】经济受到困扰，社会发展陷入停滞的特殊条件下，企业家本身很大程度上不得不来自于贵族和政府官员。官房主义作者经常自己扮演实际的企业家角色，比如贝克尔和冯·施罗德在维也纳，以及朱斯蒂在柏林作为矿场董事和玻璃厂及钢铁厂的负责人。没有什么比采矿专营权（Bergkegal）的潜在价值的实现更能刺激德国贵族的商业能力了。国王和诸侯们委任贵族政府官员从事采矿和冶炼，西里西亚和波西米亚的铁矿就是以这种方式管理的。在18世纪德国重要的贵族管理者中，普鲁士的雷顿伯爵，以及萨克森（后来到了普鲁士）的弗雷赫·冯·海恩尼茨（Freiherr von Heinitz），还有费雷赫·冯·特拉布拉（Freiherr von Trebra）都首先与采矿有关。然而，采矿远非惟一的企业领域。贵族们在纺织、陶器，甚至批发贸易方面都有所参与。

---

[1] 见F. 瑞得里克：《学校的商业教育》，载《商业史评论》，第31期，第1部分（1957年）。

相反的，像康拉德·索吉尔（Konrad Sorgel）这样的商人可能会成为政府官员，而且可能因其作为政府企业家在奥地利的冶金、纺织、陶瓷和玻璃制造方面的工作而被授予贵族称号。

到 18 世纪中期，西方思想对重商主义干预经济事务的优点不再齐声赞同。不过很多人仍然执著于旧的学说，认为国际贸易的数量是固定的，并按照各个国家的实力来决定它们各占多少份额。那些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对战争的态度根据其利害关系不同而各不相同。英国的这类人中，有很多都支持 1739 年对西班牙的战争，或 1756 年对法国的战争。与其 17 世纪 60 年代的城市先辈一样，他们为一场“贸易之战”而大声鼓噪。只不过现在是与法国开战而非与荷兰开战。“我们的贸易”，威廉·贝克福德（William Beckford，伦敦最著名的西印度商人之一）对国会宣称，“将因为他们的贸易的完全摧毁而得以增加”。然而这不再是一种无可争议的政策原则。在英国、在法国，更不必说在荷兰，哲学的声音正在对重商主义的基本假设提出疑问。大卫·休谟的逻辑对有识之士的头脑来说具有强有力的说服力，尽管新哲学在一个以民主方式进行组织的社会里永远也不会通行，但这些论点在产生英国执政者的那个社会阶层还是拥有很多敬仰者的：

> 假设大不列颠的全部货币的 4/5 一夜之间消失了……结果将会怎样？所有劳动力和商品的价格难道不是必然相应地下降，而所有东西都必然会像往昔那样便宜地被出售吗？还有哪个国家能与我们【561】争夺任何外国市场或妄想能以对我们来说有足够利润的价格来航海或出卖产品呢？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这就会使我们失去的货币重新回来并使我们达到所有邻国的水平。当达到这一水平后，我们也就马上失去了劳动和商品的价格优势，而货币的流入也就因我们的充足和饱和而停止。

又过了 100 年，英国才完全接受了关于经济运行机制的自我调节特征的这种演示：然而自此以后，那些被说服——比如休谟——出于英国人的利益而为西班牙甚至为法国的繁荣而祈祷的人的数目稳定增加了。但在德国却并非如此，那里的开明的专制君主正忙于为官房主义理论注入生命。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战争本身，恰恰是一场重商主义战争，或许几乎属于殖民地类型的战争。对西里西亚的进攻并非完全出于经济动机，但是这一地区的经济资源肯定是首要的刺激物，而且弗里德里克意识到了它的价值。这个地区富有工业资源，矿物蕴藏几乎尚未开发，而且富于工业技术。他对它的描述——“我的新秘鲁”——并非无稽之谈，对西里西亚的占领仅仅是德国

向东部的殖民开拓的急迫过程的一个步骤而已。与此类似但更为和平的是大规模的开垦计划，尤其是对位处法兰克福下方的奥德布鲁克（Oderbruch）沼泽的开发。西里西亚战役刚一结束，弗里德里克就拾起了过去被弗里德里克·威廉搁置多年的奥德布鲁克计划。河道被挖深，堤坝和沟渠的建立防止了持续的冬季泛滥，灌木被清除，野兽被消灭，土地的积水被抽干。任何来自什切青（Stettin）的商人、附近土地的所有者、或当地渔民和猎人的抱怨都没能阻止弗里德里克。这项工作于1753年完成，弗里德里克因此可以宣布他不战而取得了一个行省。在提供专有权和免除税收及兵役的吸引之下，120户人家迅速地在那里独自定居下来。据估计总共有300 000名移民在波莫拉尼亚（Pomerania）地区定居。西里西亚的获得，奥德（Oder）的航行的改善，什切青港口的发展——所有这些都具有一致性。同样，布劳恩（Plauen）和芬诺（Finow）的连接布吕斯劳（Breslau）和柏林以及连接柏林和汉堡的运河为西里西亚的商品提供了另一条出口，并且使东欧能够经由汉堡得到殖民地物品和法国的酒类和高档食品。

弗里德里克对人口和交通问题给予了密切而恰当的关注，使得人们能够把他和真正的官房主义传统联系起来。他自己的在贸易和制造业方面的信条显示出他是一个旧式的重商主义者，专注于金银问题并早已瞄准了他用来进行七年战争的1 800万塔勒尔（thaler）窖藏银币。【562】

> 与所有贸易和制造业有关，有一个随之而来的基本原则，这就是防止货币永久性地流到国外；始终应该试图使流出的货币再回到普鲁士。最好的防止货币流失的办法是在普鲁士生产所有过去需要进口的商品。所有进口都要通过清单加以显示，列出进口的和在普鲁士销售的商品名单。通过这些清单很容易判断出哪些工厂可以扩大，哪些应该调整为生产其他产品的工厂。
>
> 第二种防止货币从国内过多地流出的办法是，从原产地购买必需的外国商品，这样就能把贸易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交到外国代理人的手中。这就意味着在汉堡花一个银币（thaler）购买的商品，如果直接从西班牙购买则很可能只需一个盾（gulden）。这样所导致的商品价格的下降将是一种明显的好处，且不要说还有国内的普鲁士贸易商所得的直接利润，因为这样还意味着汉堡和荷兰商人会有相应的损失。
>
> 武器制造为国内带来了大量的货币。而增加的生产会成为一种更大的财富来源，因为，我们与波兰和俄国是邻国，这些国家始终

> 需要各种商品，并因此间接地使其邻国的工业得以维持。所有这些理由都必然会使普鲁士的统治者鼓励制造业和贸易，或是通过直接的资助，或者通过免税，从而使它们可以顺利地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和贸易。

这就是弗里德里克在7年战争之后通过其重建计划（*Rétablissements*）而积极地付诸实施的发展国民经济的重商主义计划。这是到此时为止欧洲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经济计划实例。在1763～1786年之间，国库支出364万银币以促进德国经济的恢复和增长。在冯·海因尼茨和冯·海根（von Hagen）这些执政者的管理之下，新的重商主义对所能找到的私人企业加以利用——通常是在西部。例如，在克里菲尔德（Klefeld），冯·德尔·莱因（von der Leyen）兄弟能够提供创新，因此干预就仅限于给予他们丝绸生产的工业垄断。在柏林，由于没有私人企业来实施计划，丝绸生产就交给了国营企业，在一个传统的规章制度的框架之内——其目的在于防止原材料特别是羊毛的出口，以及防止外国制成品的进口；通过资金、垄断权和特权来促进地方制造业；鼓励熟练工匠移居本国——实现了明显的工业增长。在威斯【563】特伐利亚有制铁业的垄断，在西里西亚有冶金和采矿的垄断，贸易方面的垄断有黎凡特和俄国公司，以及1766年的国家银行。然而，正如研究德国丝绸工业的历史学家奥托·辛茨（Otto Hintze）指出的，这个计划的“核心和顶峰”是关于精细纺织品制造的计划。弗里德里克像柯尔贝尔一样——前者的计划与后者的计划极为相似——把奢侈用品视为国际贸易中的赚钱货色。因此贮存这类贸易所需要的原料——羊毛、棉花、丝绸——的仓库就具有了首要重要性，而且为此花费了巨大的开支，以便为国内种植者提供无限的市场，并为制造商提供丰富的原料供应。仅丝绸仓库就花费了80 000银币的投资。这些以及其他几十项计划都得到了来自国王本人的密切关注。对他而言，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屑一顾的。陶制烟管是进口的，难道国内就不能生产吗？斯特里格（Striegau）缺一个工厂，为什么不在那建一个化工厂呢？为什么普鲁士不能生产碎纹陶瓷呢？让驻德累斯顿的公使找一些萨克森工人教给普鲁士如何制作。为什么农民不再自己织麻布呢？找一些喜欢聆听纺轮和织机的美妙声响的萨克森妇女定居到勃兰登堡为当地妇女做个榜样。凡此种种。每年的皇家巡游都要在不堪烦扰的政府机构带来一批观感、计划和问题。弗里德里克1740年继位时，德国国土只出口初级产品——羊毛、亚麻和木材。到其统治末期，他的生机勃勃的活动使得各类工厂得以创立，制糖厂、瓷器和陶器厂、钢铁厂、造纸厂和皮革厂。其中有些是在其前任统治时就衰落了，

又有经弗里德里克有力的措施而重焕生机的工业，但很多是新兴的工业。

对弗里德里克的工作成绩很难做出评价。詹姆斯·哈里斯爵士作为英国公使于1776年写道，弗里德里克永远也无法理解一个国家的真正财富在于“其臣民的安逸和富足”，而不在于“沉睡在其金库里的”大量金银。这种评价并不怎么公平，为了工业的启动需要注入大量资金，而且像弗里德里克这样的国王不太可能在制定其经济计划时忽视军事上的紧急情况。此外，有一种指责还是有些道理的，即他所试图建立的工业中，有些“是几乎不可能在普鲁士兴旺起来的，就像香蕉或柑橘不可能在格陵兰（Greenland）生长一样”。[1] 然而，一般来说，弗里德里克对经济前景的判断会比很多私人或政府的企业家更加错误，这是令人怀疑的。他兴建的很多事业，有很多到耶拿时期均已破产或被放弃，而原因应在超出他的控制的环境中去寻找。约瑟夫二世发展工业以及放松行会和垄断控制的经济计划比弗里德里克的计划【564】更为自由，但弗里德里克与他的相似之处是，尽管本质是官房主义的，但他们都没有强大到足以打破阻碍着德国和哈布斯堡领土上的国内贸易的重重关税和关卡的程度。这一问题只有到1815年以后才可能得到解决，然而，所谓的普鲁士出口贸易从1752年的水平衰退到30年之后的较低水平，部分地反映出为国内市场的生产的增加。总体而言，国内生产的年产值增加很大，特别是在西里西亚。在拿破仑军队面前的崩溃部分是因为新国家仍然只是一种勉强的机制。对普鲁士的人为促成的商业和经济来说，没有时间使普鲁士社会本身发生转变，而且迟至1842年，仍有一位英国观察者在周游德国之后沉思道：“这个国家的商业程度不足以产生出一个可以不依赖于政府的富有的中产阶级……”[2] 这样的中产阶级仍然主要是由政府官员（绝大部分是低级官员）组成。弗里德里克自己从未认识到，如果他的思想能够成功地实施，那么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社会本身的变化。封建主义、容克精神（Junkerdom）和工业化之间并非是完全一致的。系统的社会变化在1815年之后开始，并于1848年见诸记录。使当时的形势有别于18世纪的情形的新的因素是和平和关税同盟（Zollverein）。然而，如果有人忽视了弗里德里克的生气勃勃（即使是不平衡）的实验为企业所带来的重要机会，那么他就是有失公允的。

丰富的资源、适宜的气候以及一个强有力的君主政权，并非必然地成为

---

① H. 托特勒（H. Tuttle）：《弗里德里克大帝时期的普鲁士历史》（II）（伦敦，1888年），第101页。

② W. 霍威特（W. Howiltt）：《德国农村和家庭生活》（伦敦，1842年）。

重商主义发展的灵丹妙药。在瑞典历史上所谓的帝国时代（1600～1720年），相当丰富的资源被用于无休止的战争的开支，在这一时期的120年中，瑞典有75年是处于这些战争之中的。“在瑞典历史上没有另外一个时期”，海克斯克尔（Heckscher）写道，“整个经济体制是服务于政治行动的”[①]。百姓的穷困及急需外国货币以遣散军人的需要，迫使历任国王把财产抵押给外国投标者，这些投标者拥有面对有关风险所需的资本和技术资源。其中一人是路易斯·德·吉尔（Louis de Geer），他是瓦龙（Walloon）血统的阿姆斯特丹资本家，几乎在17世纪中期瑞典的每个经济活动领域里，他都占据了显要位置。铜的出口，铁、铜、锡的开采，金属丝、纸、布匹的【565】制作、造船、银行业、殖民地贸易和零售贸易，这些只是他的事业的一部分。德·吉尔拥有和承租的大片土地遍及瑞典的中部和东部，而他投入的资本也是十分巨大的。不过，他还有其他许多得到政府授予的特许权的企业家，基本上都是外国人。

瑞典也没能免于重商主义的影响。在瑞典存在着某些关税保护、某些特许授权。建立了一些贸易公司，其中只有那些从事不正当贸易的公司获得了成功。战略方面的考虑使得古斯塔夫·阿道尔福斯（Gustavus Adolphus）资助船主以建造武装商船，使之易于转为海军用途。这种体制从1645年一直延续到这一世纪末，但是军舰所特有的不断增加着的体积和复杂性，使得这种船只的实用性令人怀疑。总体而言，重商主义政策似乎没能结出什么果实，这无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的财政需要过于急迫，以至于无法对国家的经济福利做持续不断的追求。显然，没有出现广泛的对体制的反抗，或者是缺少这种反抗，在17世纪只出现了一位重要的作者，约翰·克莱松·里辛赫（Tohan Classon Risingh），而他的《论商业》（1669年）是一个老式重商主义和鼓吹荷兰式的自由及商业效率的矛盾的杂烩。在此后直到拿破仑战争的时期里，没有产生更多的其他人物，尽管在18世纪60年代中期出现了多如潮水般的经济学小册子——平均每5天就出现一本。它们中的大多数是官房主义类型的重商主义，受到贝克尔和德国学派的强烈影响，而且在较小程度上受到早期英国重商主义者如曼和蔡尔德的影响（通过法文译本传到了瑞典）。正如17世纪的瑞典思想一样，这些小册子中的大部分是承袭他人的，并往往远离瑞典国情。大多数作者都是贵族或学者或官僚，因此，瑞典的重商主义有脱离经济现实的倾向，这种现实往往反映出寻求自由以摆脱

---

① E. 海克斯克尔：《瑞典经济史》（伦敦，马萨诸塞，1954年），第95页。

控制和约束的国民性格。关于18世纪的瑞典，有人认为是“一切都已尝试，却仍一无所成”[①]。即没有来自下层的企业涌现出来，来自上层的不断施压也未能带来其基本特征是形成更富有活力的重商主义国家的社会转变。瑞典的时代被推迟了。

18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体系”的编年史是以一系列强烈的反响作为特征的。对这一术语的传播者（即使他并非它的真正发明者）亚当·斯密来说，这一体系表明了一种观念上的混乱：首先，“货币”被错误地等同于“财富”；其次，对货币的“毫无成果的”关注被对贸易差额的同样“毫无结果”的关注所替代。一种不必要的管理机构被建立起来，以服务于一小【566】批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这个体系有益于“富人和权势者”，而有害于“穷人和贫民”。消费作为所有生产的惟一的目的和目标，被从属于生产和生产者的利益。把这种“体系”谴责为是一种以部分来反对整体的阴谋，这种观点在一定时间内在各个地方激起了反对意见。在德国，在“三十年战争”之后，由于缺乏任何自发的商业和工业发展，统治者和思想家不得不转而向国家及其官员来寻求主动性，而在更靠西部和更富有的国家里，这种主动性是自动出现的。德国的历史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尤其是古斯塔夫·施莫勒（Gustav Schomoller），对国家干预的历史持一种非常不同的观点，亚当·斯密认为它是多么糟糕，他们就认为它是多么有利。在“体系”后面的思想，施莫勒写道，“比亚当·斯密的理论更接近于现实……”在经济生活与对社会和政治生活进行控制的主要部门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经济机构依赖于政治机构的行动；个人的经济活动在一种政治真空中是无法进行的。这就是为什么政治上不统一的德国落后于那些统一的国家的原因，那些国家通过关税、保护、奖励和类似措施来追求一种协调一致的政策。弗里德里克大帝认识到了国家活动的必要性，然而，即使对施莫勒来说，这不是一个制定某种国家主义教条的问题。弗里德里克政策的较大的功绩在于它试图“通过国家的主动性和政治手段尽可能迅速而完备地建立一种健全的经济，使之能够自立并产生出兴旺的私人商业——并且使这种政策本身成为多余的”。事实上，弗里德里克的政策与历任英国和法国政府的政策并无太大不同，那些政策使国家权力为其经济利益服务并“因此在财富和工业繁荣的争夺中占据领先”。威廉·坎宁汉姆（William Cunningham）使人们重新看见了对英国历史的这种更为赞同的态度。他写道，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寻

① E. 海克斯克尔：《瑞典经济史》（伦敦，马萨诸塞，1954年），第207页。

求做出那种自觉进行的开发资源与扩展国家商业的努力，这种有意识的努力是通过政治机构并为了政治目标而做出的，而且，无论如何影响到了我们的进步”。坎宁汉姆的主张同样激起了像 W. A. S. 霍温斯（Hewins）这样的历史学家的反对，特别是乔治·安汶（George Unwin）认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不是虚伪的就是恶意的。对重商主义进行了最彻底的研究的历史学家是埃里·海克斯克（El. Heckscher），他做出的结论与那些较早的正统的经济学家并无本质不同。大多数重商主义理论都被误解了，而大多数政策则被【567】引入歧途了。的确，体系本身并没有过多地表明它是一种本来意义上的“经济”手段，并试图把迫使经济政策服务于国家“权力”作为其自身目的。海克斯克的批评相应地激发了凯恩斯对重商主义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所进行的辩护，他的辩护尽管有些时代错误，但他对于延续了 4 个多世纪的对贸易逆差的关注（这种关注经受了两个古典学派职业经济学家的至少在逻辑上的归谬证明），并没有仅仅把这种关注当作一种“幼稚的执迷”而予以否定，这是其功绩之所在。毫不奇怪的是，某些注意这段有争议的历史的历史学家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重商主义这个概念本身就是造成混乱的源泉，因此即使无法抛弃这个概念，也最好是避免使用它。①

现阶段还有哪些这种争论？至少是从 16 世纪到 18 世纪（在很多地方时间更长），而且遍及今天的文明世界（在物质的意义上）的相当多的地区，一些政府，及其官员和百姓都自然而然地有这样一种信念，即统治者对共同体的经济生活进行管制是有好处的。这个共同体并非必然地是民族国家，然而它越来越趋向于采取这种形式。尽管如此，在意大利和尼德兰，一些城市国家仍然保持着实际的自治地位。

论述重商主义体系的大多数作者，尽管可能对这一体系的作用分歧巨大，但直到相对较晚的时期，对这一体系的含义却并无异议。对亚当·斯密和施莫勒来说，对霍因斯、坎宁汉姆和安汶来说，重商主义的核心特征都是亚当·斯密所说的“重商主义体系计划用来使各个国家变得富裕的两架巨型机械……其最终目的是……某种贸易顺差”。这种“机械”是指两种孪生的法律，用来管制出口和进口，其目的在于通过使其免受外国竞争的方式，通过为其提供低价原材料同时减少对进口制品的依赖的方式，来兴建本国工业。通过进一步研究可以看出，贸易差额作为这一体系用来衡量所采取的管

① 关于这一术语起源以及后来的争论，参见查尔斯·威尔森（Charles Wilson）的《重商主义：一种思想的某些演变》，载《经济史评论》，第 2 辑，第 10 卷，第 2 期（1957 年），还可见 A. V. 尤西斯（Judges）：《重商主义国家的观念》（皇家历史学会会刊，1939 年）。

制效率的一种工具，并不是它的“终极目标”。没有什么疑问的是，平衡这个概念的形成得益于商业实践和复式簿记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使用，在这些方面，“平衡”同样起着控制的作用。这种论点认为，君主政权可以像一个好的商人一样记录其账目。托马斯·曼反复地把“一个国家的财富”比做“一个私人的财产”。然而提问者可能继续追问，“差额”所表示的是什么？【568】在早期的重商主义理论的表述中，特别是在曼的表述中，答案是非常简单的，它表示出国家通过贸易的所得或所失；而得失是以金银的形式来实现的。国家的货币和在某些地区（在这些地区要求以金银作为支付手段）继续进行贸易的能力依赖于这种得失，在这一世纪的下半叶，重商主义理论发生了某种重要的变化。贸易差额仍然作为所有事情所围绕的中枢，但是，它的职能以一种新的方式得到了阐释。蔡尔德是这样一些重商主义者中的一员，他们根据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把就业提高到成为像获取金银一样重要的政策目的。“贸易顺差”是正确的，因为它可以使大批人手（按蔡尔德的用语）得以就业；另外，更多情况下不断扩大的就业规模被认为比其他任何可能的（也是易出错的）计算贸易的方式更能够准确地显示出国家经济的健全状况。这种观点在晚期大陆重商主义者之中最为普遍。在西班牙学派的思想中，这种观点也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格诺维西和班迪尼这样的意大利作者那里，它也是支配性的主题。它尤其是从贝克尔直到松南费尔的官房主义者的指导原则。

这并非一种“因为这个错误所以那个也是错误的”情况。随着政治经济学教职的出现（特别是在意大利和德国），大批的刊物和机构致力于这种或那种经济论题的研究，重商主义学说因此得到传播。乌斯塔雷斯在1751年（在其出现于西班牙的准确日期之后的9年）被翻译成英语，两年之后——由弗波内斯——翻译成法文，并于1793年译成意大利文。乌洛阿的著作的法文译本出现于1753年，这时距其在西班牙出版已有13年。萨瓦雷的《辞典》1723~1730年在法国出版，1749年其英译本问世。约翰·考利的《论英国》（1695年）于1755年被译成法语，并在1764年（由格诺维斯）译成意大利语。这个意大利版本附有一个附录，其中包括曼的《英国通过外贸所获财富》的意大利文译本。贝洛尼的《论商业》（1750年）的英译本两年之后出现。那不勒斯政府下令把一本匿名的名为《论文》的论谷物贸易的书译成意大利文，该书1754年在伦敦出版，次年在柏林出版，它实际上是布阿吉尔贝尔（Boisguilbert）的追随者赫伯特（Herbert）的作品。德·拉·考特的《荷兰的利益》（1662年）在1672年出版了德文译本，

1702 年出版了英译本，并于 1709 年出版了法文译本。格诺维斯 1765 年的作品《*Lezioni*》的德文本 1776 年出现，西班牙文译本 1785 年出现。洛克的[569]《论文》在 1751 年出现了意大利文译本。这些事例说明，相似的重商主义思想在不同国家的重复出现，这并不是偶然的事。不论正确与否，重商主义者的处方对那些为本国经济寻求适用的经济学理论的统治者、执政者和经济学家来说，不仅是适宜的，而且是有吸引力的。

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从“货币”向“社会”目标的转变是由于重商主义思想从西欧沿海向东、南方向传播而造成的，这个问题是有待回答的。在这里，英国作者如蔡尔德（他显示出一种在工资和就业方面的社会良知并启迪了后来的人道主义者）与官房主义者之间似乎再次出现了侧重点上的差别。官房主义者对就业问题的关注是其对人口重视的一个主要方面，这相应地反映了他们自己——甚至其君主——对经济政策的战略方面的专注思考。这种差别本身表明了重商主义理论和政策在国家的繁荣和国家的强大这两个目标之间往来徘徊的方式。“在所有时代”，施莫勒写道：“历史习惯于把国家的强大和国家的财富视为孪生姐妹；但也许它们从来没有像那时那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①] 维纳（Viner）教授阐释并分析了财富和强盛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这种关系是所有重商主义的特征），他同样认为它们是国家政策的固有而可调和的目标，这两者的平衡方式因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同。在荷兰，政府的产生是来自于不同商业利益之间残余的与消极的摩擦，只有在危机时刻才服从于国家的指导，在共和国的委员会中，安全似乎是在繁荣之后居次席的。最重要的利益是那些在货栈从事贸易的商人的利益。他们关注的是货物以最大量自由进出。在国外，他们优先考虑的是克服垄断势力（比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反对，这种垄断是基于一种不利于贸易的海上和领土主权的要求。贸易差额的概念对荷兰来说是毫无意义的。正如格劳秀斯所阐发的，海上自由对他们而言更为重要。与之相伴的是“自由的船只，自由的货物”的信条，这一信条认可了荷兰人作为中立方在战争期间与交战双方自由贸易的权利，这种战争在荷兰人成就辉煌的那个世纪里往往是连绵不断的。荷兰人的地理位置及其经济增长的性质意味着他们所拥有的庞大而又非常脆弱的商船队处于危险之中，是拥有海军力量的竞争对手进行打击的不设防的目标。荷兰人在经济上得到的利益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在 1648 年的欧洲，他们面对着巨大的危险。那些年的战略格局的最令人惊异

① G. 施莫勒：《重商主义体系》（伦敦，1896 年），第 50 页。

的特点就是荷兰的海军将领如特罗普（Tromp）和鲁伊特（Ruyter）成功地打退了英国和法国的进攻并且对其敌人甚至施加了进攻性的战略。然而，这【570】种成功往往是由敌人的无能才得到的，或者说，是通过所筹划的战术作为一种干扰因素而侥幸取得的。总体而言，荷兰的富足是由于大量的个人的商业活动。国家干预少而又少。[①] 另一个极端是普鲁士，在那里，一切都依赖于国王和官员用以计划和实施政策的活力，这种政策的目的是在一个缺乏任何自发性的系统增长，而且是遭到破坏的、落后的国家里创立贸易和经济。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尽管自然条件与德国有很大不同，却同样需要对经济进行促动。尽管存在着一大批著作，但由于本文所论述到的原因，重商主义仍然只停留为一种理想，因为国家无法为私人创业的缺乏或经济发展的障碍找到补救之策。在这种自由与权威、放权和集权的极端之间，在荷兰经济的自然生长和德国经济的人为促成之间，是 18 世纪时候的两个彼此充满竞争的西欧国家经济：英国和法国。英国重商主义的特征是，它来自于商人和政府官员之间理论上和行政上的合作。大部分重商主义奠基之作都来自于曼和蔡尔德这类商人，并且带有其商业训练及利益方面的烙印。“……重商主义作者”，海克斯克写道：“绝大部分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贸易有牵连”[②]。他们对英国经济的形成有着根本性的贡献。阿什利（Ashley）先生曾经指出，在航海条例——甚至亚当·斯密也认为它是作为追求强大而非繁荣的手段——的演变中，其方案受到了大型贸易公司的要求的影响，特别是从事进口贸易公司的影响。[③] 尽管如此，最后的方案是由像圣·约翰（St John）这样的律师以及像肖（Shaw）和唐宁这样的政府官员制定的。商人们并没有得【571】到他们所要求的一切，其要求似乎为了不太直接相关的利益集团而被削减和调整，从而构成了一个范围更广的国家利益的概念。政府机构通常都对商人的利益加以密切关注。他们的诉状和反诉都得到聆听，他们的意见也得到征询。曼被邀请参加 1622 年的委员会，然而，决定政策的仍然是枢密院。林奈尔·格兰菲尔德（Lionel Granfield）在商业上获得了成功，其商业经验对

---

① 或许应该说，当时的英国观察者并非总是同意以上这种观点。乔治·唐宁爵士于 1663 年圣诞前夜在荷兰写道：“我发现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对其贸易增长付出的努力都比园丁为其草木的生长所付出的努力还要多。荷兰人自古以来就是荷兰人。然而只是在这五六十年里他们才拥有了贸易上的地位，这是由于政府确实青睐这种利益。而且在我所有居留此地的经历中，我的确明显地注意到，不是人民促动政府，而是执政者通过谨慎的指令和计划促动百姓从事各种贸易…”

当然应该记住，他正在试图戏说本国君主“促动百姓”，而且应该考虑到这其中渲染的成分。

② 《经济史评论》，第 2 辑，第 3 期（1950 年）。

③ M. P. 阿什利：《摄政时期的财政和商业政策》（1934 年），第 13 章。

詹姆士一世来说弥足珍贵，但他不是作为商人，而是作为枢密院成员、上院贵族和高级政府官员而影响政策的。1660 年创建的包括 62 个成员（大多数是商人）的庞大的贸易事务院，是一个并非正常的情况，它只能通过国王的试图为他对国家贸易拥有热情来作出证明的迫切心情来得到解释，这种热情和他对贸易事务的生疏相比在程度上毫不逊色。克莱林登（Clarenden）对这个事务院予以反对，而它的命运证明这种反对是明智的。6 年之后事务院就消失了，此后只有委员会中的海关部带有强烈的商人色彩，但它受制于财政部的特派员。一般来讲，商人并没能——作为商人——特别深入到政府核心中。然而，他们的影响和意见随着政策形成过程的不断继续而一直存在。在法国，商人群体同样被征询意见，然而，正如研究“柯尔贝尔主义”的历史学家所评论的，他们对政策的影响微弱得难以察觉。[1] 作为一个教条主义者和独裁主义者，柯尔贝尔认为商人们的看法不可避免地是自私自利和缺乏远见的，并对之不予考虑。贸易公司由政府经营，其方针根据国王及其顾问所认为的国家利益加以制定。英国和法国在形成政策的方式上的差异并不像人们有时想像得那么大，而且差异显然不是绝对的。然而程度上的差别还是重要的。商人的观点在英国得到了认真的考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王及其顾问们知道建议在最后成为法律形式之前，须提交国会审议，并由几十种地方的和直接相关的利益团体来回争执，这些团体都具有给政府制造麻烦的能力。亚当·斯密嘲弄地认为，重商主义体系是国王、贵族和乡绅与贸易商之间的合作的产物，前者不懂贸易和后者不懂国家政策，这种看法并非毫无根据，然而，就其所包含的真理的程度而言，它无非是一种陈词旧论，因为政府永远不能把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完全协调起来，而所有最初以【572】所知的事实为根据的法律和规定，迟早都会趋向于远离它们所由之产生的环境和利益。奢望重商主义政策可以免于僵化这一规律，或否认它因时代变迁而变得腐败而过时，都是愚蠢的看法。正如荷兰人所坚持主张的那样，对强大的王朝统治寄予信任永远是一件危险的事。然而，铺设在重商主义关于各种事务的规划下面的经济愿望并没有任何内在的不合理之处，尽管外国观察者［比如凯瑟林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认为英国的体制使高尚之事过于明显地屈从于贸易——“英国人”，她说道：“首先而且永远是商人”——有证据说明，经济和战略策略的要求，私人商人和国家利益的要求，都得到了相当成功地平衡。对后来时代的批评者来说，重商主义所造成

[1] C. W. 科尔（Cole）：《柯尔贝尔和法国重商主义的一个世纪》，第 2 卷，第 14 章。

的结果并非总是令人惬意的，这些批评者对重商主义者们的动机、逻辑、道德、手段和行为进行审查并发现了缺陷。重商主义政策隐藏着往往是卑鄙、贪婪而残忍的私人目的，这当然是真实的。最好情况下，它的目标是国家利益，而且民族整体的福利被当做是正当的理由并可以之来为这一民族之外的集体所遭受的不好对待进行辩护。于是这种逻辑导向了掠夺、暴力和战争，或是公开如此、或是以海盗和私掠的形式做掩护，后来时代的评论者所区分出来的思想和政策中的“经济的”因素，事实上是不可理解的，除非是将之作为“国家发展”的整个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重商主义（施莫勒写道）“在其最核心处，无非就是国家发展——并非狭义上的国家发展，而是同时作为国家发展和国民经济发展”[①]。采用后来时代的经济观点作为标准来评判重商主义思想，将会对其特性做出完全错误的理解。关于财富的专门的科学的概念在那时尚未出现，像“经济的”、“经济学”、“经济学家”这类词汇现在所具有的含义的出现不早于19世纪。在17世纪，这些词汇仅被用来指私人的家务管理的艺术，并由此而产生了后来的科学术语的含义，其方式恰如贸易差额的概念形成是借自于私人商业的记账活动。重商主义者尚未能够在其晚近的意义上把“经济学”一词做明显的哲学上的分离。同时他们的目的也比“经济学家”的目的更为直接和更为广泛。他们坚持生活在真实的世界之中，而非生活在想像的世界中，他们坚持在政治舞台上看待经济制度，因为这一舞台是他们本身所面对的。而且，他们的首要原则是考虑到那是一个充满暴力的时代。没有武力的支持而追求经济目的是不可能的事。“利润和武力”，蔡尔德写道，“应当被结合起来考虑”。蔡尔德仅仅是众多宣扬重商主义政策的根本的双重性质的人之一。【573】这说明了为什么强调实力的英国重商主义文献中有很多是私人商人的作品，他们知道在自己所生活的环境中，只有通过国家的帮助，才能使自己的利益得到保护和促进。他们继承了中世纪的具有政治、经济和社会目的的行为联合的习惯，并将其带入到大型公司和民族国家的时代。对他们而言，国家只不过是最大型的公司组织，是与其他事情一道为其利益而设计的。通过税收、并税、补助和类似事物，国家可以对与竞争对手的关系施加影响。国家的使节可以凭借礼物赢得突厥大公或沙皇的青睐并使其竞争对手受到歧视。到了韦奇伍德（Wedgwood）时代，大使服务的对象被认为应包括成为为本国涉外工业服务的商务旅居者。最重要的是，国家的军舰是用来保护商业的海上通道的，而且有

① 见其著作第50页。

时是用来摧毁竞争国家的海上贸易的。

对亚当·斯密来说，重商主义体系背后的思想是被引入歧途了的，它的目的是片面而不公正的，它的管理是腐败的，而它的存在本身即使不是绝对有害的，也是落后于时代的，然而，《国富论》的主张是根据 3 个相对成熟的重商主义国家的经济材料进行逻辑推理所得到的产物：这些国家是英国、法国和荷兰。这种主张对那些仍然与从农业经济向商业经济转变的早期阶段相关联的国家来说，并不具备同等的说服力，对这些国家而言，看不见的手似乎极少能够显示自己的存在。亚当·斯密对“在国内制造其成本比购买还要高的商品”的尝试的指责，同样不适用于那些作为初级生产者的国家，对这些国家来说（它们不仅包括旧世界的重商主义国家，也包括新世界的重商主义国家），选择从国外购买商品就意味着一个不确定的未来，这正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报告》中指出的那样。的确值得争论的是，把政策置于生产成本在某种程度上是固定而又可计算的这一假定之上，反映出了理论的根本上的静态性，这种理论是设计用来维持现状并阻止经济变化的。尽管有其所有的失败和荒谬，在重商主义思想中存在着一种动力因素。而重商主义者关于学习、发展和扩张的潜在能力的信念，也战胜了连续不断的失望。

按照后来时代的准则，重商主义者在理论上或许无感人之处，但是，其活力和信心却是巨大的。对于他们所采取的措施，人们并不像过去那样严厉地予以反对，而且最近的历史学家在审视《航海法》时得出这样的结论，【574】即如果把它与其所设计去实现的目的联系起来进行评判，那么这些法案就是成功的。[1] 这种对个别法律的分析是否行得通，对此是不会有普遍一致的意见的。然而，问题可以从更广的角度来看待。如果把 1750 年的欧洲在人口、资源、生活水平、国民收入等方面与 1600 年的欧洲进行比较，那么得与失都会被记录出来。在西班牙和匈牙利，人口减少了。战争及其后果导致了西欧纺织工业的危机和衰退，而且采取的某些政策，看起来更像是限制性而非扩张性的措施。然而，尽管有证据显示出发生了地区性和暂时性的缩减，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是一个扩张的时期，这是毫无疑问的。人口的增长尽管并不显著，却是稳定的。海外贸易，特别是殖民地贸易（比如法国和英国）的数量明显地增加了。然而，在这一时期，没有哪一种单个的现象，像历史

① L. A. 哈普尔（Harper）：《英国的航海法案》（纽约，1939 年），第 377 页。戴维斯（Davis）先生在其《英国航运业的兴起》（1962 年）中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学家们曾经用16世纪的价格革命或是用工业革命的发明来“解释”那些时期的经济增长一样，可以被用来“解释”这种扩张，可能的是，构成重商主义的核心而经典的时期的150年，是一个物价稳定或下跌的时期，而且没有什么显著的干扰强加在工业和贸易活动之上。事实上，这些似乎更多地表明了运行中的生产和交换部门的数量的增加，而不是意味着产生了任何新的社会—经济体制。商品的生产和交换的方式经历了某些变化，但是，数量上的增加更多的是由于现有方式从一地向另一地的传播，而不是由于彻底的革新。企业似乎表现出了遍及某一地理区域的模仿、调整、重复，而且表现出其所从事的商品范围，因探险开发而得以扩大和多样化。在所有这些的背后，是人们对物质利益开展有组织的追求。而且正是因为这一点，与因缺乏生气而停滞不前的亚洲相比，西方世界取得的更为迅速的物质进步才是可以理解的，而对这一观点不予考虑则是轻率的。关于重商主义者，最重要的事情或许就是，他们相信物质方面的改变是可能的和必要的，并且他们还借助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对人的力量的组织化和集中化来支持其信念。【575】

参考书目

编者注

为了与本剑桥史学丛书已确定的体例保持一致，下面所列的参考书目是选择性的，并不包含全部文献。它们的目的并不是把与这一主题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所有出版物都编入这一目录中，而是为了使读者能够更详细、更深入地研究其中的一些问题。通常被后出的出版物所取代的书籍和论文并不包括在内，而且与个别章节所论述的主题有间接关系的一般论文也被减至最少。由于大多数章节都不是最新的研究成果，而是对第二手文献中所包含的知识进行总结和解释，原始文献的出处或者完全被省略了或者被包含在主要的和最需要的经典文献中。

在这些总原则的限制下，各个作者被赋予遂其所愿地编写和安排参考书目的自由。因此参考书目的编排章章不同。编者甚至没有找到学术期刊名称缩写的理想的统一方式，因为同样一些学术期刊在一些参考文献中比在其他地方更多被引用。至于其缩写方式，作者们要自己拿主意，如果有必要，可以在他们参考书目前面的注释中加以说明。同时，前面的注释也可以解释单独列出权威典籍的其他一些独特之处。【577】

第一章　从黑死病到重大革命前夕的欧洲人口

1. 一般的书籍

BERGUES, HÉLÈNE [*et al.*]. *La prévention des naissances dans la famille* (Institut Nationale d'Études Démographiques: Travaux et Documents, Cahier no. 35.) Paris, 1960.

BOWEN, IAN. *Population*. London, 1954.

CARR-SAUNDERS, A. M. *The Population Problem: A Study in Human Evolution*. Oxford, 1922.

——*World Population: Past Growth and Present Trends*. New York, 1936.

COLNAT, ALBERT. *Les épidémies et l'histoire*. Paris, 1937.

DASZYNSKA, ZOFLA. 'Stoff und Methode der historischen Bevölkerungsstatistik.'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LXVI, 1896.

DIEPGEN, PAUL. *Geschichte der Medizin*, I–III, Berlin, 1949–55.

DREW, JOHN. *Man, Microbe and Malady*. Harmondsworth, 1950.

DRIGALSKI, WILHELM, *Männer gegen Mikroben: Pest, Cholera, Malaria und ihre Verwandten in Ge-

schichte und Leben. Berlin, 1951.

DYMOND, J. R. 'Fluctuations in Animal Populations.'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Canada*, XLI, sec. v. 1947.

ELTON, CHARLES. *Voles, Mice and Lemmings.* Oxford, 1942. Part I: *Voles and Mouse Plagues.*

GONNARD, RENÉ. *Histoire des doctrines de la population.* Paris, 1923.

GREENWOOD, MAJOR. *Epidemics and Crowd Diseas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Epidemiology.* London, 1935.

GYÖRY, TIBERIUS VON. *Morbus hungaricus.* Jena, 1901.

HAESER, HEINRICH. *Lehrbuch der Geschichte der Medizin und der epidemischen Krankheiten.* Vol. III: *Geschichte der epidemischen Krankheiten* (3rd ed.). Jena, 1882.

HENRIPIN, JACQUES. *La population canadienne au début du XVIIIe siècle* (Institut National d'Études Démographiques: Travaux et Documents, Cahier no. 22). Paris, 1954.

HIMES, NORMAN E. *Medical History of Contraception.* Baltimore, 1936.

HIRSCH, AUGUST. *Handbook of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Pathology.* 3 vols. (Transl. by Charles Creighton.) London, 1883, 1885, 1886.

HIRST. L. FABIAN. *The Conquest of Plague: A Study of the Evolution of Epidemiology.* Oxford, 1953.

KEYSER, ERICH. 'Neue deutsche Forsch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est.'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XLIV, 1957.

KING, LESTER S. *The Medical Worl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hicage. 1958.

LANDRY, ADOLPHE, *Traité de démographie* (2nd ed.). Paris, 1949.

LORIMER, FRANK [*et al.*]. *Culture and Human Fertility.* Unesco. 1954.

MACKENROTH, GERHARD. *Bevölkerungslehre.* Berlin, Göttingen, Heidelberg, 1953.

MALTHUS, THOMAS ROBERT,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Ist ed., 1798. (reprinted by the Royal Economic Society. London, 1926.) 7th ed., 1872 (reprinted in Everyman's Library, London, 1933).

MOMBERT, PAUL. *Bevölkerungslehre.* (Grundrisse zun Studium der Nationalökonomie, XV). Jena, 1929.

PEARL, RAYMOND, *The Natural History of Population.* Oxford, 1939.

PEIGNOT, GABRIEL. *Essai chronologique sur les hivers les plus rigoureux, depuis 396 ans avant Jésus-Christ jusqu'en 1820 inclusivement.* Dijon, 1821.

PENTLAND. H. C. 'Feudal Europe an Economy of Labour Scarcity'. *Culture* (Quebec), XXI, 1960.

PRINZING, FRIEDRICH. *Epidemics Resulting from Wars.* Oxford, 1916.

REINHARD, MARCEL R. *Histoire de la population mondiale de 1700 à 1948.* Paris, no date (1949).

RIQUET, R. P. 'Christianisme et population.' *Population*, IV, 1949. 【579】

RUSSELL, JOSIAH COX. 'Demographic Pattern in History.' *Population Studies*, I, 1948.

SAUVY, ALFRED.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Domination and the Numbers of Men.' *Diogenes: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Humanistic Studies*, no. 3, 1953.

——*Richesse et Population.* Paris, 1943.

——*Théorie générale de la population.* I, *Économie et population.* Paris, 1952.

SHORT, THOMAS.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the Increase and Decrease of Mankind in England and Several Countries Abroad.* London. 1767.

STERN, BERNHARD JOSEPH. *Society and Medical Progress.* Princeton, 1941.

STICKER, GEORG. *Abhandlungen aus der Seuchengeschichte und Seuchenlehre.* Vol. I/I: *Die Geschichte der Pest.* Giessen, 1908.

THOMPSON, WARREN S. *Population Problems* (4th ed.). New York, Toronto, London, 1953.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The 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 of Population Trends* (Population Studies, No. 17). New York, 1953.

WALFORD, CORNELIUS. *The Famines of the World: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1879.

WESTERGAARD, HARALD L. *Die Lehre von der Mortalität und Morbilität* (2nd ed.). Jena, 1901.

WINSLOW, CHARLES-EDWARD AMORY. *The Conquest of Epidemic Disease: 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Princeton, 1943.

ZINSSER, HANS. *Rats, Lice and History.* New York, 1935.

2. 欧洲

ABEL, WILHELM. *Agrarkrisen und Agrarkonjunktur in Mitteleuropa vom 13. bis zum 19. Jahrhundert.* Berlin, 1935.

——'Wachstumschwankungen mitteleuropäischer Völker seit dem Mittelalter.'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CXLII, 1935.

——*Dis Wüstungen des ausgehenden Mittelalters* (2nd ed.). Stuttgart, 1955.

——'Wüstungen und Preisfall im spätmittelalterlichen Europa.'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CLXV, 1953.

ARIÈS, PHILIPPE. 'Attiudes devant la vie et devant la mort du XVIIe au XIXe siècle'. *Population.* IV, 1949.

——*See also* VENARD, ANDRÉ.

BAEHREL, RENÉ 'La mortalité sous l'Ancien Régime.'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XII, 1957.

BELOCH, KARL JULIUS. 'Antike und moderne Grosstädte.' *Zeitschrift für Socialwissenschaft*, I, 1898.

——'Die Bevölkerung Europas im Mittelalter.' *Zeitschrift für Socialwissenschaft*, III, 1900.

——'Die Bevölkerung Europas zur Zeit der Renaissance.' *Zeitschrift für Socialwissenschaft*, III, 1900.

——'Die Entwicklung der Grosstädte in Europa.' *Huitièm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Hygiène et de Démographie, Budapest, 1.–9. Sept., 1894. Comptes-Rendues et Mémoires* (ed. Sigismond de Gerlóczy), VII, Budapest, 1896.

BEVERIDGE, SIR WILLIAM H. 'Weather and Harvest Cycles.' *Economic Journal*, XXXI, 1921.

BRAUDEL, FERNAND.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che de Philippe II.* Paris, 1949.

BRITTON, C. E. *A. Meteorological Chronology to A. D. 1450* (Geophysical Memoirs No. 70). London, 1937.

CARPENTIER, ÉLISABETH. 'La peste noire: Famines et épidémies au XIVe siècle.'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XVII, 1962.

CIPOLLA, CARLO, DHONDT, JEAN, POSTAN, M. M., and WOLFF, PHILIPPE. 'Rapport Collectif.' *IX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Paris, 28 août–3 septembre 1950.* Rapports I, Paris, 1950.

COULTON, GEORGE GORDON. *The Black Death.* London, 1929.

CURSCHMANN, FRITZ. *Hungersnöte im Mittelalter.* Leipzig, 1900.

DHONDT, Jean. *See* CIPOLLA, CARLO.

DIETERICI, K. F. W. 'Über die Vermehrung der Bevölkerung in Europa seit dem Ende oder der Mitte des siebenzehnten Jahrhunderts.' *Philologische und historische Abhandlungen der* [580] *König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aus dem Jahr 1850.* Berlin, 1852.

FOURASTIÉ, JEAN. 'De la vie traditionelle à la vie "tertiaire".' *Population.* XIV, 1959.

GANSHOF, F.-L. *Étude sur le développement des villes entre Loire et Rhin au Moyen Age.* Paris and Brussels, 1943.

GRAUS, FRANITŠEK. 'Autour de la peste au XIVe siècle.' *Annales: Économic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XVIII. 1963.

HÄPKE, RUDOLF. *See* INAMA-STERNEGG, KARL THEODOR VON.

HAZNAL, z. 'European Marriage Patterns in Perspective.' *Population in History.* Ed. D. V. Glass and D. E. C. Eversley. London, 1965.

HECKER, J. F. C. *The Epidemics of the Middle Ages.* Transl. by B. G. Babington. London, 1844.

HELLEINER, KARL F. 'Europas Bevölkerung und Wirtschaft im späteren Mittelalter.' *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sforschung*, LXII, 1954.

——'New Light on the History of Urban Popula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VIII, 1958.

——'Population Movement and Agrarian Depression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XV. 1949.

——'The Vital Revolution Reconsidered.'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XXIII, 1957.

HOBSBAWM, E, J. 'The General Crisis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in the 17th Century.' *Past and Present*, nos, 5 and 6, 1954.

HOPKINS, SHEILA V. *See* PHELPS BROWN, E. H.

INAMA-STERNEGG, KARL THEODOR VON, and HÄPKE, RUDOLF. 'Die Bevölkerung des Mittelalters und der neueren Zeit bis Ende des 18. Jahrhunderts in Europa': Article 'Bevölkerungswesen'.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4th ed.). II. Jena, 1924.

KAWAN, LEONE. *Gli esodi e le carestie in Europa attraverso il tempo* (R. Ac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 Pubblicazioni della Commissione Italiana per lo Studio delle grandi Calamità, III). Rome, 1932.

KRAUSE, JOHN, T. 'Some Implications of Recent Work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I. 1959.

LADURIE, EMMANUEL LE ROY, 'Histoire et climat.'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XIV, 1959.

LANGER, WILLIAM L. 'Europe's Initial Population Explosio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XIX, 1963.

LEVY, CLAUDE. 'Quelques exemples de "birth control" aux XVIe,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Le Concours Medical.* LXXIX, 1957.

LOPEZ, R. S. and MISKIMIN, H. A. 'The Economic Depression of the Renaissance.'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V, 1962.

LUCAS, HENRY S. 'The Great European Famine of 1315, 1316. and 1317.' *Speculum*, V, 1930.

LÜTGE, FRIEDRICH. 'Das 14./15. Jahrhundert in de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CLXII, 1950.

MISKIMIN, H. A. *See* LOPEZ, R. S.

MOLS, ROGER, *Introduction à la démographie historique des villes d'Europe du XIVe au XVIIIe siècle* (Université de Louvain: Recueil de Travaux d'Histoire et de Philologie, 4th ser., fasc, 1-3). Vols, I-III, Louvain, 1954-6.

MOMBERT, PAUL. 'Die Anschauungen des 17. und 18. Jahrhunderts über die Abnahme der Bevölkerung.'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CXXXV. 1931.

MOUSNIER, ROLAND. 'La démographie européene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Problèmes de Population: Conférences de la Quinzaine Universitaire Européenne, 7-19 mai 1951.* Strasbourg, 1951.

OLBRICHT, KONRAD. 'Die Vergrosstädterung des Abendlandes zu Beginn des Dreissigjährigen Krieges.' *Petermanns Geographische Mitteilungen*, LXXXV, 1939.

PELLER, SIGISMUND. 'Mortality, Past and Future.' *Population Studies*, I, 1948.

——'Studies on Mortality since the Renaissance.'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XIII, 1943; XVI, 1944; XXI, 1947.

PERROY, ÉDOUARD. 'À l'origine d'une économie contractée: Les crises du XIVe siècle.'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IV, 1949. [581]

PHELPS BROWN, E. H. and HOPKINS, SHEILA. V. 'Builders' Wage-rates, Prices and Population: Some Further Evidence.' *Economica*, new series, XXVI, 1959.

——'Wage-rates and Prices: Evidence for Population Pressur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Economica*, new ser., XXIV, 1957.

POSTAN, M. M. 'Revis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The Fif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X, 1939.

——'Not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I, 1959.

——'Some Economic Evidence of Declining Population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II. 1950.

——'Die wirtschaftlichen Grundlagen der mittelalterlichen Gesellschaft.'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CLXVI, 1954.

——*See also* CIPOLLA, CARLO.

RENOUARD. YVES, 'Conséquences et intérêt démographiques de la Peste noire de 1348.' *Popula-*

tion, III, 1948.

Robinson. W. C. 'Money,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Change in Late Medieval Europ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I, 1959.

Röric, Fritz. 'Die europäische Stadt.' *Propyläen-Weltgeschichte*, IV, 1932.

Russell, Josiah, Cox, *Late Ancient and Medieval Population*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new ser., XLVIII, part, 3). Philadelphia, 1958.

—— 'Late Mediaeval Population Patterns.' *Speculum*, XX, 1945.

Salaman, R. N. *History and Social Influence of the Potato.* Cambridge, 1949.

Stangeland, Charles EMIL. *Pre-Malthusian Doctrines of Population;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eory* (Columbia University Studies in History,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Law, XXI, part 3), New York, 1904.

Utterström, Gustaf. 'Climatic Fluctuations and Population Problems in Early Modern History.'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II, 1955.

Venard, André and Ariès, Philippe, 'Deux contributions à l' histoire des pratiques contraceptives.' *Population*, IX, 1954.

Weber. Wilhelm and Mayer-Maly, Theo. 'Studie zur spätmittelalterlichen Arberitmarktund Wirtschaftsordnung'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CLXVI, 1954.

Weikinn, Curt, *Quellentexte zur Witterungsgeschichte Europas von der Zeitwende bis zum Jahre 1850* (Quellensammlung zur Hydrographie und Meteorologie, I). Vols. 11-14. Berlin, 1958-63.

Wolff, Philippe, *See* Cipolla, Carlo.

3. 大不列颠群岛

Atsatt, Marjory. *Population Estimates for England and Wales from the Elev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ies.* Mimeogr, American Documentation Institute, Washington, D. C., No. 1459 [1940].

Aydelotie, Frank, *Elizabethan Rogues and Vagabonds* (Oxford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Studies, I), Oxford, 1913.

Bean, J. M. W. 'Plague,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Decline in England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V, 1963.

Bell, Walter George. *The Great Plague in London in 1665.* London, 1924.

Beresford, Maurice, *The Lost Villages of England.* London, 1954.

Beveridge, Sir William H. *Prices and Wages in England from the Twelf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Vol. I. London, 1939.

Brett-James, Norman G. *The Growth of Stuart London.* London. 1935.

Brown, R. G. *See* McKeown, Thomas.

Brownlee, John. 'The Health of Lond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XVIII (Epidemiology), 1925.

—— 'The History of the Birth and Death Rates in England and Wales Taken as a Whole, from 1570 to the Present Time.' *Pulbic Health*, XXIX, 1916.

Buckatzsch, E. J. 'The Constancy of Local Populations and Migration in England before 1800.' *Population Studies*, V, 1951.

[582]

Buer, Mabel, C. *Health, Wealth, and Population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1926.

—— 'The Historical Setting of the Malthusian Controversy.' *London Essays in Economics: In Honour of Edwin Cannan.* London, 1927.

Chambers, J. D. *The Vale of Trent 1670-180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upplements, III.) London, New York [1957].

Coleman, D. C. 'Labour in the English Economy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VIII, 1956.

A Collection of the Yearly Bills of Mortality from 1657 to 1758 Inclusive. London, 1759.

CONNELL, K. H. 'Land and Population in Irelan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II, 1950.
——*The Population of Ireland, 1750–1845.* Oxford, 1950.
CREIGHTON, CHARLES, *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Britain.* 2 vols. Cambridge, 1891. 1984.
DARIVAS, BASIL. 'Étude sur la crise économique de 1593–1597 en Angleterre et la Loi des Pauvres.'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XXX, 1952.
DRAKE, MICHAEL. 'An Elementary Exercise in Parish Register Demograph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V, 1962.
——'Marriage and Population Growth in Ireland, 1750–1845.'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VI, 1963.
DRUMMOND, J. C. and WILBRAHAM, ANNE. *The Englishman's Food: A History of Five Centuries of English Diet.* London, 1939.
EVERSLEY, D. E. C. 'A Survey of Population in an Area of Worcestershire from1660–1850 on the Basis of Parish Records.' *Population Studies*, X, 1956–7.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England before the "Take-off".'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Stockholm, 1960: Contributions [and] Communications.* Paris, 1960.
GEORGE, M. DOROTHY. *London Life in the XVIIIth Century.* London, 1930.
GLASS, DAVID, V. 'Gregory King's Estimate of the Population of England and Wales, 1695.' *Population Studies*, III, 1949–50.
——'The Population Controversy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Part I: The Background.' *Population Studies.* VI, 1952.
GONNER, E. C. K. 'The Population of Englan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LXXVI, 1913.
GRAS, N. S. B. *The Evolution of the English Corn Market*(Harvard Economic Studies, XIII,) Cambridge, Mass., 1915.
GRAUNT, JOHN. *Natural and Political Observations made upon the Bills of Mortality.* Ed. Walter F. Wilcox, Baltimore, 1939.
GREENWOOD, MAJOR, *Medical Statistics from Graunt to Farr.* Cambridge. 1948.
GRIFFITH, G. TALBOT. *Population Problems of the Age of Malthus.* Cambridge, 1926.
——'Rickman's Second Series of Eighteenth-Century Population Figures.'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XCII, 1929.
HABAKKUK, H. J. 'English Popula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VI, 1953.
HOLLINGSWORTH, T. H. 'A Demographic Study of the British Ducal Families.' *Population Studies.* XI, 1957.
——*The Demography of the English Peerage* (Supplement to *Population Studies*, XVIII 2). London, 1964.
JONES, P. E. and JUDGES, A. V. 'London Population in the Late Seven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I, 1935.
JUDGES, A. V. *See* JONES. P. E.
KNORR, KLAUS E. *British Colonial Theories.* Toronto, 1944.
KRAUSE, J. T. 'Changes in English Fertility and Mortality, 1781–185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 1958.
——'The Medieval Houschold: Large or Small?'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IX, 1957.
——'Some Neglected Factors in the Engl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IX, 1959. [583]
KUCZYNSKI, R. R. 'British Demographers' Opinions on Fertillty, 1660 to 1760.' *Political Arithmetic: A Symposium on Population Studies.* Ed. Lancelot Hogben. London, 1938.
LEVETT, A. ELIZABETH. *The Black Death on the Estates of the See of Winchester*(Oxford Studies in Social and Legal History, V), Oxford, 1916.
LONGDON, J. 'Statistical Notes on Winchester Heriot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 1959.

McKeown, Thomas and Brown, R. G. 'Medical Evidence Related to English Population Chang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opulation Studies.* IX, 1955.

Marshall, T. H. 'The Population Problem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conomic History: A Supplement of the Economic Journal* I/4, 1929.

Morrell, C. Conyers. 'Tudor Marriages and Infantile Mortality.' *Journal of State Medicine.* XLIII, 1935.

Mullett, Charles F. *The Bubonic Plague and England.* Lexington, 1956.

Ogle, William. 'An Inquiry into the Trustworthiness of the Old Bills of Mortality.'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LV, 1892.

Pickard, Ransom. *The Population and Epidemics of Exeter in pre-Census Times.* Exeter, 1947.

Postan, M. M. and Titow. J. 'Heriots and Prices on Winchester Manor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 1959.

Rich, E. E. 'The Population of Elizabethan Englan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II, 1950.

Rickman, J. 'Estimated Population of England and Wales.' *Great Britain: Population Enumeration Abstract*, XXII, 1843.

Rogers, James, E. Thorold. *A. History of Agriculture and Prices in England.* Vols, I–VII, Oxford, 1866–1902.

——*Six Centuries of Work and Wages*, 10th ed. London, 1909.

Royal Commission on Population. Report Presented to Parliament... June 1949. Cmd. *7695*. London, 1949.

Russell, Josiah. Cox. *British Medieval Population.* Albuquerque, 1948.

Saltmarsh, John. 'Plague and Economic Decline in England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 VII, 1941.

Schreiner, Johan. 'Wages and Prices in England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I/2, 1954.

Short, Thomas. *New Observations, Natural, Moral, Civil, Political, and Medical. on City, Town, and Country Bills of Mortality.* London, 1750.

Titow, J. *See* Postan, M. M.

Tucker, G. S. L. 'English Pre-Industrial Population Trend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VI, 1963.

Usher, Abbott Payson. 'Prices of Wheat and Commodity Price Indexes for England, 1259–1930.' *Review of Economic Statistics.* XIII, 1931.

Wilbraham, Anne. *See* Drummond. J. C.

Williams. David. 'A Note on the Population of Wales.' *Bulletin of the Board of Celtic Studies.* VIII/4, 1937.

Wilson, Frank Percy. *The Plague in Shakespeare's London.* Oxford, 1927.

4. 法国

Ariès, Philippe. *Histoire des populations françaises et de leurs attiudes devant la vie depuis le XVIIIe siècle.* Paris, 1948.

——'Sur les origines de la contraception en France.' *Population.* VIII, 1953.

Baulant, Micheline and Meuvret, Jean, *Prix des céréales extraits de la mercuriale de Paris (1520–1698)*. 2 vols, Paris, 1960. 1962.

Blacker, J. G. C. 'Social Ambitions of the Bourgeoisie in 18th Century France, and their Relation to Family Limitation.' *Population Studies.* XI, 1957.

Bloch, Marc, *Les caractères originaux de l'histoire rurale française.* Oslo, 1931.

Boislisle, Arthur M. de. *Le Grand Hiver et la disette de 1709.* Paris, 1903.

Bon, Henri, *Essai historique sur les épidémies en Bourgogne.* Dijon, no date.

Bondois, Paul-M. 'La misère sous Louis XIV. La disette de 1662.'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XII, 1924.

BOUCHARD, GEORGES. ' Dijon au XVIIIe siècle : Les dénombrements d' habitants. ' *Annales de Bourgogne*, XXV, 1953.

BOUDET, MARCELLIN and GRAND, ROGER. *Étude historique sur les épidémies de peste en Haute-Auvergne.* Paris, 1902.

BOURGEOIS-PICHAT, JEAN. ' Évolution générale de 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depuis le XVIIIe siècle. , *Population*, VI, 1951.

BOUTRUCHE, R. *La crise d' une société. Seigneurs et paysans du Bordelais pendant la Guerre de Cent Ans* (Publications de la Faculté des Lettres de l' Université de Strasbourg, fasc. 110). Paris, 1947.

BRIDGE, JOHN. S. C. *A History of France from the Death of Louis XI.* IV: *France in 1515.* Oxford, 1936.

CANARD, J. ' Les mouvements de population à Saint-Romains d' Urfé de 1612 à 1946. ' *Bulletin de la Diana*, XXIX/4, 1945.

CHATELAIN, ABEL. ' Notes sur la population d' un village bugiste, Belmont, XVIIIe–XIXe siècles. ' *Revue de Géographie de Lyon*, XXVIII, 1953.

CLÉMENT, L. *Essai d' hisoire locale: Routot des origines à la Révolution.* Fécamp, 1950.

DAINVILIE, FRANÇOIS DE. ' Un dénombrement inédit au XVIIIe siècle: L' enquête du Contrôleur générale Orry–1745. ' *Population*, VII, 1952.

DELATOUCHE, R. ' Agriculture médiévale et population. ' *Les Études Sociales*, II 1955.

DES CILLEULS, ALFRED. *La population de la France avant 1789.* Paris, 1885.

DOLLINGER, PH. ' Le chiffre de population de Paris au XIVe siècle. ' *Revue historique*, CCXVI, 1956.

DUBLED, HENRI. ' Conséquences économiques et sociales des "mortalités" du XIVe siècle, essentiellement en Alsace. ' *Revue d'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XXXVII, 1959.

DURANTY, MARQUIS DE. *See* GAFFAREL, PAUL.

FAGE, ANITA. ' Les doctrines de population des Encyclopédistes. ' *Population*, VI, 1951.

——' Économie et population: les doctrines françaises avant 1800. ' *Population*, IX, 1954.

FEILLET, ALPHONSE. *La misère au temps de la Fronde et Saint Vincent de Paul.* 5th ed. Paris, 1886.

FOURQUIN, GUY. ' La population de la région parisienne aux environs de 1329. ' *Le Moyen Age*, LXII, 1956.

GAFFAREL, PAUL and DURANTY, MARQUIS DE. *La peste de 1720 à Marseille et en France.* Paris, 1911.

GAUTIER, ÉTIENNE and HENRY, LOUIS, *La population de Crulai, paroisse normande.* Paris, 1958.

GOUBERT. PIERRE, *Beauvais et le Bauvaisis de 1600 à 1730* 2 vols. Paris, 1960.

——' En Beauvaisis. Problèmes démographiques de XVIIe siècle. '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VII, 1952.

——' Une richesse historique en cours d' exploitation: Les registres paroissiaux. '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IX, 1954.

GRAND, ROGER, *See* BOUDET, MARCELLIN.

GRAS, P. ' Le registre paroissial de Givry(1334–57) et la Peste noire en Bourgogne. ' *Bibliothèque de l' École des Chartes*, c, 1939.

GREER, DONALD, *The Incidence of the Emigration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Harvard Historical Monographs. XXIV). Cambridge. Mass. , 1951.

HADSEL, L. ' Huguenot Immigration to England after the Revocation of the Edict of Nantes. ' *Transactions of the Huguenot Society of South Carolina*, XLVI, No. 46. 1941.

HAUSER, HENRI, *Recherches et Documents sur l' Histoire des Prix en France de 1500 à 1800.* Paris, 1936.

HENRY, LOUIS, ' Une richesse démographique en friche: Les registres paroissiaux. ' *Population.* VII, 1953.

——*See also* GAUTIER, ÉTIENNE.

HIGOUNET, CHARLES. ' Mouvements de population dans le midi de la France du XIe au XVe siècle. '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lisations*, VIII, 1953.

LABROUSSE, H. ' Le prix du blé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 *Revue d'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XIX, 1931.

LARENAUDIE, MARIE-JOSÈPHE. 'Les famines en Languedoc aux XIVe et XVe siècles.' *Annales du Midi*, LXIV, 1952.
[585]
LATOUCHE, R. 'Le prix du blé à Grenoble du XVe au XVIII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XX, 1932.

LEVASSEUR, E. *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3 vols. Paris, 1889, 1891, 1892.

LOT, FERDINAND. 'L'état des paroisses et des feux de 1328.' *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Chartes*, XC, 1929.

——'Recherches sur la population et la superficie des cités remontant à la période galloromaine.' *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et philologiques*, fasc. 287. 296, 301. Paris, 1945, 1950, 1953.

MARION, MARCEL. 'Une famine en Guyenne, 1747-48.' *Revue historique*, XLVI, 1891.

McCLOY, SHELBY T. *Government Assistance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Durham, N. C., 1946.

MEUVRET, JEAN. 'Les crises de subsistances et la démographie de la France d'Ancien Régime.' *Population*, I, 1946.

——*See also* BAULANT, MICHELINE.

MOHEAU (pseud. for Baron de Montyon). *Recherches et considérations sur la population de la France 1778.* Ed. René Gonnard. Paris, 1912.

MOURS, S. 'Essai d'évaluation de la population protestante française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Bulletin protestant français*, CIV, 1958.

MOUSNIER, ROLAND. 'Études sur la population de la France au XVIIe siècle.' *XVIIe Siècl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Étude du XVIIe Siècle*, II/I6, 1952.

PERROY, EDOUARD. 'La crise économique de XIVe siècle d'après les terriers Foréziens.' *Bulletin de la Diana*, XXIX, 1945.

PRAT, GENEVIÈVE. 'Albi et la Peste noire.' *Annales du Midi*, LXIV, 1952.

REINHARD, MARCEL. '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au XVIIe siècle.' *Population*, XIII, 1958.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e problème de la population.' *Population*, I, 1946.

RIGAULT, JEAN. 'La population de Metz au XVIIe siècle: Quelques problèmes de démographie.' *Annales de l'Est*, 5th ser., 2nd year, 1951.

ROUPNEL, GASTON. *La ville et la campagne au XVIIe siècle: Étude sur les populations du Pays dijonnais.* Paris, 1955.

SAMSON, RENÉ. *Un village de l'Oise au XVIIe siècle* (Bibliothèque de Travail, no. 187-188). Cannes, 1952.

SAUVY, ALFRED. 'Some Lesser Known French Demographer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opulation Studies*, V, 1951.

SCHÖNE, LUCIEN. *Histoire de 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Paris, 1893.

SCOVILLE, WARREN C. 'The Huguenots and the Diffusion of Technolog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LX, 1952.

SÉE, HENRI. 'The Intendants' *Mémoires* of 1698 and their Value for Economic Histo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 1928.

——'Peut-on évaluer la population de l'ancienne France?' *Revue d'Économie Politique*, XXXVIII, 1924.

SPENGLER, JOSEPHJ. *Économie et population. Les doctrines françaises avant 1800.* Paris, 1954.

——*France Faces Depopulation.* Durham, N. C., 1938.

——*French Predecessors of Malthus: a Study in Eighteenth-Century Wage and Population Theory.* Durham, N. C., 1942.

USHER, ABBOTT PAYSON. 'The General Course of Wheat Prices in France, 1350-1788.' *Review of Economic Statistics*, XII, 1930.

——*The History of the Grain Trade in France, 1400-1710* (Harvard Economic Studies, IX). Cambridge, Mass., 1913.

VINCENT, FRANÇOIS. *Histoire des famines à Paris* Paris, 1946.

VICENT, PAUL E. 'French Demograph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opulation Studies*, I, 1947.

WOLFF, PHILIPPE. *Commerces et marchands de Toulouse (vers 1350-vers 1450).* Paris, 1954.

5. 低地诸国

ARNOULD, MAURICE-A. 'Ath et Avesnes en 1594. État démographique de deux villes hennuyères à la fin du XVIe siècle.' *Annales du Cercle Royal Archéologique d'Ath*, XXVII, 1941. [586]

——'Aux sources de notre démographie historique: Les registres paroissiaux en Belgique.' *Bulletin de Statistique*, XXXIV, 1948.

——*Les dénombrements de foyers dans le comté de Hainaut (XIVe–XVIe siècle)*. Brussels, 1956.

BLOCKMANS, FRANS. 'De bevolkingscijfers te Antwerpen in de XVIIIde eeuw.' *Antwerpen in de XVIIde Eeuw*. Antwerp, 1952.

BONENFANT, PAUL. *Le problème du paupérisme en Belgique à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Académie royale de Belgique, Classe des lettres et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 Mémoirs, 2nd ser., XXXV, 1934.)

BOUMANS, R. 'De demografische evolutie van Antwerpen (XVe–XVIIIe eeuw).' *Statistisch Bulletin*, XXXIV, 1948.

——'Le dépeuplement d'Anvers dans le dernier quart du XVIe siècle.' *Revue du Nord*, XXI, 1947.

COSEMANS, ALEXANDER. *De bevolking van Brabant in de XVIIe en XVIIIe eeuw*. Brussels, 1939.

CUVELIER, JOSEPH. *Les Dénombrements de Foyers en Brabant (XIVe–XVIe siècle)*. Brussels, 1912.

——'Les fouages dans le Quartier de Bois-le-Duc au XVe siècle.' *Bulletin de la Commission Royale d'Histoire*, LXXXII, 1913.

——'La population de Louvain aux XVIe et XVIIe siècles.' *Annales de la Société d'Archéologie de Bruxelles*, XXII, 1908.

DALLE, D. 'De Volkstellingen te Veurne en in Veurne-Ambacht op het einde van de zeventiende eeuw.' *Bulletin de la Commission Royale d'Histoire*, CXX, 1955.

DE BROUWERE, J. 'Les dénombrements de la Châtellenie d'Audenarde (1469–1801).' *Bulletin de la Commission Royale d'Histoire*, CIII, 1938.

DEMEY, J. 'Proeve tot raming van de bevolking en de weefgetouwen to Ieper van de XIIIe tot de XVIIe eeuw.' *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XXVIII, 1950.

Les Dénombrements de Foyers en Brabant. See CUVELIER, J.

Dénombrements des Feux des Duché de Luxembourg et Comté de Chiny, ed. Jacques Grob. Vol. I, Brussels, 1921.

DE SMET, JOSEPH. 'Le dénombrement des foyers en Flandre en 1469.' *Bulletin de la Commission Royale d'Histoire* XCIX, 1935.

——'Les dénombrements de la population dans la Châtellenie d'Ypres (1610 et 1615 à 1620).' *Bulletin de la Commission Royale d'Histoire*, XCVI, 1932.

DE VOOYS, A. C. 'De Bevolkingsspreiding op het Hollandse Platteland in 1622 en 1795.' *Tijdschrift van het Koninklijk Nederlandsch Aardrijkskundig Genootschap*, LXX, 1953.

Documents pour Servir à l'Étude des Maladies Pestilentielles dans le Marquisat d'Anvers Jusqu' à la Chute de l'Ancien Régime. Ed. A.-F.-C. Van Schevensteen. 2 vols. Brussels, 1931–2

DONY, ÉMILE. 'Le dénombrement des habitants de la Principauté de Chimay en 1616.' *Bulletin de la Commission Royale d'Histoire*. LXXVI 1907.

Enqueste ende Informatie upt stuck van der Reductie ende Reformatie van den Schiltaelen... over de Landen van Holland ende Vrieslant Gedaen in den Jaere MCCCCXCIIII. Ed. Robert Fruin. Leiden, 1876.

FRIIS, ASTRID. 'An Inquiry into the Relations between Economic and Financial Factors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I: The Two Crises in the Neterlands in 1557.'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2, 1953.

GROB, JACQUES. *See* DÉNOMBREMENTS DES FEUX.

IJZERMAN, A. W. *De 80-jarige oorlog*. Leiden [no date].

——*Nederland als grote mogenheid*. Amsterdam [no date].

Informacie up den Staet, Faculteyt ende Gelegentheyt van de Steden ende Dorpen van Hollant ende

Vrieslant om daernae te Reguleren de Nyeuwe Schiltaele, Gedaen in den Jaere MDXIV. Ed. Robert Fruin. Leiden, 1866.

MOLS, ROGER. 'Beschouwingen over de Bevolkingsgeschiedenis in de Nederlanden (XVe en XVIe eeuwe).' *Tijdschrift voor Geschiedenis*, LXVI, 1953.

—— 'Die Bevölkerungsgeschichte Belgiens im Lichte der heutigen Forschung.'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XLVI, 1959.

—— 'Une source d'histoire démographique. Les anciens registres paroissiaux de Theux.' *Miscellanea historica Alberti de Meyer.* Louvain, 1946.

[587]

PIRENNE, HENRI. 'Les dénombrements de la population d'Ypres au XVe siècle (1412-1506),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c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I, 1903.

POSTHUMUS, N. W. *Inquiry into the History of Prices in Holland.* Vol. I, Leiden, 1946.

ROGGHÉ, P. 'De zwarte Dood in de zuidelijke Nederlanden.' *Belgisch Tijdschrift voor Philologie en Geschiedenis*, XXX, 1952.

RUWET, J. 'Crises démographiques: Problèmes économiques ou crises morales? Le pays de Liège sous l'Ancien Régime.' *Population*, IX, 1954.

TORFS, LOUIS. *Fastes des calamités publiques survenues dans les Pays-Bas et particulièrement en Belgique: Épidémies, famines, inondations.* Paris and Tournai, 1859.

VAN DILLEN, J. G. 'Summiere staat van de in 1622 in de provincie Holland gehouden volkstelling.' *Economisch-Historisch Jaarboek*, XXI, 1940.

VANNÉRUS, JULES. 'Les anciens dénombrements du Luxembourg.' *Compte Rendu des Séances de la Commission Royale ou Recueil des ses Bulletins*, LXX (5th ser., XI), 1901.

—— 'Dénombrements luxembourgeois du quinzième siècle (1472-1482).' *Bulletin de la Commission Royale d'Histoire*, CVI, 1941.

VAN NIEROP, LEONIE. *De bevolkingsbeweging der Nederlandsche stad.* Amsterdam, 1905.

VAN SCHEVENSTEEN, A.-F.-C. *See Documents pour Servir à l'Étude des Maladies Pestilentielles.*

VAN WERVEKE, HANS. 'Het bevolkingscijfer van de stad Gent in de veertiende eeuw.' *Miscellanea L. van der Essen.* Brussels, 1947.

—— 'De Curve van het Gentse Bevolkingscijfer in de 17e en de 18e eeuw.' *Verhandelingen van de Koninklijke Vlaamse Academie voor Wetenschappen, Letteren en Schone Kunsten van België*, Klasse der Letteren, X, no. 8, 1948.

—— 'Demografische problemen in de zuidelijke Nederlanden (17e en 18e eeuw).' *Mededelingen van de Koninklijke Vlaamse Academie voor Wetenschappen, Letteren en Schone Kunsten van België*, Klasse der Letteren, XVII, no, I, 1955.

—— 'La famine de l'an 1316 en Flandre et dans les régions voisines.' *Revue du Nord*, CLXI, 1959.

—— 'De zwarte Dood in de zuidelijke Nederlanden (1349-1351).' *Mededelingen van de Koninklijke Vlaamse Academie voor Wetenschappen, Letteren en Schone Kunsten van België*, Klasse der Letteren, XII, 1950.

VERBEEMEN, J. 'De werking van economische factoren op de stedelijke demografie der XVIIe en der XVIIIe eeuw in de Zuidelijke Nederlanden.' *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XXXIV, 1956.

WYFFELS, A. 'De omvang en de evolutie van het Brugse bevolkingscijfer in de 17de en de 18de eeuw.' *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XXXVI/2, 1958.

6. 德国和奥地利

ABEL, WILHELM. 'Verdorfung und Gutsbildung in Deutschland zu Beginn der Neuzeit.' *Geografiska Annaler*, XLIII, 1961.

—— 'Wandlungen des Fleischverbrauchs und der Fleischversorgung in Deutschland seit dem ausgehenden Mittelalter.' *Berichte über Landwirtschaft: Zeitschrift für Agrarpolitik und Landwirtschaft*, XXII/3, 1937.

ARNDT, CARL. *Die Einwohnerzahlen der niederdeutschen Städte von 1550 bis 1816.* Philos. Disserta-

tion, Univ. Hamburg, 1946 (typescript).

BÜCHER, CARL. *Die Bevölkerung von Frankfurt am Main im XIV. und XV. Jahrhundert.* Tübingen, 1886.

BÜCHER, KARL. *Die Frauenfrage im Mittelalter* (2nd ed.). Tübingen, 1910.

CRUM, FREDERICK S. 'The Statistical Work of Süssmilch.' *Publications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VII, 1901.

DEUTSCHES STÄDTEBUCH. Ed. Erich Keyser. Vols. I–III. Stuttgart, 1939–56.

DREYFUS, FRANÇOIS G. 'Prix et population à Trèves et à Mayence au XVIII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XXXIV, 1956.

EHEBERG, K. TH. 'Strassburg's Bevölkerungszahl seit Ende des fünfzehnten Jahrhunderts bis zur Gegenwart.'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XLI, 1883. [588]

ELSAS, M. J. Umriss einer Geschichte der Preise und Löhne in Deutschland. Vols. I-II. Leiden 1936–49.

FRANZ, GÜNTHER. *Der Dreissigjährige Krieg und das deutsche Volk* (2nd ed.). Jena, 1943.

GOEHLERT, V. 'Die Ergebnisse der in Österreich im vorigen Jahrhundert ausgeführten Volkszählungen im Vergleiche mit jenen der neueren Zeit.' *Sitzungsberichte der Wien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 -hist. Klasse, XIV, 1854.

GROSSMANN, H. 'Die Anfänge und geschichtliche Entwicklung der amtlichen Statistik in Österreich.' *Österreichische Statistische Monatsschrift*, New Ser., XXI, 1916.

GÜRTLER, ALFRED. *Die Volkszählungen Maria Theresias und Josefs II, 1753–1790.* Innsbruck, 1909.

HÖMBERG, ALBERT. *Siedlungsgeschichte des oberen Sauerlandes* (Geschichtliche Arbeiten zur westfälischen Landesforschung, III). Münster, 1938.

JASTROW, J. *Die Volkszahl deutscher Städte zu Ende des Mittelalters und zu Beginn der Neuzeit* (Historische Untersuchungen, ed. J. Jastrow, I). Berlin, 1886.

JOLLES, OSKAR. 'Die Ansichten der deutschen nationalökonomischen Schriftsteller des sechszehnten und siebzehnten Jahrhunderts über Bevölkerungswesen.'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New Ser., XIII, 1886.

KELTER, ERNST. 'Das deutsche Wirtschaftsleben des 14. und 15. Jahrhunderts im Schatten der Pestepidemien.'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CLXV, 1953.

KEYSER, ERICH. 'Die Ausbreitung der Pest in den deutschen Städten.' *Ergebnisse und Probleme moderner geographischer Forschung: Hans Mortensen zu seinem 60. Geburtstag* (Abhandlungen der Akademie für Raumforschung und Landesplanung, XVIII). Bremen, 1954.

—— 'Die Bevölkerung der deutschen Städte.' *Städtewesen und Bürgertum als geschichtliche Kräfte. Gedächtnisschrift für Fritz Rörig.* Lübeck, 1953.

—— *Bevölkerungsgeschichte Deutschlands* (3rd ed.). Leipzig, 1943.

KISSKALT, KARL. 'Epidemiologisch-statistische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Sterblichkeit von 1600–1800.' *Archiv für Hygiene und Bakteriologie*, CXXXVII, 1953.

—— 'Die Sterblichkeit im 18. Jahrhundert.' *Zeitschrift für Hygiene und Infektionskrankheiten*, XCIII, 1921.

KLEIN, HERBERT. 'Das Grosse Sterben von 1348/49 und seine Auswirkung auf die Besiedlung der Ostalpenländer.' *Mitteilungen der Gesellschaft für Salzburger Landeskunde*, C, 1960.

KOERNER, FRITZ. 'Die Bevölkerungszahl und-dichte in Mitteleuropa zum Beginn der Neuzeit.' *Forschungen und Fortschritte*, XXXIII, 1959.

KOLLNIG, KARL. *Wandlungen im Bevölkerungsbild des pfälzischen Oberrheingebietes.* Heidelberg. 1952.

KORTH, SIEGFRIED. 'Die Entstehung und Entwicklung des ostdeutschen Grossgrundbesitzes.' *Jahrbuch der Albertus-Universität zu Königsberg/Preussen*, III, 1953.

KRAUSSE, JOHANNES. 'Unterschiedliche Fortpflanzung im 17. und 18. Jahrhundert.' *Archiv für Bevölkerungswissenschaft und Bevölkerungspolitik*, X, 1940.

KUHN, WALTE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Ostsiedlung in der Neuzeit.* Vols. I, II, Cologne-Graz, 1955, 1957.

LAMMERT, GOTTFRIED. *Geschichte der Seuchen, Hungers-und Kriegsnoth zur Zeit des Dreissigjährigen*

Krieges. Wiesbaden,1890.
LESKY,E. ' Die österreichische Pestfront an der k. k. Militärgrenze. ' *Saeculum*,VIII,1957.
Materialien zur Geschichte der Preise und Löhne in Österreich. Ed. Alfred Francis Pribram. Vol. I. Vienna,1938.
MEYER,A. O. ' Ein italienisches Urteil über Deutschland und Frankreich um 1660. ' *Quellen und Forschungen aus italienischen Archiven*,IX,1906.
POHLENDT,HEINZ. *Die Verbreitung der mittelalterlichen Wüstungen in Deutschland*(Göttinger Geographische Abhandlungen,Heft 3). Göttingen,1950.
PRIBRAM,ALFRED FRANCIS. *See Materialien.*
REINCKE,HEINRICH. ' Bevölkerungsprobleme der Hansestädte. ' *Hansische Geschichtsblätter*,LXX, 1951.
——' Bevölkerungsverluste der Hansestädte durch den Schwarzen Tod 1349-50. ' *Hansische* [589] *Geschichtsblätter*,LXXII,1954.
RICHTER,GERTRAUD. ' Klimaschwankungen und Wüstungsvorgänge im Mittelalter. ' *Petermanns geographische Mitteilungen*,XCVI,1952.
RIEMANN,F. ' Preise und Löhne in der deutschen Landwirtschaft während des 17. und 18. Jahrhunderts. ' *Landwirtschaftliches Jahrbuch für Bayern*,XXX,1953.
RUNDSTEDT,HANS-GERD VON. *Die Regelung des Getreidehandels in den Städten Südwestdeutschlands und der deutschen Schweiz im späteren Mittelalter und im Beginn der Neuzeit.* Stuttgart,1930.
SCHMÖLZ,FRANZ and THERESE. ' Die Sterblichkeit in Landsberg am Lech von 1585-1875. ' *Archiv für Hygiene und Bakteriologie*,CXXXVI,1952.
SCHMOLLER,GUSTAV. ' Die historische Entwicklung des Fleischkonsums sowie der Vieh-und Fleischpreise in Deutschland. '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XXVII,1871.
SCHÜNEMANN,KONRAD. *Österreichs Bevölkerungspolitik unter Maria Theresia.* Berlin,1935.
SCHUUR,KURT. *Kinderzahl und Kindersterblichkeit früherer Jahrhunderte.* Cottbus,1936.
SÜSSMILCH,JOHANN PETER. *Die göttliche Ordnung in den Veränderungen des menschlichen. Geschlechts aus der Geburt,dem Tode und der Fortpflanzung desselben erwiesen*(4th edn.). Berlin,1788.
WOEHLKENS,ERICH. *Pest und Ruhr im 16. und 17. Jahrhundert*(Schriften des Niedersächsichen Heimatbundes E. V. ,New Ser. ,XXVI). Hanover,1954.
WOPENER,HERMANN. ' Güterteilung und Übervölkerung tirolischer Landbezirke im 16. ,17. ,und 18. Jahrhundert. ' *Südostdeutsche Forschungen*,III,1938.
ZUR MÜHLEN,HEINZ VON. ' Die Entstehung der Gutsherrschaft in Oberschlesien. '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XXXVIII[no date].

7. 瑞士

AMMANN, HEKTOR. ' Die Bevölkerung der Westschweiz im ausgehenden Mittelalter. *Festschrift Friedrich Emil Welti.* Aarau,1937.
——' Die Bevölkerung von Stadt und Landschaft Basel am Ausgang des Mittelalters. ' *Basler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e und Altertumskunde*,XLIX,1950.
BICKEL,WILHELM. *Bevölkerungsgeschichte und Bevölkerungspolitik der Schweiz seit dem Ausgang des Mittelalters.* Zürich,1947.
——' Early Swiss Mortality Tables. ' *Schweizerische Zeitschrift für Volkswirtschaft und Statistik*, LXXXV,1949.
BUOMBERGER, FERDINAND. ' Bevölkerungs-und Vermögensstatistik in der Stadt und Landschaft Freiburg um die Mitte des XV. Jahrhunderts. ' *Freiburger Geschichtsblätter*,VI-VIII,1900.
BURCHARDT,ALBRECHT. *Demographie und Epidemiologie der Stadt Basel während der letzten drei Jahrhunderte,1601-1900.* Basel,1908.
DASZYNSKA, ZOFIA. *Zürichs Bevölkerung im XVII. Jahrhundert. Ein Beitrag zur historischen Städtestatistik.* Berne,1889.
DENZLER,ALICE. *Die Bevölkerungsbewegung der Stadt Winterthur von der Mitte des 16. bis zum Ende des 18. Jahrhunderts.* Winterthur,1940.

HENRY, LOUIS. *Anciennes familles genevoises. Étude démographique: XVIe-XXe siècle.* (Institut National d'Études Démographiques, Travaux et Documents, Cahier no. 26.) Paris, 1956.
MAYER, KURT B. *The Population of Switzerland.* New York, 1952.
SCHNYDER, WERNER. *Die Bevölkerung der Stadt und Landschaft Zürich vom 14.-17. Jahrhundert* (Schweizer Studien zu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XIV/I). Zürich, 1925.

8. 意大利

ALEATI, GIUSEPPE. *La popolazione di Pavia durante il dominio Spagnolo.* Milan, 1957.
——and CIPOLLA, CARLO M. 'Il trend economco nello Stato di Milano durante i secoli XVI e XVII.' *Bollettino della Società Pavese di Storia Patria*, XLVIII-L, 1950.
BATTARA, PIETRO. 'La popolazione di Firenze dal XIV al XVI secolo.' *Economia: Revista di Economia Comparativa e di Scienze sociali*, XVIII, 1935. [590]
BELOCH, KARL JULIUS. 'Bevölkerungsgeschichte der Republik Venedig.'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3. Folge, XVIII, 1899.
——*Bevölkerungsgeschichte Italiens.* Vol. I, Berlin and Leipzig, 1937. Vol. II, Berlin and Leipzig, 1939. Vol. III, Berlin, 1961.
BELTRAMI, DANIELE. *Storia della popolazione di Venezia dalla fine del secolo XVI alla caduta della repubblica.* Padua, 1954.
BESTA, BEATRICE. 'La popolazione di Milano nel periodo della dominazione Spagnola.' *Atti del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per gli Studi sulla Popolazione, Roma, 7-11 Settembre 1931* (ed. Corrado Gini). Vol. I. Rome, 1933.
BESTA, ENRICO. 'I censimenti Milanesi di Francesco II Sforza e di Carlo V.' *Atti del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per gli Studi sulla Popolazione, Roma, 7-11 Settembre 1931* (ed. Corrado Gini). Vol. I, Rome, 1933.
CARPENTIER, ÉLISABETH. *Une ville devant la peste. Orvieto et la Peste Noire de 1348.* Paris, 1962.
CIPOLLA, CARLO M. 'The Decline of Ital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V, 1952.
——*Mouvements monétaires dans l'État de Milan* (1580-1700). Paris, 1952.
——'Per la storia della popolazione lombarda nel secolo XVI. *Studi in Onore di Gino Luzzatto*, II. Milan, 1950.
——'Profilo di storia demografica della città di Pavia.' *Bollettino Storico Pavese*, VI, 1943.
——'Revis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The Trends in Italian Economic History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II, 1949.
——*See also* ALEATI, GIUSEPPE.
CONIGLIO, GIUSEPPE. *Il Regno di Napoli al tempo di Carlo V.* Naples, 1951.
CORRADI, ALFONSO. *Annali delle epidemie occorse in Italia dalle prime memorie fino al 1850.* 3 parts, Bologna, 1865, 1867, 1870.
CORRIDORE, FRANCESCO. *Storia documentata della popolazione di Sardegna (1479-1901)* (2nd ed.). Turin, 1902.
COSTA, ANTONIO. 'La peste in Genova negli anni 1656-57.' *Atti del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per gli Studi sulla Popolazione, Roma, 7-11 Settembre 1931* (ed. Corrado Gini). Vol. I. Rome, 1933.
DONAZZOLO, PIETRO and SAIBANTE, MARIO. 'Lo sviluppo demografico di Verona e della sua provincia dalla fine del secolo XV ai giorni nostri.' *Metron*, VI, 1926.
FELLONI, GIUSEPPE. 'Per la storia della popolazione di Genova nel secoli XVI e XVII.'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CX, 1952.
FIUMI, ENRICO. 'La demografia fiorentina nelle pagine di Giovanni Villani.'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CVIII, 1950.
FORTUNATI, PAOLO. 'La popolazione Friulana dal secolo XVI ai giorni nostri.' *Atti del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per gli Studi sulla Popolazione, Roma, 7-11 Settembre 1931* (ed. Corrado Gini). Vol. I, Rome, 1933.
GIGLI, FERNANDA. 'La densità di popolazione in Toscana nei secoli XVI e XVIII.' *Rivista Geografi-*

ca Italiana, LXI, 1954.

HEERS, JACQUES. *Gênes au XVe siècle. Activité économique et problèmes sociaux.* Paris, 1961.

PARDI, G. 'Disegno della storia demografica di Firenze.'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LXXIV/I, 1916.

PARENTI, GIUSEPPE. 'Fonti per lo studio della demografia Fiorentina: I libri dei morti.' *Genus*, VI-VIII, 1943-9.

——*Prezzi e mercato del grano a Siena (1546-1765)*. Florence, 1942.

——*Prime ricerche sulla rivoluzione dei prezzi in Firenze.* Florence, 1939.

PETINO, ANTONIO. 'Primi assaggi sulla »Rivoluzione dei prezzi « in Sicilia: I prezzi del grano, dell' orzo... a Catania dal 1512 al 1630.' *Studi in Onore di Gino Luzzatto*, II. Milan, 1950.

REYNAUD, PIERRE. *La théorie de la population eu Italie du XVIe au XVIIIe siècle.* Lyon and Paris, 1904.

RODENWALDT, ERNST. 'Pest in Venedig 1575-1577. Ein Beitrag zur Frage der Infektkette bei den Pestepidemien West-Europas.' *Sitzungsberichte der Heidelberg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Mathematisch-naturwissenschaftliche Klasse, Jahrgang 1952, 2. Abhandlung. [591]

SAIBANTE, MARIO. *See* DONAZZOLO, PIETRO.

ZERBI, LUIGI. 'La peste di San Carlo in Monza.' *Archivio Storico Lombardo*, 2nd ser., fasc. XXX, 1891.

9. 西班牙和葡萄牙

AMMANN, HEKTOR. 'Vom Städtewesen Spaniens und Westfrankreichs im Mittelalter. *Studien zu den Anfängen des europäischen Städtewesens* (Vorträge und Forschungen, herausgegeben vom Institut für geschichtliche Landesforschung des Bodenseegebietes, vol. IV), Lindau and Constance, n. d. (1958).

EDGE, P. GRANVILLE. 'Pre-census Population Records of Spa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XXVI, 1931.

ELLIOTT, JOHN. 'The Decline of Spain.' *Past and Present*, no. 20. November 1961.

FUENTES MARTLÁÑEZ, MARIANO. *Despoblación y repoblación de España (1482-1920)*. Madrid, 1929.

GIRALT, E. *See* NADAL, J.

GIRÃO, AMORIM. *See* VELHO, FERNANDA.

GIRARD, ALBERT. 'Le chiffre de la population de l'Espagne dans les temps modernes.'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III, 1928 and IV, 1929.

——'La répartition de la population en Espagne dans les temps modernes.'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XVII, 1929.

GONZÁLEZ, TOMÁS. *Censo de población de las provincias y partidos de la Corona de Castilla en el siglo XVI.* Madrid, 1829.

HAMILTON, EARL J. *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in Spain, 1501-1650* (Harvard Economic Studies, XLIII). Cambridge, Mass., 1934.

——*Money, Prices and Wages in Valencia, Aragon, and Navarre, 1351-1500* (Harvard Economic Studies, LI). Cambridge, Mass., 1936.

——'Revis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The Decline of Spa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III, 1938.

——*War and Prices in Spain, 1651-1800* (Harvard Economic Studies, LXXXI). Cambridge, Mass., 1947.

LAPEYRE, HENRI. *Géographie de l'Espagne morisque.* Paris, 1959.

MACHADO, MONTALVÃO, J. T. 'A população portuguesa através da História.' *Jornal do Médico*, XVI, 1950.

NADAL, J. and GIRALT, E. *La population catalane de 1553 à 1717.* Paris, 1960.

Relaciones Historico-Geografico-Estadisticas de los Pueblos de España Hechos por Iniciativa de Felipe II. Ed. Carmelo Viñas y Mey and Ramón Paz. Vol. I: *Provincia de Madrid*; Vol. II: *Reino de Toledo.* Madrid, 1949, 1951.

RUIZ ALMANSA, JAVIER. *La población de Galicia, 1500-1945, segun los documentos estadisticos y de-*

scriptivos de cada epóca. (Publicaciones del laboratorio de demografia retrospectiva Española, Vol. I). Madrid, 1948.

SMITH, ROBERT S. 'Barcelona "Bills of Mortality" and Population, 1457–1590.'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XLIV, 1936.

—— 'Fourteenth-Century Population Records of Catalonia.' *Speculum*, XIX, 1944.

—— 'Spanish Population Thought before Malthus.' *Teachers of History: Essays in Honor of Laurence Bradford Packard*. Ed. H. Stuart Hughes, et al. Ithaca, N. Y., 1954.

VANDELLOS, J. A. 'La evolución demográfica de España.' *Bulletin de l'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statistique* (Netherlands), XXVII, 1934.

VELHO, FERNANDA and GIRÃO, AMORIM. 'O mais antigo Censo da População de Portugal (1527).' *Boletim do Centro de Estudos Geográficos* (Coimbra) No. 8–9, 1954.

VERLINDEN, CHARLES. 'La grande peste de 1348 en Espagne.' *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XVII/I, 1938.

10. 斯堪的纳维亚诸国

BOËTHIUS, BERTIL. 'New Light on Eighteenth Century Sweden.' *The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2, 1953. [592]

GILLE, H. 'The Demographic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European Countri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opulation Studies*, III, 1949–50.

HAMMARSTRÖM, INGRID. 'The "Price Revolution"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Some Swedish Evidence.'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 1957.

HECKSCHER, ELI F. (transl. by Göran Ohlin). *An Economic History of Sweden* (Harvard Economic Studies, XCV), Cambridge, Mass., 1954.

—— 'Swedish Population Trends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II, 1950.

HYRENIUS, HANNES. 'Reproduction and Replacement: A Methodological Study of Swedish Population Changes during 20 Years.' *Population Studies*, IV/I, 1951.

JUTIKKALA, EINO. *Die Bevölkerung Finnlands in den Jahren 1721–49* (Annales Academiae Scientiarum Fennicae, B LV/4). Helsinki, 1945.

—— 'Can the Population of Finland in the 17th Century Be Calculated?'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 1957.

—— 'The Great Finnish Famine in 1696–97.'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II, 1955.

SCHREINER, JOHAN. Pest og Prisfall i Senmiddelalderen (*Avhandlinger utgitt av det Norske Videnskaps-Akademi i Oslo*, Hist, -Filos, Klasse, 1948, no. I). Oslo, 1948.

SUNDBÄRG, GUSTAV. *Bevölkerungsstatistik Schwedens, 1750–1900.* Stockholm. 1907.

SUNDQUIST, S. *Sveriges folkmängd på Gustaf II Adolfs tid.* Lund, 1938.

SWEDEN, Statistika Centralbyrån. *Historisk Statistik för Sverige.* I. Befolkning, 1720–1950. Stockholm, 1955.

THOMAS, DOROTHY SWAINE. *Social and Economic Aspects of Swedish Population Movements*, 1750–1933. New York, 1941.

UTTERSTRÖM, GUSTAF. 'Population and Agriculture in Sweden, *circa* 1700–1830.'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X, 1961.

—— 'Some Population Problems in Pre-Industrial Sweden.'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I/2, 1954.

WARGENTIN, PER WILHELM. *Tables of Mortality Based upon the Swedish Population, Prepared and Presented in* 1766. Stockholm, 1930.

11. 巴尔干诸国和东欧

BARKAN, ÖMER LÜTFI. 'Les déportations comme méthode de peuplement et de colonisation dans

l' Empire Ottoman. '*Revue de la Faculté des Sciences Économiques de l' Université d' Istanbul*, *XI*, 1953.
——'Essaisurles données statistiques des registres de recensement dans l' Empire Ottoman aux XVe et XVIe siècles.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1/1, 1957.
——'»La Méditerranée« de Fernand Braudel vue d' Istamboul.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IX, 1954.
Beloch, Karl Julius. 'Bevölkerungsgeschichte der Republik Venedig.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III, Folge, XVIII, 1899.
Hoszowski, Stanisław. 'Dynamika rozwoju zaludnienia Polski w epoce feudalnej, X–XVIII w. '*Roczniki Dziejów Społecznych i Gospodarczych*, XIII, 1951.
——*Les prix à Lwow*(*XVIe–XVIIe siècles*). Paris, 1954.
Jabłonowski, Aleksander. *Polska XVI wieku pod względem geograficzno-statystycznym*, VI-XI. Warsaw, 1894–1910.
Kula, Witwold. 'Stan i potrzeby badań nad demografią historycaną dawnej Polski, do początków XIX wieku. '*Roczniki Dziejów Społecznych i Gospodarczych*, XII, 1951.
Ladenberger, Tadeusz. *Zaludnienie Polski na początku panowia Kazimierza Wielkiego.* Lwów, 1930.
Mitkowski, Jozef. 'Uwagi o zaludnieniu Polski na początku panowia Kazimierza Wielkiego. '*Roczniki Dziejów Społecznych i Gospodarczych*, X, 1948.
Pawiński, Adolf. *Polska XVI wieku pod względem geograficzno-statystycznym*, I–V. Warsaw, 1883, 1886, 1895.
【593】 Rutkowski, Jan. *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a Pologne avant les partages.* Paris, 1927.
Stoianovich, Traian. 'Land Tenure and Related Sectors of the Balkan Economy, 1600–180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III, 1953.
Vielrose, Egon. 'Ludność Polski od X do XVIII wieku. '*Kwartalnik Historii Kultury Materialnej*, V, 1957.

第二章　科学方法与技术进步

以下简短的参考书目是试图用作为相关人士开展进一步研究的一般指导的，而非相关出版物的穷尽式列举。它略省了所有关于期刊文章、关于科技论著的现代版本、关于传记等形式的参考资料。进一步的文献信息可以到以下列出的著作之中，特别是其中的“一般书籍”中去寻找。

1. 一般书籍

Burtt, E. A.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Physical Science.* London, 1932
Butterfield, H. *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2nd ed.). London, 1957.
Castiglioni, A. *History of Medicine*(2nd ed.). New York, 1947.
Drummond, J. C. and Wilbraham, A. *The Englishman's Food.* London, 1939.
Gras, N. S. B. *A History of Agriculture in Europe and America.* New York, 1925.
Hall, A. Rupert.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1500–1800*(2nd ed.). London, 1962.
Hanson, N. R. *Patterns of Discovery.* Cambridge, 1958.
Mumford, L.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1934.
Nef, J. U. *Cultural Foundations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Cambridge, 1958.
Salaman, R. N. *The History and Social Influence of the Potato.* Cambridge, 1949.
Singer, Charles, Holmyard, E. J., Hall, A. R. and Williams, T. I. *A History of Technology*, III. Oxford, 1957.
Taton, R. (ed.).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Sciences*, II. Paris, 1958.
Uccelli, A. *Storia della Tecnica dal Medio Evo ai Nostri Giorni.* Milan, 1945.
Usher, A. P. *A History of Mechanical Inventions*(2nd ed.). Cambridge, Mass., 1954.

WOLF, A. *A His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Philosophy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2nd ed.). London, 1950.

2. 科学

ARBER, AGNES. *Herbals*(2nd ed.). Cambridge, 1953.
BALL, W. W. R. *An Essay on Newton's Principia. London*, 1893.
BOAS, MARIE. *The Scientific Renaissance, 1450–1630.* London, 1962.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echanical Philosophy.' *Osiris*, X, 1952.
——*Robert Boyle and 17th Century Chemistry.* Cambridge, *1958.*
BROWN, HARCOURT. *Scientific Organisations in 17th Century France.* Baltimore, 1934.
COHEN, I. B. *Franklin and Newton.* Philadelphia, 1956.
COLE, F. J. *A History of Comparative Anatomy.* London, 1949.
CLARK, G. N. *Science and Social Welfare in the Age of Newton.* Oxford, 1937.
CROMBIE, A. C.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Science*, II. New York, 1959.
DIJKSTERHUIS, E. J. *The Mechanization of the World Picture.* Oxford, 1961.
DRAKE, S. *Discoveries and Opinions of Galileo.* New York, 1957.
DUGAS, R. *History of Mechanics*, trans. J. R. Maddox. London, 1955.
——*La Mécanique au XVIIe Siècle.* Paris, 1954.
HALL, A. RUPERT. *Ballistic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1952.
——*From Galileo to Newton, 1630–1720.* London, 1963.
HALL, A. R. and M. B. *Unpublished Papers of Isaac Newton.* Cambridge, 1962. [594]
JOHNSON, F. R. *Astronomical Thought in Renaissance England.* Baltimore, 1937.
KOYRÉ, A. *Etudes Galiléennes*(*Actualités Scientifiques et Industrielles*, nos. 852–4). Paris, 1939.
——*From the Closed World to the Infinite Universe.* Baltimore, 1957.
——*La Revolution Astronomique.* Paris, 1961.
KREMERS, E. and URDANG, G. *History of Pharmacy.* Philadelphia, 1940.
KUHN, T. S.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1956.
LEICESTER, H. M.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Chemistry.* London and New York, 1958.
LENOBLE, R. *Mersenne, ou la Naissance du Mécanisme.* Paris, 1943.
LYONS, SIR H. *The Royal Society, 1660–1940.* Cambridge, 1944.
MERTON, R. K.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17th century England.' *Osiris*, IV, 1938.
METZGER, HÉLÈNE. *Les Doctrines Chimiques en France du début du XVIIe à la fin du XVIIIe siècle*, I (all published). Paris, 1923.
MOUY, P. *Le Développement de la Physique Cartésienne.* Paris, 1934.
ORNSTEIN, M. *The Role of Scientific Societies in the 17th Century.* Chicago, 1928.
RONCHI, V. *Histoire de la Lumière*, trans. J. Taton. Paris, 1956.
TAYLOR, E. G. R. *The Mathematical Practitioners of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Cambridge, 1954.

3. 技术

CLOW, A. and N. *The Chemical Revolution.* London, 1952.
DAUMAS, M. *Les Instruments Scientifiques au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Paris, 1953.
DONALD, M. B. *Elizabethan Copper.* London, 1955.
FORBES, R. J. *Short History of the Art of Distillation.* Leiden. 1948.
HART, I. B. *The Mechanical Inventions of Leonardo da Vinci.* London, 1925.
HOOVER, H. C. and L. H. (trans.) G. Agricola, *De re metallica*(2nd ed.). New York, 1950.
NEF, J. U. *The Rise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 London, 1932.
PARSONS, W. B. *Engineers and Engineering in the Renaaissance.* Baltimore, 1939.
SMITH, C. S. *A History of Metallography.* Chicago, 1960.
SMITH, C. S. and GNUDI, M. *The Pirotechnia of Vannoccio Biringuccio*(2nd ed.). New York, 1959.

SMITH, C. S. and SISCO, A. *The Treatise on Ores and Assaying of Lazarus Ercker.* Chicago, 1951.

STRAUB, H. *A History of Civil Engineering. An Outline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s*, trans. E. Rockwell. London, 1952.

TREUE, W. *Kulturgeschichte der Schraube.* Munich, 1955.

WAILES, R. *The English Windmill.* London, 1954.

第三章　运输与贸易路线

ALBION, R. G. *Forests and Sea Power.* Cambridge, Mass., 1926.

ANDERSON, ROMOLA and R. C. *The Sailing Ship.* London, 1947.

BARBOUR, V. 'Dutch and English merchant shipping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I(1930), 2.

BIANCHINI, L. *Storia economica-sociale de Sicilia.* Naples, 1841.

BONREPOS, R. de. *Histoire du canal de Languedoc.* Paris, 1805.

BORAH, W. W. *Early Colonial Trade and Navigation between Mexico and Peru* (*Ibero-Americana* no. 38). Berkeley, California, 1954.

BRAUDEL, F. *La Me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editerranéen a l'époque de Philippe II.* Paris, 1949.

BRAUDEL, F. and ROMANO, R. *Navires et marchandises à l'entrée du port de Livourne, 1547–1611.* [595] Paris, 1951.

CANABRAVA, A. P. *O comércio português no Rio da Prata, 1580–1640.* São Paulo, 1944.

CARANDE, R. *Carlos V Y sus banqueros.* 2 vols. Madrid, 1943–9.

CHAUNU, H. and CHAUNU, P. *Séville et l'Atlantique.* II vols. Paris, 1955–9.

CHAUNU, P. *Les Philippines et le Pacifique des Ibériques.* Paris, 1960.

CHILD, Sir J. *The New Discourse of Trade.* London, 1669.

DAENELL, E. *Die Blütezeit der deutschen Hanse.* 2 vols. Berlin, 1905–6.

DAVIS, R. *Rise of the English Shipping Industry.* London, 1962.

VAN DRIEL, A. *Tonnage Measurement, a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Essay.* The Hague, 1925.

EDMUNDSON, G. *Anglo-Dutch Rivalry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Oxford, 1911.

EHRENBERG, R. *Das Zeitalter der Fugger.* 2 vols. Jena, 1922.

ELLINGER BANG, N. *Tabeller over skibsfart og varetransport gennen φresund 1497–1660.* 2 vols. Copenhagen, 1906–22.

FARIA E SOUSA, M. DE. *Asia portuguesa.* Oporto, 1945.

FAYLE, C. E. *A Short History of the World's Shipping Industry.* London, 1933.

FERNÁNDEZ DURO, C. *Disquisiciones náuticas.* 6 vols. Madrid, 1876–81.

FORBES, R. J.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Roads and their construction.* Amsterdam, 1934.

GAUTIER, H. *Traité de la construction des chemins.* Paris, 1716.

GOMES DE BRITO, B. (ed.). *Historia trágico—maritima em que se escreven chronologicamente os naufragios que tiverão as naos de Portugal, depois que se poz em exercicio a navegação da India.* 2 vols. Lisbon, 1735–6.

GOTHEIN, E. 'Zur Geschichte der Rheinschiffahrt.' *Westdeutsche Zeitschrift fur Geschichte und Kunst XIV*, (1895), 254.

HAGEDORN, B. *Die Entwicklung der wichtigsten Schiffstypen bis ins 19 Jahrhundert.* Berlin, 1914.

HARING, C. H. *Trade and Navigation between Spain and the Indies.* Cambridge, Mass., 1918.

HEYD, W. *Histoire du commerce du Levant au moyen-âge.* Leipzig, 1885–6.

HUNTER, SIR W. W. *History of British India 1500–1700.* 2 vols. London, 1899–1900.

JAL, A. *Archéologie navale.* 2 vols. Paris, 1840.

JENKINS, J. T. *The Herring and the Herring Fisheries.* London, 1927.

——*A History of the Whale Fisheries.* London, 1921.

JONGE, J. C. DE. *Geschiednis van het Nederlandsche Zeewesen.* 5 vols. Zwolle, 1869.

KLERK DE REUS, G. C. *Geschichtlicher Überblick der Niederländisch-Ostindischen Compagnie.* Batavia, 1894.

LALANDE, J. J. LE F. DE. *Des canaux de navigation.* Paris, 1778.
LANE, F. C. *Venetian Ships and Ship-builders of the Renaissance.* Baltimore, 1934.
—— 'Tonnages, Medieval and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econd Series, XVII (1964), 213–33.
LECCHI, A. *Trattato de' canali navigabili.* Milan, 1824.
LINDSAY, W. S. *History of Merchant Shipping and Ancient Commerce.* 4 vols. London, 1874–6.
LEFEBRE DES NOETTES, R. *La force motrice animal à travers les ages.* Paris, 1924.
MACPHERSON, D. *Annals of Commerce.* 4 vols. London, 1805.
MAGE, A. *De la navigation intérieure en France.* Paris, 1914.
MAURO, F. *Le Portugal et l'Atlantique au XVIIe siècle.* Paris, 1960.
MILLER, L. R. 'New evidence on the shipping and imports of London, 1601–1602.'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41, p. 740.
MOLLAT, M. *Le navire et l'économie maritime du XV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1959.
OPPENHEIM, M. *History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Royal Navy.* 2 vols. London, 1896.
PARENTI, G. *Prime ricerche nella rivoluzione dei prezzi in Firenze.* Florence, 1939.
PARSONS, W. B. *Engineers and Engineering in the Renaissance.* Baltimore, 1939.
POMMEUSE, H. DE. *Des canaux navigables... avec des recherches comparatives sur la navigation intérieure de la France et celle de l'Angleterre.* Paris, 1822.
POUJADE, J. *La route des Indes et ses navires.* Paris, 1946.
QUIRINO DA FONSECA, H. *Os Portugueses no mar.* Lisbon, 1926.
RAMÉE, D. *La locomotion: histoire des chars, carrosses, omnibus et voitures de tous genres.* Paris, 1856.
RIVE, B. L. DE. *Précis historique et statistique des canaux et rivières navigables de la Belgique.* Brussels, 1835. [596]
SCHAUBE, A. *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lichen Handels und Verkehrs zwischen Westdeutschland und Italien.* 2 vols. Leipzig, 1900.
SCHAUBE, A. 'Die Anfänge der venezianischen Galcerenfahrten nach der Nordsee.' *Historisches Zeitschrift*, CI (1908), 37.
SLUITER, E. 'Dutch-Spanish rivalry in the Caribbean area, 1594–1609.'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XVIII (1948), 179.
SOMBART, W. *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Leipzig, 1916–17.
TEUBERT, O. *Die Binnenschiffahrt.* Leipzig, 1912.
TROCMÉ, E. and DELAFOSSE, M. *Le commerce rochelais de la fin du XVe siècle au début du XVIIe siècle.* Paris, 1953.
USHER, A. P. 'Spanish ships and shipping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Facts and Factors in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Mass., 1932.
USHER, A. P. 'The growth of English shipping, 1572–1922.'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XLII (1927–8), 467.
VIGNON, E. J. M. *Etudes historiques sur l'administration des voies publiques en France.* 4 vols. Paris, 1862.
VOGEL, W. 'Zur grosse der Europäischen Handelsflotten im 15, 16 und 17 Jahrhundert.' *Forschungen und Versuche zur 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s und der Neuzeit.* Jena, 1915.
WIEL A. *The Navy of Venice.* London, 1910.
WILLAN T. S. *River Navigation in England, 1600–1750.* Oxford, 1936.
WITSEN N. *Aeloude en Hendendaegsche Scheeps-Bouw en Bestier.* Amsterdam, 1671.

第四章　欧洲经济制度与新世界：特许公司

1. 一般书籍

BLAKE, J. W. *European Beginnings in West Africa, 1454–1578*. London, 1937.
——*Europeans in West Africa, 1450–1560*.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42.
BONNASSIEUX, P. *Les Grandes Compagnies de Commerce*. Paris, 1892.
CHAUVIN, P. *Histoire de l' Amérique latine*. Paris, 1949.
HARDY, O. and DUNKE, G. S. *A History of the Pacific Area in Modern Times*. Boston, 1949.
LLOYD, C. *Pacific Horizons*. London, 1946.
MAJUNDAR, R. C., RAYCHAUDHURI, H. C. and KALININKAR, D. *An Advanced History of India*. London, 1946.
MEILE, P. *Histoire de l' Inde*. Paris, 1951.
MORELAND, W. J. and CHATTERJEE, A. C. *A Short History of India*. New York, 1953.
PANIKKAR, K. M. *A Survey of Indian History*. Bombay, 1954.
PENROSE, B. *Travel and Discovery in the Renaissance, 1420–1620*. Cambridge, Mass., 1952.
POWELL-PRICE, J. C. *A History of India*. London, 1955.
PRATT, SIR J. *The Expansion of Europe in the Far East*. London, 1947.
RAWLINSON, H. G.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Indian People*. London, 1946.
SAINTOYANT, J. *La colonisation européenne du XVème siècle*. Paris, 1948.
SCHRAUM, P. E. *Deutschland und Ubersee*. Kiel, 1950.
WILBUR, M. E. *The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Far East*. New York, 1945.

2. 比利时

ANCIAUX, L. *La participation des Belges à l' oeuvre coloniale des Hollandais aux Indes Orientales*. Brussels, 1955.
CUVELIER, MSGR (ed.). *Relation sur le Congo du Père Laurent de Lucques, 1700–1717*. Brussels, 1953. [597]
PRIMS, F. *Voor de geschiedenis van de Oostendse Compagnie*. Brussels, Meded. van de Academië van Marine van België, 1953.

3. 英格兰

ANDREWS, C. M. *The Colonial Period of American History*. 4 vols. New York, 1912.
ASHTON, T. S. (ed.). *The Letters of a West African Trader, Edward Grace, 1767–1770*. London, Council for Preservation of Business Archives, 1950.
BHATTACHARYA, SUKUMAR. *The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Economy of Bengal, 1704 to 1740*. London, 1950.
BOYD, J. P. 'The Susquehannah Company, 1753–1803.'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 1931–2.
CRAVEN, W. F. *The Southern Colonie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1607–1689*. Louisiana, 1949.
COTTON, SIR E. *East Indiamen, the East India Company' s Maritime Service*. London, 1949.
DAVIES, K. G. *The Royal African Company*. London, 1957.
DONNAN, E. 'The early days of the South Sea Company.'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 1929–30.
FAWCETT, SIR C. *The English Factories in India*, vol IV, *The Eastern Coast and Bay of Bengal*. Oxford, 1955.
FINLAY, J. *James Finlay and Company Ltd., manufacturers and East India Merchants, 1750–1950*.

Ed. Colm Brogan. Glasgow, 1951.

Fort William—India House Correspondence and other contemporary papers relating thereto, 1748–1800. Ed. K. K. Datta, N. K. Simba and others. 21 vols. Delhi, 1949– .

FURBER, HOLDEN. *John Company at Work*. Harvard, 1948.

——'The United Company of Merchants of England trading to the East Indies, 1783–96.'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40.

McGRATH, P. *Merchants and Merchandise in Seventeenth-century Bristol*. Bristol, Bristol Record Society, 1955.

——*Records relating to the Society of Merchant Venturers of the City of Bristol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ristol, Bristol Record Society, 1951.

MCKANN, F. T. *The English Discovery of America to 1585*. New York, 1952.

MINCHINTON, W. E. *The Trade of Bristol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ristol, Bristol Record Society, 1957.

PARKINSON, C. N. *Trade in the Eastern Seas, 1793–1813*. Cambridge, 1937.

PHILIPS, C. H. DE. *Correspondence of David Scott, director and chairman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1787–1805*. 2 vols. London, Camden Society, 1951.

RICHE. E. (ed.). *Copy-book of Letters Outward of the Hudson's Bay Company, 1680–1687*. London, Hudson's Bay Record Society, 1948.

——*The History of the Hudson's Bay Company, 1670–1870*. 2 vols. London, 1958–9.

——(ed.). *Hudson's Bay Copy Booke of Letters Commissions Instructions Outward 1688–1696*. London, Hudson's Bay Record Society, 1957.

——(ed.). *Minutes of the Hudson's Bay Company, 1679–84*. 2 vols. London, Hudson's Bay Record Society, 1945, 1946.

SUTHERLAND L. S. 'The East India Company in eighteenth-century politic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47.

THORNTON, A. P. *West India Policy under the Restoration*, Oxford, 1955.

WILLIAMSON, J. A. *Voyages of the Cabots and the English Discovery of North America under Henry VII and Henry VIII*, London, 1929.

4. 法国

BIGGAR, H. P. *The early Trading Companies of New France*. Toronto, 1901.

BLET, H. *France d'Outre-Mer*. Grenoble, 1950.

——*Histoire de la colonisation française, des origines à 1815*. Grenoble, 1946.

BONNAULT. C. DE. *Histoire du Canada français*. Paris, 1950.

BRUNSCHWIG, H. *La colonisation française*. Paris, 1949. 【598】

COLE, C. WOOLSEY. *Colbert and a Century of French Mercantilism*. 2 vols. New York, 1939.

——*French Mercantilism, 1683–1700*. New York, 1943.

CONAN, J. 'La dernière Compagnie française des Indes.'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939.

DEBIEN, G. *L'émigration poitevine vers l'Amérique au XVIIème siècle*. Paris, 1952.

——*Une plantation à Saint-Domingue*. Cairo, 1941.

——*Le peuplement des Antilles françaises au XVIIème siècle*. Cairo, 1942.

——*La société coloniale aux XVIIème et XVIIIème siècles*. Paris, 1953.

DELCOURT, A. *La France et les établissements français au Sénégal entre 1713 et 1763*. Dakar, 1952.

DESCHAMPS, H. *Méthodes et doctrines coloniales de la France*. Paris, 1953.

DIAGON, G. (ed.). *Arrêts du Conseil Supérieur de Pondichéry, 1735–1820*. 8 vols. Pondicherry, 1935–41.

ESQUER, G. *L'anticolonialisme au XVIIIème siècle*. Paris, 1951.

GIRAUD, M. *Histoire de la Louisiane française*. 2 vols. Paris, 1953, 1958.

GROUX, L. 'Colonisation au Canada sous Talon.' *Rev. d'hist. de l'Amérique française*. Montreal, IV, 1950.

——*L' Histoire du Canada français.* Montreal, 1952.

HARDY, G. *Histoire de la colonisation française.* Paris, 1937.

HARSIN, P. 'La création de la Compagnie d' Occident.' *Revue d'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956.

JULIEN, CH. A. *Les Français en Amérique de 1713 à 1783.* Paris, 1951.

——*Histoire de l' expansion et de la colonisation françaises.* Paris, 1948.

LE BLANT, R. 'La Compagnie de la Nouvelle France et la restitution de l' Acadie, 1627-1636.' *Revue de l' histoire des colonies.* 1955.

LOKKE, C. L. *France and the Colonial Question.* New York, 1952.

LONGNON, A. *Correspondance du Conseil Supérieur de Bourbon et de la Compagnie des Indes, 1732-1736.* Saint-Denis de la Réunion, 1933.

LOUIS-JARAY, G. *L' empire français d' Amérique.* Paris, 1937.

MARTIN, G. *La doctrine coloniale de la France en 1789.* Paris, 1934.

SCHAPPER, B. 'À propos de la doctrine et de la politique coloniales de Richelieu.' *Revue d' histoire des colonies.* 1954.

SURINDRA, NATH SEN. *The French in India.* London, 1947.

——*Travels of the Abbé Carré in India and the Near East, 1672-1674.* 2 vols.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47-.

VIGNOLS, L. 'Early French Colonial Policy.'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 1929.

WARD, C. *The Dutch and Swedes on the Delaware, 1609-64.* Philadelphia, 1930.

WEBER, H. *La Compagnie française des Indes.* Paris, 1904.

5. 荷兰

BASTIN, J. *Raffle's Ideas on the Land Rent System in Java.* The Hague, 1954.

BLONK, A. *Cornelis de Houtman en het begin onzer zeevaert of indië, 1565-1599.* Ryswick, 1937.

BOXER, C. R. *Jan Compagnie in Japan, 1600-1817.* The Hague, 1950.

COLENBRANDER, H. T. *Jan Pieterszen Coen.* The Hague, 1934.

COOLHAAS, W. P. *Jan Pieterszen Coen.* The Hague, 1952.

DE GRAAF, H. J. *Geschiedenis van Indonesië.* The Hague, 1949.

DE JONGH, B. *Het Krijgtwezen onder 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The Hague, 1950.

DE LAET, J. *Jaerlyck Verhael van de Verrichtingen der Geoctroeerde West Indische Compagnie in den thien Boeken uitgegeven.* 4 vols. The Hague, 1937.

DEN HAAN, J. C. and VAN WINTER, P. J. *Nederlandersover de Zeën.* Utrecht, 1940.

FURNIVALL, J. S. *Netherlands India.* Cambridge, 1944.

HOEGEWERFF, G. J. (ed.). *Journalem van de gendenckwaerdige zeystem van W. I. Bontekoe, 1618-25.* The Hague, 1952.

HOOGENBECK, N. H. *De rechtsvoorschriften voor de Compagnie of Oost Indie, 1595-1620.* Utrecht, [599] 1940.

KENNING, J. *De Tweede Schipvaart der Nederlanders naar Oost-Indië onder Jacob Cornelitz van Neck en Wybrant.* 2 vols. The Hague, 1938-40.

MENKMAN, W. R. *De Nederlanders in het Caraïbische zeegebiet.* Amsterdam, 1942.

MOLLEMA, J. C. *De reis om de wereld van Olivier van Noort, 1598-1601.* Amsterdam, 1937.

PELZER, A. N. *Jan van Riebeeck, 1618-1677.* Pretoria, 1944.

PHILLIPS, J. D. *Pepper and Pirates: Adventures in the Sumatra Pepper Trade of Salem.* Boston, 1949.

STAPEL, F. W. *Corpus diplomaticorum Neerlands-Indiennis.* Amsterdam, 1943.

——*Geschiedenis van Nederlandsch indië.* Amsterdam, 1938-40.

——*De Oost Indische Compagnie en Australië.* Amsterdam, 1937.

STAPEL, F. W., MARTIN, H. and HOOGENBECK, H. *Indië schrijft zyn eygen geschiedenis.* Amsterdam, 1943.

UNGER, W. S. *Het archiev der Middelburgse Commercie Compagnie.* The Hague, 1952.

——'Die resolutiën der Compagnie of Oost-Indië te Middelburg.' *Economisch-Historisch Jaar-*

boek. Amsterdam, 1947.

——'Het inschrijvingkregister van de Kamer Zeeland der 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Economisch-Historisch Jaarboek.* Amsterdam, 1950.

VAN DAM, P. *Beschryving van 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The Hague, 1943.

VAN KLAVEREN, J. J. *The Dutch Colonial System in the East Indies.* The Hague, 1953.

VOGEL, J. P. *Journal van Katelaers hofreis naar dem Groot Mogol te Lahore.* The Hague, 1937.

WARNSINCK, J. M. C. *Itinerario, voyage ofte sheepvaart van 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 naar Oost ofte Portugals Indien, 1579-1592.* The Hague, 1939.

6. 葡萄牙

GODINHO, V. M. 'A economia das Canarias nos seculos XIVe XV mos.' *Rev. de Hist.* São Paulo, 1952.

——*Historia economica e sociale da expansao portugueza.* Vol. I. Lisbon, 1947.

DA SILVA, J. G. *Alegaçao a favor de Companhia Portugueza da India Oriental.* Lisbon, 1950.

DE FREITAS, G. 'A Companhia Geral de Comercio do Brazil, 1649-1720.' *Rev. de Hist.* São Paulo, 1951.

DE LANNOY, C. and VAN DER LINDEN, H. *Histoire de l' expansion coloniale des peuples européens.* Vol. I. *Spain and Portugal.* Brussels, 1907.

DIEGUES, J. M. 'As Companias Privilegiadas no comercio colonial.' *Rev. de Hist.* São Paulo, 1950.

KIEMEN, M. C. *The Indian Policy of Portugal in the Amazon region*, 1614-1693. Washington, 1954.

LAUDE, ABBÉNORBERT. *La Compagnie d' Ostende et son activité coloniale au Bengale.* Brussels, 1944.

LIVERMORE, H. V. and ENTWISTLE, J. *Portugal and Brazil.* Oxford, 1953.

RICARD, R. *Le commerce de Berbérie et l' Organization économique de l' Empire portugais aux XVème et XVIème siècles.* Paris, Annales de l' Institut d' Études Orientales, 1936.

WELCH, S. *South Africa under King Sebastian and the Cardinal, 1557-1580.* Cape Town, 1950.

——*Portuguese and Dutch in South Africa.* Cape Town, 1951.

7. 西班牙

BAGUÉ, S. *Economia de la sociedad colonial.* Buenos Aires, 1949.

BORAH, W. *Early Colonial Trade and Navigation between Mexico and Peru.* Berkeley. 1954.

BENAVENTI, M. *Relaciones de la Nueva España.* Mexico, 1956.

CHAUNU, H. and CHAUNU, P. *Séville et l' Atlantique, 1504-1650.* 3 vols. Paris, 1956.

CHEVALIER, F. *La formation des grands domaines au Mexique.* Pairs, 1952.

DE AYALA, P. 'El régimen comercial de Canarias en las Indias en los siglos XVI, XVII, y XVIII.' *Revista da historia.* Madrid, 1951.

DE LUZ, F. M. *O conselho da India.* Lisbon, 1952.

FARIAS, E. A. 'La politica española sobre poblacion indigena.' *Revista nacional cultura.* Caracas, 1955. [600]

FOLMER, H. *Franco-Spanish Rivalry in North America*, 1542-1763. Glendale, 1953.

HANKE, L. and AUGUSTIN, M. C. *Cuerpo de documentos del sigle XVI sobre el derecho de España en las Indias y las Filipinas.* Mexico, 1943.

HANKE, L.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The Hague, 1951.

——The Spanish Struggle for justice in the conquest of Americ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49.

——*La Villa Imperial de Potosi.* Sucre, Bolivia, 1954.

HARING, C. H. *The Spanish Empire in America.* Oxford, 1947.

HOWE, W. *The Mining Guild of New Spain and its Tribunal General, 1770-1821.* Cambridge, Mass., 1949.

KONETZKE, R. *Coleccion de documentos para la historia de la formacion social de Hispanoamerica.* I. *1493–1592.* Madrid, 1953.
——*La migracion española al Rio de la Plata durante el siglo XVI.* Madrid, 1952.
——*Das Spanische Weltreich, Grundlagen und Entstehung.* Munich, 1943.
LAVALA, S. *La encomienda indiana.* Madrid, 1935.
——*Estudios Indianos.* Mexico, 1949.
——*Institutiones juridicas en la conquista de America.* Madrid, 1935.
LAVALA, S. and CASTELO, N. *Fuentes para la historia del Trabajo en Nueva España, 1575–1805.* 8 vols. Mexico, 1939–46.
MADARIAGA, SALVADOR DE. *The Rise of the Spanish Empire.* London, 1948.
MERRIMAN, R. B. *The Rise of the Spanish Empire.* 3 vols. London, 1918–25.
MORALES, FR. PATRON. *Jamaica española.* Seville, 1952.
PARRY, J. H. *The Audiencia of New Galici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1948.
——*The Spanish Theory of Empir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1940.
PEREZ, R. D. *Historia de la colonizacion española en America.* Madrid, 1947.
——*Recopilacion de Leyes de los Regnas de las Indias, 1680–*. 3 vols. New edition, Madrid, Consejo de la Hispanidad, 1943.
SCHÄFER, E. *Der Königlich Spanische oberste Indienrat, Consejo Real Y supremo de las Indias.* Hamburg, 1936.
SCHURZ, W. L. *The Manila Galleon.* New York, 1939.
SIMÕES DE PAULA, E. ‘Inventario de documentos ineditos de interêsse para a historia de São Paulo.’ *Revista de Historia.* São Paulo, 1952.
SIMPSON, L. B. *The Encomienda in New Spain.* Berkeley, 1950.
SMITH, R. S. *The Spanish Guild Merchant.* Durham, N. C., 1940.
VASCONCELOS, J. *El sistemo de gobierno en la Colonia.* Mexico, 1952.
VILLENA, G. L. *Las minas de Huancavelica en los siglos XVI y XVII.* Seville, 1949.
WILGUS, C. A. *The Development of Hispanic America.* New York, 1947.
WILLIAMS, E. ‘The Negro slave trade in Anglo-Spanish relations.’ *Caribbean Historical Review.* Trinidad, 1950.

第五章　农作物和牲畜

ARBER, A. *Herbals.* Cambridge, 1912.
BEER, G. L. *The Old Colonial System 1660–1754*, Part I. 2 vols. New York, 1912.
BURTON, W. G. *The Potato.* London, 1948.
CARRIER, L. *The Beginnings of Agriculture in America.* New York, 1925.
CHATT, E. M. *Cocoa.* New York and London, 1953.
CHEESMAN, E. E. ‘The history of introduction of some well-known West Indian Staples.’ *Tropical Agriculture.* Vol. 16 p. 101, 1939.
CHEVALIER, A. and EMMANUEL, H. – F. *Le Tabac.* Paris, 1948.
CHEVALIER, A. *Le Café.* Paris, 1949.
[601] COLLINS, J. L. *The Pineapple.* London and New York, 1960.
CROFTON, R. H. *A Pageant of the Spice Islands.* London, 1936.
CURSON, H. H. and THORNTON, R. W. ‘A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African native cattle.’ *Onderstepoort Journal of Veterinary Science.* Vol. 7, p. 613, 1936.
DEERR, N. *The History of Sugar.* 2 vols. London, 1949–50.
FAIRHOLT, F. W. *Tobacco: Its History and Associations*, London, 1876.
FURNTVALL, J. S. *Netherlands India.* Cambridge, 1944.
GOSSE, P. *St. Helena 1502–1938.* London, 1938.
HAARER, A. E. *Modern Coffee Production.* London, 1956.
VAN HALL, C. J. J. *Cocoa.* London, 1914.

HARLER, C. R. *The Culture and Marketing of Tea*(2nd ed.). London, 1956.
HOWELL, C. E. *Tea.* London, 1951.
JONES, W. O. *Manioc in Africa.* Stanford, 1959.
KIRKPATRICK, F, A. *The Spanish Conquistadores*(2nd ed.). London, 1946.
LYDEKKER, R. *The Ox and Its Kindred.* London. 1912.
MASEFIELD. G. B. *A short History of Agriculture in the British Colonies.* Oxford, 1950.
McINTOSH. T. P. *The Potato: Its History, Varieties, Culture and Diseases.* Edinburgh, 1927.
MITRANY D. *The Land and the Peasant in Rumania.* London, 1930.
PARKER, H. H. *The Hop Industry.* London, 1934.
PITMAN, F. W.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ritish West Indies, 1700-1763.* New Haven and London, 1917.
PRESTAGE, E. *The Portuguese Pioneers.* London, 1933.
PURSEGLOVE, J. W. 'History and functions of botanic garden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ingapore.' *Tropical Agriculture.* Vol. 34, p. 165, *1957.*
RIBEIRO, O. *Geografía de España y Portugal.* Vol. V. Barcelona, 1955.
RIDLEY, H. N. *Spices.* London, 1912.
SALAMAN, R. N. *The History and Social Influence of the Potato.* Cambridge, 1949.
SHEPHARD, C. Y. 'British West Indian economic history in Imperial perspective.' *Tropical Agriculture.* Vol. 16, p. 151, 1939.
SPRAGUE, G. F. *Corn and Corn Improvement.* New York, 1955.
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57.* Washington, 1960.
VLEKKE, B. H. M. *Nusantara: A History of the East Indian Archipelago.* Cambridge, Mass., 1943.
WADHAM, S. M. and WOOD, G. L. *Land Utilization in Australia*(2nd ed.). Melbourne, 1950.
WILLIAMSON, J. A. *A Short Hisory of British Expansion.* London, 1927.
YOUATT, W. *The Pig.* London, 1860.

第六章　殖民定居点及其劳动力问题

1. 未出版的文献

London, Public Record Office, Series CO. I.

2. 已出版的著作

ALBUQUERQUE, AFFONSO. *See* BIRCH, W. DE G.
ANDREWS, C. M. *British Committees, Commissions and Councils of Trade and Plantations.* Baltimore, 1908.
——*The Colonial Period of American History.* 4 vols. New Haven, 1934-8.
ANDREWS, K. R. (ed.). *English Privateering Voyages to the West Indies, 1588-1595.*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59.
ARBER, E. (ed.). *The Travels and Works of Captain John Smith.* 2 vols. Edinburgh, 1910.
BARBOUR, V. *Capitalism in Amsterdam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altimore, 1950. 【602】
BARROS, R. DE. *The Origins of the British Colonial System, 1578-1660.* New York, 1908.
BEER, G. L. *The Old Colonial System.* 2 vols. New York, 1933.
BIRCH, W. DE. G. (ed.). *The Commentaries of the great Afonzo Dalboquerque.* 4 vols.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875-83.
BLAKE, J. W. *European beginnings in West Africa, 1544-1578.* London, 1937.
BONNASSIEUX, P. *Les Grandes Compagnies de Commerce.* Paris, 1892.
BORAH, W. and COOK, S. F. *The population of Central Mexico, 1531-1601.* Berkeley, 1960.

BOURNE, E. G. *Spain in America, 1450–1580*. New York, 1904.
BOXER, C. R. *The Dutch in Brazil, 1624–1654*. Oxford, 1957.
——*Salvador de Sã and the struggle for Brazil and Angola, 1602–1686*. London, 1952.
BRAKEL, S. van. *De Hollandsche Handelscompagneen der zeventiende Eewe*. The Hague, 1908.
BURN, W. L. *The British West Indies. London*. 1951.
——*Emancipation and Apprenticeship in the British West Indies*. London, 1937.
CASAS, BARTOLOMEO DE LAS. *Apologética historia de las Indias*. Ed. M. Serrano y Sanz. Madrid. 1909.
——*Historia de las Indias*. 3 vols. Ed. G. de Reparaz. Madrid, 1929.
CHEMIN-DUPONTÈS, P. *Les Compagnies de Colonisation en Afrique Occidentale sous Colbert*. Paris, 1903.
CORBETT, J. S. *Drake and the Tudor Navy*. 2 vols. London, 1917.
CRAVEN, W. F. *The Southern Colonie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1607–1689*. Louisiana, 1949.
CROUSE, NELLIS M. *The French Struggle for the West Indies, 1665–1713*. New York, 1943.
DAVENPORT, F. G. (ed.). *European Treaties bearing o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4 vols Washington, 1917–37.
DAVIES, K. G. *The Royal African Company*, London, 1957.
DONNAN, E.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History of the Slave Trade to America*. Washington, 1930–5.
DRAKE, T. E. *Quakers and Slavery in America*. New Haven, 1950.
EDMUNDSON, G. *Anglo-Dutch Rivalry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Oxford, 1911.
—— 'The Dutch power in Brazil.'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XI, 1896.
FAGE. J. 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West Africa*. Cambridge, 1955.
FISKE, J. *The Dutch and Quaker Colonies in America*. 2 vols. Boston, 1899.
FOSTER, SIR Wm. (ed.). *The Voyages of Sir James Lancaster to Brazil and the East Indies, 1591–1603*.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40.
FREYRE, GILBERTO. *The Masters and the Slaves. New York*, 1946.
——*The Portuguese and the Tropics*. Lisbon, 1961.
FURNIVALL, J. S. *Netherlands India*. Cambridge, 1944.
GASTON-MARTIN, DR. *L' ère des négriers, Nantes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1913.
——*Histoire de l' esclavage dans les colonies françaises*. Paris, 1948.
GIRAUD, M. *Histoire de la Louisiane française*. 2 vols. Paris, 1953–8.
——*Le métis canadien*. Paris, 1945.
HANKE, L. *The First Social Experiments in America*. Cambridge, Mass., 1935.
HARDING, N. DERMOTT. *Bristol and America, a Record of the First Settlers, 1654–1685*. London [no date].
HARDY, G. *Histoire de la colonisation française* (5th ed.). Paris, 1947.
HARING, C. H. *The Spanish Empire in America*. New York, 1947.
——*Trade and Navigation between Spain and the Indies in the time of the Hapsburgs*. Cambridge, Mass., 1918.
HARLOW, V. T. *A History of Barbados, 1625–1685*. Oxford, 1926.
HAUSSER, H. *La Pensée at l' Action Économiques du Cardinal de Richelieu*. Paris, 1944.
HIGHAM, C. S. 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eeward Islands under the Restoration*. Cambridge, 1921.
HOTTEN, J. C. *The original Lists of Persons of Quality... and others who went from Great Britain to the American Plantations*. Reprinted New York, 1931.
[603] JACKSON, M. V. *European Powers and South-east Africa*. London, Royal Empire Society, 1942.
JENKINSON, H. *Records of the English African Companies*.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VI, 1912.
JOBSON, R. *The Golden Trade*. London, 1623; reprinted Teignmouth, 1904.
KELLER, A. G. *Colonisation. A Study of the founding of New Societies*. Boston, 1908.
KIRKPATRICK, F. A.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1938.
——*The Spanish Conquistadores*. London, 1934.
LANNOY, C. DE and VAN DER LINDEN. H. *L' Expansion coloniale des peuples Européens, Portugal et Es-*

pagne. Brussels, 1907.
LATOURETTE. K. S. *History of the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7 vols. New York, 1943-7.
LEROY-BEAULIEU, P. *De la colonisation chez les peuples modernes*. 2 vols. (6th ed.). Paris, 1908.
LIGON, R. *A true and exact history of the island of Barbados*. London, 1657.
MCLACHLAN, J. O. *Trade and Peace with old Spain, 1667-1750*. Cambridge, 1940.
MACLEOD, W. C. *Contacts of Europe with the American Aborigines; European Civilization, its Origin and Development*. Ed. E. Eyre. Vol. VII Oxford, 1939.
MADARLAGA, SALVADOR DE. *The Rise of the Spanish Empire*. London, 1947.
MARGRY, P. *Mémoires et documents pour servir à l' histoire des origines françaises des pays d' outremer*. 6 vols. Paris, 1879-87.
MATHIESON, W. L. *British Slavery and its Abolition*. London, 1926.
MIMS, S. L. *Colbert' s West India Policy*. New Haven, 1912.
MONTCHRÉTIEN, A. DE. *Traicté de l' oeconomie politique*. Ed. Th. Funck-Brentano. Paris, 1925.
MOSES, B. *The Spanish Dependencies in South America*. 2 vols. London, 1914.
NATHAN, SIR M. 'The Gold Coast at the end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under the Danes and Dutch.' *Journal of the African Society*, IV. London.
NEWTON, A. P. *The Colonising Activities of the English Puritans*. New Haven, 1914.
——*The European Nations in the West Indies, 1493-1688*. London, 1933.
PARES, R. *War and Trade in the West Indies*. Oxford, 1936.
——*A West India Fortune*. London, 1949.
PARRY, J. H. *Europe and a Wider World*. London, 1949.
——*The Spanish Theory of Empir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1940.
PARRY, J. H. and SHERLOCK, P. M. *A Short History of the West Indies*. London, 1956.
PITMAN, F. W.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ritish West Indies*. New Haven, 1917.
PRESTAGE, E. *The Portuguese Pioneers*. London, 1933.
PRICE, A. GRENFELL. 'Pioneer reactions to a poor tropical environment.' *American Geographical Review*. New York. July 1933.
——'White settlers in the Tropics.'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New York, 1939.
PYM, SIR ALAN. *Colonial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London, 1946.
QUINN, D. B. (ed.). *The Roanoake Voyages*. 2 vols.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55.
RAGATZ, L. J. *The Fall of the Planter Class in the British Caribbean*. New York, 1928.
RICH, E. E. 'The population of Elizabethan Englan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50.
——*The First Earl of Shaftesbury' s Colonial Policy*. Transactions of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5th ser. , vol. 7, 1957.
SACO, J. A. *Historia de la esclavitud de la raza africana en el Nuevo Mundo*. 2 vols. Barcelona, 1879-93; reprinted Havana, 1938.
SAINTOYANT, J. *La colonisation Européenne du xve au xix Siècle*. 3 vols. Paris, 1938-40.
——*La colonisation française sous l' Ancien Régime*. 2 vols. Paris, 1929.
SCOTT, W. R. *The Constitution and Finance of English, Scottish and Irish Joint-Stock Companies to 1720*, 3 vols. Cambridge, 1911-12.
SCELLE, G. *La traite négrière aux Indes de Castille*. 2 vols. Paris, 1906.
SCHOELCHER, V. (ed. A. CÉSAIRE). *Esclavage et Colonisation*. Paris, 1948.
SÉE. H. 'Commerce française à Cadix et dans l' Amerique Espagnole au xviii siècle.' *Revue d' histoire moderne*, 1928.
SHERLOCK, P. M. *See under* PARRY, J. A.
SIMPSON, L. B.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Indian Slaves and the Resettlement of the Freedmen, 1548-1555*. Berkeley, 1940.
——*The encomienda in New Spain, 1942-1550*. Berkeley, 1929.
——*The Repartimiento System of Native Labor in New Spain and Guatemala*. Berkeley, 1938. [604]
SLUITER, E. 'Dutch-Spanish rivalry in the Caribbean area.'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48.
SMITH. A. E. *Colonists in Bondage*. Chapel Hill, N. C. , 1947.

SMITH, CAPT, JOHN. *Travels and Works. Ed. E. Arber.* 2 vols. Edinburgh, 1910.
THOMAS, DALBY,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Rise and Growth of the West India Colonies.* London, 1690.
VANDER LINDEN, H. *See under* LANNOY, C. DE.
VIGNOLS. L. 'L'institution des Engagés, 1626~1774.'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Paris, 1928.
VLEKKE, B. H. M. *Nusantara, a History of the East Indian Archipelago.* Cambridge, Mass., 1943.
WEGG, J. *Antwerp, 1447-1559.* London, 1916.
WHEELER, J. *A Treatise of Commerce.* Ed. G. B. Hotchkiss, New York. Facsimile Text Society, 1931.
WHITEWAY, R. S. *The Rise of the Portuguese Power in India, 1497-1550.* London, 1899.
WILLAMS, E. *Capitalism and Slavery.* Chapel Hill, N. C., 1944.
WILLIAMSON, J. A. *The Caribee Islands under the Proprietary Patents.* Oxford, 1926.
——*Hawkins of Plymouth.* London, 1949.
WRIGHT, I. A. (ed.). *Documents concerning English Voyages to the Spanish Main, 1569-80.*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32.
——*Further Documents concerning English Voyages to the Spanish Main, 1580-1603.*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51.
——*Spanish Documents concerning English Voyages to the Caribbean, 1527-68.*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29.
WRONG, G. M. *The Rise and Fall of New France.* 3 vols. Toronto, 1928.
WYNDHAM, HON. H. A. *The Atlantic and Slavery.* Oxford, 1935.
——*The Atlantic and Emancipation.* Oxford, 1937.
ZAVALA, S. *La encomienda indiana.* Madrid, 1935.
——*New Viewpoints on the Spanish Colonisation of America.* Philadelphia, 1943; translation of *Ensayos sobre la colonización española en América.* Buenos Aires, 1944.
ZAVALA, S. and ZAVALA. M. C. (eds.). *Fuentes para la historia del trabajo en Nueva España.* Mexico, 1939~45.
ZOOK, G. F. *Company of Royal Adventurers Trading to Africa.* Lancaster, Pennsylvania, 1919.

第七章 1450~1750 年欧洲的价格

物价史的参考书目汗牛充栋，远远超过了分配给这一章的空间。这里列入的著作和文章只是形成这一主题的有代表性的已出版的文献、经典研究和讨论。

ABEL, W. *Agrarkrisen und Agrarkonjunktur in Mitteleuropa vom 13 bis zum 19 Jahrhundert,* Berlin, 1935.
——'Bevölkerungsgang und Landwirtschaft im ausgehenden Mittelalter im Lichte der Preis-und Lohnbewegung.' *Schmollers Jahrbuch*, 1934.
—— *Die Wüstungen des ausgehenden Mittelalters*. Jena, 1943.
——'Wüstungen und Preisfall im spätmittelalterlichen Europa.'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1953.
ACHILLES, W. 'Getreidepreise und Getreidehandelsbeziehungen europäischer Räume im 16 und 17 Jahrhundert.' *Zeitschrift für Agrargeschichte und Agrarsoziologie*, 1959.
ADAMCZYK, W. *Ceny w Lublinie od XVI do końca XVIII wieku.* Lwow, 1935.
—— *Ceny w Warszawie w XVI i XVII wieku*, Lwow, 1938.
ALIVIA, G. 'Di un indice che misura l'impiego monetario dell'oro relativamente a quello dell'argento elesue variazioni dal 1520 ad oggi.' *Giornale degli Economisti*, 1911.
[605]
ANDERSSEN, W. 'Materialien zum ragusanischen Mass-und Geldwesen.'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1935.
ANZANO, T. DE. *Reflexiones Económico-Politicas sobre las causas de la Alteración de Precios.*

Saragossa,1768.

ARENS, F.' Analekten zur Geschichte des spätmittelalterlichen Geldhandels in Dauphiné.'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1928.

D'AVENEI,VICOMTE G. *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a propriété,des salaires,des denrées et de tous les prix en général,depuis l' an 1200 jusqu' à l' an 1800.* 7 vols. Paris,1894-1926.

—— *Histoire de la fortune française:la fortune privée à travers sept siècles.* Paris,1927.

BAEHREL,R. 'Economie et histoire:à propos des prix. ' *Hommage à Lucien Febvre.* 2 vols. Paris, 1954.

——' L ' exemple d' un exemple: histoire statistique et prix italiens. ' *Annales:Economies, Sociétiés,Civilisations*, 1954.

——' Pitié pour elle et pour eux. ' *Annales:Economies,Sociétiés,Civilisations*, 1955.

——' Prix, superficies, statistique, croissances. ' *Annales:Economies,Sociétiés,Civilisations*, 1961.

—— *Une croissance:la Basse-provence rurale depuis la fin du XVIe siècle jusqu' à la veille de la Révolution*, I vol. + graphs. Paris,1961.

BANG ,N. E. *Tabeller over Skibsfart og Varetransport gennem ϕresund 1479-1660.* 2 parts in 3 vols. Copenhagen,1906-22.

——and KORST, K. *Tabeller over Skibsfart og Varetransport gennem ϕresund 1661-1783 og gennem Storebaelt 1701-1748.* 2 parts in 3 vols. Copenhagen,1930-45.

BARBIERI,G. 'Un' azienda agricola parmense ed i prezzi dei cereali intorno alla metà del secolo XVI. ' *Saggi di storia economica italiana.* Bari,1948.

BARKAN, O. L. ' Le chantier d' une grande mosquée à Istanbul au XVIe siècle. ' *Annales: Economies,Sociétiés,Civilisations*, 1962.

BARTOLINI,D. 'Contribuzioni alla storia e statistica dei prezzi e salari la metida del frumento,vino ed oglio dal 1670 al 1685. ' *Annali di Statistica*,1879.

—— *Contribuzione per una storia dei prezzi e salari,Rome*,1881.

——'La metida del frumento, vino ed oglio dal 1670 al 1685 mel commune di Portogruaro. ' *Annali di Statistica*,1879.

——'Prezzi e salari nel commune di Portogruaro durante il secolo XVI. ' *Annali di Statistica*, 1878.

BATH . B. H. SLICHER VAN. *De agrarische Geschiedenis van West-Europa(500-1850)*. Utrecht, 1960. (and English translation,London,1963).

BAULANT,M. and MEUVRET,J. *Prix des céréales extraits de la mercuriale de Paris(1520-1698)*. 2 vols. Paris 1960-2.

BEELE. SLOET VAN DE. 'Diagramme représentant les prix moyens des céréales au marché d' Arnhem entre le II novembre et le 22 février des années 1544 à 1869 dressé d' après des données officielles. ' *Bijdragen tot de Statistiek van Nederland,Nieuwe Volgreeks XXVI.* The Hague, 1903.

BENNETT, M. K. ' British wheat yield per acre for seven centuries. ' *Economic Journal Supplement*, III,1934 -7.

BERNARDINO,A. 'Contributo alla storia dei prezzi in Sardegna tra la fine del secolo XVIII e il principio del secoloXIX. ' *Giornale degli Economisti.* 1931.

BERRY,T. S. *Western Prices before 1861.* Cambridge,Mass,1934.

BEVERIDGE,LORD, *Prices and Wages in England from the Twelf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Vol. I. London,1939.

——' A statistical crim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 1928-9.

——'The trade cycle in Britain before 1850. ' *Oxford Economic Papers.* 1940.

——'Wages in the Winchester Manors.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36-7.

——'Weather and harvest cycles. ' *Economic Journal.* 1921.

——'Wheat measures in the Winchester Roll. ' *Economic Journal Supplement.* II,1930-3.

——'Wheat prices and rainfall in western Europe. '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1922.
——'The yield and price of corn in the Middle Ages.' *Economic Journal Supplement.* I. 1926-9.

[606]

BEZANSON, A., GRAY, R. D. and HUSSEY, M. *Prices in Colonial Pennsylvania 1770-1790.* Philadelphia, 1935.
——*Wholesale prices in Philadelphia 1784-1861.* 2 vols. Philadelphia, 1936-7.
BEZANSON, A., DALEY, B., DENISON, M., and HUSSEY, M. *Prices and Inflation dur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Pennsylvania 1770-1790.* Philadelphia, 1951.
BEZARD, Y. *La vie rurale dans le sud de la région parisienne de 1450 à 1560*. Paris, 1929.
BLOCH, M. 'L'histoire des prix: remarques critiques.'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939.
——'La monnaie de compte.'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935.
——'Les mutations monétaires et les dettes.'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934.
——'Prix, monnaies, courbes.'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1946.
——'Le problème de la monnaie de compte.'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938.
——'Le problème de l'or au moyen âge.'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933.
——'Le salaire et les fluctuations économiques à longue période.' *Revue historique*. 1934.
BODIN, J. *La Réponse de Maistre Jean Bodin, Avocat en la Coru, au Paradoxe de Monsieur de Malestroit touchant l'enchérissement de toutes choses et le moyen d'y remédier*. Paris, 1568. Ed. E. Coornaert. Paris, 1932.
BOLDRINI, M. 'L'organizzazione annonaria di Matelica nel secolo XVII.' *Giorale degli Economisti*, 1921.
——'Il prezzo del pane in Matelica nel secolo XVII.' *Giornale degli Economisti.* 1921.
BORAH, W. and COOK, S. F. *Price trends of some basic commodities in Central Mexico 1531-1570.* Berkeley, 1958.
BRAUDEI, F. 'Histoire et sciences sociales: la longue durée.'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1958.
——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 Paris, 1949.
——'En relisant Earl J. Hamilton: de l'histoire de l'Espagne à l'histoire des prix.'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1951.
——and SPOONER, F. *Les métaux monétaires et l'économie du XVIe siècle. Rapport au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Rome, 1955.
BRENNER, Y. S. 'The inflation of prices in early sixteenth century Englan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61.
BRESCIANI-TURRONI, C. 'Movimenti di lungha durata dello sconto et dei prezzi.' *Giornale degli Economisti.* 1917.
PHELPS BROWN, E. H. and HOPKINS, S. 'Builders' wag-rates, prices and population: some further evidence.' *Economica.* 1959.
——'Seven centuries of building wages.' *Economica.* 1955.
——'Seven centuries of the prices of consumables, compared with builders' wage-rates.' *Economica*, 1956.
——'Seven centuries of wages and prices: some earlier estimates.' *Economica.* 1961.
——'Wage-rates and Prices: evidence for population pressur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Economica.* 1957.
CAGNAZZI, L. DE SAMUELE. *Notizie dei prezzi di alcune derrate di alimento per più di due secoli. Atti della Accademia Pontaniana.* 1810.
CALÒ, G. *Indagine sulla dinamica dei prezzi in Genova durante il secolo XVII*. Vol. I,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Genova, Anno Academico, 1957-8.
CASTILLO, A. 'Dette flottante et dette consolidée en Espagne de 1557 à 1600.' *Annales: Economic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1963.
CHABANEAU, C. 'Cartulaire du Consulat de Limoges.' *Revue do Langues Romaines.* 1895.
CHABERT, A. 'Encore la révolution des prix au XVIe siècle.'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1957.
CHABOD, F. *Note e documenti per la storia economico-finanziaria dell' Impero di Carlo V*. Padua, 1937.
CHAUNU, H. and p. *Séville et l' Atlantique 1504 à 1650* . II vols. Paris, 1955-60.
CIPOLLA, C. M. *Mouvements monétaires dans l' Etat de Milan(1500-1700)*. Paris, 1952.
—— 'La prétendue 'révolution des prix' : réflexions sur l' expérience italienne.' *Annales: Economi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 1955.
—— 'Storia dei prezzi e storia della moneta.' *L' Industria*. 1950.
[607]
CLARK, G. N. 'The occasion of Fleetwood' s "Chronicon Preciosum."'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936.
COLE, A. H. *Wholesale Commodity Pr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700-1861*. 2 vols. Cambridge, Mass. , 1938.
CONIGLIO, G. *Annona e calmieri a Napoli durante la dominazione spagnuola. Archivio storico per le provincie napoletane*. 1940.
—— *Note sulla storia della politica annonaria dei Vicere spagnuoli a Napoli. Archivio storico per le provincie napoletane*. 1941.
—— *La rivoluzione dei prezzi nella città di Napoli nei secoli XVI e XVII* . Spoleto, 1952.
COORNAERT, E. *La draperie-sayetterie d' Hondschoote(XIVe-XVIIe siècles)* . Paris, 1930.
CRAEYBECKX, J. 'Brood en levensstandard. Kritische nota betreffende de prijs van het brood te Antwerpen en te Brussel in de XVII en de XVIII eeuw.' *Bijdragen tot de Prijzengeschiedenis*. 1958.
DAUPHIN, V. 'Recherches pour servir à l' histoire des prix des céréales et du vin en Anjou sous l' Ancien Régime, XIe siècle à 1789.' *Revue de l' Intendance*. 1934.
DELATTE, I. 'Prix et salaires en Hainaut au XVIe siècle.' *Annales du Cercle Archéologique de Mons*, 1937-8.
DELUMEAU, J. *Vi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Rome dans la seconde moitié du XVIe siècle*. 2 vols. Paris, 1957-9.
DENIS, H. 'Les index numbers au XVIe siècle en Flandre.' *Annales de l' Institut des Sciences Sociales*. 1900.
DESMAREZ, G. 'Notice critique pour servir à l' histoire des prix.' *Revue de l' Université de Bruxelles* . 1901-2.
DEWEY, E. R. and DAKIN, E. F. *Cycles: the Science of Prediction* . New York, 1950.
DIECK. A. 'Lebensmittelpreise in Mitteleuropa und im Vorderen Orient vom 12 bis 17 Jahrhundert.' *Zeitschrift für Agrargeschichte und Agrarsoziologie*. 1955.
DITTMANN, O. 'Die Getreidepreise in der Stadt Leipaig im XVII, XVIII und XIX Jahrhundert.' *Mitteilungen des Statistische Amtes der Stadt Leipzig*. 1891.
DREYFUS, F.-G. 'Beitrag zu den Preisbewegungen im Oberrheingebiet im 18 Jahrhundert.'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 1960.
—— 'Prix et population à Trèves et à Mayenne au XVIIIe siècle.' *Revue d'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 1956.
DUPRÉ DE SAINT-MAUR, N. F. *Essai sur les monnaies, ou réflexions sur le rapport entre l' argent et les denrées*. Paris, 1746.
—— *Recherches sur la valeur des monnaies et sur les prix des grains, avant et après le Concile de Francfort* . Paris, 1762.
EINAUDI, L. (ed.). 'Dei criteri informatori della storia dei prezzi.' *Rivista storia economica*. 1940.
—— *Paradoxes inédits du seigneur de Malestroit touchant les monnoyes avec la réponse du Président de la Tourette*. Turin, 1937.
ELSAS, M. J. 'Price data from Munich 1500-1700.' *Economic Journal Supplement*. III, 1934-7.
—— *Umriss einer Geschichte der Preise und Löhne in Deutschland vom ausgehenden Mittelalter bis zum Begin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2 vols. in 3 parts Leiden, 1936-49.

ESPEJO, C. *Carestiá de la Vida en el Siglo XVI, Revista de Archivos, Bibliotecas y Museos*, 3ª Época, XXV.

FALKE, J. 'Geschichtliche Statistik der Preise im Königreich Sachsen.'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1869–70.

FANFANI, A. 'Un effetto economico della scoperta dell' America.' *Rivista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Sociale.* 1937.

—— *Indagine sulla rivoluzione dei prezzi.* Milan, 1940.

—— 'La rivoluzione dei prezzi a Milano nel XVI e XVII secolo.' *Giornale degli Economisti.* 1932.

FARAGLIA, N. F. 'Storia dei prezzi in Napoli dal 1131 al 1860.' *Atti del Reale Istituto di Incoraggiamento.* 1878.

FEBVRE, L. 'L' afflux de métaux d' Amérique et les prix à Séville.' *Annales d'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930.

[608] —— 'Le problème historique des prix.' *Annales d'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930.

FEBVRE L. 'Or d' Amérique et capitalisme.' *Annales d'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931.

FELIX, D. 'Profit inflation and industrial growth: the historic record and contemporary analogi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6.

FETTEL. J. *Die Getreide-und Brotversorgung der freien Reichstadt Esslingen, 1350–1802*. Stuttgart, 1930.

FISHER, F. J. 'Commercial trends and policie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40.

FLEETWOOD. W. *Chronicon Preciosum: or, an account of English money, the price of corn and other commodities for the last 600 years in a letter to a Student in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London, 1707.

FOURASTIÉ, J. 'Quelques réflexions sur le mouvement des prix et le pouvoir d' achat des salaires en France depuis le XVIIIe siècl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 Histoire Moderme*. 1953.

FRANCHINI, V. *Contributo alla storia dei prezzi in Italia*. Rome, 1928.

FRIEDENBERG, P. 'Die schlesischen Getreidepreise vor 1740.' *Zeitschrift des Vereins für Geschichte Schlesiens.* 1906.

FRIEDMAN, M. (ed.). *Studies in 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Chicago.* 1956.

FRIIS, A. 'An inquiry into the relations between economic and financial factors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53.

——and GLAMANN, K. *A History of Prices and Wages in Denmark, 1660 – 1800.* Copenhagen, 1958.

FURTAK, T. *Ceny w Gdańsku w latach 1701–1815.* Lwow, 1935.

GILBOY, E. W. *Wages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 Cambridge, Mass., 1934.

GIOLA, M. *Su commercio de' commestibili e caro Prezzo del vitto.* Avignon, 1830.

GIRALT RAVENTÓS, E. 'En torno al precio del trigo en Barcelona durante el siglo XVI.' *Hispania*, 1958.

GIRARD, A. 'La guerre des monnaies.' *Revue de Synthèse.* 1940–5.

GODARD, J. 'Contribution à l' étude de l' histoire du commerce des grains à Douai du XIVe au XVIIe siècle.' *Revue du Nord.* 1944.

GODINHO, V. M. *Prix et monnaies au Portugal.* Paris, 1955.

GOUBERT. P. *Beauvais et le Beauvaisis de 1600 à 1730: contribution à l' histoire sociale de la Franc du XVIIe siècle.* Paris, 1960.

GRIZIOTTI-KRETSCHMANN, J. *Il problema del trend secolare nelle fluttuazioni dei prezzi.* Pavia, 1935.

GUITTON, H. *Essai sur la loi de King*. Bordeaux, 1938.

HABAKKUK, H. J. 'The long term rate of interest and the price of land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52–3.

HAMILTON, E. J. 'American treasure and Andalusian prices 1503–1660.'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 1928.
—— *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in Spain 1501–1650.* Cambridge, Mass. ,1934.
—— '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1500–1700). ' *Economica.* 1929.
—— 'The decline of Spain.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37–8.
—— 'The History of Prices before 1750. ' *X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Rapports I.* Stockholm,1960.
—— 'The mercantilism of Geronimo de Uztáriz: a re-examination 1670–1732. ' *Economics, Sociology and the Modern World.* 1935.
—— 'Monetary problems in Spain and Spanish America 1751–1800.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 1944.
——*Money,Prices and Wages in Valencia. Aragon and Navarre,1351–1500.* Cambridge, Mass. , 1936.
—— 'Prices and wages at Paris under John Law's system. '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36–7.
—— 'Prices and wages in Southern France under John Law's system. ' *Economic Journal Supplement*, III,1934–7.
—— 'Prices as a factor in business growth:prices and progress.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52. [609]
Hamilton E. J. 'Profit inflation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51–1800. '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41–2.
—— 'Spanish mercantilism before 1700' *Facts and Factors in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Mass. ,1932.
—— 'The use and misuse of Price History.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44(Supplement).
—— 'Wages and subsistence on Spanish treasure ships 1503–1660.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29.
——*War and Prices in Spain,1651–1800.* Cambridge, Mass. ,1947.
Hammarström, I. 'The "Price Revolution"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some Swedish evidence. '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57.
Hanauer, A. Etudeséconomiques sur l'*Alsace ancienne et moderne.* 2 vols. Paris and Strasbourg, 1876–8.
Haring, C. H. 'American gold and silver productio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14–15.
Harsin, P. *Les doctrines monétaires et financières en Frane du XVIe du XVIIIe siècle.* Paris,1928.
Hauser, H. 'Un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nquête sur l'histoire des prix. '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1930.
—— 'La question des prix et des monnaies en Bourgogne dans la seconde moitié du XVIe siècle. ' *Annales de Bourgogne.* 1932.
——*Recherches et documents sur l'histoire des prix en France,1500–1800.* Paris,1936.
Heckscher, E. *Sveriges ekonomiska historia från Gustav Vasa.* 2 vols. Stockholm,1935–6.
Helferich, J. A. *Von den periodischen Schwankungen in Wert der edele Metalle von der Entdeckung Amerikas bis zum Jahr 1830.* Nürnberg,1843.
—— 'Württembergische Getreide-und Weinpreise von 1456 bis 1628;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Geldentwertung nach der Entdeckung von Amerika. '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mte Staatswissenschaft.* 1858.
Helleiner, K. F. 'The vital revolution reconsidered. '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957.
Holtrop, M. W. 'Theories of the velocity of circulation of money in earlier economic literature. ' *Economic Journal Supplement*, I,1926–9.
Hon-Firnberg, H. *Lohnarbeiter und freie Lohnarbeit im Mittelalter und zu Beginn der Neuzeit.* Baden b. Wien,1935.
Hoszowski, S. 'L'Europe centrale devant la révolution des prix. '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1961.

——*Ceny we Lwowie w latach 1701–1914*. Lwow, 1934.

——*Ceny we Lwowie w XVIiXVII wieku. Lwow*, 1928 (and French translation, Paris, 1954).

HOUTTE, H. VAN. *Documents pour servir à l' histoire des prix de 1381 à 1794. Académie Royale de Belgique, Commission Royale d' Histoire*. Brussels, 1902.

HOUTTE, J. A. VAN. *Het economisch Verval van het Zuiden, Algemeene Geschiedenis der Nederlanden*. Vol. v. 1952.

HUMBOLDT, F. H. A. VON. ' Uber die Schwankungen der Gold produktion mit Rücksicht auf staatswirtschaftliche Probleme. ' *Deutsche Vierteljahrschrift*. 1838.

HUTCHINS, B. L. ' Notes towards the history of London wages. ' *Economic Journal*. (IX) 1899 and (X) 1900.

IMBERT, G. *Des mouvements de longue durée Kondratieff*. Aix-en-Provence. 1959.

INAMA-STERNEGG, K. TH. VON. ' Quellen der historischen Preisstatistik. ' *Statistischen Monatsschrift*. 1886

JACOB, W. *An Historical Inquiry into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Precious Metals*. 2 vols. London, 1831.

JANACEK, J. *Rudofinské drahotni řády, přispěvek k dějinám cenové revoluce v Čechách*. Prague, 1957.

JOUANNE, ' Les monographies normandes et l' histoire des prix. ' *Normania*. 1931.

JUDGES, A. V. ' Scopi e metodi della storia dei prezzi. ' *Rivista Storia Italiana*. 1951.

KELLER, L. ' Zur Geschichte der Preisbewegung in Deutschland während der Jahre 1466–1525. ' [610]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1879.

KELSALL. R. K. ' Wages of northern farm labourers in mid-eighteenth centur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37–8.

KELTER, E. *Geschichte der obrigkeitlichen Preisregelung*. Jena, 1935.

KERRIDGE, E. ' The movement of rent, 1540–1640.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53–4.

KIRKLAND, J. *Three Centuries of Prices of Wheat, Flour and Bread*. London, 1917.

KNOOP, D. and JONES, G. P. ' Masons' wages in medieval England. ' *Economic Journal Supplement*, II, 1930–3.

KONDRATIEFF, N. D. ' Die langen Wellen der Konjunktur. '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1926.

KOENIGSBERGER, H. G. ' Property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56.

KOPPE, W. ' Zur Preisrevolution des 16 Jahrhunderts in Holstein. ' *Zeitschrift der Gesellschaft für Schleswig-Holsteinische Geschichte*. 1955.

KUZNETS, S. *Secular Movements in Production and Prices*. Boston, 1930.

—— ' Statistical trends and historical changes.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50–1.

LABROUSSE, C. E. *Esquisse du mouvement des prix et des revenues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2 vols. Paris, 1933.

—— ' Observations complémentaires sur les sources et la méthodologie pratique de l' histoire des prix et des salaires au XVIIIe siècle. ' *Revue d'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938.

—— ' Le prix du blé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 *Revue d'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931.

——*La crise de l' économie française à la fin de l' Ancien Régime et au début de la Révolution*. Vol. I. Paris, 1944.

—— ' Le prix du blé en France dans la seconde moitié du 18e siècle d' aprés les états statistiques du Contrôle Général. ' *Revue d'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930.

——*La crise de l' économie française à la fin de l' Ancien Régime et au début de la Révolution*. Vol. I. Paris, 1944.

—— ' Le prix du blé en France dans la seconde moitié du 18e siècle d' aprés les états statistiques du Contrôle Général. ' *Revue d'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930.

—— ' Quelques observations sur la lecture des courbes économiques. '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37.

——Un siècle et demi de hausse des prix agricoles (1726–1873). *Revue Historique*. 1940.

LATOUCHE, R. ' Le mouvement des prix en Dauphiné sous l' Ancien Régime. ' *Annales de*

l' Université de Grenoble. 1935.

——'Le prix du bié à Grenoble du XVe au XVIII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932.

——LEBER, J. M. C. *Mémoires sur l' appréciation de la fortune privée au Moyen Age relativement aux variations des valeurs monétaires et du pouvoir commercial de l' argent.* Paris, 1844.

LE BRANCHU, J. -Y. *Ecrits notables sur la monnaie, XVIe siècle, de Copernic à Davanzati.* 2 vols. Paris, 1934.

——'La théorie quantitative de la monnaie au XVIe siècle.' *Revue d' économie politique.* 1934.

LEHR, J. *Beiträge zur Statistik der Preise insbesondere des Geldes und des Holzes.* Frankfurt a. M., 1885.

LEFEBVRE, G. 'Le mouvement des prix et les origin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Annales d'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937.

LENNARD, R. 'Statistics of corn yield in medieval England.' *Economic Journal Supplement*, III, 1934-7.

LESCURE, J. *Hausses et baisses de prix de longue durée. Paris*, 1933.

LEVASSEUR, E. 'Une méthode pour mesurer la valeur de l' argent: des variations de la valeur de l' argent au seizième siècle.' *Journal des Economistes.* 1856.

——'Les prix, aperçu de l' 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a valeur et du revenu de la terre du commencement du XIIIe à la fin du XVIIIe siècle, avec un appendice sur le prix du froment et sur les disettes, depuis l' an 1200 jusqu' à l' an 1891.'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Nationale d' Agriculture de France.* 1896.

——*Rapport sur deux concours pour le prix Rossi.* Paris, 1894.

——'Tableaux des prix de céréales à Paris.' Séances et *Travaux de l' Académi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 1912.

LEWIS, G. R. *The Stannaries.* Cambridge, Mass., 1924.

LEXIS, W. 'Beiträge zur Statistik der Edelmetalle.'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1879.

LIAUTEY, A. *La hausse des prix et la lutte contre la vie chère en France au 16e siècle.* Paris, 1921. [611]

LIVET, G. L' *Intendance d' Alsace sous Louis XIV, 1648-1715.* Strasbourg, 1956.

LLOYD, W. F. *Prices of Corn in Oxford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also from the year 1583 to the Present Time.* Oxford, 1830.

LONARDO, P. *Contributo alla storia dei prezzi nelle provincie napoletane.* Naples, 1904.

MAAS, W. 'Zur Geschichte der Preise in Polen, Österreich und Oberdeutschland.'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1938.

MCARTHUR, E. A. 'A fifteenth-century assessment of wages.'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898.

MADDALENA, A. DE. *Prezzi e aspetti di mercato in Milano durante il secolo XVII.* Milan, 1950.

MAGOLDI, V. and FABRIS, R. 'Notizie sui salaie e sui prezzi di alcune derrate alimentari e prodotti industriali nelle citte di Milano, Venezia, Genova e Firenze nei secoli XIII al XVIII.' *Annali di Statistica.* 1878.

MANDICH, G. 'Formule monetarie veneziane del periodo 1619-1650.' *Il Risparmio.* 1957.

MANKOV, A. G. *Le mouvement des prix dans l' Etat Russe du XVIe siècle* (French translation). Paris, 1957.

MANTELLIER, P. *Mémoire sur la valeur des principales denrées et et marchandises qui se vendaient ou se consommaient en la ville d' Orléans au cours des XIVe, XVe, XVIe,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Archéologique de l' Orléanais.* Vol. v, 1862.

MASSA, C. *Il prezzo del grano e dell' orzo in terra di Bari (1419-1727). Atti dell' Accademia Pontaniana.* 1908.

——*I salari agricoli in terra di Bari (1447-1733). Atti dell' Accademia Pontaniana.* 1911.

MAZIÈRES, L. DE. 'Note sur les prix en France.' *La Science Historique.* 1922.

MENSI, F. 'Zur Geschichte der Preise und Löhne in Steiermark.' *Zeitschrifs des Historischen Vereines für Steiermark.* 1935.

MESSANCE, F. *Réflexions sur la valeur du blé tant en France qu' en Angleterre, depuis 1674 jusqu' en*

1764(printed as an appendix to *Recherches sur la Population*). Paris,1766.

MEUVRET,J. 'Conjoncture et crise au XVIIe siècle:l'exemple des prix milanais. '*Annales:Economies,Sociétés,Civilisations.* 1953.

——La géographie des prix des céréales et les anciennes économies européennes, prix méditerranéens,prix continentaux,prix atlantiques à la fin du XVIIe siècle. *Revista da Economia*,vol. IX.

——*L'histoire des prix des céréales en France dans la seconde moitié du XVIIe siècle,sources et publication,Mélanges d'Histoire Sociale.* 1955.

——*Les mouvements des prix de 1661 à 1715 et leurs répercussions,Communication faite à la Société de Statistique de Paris.* 1944.

——'Simple mise au point. '*Annales:Economics Societes,Civilisations.* 1955.

MIRA ,G. *Contributo per una storia sui prezzi in alcune provincie delle Puglie. Atti della Società Italiana di Statistica.* 1942.

——*Un episodio di politica annonaria:importazione di grani a Como nel 1628. Aspetti dell'economia comasca.* Como,1939.

——'I prezzi dei cereali a Como dal 1612 al 1658. '*Rivista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Sociale.* 1941.

MOREYRA Y PAZ SOLDAN,M. *En torno a dos valiosos documentos sobre Potosi.* Lima,1953.

NADAL OLLER,J. 'La revolución de los precios españoles en el siglo XVI. *Hispania.* 1959.

NAUDÉ,W. *Die Getreidehandelspolitik der Europäischen Staaten vom bis zum 18 Jahrhundert, I—Die Getreidehandelspolitik, Acta Borussica, 1896; II—Die Getreidehandelspolitik und Kriegsmagazinverwaltung Brandenburg-Preussens bis 1740*(W. Naudé and G. schmouer),Acta Borussica,1901;*III—1740—1756*(G. Schmoller W. Naudé and A. Skalweit),Acta Borussica,1910;*IV—1756-1806*(A. Skalweit) *Acta Borussica*, 1931.

NEF,J. U. 'A comparison of industrial growth in France and England from 1540 to 1640.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36.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reconsidere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43.

——'Prices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in France and England(1540-164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37.

【612】 ——'Silver production in Central Europe 1450-1618.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41.

NIELSEN,A. 'Dänische Preise 1650-1750.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1906.

NOTTIN,L. *Recherches sur les variations des prix dans le Gâtinals du XVIe au XIXe siècle.* Paris, 1935.

PARENTI,G. *Prezzi e mercato del grano a Siena(1546-1765).* Florence,1942.

——*Prime ricerche sulla rivoluzione dei prezzi in Firenze.* Florence,1939.

PELC ,J. *Ceny w Gdańsku w XVI i XVII wieku.* Lwow,1937.

——*Ceny w Krakowie w latach 1369-1600.* Lwow,1935.

PESǍK,V. *Polské prace a methody pře studi u historie, cen, Věstnik Československé Akademie Zemědělska.* 1935.

PETINO,A. *I prezzi del grano,dell'orzo,dell'olio,del vino,del cacio a Catania dal 1512 al 1630.* Milan,1949.

——*La questione del commercio dei grani in Sicilia nel Settecento.* Catania,1946.

PHINNEY,J. T. 'Gold production and the price level:the Cassel three per c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33.

POPELKA,F. 'Die Bewegung der Fleischpreise in Österreich im 16 Jahrhundert. '*Zeitschrift des Historischen Vereines für Steiermark.* 1935.

——'Die Lebensmittelpreise und Löhne in Graz vom 16 bis zum 18 Jahrhundûert.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1930.

POSTHUMUS,N. W. *De Geschiedenis van de Leidsche Lakenindustrie.* 3 vols. The Hague,1908-39.

——*Inquiry into the History of Prices in Holland.* 2 vols. Leiden,1946-65.

PRIBRAM,A. F. *Materialien zur Geschichte der Preise und Löhne in Österreich.* Vol. I. Vienna,1938.

QUENEDEY,R. *Les prix des matériaux et de la maind'oeuvre à Rouen du XIVe au XVIIIe siècle.* Rou-

en, 1927.

QUIRING, H. *Die Geschichte des Goldes.* Stuttgart, 1948.

RAVEAU, P. *L' agriculture et les classes paysannes.* Paris, 1926.

——' La crise des prix au XVIe siècle en Poitou. ' *Revue Historique.* 1929.

——*Essai sur la situation économique et l' état social en Poitou au XVIe siècle.* Paris, 1931.

——*La vie économique en Poitou au XVIe siècle.* Poitiers, 1917.

ROBINSON, W. C. ' Money,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change in late medieval Europ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59, and *Note by* M. M. Postan, *ibidem.*

ROGERS, J. E. THOROLD. *A History of Agriculture and Prices in England From the Year after the Oxford Parliament(1259) to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Continental War (1793).* 7 vols. Oxford, 1866-1902.

——*Six Centuries of Work and wages.* 2 vols. London, 1884.

ROMANO, R. *Commerce et prix du blé à Marseill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1956.

——' Une économie coloniale: le Chili au XVIIIe siècle. '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1960.

——' Tra XVI e XVII secolo. Una crisi economica: 1619-1622. '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1962.

ROSCHER, W. *Uber Kornhandelund Theuerungspolitik.* Stuttgart, 1852.

ROSSI, E. and ARCARI, P. ' I prezzi a Genova dal XII al XV secolo. ' *La Vita Economica Italiana.* 1933.

SACHS, W. ' Agricultural conditions in the Northern Colonies before the Revolution.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53.

SCHMOLLER, G. ' Die historische Entwicklung des Fleischconsums sowie der Vieh-und Fleischpreise in Deutschland, I, Die Zeit bis zum 30 jährigen Kriege. '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1871.

——*Die historischer Lohnbewegung von 1300-1900 und ihren Ursachen.* Berlin, 1902.

SCHOLLIERS, E. ' De levensstandaard der arbeiders op het einde der XVIe eeuw te Antwerpen. ' *Tijdschrift voor Geschiedenis.* 1955.

SCHUMPETER, E. B. ' English prices and public finance, 1660-1822. ' *Review of Economic Statistics.* 1938.

SELLA, D. ' Les mouvements longs de l' industrie lainière. '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1957. [613]

SIEGEL, S. *Ceny w Warszawie w latach 1701-1815.* Lwow, 1936.

SILLEM. J. A. *Tabellen van marktprijzen van graanen te Utrecht in de jaaren 1393 tot 1644, Verhandelingen der Koninklijke Akademie van Wetenschappen te Amsterdam.* Amsterdam, 1901.

SHAW, W. *The History of the Currency, 1252-1894.* London, 1895.

SIMIAND, F. *Les fluctuations économiques à longue période et la crise mondiale.* Paris, 1932.

——' La monnaie, réalité sociale. ' *Annales sociologiques.* 1934.

——*Recherches anciennes et nouvelles sur le mouvement général des prix du XVIe au XIXe siècle.* Paris, 1932.

SOETBEER, A. *Edelmetall-Produktion und Wertverhaltniss zwischen Gold und Silber zeit der Entdeckung Amerikas bis zur Gegenwart.* Gotha, 1879.

——*Materialen zur Erläuterung und Beurteilungen der wirtschaftlichen Edelmetallverhältnisse und der Währungsfrage.* Gotha, 1881 and 1886.

SPOONER, F. C. *L' économie mondiale et les frappes monétaires en France 1493-1680.* Paris, 1956.

——*Secular Price Movements and Problems in Capital Formation, Report to the Congress on Economic History, Aix-en-Provence.* 1962.

STEFFEN, G.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englischen Lohnarbeiter*(German translation). 3 vols. Stuttgart, 1901-1905.

TENENTI, A. and VIVANTI, C. ' Le film d' un grand système de navigation: les galères vénitiennes XIVe-XVIe Siècles. '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1961.

TOMASZEWSKI, E. *Ceny w Krakowie w latach 1601-1795.* Lwow, 1934.

TOOKE, T. and NEWMARCH, W. *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6 vols. Lon-

don, 1838-57.

Usher, A. P. 'The general course of wheat prices in France 1350-1788.' *Review of Economic Statistics.* 1930.

—— 'Prices of wheat and commodity price indexes for England 1259-1930.' *Review of Economic Statistics.* 1931.

Verhaegen, A. 'Note sur le travail et les salaires en Belgique au XVIIIe siècle.' *Bulletin de l'Institut de Recherches Economiques et Sociales de l'Université de Louvain.* 1953.

Verlinden, C., Craeybeckx. J., and Scholliers, E. 'Mouvements des prix et des salaires en Belgiques au XVIe siècle.'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1955.

Verlinden, C. (director), edited by J. Craeybeckx. *Dokumenten voor de Geschiedenis van Prijzen en Lonen in Vlaanderen en Brabant XVe-XVIIIe eeuw.* Bruges, 1959.

Vettiger, M. *Die agrare Preispolitik des Kantons Basel im 18 Jahrhundert.* Weinfelden, 1941.

Vignols, L. 'Salaires des ouvriers et prix des matériaux employés aux travaux publics à Saint-Malo 1737-1744 et 1755-1762.' *Annales de Bretagne*, 1931.

Vilar, P. 'Elan urbain et mouvement des salaires: le cas de Barcelone au XVIII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950.

—— 'Histoire des prix, histoire générale.'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1949.

—— 'Problems of the formation of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1956.

—— 'Remarques sur l'histoire des prix.'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1961.

Wächter, H. H. *Ostpreussiche Domänenvorwerke im 16 und 17 Jahrhundert.* Würzburg, 1958.

Wailly, N. de. *Mémoire sur les variations de la livre tournois depuis le règne de Saint Louis jusqu'à l'établissement de la monnaie décimale.* Paris, 1857.

Walther, A. 'Geldwert in der Geschichte.'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1912.

Warren, G. F. and Pearson, A. F. *Wholesale Prices for 213 years, 1720 to 1932, Memoir No. 142, Agricultural Experiment St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Ithaca, 1932.

Waschinski, E. *Währung, Preisenwicklung und Kaufkraft des Gelds in Schleswig Holstein von* 1226-1864. 2 vols. Neumünster, 1952-9.

Werwecke, H. van. 'Monnaie de compte et monnaie réelle.' *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Histoire* 1934.

Wiebe, G. *Zur Geschichte der Preisrevolution des XVI und XVII Jahrhunderts.* Leipzig, 1895.

Young, A. *An Inquiry into the Progressive Value of Money in England.* London, 1812.

[614] ——*An Enquiry into the Rise of Prices in Europe.* London, 1815.

Zöpfl, G. 'Eine ältere Getreidepreisstatistik.'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1895.

Zolla, D. 'Les variations du revenu et du prix des terres en France au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Annales de l'Ecole lib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1893-4.

第八章　贸易、社会和国家

Algemene Geschiedenis der Nederlanden (1954). Vols. VII and VIII. (Chapters by J. G. van Dillen and J. de Vries.)

Aström, S. E. *From Cloth to Iron. The Anglo-Baltic Trade in the late Seventeenth Century.* 1963.

Andrews, C. M. *The Colonial Period.* 1912.

Ashley, M. P. *Commercial Policy under the Cromwellian Proctetorate* 1934.

Bailyn, B. *The New England Merchant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1955.

Baasch, E. *Holländi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 1927.

Beer, G. L. *The Old Colonial System.* 2 vols. 1912.

Boissonnade, P. *Colbert.* 1932.

Braudel, F. *La Mediterranée.* 1949.

CHRISTENSEN, A. E. *Dutch Trade to the Baltic about* 1600. 1941.
CIPOLLA, C. 'The decline of Ital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52.
CLARK, G. N. *A Guide to English Commercial Statistics*, 1696–1782. 1938.
COLEMAN, D. C. 'Eli Heckscher and the Idea of Mercantilism.'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57.
COLE, C. W. *French Mercantilist Doctrines before Colbert.* 1931.
——*Colbert and a Century of French Mercantilism.* 2 vols. 1939.
——*French Mercantilism, 1683–1700.* 1943.
——and CLOUGH, S. B.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1941.
COSSA, L. *Guide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W. Jevons). 1880.
——*Guide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L. Dyer). 1893.
CORY, J. *An Essay on the State of England.* 1695.
DAVIES, K. G. *The Royal African Company.* 1936.
DAVIS, R. *The Rise of the English Shipping Industry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1962.
DE WITT, J. *The True Interest and Political Maxims of the Republic.* 1702.
DECKER, M. *An Essay on the Causes of the Decline of the Foreign Trade.* 1739.
DE ROOVER, R. *Gresham on Foreign Exchange* 1949.
DORN, W. L. *Competition for Empire, 1740–1763.* 1940.
ELLIOTT, J. H. 'The decline of Spain.' *Past and Present.* 1961.
FREUDENBERGER, H. *The Waldstein Woollen Mill. Noble Entrepreneurship in Eighteenth Century Bohemia.* 1962.
FRIIS, A. *Alderman Cockayne's Project and the Cloth Trade.* 1927.
GENOVESI, A. *Studi in Onore di.* 1956.
GRAY, A.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Doctrine.* 1948.
HAMMERSTRÖM, I. 'The price revolution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57.
HEATON, H.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Revised ed., 1948.
HECKSCHER, E. *Economic History of Sweden.* Trans. G. Ohlin, 1954.
——*Mercantilism.* 2 vols. Revised ed., 1955.
HARPER, L. A. *The English Navigation Laws.* 1939.
HAUSER, H. 'The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French economic histo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33.
HENDERSON. W. O. *The Stat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Prussia* (1958). [615]
HOUTTE, J. A. VAN. 'Anversaux XVe et XVIe siècles.' *Annales.* 1961.
HUME, D. *Works.* 4 vols. Ed. by T. H. Green and T. H. Grose, 1874.
JUDGES, A. V. 'The idea of the mercantile state.' *Trans.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1939.
KULISCHER, J. *Allgemeine Wirtschaftsgeschichte.* Vol. II. 1929.
LANE, F. and RIEMERSMA, J. C. *Enterprise and Secular Change.* 1953.
LETWIN, W. *Sir Josiah Child, Merchant Economist.* 1959.
LÜTGE, F. *Deutsche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1960.
LUZZATO, G. *An Economic History of Italy.* Trans. P. Jones. 1961.
MANDEVILLE, B. *The Fable of the Bees or Private Vices, Publick Benefits.* 1924.
MACGREGOR, D. H. *Economic Thought and Policy.* 1949.
MCCLOY, S. T. *French Invention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952.
MEOLI, U. *Il Pensiero Economico del Condillac.* 1961.
MORINI-COMBY, J. *Mercantilisme et Protectionnisme.* 1930.
PARIS, R. *Histoire du Commerce de Marseille de* 1660 *à* 1789. 1957.
PETTY, SIR W. *Writings.* 2 vols. Ed. C. H. Hull. 1899.
REDLICH, F.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initial stages of industrialisation.' *Explorations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1954.

——'Academic education for business.'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1957.

SAMUELSSON, K. *Religion and Economic Action*. Trans. G. French. Ed. D. C. Coleman. 1961.

SARRAILH, J. *L'Espagne Eclairée de la Seconde Moitié du XVIIIe siècle*. 1954.

SAVARY, J. *Le Parfait Négociant*. 1675.

SCHMOLLER, G. *The Mercantile System*. 1896.

SCOVILLE, W. C. *The Persecution of the Huguenots and French Economic Development, 1680–1720*. 1960.

SEE, H. *La France Economique et Sociale au XVIIIe siècle*. 1925.

SELLA, D. *Commerci e Industrie a Venezia nel secolo XVII*. 1961.

SMITH, A. *The Wealth of Nations*. 2 vols. Ed. E. Cannan. 1904.

STRAUSS, E. *Sir William Petty*. 1954.

SUPPLE, B. E. *Commercial Crisis and Change in England, 1600–1642*. 1959.

TAWNEY, R. H.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1926.

——*Lionel Cranfield: Business and Politics under James I*. 1958.

THORNTON, A. P. *West India Policy under the Restoration*. 1956.

TUCCI, U. *Lettres d'un Marchand Venitien Andrea Berengo*, 1553–1556. 1957.

TUTTLE, H. *History of Prussia under Frederick the Great*. 2 vols. 1888.

ULLOA, B. *Rétablissement des Manufactures et du Commerce d'Espagne*. 1753.

UZTÁRIZ, G. D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mmerce and Maritime Affairs*. Trans. J. Kippax. 1751.

VAUBAN, S. DE. *Le Dixme Royal*. 1707.

VINER, J. 'Power versus plenty.' *World Politics*. 1948.

VRIES, J. DE. *De Economische Achteruitgang der Republiek in de Achttiende Eeuw*. 1959.

WILSON, C. 'Mercantilism: some vicissitudes of an idea.'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57.

——*Profit and Power*. 1957.

——'Treasure and trade balance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49.

供参考的书目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especially vols. V and VII).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930.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Ed. E. M. Carus-Wilson. Vol. I. 1954; Vols. II and III. 1962.

Stockholm, 1960 (Communications and Contributions to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nomic History).

[616]

索　　引

[1] 原书页码,即本书的边码,下同。——译者注

[617]

【635】

译 后 记

本卷译者及分工如下：

张锦冬：前言，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

钟　和：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八章。

晏　波：第七章。

索引由张锦冬译出，钟和作了修订。

全卷由徐强审订。

由于时间、译者水平及参考资料等因素的制约，尽管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往往推敲再三，踯躅良久，但有时仍未能找到满意的译法，特别是对于一些无从查考的词句，落笔后仍心中惴惴。错误之处，亦在所难免。因此，译者在抱憾之余，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卷译者

2003 年 3 月